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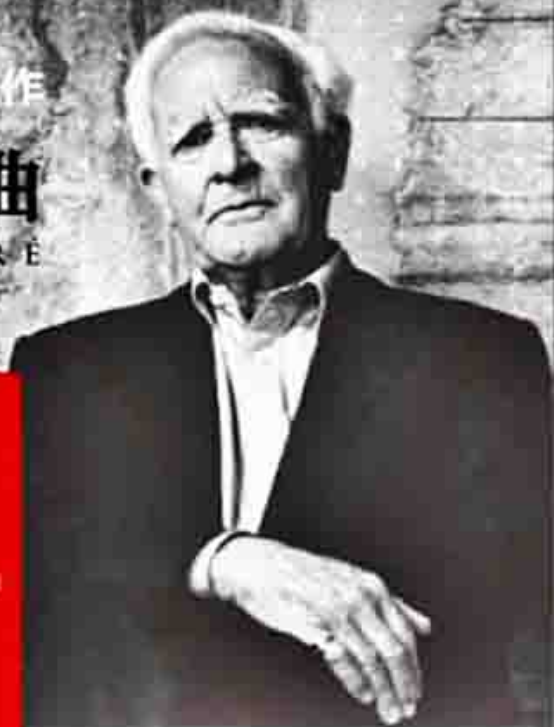
“卷福”、加里·奥德曼 热门电影原著小说

英国文学大师

勒卡雷 经典代表作

史迈利三部曲

JOHN LE CARRÉ



他创造了与福尔摩斯
同样家喻户晓的

乔治·史迈利 之不朽传奇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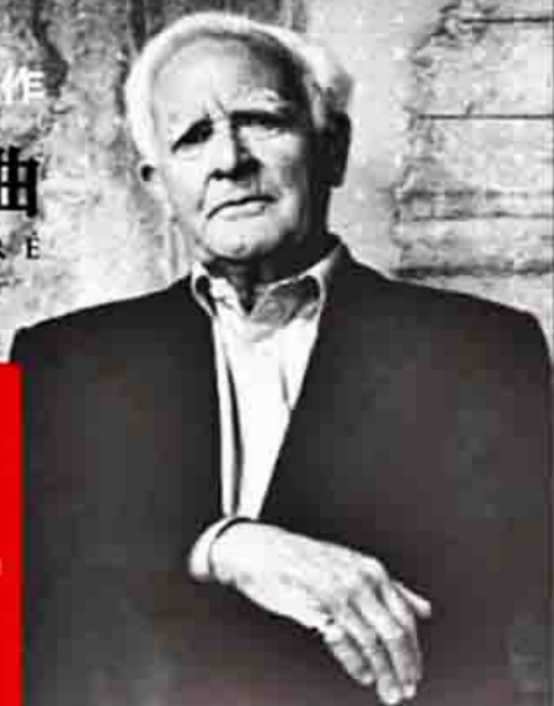
“卷福”、加里·奥德曼 热门电影原著小说

英国文学大师

勒卡雷 经典代表作

史迈利三部曲

JOHN LE CARRÉ



他创造了与福尔摩斯
同样家喻户晓的

乔治·史迈利 之不朽传奇



浙江文艺

史迈利间谍三部曲

勒卡雷 著

第1册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第1篇 上篇

说实话，要是杜佛少校这个老头没有在汤顿赛马场上突然中风死去，吉姆是根本不会到瑟斯古德学校来的。他没有经过面试就在学期中来了。时间是在五月末，不过从气候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已是五月末了。他是通过专门为预备学校介绍教员的一家不太可靠的介绍所来的，暂时应付一下杜佛老头的课，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是个语言专家，”瑟斯古德在教员休息室对大家说，“是临时性的。”他把额上的一绺头发往上一撩，有点为自己分辩地说。“姓普莱多，”他把字母一个个拼出来，“p—r—i—d”——法语不是瑟斯古德的专长，因此他参看一下手里的纸条——“e—a—u—x，名叫吉姆。我想他帮我们应付到七月没有问题。”教员们不难听出他话里的暗示。吉姆·普莱多是教员里的穷白人。他跟以前的勒夫戴太太和马特贝先生属于同一类，都不怎么样。勒夫戴太太有一件波斯羔羊皮大衣，颇受年轻人崇拜，结果她却是个开空头支票的。马特贝先生是钢琴家，但在为合唱团练唱伴奏时被叫了出来，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就目前所知，他至今还在继续协助，因为他的衣箱仍放在地下室里等待处理。好些教员，其实主要是马乔里班克斯，主张开箱检查。他们说，其中一定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失物，例如阿普拉米安的黎巴嫩母亲的银框相片、贝斯特-英格拉姆的瑞士军用折刀、女舍监的手表。但是瑟斯古德板着他那没有皱纹的脸，坚决不为他们的请求所动。他从他父亲那里接手管理这所学校才五年，可是这五年的时间已经教会他，有些东西最好还是锁起来为妙。

吉姆·普莱多在某个星期五的滂沱大雨中到达。大雨像大炮硝烟似的从昆托克山的褐色山沟里滚滚而下，流过空旷的板球场，渗透到了快要倾圮的校舍的沙岩石墙基里。他是在刚吃过午饭后不久到的，开着一辆红色的阿尔维斯牌旧车，后面拖着一辆旅行住房用的拖车，原来是蓝色的，几经易手，如今已说不上是什么颜色了。瑟斯古德学校的午后一片宁静，上课的日子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吵吵嚷嚷的，惟有这时才有片刻的安静。学生们都被打发到宿舍里去午休了，教员们则坐在休息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或者改作业。瑟斯古德在替他母亲朗读小说。因此，整个学校里只有小家伙比尔·罗奇亲眼看到吉姆到达，看到阿尔维斯牌汽车从坑坑洼洼的汽车道上吱吱地溅着水开过来，车头上冒着汽，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子不断地来回扫划，后面的拖车在水潭里颠簸地跟着。

那时罗奇还是个新生，大家都认为，如果不说他天赋有什么缺陷的话，至少也有点笨。他在两个学期里已经换过两个预备学校了，瑟斯古德学校是第二个。他是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孩子，患有气喘病，大部分午休时间里都跪在床头上，趴在窗口向窗外瞭望。他的母亲住在巴斯，生活阔绰。大家都认为他父亲是全校最有钱的家长，这样显赫的地位却叫儿子吃了不少苦头。罗奇既然来自父母分居的家庭，天生就是个喜欢留神观察的人。罗奇观察到吉姆没有在校舍前面停下来，却继续往前

开，一直开到马厩那边去，可见他对这个地方的布局早已了若指掌。后来罗奇想他一定先来勘察过地形，或者研究过地图。他开到马厩那里以后，也没有停下来，仍保持原来的车速，一直向湿草丛中开过去，接着就翻过了土墩，倒栽葱似的掉到大坑里去，没有了踪影。罗奇原来以为吉姆开得那么快，拖车会跟前面的车子折成直角挂在坑边上，可是结果却像一只大兔子翘起尾巴跳进洞里一样，没有踪影了。

大坑的来历在瑟斯古德学校里传说纷纭。它位于果园、果房和马厩之间的一片荒地，看上去不过是地上凹了一块，杂草丛生。北面有几个小土墩，每个土墩都有一个孩子的身子那么高，上面有一丛丛的灌木，一到夏天就长得密密麻麻。就是由于这些小土墩，大坑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地方，因之出了名，关于它的传说随每一届新生的想像力而异。有一年说，这些小土墩是露天银矿的遗迹，于是大家都起劲地开始挖掘宝藏。又有一年说，这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堡垒，于是大家都挥舞棍棒、投掷土块，在这里布阵厮杀。也有一年说大坑是战时的炸弹坑，土墩是炸弹开花时被埋在里面坐着的人体。实际情况却要平淡无奇得多。六年以前，也就是瑟斯古德的父亲突然与城堡旅馆女职员私奔之前不久，他发起修建游泳池，动员学生挖了一个大坑，一头深一头浅。但是募捐来的钱总是不够实现这个雄心，因此就在别的计划上零零碎碎地花掉了，像替美术课购置了一台新的投影机啦，在学校地窖里人工培植蘑菇啦，等等。爱挖苦的人甚至还说，那对私通的情人最后逃到女方故乡德国时，还卷走了一部分捐款。

吉姆不知道这些事情。事实是，他选择瑟斯古德学校里那个在罗奇心中有着神怪传说的角落，这完全是碰巧。

罗奇趴在窗口上等着，不过再没有看到什么了。阿尔维斯牌汽车和拖车都已陷在坑里，要不是草地上有车轮的红泥湿印，他很可能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在做白日梦呢。但是车轮印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午休结束打铃时，他穿上长统雨靴，冒雨蹚水到了大坑边上，爬到高处往下望。吉姆身穿军用雨衣，头戴一顶很特别的帽子，帽檐很宽，像非洲猎帽，但是毛茸茸的，一边卷起，像个放荡不羁的海盗似的满不在乎，上面的雨水就像顺沟而下那么直灌下来。

阿尔维斯牌汽车现在出现在马厩院子里。罗奇始终没有弄明白，吉姆是怎样把它弄出大坑的，但是拖车却还在下面坑里，就在原来预定挖得比较深的一头，停在砖砌的坑底上。吉姆坐在车门踏级上，用一个绿色塑料平底杯喝酒，一只手揉着右肩，好像碰到了什么地方似的。这时大雨如注，从他的帽檐上直灌而下。帽子抬了一下，罗奇看到了一张赤如烈火的脸，褐色的胡子被雨水粘在一起，像两撇犬牙，在帽檐的掩映下，他的脸色显得更红了。脸上尽是横一道竖一道的皱褶，又深又弯曲。罗奇突发奇想，他一定在热带的什么地方挨过饿，饿瘪了以后又饱餐一顿，才把身上填补起来，因此脸上有这么多的皱褶。他的左臂仍横在胸前，右肩高耸在颈后。但整个蜷缩的形状静止不动，像一头冻僵了的动物，凝住在背景前。罗奇一时又突发奇想，希望这是一头雄鹿，一

种高贵的动物。

“你这小子是谁？”问话的声音非常像个军人。

“我叫罗奇，先生。我是个新生。”

帽影下面红砖一般的脸打量了罗奇大半天。接着，使罗奇感到放心的是，他的脸色和缓了下来，露出了狼一般的笑容，左手仍按在右肩上，慢慢地又按摩起来，同时他又就着宽口塑料杯喝了一大口。

“新生，喂？”吉姆对着杯口说，仍在微笑，“这我倒没有想到。”

吉姆现在站了起来，把驼着的背转向罗奇，开始仔细检查起拖车的四条支腿来。这次检查非常严格，把车下的弹簧摇晃了半晌，又把装扮奇怪的车头不断抬高一些，以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地方垫上了几块砖头。在这当儿，春雨如注，下个不停，淅淅沥沥地打在他的雨衣上、帽子上、拖车的车顶上。罗奇注意到，在这一切动作中，吉姆的右肩纹丝不动，高高地鼓在他的颈后，好像雨衣下面塞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因此，他心里想，吉姆是不是一个大驼背，凡是驼背的人是不是都像吉姆那样容易碰痛。而且他还注意到一个普遍规律，值得记住，以后可以应用，那就是背驼的人走起路来步子跨得大，这是为了要保持平衡。

“新生，是吗？我可不是新生，”吉姆一边拉一拉拖车的一条支腿，一边继续说，口气要比刚才友善多了，“我是个老生。你要知道到底多老，那么我告诉你，像瑞普·凡·温克尔2一样老，还要老一些。有朋友吗？”

“没有，先生。”罗奇简单地回答。学生在作否定的回答时都用这种有气无力的口气，肯定的话是让问话的人说。可是，吉姆却什么话也没有说，罗奇突然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一种希望感。

“我的名字叫比尔，”他说，“我受洗时的正式名字就叫比尔，可是瑟斯古德叫我威廉3。”

“比尔，是啊。没付的账单4。有人这么叫过你吗？”

“没有，先生。”

“反正名字不错。”

“谢谢您，先生。”

“我认识不少叫比尔的，他们都是好样的。”

这样，两人都算是作了自我介绍。吉姆没有把罗奇撵走，因此罗奇就在坑边上待着，透过他雨水淋湿的眼镜往下望去。他吃惊地注意到，砖块是从黄瓜架上卸下来的。有几块已经松了，吉姆一定又弄松了一些。罗奇感到很高兴，居然有人刚到瑟斯古德学校就敢这样自作主张，真的挖起学校的墙脚用在自己身上。尤其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吉姆打开了自来水龙头取水，因为那个水龙头是学校特殊规定谁也不许碰的东西：碰一下就会被罚一顿揍。

“喂，比尔，我问你。你身上有没有正好带着弹珠什么的？”

“什么，先生，什么？”罗奇摸摸口袋，有点茫然。

“弹珠，老兄。圆圆的玻璃球，那么小的。难道现在学生不玩弹珠啦？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可是玩的。”

罗奇没有弹珠，可是阿普拉米安却有一大堆，从贝鲁特用飞机运来的。罗奇花了大约五十秒钟急忙跑回学校去，冒了极大的风险搞到了一颗，又气喘吁吁地跑回到坑边。他一到坑边就迟疑起来，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大坑已是吉姆的产业了，罗奇要下去得取得他的许可。但是吉姆已经到拖车里面去了，所以罗奇稍微等了一下以后，就蹑手蹑脚地从坑边走下去，从门口伸手把弹珠递进去。吉姆一时没有瞧见他，他正在喝着杯里的酒，呆呆地望着窗外天上的乌云在昆托克山顶上聚起来又散开去。罗奇注意到，这个喝酒的动作实在很困难，因为吉姆要站直身子对着杯口喝，不容易做到。要达到这个角度，他得把佝偻的身子往后仰。这时雨又下大了，像小石子似的噼里啪啦打在拖车上。

“先生。”罗奇叫他，但是吉姆一动也不动。

“阿尔维斯汽车的毛病是，他妈的没有弹簧避震，”吉姆终于开腔道，与其说是对着他的客人，不如说是对着窗户说的，“你开着车，屁股等于挨着路面白线，谁都会变成残废的。”他又往后一仰，喝了一口。

“是啊，先生。”罗奇说。他没有想到吉姆居然以为他会开车。

吉姆已经摘掉帽子。他的淡褐色头发剪得很短，有几块地方剪刀下得太狠了些，露出一道道刀痕，都集中在一边。因此罗奇猜想，吉姆是用他那条好胳膊自己剪头发，这样一来，他看上去更是歪一边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颗弹珠。”罗奇说。

“很好。谢谢你，老兄。”他把弹珠接了过去，放在他硬邦邦的粗糙手心里慢慢滚来滚去。罗奇马上知道他对什么东西都非常在行，他这号人物对什么工具、什么家伙都非常得心应手。“这车不平，你瞧，比尔，”他仍一心一意端详着弹珠说，“一头斜，像我一样。你瞧。”他转身到大窗户一边。大窗户下面有一条铝边，放在那里承接流下来的水。吉姆把弹珠放在上面，看着它朝一头滚去，掉到了地上。

“一头斜，”他又说，“朝车尾一头斜。这可不行。喂，喂，你这小家伙，你上哪儿去啦？”

罗奇一边弯下身去找弹珠，一边注意到这拖车一点也不舒服。尽管里头收拾得特别干净，随便谁都可以是它的主人。车里有一个床铺、一张凳子、一个船上用的炉灶、一个液化气罐。罗奇想，他妻子的照片甚至连一张也没有。罗奇还没有碰见过单身汉，不过瑟斯古德先生除外。他能找到的仅有一些属于个人的东西，是挂在门上的一只网袋、床铺旁边放的一个针线包、一个自制的淋浴喷头，用饼干筒打了洞，干净利落地焊接在车顶上。桌子上有一瓶无色的酒，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

酒，因为罗奇在假期到他父亲住的公寓度周末时，他父亲喝的就是这种酒。

“看上去东西向还可以，但是南北向肯定是一头斜。”吉姆试一试其他的窗框，“你擅长什么，比尔？”

“我也不知道，先生。”罗奇木然说。

“得有个专长，人人都是这样。足球踢得怎么样？你会踢足球吗，比尔？”

“不会，先生。”罗奇说。

“那么你是个书呆子？”吉姆漫不经心地问，一边哼了一声，倒在床上，喝了一口杯里的酒。“不过我说，你一点也不像是个书呆子，”他有礼貌地又补了一句，“不过你爱独来独往。”

“我也不知道。”罗奇又重复了一遍，朝着打开的门挪了半步。

“那么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呢？”他又喝了一大口，“你总有个专长，比尔，人人都是这样。我最擅长的是打水漂。祝你健康。”

在此时此刻向罗奇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得当，因为他自己正一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感到苦恼。他最近甚至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什么目标。不论在学习或玩乐上，他都觉得自己有严重的欠缺；甚至学校生活中的日常事情，例如叠被子、收拾衣服，他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而且他也不够虔诚，这是瑟斯古德老太太对他这么说的；他在教堂里不该常常板着脸孔。对于这些缺点，他都怪自己不好，但是他最责怪自己的，还是破坏了父母的婚姻，他应该早有预见，采取步骤来防止的。他有时甚至想，他是不是有更加直接的责任，例如，他是不是天生邪恶、破坏成性、懒散成习，他的这种恶劣性格造成了父母的不和。他在以前的那个学校里，曾想用大声叫喊来表明这一点，甚至假装发羊痫风，他的姑姑有这毛病。他的父母为此特地见了面，商量了一下——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人，常常这样做——最后决定让他转学。因此，在一辆抛了锚的拖车边上，由一个他几乎盲目崇拜的人——而且和自己一样也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无意之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差点让他招架不住。他觉得脸上的血往上涌，镜片上雾气迷蒙，拖车开始融化成一片苦海。罗奇也没有弄清楚，是不是吉姆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见他突然转过身去，驼着的背面向他。他走到桌边，一边说几句补救的话，一边又喝着杯里的酒。

“反正，你观察很仔细，这一点没有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老兄。咱们独来独往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人可以依靠，对吗？没有别人看到我。你在那边坑上一出现，让我吓了一跳，以为你是会变魔法的。我敢打赌，比尔·罗奇是全校观察最仔细的人，只要戴着眼镜。是吗？”

“是的，”罗奇感激地表示同意，“我是这样。”

“那么好吧，你就留在这里，留心观察，”吉姆命令道，把非洲猎帽

又戴在头上，“我要出去，修理一下支腿。好吗？”

“好的，先生。”

“那弹珠呢？”

“在这里，先生。”

“它一滚就叫我，好吗？朝北，朝南，不管它朝什么方向滚。懂吗？”

“懂，先生。”

“知道哪一边朝北吗？”

“那边。”罗奇马上伸出胳膊，随便指着一个方向说。

“对。那么好吧，它一滚你就叫。”吉姆又说了一遍，然后到雨中去了。一分钟后，罗奇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摇晃，当吉姆在使劲扳一条支腿时，他又听见了一声不知是痛苦还是愤怒的咆哮。

在那年夏季这个学期里，学生们替吉姆取了一个外号。他们试了好几个名字，最后才人人满意。他们先叫他“骑兵”，因为他有点儿军人气概，有时喜欢无伤大雅地骂几声，常常独自在昆托克山间闲逛。尽管如此，“骑兵”没有叫开。后来他们又叫他“海盗”，有一阵子还叫“匈牙利炖牛肉”，那是因为他爱吃辣。当他们列队走过大坑到教堂去做晚祷时，总有热气腾腾的咖喱、葱头、辣椒的香味向他们飘来。叫他“匈牙利炖牛肉”也是因为他的法语地道，大家认为法语就是连汤带水的。五年级乙班的斯巴克莱能够把他的法语学得惟妙惟肖：“你已经听到了所提的问题，伯格，艾米尔在看什么？”——右手痉挛地一挥——“别瞪着眼睛瞧我，老兄，我又不是施魔法的。Qu'est-ce qu'il regarde, Emile dans le tableau que tu as sous le nez ? Mon cher Berger, 如果你不能马上回答出一句清楚的法语来，je te mettrai tout de suite à la porte, tu comprends, 你这傻蛋？”5

不过这种吓人的威胁，不论是用法语还是用英语，都从来没有真的实行过，反而很奇怪地增加了他身上的温和神态，这只有透过孩子们的眼光才能看到。

但是，他们对“匈牙利炖牛肉”也不满意。这个外号缺乏其中所包含的泼辣劲儿，没有考虑到吉姆热爱英国的感情，要想引他斗嘴，用这方面的话题去逗他准没有错。傻蛋斯巴克莱只要敢对女王说一句不敬的话，赞叹一下外国哪个地方的美妙，尤其是个热带国家，那么吉姆的脸就会马上涨得通红，一口气说上三分钟身为英国人有多大福气的大道理。他明知道他们是在逗他，但还是上了钩。他说完他的大道理后，常常露出懊丧的笑容，自言自语说什么上当啦、不及格啦之类，还有什么有人脸上要不好看啦，因为要挨罚，多加作业，不能去玩足球了。但是他确实热爱英国，因为说到头，到底没有人为此吃了亏呀。

“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他有一次大声叫道，“知道为什么吗？傻蛋，

知道为什么吗？”

斯巴克莱不知道，于是吉姆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地球。他说，西边，是美国，尽是贪心不足的傻瓜，糟蹋了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东方是中国和俄国——他对它们不加区别——工作服、劳改营、没完没了的长征。在中间则是英国……

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外号叫“犀牛”（Rhino）。

这一半是与“普莱多”谐音，一半是指他喜欢在野外生活和他对体育运动的爱好，这是他们常常看到的。他们早起脱光了衣服，冷得瑟瑟发抖，在排队等洗淋浴时，就可以看到“犀牛”大清早散步已经回来了，驼着的背上背着一个帆布背包，大踏步从峡谷路走过来。晚上就寝时，他们可以瞥见手球场塑料顶篷里，他不知疲倦地在向混凝土墙上击球的孤单身影。有时，黄昏天气暖和，他们可以从宿舍窗户中偷看他打高尔夫球。他常常是先向他们读一本随手从昏暗图书馆抓来的极其英国味的冒险小说，像比格尔斯、潘西·威斯特曼或者杰弗里·法诺尔的小说，然后才去玩高尔夫球，带着一根旧得一塌糊涂的铁头球棍，在场地上走来走去。每次击球，他们在他扭过背使劲向前挥球棍的时候，都等他发出“哼哧”的一声，他从来没有叫他们失望过，他们保持了完整的纪录。在教职员板球赛上，他打到了七十五分才下场，有意把球打得高高的，送给右后方的斯巴克莱。“接住，傻蛋，接住——发出去。好球，斯巴克莱，好孩子，你待在那里就是为着这个。”

尽管他天性宽厚，但是大家都公认他非常了解犯罪心理。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最足以说明的一次发生在学期结束前几天，斯巴克莱在吉姆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第二天的试题，他就拿来出租给考生，每次收费五个新便士。许多学生付了钱后，在宿舍里连夜用手电筒照着，背诵答案，一宿没有睡好。但是临考试时，吉姆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试题。

他坐下来大声道：“这一份试题，你们大家都免费。”接着他就翻开了《每日电讯报》，开始专心致志地读起“施魔法的人”的最新见解了，他们明白这是指几乎任何有头脑的人，哪怕他只是一个为女王利益写文章的人。

最后还有那个猫头鹰事件，在他们对他的看法中，这另有意义，因为这件事牵涉到死亡，而对于死亡这个现象，孩子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一个星期三，天气还冷，吉姆提了一桶煤到教室里，就在壁炉中生起火来。他背对着炉火，坐在那里取暖，一边读着一篇法语听写题。先是壁炉烟囱里掉了一些脏土下来，他没有理会，接着就掉下来那只猫头鹰。那是一只很大的谷仓猫头鹰，肯定是因为在杜佛的时代，多年以来，不论冬夏，从来都不清除烟囱里的积尘，它就在烟囱里做起了窝，如今给煤烟熏得昏头昏脑，在烟囱里拼命扑翅挣扎，已经弄得全身发黑，精疲力竭了。它掉在煤块上，又滚到地板上，嘴里叽叽呱呱，身上一阵哆嗦，接着就瘫倒在那里，好像是魔鬼的密使。它的身子蜷缩，翅膀张开，胸口还有点呼吸，眼皮上蒙着脏土，但是脏土缝里那双发呆的

眼睛，却直瞪瞪地望着那些学生。没有人不感到害怕，甚至众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汉斯巴克莱也吓怕了。不过吉姆除外。他一言不发，马上把那只飞禽收拾起来，拎到外面去。他们像船上的偷渡客一样，屏息凝神地谛听外面的动静，却听不到什么声音，直到最后才听见走廊那头的水龙头在放水，那显然是吉姆在洗手。斯巴克莱说“他在撒尿了”，这话引起一阵不安的哄笑。但是他们下了课鱼贯走出教室时，发现在大坑旁边的混合肥料堆上，猫头鹰被扔在那里，完全死了，等待埋葬。胆子大一些的人上前一看，发现脖子已经被折断。只有猎场看守人才会这样干净利落地弄死一只猫头鹰，这话是苏德雷说的，因为他家才有猎场看守人。

瑟斯古德这个学校里的其他人，对吉姆的看法却不那么一致。钢琴家马特贝先生的阴魂不散。女舍监站在比尔·罗奇一边，认为吉姆了不起，需要特别照顾：他的背那么驼，可是却行动自如，真是奇迹。马乔里班克斯则说，他是在喝醉酒的时候被公共汽车压的。也是马乔里班克斯，在吉姆表现突出的那次教职员板球赛上，指出那件厚运动衫可能来历不明。马乔里班克斯不是板球队员，但是他与瑟斯古德一起走过来看比赛。

“你认为那件运动衫来路是正大光明的，还是顺手牵羊来的？”他大声问道。

“里奥纳德，这话可太不公道的。”瑟斯古德责备道，一边不断地拍着他的猎犬的侧腹，“咬他，琴妮，咬这坏人。”

但是等到瑟斯古德回到书房里的时候，他已没有笑意，老是觉得放心不下。冒充牛津大学出身的人，他能对付，就像他自己念书时，遇到过不识希腊文的古文老师和不懂神学的牧师一样。这种人在证据面前知道瞒不过去，就会支持不住，最终痛哭流涕，自动告退求去，或者愿意降薪留职。但是真正有成就却隐姓埋名的人，他还没有碰到过，不过他知道自己是不会喜欢他们的。他查了一下校历，就打电话给斯特罗尔和梅德莱介绍所里一个叫斯特罗尔先生的人。

“你到底想要了解什么？”斯特罗尔先生大声叹了一口气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要了解的。”瑟斯古德的母亲在刺绣，假装没有在看，“只不过是，既然要一份书面简历，那就得要完整，不要有遗漏。何况我们付了中介费。”

这时瑟斯古德忽然想，是不是把斯特罗尔先生从沉睡中叫醒过来以后，他又睡着了。

“非常爱国的家伙。”斯特罗尔先生终于开腔道。

“我并不是因为他爱国才聘请他的。”

“他一直没工作，”斯特罗尔细声细气地说道，声音好像是从烟雾腾腾中透过来的，“住了院。脊髓的毛病。”

“这话不错。但是我想他过去二十五年里总不见得都是住在医院里

吧。真讨厌。”这最后一句话，他是对他母亲说的，他的手掩着话筒。他这时忽然觉得斯特罗尔先生又睡着了。

“你只雇用他到这学期末，”斯特罗尔轻声说，“你如果不喜欢他，到时候辞退他就得啦。你要的是代课老师，给你的也是代课老师。你说要便宜，给你的也是便宜的。”

“话虽是这么说，”瑟斯古德理直气壮地反驳，“可是我付了你二十镑金币的介绍费，我的父亲跟你来往已有好多年了，你们总得给我一定的保证呀。你在这里是这么写的——我读给你听——你在这里是这么写的：‘受伤前曾在海外任职，从事商业和勘探工作。’把一辈子的工作用这么一句话带过去，未免太含糊了，你说是不是？”

他的母亲一边刺绣，一边点头。“可不是？”她大声接腔道。

“这是第一点。我还要说一点——”

“别多说了，亲爱的。”他母亲提醒他。

“我知道他一九三八年曾在牛津待过。他为什么没有念到毕业？出了什么事？”

“我好像记得那时候大家都中断了学业，”斯特罗尔先生隔了好久以后又说，“只是你太年轻，恐怕记不得了。”

“这么多年他总不可能是在监牢里。”他母亲在沉默了很久以后又说，一边仍低着头刺绣。

“他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瑟斯古德郁郁不乐地说，眼光越过大风吹刮的花园，呆呆地朝着大坑那边看着。

在整个暑假里，比尔·罗奇轮流在他爸爸和妈妈那里住，很不自在，他也始终惦记着吉姆：不知他的背疼不疼；他现在没有课，只有半个学期的薪水，不知在干什么活儿挣钱；尤其是，下学期开学后，他是不是仍在那里任课。因为比尔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吉姆生活在地球的表面上很不平稳，随时随地都可能掉下去，深不见底。他担心吉姆像他自己一样，没有自然的地心吸力吸住他。他回忆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特别是关于吉姆问他有没有朋友的话，他很担心，生怕就像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慈爱一样，也辜负了吉姆的情谊，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年龄的悬殊。因此，吉姆可能已经到别的地方找友伴去了，他仿佛看到了吉姆的浅灰色的眼睛在别的学校东寻西觅。他也想像，吉姆像自己一样，也曾经有过自己所爱恋的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因此想找个人来代替。但是想到这里，比尔·罗奇的想像力进了死胡同：他对于成年人怎样互相爱恋无法想像。

除了瞎想以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查看了一本医学书，又向他母亲打听关于驼背的情况，他很想偷一瓶他父亲的伏特加酒，拿到瑟斯古德学校当做礼物，但是他又不敢。最后他母亲的司机把他送到可恨的台阶上时，他连再见也不说一声，就拼命地飞快跑到大坑的顶上。看

到吉姆的拖车仍在下面老地方，觉得无限地高兴，只是拖车比以前更脏了，旁边还新翻了一块地，大概是种过冬的蔬菜的。吉姆正坐在车门踏板上向他憨笑，好像他已听到比尔来了，在他出现在坑边之前就摆出欢迎的笑容似的。

就在这个学期，吉姆给罗奇取了一个外号。他不再叫他比尔，改称大胖。他没有说明原因，而罗奇呢，也无法反对，在取名字的事情上一般都是这样。罗奇则以吉姆的监护人自命，他心中自称是摄政王，代替吉姆的那个离去的朋友，不管那朋友可能是谁。

不像吉姆·普莱多，乔治·史迈利先生天性不擅在雨中赶路，尤其是在深夜。说真的，他很可能是比尔·罗奇将来长大成人最后定型的样子。矮胖结实，年纪最多刚到中年，从外表上看，他属于伦敦常见的那一类与世无争、温和驯顺的人。他腿短，步履一点也不灵活，他的衣着质地讲究，却不合尺寸，这时已淋得湿透。他的大衣有一种老光棍的味道，那种黑的料子和松软的织法似乎是为了保存水汽。或者是他的衣袖太长了，或者是他的胳膊太短了，就像罗奇一样，他穿上雨衣，袖口总是几乎盖没了他的手指。为了爱体面，他不戴帽子，因为戴了帽子使他显得滑稽可笑，确实是这样。“像个小鸡蛋。”他美丽的太太最近一次离开他之前不久就这么说过，她的评语往往产生长期效应，这次也不例外。因此雨水在他厚厚的眼镜片上不断形成大滴的水珠，使他只得一会儿低头，一会儿仰头，才能看清维多利亚车站那已经被煤烟熏黑的拱门旁的人行道。他是朝西走，回到他住的切尔西住宅区去。他的步履，不知什么缘故，略有迟疑，如果这个当儿吉姆·普莱多从黑暗中出来问他有没有什么朋友，他大概会回答说，什么朋友不朋友的，能叫到一辆出租车就不错了。

“罗迪说话没完没了。”他自言自语道，一阵急雨又落在他那胖乎乎的脸颊上，流到他已经湿透了的衬衫里，“我为什么不站起来就走？”

史迈利一阵后悔，再一次检查自己落到目前痛苦处境的原因，结论是：这完全是自作自受。这样冷静的态度与他秉性谦恭是分不开的。

这一天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头天晚上睡得太迟了，他早上起得特别晚，自从去年退休以来，这已慢慢成了习惯。他发现咖啡已经喝完，就到杂货店去排队，结果等得失了耐心，于是就决定索性办一下个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早上邮差送来的银行结账单显示，他的妻子已经把他每月养老金提取了大部分。他想，好吧，那就卖掉点什么东西。这个决定有点意气用事，因为他经济情况不错，负责他养老金的那家小银行按月付款，从不拖欠。但是他还是把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收藏的格里美尔斯豪森6著作的一册初版珍本包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往寇松街海伍德·希尔书店去，他在那里偶尔和店老板做成一两笔和气的买卖。他在路上越想越气，在公用电话亭里跟他的律师约定下午去见他。

“乔治，你怎么能这么庸俗？没有人会和安恩闹离婚的。送束花给她，然后到我这里来吃中饭。”

这个劝告使他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一些，到海伍德·希尔书店去时心境已很愉快，但是迎面却碰上了罗迪·马丁台尔，他正好从琼佩理发店每周一次理完发出来。

不论从职业上，或社交上来说，马丁台尔都不够资格和史迈利有来往。他在外交部的交际部门工作，他的任务是设午宴招待别人连在柴房

也不愿招待的外宾。他是个行踪不定的单身汉，一头灰发，动作是胖人特有的那种灵活轻捷。他喜欢在上衣翻领扣眼上插朵鲜花，穿淡色衣服，稍有机会就喜欢拉拉扯扯，装得好像和白厅7的机要部门关系很熟的样子。几年前他曾“叨陪末座”，参加了白厅一个统一调度谍报工作的小组，但不久这个小组就解散了。战时因为他有些数学才能，也在秘密工作圈子的边缘上徘徊，一度在圆场和约翰·兰斯伯里一起参加过一项昙花一现的密码工作，这件事他老是没完没了地提起。但是战争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史迈利有时就得这样提醒自己。

“哈罗，罗迪，”史迈利说，“真高兴见到你。”

马丁台尔说起话来有种上等阶级讲心里话时旁若无人、大声嚷嚷的习惯，在外国度假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弄得史迈利很尴尬，连忙搬出旅馆，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好家伙，那不是谍报大师他本人吗！他们说你已经到圣加伦修道院之类的地方，和僧侣们一起关起门来研读中世纪的手稿了！请马上向我坦白吧。我要知道你究竟在干些什么，一点不漏。你身体怎么样？仍旧爱英国吗？你那漂亮的太太好吗？”他游移不定的目光在街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到史迈利腋下那册包装好的格里美尔斯豪森的著作上，“我敢打赌，这一定是你送给她的礼物。他们说你宠坏她了。”他放低声音，可是仍旧震耳：“我说，你是不是又回来干老本行了？别告诉我这都不过是掩护，乔治，是掩护吗？”他尖尖的舌头舔着他的小嘴巴的湿嘴唇，接着，像一条蛇一样，又消失在嘴缝里了。

这样，史迈利尽管责备自己太蠢，还是同意当天晚上到他们两人都是会员的曼彻斯特广场上一家俱乐部去吃晚饭，这样好不容易才把他打发掉。史迈利平时对那家俱乐部视为畏途，避之犹恐不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马丁台尔也是会员。到了晚上，他在白塔饭店吃的中饭仍饱饱的还没有消化掉，因为他的律师是个从来不亏待自己的人，认为只有一顿丰盛的美餐才能使乔治摆脱意气消沉。马丁台尔根据另一种方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有四小时之久，他们前面摆着史迈利不想吃的菜肴，交谈着一些熟人的名字，好像他们是被人遗忘的足球队员一样。先是谈到史迈利以前的导师杰比第：“我们的莫大损失，上帝保佑他。”马丁台尔喃喃地说，但是据史迈利所知，马丁台尔从来没有见过杰比第。“唉，真是行家，你说是不是？可以说，是个真正有才学的人。”接着又说剑桥大学出身的法国中世纪专家菲尔丁：“真有幽默感！头脑清楚，非常敏锐！”接着是东方语言学院出身的斯巴克，最后是斯蒂德·阿斯普莱。俱乐部就是他为了逃避罗迪·马丁台尔那样的俗物而成立的。

“你知道，我认识他可怜的兄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心思都用到别的方面去了。”

史迈利就在酒意蒙眬之中听着他这些废话，嘴上还不时地附和着“是啊”、“不是”、“真可惜”、“没有，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他”，有一次还使他

脸红了半天：“唉，别这么说，你过奖了。”最后，马丁台尔终于谈到了一些最近的事：权力的替换和史迈利的退隐。

不出所料，他从老总最后几天的日子开始说起：“你的老上司，乔治，上帝保佑他，他是惟一能把自己的名字保密的人。当然，对你是不保密的，他对你从来没有隐瞒什么吧，是不是，乔治？他们说，史迈利和老总亲如兄弟，一直到死都是这样。”

“他们过奖了。”

“别急，乔治。你忘了我是个老鸟。你和老总就是那样。”他胖乎乎的手做了一个象征结婚的动作，“这就是你给撵出来的原因，不用骗我，这就是比尔·海顿谋到你的差使的原因。这就是他，而不是你，当上潘西·阿勒莱恩的助手的原因。”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罗迪。”

“我要这样说。我要说的还不止这些，还要多得多。”

马丁台尔俯身靠过来的时候，史迈利闻到了琼佩理发店特有的一种刺鼻的香水味。

“我还要说的是，老总根本没有死。有人看到他了。”他连忙摇手，不让史迈利否认，“让我把话说完。维利·安德鲁瓦沙在约翰尼斯堡机场候机室里碰到了他。不是阴魂。有血有肉。维利因为天气太热在酒吧里买一杯苏打水喝，你最近没有见到维利，他胖得像个气球。他转过身来，老总就坐在他旁边，一副布尔人8的穿戴，难看得吓死人。他一见到维利就溜掉了。你觉得怎么样？所以我们都知道了。老总根本没有死。他是被潘西·阿勒莱恩和他的三人帮排挤走的，因此到南非躲了起来，愿上帝保佑他。但是，你不能怪他，是不是？谁都想平平安安度过晚年，你怎么能怪他？我就不怪他。”

史迈利精疲力竭，神经越来越麻木，老半天才听明白这种谣言的荒诞无稽，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荒唐的事情！老总死了。他是长期患病以后，心脏病发作死的。而且他最不喜欢南非了。除了萨里、圆场、贵族板球场以外，他什么地方都不喜欢。真的，罗迪，你不能散播这样的谣言。”他大可以再加一句：是我在去年圣诞节前夕，独自一人看着他在伦敦东区的一个火葬场里被下葬的。那个牧师说话还口吃。

“维利·安德鲁瓦沙总喜欢说瞎话，”马丁台尔毫不在乎地沉思说，“我也这样对他说：‘完全是胡说八道，维利，你应该觉得难为情。’”好像他不论从思想上或者口头上，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种愚蠢的谣言似的。他马上又说：“给老总的棺材钉上最后一个钉子的，大概是捷克事件吧。那个可怜的家伙，背上挨了一枪，把事情闹到上报了，听说他与比尔·海顿一直很亲密。埃利斯，我们得叫他这个名字，尽管我们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像知道自己的姓名一样确实，我们还是得这么叫他，是不是？”

马丁台尔很贼，他等着史迈利接话，但是史迈利不想上钩，于是马丁台尔又心生一计。

“不知怎么，我对潘西·阿勒莱恩当头头总是不能太放心，你呢？乔治，这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还是只不过因为我天性不易轻信他人？你善于相人，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觉得我们一起出道的人都不适合掌权。这是不是一个线索？如今很少有人能使我心悦诚服，我总是认为，潘西很明显是这样一个人，特别是有了那个老狐狸老总以后。他人缘好，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只要一想到他从前在‘旅客’酒吧里闲荡，口里衔着他的大烟斗，给一些头儿买酒喝，那就行了。说真的，谁都不想背信弃义的事做得太露骨，你同意不同意？还是只要能成功，就不在乎？他到底有什么窍门，乔治，他有什么秘方？”他专心一意地说着，俯身向前，眼光贪婪而兴奋，除此之外，只有吃喝才能使他这样激动，“靠属下的才智过活。可是，这也许就是如今做领导的本领。”

“真的，罗迪，我没法帮你的忙，”史迈利有气无力地说，“我从来不知道潘西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你明白，我只知道他是个——”他想不起用什么词形容才好。

“是个向上爬的人，”马丁台尔提示道，眼光炯炯发亮，“一天到晚眼睛盯着老总的黄袍。如今他黄袍加身，大伙儿都拥戴他。那么谁是他的左右手呢，乔治？谁在给他立功呢？从各方面听来，他干得很不错。海军部的机密文件阅览室里，用各种古里古怪名称成立的小组委员会里，不论潘西到白厅哪一条走廊里去，都替他铺了红地毯，一些次级大臣们得到了上级的特别表扬，名不见经传的人无缘无故得到了大奖章。你知道，这，我以前都见过。”

“罗迪，我无法帮你忙，”史迈利仍这样说，一边要站起来，“真的，我爱莫能助。”但是马丁台尔却拦住了他，用一只油滋滋的手把他按在桌边，一边说得更快了。

“那么谁是狗头军师呢？肯定不是潘西自己。我也不相信美国人又开始信任我们了。”他的手抓得更紧了，“是狠劲十足的比尔·海顿，我们当代的阿拉伯劳伦斯⁹，上帝保佑他。你瞧，是比尔，你的老对手。”马丁台尔的舌头又伸了出来，逡巡了一会儿后又缩进去，留下一丝薄薄的笑意。“我听说你和比尔一度是什么都不分彼此的，”他说，“但他从来不是正统派，是不是？天才永远不会是正统派的。”

“史迈利先生，你还要什么吗？”侍者来问道。

“其次就是布兰德：褪了色的纯洁的希望，红砖大学¹⁰的教书先生。”但是他仍不放开史迈利，“如果不是这两个人谋划的，那就是个退休的人，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假装退休的人。如果老总已经死了，那么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

他们开始穿大衣。看门的已经下班了。他们得自己从空荡荡的棕色衣帽架上取下大衣来。

“罗埃·布兰德不是红砖大学出身。”史迈利大声说，“如果你想知道，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上过牛津的圣安东尼学院。”

史迈利心里想，老天爷帮忙，我能做的至多就是这些了。

“别傻了，亲爱的。”马丁·台尔不高兴地说。史迈利令他失望：他面有愠色，好像发觉上当了一样，面颊下部出现了令人看了难受的下垂皱褶。“圣安东尼学院当然是红砖大学，同一条街上有一小块沙岩石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即使他是你的门下。我想现在他已投到比尔·海顿门下去了——别给他小费，是我请客，不是你请客。比尔现在是他们的前辈——以前也是。能够使他们围着他团团转。不过，他有他的魅力，是不是？不像我们有些人。我说这是做明星的资质，属于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人。有人告诉我说女人们都完全拜倒在他面前，如果女人可以下拜的话。”

“晚安，罗迪。”

“别忘了向安恩问好。”

“我不会忘的。”

“那么别忘了。”

现在雨已下得很大，史迈利全身湿透了，而且上帝为了惩罚他，把伦敦街上的出租车全都隐藏起来。

“纯粹是缺乏意志。”他自言自语说，一边彬彬有礼地谢绝了一个站在门口的女人的招徕，“与其说是有礼貌，不如说只是软弱而已。马丁台尔，你这个头脑轻浮、装腔作势、爱说大话、没有骨气、不事生产……”他跨了一大步，想避开一个看不清的障碍物。“软弱，”他继续说，“无法摆脱一切羁绊过独立自主的生活，”——一潭脏水溅了他一脚——“还有感情上的牵挂，其实都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不管是和我的妻子、和圆场、和伦敦的生活。出租车！”

史迈利向前冲几步，可是已经晚了。两位小姐挤在一顶雨伞下笑着，早已上了车，只见到胳膊和腿的一阵闪动。他陡然拉起黑大衣的领子，继续孤独地前进。“褪了色的纯洁的希望，”他生气地喃喃自语，“街上的一小块沙岩石。你这个爱说大话、喜欢到处打听的厚脸皮——”

这时他记起把格里美尔斯豪森那本书忘在俱乐部了，但为时已晚。

“唉，他妈的！”他大声骂道，为了出气，还停下步来连骂几声，“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他决定把伦敦的房子卖掉。刚才躲在遮篷下自动售烟机旁等雨停的时候，他就作出这个重要的决定。他从各方面打听到，伦敦房价飞涨。那很好。把房子卖了，用一部分所得在考兹伍德买幢乡间小屋。还是在伯尔福德？那儿来往车辆太多。斯蒂普尔·阿斯顿？那是个好地方。那么他就以性格怪僻、说话东拉西扯、喜欢离群索居的面目出现，但是也有一两个讨人喜欢的习惯，例如在街上彳亍的时候常常自言自语。也许有点不合时代潮流，但如今谁合时代潮流呢？不合时代潮流，但也不背弃自己的时代。毕竟，到了一定时候，人人都得选择向前进，还是向后退。现在的风一会儿这样刮，一会儿那样刮，你不随风倒，并没有什么不光彩。还是要有主见，坚持不动摇，做自己那一代人的中流砥柱。如果安恩要回来，那么他就把她送到门口请她走。

或者，不一定请她走，这要看她是否归来心切。

在这种前提的慰藉下，史迈利到了国王路，他在人行道上停了一会儿，好像要过马路似的。马路两边都是华丽的精品店。在他前面是自己住的贝瓦特街，一条死巷子，他从头走到底，总共只有一百一十七步。他当初搬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些乔治时期的建筑有一种败落敝旧的美，年轻的夫妇靠十五镑过一星期，在地下室里还不敢声张地收个不付税的房客。可是现在却有铁栏杆保护下层的窗户，每幢屋子的路边都挤着停了三辆汽车。史迈利出于长期养成的习惯，走过去时——看了一眼，哪辆是熟悉的，哪辆不熟悉。不熟悉的汽车中，哪辆又是安装着天线和多一面镜子，哪辆是监视者喜欢的那种没窗的小货车。他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想考验一下自己的记忆力，为了保持自己头脑不至于因为退休而萎缩，就像以前他去大英博物馆的公共汽车上熟记沿途的商店门牌号码

一样，也正如他背得出自己家中每层楼梯一共有多少级，十二扇门每一扇朝什么方向开一样。

但是史迈利这么做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他害怕，这是职业间谍到死都甩不开的秘密的恐惧。由于过去的经历是那样复杂，连自己也记不清结下了多少怨仇，总有一天仇人会找上门来跟他算账。

在这条街的尽头，有个邻居把狗带出来散步。她看到了他，抬起头来说了一句不知什么的话，但是他没有理她，心里知道大概又是关于安恩的话。他穿过马路。他的房子一片漆黑，窗帘仍像他出门时那样拉了起来。他爬上六级台阶，到了门口。自从安恩走了以后，他把收拾屋子的人也给辞退了：除了安恩以外，没有别人有钥匙。门上有两道锁，一道是班汉牌死锁，一道是丘伯牌管匙锁，还有两片他自制的小木片，只有指甲那么大，一片塞在上面门梁缝里，一片塞在班汉锁的下面。这是他在外出行动时留下来的习惯。最近，不知什么原因，他又开始使用起来，也许他的目的是为了不要因为她突然回来而大吃一惊。他用指尖一摸，两片小木片都在那里。于是他就开了门锁，推了进去，脚下碰到了中午塞进来躺在地毯上的邮件。

他心中想，是什么杂志到期了？《德国生活与文学》？《语言学》？他想该是《语言学》，它早就到期了。他打开门廊的电灯，弯下身去，翻看了一下邮件。一件是他的裁缝寄来的账单，记的是一套他没有订制的衣服，他怀疑很可能现在正穿在安恩的情人身上；一张是亨莱一个加油站寄来的她的汽油账单（才十月九号就没钱了，他们在亨莱干什么呀）；一封是银行来信，说的是关于米兰银行伊明翰分行为安恩·史迈利夫人开户取款的事。

他对着这封信问，他妈的他们两人在伊明翰干什么呀？真是天晓得，谁会到伊明翰跟姘头幽会？到底伊明翰是在哪里？

他正在思量这个问题时，眼光却落在雨伞架上一把没有见过的雨伞上。这是一把绸伞，伞把上有手工缝的皮套，上面有一个金环，但是没有物主的姓名缩写。他的脑袋里很快闪过一个念头：既然这把伞是干的，那一定是在六点十五分下雨前就放在那里了，因为架子上也没有水迹。而且这把雨伞很讲究，虽然不新，伞尖不锈钢包头还没有擦划过的痕迹。因此，这把伞属于一个行动敏捷的人，甚至是年轻人，像安恩最近的一个情人。但是既然这个伞主人知道门上塞的木片，又知道进屋以后放回原处，而且还颇为机灵，在推门打乱了（而且无疑也读了）邮件以后，又把它们靠在门边放着，那么极有可能他也认识史迈利。他不是安恩的情人，而是一个像他自己那样的职业特务，一度跟他亲密共事过，而且就像行话所说的那样，认得出他的“笔迹”。

客厅的门虚掩着。他轻轻地又推开了一点。

“彼得？”他问道。

他从门缝里看进去，靠外面路灯的光，看到沙发一头伸着一双穿着麂皮鞋子的脚，懒洋洋地交叠在一起。

“要是我是你的话，乔治，我就不脱大衣了，老兄，”说话的声音很亲切，“我们还要赶远路呢。”

五分钟以后，穿着一件宽大的棕色旅行大衣，乔治·史迈利郁郁不乐地坐在彼得·吉勒姆的敞篷跑车的客座中。那件大衣是安恩送他的礼物，是他惟一干燥的大衣。原来彼得把他的车停在附近另外一个广场上，所以他之前没有发现。他们的目的地是阿斯科特，那是个以女人和赛马著称的地方。不过作为内阁办公室奥立弗·拉康先生的宅邸所在，就不怎么有人知道了。拉康先生是各类不同委员会的一位高级顾问、谍报事务的总监督。或者，用吉勒姆那有失尊敬的话来说，是白厅的管家。

比尔·罗奇在瑟斯古德学校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心里在想，他每天盯着吉姆，最近终于有了效果。昨天吉姆令拉兹吃了一惊。星期四他又偷了寄给阿隆逊小姐的信。阿隆逊小姐教提琴和《圣经》，罗奇因为她脾气温柔而巴结着她。据女舍监说，园丁助手拉兹是个D.P.，而D.P.不会说英语，或者说不了几句英语。女舍监又说，D.P.的意思是不同的人¹¹，反正是战时从外国来的。但是昨天吉姆和拉兹说了话，他要拉兹帮忙摇车前的启动杆，而且他是用D.P.的母语跟他说话的，反正是用D.P.说的话跟他说的，拉兹当场高兴得跳起来。

关于阿隆逊小姐的信，这事要复杂一些。星期四上午从教堂回来后，罗奇到教员休息室去拿他们班上的练习簿，当时墙边桌上有两封信，一封是给吉姆的，一封是给阿隆逊小姐的。吉姆的一封是用打字机打的，阿隆逊小姐的一封是手写的，笔迹倒有点像吉姆自己的笔迹。罗奇看到这两封信时，教员休息室里空无一人。他就自己动手取了练习本，正要作声地退出去时，吉姆从另外一扇门进来了，他是早上散步回来，满脸通红，气喘吁吁。

“快走吧，小胖，上课铃已经响了。”他俯身在墙边桌子上。

“好吧，先生。”

“天气有点变化不定，是不是，小胖？”

“是的，先生。”

“好吧，快走吧。”

到了门边，罗奇回头看一眼。吉姆已经直起身来，打开那天早上的《每日电讯报》。桌上空了。两封信都不见了。

是不是吉姆给阿隆逊小姐写了信，又改变了主意？也许是求婚？比尔·罗奇又有了一个想法。最近，吉姆弄了一台旧打字机，是一台破雷明顿牌的，他自己动手修好的。他是不是用那台打字机打了一封信给自己？他难道这么寂寞，自己给自己写信，还偷别人的信？想到这里，罗奇便睡着了。

吉勒姆懒洋洋地开着车，但是开得很快。车厢里充满了秋天的各种气味。月光皎洁，田野上弥漫着雾，寒气袭人。史迈利心里想，不知吉勒姆多大年纪了，他估计是四十岁，但是在朦胧之中很可能以为他是个在河上划船的大学生。他操纵排挡拉杆，动作潇洒，好像他是在水里一样。无论如何，史迈利有些生气地想，这辆汽车对吉勒姆来说是太年轻了。他们风驰电掣地开过了伦尼梅德，开始爬上埃格汉姆山。他们已经开了二十分钟的车，史迈利问了十多个问题，所得的答复却不值一文钱，现在他心中有了一种不敢正视的恐惧，久久不散。

“我觉得真奇怪，他们没有把你和我们一起撵出来，”他不愉快地说，一边把大衣下摆裹得紧一些，“你具备一切条件：工作出色、忠心耿耿、处事谨慎。”

“他们让我负责‘剥头皮’。”

“唉，我的上帝。”史迈利打了一个寒战说。他把胖乎乎的下巴周围的衣领拉了起来，不禁想起了布里克斯顿，还有那个当做剥头皮组大本营的阴沉严峻的校舍。剥头皮组的正式名称叫“旅行组”，是冷战初期老总在比尔·海顿建议下设立的，当时暗杀、绑架、讹诈成风。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是海顿提名的。这是个单位，大约只有十一二个人，专门处理一些突击的任务，如果由国外常驻人员来干，不是太肮脏了，就是太危险了。老总总是这么教诲人，谍报工作要做得好，必须慢慢来，而且要看有没有一种文雅的风度。但是剥头皮组对他这条原则却是个例外。他们干起来可不是慢慢来的，而且也不文雅，因此反映了海顿的气质，不是老总的气质。此外他们出去都是单枪匹马，因此他们被安顿在一个没有人瞧见的地方，在围墙上还插着碎玻璃，拉着铁丝网。

“我问过你知道不知道‘横向主义’这个词儿？”

“当然不知道。”

“这是现在最in的理论。我们本来是逐级上下的关系，现在是横向合作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在的时候，圆场是分地区管理的。非洲、附庸国、俄国、中国、东南亚等地区，每一个地区由自己的头头率领，老总高高在上，掌握一切。你还记得吗？”

“听起来已如隔世。”

“现在呢，一切活动都集中领导，叫做伦敦站。地区取消了，实行了横向主义。比尔·海顿是伦敦站长，罗埃·布兰德是他的第二把手，托比·伊斯特哈斯像哈巴狗似的在他们两人中间来回奔跑。他们是国中之国。他们什么都保密，不跟普通人来往。这倒使我们感到更加放心了。”

“听起来，这个主意倒不错。”史迈利说，有意不去理会对方影射的话。

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泛起许多记忆，他忽然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他这一天好像当做两天度过似的，一天是在俱乐部和马丁台尔一起度过，一天是现在和吉勒姆在梦中度过。他们驶过了一个松树养育林。树林缝里，月光成了一条条的。

史迈利开始问道：“埃利斯有没有什么信——”但是他又用比较试探的口气问：“埃利斯有没有什么消息？”

“仍在隔离之中。”吉勒姆简短地答道。

“哦，是的。当然。我并不要打听。我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可能通过审查？他身体复原了，他还能走动吗？据我了解，背部受伤可不是好玩的。”

“他们说他的情况很好。安恩怎么样，我忘了问。”

“很好。很好。”

车厢里一片漆黑。他们已经离开了大路，弯到一条石碴煤层路上。两边都出现了黑色的树影，出现了灯光，接着是个高耸的门廊，树梢头上是一栋破旧败落的房子尖顶。雨已经停了，但是当史迈利下车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时，他听到了四周尽是雨水淋湿的树叶的萧萧声。

是啊，他想，上次我来这里也是下着雨。那时候，吉姆·埃利斯的名字是头条新闻。

他们梳洗过以后，在天花板高高的衣帽间里观看了拉康的爬山用具，这些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谢拉顿式的五斗柜上。现在他们围成半圆形坐着，面对着一把空椅子。这栋房子是方圆几里内最难看的一栋，拉康没有花多少钱就买了下来。他有一次曾称之为“伯克郡行宫”，他向史迈利解释，“是一个烟酒不沾的百万富翁盖的。”客厅很大，彩色玻璃的窗户有二十英尺高，大门口古松参天。史迈利环顾周围一些熟悉的摆设：一架堆满了乐谱的大钢琴、穿着僧袍的教士的古画、一叠铅印的请帖。他四处找剑桥大学的船桨，发现它横挂在壁炉上方。壁炉里仍旧烧着火，但是在那么大的壁炉里显得很气。寒酸的气氛盖过了贵气。

“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怎么样，乔治？”拉康问道，好像是对着一个耳聋的老姑奶奶在大声嚷嚷，“你不感到与世隔绝吗？要是换了我，是会有这种感觉的。惦念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老伙伴。”

拉康的个子又瘦又高，态度生硬，有些孩子气，据圆场才子海顿说，是个教会和间谍圈子里的人物。他的父亲是苏格兰教会的显要人物，他的母亲出身贵族。有时比较时髦的周日报纸写到他，说他是“新派人物”，因为他年轻。他脸上因为刮胡子太匆忙有些刮破了。

“我过得很不错，谢谢你的关心。”史迈利客气地说。为了要再敷衍几句，又说：“是啊。是的，我当然很惦念。你呢？一切顺利吗？”

“没有什么大变化。一切非常顺利。夏洛特得到了罗迪安学校的奖学金，这很不错。”

“那很好。”

“你的太太呢，她还是很漂亮吧？”

他的表情也有点孩子气。

“是很漂亮，谢谢你。”史迈利很洒脱地想用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们都看着那个双扇门。他们听到远远传来了瓷砖地上的铿锵脚步声。史迈利猜，是两个人，都是男人。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半明半暗的高大人影。史迈利一眼又瞥见了后面还有一个人在照应，黑头发，矮个子，但是进屋子的只有前面一个人，一进来就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门关上了。

“请在外面把门锁上。”拉康叫道，接着他们听到了钥匙锁上的咔嚓声，“你认识史迈利的吧？”

“是的，我认识。”那个人影从阴暗处向他们走过来时说，“我记得他曾经派给我一次任务，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他的声音像南方人一样柔和，但无疑有殖民地的口音。“我是塔尔，先生。槟榔屿来的里基·塔尔。”

炉火一闪，照亮了他半边脸上不自然的笑容，可是却把眼眶照成了一个空洞。“还记得吗，一个律师的儿子？你一定记得，史迈利先生，我的第一片尿布还是你换的。”

这时奇怪的是，他们四个人都站着，吉勒姆和拉康在旁看着，好像教父教母一样，而塔尔握着史迈利的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为了拍照又握一次。

“你好吗，史迈利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他终于松开了史迈利的手，转身到指定给他的椅子。这时史迈利想：是的，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遇到塔尔这号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想到，我的上帝，两小时之前我还在对自己说，我要在过去之中寻找庇护。他感到口渴，心想这可能是恐惧的缘故。

十年？十二年以前？这天晚上他很难有什么时间观念。那时，史迈利的任务之一是审查新人：未经他点头认可，谁都不能入选；未经他在课程表上签字，谁都不能受训。冷战正炽热，剥头皮组的人员供不应求，圆场在国外的常驻人员奉海顿之命物色人选。雅加达的斯蒂夫·麦克尔沃提出了塔尔。麦克尔沃是个老手，以航运代理商为掩护，他看到塔尔喝醉了酒，怒气冲天地在码头上到处找一个抛弃他的小姐，名字叫做罗斯。

据塔尔自称，他和一伙比利时人混在一起，在各岛屿和北方海岸之

间走私枪支。他不喜欢那些比利时人，对走私枪支也感到厌倦，尤其叫他生气的是，他们抢走了他的女朋友罗斯。麦克尔沃估计他可以接受纪律的约束，年纪也轻，可以训练，干那些剥头皮的勾当，他们平时躲在阴郁的布里克斯顿学校围墙后面，必要的时候出来干那种暴力勾当。在经过了必要的调查以后，他们把塔尔送到新加坡复查，然后又送到沙拉特的训练所三查。这时史迈利插手进来，担任一连串面谈审查的主持人，这种审查有时是很不客气的。沙拉特是个训练所，但地方很宽敞，还可以充当其他用途。

塔尔的父亲是住在槟榔屿的一位澳洲律师，母亲是战前从布拉德福跟着一个英国剧团到东方去的小演员。史迈利还记得，做父亲的天性好传播福音，常常在当地的教堂里讲道。做母亲的在英国有犯罪的记录，不过不严重，塔尔的父亲大概不知道，要不，知道了也不在乎。战争爆发时，为了年幼的儿子，夫妇俩疏散到新加坡。几个月以后，新加坡沦陷，里基·塔尔就在樟宜监狱里于日本人的监视下受教育。在樟宜，做父亲的遇到人就传播上帝的福音，如果日本人不迫害他，和他一起关着的人也会乐意代劳。战争结束后，一家三口回到槟榔屿。里基想读法律，但他更常干的还是触犯法律。做父亲的一时生起气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想把他灵魂中的罪恶打掉。塔尔离家出逃，到了婆罗洲，十八岁就成了个正式的枪支走私贩，在印尼群岛周围无险不冒，麦克尔沃就是在这时候遇到他的。

等到他从训练所毕业时，马来半岛已经发生变乱。塔尔奉令回去混进枪支走私贩子中间去。他几乎一去就碰到了他的比利时老朋友。他们替共产党运送枪支忙也忙不过来，顾不上问他这一阵子上哪儿去了，而且他们正好缺少人手。塔尔要切断他们的联系，帮他们送了几次货，然后有一天晚上把他们灌醉了，打死了四个，其中包括罗斯，放火烧了他们的船。他在马来半岛混了一阵子，又完成了一两次任务，就被召回布里斯克斯顿，重新训练了一下后，被派到肯尼亚去执行特殊任务，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捉拿茅茅12领赏。

到肯尼亚以后，史迈利有一阵子就没有再见过他了，但是他还记得一两件事，因为这一两件事很可能成为丑闻，得报告给老总。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塔尔被派到巴西去，跟一个境况很困难的军备部长索取贿赂。塔尔搞得太露骨了，那位部长害怕起来，向新闻界透露了风声。当时塔尔用的是荷兰人的名义，这事谁都不知道，可是却被荷兰谍报机关知道了，他们很生气。一年后在西班牙，塔尔根据比尔·海顿所提供的线索，知道有个波兰外交官被一个舞女迷了心窍，便向他进行讹诈——用剥头皮组的行话来说，叫火烧。第一次收获不错。塔尔受到嘉奖，还得了赏金。但是他回去进行第二次讹诈时，那个波兰人向自己的大使写了一封坦白书，就跳楼自杀了——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怂恿。

在布里斯克斯顿，他们常常说他是容易招祸的。当他们围着那低低的炉火坐下来时，从吉勒姆尚未成熟但已衰老的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背后说他的话可能还要难听得多。

“好吧，我想先坐下来再说。”塔尔一边轻快地说，一边动作敏捷地坐了下来。

“这事发生在六个月以前。”塔尔开始说。

“在四月间，”吉勒姆插言道，“从头到尾说得尽量精确些，好不好？”

“好吧，在四月间，”塔尔不动声色地说，“布里克斯顿平静无事。我们在这里静候待命的，我估计，大约有五六个人。彼得·森布里尼从罗马回来，赛·范霍佛刚在布达佩斯干了一仗，”——他露了一个恶作剧的笑容——“大家闲着无事，就在布里克斯顿休息室打乒乓、玩撞球。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那正好是淡季。”

据塔尔说，这时突然香港站发来急电要人。

“他们说有一个苏联低层贸易代表团在香港，为莫斯科市场搜购电气用品。有位代表在夜总会里抛头露面，名叫鲍里斯，详细情况，吉勒姆先生知道。以前没有记录。他们已经盯了他五天，代表团预定还要待十二天。从政治上来说，由当地的弟兄们来处理，这太棘手了，但是他们认为突然找到他头上去，可能奏效。收获不见得会很大，但这有什么关系？也许可以把他当存货买下来，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当存货的意思是转卖给别国的谍报机关，或者跟他们交换，这是剥头皮组常做的低层叛逃人员的买卖。

吉勒姆没有理会塔尔，他说：“东南亚是塔尔负责的区域。他正好闲着没事，因此我派他去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发电报汇报结果。”

每次别人一说话，塔尔就陷入了梦境。他的眼光呆滞，看着说话的人，眼里升起一层雾，要定一定神才能重新说话。

“于是我照吉勒姆先生吩咐的做了，”他说，“我总是听吩咐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我真的是个听话的人，尽管有时候有些容易冲动。”

他在第二天晚上，即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起飞，用的是澳洲护照，自称是汽车推销商，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夹层里还放着两份没有用过的瑞士护照，以备逃跑之用。这是两份紧急文件，可以按照当时情况需要填写，一份是给鲍里斯用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用的。他住进九龙金门饭店，到附近不远的地方，在一辆汽车里和香港的情报员碰头。

说到这里，吉勒姆侧过身去向史迈利轻声说：“塔夫蒂·西辛格，是个小丑，前皇家非洲步兵团的少校。潘西·阿勒莱恩派的人。”

西辛格根据一个星期来的监视，给了他一份关于鲍里斯动向的报告。

“鲍里斯真是个怪物，”塔尔说，“我搞不懂他。他每晚狂喝痛饮，没

有断过。他已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西辛格派去盯梢的人，腿都几乎站不直了。白天他还跟着代表团视察工厂，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苏联官员的样子。”

“多大年纪？”史迈利问道。

吉勒姆插进来说：“他的签证申请填的是一九四六年生于明斯克。”

“一到晚上，他就回到亚历山德拉旅馆，那是远在北角的一个破烂的旧房子，是代表团的驻地。他和别人一起吃饭，到了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来，拦住一辆出租车，赶到九龙一带夜总会集中的地区。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皇后大道的一间酒店——‘猫的摇篮’，他请本地的商人喝酒，一举一动像个大人物的样子，一直待到午夜。从‘摇篮’出来，他又直接杀到湾仔，到一个叫‘安琪儿’的地方，那里的酒便宜些。他都是孤身一人。‘安琪儿’设在地下室里，是个水手和游客爱去的小酒馆，鲍里斯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他一般要喝三四杯酒，留着账单收据。他大多喝白兰地，有时来杯伏特加，换一换胃口。他和一个欧亚混血儿有过一次勾搭，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找过她，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说，他感到很孤独，坐在床上哀叹，说他的老婆不识他的天才。这确实是个突破，”他讥讽地加了一句，这时拉康拨弄了一下煤块，火势大了一些，“那天晚上我到‘摇篮’去，亲眼看一看他。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喝了杯牛奶睡觉去了。他们不想知道。”

有的时候，塔尔说话的时候，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好像是在听他自己的录音带一样。

“他在我之后十分钟到了，带了自己的女伴，一个高大的瑞典金发女人，还有一个中国女人跟在后面。里面很暗，所以我移到附近的一张桌子。他们要了威士忌，鲍里斯付的账，我坐在六尺远的地方，眼睛看着那个蹩脚乐队，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话。那个中国女人没有开腔，说话的全是那个瑞典女人。他们说的是英语。那个瑞典女人问鲍里斯住在哪里，鲍里斯说住在怡东酒店，这显然是鬼扯，因为他明明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亚历山德拉。好吧，亚历山德拉是家小旅馆，怡东酒店听起来好听一些。到午夜时分，他们就散了。鲍里斯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这又是说谎，因为他并没有回去——这叫什么，杰克与海德13，对！——换了装出去寻欢作乐的那个正派医生。因此，鲍里斯究竟是谁呢？”

一时没有人理他。

“是海德。”拉康看着他搓洗得发红的手说。他又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

“海德，”塔尔重复说，“谢谢你，拉康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我于是趁他们付账的时候，就赶紧先出去，赶在他前头到湾仔，在他还没有到‘安琪儿’之前就到了那里。这时我已经十之八九知道他有问题。”

塔尔用他干干的细长手指一一数说理由：第一，他从来不知道有苏

联代表团不带一两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来监视团员，不让他们到寻欢作乐的场所去。鲍里斯怎么能够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溜出来呢？其次，他看不惯鲍里斯大把大把花外币。这是违反苏联官员的脾气的，他坚持说：“他们根本没有外币可以给他花。要是有的话，早就给他老婆买假珠宝了。第三，我不喜欢他那样说谎。他这个人太油腔滑调了。”

于是塔尔在“安琪儿”等着，果然不错，半小时后，他的海德先生独自一个人来了。“他坐下来后点了一杯酒。他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喝酒，作壁上观。”

又是史迈利得到塔尔的青睐。“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史迈利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注意的是一些小事情，”他仍旧对着史迈利推心置腹地说，“就以他坐的地方来说。说真的，先生，要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我们也不会比鲍里斯坐在更合适的地方了。他离出口处和楼梯最近，可以一目了然看清进门入口处和店里一切的活动。他是用右手的，因此左边有道墙保护。鲍里斯是个职业特务，史迈利先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是在等候接头的人，可能是充当信箱，或者是在放线钓鱼，等我这样的笨蛋上钩。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敲诈一个贸易小代表是一回事，朝着中心训练出来的老手挥大腿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吉勒姆说：“自从改组以后，剥头皮组就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要收买双重特务。一碰到这样的对象就得马上转给伦敦站。这道命令是比尔·海顿亲笔签发的。如有一丝反抗的意味，就要解职。”他补充一句，特别说给史迈利听：“按照横向原则，我们的自主权极其有限。”

“我以前也干过双面间谍，”塔尔坦白说，声音当中有一种好人受委屈的味道，“请相信我，史迈利先生，他们都是一帮不好惹的人。”

“他们肯定是的。”史迈利说，把眼镜框往上一推。

塔尔打电报给吉勒姆说“未成交”，就订了回国的机票，上街采购去了。他后来又想，反正飞机要到星期四才走，他在走以前不妨去鲍里斯的房间偷点东西，把本捞回来。

“亚历山德拉真是个破烂地方，史迈利先生，它在马宝道上，有一排木头阳台。至于门锁，一见到你来就自动打开了。”

因此没有多久，塔尔就进了鲍里斯的房间，背顶着门，等眼睛习惯黑暗。他站着还没有动手就听见床上有个女人睡意蒙眬地用俄语和他说话。

“那是鲍里斯的老婆，”塔尔解释道，“她正在哭。好吧，我就暂时叫她伊琳娜。吉勒姆先生有详细资料。”

史迈利已经在表示不同意了：他说不可能是老婆。中心是绝不会让他们夫妇同时出国的，他们总是留下一个，派一个去——

“也许是露水夫妻，”吉勒姆挖苦地说，“没有正式结婚，但是长期同

居。”

“如今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是颠倒过来的。”塔尔说，脸上堆笑，不对任何人，更不是对着史迈利，但是吉勒姆又白了他一眼。

史迈利在这次见面一开始就保持一种老僧入定的莫测高深的样子，不论是塔尔讲的故事，还是拉康或吉勒姆偶尔的插话，他都不为所动。他在椅子上靠着椅背坐着，短腿蜷缩，脑袋低垂，胖乎乎的双手交叉地放在鼓鼓的肚子上。他低垂的眼皮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已经合上了。他的惟一动作是拿下眼镜来用领带的绸衬里擦一擦，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上去仿佛浸泡过了，赤裸裸的，令看到的人很不好意思。但是，他插嘴的话和在听了吉勒姆解释以后发出像老学究那样空洞的声音，现在对在场其他人变成了一种信号，引起一阵椅子的移动和清一清嗓子的声音。

拉康第一个说话：“乔治，你喜欢喝什么？要我给你倒一杯威士忌吗？还是别的？”他请人喝酒的样子显得很热心，好像是给别人吃治头痛的阿司匹林。“我刚才忘记问了，”他解释道，“乔治，来一杯提提神吧。究竟是冬天呀。是不是有点凉飕飕的？”

“我很好，谢谢你。”史迈利说。

他倒是想喝一杯新煮的咖啡，但他不好意思开口。他也记得拉康家的咖啡很难喝。

“吉勒姆呢？”拉康接着问。不，吉勒姆也觉得不能喝拉康的酒。

他没有问塔尔要喝什么，塔尔就继续说下去。

他说，他对伊琳娜的出现没有惊慌失措。他在没有进屋之前已想好了退路，他马上就采取行动。他没有拔出手枪来，也没有伸手按住她的嘴巴。他没有搞这一套把戏，他只是说他是为了一件私人的事来找鲍里斯的，他很对不起，但是他要坐下来等鲍里斯回来。他用很道地的澳洲口音——非常适合一个从南半球来的生气的汽车销售商——解释说我不想多管别人的闲事，但是他绝不让一个连寻欢作乐的钱也没有的死俄国人，在一夜之间就把他的女人连钱一起偷走。他越说越气，但是把声音压得很低，看那女人的反应。

塔尔说，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进鲍里斯的屋子是十一点三十分，离开时是一点三十分，还说好第二天晚上再见面。这时情况已完全颠倒过来了：“不过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干什么不规矩的事。可以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对不对，史迈利先生？”

这种无心的讽刺似乎触动了史迈利的心事。

“对。”他了无生气地同意。

伊琳娜在香港的出现并没有什么特别，西辛格也不是非知道不可。她本人就是贸易团的正式团员，她是个收购纺织品的专家。“想起来真叫

人不敢相信，她比她的老头还更合乎条件。她完全像个孩子，从我的喜好类型来说，有点像个女学者，但她年轻，不哭的时候，笑容动人。”塔尔奇怪地有点脸红，“跟她在一起很有趣。”他坚定地说，好像是跟别人的相反意见在争辩，“从澳洲阿德莱德来的托马斯先生在她生命中出现，正好是她为那个死人鲍里斯发愁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她以为我是个从天而降的天使。她能够找谁说说她的丈夫而那个人不会借机害她呢？她在代表团里没有谈得来的人，她说，甚至在莫斯科，她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不会了解，你一边到处跑一边又要保持破裂的关系是什么滋味。”史迈利又陷于沉思出神状态，“一个旅馆接着一个旅馆，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甚至不许和当地人随便谈话，或者对陌生人笑一笑，她就是这样形容她的生活的。史迈利先生，她认为这种生活实在太痛苦了，因此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而且床头总有一个伏特加空酒瓶为证。为什么她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呢？她不断地问着这句话。为什么她不能像别人一样享受阳光呢？她喜欢旅游，她喜欢外国孩子，为什么她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生来自由、无拘无束的孩子？她不断地说：生下来就无拘无束，生下来就自由。‘我是个乐天的人，托马斯。我是个正常的、喜欢交际的女人。我喜欢与人来往！我喜欢他们，既然我喜欢他们，我为什么要欺骗他们？’接着她又说，但问题是她很早以前就被选拔来做这种工作，这就把她冷冻成了一个老太婆，与上帝隔绝。因此她才喝了酒，痛哭一场。这时她仿佛已经忘了她的丈夫，而且，还因为发了一顿脾气表示很抱歉。”他说话又迟疑起来，“我可以嗅得出来，史迈利先生。她身上有金子。我一开始就可以嗅出来。各位，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伊琳娜就有力量，也有才能。她可能有点固执，但仍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拿出来。如果我遇到一个慷慨大方的女人，我就能凭直觉感觉得到，史迈利先生。我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个女人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我也不知道如何来解释我的直觉才好。有的人能够嗅出地底下有水……”

他似乎在等候有人能表示共鸣，因此史迈利就说：“我明白。”伸手搔一搔耳垂。

塔尔带着一种奇怪的依赖表情看着史迈利，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第二天早上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退了机票，换了旅馆。”

史迈利突然睁大了眼睛：“你对伦敦那边是怎么说的？”

“我没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自作聪明的傻瓜。”吉勒姆说。

“我怕吉勒姆先生会说‘立即回国’。”他答道，会意地看了吉勒姆一眼，但没有得到回应，“你知道，很久以前，我刚出道的时候，曾经犯过错误，中了美人计。”

“他上了一个波兰女人的当。”吉勒姆说，“他当时也凭直觉感到那个波兰女人是慷慨大方的。”

“我知道伊琳娜不是美人计，但是现在我怎么能希望吉勒姆先生相信我呢？没有办法。”

“你告诉西辛格了没有？”

“没有。”

“你延迟回国，向伦敦提出什么理由？”

“我原定星期四起飞。我估计国内的人要到下一个星期二才想起我来，特别是鲍里斯是只‘死鸭子’。”

“他没有提出理由。‘管家’星期一算他旷职，”吉勒姆说，“什么规章制度他都违反了。不是规章制度的，他也违反。到下一个星期三，甚至比尔·海顿也发脾气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听着。”他悻悻地说。

不管怎么样，塔尔和伊琳娜第二天晚上碰了面。第三天晚上又碰面。第一次碰面是在一家饭馆里，没有什么进展。他们设法不让别人看到，因为伊琳娜怕得要死，不仅怕她丈夫，还怕代表团里的保安人员，塔尔叫他们猩猩。他请她喝酒，她谢绝了，还全身哆嗦。第二次碰面的那个晚上，塔尔还没有放弃，仍等着她慷慨大方起来。他们搭电车到维多利亚山顶，挤在穿白色短袜戴遮阳帽的美国太太中间。第三次他租了一辆汽车，带她在新界兜风，最后因为距离中国边界太近，她突然害怕起来，于是他们又折回到港口这边来。不过，她对这次兜风还是很喜欢，不断谈到一路上景色的美丽，还有那鱼塘和稻田。塔尔也喜欢，因为这次出游向他们两个人都证明，没有人盯他们的梢。但是用他的话说来，伊琳娜仍旧没有打开心扉。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一开始就假装有澳洲人托马斯。我跟她鬼扯了不少关于在阿德莱德郊外的绵羊场，还有城里大街上有玻璃落地窗户的房子，在灯光照射下的‘托马斯’三个字。她不相信我说的。她点着头敷衍了一会儿，等我把话说完，然后她说‘是啊，托马斯’，‘不，托马斯’，然后就说别的了。”

第四天晚上，他开车到俯瞰北岸的山顶上，这时伊琳娜告诉塔尔，她爱上了他，还说她是莫斯科中心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而且她知道塔尔也是同行。从他的态度警觉，听人说话时的眼神贯注，她可以看得出来。

“她以为我是英国谍报上校。”塔尔板着脸说，“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觉得她大概快要疯了。她说起话来一半像个廉价小说中疯疯癫癫的女主角，一半又像个有教养的好小姐。她最喜欢英国人。她老是说，英国人是君子。我买一瓶伏特加给她，她一下子就喝掉半瓶。为英国君子干杯。鲍里斯是主角，伊琳娜是他的配角。这是一出夫妻搭档的戏，总有一天她要跟潘西·阿勒莱恩谈，告诉他一个大秘密。鲍里斯是在收买香港的商人，附带替当地苏联常驻站传递情报。伊琳娜当通讯员，译出微点通讯，帮他收发无线电报，速度极快，使别人无法窃听抄收。理论上就是这么计划的，懂吗？那两个夜总会，前一个是他和本地联系碰头的

地方，后一个是万一接不上头的退路。但是鲍里斯实际上只想喝酒，追舞女，浇愁解闷。或者出去散步，一去就是五个小时，因为他没法与他的妻子待在一个房间里。伊琳娜只能哭着等他回来，或者喝得烂醉，想像自己单独坐在潘西的壁炉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内幕和盘托出。我在山顶上坐在汽车里，让她不停地说着。我没有动，因为我不想打断她。我们看着港口上暮霭渐降，可爱的月亮升了起来，农夫们带着扁担和煤油灯走过。我们只需要等亨弗莱·鲍嘉¹⁴穿着晚礼服登场了。我的脚踩着伏特加酒瓶，让她说下去。我一动也没有动。这是事实，史迈利先生，这就是事实。”他说，是希望别人相信他而又无可奈何的口气。但是史迈利的眼睛紧闭，他对任何恳求都无动于衷。

“她就这样开了头，”塔尔解释道，好像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他没有参与其间，“她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了我，从出生一直到遇到托马斯上校，那就是我。妈妈、爸爸、初恋、入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鲍里斯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以后就没有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工作化名、旅行时和发电报时的假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我看她那套变戏法的道具：可以暗藏密码报告的钢笔、秘密照相机等，应有尽有。‘等潘西看到了不知会怎么说。’我顺着她这么说。那些都是大量生产的货色，不是什么精致的东西，不过材质还是上等的。最后，她全盘说出苏联在香港的常驻站的全部情况：跑腿的、安全联络站、信箱等。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记住。”

“你还是记住了。”吉勒姆没好气地说。

是的，塔尔同意。他差不多记住了。他知道她并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刚成年就当特务，要讲真话不容易，他想，作为开端，她已经不错了。

“我有点同情她，”他又用那种虚伪的坦白口气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频率相同，互相没有干扰。”

“可不是？”拉康难得插了一句话。他脸色苍白，但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还是由于从百叶窗的窗缝里射进来的晨曦所造成的，则无法知道。

“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我第二天、第三天又跟她见面了，我心里想，就算她现在还没有精神分裂的话，那么也快了。她一会儿说什么潘西要在圆场给她一个高级职务，在托马斯上校领导下工作，还一个劲儿地跟我争，应该给她一个中尉还是少校当。一会儿她又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做间谍了，她要种种花，养养鱼，跟托马斯过太平日子。接着她忽然又想起修道院来，说：浸信会修女要给她洗涤灵魂。我几乎笑死了。我问她，谁听说过浸信会有修女？她却说，这没关系，浸信会是最伟大的教会，她的母亲出身农民，她知道。这是她告诉我的第二大秘密。我问她，那么，第一大秘密是什么？她不肯说。她只说，我们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之大，我连想也无法想像，我们两人都没有希望，除非她跟潘西兄私下密谈一下。‘我的天，到底是什么危险？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她很得意，要想表现一下，但是我一追问，她又闭口不言了。我怕得要死，生怕她回去跟鲍里斯坦白。而且我的时间也不够了。那天已是星期三了。贸易代表团定于星期五飞回莫斯科。她搞暗号这一套很在行，但是我怎么能够信任这样一个神经病呢？史迈利先生，你知道女人一坠入情网是什么样子。她们很难……”

吉勒姆打断了他的话。他命令道：“你别岔开，好不好？”塔尔不高兴地停了一会儿。

“我所了解的是，伊琳娜要叛逃——照她的说法是跟潘西密谈。她还有三天时间，她越快脱身，对谁都越好。如果我再等下去，她就可能改变主意。因此我就采取行动，直接去找西辛格，他大清早刚打开店门我就去找他。”

“星期三，十一号，”史迈利喃喃道，“伦敦时间是凌晨。”

“我想西辛格一定把我当做了鬼。我对他说：‘我要直接跟伦敦通话，跟伦敦站长本人。’他拼命和我辩论，反对我这样做，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坐在他的桌前，在用了一次就得扔掉的便签簿上拟了电报的密码，西辛格像只病狗一样看着我。我们得让电报伪装得像一封外贸密电，因为西辛格是以做贸易为掩护的。这多花了我一个小时。我有些紧张，的确有点紧张。然后我把剩下的便签簿烧了，由电报机上发出密电。这个时候，全世界没有旁人，只有我知道那张纸上的密码是什么意思，甚至西辛格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要求按照紧急事态处理，给予伊琳娜叛逃者的待遇。我坚持要给她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条件：现款、国籍、新的身份、不大事宣扬、一个安定生活的地方。毕竟，我可以说是她的业务代表，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抬眼一看，似乎因为这话是对他说的而感到吃惊。“是的，”他很客气地说，“是的，可以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他也有份。”吉勒姆咬着牙轻轻地说。

听到这话，或者猜到了这话的意思，塔尔生了气。

“这完全是造谣！”他叫道，脸涨得通红，“这是……”他瞪了吉勒姆一会儿，又继续说他的故事。

“我介绍她到当时为止的经历和她能接触到的机密，包括她在中心的工作。我要求派审查人员和空军的飞机来。她以为我会要求在中立国与潘西·阿勒莱恩亲自碰面，但是我认为我们这样是徒劳无益的。我建议他们派出伊斯特哈斯手下下一两个‘点路灯的’来照顾她，最好还有个医生。”

“为什么要‘点路灯的’？”史迈利厉声问道，“他们是不许处理叛逃者的。”

“点路灯的”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手下的人，驻地不在布里克斯顿，是在阿克顿。他们的任务是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

“啊，史迈利先生，自从你走了以后，托比的地位提升了，”塔尔解释道，“他们告诉我，甚至他的街头艺术家15都用凯迪拉克汽车。而且，如果有机会，还抢剥头皮的饭碗，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他们已成了伦敦站之下的主力了。”吉勒姆简短地说，“这是横向领导原则的一部分。”

“我估计审查人员需要半年工夫才能把她审问完毕。不知什么缘故，她对苏格兰着了迷。她很愿在那里度过她的余生。跟托马斯在一起。在高原上养儿育女。我的电报发给伦敦站，用单位的名义，发的是急电，限官员亲自处理。”

吉勒姆插进来说：“这是最高限度机密的新规定。目的是要跳过密码室的处理。”

“但不是在伦敦站？”史迈利说。

“这是他们的事。”

“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比尔·海顿得到了那个差使？”拉康说，转过身面对史迈利，“伦敦站的站长？他实际上是他们的活动总指挥，就像老总有的时候潘西所担任的一样。他们把名称都换了，所以你不太清楚。你知道，你的老伙伴们对名称是很在乎的。吉勒姆，你应该向他介绍一下，让他了解状况。”

“我想我是了解情况的，谢谢你。”史迈利有礼貌地说。他对塔尔装出一种睡意蒙眬的样子问道：“你刚才说，她说到一个大秘密？”

“是的，先生。”

“你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提到了这一点没有？”

他碰到了要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找到了一个一碰就痛的地方，因为塔尔皱了一下眉头，向拉康，又向吉勒姆投射了疑问的一瞥。

拉康猜到了他的意思，马上声明：“史迈利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你在

这间屋子里告诉他的之外。”他说：“对吗，吉勒姆？”吉勒姆点头称是，看着史迈利。

“我把她告诉我的话如实告诉了伦敦方面。”塔尔悻悻然回答，好像被剥夺了讲个动听故事的机会似的。

“确切的措词是什么？”史迈利问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自称有对圆场利益攸关的进一步情报，但尚未透露。’大概如此。”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

他们等待着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也要求伦敦站长通知这里的吉勒姆先生，我一切安全，没有旷职。”

“他们通知了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吉勒姆挖苦地说。

“我等回复等了一天，到晚上还没接到。伊琳娜正常地工作了一整天。你知道，这是我坚持要她那样做的。她想假装发烧，躺在床上，但我不同意。代表团在九龙有工厂要参观，我叫她跟去，别露出马脚。我要她发誓不再碰酒。我不希望她在最后一分钟闹出意外。我要她在脱逃以前一切保持正常。我一直等到晚上，才又加发了一个急电。”

史迈利蒙眬的眼光盯住他面前那张苍白的脸。“你当然收到了他们的回电了吧？”

“‘电悉。’就是这么一句话。我通宵未睡，急得出汗。到天亮还没有接到答复。我想，也许皇家空军飞机已在途中。我想，伦敦大概是为谨慎起见，要等到一切齐备以后才通知我。我的意思是，你离他们这么远，你只能信任他们。不管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你只能信任他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的时候的确是可靠的，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没有人接他的腔。

“我是在为伊琳娜担心，懂吗？我敢肯定，再等一天，她就要垮了。最后答复终于来了，却根本不是答复。这是拖延时间：‘请告知她工作部门、莫斯科中心以前的联系人和熟人的名字、目前上司的名字、参加中心的日期。’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也记不清了。我马上拟了一个回电，因为我跟她约好三点钟在教堂碰头——”

“什么教堂？”又是史迈利问。

“英国浸信会教堂。”令大家奇怪的是，塔尔又脸红了，“她喜欢到那里去。不是去做礼拜，只是去转转。我在门口装作若无其事地等着，但是她没有露面。这是她第一次失约。我们约好如果没有碰上，三小时后就到山顶上去，然后按一分钟五十级的速度下山再回到教堂，直到见到面为止。如果她出了事， she 就把游泳衣挂在窗户上。她是个游泳迷，每天游。我赶到亚历山德拉，没有游泳衣。我还有两个半小时的充裕时

间。除了干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史迈利说：“伦敦站给你的电报等级是什么？”

“是速件。”

“但是你的电报是最速件？”

“我的两次电报都是最速件。”

“伦敦来的电报有人署名吗？”

吉勒姆插进来：“电报不再署名了。外动人员和伦敦站打交道是把它当做一个单位的。”

“你自己译的吗？”

“不。”吉勒姆说。

他们等待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在西辛格的办公室里等着，但在那里不受欢迎。他不喜欢剥头皮的，而且他在中国大陆有件要紧的事，他怕因为我而被破获掉。因此我坐在咖啡馆里等，我忽然想到不妨到机场去一趟。这是随便想到的，好比你可能会想‘不如去看一场电影吧’。我叫出租车司机开快点。我连杀价都没有。好像疯了一样。我在讯问处前也不排队，直接到前面去打听到俄国的飞机或在俄国过境的飞机。我来不及看班机时间表，就问一个中国职员，但是昨天以来，没有一架飞机飞俄国，下一班飞机要到今晚六点。但是这时我灵机一动。我一定得知道呀。那么包机呢？不属于正常航班的那些客机、货机或过境的飞机呢？从昨天早上起就没有飞机去莫斯科吗？真的没有吗？这时有个小姐答复了我，她是一个中国籍的空中小姐。她喜欢我，明白吧。她存心帮我忙。她说两个小时以前有一架苏联飞机临时起飞。只有四个乘客上机。大家注意的是个女病人。一个女人。处在昏迷状态。他们得用担架抬她上机，她的脸上绑了绷带。有两个男护士和一个医生和她一起走，就是这几个人。我打电话到亚力山德拉去，这是最后的一丝希望了。伊琳娜和她冒牌丈夫都还没有结账，但是房间里没有人接电话。那家倒霉的旅馆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

也许音乐早已开始演奏了，但是史迈利现在才注意到。这房子里四处传来了不完整的片段：有吹笛子的，有录音机上放的儿歌，有演奏得比较老练的提琴曲子。拉康的几个女儿都已醒了。

“她很可能是生病了，”史迈利迟钝地说，对象主要是吉勒姆，不是别人，“也很可能是昏过去了。把她护送走的人也很可能真是护士。看起来，她的情况够糟的。”他又补充一句，斜眼瞥了一下塔尔，“毕竟，从你发出第一封电报到伊琳娜离开香港之间只有二十四小时。根据这样的时间安排，你很难把原因归于伦敦那边。”

“正好可以这样，”吉勒姆看着地板说，“时间固然很紧，但刚好够，要是伦敦有人——”他们都等着他把话说完，“要是伦敦有人手脚快。当然莫斯科也得手脚快。”

“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想的。”塔尔得意地说，接过史迈利的话，不去理会吉勒姆，“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说的。别急，里基，我说，如果不小心，你就徒劳无功了。”

“也很可能俄国人无意中发现了，”史迈利坚持己见，“保安人员发现了你们往来的事，就把她弄走了。你们那样往来，他们没有发觉才怪呢。”

“也可能她告诉了她的丈夫，”塔尔提示说，“先生，我也懂得一点心理学。我知道夫妻之间闹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想惹他生气，所以刺激他，看他怎么反应。‘你想知道你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说些这样的话。鲍里斯一怒之下，报告了猩猩，他们揍了她，押送她回国。所有的可能性，我都想到了，这你可以相信我，史迈利先生。说真的，我都一一想到了。任何一个男人，遇到女人抛弃他，都会这样的。”

“还是言归正传吧，好不好？”吉勒姆压低嗓门生气地说。

于是塔尔又继续说，他现在承认，足足有二十四小时，他像疯了一样。“我一般不是常常那样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够经常的了。”

“我感到很懊丧。你几乎可以说感到很恼火。”

他认为快要到手的一块大肥肉给无缘无故抢走了，因此感到很生气，盛怒之下，不顾一切跑到那些常去的地方去瞎闯。他到“猫的摇篮”去，又到“安琪儿”，到天明时分，已到过十几家其他的地方，且不论一路上碰到的一些女人。他还到亚力山德拉去了一趟。他想和那几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吵一架。等他清醒下来以后，他想起了伊琳娜，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决定在飞回伦敦之前到他们约定当信箱的地方看一下，说不定她在走以前给他写了信。

一半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一半大概是因为我实在放不下心，万一她的信留在墙洞里没有人去取，而她自己又束手无策，只能干着急。”他又这么补充一句，真像个知过必改的好孩子。

他们有两个地方交换信件。第一个地方是在旅馆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

“见过他们用竹子做的脚手架吗？真是巧妙之极。我见过这种有二十层楼高的脚手架，苦力扛着预制混凝土构件爬上去。”他说有一根没有用的竹桩，大约有一个人的肩膀那么高。如果伊琳娜真的抽不出时间来见他，就用这竹管做信箱，但是等到塔尔赶到那儿，竹管是空的。第二个地方是在教堂座位的后面，他说：“是他们放小册子的书架下面。这个书架原来是个旧衣柜。如果你在教堂里跪在后排，伸手摸一下，有一块板是松的。背后有个洞，尽是垃圾和老鼠屎。但是我告诉你，这真是最保险不过的信箱了。”

他说话停顿了一下，大家的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里基·塔尔和他的莫斯科中心的情妇一起跪在香港一所浸信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

塔尔说，在这个信箱里，他找到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整整的一本日记。字迹清楚，两面书写，因此墨水就常常渗透过来。写得很匆忙，但没有什么涂改。他一眼就知道这是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写的。

“不过，这里的这本不是，这本是我抄的。”

他把瘦长的手指伸进他的衬衫里面，取出一个皮夹，有一条很宽的皮带系住，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叠折得皱巴巴的纸。

“我猜她是在被揍之前把日记送到那里，”他说，“或许她还在那儿做最后一次祷告。这是我自己翻译的。”

“我以前不知道你懂俄语。”史迈利说。这句话别人没有注意，但是塔尔注意到了，他马上露出了笑容。

“唉，史迈利先生，干这行当，你得要有一项专长，”他打开那叠纸解释道，“我学法律可能不怎么行，但是多学一种外语肯定是有用的。我想你大概知道诗人是怎么说的吧？”他抬起头来，面露笑容道，“‘多掌握一国语言就是多掌握一个灵魂。’先生，是个伟大的国王说的，他就是查理五世。我的父亲记得很多名言，这一点我不是吹嘘，不过奇怪的是，他除了英语以外不懂任何其他外语。要是你们同意，我把日记念给你们听。”

“他一句俄语也不懂，”吉勒姆说，“他们两人一直用英语对谈。伊琳娜学过三年英语。”

吉勒姆说这话时，抬头望着天花板，拉康看着自己的手。只有史迈利看着塔尔，塔尔对于自己开的小玩笑咯咯地笑着。

“都准备好了？”他问道，“那么好吧，我就开始吧。‘托马斯，你听好，我现在告诉你。’她总是称呼我的姓，”他解释道，“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叫汤尼，但是她总叫我托马斯。‘这本日记是我给你的礼物，万一他们没有等我和阿勒莱恩谈话就把我带走。托马斯，其实我宁可给你我的生命，当然还有我的肉体，但是我想更能使你高兴的，只有这个可怜的

秘密了。请好好利用它！”塔尔抬起头来，“上面写的是星期一。她写了四天日记。”他的声音平板，甚至有些倦意，“在莫斯科中心，传说很多，上级很不满意。特别是一些小萝卜头，他们想显得重要，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我在参加贸易部之前，有两年是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总部里管档案。在那里工作很单调，托马斯，气氛很不愉快，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他们鼓励我们互相猜疑，不能跟任何人讲心里话，一次也不能，这真使人憋得难受。在我的下面有个办事员叫伊夫洛夫，他的社会地位和职务都比我低，但是由于气氛憋人，我们倒很谈得来。对不起，有时候我们只有通过肉体交谈，你应该早一些出现，托马斯！伊夫洛夫和我好几次一起上夜班，最后我们决心违反规定在大楼外面见面。他跟你一样，是金头发，托马斯，我喜欢他。我们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区的餐馆里见了面。在俄国，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莫斯科没有贫民区，这是瞎说。伊夫洛夫告诉我他的真名叫勃洛特，但他不是犹太人。他给我一些咖啡，那是他在德黑兰的一个朋友偷偷带给他的，他很讨人喜欢，还给了我几双丝袜。伊夫洛夫告诉我，他对我很倾倒，说他以前工作的部门负责保管中心的全部外国间谍的档案。我听了大笑，对他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部门，这是有些喜欢做梦的人的瞎想，以为中心的全部秘密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唉，也许我们都是这种喜欢做梦的人。”

塔尔又中断了朗读。“这里又是另外一天。”他宣称说，“她一开始说了一大堆‘托马斯，早安’啦、祷告啦，还有一些情话。她说，女人写信不能没有对象，所以她写给托马斯。她的男人一早就出去了，她有一个小时。我念吧？”

史迈利的嗓门里咕噜了一声。

“我第二次和伊夫洛夫碰头是在伊夫洛夫妻子的一个表兄弟房子里，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员。屋子里没有别人。这次碰面极其秘密，干了一件我们在报告里称为犯罪的事。我想，托马斯，你自己也一定干过一两次这样的事！在这次见面时，伊夫洛夫还告诉我下面这件事，目的是要巩固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托马斯，你注意听着。你听过有个叫卡拉的人吗？他是个老狐狸，中心里最狡猾、最神秘的一个人，甚至他的名字，我们俄国人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伊夫洛夫虽然告诉了我这件事，但是他怕得要命，因为据他说，这牵涉到一个大阴谋，也许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阴谋。伊夫洛夫说的事如下。托马斯，由于这是极度机密，你只能告诉你最可靠的人。你绝不能告诉圆场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在这个谜解开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加以轻信。伊夫洛夫说，他原来说曾在外国间谍档案部门工作，这话不是真的。他捏造这件事只是为了要我炫耀他对中心的内幕知道得很详细，让我知道我爱上的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实际情况是，他曾经担任卡拉的助手，参与过卡拉的一个大阴谋，他以大使馆司机和助理译码员身份为掩护，驻在英国，从事阴谋活动。为此，他有个工作上的假名叫拉宾。这样，勃洛特就一变而为伊夫洛夫，再一变而为拉宾——可怜的伊夫洛夫，他对此还感到很得意。我没有告诉他，在法语里，拉宾是什么意思。16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居然以

名字多寡计，这也是很少见的。伊夫洛夫的任务是为一个地鼠服务。所谓地鼠就是潜伏很深的间谍，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西方帝国主义内部挖了很深的地洞，这次是个英国人。地鼠对中心很珍贵，因为要打进去很费时间，常常要花十五年、二十年的工夫。英国的地鼠大部分是卡拉在战前招募来的，出身都是上层阶级，甚至有对自己出身感到厌恶的贵族，结果私底下成了狂热分子，比他们一些懒懒散散的英国工人阶级同志还要狂热执迷得多。有的甚至要申请入党，还是卡拉及时制止了他们，引导他们做特殊工作。有的曾在西班牙与佛朗哥法西斯主义作战，为卡拉物色人才的人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后，推荐给卡拉。有的是在战时苏英结成同盟时招募来的。有的因西方在战后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失望……’这里好像断了。”塔尔看着自己的稿子说，“我在这里写了‘断了’两字。我估计是她的先生回来得比预计早。墨水迹都化开了。谁知道她把这玩意儿塞在什么地方。床垫下面也说不定。”

这话如果他是当笑话说的，并没有引起笑声。

“拉宾在伦敦服务的那个地鼠，代号叫做杰拉德。他是卡拉招募来的，他是一个极大阴谋的目标人物。据伊夫洛夫说，只有极有能力的同志才有资格为地鼠服务。因此，伊夫洛夫即拉宾在大使馆里表面上固然无足轻重，常常受到种种侮辱，比如在举行招待会时和女侍一样站在酒吧后面侍候客人，但实际上他是个要人，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的秘密助手，后者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

史迈利这时插话，要塔尔把名字拼出来。塔尔好像一个演员台词说了一半给打断了感到不高兴，粗鲁地说：“P—o—l—y—a—k—o—v，听清楚了吗？”

“谢谢你。”史迈利不为所动，仍旧很有礼貌地回答。他的态度明确显示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塔尔又继续说下去。

“维多洛夫本人是个极其狡猾的职业老手，伊夫洛夫这么说。他作为掩护的职务是文化参事，他与卡拉说话就是用这个身份。作为文化参事的波里雅科夫，他筹组苏联方面派人到英国各大学和团体讲学，介绍苏联的文化情况。一到晚上，他作为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的工作则是根据卡拉从中心发来的指示，与地鼠杰拉德联系，发给指示，接受汇报。为此，维多洛夫上校即波里雅科夫要用一些跑腿的人，可怜的伊夫洛夫有一阵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实际控制地鼠杰拉德的还是在莫斯科的卡拉。”

“写到这里真的乱了，”塔尔说，“她是在夜里写的，不是喝醉了，就是吓怕了，这一页写得乱七八糟，说到走道里有脚步声，猩猩们对她瞪白眼。这部分就不译了，好不好，史迈利先生？”他得到点头许可后又继续下去，“为了地鼠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极其周密。从伦敦发到莫斯科中心给卡拉的书面报告，即使在译为密码以后，也分成两半，由不同的通讯员发送，有的在大使馆正规公文下面用隐形墨水书写。伊夫洛夫告诉我，地鼠杰拉德有时提供的机密资料，连维多洛夫即波里雅科夫一

时也应接不暇。有很多都是拍成照片，但没有冲洗出来，一星期常常有三十卷。底片如果不按规定的方法打开，就会曝光。有的资料则是地鼠在极其机密的会面时讲的话，用特制的录音带录下来，只有用特制的复杂机器才能播放出来，这种带子如果曝光或者用的机器不对，也就全都洗掉了。这种会面都是紧急性质的，每次总是不同的、突然的，我只知道这一点，还有都是在越南遭到法西斯侵略最严重时期，在英国，极端反动派又掌握了政权。而且据伊夫洛夫即拉宾说，地鼠杰拉德在圆场是个高级官员。托马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我既然爱你，我就决定要敬重所有的英国人，尤其是你。我不能想像一个英国绅士是卖国贼，不过当然，他是完全有权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的。而且我对圆场任何一个人员的安全都担心。托马斯，我爱你，你知道了这件事后可要小心，这也可能害了你。伊夫洛夫是个像你一样的人，即使他们叫他兔子……”塔尔没有把握地说，“最后有一点……”

“读下去。”吉勒姆轻声说。

塔尔把那一叠纸稍微拿高一些，仍旧平铺直叙地念道：“‘托马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也是因为我害怕。今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坐在床边，像个疯子似的盯着我看。我下楼去喝咖啡时，保安人员特里波夫和诺维科夫像野兽一样看着我，无心吃东西。我想他们在那里一定有很长时间了，还有一个香港站来的阿维洛夫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还是个孩子。托马斯，你有没有不小心走漏了什么？你是不是瞒着我把不该说的也说了？现在你可以明白了，非找阿勒莱恩不可。你不用责备自己，我可以猜得出来你告诉了他们什么。我内心是自由的。你只看到我坏的一面：喝酒、害怕、撒谎。但是我内心燃烧着一种新的幸福光芒。我常常想，秘密世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被永远放逐到了一个半人半兽的孤岛。但是，托马斯，这不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上帝让我看到，它就在这里，就在实际世界的中间，实际世界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只要开门走出去就可以得到自由。托马斯，你一定要永远寻找我已经找到的光明。这就是爱情。现在我要把这本日记拿到我们的秘密地方去，趁现在还有时间，把它放在那里。亲爱的上帝啊，我希望时间还来得及。上帝在教堂里给了我庇护。请你记住：我也在那里爱过你。’”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他的手在拉开衬衫把那叠纸放回皮夹里去的时候是哆嗦的，潮湿的。“还有最后一句，”他说，“说的是：‘托马斯，你为什么不得童年时代的祷告文了？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好人。’我对你们说过，”他解释道，“她疯了。”

拉康已经拉开了窗帘，白昼的光线直泻进来。窗户对着一个小骑马场，洁姬·拉康，一个梳着辫子、戴着帽子的胖胖女孩，骑着她的小马，在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跑着。

史迈利在塔尔走以前，问了他一些问题。他的眼光没有看着塔尔，而是近距离地看着眼前，他发肿的脸因为这个悲剧而显得有些泄气。

“这本日记的原本在哪里？”

“我把它放回到那个信箱里。史迈利先生，我是这样想的：等我找到日记的时候，伊琳娜到莫斯科已有二十四个小时了。我估算她一开始接受审问，就没什么气了。很可能他们在飞机上就会拷打她，着陆后又来一遍，等那些壮汉吃了早饭后，就开始审问。他们对胆小的就来这一套：先拷打再审问，对不对？因此很可能过不了一两天，中心就会派人到教堂后面去搜查，对不对？”接着又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而且我也有自身的安全考量。”

“他的意思是说，莫斯科中心如果认为他没有见到日记，就不会那么急着想切断他的喉咙。”

“你把日记拍了照没有？”

“我没有带照相机。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本笔记本，把日记内容抄在上面，把原本放了回去。一共整整花了我四小时。”他看了一眼吉勒姆，在白昼的光线里，塔尔的脸上突然现出了内心的深刻恐惧，“我回到旅馆里时，我的房间被弄得一塌糊涂。他们把墙纸都撕下来了。旅馆经理叫我赶快搬走。他不想知道内情。”

“他带着一把手枪，”吉勒姆说，“他不让它离身。”

“你说得没错，我枪不离身。”

史迈利同情地咕嚕一声，好像消化不良一样：“关于你和伊琳娜的几次见面：秘密信箱、安全暗号、万一无路可走的退路等。这些玩意儿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还是她？”

“是她先提出来的。”

“安全暗号是什么？”

“肢体语言。如果我敞开衬衫领子，她知道我已观察过地方，一切安全。如果系上扣子，就取消碰头，到约好的第二次时间和地点。”

“伊琳娜呢？”

“手提包。左手，或者右手。我先到那里，在她能够看得见我的地方等她。这样她就能选择见面还是分手。”

“这些事都发生在六个多月以前。那么这六个月以来你在干什么？”

“休息。”塔尔粗鲁地回答。

吉勒姆说：“他吓怕了，躲了起来。他逃到吉隆坡，躲在一个小山村

里。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有个女儿叫丹妮。”

“丹妮是我的小乖乖。”

“他与丹妮和她母亲待在一起，”吉勒姆说，把塔尔说的话都当做没有听见一样，这是他的习惯，“他全世界都有老婆，不过现在似乎是这个得宠。”

“为什么你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来见我们？”

塔尔没有说话。

“你不想和丹妮一起过圣诞节吗？”

“当然想。”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你在怕什么？”

“有谣言。”塔尔愠愠地说。

“什么谣言？”

“吉隆坡来了个法国人，告诉大家我欠他钱，要请律师来对付我。我根本没欠谁的钱。”

史迈利转过身来问吉勒姆：“圆场里还把他当做叛逃者吗？”

“大概是吧。”

“他们到现在为止采取了什么行动？”

“这不归我管。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前一阵子伦敦站针对他开了几次作战会议，但是没有请我去，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想大概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结果。”

“他现在用的是什么护照？”

塔尔早已准备好了答案：“我一到马来亚就把托马斯的护照扔了。我想托马斯不合这一个月莫斯科的口味，我还是马上把他做掉为妙。我在吉隆坡让他们给我弄了一个英国护照，名字叫普尔。”他把那份假护照拿给史迈利，“还蛮划算的。”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瑞士护照呢？”

又是一阵谨慎的沉默。

“是不是他们搜查你的旅馆房间时丢了？”

吉勒姆答道：“他一到香港就把护照藏起来。这是例行的做法。”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是编了号的，史迈利先生。虽然是空白护照，但是编了号的。老实说，我有点害怕。如果伦敦知道这号码，莫斯科可能也知道，我想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那么你怎么处理你的瑞士护照呢？”史迈利仍旧脾气很好地再问一

遍。

“他说他扔了。”吉勒姆说，“更有可能是他卖了。或者换了现在这个。”

“怎么？怎么扔的？你是不是烧了？”

“是的，我烧掉了。”塔尔说，声音有点紧张，一半是威胁，一半是恐惧。

“因此，当你说到那个法国人在打听你的时候——”

“他是打听普尔。”

“但是除了伪造那份护照的人以外，还有谁听说过普尔呢？”史迈利问，一边翻着护照。塔尔没有说话。“告诉我你是怎样来英国的。”史迈利提议说。

“从都柏林绕道来的。这不成问题。”塔尔压力太大时，撒谎就很不灵光。也许得怪他的父母。他没有现成的答案，就回答得太快，有现成的答案，就回答得太硬。

“你怎么到都柏林的？”史迈利一边问，一边检查护照中间一页的海关戳章。

“靠美女。”他恢复了自信，“一路都是美女。我认识一个小姐，她是南非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我的一个好朋友让我搭货运机到好望角，到了好望角，那个小姐把我藏了起来，然后托一位驾驶员免费把我带到都柏林。东方那边的人都还不知道我已离开了半岛。”

“我正在全力进行调查。”吉勒姆看着天花板说。

“你最好小心一点儿，”塔尔朝他那一头不客气地说，“因为我不想让不该知道的人去调查我。”

“你为什么来找吉勒姆先生？”史迈利问，一边仍在检查着普尔的护照。它看上去是个已经用过的旧护照，翻了很多次，里面登记得不是太满，也不是太空。“当然，除了你害怕以外。”

“吉勒姆先生是我的上司。”塔尔一本正经地说。

“你有没有想到他可能直接把你转给阿勒莱恩？毕竟，就圆场高层而言，你是一个通缉犯。”

“是啊。但是我认为吉勒姆先生和你史迈利先生一样不喜欢现在的新安排。”

“他也很爱英国。”吉勒姆解释道，带着辛辣的讽刺味道。

“是啊，我有点想回国。”

“你有没有想过找吉勒姆先生以外的人？比如说，为什么不找海外的常驻站？这样你就少点危险。麦克尔沃仍旧是巴黎站的站长吗？”吉勒姆点点头，“你瞧，你大可去找麦克尔沃先生。当初是他把你找来的，你可

以信任他——他是老圆场人了。你大可以安然无事地待在巴黎，不用到这里冒生命危险。啊，上帝，拉康快去！”

史迈利已经站了起来，一只手捂着嘴巴，眼睛望着窗外。在小跑马场里，洁姬·拉康趴在地上尖叫，一匹无主的小马在树丛中猛冲乱跑。他们在看着的时候，拉康的妻子，一个长头发的漂亮女人，腿上穿着冬天的厚袜，跳过篱笆，把孩子抱了起来。

“她们老是摔下来，”拉康不快地说，“小孩子摔不坏。”而且一点也不客气地又说：“乔治，不是每个人的事都要你操心。”

他们慢慢地又坐下来。

“如果你到巴黎去，”史迈利又说，“你走什么路线呢？”

“同一条路线到爱尔兰，然后大概从都柏林到巴黎的奥利机场。你要我怎么走，从海上过去吗？”

拉康听到这话气红了脸，吉勒姆怒吼了一声，站了起来。但是史迈利似乎毫不在乎。他又拿起护照，慢慢地翻到前面。

“你是怎样与吉勒姆先生联系的？”

吉勒姆代替他回答，说得很快：“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停车。他留一张条子在车上说他要买这辆车，署名是他的工作名字特仑奇。他提了一个碰头的地方，并且暗示要我在向别人兜售之前暂时保密。我带了法恩去替我把风——”

史迈利打断他的话说：“刚才在门外的是法恩吗？”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替我把风，”吉勒姆说，“从那以后，我们见面时一直带着他。我听了塔尔的报告后，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拉康，要求见面。乔治，这些情况咱们另外再谈吧。”

“打电话给拉康是打到这里，还是打到伦敦？”

“打到这里。”拉康说。

吉勒姆停了一会儿才说：“我正好记得拉康办公室里一个小姐的名字。我提到她的名字，说她要我赶紧找他联系，是关于一件私事。这样做并不太好，但在当时情况下我只能想到这样。”他又补充，打破了沉默，“他妈的，没有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有各种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史迈利合上了护照，就着旁边一盏破旧的台灯查看它的装订。“真不坏，是不是？”他轻松地说，“真的很不坏。一定是个行家作品。我找不到一点毛病。”

“别担心，史迈利先生，”塔尔伸手拿了回来，不客气地说，“这不是俄国造的。”他走到门口时，脸上又恢复了笑容，“你们知道吗？”他对这间长长的屋子另一头的三个人说，“如果伊琳娜说的话没错，你们就需要全部重建圆场了。因此如果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就可以在一起从第一

层干起。”他在门上开玩笑地敲了一下，“亲爱的，开门吧，是我，里基。”

“谢谢你！现在没事了！开门吧！”拉康大声说。过一会儿，就听到了钥匙的转动声，在外把风的法恩的黑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接着在空荡荡的屋子中回响的脚步声渐渐消失，远处有洁姬·拉康的哭声伴随着。

这幢房子一面是练习骑马的小围场，另一面是个草地网球场，隐藏在树林中间。球场不是太好，没有经常割草。春天，冬季的积水浸透了草地，没有阳光照射进来把它晒干。到了夏天，球飞了出去，掉在树叶丛中很难找到。今天早晨，从整个花园扫到球场里来的结霜落叶，厚可没脚。但是在场外，在顺着长方形的铁丝网外的山毛榉间，有一条小径，史迈利和拉康现在就在这条小径上漫步。史迈利已经披上了他的旅行大衣，拉康却只穿他那套破旧的衣服。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每一步都走在史迈利前面，因此不得不停下来等个子矮的那个人赶上来。一赶上来以后，他又急着迈步，结果又走在前头。他们这样赶了两次，拉康终于打破沉默。

“一年前，你为了一个类似的想法来见我，我几乎把你撵了出去。我想现在应该向你道歉。我当时太大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在想他那次的失职，“我那时指示你停止一切调查。”

“你对我说，这种调查是违反宪法的。”史迈利也遗憾地说，仿佛他也想到了那个可悲的错误。

“我是这样说的吗？我的天，我真是太夸大其词了。”

屋子那里传来了洁姬不断的哭声。

“你从来没有过吧，是不是？”拉康马上问，他的脑袋转向哭声传来的方向。

“你说什么？”

“我是说孩子，你和安恩没有孩子吧？”

“没有。”

“侄子、外甥呢？”

“只有一个侄子。”

“你的？”

“她的。”

史迈利环顾周围的玫瑰树丛、断了的秋千、潮湿的沙坑、在晨光中醒目刺眼的红房子，心想，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们从上次谈话以后仿佛一直在这里。

拉康又在道歉了：“是不是可以说，我并不完全信任你的动机？你瞧，我当时心里想，这是老总指使你来见我的。这是他恋栈不去，想排挤潘西·阿勒莱恩的一种办法——”他又向前跨起大步，手腕向外挥着。

“那可不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老总根本不知道。”

“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却不明白。对于你们这种人，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应该相信，什么时候不该相信。你们有完全不同的一套标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不得不那样。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我并不是要随便下断语。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使方法有所不同。”——他跳过一个沟——“我有一次听人说，道德规范就是方法。你同意这种看法吗？我想你大概不会同意。我想，你会说，道德规范就寄托在目标之中。但是很难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问题就在这里，特别如果你是英国人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你们这些人来为我们决定政策，是不是？我们只能要求你们推行政策，对不对？又很微妙吧？”

史迈利不再追着他走。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生锈的摇椅上，把大衣裹得更紧了，于是拉康只好回来，欠着身子坐在他的身旁。他们两人一起跟着下面的弹簧咯吱咯吱地摇着。

“为什么她选中了塔尔？”拉康终于自言自语道，拨弄着他纤长的手指，“要找一个人听她忏悔，我看没有比这个人更不合适了。”

“这个问题，我看你得去问女人，问我们可没有用。”史迈利说，心里又在想伊明翰究竟位于哪里。

“唉，是啊。”拉康马上同意道，“这一切都是个谜。我在十一点钟要去见大臣，”他低声告诉史迈利，“我得让他知道。他是你在议会的表兄。”他又补充了一句，勉强加上这个跟私人有关的笑话。

“实际上是安恩的表兄，”史迈利纠正他，口气仍有点心不在焉，“虽然是远房，但还是表兄。”

“比尔·海顿也是安恩的表兄？我们伦敦站的那位杰出的站长？”他们以前也已经开过这个玩笑了。

“是啊，根据另一条家系，比尔也是她的表兄。”他完全没有必要地补充一句：“她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有很稳固的政治传统。年代久远，就分布得更广。”

“传统？”拉康喜欢把含糊其辞的话弄得一清二楚。

“家族。”

史迈利听见树林外面汽车开过的声音。整个世界就在这树林的外面，可是拉康却有这个红色的城堡和基督教的伦理观，后者所能给他的只不过是爵士的封号、同辈的尊敬、优厚的年金和一两家大公司理事的挂名差使。

“我反正要在十一点钟去见他。”拉康站了起来，他们又在一起走了。史迈利忽然觉得在早晨新鲜的空气中飘来了“埃利斯”的名字，有那么一阵子，像坐在吉勒姆的汽车中一样，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袭上了他的心头。

“毕竟，”拉康说道，“我们俩的立场都是很光明正大的。你认为埃利斯被出卖了，因此你要求追查。大臣和我认为这事完全是老总办事无能

——说得客气一些，这也是外交部的看法——因此我们要换一把新扫帚17。”

“唉，你的处境，我很能理解的。”史迈利说，与其说是说给拉康听的，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

“那我很高兴。乔治，可别忘记：你是老总的人。老总喜欢你，不喜欢海顿，他后来失去了自制，干这件特别冒险的事儿时，是你给他撑门面的。不是别人，是你，乔治。谍报组织的头头自己和捷克人打私仗，不是常见的事。”很明显，旧事重提仍使人不快。“要不是那样，我想倒霉的也许是海顿了，但是你正好首当其冲，而——”

“而潘西·阿勒莱恩正好是大臣的人。”史迈利说，声音很轻，拉康只好放慢脚步来听他说。

“要是你有个怀疑对象，那就不是那样了！你没有指出任何一个人！没有具体目标而进行调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而新扫帚扫得更干净些。”

“你是说潘西·阿勒莱恩？总而言之，他做得极好。他拿出来的是谍报，不是丑闻。他严格遵守职责，博得顾客信任。据我所知，他还没有侵犯捷克领土。”

“有比尔·海顿替他防守，谁不会？”

“老总就不会。”拉康说，这一拳很有力。

他们走到了一个空游泳池前停了下来，站在那里看着深的那一头。从黑漆漆的深处，史迈利好像觉得又听见罗迪·马丁台尔含沙射影的话：“海军部的机密文件阅览室里，用各种各样古里古怪名称成立的小组委员会里……”

“潘西的那个情报特别来源仍旧活跃吗？”史迈利问道，“叫什么巫术资料或者什么的？”

“我不知道名单上有你，”拉康说，一点也不高兴，“既然你问，我就告诉你，仍旧活跃。巫师情报来源是我们的主要依靠，他的情报仍用巫术这个名字。圆场多年没有交来这样好的资料了。根据我的记忆，可以说从来没有过。”

“仍旧需经那一套特殊处理吗？”

“当然啰，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我想毫无疑问的，我们要采取更严格的预防措施。”

“要是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杰拉德可能闻出味道不对。”

“这是个关键，是不是？”拉康马上说。史迈利心里想，这人精力过人，不可想像。刚才还像个连腰板也挺不直的瘦弱拳击手，戴着一副太大的拳击手套，一会儿他又伸出拳来，把你打到拳击场边的绳圈上，带着基督徒的同情眼光看着你。“我们不能动手。我们不能着手调查，因为

一切调查手段都掌控在圆场手里，甚至可能在地鼠杰拉德的手里。我们不能监视、偷听、拆信。要做这些事情，得用伊斯特哈斯手下点路灯的力量，而伊斯特哈斯本人像别人一样也是嫌疑对象。我们不能讯问，我们不能限制某个人查阅机密资料。做这些事，就会有使地鼠警惕起来的危险。乔治，这是个最古老的问题：谁能够充当侦查间谍的间谍呢？谁能够打草不惊蛇呢？”他开了一个笨拙的玩笑：“只有地鼠。”说的是内心的旁白。

史迈利一时来了劲，往前跨步，在通向小骑马场的那条小径上，走在拉康的前头。

“那么找圆场的竞争对手，”他回头大声说，“找安全部门去。他们是专家，他们会帮你忙。”

“大臣不会同意的。你明白，他和阿勒莱恩对这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也难怪他们。如果让一些前殖民地官员来检查圆场的文件，那不如让陆军来调查海军！”

“根本不能这样比。”史迈利不同意。

但是拉康这个模范公务员却已准备好了他的第二个隐喻：“那么好吧，大臣宁可屋漏，也不愿意让外人来把他的堡垒拆掉。这么说总行吧？乔治，他有充分的理由。我们有情报员在外面，一旦安全部门的人插手进来，他们就完了。”

现在是史迈利放慢脚步了。

“有多少？”

“六百上下。”

“铁幕后面呢？”

“预估是一百二十。”凡是数字，凡是各种各样的事实，拉康从来不含糊的，这是他工作的本钱，从灰色的官僚主义大地中挖出来的黄金。“从财务报告来看，目前他们几乎都是很活跃的。”他跨了一大步，“那么，我可以告诉他你愿意干，是不是？”他相当轻快地说，好像这个问题仅仅是形式而已，在适当的方格里打一个勾就行了，“你愿意担任这整顿内部的工作？对以前的，对以后的，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毕竟是你这一代的，这是你的责任。”

史迈利已经推开了小骑马场的栅栏门，进去以后又随手关上。他们两人就在摇摇晃晃的栏杆两边面对着。拉康脸上有些红晕，带着一种依赖的笑容。

“我为什么要说埃利斯？”他找话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明叫普莱多，我为什么说埃利斯事件？”

“埃利斯是他工作的名字。”

“对了。那些日子里不断出事，让人连细节都忘了，”停了一会儿，

他挥着右臂向外一甩，“他是海顿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

“他们在战前一起念牛津。”

“后来在战时和战后一直是圆场的同伴。有名的海顿—普莱多搭档。我的前辈不断提到他们。”他又问，“你跟他从来不是很亲近？”

“普莱多？不。”

“我是说，不是表兄？”

“拜托！”史迈利粗声粗气地叫道。

拉康又显得尴尬起来，但是他另有目的，因此眼光死盯着史迈利。“不会有感情上的原因或其他的原因，使你觉得不适合担任这一工作吧？乔治，你一定得说清楚。”他有些担心地要求，好像他最不希望人家说清楚似的。他等了一会儿，就又不在了乎了：“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理由。我们总有一部分属于公家的，是不是？社会契约互相都有约束力，我相信你是一直知道的。普莱多也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唉，乔治，他中了枪。背上中了一枪，即使在你们的圈子里，也是很大的牺牲吧。”

史迈利一个人站在小骑马场的另一头，在低垂的柳树下一边喘着气，一边想弄清楚自己的心情究竟怎么回事。像旧病复发一样，他的气愤突如其来。自从退休以后，他就一直以为已与气愤绝缘了，凡是能够引起气愤的事，他都小心避开：报纸、以前的同事、马丁台尔那种闲聊。他一辈子靠的是自己的机智和惊人的记忆力，现在却把全部时间用在遗忘上。他强迫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当他在圆场工作时，这不失为一个有用的散心方法，但是如今失了业，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散心了。什么也没有。他简直要大声呼喊：没了！

“把那里给烧掉，”安恩曾经这么建议，指的是他的藏书，“把房子烧了也可以。但是可别意志消沉。”

如果她说意志消沉是指随俗从流的话，她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的目标。他越来越接近保险公司广告所称的迟暮之年了，他真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模范的靠退休金为生的人，虽然没有人感谢他这种努力，尤其是安恩。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者每天晚上上床（多半是独宿）的时候，总是提醒自己，他从来不是“缺我不可”的。他已经努力习惯了这样的看法：在老总当家的最后几个倒霉的月份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使人晕头转向，眼看着事情搞得不可收拾，他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果说，他职业上的自我现在起来责问自己：你明知道那地方出了毛病，你明知道吉姆·普莱多被出卖了——还有什么证据比背上中了一两颗子弹更确凿呢？——那么他的回答是，即使他真的知道，那又怎么样呢？即使他是正确的，那又怎么样呢？他会对自己说：如果认为只有一个胖胖的中年间谍才能拯救这个世界，那未免太狂妄自大了。但是有的时候，他却这

样对自己说：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离开圆场时没有留下一些未了事务的。

只有安恩不肯接受他的结论，尽管她无法了解他的推论。事实上，在这种职业问题上，她很认真，只有女人才如此，她真的逼着要他回去，重操旧业，不要轻易退让。这当然并不是说她了解什么真实情况，但是有哪个女人因不了解情况而罢休的呢？她全凭直觉，而且因为他不按照她的感觉去做而瞧不起他。

而现在，就在他快要开始相信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安恩迷上了一个失业演员而容易一些），谁能想到他过去生活中的一些阴魂一个个又闯进了他的小天地，拉康、老总、卡拉、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布兰德，最后还有比尔·海顿本人，把他又拉到这个花园中来，高兴地告诉他，他一直称之为虚妄的东西都是确实的？

“海顿。”他对自己一再重复说，不再能够抑制汹涌而来的记忆，即使这个名字令他像听到打雷一样震惊。“我听说你和比尔一度是什么都不分彼此的。”马丁台尔这么说。他看着自己粗短的手指哆嗦。年纪太老了？无能为力？害怕追逐，还是害怕他最后会揭发出来的东西？“要无所作为，总是有许多理由的，”安恩喜欢这么说，实际上这是她为自己多次行为不检而爱用的借口，“但是要做一件事情，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你想做。”还是不得不做？安恩会竭力否认，她会说，胁迫，不过是做你想要做的事的另一种说法，或者不做你怕做的事的另一个说法。

不大不小的孩子哭起来比哥哥姐姐时间更长。洁姬·拉康趴在她妈妈的肩上，抑制着自己的伤痛和自尊心，看着客人们离去。先走的是两个她以前没有见过的男客，一个是高个子，一个是黑头发的矮个子。他们坐一辆绿色的小货车走的。她注意到没有人向他们挥手，甚至没有人向他们送别。接着是她父亲坐自己的车走了。最后是一个金发漂亮的男客和一个矮矮的胖子，穿着一件十分肥大的大衣，好像披在马背上的毛毯一样，他们走到停在山毛榉树下的一辆跑车那里。她真的还以为那个胖子一定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跟在后面走得很慢，而且很痛苦。接着，她看到那个漂亮的男人替他打开车门，他似乎从梦中醒了过来，匆匆地抢前一步。不知什么缘故，这一动作刺激了她。她感到一阵伤心，又号啕大哭起来，她的母亲无论如何都安抚不了她。

彼得·吉勒姆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自觉的忠诚决定于他个人的爱憎。至于在其他方面，他的忠诚早就奉献给圆场了。他的父亲是个法国商人，在战时曾为圆场的一个谍报网做过间谍，由他的母亲，一个英国女人，负责密码部分。八年以前，吉勒姆本人还以航运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在法属北非指挥一批自己的情报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他终于被破获，他手下的情报员被处以绞刑，他于是转为内勤，人也迈入中年。他在伦敦替人当助手，有时替史迈利当助手，也负责指挥过少数几次以国内为基地所进行的活动，其中还有一个“女朋友”网，但是正如行话所说，这些女朋友互不知情。等到阿勒莱恩的一帮人当权，他就被排挤，打入布里克斯顿冷宫了，他自己猜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关系不对，其中包括史迈利。到上星期五为止，若是要他谈谈自己的经历，他一定会这样说。关于他与史迈利的关系，他说起来是乐此不疲的。

那些日子里，吉勒姆主要住在伦敦的码头边，他和一票招募人员偶尔能遇上一些波兰、俄国或者中国海员，他就从中拼凑一个较下层的海员谍报网。有空的时候，他就坐在圆场二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和一个叫玛丽的漂亮女秘书说说笑笑解闷，这样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只是送上去的报告没有人理。拿起电话来不是占线，就是没有人回答。他隐约听说上面出了事，但这是常事。例如大家都知道阿勒莱恩和老总两人在钩心斗角，但好多年来他们两人就一直如此，很少搞别的。他跟大家一样，也知道捷克破了一个大案，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发表声明，推说并不知情，剥头皮组的组长吉姆·普莱多原来是第一号捷克通，也是比尔·海顿的长期密友，背上中了一枪，给抓了起来。大家都缄口不言，板着面孔，他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比尔·海顿大发雷霆，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楼，大家又紧张又兴奋，据玛丽说有点像上帝震怒，不过她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后来他听说这场灾难的代号叫“作证”。海顿告诉他，一个老头子为了死前的临别光荣纪念，搞这么个活动，实在窝囊，结果拿吉姆·普莱多作牺牲。消息走漏，见了报纸，在议会中引起质询，甚至有谣传说，德国境内的英国驻军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不过这个谣言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最后由于到别人的办公室里闲荡，他才开始慢慢了解别人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的情况。圆场不仅一片沉默，甚至是一片冰冻，什么都不进，也不出，至少在吉勒姆的那一级是如此。大楼里面，相关人士都躲了起来，发薪的日子，信件架上没有鼓鼓的工资袋，因为据玛丽说，管家的没有接到发薪的例行指示。有时有人看到阿勒莱恩从他的俱乐部出来，满脸怒容。或者看到老总上车，满面春风。还有人说比尔·海顿已经辞职，因为上上下下都不支持他，不过比尔一直是在闹辞职的。只是据谣言说，这一次原因略有不同。海顿所以生气是因为圆场不肯付给捷克

为了遣返吉姆·普莱多所索取的代价。据说，无论是为了情报员或者威望，这个代价都太高了。但是比尔·沙文主义大发作，他扬言，为了把一个爱国的英国人搞回来，任何代价都不算高：只要能把吉姆弄回来，什么都可以给他们。

接着有一晚，史迈利脑袋伸进吉勒姆办公室的门里来，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喝一杯酒。玛丽没有看清他是谁，用她时髦却没什么气质的腔调说了一声“哈啰”。他们并肩走出圆场时，史迈利向看门的道别，口气特别干脆。到了华都街的酒店里他才说“我被撤了”，就此而已。

他们从酒店出来，又到查令十字街不远的一家地下室酒吧，因为那里有音乐，却没有酒客。吉勒姆便问道：“他们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只因为你发胖了？”

史迈利就一心惦念着“理由”这一字眼。他这时已完全醉了，不过还没有失态。他们沿着泰晤士河的河堤步履不稳地走着时，他又想到了理由。

“理由是作为逻辑，还是作为动机？”他问道，听起来不像他自己，而有点像比尔·海顿。在这些日子里，人人的耳旁，似乎都可以听到海顿战前在牛津联盟上学来的辩论腔。“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他们用不着向我提出理由。我能够提出自己的理由。不过这不一样，”他还是喋喋不休地说着，这时吉勒姆小心翼翼地把他搀进一辆出租车，把车钱和地址给了司机，“这跟心灰意冷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一样。”

“阿门。”吉勒姆说，他一边看着汽车远去，一边心里明白，按照圆场的规矩，他们仅有一些友谊也就此告终了。第二天，吉勒姆听说还有更多的人头落地，潘西·阿勒莱恩暂代领导，头衔是代理首长，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比尔·海顿愿意在他底下工作，但很可能是出于对老总余怒未消。不过也有人挖苦说是在他上面工作。

到圣诞节，老总就死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玛丽说。她把这些事情看做是二次攻打冬宫，所以当吉勒姆被放逐到布里克斯顿去的时候，她哭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勒姆是去补吉姆·普莱多的缺。

那个星期一下午多雨，吉勒姆在登上圆场的四楼阶梯时，因为想到要做犯罪勾当，心里反而很高兴，他回顾了上述种种事件，断定今天就是卷土重来的开始。

他前一天晚上是在宽敞的伊顿公寓和卡米拉一起度过的，卡米拉是个学音乐的，身材修长，面容美丽，只是有种悲哀的表情。她还不满二十岁，但黑色的头发里已有白丝了，好像受过一次她缄口不提的惊吓一样。这种心灵损伤的另一个后果是，她不吃肉，不穿皮鞋，滴酒不沾。在吉勒姆看来，似乎只有在爱情方面，她没有这一切神秘的禁忌。

这天上午他独自一人在布里克斯顿极其昏暗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文件的照片。他先去常去的店里买了一架小型照相机，为了避免荒废业务

他常常这样做。店员问他是“用自然光的，还是用灯光的”，两人还亲切地交换了一下关于底片颗粒的意见。他告诉女秘书不要打扰他，然后关上了门，按照史迈利的精确指示着手工作。墙上的窗户很高。他坐着也只能看到天空和马路那边新建学校的尖顶。

他先拍自己保险柜里的参考文件。史迈利把先后次序告诉了他。先是工作人员名册，这是只发给高级人员的，上面有圆场在国内所有人员的姓名、工作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其次是职责手册，里面折着一张圆场在阿勒莱恩领导下改组后的组织机构表。中间是比尔·海顿的伦敦站，像一只大蜘蛛歇在自己的蛛网中。据闻比尔曾经说过，“在普莱多事件以后，我们绝不允许再有私人军队，不允许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职守。”吉勒姆发现，阿勒莱恩有两个头衔：一个是首长，一个是“特种情报来源负责人”。据说，圆场就是靠这种特种谍报来源维持的。在吉勒姆看来，没有别的原因能够说明，为什么圆场工作人员现在都毫无作为，可是在白厅却极受尊重。根据史迈利的要求，他除了拍这些文件以外，还拍了剥头皮组的修正规程，那是阿勒莱恩以“亲爱的吉勒姆”为开头的一封信，详尽列出了他缩小的权限。在某些方面，胜利者是阿克顿点路灯组组长托比·伊斯特哈斯，这是按照横向领导原则惟一实际扩大的一个单位。

接着他到桌边拍摄一些例行的传阅文件，这也是根据史迈利的指示，作为背景资料，也许很有了解价值。其中包括行政部门一份关于伦敦地区安全联络站的情况通知（“务请爱惜使用”）和另外一份关于禁止滥用圆场秘密电话办私事的公告。最后是文件组给他个人的一封非常不客气的信，“最后一次”警告他，他用工作姓名所领的驾驶执照已经期满，除非办理延长手续，否则“将通知管理组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

他放下照相机，回到保险柜那里。在最下面一层有一叠点路灯组的报告，由伊斯特哈斯签字，盖了代号“短斧”的戳章。里面是已经确知苏联在伦敦地区以合法或半合法身份活动的两三百名谍报官员的姓名和掩护身份：贸易、塔斯社、苏航、莫斯科电台、领事、外交等等。这些报告在适当的地方还标明点路灯组进行调查的日期和分支的姓名，所谓“分支”这个行话的意思就是在监视过程中所发现的联系者，不一定是躲起来的。这些报告一年一厚册，每月还有补充。他先看了一下正册，又看了补充部分。到十一点二十分，他锁好了保险柜，用专线打给伦敦站，跟财务组的劳德·斯屈克兰通了话。

“劳德吗，我是布里克斯顿的彼得，生意怎么样？”

“哦，彼得，有什么事情呀？”

说话干脆，口气得意，意思是说我们伦敦站的人有更重要的朋友。

吉勒姆解释道，需要洗一些脏钱，因为有个法国外交信使似乎可以收买。他用特别和气的口吻问，不知劳德有没有时间碰头讨论一下。劳德问，这个计划是否已得到伦敦站的批准？还没有，不过吉勒姆已把报告交给传讯员送去给比尔了。劳德口气软了一些。吉勒姆再逼一步：“劳

德，有些事情比较麻烦，需要你出主意。”

劳德说，他可以腾出半小时来和他谈一谈。

他到西区去的路上，把底片送到查令十字街一家叫云雀的小杂货店。店主人是个胖子，拳头大得吓人。店里没有人。

“兰普顿先生的底片，请冲洗出来。”吉勒姆说。店主把底片拿到后间，等他出来的时候粗哑地说了句“成了”，接着马上吐了一口气，好像吐口烟似的，但他并没有在吸烟。他把吉勒姆送出门，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了。乔治怎么会找到他的？吉勒姆心里觉得奇怪。他买了几盒润喉糖。史迈利警告过他，每一行动都得有交代——假定圆场派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吉勒姆想，这有什么奇怪呢，托比·伊斯特哈斯连自己的母亲也会派人盯梢，只要这能博得阿勒莱恩拍一下肩膀称赞。

他从查令十字街走到却兹·维克多餐厅与他的小头头赛·范霍佛和一个叫劳里麦的无赖吃中饭。劳里麦自称和东德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共用一个女人。劳里麦说那个女人愿意合作，但她需要在第一次交货时就给她英国国籍和一大笔钱。他说，她什么都愿意干：偷看大使的信件，在他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或者在他的浴盆里撒碎玻璃”，这是当笑话说出的。吉勒姆猜劳里麦在说谎，他甚至怀疑范霍佛是不是也在说谎。但是他转念一想，现在到底谁靠向谁，他其实也没有发言权。他喜欢那家餐厅，但是记不得吃了些什么，现在他走进圆场的门厅时，他明白了原因是因为兴奋过度。

“哈啰，布里扬特。”

“看到您很高兴，先生。请坐，先生，一会儿就好，先生，谢谢您。”布里扬特一口气说完了这几句话，吉勒姆就坐在一张高背木椅上，想的是牙医和卡米拉。她是他最近才搞到手的，来得有些意外，一切发展得很快，至今已有一些时候了。他们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她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拿着一杯胡萝卜汁，口里说着关于真理之类的话。吉勒姆存心冒险，就说他对伦理问题一窍不通，他们何不直接上床。她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就起身去穿大衣了。从此之后，她就留下没走，给他炸坚果饼吃，吹笛子听。

门厅里显得比平时还要暗。三台旧电梯，一个木屏风，一张马柴瓦蒂牌茶叶的广告，布里扬特的玻璃门值班室，里面有个英国风景的挂历和一排油腻腻的电话。

“斯屈克兰先生在等您，先生，”布里扬特出来告诉他，慢手慢脚地在一张红纸条上盖上了一个时间的戳章：十四点五十五分，警卫P.布里扬特。中间那台电梯好像几根枯柴一样咯吱咯吱地响着。

“该上油了，对不对？”吉勒姆等电梯开门的时候回头大声说。

“我们一直在叫他们上油，”布里扬特说，这是他最爱发的牢骚，“可是他们从来不管。怎么叫都没有用。家里都好吗，先生？”

“很好。”吉勒姆回答，其实他并没有家。

“那就好。”布里扬特说。吉勒姆在电梯上升时，看着他奶油色的脑袋消失在他的脚下。他记得玛丽叫他草莓香草冰淇淋，因为他脸色红红的，上面是一头软绵绵的白发。

他在电梯里看了一下他的会客条，名称叫做“LS出入证”。“事由：财务组。出门交还。”受访者签名一栏空着。

“欢迎你，彼得。你晚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

劳德在电梯外的栅栏旁等着。身高只有五英尺，穿着白衬衫，有人来见他时总悄悄踮着脚。老总在这的时候，这一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可是如今却有个栅栏拦在进口处，还有一个脸孔像老鼠一样的警卫检查出入证。

“我的天，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个玩意儿？”吉勒姆在一台崭新发亮的咖啡机前面放慢了脚步问道。有两个小姐在加灌两个杯子，她们回过头来一边说“哈啰，劳德”，一边看吉勒姆一眼。那个高个子使他想起卡米拉：一样含情脉脉的眼睛，似乎能侦测出男人的无能。

“你不知道这省了多少人力，”劳德马上叫道，“棒极了，真是棒极了。”兴奋之下，几乎和比尔·海顿撞个满怀。

比尔·海顿正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间六角形胡椒瓶一样的房间，临窗是新康普顿街和查令十字街。他走的方向和他们一样，不过速度是每小时半英里，这对他来说在室内已是开足马力了。室外是另外一回事。吉勒姆也见过，那是在沙拉特作演习的时候，有一次是夜里空降希腊。他在室外动作敏捷。神态警觉的脸，虽然在这条闷热的走廊里显得有点阴暗冷淡，但可以看出是在开放的户外由他所服役的偏远地方熏陶出来的。这些地方多得不可胜计，在吉勒姆的敬佩的目光看来，似乎所有谍报活动地区都留有海顿的印记。吉勒姆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不止一次和神出鬼没的海顿意外相遇。比如一两年以前，吉勒姆当时还在从事海上谍报工作，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搜罗一批海岸观察员，监视中国的两个港口温州和厦门，他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地方早已有潜伏的中国情报员，那是比尔·海顿战时不知干什么活动时招来的，还有无线电等装备，可以和他们联络。另外一次，吉勒姆与其说是出于对目前工作的劲头，不如说是出于怀恋过去，他翻阅战时圆场海外活动记录，在两份记录中两次见到了海顿的工作姓名：一九四一年他在海尔福特河口指挥法国渔船；同一年，以吉姆·普莱多为助手，从巴尔干到马德里布置了一条南欧传输线。在吉勒姆看来，海顿属于圆场一去不复返的老一代人物，他的父母和史迈利也是属于这一代——与众不同，特别是在比尔·海顿身上，还有贵族血统——他们的生活不像他这一代那么匆忙，都悠闲得很，三十年后，仍使圆场有一种冒险的神秘气氛，久久不散。

海顿见到他们两人，就站住不动。吉勒姆距上次和他谈话已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大概出差去了。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门里透过来的光线的反射下，他看上去黑得出奇，高得出奇。他手中拿着什么东西，

吉勒姆看不清是什么，可能是一本杂志、一份档案、一份报告；从他的身侧看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大学生的寝室，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成堆的报告、文件、档案；墙上有一张绿色呢面的布告牌，钉满了明信片 and 剪报；旁边斜挂着一幅比尔以前画的没有配框的油画，以沙漠平淡的颜色为背景，中间是个圆形的抽象物。

“哈啰，比尔。”吉勒姆说。

海顿没有关门——这是违反管理组的规定——正在他们前面，仍旧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穿戴仍旧不脱他的怪诞本色。上衣肘部贴的两块皮革是菱形，不是方块的，从后面望去，像个丑角。他的眼镜就像蛙镜般塞在前额的头发里。他们拿不定主意，跟着他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个塑像从底座慢慢转过来一样，眼光盯住吉勒姆。这时他才露出了笑容，他的新月形的弯眉像小丑似的抬了起来，他的面容一变而显得俊秀，而且年轻得出奇。

“你这乞丐在这里干什么？”他高兴地问。

劳德把他这句开玩笑的话当了真，向他解释法国人和赃钱的事。

“你最好把银器锁起来。”比尔说，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些剥头皮的会把你的金牙都给偷走。把小姐们也锁起来，”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眼睛仍盯着吉勒姆，“要是她们会让你锁起来的话。剥头皮组什么时候洗起自己的赃钱来了？这是我们的事。”

“负责洗钱的是劳德。我们不过是经手。”

“把报告给我，”海顿对劳德·斯屈克兰说，态度突然不客气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错了。”

“已经送去给你了，”吉勒姆说，“可能已放在你的收发篮里了。”

他最后点了一下头。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吉勒姆觉得海顿淡蓝色的眼光在他的背上打转，一直到他们转弯为止。

“这家伙真不简单。”劳德说，好像吉勒姆以前没有见过他似的，“伦敦站不可能有更好的领导了。非常有能力，成绩非常好。高明极了。”

吉勒姆心里不客气地想，而你的高明呢，是靠关系的。不仅有比尔，还有咖啡机的，还有银行的。他的沉思被罗埃·布兰德的伦敦土腔打断了，他在前面门口对着他们说话。

“嗨，劳德，等一会儿。你见到比尔了吗？有紧急的事找他。”

接着从同一方向发出来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中欧腔：“马上得找他，劳德，我们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条拥挤的走廊。劳德大约领先三步，正要回答时，吉勒姆已到了门口，向里一看，只见布兰德趴在办公桌上，他已脱了上衣，手中抓着一张纸，胳肢窝尽是汗渍。小个子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像个侍者领班似的弯腰站在他旁边，他一头银发，下巴突出，是个腰板

挺直、短小精悍的大使。他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纸，仿佛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布兰德突然看见劳德走过的时候，他们显然正在一起阅读一份文件。

“我刚才还见到了比尔·海顿，”劳德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别人的问话重复一遍，听起来更加得体，“我想比尔应该快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走廊上见到他，还和他说了几句话。”

布兰德的眼光慢慢地转到吉勒姆的身上就停止不动了，这种冰冷的打量使人不舒服地想到海顿的眼光。“哈啰，彼得。”他说。听到这话，小托比伸直了身子，眼光也直盯着吉勒姆，褐色平静的眼神就像一只猎犬。

“嗨，”吉勒姆说，“怎么啦？”

他们的招呼不仅是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敌意的。吉勒姆曾经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瑞士一起从事一件非常惊险的活动，共度三个月的患难，在这三个月中，托比没露过一次笑容，因此他的白眼并不使吉勒姆感到奇怪。但是罗埃·布兰德是史迈利提拔的人，是个热心肠，容易冲动，一头红发，身材魁梧，且是个淳朴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最惬意的事，便是晚上在肯特镇附近的酒店里谈论维特根斯坦18。他曾做过十年的共产党文人，在东欧的学术圈子里活动，现在像吉勒姆一样转入内勤了，这甚至成了一种束缚。他平时见到人的作风是满脸堆笑，拍拍肩膀，喷你一脸昨天晚上啤酒味，可是今天却不然。

“没怎么，彼得老兄，”罗埃说，勉强装出一副为时已晚的笑容来，“没想到会见到你，就此而已。我们这一层没有外人进来，已经习惯了。”

“比尔来了。”劳德说，为他的预测马上得到证实而感到很高兴。吉勒姆注意到海顿进来的时候，在一道光线的映照下，脸颊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颜色。颧骨上面泛起一片红，颜色很深，是许多微血管组成的。吉勒姆神经紧张之下感到这使海顿有了一些格雷19的样子。

他与劳德·斯屈克兰的会见前后达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吉勒姆有意拖得这么长，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心里老是惦记着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不知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好吧，我现在该到道尔芬那里去请她批准了，”他最后说，“她对瑞士银行的看法，我们都是知道的。”管理组办公室与财务组距离两扇门。“我把这条留在这里。”他把会客条丢在劳德的办公桌上。

狄安娜·道尔芬的屋子里有一股刚刚喷过芳香剂的味道。她的手提包放在保险箱顶上一份《金融时报》的旁边。她是圆场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入娶的待嫁小姐之一。他厌烦地说，是呀，活动计划已送到伦敦站去了。是呀，他也明白，随便收送赃钱现在已不时兴了。

“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结果。”她说，这意思是说她要请示坐在隔壁的菲尔·波特奥斯。

“那我就去告诉劳德。”吉勒姆说完就走了出去。

动手吧，他心里想。

在男厕所里，他在洗手台前等了三秒钟，看着镜子里的门，竖起耳朵听着。整层楼意外沉寂。他心里说，动手吧，你有些老了，快动手吧。他穿过走廊，大胆地走进值班室，砰地关上门，然后向四周一看。他估计他有十分钟时间，他也估计砰地关上门在那一片沉寂中比悄悄地关上门更不会引起注意。快动手。

他带了照相机，但光线太差。挂着纱窗帘的窗户外面是个全是黑烟囱的院子。他即使带了一个亮一些的灯泡来也不敢用。因此他只能凭他的记忆。自从领导换人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白天这个地方以前是情绪低落的女职员的洗手间，从廉价香水的气味来看，现在仍旧是如此。一面墙前有个卧榻，夜里马马虎虎充作床用，旁边是个急救箱，上面的红十字已剥落了，还有一台旧电视机。铁柜仍在原处，一边是电话总机台，一边是锁起来的电话，他就直接朝铁柜走过去。这是个旧铁柜，用开罐器就可以打开。他却带着凿子和一两件轻金属工具。这时他想起来开锁号码是31—22—11，他就试了一下，倒着四下，顺着三下，倒着两下，再顺着，锁就开了。拨盘已经拨惯了，转动很自然。他打开门的时候，底层扬起了一阵尘土，卷成一团，在地面飘过，慢慢地向黑暗的窗户升去。在此同时，他听到了像是从笛子吹出来的一个声音，很可能是外面街上汽车停下来的声音，也可能是文件手推车的轮子在漆布地板上发出的声音。但是在当时听来，却像卡米拉练笛子时的那种音符，拉得很长，使人听了难受。她高兴时就练笛子。有时在午夜，有时在清晨，不分晨昏。她一点也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她简直是没有神经的一样。他还记得她第一夜就问：“你睡床上哪一边？我的衣服放哪里？”他在这些事情上素以作风优雅自赏，但是卡米拉却大大咧咧的，技巧本来已是一种妥协，是跟现实的妥协，她还会说是脱离现实的逃避。那么好吧，就把我从这个险境中救出去吧。

值班记事簿订成厚册，放在最高一层，书脊上贴着日期，看上去像家庭账簿。他把四月份的一本拿下来，查看了内封里的名单，心里在想，院子对面的影印室里会不会有人看到他，如果看到会不会放在心上？他开始查看一条条的记载，找十日 and 十一日之间的那一夜，伦敦站和塔尔就是在那时交换电报的。香港时间早九小时，史迈利指出：塔尔的电报和伦敦的第一个回电都是下班后发的。

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谈话声，刹那间他甚至觉得可以听出阿勒莱恩的苏格兰边界土腔在说一句并不好笑的笑话，但是现在瞎想已没有用了。他反正已预备好了借口，自己也有一半相信。如果被逮住了，就完全相信。如果沙拉特的审查人员拷问他，他还有个退路，他出门总是预备好退路的。但是他还是吓坏了。说话声远去了，潘西·阿勒莱恩的鬼影也一起远了。他的胸膛上都是汗珠。有个女人走过，嘴里哼着歌剧《毛发》中的一个曲调。他心里想，要是比尔听到，他会宰了你，比尔最恨有人嘴里哼着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穷小子？”

接着使他感到好玩的是，他真的听到了比尔生气的咆哮声，不知从多远的地方传来：“别哼了。哪个笨蛋在哼？”

快动手。你一停下来，就无法再开始：有一种特别的怯场使你忘了台词，一走了之，使你一碰到东西手指就哆嗦，让你胃开始翻搅。快动手。他把四月份的一册放了回去，随便又拿了四册，是二月份、六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的。他很快地翻了一遍，找可以比较的地方，然后又放回架子去。他蹲了下来，求上帝赶快让扬起来的尘土落下来，可是它似乎没完没了。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有意见？多人共用一个地方就总是这样：没有人负责，没有人放在心上。他找夜班警卫的值勤登记本。他在最底下的一层找到了，夹在茶叶包和炼乳罐之间，放在信封式的卷宗夹里。警卫填写好以后，在你值班的十二小时之内送来给你两次，一次在午夜，一次在清晨六点，请你签名证明正确无误——天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夜班工作人员四散在大楼里，各处都有——然后把第三联保存起来，放在柜子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洪水”20以前的手续，看来现在也是如此。

有一层架子上全是尘土和茶叶包。他想，有多久没有人自己泡茶了？

他再一次查看四月十日到十一日之间的那个夜里。他的衬衫湿得黏在背上。我怎么啦？天呀，我这身体不行了。他前后翻来翻去，两次，三次，然后把柜门关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担心地最后看了一眼地上扬起的尘土，然后大胆地走过走廊，安全地回到对面男厕所里。在走过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译码机、电话铃、一个女人在说“那个该死的东西在哪里，原来就在我手里”，还有那神秘的管乐声，但不再像半夜卡米拉的吹笛了。下次我让她来干这活，他这么恶狠狠地想。毫不妥协，面对面，生活就应该就是这样。

在男厕所，他发现斯巴克·卡斯帕和尼克·德·西尔斯基站在洗手台前，面对着镜中的对方在低声说话，他们两人是为海顿的苏联间谍网跑腿的，加入已很多年了，大家干脆管他们叫俄国人。他们一见吉勒姆就不说话了。

“哈啰。你们两人，真是难兄难弟，形影不离。”

他们都是金头发的矮胖子，比真正的俄国人还像俄国人。他等他们走了以后，才洗去手指上的尘土，又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劳德·斯屈克兰的办公室里。

“我的天，那个道尔芬说话真是没完没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她很能干。我们这里几乎少不了她。极其能干，我可以向你保证。”劳德说。他在签会客单之前仔细地看了一下表，然后把吉勒姆带到电梯前面。伊斯特哈斯正在栅栏旁，跟那个态度不客气的年轻警卫讲话。

“你回布里克斯顿吗，彼得？”他的说话口气随便，表情仍旧莫测高

深。

“怎么？”

“我车在外面。我可以顺道‘开’你去，我们在那边有事。”

开你去！小托比什么话都说不好，但他都会说。在瑞士的时候，吉勒姆听他说过法语，有德国口音，他的德语又有斯拉夫口音，他的英语尽是小毛病和元音错误。

“没事，托比，我想回家去。晚安。”

“直接回家？我可以开你去，没别的。”

“谢谢，我还得去买些东西。给那些教子教女。”

“是啊。”托比说，好像他没有教子教女似的，小下巴缩了进去，感到很失望。

他究竟要干什么？吉勒姆心里又想。小托比、大罗埃，这两个人为什么瞪我白眼？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文件，还是因为吃到了什么东西？

他到了街上以后，漫步走上查令十字街，浏览书店的橱窗，同时查看人行道的两侧。天气变冷了，开始起风了，路人匆匆忙忙走过去的时候，脸上都有一种期待的神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觉得迄今为止，他都生活在过去之中。现在是再度赶上潮流的时候了。在兹温默书店里，他翻看了一本图文书，名叫《历代乐器》，他想起卡米拉要到她的笛子老师桑德博士那里去上课，很晚才能回家。他又往回走，一直走到福尔斯书店，一路眼光扫去，把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群一一都瞧在眼里。史迈利说过，要当做身在国外一样。吉勒姆一想到值班室的事和罗埃·布兰德的怀疑眼光，就觉得这样做不难理解。还有比尔·海顿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起了疑心？不，比尔另属一类。吉勒姆这样得出结论，无法抗拒对海顿的一片忠心。首先是，比尔绝不参与不是他自己首创的事情。放在比尔旁边，其他两个不过是侏儒而已。

在苏荷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开到滑铁卢车站。到了滑铁卢车站后，他又到一个肮脏的公用电话亭拨了萨里区米切姆街的一个号码，给特别分局以前的督察长孟德尔，这是他和史迈利不再做谍报工作时认识的。孟德尔来接电话时，吉勒姆说要和詹尼讲话，孟德尔马上回答没有詹尼这个人。吉勒姆说了声对不起，就挂了电话。接着他拨了报时专线，假装与那自动报时器愉快地交谈，因为有个老太太在外面等他。他把话讲完。他心里想，现在他总该到了。他于是挂了电话，又拨了米切姆街的另外一个号码，那是孟德尔住的那条街上的公用电话。

“我是威尔。”吉勒姆说。

“我是阿瑟，”孟德尔高兴地说，“你好。”他是个古怪、吊儿郎当的人，目光敏锐，神色警觉，吉勒姆可以想像他打电话的样子，拿着一支铅笔随时准备在警察笔记本上记下谈话。

“我先把重点告诉你，以防万一我被汽车撞死。”

“你说得对，威尔，”孟德尔安慰道，“还是小心点好。”

他慢慢地把要说的话说了，用的是他们商量好的学术用语，以防万一有人偶然窃听到：考试、学生、弄丢的报告等。他一停下来就听到对方的轻轻书写声。他想像孟德尔在慢慢工整地书写，等他写完一句，他才继续说下一句。

“我从店里拿来了那几张好照片，”孟德尔把记下来的话核对一遍后，又说，“效果很好，没有一张漏掉。”

“谢谢你，我很高兴。”

但是孟德尔已把电话挂了。

吉勒姆心里想，对地鼠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地道又长又黑。他为外面的老太太打开门时，注意到听筒已放回到电话机上，都是斑斑汗渍。他想了一下他给孟德尔传的话，又想到了罗埃·布兰德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门廊上向他投过来的眼光，心里不禁很焦急，不知史迈利现在在哪里，不知他是不是放在心上。他回到伊顿公寓，很需要卡米拉，但又有点怕自己要她的原因。真的是他的年纪已经突然与他作对了？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违反了自己的荣誉观，做出了犯罪的勾当。他感到了卑污，甚至憎恶自己。

有些老头子回到牛津去，会发现建筑石块上过去的青春在向自己招手。史迈利不是这种人。要是在十年前，他可能会这样，如今却不会了。经过博得利图书馆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地想到，我曾在那里念过书。看到公园路上他指导老师的房子，他想起了战前在那个长长的花园里，杰比第第一次问到他是愿意和“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两个人谈谈”。听到汤姆钟楼敲晚上六点钟时，他想起了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他们大概是他到伦敦去的那一年到这里来的，后来又因战争而聚在一起了。他漫不经心地想着他们两人当时在一起的样子：比尔是个画家、辩论家、交际家，吉姆是个运动员，一切都听他的话。他想到在圆场他们两人最红的时候，这种差别几乎拉平了：吉姆在动脑筋方面开始灵活起来，而比尔去搞外勤无人能望其项背。只有到最后，原来的两极差别又明显起来，拉马车的马回到了马厩，思想家回到了书桌。

天空开始落下雨滴，但他没有注意到。他坐火车来，从车站步行，一路绕弯：布莱克威尔书店、他以前的学院，什么地方都去了，然后才朝北走。由于树木繁茂，这里黄昏降临得早。

他走到一条死巷子前面，又放慢了脚步，再仔细看一眼。一个围着披巾的妇女骑着自行车在盏盏路灯穿破浓雾的光圈下，从他身边经过。她在一道栅栏门前下了车，推门进去，消失了踪影。马路对面，有个模糊的人影带着一条狗散步，他看不清是男是女。除此之外，路上空无一人。公用电话亭也是空的。接着突然有两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大声谈论着上帝和战争。主要是年轻的那个在说。史迈利听到年纪大的那个表示同意，猜想他是个教师。

他沿着一道很高的围篱走，围篱上面不时出现枝叶繁茂的树丛。十五号门的铰链很轻，这是一道双扇门，但经常只用一扇。他推门的时候，门闩掉了。房子远远地在花园深处，大多数的窗口都有灯光。楼上一扇窗户外，一个年轻人俯身在一张书桌上。另一扇窗户外，有两个小姐似乎在争论。第三扇窗户外，有个非常苍白的女人在拉中提琴，但他听不见声音。一楼的窗户外也都有灯光，但是窗帘都拉了起来。门廊铺的是花砖，前门嵌着五彩玻璃。门框上钉着一张旧布告：“晚上十一点后，请走旁门。”几个门铃上各有一张条子：“普林斯按三下”，“卢姆贝按两下”，“布兹：整晚外出，以后再见，珍妮”。最下面的一个门铃上写着“沙赫斯”，他就按这个铃。马上有狗叫了起来，一个女人开始吆喝。

“弗勒许，你这个傻孩子，来的只是个笨蛋学生。弗勒许，别叫，傻瓜。弗勒许！”

门开了一半，仍挂着门链，门缝里填满了一个人影。就在史迈利拼命张望屋子里还有谁时，那双像婴孩般水汪汪的眼睛精明地也在打量他，注意到了他的公文包、他溅了泥浆的鞋子，然后眼光抬到他的肩

上，窥看他身后的车道，回过来又打量了他一下。白皙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动人的笑容，前圆场研究组女王康妮·沙赫斯小姐由衷地高兴起来。

“乔治·史迈利，”她叫道，一边把他拉进屋子，一边羞怯地笑着，“原来是你这个老朋友，我还以为是有人来推销胡佛牌吸尘器呢，谁知道敲门的却是乔治！”

她马上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比史迈利还高一个头。宽阔的脸上一头蓬松的白发。她穿着一件褐色的运动夹克衫，裤子腰部是松紧带的，小肚子鼓鼓的，像老头子一样。壁炉里在烧着焦炭。炉前躺着好几只猫，还有一只灰色的长毛垂耳狗躺在卧榻上，胖得动不了。小推车上放着她吃的罐头和喝的酒。她的收音机、电炉、卷发夹子都用同一个插座。一个长发垂肩的男孩子趴在地上烤面包，一见史迈利进来，他就放下了铜叉子。

“哦，琴格尔，好孩子，你明天再来好吗？”康妮央求他，“我难得有个老情人来看我。”他已经忘记她说话的声音了。她说话经常像弹琴，时高时低，什么音阶都有。“我放你整整一个小时的假，怎么样？他是我收的一个笨学生。”她向史迈利解释，那孩子还没有走远。“我还在教书，也不知为什么，乔治。”她轻声说，高兴地看着他公文包中取出一瓶雪利酒，斟满了两个玻璃杯。“我认识这么多的老朋友，可就是他来了。他还是走路来的！”她向垂耳狗解释，“你瞧他的皮鞋。从伦敦一直走来的，是不是，乔治？哦，上帝保佑。”

她喝酒有点困难。她的手指患关节炎，都蜷缩起来，就像是在意外事故中跌断一样，而且她的胳膊僵硬。“你一个人走来的吗，乔治？”她问道，从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我们没有陪客吧？”

他替她点了烟，她像玩具枪一样举着，手指抓着一头，精明、发红的眼睛顺着枪管看着他。“那么，你这个坏孩子，有什么事情要来求康妮？”

“她的记忆。”

“哪一部分的？”

“我们要回到一个老地方去。”

“听见吗？弗勒许？”她向她的狗叫道，“他们先是用一根老骨头把我们撵了出来，现在又来求我们了。哪个老地方，乔治？”

“我带来了拉康给你的一封信。今天晚上七点，他在俱乐部里，你如果有疑问，可以用外面路上的公用电话找他。我想你最好不用那样，不过你如果一定要，他会向你作必要的说明。”

她原来一直挽着他，这时她放下了手，在屋子里周游了半天，哪里是憩脚的地方，哪里是扶手的地方，她心里都很明白，她的嘴里嘟囔着：“哦，该死的乔治·史迈利和他的同伙。”她到了窗边，大概是出于习惯，拉开了窗帘的一角，但是外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引起她的注意。

“哦，乔治，你这该死的，”她嘟囔着说，“你怎么可以让拉康插进来呢？那还不如让国安局的人插进来呢。”

桌上有一份当天的《泰晤士报》，字谜栏朝上。每个空格都填满了工工整整的字母，没有一格空着。

“今天去看了足球赛。”她在楼梯下面的暗处说，一边从手推车上拿起酒杯来喝，“乖威尔带我去的。他是我最喜欢的笨学生，这样的学生不错吧？”她突然夸张地撅起了嘴，用小女孩的嗓音说，“乔治，康妮着凉了。康妮冻僵了，连脚丫子都冻僵了。”

他猜她是在哭，因此把她从暗处扶了出来，带到沙发旁边让她坐下。她的酒杯已空，他又斟了半杯。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喝着酒，康妮泪如雨下，从面颊上掉到衣襟上，又掉到他的手上。

“哦，乔治，”她继续说，“你知道他们把我撵出来的时候，她怎么说的呀？那个管人事的婆娘？”她拉住史迈利的衣领一角，用手指揉着，情绪慢慢恢复。“你知道那个婆娘怎么说的吗？”她换了带兵的口气：“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我讨厌现实世界，乔治。我喜欢圆场和里面所有的孩子们。”她拿起他的手，想把自己的手指和他的手指缠在一起。

“波里雅科夫，”他轻轻地说，按照塔尔的发音，“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就像你预测的一样，他又复活了。”

外面马路上有一辆汽车停下来，他只听见轮子的声音，引擎早已熄了。接着是脚步声，很轻。

“这是珍妮，偷偷带男朋友进来。”康妮轻声说，她眼眶发红的眼睛盯着他，和他一样因为外面的动静分了心。“她以为我不知道。听到吗？他的鞋后跟的金属片。等等。”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一阵轻轻的窸窣声，“她把钥匙交给他。他以为他开起门来声音比她轻。其实不然。”锁打开时，一声很响的咔嚓。“唉，你们男人。”康妮叹口气，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哦，乔治。你为什么要把阿力克斯拉出来？”她为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哭了一阵子。

史迈利记起来了，她的兄弟都是教书的，她的父亲是教授之类。老总在打桥牌的时候认识了她，为她因人设事，安排了工作。

她像讲童话一样开始讲她的故事：“从前有个叛逃的，名字叫斯坦莱，那是早在一九六三年的事。”她讲故事能自圆其说，想像力极其丰富，但是只有思想永远不成熟的人才具有这种本领，一半是靠灵感，一半是凭急智。她平淡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老奶奶回忆往事时的那种得意。她的记忆和她的身体一样广袤无垠，可以肯定地说，她更喜欢她自己的记忆，因为她把别的都放在一边了：她的酒、她的烟，甚至有一阵子还有史迈利被动的手。她不再坐着蜷成一团了，而是挺着腰背，脑袋侧在一边，出神地卷弄着她的白发。他以为她会立刻从波里雅科夫说起，但

是她却从斯坦莱说起——他忘记了她对家谱有偏好。她说，斯坦莱是审问组替莫斯科中心一个五流叛逃者所起的代号。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剥头皮组从荷兰人那里把他转买到手，送到沙拉特，要不是正好碰上淡季，审问组没有事干，谁知道这件事会透露出来呢？事实是，斯坦莱身上有金子，少少的一点点，结果被找到了。荷兰人没有找到，审问组找到了，他们的报告副件送到了康妮那里。“这事件本身又是一个奇迹，”康妮得意地说，“因为大家，特别是沙拉特规定的绝对原则是，他们的报告副件不再送研究组。”

史迈利耐心地等待那点金子，因为像康妮这样年纪的人，你能给她的东西只有时间。

她解释道，斯坦莱当时是在海牙执行暗杀使命时叛逃的。他原本是职业杀手，他被派到荷兰去暗杀一个俄国流亡者，因为那人让中心不安。结果，他却决定投案自首。康妮轻蔑地说：“他上了一个女人的当。荷兰人对他施了美人计，他闭着眼睛一头栽了进去。”

中心为了训练他进行这项使命，在派他出国之前，把他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训练营学习“黑色艺术”：破坏和灭音枪杀。荷兰人搞到他以后，一知此事，极为吃惊，因此把审问集中在这个焦点上。他们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要他绘出氰化物子弹和中心最喜欢用的其他可怕武器的图样。但是在沙拉特训练所，审问组对这些东西早已熟悉，因此在审问时集中注意于训练营本身，这个训练营是新设的一个，外界知之不详。她解释说：“像一个百万富翁开设的。”他们画了训练营的地形草图，这个地方有好几百英亩的森林湖泊。他们把斯坦莱所能记得的所有房子都画了进去：洗衣房、餐厅、教堂、练靶场，一点不漏。斯坦莱到过那里好几次，记得的不少。后来斯坦莱停下来不说了，因此他们以为快要完了。谁知他拿起一支铅笔在西北角又画了五座房子，外面围上双层铁丝网，还放了警犬。斯坦莱说，这些房子是前几个月新盖的。要走一条不对外开放的路才能到那里，他是与他的教官米洛斯在外出散步时，从一个小山顶上看到的。据米洛斯说（康妮话中有话地说他是斯坦莱的“朋友”），卡拉为了要训练军官从事秘密活动，最近办了一个专门学校，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弄到的东西。”康妮大声说，“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听到谣传说，卡拉要在莫斯科中心内部创建他自己的一支私人军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大权。我们知道，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情报员，很自然地，他很担心，他年纪越来越老，地位越来越高，要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我们知道，像其他人一样，他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私产，不肯把他们交给派在目标国的合法常驻站。他当然不会这样做，你知道他最恨常驻站：人员过多，保密不严。这和他不喜欢保守派一样，他叫他们地面虫。这话不假。现在他有了大权，他就要想办法，凡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这样。于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她惟恐史迈利忘记了这个日期又重复一遍。

结果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仍旧是老规矩：因循蹉跎，忙着别的工

作。等待发生什么新动向。”她这么等待了三年，终于发生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助理军事武官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科马罗夫少校，从日本防卫厅一个高级官员那里收受六卷底片的最高机密被当场抓住的事。科马罗夫是她第二个童话中的主角，他不是个叛逃者，而是一个佩戴着炮兵军官肩章的军人。

“还有勋章，亲爱的！各式各样的勋章！”

科马罗夫得马上离开东京，走得这么匆忙，结果把他的狗反锁在屋子里了，后来竟然饿死，这是康妮绝对不能原谅他的一件事。科马罗夫的日本特务当然也遭到了应有的审问，巧的是，圆场竟能够从东京买到了一份报告。

“噢，乔治，我记起来了，这次交易就是你安排的！”

史迈利表示这很有可能，还做了一个鬼脸，其实却很得意。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日本防卫厅的那个官员是只地鼠。他是在战前日本侵略满洲前，被一个看来与共产国际有关系、名叫马丁·勃兰特的德国记者搜罗过去的。据康妮说，勃兰特就是卡拉在三十年代用的一个名字。科马罗夫本人从来不是大使馆内正式东京常驻站的人员，他是单枪匹马，只有一个跑腿的，自己和卡拉单线联系，他们在战时并肩作过战。他在到东京之前，还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新设的学校里受过特殊训练，这是卡拉为了训练他精选的学员而办的学校。康妮说：“结论就是，科马罗夫是我们卡拉训练学校的第一个毕业生，可惜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他后来被枪毙了，那个可怜虫。”她又补充一句，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还把声音放低一些，“他们从来不用绞刑，太性急了，这些可怕的人！”

康妮说，那时，她觉得可以加紧脚步了。她知道该找什么线索，她把卡拉的档案翻了一遍。她在白厅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跟陆军方面对付莫斯科的人一起检查了苏联军队的任命名单，寻找伪装的成员，最后从一批嫌疑对象中确定了三个人，她估计是卡拉新训练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军人，都和卡拉本人相识，都比他年轻十岁到十五岁。他们的名字据她说是巴尔丁、斯托科夫斯基、维多洛夫，都是上校。

一听到第三个名字，史迈利脸上露出了倦容，他的眼光特别迟钝起来，好像是在竭力打消困意似的。

“这三个人后来怎样呢？”他问道。

“巴尔丁改名索科洛夫，又改名鲁萨科夫，参加了苏联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当地常驻站没有公开来往，没有参加日常的情报活动，不盯人，不招人，规规矩矩地在做掩护他的工作。据我所知，现在仍在那里。”

“斯托科夫斯基呢？”

“转入不法活动，在巴黎以法籍罗马尼亚人格罗德斯基的身份开了一

个照相馆。在波恩开了一个分店，据说是负责指挥边境那边卡拉在西德的一个谍报来源。”

“第三个呢？维多洛夫？”

“销声匿迹，毫无踪影。”

“哦。”史迈利说，他似乎更困倦了。

“受过训练以后，就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当然也可能死了。自然的原因，很容易忘掉。”

“是的，的确是那样，”史迈利表示同意，“太容易了。”

他从多年间谍生活中学会了这门艺术：前一半脑子听别人讲话，后一半脑子把一些主要事实——陈列在自己前面，看一看它们有没有历史的关联。现在这个历史的关联通过塔尔到了伊琳娜，又通过伊琳娜到了她那个可怜的叫兔子的情夫。说他可怜是因为他不仅为这个名字感到得意，而且也因能为一个叫做格里戈尔·维多洛夫的上校服务而感到得意。那位上校“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事情像童年往事的一部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没有照片，康妮？”他闷闷不乐地问，“你有没有弄到什么体形上的特征？”

“在联合国的巴尔丁，当然有。斯托科夫斯基，也许有。我们有一张他当兵时的在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我们无法确切证实。”

“那么那个销声匿迹的维多洛夫呢？”好像是在说个随便什么名字一样，“也没有什么漂亮的照片吧？”史迈利说，一边走到屋子那头去拿酒瓶。

“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康妮若有所思地微笑道，“在斯大林格勒英勇作战。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弄到他的照片。他们说就他最行。”她又精神一振，“不过别人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当然也并不知道。五幢房子，两年训练——亲爱的，经过这么多年，这加起来，不应该只有三个毕业生吧！”

史迈利轻轻叹口气有点失望，好像是说，讲了这半天故事，没有什么东西使他这费力的搜寻有什么进展，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身上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建议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个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也就是康妮喜欢叫他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的那个人，确定一下他在卡拉阴谋计划中的地位以及当初为什么不允许她进一步调查他。

她现在比刚才精神亢奋多了。波里雅科夫不是个童话中的主人公，而是她的心上人阿力克斯，尽管她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也许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她挪到另外一把椅子坐，那是靠近落地灯的一把摇椅，可以使她身上的痛楚减轻一些。她在哪里都不能坐很久。她把脑袋向后仰了一些，史迈利就看到了她一圈圈肥白的脖子，她一只僵硬的手妖娆地摇晃着，一边回忆着她干过而并不感到后悔的有失检点的事。在史迈利看来，她的猜测似乎比刚才更荒诞不经了。

“唉，他这人真厉害，”她说，“阿力克斯在这里待了七年，我们才听到一点风声。七年，亲爱的，滴水不漏！你无法想像！”

她背诵了他原来在大约九年以前提出的护照申请书的内容：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生，二等秘书衔文化参事，已婚，夫人未同行，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生于乌克兰，运输工人之子，幼年教育不详。她声音里带着笑意，继续转述点路灯组提出的第一份例行的特征报告：“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格魁梧，眼睛绿色，头发黑色，没有其他显著特征。真是个大个儿。”她笑一声说，“很喜欢开玩笑。这里右眼上面有一络黑毛。我敢说，他一定喜欢摸女人的屁股，不过我们没有当场逮过他。如果托比肯合作，我原来是打算让他有一两次机会，但是托比不肯合作。这并不是说，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一定是会中计的。阿力克斯太机灵了，”她得意地说，“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乔治，他仍在那里吗？你瞧，我连问都实在不想问。我担心他们都换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了。”

史迈利叫她放心，他仍在那里。仍旧用那个掩护身份，仍旧用那个头衔。

“仍旧住在托比的监视者讨厌的、海格特那栋难看的郊区小房子？米多罗斯四十号，顶楼。唉，这真是个鬼地方！我喜欢名副其实过着伪装生活的人，阿力克斯就是这样。他是大使馆里历来最忙的一个文化参事。如果你要他们很快替你安排什么人演讲、什么音乐家演奏，阿力克斯一定有求必应，办起手续来比别人都快。”

“他怎么能够做到的，康妮？”

“可不是像你所瞎想的那样，乔治·史迈利，”她一边说，一边涨红了脸，“不是。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参事，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托比·伊斯特哈斯或者潘西·阿勒莱恩。他像积雪一样纯洁，一点也没有弄脏变形，托比会立刻这样告诉你！”

“嗨，”史迈利喃喃地道，一边给她斟酒，“嗨，别激动，康妮，坐下来。”

“胡说！”她大声叫道，一点也没有安静下来，“纯粹是胡说八道！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我敢确定是卡拉训练出来的头等特务，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托比说：‘你这是杯弓蛇影，怀疑床下也有特务躲着。’潘西说：‘点路灯的忙不过来，我们这里没有余力搞多余的事。’多余的事！”她又哭了。“乔治，”她不断地叫道，“乔治！你想尽力，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自己地位不高呀。哦，乔治，别跟拉康那样的人打猎去，千万别去。”

他悄悄地又把她的话题引回到波里雅科夫上来，为什么她那样有把握说他是卡拉的手下、专门学校的毕业生。

“那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她抽咽着说，“我们拍到了他挂勋章的照片。”

又回到头一年，她跟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搞了八年关系的头一年。她说，奇怪的事情是，她是打从他一到达以后就看上他的：“我当时想：好啊，我要跟你好好地玩一玩了。”

她究竟为什么有这想法，她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一副自信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他从检阅场走过去时，腰板挺直的姿态：“一副硬汉的样子，摆明了是个军人。”也许是因为他生活的方式：“他选择了伦敦一幢那些点路灯的无法接近五十码以内的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有三个文化参事了，两个是特务，另外一个的工作只是到海格特公墓替卡尔·马克思送鲜花。”

她有点儿晕了，于是他又搀着她走一走，她脚下一不稳，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压在他身上。她说，起先，托比·伊斯特哈斯同意把阿力克斯列入甲级名单，叫他在阿克顿的点路灯组一个月随便抽十二天盯住他，他们每次盯他稍的时候，他总是白璧无瑕，无懈可击。

“亲爱的，那简直好像是我已经打了电话给他，告诉他说：‘阿力克斯·亚力山德罗维奇，你得行动小心，我已经让小托比的狗腿子盯上了你。所以你可不能胡来，只能当你的文化参事。’”

他去参加各种典礼仪式、演讲会，在公园中散步，偶尔还打打网球，行为举止得体，只差没有送糖果给路上碰见的小孩子。康妮坚决主张要继续盯他，但是没有成功。按照规定，波里雅科夫改列到乙级名单上：隔半年，或者条件许可，对他复查一次。这样半年一次的复查也没有搞出什么结果，三年以后就把他转为丙级：经深入调查发现没有任何谍报价值。康妮没有办法，几乎也只好同意这个判断了，但是谁知十一月间有一天，特迪·汉克从阿克顿洗衣店打电话给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她，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终于丢掉了他作为掩护的身份，升起了他真面目的旗帜，在桅顶上迎风飘扬。

“特迪是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他是圆场的老人，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伙伴，即使到九十岁我也要他。他那天工作完毕，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苏联大使的伏尔加汽车驶过去，举行献花圈的仪式，其中有三军武官。后面一辆汽车中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波里雅科夫，胸前佩戴的勋章

比圣诞节树上的装饰还要多。特迪带着照相机赶紧跑到白厅，隔着马路拍了他们的照片。亲爱的，天公作美，虽然下了小雨，但是傍晚出了太阳，他在三百码以外也能把一只苍蝇屁股上的笑容拍下来。我们把照片放大以后一看，共有两个作战英勇奖章和四个战役纪念章。原来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参加过大战，但是他七年来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唉，我真是兴奋极了。我甚至不用再策划什么活动争取支持了。我马上打电话给托比说：“托比，你这次得听我说，你这个匈牙利毒心肠的矮小子。这一次虚荣心终于占了上风，顾不得伪装的掩护了。我要你把阿力克斯·亚力山德罗维奇给我调查得一清二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康妮的直觉终于证明是对的。”

“那么托比怎么说呢？”

灰毛狗丧气地叹了一口气，又睡着了。

“托比？”康妮突然显得很孤寂，“哦，小托比死样怪气地对我说，现在潘西·阿勒莱恩是头头。调拨人员是潘西的职权范围，不是托比的事。我马上就知道了出了问题，但是我当时还以为是托比的问题。”她沉默不语。“这该死的炉火，”她不高声地自言自语道，“你一转过去，它就灭了。”她已经失去了兴趣。“下文你都知道了。报告递给了潘西。‘那又怎样呢？’潘西说，‘波里雅科夫曾在俄国军队里待过。俄国军队很大，并不是在俄国军队里打过仗的人都是卡拉的特务。’真奇怪。批评我的推论不科学。我问他：‘这是谁说的？’他说：‘这还算不上是推论，这是归纳。’亲爱的潘西，不论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些术语的，你说话的口气听来像个蹩脚大夫。’亲爱的，他听了很不高兴！但是为了安慰我，托比派人去盯阿力克斯，结果当然没有什么。我就说：‘搜查他的房子、他的汽车，什么都搜查一遍！拦截他，派人去窃听！假装弄错人，搜他身上。不管是什么，反正都要试一下，因为可以打赌，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一定是英国地鼠的联络员！’因此潘西把我叫了去，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又是苏格兰腔——“‘你别再管波里雅科夫了。把他忘掉吧，懂吗，你这个傻女人？你和你的波里什么夫可叫人烦死了，以后别管他了。’接着又来了一封不客气的信。‘我们已经谈过话，你已经表示同意’，副件给了管人事的婆娘。我在下面批了‘同意前句，不同意后句’退给了他。”她改用带兵的口吻：“‘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

康妮已烂醉如泥。她一屁股坐在自己的酒杯上，双目紧闭，脑袋不断地往一边倒。

“我的天，”她又醒了过来，轻声说，“我的天。”

“波里雅科夫有没有一个跑腿的？”史迈利问。

“为什么他要个跑腿的？他是文化参事，文化参事不需要跑腿的。”

“科马罗夫在东京有一个。这是你自己说的。”

“科马罗夫是军人。”她不高声地说。

“波里雅科夫也是。你瞧见过他的勋章。”

他握着她的手，等着。终于她说，兔子拉宾，大使馆的文书兼司机，一个笨蛋。起先她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她怀疑他就是化名为伊夫洛夫的勃洛特。但是她无法证实。反正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兔子拉宾大部分时间在伦敦周游闲逛，看女人，又不敢搭讪。但是后来她逐渐弄清楚关系。波里雅科夫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拉宾帮忙斟酒。半夜里波里雅科夫把拉宾叫了进去，半小时后拉宾出去，大概是去发电报。波里雅科夫飞到莫斯科去时，兔子拉宾就搬到大使馆里，住到他回来。康妮口气坚定地说：“他是在代替他值班，没有问题。”

“这你也报告了？”

“当然也报告了。”

“后来呢？”

“康妮被辞退了，拉宾高高兴兴地回国了。”康妮吃吃一笑。她打了个呵欠。“啊呀，”她说，“冬至前后，可真冷。乔治，我没有泼你冷水吧。”

火已经灭了。楼上传来了“砰”的一声，可能是珍妮和她的情人。康妮慢慢地哼起来，接着随着曲调摇摆起来。

他仍不走，想使她高兴起来。他又替她斟了酒，这终于使她高兴起来了。

“来，”她说，“我给你瞧瞧我的勋章。”

于是又东搬西找的。她放在一只旧公文包中，史迈利得从床底下把它拉出来。她先拿出一个真的勋章，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还有一张打字的奖状，上面的化名就是她工作的名字康斯坦斯·沙林格，列名于首相传接见嘉奖的名单上。

“因为康妮是个好小姐，”她解释道，脸颊贴着他，“而且爱她所有漂亮的男朋友。”

接着是圆场以前人员的照片：康妮在战时穿着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服装的照片，她站在杰比第和破译专家比尔·马格纳斯之间，那是在英国某个地方照的；康妮与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的照片，一边一个，他们穿的是打板球的球衣，三个人都显得很高兴，那是在沙拉特夏季训练班照的，身后是一片很大的场地，草都剪得短短的，阳光灿烂，打靶场上的瞄准靶闪烁着。接着是一块很大的放大镜，镜片上刻着缩写字母，那是罗埃、潘西、托比等许多人“送给亲爱的康妮，永远不要说再见！”的。

最后是比尔自己的特殊礼物，这是一张漫画，画的是康妮趴在肯辛顿王宫花园，从望远镜里偷看苏联大使馆，上款是“带着爱和怀念送给最亲爱的康妮”。

“你知道，剑桥这里仍记得他。天之骄子。基督教会学院教员休息室

还有他的两幅油画。他们常常挂出来。有一天翟理斯·兰格莱在高街遇到我，问我有没有关于海顿的消息。我记不得怎么回答了，有还是没有。你知道吗，翟理斯的妹妹仍在管理安全联络站？”史迈利不知道。“翟理斯说：‘我们很想念他，他们现在再也培养不出比尔·海顿那样的人才了。’翟理斯至少有一百零八岁了。他说，他在大英帝国成为一个肮脏字眼以前教过比尔现代史。他还问到吉姆的情况。可以说是他的另一个化身，哈哈。你从来不喜欢比尔是不是？”康妮东拉西扯地说着，一边把这些东西都装在塑料袋里，用布包起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是你妒忌他，还是他妒忌你。我想大概是他太时髦了。你总是不相信漂亮的外貌，当然只指男人而言。”

“亲爱的康妮，别胡说八道了。”史迈利这一次可没有防备，感到很尴尬，马上反驳道，“比尔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没有什么，”她几乎已经忘掉了，“我有一次听说他和安恩在公园里骑马，就此而已。他不是她的表兄吗？我一直以为，要是办得到，你和比尔在一起合作真是很合适的。你能恢复传统的精神。那个苏格兰鬼可不行。由比尔重建班底，”——她又露出了讲童话的笑容——“而乔治——”

“乔治来收拾残局。”史迈利给她提示说，他俩都笑了，不过乔治的笑是假的。

“亲我一下，乔治，亲康妮一下。”

她带他从菜园出去，那是她房客走的一条路，她说他一定喜欢走这条路，不喜欢走另外一条路，免得看到隔壁花园那头哈里逊公司新盖的一排难看的平房。天空在下毛毛雨，夜雾之中隐约可以看到几颗淡淡的星星。在马路上，卡车隆隆而过，穿过夜幕，向北驶去。康妮突然害怕起来，抓住了他。

“你真淘气，乔治，你听到没有？你瞧着我，别瞧那边，那边尽是霓虹灯和罪恶的渊藪。亲一亲我。全世界坏人到处都在糟蹋我们的时代，你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

“我没有帮他们，康妮。”

“当然你在帮他们。瞧着我。那时候才是好时光，你听见吗？真正的好时光。那时候英国人可以感到骄傲自豪。现在也应该让他们感到骄傲自豪。”

“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事。”

他把他的脸拉到自己的前面，于是他就亲了她的嘴。

“可怜的人儿，”她喘着粗气，可能不是由于某一种感情，而是多种感情的交错，像混合酒一样在她身上掺和在一起，“可怜的人儿。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都被夺走了，一去不复返了。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可恶的

潘西只是个跑龙套的。”他早知道会这样收场，不过没有想到这么难堪。每年圣诞节在圆场各个角落里举行的小酒会上，他总要一遍又一遍地听她说同样的事情。“你不知道米尔邦兹吧？”她问。

“什么米尔邦兹？”

“我哥哥的房子。很漂亮的帕拉底欧式建筑，有可爱的花园，在纽伯雷附近。后来修马路，砰，砰，建起了高速公路，把花园都占了。你知道，我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还没有把沙拉特卖了吧？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会把它卖了。”

“他们没有。”

他一心只想摆脱她，但是她把他抓得更紧了，他可以感到她的心房贴着他在跳动。

“如果情况不好，就别回来见我。答应吗？我太老了，本性难改。我希望你们都像过去我所认识的那样留在我的记忆中，个个都是可爱的孩子。”

他不想就这样把她丢在黑暗中，在树丛下跌跌撞撞，所以他又送她走回半路，两人都没有说话。当他朝马路上走去时，他听到她又在哼歌了，声音很大，简直是尖叫。可是与他心中当时感到的乱哄哄相比，这算不得什么，在这漆黑黑的夜里，加上一个天晓得最后会有什么结局的心境，使他的心中感到一阵阵惊慌、愤怒和难受。

他搭了一列慢车到斯劳，在那里孟德尔租了一辆汽车在等他。他们驱车慢慢驶向伦敦的橘黄色城市夜空时，他听了彼得·吉勒姆调查的汇报。孟德尔说，值班记事册上没有四月十日到十一日夜间的记载。那几页被刮胡刀割去了。同一天夜里警卫保管的签到本也不见了，还有收发报登记簿也是如此。

“彼得认为这是最近发生的事。下一页上写着一个条子说‘如欲查询，请问伦敦站站长’。是伊斯特哈斯的笔迹，日期是星期五。”

“上星期五？”史迈利转身问，他转身太急了，身上系的安全带发出了咯吱的声音，“那是塔尔到英国的那一天。”

“这都是彼得说的。”孟德尔岿然不动。

最后，关于又名伊夫洛夫的拉宾，还有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这两个人，在托比·伊斯特哈斯的点路灯组的报告中，都没有什么不利的痕迹。两人都受到了调查，两人都列为丙级：最干净的一级。拉宾在一年前奉命调回莫斯科。

孟德尔的公文包中还带来了吉勒姆拍的照片，那是他在布里克斯顿的调查结果，冲洗以后放大了。到接近帕丁顿车站的地方，史迈利下了车，孟德尔从车门中把皮包交给他。

“你不要我跟你去吗？”孟德尔问。

“谢谢你。只有一百码远。”

“幸亏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是啊。”

“有的人要睡觉。”

“晚安。”

孟德尔仍举着皮包。他说：“我也许找到学校了，在汤顿附近一个叫瑟斯古德的学校。他先在伯克郡代了半学期的课，后来又转到萨默塞特去了。听说买了一辆旅行拖车。要调查一下吗？”

“你有什么方法？”

“去敲他的门。向他兜售一台胡佛牌吸尘器，通过社交场合去认识他。”

“对不起，”史迈利突然担心起来，“我可能是过虑了。对不起，我不该如此无礼。”

“吉勒姆这小子也有点过虑，”孟德尔坚定地说，“他说他在那里看到别人对他都侧目而视。他说肯定有什么事，他们都知道。我叫他好好地喝口酒定定神。”

“是啊，”史迈利想了一会儿说，“是啊，该这样。吉姆是个老手，”他解释道，“是老派的外勤人员。不论他们怎么整他，他还是很行。”

卡米拉很晚才回来。吉勒姆知道她在桑德那里上笛子课到九点，但是她开门进来时已十一点了，因此他对她说话没有好气，他无法控制自己。现在她躺在床上，一头夹着白丝的黑发铺在枕头上，看着他站在没有点灯的窗口，凝视着外面的广场。

“你吃过饭了吗？”

“桑德博士请我吃过了。”

“吃什么？”

她告诉过他，桑德是个波斯人。

没有回答。也许是在梦中？核桃牛排？爱情？她睡在床上时，除非要拥抱他，否则从来一动也不动。她睡着时呼吸很轻。他有时醒来看着她，心想要是她死了，他会有什么感觉？

“你喜欢桑德吗？”他问。

“有时候。”

“他是你的情人吗？”

“有时候。”

“也许不该搬到我这里来。应该搬到他那里去。”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卡米拉说，“你不懂。”

是，他不懂。先是有一对情人在一辆吉普车后座上搂在一起，接着是一个头戴软帽的独行侠在带着狗散步，后来又是一个小姐在他前门外的公用电话亭中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这些事情不一定有关系，只是接连不断，好像警卫换岗一样。现在又停了一辆送货车，却没有人下车。又是情人，还是点路灯的夜班值勤？送货车到了十分钟后，吉普车才开走。

卡米拉睡着了。他醒着躺在她的身边，等到明天按史迈利的要求去偷普莱多事件的档案，这个事件又称埃利斯丑闻，或者缩小范围来说，叫“作证计划”。

在那件事没有发生以前，这一天是比尔·罗奇有生以来第二个最愉快的日子。第一个最愉快的日子是在他的家庭分裂以前不久，那天他父亲发现屋顶上有个黄蜂窝，要比尔帮他用烟把黄蜂熏出来。他的父亲不善于户外活动，手脚一点也不灵活，但是在比尔从百科全书中查阅了有关黄蜂的介绍以后，他们就一起开汽车到一家杂货店里买了一些硫黄，装在一个喂食器里，放在屋檐下熏，终于把黄蜂都熏死了。

今天则是吉姆·普莱多汽车俱乐部的赛车开幕日。至今为止，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阿尔维斯牌汽车拆下来，擦洗擦洗，再重新安装好。但是今天为了答谢他们，由他们在难民拉兹的帮助下，在车道上铺了一捆捆的干草作为障碍物，然后大家一个接一个握方向盘开车比赛，由吉姆计算时间，在观战者的哄笑中，扑哧扑哧地开过起跑门。吉姆介绍他的汽车是“英国制造的最好的汽车。由于社会主义，现在停产了”。他现在油漆一新，车头上有一面米字旗迎风飘扬，它无疑是天下最好最快的汽车。第一轮比赛的十四人中，罗奇得第三名。现在举行第二轮，他已开到了栗树林附近，还没有因障碍物而停下来过，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打破纪录了。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会使他感到这么快乐。他喜欢这汽车，喜欢吉姆，甚至也喜欢起学校来，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想努力求胜。他听到吉姆在叫“小心，大胖”，他可以看到拉兹举着一面临时凑合做成的方格指挥旗在蹦蹦跳跳的，但是当他磕磕碰碰地开过终点柱时，他就已经知道吉姆没有在看他了，他的眼光远远地看着跑道那头的山毛榉树林。

“多少时间，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但是一阵沉默。

“计时员！”斯巴克莱叫道，试一试他的运气，“犀牛，请告诉我们多少时间。”

“很棒，大胖。”拉兹也看着吉姆说。

这一次，斯巴克莱的大胆和罗奇的央求一样，好像石沉大海，没有引起反响。吉姆朝着运动场东边那头场外的小路看着。一个叫科尔萧的学生站在他的旁边，他的外名叫卷心菜沙拉。他是三年级乙班的留级生，以爱拍老师马屁出名。运动场很平坦，到山边才升高，下几天雨就要积水，因此在那条小路旁没设什么围篱遮住外面，只有绕在木桩上的铁丝网。而且也没有什么树木，只有铁丝网、低洼地，有时还看得见远远的昆托克山，但是今天却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雾中了。低洼地原来可能是沼泽，通往一个湖泊，或者不如说通向白茫茫一片没有尽头的地方。就在这个给雨水冲洗得一干二净的地方走着一个孤单的人影，一个身材修长、不引人注意的过路人，他是个男人，面容瘦削，头戴软帽，身穿灰色雨衣，手提一根很少使用的手杖。罗奇也看着他，觉得那人心里想要走得快一些，但是又为了某种目的而放慢了脚步。

“你戴着眼镜吗，大胖？”吉姆问道，一边看着那个人，他快要走近下一个木桩了。

“戴着，先生。”

“那么他是谁？看上去像是所罗门·格隆第21。”

“我不认识，先生。”

“从来没有见过吗？”

“没有，先生。”

“既不是教员，又不是村里的人。那么是谁呢？乞丐？小偷？他为什么不朝这边看，大胖？咱们有什么不对？要是你看到有一伙学生在球场上比赛开汽车，你不会那样的，是不是？他不喜欢汽车？他不喜欢学生？”

罗奇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想出答案，吉姆就已经用拉兹的话在跟拉兹说了，声音很轻，很平板，使罗奇马上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特殊的外国联系。这个印象由于拉兹显然否定的回答而加强了，拉兹的回答也同样的泰然自若。

“先生，请听我说，我想他大概是教会的人，先生，”卷心菜沙拉说，“做过礼拜以后，我看到他在跟威尔斯·法戈说话。”

牧师的名字叫斯巴戈，年纪很大。瑟斯古德学校里流传他实际上就是那个退隐中的伟大的威尔斯·法戈22。吉姆听到这个情况，想了一下，罗奇很生气，认为这都是科尔萧瞎编出来的。

“你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吗，卷心菜沙拉？”

“没有，先生，没有。他们在看教堂座位名单。我可以去问威尔斯·法戈，先生。”

“我们的教堂座位名单？瑟斯古德的座位名单？”

“是的，先生。学校的教堂座位名单。瑟斯古德学校。所有名字都在上面，按我们的座位排列。”

罗奇不高兴地想，还有教职员的座位。

“要是有人再见到他，马上告诉我。别的可疑的人也是如此，明白吗？”吉姆现在是对大家说话，口气有意显得很轻松，“我不喜欢莫名其妙的人在学校周围晃来晃去。我上次教的那个学校有一伙这样的人。结果把那地方全都偷光了。银器、现款、学生的手表、收音机，什么都偷。下次就会偷阿尔维斯了。这是英国最好的汽车，如今已停产了。他的头发什么颜色，大胖？”

“黑色，先生。”

“身高，卷心菜沙拉？”

“先生，六英尺，先生。”

“卷心菜沙拉眼中人人看来都是六英尺，先生。”一个反应很快的孩子打趣道，因为科尔萧是个矮子，据说幼时喂的不是奶，而是杜松子酒。

“年纪，斯巴克莱，你这傻瓜？”

“九十一，先生。”

大家一阵哄笑。罗奇得到再开一次的机会，但成绩不佳，那天晚上难过得睡不着觉，因为汽车俱乐部的全体会员都被吸收成为观察员了，更不用说拉兹了，而这原来是他独占的地位。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像他那样警觉性高，尽管吉姆命令的有效期限不超过一天，尽管从今以后，罗奇必须加倍努力来应付竞争威胁的来临，这都安慰不了他。

那个瘦脸陌生人不再出现了，但是第二天吉姆很难得地到教堂去了一次。罗奇看到他在一个墓穴前面同威尔斯·法戈说话。从此以后，比尔·罗奇注意到吉姆脸上越来越阴沉，而且神态警惕，有时好像心中有把怒火一样，不论他每天傍晚散步时，或者坐在拖车住房外的吊床上，不顾寒风急雨，吸着他的小雪茄，喝着伏特加，让暮霭渐渐地包围他，他都是如此。

第2篇 中篇

乔治·史迈利去了阿斯科特的第二天，就用巴拉克劳夫的名字，在苏塞克斯花园的艾莱旅馆设立了工作总部。从位置来看，艾莱旅馆算是个很僻静的地方，完全符合他的需要。它在帕丁顿车站南面一百码处，原来是一批年代比较久远的宅邸中的一幢，一行梧桐树和一个停车场把旅馆和大马路隔开。大马路上整晚车辆不停，隆隆而过。但是在旅馆里面，却异常安静，尽管颜色很不协调的墙纸和铜灯罩使那地方成了一个火盆似的。不仅旅馆里一片安静，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外面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旅馆老板娘波普格拉汉太太更令人加深了这个印象。她是个少校的遗孀，说话有气无力，使得巴拉克劳夫先生或者任何一个前来投宿的客人，都有一种极度疲劳困顿的感觉。她当孟德尔督察长的线民已有多多年了，孟德尔硬说她的姓氏就是普通的格拉汉。波普23两字，只不过是听起来威风一些，或者是为了表示对罗马教廷的尊敬才加上去的。

“你的父亲不是绿衣团的吧？”她在旅客登记册中看到巴拉克劳夫的名字时，打个呵欠问。史迈利订了两个星期的房间，预付她五十英镑，她给他八号房间。因为他要工作，他要一张书桌，她给他一张摇晃不稳的牌桌，让旅馆侍者诺曼送去。她自己还亲自监督，一边叹口气说：“这是乔治王时代的。看在我的面上，请爱惜使用，好不好？我其实不应该借给你的，这是少校的桌子。”

除了这五十英镑以外，孟德尔又偷偷自己掏腰包加了二十英镑的预付款，他称之为行贿钱，不过后来他又从史迈利那里要了回去。他付钱的时候告诉她：“不会有人打扰吧？”

“你可以这么说。”波普格拉汉太太肯定地回答，一边正经地把钞票塞到内衣里。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我都要知道，”孟德尔坐在她地下室的房间里，和她一起喝着一瓶她喜欢的酒，提醒她说，“进出的时间、来往的人、生活作风，尤其是，”——他伸出一只手指强调——“尤其是，你不知道这有多么重要，那就是，我要了解是不是有可疑的人物对他发生兴趣，会找个借口跟你的旅馆员工打听他的情况。”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哪怕他们说他们是禁卫军，或者福尔摩斯都一样。”

“只有我和诺曼两个人，”波普格拉汉太太说，顺手一指一个在哆嗦的孩子，他穿着一件黑大衣，波普格拉汉太太给他配了个天鹅绒领子，“在诺曼身上他们是问不到什么的，亲爱的，你太敏感了。”

“寄给他的信也一样，”督察长说，“只要是看得见的，邮戳、投寄时间，我都要，但是不可私拆，也不许耽搁。他的衣物也是。”他看了一眼那个显眼的大保险柜，停了一会儿说，“他有时可能要求存放一些东西。主要是文件，有时是书。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一个人可以看这些东

西，”——他突然露出一副海盗般的笑容——“那就是我。明白吗？别的人甚至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替他收藏了这些东西。别碰这些东西，他很精明，能够看出的。要碰，得要由专家来碰。我不多说了。”孟德尔最后说。不过他从萨默塞特一回来就告诉史迈利，他只花二十镑钱，做把风生意的，要算诺曼和他的老板娘是最最便宜的了。

他这牛皮吹错了，不过尚可原谅，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吉姆不花一分钱，就找到了他的汽车俱乐部全体会员替他把风，也不可能知道吉姆用什么办法，后来居然能够摸清楚孟德尔小心翼翼建起的调查脉络。不论孟德尔或者任何其他他人，都不可能想像吉姆由于积压的愤怒、紧张的等待，甚至还有点疯狂，而导致心理上的高度警惕状态。

八号房间在顶层。窗户外面是一道女儿墙。墙外是一条小街，有一家阴暗的书店和一家叫做大世界的旅行社。擦手毛巾上绣着“马劳天鹅旅馆”的字样。头一天晚上拉康就来了，带着鼓鼓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的是他办公室里拿来的头一批文件。他们为了要说话，并肩坐在床边，打开半导体收音机，盖过他们谈话的声音。拉康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搞这一套把戏似乎年纪太老了一些。拉康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把文件拿回来，还史迈利那些前晚给他塞在公文包让它看来鼓鼓的书。做这种事情，拉康最不擅长了。他很不高兴，态度简慢。他明确表示对于这种不正当的事情感到由衷厌恶。天气很冷，但他脸上气得红红的，久久不退。可是史迈利要在白天看到这些文件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拉康的手下工作人员随时会要查阅，万一没有找到，可能引起喧哗。而且史迈利也不想白天看这些文件。他比别人都了解，他手头时间很紧。在之后的三天里，这样的安排很少变化。每天晚上拉康下班到帕丁顿车站搭火车回家时，就到史迈利那里去，送来文件。每天晚上波普格拉汉太太就偷偷地向孟德尔报告，那个一脸不高兴的瘦高个子又来过了，对诺曼颐指气使。每天早上，在只睡了三个小时、吃了一顿有半生不熟的香肠和煮得过烂的番茄这种糟糕早餐后——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可吃——史迈利就等拉康来，然后高高兴兴地出去，混迹在人群之中，尽管冬天很冷。

在顶层的房间单独度过的这几个夜晚，对史迈利来说很不平常。尽管后来的一些日子也同样紧张忙碌，而且从表面来看，更加变化多端，但是他回想起来，这些夜晚好像是一次独特的旅程，几乎像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拉康原来在花园里厚着脸皮央求的事。“那么你愿意担任这个工作？对以前的，对以后的，都采取必要的措施？”史迈利一步一步回到他过去的经历中时，以前和以后不再有什么不同了，这只是一个旅程，目的地就在前面。那间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旅馆家具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他与他回忆中的一些房间分开。他又回到了圆场顶楼他自己简朴的办公室中，墙上挂着牛津校景的风景照，就像他在一年前离开时那样。他的屋子外面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大办公室，老总的一些头发花白的女职员，大家叫做老妈妈们，在轻声地打字、接电话。而在这个旅馆走廊里却有一个没有被发现的天才日日夜夜在耐心地用一台老打字机。在大办公室的尽头——在波普格拉汉太太的天地里则是个浴

室，外面有块“请勿使用”的牌子——有一扇没有标记的门通向老总的禁区：那地方像一条小巷子，两边尽是旧铁柜和红皮的旧书，有一股尘土味和茉莉花茶的香味。老总坐在办公桌后，这时已瘦得形销骨立，额上挂着一绺头发，脸上露出的笑容像骷髅一样惨淡。

史迈利完全陷入这种错觉之中，所以那个额外装的、需要另付现款的电话分机铃响时，他要定一定神，才能想起自己身在何处。其他的声音也同样叫他糊涂，例如女儿墙上鸽子的扑翅声，电视天线在风中的吹刮声，下雨时屋顶两条屋脊之间积水流下的汩汩声。因为这些声音也是属于他的过去的，在剑桥圆场只有在五楼才能听得到。他的耳朵对这些声音特别敏感，显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些声音是他过去的背景配音。有一次大清早，史迈利听到房间外面步道里有脚步声，他真的走到门口去，想开门让圆场的夜班译码员进来。当时他正沉浸于吉勒姆的照片中，根据手头仅有的一点点情报，无法弄清楚圆场按照横向领导的原则处理香港来电的程序。结果门外却不是译码员，而是穿着睡衣赤着脚的诺曼。地毯上撒着五彩碎纸，对门房间的门外放着两双皮鞋，一男一女，不过艾莱旅馆里是会有人把它们擦干净的，尤其是诺曼不会干这事。

“别在这里张望了，快回去睡觉。”史迈利说。看到诺曼看着他发呆，又说：“你快走开好不好？”他几乎要说“你这个卑鄙的小鬼”，不过他及时制止了自己，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拉康头一天晚上给他带来的第一份卷宗的标题是“巫术计划”，副题是“关于分配特殊情报的政策”。封面上其他空白的地方贴满了注意事项和处理程序，其中一条古怪地规定，若有人无意中发现此一卷宗，应“原封不动归还给内阁办公室收发主任”，“不得擅自启阅”。第二份卷宗，标题写的仍是“巫术计划”，副题是“给财政部的补充费用估算、伦敦的特殊住宿、财务的特别安排、补助等等”。第三份卷宗用红缎带和第一份卷宗捆在一起，叫“巫师来源”²⁴，下面写的是“客户的估价、成本效用、扩大利用，参看机密附件”。但后面没有机密附件，史迈利问起时，拉康态度甚为冷淡。他不耐烦地说：“大臣保管在他的私人保险柜中。”

“你知道开锁的密码吗？”

“当然不知道。”他生气地回答。

“标题叫什么？”

“跟你不可能有关系。我完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找这资料。这是高度机密的资料，我们尽可能把能看到的人限制在最低数量。”

“即使是机密附件，也该有个标题。”史迈利和颜悦色地说。

“这个却没有。”

“它是不是指明了巫师是谁？”

“别胡说八道了。大臣不想知道，阿勒莱恩也不想让他知道。”

“扩大利用是什么意思？”

“乔治，我不想被你审问。你已经不再是圆场的人了，这你也明白。照理我应该先要对你进行专门审查。”

“为了巫术专案进行审查？”

“是的。”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份已通过专门审查的人的名单？”

拉康反驳道，这放在政策档案里，不高兴地几乎要砰地甩门一怒而去。但是随着收音机里放的一张《花儿都到哪儿去了？》的唱片的慢吞吞歌声（一个澳洲DJ主持的音乐节目），他又走了回来，说：“大臣——他不喜欢转弯抹角的解释。他有一句名言：他只相信能够用一张明信片就写完的话。他对于送上手的都急着要知道。”

史迈利说：“你不会忘记普莱多吧？你所有关于他的资料我都要。鸡毛蒜皮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

史迈利的这句话使拉康瞪大眼睛，呆了一会儿，接着又站起身来要走了：“你疯了吗，乔治？你难道不明白，普莱多在挨那一枪之前极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巫术？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针对主要问题，反而要到处钻啊钻的……”不过话还没有说完，他已出了房门。

史迈利回过头来看最后一包：“巫术计划”，副标题是“与部门的通讯”。所谓的部门是白厅称呼圆场的许多个代号之一。这一卷宗采用的形式是以大臣为一方和潘西·阿勒莱恩——从他端端正正的小学生体字迹一望便知——为另一方之间的正式来往记录，当时他在老总的用人系统中还处于最低一层。

史迈利一边翻阅这些已有不少人翻阅过的档案，一边心里想，作为这样一场长期无情的斗争记录，这份档案实在太枯燥乏味了。

史迈利现在一边开始阅读，一边重新经历了这场长期无情斗争的一些主要战役。档案中只留下极少的记录，但在他的记忆中却要得多。主角是阿勒莱恩和老总，起因不明。比尔·海顿是密切注意这些事情的人，即使他也为此感到伤心，他认为这两个人早在剑桥时代就互相仇视了，当时老总曾在那里担任短期的教职，阿勒莱恩还未毕业。据比尔说，阿勒莱恩是老总的学生，而且是个坏学生。老总经常奚落他，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种说法是够荒谬的，因此老总一笑置之。他只是说：“有人说潘西和我是拜把兄弟。说我们玩在一起，真亏有人想得出来！”他从来没有表示这种说法是否确实。

对于这种传说，史迈利根据自己个人对他们两人早年生活的了解，倒可以补充一些确凿的事实。老总出身低微，而潘西·阿勒莱恩却是低地苏格兰人，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长老会牧师，如果说潘西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信仰，他至少继承了他父亲说教的能力。他差个一两岁没有参加大战，在参加圆场之前在伦敦一家大公司工作。在剑桥的时候，他有点儿喜欢政治（海顿说他比成吉思汗还右，而海顿自己，只有天晓得，也不是什么温和的自由派），又有点儿爱好体育。他是一个叫做马斯顿的无足轻重的人招募来的，马斯顿本人曾有一段很短的时期里，想在反谍报活动中搞个自己的小地盘，他认为阿勒莱恩大有前途，竭力为他吹嘘，结果自己不久却下了台。圆场人事组见到阿勒莱恩处境尴尬，就派他到南美去，以领事身份为掩护，连续两任，一直没有回英国。

史迈利还记得，甚至老总也承认潘西在南美干得极好。阿根廷人喜欢他会打网球和骑马，认为他是个绅士——这是老总的话——还当他很蠢，这就完全把潘西估计错了。到他办理移交给后任时，他已在南美的东西两岸布下了一个谍报网，而且还把他的羽翼扩大到北方去。在国内休假以后，他听了两个星期的情资汇报，就到印度去，那里的手下把他看做是殖民地时代英国老爷的化身。他教他们要忠心耿耿，但是给他们的待遇却极低，还随手就把他们出卖掉。他从印度又调到开罗。这个岗位对阿勒莱恩来说本来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中东仍是海顿最喜欢憩脚的地方。马丁台尔那天晚上在他那家无名俱乐部里所说的话丝毫不差，开罗的人把比尔看成是当代的阿拉伯劳伦斯。他们都决心不让他的后任有好日子过。但是潘西还是打下了天下，要不是和美国人发生了纠葛，本来有可能比海顿更受人称道。结果发生了一场丑闻，潘西和老总因此发生了公开的争吵。

具体情况至今不明：那次事件发生在史迈利被提拔担任老总的助手之前很久。情况大概是，潘西未得伦敦授权，即与美国人搞在一起，要弄一个愚蠢的诡计，要用他们自己羽翼下的人代替当地一个土皇帝。阿勒莱恩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尊敬美国人。他在阿根廷的时候，看到他

们在西半球到处打掉右翼政客就极其钦佩。在印度的时候，他对他们分化中央集权势力的手段也极为欣赏。而老总像圆场的大多数人一样，瞧不起美国人和他们的一切活动，对他们的活动还常常设法加以破坏。

这次阴谋流产，英国一些石油公司很生气，阿勒莱恩不得不卷铺盖走路，连鞋子都来不及穿——他们的行话里就是这样开玩笑的。后来，阿勒莱恩说是老总怂恿他这样做的，后来又拆他的台，甚至说老总有意向莫斯科走漏风声。不管内情究竟如何，阿勒莱恩回到伦敦时接到通知，奉派到训练所去负责训练见习新手。这个差使一般是给只有一两年工夫就要退休的老朽做的。比尔·海顿当时是人事组长，据他解释，当时伦敦没有什么职位可以供潘西那样资历和才能的人选择。

“那么你也得为我因人设事。”潘西说。他说得不错。后来比尔向史迈利坦承，他当初没有估计到阿勒莱恩后台的力量。

“他们是谁？”史迈利曾经问过，“他们怎么能够把一个你不要的人强塞给你呢？”

“打高尔夫球的。”老总不高兴地说。打高尔夫球的和保守党人，因为那时阿勒莱恩勾搭上反对党，尤其是得到了迈尔斯·塞康比张开双手的欢迎，他是安恩的表兄弟，可惜不是远房，现在是拉康的大臣。但是老总没有力量抗拒。圆场当时奄奄一息，甚至有人主张撤销原机构，重起炉灶。在间谍世界中，失败一向祸不单行，只不过这次是没完没了地拉得特别长而已。情报价值下跌，而且越来越值得怀疑。在关键的地方，老总的手不够狠。

这种暂时的挫折，并不妨碍老总为潘西·阿勒莱恩创设“对外活动总指导”一职拟草案时所得到的乐趣。他把这个新职称做潘西的小丑帽。

史迈利无计可施。比尔·海顿这时在华盛顿，想和美国情报局的法西斯清教徒（他这么称呼他们）谈判一项谍报条约。史迈利已升到五楼，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老总挡驾谢客。因此阿勒莱恩见不到老总只好来问史迈利：“为什么？”他在老总外出的时候，就到史迈利的办公室来见他，请他到他那个暗淡的公寓去（先把他的情妇打发出去看电影），用哭丧的苏格兰腔问他：“为什么？”他甚至不惜工本，买了一瓶威士忌大方地硬灌史迈利，自己却只喝一瓶比较便宜的酒。

“乔治，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呢？我们有过一两次小争吵，那有什么了不起，你说说看？他为什么盯住我不放？我只不过想在上一层有一席之地。大家都知道我凭我的成绩有权这样要求！”

他所谓的上层是指五楼。

老总为他拟的草案，初看之下甚为冠冕堂皇，根据这一条例，一切活动计划在实施之前，阿勒莱恩都有权检查。但是用小字加上的但书又对这个权限加上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地区组的同意，而老总却有办法使地区组不表示同意。工作条例又委托他“协调后动力量，防止各地区组相互越权”，这一点，阿勒莱恩在设立伦敦站之后倒实现了。但各后勤单

位如点路灯的、伪造护照的、监听的和破译的，却不肯让他检查，他也无权强迫他们。因此阿勒莱恩闲得发慌，他桌上的进出文件篮一到午饭以后就空空如也了。

“我是个庸才，是不是？这年头大家都得是天才才行，都得当主角，不能跑龙套，而且还得是老头子。”因为阿勒莱恩要当上级还嫌年轻，尽管这一点在他身上很容易被忘掉，他比海顿和史迈利年轻十来岁，比老总年轻得更多。

老总不可动摇：“潘西·阿勒莱恩为了图得封爵会不惜出卖亲娘，为了在上议院占个席位会不惜出卖我们这个机构。”后来，他身患痼疾日趋严重时，他说：“我绝不把我一辈子的心血交付给一匹只供节日检阅用的马。我这人自视甚高，所以不吃拍马屁这套，人已老迈，所以也无野心。我就是脾气太坏。潘西则正好相反，白厅多的是高人，他们喜欢他，不喜欢我。”

可以说，老总就是这样间接地把巫术招到自己头上来的。

“乔治，到我这里来，”有一天老总在对讲机里说，“潘西老弟想要跟我干。你快到我这里来，要不然就要打起来了。”

史迈利记得，当时正好是一些出师不利的战士从世界各地回来的时候。罗埃·布兰德刚从贝尔格莱德搭飞机回来，他在那里在托比·伊斯特哈斯帮助下想重建残破的谍报网。保罗·斯科尔德诺当时是德国站长，刚在东柏林替他最优秀的苏联情报员送葬。至于比尔，在又去了一趟美国空手回来后，正在大骂五角大楼目中无人、五角大楼都是蠢材、五角大楼口是心非，并且扬言“现在该是和该死的俄国人搞合作的时候了”。

在艾莱旅馆，时间已过了午夜。有个晚到的客人在按门铃。史迈利心里想，他得给诺曼十先令的小费。英国币制虽已改革，他仍搞不清楚。他叹了一口气，把第一份巫术档案拉了过来，轻轻地舔了一舔右手食指和大拇指，开始工作起来，用自己的记忆核对官方的资料。

在那次谈话以后才一两个月，阿勒莱恩就向安恩那位显贵表兄弟写了一封有点歇斯底里的私人信，后来存入了拉康的档案。信中说：“我们已经谈过了。巫术报告的情资料来源极为机密，我认为目前白厅分发报告的方法不能适用。我们在牛虻计划上使用的公文箱办法常常失效，因为白厅的客户不是把钥匙丢了，就是一位工作过度疲劳的副官把钥匙交给了他的私人助理。我已向海军谍报处的李莱谈过，他准备在海军部大楼为我们专辟一间文件阅览室，供客户阅读文件，由我单位派一位资深门警监视着。为掩护起见，阅览室称为亚得里亚海工作组会议室。符合阅读条件的客户不用出入证，因出入证容易产生弊端。他们可向我的管理员”——史迈利注意到所用的代名词——“自报身份，由他核对名单上的相片。”

拉康还没有被说服，他通过他讨厌的上司，向财政部提出了他的看法，他的看法一般也总是代表那位大臣提出的：

既属必要，亦需大规模改建阅览室。

一、阁下是否批准此项开支？

二、如获批准，此项开支表面上似需由海军部承担，然后由部门偿还。

三、此外尚有增添管理员问题，又是一项额外开支……

而且还有阿勒莱恩增光添辉的问题——史迈利一边慢慢翻阅一边想。到目前为止，他的光辉已经像灯塔一样到处在发光了：潘西不久即可在上层占一席之地，老总好像已经死了。

在楼梯下面传来了很悦耳的歌声。那是一位威尔士客人，已经喝得烂醉了，在向大家道晚安。

史迈利记得——又是他的记忆，档案里是没有这样单纯人情味的东西的——巫术绝不是潘西·阿勒莱恩在担任新职之后，要策划他自己的谍报活动的第一次尝试。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条例规定，他凡事必须先得到老总的许可，之前的尝试遂告流产。比如，他有一阵子一心想挖地道。美国人在柏林和贝尔格莱德挖了窃听的地道，法国人对美国人也搞了差不多同样的一手。那么好吧，圆场就在潘西的旗号下也挤进这个市场。老总睁只眼闭只眼，各部联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阿勒莱恩委员会，派了一批技术人员去检查雅典苏联大使馆的地基，阿勒莱恩一向钦佩那里历届的军人政权，对最近这个也是十分钦佩，指望可以得到他们的不吝支援。但是这时老总却轻轻推翻了潘西的准备工作，且等他又搞什么新花样。那天阴沉沉的上午，老总把史迈利叫来，就是因为潘西搞了新花样。只是在这中间还互相开了几次火。

老总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阿勒莱恩站在窗户旁边，桌子上放着一份卷宗，颜色鲜黄，没有打开。

“你到那边坐下，看一看这些胡说八道。”

史迈利在小沙发上坐下，阿勒莱恩仍站在窗边，双肘撑在窗台上，从外面屋顶上望过去，看着纳尔逊纪念碑和远处白厅的一些尖顶。

卷宗里是一张据说是苏联海军高级文件的照片，文件长达十五页。

“谁翻译的？”史迈利问，一边心里想，译得不错，很可能是罗埃·布兰德的手笔。

“上帝，”老总答道，“上帝翻译的，是不是，潘西？乔治，你别问他，他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那时候老总显得特别年轻。史迈利记得他体重减轻，双颊红润，对他知之不深的人往往会为他的气色向他表示祝贺。也许只有史迈利才注意到，即使在那时，他头上头发分开的地方，总是流着小汗珠，这已司空见惯。

精确地说，这份文件是对苏联最近在地中海和黑海举行的一次演

习所作的评估，据说是向苏联统帅部提出的。拉康归档时只标《海军第一号报告》，海军部好几个月以来就一直在催圆场要提出有关这次演习的情报。因此，这份资料来得正是时候，这在史迈利看来反而觉得有些可疑。资料十分具体，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史迈利即使不是以近距离来看也很难理解：海岸对海上的进攻力量、敌方警报系统的无线电活动、恐怖均势的高等数学。即使是真货，价值也不大，但是又没有任何确凿根据可以证明它是真货。圆场每星期都要检验好几十份各地自动投来的所谓苏联文件。大多数是纯粹骗人的货色。有少数是盟国有意伪造的东西，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有少数文件是俄国人故意提供的鸡毛蒜皮。偶然有一两个文件后来证明是真实的，但那也往往是在丢弃了以后。

“这个签名的是谁？”史迈利问，他指的是边上用俄文字母写的一些批注，“有谁知道吗？”

老总的头向阿勒莱恩那边偏了一下。“请问有关人士。别问我。”

“札罗夫，”阿勒莱恩说，“海军上将，黑海舰队。”

“没有日期。”史迈利表示怀疑。

“这是个草稿，”阿勒莱恩自满地回答，苏格兰腔比平时更重了，“札罗夫在星期四批示的。最后定稿加上这些补充，到星期一发出，也用那个日期。”

今天是星期二。

“从哪儿搞来的？”史迈利仍感到不解。

“潘西不能说。”老总说。

“我们自己的鉴定人员怎么说？”

“他们还没有看到，”阿勒莱恩说，“而且也不会让他们看到的。”

老总冷冰冰地说：“不过，我们的同行兄弟，海军谍报处的李莱却发表了他的初步意见，是不是，潘西？潘西昨天晚上给他看了——在旅客酒吧间一边喝杜松子酒，是不是，潘西？”

“在海军部。”

“李莱老弟是潘西的同乡，一般来说是不大轻易说好话的。但是半小时以前他打电话给我时还赞不绝口。他甚至还向我道喜。他认为这个文件是真货，征求我们同意——其实应该说是潘西的同意——让他的海军首脑们了解这个文件的大概内容。”

“办不到的事。”阿勒莱恩说，“这是只供他阅读的，至少在一两星期内如此。”

“这份资料太抢手，”老总解释道，“得等到稍微冷却一些才能分发。”

“但是它的来源是哪里？”史迈利坚持问这个问题。

“你不用发愁，潘西已经想出了一个掩护代号。咱们搞掩护代号从来不拖拉的，是不是，潘西？”

“但是，是谁搞到手的？专案负责人是谁？”

“够你伤脑筋的。”老总说了一句旁白。他特别生气。史迈利与他长期交往中，还没有见过他这么生气。他细瘦又长满斑的手颤抖着，平常毫无生气的眼光，这时却闪闪发光。

“巫师来源，”阿勒莱恩说，说话之前，嘴唇微微一咂，完全是苏格兰人的习惯，“是个高居要职的人，能直接接触到苏联决策单位最机密的阶层。”好像他自己就是这个特权阶层一样：“我们称他的情报叫巫术。”

史迈利后来注意到，他在给财政部一个崇拜他的人的个人机密信中也用这两个词，那封信是要求给他更多的权力可伺机行事，付款给情报员。

“他下次就会说是在足球比赛赌博中赢来的。”老总预言道，尽管他脑子清楚，但是仍像一般老年人一样，用起流行的俗话来有些颠三倒四，“你休想叫他告诉你为什么他不肯说。”

阿勒莱恩不为所动。他也满脸通红，不过是因为感到得意，而不是因为有病。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长篇大论地说一通，这番话是完全向史迈利说的，没腔没调，仿佛一个苏格兰警长在法庭上作证。

“巫师来源究竟是什么人，这个秘密不能由我来泄露。他是我们某些人长期争取的结果。这些人和我都有义务相互保密。他们对于我们这里最近接二连三搞砸，也感到不高兴。被破获的事件太多了，损失太大，浪费太多，丑闻也出得太多了。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但是他只把我说的当做耳边风。”

“他指的是我，”老总在旁说，“乔治，你听清楚了没有？这番话里的他，指的是我。”

“一般的暗号和安全原则，在我们这里都被抛在一旁。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各级都各自为政，这是怎么一回事，乔治？各地区组互相拆台，这是上面怂恿的。”

“又是指我。”老总插言道。

“分而治之，如今的原则就是这个。应该齐心协力的人却在自相残杀。我们把最好的伙伴都丢了。”

“他的意思是指美国人。”老总解释道。

“我们把自己的生计都丢了，把我们的自尊心都丢了。这还不够吗？”他把报告收回来，夹在腋下。“真是够了，简直快要把肚子都胀破了。”

“而且和吃饱了的人一样，”老总在阿勒莱恩出去的时候说，“他还要吃。”

现在拉康的档案代替了史迈利的记忆，把这一段故事继续说下去。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已让史迈利知道，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没有再告诉他，这样的情况，根据那最后几个月的气氛来看，是很典型的。老总不喜欢失败，就像他不喜欢生病一样，而且最不喜欢自己的失败。他很明白，承认失败就得容忍失败，任何谍报机关如果放弃斗争，日子就不会太长。他不喜欢高级情报员，因为他们占了预算的很大额度，损及日常的谍报工作，而他对后者却寄托主要的期望。他喜欢成功，但是如果他的其他努力由后出现了奇迹而不受重视，他就讨厌奇迹。他不喜欢软弱，正如他不喜欢感情用事或宗教一样，因此他不喜欢潘西·阿勒莱恩，因为这些成分他什么都有一些。他的对应办法是名副其实地关上门，退到他顶楼办公室里，在昏暗中独坐孤室，谢绝来客，所有电话都由他的女秘书们代接代答。这些蹑手蹑脚、细声细气的老妈妈们给他送茉莉花茶和数不清的档案卷宗来，他成堆成堆地要了来又退了回去。史迈利为了要使圆场工作继续维持下去，继续办自己的事，有时走过他的门口，就经常看到这些档案堆在他的门口。有的是些老档案，还是老总亲自率领弟兄们活动时留下来的，有些是个人的档案，即部门过去和现在成员的历史。

老总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在干什么。如果史迈利问老妈妈们，或者最受欢迎的比尔·海顿进来问同样的问题，她们只是摇摇头，或者向着天上不作声地抬一下眉毛，这种温和的眼色说的是：“病入膏肓。我们不想扫他的兴，反正这个伟大人物的事业快要结束了。”但是史迈利知道——他现在一边耐心地翻阅一卷卷档案，复杂的头脑里有个角落还在回忆伊琳娜给里基·塔尔的信——史迈利知道，而且因此感到很宽慰，原来他自己并不是第一个进行这个探索的人，老总的阴魂一直是他的同伴，只是没有陪他到最后而已，要不是作证计划在最后一分钟让他送了命，很可能会陪他一路走完。

又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半生不熟的香肠和煮得过熟的番茄并不能吸引那个抑郁的威尔士人。

“你还要这些资料吗，”拉康问，“还是已经用完了？它们对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其中甚至连报告也没有。”

“今天晚上还要用一下。”

“我想你自己也发现了，你的脸色真难看。”

他自己并没有发现，但是当他回到贝瓦特街的住处时，他从安恩美丽的镀金镜子中，看到自己眼眶发红，胖乎乎的脸颊尽是疲惫的皱纹。他微微睡了一下，又去干他神秘的勾当了。傍晚的时候，拉康早在那里等他。史迈利二话不说，径自继续阅读文件。

根据档案里的资料，那份海军情报文件在六个星期内没有下文。国防部其他部门对这个文件像海军部一样有兴趣，外交部则说：“此一文件对苏联侵略意图作了极好的侧面说明。”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阿勒莱恩坚决要求对这份资料加以特殊处理，但是他好像是个没有带兵的司

令。拉康冷冰冰地提到“没有及时听到下文”，因此向大臣建议，说他“和海军部一起分析一下情况”。根据档案来看，老总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可能是按兵不动，等事情过去。在这期间，财政部的一位莫斯科观察家指出，白厅在近几年中已经碰到过不少这种情况了：先是得到一份令人鼓舞的情报，后来不见动静，甚至更糟的是，出现一场丑闻。

他错了。到了第七个星期，阿勒莱恩在同一天宣布得到了三份巫术的新情报，都是苏联各部门之间的秘密通讯，不过内容各不相同。

根据拉康做的摘要，巫术第二号情报是谈经互会中的紧张关系，谈到西方贸易对经互会较弱的会员国的腐化影响。用圆场的话来说，这是罗埃·布兰德工作范围内的一个典型报告，所牵涉问题就是那个以匈牙利为基地的阿格拉瓦特谍报网多年来打听不到的问题。外交部的一位客户写道：“从天而降的好资料，且有确凿的旁证。”

巫术第三号情报讲的是匈牙利修正主义和卡达在政界和学术界加紧肃清的情况：写报告的人借用赫鲁晓夫很久以前新创的一句话说，要使匈牙利停止流言飞语，最好的办法是再杀几个知识分子。这又是罗埃·布兰德的工作范围。外交部那个评论员又说，“对于那些认为苏联对附庸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人来说，这是个使人头脑清醒的警告。”

这两份情报基本上都是背景资料性质。而巫术第四号情报却不然，它共有六十页，一些客户都认为独一无二。这是一份苏联外交部针对与声望下滑的美国总统进行谈判的技术性利弊分析。总之，结论是，向美国总统丢一块骨头，让他对选民有所交代，苏联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多弹头核武谈判中换得有价值的让步。但是结论中指出，不宜使美国明显感到自己是输家，因为这可能使五角大楼采取报复性或先发制人的政策。这份情报是比尔·海顿的工作范围。但是海顿在给阿勒莱恩的一份令人感动的备忘录中自己也说，他搞苏联核武二十五年，还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好的资料。这份备忘录未得海顿同意，就立即送呈大臣一份副本，归入内阁办公室档案。

他最后说：“除非我完全弄错了，否则，我们的美国同行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我知道现在为时尚早，但是我的确认为，任何人将此资料拿给华盛顿，都可以获得重赏。的确，如果巫师能保持此标准，我敢预言，美国情报局中的任何货色我们都能买到。”

于是潘西·阿勒莱恩有了他的文件阅览室。乔治·史迈利在洗手台旁边的旧煤气炉上煮了一壶咖啡。煮到一半，煤气就断了，他一气之下，把诺曼叫来换了五英镑的硬币。25

史迈利利用拉康为数不多的记录，从那次赞成派的首次会面情况，一直研读到现在。他的兴趣越来越大。当时，互相猜疑在圆场颇为盛行，因此甚至史迈利和老总都噤口不提巫师来源的问题。阿勒莱恩把巫术报告送来以后，就等在外面大办公室中，让老妈妈们把报告送去给老总，他马上签了名，以表示未加阅读。阿勒莱恩把报告拿了回去，打开史迈利办公室的门伸进脑袋打了一声招呼，就砰砰砰下楼了。布兰德躲得远远的，甚至比尔·海顿轻快的光临次数也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就完全绝迹了，而本来这是顶楼生活的一部分，老总以前是喜欢鼓励他的高级助手间相互交谈的。

“老总傻了，”海顿瞧不起地对史迈利说，“我敢大胆地说，他的命也不长了。问题只不过是到底先傻还是先死而已。”

每星期二的例行会议不再举行，史迈利发现老总老是来打扰他，不是叫他出国去完成一些目的不明的使命，就是以他个人身份去视察国内一些基地——沙拉特、布里克斯顿、阿克顿等等。他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老总有意要把他打发走。他们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他就觉得相互之间有严重的猜疑情绪，因此甚至史迈利也真的开始认为，比尔说老总担任现职是否胜任的话可能有些道理。

从内阁办公室的档案可以看出，此后三个月内，巫术计划在没有得到老总的帮助下稳定地开花结果。每月总有两份甚至三份报告收到，据客户的意见，质量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准，但是很少提到老总的名字，甚至没有请他发表意见。有时鉴定人员发表了一些吹毛求疵的意见，不过比较常发生的是他们抱怨无法找到旁证，因为巫师把他们带到了一些从未进入过的领域，是否能请美国人鉴定一下呢？大臣的回答是不能。阿勒莱恩则说，时机未到。他在一份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备忘录里说：“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将不仅用我们的资料交换他们的资料。我们的宗旨不是做一次买卖。我们的任务是要排除众议确立巫师情报价值。做到了这一点以后，海顿就可以在情报市场兜售了……”

对此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在参与亚得里亚海工作组机密的少数人之间，巫师已成了一匹必胜之马。他的资料确凿，这是其他情报来源事后常常证实的。于是成立了一个巫术委员会，由大臣亲自担任主席。阿勒莱恩担任副主席。巫师已成了一项生产事业，老总甚至没有份儿。因此他在绝望之余派史迈利带着叫化碗出去：“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他说，“乔治，对他们施什么计策都行。拷打、利诱、威吓，他们要吃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关于这些会面，档案并无记载，因为这属于史迈利最不愿想起的一部分。他这时已经知道，老总的伙房里没有东西能满足他们的食欲。

四月间，史迈利从葡萄牙回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掩饰一场丑闻，

回来后却发现老总生活在围城之中。地板上到处是档案卷宗，窗户上装了新的锁。他把茶壶的保暖罩盖在他的电话机上，又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块隔音板以防电子窃听。这玩意儿像电扇一样，可以不断地变化音域。史迈利不在的三个星期中，老总已遽然成了一个老头子了。

“告诉他们，他们是用伪钞打通门路，”他头也不抬，仍旧看着档案说，“告诉他们什么都行。我需要时间。”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这时史迈利向自己重复了老总的这句话，他坐在少校的牌桌边，一边研究着拉康一张经过审查可以参与巫术机密的人员名单。今天一共有六十八人领到出入证，可以到亚得里亚海工作组的文件阅览室。每个人像共产党的党员一样，根据领证日期先后编了号。老总死后，名单又打过一遍，其中没有史迈利。但是名列前茅的仍是四个创始人：阿勒莱恩、布兰德、伊斯特哈斯和比尔·海顿。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当初老总这么说过。

史迈利一边阅读，一边注意着每一细节、每一推理、每一隐含的关系，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景象，那就是他和安恩在康沃尔悬崖上散步。那是老总死后不久的事，是他们夫妇长期扑朔迷离的婚姻史上，他所记得的最艰困的时刻。他们站在海边高岩上，大概是在拉莫那和普思古诺之间的什么地方。当时不是到那里出游的季节，他们到那里去，表面上是为了让安恩呼吸海边新鲜空气以治她的咳嗽。他们沿着海边的小道走，各自都在想着心事：他想她是在想海顿，他则是在想老总，想吉姆·普莱多和作证计划，想他退休以后留下的一团糟。他们两人之间已无和谐可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已无平静心情可言。相互之间都成了谜，最寻常的谈话也会扯到奇怪而无法控制的方向。在伦敦的时候，安恩生活糜烂，谁对她有胃口，她就跟谁搞上手。他只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埋葬一件使她伤心或使她十分担心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怎样跟她说话。

“要是死的是我，”她突然问，“不是老总，那么你对比尔有什么想法？”

史迈利还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时，她又加上一句：“有时候我觉得我护卫了你对他的看法。这可能吗？那就是我使你们在一起？这可能吗？”

“可能，”他说，“是的，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依赖比尔。”

“比尔在圆场仍旧举足轻重吗？”

“大概比他实际价值还重要。”

“他还是到华盛顿去，跟他们谈判交易，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我想是吧。我听说是这样。”

“他现在的地位跟你以前的地位一样重要吗？”

“我想是吧。”

“我想是吧，”她重复说，“我想是吧，我听说是这样。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更好一些？比你的成绩好，比你的数学好？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

她神情兴奋，有些奇怪。她那因为海风流泪、晶晶发亮的眼睛，绝望地看着他。她双手抓住他的胳膊，像个孩子似的要他答复。

“你总是告诉我，男人是不宜比较的，”他尴尬地回答，“你总是说，你不相信这种比较。”

“告诉我！”

“好吧，我的答复是‘不’。他不比我好。”

“那么一样好？”

“不。”

“要是没有我插在中间，那么你对他有什么看法？要是比尔不是我的表兄，不是我的什么人，告诉我，你是把他看得更重一些，还是更轻一些？”

“更轻一些，我想。”

“那么从现在起，就把他看得更轻一些吧。我把他从家庭、生活、一切的一切中抛开了。就在此时此地。我把他扔入了大海。喏，你明白吗？”

他明白的只是：回到圆场去，完成你的工作。同样的话，她可以用十多种方式来说，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迈利仍旧因为这段意外的回忆而感到不安，他马上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他心绪不定的时候总是到窗边去张望。一群海鸥有六七只，停在女儿墙上。他一定是听见了它们的叫声，才想起拉莫那海边的那次散步的。

“我话说不出口的时候才咳嗽。”安恩有一次这么对他说。当时她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呢？他不快地朝着对街房顶烟囱间。康妮说得出口，马丁台尔说得出口，为什么安恩说不出口？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史迈利大声地自言自语。海鸥一下子都飞走了，好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一样。“告诉他们，他们是用伪钞打通门路。”若是银行接受伪钞呢？若专家宣布是真钞，而且比尔把它捧到天上去？而且内阁办公室的档案里尽是赞扬剑桥圆场里崭新一辈的人才，他们扭转了霉运，那又如何？

他先挑出托比·伊斯特哈斯，因为托比是靠史迈利起家的。史迈利在维也纳招募他的时候，他还是个穷大学生，住在他死去的叔叔曾担任馆长的一个博物馆废墟里。史迈利开车径赴阿克顿，直捣他的洗衣店虎穴，站在他的核桃木办公桌前面，桌上有一排象牙色的电话机。墙上挂

的是一幅跪着的贤人，是意大利十七世纪的作品，是真是赝，颇可怀疑。窗外是个院子，停满了汽车、卡车、摩托车，还有一些休息娱乐室，点路灯的下班以后就在这里消磨时间。史迈利先问托比的家庭情况，知道有个儿子上了西敏寺公学，一个女儿上了医学院一年级。接着他向托比提出，点路灯的有两个月没有填工作单了，他见托比支吾搪塞就直接问他，他手下的人是不是最近在干什么特殊任务，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由于保密原因，托比不能在报告中说明？

“乔治，我会帮谁做呀？”托比瞪着眼睛说，“你知道，照我看来，那是完全不合法的。”这句话——照托比看来——有一种滑稽的味道。

“我倒觉得你会帮潘西·阿勒莱恩，”史迈利提示说，提供一个借口给他，“毕竟，要是潘西命令你去干一件事，又不许你记录，你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乔治，我倒要问，会是什么样的事呢？”

“审查一个外国信箱，准备一个安全联络站，监视一个人，窃听一个大使馆。潘西毕竟是对外活动的总指挥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根据五楼的指示办事的。我认为这样的事是很说得通的。”

托比小心地看了一眼史迈利。他手里捏着一根香烟，但是点燃了以后却一口也没有吸。这玩意儿是手卷的，从一个银盒中拿了出来，点燃以后却一直没有再送到他嘴上。托比把香烟摆来摆去，有时在前面，有时在旁边，有时要送到嘴边，但结果却从来没有。这时开口说话了，这是托比的一次个人表态，说明他在这一生中这个特定时刻所处的地位。

托比说，他喜欢谍报处，他想留在处里，他对那里有感情。他也有其他兴趣，这些兴趣随时随地可以使他全心全意投入进去，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处里的工作。他说，他有意见的是升官问题。并不是他知足。他想升官主要是社会地位的考量。

“你知道，乔治，我的资格比别人老好几年，可是这些年轻人却要我听他们的命令，我真的感到有些难为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阿克顿也是这样，他们一听到阿克顿这名字就觉得可笑。”

“哦，”史迈利和气地说，“这些年轻人是谁呀？”

但是托比已失去了兴趣，他表白完，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一贯没有表情的样子，他像洋娃娃一样的眼睛出神地发呆。“你是说罗埃·布兰德吗？”史迈利问，“还是潘西？潘西年轻吗？到底是谁，托比？”

没有用。托比后悔刚才说了的话。“乔治，你该升官的时候没有升官，你累得要死地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谁，级别比你高就显得年轻。”

“也许老总可以升你几级。”史迈利提示说，但他自己却不想担任这个角色。

托比的回答使他感到一阵心寒。“事实上，乔治，你也明白，我对他

如今是不是有这种能力，十分怀疑。我这里有些东西要送给安恩，”——他拉开抽屉——“我听说你要来，就打电话给我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可以送给一个完美无缺的太太，你知道我自从有一次在比尔·海顿的鸡尾酒会上见到她以后，从来没有忘掉过她。”

于是史迈利就带着安慰奖回来了——一瓶名贵的香水，他猜想是托比手下点路灯的从国外走私回来的——他又带着叫化碗去见布兰德，心里明白这样他又接近了海顿一步。

史迈利回到少校的牌桌边，翻查拉康的档案，最后找到了薄薄的一份，上面标着《巫术计划·直接补助》，记的是自从有了巫师情报来源以后的最早开支。阿勒莱恩在另一份给大臣的个人备忘录——这一份的日期已经快有两年了——中说：“为了保密起见，建议将巫术财务情况与圆场其他开支完全分开。在未找到合适掩护之前，我请您从财政部所拨经费中直接设置专款，不要作为秘密工作拨款的追加费，因为后者必然会记入圆场账目。专款账目一概由我个人向您申报。”

“所请照准，”一星期后大臣批示道，“只要能按规定……”

但字下面并没有但书。瞄了一眼第一行的数字，史迈利就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一切：到该年五月，也就是他在阿克顿见托比的时候，托比用巫术的预算款项，已亲自出国不下八次之多。两次去巴黎，两次去海牙，一次去赫尔辛基，三次去柏林。每次的旅行目的都简单地说是“取货”。从五月到十一月老总下台的时候，他又去了十九次。有一次去索非亚，还有一次去伊斯坦布尔，每次都不超过三天以上的时间，大多数是在周末去的。有好几次，还有布兰德随行。

坦白说，托比·伊斯特哈斯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史迈利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从记录中找到资料证实自己的印象，反而使他感到很踏实。

史迈利在那段时间对罗埃·布兰德的看法则颇为矛盾。他回想起来，觉得现在仍是这样。布兰德是一个大学教师发现的，由史迈利去把他招募来。这和当初自己被圆场吸收的情况颇为相像。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德国妖魔可以用来煽动爱国情绪，而史迈利对于反共表白总是感到有些尴尬的。像史迈利一样，布兰德没有真正的童年生活。他的父亲是个码头工人，一个热情的工会成员加共产党员。布兰德年幼丧母。他的父亲仇视教育就像他仇视权威一样，布兰德懂事以后，做父亲的不知怎么认为他的儿子已被统治阶级争取过去了，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布兰德争取上了普通中学，暑假里就像托比所说的一样，累得要命地赚些外快。当史迈利在牛津大学老师的屋子里遇到他时，他一副刚刚出门回来精疲力竭的样子。

史迈利看上他以后，过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转入正题上来，布兰德很爽快地接受了，史迈利猜想是出于他对父亲的仇视。在这以后，他就不再由史迈利经管了。布兰德靠一些来历不明的各种补助金，在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孜孜努力，写了一些左倾文章寄给一些如果没有圆场津贴早已

夭折的小刊物。晚上他在烟雾弥漫的酒店里，或者学校会议厅里跟人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假期里，他到训练所去，那儿有个名叫撒切的狂热分子办了一个外派渗透间谍训练班，一次只收一个学生。撒切一边训练他间谍的技能，一边小心地将布兰德的改革观点转向他父亲的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在整整三年以后，一半靠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一半靠他父亲在国王路26的影响，终于争取到了在波兹南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一年的职位。

他从波兰又申请到布达佩斯科学院的工作，此后八年他就过着游牧生活，身为一个寻找光明的左倾小知识分子，他到处受欢迎，但从来没有得到信任。他在布拉格待了一阵子，又回到波兰，再到索非亚待了两个学期，又到基辅待了六个学期，终于精神崩溃，这已是几个月内第二次发病了。训练所又把他叫了回去，这次是要拷问他。审查结果认为他是干净的，把他的谍报网移交给别的外勤人员，他本人则到圆场办公室里指挥他当初在外建立的谍报网。史迈利觉得最近布兰德已成了海顿的密友。史迈利有时去找罗埃闲聊，往往会见到比尔躺在他的小沙发上，周围尽是文件、图表、烟雾；他如果去找比尔，则也不出所料，会见到布兰德穿着一件汗水湿透的衬衫，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比尔负责俄国，布兰德负责附庸国，但是在巫术计划的早期，这一分工几乎已经消失了。

他们在圣约翰伍德的一家酒店里见了面，时间仍在五月间。那天天气阴沉，下午五点半，花园里仍空无一人。罗埃带了一个孩子来，是个五六岁的男孩，一个小布兰德，淡发、粗壮、红通通的脸。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带孩子来，但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停下来闭口不言，看着他那个坐在远处一张凳子上吃核桃仁的孩子。不管有没有精神崩溃，布兰德身上仍有撒切派到敌营里的特务应有的标记：自信、主动，具有群众吸引力，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自在的形容词，在冷战高潮期间，这些形容词把训练所变成了像个道德重整运动的中心。

“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布兰德和气地问。

“没有什么交易，罗埃。老总觉得目前情况不佳。他不喜欢你搞到阴谋集团里去。我也是这样。”

“很好。那么跟我做什么交易呢？”

“你要什么？”

桌上有午餐时段留下来的一套调味罐，中间一格有一捆纸包的牙签，被刚才下的雨打湿了。布兰德取了一根，剥去纸套，扔在草地上，开始用粗的一头剔他的大牙。

“从秘密经费里拨出五千镑来给我怎么样？”

“外加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史迈利把它当做开玩笑。

“还有送孩子上伊顿27读书。”布兰德又补充一句，朝着水泥地那边的孩子眨一眨眼，一边仍剔着牙齿。“你瞧，乔治，我已经付出了代价。

这你很明白。我不知道到手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付了极大的代价。我要捞一些回来。为了爬到五楼我耐心等了十年，不管什么年纪，这都值一大笔钱。甚至你的年纪也是这样。尽管这样，我还是跌了下来，总有个原因，不过我已记不清是什么了。一定是由于你的魅力。”

史迈利的酒杯还没有空，因此布兰德又到酒吧那里去给自己拿一杯，还替孩子拿点吃的。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猪猡，”他坐下来时信口说道，“一个艺术家能够同时抱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照旧工作不误，这话是谁想出来的？”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28？”史迈利回答，觉得布兰德就要说到比尔·海顿头上来了。

“是啊，菲茨杰拉德懂得一些东西。”布兰德肯定道。他喝酒的时候，他有些往外突出的眼睛斜着往篱笆那边看，仿佛是在找人。“我肯定自己还是有用的，乔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可以捞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者，我不放弃搞革命，因为如果你不能打败它，那就侦察它。别那么看我，乔治。这只是现今游戏的名称罢了：你不使我良心不安，我就为你开车，对不对？”他在说话时已举起手来。“马上就来！”他对草地那头喊道，“帮我准备一个！”

铁丝篱笆那边有两个小姐在徘徊。

“这是比尔的笑话吗？”史迈利突然感到很生气地问。

“什么？”

“这是比尔说的英国社会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优裕生活的笑话吗？”

“可能是，”布兰德说，一口气把酒喝完了，“你不喜欢吗？”

“不怎么喜欢，不。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比尔是个激进的改革派。他怎么一下子变了？”

“那谈不上激进。”布兰德反驳道。对于贬低他的社会主义和贬低海顿的话，他都不高兴。“不过是朝窗外瞧一瞧。那就是现在的英国，老兄。谁都不要这样的英国，是不是？”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史迈利问，听到自己也用那种冠冕堂皇的话，他感到很不自在，“摧毁西方社会中那种贪得无厌、互相竞争的本能，而又不至于毁坏……”

布兰德已经喝完酒，会面也结束了。“你操这份心干什么？你弄到了比尔的职位，你还想要什么？只要能保持这个职位就好了。”

比尔却搞到了我的妻子——史迈利心里这么想，这时布兰德已站起来要走了——而且真他妈的，他已经告诉你了。

那个孩子自己想出了一个游戏玩法。他把桌子斜放，把一个空瓶放在上面，看着它滚到地上去。每次他都把空瓶放在桌面最高的地方。史迈利在空瓶没有砸碎以前就走了。

不像伊斯特哈斯，布兰德连谎话也懒得扯。拉康的档案并不隐瞒他和巫术计划的关系。

阿勒莱恩在老总离职后不久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巫师来源完全是一种委员会性质的任务……老实说，我很难说我的三个助手哪个功劳最大。布兰德的过人精力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鼓舞……”他这话是答复大臣的建议：巫术的负责人应列入新年时的授勋名单。他又说：“而海顿的活动手腕有时也不逊于巫师本人。”三个人都得到了勋章，阿勒莱恩的首长任命也获得批准，还有他梦寐以求的爵士勋位。

剩下来的就只有比尔了，史迈利这样想。

在大多数的伦敦夜晚里，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是万籁无声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时甚至一小时，听不到醉汉的呻吟、孩子的哭叫、汽车紧急刹车时车胎擦地的声音。在苏塞克斯花园，这段时间是在午夜三点左右以后。但是那天夜里却提前到一点钟，那时史迈利又站在斜窗口，像个囚犯似的往下面看着波普格拉汉太太的一片沙石地，那里刚有一辆贝德福特牌旅行车停着。车头上贴着许多标语：“悉尼九十天”，“直抵雅典”，“玛丽·劳，我们到了”。车厢里有灯光，他猜想大概有什么年轻人在那里寻欢。孩子，他应该这么叫他们。窗户上有窗帘掩住。

他心里想，现在留给我的只有比尔了，他仍呆呆地看着旅行车的窗帘和车顶上醒目的环游世界的吹嘘。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我们在贝瓦特街有过一次融洽的交谈，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个老朋友，两个老战友，“不分彼此”，就像马丁·台尔那么优雅地说的一样，不过那天晚上安恩被打发走了，这样可以让两个男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心里重复说，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他觉得血往上涌，眼前金星直冒，自制力开始急剧减退。

他到底是谁？史迈利觉得不认识他了。每次想到他，总是把他的形象想得太大了，而且每次不同。在安恩和他勾搭上以前，他以为他很了解比尔：了解他的优缺点。他属于战前那一类人，现在看来似乎已永远消失了，他能够同时做到既声名狼藉，又品格高尚。他的父亲是个高等法院法官，他几个美丽的姊妹中有两个和贵族结了婚。他在牛津的时候支持不吃香的右派，而非吃香的左派，但是从来没有和这些人关系紧张。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个热心的探险家，还是胆大心细的业余画家，他的好几张油画至今仍挂在迈尔斯·塞康比在卡尔登花园的庸俗大宅里。他在中东一带的每个大使馆和领事馆都有熟人，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他学起冷僻的外语十分容易，一九三九年大战一爆发，圆场就找到了他，他们注意他已好多年了。他在战时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无处不在，魅力十足，作风不落俗套，有时甚至荒诞不经。他可以说颇有英雄气概，把他比作劳伦斯是无可避免的。

史迈利心里承认，比尔的确接触过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宏伟计划，要恢复英国的影响和伟大——像鲁伯特·布鲁克²⁹一样，他很少谈起大不列颠。但是史迈利即使在偶尔客观的时候，也记不起他有什么计划获得实行。

相较之下，作为同事的他觉得比较容易尊重海顿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天生间谍头子的耐心和手腕，对付双面间谍时少有的稳重，策划骗局的能力，还有他的讨人喜欢、甚至讨人爱慕的艺术，不过这有时是对

不起朋友的。

谢谢你，我的妻子就是明证。

他为了不失公允，仍绝望地想，也许比尔真的不是能以常规来衡量的。他现在在脑海里把他放在布兰德、伊斯特哈斯，甚至阿勒莱恩旁边，真的觉得海顿是个原创之作，其他人全是有或大或小缺陷的仿制品。他们对比尔的爱戴就像要达到无法达到的完人理想而作的努力一样，即使这个理想本身就是不对的，即使比尔是完全不配的。布兰德粗鲁无礼，伊斯特哈斯冒充英国腔，阿勒莱恩领导才能平庸，没有比尔，他们都是一盘散沙。史迈利也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他现在想到这一点，仿佛是个小小的启示——比尔本人也是微不足道的，钦佩他的人，布兰德、普莱多、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以及其他拥护者，可能认为他十全十美，但是他的真正诀窍是利用他们，通过他们来使自己臻于完美。从他们消极被动的个性中这里拿一块，那里取一块，这样就掩盖了他骨子里其实远不如表面那样杰出……最后把这种依赖淹没在艺术家的高傲下，把他们叫做是他思想的产物……

“够了，够了。”史迈利大声道。

他突然停止进行这样的分析，恼火地把关于比尔的另外一个看法丢在一边，开始回忆起上次和他见面的情况，让自己过于炽热的头脑冷却一下。

“我猜你大概要向我打听巫师的事。”比尔一开始就说道。他的表情倦怠，但神经紧张。这是他该去华盛顿的时候。要是在从前，他会带一个不相配的小姐来，叫她到楼上去陪安恩，他们可以坐下来谈正经事。史迈利不客气地想，这样免得让安恩对他的女伴吹嘘他的才华。这些女人都是同一类的，年纪比他小一半，邋里邋遢的艺术学校学生，死缠不放，性情乖戾。安恩常常说他大概有个给他专门拉皮条的。有一次为了要叫人吃一惊，他带来了一个叫斯丹奇的讨厌年轻人，是切尔西一家酒店里的侍者助手，衬衫领子敞开，胸口挂着一条金链子。

“他们的确说是你写的报告。”史迈利解释道。

“我还以为这是布兰德的事。”比尔露出狡猾的笑容道。

“是罗埃翻译的，”史迈利说，“附在一起的报告是你拟的，是用你的打字机打的。这资料是不给打字员打的。”

比尔小心地听着，抬起了眉毛，好像他随时都会提出反对意见或者比较不伤和气的话题来一样，但是接着他从小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书柜旁边，他站在那里就比史迈利高出足足一层书架。他用他的纤长手指找出一本书来，打开来看，脸上仍露着笑容。

“潘西·阿勒莱恩不肯说，”他打开一页宣布道，“这是不是个前提？”

“是的。”

“这就是说巫师也不肯说。要是巫师是我的来源，他就会说了，是不

是？要是我比尔去找老总说，他钓到了大鱼，要自己一个人单干，那结果会怎样？老总会说，‘比尔老弟，你真聪明，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因为你行。来吧，喝杯茶。’到现在他就会给我一枚勋章，而不会派你到处打听了。我们过去一向是很讲气派的，如今怎么这样庸俗低级了？”

“他认为潘西一心不择手段追求名利。”史迈利说。

“这有什么不对？我也是这样。我想当头头。你知道吗？我也该搞出点名堂了，乔治。半个画家，半个间谍，结果什么也不是。在我们单位里，从什么时候起，个人抱负成了有罪的事了？”

“谁指挥他，比尔？”

“潘西？当然是卡拉，还有谁？一个小萝卜头居然搞到了高级的情报来源，那一定来路不正。潘西被卡拉收买了，这是惟一的解释，”他早就学会了一种刻意误会的手法，“潘西是咱们家里的地鼠。”他说。

“我是说谁指挥巫师？谁是巫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海顿离开书柜，周游全室，浏览史迈利的画。“这是卡洛的画吧，是不是？”他把一幅有镀金画框的小油画拿下来，在灯光下细看。“很不错。”他抬了一下眼镜，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史迈利心里想，他以前早已看过十几次了。“这的确很不错。不是有人想要排挤我吗？你知道，按理说，是我负责俄国这个目标。我献出了我一生最好的年华，建立了谍报网，找到了物色人才的能手，添置了一切现代化装备。你们五楼的人忘了到实地去指挥谍报活动是什么滋味：花了三天工夫才能发出一封信，结果甚至连封回信都没有。”

史迈利心里老老实实在地想：是的，我忘掉了。是的，我也有同感。不，我的脑海里没有想到安恩。我们毕竟是同事，大家都见过世面，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要谈一谈巫师和老总。

“现在却来了这个暴发户潘西，苏格兰小商人，一点气派也没有，卸了一车俄国货。真叫人讨厌，你说是不是？”

“很讨厌。”

“问题是，我的谍报网并不太好。其实侦察潘西要容易得多——”他中断了自己的话，对于这个话题感到厌倦了。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尊小小的范·米里斯画的石膏头像上。“我很喜欢这一个。”他说。

“安恩送给我的。”

“是为了赎罪？”

“大概是。”

“那罪一定不小。送你多久了？”

即使现在，史迈利仍记得他当时注意到街上是多么安静。那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而且他还记得当时心里想，“不，比尔。为了你，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过安慰奖。到今天晚上为止，你甚至不值一双卧室拖

鞋。”这是他心里想的，不过没有说出来。

“老总还没有死吗？”海顿问。

“就是忙。”

“他一天到晚在忙什么？他像个患淋病的隐士，在楼上那个洞窟里一个人在瞎搞。他读那些乱七八糟的档案是为了什么？我敢说，他大概是在怀念他那并不值得怀念的经历。他满面病容。我想也是为了巫师的缘故。”

史迈利又没有说什么。

“他为什么不跟厨师一起吃饭？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而自己在上面挖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他有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史迈利说。

“啊，别装模作样了。当然他有目的。我在上面也有个线民，一个老妈妈，你不知道吗？给她一块巧克力，她就会什么都告诉我。老总在研究圆场昔日英雄的人事档案，看看有没有丑闻，谁是左倾的，谁是好男色的。他们这些人里已有一半入土了。研究我们所有失败的事，你想得到吗？但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成功干了一件事。他疯了，乔治。他得了老年恐慌症，我这话没错。安恩有没有告诉过你弗莱舅舅的事？他以为仆人们都在玫瑰花里安装窃听器，想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离开他吧，乔治。跟着要死的人没有意思。赶快切断关系，走下楼来，跟大伙儿在一起。”

安恩还没有回来，因此他们一起到国王路上去找出租车，一边走，比尔一边谈他最近对政治的见解，史迈利一口“是的，比尔”，一口“不对，比尔”敷衍着，心里在想不知怎样向老总报告才好。他现在已记不得比尔当时是持哪一种见解了。在前一年，比尔是鹰派。他主张撤换欧洲的一切常规部队，代之以核武器。他几乎是白厅里惟一主张英国要维持独立的威慑力量的人。今年——如果史迈利没有记错——比尔却积极主张非战，鼓吹采用瑞典的解决办法。

路上没有找到出租车，夜晚空气很好，他们像两个老朋友一样继续逛着。

“还有，如果你想出让那个米里斯头像，请告诉我好吗？我会出一个好价钱的。”

史迈利以为比尔又是在开一个笨拙的玩笑，他一口回绝了他，终于要生气了。但是海顿根本没意识到他所在乎的。他望着街道的那一头，看到一辆出租车过来，连忙举起了他长长的胳膊。

“哦，天呀，你瞧车里，”他恼火地叫道，“全是到奎格酒店去的犹太人。”

“比尔的屁股一定像一个铁格架，”老总第二天自言自语地说，“他是墙头草。”他眼光失神地看了史迈利一会儿，好像是要穿过他看到另外一

个不那么有血肉的东西，接着就定了一定神，又低头继续看他的文件了。“幸好他不是我的表兄。”他说。

下一个星期一，老妈妈们有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告诉史迈利。老总飞到贝尔法斯特和军方会谈去了。史迈利后来核对了一下出差预支条，发现这是个谎言。那个月圆场里没有人飞到贝尔法斯特去，却有一张去维也纳来回的头等票的报销单据，签发的主管名字是乔治·史迈利。

海顿也在找老总，他很不高兴。“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把爱尔兰也扯了进来，大概是要造成组织上分化吧。天呀，你的头头真没药救了！”

汽车里的灯光熄了，但是史迈利仍看着它花花绿绿的车顶。他心里想，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还有钱？他想像不出要在苏塞克斯花园过隐居生活的后勤工作：供水、排水、电灯。安恩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比尔也能。

事实。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在巫术计划之前一个和煦的夏日夜晚，我突然从柏林回来，发现比尔躺在我贝瓦特街家里客厅的地板上，安恩在电唱机上放一张李斯特的唱片。安恩坐在屋子另一头，身上只穿一件晨袍，脸上没有化妆。没有发生难看的场面，大家都竭力装得自然的样子。据比尔说，他是从机场回来，路过这里，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安恩当时在床上，但是一定要起来见他。我们大家都说，真遗憾，早知道就从希思罗机场一起叫辆出租车回来。比尔走后，我问：“他要干什么？”安恩说：“要找个人听他诉苦。”她说，比尔遇到了桃色纠纷，要找个人谈谈心里话。

“华盛顿有个费丽西蒂，要他让她生个孩子，伦敦有个琴，肚子里有了孩子。”

“比尔的吗？”

“天晓得。我想至少比尔不晓得。”

第二天上午，史迈利无意中发现比尔回伦敦已有两天了，不是一天。在这事件以后，比尔对史迈利异常尊敬，史迈利也礼尚往来，这种态度一般是属于新朋友之间的。史迈利不久就发现秘密已经公开，但他仍对这件事传播之快感到不解。他想大概是比尔向谁吹了牛皮，大概是布兰德。如果这消息是确凿的话，那么安恩违反了她自己的三条规则。比尔是圆场的人，又是同窝——这是安恩的话，指的是家人和亲戚。不论从哪一点来说，他都是不合条件的。第三，她在贝瓦特街接见他，这未免太没有顾忌了。

史迈利又一次退到自己的独身生活中去，等待安恩有所表示。他搬到客房里去住，晚上总是把节目排得满满的，免得自己知道她的进出。他慢慢地发现她很不快乐。她的体重减轻，性情懒散起来，要不是他对她很了解，他一定以为她是感到了内疚，或者甚至自嫌。他对她态度温和，但她拒他于千里之外，她对圣诞节采购不感兴趣，咳嗽咳得很厉害，他知道这是她内心感到痛苦的征候。要不是由于作证计划，他们早

已到康沃尔去了。但事实是，他们不得不延期到一月才走，那时老总已经死了，史迈利已经失业，情况大变，使他感到屈辱的是，安恩为了要掩盖海顿这张牌，又从一叠牌里尽量抽了好几张牌。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与他断绝了关系，还是海顿与她断绝了关系？为什么她从来不提这件事？这么多的情人里，难道这一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实在想不通，只好不去想。比尔·海顿的脸像柴郡猫³⁰一样，他一走近就往后退缩消失了，只留下笑容。但是他心里明白，比尔狠狠伤了她的心，千不该万不该，这最不该。

史迈利叹一口气回到那张不太可爱的牌桌前，继续阅读自从他被迫退休以来关于巫师进展的报告。他马上发现，潘西·阿勒莱恩的新体制很快就在巫师的生活作风上，产生了好几个有利的变化。这好像是一个成熟起来了，安定了下来。深夜赶到欧陆各国首都的事停止了，谍报源源而来，比以前正常稳定。当然，也有头痛的事。巫师继续要钱，不过从来不威胁，由于英镑不断贬值，大笔大笔用外汇付款使财政部很伤脑筋。有次甚至有人提出——不过没有坚持——“既然巫师自己选中我们，他应该有心理准备，负担一部分我国经济衰退的后果。”看来海顿跟布兰德发了脾气，因为阿勒莱恩以少有的坦率态度向大臣写道：“我没有脸再向我的下属提起这件事。”

一台新照相机也引起了一场争吵，这台照相机由技术组花了不少钱卸成管状组件，再装在一盏苏联落地灯座里。这盏落地灯用外交包裹箱偷运到莫斯科，这又引起不少抱怨，不过这次来自外交部。接着的问题是交货。不能把巫师的身份告诉常驻站长，他们也不知落地灯里的内容。这台落地灯很笨重，放不进常驻站长汽车后车厢。经过几次瞎摸瞎撞后，终于不很干净利落地交了货，但是照相机不灵，结果还引起圆场和常驻站长的不和。后来由伊斯特哈斯把一台型号不太复杂的照相机带到了赫尔辛基，交给了——据阿勒莱恩致大臣的备忘录——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他进出边境可以不受检查。

史迈利突然一震，坐了起来。

阿勒莱恩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一份备忘录里向大臣说：“我们谈过话。你同意向财政部提出一份追加估算列入巫术预算，在伦敦购置一幢房子。”

他读了一遍以后，又慢慢地读了第二遍。财政部批准购置房屋费用六万英镑，购买家具和装修费用一万英镑。为了降低开支，财政部要部里自己的律师来处理购房事宜。但是阿勒莱恩不肯透露地址。也是为了降低开支，对于由谁来保有房契的问题也发生了一场争论。这次财政部不肯让步了，部里的律师拟了文件，如果阿勒莱恩去世或破产，可以把房屋收回。但是他仍把地址保密，为了在国外进行活动却购置这幢昂贵的房子，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秘而不宣。

史迈利竭力想找寻一个解释。他很快就发现，财务档案十分严密，没有提出什么解释。档案里只有一次隐约地提到了伦敦的房子，那是房地价税率加倍的时候。大臣致阿勒莱恩：“伦敦方面仍属需要？”阿勒莱恩致大臣：“显然如此。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上次谈话以来，知道的范围并未扩大。”知道什么？

等到他回过头来再研究那份估算巫术情资产品的档案时，他才得到了解答。那幢房子是在三月底付款的。马上有人搬了进去。从那一天开

始，巫师开始有了个性，这是在客户的评语中出现的。到现在为止，从史迈利怀疑的目光看来，巫师不过是个机器：手段高明，无懈可击，能够接触机要，令人感到神秘，没有大多数情报员那样重的负担。现在他忽然也有脾气了。

“我们向巫师提出你关于克里姆林宫目前对俄国剩余石油出售给美国的看法的疑问。我们应你的要求向他提出，这与他上月的报告矛盾，当时他说克里姆林宫目前正在拉拢田中政府，商谈将西伯利亚石油在日本市场上出售。巫师认为这两个报告并无矛盾之处，拒绝预测最后可能选定哪个市场。”

白厅对于自己的莽撞表示遗憾。

“对于乔治亚民族主义情绪和第比利斯骚乱的报告，巫师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他本人不是乔治亚人，因此对此采取传统的俄国观点，认为所有乔治亚人都是小偷流氓，应该丢到监狱……”

白厅同意不再提此事。

巫师越来越近了。是因为购置了伦敦的房子才使史迈利有了他近在身旁的感觉？巫师好像突然从远方莫斯科的隆冬移过身来，就在这间乱七八糟的屋子里，坐在他的前面，好像就在窗外，站在街上，在大雨中伫候着。但是他知道，这时只有孟德尔在那里给他把风。突然之间，巫师不但会说话，会回答问题，还会自动提出意见。他有时间和你碰头。在伦敦这里碰头？在一幢耗资六万英镑的房子里招待他吃饭，听他汇报，而他却目中无人，开乔治亚人的玩笑？在原来参与巫术计划机密的一些人中间，又出现了一小群知道的人，这些少数人又是谁？

这时有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上台了，一个叫JPR的人，他是新请来参加白厅的巫术鉴定班子的。史迈利参考一下名单，确定他名叫李博尔，外交部研究司人员。李博尔表示他感到迷惑不解。

李博尔致亚得里亚海工作组：“敬请注意日期上的明显差错。巫术第一〇四号报告（苏法谈判联合制造飞机问题）日期为四月二十一日。根据所附的备忘录，巫师是在谈判双方同意秘密交换照会后那天从马尔科夫将军那里直接获此情报的。但据我驻巴黎使馆资料，四月二十一日那天马尔科夫仍身在巴黎，而根据第一〇九号报告，那天巫师本人却在列宁格勒郊外参观一个导弹研究中心……”

这份备忘录所举的这样的“差错”，不少于四项，这说明巫师不愧是个巫师，竟有分身术。

李博尔所得到的结果是叫他别多管闲事。但是阿勒莱恩在另外一份致大臣的备忘录中承认有此差错，这对巫术计划的性质，让人有了完全新的看法。

“极机密。我们谈了话。你已了解巫师不是一个来源，而是好几个来源。我们为了保密的原因，尽量不让你的读者了解这一事实，且仅以资料数量之多这一点而言，要再继续维持此一虚构，已越来越困难。现在

是否可以公开此事，至少在人数有限的范围内？同样也不妨告知财政部，巫师每月一万瑞士法郎的薪水和同额的活动费并不过多，因为此款需要再分给许多人。”

但是这个备忘录结束时，口气就不大客气了：“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同意信息公开，我仍认为伦敦房子及其用途绝不能让不必要的人知道。一旦巫师不止一人的这个事实为我们的读者所知，在伦敦的活动就加倍困难了。”

史迈利感到完全坠入五里雾中，他把这份备忘录又读了好几遍。接着，好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似的，他抬起头来，一脸困惑。他在专心致志地想着事情，因此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好几次他才听到。他拿起话筒时，看了一下表，下午六点，他才看了一个小时的文件。

“巴拉克劳夫先生？我是财务部门的洛夫豪斯。”

这是彼得·吉勒姆用约定的暗号要求紧急碰头，他的声音颤抖。

圆场的档案室从大门是无法进入的。档案都放在大楼后面许多阴暗的屋子里和小楼梯旁，有些像旧书店在那里摆了书摊，不像一个大机关有组织的部门。入口在查令十字街一家画框店和一家24小时营业而圆场职员不许光顾的餐厅里的一道小门。门上的一块招牌写着“城乡语言学校，非教职员请勿入内”。另一块招牌是“C&L经销公司”。你要进去得按一下门铃，便有一个有点娘娘腔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阿尔温来开门。他说话只有一个话题：周末。星期三以前，他说的是上一个周末，过了星期三，他说的便是就要到来的周末。今天早上，是星期二，他的心情很不好。

“你说，这场暴风雨有多厉害？”他一边把签名簿推过柜台让吉勒姆签名，一边问道，“还不如住在灯塔里。刮了整整两天，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们住的地方是伦敦中心，但是你听听这风声。’要我替你看管这个吗？”

“你应该到我住的地方去，”吉勒姆说，把棕色帆布袋交到阿尔温伸出的手里，“你说听听风声。在我那里，你连站都站不住。”

别太讨好他。他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不过我还是喜欢乡下，”阿尔温说他的心里话，一边把帆布袋存放在柜台下面，“要牌子吗？我应该给你一块，要不然道尔芬知道了就会要我的命。”

“我信任你。”吉勒姆说。他爬上四级台阶，推开弹簧门，到了阅览室。阅览室像个临时凑成的讲堂：十几张办公桌都朝一个方向放，讲台上坐着档案管理员。吉勒姆在后排占了一张桌子。时间尚早，他的表是十点十分，另外一个惟一的阅览者是研究组的班恩·瑟鲁克斯顿，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很久以前，他伪装成一个拉脱维亚的异议派，和其他一些异议派在莫斯科街头游行，高呼打倒压迫者的口号。如今他趴在一堆文件前面，一动不动，一头白发，很像一个年老的教士。

档案管理员看到吉勒姆站在她的桌前，就向他露出笑容。吉勒姆在布里克斯顿无趣时常常到这里来消磨时日，从旧档案里寻找有没有值得再搞的案件。管理员叫莎尔，是个胖乎乎喜欢运动的小姐，她在契斯维克办了一个青年俱乐部，是个柔道黑带高手。

“这个周末折断什么人的脖子了吗？”他一边拿过来一叠绿色的借条，一边问。

莎尔从铁柜里取出代他保管的笔记交给他。

“折断了两个。你呢？”

“到什罗普郡探望姑姑去了，谢谢你。”

“真是了不起的姑姑。”莎尔说。

他在她桌边填了他要借阅两份档案的借条。他看着她盖了戳章，撕下复写的那两张，塞在她桌上的一个窄长小孔里。

“第四走道，”她把上面的正页还给他，一边轻声说，“二十八号在右手边中间，三十一号在下一个小间里。”

他推开另外一头的门，就到了大厅里。大厅中央有个像是矿工用的旧电梯，把档案送到上面圆场的主楼。两个眼光昏花的员工不断送档案进去，另外一个站在旁边操纵机器。吉勒姆慢慢地在架子旁边走，一路看着上面荧光的号码卡片。

“拉康一口咬定他根本没有作证计划的档案，”史迈利向他解释，依然是那么忧心忡忡的，“他只有几份关于重新安置普莱多的文件，别的就没有了。”他又用这种阴沉的口气说：“因此，我觉得不管圆场档案室有什么资料，我们都得想办法搞到手。”

在史迈利的辞典里，“搞到手”的意思就是“偷”。

有个小姐站在一把扶梯上。管理员奥斯卡·阿利森在把一些破译组档案放到一个洗衣篮里，修理工阿斯特里德在修暖气机。档案架子是木制的，深得像个床铺，用三合板分成小格。他已经知道作证计划档案编号是4482E，这就是说放在他现在站着的四十四号小间，E代表已结案，只用于已经收场的计划。吉勒姆从左边数到第八层。作证计划应在左边第二格，但没有办法确定，因为档案夹脊上没有标记。他完成了侦察以后，就把他原来要的两份档案抽出来，把绿色的借条留在夹借条的铁夹子里。

“我相信，不会有很多的东西，”史迈利说，好像档案薄一些就容易偷一样，“不过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哪怕是装个样子。”他这一点又是使吉勒姆当时不喜欢他的地方：他说起话来好像你是了解他的推理似的，好像你一直是他肚子裡的蛔虫。

吉勒姆坐下来假装看文件，可是心里一直在想着卡米拉。他打算把她怎么样呢？今天早晨她躺在他的怀里的时候告诉他，她曾经结过一次婚。有时候她说话就是这样，好像她还过着别的人生。那次结婚是个错误，因此他们就吹了。

“什么不对劲？”

“没什么。我们不合适。”

吉勒姆不相信她。

“你离婚了吗？”

“我想是吧。”

“别胡说了，你当然知道究竟离了婚还是没有离婚！”

她说是他父母经手办的，他是外国人。

“他寄钱给你吗？”

“他为什么要寄钱给我？他不欠我什么。”

接着在空房间里又吹起了笛子，晨光熹微之中悠长的调子像提问题一样，吉勒姆在煮咖啡，心里想，她到底是骗子，还是天使？他真有点儿想在档案里调查一下她。再过一小时她就要到桑德那里去上课了。

他带着取阅四十三号小间档案的绿借条，先把手头两份档案放回原处，然后走到作证计划对面的这个小间前面。

“演习平安无事。”他心里想。

那个小姐仍在扶梯上。阿利森已不见了，但洗衣篮仍在那里。暖气机把阿斯特里德累得精疲力竭，他坐在旁边看《太阳报》。绿借条上写的是4343，他马上找到了那份档案，因为他早已认出来了。文件封面是粉红色的，和作证计划一样，而且也同样翻旧了。他把绿借条夹在铁夹子里，穿过走道到对面，又看了一眼阿利森和那些小姐们，然后伸手拿作证计划，把他手中的那份档案很快地放在作证计划的原处。

“彼得，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是史迈利的话——“不要留下空隙。因此我的建议是，你借阅一份厚度相当的档案，我的意思是说外观相当，然后把它放在空出来的地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吉勒姆说。

吉勒姆把档案随便拿在右手，封面朝里，贴着身子一边，回到了阅览室，又坐到他的座位上。莎尔抬了一下眉毛，嘴里说了些什么。吉勒姆点了点头，表示一切顺利，以为她问的就是这个，但是她招手叫他过去。一阵惊慌。把档案带着过去，还是留在桌上？我平时是怎么办的？他把它留在桌上。

“朱丽叶去买咖啡了，”莎尔轻声说，“你要喝一杯吗？”

吉勒姆在柜台上放了一先令。

他看了钟一眼，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天呀，别看你他妈的表了！想一想卡米拉，想一想她开始上课，想一想你周末不去看望的姑姑阿姨，想一想阿尔温会不会检查你的袋子。想什么都行，可别想时间。还得等十八分钟。“彼得，假如你心中稍有顾虑，你就不用去。这并不是很重要。”说得好听！当你的肚子里有像是三十只年轻蝴蝶在交配，你的衬衫里汗如雨下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有顾虑？他咬牙切齿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打开作证计划档案，想定下心来阅读。

这份档案不薄，但也不厚。像史迈利说的一样，看上去很像是一份象征性的档案：第一部分只有一张纸条，说明原来的资料为什么没有收入。“附件一至八号在伦敦站。参看吉姆·埃利斯、吉姆·普莱多、弗拉杰米尔·哈耶克、山姆·科林斯、麦克斯·哈波特的个人档案……”还有托姆·科布莱大叔等等。“欲看这些档案，请询问伦敦站站长或CC。”CC指的是圆

场首长和他指定的一些老妈妈们。别看表，要看钟，做算术，你这个傻瓜！八分钟。偷前任的档案，这事可真新鲜。而且，有吉姆这样的人做你的前任，这事也很少有，他的秘书至今还在替他守灵，但从来不提他的名字。除了他的档案里的工作假名以外，吉勒姆所能找到他惟一存活的痕迹是他办公室保险柜后的网球拍，拍把上还烙有吉姆名字的缩写。他把网球拍给爱伦看，爱伦是个硬心肠的老太太，范霍佛在她面前像个小学生那样害怕，可是看了却泪如雨下，她把球拍包起来，让下一班的传讯员送到管理组去，还亲自写了一封短简给道尔芬，要求把它转给他，“如果人力上办得到的话。”你的锁骨里还留着两颗捷克子弹，近来的你的网球打得怎么样，吉姆？

还有八分钟。

“如果你能办到的话，”史迈利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把你的汽车送到你家附近的车行里去检修一下。当然，要用你家里的电话去约时间，但愿托比正好在偷听……”

但愿！我的天！那么也就听到了我和卡米拉的谈情说爱？还有八分钟。

档案里其余的资料似乎都是外交部的电报、捷克报纸的剪报、布拉格电台广播收听记录、关于被破获间谍的安置就业政策文件摘录、向财政部提出的建议草案，以及阿勒莱恩事后把此次失败诿过于老总的分析。乔治，你应该自己来。

吉勒姆心里开始测量他的桌子与阿尔温在打瞌睡的柜台旁边后门的距离。他估计约有五步远，于是决定找个战术整备点。门边两步远的地方有个像黄色大钢琴的图表柜，里面尽是一些各式各样的参考资料：大地图、过期的《名人录》、以前的旅游指南。他牙缝里咬着一支铅笔，收起作证计划档案，信步走到柜前，挑了一本华沙电话簿，开始在一张纸上写起名字来。我的手！他的心中有个声音叫道：我的手抖得可以，你瞧这纸上写的是是什么，我一定是喝醉了！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朱丽叶端着一个盘子进来，放了一杯咖啡在他桌上。他心不在焉地向她飞了一个吻。他又挑了一本电话簿，大概是波兹南的，放在刚才那一本旁边。阿尔温从门外进来时，他甚至没有抬起头来。

“电话，先生。”他轻声说。

“去他妈的，”吉勒姆仍在查电话簿，“谁打来的？”

“外线，先生。那家伙很粗暴。是车行的人，先生，关于你汽车的事。说他有坏消息要告诉你。”阿尔温说，脸上很高兴。

吉勒姆双手捧着作证计划档案，看来像是在和电话簿核对。他的背对着莎尔，他可以感到双膝在裤管里发抖。铅笔仍咬在牙缝里。阿尔温先走，把弹簧门拉开等他出去，他一边出门，一边仍看着档案，他心里想，像个他妈的唱诗班学生。他等闪电忽然击中他，等莎尔叫杀人哪，等哪个超级特务班恩老头子突然复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感到好

多了：阿尔温是我的盟友，我信任他，我们是联合起来反对道尔芬的，我可以动手了。弹簧门关上了，他走下四层台阶，阿尔温又在那里替他打开电话间的门。电话间的门下半截是木板，上半截是玻璃。他拿起电话听筒时，把档案放在脚下，听到孟德尔告诉他说，他需要安装个新的变速箱，这东西可能要花近百英镑。这话是他们想出来骗管理组的，或者不论哪个读电话记录的人，吉勒姆对答如流地说了一些该说的话，一直等到阿尔温留神地听着回到柜台后面。这办法很灵，他心里想，我真是幸运，这办法居然很灵。他听见自己在说：“那么，你想办法先去找一家大车行，看他们需要多久才有货。你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然后不耐烦地说：“等一等。”

他把门推开一半，歪着脑袋把话筒夹到颈后去，这样这一部分对话就不会录上。“阿尔温，请你把我的袋递给我一下，好不好？”

阿尔温很热心地送了过来，像足球赛场上的急救员一样。“这样行吗，吉勒姆先生？要我帮你打开吗，先生？”

“扔在这里就行了，谢谢你。”

袋子放在电话间门外地板上。他弯下身去，把它拉了进来，打开拉链。袋子中间，就在他的一些衬衫和报纸中间，有三份假档案，一份米黄色，一份绿色，一份粉红色。他取出粉红色的一份和他的地址电话录，换了作证计划放进去。他拉上拉链，站了起来，向孟德尔念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个真的电话号码。他挂了电话以后，把袋子还给阿尔温，拿了那份假档案进了阅览室。他在图表柜前又逗留了一会儿，翻了翻另外两本电话簿，然后拿着那份假档案到档案库里去。阿利森像在演滑稽戏一样，一会儿推，一会儿拉那洗衣篮。

“彼得，你帮我一下怎么样，这给卡住了。”

“马上就来。”

他从作证计划那个小格里把四十三号档案取出来，换了假档案进去，然后把四十三号档案放回到原处，从夹子中取回绿借条。谢天谢地，一切顺利。他可以高声大唱，谢天谢地，我真幸运。

他把绿借条交给莎尔，她签了名，像往常那样插在一个长钉座上，以后再核对。如果档案在原处， she 就把绿借条和复写的那一份都销毁，甚至连聪明过人的莎尔也不记得他曾经到四十四号小间去过。他正要到档案库去帮阿利森，转身忽然与托比·伊斯特哈斯不友善的棕色目光不期而遇。

“彼得，”托比用他不太好的英语说，“我很抱歉要来打扰你，我们发生了一场小危机，潘西·阿勒莱恩想马上跟你说句话。你现在能来吗？那好极了。”在门口，阿尔温让他们出去时，他又用小人得意的煞有介事的口气说：“实际上他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想跟你商量一下。”

吉勒姆在紧急之中忽然灵机一动，他转身对阿尔温说：“中午有传讯员去布里克斯顿。请你打个电话给交通组，叫他们把我的那个袋子送

去，可以吗？”

“可以，先生，”阿尔温说，“没问题。请小心楼梯，先生。”

你还得为我祈祷，吉勒姆心里想。

海顿叫他“咱们的影子外交大臣”。警卫叫他白雪公主，那是因为他的头发。托比·伊斯特哈斯打扮得像个男模，但他一旦松开肩膀或者握紧小拳头，你就不会弄错，他是个好斗的武士。吉勒姆跟着他走在四楼的走廊里，又看到了那个咖啡机，听到劳德·斯屈克兰的说话声，在解释他没有空，这时吉勒姆想：“天呀，我们又回到伯尔尼，又在逃命了。”

他几乎要把这话向托比说出来，但是继而一想，这样比喻是不智的。

他一想到托比，想到的就是八年前在瑞士的托比，当时托比还只是在干无聊的监视勾当，只是附带搞些窃听，倒很有名气。吉勒姆当时刚从北非回来闲着无事，于是圆场把他们两人送到伯尔尼去干桩短期的差使，要侦查一对比利时军火商，因为他们利用瑞士人把他们的货物推销到不友好的敌方。他们在对方房子的隔壁租了一个别墅，头一天晚上，托比整理了一下电话连接线以后，就可以在自己的电话机里窃听那两个比利时人打电话。吉勒姆既是头子，又是跑腿的，一天两次把录音带送到伯尔尼常驻地去，利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当做信箱。托比同样轻而易举地贿赂了当地的邮差，把比利时人的信件先让他过目一遍再递送，又贿赂了打扫屋子的老太太，在那两个比利时人说话最频繁的客厅里，安装了一个无线电的话筒。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契基托餐厅去玩，托比跟最年轻的小姐跳舞。有时他还带一个回家，不过到第二天早上，她早走了，托比早已打开了窗，吹掉了香水味。

他们这样生活了三个月，到最后吉勒姆对他的了解仍和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哪国人。托比是个爱好虚荣的人，他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和现身。他自己洗衣服，晚上上床时在一头白发上戴一个发网。警方搜查别墅那一天，吉勒姆翻后墙逃走，他在贝勒伍饭店找到托比在吃蛋糕，看人家跳茶舞。他听了吉勒姆抱怨的话以后，付了账单，赏了乐队指挥和侍者领班弗朗兹小费，然后才从从容容地领着吉勒姆走过一连串的走廊和楼梯，到了地下车库，他的脱逃汽车和护照就藏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他也一丝不苟地付了他的账单。吉勒姆想，“即使你要急着离开瑞士，你也先得付清账单。”走廊无穷无尽，墙上嵌满镜子，天花板上吊满凡尔赛枝形吊灯，因此吉勒姆跟的不止一个伊斯特哈斯，而是整整一队的伊斯特哈斯。

现在这个景象又浮现在他脑际，虽然通向阿勒莱恩办公室的狭窄木头楼梯漆成灰绿色，只有一张破旧的羊皮灯罩令你想起吊灯。

“我要见首长。”托比煞有介事地对那个年轻的警卫说，他傲然点一下头让他们进去。在接待室里有四架灰色的打字机，打字机前面坐着四个白发老妈妈，个个戴着珍珠，穿着套头毛衣。她们向吉勒姆点点头，却不理托比。阿勒莱恩门上挂着一块“有访客”的牌子。门旁是个六尺高

的崭新大保险柜。吉勒姆心里想，这么沉重，地板怎么吃得消。柜顶上放着几瓶南非雪利酒和酒杯盘碟。他记起来了，今天是星期二，伦敦站举行非正式午餐会的日子。

“告诉他们，我不接电话。”托比开门的时候，阿勒莱恩叫道。

“女士们，首长不接电话，请你们注意。”托比周到地说，一边为吉勒姆拉开门，“我们要开会。”

一位老妈妈说：“我们听到了。”

这是个作战会议。

阿勒莱恩坐在会议桌一头一张自大狂才喜欢坐的雕木椅子上，看着一份总共才两页的文件，吉勒姆进来的时候，他一动也不动。他只是咕噜一声：“坐到那边去。保罗旁边，盐的下面。”又继续专心致志地阅读。

阿勒莱恩右边的椅子空着，吉勒姆从绳子系着的椅垫可以看出这是海顿的。阿勒莱恩的左边坐着罗埃·布兰德，也在阅读，但在吉勒姆经过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说“你好，彼得”，然后他鼓出的灰色眼睛一直看着他走到桌子另一头。比尔的空椅子旁边坐着莫·德拉瓦，她是伦敦站里做点缀的妇女象征，剪了短发，穿一身棕色粗呢套装。她的对面是管理组组长菲尔·波特奥斯，他是一个见人就低头哈腰的有钱人，在郊外有一个大房子。他看到吉勒姆的时候干脆不看文件了，明显地把文件夹合上，把油光光的手放在上面，脸上堆着假笑。

“盐的下面的意思是坐在保罗·斯科尔德诺旁边。”菲尔仍假笑着说。

“谢谢。我知道。”

波特奥斯对面是比尔的两个俄国人，就是上次在四楼男厕见到的尼克·德·西尔斯基和他的男朋友卡斯帕。他们不能有笑容，而且吉勒姆也知道他们也不能阅读文件，因为他们面前没有文件，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文件。他们坐在那里，四只粗壮的手放在桌上，好像他们背后有人用枪对着他们，他们只是用两双褐色的眼睛看着他。

波特奥斯旁边坐着保罗·斯科尔德诺，现在据说是布兰德在附庸国谍报网方面的外勤，尽管有人说他还抽空替比尔跑腿。保罗很瘦，很刁钻，年约四十，褐色脸上有麻点，手臂很长。吉勒姆有一次和他一起在训练所接受硬汉训练时看到他差点把对方给杀了。

吉勒姆把椅子从他身边移开一点坐下来，托比坐在他的另一旁，就像一对保镖的另一个。他们要我干什么？吉勒姆想：纵身逃命吗？大家都在看着阿勒莱恩装烟斗，这时比尔·海顿抢了他的戏。门开时，起先没有人进来。接着一阵窸窣，比尔慢慢地出现了，双手捧着一杯咖啡，还有一个托盘。他的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鼻梁上架着眼镜，由此可见他大概在别的地方看过文件。吉勒姆想，他们都在看文件，只有我没有，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关于什么事。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伊斯特哈斯和罗埃昨

天在看的那个文件，接着他断定没有证据能说明就是那个文件。因为那个文件昨天才到。托比把它带给罗埃，他打扰他们时，正是他们为此感到激动的时候。要是你可以用激动这个词的话。

阿勒莱恩仍没有抬头。吉勒姆坐得这么远，只能看到他的一头黑发和一对穿着粗呢衣服的宽阔肩膀。莫·德拉瓦一边看文件，一边摸着她的刘海。吉勒姆想起来了，潘西有过两个老婆。这时卡米拉又闪过他心事翻腾的脑海。两个都酗酒，这一定能说明一些问题。他只见过伦敦的那个。当时潘西正在组织自己的真正班底，在白金汉宫大厦，他宽敞、镶有嵌板的公寓里举行一次酒会。吉勒姆到得晚了，他在门厅里脱大衣的时候，有个金发女人羞怯地伸手向他走过来。他以为她是来接他大衣的女佣。

“我是乔伊。”她用演戏的嗓子说，就像说“我是德性”、“我是克己”一样。她要的不是他的大衣，而是吻。吉勒姆顺从了她的要求，闻到的是一阵香水和廉价雪利酒的混合味。

“好吧，彼得·吉勒姆老弟，”——阿勒莱恩开始说话了——“你准备好了没有，还是要再打几个电话调查我家的房子？”他稍微抬起头来，吉勒姆注意到久经风霜的双颊都有撮小小的三角形软毛。“你这几天到乡下去干什么？”——他翻了一页——“除了追逐当地的处女——我很怀疑布里克斯顿还有没有处女，莫，请你原谅我说话放肆——把公家的钱浪费在大吃大喝的午餐上？”

这样开玩笑是阿勒莱恩的一种交谈手段，这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恶意的；可以是责怪的，也可以是捧场的，但是到头来，就好像是不断拍打同一个地方。

“有两个阿拉伯人看来很有希望。范霍佛弄到了一个接近德国外交官的线索。如此而已。”

“阿拉伯人，”阿勒莱恩重复了一句，把文件夹推在一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粗糙的烟斗，“随便哪个笨蛋都可以敲诈一个阿拉伯人，是不是，比尔？要是你想干，花半个金币就可以收买整个阿拉伯内阁。”阿勒莱恩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袋烟草，顺手扔在桌上。“我听说你在跟我们可悲的塔尔老弟商量什么事情。他的近况如何？”

吉勒姆听到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的声音时，心里闪过许多念头。他现在弄清楚了，对他公寓的监视是昨晚才开始的。上周末他没有受到怀疑，除非替他把风的法恩是两面受雇的。不过他要那样是很困难的。罗埃·布兰德与已经去世的诗人狄兰·托马斯很像，罗埃总是令他想起什么人，到现在为止，他才能确定到底像谁。莫·德拉瓦有一种女童军的男人气概，仅仅是勉强可以算作一个女人。他心里想，不知狄兰·托马斯有没有罗埃那种特别淡的蓝眼睛。托比·伊斯特哈斯从他金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来，阿勒莱恩只让人家在他面前吸烟斗，不许吸香烟，因此托比现在一定得阿勒莱恩的欢心。比尔·海顿看上去出奇地年轻，圆场流传关于他恋爱生活的谣言毕竟不是完全无稽可笑的：他们说，他两头都来。保罗·

斯科尔德诺一只手的褐色掌心平放在桌上，拇指略为翘起，使得手背用来打人的一面绷得更紧了。他也想到他的帆布袋：阿尔温有没有把它送走？还是他自己下班去吃中饭，把包留在那里，结果引得新来的一心想被擢升的警卫产生好奇，进行翻查？而且吉勒姆心里也不止一次嘀咕过：他在看到托比之前，托比在那里不知待了多久了。

他选择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不错，首长。塔尔和我每天下午在福特纳餐厅喝茶。”

阿勒莱恩吮着没有点燃的烟斗，试试烟草塞得严实不严实。

“彼得·吉勒姆，”他用苏格兰腔一字一句不客气地说，“你可能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不会计较过去的。而且可以说我现在是一心为你好。我要知道的就是你跟塔尔谈些什么。我不要他的脑袋，也不要他身体的任何部位，而且我会克制要亲手掐死他的冲动，或者掐死你的冲动。”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斗，火光猛地一闪，“我甚至想在你的脖子上套一条金链子，把你从那令人讨厌的布里克斯顿带到王宫里去。”

“那样的话，我恨不得他早些露面。”吉勒姆说。

“我没有抓到他以前，他可以得到完全的宽恕。”

“我一定告诉他。他会很高兴的。”

一大团烟滚过了会议桌。

“彼得老弟，我对你很失望。居然轻信那种挑拨离间的谣言。我付给你的薪水不低，你却背后捅我一刀。我觉得，你这样报答我未免忘恩负义。我不妨告诉你，我养你还遭到我一些顾问反对呢。”

阿勒莱恩现在有了一种新的习惯性动作，吉勒姆从爱好虚荣的中年人身上常常可以发现，那就是捏住一块下巴上的肉，用拇指和食指按摩着，想让它变得小一些。

“把塔尔目前的情况再告诉我们一些，”阿勒莱恩说，“把他的感情状况告诉我们。他有个女儿，是不是？一个叫丹妮的小女孩。他提起她没有？”

“他常常提起她。”

“把她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些。”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喜欢她。”

“喜欢得入迷？”他突然生气，声音高了起来，“你耸肩膀干吗？你干吗朝我那样耸肩膀？我现在是在跟你谈你自己组里一个叛逃的混蛋，我控告你背着我跟他玩捉迷藏，你不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却在那里朝我耸肩膀。彼得·吉勒姆，有一条法律禁止与敌方情报员勾结。你也许不知道。我真想狠狠地治你的罪！”

“我最近根本没看到他，”吉勒姆怒气也上来了，这可救了他，“玩捉迷藏的不是我，而是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他一边说，一边感觉到会议桌周围情绪都缓和下来了，好像大家都有点儿感到厌倦，好像大家都觉得阿勒莱恩乱开一阵枪，漫无目标，把子弹都用完了，斯科尔德诺在玩着一块小象牙，那是他带在身边的吉祥符。布兰德又在阅读文件了，比尔·海顿喝一口咖啡，觉得很难喝，向莫·德拉瓦做了个苦脸，放下了杯子。托比·伊斯特哈斯手托着下巴，抬起了眉毛，呆看着维多利亚式壁炉里的红色玻璃纸。只有那两个俄国人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就像一对不愿相信打猎已经结束的猎狗一样。

“那么说，他以前常常同你说起丹妮？他告诉你他爱她？”阿勒莱恩说，又回去看他面前的文件，“丹妮的母亲是谁？”

“一个欧亚混血儿。”

现在海顿开腔了：“一看就知道是亚洲血统呢，还是可以冒充比较纯种的白人？”

“塔尔认为她看上去像个十足的欧洲人。他认为他的孩子也是这样。”

阿勒莱恩大声念：“十二岁，金黄色的长发，眼睛褐色，个子苗条。丹妮是不是这样？”

长时间沉默，甚至海顿也无意打破这沉默。

“因此，如果我告诉你，”阿勒莱恩继续说，用字十分小心，“如果我告诉你，丹妮和她母亲原定要在三天之前从新加坡搭直航飞机到伦敦机场，那么我想你大概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奇怪的。”

“是的，我也会感到奇怪的。”

“你出了这间屋子以后，你也要闭上你的嘴巴。除了你十二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人也不可以透露！”

不远的地方传来菲尔·波特奥斯的咕噜声：“彼得，这个情报来源非常机密。你听来也许像是普通的消息，但并不是这样。这是超机密。”

“那么好吧，我也会把嘴巴封得超紧。”吉勒姆向波特奥斯说。波特奥斯红了脸，比尔·海顿则又露出了小学生的笑容。

阿勒莱恩接着又说：“那么你对这情报有什么看法？说吧，彼得。”——他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吧，你是他的上司、他的向导、他的老师、他的朋友，你的心理学到哪里去啦？塔尔为什么来英国？”

“你刚才说的可不是这个。你刚才说塔尔的女人和她的女儿丹妮原定在三天前到伦敦。也许她是来找亲戚。也许她另外找到了男人。我怎么知道？”

“别傻了，你难道没有想到，小丹妮到了哪里，塔尔本人就会马上跟着到哪里？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到这里——我认为他早已到这里了，一般都是人先到，老婆小孩等的包袱后到。莫·德拉瓦，请原谅我又失言了。”

吉勒姆第二次放手发了一通脾气。“至今为止，我没有想到。至今为止，塔尔是个叛逃分子。这是七个月以前管理组的判决。是不是，菲尔？塔尔现在莫斯科，凡是他所知道的东西，都要假定已经完全泄密了。是不是，菲尔？当初决定布里克斯顿要偃旗息鼓，把我们一部分工作移交给伦敦站，另外一部分移交给托比的点路灯组，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理由。塔尔现在想干什么？再投到我们这边来？”

“说再投过来，这话还算是客气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阿勒莱恩反唇道，一边又低头看他面前的文件，“听我说。不仅要听好，还要记牢。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疑问，你们这伙人都一样，你的记忆像个筛子，你们这些当小头头的都是这样。丹妮和她的母亲用假英国护照旅行，名字改作普尔。这护照是俄国伪造的，第三份给了塔尔本人，有名的普尔先生。塔尔已到了英国，但是我们不知他在哪里。他比丹妮母女先来，走另外一条路线，我们调查结果认为很可能走的是偷渡路线。他叫他老婆——也许是姘头，不管是什么，”——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老婆、姘头他都没有——“原谅我，莫，在他之后一个星期以后来，但现在看来她们显然没有遵照他的指示。我们昨天才得到这个情报，因此我们还有许多跑腿的工作要做。塔尔要她们——丹妮和她的母亲——万一他跟她们联系不上，就去投奔一个叫彼得·吉勒姆的人。我想这就是你吧。”

“要是她们原定三天以前到，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了？”

“耽误了。错过了班机。改变了计划。把飞机票丢了。我怎么知道？”

“要不然就是情报错了。”吉勒姆提示道。

“情报没有错。”阿勒莱恩不客气地反驳。

愤恨，迷惑。吉勒姆死抱住这两条。“那么好吧。俄国人已经使塔尔转向了。他们把他的家眷送来——天晓得为什么，我还以为他们已经把她们留下来当人质呢——而且他们把他也送过来了。那有什么好紧张的？他说的话，我们连一句也不信，他有什么用？”

这一次，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听众都在盯着阿勒莱恩瞧。吉勒姆觉得阿勒莱恩仿佛左右为难，究竟要对这句话作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而泄漏了机密呢，还是让自己出丑。

“别管什么用处！把池水搅浑，在井里放毒，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搞什么乱谁知道？”吉勒姆心里想，他的文件里大概也是这么写的。上面尽是一个接一个的隐喻。“但是这一点你得记住。彼得老弟，你一看见，或在你一看见之前，你一听见他、或者他的女人、或者他的小女儿的消息，你就得马上来找我们这些大哥。在场的随便哪个都可以。别的王八蛋可不行。这条指示你弄清楚了没有？因为这里关系太错综复杂了，或者你根本猜不到有多么复杂，也没有权利知道……”

这场谈话这时突然变成了用动作来进行的谈话了。布兰德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慢吞吞地走到屋子那头的门上靠着。阿勒莱恩又点燃了烟

斗，手臂慢慢摇晃着把火柴挥灭，一边透过烟雾看着吉勒姆。“彼得，这几天你在追求谁？这个幸运的女人是谁？”波特奥斯从桌上递过一张纸来要吉勒姆签名。“请你签字，彼得。”保罗·斯科尔德诺在俄国人耳边轻声说着什么。伊斯特哈斯向门外的老妈妈们发出了不讨人喜欢的命令。只有莫·德拉瓦褐色的谦卑眼光仍盯住吉勒姆看。

“你先看一遍。”波特奥斯油滑地说。

吉勒姆已经看了一半了：“兹证明我今天已获知巫术第三〇八号报告的内容，来源为巫师。”这是第一段。“我保证不将此一报告任何内容泄露给部门其他人员，也不泄露有巫师来源的存在。我并保证一遇有和他的资料相关的任何情况立即报告。”

门仍开着，在吉勒姆签字的时候，伦敦站二楼的人物列队进来，前面是端着三明治盘子的老妈妈们：狄安娜·道尔芬、脸上紧绷得快要爆了的劳德·斯屈克兰、情资分发组的女职员，还有一个叫哈加德的一脸不高兴的老特务，他是班恩·瑟鲁克斯顿的上级。吉勒姆慢慢走出去，心里清点着人头，因为他知道史迈利肯定想知道究竟有谁在场。到门口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海顿也跟着出来了，他似乎觉得剩下来没有什么好戏可瞧了。

“真是愚蠢的一伙。”比尔说，笼统地指了一指那些老妈妈们。“潘西一天比一天令人难以忍受了。”

“看来他的确是那样。”吉勒姆轻快地说。

“史迈利近来好吗？常去看他吗？你以前是他的好朋友，是不是？”

吉勒姆的天地原来一直是稳步转动的，这时突然掉了下去。“哪里，”他说，“他是不许跟我们来往的。”

“我才不信你把这些胡说八道放在心上呢。”比尔反驳道。他们已走到了楼梯口。海顿先下去。

“你呢？”吉勒姆在后面大声说，“你常去见他吗？”

“安恩离开他了，”比尔说，没有理会他的问题，“跟一个水手或是侍者什么的走了。”他的办公室大门洞开，办公桌上堆满了秘密文件。“是不是？”

“我不知道，”吉勒姆说，“可怜的老乔治。”

“喝杯咖啡吗？”

“谢谢你，不过我想该回去了。”

“跟塔尔老弟喝茶去？”

“是啊。到福特纳。再见。”

在档案室里，阿尔温吃过午饭回来了。“袋已经送走了，先生，”他高兴地说，“这时候已到布里克斯顿了。”

“哦，该死的，”吉勒姆发了最后一顿脾气，“里面有我要的东西。”

他忽然很难过地想道：这件事是那么简单明白，怎么这么晚才想到，他只有后悔的份儿。桑德是卡米拉的丈夫。她在过着双重生活。现在他可睁开了眼睛，看清了全部的骗局。他的朋友、他的爱人，甚至圆场本身，都汇合在一起，成了一连串的阴谋。这时他想起了孟德尔的一句话，那是两天以前的一个晚上，他们在郊区一家小酒店里喝啤酒时对他说的：“别不高兴，彼得。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你知道，可是其中就有一个是叛徒。”

塔尔，他心里想。那个婊子养的里基·塔尔。

这个卧室是阁楼上一间长条形的房间，天花板很低，原来是女仆的房间。吉勒姆站在门边，塔尔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脑袋靠着斜屋顶，手撇在两边，手指张开。他的头上有个天窗，从吉勒姆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萨福克深褐色田野，天空上衬着一长列黑色的树梢。褐色的墙纸上有很大的红花。黑色栎木桁梁上吊着一盏灯，照亮了他们两个人的脸，成了奇怪的几何图形，不论是谁移动，不管是床上的塔尔，还是板凳上的史迈利，灯光都像是跟着他们移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吉勒姆要是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会对塔尔不客气，他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脾气已到了要爆发的程度，开车来的时候，车速接近九十英里，史迈利厉声叫他放慢一些。要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会把塔尔狠揍一顿，如果必要的话，叫法恩来帮忙。他一边开车，一边眼前就清楚地展开了这样一个景象：他一推开塔尔——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的房门，就没头没脑地狠揍起他来，把卡米拉和她的前夫、那个杰出的笛子博士给他受的气都出在上面。大概是因为一起出这一次远门，史迈利透过心灵感应也收到了这幅图像，因为他虽然没有说几句话，但句句是为了要叫吉勒姆冷静下来。“彼得，塔尔没有向我们说谎。一句谎话也抓不到。他做的只不过是全世界特务都做的事：那就是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们。另一方面，他也相当聪明。”他不但像吉勒姆那样感到迷惑不解，反而奇怪地很有自信，甚至自满，因为他说了一句斯蒂德·阿斯普莱关于背叛艺术的名言。有点像是不要寻求十全十美，而是要寻找有利条件之类的，这又使吉勒姆想起了卡米拉。“由于卡拉的帮助，我们终于进到内层的圈子里了。”史迈利道。吉勒姆则说了一句在查令十字街车站换车的笨笑话。接着史迈利就只满足于指挥方向和注意后视镜了。

他们是在水晶宫碰头的，在孟德尔驾驶的一辆卡车上碰面。他们开进巴恩斯布莱一家车行，它位于一条小石块铺路的小巷尽头，有不少孩子在玩耍。一个德国老头和他儿子欢迎他们，没有等他们从车上下来，就把车上的牌照卸下，一边把他们带到一辆油漆一新的沃克斯豪尔牌汽车那里，那辆车子已备好了，随时可以由后门开出去。孟德尔留下未走，还带着吉勒姆从布里克斯顿带来的作证计划档案。史迈利说：“找A12号公路。”路上车辆不多，但是不到科尔契斯特，他们就遇到了一些卡车，吉勒姆忽然失去了耐心。史迈利得厉声叫他放慢一些。有一次他们遇到一个老头子在快车道上开二十英里的速度。他们在内侧超车时，他忽然向他们乱冲过来，不知是喝醉了，还是病了，还是只不过是吓昏了。有一次他们开进一道浓雾，它好像是从头顶上掉下来似的。吉勒姆开出来后，又不敢随意踩刹车，因为马路上有融雪结冰。过了科尔契斯特以后，他们改走小道。路标上的名字是小霍克斯莱、华明福特、布尔格林，接着就没有路标了，吉勒姆有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向左转，到了那幢小屋再向左转。能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不过不要停在大门外。”

他们开到了一个小村庄，不过没有灯光，也没有人，没有月亮。他们停下来时，一阵寒气袭来。吉勒姆一下子闻到了板球场、焦木、圣诞节的味道。他想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安静、这么寒冷、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前面出现了教堂的尖顶，一边是白色的篱笆，在斜坡上大概是教士的住宅，房子不高，显得凌乱，一半是茅草顶，他可以看清楚山墙与天空交界的地方。法恩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停车的时候他走了过来，不声不响地爬进了后座。

“里基今天好多了，先生。”他报告说。看样子他这些天向史迈利做了不少报告。他是个稳健的人，说话轻声，很愿意讨好别人，但是布里克斯顿的一帮人似乎都怕他。吉勒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那么紧张了，可以说比较放心了。今天早晨赌了足球赛，他可真喜欢赌足球。今天下午我们给爱尔莎小姐捡柴火，她可以送到市场上去卖。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牌，很早就上床了。”

“他单独出去过吗？”史迈利问。

“没有，先生。”

“他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先生，至少我在的时候没有，至于爱尔莎小姐在的时候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

他们的呼吸使汽车玻璃窗上蒙上一层雾气，但是史迈利不愿发动引擎，因此没法开暖气，也没法开除雾器。

“他说起过他的女儿丹妮吗？”

“上周末他说了好几次。现在似乎对她们淡忘一些了。我想他大概怕动感情，不去想她们了。”

“他没有说起要再见她们吗？”

“没有，先生。”

“没有说起将来没事之后见面的安排吗？”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把她们接到英国来？”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替她们弄证件？”

“没有，先生。”

吉勒姆不耐烦地插进来问：“那么他到底说些什么？”

“那个俄国女人，先生。叫伊琳娜的。他喜欢在没事的时候读她的日记。他说把地鼠逮住以后，他就要中心让地鼠与伊琳娜交换。然后他要

为她找个好房子，先生，就像爱尔莎小姐的房子一样，不过要在苏格兰，那地方更好一些。他说，他也要帮我。要帮我在圆场弄个好差使。他一直鼓励我学一种外语，这样更有前途一些。”

根据从他们身后传来的平板语调，无法知道法恩究竟有没有接受他的劝告。

“他现在在哪里？”

“睡觉了，先生。”

“轻轻地关门。”

爱尔莎·布里姆莱在前廊等他们。她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太太，头发灰白，有一张坚决、聪明的脸。据史迈利说，她是圆场的老人，战时兰斯伯利勋爵手下的译码员，现已退休，但仍精神矍铄。她穿着一套合身的褐色衣裙，握住吉勒姆的手说“您好”，门上门以后，他再回头时她已不在了。史迈利带他们上了楼。法恩留在楼梯拐弯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史迈利敲塔尔的门说：“是史迈利。我要跟你说句话。”

塔尔很快就开了门。他一定是听到他们来了，就在门后等着。他用左手开门，右手握枪，他从史迈利身后望过去，看一看走道里有没有别人。

“就只有吉勒姆。”史迈利说。

“我就是这么说，”塔尔说，“婴儿也能咬人的。”

他们进了屋子。他穿着长裤和马来人身上穿的廉价布衣。地上撒了一地拼字卡片，屋子里有咖喱味道，那是他在煤气炉上自己煮的。

“很抱歉又得来打扰你。”史迈利说，神色之中好像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一定要请你说清楚，你到香港去的时候，带了两份预备逃跑用的瑞士护照，你究竟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塔尔过了一阵之后终于开口。

蜡黄的脸色已消失了，而是久蹲监牢的那种苍白，他的体重也减轻了。他坐在床边，手枪放在身边的枕头上，他的眼光紧张地盯着他们两人，一个挨着一个，谁也不信。

史迈利说：“听着。我相信你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不再来打扰你，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有关你的前途。”

吉勒姆一边瞧着一边心里想，这还有关许多别的事情。要是吉勒姆真的了解史迈利，有关的事情还不知有多少呢。

“我跟你说过，我已经把它们烧掉了。我不喜欢那号码。我想这些号码已被破获。你用这些护照，好比在自己脖子上套上一个标签：‘通缉犯里基·塔尔’。”

史迈利下面的问题提出来的速度奇慢。在这万籁无声的深夜里，等着他慢慢提问题，即使在吉勒姆听来，也是很难熬的。

“你用什么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但是史迈利似乎并不想为自己的问题提出理由，他只是让沉默来解释一切，而且他也许深信这样可以办到。吉勒姆曾经见过这样的盘问：别有深意的问题掩盖在老套的外衣下，在听到回答以后慢慢地记下来，这样拖延时间使得对象的脑海里由于询问者的一个问题而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想坚持原来供词的决心就越来越削弱了。

“你用普尔的名字买那份英国护照的时候，”史迈利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又问，“你有没有从同一来源买别的护照？”

“我为什么要买别的护照？”

但是史迈利不想提供理由。

“我为什么要买？”塔尔又说一遍，“我又不是收集护照的人，我只想离开那里。”

“还要保护你的孩子，”史迈利提示道，脸上露出同情的笑容，“而且如果办得到的话，也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我想对于这一点，你一定考虑过很多，”他用一种讨好的口气说，“毕竟，你不能把她们丢在那里任由那喜欢打听的法国人摆布呀，是不是？”

史迈利在等他答复时，好像在读那拼字卡片，横着读，竖着读。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随便拼成的字。有一个还拼错了，吉勒姆注意到书信一词最后两个字母拼到前面去了。吉勒姆心里想，他在那个旅馆里干什么？跟一些酱料瓶和推销员住在一起，他的心里在追踪些什么线索？

“好吧，”塔尔不高兴地说，“就算我替丹妮和她的母亲弄到了护照。普尔太太，丹妮·普尔小姐。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高兴得大叫大喊？”

又是一片沉默，比提问还厉害。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史迈利问道，口气像是个做父亲的感到失望的口气。“我们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我们并不想加害她们。你为什么告诉我们？你早告诉我们，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帮她们忙。”说完又去看那卡片去了。塔尔大概用了两三盒这样的卡片，在椰子壳纤维织成的地席上铺了一地。“你为什么告诉我们？”他又问，“照顾自己的亲人又不是犯法的事。”

吉勒姆心里想，他们可不会让你照顾自己的亲人呢，他这时心里想的是卡米拉。

为了帮助塔尔答复，史迈利提出了各种的提示：“是因为买护照用的

是你的出差费？你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说实在的，这里谁也不愁钱。你替我们送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我们为什么要斤斤计较两千英镑？”时间又滴答过去，没有人加以利用。

“还是因为，”史迈利提示道，“你感到惭愧？”

吉勒姆竖起了耳朵，忘掉了自己的问题。

“感到惭愧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把被识破了的护照留给丹妮和她母亲，那个法国人到处在打听普尔先生，让她们去受他的摆布，这可太不妙了，是不是？而你自已呢，却一路受到优待。为了要封住你的嘴，”史迈利同意道，好像这个理由是塔尔提出来的，不是他提出来的，“或者是为了要收买你为他们效劳，卡拉是会不择手段的，一想到这一点，就叫人心里一凉。”

塔尔脸上的汗珠突然多得不像是汗珠，而是满脸的泪珠，使人不忍卒睹。拼字卡片不再吸引史迈利的兴趣了，他的眼光落在另一个东西上。那是一个玩具，是用火钳一样的两根铁条做的。玩的时候把一个铁球放在上面滚。从滚得越远的下面一个洞里掉下去，得分就越多。

“我想，你没有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理由，也可能是因为你把它们烧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英国护照烧了，而不是把瑞士护照烧了。”

别忙，乔治。吉勒姆心里想，轻轻地走近一步，插在他们两人中间。别着急。

“你知道普尔已被识破了，所以你把为丹妮母女俩买来的普尔的护照烧了，但是你保留了自己的护照，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然后你用普尔的名字为她们俩买飞机票，为的是让大家相信你不知道普尔的护照已没有用了。所谓大家，我是指卡拉的爪牙。你以为不会有人注意到号码，就改窜了瑞士护照，一份给丹妮，一份给她母亲，然后你作了不同的安排，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安排早在你打算用普尔的护照之前就想好了。那是什么呢？比如留在东方，但换个地方，比如雅加达，你有朋友的地方。”

即使站在吉勒姆现在站的地方，他也太迟了。塔尔的手掐住了史迈利的脖子，把椅子打翻在地，塔尔一起翻了下去。吉勒姆从人堆中找到了塔尔的右臂，拧到他背后来，几乎要把它折断了。法恩不知从哪里出现，从枕头上拿起手枪，朝塔尔过去，好像是要帮他一手似的。这时史迈利整了整衣服，塔尔又回到床上，用手帕拭着嘴角。

史迈利说：“我不知道她们在哪里。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加害她们。你相信吧？”

塔尔盯着他看，等着。他的眼睛露出怒火，但是等到落在史迈利身上时，却是一种安详的眼光，吉勒姆猜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得到了心中一直在想望的保证。

“你还是留神你自己的混账女人吧，别管我的。”塔尔轻声说，他的

手抿着嘴巴。吉勒姆惊呼一声，跳了上去，但是史迈利拦住了他。

“只要你不跟她们联络，”史迈利继续说，“我不知道最好。除非你有什么事情要我替她们办。钱啰，保护啰，或者别的事情啰？”

塔尔摇摇头。他的嘴角流着血，很多的血，这时吉勒姆才明白法恩一定狠狠揍了他，但是他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揍他的。

“不会太久，”史迈利说，“可能一个星期。如果我能办得到，还可能更短一些。别去多想她们了。”

他们走的时候，塔尔又在微笑了，因此吉勒姆想，他们这次来看他，还有他对史迈利的侮辱，脸上吃的一拳，都对他有好处。

“他的那些足球赛赌票，”他们上车的时候，史迈利安详地问法恩，“你没有替他寄到什么地方去吧？”

“没有，先生。”

“那么好，但愿他没有赢。”史迈利用极不常见的轻快口气说，大家都笑了。

精疲力竭、负担过重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很奇怪的记忆。吉勒姆开着车，他的心一半用在公路上，一半仍可怜地在反复怀疑着卡米拉，今天和其他日子里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印象，不断地闪现在他的记忆之中。那些日子有在摩洛哥令人胆战心惊的日子：他的间谍网一个个被破获，楼梯上一有脚步声他就马上到窗口去检查街上的动静。还有在布里克斯顿闲着无事的日子：眼看着这个可怜的世界在他眼前滑过，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到这个世界去。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的书面报告，那是用蜡纸刻印在一张蓝色的薄纸上的，因为是交换来的，所以来源不详，可能并不可靠。现在这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好像有一尺高出现在他面前：

据最近从卢比安卡监狱获释的一个人说，莫斯科中心七月间在狱内曾经举行了一次秘密处决。被处决的是里面的三个干部。其中一个女人。三人都是颈后中枪毙命。

“上面打着‘内部’的戳章。”吉勒姆迟钝地说。他们在一个挂着彩色灯泡的路边酒店旁的一条小巷停了车。“伦敦站的人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有谁能认尸吗？”

吉勒姆借着彩色灯泡的光线，看到史迈利的脸厌恶地皱了起来。

“是啊，”他终于同意道，“是啊，那个女人是伊琳娜，是不是？另外两个我想是伊夫洛夫和她的丈夫鲍里斯。”他的口气仍旧不露声色。“不能让塔尔知道，”他继续说，好像是要打起精神来，“绝不能让他得到什么风声。要是他知道伊琳娜已经死掉了，谁知道他会干什么，或者不愿干什么。”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动。也许原因不同，不过这时谁都没有力气动，也许没有心思动。

“我该去打电话。”史迈利说，不过他并没有起身。

“乔治？”

“我有个电话要去打，”史迈利喃喃地说，“拉康。”

“那么去打吧。”

吉勒姆从他身上伸过手去，替他开了车门。史迈利爬了出去，在柏油路上走了一段，又似乎改变了主意回来了。

“一起来吃一点东西吧，”他在车窗旁说，仍旧有些担心的样子，“我想托比的人总不至于盯着我们到这里来吧？”

这原来是一家餐馆，现在成了一家路边酒店，装饰仍很华丽。菜单用红皮封面订起来，满是油渍。送菜单来的侍者好像还没睡醒。

“我听说红酒烩鸡不错的。”史迈利从屋角电话间里出来，回到座位上以后，开句玩笑说。接着他用很轻的声音说：“告诉我，关于卡拉，你知道些什么？”这话在屋子里没有引起回响。

“我所知道的不多，并不比我知道巫术、巫师来源和我为波特奥斯签字的那张纸上的东西多。”

“事实上，这是个很好的回答。你是想责怪我，但结果却是，这个类比很恰当。”侍者又来了，拿着一瓶勃艮第酒，像捏着一根棍子一样。“让酒醒一下。”

侍者看着史迈利，好像他疯了一样。

“打开瓶盖，放在桌上。”吉勒姆干脆道。

史迈利后来说的还不是全部情况，吉勒姆注意到了一些脱节的地方，但是足够让他提起精神来，使他不再意气消沉了。

“指挥情报员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传奇人物。”史迈利开始道，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训练所给新招的学员上课。“他们这样做，第一个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报员钦佩他们。而后他们会想在同事身上也这样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结果没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数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这样试一下。这些人都是卖狗皮膏药的，得马上除掉，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传奇人物还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龄也是一个谜。很可能卡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几十年情况不明，也许永远搞不清楚了，因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缄口不言。

“有人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沙皇的特务机关待过，后来转到了苏联秘密警察委员会。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还有人说，他曾在东方对抗日本占领军的装甲列车上当过厨师助手。据说他是从伯格那里学到他的本领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这等于是说由……随便说哪个伟大的作曲家，教他音乐。就我所知，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至少这是有档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伪装成一个白俄新闻记者，收罗了一批德国情报员。这件工作非常复杂，由一个年轻人来担任更是突出。接着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担任科涅夫手下的谍报官，在苏联反攻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出现。他的任务是指挥敌后游击队。他发现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转了向，向敌人发送军情。他又把他转了过来，从此以后就搞起无线电来，从四面八方收情报。”

史迈利说，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耶尔尼亚，由于卡拉的捉弄，德军向自己的前线开炮。

“在这两次露面之间，”他继续说，“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间，卡拉来过英国，我们估计他来了六个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那是说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名字或什么掩护。这并不是说杰拉德不知道。不过杰拉德不会告诉我们的，至少不会有意告诉我们的。”

史迈利以前从来没有和吉勒姆这样谈过话。他是不喜欢跟人家说心里话或者讲长篇大论的。吉勒姆知道他尽管很爱面子，却是个羞怯的人，不擅交际。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为国效劳了大半生以后，卡拉坐了一段时期的监牢，后来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不是因为他本人有问题。他所属的红军那个谍报单位正好遭到整肃，不再存在。”

史迈利继续说，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他复了职，便去了美国。这一点所以敢肯定，是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刚从加州飞到德里，印度当局就以移民手续不周的含糊其辞的罪名逮捕他。圆场后来传说他与英

国和美国的大叛国案有关。

史迈利了解到的情况却更可靠：“卡拉又失宠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们当时认为也许能够说服他倒戈过来。因此我坐飞机去德里。想跟他谈一谈。”

那个满面倦怠的侍者俯身过来问他们吃得满意不满意，故事就中断了一会儿。史迈利极其客气地向他保证，一切都很好。

“我与卡拉会面的经过，”他继续说，“是时势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处于瓦解状态。高级人员整批整批地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整肃，下级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第一个结果就是驻外人员大批叛逃。新加坡、内罗毕、斯德哥尔摩、堪培拉、华盛顿，到处都有，我也记不清哪些地方了，我们不断地从常驻站收到这样的人员，不是什么大鱼，不过是跑腿的、司机、密码员、打字员。我们得有所表示——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行业的通货膨胀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个跑外务的推销员，今天飞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明天飞到一个边境小岗哨，有次甚至飞到海上的一艘船上，收纳叛逃的俄国人。选种、排队、谈判条件、听取汇报，最后加以处理。”

吉勒姆一直看着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灯光下，史迈利的表情除了略带焦虑的专注外，仍声色不露。

“对于那些可信的人，我们拟出了三种合约。如果对方能够接触的机密不多，我们就把他跟别国交换，然后就置于脑后了。当做存货买下来的，你会这么说，就像剥头皮组今天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人派回到俄国去——那是假定此人的叛逃还没有被察觉。或者，要是他的运气好，我们要了他，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让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伦敦作决定，不是我。但是记住这一点，那个时候卡拉，他又自称格茨曼，不过是一个策反者而已。我刚才倒是倒叙他的经历。我不想对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现在得记住这一点，不管我们之间谈过了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谈到什么，我到德里去时所知道的不过是——或者圆场里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有个自称格茨曼的人，已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谍报网头子鲁德涅夫和加州在中心指挥下的一个组织建立了无线电的联系，那个组织过去由于缺乏通讯工具一直闲置着。所知道的就是这一些。格茨曼越过加拿大边境偷运一台发报机进来，在旧金山潜伏了三个星期，训练新的收发人员。这不过是个假定，不过有一大堆试发的电报可以作为证据。”

史迈利解释，莫斯科和加州之间的试报用的是普通密码：“后来有一天莫斯科发来一个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码？”

“正是这样。问题正是在这里。由于鲁德涅夫的密码员一时失察，我们抢先了一步，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我们就是这样得到情报的。命令内容是要格茨曼立即离开旧金山到德里去见塔斯社记者，那人是个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个很有潜力的中国人，需要马上有人指导他怎么办。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他老远从旧金山派到德里，为什么别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后再讲的另一个故事。惟一具体的一点是，格茨曼在德里见到了那个塔斯社记者，那个记者给他一张飞机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不要提出问题。那个命令是鲁德涅夫直接发来的。签的是鲁德涅夫的工作化名。即使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也办得很粗糙。”

塔斯社记者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当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二十四小时。

“他站在那里没有多久，印度当局就应我们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监狱。我记得我们答应印度人把得到的情报结果分一份给他们。我想条件就是这个，”他说，就像有的人会暂时丧失记忆一样，他突然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看着雾气弥漫的屋子那头，“也可能是我们说过，我们用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他们。唉，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那没有关系。”吉勒姆说。

“我要说的是，卡拉一辈子中总算有一次被圆场抢在前头。”史迈利又说下去，他喝了一口酒，做了一个苦脸。“他当时不知道，他刚刚在旧金山建立的谍报网，就在他动身前往德里那一天，被破获得一干二净了。原来老总从破译员那里获得情报后，就马上和美国人做了交易，要他们放过格茨曼，交换条件是把鲁德涅夫在加州的谍报网交给他们处理。格茨曼飞到德里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在我到德里监牢向他兜售——就像老总所说的那样——保险单时，他也还不知道。他的选择是很简单的。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格茨曼的脑袋已经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鲁德涅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抢在前面告发他把旧金山的谍报网给泄露了。这件事在美国报上轰动一时，莫斯科对这样张扬很不高兴。我带了美国报上刊载的逮捕苏联间谍的照片，甚至还有缴获卡拉进口的收发报机和他走之前藏起来的信号计划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闹到报上去，我们不管是谁，都是很恼火的。”

对此，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给孟德尔的作证计划档案。

“总之，卡拉成了俗话所说的冷战孤儿。他原来是出国去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被破获了，他却无家可归——家里比国外更加险恶。我们没有长期逮捕权，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们保护。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旧金山谍报网被破获就行了——从我的公文包中，掏出照片和新闻的剪报来给他瞧——和他稍微说两句鲁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恶意阴谋，然后把结果打电报给沙拉特那些过度疲劳的审讯员，如果运气好的话，周末就可以回伦敦了。我甚至想去订莎德勒·威尔斯剧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是啊，吉勒姆也听说了，一个二十岁的威尔士太阳神，那一个戏剧季里成就非凡的天才，在伦敦风靡已有好几个月。

史迈利又接下去说：“牢里热得要命。牢房中间有一张小铁桌，用铁

环拴在墙上。他们把他双手铐着带了进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他这人很瘦小。我要他们松了他的手铐，他们松了以后，他把手放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手慢慢恢复了血色。这一定很痛苦，但是他没有说话。他在那里已有一个星期了，穿的是一件棉布衬衫，红色的。我不知红色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囚衣。”他喝了一口酒，又做了一个苦脸，随着回忆的再次浮现，他的苦脸又慢慢消失了。

“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深。我很难相信在我前面的这个小个子，就是我们从伊琳娜信中所了解到的那个诡计多端的大师。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遇到过很多次相似的事件，由于长途旅行的劳累，由于——唔，由于家里的事，神经末梢大大地迟钝了。”

吉勒姆自从与他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史迈利谈话中最直接承认安恩不贞的话。

“不知什么缘故，这令人很难过。”他的眼睛仍旧张开着，但是眼光凝视在一个内在的世界上。他的眉头和双颊的皮肤好像由于苦苦思索过去的记忆而拉得很平，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瞒过吉勒姆，能够让他不注意这惟一句承认的话所引起的孤寂感。“我有个理论，不过我认为这个理论有些不道德。”史迈利继续说，不过比刚才轻松一些了。“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定量的怜悯心。如果见到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就滥施怜悯，我们就永远办不成大事。你觉得对不对？”

“卡拉的外貌怎么样？”吉勒姆把他的问题当做是不需答复的，自己另外提了一个问题。

“很慈祥。朴实、慈祥。很像一个神父，在意大利小镇上常常遇到的那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满头银发，目光炯炯，一脸皱纹。也像一个校长，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坚强，在他自己的经历范围以内，可以说很精明，但仍格局不大。除了他的眼光从我们谈话一开始就直愣愣地盯着我以外，没有给我留下别的初步印象。不过这算不上是谈话，因为他一言不发。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声也不吭。而且牢房里热得发臭，我又累得要命。”

史迈利开始吃东西，与其说是胃口，不如说是为了做样子，他勉强地吃了几口以后，又喃喃自语地说下去：“你不吃，厨子会不高兴的。老实说，我对格茨曼有一点成见。我们大家都有成见，我的成见就是针对搞无线电的。根据我的经验，搞无线电的都很讨厌，搞外勤的都不行，他们过分紧张，要他们真正干一些事情，往往靠不住，非常丢人。在我看来，格茨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我这是寻找借口，因为我对他的侦察工作做得不够，”——他犹豫地说——“不够小心、不够谨慎，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不对的。”他突然坚决起来，“不过，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吉勒姆这时感受到一阵异常的愤怒，那是从史迈利苍白嘴唇上的惨淡笑容传染给他的。“去他妈的。”史迈利喃喃自语。

吉勒姆困惑地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我也记得，当时觉得关了七天监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肤泛出灰白色，身上并未流汗。我却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议，那一年我已经提出过好几十次了。不过他可以放心，不会把他送回俄国去当我们的情报员。‘决定权在你手里。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来，我们在合理范围内会给你过体面舒适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与我们的讯问合作，问过了以后，我们就帮助你隐姓埋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给你一笔钱。否则你就回国去，我想他们会把你枪毙，或者送你到集中营。上个月他们把贝科夫、舒尔、穆拉诺夫都送进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姓名呢？’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我就往后一靠，坐在那里，抹掉脸上的汗珠，等待他说‘好吧，谢谢你’。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他的头顶上有一架不会转动的大电扇，使他显得个子更小了，他褐色有笑意的眼睛看着我。双手伸在前面，全是老茧。我记得当时想问问他到底在哪里干过这么多体力劳动。他这么把手伸出来放在桌上，手心朝上，手指有点弯曲，好像仍戴着手铐一样。”

侍者看到史迈利那个姿势以为他要什么东西，便走了过来，史迈利又对他说一切都很好，酒更是特别好，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买来的，于是那个侍者就带着笑容走开，心里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弹了一下。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不安感觉。气温实在叫我受不了。臭气熏天，我记得可以听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铁桌上的啪嗒声。不仅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体木然不动，也开始叫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肯开口，这个我是知道的。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使一个一向受到保密训练，甚至对最亲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开口向敌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监狱当局也许认为，为了对我表示礼貌，在把他带来见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顿。他们叫我放心，他们没有收拾他，但是这谁也说得不准。因此我一开始以为他的沉默是由于受到了惊吓。但是他一动也不动，紧张、出神的一动不动的神情，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我自己心里心潮起伏，像翻了锅一样：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热和旅途劳顿所造成的影响……”

“我可以理解。”吉勒姆轻轻地说。

“你可以理解吗？一个人的坐姿是最富有表情的，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每个人的坐姿视各人的心情而异。有的人摊手摊脚，像拳击手在休息，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侧着一半屁股，有的人一会儿跷腿，一会儿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韧性。但是格茨曼却一点也没有这样。他的姿势是永远不变的，小小的身躯像海岬上的岩石一样，他可以整天那样坐着，岿然不动。而我——”史迈利尴尬地、难为情地笑了一声，又喝一口酒，不过这酒并不比刚才好喝些。“而我却希望手头有什么东西放在我前面，文件、书、报告，什么都行。我觉得我是个安定不下来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当时是那样想的。我觉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气度，也可以说缺少哲学家的气度。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

压力是那么重，我到现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觉得这场冷战的全部重担都落到我的肩膀上来了。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过是疲劳过度，感到不大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

“我告诉你，”他坚持说，又对自己生起气来，“没有人有义务为我做的事道歉。”

“你做了什么啦？”吉勒姆笑一声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出现了冷场，”史迈利接着说下去，不理这个问题，“很难说是格茨曼造成的，因为他反正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经说了我该说的话，我给他看了照片，不过他没反应——也许应该说，他似乎是愿意相信我说的旧金山谍报网已遭破获了。接着我又把这一点那一点重复说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后我把话说完了。坐在那里像一头猪似的汗水直流。随便哪个笨蛋都知道，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应该马上站起来就走人，嘴上说些‘愿不愿意接受，悉听尊便。明天早上再见’等等这类的话，或者‘你现在下去吧，给你一小小时的考虑时间’。”

“结果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说起安恩来了。”他没有让吉勒姆有时间轻声惊叹一声就接着说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没有那么直说。是他的安恩。我猜想他也有一个的。毫无疑问，我一定是糊里糊涂地，心里暗问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想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处在这种情况下，想的是什么呢？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主观的答案：他的女人。这叫以己度人还是设身处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个是适用的。我把自己的处境与他交换了一下，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等于是开始对我自己进行讯问，他根本没有开腔，你能想像得到吗？不错，我当时采取这个办法，是有一些外在迹象作为依据的。他看上去像个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像个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像一辈子过光棍生活的。还有他的护照，上面写着：格茨曼，已婚。我们干这一行的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至少在这些方面把我们的掩护身份说得和实际情况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样想的。我甚至向老总提出，应该认真重视对手的掩护身份。一个人的身份越多，这些身份所要掩盖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岁的人把年龄减去五岁，已婚的自称未婚，没有子女的说自己有两个小孩……或者是，讯问者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不肯开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编造故事的时候能够压抑表达自己爱好的冲动。”

他又岔开了，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归正传。史迈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史迈利。当时不论史迈利到哪里去，他都会跟着他去，寸步不离，留在他的身边，听他把故事讲完。

“我也从美国人的观察报告中知道格茨曼烟不离手，抽的是骆驼牌。我叫人去买几包来——美国人是说‘包’吧？——我还记得把钱给狱警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你瞧，我有这样的印象，格茨曼认为我把

钱交给那个印度人是有象征性的。那时我身上系了一条贴身钱带。我得摸半天才能从一叠钞票中数出一张来。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个第五流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当然不是。也许比尔是。还有潘西。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来，目的是把他打发掉：“可以给我们一些水吗？一壶水，两个杯子？谢谢你。”他又把故事说下去。“这样，我就问起他关于格茨曼太太的事来。”

“我问他：她在哪里？这个问题我真希望在安恩那里有答案。他没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动摇。他两旁都站着一个狱警，和他相比，他们的眼睛颜色淡多了，我说，她一定另有新欢了，因为没有别的路。他没有朋友可以照顾她吗？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办法与她秘密联系？我向他说明，他回莫斯科对她没有什么好处。我听着自己说下去，无法停住。也许我并不想停住。我真的想与安恩分手，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我告诉他，回去是徒劳无益的，对他妻子没有实际好处，不管对什么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会受到大家的排斥，最多他们只会让他在枪毙以前见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可能用人与她交换，你知道我们那时存货很多，有些准备交换回俄国，至于为什么把这些存货都用在这个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对他说，她一定想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己也很有可能与他团聚，她不愿意被枪毙，或者送到西伯利亚去饿死。我真的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因为他的眼光鼓励我。我十分有把握，认为自己已经打动了，找到他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实上当然是我让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碰到了他的痛处。这一点我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好像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样，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阵作呕，哆嗦了一下。当然，我碰到了他的痛处，”史迈利苦笑道，“因为他不久以前还在那里关过。最后，狱警把香烟买来了，一大堆香烟，砰地扔在铁桌子上。我把找回来的钱数清以后，赏了他小费，这样做时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里的神情。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嘲笑的神情，但是说实话，我无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狱警不要我的小费，他大概不喜欢英国人。我打开一包，给格茨曼一根烟。我说：‘抽吧，你是烟瘾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你最喜欢抽的牌子。’我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格茨曼却站了起来，有礼貌地向狱警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里去。”

史迈利慢条斯理地把吃剩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去，上面的油脂已经凝成一片像是合乎时令的白霜。

“他临走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从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那是我的打火机，是安恩送我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我在平常的情况下是绝不会让他拿走的，但这不是平常的情况。我甚至想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这是完全适当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到红衬衫的口袋里，便伸出手让他们戴上手铐。我说：‘你想抽的话，现在就抽一根吧。’我吩咐狱警：‘请你替他点一根烟。’但是他一动不动。我又补充一句：‘除非我们谈妥了，否则就送你上飞机，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看着狱警把

他带出去，然后回到我的旅馆，有人开车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说不出是谁。我不再有什么知觉。我感到又糊涂又难受，这连我自己也不敢承认。我马马虎虎地吃了晚饭，喝多了酒，发了高烧。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梦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来。我尽管头重脚轻，却真的想办法留住他，替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办得到，便使他们夫妇俩团圆，过美满的日子。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脱离战争。我拼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抬头看一眼，带着一种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说的其实是，那天晚上退出战斗的不是格茨曼，而是史迈利。”

“你当时病了。”吉勒姆肯定地说。

“不如说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整晚吃阿司匹林、奎宁，再就是格茨曼夫妇破镜重圆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梦见格茨曼站在窗户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断地对他说，‘留下，别跳，留下。’当然我没有想到我梦见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处境。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我本来应该就此罢手，发电报要求另外派人来接替我的。我本来应该等一等再到监牢里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格茨曼：我需要听到他的回复。八点不到，我就由他们派人护送到监牢里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像一通枪条一样。我第一次觉察到他身上的军人气质，而且我知道他像我一样整晚没有合眼。他没有刮脸，下巴上有一撮白胡子，这使他像个老头子。别的凳子上睡着印度人，由于他的红衬衫和这银白色的胡须，他们在他们中间显得非常白皙。他手中握着安恩的打火机，身边凳子上放着那包香烟，原封未动。我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夜未眠，又立意戒烟，来试一试自己究竟能不能视死如归，不怕坐牢和审讯。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经认定自己是能够办到的。我没有再央求他，”史迈利一直说下去，“怎么哭哭啼啼也不能动摇他。他的飞机于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鼓吹者了，但是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尽量搜索枯肠，把我认为他不该飞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来。你瞧，我以为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比教条高尚的蛛丝马迹，我不知道这其实反映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以为格茨曼最后会被一个同他年龄相同，职业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所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动的。我没有答应给他金钱、女人、高级汽车和廉价的奶油。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用处的。我这时反倒聪明起来，避开不谈他的妻子。我没有向他长篇大论谈什么自由——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西方的善意，何况，这么说当时并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是态度明确的。我采取了同病相怜的方针。‘你瞧，咱们都快成老头子，咱们一辈子都想在对方的制度上找弱点。你能够看穿我们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够看穿你们东方的一套。我相信，对这场倒霉的冷战，咱们俩都已倒足了胃口。现在你的自己人要枪毙你了。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一方与我这边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拼命的东西吗？你瞧，’我说，‘在咱们这一行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前途。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着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里一动——西伯利亚——我碰到了个痛处，‘但现在却不再有什么理想了，是不是？’我要

他只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想过，他和我两人尽管走的路线不同，对于生活，到头来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我的结论在他说来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例如，难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则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只有生活中的具体东西对他才有价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伟的设想只会以新的形式带来旧的苦难，除此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从无谓的枪毙中救出他的性命来，比什么责任感、义务感等等这种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话，更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替他们干了一辈子，如今却为了一个没有犯过的错误，他们竟硬着心肠要把他枪毙，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正确，难道他没有想到应该有所怀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确有些死皮赖脸地央求他。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求他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当时那个时候，他对他所效劳的那个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

现在史迈利可沉默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一点点心理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间谍学也是如此。你可以想像老总是怎么说的。不过我把经过告诉他以后，他还是觉得很好玩。他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弱点。不知为什么缘故，尤其是我的弱点。”他又恢复了就事论事的态度。“结果就是这样。飞机到了以后，我跟他一起上了飞机，一起飞了一段路。当时，还没有全都用喷气机。眼看他就要从我手中滑走了，但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制止他。我已放弃劝说了，但还留在那里，以防万一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宁可死，也不愿答应我的要求，他宁可死，也不愿背叛他所献身的政治制度。我最后见到他是在飞机座舱的窗口中看着我走下舷梯时那没有表情的脸。有两个粗汉，一眼望去就是俄国人，上了飞机，坐在他的背后，我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了。我搭飞机回了国，老总说：‘但愿他们真的把他枪毙了。’说完给我喝了一杯茶恢复精神。是他喝的那种中国货，柠檬花茶之类的东西，他派人到马路转角的杂货店去买的。我是说他过去常常这样。然后他让我去度三个月的假，没有选择余地。他说：‘我喜欢你有怀疑。这说明你站在哪里。但不要死抱住不放，这样你就让人讨厌了。’这是个警告，我听从了。他叫我不要再去做多想美国人了，他对我说，他很少去想他们。”

吉勒姆看着他，等待结果。“但是你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要求道，他的口气使人觉得他对没有听到最后的结果感到失望。“卡拉没有真的想过留下来不走？”

“我敢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史迈利厌恶地说，“我的一举一动完全像个软弱的傻瓜。一个虚弱的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但是尽管如此，我宁可做我那种傻瓜，也不做他那种傻瓜。我敢肯定地说，”史迈利有力地重复说，“不管是我的陈说，还是他自己在莫斯科中心的处境，对他最后都产生不了什么作用。我猜他那一夜通宵未睡，一直在盘算回国以后怎么推翻鲁德涅夫。附带说一句，一个月以后鲁德涅夫被枪决了。卡拉得到了鲁德涅夫的职位，着手恢复他原来的情报员的活动。其

中无疑有杰拉德。现在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很有意思，他在看着我的时候，心里可能一直在想杰拉德。我想他们后来一定好好地嘲笑了一番。”

史迈利说，这件事还造成另一个后果。卡拉吃了旧金山的亏以后，从此以后不再碰非法的无线电传输了。他完全放弃了这玩意儿，不再使用：“使馆的联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外面的，他的手下是不许接近的。而且，他仍保留着安恩的打火机。”

“你的打火机。”吉勒姆纠正他。

“是的，当然是我的。请你告诉我，”侍者拿走他的钱后，他又说，“塔尔说到安恩那句难听的话时，他是不是意有所指的？”

“我想他是意有所指的。”

“谣言已经传到了那样的程度？”史迈利问道，“传到那么远，连塔尔也知道了？”

“是的。”

“究竟是怎么说的？”

“说比尔·海顿是安恩·史迈利的情人。”吉勒姆狠下心说，这是他在报告坏消息的时候给自己的保护，比如：你被破获了，你被撤职了，你快要死了。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谢谢你。”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么，过去和现在是否有一个格茨曼太太呢？”吉勒姆问。

“卡拉曾经在列宁格勒和一位小姐结过婚，那是个大学生。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她自杀了。”

“这样卡拉的确是刀枪不入的，”吉勒姆最后说，“你不能收买他，你无法打败他。”

他们回到了汽车旁。

“我说，刚才我们吃得真贵，”史迈利说，“你觉不觉得侍者敲了我的竹杠？”

但是吉勒姆不想谈论英国蹩脚饭菜的价格。他发动车以后，觉得这一天又仿佛是一场噩梦，莫名的危险和怀疑都搅在一起。

“那么谁是巫师来源呢？”他问道，“如果不是从俄国人那里直接弄到那个情报，阿勒莱恩可能从哪里弄到呢？”

“他是从俄国人那里弄到的，这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俄国人派塔尔——”

“他们没有。塔尔也没有用英国护照，是不是？俄国人弄错了。阿勒莱恩的情报证明，塔尔骗过了他们。这是我们从这场小风波中所得到的

极为重要的情报。”

“那么潘西说什么‘把池水搅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是在说伊琳娜的。”

“还有杰拉德。”史迈利表示同意说。

他们又沉默不语地开着车，他们之间的鸿沟似乎突然不可逾越了。

“你瞧，彼得，我本人并不在那里，”史迈利安静地说，“但是我几乎犹如在那里一样。卡拉对圆场了若指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你也明白。但是有一个最后的死结，我却解不开。虽然我想要解开。如果你要听我讲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卡拉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分子。有一天，如果我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他的善走偏锋就是他完蛋的原因。”

他们到斯特拉福地铁入口时，天在下雨。一堆行人躲在天篷下面。

“彼得，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紧张。”

“三个月没有选择余地？”

“歇一歇再说。”

吉勒姆在史迈利下车后替他关上了车门，忽然感到冲动要向他道声晚安，甚至祝他好运，因此他俯身过去，摇下了车窗，吸一口气开口要叫他。但是这时史迈利已经走了。吉勒姆从来不知道有人能像他那样快消失在人群中的。

那天夜里，艾莱旅馆的巴拉克劳夫先生屋顶天窗里的灯光未熄。乔治·史迈利衣服没换，胡子没刮，仍旧趴在少校的桌上阅读、比较、做摘记、做对照，他专心致志的程度，要是他自己看到了，肯定会令他想起老总在剑桥圆场五楼上的最后几天。他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参考了吉勒姆送来的一直到去年的休假名单和病假名单，把它们跟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的旅行行程、他去莫斯科、他离开伦敦到外地去（那是由特别分局和移民局向外交部汇报的）作一比较，然后又把这些跟巫师提供情报的日期作一比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把巫术报告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收到时显然是热门的话题，一类是被巫师或他的指挥者搁置了一两个月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空当的，例如分析报告、对行政部门重要人物的性格研究、克里姆林宫的流言飞语，这是随时随地都可听到，留在淡季使用的。他把热门话题的报告列表后，把它们的日期写了一张单子，把其余部分都放在一边不用。这时他的情绪可以极为恰当地比作一个凭直觉感到快要得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随时等待合乎逻辑的关联发生。他后来在与孟德尔谈话时说，这仿佛是“把什么都放在一个试管里等着看是否会爆炸”。他说，令他感到最着迷的，是吉勒姆提到阿勒莱恩所说的关于搅浑池水的话，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找卡拉为了要掩饰伊琳娜的信所引起的怀疑，而打上的那个“最后的死结”。

他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初步结果。首先是，巫师提出热门话题的报告时，有几次波里雅科夫正好在伦敦，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正好到国外去很快地走了一遭。其次，今年塔尔在香港遭到奇遇以后的这段重要时期里，波里雅科夫一直在莫斯科述职，商讨紧急的文化事务。接着不久，巫师就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提出了一些最耸动、最热门的资料，其中包括对中心在美国的重要谍报对象的研判。

他往前回溯，又确定反过来也一样，有些报告由于跟最近事件无关，他原先扔在一边的，一般都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述职或休假时发过来的报告。

他终于搞清楚了！

没有爆炸性的泄露，没有电光一闪，没有高呼“我找到了”，没有给吉勒姆或拉康打电话说“史迈利是世界冠军”。只不过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研究过的记录和积累的笔记中，证实了史迈利、吉勒姆、塔尔那一天从各人不同的角度认为很明白不过的一个理论：在地鼠杰拉德和巫师来源之间有着一种不能再否认的相互关系；巫师的多才多艺使他既能充当阿勒莱恩的工具又能成为卡拉的工具。史迈利想，也许应该说做卡拉的情报员？这时他把一条毛巾往肩上一搭，兴高采烈地到走廊那头去痛快地洗个澡。这个阴谋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设想巧妙，不由得令他感到佩服。这个阴谋甚至有个具体的物质存在：在伦敦这里有一幢房子，由财政部出资，花了六万英镑，而且没有疑问，每天许多不走运的纳税人走过这幢房子时，都禁不住要羡慕这所房子，他们以为自己买不起这幢房子，却不知道已经为这幢房子付了钱。他再拿起偷来的作证计划档案时，心境之愉快是多少个月以来所没有的。

女舍监自从看到罗奇一个人在盥洗室以后，一个星期以来都在为他担心。因为那已是宿舍里其他学生都下去吃早饭以后十分钟了，他还穿着睡裤，趴在洗脸台上拼命刷牙。她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的时候，他不敢正视她。她对瑟斯古德说：“这一定是他可怜的父亲，让他苦恼着。”到了星期五，她又说：“你一定要写信给他母亲，说他情绪不太好。”

但是即使是女舍监，尽管有母性的直觉，也还是没有想到病因是单纯的恐惧。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是个孩子呀。但那正是他的过失，可以直接导源于他父母的不慎，也是他今天为了保持表面平静而背着沉重包袱的原因。善于观察的罗奇，用吉姆·普莱多难得称赞的话来说，是“全校最好的观察员”，可是最后却观察过头了，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他愿意牺牲自己手中的一切，金钱、夹着父母照片的皮夹、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只要能够抹掉自从星期日晚上以来一直令他不安的事情。

他发出了信号。星期日晚上，熄灯以后一小时，他东碰西撞地到厕所去，伸出手指来掏喉咙，引起一阵恶心，终于吐了一地。室长本来是应该起来报告说“舍监，罗奇病了”，可是他却睡得像死猪一样。罗奇无可奈何地爬回床去。第二天下午在教员休息室外面的电话间里，他拨了电话，说了一些古怪的话，希望有个老师听见，以为他发疯了。但是没有人理他。他又想把现实与梦境混合起来，希望那件事一半是他空想出来的，但是每天早上他经过大坑时，他总看到吉姆在日光下驼着背，拿着铁锹，他看到他的旧帽檐下的脸，听到他在挖土时吃力的声音。

罗奇本来是不应该到那里去的。这也是他的过失——这个教训是犯了错才得到的。在村子那边上了大提琴课回学校来，他有意走得很慢，有心要在晚祷时迟到，吃瑟斯古德太太的白眼。这时全校都在做礼拜，只有他和吉姆两人除外。他经过教堂的时候，听见他们在唱《赞美诗》，他故意绕远路，这样可以经过大坑，那里吉姆的灯还亮着。罗奇站在他平时站着的地方，看着吉姆的人影在窗帘上慢慢移动。这时灯光突然熄灭了，罗奇有些赞许地想，他今晚提早床上床了，原来这一阵子吉姆常常外出，罗奇不太赞同。他常常在打完橄榄球后，开着阿尔维斯车走了，到罗奇睡着以后才回来。这时，后车的门开了又关上，吉姆手拿着一把铁锹站在菜园里，罗奇大惑不解，不知他在黑夜里挖什么东西。挖蔬菜吃晚饭？吉姆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听着《赞美诗》，接着向四周扫了一眼。眼光向罗奇的方向直挺挺地射过来，不过罗奇在小土墩的阴暗处，看不出来。罗奇甚至想出声叫他，但是由于没有去做礼拜而感到有罪，所以没开口。

最后吉姆开始测量。至少在罗奇看过去觉得是在测量。他没有动手

挖，却跪在菜园一角，把铁锹放在地上，似乎是把它和罗奇看不到的什么东西排成一条线，比如说教堂的尖顶。完了以后，吉姆马上走到铁锹的另一头，用脚跟在地上刨了一个印，然后拿起铁锹，飞快地挖起来。罗奇数着，一共挖了十二下，然后吉姆又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教堂那边一片沉寂，接着是做祷告的声音。吉姆很快地蹲下身去，从地上拿起一包东西，马上塞在他粗呢上衣的前襟里。几秒钟以后，看上去简直快得难以相信，车门又砰地关上了。灯又打开，比尔·罗奇鼓起勇气蹑手蹑脚地走到大坑下面，到距离窗帘遮得不严的车窗不到三尺处，从斜坡上往里窥看。

吉姆站在桌边。身后床铺上放着一堆练习簿、一瓶伏特加酒、一个空杯子。他一定是把这些东西扔到床上腾出位子来的。他拉开了一把折刀，但没有用它。吉姆只要能够办到是从来不用刀子割绳的。那包东西有一尺长，像烟袋一样是黄色的。他打开来，拿出一件用麻袋布包的一把老虎钳一样的东西。但是谁会把老虎钳埋起来呢？哪怕是为了英国制造的最好汽车？螺丝钉和螺丝帽放在另外一个黄色信封里，他把它们撒在桌上，一个个仔细看了一下。不是螺丝钉，是笔盖。也不是笔盖，但已经瞧不见了。

也不是一把老虎钳，也不是扳子，绝不是汽车上用的东西。

罗奇跌跌撞撞地爬到了坡顶。他在小土墩之间朝着车道飞奔，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放慢了脚步，他跑过沙地、水潭、杂乱的深草，深深地吸着夜间的空气，口里扑哧出声，像吉姆一样斜倾着身子，一会儿用左腿使劲，一会儿用右腿使劲，还甩着脑袋增加速度。他没有明确的目标。他的一切明确意识都抛在后头了，只留在那把黑色的手枪和皮套上，留在那看上去是笔盖，但在吉姆把它们一个个放到枪膛里时又变成子弹的东西上。吉姆满是皱纹的脸凑向台灯侧着，脸色苍白，眼睛由于灯光刺眼而有些睁不开。

“乔治，不能引用我的话，”大臣用他悠闲的口气警告说，“不作记录，就不会有麻烦。我有选民要对付。你却没有。奥立弗·拉康也没有，奥立弗是不是？”

史迈利想，他也有美国人爱用助动词的癖好。“好吧，我对这感到很抱歉。”他说。

“如果你有我的选区，你还要感到更加抱歉。”大臣反讥道。

不出所料，为了商定会面的地方，就引起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史迈利向拉康指出，在白厅的大臣办公室见面是不智的，因为那儿随时有圆场的人员进出，不管是送文件的传讯员，还是绕进来谈谈爱尔兰问题的阿勒莱恩。而大臣又拒绝到艾莱旅馆或贝瓦特街去，硬说那里不安全。他最近曾在电视上露过面，自以为容易被人认出来。在来回打了几次电话以后，他们商定借用孟德尔在米切姆的住宅，那是一幢都铎式建筑，只有一侧与隔壁相连，大臣和他崭新的汽车在那里露面，好像一只发肿的手指一样突出。他们三个人，拉康、史迈利、大臣，坐在一间小前厅里，窗上挂着网状窗帘，桌上放着新鲜的鲑鱼三明治，屋子的主人则在楼上替他们把风。在小巷里，孩童们在打听汽车司机是为谁开车的。

大臣的脑袋背后是一列关于养蜂的书。史迈利记起来这是孟德尔的嗜好：凡不是萨里产的蜜蜂，他都称为“异国的”。大臣年纪还轻，他的下颚发黑，好像跟人吵架，被揍了一拳似的，很不体面。他的头顶已经开始秃，有种未老先衰的样子，他一口伊顿腔。“好吧，你们作出了什么决定？”他说话也有点强横霸道。

“首先，我想，不管最近你和美国人进行了什么谈判，现在都得停止了。我指的是你保险柜中那份没有名称的秘密附件，”史迈利说，“也就是谈到进一步利用巫术资料的那一份。”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臣说。

“当然，我很了解是出于什么动机，美国那个单位大，好处多，大家都想以巫术作为交换条件，从那里分到一些好处，这种理由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为什么反对？”大臣问道，好像是在和他的股票经纪人说话。

“如果确实有杰拉德这只地鼠存在。”史迈利开始说道。安恩有一次很得意地说过，她的许多表兄之中只有迈尔斯·塞康比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史迈利第一次觉得她的话是对的。他不仅觉得可笑，而且觉得荒唐。“如果地鼠确实存在，我假定这是我们的共同基础。”他等待着，但没有人否认。他又重复说，“如果地鼠确实存在，那么和美国人搞交易得到双倍好处的，不仅有圆场，而且还有莫斯科中心，因为你从美国人那里买到的东西，经地鼠的手又到他们那里。”

大臣在孟德尔的桌上绝望地拍了一下，在光泽的油漆桌面上留下了一个湿手印。

“天晓得，我真不明白，”他宣称，“那巫术资料是很精彩的！一个月以前它还能为我们从天上摘月亮，如今我们却怕得碰也不敢碰，还说这是俄国人骗我们上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认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话说得回来，我们也曾经不止一次指挥过在俄国的谍报网，按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我们指挥得还不错哩。凡是可以拿出来的，我们尽量把最好的资料给他们。火箭、作战计划。你也是参与过的，”——这话是对拉康说的，拉康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把不要的情报员扔给他们，我们给他们通讯设备，保护他们的传输联系，清除干扰，让他们可以畅通发讯，这样我们自己也可以清楚收听。这就是我们指挥对方——该怎么说？——‘为了知道他们怎样向政委汇报’所付的代价。我知道卡拉如果指挥我们的谍报网，也会为我们这样做的。如果他还考虑到美国市场，他还会做得更多，是不是？”他停了下来，看一眼拉康。“更多，多得多。美国的关系，我是说要是能从美国那里捞到好处，地鼠杰拉德就能爬到首席上来。当然圆场也因此得到好处。要是我是俄国人，如果……如果我能把美国人也收买过来，我是什么代价都肯付给英国人的。”

“谢谢你。”拉康很快说。

大臣走了，他拿了一些三明治到车上去吃。忘记跟孟德尔道别，大概是因为孟德尔不是他的选民。

拉康留了下来。

“你叫我注意有没有普莱多的资料，”他终于说，“我发现，我们确实有一些关于他的文件。”

他解释说，他正好在查阅关于圆场内部保密问题的一些档案，“只是为了要清理办公桌。”他发现一些审查结果报告。其中一份是关于普莱多的。

“你知道，他是完全审查清楚没有问题的，一点嫌疑也没有。不过，”——他的口气有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使史迈利看了他一眼——“我觉得你还是会感兴趣的。有一些关于他在牛津上学时的描述绘声绘色。在那个年龄，咱们谁都有点儿左倾。”

“的确是这样。”

沉默又恢复了，只有孟德尔在楼上轻轻的踱步声打破这沉默。

“你知道，普莱多和海顿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拉康承认道，“这我以前可不知道。”

他忽然急着要走。他在皮包中掏出一个很大的窄白信封来，塞在史迈利的手中，就到白厅这个更加高等的世界中去了。巴拉克劳夫先生则回到艾莱旅馆去，继续阅读他的作证计划档案。

第二天午饭时分。史迈利只睡了很短一觉，又起来阅读，然后洗了一个澡，等到他爬上伦敦那幢漂亮房子的台阶时，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喜欢山姆。

那幢房子是用褐色的砖头砌的，乔治王时代的式样，就在格罗斯凡诺广场附近。台阶一共五级，扇贝形的小框里有个黄铜门铃。门漆成黑色，两边都有门闩。他按了铃，门马上开了。其实他推门进去就是了。他到了一个圆形的门厅里，对面有另外一扇门，站着两个穿黑色衣服的魁梧大汉，他们很像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领座员。在大理石壁炉上有举蹄欲纵的马的雕刻，很像是斯塔布斯的手笔。他脱大衣的时候，两个大汉有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一个带他到圣经桌上签名。

“赫伯顿，”史迈利一边签名一边说，这是山姆记得他的工作假名，“阿德里安·赫伯顿。”

接过他大衣的那个人在内部电话里说了他的名字：“赫伯顿先生，阿德里安·赫伯顿先生。”

“请你稍等一会儿，先生。”桌边的那个人说。没有音乐，史迈利觉得应该有音乐，还应该有喷水池。

“其实我是科林斯先生的朋友，”史迈利说，“不知科林斯先生有没有空。他可能在我等。”

电话边上的那个人轻声说了句“谢谢”，搁下了电话。他把史迈利带到里面的那扇门前，推开了门，一点也没有出声，甚至在丝绒地毯上的摩擦声也没有。

“科林斯先生就在里面，先生，”那人恭敬地轻声说，“请随使用酒，不另收费。”

三间客厅都连成一片，从圆柱和拱顶才可以看出它们不是一间，墙上都有硬木嵌壁。每间屋子里都有一张桌子，第三张在六十英尺以外。灯光照在金色大镜框镶起来的没有意义的水果画和绿呢桌布上。窗帘都遮得很严，桌子只有三分之一坐满，每张有四五个人在赌，都是男人，惟一的声是球在轮盘中的滚撞声，还有筹码的碰击声、赌场管理员的低声说话声。

“原来是阿德里安·赫伯顿，”山姆·科林斯高兴地说，“好久不见。”

“你好，山姆。”史迈利说，他们握了手。

“到我屋里去。”山姆向屋子里惟一个站着的人点点头，那个人是个有高血压的大个儿，面容粗犷，他也点了点头。

“喜欢吗？”山姆在他们走过挂着红绸窗帘的走廊时问他。

“非常豪华。”史迈利客气地说。

“没错，”山姆说，“豪华。就是这样。”他穿着一件晚礼服。他的办公室有爱德华王时代的气派，办公桌面是大理石，雕花的桌腿，但房间本身很小，空气也不流通，史迈利觉得更像是戏院的后台，用剩下的道具布置的。

“他们很可能以后让我也投资，再过一年。他们都是些粗人，但讲义气，你知道。”

“是的。”史迈利说。

“像我们从前那样。”

“这话不错。”

他的身材挺秀，态度轻松，上唇留着一条细细的黑胡子。史迈利一想起他就想起那黑胡子。他大概有五十岁了，在东方待过很长时间，有一次他们想一起绑架一个中国无线电报务员。他的面色和头发都开始发白，但看上去仍像三十五岁的人。他的笑容很热情，态度友善，令人感到可以推心置腹。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好像是在玩牌，他看着史迈利，流露出一种可以说是慈爱的，或者亲情洋溢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喜悦。

他对着桌上一个对讲机说：“哈莱，要是咱们的老朋友过了五，”他说，脸上仍露着笑容，“打个电话给我。否则的话就别作声。我有事和一个石油大王商量。他现在多少了？”

“涨到了三。”一个很粗的声音回答道。史迈利猜想就是那个面容粗犷、血压很高的人。

“那么他还有八可输，”山姆满意地说，“把他留在桌边。捧着。”他关掉了开关，满面笑容。史迈利也还他一笑。

“真的，这种生活真惬意，”山姆对他说，“反正比推销洗衣机要好多了。当然有点古怪，早上十点就穿上晚礼服，让我想起了做外交官当掩护的日子。”史迈利笑了。“信不信由你，我们手段也很正当，”山姆又说，脸上表情不变，“我们全靠数学就搞定。”

“我完全相信。”史迈利说，又是十分客气有礼。

“想听些音乐吗？”

是罐头音乐31，从天花板上发出来的。山姆把声音放得很大，到了他们耳朵能忍受的极限。

“那么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效劳吗？”山姆问道，更笑容可掬了。

“我要和你谈谈吉姆·普莱多中枪那一天晚上的事。你当时是值星官。”

山姆抽一种褐色的香烟，闻起来像雪茄。他点了一支，让烟头着了火以后，看着它熄了下来，变成灰烬。“在写回忆录吗，老兄？”他问

道。

“我们在重新审查这个案件。”

“我们是谁，老兄？”

“我自己，还有拉康在推，大臣在拉。”

“凡有权力必然腐化，但总得有人管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拉康老兄就会勉为其难地爬到上头来。”

“情况没有变化。”史迈利说。

山姆沉思地吸着烟。音乐换成了诺尔·考德的乐句。

“我真的希望——其实是做梦——”山姆在烟雾中说，“总有一天潘西·阿勒莱恩会提着他的破公文包走进这扇门来，想要赌一下。他把全部的秘密选票押在红上，结果输光。”

“记录已经被阉割了，”史迈利说，“现在需要找关系人进行了解，看他们还记得些什么。档案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山姆说。他拨电话要了三明治。“就吃这个，”他解释道，“三明治和烤面包。员工福利之一。”

他在倒咖啡的时候，他们之间桌上的小红灯亮了。

“那个老朋友平了。”低沉的声音说。

“那么开始计数吧。”山姆说，把对讲机关上。

他说得简单精确，像个战士回忆一场战斗，不再计较胜负得失，只是为了要回忆一下。他刚从国外回来，他说，在老挝的万象卧底三年，他到人事组报到后，经过道尔芬的审查通过，当时似乎没有人考虑到怎么安排他，因此他想到法国南部去度一个月的假，这时麦克法迪安，就是那个几乎算是老总私仆的老警卫，在走廊上叫住了他，把他带到老总的办公室里。

“到底是哪一天？”史迈利问。

“十月十九日。”

“星期四那天。”

“星期四那天。我当时想在星期一搭飞机到尼斯去。你当时在柏林。我原想请你喝杯酒，可是那些老妈妈说你有事，我问了行动组，他们告诉我你已到柏林去了。”

“是的，没错。”史迈利简单地说，“老总派我去的。”

他本来还可以加一句：把我支开。当时他也有这种感觉。

“我找比尔，可是比尔也不在。老总派他到乡下什么地方去了。”山姆说，避开史迈利的眼光。

“白跑了一趟，”史迈利喃喃说，“不过他回来了。”

这时山姆朝史迈利不解地看了一眼，但是他对比尔·海顿此行没有再说一句话。

“整个地方像是死了一样。几乎想搭头一班飞机回万象去。”

“是像死了一样。”史迈利承认，心里想：只有巫术是例外。

山姆说，老总看上去好像发烧已有五天了。四周到处是档案，肤色蜡黄，说话时总要停下来用手帕擦一擦额头的汗。山姆说，他一点也不讲平常的寒暄客套话。他没有祝贺他在外三年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也没有提到他当时乱七八糟的私生活，他只说他要山姆代替玛丽·马斯特曼在周末值班，山姆能不能帮忙？

“当然可以，”我说，“你要我当值星官，我就当。”他说他到星期六会把其余情况告诉我。在这以前，我对谁都不能讲。我在大楼里不能给人任何暗示，就是他要我干这件事也不能提。他需要可靠的人在总机房值班，以防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但是这个人得是从下面单位来的，或者像我那样离开总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还得是个老手。”

于是山姆到玛丽·马斯特曼那里去，编了一个倒霉的故事，说什么在下星期去度假以前，赶不走他的房客，能不能代她值班，省了他的旅馆钱？他在星期六上午九点，带着一个外面仍贴着棕榈树旅行的标签的袋子，里面装了牙刷和六罐啤酒，就接过班去。预定由杰夫·阿加特在星期日晚上接他的班。

山姆这时又说到整个大楼死气沉沉。他说，要是在从前，星期六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地区组大都会有人在周末值班，有的甚至还有人值夜班，你到大楼里走一遭，会觉得这个机关是个生气勃勃的机关。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整个大楼好像已经撤空似的，就他后来听说的来看，这是根据老总的命令。二楼有两个破译员在工作，无线电和密码室都有人在工作，不过这些地方反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值班。山姆说，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沉寂。他坐在那里等老总打电话来，但白等了一场。他跟警卫说说笑话，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认为圆场里最闲着无事的的就是他们这帮人了。他查了他们的出勤表，发现有两个打字员和一个值班员签到，人却不在，因此他把警卫长，一个叫梅罗斯的名字记了下来。最后他到楼上去看看老总在不在。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除了麦克法迪安以外，老妈妈们都不在，你也不在，只有老麦克端着茉莉花茶在照顾他。太详细了吧？”

“不，请你继续说下去。你能记得多少细节就说多少。”

“这时老总又揭开了一层秘密的帷幕。不，半层。他说，有人在为他干一桩特殊任务。对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他不断地说这句话：对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不是对白厅，不是对英镑，也不是对鱼价，而是对咱们。即使一切结束以后，我也不能泄露一句话。对你也不行，也不能对比尔，对布兰德，或者对任何其他他人。”

“也不能对阿勒莱恩吗？”

“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潘西的名字。”

“是啊，”史迈利表示同意，“他到后来根本不可能了。”

“我那天晚上应该是把他当做活动总指挥。我自己则是在他和大楼之间发挥隔绝的作用，不管大楼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东西送进来，一个信号，一个电话，不论多么鸡毛蒜皮，我都要等到没有旁人看见的时候，才悄悄地跑上楼去交给老总。不论当时或以后，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老总是在幕后指挥。我无论如何不能打电话或写报告给他，甚至内部电话也不行。这都是实话，乔治。”山姆拿起一块三明治说。

“我完全相信你。”史迈利带着感情说。

如果有电报要发出必须请示老总时，山姆也要替老总挡驾。估计到晚上以前不会有什么事情，即使到晚上也不大可能会有什么事情。至于对警卫和诸如此类的人——这是老总的话——山姆要尽量装得自然，显得很忙。

谈完之后，山姆就回到值班室，叫人去买了一份晚报，开了一罐啤酒，选了一条外线电话，就开始赌起赛马来。肯普顿有场越野赛，他已多年没有去看了。到黄昏时分，他又到处走了一遭，试了一试总档案室所在的那一楼的警报器，十五个里面有三个失灵，到这时，一些警卫都和他变成朋友了。他煮了一个鸡蛋，吃了以后，就上楼去向老麦克要一英镑，还给他带去了一罐啤酒。

“他原先要我在一匹劣马上押一镑钱。我跟他聊了十分钟，回到我的值班室，写了几封信，在电视上看了一场蹩脚电影，就上床了。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第一个电话来了。正好是十一点二十分。接着的十个小时里，电话铃没有断过。我以为电话总机就要在我面前爆炸了。”

“阿卡迪下去了五。”内部对讲机里有人说。

“对不起。”山姆露出惯有的笑容说，把史迈利交给音乐去招待，自己到楼上应付去了。

史迈利独自坐在那里，看着山姆褐色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慢慢燃烧。他等着，山姆没有回来。他不知该不该把烟头捻熄。他想，上班时不准吸烟，这是赌场规矩。

“办妥了。”山姆说。

山姆说，第一个电话是外交部的值班办事员用专线打来的。你可以那么说：在白厅的各机构中，外交部总是独占鳌头，一马当先的。

“路透社伦敦负责人刚才打电话告诉他，布拉格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英国间谍被俄国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了，现在正在追捕同谋犯，外交部对此感不感兴趣？那个值班办事员把这消息转告我们，要我们提供情报。我说这消息听起来不可靠。刚把电话挂断，破译组的迈克·米金打电话来说捷克无线电通讯乱翻了天：一半是密码，但另一半是明码。他不断收到断断续续的报道，说是在布尔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我问究竟

是布拉格还是布尔诺？还是两个地方都有？只有布尔诺。我叫他继续接听，到这时五部电话机都响了。后来我刚要走去，外交部又打来了专线电话。他说，路透社更正了他们的消息，把布拉格改为布尔诺。我关上门以后，觉得这像把一个马蜂窝留在你家客厅一样。我进去的时候，老总站在那里。他听到我上楼来了。顺便问一句，阿勒莱恩后来在楼梯上铺了地毯没有？”

“没有。”史迈利说。他仍不动声色。有一次他听到安恩对海顿说：“乔治像只蜥蜴，他能把体温降低到和周围环境的温度一样。为了适应环境，那样他就不必费劲了。”

“你知道他看你一眼有多快。他看了一眼我的手，看我有没有电报带给他，我真希望我有什么东西带给他，但是我的双手是空空的。我说，‘好像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情了。’我把大致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看了一下手表，我猜想他是在推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我说，‘可以跟我讲个大概吗？’他坐了下来，我看不清他，他只在桌上打开了那盏绿色的台灯。我又说道：‘我需要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你要我否认吗？为什么我不能找个人进来帮忙？’他没有回答。不过，我告诉你，根本找不到什么人，不过我当时不知道，‘我一定得知道大概的情况。’我们可以听到楼下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无线电通讯员在找我。‘你要下去亲自处理这件事吗？’我绕到办公桌那一边去，从散在地上的档案上跨过去，这些档案全都打开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在编一部百科全书呢。有些档案大概还是战前的。他就这样坐在那里。”

山姆弯起手指，把指尖扶着前额，眼睛呆呆地瞪着办公桌。他的另一只手平摊开来，拿着想像中的老总的怀表。“‘叫麦克法迪安替我叫一辆出租车，然后去把史迈利找来。’我问道：‘那么这件事呢？’我等了半天他才回答。‘那是可以赖掉的。’他说，‘两个人用的都是外国护照。目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英国人。’我说，‘他们只说一个人。’接着我又说，‘史迈利在柏林。’反正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因此接着又是两分钟的沉默。‘随便谁都行。都一样。’我应该为他感到难受，但是当时我同情不起来。我得首当其冲，可是我又什么都不知情。麦克法迪安不在，因此我想老总能够自己找到出租车，等我走到楼梯下面时，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像戈登将军在喀土穆一样。值班的那个老太婆把监听到的最新消息像摇旗一样向我摇着，警卫都大声叫我，无线电通讯员拿着一叠电报，电话铃声不绝，不仅是我的电话，而且四楼五六个外线电话都在响。我直奔值班室，把电话都切断了，静下来估量一下局势。监听员——那个婆娘叫什么名字，他妈的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她常常跟道尔芬打桥牌的？”

“帕西尔。莫莉·帕西尔。”

“就是她。只有她说的情况是清楚的。布拉格电台宣布半小时内发布紧急新闻。那是一刻钟以前的事。新闻里要说的是一个西方国家公然侵犯捷克的主权，这是对各国爱好自由的人士的挑衅。除此之外，”山姆苦笑道，“这件事一定会叫人笑掉了大牙。我当然先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后

来又发电报到柏林，要他们找你，马上让你搭飞机回来。我把主要的一些电话号码交给了梅罗斯，要他找个外面的电话，把单子上面的负责人不管是谁想法子找到一个。潘西在苏格兰过周末，出去吃晚饭了。他的厨师给了梅罗斯一个电话号码。他拨了过去，请客的主人来接，说潘西刚走。”

“对不起，”史迈利插进去说，“你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去干什么？”他用食指和拇指拉着他的上唇，弄得仿佛畸形似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面。

“万一你提早从柏林回来了。”山姆说。

“我回来了？”

“没有。”

“那么你跟谁说的话？”

“安恩。”

史迈利说：“现在安恩不在家。你能告诉我你们说些什么吗？”

“我说要找你，她说你在柏林。”

“就这么一些？”

“乔治，你知道当时发生了危机事件。”山姆以警告的语气说。

“因此？”

“我问她是不是知道比尔·海顿在哪里。有急事找他。我猜他正在度假，但可能在她那儿。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是表兄妹。”他又说，“况且，据我了解，他是你们的家庭好友。”

“是啊，他是。她怎么说？”

“不客气地说了一声‘不知道’就挂断了。对不起，乔治。战争毕竟是战争。”

“她的口气怎么样？”史迈利等那句格言在他们之间停留了一会儿以后问。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她很不客气。”

山姆又说，罗埃在利兹大学物色人才，找不到他。

山姆一边打电话，一边顶着全部的风暴。他仿佛犯了侵略古巴的错误一样：“军方嚷嚷捷克坦克在奥地利边境调动，破译组忙得无法应付布尔诺周围的无线电通讯，至于外交部，值班办事员好像患了呓语症和黄热病一样。先是拉康，大臣也是，都来电嚷个不停，到十二点半，我们收到了捷克的新闻讯息，晚了二十分钟，不过也还好。一个名叫吉姆·埃利斯的英国间谍，用捷克假护照在捷克反革命分子的协助下，企图在布尔诺附近森林中绑架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捷克将军，打算把他偷渡至奥地利边境。埃利斯被枪击中，但他们没有说打死了他，其他人正在搜捕

中。我找工作假名索引，找到埃利斯就是吉姆·普莱多。于是我想，老总大概也会这么想：如果吉姆被枪击中，用的又是捷克护照，他们怎么能知道他的工作假名，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他是英国人？这时比尔·海顿来了，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他是在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上看到消息的，就马上赶到圆场来。”

“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史迈利问，微微地皱起眉头，“那一定是很晚了。”

山姆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他说：“一点十五分。”

“那是很晚了，是不是，那时候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还开着吗？”

“这个我可不知道，老兄。”

“比尔待的俱乐部是沙维尔俱乐部吧，是不是？”

“不知道。”山姆固执地说。他喝了几口咖啡。“他的样子真吓人，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我原来总以为他是个性情怪僻的人。那天晚上可不是。没错，他很震惊。在那种情况下谁不会那样呢？他来的时候，知道发生了枪击事件，别的就不知道。等我告诉他中枪的是吉姆时，他的眼光像疯子一般。我还以为他要向我扑过来呢。‘中枪。怎么中枪的？中枪死了吗？’我把报道塞在他手中，他一张接一张看——”

“他难道没有从自动收报机上知道详情？”史迈利轻声问，“我还以为那时消息早已传开了呢：吉姆中了弹。那不是头条新闻吗？”

“那要看他看到的是哪份新闻报道，”山姆耸耸肩说，“反正，他把事情接过手去，到天亮的时候精神已经恢复了一些，可以说恢复了镇静。他告诉外交部不要慌张，他找到托比·伊斯特哈斯，派他去逮了两个捷克间谍，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比尔原来一直没有去找他们麻烦，是打算把他们搞过来派到捷克去的。托比的点路灯的把他们绑了过来，关在沙拉特。然后比尔打电话给捷克驻伦敦的常驻站长，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他们伤了吉姆·普莱多一根寒毛，他就要他好看，叫他成为同行的笑柄。比尔叫他把这话传给他的上司。我觉得好像是大家围在街上看意外事故，只有比尔是医生。他打电话给报界一个朋友，透露给他说，埃利斯是捷克雇用的，和美国有关系，他可以报道这个消息，但不能指明来源。这条消息真的当天上了报。他一有空就到吉姆的房间里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会被头脑机灵的记者发现，猜出埃利斯就是普莱多。我可以说，他干得很干净利落，家属啊什么的都收起来了。”

“没有什么家属。”史迈利说。“我想除了比尔以外。”他低声补充一句。

山姆最后说：“八点钟，潘西·阿勒莱恩来了，他是搭空军专机来的。满脸笑容。我想到比尔此时的心情，觉得潘西这样真不聪明。他问我为什么由我在值班。我就把我告诉玛丽·马斯特曼的原因告诉他：没有地方住。他用我的电话跟大臣约了会见的时间，还在讲话的时候，罗埃·布兰德进来了，大发脾气，其实是喝醉了，他问谁在多管他的闲事，这

等于是指名道姓地骂我。我说，‘老兄，别忘了吉姆。你在这里该可怜可怜他。’但是罗埃贪心不足，喜欢活人，不喜欢死人。我把电话总机移交给他，下楼到萨伏伊吃早饭，看星期日的报纸。他们不但把布拉格电台的消息登了出来，还登了外交部表示不屑否认的声明。”

史迈利最后说：“你后来就去了法国南部？”

“过了两个月愉快的假期。”

“有没有人再问过你——例如，关于老总的事？”

“等我回来以后。你那时已被开除了，老总生病住了院。”山姆的声音低沉了一些，“他没有干什么傻事吧？”

“他接着就死了。后来呢？”

“潘西当了代理首长。他把我叫去，要知道我为什么代替马斯特曼值班，以及我和老总交换了什么情况。我坚持原来的说法，潘西说我撒谎。”

“那么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开除了你？撒谎？”

“酗酒。警卫们总算立了功。他们在值班室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五个啤酒罐，向管理组作了汇报。按规矩是不准在大楼里喝酒的。后来有个纪律委员会判定我犯有纵火焚毁皇家码头的罪名，因此我就失了业。你呢？”

“哦，差不多。我无法让他们相信我没有参与其事。”

“唉，以后你如果要切断谁的喉咙，”山姆从一扇旁门安静地看着外面一条漂亮的小巷，“打个电话给我。”史迈利陷入了沉思。“要是你要赌钱，”山姆又说，“把安恩的漂亮朋友带一个来。”

“山姆，你听我说。比尔那天晚上是在跟安恩睡觉。别忙，你听我说。你打电话给她，她告诉你比尔不在那里。她一挂电话，就把比尔推下床，一小时后，他到了圆场，已知道了捷克发生了枪击事件。要是你把情况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比如说像写张明信片那样只用一言半语，你要说的其实就是这些，是吗？”

“基本上是。”

“但是你打电话给安恩的时候，你没有把捷克的事告诉她——”

“他在去圆场的路上到俱乐部去了一下。”

“要是俱乐部还开着门的话。好吧，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吉姆·普莱多挨了枪？”

在白天的光线下，山姆显得有点老，尽管脸上笑容未退。他好像要说什么话，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似乎很生气，又感到气不起来，接着又没有了表情。“再见，”他说，“但要多加小心。”说完他又退到了他所选择的行业的永恒长夜里了。

那天早上史迈利离开艾莱旅馆到格罗斯凡诺广场去的时候，阳光耀眼，天空蔚蓝。但是在他开着租来的罗孚牌汽车，经过埃奇韦路两旁难看的建筑物时，风停了。天空中又聚起了欲雨的密云，只有柏油路上残余的红光使人想到刚才的阳光。他在圣约翰伍德路停了车，那是在一座新大楼的前院，大楼前有个玻璃入口处，但是他没有从入口进去。他走过一个大型的雕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团乱七八糟的宇宙物体。他在寒冷的毛毛细雨中，走到大楼外面一个往下的楼梯，墙上标着“出口”两字。第一层楼梯是用水磨石砌的，扶手是非洲柚木，一到下面，承包商就偷工减料了。不像刚才豪华，水泥抹得很马虎，空气中有一股堆积很久的垃圾臭味。他的态度小心翼翼的，但不是偷偷摸摸。到了铁门前面，他先停了下来，然后再用双手去推那个长门把，还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要接受什么考验似的。门开了一尺，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停住了。里面一阵怒喝，回音绕梁，像在游泳池里叫喊一样。

“嗨，你怎么不当心点儿？”

史迈利从门缝中挤了进去。门碰在一辆非常光亮的汽车的挡板上，但是史迈利没有去看汽车。车库里面有两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在用水管冲洗一辆放在升降车里的劳斯莱斯汽车。两个人都朝他这边看。

“你为什么不走那边？”还是那个愤怒的声音问道，“你是这里的住户吗？你为什么不要住电梯？这楼梯是消防梯。”

看不清是哪个人在说话，不过不管是哪个，他的斯拉夫口音很重。升降车的灯光在他背后。矮的一个手中拿着水管。

史迈利向前走去，注意不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拿水管的那个人继续工作，可是高个子的那个仍在暗处看着他。他穿着一身白色的工作服，把尖领子翻起，有了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气。他的满头黑发往后梳。

“我不是住户，”史迈利承认，“不过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谈谈我想租个地方的事。我姓卡迈克尔，”他大声解释道，“我在马路那边买了一栋公寓。”

他做出像要掏出一张名片的姿势，好像他的证件比他貌不惊人的外表更能介绍他的身份。“我愿意预付租金，”他答应说，“我愿意签个合约，或者什么的。只要是光明正大的。我可以找个证人，预付租金，只要合理就行。我的车是罗孚汽车。一辆新车。我不想背着公司做生意，我不主张这样。只要合理，我都愿意。我本来想把车开过来，但我不想太冒失。说来好笑，外面那楼梯我不喜欢。它太新了。”

史迈利装出一种啰里啰嗦的样子说明来意，他自始至终像个低声下气的恳求者，站在屋梁上一盏强烈的灯光下，对方可以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这种态度产生了效果。穿白衣的人离开升降车，往嵌在两根铁柱之

间的一个玻璃小房间走去，摆了一下脑袋叫史迈利跟着过去。他一边走，一边拉下他的手套。这是皮手套，手工缝的，很贵。

“你推门得小心点儿，”他仍大声警告说，“你要用电梯，或许得多付几镑。不过你会省得多。”

“麦克斯，我有事跟你谈，”他们一进玻璃小屋，史迈利就说，“单独谈。不在这里。”

麦克斯体格魁梧，脸色苍白，像个少年，但是皮肤却皱得像个老头子。他长得很英俊，眼光很沉着。他身上有一种沉着的神气。

“现在？你要现在谈？”

“到汽车里去。我有辆车子在外面。你从楼梯上去，就可以见到。”

麦克斯把手围在嘴边，向车库那头喊。他比史迈利高过半个脑袋，嗓门像个鼓队队长。史迈利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们俩很可能都是捷克人。那边没有回话，但是麦克斯已在解工作服的纽扣了。

“是关于吉姆·普莱多的事。”史迈利说。

“我知道。”麦克斯说。

他们开车到汉姆斯丹德，坐在崭新的罗孚汽车里，看着孩子们在水塘里敲冰。雨终于停了，也许是因为天冷。

到了外面，麦克斯穿了一身蓝衣服，蓝衬衫，领带也是蓝的，但与别的蓝色稍有区别。各种蓝色深浅不一，这样讲究，他大概花了不少工夫，他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长统靴旁边有拉链。

“我已经不在里面了。他们告诉你了没有？”史迈利问。麦克斯耸耸肩。“我以为他们会告诉你。”史迈利说。

麦克斯直挺挺地坐着。他没有把背靠在椅背上，他太自大了。他没有看史迈利。他的眼光凝视着水塘，凝视着在芦苇丛中嬉戏的孩子们。

“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他说。

“我被撤职了，”史迈利说，“大概跟你是同一个时候。”

麦克斯身子似乎挺了一下，又缩了回去。“太糟糕了，乔治。你现在干什么，偷钱？”

“我不要他们知道，麦克斯。”

“你保密，我也保密。”麦克斯说，他掏出金烟盒来给史迈利一支烟，史迈利谢绝了。

“我要听你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史迈利继续说，“在他们开除我之前我就想弄清楚，但是没有时间。”

“他们就为了这个才开除你？”

“可以这样说。”

“你啥都不知道，唔？”麦克斯说，他的眼光仍冷冷地看着孩子们。

史迈利说得很简单，一边注意麦克斯的反应，生怕他没有听懂。他们本来可以讲德语，但是他知道麦克斯不愿意。因此他讲英语，一边看着麦克斯的脸。

“我一点也不知道，麦克斯。我根本没有参加。事情发生时我在柏林，这事是怎么计划的，什么背景，我都不知道。他们打电报给我，我回到伦敦时已经太迟了。”

“计划，”麦克斯重复说，“是有一些计划的。”他的下巴和面颊突然满布皱纹，眼睛眯细了，不知是在苦笑还是微笑。“那么你现在有的是时间了，乔治？不错，是有一些计划的。”

“吉姆有件特殊任务要完成。他指名要你。”

“是呀。吉姆要麦克斯替他把风。”

“他怎么要到你的？他是不是到阿克顿去，跟托比·伊斯特哈斯说‘托比，我要麦克斯’？他怎么要到你的？”

麦克斯的双手放在膝上。十分整洁而且修长，但是骨节都很粗壮。他一听到伊斯特哈斯的名字，就把双手的掌心合拢，仿佛是个笼子逮到了一只蝴蝶一样。

“什么？”麦克斯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秘密的。”麦克斯说，“吉姆是秘密的，我也是秘密的。跟现在一样。”

“说吧，”史迈利说，“请你说吧。”

麦克斯说起这件事来好像是在说任何普通的事情一样，像是家庭问题、工作问题、爱情问题。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十月中，是的，十月十六日。那时是淡季，他有好几星期没有到国外去了，感到很厌烦。他那天整天都在侦察布鲁姆斯伯里的一幢房子，那是两个中国学生住的，点路灯的打算偷偷地去搜查一下。他正要回阿克顿洗衣店去写报告，吉姆在路上拦下了他，演了一场假装偶然遇到的戏，把他带到水晶宫，他们坐在汽车里谈话，像现在一样，只是说的是捷克话。吉姆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要完成，任务很重大，很秘密，不能让圆场别人知道，甚至连托比·伊斯特哈斯也不能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事。这是最高层交代下来的，很艰巨。麦克斯有兴趣吗？

“我说：‘当然，吉姆。麦克斯有兴趣。’于是他吩咐我：‘请个假。你去找托比，对他说：托比，我的母亲病了，我得请几天假。’我并没有母亲。‘好吧，’我说，‘我去请个假。多久，吉姆？’”

吉姆说，这件事从头到尾不会超过一个周末。他们星期六去，星期天就可以回来了。接着他问麦克斯，目前有没有可用的身份证件，最好

是奥地利的，做小生意的，还有相应的汽车驾驶执照。如果麦克斯在阿克顿没有现成的，吉姆可以在布里克斯顿替他弄一份。

“我说，当然，我有，叫哈特曼·鲁迪，奥地利林茨人，捷克苏台德移民。”

于是麦克斯编了一个他在布拉德福有个女朋友惹了麻烦的故事给托比听，托比训了他十分钟关于英国两性之间的规矩的话。到星期四，吉姆和麦克斯在当时剥头皮组租的一所安全联络站会面，那是在兰伯斯的一个破旧房子里。吉姆随身带了钥匙。吉姆又说了一遍，一共只需三天，在布尔诺郊外跟人偷偷碰个头而已。吉姆带了一张大地图，两人仔细研究了一下。吉姆用捷克人身份旅行，麦克斯用奥地利人身份。他们分两路去布尔诺。吉姆从巴黎飞到布拉格，然后再坐火车。他没有说他自己带的是什么护照，但麦克斯猜是捷克的，因为捷克原来是吉姆的祖国。他见过吉姆用过。麦克斯化名哈特曼·鲁迪，做玻璃和炉子生意。他要从米库洛夫附近开车越过奥地利边境，然后向北驶向布尔诺，中间有充裕的时间，到星期六晚上六点半，才在足球场附近一条小路上与吉姆相会。那天晚上七点有一场盛大的比赛。吉姆跟着人潮走，到小路就上了麦克斯等着的汽车。他们商量好时间，万一碰不上怎么办，还有其他老套的应急措施。麦克斯说，反正，他们对相互的习惯作风都是很了解的。

汽车一出布尔诺，他们就要走比洛维奇公路到克尔蒂尼，朝东折向拉奇斯。在拉奇斯公路上，他们会见到左边停着一辆黑色汽车，很可能是菲亚特汽车。牌照号码头两个是99。开车的在看报。他们就停下来，麦克斯过去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人回答他的医生叫他一次开车不要超过三小时。麦克斯就说是啊，长时间开车对心脏不好。这时那人就会告诉他们把车停在哪里，然后叫他们坐上他的汽车到碰头的地方去。

“你们去见谁，麦克斯？吉姆告诉你没有？”

没有，吉姆说的就只有这些。

麦克斯说，到布尔诺为止，一切都按计划。从米库洛夫出发，他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便衣跟了一阵子，他们每隔十分钟换一个上来，但是他猜这是因为他用的是奥地利汽车牌照，所以不去理会。他很充裕地在下午三四点钟到了布尔诺，为了要把事情装得像样一些，他到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在餐厅里喝了两杯咖啡。有个眼线盯上了他，麦克斯就向他大谈玻璃的生意经，还谈到他在林茨的女朋友跟美国人跑了。吉姆在头一次没有露面，后来一小时后在约好的地方露面。麦克斯以为火车误了点，但是吉姆叫他“慢慢开车”，他就马上知道出了事情。

吉姆告诉他，计划有了变更，现在这样来进行：麦克斯要完全置身事外。他开到约好的地方就先让吉姆下车，然后待在布尔诺一直到星期一上午。他不得和圆场任何一条“贸易”路线接触：不得和阿格拉瓦特谍报网的任何人，不得和柏拉图谍报网的任何人，更不得和布拉格常驻站联系。如果到星期一上午，吉姆没有在旅馆露面，麦克斯就赶紧脱身，

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吉姆露了面，麦克斯的任务就是把吉姆的口信带给老总：口信很简单，可能不超过一个词儿。他到伦敦后就直接去找老总，通过老麦克法迪安约个时间，把口信给老总。明白了吗？如果吉姆没有露面，麦克斯就回去干原来的工作，什么都推说不知道，不论圆场内外都一样。

“吉姆没说为什么改变计划吗？”

“吉姆很担心。”

“是不是他在去跟你见面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我对吉姆说：‘我说，吉姆，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很担心。我来把风，我给你开车，帮你开枪，怕什么？’可是吉姆生了气，我这么说对吗？”

“对。”史迈利说。

他们开到拉奇斯公路上，找到了那辆车停在那里，没有开灯，对着一条田间小径，那是一辆菲亚特车，黑色的，牌照号码头两个数字是99。麦克斯停了车，让吉姆下车。吉姆朝那菲亚特车走过去时，那个开车的把门打开了一道缝，好让车内自动亮灯。他在方向盘上打开一份报纸。

“你能看清他的脸吗？”

“在暗处。”

麦克斯等了一会儿，他们大概在交换暗号，吉姆坐了进去，车就沿着小径开走了，仍没有亮灯。麦克斯回到了布尔诺。他坐在餐厅里喝烈性杜松子酒的时候，听到全城一片隆隆声。他原本以为是从足球场传来的声音，后来才弄清楚是卡车的声音，有个车队从公路上开过来。他问女侍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森林里发生了枪击事件，是反革命分子搞的。他到外面自己的车里，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布拉格的新闻。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还有一位将军被涉及。他猜想到处一定都布置了检查哨，反正吉姆指定他在旅馆里待到星期一上午。

“也许吉姆会送信给我。也许有反抗运动的人会来找我。”

“带来一个词的口信。”史迈利悄悄地说。

“是呀。”

“他没有说是什么词？”

“你疯了？”麦克斯说。这是一句陈述句，也是一句问句。

“一个捷克词，还是英国词，还是德国词？”

麦克斯说，没有口信送来，他根本不想回答疯子的问题。

星期一，他把入境的护照烧了，换了汽车牌照，用了德国的脱逃护照。他不往南走，改为西南方向，丢了汽车，坐长途巴士过境到了弗莱

斯塔特，这是他所知道最安全的一条路线。到了弗莱斯塔特，他喝了一杯酒，找个女人睡了觉，因为他感到糊涂、生气，需要喘喘气。他在星期二晚上到伦敦，尽管吉姆叫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去找老总，但是“那很困难”。他说。

他想打电话，但只能接到老妈妈那儿为止。麦克法迪安不在。他想写信，但想起了吉姆的话，不能让圆场其他人知道。他认为写信太危险。阿克顿洗衣店有人传说老总病了。他想打听住的医院，但打听不出来。

“洗衣店的人知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应该不知道。”

他还在纳闷的时候，管理组叫他去，要看他的哈特曼·鲁迪的护照。麦克斯说他丢了，这确实是相当接近事实的。他为什么不报告？他没有发现。是什么时候丢的？他不知道。他最后见到吉姆·普莱多是什么时候？他记不清了。他被送到了沙拉特的训练所，但是麦克斯觉得很不爽，两三天后，审问组对他感到厌烦了，要不然，就是有人叫他们停止审问。

“我回到阿克顿的洗衣店。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一百英镑，叫我滚蛋。”

水塘边一阵尖叫称好。原来是两个男孩打破了一块冰，水从洞里汩汩地冒出来。

“麦克斯，吉姆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

“你能听到一些传说。流亡者之间总是有谣言流传的。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谁照顾他的，比尔·海顿怎么把他买回来的？”

“流亡者不再跟麦克斯说话了。”

“但是你还是听到了一些，是不是？”

这次是那双白皙的手告诉了他。史迈利看到手指伸开，一只手五根，另外一只手三根，麦克斯还没有说话，他心中已经感到了不好受。

“他们从背后开枪打吉姆。也许吉姆正要逃走，管它的呢？他们把吉姆关进监牢。这对吉姆当然不是滋味。对我的朋友也不是滋味。”他开始数了起来：“普里比尔，”他开始数道，碰了一下大拇指，“布科瓦·米莱克，普里比尔老婆的弟弟。”他弯了一根手指。“还有普里比尔的老婆。”又是一根手指，第三根手指。“科林·吉里，他的妹妹，都死了。这是阿格拉瓦特谍报网。”他换了一只手。“这个谍报网完蛋了以后，柏拉图谍报网也完蛋了。先是拉波丁律师，接着是兰德克朗将军、打字员艾娃·克里格罗娃和汉卡·比罗娃。也都死了。这个代价可不低，乔治，”他把干净的手指举到史迈利的面前，“一个英国人吃了一子弹，这个代价可不低。”他生了气。“你管闲事干什么，乔治？圆场不把捷克放在心上。

盟国不把捷克放在心上。有钱人不会帮穷人逃出监牢！你要知道内情吗？有个词儿Märchen，英文是怎么说的，乔治？”

“神话。”史迈利说。

“对啦，以后请你别再告诉我什么英国人要拯救捷克的神话了！”

“也许这不是吉姆，”史迈利沉默很久以后才说，“也许是别人把谍报网泄了密。不会是吉姆。”

麦克斯已在开车门。“管它的？”他问道。

“麦克斯。”史迈利说。

“别担心，乔治。我没有地方可以出卖你。好吧？”

“好。”

史迈利坐在汽车里，看着他叫一辆出租车。他挥了一挥手，好像叫侍者一样。他把地址告诉那个司机，连看也不看一眼。然后就坐上车走了，腰板仍挺得很直，眼睛望着前方，好像一个国王，不看群众一眼。

出租车消失以后，孟德尔督察长慢慢地从长凳上站起来，一边折着报纸，一边走到罗孚车这边来。

“你很干净，”他说，“背后很干净，良心也很清白。”

但是史迈利没有这么有把握，他把汽车钥匙交给他，自己走向公共汽车站，为了要向西走，先越过了马路。

他的目的地是舰队街底一家摆满了酒桶的酒馆。在别的地段喝午饭前的开胃酒，三点半可能已经晚了一些，但是当史迈利轻轻推门进去时，看到有十几个朦胧的人影从酒吧柜台那边转过头来看他。在角落里一张桌边，坐着杰里·威斯特贝，桌上放着一大杯粉红色的杜松子酒，与塑料假拱顶或墙上的仿冒火枪一样不显眼。

“老兄，”杰里·威斯特贝羞怯地说，声音好像是从地下出来的，“想不到是你。嗨，吉米！”他一手按住史迈利的肩膀，一手打招呼要酒，他的手又粗大又结实，原来杰里曾经在一个乡下板球队担任过守门员。和其他守门员不同的是，杰里个子高大，不过由于放下手准备接球成了习惯，他的肩膀仍旧下垂。他一头黄发已经发白，满脸通红，穿着一件奶油色的绸衬衫，系着一条著名的运动领带。看到史迈利无疑使他很高兴，他满面笑容。

“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他又说，“真是想不到。嗨，你最近在干什么？”他把他一把拉到自己旁边坐下，“晒太阳，睡大觉？嗨——”他急切地问，“喝什么？”

史迈利要了一杯血腥玛丽32。

“这不完全是巧合，杰里。”史迈利承认道。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杰里突然急着要打破沉默。

“你听我说，你的那个老婆好吗？一切都好吗？那才行。我总是说，你们是最美满的一对。”

杰里·威斯特贝自己结过好几次婚，但是没有一次令他感到满意。

“我跟你对换一下，乔治，”他建议道，肩膀向他一撞，“我去跟安恩过日子，每天睡大觉，你来做我的工作，报道女子乒乓球赛。怎么样？”

“干杯。”史迈利好脾气地说。

“说实话，很久没有看到哥儿们和娘儿们了。”杰里尴尬地招认，不知为什么羞红了脸，“去年收到老托比的圣诞节卡片，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想他们把我也给忘了。也不能怪他们，”他用手指弹一弹玻璃杯，“喝得太多了，就是为了这个。他们以为我会嘴快说出来。失去控制。”

“他们不会那样。”史迈利说，两人又沉默不语。

“勇士的钱太多不好。”杰里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喜欢说这句印第安人的笑话，史迈利听了心中一沉。

“来一杯怎么样？”他说。

“怎么样？”杰里说，他们一起喝了酒。

“我读了你的信就马上烧了。”史迈利神色自若轻声地说，“怕你不放

心。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反正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过去了。”

听到这话，杰里的面色涨得发紫。

“因此他们辞退你，不是因为你写了那封信给我，”史迈利仍然轻轻地说，“你可不能那么想。而且，这封信是你亲手交给我的。”

“你很够朋友，”杰里喃喃道，“谢谢你。我本来不应该写的。多管闲事。”

“没有的事。”史迈利说，一边又要了两杯酒，“你是为了圆场好。”

史迈利觉得这样说有点像拉康。但是要与杰里谈话，惟一方式是用杰里的报纸陈述方式：句子要短，说话要快。

杰里吐了几口烟。“最后一个任务，哦，那是一年前，”他又高兴地说起来，“不止一年了。把一个小包裹送到布达佩斯去。其实没有什么。公用电话亭。放在顶上。把手举起。就放在那里了。小孩子的玩意儿。你放心，我没出错。我还先估算了一下。有安全暗号。‘亭空，请用。’你知道，这是他们教我们的。你们这帮子人最了解，是不是？你们是‘猫头鹰’。各干各的，规矩是这样。多的不干。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整体。计划是如此。”

“他们很快就会登门来求你。”史迈利安慰道，“我想他们大概是让你休息一阵子。你知道，他们常常那样做。”

“希望如此。”杰里恭敬地微笑道。他喝酒的时候，酒杯微微发抖。

“你是写信给我前出门的吗？”史迈利问。

“是的。实际上就只是一次，先到布达佩斯，再到布拉格。”

“你是在布拉格听到那消息的？你给我信中说的这个消息？”

在酒吧柜台那里，一个穿黑色衣服、脸色红润的人在预言国家马上就要崩溃。他说，顶多三个月就要完蛋。

“难搞的家伙，托比·伊斯特哈斯。”杰里说。

“但还不错。”史迈利说。

“是啊，老兄，第一流的。很杰出，我的看法。但是难搞，你知道的。怎么样？”他们又喝了酒，杰里·威斯特贝在脑袋后伸出一根手指，假装是印第安人的羽毛。

“问题是，”柜台那边那个脸色红润的人喝一口酒说，“我们根本没有料到。”

他们决定马上去吃饭，因为杰里要给明天的报纸发稿：某个足球前锋在商店扒窃被捕。他们到一家咖喱餐厅，吃饭的时候还供应啤酒。他们商量好，如果碰到什么人，杰里便把史迈利当做他的银行经理介绍给对方，因为这个主意，他在吃那顿满意的饭时，一直很高兴。餐厅里放着背景音乐，杰里称之为蚊子的交配飞行，有时甚至淹没了他的粗嘎嗓子。

的轻声说话。这样也不错。史迈利硬着头皮表示很喜欢吃咖喱。杰里开始时还有点勉强，后来就开始说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老托比不许他报道的那个故事，跟一个叫吉姆·埃利斯的人有关的。

杰里·威斯特贝是个极难得的证人人选。他没有幻想，没有恶意，没有个人意见。他只觉得这事很古怪。他一直不能忘掉这件事，但是说也奇怪，他后来再也没有跟托比谈起过。

“就是这张卡片，你瞧，‘圣诞快乐，托比。’一张雪中街景的图片，是里登霍尔街。”他大惑不解地看着电扇，“里登霍尔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老兄？不是什么间谍窝或者碰头的地方吧？”

“据我所知都不是。”史迈利笑道。

“真不明白他为什么选一张里登霍尔街雪景的圣诞卡。真怪，你说是不是？”

史迈利说，他也许只是想要选一张伦敦的雪景。托比到底在很多方面都保有一点外国习气的。

“我觉得要保持联络，这样未免太古怪了一些。过去总是送我一箱威士忌酒，非常准时。”杰里皱起眉头，喝了一口。“我倒不是在乎威士忌酒，”他迷惑地解释，他的一生常常因为感到迷惑，而没有远景，“我要喝随时可以买。只不过，我人既然在圈子外面，就会把什么都看成是别有用意的，因此礼物也很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是在一年以前，精确地说，是在十二月。杰里·威斯特贝说，布拉格的体育餐厅不是西方记者常去的地方。他们多半在“宇宙”或“国际”，低声谈话，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很提心吊胆。杰里常去的是体育餐厅，在赢了鞑靼队那场比赛后，杰里带守门员霍洛托克去了那里，从此以后，杰里与酒保就有了交情，他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也叫斯坦。

“斯坦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让你觉得好像捷克仍是个自由的国家。”

他解释道，餐厅主要是个酒吧。而在捷克，酒吧就是夜总会，而夜总会就是朗姆酒。史迈利附和说这令人糊涂。

与往常一样，杰里在那里的时候总是竖着耳朵留心听着，毕竟这是捷克，有一两次他居然给托比带回一些片言只语回来，或者替他提供一些人的线索。

“即使听到的不过是外币交易、黑市之类的事，据托比说，都是有用的。一鳞半爪的加起来——反正托比是这样说的。”

很对，史迈利同意，就是这样。

“托比是‘猫头鹰’，是不是？”

“当然。”

“你瞧，我原来是在罗埃·布兰德手下工作。后来罗埃升了官，我就

由托比领导。说实在的，有点令人不安，老是换人。干杯。”

“你那次去以前已替托比工作多久了？”

“一两年，不会更久。”

菜送上来时，他们停止了说话，酒杯又斟满了。杰里·威斯特贝的粗手把一瓶胡椒撒在菜单上最辣的一道菜上，然后又在上面倒了一层猩红的调味料。他说，这调味料是为了要吃起来更辣一些。“那是老厨师特地为我调制的，”他解释道，“放在最下层的架子。”

他继续说下去，那天晚上在斯坦的酒吧里，有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小伙子，挽着一个漂亮的小姐。

“因此我想：小心点儿，杰里，那是当兵的人剃的头发。对不对？”

“对。”史迈利附和他说，心里想，在有些方面，杰里自己也是“猫头鹰”。

原来那小伙子是斯坦的侄子，因为能说英语，感到很得意：“你不知道有人因为能表现自己的外语本领，什么都会告诉你。”他正在休假中，爱上了那个小姐，假期还有八天，人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包括杰里在内。应该说，特别是杰里，因为杰里会付酒钱。

“我们大家都挤着坐在角落里一张大桌子边，有大学生，有漂亮的小姐，什么人都有。老斯坦也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有个小伙子修好了一台录音机。大家都很自在，又是喝酒，又是喧闹。”

杰里解释道，这喧闹声特别重要，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和那个小伙子搭讪，而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小伙子坐在杰里旁边，从一开始就对他有好感。他的一只胳膊搂着他的小姐，一只胳膊搭在杰里肩上。

“他那种小伙子碰到你身上是不会叫你起鸡皮疙瘩的。我一般不喜欢被别人碰。希腊人喜欢那样。我最恨那样。”

史迈利笑着说他也最恨那样。

“说来奇怪，那小姐有点像安恩，”杰里回想道，“狡黠，懂得我的意思吗？像嘉宝33一样的眼睛，很性感。”因此就在大家唱歌、喝酒、玩着接吻游戏的时候，那个小伙子问杰里想不想知道关于吉姆·埃利斯的事件真相。

“我假装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杰里向史迈利解释，“‘很想知道，’我说，‘吉姆·埃利斯是谁呀？’那个小伙子看我一眼，好像我是个傻瓜似的，他说，‘一个英国间谍。’你瞧，谁也没有听到我们说话，大家都在叫啊，喊啊，唱那些快活的歌儿。他的小姐倚在他的怀中，头倚在他的肩上，但是她已半醉了，有些迷迷糊糊的，因此他就一个劲儿地和我说话，因为自己能说英语很得意，你懂吗？”

“我懂。”史迈利说。

“‘英国间谍，’他对着我的耳朵直嚷，‘战时和捷克游击队一起打过

仗。到捷克来自称哈耶克，被俄国秘密警察开枪打中了。’我耸一耸肩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老兄。’不能操之过急，你懂吗？什么时候都不能操之过急，不然会把他们吓跑的。”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史迈利衷心地表示同意，接着就耐心地招架有关安恩的一些问题，以及爱一个人、真心地一辈子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滋味的问题。

据杰里·威斯特贝说，那个小伙子告诉他：“我是征兵入伍的。我要是不入伍，就不能上大学。”十月间，他在布尔诺附近的森林进行基本训练演习。那边森林一直有许多部队驻扎在那里，一到夏天有时整整一个月不对民众开放。单调乏味的步兵操练原来规定要举行两个星期，但是到了第三天就无缘无故取消了，部队奉令开拔回城。命令就是：马上收拾回到营区。整个森林要在天黑以前撤空。

“马上各种谣言就纷纷传开了。”杰里接着说，“有人说，季斯诺夫的弹道研究站被炸了。也有人说，训练营的新兵发生叛变，开枪射杀俄国兵。布拉格又发生暴动，俄国人接管了政府，德国人打了进来，天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当兵的都是那样的。不论在哪里，当兵的都是一样。谣言传来传去，没有个完。”

谈到当兵的，杰里·威斯特贝又不免问起在军中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是史迈利有泛泛之交但后来淡忘了一些人。最后他们又言归正传。

“他们就背起背包，爬上卡车，只等开动了。刚走了半里路，忽然车队又停住了，命令他们开到路边，卡车都得倒退回到树林里，结果陷在泥里，掉在沟里，一片混乱。”

据威斯特贝说，原来是俄国人来了。他们从布尔诺的方向开来，急急忙忙说着，凡是捷克的东西都得撤走，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的话。

“先是有一队摩托车疾驰而来，挥舞着手电筒，开车的人向他们大声嚷嚷。接着来了一辆参谋车，上面坐着穿便服的人，那个小伙子估计一共有六个人。后面是两辆卡车的特别部队，个个都全副武装，脸上涂着迷彩，杀气腾腾的。最后一辆卡车装的都是追捕的警犬。看上去完全是一副要上阵作战的样子。我没有让你厌烦吧，老兄？”

威斯特贝用一块手帕擦一擦脸上的汗，眨着眼睛，好像刚刚苏醒过来的样子。他的绸衬衫也被汗湿透了，像刚洗过淋浴一样。史迈利不喜欢吃咖喱，因此又要了两罐啤酒，把咖喱味冲掉。

“故事的第一部分就是：捷克军队撤了出去，俄国军队开了进来。明白了吗？”

史迈利说，明白了，他心里想，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着了。

但是那小伙子回到布尔诺以后，很快就听说他的部队在这件事中所分配到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除了他们以外，又来了一个车队。第二天晚

上，两个车队就在乡下来来回回地转了十来个小时，没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地。他们向西开到特热比奇，停了下来等待通讯队向总部通报，过了很久才又折向东南，开到奥地利边境上的兹诺伊莫，一边开车，一边收发电报，像疯了一样。谁也不知道走这条路线是奉了谁的命令，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有一次他们还奉命上刺刀，又有一次下车扎营，接着又背起背包重新出发。一路上还碰到其他部队，在布雷拉夫铁路调车场，有坦克在围着转，有一次还有一对自动推进的大炮架在事先铺好的轨道上。不管到什么地方，情况都是一样的：一片混乱，莫名其妙。有的老兵说，谁叫你是捷克人？这是俄国人给你的惩罚。回到布尔诺以后，那小伙子听到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说是俄国人在追捕一个叫哈耶克的英国间谍。他在侦察研究站的时候想绑架一个将军，被俄国人开枪打中了。

“你瞧，因此那个小伙子问，”杰里说，“那个小伙子问他的班长：‘既然哈耶克已经中了弹，咱们为什么还要在乡下乱转，闹得天翻地覆？’班长对他说：‘因为咱们是军队。’全世界的班长都是一样的。你说什么？”

史迈利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刚才说的事情发生在两个晚上，杰里。俄国人开到森林里是哪个晚上？”

杰里·威斯特贝迷惑不解地皱起眉头。“那个小伙子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你知道吗，乔治？他在斯坦的酒馆里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谣言传说的究竟是什么？俄国人是星期五开进去的。他们到星期六才开枪打哈耶克。因此头脑机灵的人就说：你瞧，俄国人早在等哈耶克自投罗网了。知道他会来的。事先知道，预先埋伏。真是不好。对我们的名誉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老总不好，对我们全都不好。来，喝酒？”

“喝酒。”史迈利说，喝了一口啤酒。

“托比也是这么想。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反应不一样。”

“于是你告诉了托比，”史迈利把一大盘开心果递给杰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你反正要去见他，向他报告你已经在布达佩斯替他交货了，于是你把哈耶克的事也告诉了他。”

杰里说，情况正是这样。令他不安的就是这件事，他感到古怪，因此他写信给乔治。“老托比说，这是胡说八道。一下子摆起架子来，很不客气。开头很热情，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干得好。回去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却责备我。说要开紧急会议，却开着车子带我在公园外面兜圈子，大惊小怪，闹得不可开交。说我酒喝多了，糊涂得分不清事实和胡思乱想。这些话真使我有点生气。”

“我想你一定奇怪他还跟谁说过。”史迈利同情地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问道，不过一点也不紧迫，好像只是为了要把事情弄清楚而已。

“说这很可能是捏造出来骗我的。那个小伙子是有意来煽动我的。分

化离间，让圆场怀疑自己人。怪我散布谣言。乔治，我就对他说：‘托比，老兄，我只是向你报告，老兄。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昨天你还说我好得不得了。用不着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骂送信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情报不对，那是你的事。’不想再听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真没有道理。那样的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他平时不是那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杰里举起左手摸摸头，好像一个小学生假装在想一件事似的。“‘好吧，’我说，‘别提啦。我替我的报纸写好稿了。俄国人先到那里，这就不写。写别的。森林伏击，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对他说：‘如果圆场不喜欢这资料，给报纸倒不错。’他一听又火了。第二天有只猫头鹰打电话给老板。别让那个讨厌鬼威斯特贝碰埃利斯的消息。叫他注意D号通知：正式警告。‘如有人再提吉姆·埃利斯，即哈耶克事件，即有损国家利益，一概予以辞职。’所以又回来写女子乒乓球赛的消息了。干杯。”

“但是那时你已写信给我了。”史迈利提醒他。

杰里·威斯特贝涨红了脸。“对不起，”他说，“忽然排外和多疑起来。大概是因为在圈子外面的缘故：你连最好的朋友也不相信。就连陌陌生生人也不如。”他又想用另外一个说法：“只是觉得老托比有点古怪。我不应该写这封信，是不是？违反规定。”他虽然尴尬，还勉强装出笑容。“后来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单位把你也辞了，因此我觉得更糊涂了。你不是在单独进行调查吧，老兄？不是……”他没有把话问完，不过，也许是没有说完。

他们分手的时候，史迈利轻轻地拉住他的肩膀。

“要是托比来找你，我想你最好别告诉他我们今天碰头的事。他是个好人，但他总是觉得别人联合起来对付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告诉他，老兄。”

“而且要是万一他在这两天找你，”史迈利继续说，他的口气表明这是万一情况，“你最好告诉我。那么我就可以证明你说得不错。我想起来了，别打电话给我，打这个号码。”

杰里·威斯特贝忽然急着要走，关于那个足球队在店里偷窃的消息不能再等。但是他把史迈利的卡片接过来时，还是奇怪地有点不好意思地斜视一眼问：“没有不对劲吧，老兄？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那笑容很难看。“不是同伙闹翻了吧？”

史迈利听了大笑，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杰里宽厚微驼的肩膀上。

“随时恭候大驾。”威斯特贝说。

“我不会忘记。”

“你瞧，我以为是你打电话给老板的。”

“不是我。”

“也许是阿勒莱恩。”

“我想是吧。”

“什么时候都行。”威斯特贝又说，“对不起，你明白。向安恩问好。”他犹豫地说。

“说吧，杰里，说出来吧。”史迈利说。

“托比说了她和比尔的事。我叫他闭上鸟嘴。没有的事吧，是不是？”

“谢谢你，杰里。再见。当然啦。”

“我就知道没有。”杰里高兴起来，举起手指表示道别，就走了，到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史迈利那天晚上躺在艾莱旅馆的床上，一时睡不着，就又拿起拉康在孟德尔家中交给他的那份档案来看。那份档案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建档的，当时圆场像白厅其他部门一样都受到压力，要竞相媲美，比较谁更认真检查自己人员的忠诚可靠。大部分资料都是一般性的：截听的电话，监视的报告，没完没了访问教师、朋友、审查人的调查记录。但是有一个文件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史迈利，他总是看不够。这是一封信，索引上随便写着“海顿致范沙维，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其实是一封手写的信，是比尔·海顿在大学时代写给他的导师范沙维的。范沙维为圆场物色人才，曾经介绍年轻的吉姆·普莱多，认为他是个合适人选。这封信的前面有条捉弄人的解释。那个不知名的作者说，精英俱乐部是“基督教会学院的一个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员主要是伊顿出身的”。创始人是范沙维（法国荣誉勋位、英帝国勋章获得者，个人档案第几号第几号），海顿（后面有无数可供查对的档案号码）该年是俱乐部的明星人物。海顿的父亲年轻时也参加过这个俱乐部，它的政治色彩供认不讳是保守的。范沙维早已故世，他是个狂热的帝国派，序言说，“精英俱乐部是他个人精选的智库，以备急需。”奇怪的是，史迈利隐约也记得自己年轻时对范沙维的印象：一个瘦瘦、热心的人，无边眼镜，张伯伦式的雨伞，面颊红润，有点不合乎他的年龄，仿佛还在长牙似的。斯蒂德·阿斯普莱叫他童话中的教父。

亲爱的范，我建议你着手打听一下这个姓名见附件的年轻人。[审查人多余的注解：普莱多]你若知道吉姆，必然知道他是个有相当成就的运动员。但是你应知而不知的是，他也精通数国外语，而且也不完全是个呆子……

接着是他的简历，令人惊奇的精确：……巴黎拉克纳尔中学，申请念伊顿，但从来没去上过学，布拉格耶稣会中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两学期，父母在欧洲从事银行业，小贵族，父母分居……

因此，吉姆非常熟悉国外情况，他无牵无挂，我觉得极为可贵。再者，尽管他到过欧洲各地，但请别弄错，他骨子里完完全全是英国佬。目前他刚出道，有点迷惘，因为他刚发现了球场之外还有一个新大陆，那就是我。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是怎样遇到他的。

你知道，我有时习惯（也是你的命令）穿起阿拉伯服装到集市里去，混在他们中间，听他们那些先知的谈话，以备有朝一日可以好好地对付他们。那天晚上出风头的巫师是从俄罗斯来的，一个名叫赫列布尼科夫的科学院院士，当时在伦敦苏联大使馆工作，是个随和、有感染力的家伙，他在大家说废话时说了一些相当有智慧的话。那个集市有个叫做大众俱乐部的辩论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以前去过几次，情况你已知

道。谈话结束后，一边喝大众化的咖啡，一边进行民主争论，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我注意到有个大个子坐在后排，显然太羞怯，怕跟人混在一起。他的脸仿佛是在板球场见过的，后来才弄清楚我们两人都在一个临时组成的球队里打过球，只是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描写他才好。他是这块料，范。我这不是开玩笑。

笔迹到此为止有些拘谨，但从此开始，由于作者得心应手，潦草了起来。

他沉默寡言，让人敬畏。头脑很固执——真的是那样。他是属于那种能够不露痕迹领导别人的沉着、有想法的人。范，你知道要我采取行动是多么困难。你得随时提醒我，从思想上提醒我，除非我尝到生活中危险的滋味，否则我是不会了解生活的神秘的。但是吉姆是个凭本能就会行动的人……他是执行者……他是我的另一半，我们两个加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人，惟一不足的是我们两个都不会唱歌。范，你有这样的体会吗？你非得要出去找到一个新朋友，否则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意思了？

这里笔迹又整齐了一些。

“耶伐斯拉格罗”，我说，据我理解这是俄语，意思是到木棚里或者什么地方去等我，但是他却说“哈啰”，我想要是他见到加百利天使经过，他也会这样说的。

“你的难题是什么？”我问他。

“我没有难题。”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要是没有难题，你怎么进来的？”

他咧开嘴安详地一笑，我们就到那个伟大的赫列布尼科夫那【引文1】里去，握了一握他的小手，一起回到我的房间。我们喝了酒，喝啊喝的。范，他见到什么都喝。也许是我见到什么都喝，反正我已忘掉是谁了。天亮以后，你猜我们怎么着？我来告诉你，范。我们一本正经地走到公园里，我拿着一只秒表坐在凳子上，吉姆换了运动衣，跑了二十圈。二十圈。我可累得够呛。

我们随时都会来见你，他只要跟我在一起，或者跟我的好、坏朋友在一起。总之，他要我做浮士德的恶魔。我感到很荣幸。再者，他还是童男，身高八尺，体格结实跟巨石群一样。别害怕喔。

档案至此快完了。史迈利坐了起来，不耐烦地翻着发黄的纸，想找一些更精彩的内容。这两个人的导师（二十年后）断言，无法想像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超过纯粹友谊”……海顿方面的证据没有找到……吉姆的导师说他“求知若渴”——否认他是“左倾”的说法。那次谈话是在沙拉特进行的，开始就是长篇大论的道歉，特别是鉴于吉姆战时表现优异。在读到海顿花哨的信以后，再看到吉姆的答复，有一种令人高兴的直率气息。国安局有一个情报员参加，但是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话。没有，吉姆后来从来没有见过赫列布尼科夫或者他的代表……没有，他除了那次

以外没有跟他说过话。没有，他当时跟共产党或俄国人没有来往，他想不起大众俱乐部任何一个会员的姓名来……

问：（阿勒莱恩）不至于让你睡不着吧？

答：老实说，没有。（笑声）

是的，他曾经参加过大众俱乐部，也参加过大学里的戏剧俱乐部、集邮俱乐部、现代语言俱乐部、联合俱乐部、历史协会、伦理协会、鲁道夫·史坦纳研究会……要听有趣的报告和认识人，这是很好的途径，特别是要认识人。不，他从来没有分发过左翼书报，不过他曾经订阅过《苏联周刊》……不，他从来没有向任何政党交过党费，不论在牛津时代，还是后来都没有。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投过票……他在牛津参加这么多的俱乐部，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国外上过的学校太多了，因此没有什么自然结交的英国同学……

这时审查人都站在吉姆一边了：大家都站在一边反对国安局和他们的官僚主义干涉。

问：（阿勒莱恩）有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是，你既然在海外待这么久，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里学会打板球？

答：哦，我有个舅舅，他在巴黎城外有个房子。他是个板球迷。有球网等一切设备。我到那里度假，他就没完没了地找我打球。

[审问人的注解：亨利·德·圣伊冯伯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PF-AF64-7]

谈话结束。国安局的代表要求让海顿作证，但是海顿在国外，无法出席。另定日期……

史迈利读到档案中最后一份资料时，几乎已经睡着了。那份资料是在吉姆获得正式审批通过后，国安局胡乱塞进来的。那是当时牛津大学一张报纸的剪报，上面刊载一篇一九三八年六月海顿单人画展的评论，题为《现实抑或超现实？牛津的一个观点》。这位批评家把画展批评得体无完肤，最后幸灾乐祸地说：“我们知道吉姆·普莱多先生为了要帮助悬挂画框，还牺牲了他的板球。我们认为，要是他留在班伯里路，贡献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他对艺术的贡献是这次画展惟一感人的地方。也许我们最好不要这么大声讥笑……”

他想睡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怀疑和犹豫。他想起了安恩，困倦之中想念得厉害，想以自己的脆弱来保护她的脆弱。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幻想她在昏暗的灯光中俯视着他，而这时波普格拉汉太太却在钥匙孔中偷看，不免使他有所顾忌。他想到塔尔和伊琳娜，徒劳无益地思考着爱情和忠贞问题。他想到吉姆·普莱多和明天的事。他隐约意识到即将来临的胜利。他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明天，如果他的运气好，他可能会找到陆地：一个安静的小小荒岛。是卡拉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属于他和安恩。他终于睡着了。

第3篇 下篇

在吉姆·普莱多的天地里，星期四过得和别的日子一样，只是夜半时候，他肩胛骨的伤口开始流脓水，他想这大概是因为星期三下午参加了校内赛跑的缘故。他被痛醒了，感到背上流脓水的地方凉滋滋的。上一次发生那样情况的时候，他自己开车到汤顿医院去，但是护士看了他一眼，就马上打发他到急诊室去等医生来，帮他拍X光片，因此他就偷偷地穿上衣服回来了。他尝够了医院和护士的味道。不管是英国医院，还是别国的医院，他都不想再跟医院打交道了。他们说流脓是“本来就会有的”。

他自己摸不到那个伤口，但是在那次以后，他就自己胡乱做些三角绷带，每个角上缝了绳子。他于是把这些绷带找出来，放在架在水池的板上，调制化脓药，然后烧了热水，加了半包盐，洗了一个临时简单的澡，弓起背来冲洗一下创口。他把绷带浸透了化脓药，甩在背上，在胸前打了结，然后俯卧在床上，手边放着一杯伏特加。痛楚减轻了，就打起瞌睡来，不过他知道要是就这样睡着了，他会睡一整天，因此他拿起伏特加瓶到窗前，坐在桌边批改五年级乙班的法语作业，这时星期四的晨曦在大坑上空露出鱼肚白，乌鸦开始在榆树丛中扑翅起飞了。

他有时觉得那伤口像一个不能忘怀的记忆。他尽量想忘掉，但总是做不到。

他慢慢地批改作业，因为他喜欢这项工作，因为批改作业能够使他心无二用。到六点半、七点时，他批改完毕，就穿起一条法兰绒旧裤和一件运动外套，悄悄漫步走到教堂里去。教堂门是从来不上锁的。他在寇都瓦教堂的中央走道里跪了一会儿，这是寇都瓦家族为纪念两次大战中阵亡的家人所建的小教堂，很少有人去。小祭坛上的十字架是凡尔登的坑道兵削出来的。吉姆一边跪着，一边在座位下面小心地摸索着，手指终于摸到了几条胶带黏在那里，顺着胶带摸过去，就摸到了冰凉的金属物。他做完祈祷后就快步跑过峡谷路，到了山顶，他稍微放慢了速度，保持身上不断地流着汗，只要身体感到暖和，就很舒服，跑步的节奏安定了他的神经。他一夜未睡，大清早就喝了伏特加，因此感到有点轻飘飘的，看到峡谷下面的马驹呆呆地看着他时，他就用萨默塞特方言向它们嚷嚷道：“滚开，傻瓜！别呆呆地看我！”然后又沿着小径跑回去喝咖啡，换绷带。

晨祷后的第一节课是五年级乙班的法语，吉姆在班上几乎发了脾气：他给绸布商的儿子克里门兹不必要的处罚，快下课时又不得不取消了。在教员休息室，他又做了另外一件照例必做的事，就像在教堂一样：动作很快，不用脑筋，干净利落。这事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通过信件进行检查，不过这个法子很灵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用过这个做法，特别在职业间谍之间，不过话又说回来，职业间谍是不会谈论他们玩弄的把戏的。他会这么告诉你：“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对方在监视你，

他们一定也在注意你的信件，因为信件最容易搞，特别是如果寄信者是国内的人，可以得到邮局的合作。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每星期在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邮筒，用同一种邮资，寄一封信给你自己，另一封信寄给同一地址的另一个不知情的人。里面放些什么都行——圣诞节卡片，本地超级市场的广告——一定要把信口封严，然后等着比较收信的时间。如果你的一封信比另外一个人的那封到得晚，那一定就是有人在监视你，就目前情况来看，那就是托比。”

吉姆用他自己古怪的话叫这为“测水温”，这一次水温又是可以的。两封信同时送来，但是吉姆到得太晚了，来不及取走寄给马乔里班克斯的那封，这次是轮到他被当做不知情的搭档。因此吉姆把自己的信揣在口袋里以后，翻看着《每日电讯报》，口中还啧啧有词，只听得马乔里班克斯厌烦地骂了一声“去他妈的”，就把一份邀他参加读经会的请帖撕掉。这一天的课程排得满满的，一直到和圣埃尔明学校比赛少年橄榄球为止，他当裁判员。球赛进行得很快，结束时他的背又痛了，因此他又回去喝伏特加，一直喝到打下午第一节上课铃，他答应年轻的埃尔维斯代他值班打铃。他已记不得为什么答应，但是年轻的教职员，特别是已婚的，都会找他来帮忙做些杂事，他也从不拒绝。这个铃是轮船上的旧货，是瑟斯古德的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如今已成为学校的一个传统了。吉姆摇铃的时候，他发觉小比尔·罗奇就站在他身旁，抬头望着他，脸上虽露笑容，但脸色发白，等着跟他说话，他那样一天总有五六次了。

“哈啰，大胖，又有什么事啦？”

“先生，我说，先生。”

“说吧，大胖，快说。”

“先生，有个人问你住在哪里，先生。”罗奇说。

吉姆放下铃。

“怎么样的一个人，大胖？说吧，我不会咬人的，快说吧，嗨……嗨！什么样的一个人？男人？女人？变魔术的？嗨！说吧，老兄，”他温和地说，蹲着身子与罗奇一般高度，“不用哭。这又怎么啦？发烧了吗？”他从袖口里抽出一块手帕。“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仍低声地问。

“他在麦克库伦太太家的店里打听。他说他是你朋友。后来他就回到他的车里去，汽车停在教堂院子里，先生。”又是一阵泪如雨下，“他就坐在汽车里。”

“你们快滚开，”吉姆向挤在门口的一批年长的学生嚷，“快滚！”他又反过来对罗奇说：“很高的朋友？是不是邋里邋遢个子高高的，大胖？眉毛很浓，背有点驼？瘦个子？布拉德伯雷，过来，别呆看着！等会儿带大胖到舍监小姐那里去！瘦个子？”他又问，口气温和但是坚定。

但是罗奇已经词穷。他的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在大人世界中已没有了分辨的能力。什么大个子、小

个子、老头儿、年轻人、驼背、直腰，都有分辨不清的危险。他不能对吉姆说不是，但是说是又要令他失望，这可担当不起。他看见吉姆的眼睛盯着他，他看到他的笑容消失了，感到一只大手慈爱地放在他的胳膊上。

“好孩子，大胖。没有人像你这样观察仔细了，是不是？”

比尔·罗奇把头靠在布拉德伯雷的肩上，闭上了眼睛。待他再睁开时，他在泪花中看到吉姆已走上一半的楼梯了。

吉姆感到很平静，几乎是沉着。好多天以来他已经知道有什么人要来了。这也是他信奉的一个规律，凡是那些监视他的人必到之地，他都留神注意。首先是教堂，本地居民的动静在那里是个现成的话题；其次是市政厅，选民登记的地方；还有小店老板，他们都有主顾来往的账目；最后是酒店，对象没有不上酒店的。他知道，在英国，这些地方是监视者要找到你而必去之地。果然不出所料，两天前在汤顿跟图书馆副馆长闲聊的时候，吉姆发现了他要寻找的踪迹。一个显然是从伦敦来的陌生人，居然对乡村选区发生兴趣，是啊，是个对政治有兴趣的先生，大概是在从事政治研究，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专业人员，他想了解的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奇怪，就是吉姆那个村子的最新人口记录，是啊，想要了解选民名单，他们想挨家挨户调查一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偏僻乡村，特别是有新住户的乡村。是啊，真奇怪，吉姆附和道，于是他就做了准备。他买了到各地去的火车票：汤顿到埃克塞特的，汤顿到伦敦的，汤顿到斯温顿的，有效期都是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他若要逃跑，临时不容易弄到车票。他把他原来的证件和手枪挖出来，藏在地面上容易找到的地方，在阿尔维斯车的后车里放了一个装满衣服的手提箱，又把油箱加满了汽油。做了这些准备以后，他才能安心睡觉，但背又痛了。

“先生，谁赢了，先生？”

一个叫普里布尔的新生，穿着睡衣，嘴上还全是牙膏，到医务室去。有时，那些学生会毫无理由地向吉姆说话，大概是因为他的个子和背吸引了他们。

“先生，我是说球赛，和圣埃尔明队的球赛。”

“是圣维尔明队。”另外一个学生插嘴道，“是啊，先生，到底谁赢了？”

“先生，他们赢了，先生，”吉姆吼道，“要是你们看了，先生，你们就知道了，先生。”他假装进攻，挥着一个大拳头，把两个学生都赶到走道对面舍监的医务室。

“晚安，先生。”

“晚安，小鬼。”吉姆一边说，一边跨进另外一边的病房，从这里可以看到教堂和坟场。病房没有开灯，他不喜欢它的样子和气味。晚饭后有十二个孩子躺在昏暗中，迷迷糊糊地发着烧。

“是谁？”一个粗哑的嗓子问。

“是犀牛，”另一个回答，“喂，犀牛，谁赢了圣维尔明队？”

直呼吉姆的绰号是大不敬的事，但是病房里的孩子觉得这里可以不受纪律的约束。

“犀牛？谁是犀牛？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吉姆站在病床之间说，“把手电筒藏起来，这里是禁止的。轻而易举地，他们就赢了。圣维尔明队十八比零。”那扇窗户几乎和地面一样高，有个炉栏挡在前面不让孩子们爬过去。“后卫线太糟糕。”他喃喃地说，一边往下看。

“我不喜欢橄榄球。”一个叫史蒂芬的孩子说。

蓝色的福特汽车停在教堂背后的榆树林里。从楼下看是看不到的，但并不像是存心藏起来。吉姆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离开窗户有一步远，观察那汽车有什么地方露出马脚。天很快就黑了，但是他的眼力很好，他知道该注意些什么地方：惹眼的天线、给跑腿用的第二面侧镜、长途开车后的痕迹。孩子们感觉到他的专心致志，都开起他的玩笑来。

“先生，在看鸟吗？好看不好看，先生？”

“先生，我们失火了吗？”

“先生，她的腿长得怎么样？”

“天啊，先生，难道是阿隆逊小姐？”大家听到这话都吃吃地笑起来，因为阿隆逊小姐又老又丑。

“闭嘴，”吉姆叱道，很生气，“无礼的蠢猪，闭嘴。”

楼下会客厅里，瑟斯古德在晚预习之前点高年级学生的名。

阿贝克隆比？到。阿斯特？到。布拉克纳？生病了，先生。

吉姆仍旧看着，这时车门开了，乔治·史迈利小心地下了车，穿着一件厚大衣。

走廊里响起了女舍监的脚步声。他听到她鞋子橡皮后跟擦地的声音和酒精瓶里体温计的碰撞声。

“我的好犀牛，你在我的病房里干什么？把窗帘拉上，你要他们都得肺炎死吗？威廉·梅里杜，马上坐起来。”

史迈利在锁车门。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带什么东西，甚至公文包也没有带。

“格林维尔楼里大家都在等你呢，犀牛。”

“好吧，我这就去，”吉姆精神抖擞地又说一句，“大家晚安。”就大步走到格林维尔宿舍楼去了，他答应要跟他们讲完约翰·巴肯的一个故事。他在大声念的时候，发现有些声音发不出来，好像塞在喉咙里了。他知道头上在冒汗，他心里嘀咕背上一定又在流脓了，等读完的时候，他的下巴感到有些僵硬，那不完全是因为大声朗读的缘故。但是所有这

一切，与他跨进寒冷的夜晚空气里，心中越来越感到的气愤相比，一点也不足道。他在杂草没膝的院子里犹豫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教堂。他只需要三分钟不到，就可以到教堂里，从座位底下把胶带拉开，取出手枪，插在腰带里，在左边，枪口朝里，贴着下腹.....

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不用如此，因此他就直接往自己的拖车走去，放声唱着“嗨，打炮打炮”，尽管他嗓门不高，而且走调。

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总有不安定之感。甚至外面过往车辆难得安静下来的时候，窗户也还是咯咯作响。浴室里，漱口杯也格格地响着，而隔着两边的墙，还有从楼上，都可以听到音乐声、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前院一有汽车开到，车门砰地关上的声音，都仿佛来自室内，脚步声也是如此。至于家具饰物都是协调一致的。黄色的椅子配着黄色的图片和黄色的地毯。有凸纹的床罩的颜色搭橘红色的配房门，碰巧也配上伏特加酒瓶上的标签。史迈利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他把椅子拉开了点，把伏特加酒瓶放在茶几上，现在吉姆坐在那里瞪着他的时候，他从小冰箱里取出一盘烟熏鱼，和已经抹了奶油的面包。和吉姆的情绪相比，他的情绪显得很轻松，动作敏捷，目的明确。

“我想我们别的不行，至少可以坐得舒服一些。”他笑一下道，一边忙着在桌上摆杯盘，“你什么时候得回学校去？有规定的时间吗？”没有回答，他就坐了下来。“你觉得教书有趣吗？我仿佛记得战后你教过一阵子书，是不是？在他们把你回去之前？是不是也是个预备学校？我记不得了。”

“可以看档案去，”吉姆不高兴地说，“乔治·史迈利，你别到这里来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把戏。你要了解我的情况，可以去查档案。”

史迈利伸手到茶几上，倒了两杯酒，一杯给吉姆。

“你在圆场的个人档案吗？”

“跟管理组要。向老总去要。”

“恐怕应该是那样，”史迈利怀疑地说，“问题是老总已经死了。在你回来之前，我也早已被撵了出来。你回国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吗？”

一听到这话，吉姆的脸色有点缓和下来，他做了一个慢慢的动作，这个姿态常常使瑟斯古德的学生感到很好玩。“老天，”他喃喃地说，“原来老总已经死了，”他的左手掠过胡子尖，朝上摸到发根上，“可怜的老头子，”他喃喃说，“他是怎么死的，乔治？心脏病？心脏病死的？”

“在汇报的时候，他们没有告诉你吗？”史迈利问。

一听到汇报，吉姆态度又紧张起来，目光又瞪起来。

“是的，”史迈利说，“是心脏病。”

“谁接替他？”

史迈利笑道：“我的天，吉姆，要是他们连这个也没有告诉你，你们在沙拉特到底说些什么呀？”

“他妈的，谁接替他？不是你，对不对，你被撵出来了！谁接替他，乔治？”

“阿勒莱恩接替他。”史迈利留心地看着吉姆。他注意到他的右前臂一动也不动地搁在膝上。“你想由谁来接替？你有合适的人选要推荐吗，吉姆？”停顿很久以后，他又说，“那么他们也没有告诉你阿格拉瓦特谍报网的下场？普里比尔、他的妻子、他的妻舅的下场？也没有告诉你柏拉图谍报网的下场？兰德克朗、艾娃·克里格罗娃、汉卡·比罗娃？这些人有几个是你在罗埃·布兰德接手以前招募来的，是不是？老兰德克朗在战时还为你工作过。”

吉姆顿时无法移动。他红红的脸显得犹豫不决，淡黄的眉毛上有汗珠慢慢渗了出来。

“他妈的，乔治，你究竟要干什么？我已经下了决心。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下定决心，重新做人，忘掉一切。”

“他们是谁，吉姆？是罗埃？比尔？潘西？”他等着，“不管他们是谁，他们有没有告诉你麦克斯的遭遇？不过放心，麦克斯没有遭到什么不幸。”他站了起来，利落地替吉姆重新斟满了酒，又坐下来。

“好吧，你说吧，那两个谍报网怎么啦？”

“他们被破获了。他们说是你为了自己活命而出卖了他们。我不相信。但是我必须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停地说下去，“我知道老总要你誓死保密，但是这个誓言已经结束了。我知道他们对你严加讯问，我也知道你已经把一些事情置之脑后，现在已经很难再挖出来了，或者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实情，什么是伪装了。我知道你尽量想划一道界限，说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我也这样做过。不过，你过了今天晚上以后再划这条界限吧。我带来了拉康的一封信，如果你要打电话给他，他在家等着。我不想要封你的口。我要你开口。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来看我？你是大可以来看我的。你在走以前曾经想来看我，那么回来以后为什么不来看我呢？你不来看我，不完全是为了清规戒律。”

“没有人幸免吗？”吉姆说。

“没有人。他们看来都被枪毙了。”

他们打了电话给拉康后，只有史迈利一个人坐在那里喝着酒。他可以听到浴室里的水声，和吉姆泼水洗脸时的咕啾声。

“他妈的，让我们到可以透气的地方去。”吉姆低声说，仿佛这是他开口说话的条件。史迈利提起酒瓶，在他身旁一起走过车道到汽车旁边。

他们开着车子驶了二十分钟，由吉姆开车。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汽车已经开到高原上，今天早晨的山顶没有雾，远远地可以望到谷底。远处有稀稀落落的灯光。吉姆坐在那里像铁铸的一样，右肩略高，双手低垂，穿过结了雾气的挡风玻璃，凝视着远处的山影。天空已经发亮，衬着吉姆的面孔，轮廓鲜明。史迈利的头几个问题都很短。吉姆的声音里已经没有怒意，他说话慢慢地从容自如起来。有一次谈到老总搞特务的一套本领时，他甚至笑了起来，但是史迈利始终没有放松戒备，他谨慎

小心，好像领着一个孩子过马路一样。遇到吉姆撒腿跑了起来，或者生起气来，史迈利就轻轻地把他拉回来，一直到平静下来为止，然后按同样的速度向同一个方向一起前进。吉姆如有迟疑，史迈利就哄他跳过障碍。在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由史迈利凭直觉和推断，跟吉姆提供他自己经历的线索的。

比如史迈利问，吉姆第一次接受老总的指示是不是在圆场外面的什么地方？是的。那么在哪里呢？在圣詹姆斯的一间公寓里，是老总建议的一个地方。有旁人在场吗？没有。老总当初为了和吉姆联系是不是通过他的私人警卫麦克法迪安？是的，老麦克坐布里克斯顿的交通车送来一个纸条，要吉姆那天晚上跟他见面。吉姆把去或不去的答复告诉麦克后，得把条子交还给他。他无论如何不得使用电话讨论这个安排，即使内线电话也不行。吉姆回复麦克说他同意去，七点钟到了那里。

“我想老总一开头就叫你要提高警惕？”

“告诉我谁都不能相信。”

“他有提到具体的人名没有？”

“后来提到了，”吉姆说，“开始没有。开始他只说：谁都不能相信。特别是主流派的人。乔治？”

“唔？”

“他们都被枪毙了？兰德克朗、克里格罗娃、普里比尔夫妇，都被枪毙了？”

“秘密警察在同一天晚上逮捕了两个谍报网的人。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的亲属得到通知，说是他们已经死了。这一般就是指枪毙。”

他们的右边有一排松树，在晨光熹微中好像一列爬上山谷静止不动的军队。

“后来我想老总问你手头有什么现成的捷克护照，是不是？”史迈利又问道。

他得把问题再重复一遍。

“我告诉他我用哈耶克，”吉姆最后说，“弗拉基米尔·哈耶克，驻巴黎的捷克记者。老总问我，这些证件有效期还有多久。我说，‘不一定。有时用一次就要作废了。’”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好像失去了控制。“老总有时候聋得厉害。”

“于是他告诉你该做些什么。”史迈利提示道。

“首先，我们讨论怎样否认。他说，如果我被逮住，我不可以把他牵连进去。就说是剥头皮组搞的，私底下搞的。当时我就想，谁会相信呀？他说的每句话都叫人心凉。”吉姆说，“在整个指示过程中，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什么也不愿告诉我。他不要我知道，但是他要我得到他的

明确指示。‘有人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劳，’老总说，‘位阶很高的一个官员。代号作证。’我问他：‘是捷克官员吗？’他说是‘军方的’。‘吉姆，你有军事头脑，你们俩一定很合得来。’就这样开始的，我想，如果你不想告诉我，那就干脆别告诉我吧，可是别再犹豫不决。”

吉姆说，再兜了几个圈子以后，老总表示“作证”是一个捷克炮兵将领。他的名字叫斯蒂夫契克，在布拉格国防系统中以亲苏的鹰派著称，至于这话有多少可信，那就只有天晓得了。他曾在莫斯科担任过联络工作，是俄国人信任的极少数捷克人之一。斯蒂夫契克通过一个中间人在奥地利带信给老总，表示他想就共同有兴趣的问题与圆场的一位负责人员谈话。这个人必须能说捷克话，有权力相机行事。斯蒂夫契克在十月二十日星期五那一天，会到奥地利边境以北约一百英里的布尔诺附近的季斯诺夫武器研究所视察。完了之后他将单独到附近一个猎场度周末。那个地方在森林中间，距拉奇斯不远。他愿意在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在那里会见那位使者。他还会派人护送那个使者去布尔诺。

史迈利问道：“老总提到过斯蒂夫契克的动机吗？”

“一个女朋友，”吉姆说，“他所爱的一个女大学生。想抓住青春的尾巴。老总说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她在一九六八年夏天的动乱时被杀。在此以前，斯蒂夫契克为了个人前途，隐藏他的反俄感情。那个小姐的死改变了一切：他决心要报仇。四年来，他一直潜伏不露，装出友好的姿态，探听能够真正有损俄国人的情报。因此我们向他提出了保证和商定了贸易路线以后，他就愿意出售。”

“对于这些情况，老总核查过没有？”

“尽了全力。斯蒂夫契克是有档案可查的。他是负责匈牙利问题的参谋军官，经验丰富。是个技术专家政治论者。他不是在进行进修，就是在国外增长见识：华沙、莫斯科、北京待了一年，在非洲当过武官，最后又回到莫斯科。当将军他算是年轻的。”

“老总有没有告诉你此行是搞什么情报？”

“国防资料。火箭。导弹。”

“还有别的吗？”史迈利说，递过酒瓶来。

“还有一些政治情报资料。”

“还有别的吗？”

史迈利不是第一次明显地感到，吉姆不是不知道，而是仍旧坚决地想忘掉一切。在黑暗中，吉姆·普莱多的呼吸突然急促重浊起来。他把手放在方向盘上，下巴靠在上面，茫然地看着已经结霜的挡风玻璃。

“他们在枪毙以前被逮到多久？”吉姆想要知道。

“恐怕比你久。”史迈利只好承认。

“天哪。”吉姆说。他从衣袖里抽出一块手帕，抹一抹脸上的汗水和

不管是什么亮晶晶的东西。

“老总想要从斯蒂夫契克那里弄到的情报。”史迈利仍旧轻声地提示。

“他们再三讯问我的也是这个。”

“在沙拉特？”

吉姆摇摇头。“在那边。”他向山那边点点头，“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老总安排的。我无法说服他们这是我自己安排的。他们听了大笑。”

史迈利于是又耐心地等着吉姆继续说下去。

“斯蒂夫契克，”吉姆说，“老总始终惦记着一件事：斯蒂夫契克能够提供答案，斯蒂夫契克能够提供线索。我问他，‘什么线索？’他拿出他那个棕色装乐谱的袋子，抽出几张图表来，上面尽是他的批注。用蜡笔画的图表。他说，‘给你的资料。这是你要见的那个家伙。’斯蒂夫契克的一生逐年都有记载，他带我看了一遍。军校、奖章、老婆。‘他喜欢马，’他说，‘你过去也喜欢骑马，吉姆。这又是共同的地方，请记住。’我想：这倒挺好玩，坐在捷克某个地方，警犬在追踪我，却闲谈怎样训练纯种马。”他笑得有点奇怪，因此史迈利也笑了。

“用红蜡笔写的职务是斯蒂夫契克替苏联做的联络工作。绿笔写的是他的谍报工作。斯蒂夫契克什么都有份儿。捷克军方谍报部门第四号人物，首席武器专家，国内安全委员会书记，主席团的军事参议，捷克军事谍报系统的英美方面负责人。接着老总指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一段，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一半绿笔，一半红笔。老总说，表面上斯蒂夫契克是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里的捷克中将，但这不过是个掩护。‘他和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没有关系，他的真正工作是在莫斯科中心的英国处里。他的工作假名叫米宁，’他说，‘他的工作是代表捷克方面与中心配合工作。这可是个有价值的宝藏，’老总说，‘斯蒂夫契克要向我们出卖的是莫斯科中心打进圆场潜伏的地鼠名字。’”

史迈利想，这很可能只是两个字，这时他想起了麦克斯，突然又感到了担心。他知道，到最后，不过就是地鼠杰拉德的名字，黑暗中一声喊叫。

“‘有个烂苹果，吉姆，’老总说，‘把别的苹果也弄烂了。’”吉姆一口气说了下去。他的声音僵硬起来，他的态度也僵硬起来。“他不断地说他淘汰的办法，从头调查起，几乎已经得出了结论。他说，剩下了五个可能性。别问我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来的。他说，‘是高层的五个人之一。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他给我喝了一杯酒，我们俩坐在那里，像两个小学生那样约好用什么暗号。我们用了《锅匠、裁缝》这首儿歌。我们坐在公寓房间里，一起想出这个暗号，喝老总请我们喝的那种便宜的塞浦路斯雪利酒。如果我无法脱身出来，如果我遇到斯蒂夫契克以后出了什么事，如果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哪怕我得到布拉格在大使馆门上用粉笔涂写，或者在电话中向布拉格常驻站长大声嚷嚷，我也得把那两个

字传给他。锅匠，裁缝，士兵，水手。阿勒莱恩是锅匠，海顿是裁缝，布兰德是士兵，托比·伊斯特哈斯是穷人。我们不用水手，因为与士兵同韵。你是乞丐。”吉姆说。

“我现在还是吗？对于老总的这个想法，吉姆，你是怎么看的？总而言之，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完全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就是胡说八道，”他用一种军人的固执口气重复说，“以为你们中间有一个是地鼠——这不是疯了吗？”

“但是你还是相信了？”

“没有！老天，老兄，你怎么——”

“为什么不相信？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一直认为这件事迟早是会发生的。我们总是互相警告：要提高警觉。我们把别的单位的人搞成我们的地鼠已经够多了：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法国人，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英国人忽然成了例外呢？”

史迈利感到吉姆的敌意，便打开了车门，放一些冷空气进来。

“走一走怎么样？”他说，“可以走动走动的时候，没有必要窝在这里。”

不出史迈利所料，走动一下以后，吉姆说话又流利了。

他们是在高原的西端，只有几棵树耸立着，其余都砍倒在地了。有一张结了霜的长凳，他们没有坐下。没有风，星星很亮，吉姆继续说下去时，他们并肩走着，一会儿走近车子，一会儿又离开车子，总是吉姆跟着史迈利的步伐。有时他们停下步来，并肩站在那里，凝望下面的山谷。

吉姆首先谈到怎么去找麦克斯，采取了什么伪装手法，不让圆场别的人知道他的使命。他放消息说，他搞到了一条线索，可以找到苏联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破译员，他用以前用过的工作名字埃利斯订了去哥本哈根的机票。但实际上他却飞到巴黎，改用哈耶克护照，搭班机在星期六上午十点到布拉格机场。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检查，在候机室弄清楚了火车时间以后，发现还有两个小时空当，就决定慢慢晃晃，看看在去布尔诺之前有没有人在他背后跟踪。那年秋天那里的气候很不好。地上已经积雪，天上还正在下雪。

吉姆说，在捷克，要察觉是否被跟踪一般不是问题。安全部门一点也不懂街头监视，大概是因为历届政府觉得没有必要畏畏缩缩的。吉姆说，他们往往到处布哨和停车，像艾尔·卡彭34一样，吉姆要找的果然给找到了：黑色的斯柯达汽车和三个戴软毡帽的壮汉。在寒风里，要发现他们稍微困难一些，因为车辆开得慢，行人走得快，人人都用围巾捂着鼻子。尽管如此，他在走到马萨里克车站，也就是他们现在所称的中央

车站之前，一点也不担心。吉姆说，但是到了马萨里克车站，他从两个排在他前面买车票的女人身上得到了警告，这完全是靠直觉，而不是靠事实。

现在吉姆用职业特务平心静气的态度回顾了当时的情况。他在温契斯拉斯广场旁边一排有顶篷的商店门前走过时，有三个女人从他后面走到前面去了，其中中间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最靠外边的那个女人，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皮包，最里面的那个女人牵着一只狗。十分钟以后，他迎面遇到了两个女人，手挽着手，都走得很急，他忽然想起，如果由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负责这项工作，这样的布置完全像是出于他的手笔。婴儿车提供迅速改装的行头，后边还有汽车停在那里，上面有短波无线电，万一第一组没成，另外有第二组支援。吉姆在马萨里克车站，看一眼排在他前面等着买票的两个女人，就知道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盯梢的人有一件行头是没有时间换掉，也不想换掉的，尤其是在这种寒带的气候中，那便是鞋子。吉姆观察这两个排队买票的女人穿的两双鞋子，马上认出了一双：毛里塑料的黑靴子，外面有拉链，棕色鞋底厚厚的，还带着一些积雪。那双靴子他在当天早上已经看到过一次了，那是在斯蒂尔瓦巷，不过穿那双鞋子的女人身上穿的是不同的衣服，推着婴儿车走过他身旁。从此以后，吉姆不再怀疑了。他已确知无疑，要是换了史迈利也会那样。

吉姆在车站书报摊上买了一份《红色权利报》，就上了去布尔诺的列车。若是他们要逮捕他，他们这时便可逮捕了。既然还不动手，他们的目标大概是支线，那就是说，他们想跟着吉姆去一网打尽他的联系人。不用再考虑别的，吉姆估计哈耶克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一上飞机，他们就埋下了陷阱。但是吉姆说，只要他们不知道他已发现了他们，他仍抢先一步。史迈利这时感到仿佛又回到了占领下的德国，他自己在当外勤的时代，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仿佛每个陌生人都在双目炯炯地盯着自己。

吉姆应该搭下午一点八分的车，四点二十七分到布尔诺。那班车改时间了，于是他搭了一列专门为足球比赛开的慢车，几乎逢站必停，吉姆每次停车总能认出便衣来。质量不一。在乔森，那是他所见到过的最小车站，他下车去买香肠，不下于五个人，都是男人，挤在小小的车站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装出在互相聊天的样子，真是可笑之极。

“如果说监视有高明的，也有不高明的，差别就是有人伪装逼真，有人不逼真。”

在斯维塔维，有两男一女进了他的车厢，谈着球赛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吉姆也加入——他已经看过报上的战绩表。这是一场复赛，大家都迷之若狂。到布尔诺没有再发生什么事，因此他下了车就到热闹的地方逛逛街，他们在那些地方只好紧紧地跟着他，生怕跟丢了。

他想让他们放松警戒，让他们知道他一点也不起疑。他现在知道他已成了他们逮大鱼——托比肯定会这么说的——的对象。他们步行的有

七个。汽车老换，他就记不清有多少了。指挥的是一辆邋里邋遢的绿色货车，由一个壮汉驾驶。车顶上有个环形天线，车背后有颗用粉笔潦草画上的白星，位置很高，孩子都够不着。他认了出来，汽车辨识的标志是车子前窗里放着一个女用手提包，并拉下遮阳板。他猜想还有其他标志，但是他有这两个已经足够了。他从托比传授给他的经验中知道，这样的规模恐怕动员了上百人，如果对象逃跑就尾大不掉。托比因此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布尔诺大广场里有一家商店货色齐全。在捷克买东西很乏味，每家公司企业都只有几个零售店，但这个地方却刚开张，规模很大。他买了儿童玩具、一条围巾、一些香烟，又试了皮鞋。他估计监视他的人仍在等待他的秘密联络人。他偷了一顶皮帽和一件白色的塑料雨衣，还偷了一个手提袋放这些东西。他在男性用品部溜达了很久，知道第一对那两个女人仍在跟着他，但又不愿走得太近。他猜想她们已经发出信号，要男的来接手，因此在那里等着。于是他进了男厕所立即行动起来。他把白色的雨衣罩在大衣外面，把手提袋塞进口袋，戴上了皮帽。他把别的东西都扔了，像发疯似的从消防梯跑下来，撞开了一扇太平门，到了一条小巷里，又拐到另外一条单行道的小巷，把白色雨衣塞进手提袋，又走进另外一家正要关门的商店，买了一件黑色的雨衣穿上，混在别的顾客中间走出来，挤上一辆很拥挤的电车，一直到倒数第二站才下车，走了一个小时，才准时在约好的第二个地方跟麦克斯相会。

这时他叙述了和麦克斯的对话，他说，他们几乎要吵了起来。

史迈利问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洗手不干吗？”

“没有。从来没有想到。”吉姆不快地说，嗓门提高了一些。

“但是，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胡来？”史迈利的声音里只有尊重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想表示自己高明，只是想弄清楚真相，在夜空下弄得一清二楚。“你继续向前走。你已经看到了背后有人跟踪，你认为这次任务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你仍旧走下去，越来越深入丛林里。”

“是的。”

“有没有可能，你对这次任务改变了想法？是不是好奇心吸引着你？比如你一心想知道地鼠是谁？吉姆，我这只是胡乱猜测。”

“那有什么不同？事已如此，我的动机有什么关系？”

半边月亮已经从云后露出，似乎很近。吉姆坐在长凳上。长凳嵌在石子堆里，他一边说话，一边捡起一颗石子，往身后的蕨丛丢去。史迈利坐在他身旁，眼光直盯着吉姆，不看别处。有一次，为了作伴，他也喝了一大口伏特加，不由地想起了塔尔和伊琳娜在香港山顶上喝酒。他想，这大概是干这一行的习惯，眼下有个景色，我们说话容易一些。

吉姆说，隔着菲亚特汽车的车窗，交换了约好的暗号，没有出什么岔子。开车的人是一个全身都是肌肉的僵硬的捷克马扎尔人，留着两撇爱德华王式的胡子，一嘴大蒜臭。吉姆不喜欢他，不过他原来也没有想

到要喜欢他。汽车后座的两道门都锁上了，为了他该坐在哪里，两人争了几句。那个马扎尔人说，吉姆坐在后座不安全，也不民主。吉姆骂他见鬼去，他问吉姆有没有带枪，吉姆说没有，这不是真话，不过要是马扎尔人不相信他的话，也不敢说出来。他又问吉姆有没有带给将军的指示？吉姆说，他什么也没有带。他只带着耳朵来听的。

吉姆说，他感到有点不放心。他们开了车，那个马扎尔人把情况作了交代。他们到猎场小屋时，那边不会有灯光，也不会有人住在那里的样子。将军在里面。要是有人住的样子，像是有自行车、汽车、灯光、狗，就说明小屋里有人的，那么由那个马扎尔人先进去，吉姆等在汽车里，否则就由吉姆单独进去，马扎尔人则在外面等。清楚了没有？

吉姆问，为什么他们两人不一块儿进去？马扎尔人说，因为将军不要他们两人一块儿进去。

根据吉姆的表，他们的车开了半个小时，朝东北方向，平均速度是一小时三十公里。路很曲折、陡峭，两边都有树。天上没有月亮，他看不到什么景色，除了偶尔在天际出现的森林和山顶。他注意到雪是从北方飘过来的，这一点以后很有用处。路上很干净，但有重型卡车的轮印。他们开车时没有开灯。马扎尔人开始说下流的笑话，吉姆认为他是要掩饰自己的紧张。大蒜臭味很难闻。他似乎不停地嚼。他忽然熄火。他们是在走下坡路，但速度比刚才慢。他们还没有完全停下车来，那个马扎尔人就伸手拉刹车，吉姆敲了他的脑袋，他的脑袋撞在窗柱上。吉姆拿过枪来。他们当时是在一条支路的路口上。支路三十码外就是一间低矮的木屋。没有人在的样子。

吉姆命令马扎尔人照他说的做。他要他戴上吉姆的皮帽，穿上吉姆的大衣，代替吉姆走过去。他要他慢慢地走过去，双手放在背后，走在小路的中央。他要是不照吩咐去做，吉姆就开枪打他。他到了小屋那里，进去告诉将军，然后再慢慢走回来告诉吉姆一切顺利，将军准备见他，或者不见他。吉姆这样做是采取基本的戒备措施。

马扎尔人对此似乎并不高兴，但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在他下车之前，吉姆叫他把车头掉转方向，面对小路。吉姆向他说明，如果搞什么鬼，他就开亮车灯，开枪打他，不是一枪，而是好几枪，而且也不是打在腿上。马扎尔人就开始走过去。他走到小屋，整个地区突然被探照灯照得大亮了，把小屋、车道、周围一大片都照亮。接着好几件事情一齐发生。吉姆并没有全都看到，因为他忙着把汽车转向。他看见四个人从树上跳下来，吉姆依稀看到其中一个打昏了马扎尔人。这时有人开了枪，但那四人不加理会，他们往后退身，让人拍照。枪似乎是朝探照灯后的晴空打的。整个场面十分戏剧化。放了照明弹、信号弹，甚至曳光弹，吉姆开着菲亚特汽车急驰逃跑时，他觉得好像是一场夜间军事演习达到了高潮。他几乎脱了身——他真的觉得已经脱了身——但是右边森林中有人在近处开了机关枪。第一发子弹打掉一个后轮，车子翻了，掉到了左边沟里，他看到车轮从车头盖上飞出去。沟大概有十尺深，但是积雪软软的，他没有受伤。车身没有着火，他就躲在后面等，脸朝着公

路的对面，想开枪打那机关枪手。第二发子弹是从他身后来的，把他震得贴在车身上。森林里大概尽是军队。他知道自己中了两枪。两枪都打在他的右肩上，他躺在那里一边观察着这场演习，一边不由地觉得奇怪，他的胳膊居然没有被打掉。警笛响了两三下。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但是枪声仍旧不断，足够让这里的野兽吃惊好几年了。那辆救护车令他想起了好莱坞那种老式消防车，方方正正的。军事演习一本正经地在进行，但是那些急救人员却毫不在意地站在那里向他呆看着。他听到又有一辆汽车开来，听到说话声，又拍了几张照片，这次没有弄错对象，但是这时他已慢慢失去知觉。有人在下命令，但是他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因为用的是俄语。他们把他扔在担架上，这时灯光灭了，他惟一的念头是回伦敦去。他以为自己是在圣詹姆斯的公寓里，身边是彩色图表和一张张笔记，他坐在小沙发里，向老总解释，他们两人到了老年以后会成为干他们这一行史上最大的笨蛋。他的惟一安慰是，他们打昏了马扎尔人，但是现在回顾起来，吉姆恨不得折断他的脖子，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一点也不后悔。

要吉姆这样的人谈一谈中枪以后的痛楚，他肯定是会要求饶了他的。但在史迈利看来，这样的硬汉确实令人敬畏，尤其是因为他似乎若无其事。他自己的解释是，他说的经历缺了这一段是因为他昏过去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救护车一直往北开。他是从他们开门让医生进来时，从树上看出来的：他往后看到的部分积雪最深。路面很好，他猜想是行驶在往赫拉德兹去的公路上。医生替他注射了一针。他醒过来时已在监狱医院里，高高的窗户上钉有铁条，有三个人监视着他。他动了手术以后，醒过来时又换了一个牢房，一扇窗户也没有。他记得第一次讯问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那是他们把他的伤口缝起来七十二小时以后，不过这时他已记不清什么时间了，他们早已拿走了他的手表。

他们不断地给他挪地方。不是挪房间，就是挪监狱。挪房间要看是干什么，挪监狱要看是谁讯问他。有时候只是为了不让他睡觉，夜里要他在监狱走道里走来走去。也曾经用卡车载他换地方，有一次还用捷克运输机，不过那次飞行时把他绑了起来，蒙了面罩，飞机一开，他就昏了过去。除此以外，他对于历次讯问都分不清楚，就是想弄清楚也没有用，一想反而更糊涂了。他仍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等待第一次讯问开始时自己拟好的应付计划。他知道不可能保持缄默，为了让自己神经不至于错乱，或者为了活命，答话是免不了的，因此要使他们相信，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就想好了几条防线，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一道道退守，最后造成全面崩溃的印象。他想他的第一道防线，而且也是最可以轻易放弃的防线，是作证计划的简单轮廓。谁也不知道他是栽进来的，还是被出卖了。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捷克人对斯蒂夫契克的情况比吉姆了解得多。因此他第一步要退让的是斯蒂夫契克，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要他们花力气。他先要否认一切，坚持原来掩护的身份。抵抗一阵以后，他就承认是英国间谍，工作姓名叫埃利斯，这样如果他们公布的话，圆场至少能知道他还活着，仍在想办法。他毫不怀疑，陷阱布置得这么费工夫，而且还拍了照，一定要掀起一场吵吵闹闹。在这以后，根据他与老总商量好的，他要坚持这事是他个人搞的，未经上级同意，目的是想立功。他要把圆场里面有间谍的想法埋葬起来，埋得越深越好。

“没有地鼠，”吉姆凝视着昆托克山黑黑的山影说，“没有和老总见面，没有圣詹姆斯的公寓。”

“没有锅匠、裁缝。”

他的第二道防线是麦克斯。他想先否认带了一个跑腿的来。后来再说他带了一个来，但不知道他的名字。由于大家都喜欢有个名字，他再给他们一个：先是给个错的，然后给个对的。到那个时候，麦克斯一定已经脱了身，或者转入地下，或者被逮住了。

接着在吉姆想像里出现的是一系列不那么守得牢的阵地：最近剥头皮组的活动、圆场的传说，只要能使讯问他的人以为他已经垮了，什么都谈，他所了解的也就是这些了，他们已攻破了最后一道战壕。他要搜索枯肠，想起剥头皮组以前的一些活动，如有必要，还把最近转向的和被“勒索”的一两个苏联官员或附庸国官员的姓名告诉他们，还有在过去曾经做过一缸子买卖的人，由于他们没有叛逃，因此很有可能是“勒索”的对象或者是做第二次买卖的对象。凡是他能想到的肉骨头，他都扔给他们，如有必要，甚至把布里克斯顿的整个“马厩”都卖给他们。这都是为了要掩护吉姆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情报，因为他们一定是认为他拥有这个情报的：阿格拉瓦特谍报网和柏拉图谍报网在捷克方面的人员姓名。

“兰德克朗，克里格罗娃，比罗娃，普里比尔夫妇。”吉姆说。

为什么他选择的姓名次序也是一样的？史迈利心里纳闷。

这两个谍报网，吉姆早已不负什么责任了。多年以前，还在他负责布里克斯顿以前，他帮助成立了这两个谍报网，有些人当初还是他吸收来的。在这以后，他们在布兰德和海顿手中几经波折，这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他肯定知道，他仍掌握一些他们的情况，说了出去足以让他们丧命。他最担心的是老总，或者是比尔或潘西，或者不论是哪一个当时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过于贪得无厌，或者是行动过于缓慢，等到吉姆在他无法想像的严刑逼供之下，除了完全招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时候，没有及时撤出这两个间谍网的人。

“结果这只是个笑话，”吉姆一点也没有笑意地说，“他们对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向我问了十几个关于阿格拉瓦特的问题以后，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作证计划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他们也完全知道老总在维也纳为斯蒂夫契克买护照的事。他们就是在我关门的地方开始的：圣詹姆斯公寓的指示。他们没有问我关于跑腿的事，他们对谁开汽车送我去与马扎尔人碰面不发生兴趣。他们要谈的只是老总的烂苹果一说。”

一个词，史迈利又想，很可能只是一个词。他问道：“他们真的知道圣詹姆斯这个地址吗？”

“他们连那蹩脚雪利酒的牌子都知道，老兄。”

“还有图表？”史迈利马上问，“装乐谱用的袋子？”

“不。”他又说，“原先并不知道。”

斯蒂德·阿斯普莱曾说要从小里面往外推敲。史迈利想，他们知道，是因为地鼠杰拉德告诉了他们。地鼠所以知道，是因为管理组从老麦克法迪安那里打听出来的。圆场进行了事后分析：卡拉坐享其成，把结果用来对付吉姆。

“现在我想你大概开始相信老总是对的：的确有一只地鼠。”史迈利说。

吉姆和史迈利倚靠在一道木栏门上。他们脚下地势倾斜，下面是一片蕨丛和田野。还有一个村子、海湾和月光下细细的一道海面。

“他们开门见山。‘为什么老总要单干？他想得到什么？’我说：‘他想东山再起。’他们于是笑道：‘靠布尔诺一带军事部署这样鸡毛蒜皮的情报？那连给他在俱乐部吃顿饭的钱都不够。’我说：‘也许他已无法控制了。’如果他控制不住，那么是谁在踩他的手指？我说是阿勒莱恩，这就引起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阿勒莱恩和老总都抢着要拿出谍报来。我说，但是在布里克斯顿，我们听到的只是传说。‘有什么谍报阿勒莱恩能够拿出来，而老总拿不出来呢？’我不知道。‘但是你刚才说阿勒莱恩和老总抢着要拿出谍报来。’这是传说，我不知道。”又回到了牢房。”

吉姆说，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他不是蒙着面罩生活在黑暗里，就是在牢房刺目的灯光下。没有昼夜，为了要使你搞不清昼夜，他们一天到晚闹声不断。

他解释说，他们是按照生产装配线的方式对他审讯的：不让他睡觉，连续讯问，搞得你晕头转向，外加拷打，一直到他觉得讯问成了精神恍惚和完全崩溃之间的一场缓慢的赛跑。当然，他希望能精神恍惚，但这不是由你自己做主的事，因为他们有办法把你拉回来的。不少拷打手段是用电击的。

“这样我们又重新开始，另起炉灶。‘斯蒂夫契克是个重要的将领。如果他要求派一个英国资深人员来，他当然认为对方对他生涯各方面情况都十分了解。而你却对我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我说我是从老总那里听来的。‘你在圆场看过斯蒂夫契克的档案吗？’没有。‘老总呢？’我不知道。‘老总从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工作得出什么结论？老总有跟你谈到斯蒂夫契克在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的任务？’没有。’他们坚持这个问题不放，我则坚持我的回答，因为在我回答了几次没有以后，他们有点火了。他们似乎失去了耐心。我昏过去以后，他们用水把我浇醒，继续再问。”

吉姆说，又挪了地方。他的话有些颠三倒四起来。牢房、走道、汽车……机场、要人待遇、上飞机前遭到一场毒打……飞机上打瞌睡，遭到惩罚：“又在一个牢房中醒了过来，房间小一些，墙上没有油漆。有时，我想大概身在俄国。我根据天上的星星判断我们飞到了东方。有时我仿佛感到身在沙拉特，又在接受对付审讯的训练。”

他们有两天没有来找他。脑袋迟钝发胀。他的耳朵里总是响着森林中的枪声，眼前总是看到那场假演习的情景，最后那场审讯在他的记忆中像场马拉松长跑一样，他一进去就已经感到心力交瘁，这对他很不利。

“多半也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解释道，精神很疲惫。

“我们要不要歇一会儿？”史迈利说，但是吉姆正说到重要关头，无法停下来，何况他要不要什么，无关紧要。

吉姆说，这一场讯问时间很长。在中间他一度谈到了老总的笔记和图表，还有蜡笔。他们狠狠地揍他，他记得在场的全是男人，坐在屋子那一头，看上去像是一堆去死的医科学生，在窃窃私议。他把蜡笔告诉他们只是为了不要冷场，让他们住手听他说，他们听他说了，可是没有住手。

“他们一听说蜡笔，就问各种颜色是什么意思。‘蓝色指什么？’老总没有蓝色蜡笔。”红色指什么？红色代表什么？把图表上的红色给我们举个例子。红色指什么？红色指什么？红色指什么？”接着大家都撤出去了，只留下两个警卫，一个冷冰冰的小个子，腰板挺直，像是个头头的样子。他们把我带到桌边，这个小个子坐在我身边，双手交叉在胸前。他的前面放着两支蜡笔，一支红，一支绿，还有一张斯蒂夫契克履历的图表。”

其实，并不是吉姆垮了，而是他想不出什么招数来了。他编不出别的故事来了。他深深埋藏的事实都一个劲儿地提醒他要说出来。

“于是你把烂苹果告诉了他。”史迈利提示道，“你也把锅匠、裁缝告诉了他。”

是的，吉姆承认他招了。他告诉对方，老总认为斯蒂夫契克能够指出圆场里的地鼠是谁。他也告诉他，他们用的锅匠、裁缝的暗号，每个暗号代表谁，逐一地说了名字。

“他的反应怎么样？”

“想了一会儿，给我一支烟。我不喜欢那破烟。”

“为什么？”

“美国烟的味道。骆驼牌，那一类的烟。”

“他自己抽了吗？”

吉姆点一点头。“烟瘾大极了。”他说。

在这以后，吉姆说，时间又过得很快。他被带到一个营区里，他估计是在城外，他住在一个院子里，外面围着两道铁丝网。由一个警卫搀着，他不久就能走路了，有一天甚至到森林中去走了一遭。营区很大，他自己的那个院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夜里他可以看到东面城市的红光。警卫都穿蓝色工作服，都不说话，所以他不知道究竟是在捷克，还是俄国，但他敢打赌是在俄国，因为外科医生来检查他的背时，通过一个俄语翻译表示对原来医生的手术不满。讯问时断时续，但已没有敌意。他们另外派了人，但和原来十一个人相比，从容不迫多了。一天夜里他被带到一个军用机场，由一架皇家空军战斗机载到了因弗内斯，又改乘一架小飞机到埃尔斯屈里，然后坐汽车到沙拉特，都是夜间旅行。

吉姆这时已匆匆结束了他的叙述。他正要谈到他在训练所的经历，史迈利却问他：“那个头头，那个冷冰冰的小个子，你后来没有再见到他？”

吉姆承认后来又见到过一次，那是他回来之前不久。

“为什么？”

“闲聊，”声音大得多了，“谈些圆场人物的琐事。”

“哪些人物？”

吉姆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谈些在上层的是哪些人物，在下层的是哪些人物，谁可能继承老总。“‘我怎么知道？’我说，‘那些警卫比布里克斯顿还要消息灵通。’”

“那么确切地说，这些闲谈中谈到谁最多？”

吉姆愠愠地说，主要是罗埃·布兰德。布兰德的左倾观点怎么能与圆场的工作协调呢？吉姆说，他没有什么左倾观点，因此不会有协调的问题。布兰德在伊斯特哈斯和阿勒莱恩的心目中的地位怎么样？布兰德对海顿的油画有什么看法？罗埃喝多少酒，如果海顿不支持他，结果会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吉姆的回答都很含糊。

“还提到谁？”

“伊斯特哈斯，”吉姆仍用不高兴的口气回答，“那个王八蛋要知道怎么会有人信任一个匈牙利人。”

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甚至在他自己看来也似乎使得整个黑黢黢的山谷寂然无声。

“关于我也说了些什么吗？”他又说一遍，“对我他说了什么？”

“给我看一只打火机。说这是你的。安恩的礼物。上面刻着‘爱你的安恩’，还有她的签名。”

“他提过他怎么得到的吗？他怎么说，吉姆？说吧，我不会因为一个俄国无赖耻笑我就不高兴的。”

吉姆的回答像军队的命令一样干脆。“他说，在与比尔·海顿发生关系以后，她可能想改换上面的题词。”他突然向汽车走去。“我告诉他，”他生气地叫道，“我当着那小老头儿的皱皮脸告诉他。你不能根据那样的事情来判断比尔的为人。艺术家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看法跟我们不同。他们的感情我们无法体会。那个小王八蛋听了只是大笑。他说，‘不知道他的画有那么好。’我告诉他，乔治，‘滚你妈的。滚你妈的。要是你们有一个像比尔·海顿那样的人，你们才算有资格说呢。’我对他说：‘真是天晓得，’我说，‘你们这算是什么呀？是个情报机关，还是他妈的救世军？’”

“说得好。”史迈利终于说，好像是在评论别处的一场辩论似的，“那个人你以前没有见过吗？”

“谁？”

“那个冷冰冰的小个子。你不认识他——比如，很久以前就不认识吗？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受到训练，要熟记一些脸孔，中心的人

物照片，有时候见了就忘。即使一时想不起名字来。反正这个人的名字你想不起来了。我只是好奇。我想你当时有不少时间回想，”他继续说，好像在聊天，“你躺在那里养伤，等回国，你有什么好干呢，除了回想？”他等了一会儿。“因此我不知道你想起了一些什么？这次任务。我想大概是在想你的任务。”

“断断续续地想到。”

“结论呢？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有什么怀疑、看法、暗示，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你，”吉姆很不高兴地说道，“你了解我，乔治·史迈利，我不是变魔术的人，我是个——”

“你是个搞实际活动的人，让别人替你动脑筋想问题。但是，你既然知道你被骗进一个大陷阱里，被出卖了，背上中了枪，几个月来躺在那里无事可干，只好在俄国牢房里来回踱步，我想即使是最最不爱动脑筋的实干家”——他的声音里一点也没有友善的味道了——“也会觉得奇怪，不由得要想一想自己怎么会掉进这样一个圈套的。以作证计划为例，”史迈利朝他面前那个一动也不动的人影说，“作证计划使老总的生涯完蛋。他丢了脸，他无法再追查地鼠，我们姑且假定有一只。圆场领导更替。老总死得正是时候。作证计划也发生了其他作用。它向俄国人透露——实际上是经由你——老总的怀疑到了什么程度。那就是他把嫌疑对象缩小到了五个人，就到此为止。我不是说你在牢房里等待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毕竟，你蹲在牢房里，一点也不知道老总已被撵了出来——尽管你可能想到，俄国人在森林里搞的那场假演习是为了要引起一场风波。是不是？”

“你忘记了那两个谍报网。”吉姆迟钝地说。

“哦，那个，在你出场前捷克人早就盯住他们了。把他们一网打尽只是为了加重老总的失败。”

史迈利提出这些论点时，用的那种东拉西扯的聊天口吻在吉姆身上没有引起反应。史迈利等他说话，但他半天不开腔，于是也不再追究下去了。“好吧，你就谈一谈在沙拉特的经过吧。然后就此打住？”

他难得这样健忘，竟然自己先喝一口伏特加，然后把酒瓶递给吉姆。

从吉姆的声音听来，他已经厌烦了。他说得很急很快，也很生气，话说得很短，完全是军人的口气，这是他逃避伤脑筋的一个办法。

他说，在沙拉特的四天完全过得浑浑噩噩：“大吃，大喝，大睡。在板球场上散步。”他很想去游泳，但游泳池在整修，跟六个月前一样，效率极低！他身体做了一次检查，在屋子里看电视，跟负责照顾他的克兰科下棋。

同时他等老总出现，但是老总始终没有出现。圆场来见他的第一个

人是负责遣散工作的，跟他谈到了有个愿意帮忙的教职员介绍所，接着是会计部的人来谈他的退休金，最后又是那个医生来谈医药费。他等讯问人员来，但他们始终没有来，这使他感到放心，因为他在没有得到老总的“绿灯”开放前，不知道该向他们说些什么，而且他已经被讯问得够多的了。他猜测是老总不让他们来。但是他觉得这简直没有道理，他已经把一切告诉了俄国人和捷克人，没有必要再瞒讯问人员，但是他在得到老总的指示以前，有什么办法呢？由于老总没有传话来，他曾想到去见拉康，把情况告诉他。但是他又觉得老总大概是等他在训练所审查清楚以后再来找他。他又病了几天，病好以后，托比·伊斯特哈斯穿了一身新衣服来了，表面上是来跟他握握手，祝他好运，实际上是来跟他说明情况。

“派他来见我真是奇怪，但他似乎很得意。这时我又想起老总说过的，只用下层单位的人的话。”

伊斯特哈斯告诉他，由于作证计划，圆场几乎垮台，吉姆现在成了圆场的头号“麻风病人”。老总已经下台，为了使白厅息怒，正在进行改组。

“这时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吉姆说。

“不要担心什么？”

“关于我的特殊任务。他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真正情况，我不用担心，因为这事已经有人在收拾了。实情都已知道了。这时他给我一千英镑，补助我的医药费。”

“谁的钱？”

“他没有说。”

“他有没有提到老总关于斯蒂夫契克的论点。也就是中心在圆场里安置了卧底间谍？”

“事实都已知道了，”吉姆生气地重复一遍，“他命令我不要跟任何人联络，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别人，因为最上层已经负责处理了这件事，我若轻举妄动就会误事。圆场又恢复原状。什么锅匠、裁缝，什么地鼠等等，我一股脑儿都要忘掉。‘放手吧，’他说，‘吉姆，你算是幸运的，’他不断这么说，‘现在命令你忘掉一切。’你能够忘掉吧？那就忘掉吧。就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提高了音量在喊叫，“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服从命令，忘掉一切！”

史迈利突然发现夜景纯洁无瑕，它就像一块大画布，上面什么也没有画，不论什么坏的、邪恶的东西都没有画在上面。他们并肩站在那里，从下面山谷里的点点灯光望过去，远处天际有块突起的岩石。岩石顶上有个高塔，史迈利仿佛觉得这就是旅程的终点。

“是的，”他说，“我也在忘掉一切。那么托比确实跟你提到了锅匠、裁缝。不管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除非……比尔带来什么口信吗？”他

继续问，“连明信片也不寄一张？”

“比尔在国外。”吉姆说。

“谁告诉你的？”

“托比。”

“那么你一直没有见到比尔：自从作证计划以后，你最要好的老朋友，就此不再露面了。”

“你听到托比的话。我不许跟人接触，处在隔离状态。”

“不过比尔从来不是严格遵守规定的人，是不是？”史迈利用回忆往事一般的口气说。

“你对他的看法向来是不对的。”吉姆嚷道。

“你到捷克去之前来找我，我不在家，很抱歉。”史迈利稍停一下说。“老总把我打发到德国去了，免得碍事，等我回来——你当时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没有什么。觉得捷克的事有点蹊跷。觉得要跟你打个招呼，道别一下。”

“在出发之前？”史迈利有些奇怪地问，“在出发去进行这样一个特殊任务之前？”吉姆没有表示他听到了这句话。“你跟别人打了招呼没有？我想当时我们都不在国内。托比、罗埃……比尔，跟他打了招呼吗？”

“谁也没有。”

“比尔在休假，是不是？不过我觉得他总是没有走远的。”

“谁也没有。”吉姆坚持说，他的右肩感到一阵疼痛，他就抬了一下，转动一下脑袋。“都不在家。”他说。

“这很不像你的作风，吉姆，”史迈利仍温和地说，“在出发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到处跟人家告别。你大概是年纪大了，多愁善感起来。你不是……”他犹豫了一下，“你不是要想征求别人的意见吧？因为，你认为这次任务是乱来，是不是？而且觉得老总有些糊涂了。你是不是觉得要找个第三者商量商量？不过我也认为这有些蹊跷。”

斯蒂德·阿斯普莱曾经说过，先要了解事实，然后像试衣服一样试试每段故事。

吉姆愠怒不语，他们就在沉默中回到车子里。

在汽车旅馆里，史迈利把他大衣口袋里二十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掏出来，放在搪瓷桌面上，排成两行。有的是快照，有的是人像照，都是男人，没有一个看上去像英国人。吉姆一下子就拣出了两张交给史迈利。他喃喃地说，第一张他是有把握的，第二张不太有把握。第一张就是那个头头，态度冷冰冰的小个子。第二张是在打手们揍吉姆的时候，站在后面看的那个王八蛋。史迈利把照片放回口袋。他斟满了临睡前的

两杯酒的时候，要是换了另一个旁观的人，若不像吉姆那样心事重重，也许会注意到他有一种举行庆典那样的神情，尽管不完全是得意洋洋，好像这杯酒一喝，大局已定。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比尔，跟他谈话，究竟是什么时候？”史迈利问，好像是问到一个老朋友一样。吉姆显然在想别的事，因为他过了一會兒才抬起头来，想听明白问的是什么。

“哦，大概是，”他不经意地说，“我想大概是在走廊里碰到的。”

“跟他谈话了吗？算了。”因为吉姆又在想别的了。

吉姆不要史迈利开车直接把他送回学校。史迈利得在不远处让他下车，那是在柏油道路尽头，可以穿过坟场到教堂里去。他说他把练习本忘在那里了。史迈利在刹那间相信了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已得出这样的看法：吉姆干这一行三十年之后，仍不善于说谎。史迈利看到他一边高一边低的身影往诺曼式门廊走去，他的脚后跟在坟墓之间铿铿作响，好像枪声一样。

史迈利开车到汤顿，从城堡旅馆打了一些电话。他虽精疲力竭，但是仍睡得不太好，不时梦见卡拉拿着两支蜡笔坐在吉姆桌旁，那个化名维多洛夫的文化参事波里雅科夫因为担心地鼠杰拉德的安全，在讯问室里焦急地等着吉姆招供。最后是托比·伊斯特哈斯代替海顿出现在沙拉持，满面春风地叫吉姆忘掉锅匠、裁缝和想出这个暗号而死去的老总。

也在那天晚上，彼得·吉勒姆开车西行，横过英格兰到利物浦去，车中惟一的乘客是里基·塔尔。这次旅途很无聊，天气又糟。因为塔尔一路上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一旦完成使命就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升到什么位置。接着又谈他的女人：丹妮、她的母亲、伊琳娜。他似乎梦想这两个女人能够和他同居在一起，照顾丹妮和他自己。

“伊琳娜有许多母性的特点。这也让她充满挫折感。”他说，鲍里斯可以滚开，他会告诉卡拉保留他。一接近目的地，他的情绪又起了变化，忽然沉默起来。早晨天气很冷，多雾。在郊外，他们得放慢到爬坡的速度，骑摩托车的人追过了他们。汽车里充满了煤烟和钢铁的味道。

“别在都柏林久留，”吉勒姆突然说，“他们以为你是走好走的路线，因此别露面。马上搭飞机走。”

“这，我们都已谈过了。”

“我还要谈，”吉勒姆反驳道，“麦克尔沃的工作假名是什么？”

“我的天！”塔尔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了出来。

爱尔兰渡轮启程时天还是黑的。到处都有军队和警察，令人想起这场战争、上次战争、再上一次的战争。一阵猛烈的风吹过海面，航行似乎很不平静。在码头边，当渡轮的灯光很快地退到黑暗中去时，小小的人群似乎暂时有了一种相依为命之感。远处有个女人在哭，还有个醉汉在庆祝他得到解放。

他慢慢地开车回去，想要弄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新的吉勒姆突然听到人声就感到吃惊，老是做噩梦，不仅不能保住自己的女朋友，而且老是想出一些奇怪的理由来怀疑她。他问过她桑德的事，为什么这么晚回家，为什么保密。她严肃的棕色眼睛盯着他看，听了他的话以后，她说他是个笨蛋，说完就走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她说，从卧室里拿走了她的衣服。在他人去楼空的公寓里，他打电话给托比·伊斯特哈斯，约他一叙。

史迈利坐在大臣的劳斯莱斯汽车里，拉康坐在他旁边。在安恩家里，这种汽车叫做黑色的便盆，因为他们不喜欢它的豪华。他们叫司机去吃早餐。大臣坐在前座，大家都朝着前面长长的车盖，看到河的对岸巴特西发电厂在雾中的烟囱。大臣后脑勺的头发很密，在耳根处卷成黑色的小卷。

“如果你是对的，”大臣在经过了一段葬礼般的沉默后说，“我不是说你不对，只是如果你是对的，那么今天结束时会打碎多少瓷器？”

史迈利不完全懂得他这话的意思。

“我是说会造成什么丑闻。杰拉德到了莫斯科。那么好吧，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跳到肥皂箱上去，在大家面前痛快地笑一场，因为他把我们这里的人都玩弄了一下？我说，我们大家在这件事里都有共同利害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让他走，拆我们的台脚，让国安局来收拾残局。”

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试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只是因为俄国人知道了我们的秘密，并不能说其他人都应该知道。除了这些秘密以外，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操心。那些黑人怎么办？难道他们在一星期之后，会在小报上读到这些骇人听闻的细节？”

或者让他的选民，史迈利心里想。

“我认为总有一点是俄国人可以接受的。”拉康说，“毕竟，要是你把你的敌手搞成一个笨蛋，你也就没有理由这样严阵以待了。”他又说：“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利用过到手的机会，是不是？”

“那么好吧，一定要他们不要越线。用书面告诉他们。不，不要用书面。不过你要告诉他们礼尚往来。我们不公布中心的机密，因此他们也可以合作，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史迈利谢绝了开车送他，说走一走对他有好处。

那天是瑟斯古德值班，他感到万事都很不顺心。在他看来，校长应该免掉杂差，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出谋划策当领导。他穿上剑桥大学长袍并不感到安慰。当他站在体育馆看着学生列队进来准备点名时，他的眼光狠狠地盯着他们，不乏露骨的敌意。但是火上加油的是马乔里班克斯。

“他说是因为他母亲，”他在瑟斯古德左耳旁低语道，“他接到电报，想马上走。他甚至连茶也没喝。我答应他向你代为请假。”

“真可恶，太可恶了。”瑟斯古德说。

“要是你不反对，我代他上法语课。我们可以把五班和六班并在一起上课。”

“我很生气。”瑟斯古德说，“我一时心很乱。”

“欧文说会代替他负责橄榄球决赛。”

“有报告要写，考试要考，橄榄球决赛要比。那个老太婆怎么啦？大概只是流感，季节性的流感。我们都得过流感，我们的母亲也都得过流感。她住在哪里？”

“从他对苏说的来看，我觉得她已病危。”

“那也好，他下次总不能用这个借口了。”瑟斯古德说，仍很不高兴，猛喝一声，叫大家安静，开始点名。

“罗奇？”

“生病了，先生。”

真是祸不单行。学校里最有钱的一个学生因为父母不和而精神崩溃，做父亲的扬言要帮儿子转学。

同一天下午快四点钟的时候，吉勒姆看一看周围那个阴暗的公寓房间，心里想：安全联络站我见过可不少了。他能够像到处跑的推销员，用三言两语介绍旅馆那样介绍这种房子：从贝尔格拉维亚住宅区头等的明镜大厅、威基伍德式的壁柱和镀金的橡树叶，到剥头皮组在列克森姆花园这里租的两间破房，里面尽是积尘和淤水的气味，在黑黝黝的前厅里还有一个三尺高的灭火器。壁炉架上有骑士就着锡壶喝水的雕像。桌上放着贝壳做的烟灰缸。在灰色的厨房里，有无名氏贴的“随时关掉煤气大小两个开关”的纸条。他走过前厅时，听到了门铃响，十分准时。他提起话筒，听到里面托比失真的声音。他按了一下按钮，听到楼梯下面电锁启门声。他打开前门，但仍扣着门链，弄清楚托比是单独来以后才松开门链。

“你好吗？”吉勒姆高兴地放他进来说。

“很好，彼得。”托比说，脱下大衣和手套。

茶盘上放好了茶杯，那是吉勒姆准备的，两个杯子。安全联络站都有一定的服务标准。原因不一。或者是因为你假装住在那里，或者是因为你能随遇而安，或者是因为你就是设想周到。吉勒姆认为干他们这一行，什么都要显得自然，这是一种艺术。这是卡米拉所认识不到的。

“这天气真是怪得厉害。”伊斯特哈斯说，好像真的在分析气候一样。安全联络站的寒暄话总不脱这一套。“刚走几步就累垮了。你说，有个波兰人要来？”他坐下来，说，“一个做皮货生意的波兰人，你认为可以替我们传送情报？”

“马上就到。”

“我们认识他吗？我让我的人查了一下他的名字，可没找到。”

我的人。吉勒姆想，我得记住学会使用这句话。“自由波兰人协会几个月前跟他接洽过，把他吓跑了。”他说，“后来卡尔·斯塔克在仓库那边碰到他，认为他可能对剥头皮组有用。”他耸一耸肩，“我倒喜欢他，但这有什么用？我们自己人都闲着没事。”

“彼得，你真大方。”伊斯特哈斯尊敬地说，吉勒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是不是露了马脚。正好这时门铃响，法恩在门外站岗。

“对不起，托比，”史迈利说，爬了楼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彼得，我的大衣挂在哪里？”

吉勒姆把托比往墙边一推，抓起了他没有抗拒的双手，叫他扶着墙，然后慢条斯理地搜查他的身上。托比没有带枪。

“他一个人来的吗？”吉勒姆问，“还是有个小朋友等在马路上？”

“我没有发现。”法恩说。

史迈利站在窗口，看着下面街上。“把灯关上一会儿，好不好？”他说。

“等在外面。”吉勒姆命令道。法恩拿了史迈利的大衣退出去。“瞧见什么吗？”他也到窗口边去问史迈利。

伦敦的下午这时已经有了红里带黄的暮色。广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区广场，中央有个围着栏杆的小花园，天已经黑了。“只是一个影子，我想。”史迈利咕哝一句，回过来面对着伊斯特哈斯。壁炉上的钟敲了四下。法恩一定上过发条了。

“托比，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假设。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推想，行吗？”

伊斯特哈斯眼睛眨也没眨。他小小的手放在椅子的木头扶手上。他坐得很舒服，但稍微有些正襟危坐，鞋子擦得很亮，双脚平放。

“行吧。”

“两年以前。潘西·阿勒莱恩想要谋得老总的职位，但他在圆场没有地位。老总不让他。老总有病，体力日衰，但潘西搞不垮他。记得那时候吗？”

伊斯特哈斯利落地点一下头。

“那是在淡季，”史迈利用他讲道理的口气说，“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因此我们里面就钩心斗角起来，互相侦察。有一天早晨，潘西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没事干。他有个挂名职务，是活动总指挥，但实际上是个地区组与老总之间的橡皮图章。潘西的门开了，进来了一个人。我们暂且叫他杰拉德。‘潘西，’他说，‘我碰到了一个新的俄国情报来源。很可能是个金矿。’也可能他什么也没有说，等到他们两人到了大楼外面以后再说，因为杰拉德是做惯外勤的，他不喜欢在室内有电话的地方说话。他们可能在公园里走一走，或者开着汽车。也可能在什么地方吃饭，在这个阶段，潘西只有听对方说话的份儿。潘西对欧洲方面没什么经验，更不了解捷克和巴尔干了。他是在南美洲出道的，后来一直在以前的地区活动：印度、中东。他对俄国人或捷克人知道得不多，他只知红就是红，如此而已。对不对？”

伊斯特哈斯撇起了嘴，皱了一下眉头，好像是说他从来不议论上级。

“而杰拉德却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欧洲市场上东躲西遁。潘西是外行，但有兴趣。杰拉德则是这方面的行家。杰拉德说，这个俄国来源可能是圆场多年来碰到的最丰富的来源。杰拉德不想多说，不过他估计过几天就可以拿到贸易样品，拿到后，他想请潘西检查一下，鉴定价值。至于这个来源的详细情况，可以以后再说。‘但是为什么找我呢？’潘西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杰拉德告诉他。‘潘西，’他说，‘对外活动损失这么大，我们地区组里的人感到很担心。看来这地方已经腐败了。圆场内内外外，口风都太松了。接触机密的人太多，在现

场，我们的人碰了壁，我们的谍报网被破获了，有什么新花招总发生意外。我们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整顿一下。’杰拉德并不想谋乱叛上，他很小心，没有暗示圆场内部有个叛徒正在破坏一切活动，因为你我都明白，一旦这种话传出去，机器就要停转。反正杰拉德不想追查。但是他明确表示，这个地方有漏洞，上层领导不力是下层失败的原因。这在潘西听来都是十分顺耳的东西。他列举最近的失败所引起的丑闻，但是他很小心不提阿勒莱恩自己在中东的冒险，这次冒险出了问题，几乎让潘西丢了差使。接着他提出建议。他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一些。你明白，这是我的假设，只不过是假设。”

“是啊，乔治。”托比舔一下嘴唇说。

“另一个假设是阿勒莱恩自己就是杰拉德，你明白吗？不过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潘西会自己出马，收买个高级俄国间谍回来，又自己掌舵。我相信他会把事情搞糟的。”

“是啊。”伊斯特哈斯有绝对自信地说。

“因此，根据我的假设，杰拉德接着对潘西说的是：‘我们——那是指我自己和有类似想法、与这方案有关的人——希望你出来担任头头，潘西。我们不过问政治，我们是实干家。我们不懂白厅里的纵横捭阖。但是你懂。你负责应付各种委员会，我们负责对付巫师。如果你当我们的挡箭牌，保护我们不受腐败的影响，也就是说把了解这件事的人数维持在最低限度，我们就提供货物。’他们又讨论了这样做的办法，然后杰拉德让潘西去考虑一下。一个星期，一个月，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充裕时间可以让潘西仔细考虑。有一天，杰拉德送了第一批货样来。当然很好，非常非常之好。正好是海军要的资料，没有比这更适合潘西的要求了，因为他在海军部很吃得开，海军部里全是支持他的人。于是潘西让他的海军朋友开了一下眼界，他们个个垂涎欲滴。‘这是从哪儿搞来的？以后还有吗？’以后还有很多。至于来源是谁——这在现阶段还得保密。如果我在什么地方说得不对，请原谅我，因为我所根据的只是那份档案。”

一提档案，是史迈利的行动可能具有官方身份的第一个提示，可以看得出来在伊斯特哈斯身上引起了反应。他舔嘴唇的习惯又多了一个附带动作：脑袋向前一伸，脸上有了他一贯的精明表情，托比好像是要用这些信号表示他也读过这份档案，不论这份档案是什么，而且完全同意史迈利的结论。史迈利停下来喝口茶。

“托比，再喝一点茶吗？”他一边喝一边问。

“我来。”吉勒姆与其说是殷勤好客，不如说是态度坚决。“茶，法恩。”他向门外叫道。门马上升开了，法恩出现在门口，端着茶。

史迈利又回到窗边。他拉开一点窗帘，看着下面的广场。

“托比？”

“什么，乔治？”

“你带了把风的来吗？”

“没有。”

“一个也没有？”

“乔治，我是来跟彼得和一个可怜的波兰人见面的，我为什么要带把风的来？”

史迈利回到椅上。“巫师作为一个来源，”他说下去，“刚才我说到哪儿啦？对了，杰拉德后来逐步告诉潘西和他后来拉进巫术圈子的另外两个人，不难设想，巫师不止是一个情报来源。没错，巫师是个苏联情报员，但是像阿勒莱恩一样，他也是一个不满上级集团的代言人。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情况也设想在别人身上发生，我相信潘西从一开始就对巫师有好感。这个集团以巫师为领袖的核心，由十来个有类似想法的苏联官员组成，每个人都位居要津。我猜测到了一定时候，杰拉德向他的副手和潘西更加具体地介绍了其他来源，但是我没有把握。巫师的工作是把他们的谍报收集整理以后送到西方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做这项工作表现了他的多才多艺。他用了各种方法，圆场非常乐意提供设备给他。秘密通讯、在普通信件句号上的微点、西方首都的秘密信箱，如此等等，不知道是哪个大胆的俄国人送去的，由托比·伊斯特哈斯大胆的点路灯人收来。甚至有当面碰头，由托比的人安排和把风。”——史迈利停了一会儿，又看一眼窗户——“有一两次是在莫斯科由当地常驻地投递，但是不让他们知道交付者是谁。但是没有秘密无线电通讯。巫师不喜欢秘密电台。有一次建议——甚至提到财政部——在芬兰设立一个长期的远距离无线电通讯，目的只是为他一人服务，但后来吹了，因为巫师说：‘绝对不要。’他大概是接受卡拉的教训，会不会是如此？你知道卡拉最讨厌无线电。重要的是，巫师有他的机动性，那是他最大的才干。可能他在莫斯科贸易部可以利用跑外务的推销员。反正，他有的是办法，而且有从俄国出来的渠道。因此他的同伙密谋分子要依靠他与杰拉德做交易，同意他商定的条件，金钱上的条件。因为他们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我早应提到这一点。在这方面，谍报机关和他们的客户跟常人一样。花钱最多，他们最重视，而巫师花钱最多。买过假画吗？”

“我曾经卖出过两张。”托比露出神经质的笑容说，但没有人笑。

“你付的钱越多，你越不怀疑它是假货。真傻，但我们都是这样。知道巫师贪财，大家就放心了。我们只懂这个动机，是不是，托比？特别是在财政部。每月在瑞士银行存两万法郎。为了这么多钱，谁不会牺牲一些平等主义的原则呢？因此白厅付了他一笔巨款，称他的情报是无价之宝。而且有一些的确不错，”史迈利承认，“我甚至觉得很好，而且也应该很好。接着有一天，杰拉德把最大的秘密告诉了潘西。巫师集团在伦敦也有个人。我现在应该告诉你，这样就开始打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巧结。”

托比放下茶杯，用手帕整洁地擦一擦嘴角。

“据杰拉德说，苏联驻伦敦这儿的大使馆有个人已准备好，而且他们

有能力充当巫师在伦敦的代表。他甚至处于特殊地位，偶尔可以利用大使馆的设备和在莫斯科的巫师直接联络，收发电报。如果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有时甚至可以让杰拉德跟这个神通广大的人秘密会见，报告情况，接受指示，提出问题，在下趟邮件就可收到巫师的答复。我们暂且叫这个苏联官员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姑且假定他是苏联大使馆文化处的人员。你在听我说吗？”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伊斯特哈斯说，“我聋了。”

“原来，他在伦敦使馆工作已经很久了——精确地说是九年——但是巫师最近才吸收他。也许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休假的时候吧。”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波里雅科夫很快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不久杰拉德就让他做巫术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和其他许多事件的关键人物。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情报秘密信箱、隐形墨水、微点，这都很有用，但是总差一点。有波里雅科夫在门口，这样的方便条件可不能错过。巫师有些最精彩的资料是用外交部信封带到伦敦的。波里雅科夫只需把信封撕开递给圆场的对手就行了：不论是杰拉德或是杰拉德指定的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巫师这一部分的活动是绝对机密的事。巫术委员会本身当然也是机密，不过人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范围很大，收益也很大，光是加工和分配就需要大量工作人员：译码员、翻译员、打字员、鉴定员，天知道还有什么人员。杰拉德对此并不担心，他喜欢这样，因为要充当杰拉德，窍门就在要成为大伙儿的一分子。巫术委员会是受下层领导的？还是受中间领导的？还是受上层领导的？谁也说不好。我很欣赏卡拉对委员会的看法，你呢？还是中国人的看法？他说一个委员会是一个有四条后腿的动物。

“但是伦敦那一边——波里雅科夫的侧边——这一部分只限于原来巫术圈子的人知情。斯科尔德诺、德·西尔斯基等人，他们可以随时到国外去，为巫师奔跑。但是在伦敦这里，活动只牵涉到波里雅科夫老弟，绳结就是这样打的，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秘密，原因也非常特殊。你，潘西、比尔·海顿和罗埃·布兰德。你们四个人是巫术圈子。对不对？现在来猜测一下这是怎么运作的，详细地来猜测一下。有一幢房子，这我们已经知道。尽管如此，碰面仍安排得极其周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谁跟他见面？托比？谁对付波里雅科夫？你？罗埃？比尔？”

史迈利把他领带宽的那头的绸衬里翻出来，开始擦眼镜。“谁都见。”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怎么会这样？有时潘西见他。我猜想潘西代表有关当局见他：‘你是不是该休假啦？你这星期收到你太太的信了吗？’搞这一套潘西很在行。但是巫术委员会很少派潘西上场。潘西是头头，物以稀为贵。其次是比尔·海顿，比尔见他次数较多。比尔对俄国有好感，他有交际的本领。我觉得他和波里雅科夫一定很合得来。我觉得比尔去听汇报或提问题时，一定满面红光，你觉得是不是？把正确的信息送到莫斯科去。他有时带罗埃·布兰德一起去，有时派罗埃去。我想这

是他们两人自己商量好的。罗埃是个经济专家，也是附庸国问题的头头。因此在那方面一定也有很多可以谈的。有时，托比，例如过生日、圣诞节，或者要特别送钱表示感谢——我发现花在招待上已用了一大笔钱，更不用说其他开销了——有时，为了搞得热闹些，你们四个都去，举杯向对方，向巫师，通过他的代表波里雅科夫，向他敬酒。最后，我想托比自己也有话要跟他的朋友波里雅科夫说。有如何联系的办法要讨论，大使馆里的情况也有不少有用的风言风语，对点路灯组监视常驻站的日常活动有帮助。因此托比也有单独去见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波里雅科夫除了当巫师的伦敦代表以外在本地的作用。我们并不是每天能搞到一个听话的苏联外交官来领我们的津贴的。稍微训练一下如何使用照相机，波里雅科夫在使馆内部就非常有用。只要我们记住我们的首要目的。”

他的眼光没有离开过托比的脸。“我可以设想波里雅科夫可能已经拍了不少照片，是不是？不管是谁去见他，任务之一可能是补充他的存货：给他带去密封的小包裹。底片盒。当然没有曝过光，因为这是圆场来的。托比，请你告诉我，你听说过拉宾这个名字吗？”

舔了一下嘴唇，皱了一下眉毛，露出一个笑容，脑袋向前一倾：“当然，乔治，我认识拉宾。”

“谁命令把点路灯组关于拉宾的报告销毁的？”

“是我，乔治。”

“你自作主张？”

笑容大了一些。“不瞒你说，乔治，我这些日子已经升了官。”

“谁决定把康妮·沙赫斯排挤出去的？”

“我想大概是潘西。就算是潘西吧，也许是比尔。你知道要完成一项大任务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要补一下鞋子、擦一下水壶，总归得做一件这样的事。”他耸一耸肩，“也可能是罗埃，喂？”

“那么他们三个人的命令你都听。”史迈利轻松地说，“托比，你对他们真是一视同仁。你完全可以不必那样。”

这话，伊斯特哈斯听了一点也不喜欢。

“托比，谁叫你把麦克斯打发掉的？也是这三个人吗？你瞧，我所以问你，只是因为我得向拉康报告。他目前追得很紧。他后面又有大臣在追。是谁？”

“乔治，你弄错对象了。”

“反正我们中间有一个，”史迈利愉快地说，“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也想知道威斯特贝的事，是谁把他封住口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派你拿了一千英镑钞票在沙拉特去叫吉姆·普莱多不要担心的人？托比，我要弄清楚的只是事实，不是要剥谁的头皮。你了解我，我是不记恨的。顶多说你不够朋友，那有什么关系？看是对谁够朋友。”他又说：“只是他们非

常想弄清楚。甚至有人扬言要请国安局插手进来。这谁都不希望吧？这就像你跟老婆吵嘴去找律师一样，这一步下去就不可挽救。谁叫你把忘掉锅匠、裁缝的话带给吉姆的？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是不是直接从波里雅科夫那里得到的？”

“我的天，”吉勒姆咬牙切齿地说，“让我收拾那个婊子养的。”

史迈利不理他。“我们再来谈谈拉宾。他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

“他为波里雅科夫工作。”

“是他在文化处的秘书？”

“是他的跑腿。”

“可是亲爱的托比，一个文化参事要一个跑腿的干什么？”

伊斯特哈斯的眼睛始终盯着史迈利。吉勒姆想，他像一只狗，他不知道他们会踢他一脚，还是给他一根骨头。他的眼光从史迈利的脸上转到手上，又回到他脸上，不断地在窥测蛛丝马迹。

“别装糊涂了，乔治，”托比漫不经心地说，“波里雅科夫是为莫斯科中心工作的。这你跟我一样清楚。”他跷起他的短腿，又恢复了原来的傲慢，靠后一坐，喝了一口冷茶。

至于史迈利，吉勒姆觉得好像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吉勒姆自己也搞糊涂了，又觉得史迈利好像感到很满意。也许是因为托比至少开腔了。

“唉，乔治，”托比说，“你又不是小孩子。你想一想，我们这样干已不知有多少次了。不错，我们收买了波里雅科夫。波里雅科夫既是莫斯科的间谍，又是我们的人。但是他得在他自己人面前装出他是在刺探我们的情报。除了那样以外，他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能一天到晚直进直出，不带猩猩，不带把风的，什么都一帆风顺吗？他既然到我们店里来，总得带些货色回去。因此我们给他一些货色。鸡毛蒜皮的东西，他可以送回国去，莫斯科的人就拍他肩膀，夸他很不错，这是很平常的事。”

如果说吉勒姆现在觉得很生气，史迈利的头脑现在却特别清醒。

“在四个元老中间，这样说是统一口径的吧？”

“我不敢说口径一致。”伊斯特哈斯说，手势是典型匈牙利式的：把掌心一摊，两边摇晃了一下。

“那么谁是波里雅科夫的情报员呢？”

吉勒姆看到，这个问题对史迈利十分重要：他绕了半天的圈子，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答案。吉勒姆在旁等着，他的眼光一会儿盯在伊斯特哈斯身上，后者现在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自信了，一会儿又盯在史迈利高深莫测的脸上，他意识到，他自己也开始了解卡拉的巧结是怎么回事了，也了解他跟阿勒莱恩那次吃力的谈话是怎么回事了。

“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史迈利坚持说，“从理论上来说，谁是波里雅科夫在圆场里的情报员？我的天，托比，别装傻了。如果波里雅科夫和你们这些人见面的掩护是他在刺探圆场情报，那么他一定要有一个圆场的间谍，是不是？那么这人是谁？他跟你们这些人见了面后，带了成卷的圆场鸡毛蒜皮回大使馆去说，‘我是从那些哥们儿那里搞来的’，他能那样吗？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法，而且要够硬的说法，可以说明长期以来是怎么追踪、招募、秘密会见的，花了多少钱，动机是什么。是不是？老实说，这不仅仅是波里雅科夫的说法，而且是他的生命线。必须十分彻底。必须令人信服。我敢说，这是整个活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人是谁？”史迈利愉快地问，“你吗？为了要使波里雅科夫能继续为我们所用，托比·伊斯特哈斯伪装成圆场的一个叛徒？向你致敬，托比，这该颁发给你一大堆奖章。”

托比在思量，他们等着。

“你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乔治，”托比终于说，“要是你达不到最终目的，结果会怎样呢？”

“哪怕拉康做我的后盾也达不到最终目的？”

“你把拉康请来。还有潘西、比尔。你为什么盯住一个小角色？找大人物去。”

“我还以为你已经成了大人物了呢。托比，你是个很好的人选。匈牙利血统，未得升迁，心怀不满，能接触机密，但不太多……脑筋快，贪钱……有你当他的情报员，波里雅科夫就有个说得通的说法。三巨头把鸡毛蒜皮的资料给你，你又转给波里雅科夫，中心以为托比是他们的人，人人都得到了好处，人人都感到满意。只有后来弄清楚你给波里雅科夫的是皇冠钻石，拿回来的才是俄国的鸡毛蒜皮，那才会有麻烦。要是发生那样的情况，你就需要一些可靠的朋友。像我们这样的朋友。我的假设是这样的——最后拆穿来说，杰拉德是俄国的地鼠，受卡拉指挥。他把圆场的秘密都出卖了。”

伊斯特哈斯看上去有点不舒服。“我说，乔治。要是你弄错了，我不想跟着也错，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要是他对，你也想跟着对，”吉勒姆难得插嘴提示道，“越早越好。”

“当然。”托比说，一点也不觉得话里有什么讽刺意味。“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你想得倒头头是道，但事情都有两面，特别是情报员，也许搞错的是你。我说：谁说过巫术是鸡毛蒜皮？没有人，从来没有人。这是最上等的。你找到个嘴快的人胡说八道，把伦敦全城都翻了一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是奉他们之命行事。明白吗？他们叫我假装当波里雅科夫的情报员，我就假装了。把这底片给他，我就给他。我的处境很危险，”他解释道，“对我而言，的确很危险。”

“我很抱歉，”史迈利在窗口边上说，他又从窗帘缝里向外窥看下面

的广场，“一定叫你很担心。”

“非常非常担心，”托比同意，“我得了胃溃疡，吃不下东西。非常为难。”

使吉勒姆生气的是，他们三人都沉默不语，仿佛同情托比·伊斯特哈斯为难的处境。

“托比，有没有把风的，你没有撒谎吧？”史迈利仍在窗边问。

“乔治，我画十字起誓。”

“你一般用什么？汽车？”

“街头监视者。用一辆大车子把他们送到飞机场那边，然后叫他们步行过来，分散布置。”

“多少？”

“八个，十个。每到年终这个时候，也许是六个。很多人病了。圣诞节。”他阴沉地说。

“有没有只派一个人？”

“从来不。你疯了。一个人！你以为我在开糖果店？”

史迈利离开窗边，又坐下来。

“我说，乔治，你说得真糟糕，你知道吗？我是爱国的。上帝。”托比重复说。

“波里雅科夫在伦敦常驻站里的职务是什么？”史迈利问。

“波里是单独行动的。”

“指挥他在圆场里的大间谍？”

“当然。他们让他脱离日常工作，可以放手应付大间谍托比。我们把这都想好了，我和他一起商量了很久。我说：‘你听好，比尔在怀疑我，我的老婆在怀疑我，我的孩子患了麻疹，我没有钱付给医生。’情报员给我的垃圾，我都给了波里，他又转给国内去当宝货。”

“谁是巫师？”

伊斯特哈斯摇摇头。

“但是你至少听说过，他以莫斯科为基地，”史迈利说，“而且是苏联谍报界的一员，还有什么他不是？”

“这，他们告诉了我。”伊斯特哈斯同意道。

“就是这样，波里雅科夫可以和他联系。当然是为了圆场的利益。秘密地，不让他们自己人生疑？”

“当然。”托比又诉苦起来，但是史迈利仿佛竖起耳朵在听屋子外面的声音。

“那么锅匠、裁缝？”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听潘西吩咐办事。”

“潘西叫你去打发吉姆·普莱多？”

“当然。也许是比尔，也许是罗埃。是的，是罗埃。我得吃饭，乔治，明白吗？我不能两头得罪，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真是个难题。你也明白了，是不是，托比？”史迈利静静地说，仿佛人不在这里。“假定这是个难题。它使得对的人都成为错的人：康妮·沙赫斯、杰里·威斯特贝……吉姆·普莱多……甚至老总。对起疑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灭他们的口……一旦你的根本谎言给蒙混过去了，排列组合就是无穷无尽的。必须让莫斯科中心相信它在圆场搞到了一个重要的来源，但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白厅得到风声。其必然结果是杰拉德使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掐死在床上。要是换一种情况倒不错，”他几乎有些迷迷糊糊地说，“可怜的托比。是啊，我明白。你夹在他们中间奔跑，一定很难受。”

托比已经准备好了以下的一番话：“自然，如果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你要我做，那么，乔治，你是了解我的，你尽管吩咐好了，我总是乐意出力的。我的手下受过很好的训练，你要借他们，我们可以商量。自然我得先跟拉康打招呼。我不过是要把这件事澄清一下。你知道，这是为了圆场的缘故。我的目的就是那个。为了组织的利益。我要求不高，我并不想为个人要什么好处，对不对？”

“你专门给波里雅科夫用的安全联络站在哪里？”

“康姆顿大街水闸花园五号。”

“有人看房子吗？”

“麦克雷格太太。”

“原来是搞窃听的吗？”

“是她。”

“有没有安置窃听器？”

“你说呢？”

“那么米莉·麦克雷格在看房子，管理录音设备。”

托比说，是的，他的头一低，十分警觉。

“等会儿我要你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要在那里过夜，我还要用那设备。告诉她，我被请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要她听我的吩咐。我大概在九点钟到那里。如果你要和波里雅科夫紧急见面，用什么办法？”

“我的手下在哈佛斯托克山有一间屋子。波里每天早上去大使馆时开车经过那里，每天晚上回家也经过那里。如果他们贴上一条抗议车辆噪音的黄色标语，就是暗号。”

“夜里呢？周末呢？”

“拨错号码的电话。不过大家都不喜欢用这个办法。”

“用过没有？”

“我不知道。”

“你是说你不接听他的电话？”

没有回答。

“我要你这个周末请假。这在圆场会不会引起怀疑？”伊斯特哈斯热切地摇摇头。“我想你巴不得置身事外，是不是？”伊斯特哈斯点点头。“你就说女朋友出了麻烦，或者不管什么事情。你要在这里过夜，可能两夜。法恩会照料你的，厨房里有吃的。你的老婆呢？”

在吉勒姆和史迈利的监视下，伊斯特哈斯拨了圆场的电话，找菲尔·波特奥斯讲话。他的话说得恰到好处：带一点抱怨，一点噱头，一点玩笑。菲尔，我在北边有个女朋友对我不错，她说我如果不去抱抱她，她就要干出不可收拾的事来。

“你不用说，菲尔，我知道你每天遇到那样的事。嗨，你那个漂亮的新秘书怎么啦？我说，菲尔，如果玛拉从家里打电话来，告诉她我有重要的任务，好吗？要炸掉克里姆林宫，星期一回来。要说得当真一些，好吗？再见，菲尔。”

他挂了以后，又拨了个电话到伦敦北区。“麦太太，你好，我是你最要好的男朋友，听出声音来了吗？好吧。我说，今天晚上我有个客人到你那里去，一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你猜也猜不到的。她恨我，”他的手蒙在话筒上对他们解释，“他想要检查一下线路。”他继续说，“检查一下，看看是否运作正常，没有毛病，好不好？”

“如果他不安分，”他们走时吉勒姆狠狠地对法恩说，“把他手脚绑起来。”

在楼梯上，史迈利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胳膊。“彼得，我要你在我背后把风。好不好？给我几分钟时间，然后到马罗斯路转角接我，向北走。沿着西边人行道。”

吉勒姆等着，然后走到街上。空中飘着毛毛细雨，像融雪一样有种奇怪的暖意。在有灯光的地方，湿气转变成云气，但在阴暗处，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只是因为眼前有一片薄雾，使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他在花园里转完了一圈，然后走进碰头的地方：南面的一条幽静的小巷。到马罗斯路时，他越过马路到西边人行道，买了一份晚报，开始悠闲地在一排花园别墅前走过去。他正在数着行人、摩托车、汽车的数目，这时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看到了乔治·史迈利，一个典型的在赶回家的伦敦人。“是一组人吗？”吉勒姆问，史迈利说不确定。“快到阿平顿别墅的时候，我会越过马路，”他说，“注意单枪匹马的。瞧！”

吉勒姆看过去的时候，史迈利突然停住，好像记起了什么东西似

的，不顾危险地走到行驶间的车辆缝里去，东钻西窜，引起了开车人的愤怒，接着马上钻进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酒店门里面去了。他东钻西窜的时候，吉勒姆看到，或者自以为看到，一个驼背的高个子，穿着黑色大衣出来追他，但这时有一辆公共汽车停下来，把史迈利和那个追逐者挡住了。公共汽车开走后，那个追逐者也不见了，一定是搭车走了，因为留在人行道上的只有一个穿着黑色塑料雨衣、戴着软帽、年纪大一点的人站在车站上，在低头看晚报，当史迈利从那家酒店中拿着棕色袋子出来时，那个人仍在看着运动消息，连头也不抬。吉勒姆接着又跟着史迈利穿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肯辛顿广场比较热闹的地段，史迈利不断地在一个个安静广场之间，一条条小巷之间进进出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只有一次，当吉勒姆忘掉了史迈利，而出于本能回头看自己的背后时，才怀疑到有第三者跟着他们走：投在阒无一人的街道上的一个人影，但是他一追过去，就不见了。

在这以后，那一夜发生的事情接二连三，快得使他目不暇接。在好多天以后，他才意识到，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人的影子，使他觉得似曾相识。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一时也想不起他到底是谁来。接着有一天清晨，他蓦然醒来时，他心中就明白了这是谁：军人一样吆喝的声音，貌似粗鲁其实很文雅的态度，在布里克斯顿他的办公室保险柜后面，插着曾使他不动感情的秘书掉泪的球拍。

也就在那一天晚上，按他们这一行的行规来说，斯蒂夫·麦克尔沃干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忘记把他汽车的后座车门锁上。他从开车的一边开门上车时，粗心大意地以为那后座车门是锁上的。就像吉姆·普莱多喜欢说的那样，若要不出问题，凡事都不可轻信不疑。麦克尔沃远远达不到这个求全的标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个天气特别恶劣、交通特别拥挤的傍晚，他刚要从一条车辆堵塞、喇叭齐鸣的巷道拐到爱丽舍大街上去的时候，里基·塔尔会打开后座车门上车，用枪口对着他。但是近来巴黎常驻地平静无事，使人丧失了警觉，麦克尔沃一天所干的，无非是记每周开销的账目，整理属下的报告，然后转发给管理组。那个星期五，只有午餐时在法国安全部组织里跟一个不太诚恳的亲英派耗了一阵子，才算打破了这种单调的气氛。

他的汽车停在一棵快要枯死的椴树下，用的是使馆的牌照，因为常驻站的掩护是领事，尽管没有人相信。麦克尔沃是圆场的一位元老，身材壮实，头发花白，他是约克郡人，历任各地领事，时间之久，在外人的心目中看来，似乎从来没有晋升过。巴黎是他最近的一个领事岗位。他在远东地区活动了一辈子，并不特别喜欢巴黎，知道法国人也不喜欢他。但是在退休之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津贴高，待遇好，他到任以来十个月中，对他的工作要求，只不过是偶尔招待一下过境的情报员，在这里或者那里做个记号，为伦敦站送个信，陪着来视察的人观光。

不过，这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现在他却坐在自己的汽车里，被塔尔的枪口顶着他的肋骨，塔尔的手则爱护地搭在他的右肩上，要是他不老实，就马上折断他的脖子。两步以外，有几个女人匆忙走过，到地铁站去。六步以外，已经开始塞车，可能持续一个小时。看到他们两人坐在停在马路边上的汽车里亲切交谈，没有人会在意的。

麦克尔沃坐定以后，塔尔就开始说话。他说，他需要发个电报给阿勒莱恩。请他亲启亲译，塔尔希望斯蒂夫替他发，自己在旁持枪等着。

“里基，你在干什么呀？”他们一起手挽着手回常驻站去时，麦克尔沃抱怨道。“大家都出动了在找你，你知道吗？他们要是找到你，一定要剥你的皮。我们奉令一见到你就不要手软。”

他想一转身抓住里基，用手掌砍他的脖子，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速度，塔尔会开枪打死他的。

麦克尔沃打开前门，开电灯时，塔尔告诉他，这封电报大约有二百个字组。斯蒂夫发完以后，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等潘西的回话。如果塔尔的直觉是正确的话，到第二天潘西就会亲自到巴黎来与里基商谈。这次会面也在常驻站进行，因为塔尔估算，俄国人在英国领事馆内暗杀他的可能性较小。

“你疯了，里基。不是俄国人要杀你。是我们要杀你。”

前面一个房间叫接待室，掩护到此为止。房间里有个木板旧柜台，发黄的墙头上贴着过时的“英国公民须知”的布告。塔尔在这里用左手搜查了麦克尔沃有无带武器，结果没有搜到。屋子外面有个院子，大多数要紧的东西都放在院子另一边：密码室、保险柜、发报机。

“你神经错乱了，里基。”麦克尔沃单调地警告他，一边带路，走过一两个空办公室，到密码室门口按铃。“你总以为自己是拿破仑，你是完全中了邪了。你从你爸爸那里学到的宗教思想太多了。”

门门打开后，门缝里出现了一个感到奇怪的、有些傻气的脸。“你可以回家去了，班。到你太太那里去，可是留心等我的电话，万一我有事找你，好孩子。把密码本留在那里，把钥匙插进机器里。我马上要跟伦敦说话，我自己开机器。”

那张脸不见了，他们等着那个小伙子在里面开门锁。一把钥匙、两把钥匙，还有个弹簧锁。

“这位先生是从东方来的，班，”门开时，麦克尔沃解释道，“他是我最杰出的亲戚之一。”

“您好，先生。”班说。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一脸精通数学的样子，戴着眼镜，眼光紧紧地盯着人看。

“去吧，班。我不会扣你的值班费的。这个周末你可以休息，薪水照付，以后也不用再补。去吧。”

“班留在这里。”塔尔说。

在剑桥圆场，灯光昏黄，孟德尔站在一家成衣店的三楼上，可以看到雨后的柏油路面像廉价的黄金一样发光。时间已近午夜，他站在那里已有三个小时了。他站在一条网眼窗帘和衣架之间。他站在那里的样子跟全世界的警察一样，重量平均放在两只脚上，双腿挺直，全身稍微后倾。他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翻起了上衣的领子，使得街上的人看不到他的脸，但是他盯着下面入口处的一双眼睛却像煤堆里一双猫眼一样炯炯发光。他可以再等三小时，甚至六小时。孟德尔又回到他巡逻的岗位上来了，他的鼻尖闻到了捕猎物的气味。说得更确切些，他是只“猫头鹰”，那间试衣室的黑暗使他头脑异常清醒。从街上照进来的淡淡几道光线反射到天花板上。所有别的东西，裁衣板、成匹的料子、盖上罩子的缝纫机、熨斗、皇亲国戚的签名照片，他知道仍都在那里，因为他在下午勘探地方的时候看到过，街灯照不到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大看得清楚。

他站在那个窗口可以看到大部分街口，一共有八九个大小不等的街道和小巷，都莫名其妙地选了剑桥圆场作为汇合点。街口的一些建筑物都华而不实，有一些帝国时代的廉价装饰：一家银行是罗马式的建筑，一家像个破败的清真寺的戏院。在它们背后，高耸入云的大楼像一队机器人在进军。楼顶上暗红的天空慢慢地聚起了雾。

他心里想，为什么这么寂静无声？戏院早已散场了，但是离他窗口只有一箭之遥的歌台舞榭的前面，为什么没有出租车，没有闲荡的人群？从沙夫茨伯里大街竟没有一辆水果车隆隆地开到考文特花园35去。

孟德尔又一次用望远镜观察马路对面的那个大楼。那幢大楼似乎比它的邻居睡得还香。门廊里的两扇门都关着，地面一层窗户里看不到有灯光。只有在四楼，左手第二个窗户发出一道黯淡的光线，孟德尔知道那是值班室，这是史迈利告诉他的。他把望远镜抬起一点看屋顶，一片天线在天空上形成了古怪的图案；他又放低一些看屋顶下面的一层，无线电组的四扇发黑的窗户。

“夜里大家都从前门进出。”吉勒姆对他说过，“这是减少警卫的节约措施。”

在这三小时中，孟德尔的监视只得到三次补偿。一小时一次，并不算多。九点半的时候，一辆蓝色的福特小货车送来了两个人，带着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弹药箱。他们自己开了门，进去了以后，就又马上关上。孟德尔把看到的情况轻声打了电话。十点的时候，交通班车来了，吉勒姆事先也把这告诉了他。交通车从下面单位收集热门文件，周末送到圆场保管。它经过的单位按次序是布里克斯顿、阿克顿、沙拉特，最后是海军部，到圆场时大约十点钟。这次它准时到达，有两个人从大楼里出来帮忙卸下。孟德尔也作了报告，史迈利耐心地以“谢谢你”作答。

史迈利是坐着的？像孟德尔那样在黑暗里？孟德尔觉得他大概也是在黑暗里。他认识的怪物不少，史迈利是最怪的。看他样子，连单独过马路也不会，但是他比刺猬还善于保护自己。孟德尔心里想，这些搞特务的。我一辈子追捕坏蛋，今天怎么干起这个来了？破门而入，站在黑暗中侦察间谍。对于间谍，他从来感到不怎么样，但是后来遇到了史迈利以后，才改变了看法。他原来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外行，像大学生，挺碍事的。认为特别分局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公众，对他们最好是敬而远之。结果却遇到了史迈利和吉勒姆这两个例外。他今晚想的就是这个。

一个钟头以前，十一点不到，来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辆用伦敦普通出租车牌照的汽车，开到戏院门前停了下来。即使这样的事，史迈利也事先告诉过他：部门里的人坐出租车有不开到门口的习惯。有的停在福尔斯书店门口，有的停在老康普顿街，或者街上随便哪家店门口，各人都有一个偏爱的掩护地点，戏院则是阿勒莱恩偏爱的地点。孟德尔从来没有见过阿勒莱恩，但是他听到过他们对他的介绍，因此他从望远镜中看去时，一眼就看出是他，毫无疑问，一个身材高大、动作迟缓的人，穿着一件深色大衣。他甚至注意到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因为给的小费太少，做了一个鬼脸，骂了他一句，但阿勒莱恩正忙着在掏钥匙，没有理他。

吉勒姆解释过，前门没有加门，只是上了锁。安全措施是在你走到过道尽头向左转时开始的。阿勒莱恩住在五楼上。你看不到他窗户的灯

光，但是有个天窗，开了灯，烟囱就会露光。果然，他看到烟囱发黑的砖块上出现了一片黄光——阿勒莱恩进了房间。

孟德尔心里想，年轻的吉勒姆需要休假。这种情况他看到过：硬汉一到四十岁就垮了。他们瞒着不让人家知道，假装不是那样，依靠着前辈，结果最后证明前辈根本不成气候，于是总有一天闹穿了，他们所崇拜的人垮了下来，他们只好坐在办公桌前，泪水掉在吸墨纸上。

他原来把电话机放在地上，这时拿起话筒来说：“看上去是锅匠进了门。”

他报告了出租车的车牌号码，然后又继续监视。

“他的样子怎么样？”史迈利低声问。

“很忙。”孟德尔说。

“该忙了。”

孟德尔心里嘉许地想，不过这一个是不会垮的。史迈利是棵外表虚弱的橡树。你以为吹一口气就可以把他吹倒，但是一遇风暴，他是最后硕果仅存仍在那里的一棵树。他正在这么想时，又有一辆出租车停在大门口，一个行动迟缓的高个子一步一级小心地爬上台阶，好像一个心脏不好的人。

“你的裁缝来了，”孟德尔对着话筒低声说，“等一等，还有士兵。看起来是要开全体会议了。我说，你别着急。”

一辆奔驰一九〇旧型汽车从埃尔汉街急驰出来，就在他的窗口下面拐弯，很勉强地拐到查令十字街北口停了下来。车中下来一个年轻粗壮的人，一头姜色的浓发，他砰地关上车门，穿过马路进了门，急忙中连钥匙也来不及掏出来。一会儿以后，四层楼又亮起了一盏灯，那就是罗埃·布兰德到了。

孟德尔心里想，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谁出来了。

水闸花园的名字大概取自附近康姆顿和汉姆斯丹德路的水闸，这是一排四幢十九世纪的房子，正面平平正正，盖在一条弧形街道的中央，每幢房子都有三层，外加地下室和一个有围墙的后花园，一直到摄政运河。门牌号码是二号到五号——第一号的房子不是倒塌了，就是从来没有盖起来过。第五号在北边一头，作为安全联络站，地点再适中不过了，它在三十码内有三个出口，运河的窄路又提供了两个出口。它的北面是康姆顿大街，可以连接交通要道，南面和西面是公园和樱草山。尤其好的是，这一带不讲究社会身份，也不要求你有社会身份。有的房子已改为单间的公寓，成排的门铃有十个，好像打字机键盘一样。有的房子气派很大，只有一个门铃。五号房子有两个门铃：一个是米莉·麦克雷格的，一个是她的房客杰弗逊先生的。

麦克雷格太太喜欢上教堂，她什么都要收集，这顺带也是注意街坊动静的好办法，不过他们却不是那么看待她的热情。她的房客杰弗逊大家只知道是个外国人，做石油生意，常常不在家。水闸花园只是他的一个落脚点。街坊们并不注意他，只知道他外表体面，为人腼腆。要是那天晚上九点钟，他们在门廊下的暗淡灯光中瞥见乔治·史迈利时，也会得出同样的印象。米莉·麦克雷格迎他进门以后就拉起了窗帘。

她是个瘦长的苏格兰寡妇，穿着棕色丝袜，短头发，皮肤又光滑又带皱褶，像个老头子似的。为了上帝和圆场的缘故，她在莫桑比克办过圣经学校，在汉堡办过海员传教会，虽然从那以后，二十年来她已成了职业的窃听器，她仍总是把所有男人看成是罪人。史迈利无法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从他一到，她的态度就很生硬冷淡。她带他看了一看房子，那样子仿佛是个房客都已死绝了的女房东。

她先带他到地下室，那是她自己住的，摆满了盆花，各式各样的旧贺年片，黄铜桌面，雕花的黑色家具，这种家具似乎是在外国见过世面、一定年纪和阶层的英国妇女所特有的。是的，如果圆场晚上要找她，他们就打地下室的电话。是的，楼上另有一个电话，不是同一条线，专供打到外面去。地下室的电话在楼上餐厅里有个分机。接着到了一楼，这是管理组耗资很多但品位不高的名副其实的标本：摄政时代色彩鲜艳的缎子、鎏金的仿制椅子、豪华的沙发。厨房没有人碰过，肮脏不堪。厨房外面是一个玻璃外屋，一半当温室用，一半当放碗碟的储藏室，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和运河。花砖地上乱扔着一台旧绞肉机、一个铜壶、几箱奎宁水。

“话筒在哪里，米莉？”史迈利回到了客厅。

米莉喃喃道，成对地嵌在墙纸后面，一楼每个房间一对，楼上每个房间一个。每一对都单独与一台录音机相连。他跟她上了很陡的楼梯。顶楼没有家具，但顶楼卧室除外，里面有一台灰色的钢架，共放了八台

录音机，四台在上层，四台在下层。

“这些东西杰弗逊都知道吗？”

“对于杰弗逊先生，”米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信任的。”这话等于是表示对史迈利的斥责，亦即表示她对基督教伦理的忠诚。

回到了楼下，她又带他看了操纵机器的开关。每块开关板里都有一个额外的开关。凡是杰弗逊或随便哪个小伙子——她这么叫他们——要录音，他只需站起来把左手的电灯开关扳下来就行了，这样录音就是声音带动的，那就是说，人一说话，机器就开动起来。

“录音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米莉？”

她说，她在楼下，好像这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

史迈利不断地打开柜门、抽屉，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最后又回到储藏室，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运河。他拿出一支小手电筒，向黑漆漆的花园里照了一下。

“安全暗号是什么？”史迈利问，一边沉思地摸弄着客厅门边的电灯开关。

她的回答平板单调：“门口放两个装满牛奶的牛奶瓶，你就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没有牛奶瓶，你不可进来。”

温室那边传来轻轻的敲玻璃声，史迈利回去开了玻璃门，匆匆低语了一阵后，跟吉勒姆一起出现了。

“米莉，你认识彼得吧？”

米莉可能认识他，也可能不认识他，她冷淡的小眼睛轻蔑地盯着他。他在研究那个开关，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着什么东西。

“他在干什么？他不许动它。叫他别动它。”

史迈利说，如果她不放心，她可以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拉康。米莉·麦克雷格没有动身，但是她厚厚的脸颊上出现了红晕，生气地捻着手指。吉勒姆用一支小起子小心地把开关的塑料面板两头的螺丝卸下，仔细观察后面的电线。他十分小心地把里面的开关头从上面扳到下面，拧上电线，然后又把面板安上旋好，其余的开关都没有动。

“我们来试一下。”吉勒姆说，史迈利上楼去检查录音机，吉勒姆就用像保尔·罗伯逊的低沉嗓音唱了《老人河》。

“谢谢你。”史迈利下楼来说，身上打了一个寒战，“真的够了。”

米莉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拉康。史迈利轻手轻脚地布置了舞台。他把电话放在客厅一个小沙发旁边，然后清理出了一条他退到储藏室的路线。他从厨房里的冰箱中拿了两瓶牛奶放在大门口，用米莉·麦克雷格简洁的话来说，就是表示你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他脱了皮鞋，放在储藏室里，关了所有的电灯，在小沙发上就了位，这时孟德尔来了电话。

与此同时，在运河的窄路上，吉勒姆恢复他对这幢房子的监视。在天黑之前一小时，行人就绝迹了，这里干什么都行，情人幽会，流浪汉歇脚，因为运河涵洞下有隐蔽的地方，尽管用处不同。不过在那个寒冷的夜里，吉勒姆什么也没有瞧见。有时有一辆空火车急驰而过，留下很大一片空虚。他神经紧张，心情复杂，一时之间，那天晚上的整个景象竟使他的心中出现了幻觉：铁路桥上的信号灯成了绞刑架，维多利亚时代的仓房成了庞大的监狱，窗户钉了铁条，耸立在多雾的夜空里。身边只听见老鼠的窸窣声，只闻到死水的恶臭。这时客厅的灯灭了，房子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米莉的地下室窗帘两边露出一条黄色的灯光。储藏室那边有一细条长的手电灯光穿过杂草丛生的花园向他眨眼。他从口袋里摸出钢笔形手电筒，拔去银套，向着发光的地方，用颤抖的手指发个信号回去。从现在开始，他们只能等待了。

塔尔把收到的电报扔还给班，又从保险柜中取出只用一次的拍纸簿，也扔给他。

“来吧，”他说，“该干活了。把它译出来。”

“这是你私人的，”班反对道，“你瞧，‘阿勒莱恩发，私人自译。’我是不准碰的。这是上头的电报。”

“班，听他的吩咐。”麦克尔沃说，一边看着塔尔。

十分钟之内，这三个人一句话也没有交换。塔尔站在屋子里另外一头看着他们，等得有些紧张。他已把手枪插在腰带里，枪口冲下，贴着小腹。他把外套搭在椅背上。他背上的汗把衬衫都浸湿了，黏在背上。班用一把尺比着念数码，然后仔细地把结果写在前面的电报本上。他专心致志，舌头顶着牙齿，缩回去时就会发出喷的一声。他译完放下笔，撕下电报纸来给塔尔。

“大声念。”塔尔说。

班的声音柔和，不过有一点紧张。“阿勒莱恩发给塔尔的私人电报亲自译。我坚决要求你澄清并（或）交换货样后才能答应你的要求。‘对保障我单位至关紧要的情报’此话不合要求。我要提醒你在无故失踪后在此造成的不利地位。要求你立即向麦克尔沃报告一切。首长。”

班还没有完全念完，塔尔就开始奇怪地、兴奋地大笑起来。

“就是那样，潘西小子！”他叫道，“是，又不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采取拖延策略吗，班，好孩子？他是想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他就是那样干掉我的俄国小姐的。他又在玩老花样，那个畜生。”他摸弄着班的头发，笑着向他叫道：“我警告你，班，咱们这个单位里尽是浑蛋，你一个也别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否则你永远成熟不了！”

史迈利独自在漆黑的客厅里，也在等着，他坐在不舒服的小沙发上，斜着脑袋，夹着电话的话筒。他偶尔低声说句话，就会听到孟德爾的回答，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甚至还有一点郁闷。他像个演员一样，在幕启之前就知道即将出现的结

局，知道这个结局又小又不重要。在他经过一辈子的斗争以后，在他看来，即使死亡也似乎是件不重要的小事了。他没有他所了解的那种胜利感觉。在他害怕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人。他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或者看法。他只在想这对大家有什么影响，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他想到吉姆、山姆、麦克斯、康妮、杰里·威斯特贝，想到个人友谊都完了，他另外也想到安恩和他们在康沃尔悬崖上没有希望的谈话。他心里想，人与人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是不是以自欺欺人为基础的。他希望他能够在最后一幕演出之前就站起来走掉，但是他又不能。他像父亲一样地为吉勒姆担心，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消最近这种成熟期的紧张。他又想到给老总下葬的那一天。他想到背叛，既然有不动脑筋的暴力，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不动脑筋的背叛。令他担心的是，他感到一切都破灭了。在他碰到处世难题的时候，他所信奉的一点点精神上或哲学上的信仰却都完全破灭了。

“看到什么吗？”他对着电话问孟德尔。

“两个醉汉，”孟德尔说，“唱着《雨中丛林》。”

“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他把话机夹到左面，把手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口袋上很好的缎里已经磨破了。他摸了一下保险栓，也不知道哪一边算是开着，哪一边算是关着。他把弹夹拿出来，又放回去，于是想起了战前在沙拉特没有事做时，在夜间靶场这样拿出来又放回去不知有多少次的情景。他记得总是用两只手开枪，一只手握着枪，另外一只手按在弹夹上。圆场有个传说，要求你用一只手按着枪膛，另一个手指扣扳机。但他试过以后，觉得很别扭，就把它忘了。

“去走一走。”他低声说。孟德尔回答：“好吧。”

他手上仍握着枪走到储藏室，留心听着会不会由于地板上的咯吱声而暴露了自己，但是蹑脚地毯下是水泥地，他即使大蹦大跳也不会震动一下。他用手电筒光发了两短闪，过了很久又发了两短闪。吉勒姆马上回了三短闪。

“回来了。”

“听到了。”孟德尔说。

他又坐了下来，闷闷地想到了安恩：做那不可能做的梦。他把手枪放回口袋里。运河那边传来了一声喇叭的呻吟。夜里？夜里开船？一定是汽车。要是杰拉德有他的紧急措施，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从公用电话亭打到公用电话亭，半路上汽车接人？要是波里雅科夫确是有个跑腿的，一个助手，而康妮没有认出来？这些问题他已考虑过了。为了要在紧急情况下会面，这个办法考虑得很周密，万无一失。搞联络安排，卡拉是一丝不苟，绝不马虎的。

那么他觉得有人盯梢跟踪的感觉呢？这又怎么解释？他从来没有看到的、但是感觉到的人影，还有，只是由于背后有人紧盯而感到背上发痒的感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

到，只是感觉到。凭他的年纪经历，他不会忽视蛛丝马迹。从来没有咯吱响的楼梯发出了咯吱响，没有风吹来但是窗户有窸窣声，汽车换了牌照但挡泥板上仍有那条擦痕，地下铁道里看到一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的脸……有一段时期，有好多年，他就是根据这些蛛丝马迹生活的，其中随便哪个迹象一露头，就有充分的理由得挪地方，换个城市，换个姓名。因为在他这种职业中，没有偶然和巧合。

“有一个走了。”孟德尔忽然说，“喂，喂？”

“我在这里。”

孟德尔说，有人刚才出了圆场的门。前门，但他说不准是谁。身穿雨衣，头戴呢帽。身材魁梧，行动迅速。一定是先要出租车到门口，一出门就上了车。

“向北开，朝你的方向。”

史迈利看一下表。他想，给他十分钟。给他十二分钟，他得在半路上停车打电话给波里雅科夫。接着又想，别傻了，他在圆场早已打了电话了。

“我把电话挂了。”史迈利说。

“祝你好运。”孟德尔说。

在小径上，吉勒姆看到了手电筒光三长闪。地鼠已在途中。

史迈利在储藏室又检查了一下他的退路，把几张帆布椅子推开，在绞肉机上系了一根绳子，因为他在黑暗中眼力特别不好。绳子的另外一头系在打开的厨房门上，厨房有门通往客厅和餐厅，两门并列。厨房很长，实际上是这幢房子外面附加的，后来又添了储藏室。他想到用餐厅，但太危险，而且他在餐厅里无法给吉勒姆发信号。因此他就等在储藏室里，光着脚只穿着袜子感到很不自在，他擦了擦眼镜，因为脸上发热产生雾气。储藏室冷得多了。客厅的门关着，暖气过热，但储藏室接近外墙，而且有玻璃窗和水泥地，使他的脚感到有些潮湿。他想，地鼠先来，因为地鼠是主，这是礼仪，也是为了要假装波里雅科夫是杰拉德的情报员。

伦敦的出租车快得像一枚飞弹。

这个比喻是从他的潜意识记忆深处慢慢出现的。出租车开进弧形街道时，发出了震耳的碰撞声，低音部分消失后，又发出有节奏的得得声。接着关掉了引擎。车停在哪里？哪一幢房子前面？这边的我们都在黑暗中的街上等着，钻在桌子底下，抓住一根绳子，不知道它停在某一幢房子前面。接着是关上车门的声音，爆炸性的反高潮：如果你能听到，对方就不是到你这里来的。

但是史迈利听到了，是到他这里来的。

他听到车道上的脚步声，轻快有力。脚步停住了。走错了门，史迈利胡乱地想，走开吧。他手中握着枪，打开了保险栓。他仍听着，没有

听到什么声音。他想，杰拉德，你心中起了疑。你是只老地鼠，有什么地方不对，你能嗅出来。他想，一定是米莉，米莉把牛奶瓶取走了，放了警告的暗号，叫他走开。米莉坏了事。这时他听到了钥匙的转动，一下，两下，这是一把班汉锁，他记起来了，天哪，我们以后得帮班汉做生意。当然，刚才的耽搁是地鼠在摸口袋，找钥匙。要是换了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早已拿出来，捏在手中了，坐在车子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捏着。但是地鼠不是那样的人。地鼠可能担心，但神经不会紧张。就在钥匙转动的时候，门铃响了，可以听出这又是管理组的规定，高一声，低一声，又高一声。米莉说过，这是表示进来的是自己人，她的人，康妮的人，卡拉的人。前门打开了，有人跨进了屋子，他听到地毯上的摩擦声，关门声，开灯声，接着在厨房门下缝里露出一线亮光。把手枪放进口袋，手心在上衣上擦了一下，又把手枪拿了出来，这时他又听到了第二个飞弹。又是一辆出租车开到门前，停了下来，脚步急促。波里雅科夫不但准备好了钥匙，而且准备好了车钱。他心里想，不知俄国人给不给小费，抑或给小费是不民主的事？又是门铃响，前门开了又关上，史迈利听到两瓶牛奶放到门厅桌子上的撞击声，说明他做事井井有条，符合暗号规定。

史迈利看着身旁的那个旧冰箱，心里不禁惊叫，上帝保佑！要是他把两瓶牛奶放回到冰箱里来，那怎么办？

客厅里几盏电灯一开，厨房门下的一线光突然更亮了。整个房子异常静寂。史迈利沿着绳子在冰冷的地板上慢慢向前挪。接着他听到了说话声。起先听不清楚。他想，他们一定还在屋子的那一头。也有可能他们一直是低声说话的。现在波里雅科夫走近一些，他在手推餐车前斟酒。

“要是有人闯进来，咱们的掩护是什么？”他用很漂亮的英语问。

史迈利记起来了：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康妮，你现在应该到这里来听一听。

仍旧从屋子的那一头传来了一阵闷声的低语，回答他的每个问题。史迈利听不清。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再挂上钩？”“我们的退路是什么？”“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讲话时需要由我来带着，因为我有外交豁免权？”

史迈利想，这一定是老生常谈，卡拉训练班上的玩意儿。

“开关有没有拉下？请你检查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你喝什么？”

“威士忌。”海顿说，“满满的一大杯。”

史迈利听着那个熟悉的声音高声朗读史迈利本人在四十八小时前拟给塔尔发的电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史迈利心中潜伏已久的矛盾就要公开爆发了。原来在拉康的花园里，他曾感到这事不可置信，因此感到很生气，但又不放心，结果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一股逆流，阻挡他的前进。现在这股逆流把他冲上绝望

的岩石，又驱使他反抗：我拒绝相信。不论什么事都犯不上另外一个人的毁灭。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有尽头。在到尽头之前，没有将来，只有继续滑入更可怕现实。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安恩的情人、吉姆的朋友，说不定也是吉姆的情人。此人的叛国是国家的事。

海顿背叛了。作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他背叛了。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安恩笼统称为体制派无可估量的集团的一员……不论是作为什么身份，海顿都表面追求一个目标，暗地又实行相反一套，史迈利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种两面手法达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但是他心中已有另外一个自我出来为海顿辩护。比尔不是也被人家出卖过吗？康妮的悲叹仍在他耳边响着：“可怜的人儿。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他非常刺目地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生来就是要干大事业、雄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统治别人、征服别人的人，他的抱负和野心，像潘西一样，都以世界大局为目标，在他看来，现实不过是个可怜的岛屿，它的声音还传不过海洋。因此史迈利不仅感到伤心，而且，尽管在这紧要关头，对于他要加以保护的那个体制，他还是感到了强烈的不满。拉康说：“社会契约有来有往，你明白。”大臣漫不经心地撒谎，拉康闭紧嘴唇的道德上的自满，潘西-阿勒莱恩的贪得无厌——这样的人使得任何契约都无效了。为什么要人家对我们忠贞呢？

当然，他知道。他从一开头就知道是比尔。正如老总知道，拉康在孟德尔家里也知道。正如康妮和吉姆知道，阿勒莱恩和伊斯特哈斯也知道，他们都默默地心照不宣，只希望这好像是一种疾病一样，能不药而愈，不用承认，不用诊断。

那么安恩呢？安恩知道吗？那天在康沃尔悬崖上投在他们身上的阴影是什么？

史迈利这时成了这样一个人：安恩会说是个肥胖的赤脚间谍，在爱情上受了骗，怨愤之下束手无策，只能一手握枪，一手捏绳，在黑暗中等着。后来他握着枪，蹑手蹑脚地往回走到窗边，用手电筒光很快地连续发了五短闪的信号。等到对方表示收到信号以后，他回到了监听的岗位。

吉勒姆飞步跑下运河的窄路，手中手电筒飞舞，他一直跑到一座低拱桥，爬上一道铁梯子，到了格洛斯特大街。铁门已关了，他得爬过去，一个袖子被钩破了，开口一直开到肘部。拉康站在公主路拐弯的地方，穿着一件旧的休闲大衣，带着一个公文包。

“他在那里，他来了，”吉勒姆耳语道，“他逮住了杰拉德。”

“我不要流血，”拉康警告道，“我要绝对平静。”

吉勒姆连回答也不想回答。三十码外，孟德尔耐心地等在一辆出租车里。他们开了两分钟，或许还不到两分钟，就在快到弧形街道前停了下来。吉勒姆拿着伊斯特哈斯的大门钥匙。到了五号，孟德尔和吉勒姆为了免得出声，都从花园大门上爬过去，走在草地边缘上。他们一边

走，吉勒姆一边回头看，他觉得仿佛看到了有个人影在监视他们，是男是女，他说不准，躲在马路对过的一个门廊里。但是当他叫孟德尔看那地方时，又看不到了，孟德尔恶声恶气地叫他镇静些。门廊上的灯关了。吉勒姆走上前去，孟德尔等在一株苹果树下。吉勒姆把钥匙插了进去，转了一下，很容易就开了。他得意洋洋地想道，傻瓜，连门闩也不门上！他把门推开一点，犹豫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吸一口气到肺里，做好了准备。孟德尔又挪近了一步。街上有两个孩子走过，他们怕黑，故意纵声大笑。吉勒姆又回头看一眼，马路上没有人。他跨进门厅。他穿的是亮皮鞋，在打蜡地板上发出了咯吱的声音，因为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在客厅门外，他听了一阵，义愤填膺。

他想起了他在摩洛哥被害的一些情报员，他被流放到布里克斯顿，他年岁日长、青春消逝，然而工作却每天受到挫折，他感到越来越窝囊，他仿佛突然失去了爱、笑和享受的能力，他想遵守的平凡而又崇高的标准不断受到侵蚀，他为了献身于事业而把许多清规戒律加在自己身上——这一切他都可以朝着海顿嘲笑的脸上扔过去。海顿一度是他的导师，可以常常在一起喝喝咖啡、说说笑笑的，是他生活的楷模。

不仅如此。现在他看清楚了，心里也就明白了。海顿不仅是他的模范，而且是他的灵感，某种古老的浪漫精神的旗手，英国气质的象征，正是由于这种气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至今使得吉勒姆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意义。但是现在，吉勒姆不仅感到被出卖了，而且变成了孤儿。他的怀疑、他的愤懑，长久以来都是向实际世界发泄的，向他的女人、他企求的爱情发泄的，如今却转向圆场，转向那个让他的信仰破灭了的理想。他手里握着枪，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推开了门，一步蹿了进去。海顿和一个额上有一小绺黑色卷发、体格魁梧的人坐在一张小茶几的两旁。吉勒姆根据照片认出他是波里雅科夫，他在吸一根非常英国化的烟斗。他穿的是一件前胸有拉链的灰色羊毛衫，像赛跑时穿的运动上衣。吉勒姆揪住海顿衣领的时候，他还来不及从嘴上拿下烟斗。吉勒姆一下子就把海顿从沙发上提了出来。他已经丢了手枪，使劲地摇晃着海顿，像摇晃着一只狗一样，嘴里骂着。但是他忽然觉得这一点意思也没有。毕竟，他是海顿，他们一起干过不少事。没有等孟德尔拉开他的胳膊，吉勒姆已经松开了手。他听到史迈利一如往常般那样客气地请“比尔和维多洛夫上校”——他是这样叫他们的——举起手来，放在头上，等潘西·阿勒莱恩到达。

“你没有注意到外面有什么人吧？”他们在等着的时候，史迈利问吉勒姆。

“像坟地一样寂静。”孟德尔代表他们两人回答。

有些时候，事情发生得太迅速，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给。对吉勒姆和当时在场的人来说，目前就是这样。史迈利还是有些心不在焉，不时从窗边小心地看那么几眼；海顿漠然无动于衷；波里雅科夫不出意料，居然表示愤慨，要求被当做外交人员对待，吉勒姆毫不客气地就在沙发上收拾他；阿勒莱恩和布兰德慌忙到达，又是一阵表白，接着上楼去听史迈利放录音带，回到客厅后是一阵长久的难堪的沉默；拉康到达，最后是伊斯特哈斯和法恩到达，米莉·麦克雷格默默地侍候大家喝茶。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一种舞台上不现实的味道，就像多年前去阿斯科特一样，由于是在一天的这个时候发生，而显得更加不现实。这些事情，包括一开始用体力制服波里雅科夫和因为法恩揍他——天知道揍在哪里，尽管孟德尔留神在旁拉开——而用俄语骂人，仿佛是出无聊的戏中戏，这些破坏了史迈利请大家到场的惟一目的——说服阿勒莱恩。由于海顿被破获，给了史迈利一个跟卡拉讨价还价的机会，可以把海顿出卖了的谍报网尽量挽救一些，即使不是为了职业上的原因，至少也是为了人道原因。史迈利无权进行这些交易，他也不想进行。也许他认为，伊斯特哈斯、布兰德、阿勒莱恩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知道还有哪些情报员就理论上来说仍旧存在。反正他马上到楼上去，吉勒姆听到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从窗口向外监视。

因此在阿勒莱恩和他的部下跟波里雅科夫一起退到餐厅去单独进行谈判时，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地坐在客厅里，有的看着海顿，有的避开不看。他似乎不觉得他们都在那里。他托着腮帮子，一人坐在角落里，由法恩监视着，看上去感到很厌倦。会议结束了，与会者从餐厅鱼贯而出，阿勒莱恩向不愿参加会议的拉康宣布，已经约定三天之后在这个地点碰头，以便“上校有时间请示上级”。拉康点一点头。好像是开董事会一样。

离别的情况比到达时更加出奇。特别是伊斯特哈斯与波里雅科夫之间，告别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伊斯特哈斯一向要充君子，不想当间谍，这时好像决心要做个漂亮的姿态，他伸出了手，而波里雅科夫却无礼地把它推开了。伊斯特哈斯回过头来可怜地看一眼史迈利，也许是想转过来巴结讨好他，最后耸一耸肩膀，把手搭在布兰德的宽背上。他们马上就一起走了。他们对谁也没有说再见，但是布兰德神情极为沮丧，伊斯特哈斯像在劝慰他，尽管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前途也并不乐观。不久来了一辆有无线电的出租车把波里雅科夫送走，他也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到这时，大家都已完全不说话了，没有那个俄国佬在场，戏已平淡乏味。海顿仍保持大家熟悉的厌烦神态，仍由法恩和孟德尔在旁监视着，拉康和阿勒莱恩无言尴尬地看着。又打了几个电话，主要是叫车。史迈利从楼上下来，提到了塔尔。阿勒莱恩打电话到圆场，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巴黎说，他可以光荣地回英国，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另外又

发一封电报给麦克尔沃说，塔尔是个可以接受的人，吉勒姆也觉得这纯属个人意见。

最后，使大家宽心的是：从训练所开来了一辆没有窗户的小货车，两个人跳了下来，吉勒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个子，腿有点瘸，另一个面色苍白，一头淡黄色浓发。他发现他们是讯问员，不禁哆嗦了一下。法恩从门厅里把海顿的大衣取来，检查了口袋，恭敬地帮他穿上。这时，史迈利温和地插进来说，海顿从门口走到车上时，把门厅的灯关了，而且护卫的人要多。他把吉勒姆、法恩，甚至阿勒莱恩都拉了进去，最后海顿在大家簇拥之下，走过花园上了车。

“这只不过是以防万一。”史迈利坚持说。没有人想跟他辩论。海顿爬上了车，讯问员跟在后面，从里面上了锁。门关好后，海顿向阿勒莱恩举起了一只手，虽然亲切，却是一个打发的姿势。

只是在后来，这些事情才一一分别浮现在吉勒姆的脑海，这些人才一个个单独勾起他的回忆。比如波里雅科夫对每一个在场的人，从可怜的米莉·麦克雷格开始往上的人，都表示刻骨的仇恨，这使他的面孔变了形，他的嘴角露出凶残的、不可控制的讥笑，脸色发白，全身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愤怒。这只是单纯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吉勒姆无法加之于海顿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海顿毕竟是他的同类。

至于阿勒莱恩处在失败的时候，吉勒姆却发现有点令人钦佩，他至少表现出一定的气派。但是后来吉勒姆也没有把握，在当初提出事实的时候，不知潘西是不是明白，这些事实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毕竟他仍是首长，海顿仍是他的埃古36。

但是在吉勒姆看来最奇怪的事，也是他印象深刻而且让他深思的事，却是这个：尽管他在闯进去的时候义愤填膺，但要他不带着爱戴的心情，而带着别的心情去看海顿，需要意志力量，而且是十分暴烈的一种意志力量。也许比尔会说，他终于成熟了。尤其是，那天晚上，他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住所，在楼梯上听到卡米拉熟悉的笛声的时候。卡米拉那天晚上已不再显得神秘了，到了早上，他已把她从背叛的陷阱中解放出来，而这陷阱是他自己最近把她投进去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也有了光明一些的前景。潘西·阿勒莱恩去度无限期的假了。史迈利被暂时请回来帮忙收拾残局。至于吉勒姆本人则听到了要把他从布里克斯顿救出来的传说。只是到了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还有最后一幕，他于是明白了那个在肯辛顿深夜街头尾随着史迈利的熟悉影子是谁，为了什么目的。

接下来的两天里，史迈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他的街坊邻居偶尔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有点失魂落魄。他很晚起床，穿着睡袍在屋子里忙忙碌碌地整理东西，挥掸尘土，自己烧饭，却又不吃什么。到了下午，他一反当地的常规，点起了煤火，坐在壁炉前面读德国诗，或者给安恩写信，但是很少写完，写完了也从来没有寄出过。电话铃一响，他就马上去接，结果却使他失望。窗外的气候仍很恶劣，少数过路人——史迈利一直在观察他们——缩着脖子，像巴尔干人那样受罪的样子。有一次拉康打电话来说，大臣要求史迈利“随时准备帮忙收拾剑桥圆场的残局”，换句话说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莱恩以前看管一下。史迈利的回答含糊其辞，他仍要求拉康务必注意海顿在沙拉特期间的人身安全。

“你这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吗？”拉康反驳道，“他能去的惟一地方是俄国，反正我们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么时候？”

详细情况需要几天时间进行安排。高潮已过，史迈利已兴趣不大，他不屑过问审讯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但是从拉康的态度来看，答案应该是“很不好”。孟德尔倒带来了比较清楚的情况说明。

“伊明翰车站已关闭了，”他说，“你得在格林斯贝下车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车。”

但孟德尔多半也是坐着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病人一样。

“死等下去是不会使她回来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说，“现在是大山去见穆罕默德的时候了³⁷。不瞒你说，女人是不喜欢懦夫的。”第三天早上，门铃响了，史迈利很快就去开门，以为可能是安恩，像往常那样忘了钥匙。结果却是拉康。他说要史迈利到沙拉特去，海顿一定要见他。讯问没有什么进展，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理解是，如果史迈利去当告解牧师，海顿愿意交代一部分。

“他们保证没有用胁迫手段。”拉康说。

沙拉特已失去了史迈利所记得的光彩。大部分榆树都已病死，板球场上杂草丛生。那幢砖砌的大宅自从欧洲冷战以来已败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家具都已不见了，他想大概是搬到阿勒莱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树林间的一个组合房屋里看到了海顿。

屋子里面有一股军队看守所的味道，墙壁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户上钉着铁条。房间两边都有警卫看守，他们看见史迈利十分恭敬，叫他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海顿穿一身斜纹蓝布衣裤，身子在哆嗦，说感到头晕。他好几次因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他留了胡子，显然对于他能不能保有剃须刀有不同的意见。

“高兴点，”史迈利说，“不久就会让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过普莱多、伊琳娜、捷克谍报网，他在走进海顿的房间时，甚至模糊地想到对社会的责任，他想，他总得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狠狠地苛责他一顿。但是结果他却感到羞怯，他觉得从来不了解海顿，现在为时已晚了。而且他对海顿的健康状况也感到生气，但是在他责怪警卫时，他们却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气的是，他发现，他所坚持的加强戒备措施，过了第一天就松懈了。他要见训练所的头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却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装傻。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迟迟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请史迈利把他的信从俱乐部转到这里来，告诉阿勒莱恩赶紧和卡拉谈妥交易？他需要手纸擦鼻血。海顿解释，他的流鼻血习惯和忏悔或痛苦无关，他说这是讯问的人问一些不屑回答的话所造成的反应，他们以为他一定知道卡拉过去吸收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决心要在他走以前打听出来。还有一种想法是，基督教会学院精英俱乐部的范沙维，除了替圆场物色人才之外，还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才。海顿解释道：“真的，对这种笨蛋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弱，他还是让人觉得他是这里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场地上一起散步，史迈利发现，周围不再有人巡逻了，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这叫他大吃一惊，感到毫无办法。转了一圈以后，海顿要求回到房间里去，他挖开一块地板，从下面掏出几张写满了象形文字的纸来，让史迈利想起了伊琳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线中，他长长的一绺卷发几乎垂到了纸上，这个样子仿佛六十年代他在老总的办公室中为了英国的光荣，正提出一个言之成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的建议。史迈利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互相都了解，谈话是录了音的。海顿的声明一开始就是长篇的辩解，他后来只记得少数几个片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基本问题是……

“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颠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政治健康的東西，是它潜意识的真正表现。

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那时开始，他只在等待时机，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流鼻血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讲得具体一些。”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海顿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史迈利按照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脸部扁平的金发小姐来开了门，屋子里有彩灯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是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让我带来。”

“天呀，”那小姐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盘，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后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画了蛇、花、虫的长条图案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小姐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

是他回答的声音，让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和杂货店账单一起放在炉架上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泡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么你为什么要为他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时也无法马上回答。他回到贝瓦特街的路上，有被跟踪的感觉，他想打电话给孟德尔，把看到两次的一辆出租车牌照号码告诉他，要他调查一下。孟德尔却不在家，要到半夜才回来，史迈利睡得很不踏实，五点钟就醒了。八点又回到了沙拉特，发现海顿兴高采烈。讯问的人没有去找他，克拉道克斯告诉他已商定好交换计划，明后天就可以走了。他的要求有一种告别味道：他剩下的薪水、他的零星物品出售后的所得，由莫斯科国民银行转交，他的信件也是如此。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有几幅他的画，包括几幅早期大马士革的水彩画，他很喜欢。是不是请史迈利代办一下？最后说的是如何掩饰他销声匿迹的话。

“还是这么说，”他建议，“说派我出差，弄得神秘一些，过了一两年再说我的坏话……”

“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谢谢你。”史迈利说。

史迈利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为自己的衣服操心。他想在到达的时候看上去像样一些，他说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莫斯科裁缝没办法说。做出的衣服像是当差穿的。”

“说得对。”史迈利说，他对伦敦裁缝的评价也并不高。

哦，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说，在诺丁山有个水手朋友。“最好给他几

百英镑封他的嘴。你能不能用公费支出？”

“我想可以吧。”

他写了一个地址。海顿就是在这种愉快合作的气氛下，开始谈史迈利所说的具体细节。

不过他一点也不愿谈怎样被吸收的情况，也不愿谈他这一辈子和卡拉的关系。“一辈子？”史迈利马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初次见面的？”如果说不久之前才认识，那似乎太无聊了，但是海顿不愿细谈。

如果他说可信的话，从大约一九五〇年开始，海顿就偶尔挑选一些情报送给卡拉。这些初期的活动只限于他认为能悄悄地帮助俄国胜过美国的事业，他说，“任何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给他们的。”也不给对我们当地的情报员不利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终于使他相信英国地位的减弱，英国没有能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但又不能提供什么贡献。美国人破坏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产生火上加油的作用，尽管这说来有些矛盾。因此他要说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苏联地鼠，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到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接受苏联国籍，在此后的十年中，还接受了两枚苏联勋章——奇怪的是，他不肯说是什么勋章，但是他坚持说是“最高级的”。不幸的是，这段时期他奉派在国外活动，因此得不到多少情报。由于他坚持在得到了他的情报后，尽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不要放进苏联的档案里就石沉大海”——他的工作不仅不平常而且是危险的。他回伦敦后，卡拉就派波里（这显然是波里雅科夫在他们内部的名字）帮他，但是海顿发现很难经常秘密会面，特别是考虑到他拍摄的文件数量。

他不愿谈在伦敦执行巫术计划之前的照相机、设备、暗号等问题，不过史迈利一直明白，海顿告诉他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从更多的东西中，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仔细挑选出来为数有限的一部分。

这时卡拉和海顿都收到警告，知道老总已经起了疑心。当然，老总有病在身，但是很明显，只要他有机会把卡拉当做他给圆场的临别礼物，他是绝不会放弃领导权的。他的研究调查与他的健康恶化成正比进行着。他有两次几乎挖到了金矿——海顿又不肯说具体情况——要不是卡拉手脚快，地鼠杰拉德可能早被逮到了。就是由于这种紧张的情况才出现了巫师，最后又出现了作证计划。巫术计划的当初是要安排继承问题：要让阿勒莱恩做接班人，并且加速老总的死亡。其次当然是，巫术计划使得中心对抄送到白厅的产品有了绝对的控制权。第三是，这使得圆场成了对付美国的主要武器。海顿坚持认为从长期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

“有多少资料是真的？”史迈利问。

海顿说，显然，目的不同，标准也不一样。从理论上来说，伪造是很容易的，海顿只要把白厅所不知道的范围告诉卡拉，伪造文件的人就

可以按此编写。有一两次，甚至是海顿自己亲自编写的。接到自己写的东西，再对它进行评估，分发到各有关单位，这件事很好玩。从秘密联络的角度来看，巫术计划的好处当然是不可估量的。它几乎使海顿不受老总的管辖，使他有充分的借口可以随时与波里见面。但是他们常常好几个月不见面。海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的文件，名义上是为波里准备鸡毛蒜皮的资料，然后连同其他许多资料一起交给伊斯特哈斯，让他送到水闸花园的安全联络站去。

“情况常常是，”海顿简单地说，“潘西在前面跑，我躲在他后面，罗埃和托比做些跑腿的事。”

这时史迈利彬彬有礼地问，卡拉有没有想到过要海顿本人接手圆场，为什么要有个别人做掩蔽呢？海顿迟迟不回答，史迈利忽然想到，卡拉像老总一样很可能认为海顿当副手更合适。

海顿说，作证计划是铤而走险的事。海顿知道老总一定已经越来越有把握了。从他抽看的档案来分析，全是海顿所破坏的或者造成破坏的计划，这就很令人不安了。而且老总也把怀疑对象缩小到一定年龄和级别的人……

“我打一下岔，斯蒂夫契克原来的建议是真的吗？”史迈利问。

“当然不，”海顿说，真的吃了一惊，“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当然有斯蒂夫契克其人。他是个很杰出的捷克将领。但他从来没有向谁提出过什么建议。”

这时史迈利发现海顿说话期期艾艾了。他第一次似乎真的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感到不安。他的态度明显地变成了为自己辩解的态度。

“显然，我们必须确定知道，老总一定会上钩，他怎么上钩……还有他会派什么人去。我们不能让他派一个小喽啰去，必须是个大角色，这件事才显得当真。我们知道他只能选一个主流以外的人，不知巫术计划的人。如果我们方面是个捷克人，他就当然只能选个会说捷克语的人去。”

“我们要一个圆场老手，能够把这大庙拖垮一些的人。”

“对，”史迈利说，他记起了山顶上那个喘气流汗的人，“对，我明白这个道理。”

“他妈的，我不是把他弄回来了吗？”海顿忿忿地说。

“是啊，这是你够朋友的地方。告诉我，吉姆去执行那次作证计划任务时，临走前来看过你吗？”

“来看过。”

“来说什么？”

海顿迟疑了很久，结果没有回答。但是答案还是明摆在那里：他的

眼光突然失神，他瘦削的脸上掠过内疚的阴影。史迈利想，他来找你，因为他爱你。他来警告你，就像他来告诉我老总神经错乱了一样，但是他没有找到我，因为我在柏林。吉姆自始至终都在背后掩护着你。

海顿又说道，还有，这必须是最近发生过反革命事件的国家。因此说老实话，捷克是惟一的地方。

史迈利好像没有在留神谛听。

“你为什么要把他弄回来？”他问道，“为了友情？为了他没有多大作用而你又掌握一切有利的条件？”

海顿说，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吉姆在捷克监牢里多待一天（他没有说俄国监牢），就有人出来为他说话，把他看做是一把钥匙。但是一见他回了国，白厅里人人都想把他的嘴封住，对于遣返回来的人员都是那样的。

“我很奇怪卡拉没有把他枪毙了事。还是因为你的缘故他才手下留情？”

但是这时海顿又漫无边际地在说些半调子的政治理论了。

最后他说到了自己，在史迈利的心目中，他已越来越渺小，变成一个卑鄙小人了。他说，他听说尤奈斯库38最近答应写一个剧本，其中主角一言不发，而周围的旁人则喋喋不休，他听了很感动。将来心理分析家和当代的历史学家来分析他时，他希望他们会记得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说的话在十七岁的时候都已说了。对于后来的岁月，你总得有些作为。他很抱歉，他不能带一些朋友去。他希望史迈利以后想起他来对他会有好感。

史迈利那时想告诉他，他想到他的时候绝不会那样，还会想再说些别的，但是这样做似乎没有意义，而且海顿又开始流鼻血了。

“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要我告诉你要避免大事宣扬。迈尔斯·塞康比对这一点很在乎。”

海顿这时居然笑了一下。他说，他在暗中已把圆场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不想在公开场合再搞一遍。

史迈利临走之前，问了他仍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得把这件事告诉安恩。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我转告她吗？”

需要经过一番解释，才能使他明白史迈利问题的意思。他起先以为史迈利说的是“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没有去见她。

“哦，是你的安恩。”他说，好像到处有不少安恩似的。

他解释道，这是卡拉的主意。卡拉早就意识到，史迈利是对地鼠杰拉德最大的威胁。“他说你很了不起。”

“谢谢你。”

“但是你有什么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史迈利注意到，他的眼光非常呆滞。安恩说像锡蜡一样。“不要搞得太过分，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也算上一个。懂吗？”

“懂。”史迈利说。

例如，在作证计划那个晚上，卡拉坚持，如果可能的话，海顿要跟安恩在一起。作为一种保险。

“那天晚上，事实上是出了一个小差错，是不是？”史迈利问，他想起了山姆·科林斯，想起了埃利斯是否中了枪的事。海顿同意确是那样。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捷克的第一批新闻消息应在十点半发表。海顿在山姆·科林斯打电话给安恩之前，在他到圆场之前，就有机会读到俱乐部里的自动收报机。但是由于吉姆中了枪，捷克方面慌了手脚，消息发布时他的俱乐部已关门了。

“幸而没有人追究，”他说，又自己拿了史迈利的一支烟，“我到底算是哪一个，顺便问一下？”他闲聊地问，“我忘了。”

“裁缝。我是乞丐。”

这时史迈利已经感到腻了，他溜了出来，也没有道别。他进了汽车，漫无目的地开了一个小时，速度达每小时八十英里，一直开到去牛津的一条岔路上，才停下来找地方吃了午饭，然后转向伦敦。他仍旧没有勇气回贝瓦特街，于是去了电影院，然后在外面吃了晚饭，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却发现拉康和迈尔斯·塞康比都等在门口，塞康比的劳斯莱斯汽车像黑色的便盆，全长五十英尺，停在人行道上，碍手碍脚地影响交通。

他们像疯了似的开往沙拉特，就在那里，在明朗的夜空下，有几支手电筒的光照着，几个训练所里同住的人脸色苍白地在旁看着，一条花园的长凳上，坐着比尔·海顿，面孔朝着月光下的板球场。他的大衣下面穿着一套睡衣裤，看上去更像囚衣。他的眼睛睁开，脑袋不自然地垂在一边，好像被内行人折断脖子的鸟头一样。

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十点半的时候，海顿向警卫说他睡不着，感到头晕，他想吸些新鲜空气。由于他的案件已经结束，没有人想到跟着他，他就独自走到外面黑暗中去。有个警卫还记得他开玩笑说要“检查一下板球场上的球门”。另一个警卫只顾看电视，什么也没有注意。半小时后他们担心起来，因此年纪大的那个出去检查一下，他的助手留下来，万一海顿自己回来了。他们发现海顿就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警卫起先以为他睡着了。他弯下身来，闻到了酒气，他以为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因此以为海顿是喝醉了，这使他觉得奇怪，因为照说训练所里是禁酒的。他想把他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脑袋垂下来，全身死沉沉的。警卫呕吐了一阵（树旁还有残迹），把他扶正坐好了，就去报警。

海顿在白天收到什么信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但是他的衣服从洗衣店送了回来，可能夹带了信，例如请他到什么地方与人相会。

“那么是俄国人干的，”对着海顿一动不动的形态，大臣满意地宣布，“灭他的口，我想是。该死的恶棍。”

“不是，”史迈利说，“他们一向很在乎把自己人弄回去。”

“那么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呢？”

大家都在等着史迈利的答复，但没有等到。手电筒没有电了，这些人迟疑地回到汽车旁。

“我们还是能牺牲他的吧？”大臣在回去的路上问。

“他是个苏联公民。让他们把他要去。”拉康说，仍在看着黑暗中的史迈利。

他们都觉得这对谍报网是很不利的。不知卡拉愿不愿意继续执行原来的协议。

“他不会愿意的。”史迈利说。

史迈利独自坐在他的头等车厢里回想这一切时，他有着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把望远镜倒过来看海顿。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尽管一路上酒吧间都是开着的。

在车子过国王十字车站的时候，他有一种喜欢海顿的怀恋的感觉，甚至是尊敬的感觉。毕竟，海顿是一个大丈夫，他有他的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说了出来。但是史迈利觉得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未免太方便了。他越是考虑海顿零乱的自述，越是觉得这个人充满矛盾。他开始把海顿看成是报上那种有些浪漫味道的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莫斯科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圣地。他对自己说：“莫斯科是比尔师法的模范。他需要一个解决历史和经济问题的周延答案。”他又觉得这太干巴巴，又加了他想喜欢的那种人的性格：“比尔是个浪漫派，是个虚荣者。他要跻身于先进的行列，引导群众走出黑暗。”这时他记起了肯特镇那个女孩的客厅里那些没有完成的画：难以辨认，过分做作，没有希望。他也记起了比尔专制父亲的鬼影——安恩就叫他魔鬼——他觉得比尔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弥补他作为艺术家的不足，是因为他缺少慈爱的童年。到了后来，这种理论是不是再起作用，当然无关紧要了。比尔已陷得太深，卡拉知道怎么使他不能脱身。史迈利认为，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习惯问题，他仿佛又看到比尔躺在贝瓦特街的地板上，安恩在旁边的唱机上放着音乐。

比尔也是喜欢那样的，对此，史迈利从来没有怀疑过。站在一个秘密舞台的中央，让大家你争我斗，他既是主角，又是剧作家，合二而一。唉，没有问题，比尔喜欢那样。

史迈利耸一耸肩，把这些想法都撇在一边，仍像过去一样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标准答案一点也不相信，相反的，却相信有那么一个俄罗斯娃娃，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娃娃，再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在所有活着的人中，大概只有卡拉看过比尔·海顿身上最后一个小娃娃了。比尔是什么时候被他吸收去的，怎么吸收的？他在牛津时代的右倾立场是一种伪装，还是罪恶，倒反而是卡拉把他从这罪恶中拯救出来？

去问卡拉吧——可惜我没有问他。

去问吉姆吧——我永远不会。

英国东部的景色在车窗外飞逝而过，卡拉毫不退让的脸代替了比尔·海顿歪在一边的死亡面孔。“但是你有这一个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

幻想？这真是卡拉对爱情的称呼吗？比尔对爱情的称呼吗？

“到了，”车上的乘务员大声说道，也许已是第二次了，“准备下车吧，您不是到格林斯贝吗？”

“不，不，我到伊明翰。”这时他记起了孟德尔的话，于是下了车到月台上。

看不见有出租车，因此他到售票处去打听后，走过一个空荡荡的前院，到了一块“在此排队”的绿色牌子旁。他希望她会来接他，但是也可能她没有收到他的电报。唉，圣诞节前的邮局，谁能怪他们呢？他不知道她听到比尔的消息时会怎么想，但是他想起了康沃尔悬崖上她吓怕的脸，他这才明白，那时比尔在她的心中早已死了。她已经感觉到他手脚冰冷，猜到了是什么缘故。

幻想？他重复地自言自语。没有幻想？

天气刺骨地冷，他真希望她那个卑劣的情人另外给她找个暖和的地方。

他后悔没有从楼梯下的鞋柜里把她的毛靴带来。

他记起了那本格里美尔斯豪森，仍忘在马丁台尔的俱乐部里。

这时他看到了她：她那辆邋里邋遢的汽车在一条标着“只准公车通行”的车道上向他直冲过来，安恩在车里看着另外一边。他看到她下了车，车上的指示灯仍在闪着光，她就走到车站去打听。身材修长，步伐轻捷，貌如天仙，基本上是一个别的男人的女人。

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在罗奇的眼中，吉姆·普莱多的行为举止就像他父亲离开以后他母亲的那个样子。他花很多时间在一些小事情上，比如为学校演戏布置灯光，用绳子修补橄榄球网，上法语课时细心纠正小错误。但是大事情，比如散步和单独打高尔夫球，却完全放弃了，晚上深居简出，不到村里去。最糟的是罗奇在他冷不防的时候，发现他眼光空虚呆滞，在班上丢三落四，甚至忘记给成绩——罗奇得提醒他每周交上去。

为了帮助他，罗奇承担了调整舞台时的工作。因此在排练时吉姆要给他一个特别信号。只给比尔一人，不给别人。在要灯光变暗的时候，他要把手举一下。

不过慢慢地吉姆似乎好一些了。随着他母亲死讯的影子逐渐淡薄，他的眼光清晰起来了，精神也好了。到演出那天晚上，他神情愉快，为罗奇前所未见。他们在演出后又累又高兴地回到大楼里去的时候，他大声说：“喂，大胖，你这个傻蛋，你的雨衣呢，你没有看到在下雨吗？”他听见他向一位来看戏的家长说：“他的真名叫比尔，我们俩是同时到这里来的。”

比尔·罗奇终于相信，那把手枪到底是个幻觉。

[1]儿童在数樱桃核儿、坎肩纽扣、雏菊花瓣、梯牧草籽时唱的算命歌谣。（《牛津童谣词典》）

[2]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笔下“山上醉一宵，人间已半世”的人物。——译注，下同

[3]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4]比尔（Bill）又意为账单。

[5]法语：“艾米尔对着鼻子下的图画在看什么？我亲爱的伯格，如果你不能马上回答出一句清楚的法语来，我就马上把你撵到门口去，你懂吗，你这傻蛋？”

[6]格里美尔斯豪森（1621—1676），十七世纪德国作家，著有背景为德国三十年战争的自传体小说《痴儿西木传》。史迈利自大学时期起，便热爱研读十七世纪德国文学。

[7]White Hall，伦敦街名，位于市中心，是英国国会与政府机关集中所在地。

[8]南非荷兰血统移民的后代。

[9]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冒险家，一次大战时期曾在阿拉伯策划反土耳其叛乱。

[10]区别于牛津和剑桥、成立于1800年至二十世纪初期之间、以红砖为代表性建筑风格的英国大学。

[11]Displaced Person，战时难民。也可以是Different Person的缩写，故说是“不同的人”。

[12]当时肯尼亚反英武装组织的名称。

[13]英国作家史蒂文森（1850—1894）著名小说《化身博士》中有双重人格的主角。

[14]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男演员，曾主演《北非谍影》等著名电影。

[15]这里是讽刺盯梢的。

[16]意为兔子。

[17]英谚：新扫帚扫得干净。

[18]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

[19]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著《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主角。

[20]代号。

[21]鹅妈妈童谣中的一位主角。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童谣。

[22]威尔斯和法戈其实是两个人。法戈是美国西部拓荒时代首创快递运输的人，一八五〇年创立美国运通公司，一八五二年又与威尔斯合办威尔斯法戈公司，经营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快递运输业。

[23]意为教皇。

[24]原书中为Source Merlin，Merlin本是亚瑟王故事中的巫师，故此译为巫师来源。

[25]英国煤气炉每次使用前须投币。

[26]伦敦左翼势力集中区。

[27]英国著名贵族子弟的学校。

[28]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著有《了不起的盖茨比》。

[29]鲁伯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浪漫派诗人。

[30]Cheshire cat，《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那只猫，它脸上总咧嘴带笑。

[31]预先录制好的音乐，一般用作背景音乐。

[32]伏特加掺番茄汁。

[33]葛丽泰·嘉宝（1905—1990），著名瑞典影星。

[34]艾尔·卡彭（1899—1947），绰号“疤面”，美国知名罪犯，一九二〇年代芝加哥市黑帮头目。

[35]这一带是伦敦剧场汇集的地方，白天又是水果蔬菜市场。

[36]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阴险的反面人物。

[37]传说穆罕默德曾喝令大山向他过来，未能如愿，就自己移驾。

[38]尤奈斯库（1909—1994），法国剧作家，荒诞派戏剧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第2册 荣誉学生

机构和人物表

圆场英国情报单位的俗称，位于剑桥。

沙拉特圆场培训中心的所在地，俗称“育成所”。

剥头皮组正式名称为旅行组，专门负责暗杀、绑架、勒索等危险而肮脏的突击任务。

点路灯组支持单位，负责为第一线情报人员提供后勤补给、监视、窃听、运输与安全联络站等，旗下人员俗称“街头艺术家”。

管理组负责圆场内部各种繁杂行政事务，组员俗称“管家”。

乔治·史迈利重出江湖的老间谍，现任圆场最高主管，办案能力惊人、性情谦和，得到部下衷心爱戴，却始终在内部人事斗争中落败，妻子的不忠一直是他的心头之痛。

安恩·史迈利与乔治·史迈利分分合合的妻子，美貌而外遇不断。受比尔·海顿利用，与海顿发生一段短暂恋情，这段恋情让史迈利夫妇之间总是笼罩着阴影。

卡拉直接隶属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十三情报处首长，也是史迈利的宿敌；多年前吸收了比尔·海顿，二十多年来成功地破坏许多圆场的行动。

比尔·海顿圆场的前任伦敦站站长，实为卡拉手下，潜伏在圆场二十多年，被史迈利揭发后遭人暗杀，但他造成的破坏让圆场几乎一蹶不振。

康妮·沙赫斯回锅的圆场研究组研究员，过目不忘的记性直追计算机，专长是分析俄国情报，患有严重关节炎。

彼得·吉勒姆对史迈利忠心耿耿的部下，经常为他跑腿办事，性喜拈花惹草。

奥立佛·拉康白厅（内阁）办公室中负责监督圆场的首席行政官员，位于阿斯科特的家常常成为秘密会议地点。

索尔·恩德比外交部官员，东南亚事务首席专家，长袖善舞，得意于官场。

老总已故的前任圆场最高主管，史迈利过去的上司，受海顿陷害失势后病故。

罗迪·马丁台尔外交部官员，与史迈利为旧识，热爱嚼舌根、散布谣言。

马铁娄美国中情局驻英分部主任。

狄沙理斯博士研究组另一龙头，专长是分析中国与亚洲地区情报。

法恩史迈利的“保镖”兼管家，过去任职于剥头皮部门，出手快、狠、准。

劳德·斯屈克兰圆场财务部门主管。

山姆·科林斯圆场行动组人员，长期在东南亚工作，目前被迫退休，在赌场工作。

托比·伊斯特哈斯圆场点路灯部门主管。

塔夫蒂·西辛格圆场驻香港的情报主管。

杰里·威斯特贝没落破产贵族后裔，以记者为职业，实则为圆场从事第一线情报工作，生性浪漫，风流韵事不断，原本在意大利乡间隐居，但一封电报让他重出江湖，回到亚洲地区……

老库洛长期在香港工作的记者，也是圆场的外勤情报员，杰里的直接上司。

德雷克·柯来自汕头的神秘香港富商，中国海空公司的老板。

丽姬·伍辛顿德雷克·柯的金发情妇，化名丽泽·伍芝，一位美丽但不太高明的骗徒，意外地掌握了重要线索。

刁先生德雷克·柯的得力助手。

瑞卡度据报已神秘死亡的印支包机飞行员，丽姬的前任情夫。

查理·马歇尔鸦片瘾缠身的中意混血儿，印支包机驾驶员，瑞卡度的拜把兄弟，父亲是中国与柬埔寨边境的“将军”。

陆克杰里与库洛的朋友，来自美国的记者。

洛克斯特绰号“摇滚客”的香港警察，与圆场有某种合作关系。

1 圆场移师

事后，伦敦地下工作人员聚在灰尘满布的小角落，饮酒讨论海豚案的历史应由何处落笔。一名体态如飞船、负责转译窃听数据的男子也加入讨论，而以他为首的一群人竟然主张最适合的时间点应是六十年前，“超级无赖比尔·海顿”降生于凶星下的那日。一提海顿大名，这群人不禁心寒。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因为这位海顿，当年仍就读牛津大学时即被俄国人卡拉吸收成为“地鼠”、“卧底人”，正式的职称是渗透干员，渗透的对象是他们。而海顿在卡拉的指示下混迹他们左右，从事间谍活动至少三十载。最后虽然揪出海顿的狐狸尾巴，却直接导致英国人抬不起头，被迫仰赖美国姐妹机构的致命奶水。他们以奇特的术语称该机构为“表亲”。飞船男子表示，表亲让全局为之改观，令他深感遗憾，遗憾程度不亚于惋惜网球场上的蛮干，或板球投手故意投出触身球。“而且这也坏了大局。”多人随之附和。

对想像力较不丰富的人而言，整件事真正的起点是乔治·史迈利摘下海顿的面具，随后走马上任，照料众叛亲离的自家单位，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下旬。这些人说，乔治一锁定了卡拉，就谁都拦他不住了，其余都属必然结果。可怜的老乔治：负担沉重，心灵如何承受得住！

一位学者型男子，从事研究员之类的工作，以术语而言属“掘穴人”，他甚至在醉意方酣时坚持，起点自然而然应落在一八四一年元月二十六日，当天皇家海军舰长义律率众登陆珠江口一处名为香港的雾锁岩岛，数日后宣布该地为英国殖民地。这名学者认为，义律登陆后，香港成为英国鸦片输入中国的枢纽，因此大力助长大英经济霸业。假设英国没有开创这块鸦片市场——他以不甚认真的口吻说——根本也不会出现海豚案，也没有花招，没有获利；因此在比尔·海顿阴谋破败后，也不会出现圆场中兴回春的气象。

针对此问题，中坚分子如回局待命的外勤情报员、训练师，以及个案主办官，一如往常，自行组成耳语干部会议，这些人全然从情报活动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认为在史迈利巧妙奔走之下，才有办法追查出卡拉在老挝首都万象的金主。此外，与涉案女孩双亲的应对，以及在百般不情愿的白厅老大间纵横捭阖，史迈利的表现皆可圈可点。毕竟白厅掌握情报活动的钱包，也负责在此机密世界提供权利与特许。最重要的是，史迈利让此次行动自行运作的时机无懈可击。对这些专业人士而言，海豚案是技术上一大胜利。毋庸置疑。被迫与美国表亲结缡，他们认为只是拉长战线，巧妙运用内行人的看家本领。至于最终结果：去他的。吾皇驾崩，天佑新皇万寿无疆。

老同志会面时，上述辩论必定持续，然而杰里·威斯特贝的姓名理所当然鲜少有人提及。偶尔的确有人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这些人不是有勇无谋，就是多愁善感，或者纯属记性不佳，结果一时让现场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下；不过气氛总会消散。举例而言就在几天前，一位刚从圆场

培训班毕业的年轻见习生，在欢迎三十岁以下男女惠顾的酒吧再度提起此事。培训班位于沙拉特，经过一番整顿翻新，行话昵称为“育成所”。沙拉特最近淡化海豚案，当做学员讨论的题材，甚至以短剧诠释；这位可怜的男学员学识尚浅，自认消息灵通而沾沾自喜。“可是，我的天啊，”他提出异议，直言不讳，口气如同海军候补少尉在军官餐室吹牛时享有的那份少不经事的自由，“我的天啊，威斯特贝在本案的角色，怎么好像没人看清楚？如果真有人扛下重担，这人非杰里·威斯特贝莫属。他是前锋部队。怎样？不对吗？老实讲嘛。”当然了，他并没有说出“威斯特贝”或“杰里”，因为他没听过。他提出的姓名是该案行动期间赋予杰里的代号。

这记坏球由彼得·吉勒姆接住。吉勒姆高大强悍，生性却温文儒雅，等候初次分配的见习生往往将他视为希腊天神来崇拜。

“威斯特贝是拨动炉火的树枝，”他说，高声而简洁，打断了沉默，“任何外勤情报员都能做得跟他一样好，有些人甚至还比他高明。”

这名男学员仍未听出弦外之音，吉勒姆只好起身走向他，面色极为苍白，对着他的耳朵咒骂道，酒量够的话，应该再喝一杯，接下来就该闭嘴个几天或者几周。此时言谈焦点转回亲爱的乔治·史迈利，他肯定是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师，退休后的近况如何？众人颇有同感的是，他活过的人生无数，可供他静静回想。

“乔治尽过的心力比我们多出五倍。”有人扬声说，语气忠诚。女性。

十倍，其他人附和。二十！五十！在夸张的声势中，威斯特贝的阴影总算消退。就某种意义而言，乔治·史迈利的阴影亦然。他们会说，乔治嘛，是投了漂亮的一局。以他这种岁数还能强求什么？

或许更合实际的起点，应是一九七四年中台风来袭的某个周六；午后三时，香港如临大敌，准备迎战一场狂风暴雨。外籍记者俱乐部的酒吧里，二十几名新闻工作人员，多数来自英国前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心情闲散，言行粗暴，只管饮酒耍宝，就像独缺主角的剧团。十三层楼底下，旧电车与双层巴士沾染着来自建筑工程的泥黄污渍，以及九龙烟囱所产生的煤灰。极具破坏力的针状雨滴，落入摩天大楼旅馆外的小池塘。男士洗手间是整个俱乐部里最佳的观港据点，加州青年陆克就在那里低头探进洗脸台，漱掉嘴里的鲜血。

陆克身材高瘦，喜欢打网球，刚愎自用，二十七岁却垂垂老矣，美军撤退前是杂志社驻西贡战地记者群中一颗明星。知道他会打网球后，很难想像他还会做其他事，喝酒也包括在内。大家会想像他站在网前使出反手拍、正手拍，杀得对手落花流水；或在双发失误之后发球得分。此刻陆克一面吸吮一面吐痰，神志被酒精与轻微脑震荡分裂成数个清醒的部分。他也许会以战争用语“遭菠萝手榴弹击中”来描述。其中一部分由湾仔酒吧女孩占据，她名叫埃拉，陆克为了她挥拳击打好色警司的下巴，因此承受了无可避免的后果：这位警司姓洛克斯特

（Rockhurst），别号摇滚客（Rocker），此刻正在酒吧角落养神。稍早他使出最小限度的蛮力，狠踹他的肋骨，将陆克揍得不省人事。陆克另一部分头脑想着今早华人房东说的话。房东过来抱怨陆克的留声机太吵，并留下来喝了杯啤酒。

肯定是某种独家新闻。究竟是哪一种呢？

他又干呕一声，然后朝窗外望去。波浪猛击防波堤后的中式帆船，“天星渡轮”也已停航。一艘经验丰富的英国护卫舰在港口定锚，俱乐部里谣传白厅正物色买主。

“应该出航才对。”他脑筋紊乱地喃喃自语，一面回想起他旅行期间听到的海军传说片段。“台风天护卫舰出航。遵命。”

层层黑色云堤下的丘陵呈暗蓝灰色。若在六个月前，此景象会让他赞不绝口：港口、嘈杂声，甚至自海边攀上太平山顶的摩天大楼群。自西贡回来后，陆克贪婪地拥抱此一美景。然而今天他只看到一块自大、富裕的英属巨岩，管理人是一群系了红蝴蝶结、眼界只到肚皮的商贾市侩。如此一来，他对这块殖民地的观感跟其他记者已没两样：只剩下机场、电话、洗衣店、床铺，偶尔（但为期不长）有女人。这里连经验都必须自境外输入。至于他沉迷已久的战争距离香港之遥，如同远离战火的伦敦或纽约。惟有股市展现象征性的敏感度，然而周六不开盘。

“还活得下去吧，老大？”邋遢的加拿大牛仔问，来到他身边的小便池。两人曾共享过越战春节攻势的乐趣。

“谢谢你，我感觉好上加好。”陆克以他最高尚的英国口音回答。

陆克认定今早房东积克·赵喝啤酒时对他说的话非常重要，非回想起不可，刹那间那段话如天降之礼重回他脑海。

“我记得了！”他大喊，“天啊，牛仔，我记得了！陆克，你果然记得！我的大脑！运作正常！各位，静听陆克发言！”

“算了吧，”牛仔劝他，“今天外面乱糟糟的，老大。管他什么东西，忘掉准没错。”

然而陆克踢开厕所门，大步走进酒吧，双臂大张。

“嘿！嘿！各位注意！”

没有人转头。陆克以双手在嘴边做出喇叭状。

“听好，你们这堆酒鬼，我有天大消息。太棒了。一天两瓶威士忌，脑筋居然跟剃刀一样锋利。帮我找个铃铛。”

他遍寻不着，因此随手取来大酒杯，敲击吧台横杆，啤酒溢了出来。即使动作如此大，也只有小矮人微微理睬他。

“怎么啦，小陆？”小矮人以鼻音说。他娘娘腔的嗓音带有格林威治村的温吞。“难不成大牛又有麻烦（打嗝）了？真受不了。”

大牛是外籍记者俱乐部的术语，指的是总督。小矮人是分社总编，

陆克的长官，肌肤松软，生性阴郁，头发散乱无章，黑丝垂挂在脸上，擅长静悄悄从你身边冒出来。一年前，两名鲜少出现在俱乐部的法国人差点害他送命，原因是他随口评论越南的乱源。法国人将他带进电梯，打断了下巴以及几根肋骨，然后弃置一楼，回俱乐部继续喝酒。没过多久，他胡乱指责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只是意思意思，又遭几名澳大利亚人围殴。他暗示道，堪培拉政府与约翰逊总统谈好了条件，让澳大利亚阿兵哥待在头顿港纳凉，美军则前往他地奋战。这群澳大利亚人与法国人不同的是，他们甚至连电梯也懒得用，只是在小矮人站的原地将他打得落花流水，等他不支倒地再补几下拳打脚踢。事后他学乖了，知道何时应避免接触香港某些人。例如大雾持续不散之际，或是自来水一天只供应四小时的时候，或是刮台风的周六。

除此之外，俱乐部相当清静。顶级记者为了保持声望，绝不踏进俱乐部一步。几名生意人来这里体验新闻圈的滋味，几个女孩来这里找男人。两三个看似战争观光客的电视记者进行虚假的战斗演习。警司摇滚客，他是前巴勒斯坦人、前肯尼亚人、前马来亚人兼前斐济人，这个怒气难消的沙场老将在他习惯就座的角落，端着啤酒，一手的指关节微红，阅读着周末版的《南华早报》。有人说，摇滚客是冲着这里的格调而来。正中央有张大桌子，非周末时为合众国际社的保留地，此时坐着纳凉的是上海少年浸信会保守派保龄球俱乐部的成员，主席是年迈而白发斑驳的澳大利亚人库洛，喜欢举办周六的例行赛事。比赛的方式是将餐巾揉成一团，丢向俱乐部另一边的酒架，正中目标的话，其他参赛者得买下那瓶葡萄酒请你喝，大家也帮忙消费。老库洛吼出发射令，标靶由神态疲惫的老服务生负责，为参赛者奉上奖品。这位服务生是上海人，是库洛最喜欢的一个。这天战况并不激烈，部分成员甚至懒得投掷。然而，陆克选择的听众就是这群人。

“大牛的老婆有麻烦了！”小矮人坚称，“大牛的老婆的马有麻烦了！大牛的老婆的马夫有麻烦了！大牛的老婆的马——”

陆克大步迈向中央大桌，一跃而上，打碎了数只玻璃杯，头也撞到天花板。南边的窗框住他的身影。以半弯腰姿势站立的他，体型与其他人不成比例；黝黯水雾的后方是黝黯的山顶，眼前这位巨人尽占最突出的位置。然而大伙继续投掷餐巾，继续喝酒，对他视而不见。只有摇滚客朝陆克的方向瞥一眼，就那么一眼，接着舔舔硕大的拇指，翻至漫画版。

“第三回合，”库洛以浓浓的澳大利亚口音吆喝，“加拿大弟兄，准备发射。别急嘛，臭小子。发射！”

一团餐巾以高角度的抛物线飘向酒架，落在裂口上，停留一阵，随后瘫落地上。在小矮人怂恿下，陆克开始在桌上跺脚，又有玻璃杯落地。最后他总算击落听众的防护网。

“各位阁下，”老库洛叹了一口气说，“请安静一下，我老弟有话要讲。恐怕他有事相商。陆克老弟，你今天已经开战数次，再惹事我们将

严惩不贷。发言务必简洁清楚，细节再小也不能省略，说完后敬请歇口。”

俱乐部成员都对彼此的传奇背景穷追猛打，而老库洛在众人眼中就是《古舟子咏》里的老水手。他们口耳相传，库洛自短裤抖落的沙，比他们多数人踏过的泥土还多。这话自有道理。库洛的生涯始于上海，是当地惟一英文报刊的倒茶小弟兼采访主任。至今他报道过共产党与蒋介石之争、蒋介石与日本之争、美国人与几乎所有人之争。在这个无根之地，库洛给大家一种历史感。他的谈吐具三十年代真传，在台风天连最能吃苦的人都不敢领教。三十年代驻东方的外籍记者以澳大利亚人为主。基于某种原因，跟梵蒂冈有关的术语常常挂在他们嘴边。

多亏老库洛之助，陆克总算能发表高见。

“各位男士！——小矮人，你这该死的波兰鬼子，放开我的脚！各位男士。”他以手帕点点嘴唇，然后说，“各位所知的巍安居正物色买主，而塔夫蒂·西辛格已经溜之大吉。”

众人不为所动，但他本来就不预期会有太多骚动。新闻工作者不习惯惊呼失声，甚至吝于显露不敢相信的神情。

“巍安居，”陆克洪亮地重复，“待价而沽。知名当红房地产创业家积克·赵，各位比较熟知的身份是我那位动辄发火的房东，他接受大英政府之托处理掉巍安居。欲知内情，就散布高见。放手啦，波兰杂碎，再不放手我宰了你！”

小矮人将他推倒。他双手挥舞，以敏捷身手跃下，因此没有受伤。站在地板上的陆克继续对攻击他的人出言不逊。此时库洛的大头转向陆克，湿润的双眼以恶毒的目光瞪着他，似乎永远不会移动视线。陆克开始怀疑，库洛的私法如此多，他究竟触犯了哪一项。库洛的伪装无数，属于复杂、独行的人物，这一点围坐此桌的人都知道。在刻意粗鲁的言行举止之下，隐藏的是一份对东方的爱，有时这份爱似乎将他束缚得难以忍受，以至于他得出走几个月，消失无踪，有如情绪郁闷的大象离群行动，直到适合与他人相处时才复出。

“阁下，别嘟哝个不停了，行吗？”库洛最后说，并以倨傲的姿势将大头往后倾，“请勿朝极为有益健康的水里吐低级秽物，士绅。巍安居是特务机构。多年来一直是特务机构。是长了一对大山猫眼的塔夫蒂·西辛格少校的巢穴。少校从前隶属皇家步枪队，目前服务于香港警界，相当于常受福尔摩斯嘲笑的伦敦探长莱斯垂德。塔夫蒂才不会逃跑。他是地下工作者，不是下流坯子。先生，帮我老弟倒一杯，”他对出生于上海的酒保说，“他扯太远了。”

库洛再度说出发射令，俱乐部也重新踏上追求智慧之路。事实上，陆克所谓的间谍大独家，往往了无新意，线索也总遭摒弃。离开越南后，愚蠢的他每翻地毯必见下面密藏间谍。他相信全世界由间谍宰制，因此一有空闲，如果没喝醉，大半天时间就在香港无数伪装薄弱的中国观察家身边打混；更糟糕的是，他也与小山上偌大美国领事馆里的寄生虫

为伍。若非这天大家无精打采，这件事或许就此画上句点。结果小矮人发现耍宝的机会，抓住不放。“说来听听嘛，小陆，”他建议，双手娘娘腔似的朝上微扭，“他们要卖巍安居，是连内容一起卖，还是只卖现有建筑？”

这问题为他赢得满堂彩。怎样的巍安居价值如此高，是带有机密，还是不带机密？

“是不是连西辛格少校一块儿卖？”南非摄影记者追问。他的嗓音单调平板，仍引来笑声，只是感情成分较低。这位摄影记者是喜欢搅局的角色，小平头状似饿殍，而脸上坑洞看似他乐意出没的战场。他来自开普敦，不过大家称呼他“寻死匈奴”。有此一说：他终将为每个人收尸，因为他总是静悄悄地接近他们。

接下来几分钟话题岔离，陆克的高见完全淹没在一连串有关西辛格少校的故事，还有模仿西辛格少校的表演里，除了库洛之外，大家欣然加入。有人忆起西辛格少校最初登港时身份是进口商，在码头附近用了一些笨借口掩饰身份；可惜六个月后旋即调任军职，领着一批士气低落的职员与养尊处优的文弱秘书，移师至上述间谍机构接替某人的职位，这事令人百思不解。众人特别描述了一对一的午餐会，如今让大家恍然大悟的是，原来在座几乎每位记者皆曾于不同时间点分别受邀。这些餐会结束前，主人在觥筹交错间费力建议，所用的语句如：“你听好哟，老头子，万一碰上了一个珠江过来的有趣的潮州人，你知道吧，就是关系良好的人，懂吧？——非记得巍安居不可！”随后亮出神奇的电话号码：“直通我办公桌，不经转接，没有录音，完全没有。”——六七名记者似乎将这段记载于个人日记中：“好，写在袖口上，假装是约会或是女朋友电话或什么的。准备好了吗？香港五〇二四……”

大伙一同朗诵完数字后沉默下来。某处时钟响起，三点十五分。陆克缓缓起身，掸去牛仔裤上的灰尘。上海籍老服务生弃守酒架，伸手取来菜单，希望或许有人想点餐饮。一时之间，无所适从感袭上心头。这一天的时光报废了。打从第一杯琴酒就如此。后方传来低吼声，是摇滚客为自己点了一客分量可观的午餐：

“还有，端一杯冰啤酒来，冰的，听见了吗，小子？冰冰凉凉的。快快！”警司与当地人对有一套，每次皆用上这句贬义深重的话，惟恐对方不懂英文。现场再度陷入沉默。

“哇，小陆，原来如此，”小矮人边说边离开，“我猜你就是靠这个拿普利策奖吧。恭喜了，亲爱的。年度最佳独家新闻。”

“哎，你们这些人，全下地狱算了。”陆克漫不经心地说，开始往吧台移动。两名面有菜色的女孩坐在吧台前，是陆军眷属，来酒吧钓男人。“积克·赵不是还亮出圣旨给我看吗？不是写着遵照女王王指示？最上面还有个臭皇冠，狮子压着山羊。嗨，小甜心，记得我吗？我这种人，是以前在园游会请你们吃棒棒糖的男人。”

“西辛格不接，”寻死匈奴手持话筒，以哀伤的语调吟唱，“没人接

听。西辛格不接，值班也不接。电话线被切断了。”由于情绪激动，或是由于意兴阑珊，没人注意到寻死匈奴刚才曾经悄悄溜开。

直至此时，澳大利亚人老库洛按兵不动。现在他猛然抬头看。

“再拨一次，笨蛋。”他命令道，口吻如新兵班长般严厉。

寻死匈奴耸耸肩，再度按下西辛格的号码，有两个人过去看他拨号。库洛一动也不动，从他的座位静观其变。电话有两部，寻死匈奴又试了另一部，结果却一样。

“打给接线生，”库洛从众人站立处的另一边发号施令，“别学大肚皮的报丧女妖站在那边。打给接线生，你这个非洲人猿！”

空号，接线生说。

“什么时候开始的，老兄？”寻死匈奴对着话筒质问。

无资料可查，接线生说。

“大概是换号码了吧，对不对，老兄？”寻死匈奴朝话筒咆哮，对象仍是那位倒霉的接线生。从没人见过他如此投入。对寻死匈奴而言，人生是摄影机观景窗对面的景象——这番激情只能归因于台风。

无资料可查，接线生说。

“打给浅喉咙，”库洛命令，他这时已火冒三丈，“打给全香港每个该死的老美。”

寻死匈奴摇摇长头颅，不太确定。浅喉咙是官方发言人，遭此地全体记者痛恨。对他有事相求的话，面子挂不住。

“好吧，我来打。”库洛站起来，推开众人，走向电话，开始对浅喉咙殷勤奉承。“长官，是在下库洛，供您差遣。阁下身体可好？托福，长官，托福。夫人与子女可好？必然是吃好、睡好吧？没有感染坏血病或斑疹伤寒吧？那就好。这样的话，或许您能善心指点在下，塔夫蒂干吗逃跑？”

大家看着他，然而他的脸色固若山岩，难以从中解读信息。

“在下同样祝福您，长官！”他最后闷哼一声，挂回电话，力道之猛，整张桌子因而应声蹦跳一下。随后他转向上海籍老服务生。“郭先生，请帮我招一辆小马力引擎车好吗？各位，拍拍屁股走人啦，你们这一群！”

“干吗走人？”小矮人说，心里希望自己也包括在内。

“跑新闻啦，你这个自大的小红衣主教，跑新闻去，你们这堆沉迷酒色的阁下。去追求财富、名望、女人、长寿！”

众人无一能解释他阴郁的心情。

“浅喉咙究竟说了什么，有那么糟糕吗？”邋遢加拿大牛仔问。他一头雾水。

小矮人附和：“对啊，他怎么说的，库洛老兄？”

“他说：‘无可奉告。’”库洛以文雅的口吻回答，仿佛这四字重重折损他的专业尊严。

因此一行人朝山顶挺进，留下静静喝酒的多数客人。同行者包括寻死匈奴，高个陆克，邈邈加拿大牛仔——蓄有墨西哥革命家髭须的他，相貌格外醒目。此外还有爱当跟屁虫的小矮人，以及老库洛与两名陆军女眷——由于上海少年浸信会保守派保龄球俱乐部召开全体会议，因此女士得以参加，只不过会员皆需宣誓禁欲。令人惊讶的是，和气的粤籍司机愿载全部人，证明了有心必能克服现实障碍。司机甚至同意开立三张收据给三位记者，此举是香港出租车司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做法。这是突破所有先例的一天。库洛坐在前座，戴着那顶招牌软草帽，缎带的颜色取自伊顿校徽，是老同志遗赠之礼。小矮人被挤上变速杆，其余三名男士就位后座，两位小姐则坐在陆克大腿上，让他很难擦拭嘴角。摇滚客认为不宜同行。他将餐巾塞入衣领，准备享用俱乐部的烤羊排加薄荷酱与大量马铃薯。

“再给我一杯啤酒！这一次要冰的，听懂了没，小子？冰冰凉凉的，快快端来！”

然而这一行人一离开视线，摇滚客也用上了电话，与权威人士通话，以免独漏新闻，无奈双方的共识是目前无计可施。

出租车是辆红色奔驰，还算新车，但山顶是缩短汽车寿命的最大杀手；车子以趋近于零的速度无止境爬升，冷气全力放送。天气仍持续恶劣。出租车喘息着缓缓登上水泥峭壁时，浓雾包围过来，稠密得足以令人窒息。下了车，情况更趋严重。一道煊赫顽强的帘幕已拉过山顶，散发着汽油味，满是山谷传来的嘈杂声。湿气以细微高温粒子的形态聚合，飘浮在空气中。若是晴天，往南往北的景观皆可尽收眼底，是地球上最宜人的美景之一。往北看是九龙以及新界的青蓝山影，往南看是浅水湾、深水湾与开阔的南海。巍安居不愧由皇家海军于二十年代打造，显现出当年海军那份盛大的纯真，不但接收也透出一抹权力感。然而这天下午，假若巍安居不是坐落在林中，假若不是处于参天巨木围出的空地，假若这些树木未将浓雾排拒在外，他们将只能看见两根白色水泥梁柱，上面有注明了“日”与“夜”的两个门铃；只能看见梁柱之间围上链条的大门。多亏树木成林，巍安居清晰可见，只不过距离大门有五十码之远。他们能分辨出排水管、消防梯、晒衣绳，也能欣赏到日军占领四年间加建的绿色圆顶。

小矮人急欲进门，连忙走向前去按下注明“日”的按钮。柱子内设有对讲机，大家全盯着瞧，静候声响，或是依陆克的预测喷出大麻烦雾。广东籍司机停车路边，打开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电台播放的是哀怨的华语情歌，持续不歇。另一根柱子只镶了一块黄铜牌子，刻着明眼人一眼能识破的西辛格假身份：跨军种联络处。寻死匈奴取出相机，有条不紊地拍照，仿佛置身熟悉的战场。

“礼拜六他们大概不上班吧。”陆克表示，众人则继续等待。此话一出，库洛以“别傻了”响应，并说间谍一个礼拜上班七天，二十四小时无休，而且不吃不喝，塔夫蒂例外。

“连午安也不讲。”小矮人说。

他按下注明“夜”的门铃，将扭曲的红唇贴近对讲机出声口，假冒英国上流阶层的口音。这种口音为他带来了信任度，他运用得极为巧妙，令人啧啧称奇。

“在下姓名为麦可·汉斯德西摩，是大牛的私人跟班。有急事相商，是否能请西辛格少校接见。少校或许没有注意到，珠江上方似乎正出现一朵蘑菇云，扰乱了大牛打高尔夫的心情。谢谢。可否请您开门？”

金发女孩之一傻笑一阵。

“他是汉斯德西摩家族的人，我怎么不知道？”她说。

两女抛下陆克，改挽邋遢加拿大人的手臂，大部分时间凑着他耳朵讲悄悄话。

“他是俄国妖僧拉斯普丁，”女孩之一以仰慕的口吻说，一面抚摸他大腿后方，“那部电影我看过。他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啊，加拿大？”

每个人都接过陆克的随身酒瓶喝了一口，一面重新部署，思忖下一步怎么走。停靠路边的出租车持续传来高唱不休的华语情歌，而柱子上的对讲机却一声不响。小矮人同时按下两按钮，接着表演卡彭式的威胁。

“你给我听好，西辛格，我们知道你在家，马上举起双手，扔掉间谍用的风衣和短剑——嘿，小心一点，你这条笨牛！”

小矮人咒骂的对象不是加拿大人，也非老库洛。库洛此刻悄悄走向树林，显然想上厕所。他咒骂的对象是陆克，因为他决定硬闯。关口位于泥泞遍地的雇佣房，由低垂的树木遮蔽。远处有一堆垃圾，部分刚丢弃不久。陆克漫步至垃圾堆，希望从中找出有助理清谜团的线索，结果挖出一块S形的铸铁，至少重达三十磅，但他仍以双手将之高举过头，撞向大门，大门因此如破钟般响起。

寻死匈奴单膝跪地，捕捉镜头时空洞的脸孔挤出烈士般的笑容。

“数到五，塔夫蒂。”陆克呐喊，再度以几可破门的力量撞击。“一——”他又撞一下。“二——”

各色鸟类自树林飞起，在头顶上空缓慢绕行，有些体形甚大，然而山谷的雷声与大门的碰撞声淹没了鸟群的啼叫。出租车司机手舞足蹈，开怀大笑，将情歌抛诸脑后。更怪的是，在恶劣天气之中出现了一整家华人，手推两辆婴儿车，也开始跟着大笑，甚至连最小的幼儿也笑了起来，全家人都掩着口笑。最后加拿大牛仔倏然大呼一声，甩开缠在手臂上的女孩，指向大门另一边。

“拜托老天爷，库洛到底在干吗？老头子脑子进水啦。”

事到如今，所有正常程度的理性皆消失到九霄云外，集体癫狂症在每个人身上发作。黄汤、台风天、密室恐惧，全钻进他们脑袋里作怪。两个妞儿纵情地爱抚加拿大人，陆克继续撞击，华人家庭大笑欢呼，最后冥冥之中浓雾适时飘散，寺庙般的蓝黑云朵紧挨着头顶飞过，雨水倾泻在树木上。一秒钟后雨滴落在他们身上，刷的一声所有人都湿透了。两位小姐转眼呈半裸状态，又笑又叫地冲向奔驰车，男士却紧守岗位——甚至连小矮人也不为所动——透过雨水形成的薄膜望向肯定是澳大利亚人库洛的身影，头上戴着伊顿老帽，站在房屋的遮雨处，上方是粗制滥造的门廊，看似脚踏车停放处，可惜只有疯子才会骑脚踏车上山顶。

“库洛！”众人尖声喊，“先生！那个杂种想抢独家！”

哗哗雨声震耳欲聋，雨势打得树枝眼看即将断裂。陆克抛开了乱撞的铁块。邋遢牛仔先走，陆克与小矮人紧跟在后，寻死匈奴带着微笑与照相机殿后，继续盲目拍照，弯腰跛行前进。雨水恣意地倾倒下来，在他们一路循库洛脚步走上斜坡时，就在脚踝四周形成小红河，一旁牛蛙的叫声也加入伴奏行列。他们登上长满欧洲蕨的山脊，来到铁刺网围栏前就不得不歇脚，然后拨开切断的铁丝爬过去，接着跨过低洼的水沟。其他人赶上库洛时，他正凝视着绿色圆形屋顶，尽管戴了草帽，雨水仍不断地流下他的下巴，将原本整洁的浅黄色西装染成黑色无腰身的长袍。他如同着魔似的站立，直往上盯。陆克先开口。他是最欣赏库洛的人。

“阁下？嘿，醒醒吧！是我啦，罗密欧。老天爷啊，他是中了哪门子邪呀？”

陆克突然担心起来，轻碰他的手臂。然而库洛仍不发一语。

“也许他站着站着就死了。”小矮人猜测，而寻死匈奴则抓住这个稀有的机会，喜滋滋地对他拍照。

库洛如同老拳击手般慢慢回过神来。“陆克老弟，我们要向你致上诚挚的歉意。”他喃喃说。

“带他回出租车上。”陆克说着开始为他开路，但老库洛拒绝移动。

“塔夫蒂·西辛格。侦察做得不错。不会逃走——没有狡猾到逃跑——却是很不错的侦察者。”

“愿塔夫蒂·西辛格安息，”陆克很不耐烦地说，“我们走吧。小矮人，快走吧。”

“他僵住了。”牛仔说。

“好好思考线索，华生医师。”库洛再度冥思一阵后接着说，而陆克在一旁拉着他的手臂，雨势比刚才更急。“首先请注意窗户上方的空笼，显然冷气机不凑巧遭人动过手脚。老弟，节俭是一种美德，间谍懂得节

俭，我认为更值得嘉奖。再注意圆顶，看到没？仔细研究一下。刮痕。可不是巨型猎犬留下的足迹啊，而是有人在仓皇之中拆掉无线天线留下的刮痕。有谁听过间谍屋没装无线天线的？那就跟没有钢琴的妓院没两样。”

雨势已达最高峰，大滴雨水如子弹般掉落四周。库洛的脸看来百感交集，陆克仅能靠想像力猜测。陆克内心深处恍然想到，或许库洛果真来日无多。陆克没见过多少无疾而终的例子，因此对这种状况特别注意。

“也许他们只是感染波状热，赶紧撤离。”他边说边尽量再度哄他回车上。

“非常有可能，阁下，的确非常有可能。这种季节，鲁莽又失控的举动绝对很常见。”

“回家吧，”陆克说，坚定地拉着他的手臂，“担架队，你来带路好吗？”

然而老库洛仍顽强地徘徊不去，对风雨中飘摇的英国情报机构看了最后一眼。

加拿大牛仔率先发稿，而他的稿子应更受命运之神眷顾才对。当晚他趁双妹睡在他床上时赶完稿子。他猜想，这篇文章以杂志专题看待更胜于单纯的新闻报道，因此他以山顶的背景为大纲，将西辛格一笔带过。山顶传统上为香港的众神庙，他在文中加以解释，“住得越高，社会地位也越上流”，也说明了英国鸦片富商——香港的建港始祖——为避免传染市区的霍乱与热病而徙居山顶。他也写道，二十年以前，华人想踏进一步，还必须先取得通行证。他描述了巍安居的历史，最后描述的是巍安居的名声。在华人媒体的捕风捉影下，巍安居被比喻为巫婆的厨房，是大英帝国人士阴谋对付共产党的小营地。不料一夜之间厨房关门大吉，厨师也不见踪影。

“是另一种求和的表示？”他问，“是绥靖政策？或者只是英国对大陆低调政策的一招？或者只是又一迹象，显示东南亚如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英国在此的地位即将步下巅峰？”

他错在投稿至偶尔刊登他稿件、厚重的周日版英文报。比他稿件早到一步的是D号通知，禁止刊登任何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阁下针对巍安居的报道甚详，可惜无法予以刊登，遗憾之至。”编辑发电报告知，径自将稿单插在长钉上。数日后，牛仔回住处时发现遭人翻箱倒柜。此外，他的电话罹患类似喉炎的症状达数周之久，因此他每打电话必对大牛与其手下出口成脏。

陆克带着满脑子想法回家，洗了个澡，喝下大量纯咖啡，开始工作。他致电航空公司、政府单位友人，以及大批美国领事馆的浅交。领事馆人员个个肤色苍白，梳理过度，以狡猾而谜样的说法应付他，令他怒气难遏。他也骚扰了专门承包政府机构的搬家公司。他还数次打电话

给小矮人，对小矮人表示，当晚十点他可说是“掌握了铁打的证据”，肯定西辛格夫妇偕同巍安居所有部属，已于周四凌晨搭包机离港前往伦敦。他也在偶然机会中得知，西辛格的拳师犬将于本周随后送上飞机行李舱运走，这消息让他很高兴。陆克写了几项重点，走到房间另一边，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几行字后文思枯竭，他早已料到。起头时他行笔急促流畅：

“今日新飘来一朵丑闻之云，高挂于英国在亚洲仅存殖民地上备受诟议的非民选政府上空。继日前警方与公务单位爆发贪渎弊端后，据传香港最高机密单位，也是英国对抗共产中国的情报机关巍安居，已完全关闭。”

至此，他居然泛起一股渎神的无力感，停下来，双手捧住脸孔。噩梦；他能够咬牙隐忍。历经无数战事，难以言喻的影像令他颤抖冒汗，乍醒时鼻孔仍满是凝固汽油弹烧灼人体肌肤的恶臭。就某种意义而言，得知自己的情绪水坝经过多番压抑后终于溃堤，他反倒感到安慰。历经过实战，有时他渴望重拾作呕的能力。如果有必要服用梦魇这剂猛药，才能回归平常人的境地，他也能心怀感激地大口服用。然而，并非在最恐怖的梦魇中他才恍然大悟：报道过战争以后，他或许无法写出和平了。黑暗中六小时，陆克与这番死寂缠斗。有时他想起老库洛，站在巍安居前，雨水向下流窜，发表葬礼演说——也许那才具有新闻价值？但以记者同业诡异的情绪为题发稿，有谁发得出手？

小矮人删改过的版本也没有太大进展，他因此变得非常不重视仪容。表面上，他的报道符合编辑的每项要求，既嘲弄了英国，“间谍”一词也写得醒目，而且总算跳脱“美国是东南亚刽子手”的主题。但经过五天的等待，他只获得简短的指示，希望他能专心本业，别太不自量力。

如此一来，就看库洛的身手了。虽然与大场面报道相形失色，但库洛出手的时机，以及没有出手的时机，时至今日仍令人佩服。他三星期不发稿。有些小新闻，他本应报道却懒得处理。陆克极为关心，起初认为他不断沉沦衰微，令人不解。他失去原有的活力，原本喜欢呼朋引伴的他现在兴趣缺乏。他变得暴躁易怒，有时甚至一派薄情，而且用五音不全的广东话对服务生咆哮，甚至连他最偏爱的服务生老郭都无法幸免。他对待上海保龄球会员仿佛对待最恶劣的敌人，而且重提早已遗忘的过节。独自坐在他习惯坐的窗前座位，他有如时运不济、年华已逝的花花公子，刻薄、闭锁、怠惰。后来有天他失踪了，陆克忧心忡忡致电到他公寓，老女佣以洋泾浜英文说：“威士忌爸爸快快跑去伦敦。”她是个古怪的小个子，陆克有些怀疑她的话。根据《明镜周刊》一名个性沉闷的北德特约记者之言，他曾在万象见过库洛在群星酒吧狂欢，但陆克同样采取保留的态度。圈内人向来以观察库洛为乐，若能提供蛛丝马迹，可为个人增添名望。

直到某周一，老库洛在正午前后慢步走进俱乐部；他身穿纽扣孔眼极细的肉色新西装，再度显得满面春风，出口轶事连篇，也开始撰写那篇有关巍安居的报道。他花钱的数目超出报社通常允许的范围，也数度

与衣冠体面的美国人愉悦地共进午餐。这些人服务的美国机构名称含义不明，陆克认识其中部分人士。库洛头戴招牌草帽，带着客人前往经过慎选的僻静餐厅，一对一进餐。俱乐部常客批评他与外交人士过从甚密，犯下记者大忌，而这番批评他听在耳里却觉得舒服。其后，一场中国观察家大会于东京召开，他应邀前往，若以事后所见来判断，他十之八九利用那次机会查证手中报道的部分细节。他肯定请求出席大会的老友帮忙，请他们回曼谷、新加坡、台北或其他驻地时替他调查部分事实，而老友也恭敬不如从命，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角色互换，库洛也乐意为他们效劳。诡异的是，在他们找出真相前，他似乎知道自己找的是什么。

他的心血结晶以最完整的版本刊登在悉尼一家早报上，是英美媒体检查的大手鞭长莫及之境。众人认为，这篇报道令人遥想大师的光辉岁月，篇幅有两千字。依他典型的写法，他以与魏安居完全不相干的题材作为导言，先叙述英国驻曼谷大使馆“神秘唱空城的侧厅”。直到一个月前，进驻该处的是一个号称“东南亚条约组织协调会”的奇怪单位，也设有签证处，二等秘书多达六位。澳大利亚人老库洛以温柔的笔调问道，难道是苏活区按摩师手法绝妙，泰国人趋之若鹜，竟需多达六位二等秘书来处理签证申请案？更令他百思不解的是，签证处人员离去、侧厅关闭后，大使馆外并未出现有心出国者大排长龙的现象。他的笔调不急不徐，却丝毫不敢粗心大意，渐次为读者展现一幅令人诧异的景象。他将英国情报机构称为“圆场”。他说明此绰号源于该组织秘密总部的所在地，往下看是伦敦市街闻名的交叉路口。他写道，圆场不仅撤出魏安居，也离开了曼谷、新加坡、西贡、东京、马尼拉以及雅加达，还有首尔。就连台湾地区也无法免疫。在库洛的报道见报前一周，有人发现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在台湾的特派开除三名职员兼司机，也遣散了两名秘书级助理。

“媲美敦刻尔克大撤退2的殖民客大撤退，”库洛称呼此现象，“差别只在于搭乘的是DC8包机，不是肯特郡捕鱼船队。”

如此规模的撤退，背后原因是什么？库洛提供数项机智的理论。难道是英国政府节省开支的另一种方式？笔者持怀疑态度。时局艰困的阶段，英国对间谍行动的依赖往往更多，不太可能裁员，必须奉守大英帝国史的字字教训：贸易路线越单薄，保护路线的秘密行动便更加繁复。对殖民地的掌握越形虚弱，颠覆寻求解放者的手法就更加无所不用其极。纵使英国即将沦落至排队领救济面包的田地，最后舍弃的奢侈品也绝对是情报行动。库洛提出其他可能性，却一一加以推翻。是对中国大陆表现出缓和的姿态吗？他的臆测呼应了牛仔的观点。英国当然会想尽办法让香港避开共产党的反殖民地热，却不会动到撤除大英间谍的脑筋。因此老库洛构思出最心爱的理论：

“在远东棋盘的对面，”他写道，“圆场正进行情报界所谓的‘鸭子划水’行动。”

原因呢？

作者这时引述“驻亚洲资深美国情报界战争教会牧师”的话语。他写道，不仅是驻亚洲美国情报员，一般美国情报员都“因英国组织保密不周而气得直跺脚”。最近圆场的伦敦总部查出最高级别的俄国双面间谍——他用对了行话“地鼠”，最让美国情报界暴跳如雷。英国叛国贼的姓名，资深美国情报员不愿透露，但库洛引述：“过去二十年稍具价值的英美地下行动皆有曝光之虞。”地鼠如今哪里去了？作者询问过美国情报界消息来源。忿恨难消的消息来源回答：“死了。在俄国。最好两者皆是。”

库洛一向不想写完结篇，但陆克读来顺眼的这篇报道却深具隆重完结之感，几乎是肯定人生本身——或仅止于肯定地下人生。

“如此说来，男童间谍金姆3是否已从东方传奇消失无踪？”他问，“英国专家权威是否就此洗手，穿上传统服饰，默默围坐在炉火旁？请勿担心。”他强调，“英国人迟早会东山再起！破获间谍的运动历久弥新，我们终将有幸再度共襄盛举！间谍未死，只是沉睡中。”

报道刊登了。在俱乐部，受到短暂颂扬，羡慕，然后遗忘。香港一家与美国关系深厚的英文报重新刊载全文，结果让这篇短命的报道再吸一日空气。他们说，是对老库洛施恩，是在他下台前向他举帽致意。随后BBC于海外网报道此篇新闻，最后香港迟钝的电视网才报道了BBC的版本，因此激起一整日的辩论——大牛是否决定就此撤下本地新闻媒体的口罩。然而在冗长拖沓的这段期间，没有人怀疑——包括陆克，甚至小矮人都未曾怀疑——老库洛究竟如何找到魏安居的后门。

这现象只能证明——假使有人要求提出证据的话——察觉眼前事物的动静，新闻工作人员其实不比他人快到哪里。毕竟当天是台风来袭的周六。

至于圆场本身（库洛对这个英国情报中心的称呼很正确），内部的反应五花八门，依反应者所知内情的多寡而定。比如说在管理组：圆场近来马脚频露，管理组难辞其咎；老库洛释放出一股压抑着的怒火，惟有知道地下部门陷入重围是什么气氛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情绪。连一向宽大为怀的工作人员也变得报复心深重。叛国罪！违反合约规定！冻结他的退休金！将他列入观察名单！他一回英国，立刻起诉！较下游处，对个人身家安全较不那么狂热的人看法也比较温和，只不过他们的见解仍在状况外。算了算了，他们以稍微悻悻然的口吻说，本来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了，凡人难免偶尔大动肝火，特别是像可怜的老库洛，被蒙在鼓里那么久。更何况，他揭发的内幕，又不是一般大众无法取得的数据嘛。那些管理组的人，真的应该稍微节制一点吧。看看迈可·米金的妹妹默莉好了，可怜的她稚气未脱，前几天晚上只不过在废纸篓丢进一小张空白信纸，就被他们穷追猛打。

只有身处台风眼的少数人抱持不同观点。对他们而言，老库洛的报道是谨慎误导的杰作：是乔治·史迈利的登峰造极之作，他们说。显然的，内情非曝光不行，而且所有人皆同意，无论时机为何，检查制度都令人排斥。因此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曝光其实好上加好。时机恰好，分量

恰好，笔调也恰好——一笔一画皆是一生难得一次的经验，他们同意。然而这种观点不得外传。

镜头转回香港——上海保龄球会员说，显然老库洛如垂死之人，能预知死期——这篇巍安居的报道竟成他的告别之作。文章见报后一个月，库洛自动引退，不是退出香港，而是投笔引退，同时搬离香港岛。他在新界租下小屋，宣布自愿在亚洲人天堂中退休。对保龄球会员而言，此举无异选择阿拉斯加，因为若喝醉后开车回家，距离实在太远了。此间谣传库洛看上一名俊美的华人男孩，两人进而同居，然而由于库洛并无此癖好，此谣言不攻自破。放话的是小矮人：被老头抢到独家，他心有不甘。只有陆克拒绝将库洛淡忘。某天晚班结束后，陆克于早晨十点左右开车至新界探望他，说不上有何特别原因，也可说是因为这老家伙对他意义重大。据说库洛见到陆克时喜出望外：他仍是一副糟老头的模样，却在陆克突袭下显得有些迷惘。他有个朋友同住，不是华人男孩，而是前来拜访的一名救援投手，经介绍后以乔治称呼。乔治身材矮胖，戴着圆滚滚的眼镜。库洛将陆克拉至一旁解释，他在黑暗时期曾服务于英国一家报刊资料供应社，这位乔治是当时在幕后运筹帷幄的人。

“专门处理老人病，阁下。旋风式访问亚洲各国。”

无论其身份为何，显而易见的是库洛对这位矮胖男子极为敬重，甚至以“教宗陛下”称呼。陆克感觉自己有如不速之客，因此没有喝醉就识相告辞。

简而言之，西辛格趁夜潜逃，老库洛临死复活，不顾检查制度的黑手，发表告别之作；陆克对地下世界马不停蹄的关心；圆场受人指点后善用必要之恶。在全然未经策划的情况下，一如人生的变化，序幕向上卷起，揭开往后发生的种种事件。刮台风的星期六，香港这个恶臭、贫瘠、拥挤、令人窒息的水塘起了一阵涟漪；歌舞队已经觉得无聊了，主角却仍不见人影。令人纳闷的是，数月后陆克再度挑起重担，扮演莎翁笔下信差的角色，宣布主角登场。在待命时，消息从办公室传真机传来，他随后以惯用的激昂语调向备感无聊的观众公布：

“各位！请注意听！我有新闻相告！杰里·威斯特贝重回在线！他又要来远东了，听我说，帮同一个烂报社写新闻！”

“爵爷阁下啊！”小矮人立即以故作欣喜若狂的语气惊呼，“我敢说啊，能为这群猥琐低级的人注入一点尊贵的血统！为高贵血统干杯吧！”接着他咒骂一声，朝酒架扔过餐巾。“天啊。”他喝着喝干陆克的酒杯。

2关键电报

电报捎来的那天下午，杰里·威斯特贝正在年久失修的农屋阳台上，坐在有阴影的一边敲着打字机，装有旧书的书袋扔在脚边。信封由黑衣邮局局长送来。邮局局长是个举止粗鲁凶恶的村妇，由于传统势力逐日没落，她才得以爬上这个托斯卡尼中下阶层村落的巅峰。她生性诡计多端，但今天事关重大，尽管天气闷热，她仍不辞辛劳赶忙爬上不毛的小径。事后她在记录簿上注明此历史时刻为五点六分，尽管是说谎，却能增加效果。真正的时刻是五点整。威斯特贝骨瘦如柴的女友在屋内猛击一块顽强的山羊肉，就如她攻击所有事物的手法一样。村人称她为孤女。邮局局长贪婪的眼神瞧见她，她站在打开的窗户前，远远离开窗户，双手叉腰，上排牙齿紧咬下唇，和往常一样苦着一张脸，果然嘛。

“妓女，”邮局局长激动地想，“这下你可等到一直想要的东西了！”

收音机大声播放着威尔第——孤女只听古典音乐。全村人得知这一点，是有一晚在小酒馆里，铁匠本想在点播机上选播摇滚乐，而孤女朝他身上扔水瓶。就这样，又是威尔第，又是打字机，又是剁山羊肉的噪音，邮局局长说，吵闹声震耳欲聋，连意大利人都听得见。

她回想起杰里当时像蝗虫坐在木质地板上——也许垫了软垫，以书包权充垫脚椅。他双腿伸展，将打字机放在双膝间打字，四周散放几张沾有污渍的手稿，以石头镇住，以防被肆虐过小山顶的红烫微风吹走。他手肘边有柳条套包住的随身酒瓶，里面装的是土产红酒，最伟大的艺术工作者都清楚，那为的是在自然灵感枯竭时提供灌溉之用。他打字时用的是老鹰神功——她事后告诉大家，惹得众人大笑赞赏——绕行良久后才俯冲而下。他身上是一贯的穿着。无论是在自己的小牧场上漫无边际地走动，或是耕耘着恶棍法朗寇用来搪塞他的十几株无价值的橄榄树，或是骑车载孤女进村购物，或在准备走上漫长的上坡路回家前进小酒馆大灌烈酒，脚底一定是孤女从未刷洗过的羊皮靴，因此穿到脚趾处磨得秃亮；脚踝袜子她也从来水洗；衬衫脏臭，曾经是白色；灰色短裤活像被猛犬咬得裤管脱线。换了别的正直的女人，肯定会老早缝补妥当。杰里以熟悉急促的粗喉音招呼，既害臊又热切。他说话的内容，邮局局长不太了解，只是大致听懂，像是新闻报道，因此只能忠实转述，透过年久失修的黑色牙缝娓娓道来，忠实的程度有时真令人诧异。

“史蒂凡诺大妈，不得了，外面一定热滚滚的。快来，喝下润润嗓子。”他惊呼着，一面走下砖阶，为她端来一杯葡萄酒，边走边溅出，露齿浅笑，宛如小学生一般，而这正是村人为他取的绰号：小学生。给小学生的电报，伦敦捎来的速件！过去九个月，他只收到过一叠平装书，以及女儿每星期潦草写来的信件。如今青天外飞来如此天大的电报，用词简短如命令，共五十字，却已预付回函费！想想看，五十字，花费可不少吧！可想而知，想一窥内容的人，必然不下五十人。

收件人的头衔就让他们大惑不解：阁下。“杰里·威斯特贝阁下。”为什么？面包师傅曾在伯明翰当过战俘，找出一本残破的字典查到——阁下：有荣耀的；授予贵族之子的名誉头衔。那还用说？家住山谷对面的山德斯夫人早已宣称小学生流有贵族血统。她说过，杰里是报业巨子威斯特贝爵士的次子。这位报社社长死了。先死的是报纸，社长随后跟进。由此可见山德斯夫人是才女，大家传播这桩笑话。电报上接下来的字是遗憾，这不难理解。敬告也是。邮局局长事先以为英文难懂，却心怀感激地发现，尽管英国江河日下，英文竟吸收了许多拉丁好字。监护人一词较难懂，因为与护身物词义相通，无可避免导致男人间以有色言语讪笑，邮局局长气得直跺脚。最后在一步步解读下，密码总算破解，全文揭晓。小学生有一位监护人，意指代理父亲。监护人病危送医，执意在死前见小学生一面。他不想见其他任何人。只肯见威斯特贝阁下。众人七手八脚自行拼凑出剩下的影像：家人聚集在病榻边啜泣，未亡人举止醒目，悲恸欲绝，文质彬彬的牧师为他涂油进行终圣礼，贵重物品上锁，家中各处——无论是走廊上还是后厨房里，可听见同样的低语：威斯特贝，威斯特贝阁下究竟人在何方？

电报最后的签名仍有待诠释。签名有三个，自称律师，这字有应召者之意，再度引来男士淫秽的影射，之后解读出公证人一词，众人脸色骤变。圣母玛丽亚！如果牵扯上公证人，绝对与大笔钱财脱不了关系。此外，如果三名律师全数坚持签字，而且预付了五十字回信，数字不仅是大笔，而且是堆积如山！铺遍数英亩地！几辆马车也拖不完！难怪孤女死抓着他不放，妓女一个！忽然间，人人争先恐后往小山上直冲，贵多的兰美达机车能骑到水塔附近，马力欧跑步来犹如狐狸，杂货店女儿嫫娜拉心灵脆弱，伤恸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得汗流浹背爬上二十分钟，邮局局长仍排除所有自愿上山的人——还因马力欧自告奋勇而重赏他一记耳光，锁上钱柜，留下白痴儿子看店。如果山上吹起该死的熔炉风，辛苦恐怕只能换来一嘴红土。

他们最初并没有看穿杰里。邮局局长奋力穿越橄榄园时才感到后悔莫及，但这番过错有其缘由。第一，他于冬天抵达，是小气买主前来的季节。他只身抵达，却带有鬼鬼祟祟的表情，活像最近刚卸下大批“人类货柜”，如儿女、娇妻、母亲与丈母娘。邮局局长摸清了男人的底细，杰里那种受过伤的微笑她见得太多，不可能认不出来：“我已婚，人却自由。”他的笑容如此透露着。可惜上述两个词都不真实。第二，将杰里介绍过来的人是喷香水的英国少校，是人尽皆知的猪猡，经营土地中介，专门剥削农民：想欺骗小学生，罪名再加一笔。香水少校带他参观几栋理想的农屋，包括邮局局长本身有利益关系的一栋——碰巧也是最棒的一栋——而小学生最后却屈就同性恋法朗寇的寒酸棚屋，搭建在她现在攀登的这座可恶的小山顶：村人称之为恶魔丘；地狱太冷时，恶魔上来避寒。别人不找，偏找油头粉面的法朗寇——在牛奶和葡萄酒里掺水，星期天到市区广场陪公子哥儿傻笑！香水少校哄抬价格至五十万里拉，希望从中暗杠三分之一，只因其中有合约。

“少校为何偏心法朗寇，人人都知道原因是什么。”她咬着冒沫的牙齿说，支持民众也互相发出知情的“啧啧”声，最后她忿而制止，大家才住嘴。

此外，她是精明的女人，杰里的性格中，某些地方让她信不过。奢侈的表象下埋藏着一种无情。这种风格的英国人她并非没见识过，然而小学生自成一格，她无法信任；他散发出片刻不歇止的魅力，令她将他视为危险人物。当然了，那些早期的缺点，现在皆可归因于英国贵族文字工作者的特立独行，但邮局局长从不愿就此迁就纵容。“等到夏天，准有好戏看。”当时杰里首度磨磨蹭蹭地光顾她的小铺，后脚才离开，她就以咆哮的嗓音向顾客预告：杰里购买了意大利面、面包、杀蝇剂。“夏天一到，他就知道自己买了什么烂房子，蠢材一个。”夏天一到，油头粉面的法朗寇家中的老鼠将扫荡卧房，法朗寇的跳蚤会将他活活叮死，法朗寇的变态黄蜂将追着他绕着庭园跑，恶魔的红烫风会将他四肢烤成脆棒。用水将枯竭，他也将被迫学牲畜在田野排便。冬天再来时，香水猪猡少校就能将房子转卖给下一个傻瓜，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摸不着头脑。

最初几星期，俨然成了巨星的小学生丝毫未显骄态。他从不讨价还价，从未听说过折扣优待，骗他的钱甚至一点儿也不有趣。光顾邮局局长的杂货店时，她逼得杰里用完少得可怜的几句厨房意大利语，杰里并未如真正英国人一样抬高音量，并未对她大吼大叫，只是愉快地耸耸肩，自行挑选需要的杂货。文字工作者，他们说，那又怎样？有谁不是文字工作者？好吧，他向邮局局长购买几令大页纸。她再进货，他也买下。精彩。他拥有书本：外表看去是一大堆发霉的书本，放在灰色黄麻书包里背着走，书包有如盗猎者的随身袋。在孤女出现之前，村人常看见他大步朝没有明显目标的方向前进，一肩挑着书包，想找地方静静阅读。贵多曾在贵妇森林撞见他，宛如蟾蜍般端坐圆木上，一本接一本阅读，仿佛这些书是连贯的一整本，仿佛他遗忘置身何处。他也拥有打字机一台，以磨损的行李箱标签缝凑成肮脏的打字机罩。精彩。就像任何购买整桶颜料的长发男子自称艺术工作者一样，他就是同一类的文字工作者。春天时，孤女出现，邮局局长连她也一起痛恨。

别的不说，光是一头红发，就等于是半个妓女了。胸部小到连兔子都喂不饱，最糟糕的是算计他人的眼光锐利。村人说，杰里是在镇上认识她的：又是娼妓的作风。从第一天起，她就不愿让杰里离开视线，像小孩一样挨着他不放。陪他吃饭，臭着一张脸；陪他喝酒，臭着一张脸；陪他买东西，像小偷一样随口学英文。最后两人成了当地较次要的景观之一：英国巨汉与闷闷不乐的干瘪妓女，背着灯芯草篓子下山，穿着褴褛短裤的小学生对每人龇牙咧嘴笑，苦瓜脸的孤女身披娼妓的麻布，底下精光一片，因此尽管她身材平坦如蝎子，男人仍朝她背后猛盯，观看麻布下坚实的臀部摇摆生姿。她走路时十指紧锁杰里手臂，脸颊依傍肩膀，只在付钱时松手。杰里的皮包，如今由她掌控，付钱时锱铢必较。遇见熟悉面孔时，杰里为两人打招呼，如法西斯分子般挥舞豪

放的大臂。她独处的机会少之又少，但如果有人胆敢说醉话或学狼嚎，她会转身如阴沟猫一样吐痰，双眼如恶魔般灼热。

“现在我们总算知道为什么了！”邮局局长音量奇大地叫着，这时她到达登顶前的一个小山头，不过她还得继续往上爬。“孤女看上了他继承的遗产。不然这妓女干吗死守他不放？”

山德斯夫人光顾史蒂凡诺大妈的店后，才让大妈对小学生的评价以及孤女的动机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山德斯夫人是有钱人，在较远处的谷地养马，与她同住的是一名女性友人，绰号是大男生，头发剃得很短，戴链状皮带。她们饲养的马匹到处得奖。山德斯夫人头脑精明，充满智慧，生性节俭，是意大利人喜欢的类型，而此地散居山丘上历经风霜的英国人寥寥无几，值得认识的她全认识了。她上门佯装购买火腿，约莫一个月前，真正目的是冲着小学生而来。是真的吗？她问：“杰里·威斯特贝先生，住在村子里？身材高大，头发灰白，运动员体格，精力充沛，贵族阶级，生性害羞？”她父亲官拜将军，驻英国时认识其家人，她说两人曾在英国乡下毗邻而居一段时间，小学生的父亲与她父亲。山德斯夫人考虑前去拜访他：小学生的状况如何？邮局局长喃喃说出孤女的事，山德斯夫人却不以为忤：

“噢，威斯特贝家族的人哪，女人是一直换个不停的。”她大笑说，然后转身准备离去。

邮局局长无言以对，请她留下来，一连串问题如雨滴打在山德斯夫人身上。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年轻时做过什么？山德斯夫人说，他当过记者，并说出她所知的威斯特贝家族背景：父亲性喜招摇，如儿子一般也有一头金发，养了几匹竞赛用马，去世前不久，山德斯夫人曾再次见他一面，仍是汉子一条。他与儿子一样，从来不得安宁：女人与房屋，不断更换，老是对人大声咆哮，不是骂儿子就是骂马路对面的某人。邮局局长追问得更加急切。小学生本人呢？他本身是否有过大成就？这个嘛，他肯定是在大报工作过，可以这样说，山德斯夫人说，笑颜绽放得神秘兮兮。

“一般而言，英国人不习惯给予记者阁下头衔。”她解释。她说话时用语古典，具罗马人风格。

但是邮局局长想知道更多，比更多还多。他的写作，他的书，写些什么东西嘛。写了那么长！丢掉那么多！废纸满满一篓，收垃圾的人曾告诉她。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夏天绝不会在山丘上生火。处境孤立人士爱憎分明，贝思·山德斯很了解，知道这些人身处不毛之地时，必须将智力锁定在琐碎的事务上。所以她尽量，她真的尽量想了解。他呀，肯定是经常旅行，没有间断，她边说边走回柜台，放下包裹好的火腿。当然了，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全需四处旅行，早餐在伦敦吃，午餐在罗马吃，晚餐在德里吃，不过以威斯特贝先生奔波的程度来看，甚至显得出奇忙碌。所以也许他写的是旅游书，她大胆假设。

然而，他究竟为何旅行？邮局局长追问不休，因为出游必有目的：为什么？

报道战争嘛，山德斯夫人耐心回答：报道战争、流行病，以及饥荒。“毕竟除了报道人生的痛苦之外，现在的记者还能干什么？”

邮局局长聪明地摇摇头，所有感官专注于这条线索：他父亲是喜欢大吼的金发富翁骑师，他则疯狂热爱旅游，曾为大报撰写文章！他有特定区域吗？她问，在上帝创造的地球上，他可有专精的地区？他多半待在东方，山德斯夫人回想一阵后说。他到处都去过，但有一种英国人只认东方为家。难怪他会搬来意大利。有些男人少晒了太阳会变笨。

有些女人也一样，邮局局长尖声说，两人因此开怀大笑。

啊，东方，邮局局长说，以悲情的姿态微微偏头——战争一场接一场，为何教宗不下令禁止？史蒂凡诺大妈不停在这话题上唠叨，这时山德斯夫人似乎记起某件事。她先是淡淡微笑，越笑越明显。邮局局长边看着她边想，那是遭放逐者的微笑：她的笑容有如水手回想起大海。

“他以前常拖着一大包书到处跑，”她说，“我们以前都说，他是到大房子去偷书。”

“现在还是啊！”邮局局长惊呼，并说明贵多曾在贵妇森林撞见过小学生，看见他坐在圆木上看书。

“我相信他是有成为小说家的想法，”山德斯夫人接着说，同样以悠悠回想的口吻说，“我记得他父亲告诉过我们。他发起了脾气，好吓人。在房子里到处大吼。”

“小学生吗？小学生发脾气了？”史蒂凡诺大妈惊声问，口气变得相当无法置信。

“不对不对。是他父亲。”山德斯夫人大笑起来。她解释，在英国社会阶层中，小说家的地位甚至低于记者。“他还画画不？”

“画画？他也作画啊？”

山德斯夫人说，他试过，但父亲连作画也禁止。她说，画家是所有生物中最低贱的一种，说着再度笑起来：只有功成名就的画家才稍微能令人忍受。

身受连番轰炸过后不久，铁匠宣称看见杰里与孤女出现在山德斯夫人的养马场。这位铁匠曾是孤女一度投掷水瓶的标靶。杰里与孤女一星期出现两次，后来增为三次，也曾留下来用餐。铁匠还说，小学生在马匹身上展现极高的天赋，以与生俱来的理解力骑乘牵引，连最野的马儿也乖乖就范。铁匠说，孤女并未加入。她与大男生坐在阴影中，不是阅读着书包里的书本，就是以嫉妒、不眨不闭的双眼盯着看；现在村人全知道了，她是在等监护人死亡。而今天电报来了！

杰里大老远就看见史蒂凡诺大妈。他有直觉，内心有一部分从未停止提高警觉：一个跛行的黑色身影奋勇向前，如瘸腿甲虫登上土路，进

出西洋杉如直尺刻印般的阴影，走上滑头法朗寇家橄榄园的干枯渠道，进入他所谓自己的意大利小天地，共两百平方公尺。有心运动时，他在凉爽的夜晚可以打击绑在柱子上的网球，球已打得斑驳，场地够大。他很早就看见史蒂凡诺大妈手中的蓝色信封，甚至听见她的哇啦叫声，听来音调扭曲，与山谷其他声响一同传来——有兰美达机车，也有电动锯床。在没有停止打字的情况下，他第一个动作是朝屋内偷瞄一眼，确定女孩关上了厨房窗户，以阻止热风与昆虫入侵。随后，如邮局局长事后描述，他快速走下阶梯迎接，一手端着酒杯，为的是在她过于接近前拦下她。

他慢慢阅读电报，一度，弯腰好让阴影落在电报上，依史蒂凡诺大妈的描述，他的脸色转为严肃，而且内敛，嗓音出现额外的沙哑，一面将丰厚的大手放在她手臂上。

“今晚。”他挤出意大利文来。他带着大妈走回小径。他的意思是，他今晚会上回电报。“多谢了，大妈。太好了。非常感谢你。太棒了。”

两人分手时，大妈仍唠叨不休，愿为他提供太阳底下所有服务，出租车，行李搬运工，打电话到机场。而杰里隐约拍拍短裤口袋，摸摸有无大小零钱：他一时忘记了，显然，负责管钱的人是那个女孩。

小学生得知消息后强打起精神，邮局局长向村人报告。很有风度，甚至陪她走了一大段路；很有勇气，因此全世界只有一位女人——而且是懂得英国人的人——能看穿其椎心的哀恸；神志涣散，因此忘了给她小费。或者是，他已学会大富之家极端节俭的做法。

但是，村人问，孤女的言行举止如何？她有没有对着圣母痛哭流涕，假装为他的处境伤心？

“他还没告诉孤女，”邮局局长低声说，一面沉沉回想起当时以眼角余光瞥见她正在重击羊肉，“他还在考虑她的地位。”

村人情绪平静下来，等待夜晚来临，杰里则坐在黄蜂原野里，瞭望大海，将书包绕得团团转，直到绕到极限，再让书包以反方向绕开。

首先是山谷，山谷之上有五座丘陵呈半圆形耸立，丘陵之上是大海，此刻只不过是天空中一块平坦的棕色污渍。他端坐的黄蜂原野是长形台地，由石块支撑，一角有座倾颓的谷仓，可供他们野餐、日光浴，躲开外人眼光。后来，孤女在外晾衣服时发现大黄蜂筑巢，跑进屋里告诉杰里，而杰里想也不想，从油头粉面的法朗寇家抓起一桶水泥，封死蜂巢所有出入口，然后唤她过来，让她欣赏自己的杰作：我的男人，保护得我服服帖帖。在他记忆中，他可清晰看见她：在他身边发抖，双臂抱拢自己身体，凝视刚涂上的水泥，倾听里面惊慌失措的大黄蜂，低声说着：“天啊，天啊。”吓得无法移动。

也许她肯等我吧，他心想。

他记得两人相遇那天的情景。杰里经常对自己诉说这段故事，因为就女人而言，好运在他一生中鲜少出现。好运一旦出现，以他自己的说

法是，他喜欢百般玩味。那天是星期四。他照常搭车至市区，希望稍事采购，或者看看新鲜脸孔，暂时离开小说一阵子；或者只是逃离那片单调得令人想嘶声尖叫的空旷景观，他经常认为它宛若监狱，而且是单人隔绝监狱；或者可以理解的是，他也许只想钓个女人。他会在观光旅馆的酒吧闲晃，偶尔能带走一两个。就这样，他坐在市区广场的小餐馆读书，一只玻璃瓶，一盘火腿，几粒橄榄，忽然间他注意到这位皮包骨、四肢修长的儿童，一头红发，脸色阴郁，棕色服装有如修道院长袍，背着地毯布料缝制的肩袋。

“没背吉他，看起来像没穿衣服。”他心想。

朦胧之间，这女孩让他联想起女儿猫咪，是凯瑟琳的昵称，然而这种联想极为朦胧，因为他已有十年未见猫咪。十年前他第一场婚姻告吹。究竟为何十年没见一面，此时他甚至说不出所以然。在父女分居最初的不适应状态中，一种无所适从的骑士精神告诉他，猫咪还是忘记他比较好。“最好是把我从她心上涂掉，才能全心适应新家庭。”她母亲再嫁后，这种克己的感觉似乎变得更加强烈。然而，有时他思念女儿情切。这女孩吸引他注意后，一直无法令他释怀，最主要的原因在此。猫咪是否以这副德性流浪，孤苦无依，满身倦意？猫咪脸上雀斑是否仍在，下巴是否仍如圆石？后来女孩告诉他，她翻墙逃家。她在佛罗伦萨找到女管家的工作，服务的家庭富裕，女主人忙着与多位情夫周旋，无暇照顾子女，而丈夫却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女管家。她尽可能搜刮屋内现金潜逃，如今沦落至此：没有行李，对方又报了警，她用尽最后一张揉烂的钞票，在堕入万劫不复之境前购买最后一道正餐。

当天广场上并没有太多漂亮的表现——向来都没有——等到她坐下，几乎全镇每位四肢康健的男子都上前致意，从服务生以上，对她殷勤说着“漂亮小姐”以及更粗俗的话，杰里虽无法百分之百听懂，众人听了却哈哈大笑，寻她开心。后来有人对她胸部伸出好色之手，杰里一看立刻起身走向她的餐桌。他并非大英雄，私下对自己的看法正好相反，但此时他考虑到很多事物，她的处境很有可能是猫咪的遭遇，被人逼入墙角。因此他允许自己动怒。瘦小的服务生这时打算抓住她，高大的服务生在一旁鼓掌赞扬他的胆量，杰里左右两掌拍在大小服务生的肩头，以不流利的意大利语解释，却也解释得相当合理，要他们停止胡闹，让漂亮小姐安静用餐——否则别怪他扭断两人油腻腻的小颈子。酒吧的气氛至此变差，小服务生竟想大干一场，一手不断伸向后口袋，向下拉夹克，后来再看杰里最后一眼，总算打消念头。杰里丢了一些钱在桌上，帮她拾起肩袋，走向座位收拾自己的书包，牵起她的手臂，几乎将她举离地面，带她走过广场来到阿波罗商店。

“你是英国人吗？”她边走边问。

“从骨子到心脏，从头到尾。”杰里怒气冲冲地闷哼后，首度见到她的笑容。这抹微笑的确值得努力博取：骨感的小脸蛋绽开，如满面污泥的顽童一般。

随后杰里的怒气消解几分，心情开始平静下来，开始稍微编故事，因为数周来漫无焦点，现在自然而然应该努力取悦客人才对。他解释，他是退休记者，目前正在创作小说，是他首度尝试，等于是搔多年之痒。他也说，有个报社付了一大笔资遣费。说来也好笑，因为他一辈子都“资”质“浅”薄。

“有点类似所谓重金资遣。”他说。他挪一小部分买房子，流浪一阵子，如今宝贵的重金已所剩无几。她二度展露笑颜。受到了鼓舞，他开始论及创作生活的孤寂：“可是，天啊，我真想，真的想写出心中所有东西，那种辛苦是没有人能体会到……”

“有妻子吗？”她打断杰里的话。杰里一时假定她已融入创作小说的艰辛。接着杰里见到她以怀疑的眼神等候回音，所以谨慎地回复：“活着的，没有。”仿佛将妻子视为火山，而在杰里过往的世界中，妻子确为火山。午餐后，两人略带醉意漫步穿越空旷的广场，烈日直接鞭打在身上，这时她宣布了意图。

“我拥有的一切都在这袋子里，懂了吗？”她问。她指的是肩袋，以地毯布料缝制的袋子。“我打算维持现状，所以不准任何人给我背不动的东西。懂了吗？”

两人走到他的公车站，她也跟着等车，公交车来了，她跟在杰里身后上车，让杰里帮她买票。抵达村子后，她也下车，陪他登上小山，杰里背的是书包，女孩背的是肩袋，当时情况就是如此。三天下来，白天多数时间与晚上，她都在睡觉，到了第四天夜晚，她过来找杰里。杰里没料到她有此举动，事先已将卧房门上锁；他对门窗格外留心，特别是晚上。因此她不得不猛敲卧房门大喊：“看在老天的分上，我想上你该死的小床啦！”之后他才开门。

“绝对不能对我撒谎。”她一面警告，一面手忙脚乱上床，仿佛两人正享用宿舍大餐，“别讲话，别撒谎。懂了吗？”

以女友的身份而言，她轻如蝴蝶，他记得她简直像是中国人。轻盈无重量，一刻不歇息，了无庇护到使他倾心欲绝。萤火虫群起飞舞时，他俩跪坐在靠窗椅上欣赏，杰里心里想到的是东方。尖锐的蝉声与钝沉的蛙鸣此起彼落，萤火虫的光芒绕着中央一潭黑影闪躲回避，两人如此裸体跪坐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观赏，聆听，发热的月亮则缓缓坠入山顶之下。这些场合，两人从未开口，也未曾达成任何他能察觉到的结论。然而他自此不再锁门。

音乐与敲打声已停止，但教堂钟声响起，他猜是晚祷时间。山谷绝称不上安静，然而受到露水影响，钟声更显沉重。他信步走向绑有网球的铁柱，将绳子拉开，然后以旧羊皮靴踢着底部的青草，回想起她每打一下，轻巧的身体随之飞舞，僧袍也跟着飘荡。

“监护人可不得了，”他们对他说过，“监护人表示非回去不可。”他们说过。杰里陷入长时间的思考，再度向下凝视青色平原，望向那条路——全无譬喻之意——那条宛如运河般微微发亮、直通市区与机场的

路。

杰里自认称不上是喜欢思考的人。童年不断聆听父亲破口咆哮的他，自幼就体会到大想法与大话的价值。他心想，也许他与这女孩最初的交集就是这一点。她强调的正是：“别给我背不动的东西。”

也许会。也许不会。她会看上别人。女人都一样。

时候到了，他心想。钱没了，小说胎死腹中，女友太年轻。得了吧。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该做什么？

是时候了！她该去寻找年轻小伙子，而非与老头子穷耗年华。该让流浪成癖的心蠢蠢欲动。拔营。摇醒骆驼。上路。上帝知道，杰里从前也做过一两次。搭起旧帐篷，停留片刻，继续上路；抱歉了，伙计。

这是命令，他告诉自己。不准理性看待。哨子一吹，子弟准备整队。不准再争辩。监护人。

奇妙的是，他早有感觉，与以往并无二致，他心想，目光仍凝望模糊的平原。不是那种严重的不祥预感或者类似的鬼话；是的，就只是一种时间感。时间到了。一种季节感。尽管如此，陡升的欢欣雀跃感被取而代之，席卷全身的是一种懒散颓唐。他突然感觉太累、太胖、太昏昏欲睡，无法再移动一步。他大可就地躺平，在他站立之处。他大可睡在粗草地上，直到她唤醒他，或直到黑暗来临。

瞎扯，他告诉自己。根本是瞎扯。他从口袋取出电报，精力充沛地阔步走进房里，呼唤她的名字：

“嘿，伙计！朋友！你躲在哪里？有坏消息了。”他将电报递给她，“世界末日。”他说完走向窗前，而不是站着看她阅读电报。

他等到听见纸张飘落桌上的声响，然后转身，因为没有其他东西落下。她不发一语，只是将双手插进胳肢窝，有时候她的肢体语言震耳欲聋。杰里发现她手指盲目地插动，极力想扣上什么。

“不如到贝思家住一阵子吧？”他建议，“老贝思会很乐意招待你的。她很看重你。你肯待多久，贝思就会让你待下去。”

她双臂仍交缠在胸前，直到杰里下山发电报。杰里回家时，她已为他取出西装，那件被村人嘲笑的蓝色西装——她称之为囚衣——然而她不住地颤抖，脸孔转白，显露病容，一如旁观他对付大黄蜂时的神态。他作势想亲吻她时，她冰冷如大理石，因此他不再骚扰她。晚上两人共枕，比单独就寝的感觉更差。

史蒂凡诺大妈于午餐时间宣布新闻，上气不接下气。小学生阁下已经走了，她说。他穿了那件西装。他提了一个手提包、打字机以及书包。法朗寇开面包车带他到机场。孤女也跟去送行，但只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即下车。下车时，她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只是坐在马路边。垃圾就是垃圾。让她下车后，小学生有一段时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几乎没

注意到法朗寇问得巧妙而尖锐的问题，径自频频拨弄黄褐色的额发——山德斯称为灰白发。抵达机场后，距离起飞时间尚有一小时，为消磨时间，两人合饮一瓶酒，玩了一局多米诺骨牌戏，但当法朗寇索车费狮子大开口时，小学生露出不太寻常的严厉表情，讨价还价的姿态有如正牌大富翁。

她说，是法朗寇告诉她的，他是知音好友。法朗寇，被人中伤成是同性恋。每次有人说法朗寇坏话，难道她没有挺身辩护吗？优雅的法朗寇，她那智障的父亲。两人是曾有分歧没错——谁没有过分歧？——如果村人有办法，请他们从整个山谷挑出一个比法朗寇更正直、勤勉、优雅、衣着更得体的男人。法朗寇，她的友人与情人！

小学生回去继承遗产了，她说。

3乔治的爱马

肌肉发达的外交部才子罗迪·马丁台尔说，惟有乔治·史迈利才肯自愿挑起遇难船船长这种差事。他又说，惟有史迈利才肯痛上加痛，偏偏选上这个时机抛下偶尔脱轨的美娇娘。

第一眼看见乔治·史迈利，甚至再看一眼，都看不出他是做出上述两种事的人，马丁台尔立刻点出。他身材矮胖，有些小地方优柔寡断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生性害羞，因此令他时而显得自大，在马丁台尔这类招摇狂妄的人士眼中，他的谦逊简直可视为耻辱。此外他也有近视的毛病；此地刚受重创后的那段时日里，如果看见他佩戴圆形眼镜，身穿公务员制服，细瘦寡言的彼得·吉勒姆随侍在侧，于白厅丛林的湿软小径上如履薄冰地前进，或是看见他在如今归他执掌的圆场里，身处五楼凌乱的“觐见室”（那里活像爱德华国王的陵墓），日夜埋首文书堆中，那么旁人恐怕会误认为“地鼠”之称号非他莫属，而非已故的俄国间谍海顿。日夜在如洞穴般、半荒废的大楼加班，他的眼袋转为淤青，笑容也罕见，然而他绝非天性不苟言笑；现在有时连从座位上起身都让他气喘不已。挺身直立时会稍停，嘴巴微张，以摩擦音发出小小的一声“啊”，然后才继续动作。他的另一项招牌动作是以领带宽的一头擦拭眼镜，使他的脸孔赤裸得令人局促不安，令一名极为资深的秘书——术语是“妈妈”——不只一次险些按捺不住（而这种冲动，若看在心理医师眼里，必定小题大做一番），几乎想冲向前去，为他挡这批他似乎决心达成的艰难任务。

“乔治·史迈利不只是在清理马厩。”同一位罗迪·马丁台尔评论。他在加里克俱乐部的午餐桌前发言。“他还把爱马赶上山去，吆喝着‘左转，左转’。”

其余谣传，对他的辛劳就不那么尊重了。支持这些谣传的部门，主要是想竞标拿下此一摇摇欲坠的单位。

“乔治正仰赖过去的名声过日子，”情况持续数月后他们说，“逮到比尔·海顿只是侥幸。”

再怎么讲，他们表示，逮住海顿是多亏美国密告，绝非乔治的功劳；功劳应归美国表亲，不过美国很有技巧地保留下来。对不对，另有人说，功劳应归荷兰人。是荷兰人破解莫斯科中心的密码，通过关系传递过来，问罗迪·马丁台尔便知。当然是马丁台尔了，毕竟他是圆场专业散播误导信息的人。如此各方你来我往传言不断，对此似乎一无所知的史迈利保持沉默，却休了娇妻。

众人几乎不敢置信。

众人大感震惊。

一生从未爱过任何女子的马丁台尔，特别有受到侮辱的感觉。他在

俱乐部里大肆张扬了一下。

“未免太厚颜无耻了吧！他出身卑微，太太有一半的索坊（Sawley）血统呢！未免太条件反射了吧。根本残酷得像条件反射动作。老婆犯的小过错完全正常，他也忍了好几年——各位听好，是他逼得老婆不得不犯错的——结果这个矮子做了什么好事？回头过来反咬她一口，学拿破仑狠心踢得她满地找牙！简直是丑事一桩。告诉各位，这是丑事一桩。我这人一向宽大为怀，自认不是没见过世面，不过史迈利的做法太过分了。的确很过分。”

马丁台尔总算说对了，说多了偶尔难免正中红心。事实摆在眼前，人人都看得到。海顿死后，往事也一笔勾销，史迈利夫妇抛弃分歧，套套虚礼，破镜重圆后迁回切尔西贝瓦特街上的小房子。夫妻甚至尝试打入交际场合。两人应邀赴宴，自己也宴请宾客，场面符合乔治的新头衔；美国表亲，一两名国会大臣，以及各式各样的白厅老大，全都应邀前来，尽兴而归。甚至有数周时间，他们以略具异国风情的夫妻档姿态，出入较高层官僚圈。后来一夕之间，乔治·史迈利离开妻子的视线，在圆场觐见室后方简陋的阁楼过夜，无疑令她很不是滋味。转眼间，圆场的阴郁气氛似乎逐渐融入他的脸孔，如同灰尘蒙上了囚犯的五官一般。反观在切尔西独守空楼的安恩·史迈利，对弃妇的角色极不适应，内心极难接受。

全心奉献，知情者说。如和尚般禁欲。乔治是圣人。以他这种年龄更难能可贵。

胡说，马丁台尔派人士反驳。全心奉献，对象是什么？那栋枯燥无味的红砖怪物里，还留有什么东西需以自焚之举来解救？就算是在卑劣的白厅，或是，上帝救救我们，就算是在卑劣的英国，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如此倾心奉献？

工作，知情者说。

什么工作？这些自认圆场观察家的人士以假音抗议，一面效法蛇发女妖四处散布片段零碎的所见所闻。裁撤了四分之三的部属，仅留几个帮他泡茶的老太婆，情报网还被炸成碎片，他又有什么工作好做？他的海外驻地情报官，他的爬虫基金4，皆遭财政部冻结——他们指的是他的业务账户——白厅与华府却找不到能称兄道弟的朋友。除非你把拉康也算做他的朋友，那个内阁里走路像跳舞的假道学，一让他抓到机会，总是决心为乔治赴汤蹈火。拉康自然愿为他两肋插刀了，否则他还剩什么？圆场是拉康的权力基地。圆场没了，他等于是——其实老早就了——阉鸡一只。拉康自然而然会嚷几句战斗口号。

“真是丑事一桩。”马丁台尔气鼓鼓地宣布，一面切开熏鳗与牛排加腰子，配上招牌红酒，一瓶得再多花二十便士，“我敢逢人就说。”

在白厅的村人与托斯卡尼的村人之间，有时候可供选择的事物少得惊人。

时光无法扼杀风言风语。相反的，谣言以倍数成长，从他的孤立大做文章，称之为钻牛角尖。

有人记得，比尔·海顿过去不仅是乔治·史迈利的同事，也是乔治之妻的亲戚，此外还另有关系。他们说，史迈利对海顿的怒气，并未随海顿之死而散尽：他肯定是踩着海顿的坟墓跳舞。举例而言，对海顿神话似的角楼办公室进行清理工作时，乔治亲自监督——这房间俯视查令十字路，他也亲自监督摧毁最后蛛丝马迹的工作，从他随手乱挥的油画，到办公桌抽屉内遗留的零碎什物，一项也不放过。就连办公桌本身，他也命令锯开焚毁。办公桌销毁后，他们坚称，乔治唤来圆场工人拆掉分隔墙。不骗你，马丁台尔说。

或者，举另一例子来说，坦白说是最令人不知所措的一个，乔治肮脏的觐见室里，墙上挂了一幅照片，从外表判断是护照相片，却放大到远超过自然尺寸，因此颗粒显得粗大，有人认为具有鬼魅之感。财政部的一个男生参加临时会议，讨论的是取消情报活动银行账号事宜，曾目睹那幅照片。

“对了，那相片是老总吧？”他问彼得·吉勒姆，性质仅止于社交闲聊。问题背后全无意。问一问，总没关系吧？老总的姓名仍不为人知，是此地的传奇。整整三十年，史迈利拜他为向导兼师父。他们说，史迈利其实还亲手埋葬他，因为最高机密人士如同最富阶级，往往死后不举行告别式。

“不对，才不是老总呢。”侍酒臣吉勒姆反驳，以他特有的唐突、目空一切的口吻说，“是卡拉。”

卡拉在他们国内扮演什么角色？

小弟，卡拉是当初吸收比尔·海顿的苏联项目官员，吸收后由他负责指挥：“别的不说，他这人是截然不同的传奇人物，”马丁台尔说，嗓音震颤，“看来报仇雪恨的意味浓厚。我在想，再幼稚还能幼稚到什么程度？”

即使是拉康也对那幅照片颇有微词。

“乔治，说真的，那照片干吗挂上去？”他以惯用的班长口气大胆质问。有天晚上他离开内阁府回家途中顺道拜访史迈利。“我想知道的是，他对你有何意义？你有没有想过？难道不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吗？凯旋而归的敌人？我本以为那相片会打击你的士气，高高在上对着你神气活现的。”

“这个嘛，比尔已经死了。”史迈利说。他有时以这种省略的语法提示个人论点，而非直接提出论点本身。

“你的意思是，而卡拉还活着喽？”拉康回应，“你宁可拥有活的敌人，舍弃死掉的敌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而，乔治·史迈利面对质问时，偶尔会习惯性地置若罔闻；同事

说，甚至他有时让问题显得格调太低。

此时发生一事件，为白厅闲聊场合增添丰富题材，与所谓的“雪貂”有关。雪貂是电子仪器扫荡专家。记忆所及，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生过更严重的偏心事件。马丁台尔说，我的天啊，那些地下工作者有时候脸皮真厚！马丁台尔苦等一年，希望有人来检查他的办公室，寄出申诉函给副部长。亲笔写。由收件人亲手拆封。国防部的拜把兄弟也寄出，财政部的汉姆也差点寄出，不过汉姆不是忘了寄，就是在最后关头心里觉得不妥。这不是优先级的问题，丝毫无关。甚至也谈不上是原则问题。牵涉其中的是金钱。公家钱财。在乔治坚持下，财政部早已在圆场半数地方重新装上线路。显然乔治对窃听的疑心病永无止境。另外，雪貂部门人手短缺，由于工时不合理，曾传出劳资纠纷——从任何角度都可谈个没完！整件事说来令人气结。

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个中细节，马丁台尔修剪整齐的指端唾手可得。乔治于某周四去找拉康——那天不明热浪突然来袭，你记得吧，大家差不多全热趴下了，甚至在俱乐部亦然。到了星期六——星期六哪，想想看，加班！——野兽群聚圆场，鼓噪声惹恼了邻居，将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自从史迈利让那女的回国后，就不曾出现过更明目张胆的偏心举动。他们准许史迈利重新聘雇那个蓬头垢面的俄国老研究员沙赫斯，康妮·沙赫斯，牛津教授，背离一切理性，乱叫一通妈妈。

马丁台尔私底下煞费苦心（或者该说，他“尽可能”保持私下运作），调查雪貂是否有所发现，却无功而返。在间谍世界中，信息就是金钱，而至少就此金科玉律而言，尽管罗迪·马丁台尔或许不自知，他算得上是乞丐一个，因为此桩内情中的内情，仅有极少数人知晓。没错，史迈利周四确实拜访拉康俯瞰圣詹姆士公园那间木板装潢的房间，而那天就秋季而言确实炎热得颇不寻常。丰沛的日光倾注于雍容华贵的地毯上，点点尘埃宛如热带鱼悠游在光柱中。拉康甚至热得脱下西装外套，只不过领带当然少不了。

“康妮·沙赫斯一直在比对卡拉在类似个案里的笔法。”史迈利大声说。

“笔法？”拉康呼应他的说法，仿佛手写违反规定似的。

“情报手法。卡拉的惯用手法。看来只要可行，他会同步安排地鼠和隔墙耳。”

“乔治，能不能麻烦你以白话文重复一遍？”

史迈利解释，若状况允许，卡拉喜欢在手下情报员活动时安装麦克风，以防万一。虽然大楼内部从未泄露足以破坏他所谓“眼前计划”的秘密，令史迈利感到满意，但其中代表的意义令人于心难安。

拉康也逐渐摸清了史迈利的笔法。

“那份理论听来相当学术化，有无任何佐证？”他边询问边细察史迈利于铅笔上方无表情的五官。他以两手食指顶住铅笔，像直尺一样。

“我们一直在清点自家的音响器材，”史迈利皱眉坦承，“不少局内设备失踪。很多似乎是在一九六六年改装期间消失的。”

拉康静候，希望从他口中套出信息。“海顿是建筑委员会的委员，负责执行此工程。”还好后来又解释了一句。“事实上，他是背后的推手。只不过——要是表亲不巧得知，我认为这绝对是最后一根稻草。”

拉康并不傻，而处于盛怒之下的表亲，人人皆尽量平息其怒火，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避免再惹他们生气。若他事前能照自己意思行事，一定会当日要求雪貂出动。星期六是妥协的结果，在没有请教任何人的情况下，他派出整支团队，一行十二人，坐上两辆灰色面包车，外面漆着“害虫扑杀队”。他们将整个地方搞得天翻地覆没错，因而传出角楼办公室遭摧毁这种可笑的传言。他们满腹牢骚，是因为时间正值周末，或许也因此动作粗暴到没有必要的地步：加班费的所得税高得吓人。然而第一次扫荡后，搜出了八只无线电麦克风，个个是圆场自音响库发放的标准公物，他们的心情因而快速逆转。海顿布置麦克风的手法很典型，而拉康亲自检查时也同意上述看法。一只放置于无人使用的办公桌的抽屉，仿佛有人不知情留下，忘记它的存在，只可惜那办公桌碰巧在密码室里。另一只装置于五楼会议室（术语称之为喧闹室），在钢制旧橱柜顶端接收灰尘。另一只带有海顿典型的鉴赏力，嵌在隔壁高级长官洗手间的水槽后面。第二度扫荡将夹层墙包括在内，又找出三只，于建筑工程进行期间植入。属于探测装置，有塑料管将声音送回基地。雪貂将搜出物品如猎物般陈列成行。这些仪器当然已全数失灵，却无疑是由海顿安置，设定为圆场不用的频率。

“我敢说，维修费用也算在财政部头上。”拉康以最具挖苦意味的微笑说，一面把玩铅块。这些铅块原本用来将探测麦克风连接在交流电源上。“至少在乔治重新改装这地方的线路之前是如此。我非告诉汉姆兄不可。他一听准会跳起来的。”

汉姆是韦尔斯人（因此别号韦尔斯榔头），是拉康最持久的死对头。

依拉康的建议，史迈利现在装潢出设备简陋的剧场。他命令雪貂重新启动会议室的无线电麦克风，并修正圆场硕果仅存的几辆跟监车其中一辆的接收器。随后他邀请三位最不服从的白厅办事员，包括韦尔斯榔头在内，在大楼周遭半径半英里内开车，收听事先撰写台词的对话——由史迈利两名身份隐秘的帮手坐在喧闹室里念出来。车里一字不漏全听得到，连一个音节都逃不掉。

之后史迈利亲自要求他们发誓绝对保密，而且为保险起见，请管理组人员快速拟出保证书，逼他们签名，令他们心生畏惧。彼得·吉勒姆认为如此他们能噤声大约一个月。

“如果下雨的话，时间更短。”他说，语带挖苦。

然而，如果说马丁台尔与白厅边境的同事生活在史前时代，对史迈利天地的实情懵懂未知，史迈利身边人士对他也同感疏离。越靠近他，

圆场变得越小，早期仅有宝贵的少数人得以进入核心。史迈利进入圆场暗褐色的门口时，门口有神态机警的工友管理临时路障，但他并未削减习惯上的隐私性。连续数日数夜，通往他小办公套房的门保持紧闭状态，与他共处的人只有彼得·吉勒姆，以及名为法恩的黑眼珠总管四处走动。在对海顿引蛇出洞期间，法恩与吉勒姆共同担下为史迈利看家的任务。有时史迈利只点个头，就从后门溜走，带着整洁小巧的法恩出去，留下吉勒姆应付来电，一有紧急状况时通知他。妈妈认为他的举止有如老总生前最后几天。老总为了海顿而死于工作岗位，心碎而死。在这个封闭社会的有机程序中，又添了一个新术语。卸下海顿的面具，以新术语而言是“堕落”。圆场历史也因而分成“堕落后”与“堕落后”。以史迈利的活动来说，大楼实体上的“堕落”，包含遣散四分之三人员，包含雪貂造访后斑驳狼藉的环境，带给人一种废墟的沉重感，而士气低落时刻，对不得不咬牙隐忍的人而言，这种废墟感变成具有象征意味。雪貂不负责组合还原他们所破坏的东西；而他们或许也感觉到，卡拉的行径亦可印证同一道理，他蒙尘的五官被行踪飘忽的圆场首长钉在墙上，继续从简朴刻苦的觐见室阴影中冷眼俯视着所有人。

员工们所知不多，却足以令人心寒。举例来说，人事这种例行事务都令人望而却步。史迈利大笔一挥，开除了部属，命令摧毁外国驻地；驻扎香港的塔夫蒂·西辛格即为一例，只不过由于香港距离反苏联环境甚远，因此是最后解散的一批。他们与史迈利一样，深感难以信任白厅，他们听说史迈利在那里与人发生诡异而激烈的争论，讨论的是遣散与重新安置的条件。有些个案——香港的塔夫蒂·西辛格又是最容易随手拈来的例子——比尔·海顿刻意过度提拔已过气情报官，而这些人应该不会主动为个人要求——是应该依照本身价值遣散，或是以海顿恶意灌水过的数目来打发他们？也有些个案，是海顿为求自保而捏造理由加以开除。这些个案是否应得全额退休金？是否得以申请复职？摸不清状况的年轻部长，选举过后初尝权力滋味，作出大胆而矛盾的裁决；结果相当令人伤感，大批希望落空的圆场外勤情报官冒出来，男女皆有，纷纷求见史迈利，因此他命令管理组人员，有鉴于保密第一，或许也为求美观起见，不准这些归国情报官踏进总部大楼一步。史迈利也不容许死刑定讞者与暂缓行刑者之间进行接触。在上述规定下，财政部的韦尔斯榔头也满心不愿意提供支持，管理组人员于布鲁斯贝利一处出租民房设立临时接待所，以语言学校之名避人耳目（“抱歉，登门拜访者请事先预约”），以四名按件计酬的情报官负责运作。这群人无可避免地成为布鲁斯贝利集团，据说有时史迈利会抽出一个钟头左右，主动溜过来，差不多以赴医院探病的姿态，对这些多半陌生的脸孔表达慰问之意。有时候，视心情而定，他会全然沉默不语，宁愿在满是灰尘的面谈室角落站岗，不多作解释，杵立如佛像。

他有何动机？他究竟在寻找什么？如果根源是愤怒，这种愤怒是当时所有人的共同点，大可在一天漫长工作结束后，共聚在有屋檐的喧闹室，玩笑闲聊；但如果有人说溜了嘴，不慎说出卡拉或其地鼠海顿的名字，一群寂静天使便会降临，就连莫斯科观察家，狡猾的老康妮·沙赫

斯，也无法赶走。

更令史迈利部属动容的是，他努力从废墟抢救出情报网。海顿遭逮捕后不到一天，圆场位于苏联与东欧九个情报网悉数关闭。无线电连接戛然而止，信差线路枯竭。绝对有理由判定的是，假使其中尚存圆场掌握的情报员，一夕之间肯定全被收拾干净。然而史迈利坚决反对如此简单的推论，也拒绝承认卡拉与莫斯科中心的效率无懈可击，或做法干净利落，或合乎逻辑。他叨扰拉康，他叨扰表亲位于葛若斯芬诺广场的大型别馆，坚持继续监听情报员的无线电频率。尽管外交部强烈抗议——仍由罗迪·马丁台尔站在最前线——史迈利请BBC的海外单位公布零锁码的信息，若有幸存的情报员收听到，而且懂得代号，必须立刻跳船求生。接着渐渐的，让他们大感讶异的是，传回来了生命微微振动的迹象，宛若另一行星捎来的难解信息。

首先是表亲传回报告。代表人物是豪爽得令人起疑心的分部主任马铁娄，由葛若斯芬诺广场通报，两名英国情报员，男女各一名，正经由美国逃生线安排至黑海的老度假胜地索契，当地安排了一艘小船，随时待命，进行马铁娄的哑巴手下坚称的“外渡任务”。依马铁娄的描述，他指的是楚拉耶夫夫妇，是涵盖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沉思”情报网之首脑。史迈利不等财政部批准，径自让已退休的罗埃·布兰德复职。这人虎背熊腰，是马克思时代的方言研究员，客串外勤情报员一段时间，是“沉思”情报网的个案主办官。布兰德在圆场“堕落”时跌得很惨。史迈利托他代管两条俄国走狗——德·西尔斯基与卡斯珀。两者也已呈退休状态，也是海顿从前的手下。史迈利要他们组成迎接小组待命。他们仍坐在RAF运输机上时消息传来，逃亡中的两人离开港口时遭击毙。外渡任务失败，表亲说。马铁娄为了表示同情，亲自致电史迈利通报消息。马铁娄为人亲切，独具个人风格，也与史迈利一样作风老派。时间是晚上，雨势滂沱。

“乔治，你可别太在意，”他以慈祥的口吻警告，“听到了没？人员有外勤内勤之分，两者之间的分别要靠你我维持，否则我们全部人非发疯不行。没办法为了每个人下海。这是领导管理的要领。你可别忘记了。”

史迈利接听上述电话时，彼得·吉勒姆正站在他身旁。吉勒姆事后发誓，史迈利并无特别反应，而吉勒姆对他了如指掌。尽管如此，十分钟后，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他已不见踪影，宽大的防水衣也从挂钩上失踪。他于破晓后返回，浑身湿透，防水衣仍挂在上臂上。换装完毕后，他重回办公桌，但当吉勒姆端着茶水踮着脚尖不招自来时，发现令他感到尴尬的事：主子僵直身体，坐在德国诗集的大部头古书前，双拳各握书本左右，默默哭泣着。

布兰德、卡斯珀与德·西尔斯基央求复职。他们指出，小个子匈牙利人托比·伊斯特哈斯不知何故重返岗位，因而要求照此办理，可惜徒劳无功。他们被搁置一旁，从此不提起。对不义之人，施以不义之举。虽然沾上污点，他们或许仍派得上用场，但史迈利不愿再听见他们的姓名；当时不愿听，后来也不愿听，永远都不愿听。圆场刚“堕落”后这段期

间，士气陷入最低潮。有人认真相信——圆场内外都有这样的人——英国情报组织的心跳，他们已经听见最后一声。

大灾难过后几天，命运之神碰巧眷顾史迈利，带给他小小的安慰。在华沙，在光天化日之下，逃跑中的圆场某主要干员收听到BBC的讯号后，直接步入英国大使馆。多亏拉康与史迈利不顾马丁台尔反对，多方积极游说，当晚他经过安排伪装为外交信差，飞回伦敦。但由于史迈利不相信他的说法，便将他转交圆场加以讯问。圆场审问组由于缺乏虐待的对象，差点要了他的命，但随后宣布他没问题。经过安排，他在澳大利亚落脚。

接下来，新官上任的史迈利，被迫对圆场于国内遭暴露身份的分站作出判决。他的直觉反应是砍掉下列的一切：如今了无安全感的安全联络站；传统上传授知识、训练情报员与新手的沙拉特育成所；位于哈洛、尚处试验阶段的音响实验室；苏格兰阿盖尔郡的化学训练所；坎特伯利的无线电传输基地；以及赫佛德河口的水事学校——其中过气的水手仍练习小型船只航海术，犹如进行某种失传宗教的仪式。他甚至愿处理掉位于巴斯的解码总部。

“全砍掉算了。”他前去造访拉康时这么说。

“然后呢？”拉康询问。他对史迈利一头热感到不解。自从索契任务功败垂成后，一头热的情况更为明显。

“重新开始。”

“原来如此。”拉康说。而他的意思当然是，我不懂。拉康眼前堆了一叠财政部送来的数据，一面听史迈利讲话一面研究着。

“沙拉特育成所，竟然归类在军事预算里，原因是什么，我搞不懂，”他边回想边自言自语，“一点也没有用到你的地下基金。哈洛的支出由外交部负责——我敢确定外交部老早忘记了这点——阿盖尔郡的化学训练所归国防部照顾，而国防部极可能不知道有这个机构存在。邮政局涵盖了坎特伯利，海军照顾赫佛德。巴斯呢，也有幸由外交部基金供养，签名的是马丁台尔，六年前开始隶属，同样也从官方的记忆中渐渐消除。所以无关痛痒吧？”

“全是枯木，”史迈利强调，“只要它们存在一天，我们就没办法取代。沙拉特老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赫佛德病态百出，阿盖尔是闹剧一场。至于译码团队，过去五年来，他们等于是卡拉的全职员工。”

“卡拉？你指的是莫斯科中心吗？”

“我指的是负责海顿的部门，也负责六七个——”

“你的意思我懂了。不过我倒认为，比较妥当的做法是配合体制的运作。这样一来，可以避免个性不合造成尴尬。毕竟体制的功用在此，不是吗？”拉康以铅笔在办公桌上敲出节奏。最后他终于抬头，以疑问的眼神打量史迈利。“你呀，近来斩草除根得很彻底，乔治。一想到你有机会

来我这边的花园，会怎么挥舞你的斧头，我便害怕。那些分站是镀金的股票。现在脱手，以后休想买回来。以后等你重新上轨道时再卖，给自己买个更好的。股价低挡时一定不能卖，你也知道。一定要等到有赚头时才卖。”

史迈利满心不情愿地低头，接受他的建议。

仿佛上述伤透脑筋的事情不够看，某个霪雨绵绵的周一上午，财政部督察指出，圆场的地下基金在“堕落”前五年间，出现账目严重短缺的现象。史迈利被迫私下开庭，硬将已退休的融资处老职员拖回来，老职员掩面痛哭，羞愧地坦承对档案室的一个女孩倾心，被她牵着鼻子走。极度悔恨交加之下，老职员回家后上吊自尽。尽管吉勒姆百般劝阻，史迈利仍执意参加其葬礼。

然而有迹可循的是，从上述惨淡经营的起步点开始，从他上任之初的几周起，乔治·史迈利就打算发起攻击了。

这次攻击发动的基础，首要在于哲学，其次来自理论，到了最后阶段，多亏异乎寻常的赌徒山姆·科林斯戏剧化登场，靠的才是人力。

哲学意味不难理解。史迈利以坚定的语气高声说，情报公司的任务并非官兵捉强盗的游戏，而是将情报递交顾客手中。若无法递交情报，顾客将另寻较不讲求道德原则的卖家，或者更糟糕的是，干脆径自进行半吊子的自助情报活动。如此一来，情报业务必将凋零。他接着说，情报在白厅市场上不见踪影，表示该公司不受青睐。更糟糕的是，除非圆场从事生产，否则无法与表亲以物易物，更无法与其他姐妹公司进行传统的互惠交易。不事生产等于不事交易，不事交易相当于坐以待毙。

阿门，他们说。

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如何产生情报，他的理论——他称之为前提——成为一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地点是喧闹室，时间是史迈利主事后不到两个月，与会人士包括他自己，以及小小的内圈人。这群人就某种程度而言，组成了他的交心密友团队，共有五人：史迈利本人；彼得·吉勒姆，他的随从；体型庞大、衣着飘逸的康妮·沙赫斯，莫斯科观察家；法恩，黑眼珠总管，喜穿黑球鞋，负责掌管俄国风格的茶汤铜壶，发送软圆饼；最后是狄沙理斯博士，绰号疯狂耶稣会教士，是圆场的首席中国观察家。爱说笑的人表示，上帝造好了康妮·沙赫斯后需要休息，所以用剩余原料造出狄沙理斯博士。博士全身补丁又显肮脏，身材矮小，与其说和康妮平起平坐，不如说是她豢养的猿猴。而博士的五官，不骗你，从披散在污秽衣领上如芒的银发，到扭曲潮湿如鸡嘴般四处乱啄的指尖，皆具有一种天生畸形的外貌。假使他出现在插画家庇尔兹利笔下，必定会为他加上链条，画得毛发蓬乱，从康妮庞大的长袍一角四下窥视。然而狄沙理斯是知名东方专家，是学者，也可算是英雄，因为大战期间他有部分时间在中国战场，为上帝与圆场招兵买马，其他时候则被关在樟宜监狱，让日本人从中取乐。以上是史迈利的团队，五人帮。日后五人帮的规模扩展开来，但最初的五人核心班底名声响亮，有幸列

名其中的狄沙理斯说：“像手握编号只有个位数的共产党员证。”

史迈利首先检视废墟，花了不少的工夫，如同洗劫市区或清算大批人员那般地煞费时间。他只是驰骋穿越圆场内部每条暗巷，毫不留情地展示海顿以何种手法对苏联主子泄露机密。而史迈利通常能指出确切时间点。他当然具备优势：他亲自讯问海顿，也握有最初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最后让他揪出了海顿。他认得出足迹。尽管如此，他这番演说小露一手破坏性分析的绝活。

“所以说，别抱太大幻想，”他简洁地收尾，“本单位再也不复从前。可能会变得更好，不过会与以往不尽相同。”

他们再度说阿门，以悲哀的心情稍事休息，伸伸双腿。

真奇怪，吉勒姆事后回忆，最初几个月的重大场景，似乎全在夜间进行。喧闹室格局狭长，上方有屋檐，屋顶窗高高在上，只露出橙色夜空与矮林般的生锈无线电天线。天线是战后遗迹，没有人认为拆下来是妥当之举。

众人重新就座后，史迈利说，所谓前提是：海顿对圆场所做的一切破坏之举，无一不是经过他人指挥，指示直接来自卡拉本人。

他的前提是，卡拉在对海顿下令时，暴露出莫斯科中心内情与事实的差距。卡拉命令海顿压下通报至圆场的部分情报，命令他加以降低等级或扭曲，嗤之以鼻，或甚至完全封杀，由此可见卡拉不愿曝光的机密有哪些。

“所以我们可逆向操作，是不是啊，亲爱的？”康妮·沙赫斯喃喃地说。她的理解神速，通常让她遥遥领先同一领域人士。

“没错，康妮。我们正有此打算，”史迈利语气沉重，“我们是可以逆向操作。”他继续演说，让吉勒姆以及其他比刚才更加迷惘。

史迈利说，巨细靡遗追查海顿的破坏途径——史迈利称为兽迹——殚精竭虑记录海顿选择的档案；重组圆场分站善意搜集的情报，再对照海顿传到白厅市集上给圆场顾客的情报，不放过一丝细节。必要时，重组的作业会花上痛苦的几个星期。经过以上的努力，方有可能逆向操作——康妮这一词用得正确——才能建立起海顿的始航点，也进而找出卡拉的始航点。

只要采取了正确的逆向操作，机会之门便将在不经意之间敞开，圆场也会在表面上不看好之际站上采取主动的地位，或者以史迈利之言——“积极运作，而非只是被动反应”。

前提的定义，依康妮·沙赫斯事后愉悦地描述，是“另寻黄金法老，由乔治·史迈利提灯，我们这些可怜的小虾米挖掘”。

这个时候，在他们情报活动的眼里，杰里·威斯特贝当然连灵光一闪都称不上。

翌日五人帮进入战斗位置，庞大的康妮矗立一角，又矮又怪的狄沙

理斯也占据一角。狄沙理斯以浓浓鼻音、带有贬抑意味的口吻说话，话中具有蛮力：“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我们终于知道了。”各人分别带着有气无力的挖掘团队，将数据库一分为二。康妮称呼自己的团队为“我的左翼分子”，负责俄国及其卫星国。狄沙理斯将自己的团队称为“黄祸”，负责中国与第三世界。定位不明、在两者之间的数据，例如针对理论上的盟邦所提出的源头报告，则分发至特别位置，稍后再行评估。两人与史迈利一样，不分日夜加班。福利社在抱怨，工友威胁要罢工，然而逐渐地，掘穴人展现令人敬佩的精力，连助理都感染到，最后大家乖乖闭嘴。双方渐渐开始耍嘴皮谈笑。在康妮的影响下，原本人前鲜少微笑的幕后男孩女孩，忽然学会彼此揶揄对方；在圆场以外的世界里，挚友之间就是以这种用语交谈的。帝国主义沙皇派走狗与专事挑拨的沙文主义斯大林派分子共饮无味咖啡，双方还引以为傲。然而个性绽放得最亮眼的无疑是狄沙理斯，晚上加班时，他会抽空打乒乓球，时间虽短却打得起劲，来者无论是谁，一律迎战，四处蹦跳的姿态有如鳞翅类昆虫学家收集罕见标本。未几，首批成果出炉，带给他们全新冲劲。不到一个月，他们紧张地发出三份报告，限阅条件严苛，结果甚至连抱持怀疑态度的表亲都表示赞同。一个月后，他们发表精装本的总结，标题定得又臭又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海对空攻击能力方面苏联情报缺陷之临时报告，马铁娄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表亲基地，报以勉强的掌声，而马铁娄本人也致电喝彩。

“乔治，我早跟那些人讲过了！”他大喊，音量之大，电话线似乎是画蛇添足，“我告诉他们：‘圆场会有成绩的。’他们听进去了没？有才怪！”

此刻的史迈利，有时由吉勒姆陪伴，有时请木讷的法恩看护，亲自摸黑游历，大步走到疲惫半死的状态。他仍无所获，因此继续大步走。白天，他走遍附近郡县以及更远的地点，询问圆场从前的情报官以及已退休的情报员，往往探查至深夜。在基思威克（伦敦一处旧市区），他温顺地坐在廉价旅行社里，与曾官拜波兰装甲部队上校、如今在此担任职员男子低声交谈，自认瞥见了曙光；无奈希望如海市蜃楼，前进一步，幻影随之消散。来到七橡一家二手无线电商店，一名塞文欧克斯地区捷克人让他重燃希望，可惜他与吉勒姆兼程赶回圆场调阅记录以证实其说法，却发现几名当事人皆已作古，无人能提供进一步信息。他也曾造访纽马基特一处私人养马场，遭受衣着随便、主观强烈的苏格兰人辱骂，令法恩怒发冲冠，几乎动粗。史迈利接替的职位原属阿勒莱恩，而这人是阿勒莱恩的部属。然而回办公室后他调阅了资料，却只是再一次感到希望渺茫。

史迈利在喧闹室勾勒的前提，他深信不疑的最后一点并未说出，就是：海顿自投罗网并非独立个案。最终分析中，导致海顿落网的，并非他的文书作业，并非他出手干涉报告，也非他“遗失”了碍事的记录。落网的关键是海顿惊慌失措。海顿自动自发介入外勤情报行动，该行动对他自身造成威胁，或许也对卡拉另一名情报员造成威胁，事态忽然严重

起来，别无选择余地的他，只好不计风险将整件事压下来。这套做法，史迈利渴望发现另外有人重蹈覆辙。而这个问题，正是史迈利与帮手在布鲁斯贝利招待中心讨论的重点。讨论时绝不直言，而是以推理的方式提出：

“外勤服务期间，依你看，你是否记得曾受到不合理的约束，禁止追查某项情报线索？”

回答的人是小巧玲珑的山姆·科林斯。他身穿晚礼服，吸着棕色香烟，修整过的髭须与密西西比纨绔子弟的微笑。史迈利某日召他来密谈。他信步走进来，回答：“现在一想，有，老兄，我记得。”

然而，潜伏在这个问题与山姆的关键回答之后，又是令人敬畏的康妮·沙赫斯小姐，以及她追求俄国黄金的愿望。

而还藏在康妮身后的，一如既往，是永远朦胧的卡拉照片。

“康妮有新发现了，彼得，”她某天深夜拨了内部电话，低声对吉勒姆说，“她有新发现了，人格保证。”

这项发现，绝非她的第一桩，也非第十桩，但她异于常人的本能立刻点醒自己，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品，老康妮的话一字不假”。因此吉勒姆转告史迈利，而史迈利锁上档案，清理办公桌，接着说：“好了，让她进来吧。”

康妮体型庞大、跛足、工于心计，父亲是名校教授，姐姐也是名校教授，自己也隶属学术界，资深情报人员以“俄国妈妈”之名称呼她。口传轶事指出，她以黄花闺女姿态初入社会之际，老总以打桥牌为借口吸收她，当晚首相张伯伦还承诺“此生将见和平之日”。海顿在恩师阿勒莱恩的羽翼下掌权，上任后最初也是最精明的举动之一，就是强迫康妮退休，因为康妮对莫斯科中心旁门左道的了解，比她口中多数在里面工作的“落魄野兽”还深，而卡拉的私人地鼠与招募大军一直特别令她见猎心喜。当年的他，并非苏联叛徒，但其简报曾穿过俄国妈妈的风湿手指之间；当年的他也不曾追随卡拉旗下姓名已曝光的猎头人员，不过康妮仍能如数家珍般详述其谍影生涯；研究俄国问题近四十载的岁月，从未有过一丝传言逃过她的耳目，她将信息留在简洁的记忆堆中，待有必要时搜寻活用。老总曾以略带绝望的口吻说，康妮的脑袋有如一只大信封的背面。遭辞退后，她回到牛津，重回恶魔怀抱。史迈利回收她之前，她惟一的消遣是《泰晤士报》的猜字游戏，每天舒舒服服喝上两瓶。然而那一夜，稍具历史意义的那一晚，她拖着庞然身形走过五楼走廊，朝乔治·史迈利的内部办公室前进，身穿干净灰色长袍，涂抹上两道与她原本唇色相近的玫瑰色唇膏，赴会前整天也没喝过比烈性甜薄荷酒更烈的液体——酒臭仍在她身后飘散。众人事后判定，打从第一刻起，她就带有一份随机应变感。她提了一只沉重的塑料购物袋，因为她反对使用真皮。她的巢穴位于楼下，养了一条杂种狗，命名为小跑，是在前一条爱犬死去后懊丧交加之下找来的宠物，如今在她办公桌下哀叫，对象是她盛怒中的同事狄沙理斯。狄沙理斯经常私下猛踹它。心情稍好时，会向

康妮细数中国人料理可口香肉的多种煮法，并以此自满。她走过一扇扇爱德华式屋顶窗，外面夏末的骤雨急急落下，结束长期旱象，她认为——她后来告诉大家——这雨就算称不上具有圣经启示的意味，也具有象征性。雨滴打在石板屋顶上，发出小球般的声响，压扁了落在屋顶上的枯叶。在前厅里，妈妈们继续面无表情处理公事，对康妮的朝圣举动见怪不怪，却也不见得欣赏。

“亲爱的，”康妮喃喃说，一面学皇室挥着臃肿的手，“忠心耿耿，真是忠心耿耿啊。”

进入觐见室前必须步下一阶，没有人带路的话，尽管有褪了色的警告标语，往往还是会因此重心不稳。风湿缠身的康妮将这一阶视为梯子来应付，由吉勒姆搀扶手臂走下。史迈利看着她，肥厚的双手交握在办公桌上，她则一面开始严肃地从手提袋里取出贡品：不是蝶螈眼珠，也非出生即遭勒毙的婴儿手指——这又是吉勒姆的讲法——而是档案，一连串档案，又做记号又加注释，是她再次激情搜刮莫斯科中心数据库后的战利品。若非她数月前死而复生，这些已在海顿手中长达三年的档案，恐将静静化为尘土。她取出档案，以手抚平纸面，档案里有研究过程中以回形针固定的纸条。她展现满溢的微笑。吉勒姆再次受到好奇心驱使，不得不放下手边工作，过来一看究竟。她喃喃说着“你这个小坏蛋”以及“你跑去哪儿啦？真调皮”。对象当然不是吉勒姆或史迈利，而是档案本身，因为康妮习惯假设万物皆有生命，都有执拗不顺从的可能，无论是她的爱犬小跑，还是挡住去路的椅子，或是莫斯科中心，或卡拉本人。

“有向导陪同的旅游，亲爱的，”她大声说，“就是康妮的遭遇。超级好玩。让我回想起复活节，母亲把涂上颜色的鸡蛋到处藏在屋里，叫我们这些女孩子去找。”

之后约莫三个小时，咖啡与三明治与黑皮肤的法恩坚持送上的多余点心穿插其中，吉勒姆极力理解康妮非凡之旅的转折与动力。而这些资料对她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将文件递给史迈利的举动有如发扑克牌，朝他抛过去，再以皱纹满布的手取回，史迈利几乎没机会细看。在此同时，她会念着吉勒姆所谓的“五流魔法师咒语”，是走火入魔掘穴人的魔咒。就吉勒姆所能理解的范围，康妮的大发现之核心是她所称的莫斯科中心金棱线；是苏联的洗钱行动，将地下基金转入光天化日的渠道。路径图尚未全数揣摩出来。以色列的网民提供了一部分，表亲也提供了一部分，已故的巴黎驻地首席情报官斯蒂夫·麦克尔沃提供了第三部分。渠道行经巴黎后转向东方，途经印度支那银行。此时，也有人书面通知海顿的伦敦站，亦即行动理事会，附上圆场资源耗竭的苏联研究处所作的建议。研究处建议，应当针对外勤界全面清查。伦敦站将这项提议打入冷宫。

“对高度敏感消息来源可能具有偏见。”海顿的走狗之一写道，就没有下文了。

“归档后遗忘，”史迈利喃喃地说，心不在焉地翻阅档案，“归档后遗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外面的世界沉浸于梦乡。

“完全正确，亲爱的。”康妮以非常轻柔的口气说，仿佛害怕吵醒他。

档案与卷宗此时已在觐见室四处散落，场面较类似灾难现场，而不像胜利凯旋的场面。接下来一个钟头，吉勒姆与康妮默默凝视空气或卡拉的照片，而史迈利则谨慎回溯康妮的脚步，焦躁的脸孔凑近阅读灯，光线加强了他圆胖的线条，双手在纸张上跳跃，偶尔伸手靠近嘴巴舔舔拇指。有两次，他做出即将瞥向康妮的动作，或是张口欲言，康妮却在他发问前准备好了答案。在她心中，她其实正陪史迈利一同追寻线索。阅读完毕后，他往后靠坐，摘下眼镜来擦拭，这次总算非以领带末端，而是从黑色西装外套上方口袋取出丝质新手帕来清洁镜片。之所以盛装，是因为他几乎全天与表亲闭门商谈，任务是修补围墙。史迈利擦拭眼镜时，康妮以迷人的眼神对吉勒姆说：“他真可爱，不是吗？”——她总爱以这句口头禅来描述上司，让吉勒姆几乎怒不可遏。

史迈利接下来的话语略带反对意味。

“尽管如此，康妮，伦敦站确实正式要求驻万象的情报站进行搜索。”

“正好在比尔有机会染指之前。”她回应。

史迈利似乎没听见，拾起一份打开的档案，递给办公桌对面的她。

“而万象确实也寄出冗长的回音。目录里全标明出来了。我们却好像没拿到。到底在哪里？”

康妮懒得接下他递出的档案。

“在碎纸机里了，亲爱的。”她说，然后以满足的眼光朝吉勒姆微笑。

晨光已降临。吉勒姆缓步走去扭掉办公室里的灯光。同日午后，他走访僻静的西端区博弈俱乐部。山姆·科林斯在自选的这行里，永远不见天日，忍受退休生活的艰苦。他下午习惯监督“铁道”游戏，吉勒姆原本认定会在牌桌上找到他，结果竟被带至一间装潢奢华的房间，名称是“主管”。山姆屈身坐在上等的办公桌后，抽着他抽惯了的棕色香烟，精神饱满的笑容穿透烟幕。

“你搞了什么鬼呀，山姆？”吉勒姆以旁人听得见的低语质问，假装紧张地四下察看。“难不成接下了黑手党啊？天哪！”

“噢，那倒没必要。”山姆不改粗俗的笑容说。他在晚礼服外披上防水衣，带着吉勒姆走过一条走道，穿越防火门后站立街头，两人再跳进等着吉勒姆的出租车。吉勒姆仍在心中对山姆的飞黄腾达暗暗称奇。

外勤情报员不轻易显露情绪，方法各有千秋，而山姆的做法是微笑，慢慢吸烟，让双眼充满特殊而深邃的放肆，讨论时目不转睛看着对方。山姆主跑亚洲，是圆场老将，从事外勤多年：在婆罗洲五年，缅甸六年，泰国北部五年，之后在老挝首府万象再待三年，自然的掩护身份是百货贸易商。泰国人曾两度拷问他，最后放他走，而他不得不穿着袜子离开沙捞越。心情好的时候，他愿讲述自己跋涉于缅北丘陵区部落与掸族之间的故事，可惜他鲜少有这样的心情。山姆深受海顿之害。五年前，由于山姆才气焕发，上级曾认真考虑提拔他上五楼，部分人士指出，他甚至有机会晋升主任一职，可惜海顿帮愚蠢的潘西·阿勒莱恩撑腰。因此山姆既没得势，还遭外放冷冻，直到后来海顿设法为他复职，最后以无中生有的小错开除他。

“山姆！你气色真好！请坐吧。”史迈利说，口气总算带有宴饮交际的意味，“要不要来一杯？现在算是你一天中的什么时间？也许应该端早餐给你吧？”

就读剑桥期间，山姆风光夺得第一名，让视之为近乎白痴的师长疑惑不已。学监事后安慰地告诉他们，他完全靠死背的功夫。然而，若是见过较多世面的人，他们的说法就另有一套。根据这些人，山姆与考题所一名相貌平庸的女孩谈恋爱，从她手中吃尽甜头，其中一项便是得以先看试题。

4城堡乍醒

史迈利首先试探山姆的城府，而山姆本身也如同扑克牌高手，试探了一下史迈利。有些外勤情报员，特别是资质聪颖者，自己不明全局时反而沾沾自喜。这种人处理繁杂细节很有一手，却很固执地点到为止。山姆也有此倾向。史迈利先翻阅档案，以几件无关痛痒的旧案测试他，借此一窥山姆目前的性情，并确认他记忆是否正确无误。他单独接见山姆，因为若有他人在场，情势将为之改观：不是更热烈就是更冷淡，肯定有所不同。事后，整件事公开后，只剩追加问题未解时，他的确从楼下召来康妮与狄沙理斯博士，也让吉勒姆旁听。不过那是之后的事，眼前的史迈利正单独与山姆斗智，全然不让对方知道所有个案文件已遭销毁，在麦克尔沃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山姆是现阶段惟一目睹过某些关键场面的人。

“好吧，山姆，你回想一下，”史迈利终于判定时机成熟后问道，“你在万象时，有没有接过一项请求？是从伦敦这边传过去的，内容包括几张巴黎寄去的汇票。只是标准的请求，请收件人针对归属不详的外勤询问，加以证实或否认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印象？”

他面前的纸张写了一串笔记，显然问话的人打算细水长流，这只是开始。他一面说话，一面以铅笔做记号，看也不看山姆。就算不看，由于常人闭眼时听觉反而更加灵敏，史迈利仍能感觉到山姆的注意力紧绷起来：换言之，山姆稍微伸展双腿，相互交叉，手势减慢到几近停止的地步。

“每月转账到印支5银行，”山姆经过一段适度的停顿后说，“数字很大。从加拿大在巴黎分行的海外账户付款。”他说出账户的号码。“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付款。开始日期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前后。我当然有印象，没问题。”

史迈利立时察觉到山姆准备长期抗战。他的记忆清晰，信息却拮据，比较像准备开战，而不像坦白的应答。

史迈利维持驼背看文件的姿势说：“我们现在得在这方面探讨得稍微详细一点，山姆。归档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错，我希望靠你来更正一下。”

“没问题。”山姆又说，怡然自得地抽着棕色香烟。他看着史迈利的双手，偶尔也以刻意的闲散态度注视他的双眼，不过为时甚短。而史迈利这边则尽情想像外勤情报员生活中能碰到什么错误的抉择。山姆摆出守势，极有可能是想保护离题甚远的事物。举例而言，山姆在报公费时曾动过手脚，担心被查出来。或者他曾闭门造车捏造报告，而没有外出冒生命危险；再怎么讲，以山姆这种年龄的外勤情报员，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安危。或者情况完全相反：进行调查时，山姆稍微超出总部容许的范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交白卷，他找上了情报贩子。或是

他与当地表亲另有交易。或是他遭当地警方勒索——以间谍训练中心沙拉特的术语来说，天使在他身上烙下印记——他只好兼顾双方，为的是生存与微笑，以保住圆场的退休金。为了解读山姆的动向，史迈利知道必须随时掌握上述选择以及其他无数的选择。想观察世界，坐在办公桌前观察是个很危险的举动。

因此在史迈利提议下，两人开始追忆往事。山姆说，伦敦请求外勤调查的文件，是以标准形式送抵他手中，与史迈利的描述相差无几。送抵山姆手中的是老麦克，在他调职巴黎之前一直是圆场驻万象大使馆的居间人。晚上在安全联络站见面。文件不过是些例行公事，即使俄国的成分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山姆事实上还记得老早就对麦克说：“伦敦一定认为这是莫斯科中心的地下基金。”因为他瞧见圆场苏联研究处的代号夹杂在电报的首页。（麦克没有必要让山姆看那份电报，史迈利记下。）对于他这番观察，麦克的响应山姆也记得：“他们当初太不应该炒老康妮的鱿鱼。”他当时说。山姆也全心赞同。

山姆说，其实那份要求相当容易应付。山姆在印支已有朋友，交情很不錯，以钱宁称呼。

“这里有建档吗，山姆？”史迈利客气地询问。

山姆避免直接回答，而史迈利也尊重他的拒答。将所有友人通报总部建档，甚或调查友人身家背景，这样的外勤情报员尚未出生。正如魔术师紧抱秘诀不放，外勤情报员基于不同原因，也对消息来源尽量保密。

钱宁靠得住，山姆强调。他在过去几桩武器交易与毒品案中表现突出，山姆愿随时随地以人格担保。

“噢，这些东西你也负责处理啊，山姆？”史迈利以敬重的口吻询问。

原来山姆也曾兼差，效力于地方毒品管制局，史迈利记下。许多外勤情报员都兼过这种差事，有些甚至获得总部的首肯：在他们的世界，将这种行为比拟为贩卖工业废料。是一种特权。因此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史迈利仍将这份信息记下来。

“钱宁还好啦。”山姆再说一遍，这次口气具有警告意味。

“我想也是。”史迈利以同样客套的语气说。

山姆继续叙述。他到印支银行找钱宁，以假身份对钱宁胡扯一番，让钱宁闭嘴，几天后，谦虚的柜台办事员钱宁检查了记录簿，找出证明，山姆轻易建立起初步联机。山姆描述双方交手的惯例：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一份邮政汇票会从巴黎电传给借宿万象‘康铎旅馆’的迪拉瑟先生，出示护照即可提领，护照号码如下。”山姆再度毫不费力背出数字。“银行寄出通知，迪拉瑟星期一大清早过来银行，领出所有现金，塞进公文包里，提着走出银行。联机到此结束。”山

姆说。

“多少？”

“一开始很小，数目增加得很快。然后一直增加，再增加一点。”

“最后多少？”

“两万五千美元大钞。”山姆眼睛一眨不眨地说。

史迈利的眉头微微扬起。“一个月吗？”他以诙谐的惊讶语气问。

“赌局大，赌桌也大喽。”山姆点头，之后陷入闲适的沉默中。聪明人若未充分使用大脑，往往会显出一种特殊的强度，有时自己也无法控制大脑放射出的信息。正因如此，聪明人在强光照射下所冒的风险，比头脑较愚钝的同僚来得更大。“你问这些，是想拿来对照数据吧，老兄？”山姆问。

“我没这个意思，山姆。像现在这种时机，有时应该怎么办，你也很清楚。乱抓稻草，倾听风声。”

“当然。”山姆以同情语气说，等到两人再度互看一眼，表现出对彼此的信心，山姆才接着继续叙述。

因此山姆前往康铎旅馆查看，他说。门房是情报界常备的次级消息来源，大家都是他的老板。房客名单并无迪拉瑟此人，但柜台很大方收下小礼，提供对方住宿的地址。隔周的周一，山姆说，正好过了当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在朋友钱宁的协助下，山姆佯装逗留银行“兑现旅行支票之类的东西”，与大步进门的迪拉瑟先生正面接触，看着对方递出法国护照，数好了钞票放进公文包，提着走进等候一旁的出租车。

出租车，山姆解释，在万象算是稀有事物。任何有头有脸的人物，无不拥有轿车与司机，由此可推想迪拉瑟不希望被视为有头有脸的人物。

“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吧？”山姆最后说，以关心的眼神注视着动笔中的史迈利。

“到目前为止非常不错。”史迈利应和。史迈利一如先前的老总，从不使用笔记本，只用散装白纸，一次一张，再以一个玻璃纸镇压住。这个玻璃纸镇，法恩每天擦拭两回。

“我说的是合乎资料，还是有所出入？”山姆问。

“我认为相当符合，山姆，”史迈利说，“现在最能讨我欢心的是细节。数据中的细节常搞错，你也知道。”

同一天晚上，山姆说，他秘密与居间人麦克再度联手，费心细察当地俄国恶棍相片集，总算认出苏联驻万象一名商业司二等秘书的凶恶五官，五十五六岁，军方背景，无前科，列出全名但拗口难记，因此外交八卦圈以“商务波里斯”称呼。

然而山姆当然能默背出拗口难记的姓名，一字字慢慢拼出来让史迈

利以印刷体大写字母记下。

“写好了吗？”他语带希望地询问。

“好了，谢谢你。”

“该不会是有人把目录卡遗忘在公交车上了吧，老兄？”山姆问。

“被你说中了。”史迈利点头大笑。

山姆接着说，一个月后，关键的周一再度来临时，他决定谨慎行事。所以他不悄悄跟踪商务波里斯本人，而是待在家中，向两名当地擅长跟踪的走狗介绍状况。

“任务很轻松，”山姆说，“不必摇树，不必另外接电话线，什么都不必。是老挝人。”

“我们自己人？”

“有三年经验，”山姆说，“而且很厉害。”他以外勤的身份附加这句。在他眼中，他养的鹅全是天鹅。

那两名走狗盯着公文包继续下一段行程。出租车不同于上个月那辆，将波里斯带往市区绕一圈，半小时后载他重回大广场附近，离印支银行不远。商务波里斯走了一小段，转身潜入另一间银行，是当地的银行，将整笔钞票递给柜台，直接存入另一个账户。

“所以就这样啦。”山姆说完再点一支香烟，懒得掩饰迷惑的神情，因为史迈利正在叙述一个记录完整的个案。

“你说得对。”史迈利一面用力写字，一面喃喃附和。

山姆说，事后，他们全身而退。山姆深居简出两三星期，让尘埃落定，然后派女助理使出最后一击。

“芳名？”

山姆说出来。是在家上班的资深小姐，出身沙拉特，与他共享商务的掩饰身份。这位资深小姐在当地银行排队，原本排在波里斯之前，让他填好存款单，然后惹出一小件争端。

“怎么惹的，山姆？”史迈利询问。

“她坚持银行先为她服务，”山姆奸笑一下说，“波里斯因为过惯大男人的生活，认为没必要退让，因此拒绝要求。两人因而对骂。”

山姆说，存款单摆在柜台上，她趁自己发挥演技时，上下打量了存款单，两万五千美元，存入一家三流航空公司万象印支包机的海外账户。“资产包括几架烂铁凑成的DC3型飞机，一座锡皮小屋，一叠光鲜的信纸，一个笨笨的金发女郎坐镇店面，一个处事莽撞的墨西哥籍机长。机长在万象的绰号是小不点瑞卡度，因为他身高傲人。”山姆说。他接着说：“此外，内部办公室和其他公司一样，当然也有一群工作勤奋的华人无名氏。”

史迈利的耳朵此时灵敏到极点，若有树叶掉落，也逃不过他的耳朵；然而他听见的却是无形路障堆起的声响，从抑扬顿挫，从对方逐渐紧绷的噪音，从微小的脸部与肢体语言所演出的夸大即兴剧，他都能立即知道，他正逐步进逼山姆防御工事的核心。

因此他暗在心中记下一笔，决定在三流航空公司一事上稍事逗留。

“啊，”他轻声说，“你是说，你已经知道那家公司了？”

山姆掷出一小张卡片。“万象称不上是大型国际都会，老兄。”

“不过你却知道这公司，那才是重点。”

“万象上上下下，大家都知道小不点瑞卡度。”山姆说，奸笑的嘴型比刚才更见宽阔，而史迈利立刻明白，山姆对他有所欺瞒。但他照样继续耍弄山姆。

“瑞卡度这人的事，说来听听。”他提议。

“以前帮过美国空军。万象对这些人态度强硬。在老挝打过秘密战。”

“而且打输了。”史迈利边说边再度动笔。

“单打独斗。”山姆点头，看着史迈利挪走一张纸，再从抽屉取出另一张。“瑞卡度是万象的传奇人物。曾经跟洛基上尉以及那群人飞过。也帮表亲开过两趟，到云南。战争结束后，他无所事事一阵子，然后为中国人效命。那些单位，我们以前都叫做鸦片航空。比尔召我回国时，业绩已经蒸蒸日上。”

史迈利仍让山姆讲个不停。只要山姆认为能将史迈利带离线索所在，山姆愿拼命讲到驴子后腿脱落为止；另一方面，如果山姆认为史迈利过于接近，会立刻拉起窗帘。

“好。”他和气地说，再小心记下几笔，“现在把焦点转回山姆接下来做的事，好吗？我们刚才讲到了钱，知道付款对象，知道由谁处理。你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山姆？”

这个嘛，如果山姆没记错，他花了一两天判断情势。山姆一面鼓起自信一面解释，可从几个角度来看，有几件琐碎小事引起他的注意。首先是商务波里斯这桩怪案。山姆指出，波里斯是正牌俄国外交官，如果真有所谓正牌俄国外交官的话。这人与任何公司的关联并不可考。然而他却独来独往，对一大笔钱握有单独签名的权力，凭山姆有限的经验，这些线索任何一项，足以显示他是地下工作者。

“不只是地下工作者，是该死的最高领导人。是牙齿滴血、实实在在的金主，级别在上校以上，对不对？”

“还有其他什么角度，山姆？”史迈利问，继续用同样长的缰绳拉着山姆，但仍不尽力求取山姆视为关键核心的事物。

“那笔钱不算主流，”山姆说，“是例外。是麦克说的，也是我说的，

我们全都这样认为。”

史迈利抬头的动作比刚才更加迟缓。

“为什么？”他问，两眼直直盯着山姆看。

“台面上的苏联驻万象机构，在市内开了三个账户。表亲在三家银行全布下窃听器。窃听了好几年。苏联驻地提领的每分钱，表亲了如指掌，连提领的账号都清楚，无论目的是情报搜集或颠覆都一样。驻地设有负责运钱者的编制，超过一千元款的提款，必须经过三人签名。拜托你，乔治，这全都写在档案上了吧！”

“山姆，我希望你假装所谓的档案并不存在，”史迈利语气沉重，写字的动作持续，“时机成熟，全部会摊在你面前。现在请忍耐一下。”

“随便你怎么说了。”山姆说，呼吸变得更加轻松，史迈利注意到：他似乎感觉脚下的地面变得更为坚实。

这时史迈利提议找老康妮来旁听，或许连狄沙理斯博士也一起找来，因为毕竟东南亚是博士的擅长领域。就战术而言，得以耐心静候山姆的小秘密，他已经满足了；就策略而言，山姆故事的威力已煽起熊熊兴趣之火。因此史迈利宣布休息一下，与山姆伸展双腿，派吉勒姆找来两人。

“工作怎样？”山姆客气问。

“工作嘛，有点儿不太顺，”史迈利承认，“想念吗？”

“那是卡拉，对不对？”山姆端详着照片说道。

史迈利的语调霎时变得如学究一般，口气也变得含糊。

“谁？啊，对，对，没错。可惜印刷得不太逼真，已经尽过力了。”

旁人会以为两人正在讨论早期水彩画。

“你跟他有些私人过节，对不对？”山姆若有所思地说。

此时康妮、狄沙理斯与吉勒姆鱼贯而入，由吉勒姆带头，矮小的法恩多此一举地拉住已开启的门。

谜团暂时推至一边，因此聚会成了类似沙盘推演的场合：猎捕行动就此展开。首先史迈利为山姆扼要重述，一面不忘强调目前大家应假装没有档案的存在，等于是向新加入者暗中提示。随后山姆接着叙述刚才未完的故事，说出有关角度，有关引起他注意的一些琐碎小事。然而他也坚称，必须补充说明的其实也不太多。线索牵引至万象印支包机后戛然而止。

“印支包机是家华人公司，”山姆向狄沙理斯瞥一眼后说，“主要是汕头人。”

狄沙理斯一听到“汕头人”一词立刻发出声音，半笑半叹。“噢，那些人是最最难搞定的一群了。”他大声宣布——意思是，他们最难以突破。

“是华侨的单位，”山姆再为其他人说明一次，“东南亚那堆烂货堆里，挤满了正直的外勤情报人员，看见热钱流进华侨肚子里，拼命想找出来龙去脉。”他接着说，特别是流入汕头人或潮州人肚子里的钱。他们分散各地却属于同一族群，垄断了稻米控制事业，范围遍及泰国、老挝以及其他地方。在这群华侨公司里，印支包机是个中翘楚。贸易商的伪装，显然让他得以进行深度调查。

“首先，那家公司在巴黎注册，”他说，“其次，根据可靠消息，该公司隶属总公司位于马尼拉的一家上海贸易公司，经营的触角伸展隐秘。而这家公司本身隶属一家在曼谷注册的潮州人公司，付款的对象则是香港一家营业内容五花八门的单位，称为中国海空，在香港股市挂牌交易，营运范围无所不包，从帆船队到水泥工厂到赛马场到餐馆都有。中国海空以香港的标准而言，属于蓝筹股，历史悠久，声誉卓著。”山姆说，“印支包机与中国海空之间惟一的关系，可能是某人的五哥的婢婢是某个股东的老同学，欠他一个人情。”

狄沙理斯再度迅速点头表示赞同，别扭的十指交缠后，捧住扭曲的膝盖，拉至下巴前。

史迈利闭上双眼，似乎打起瞌睡来。但事实上，他听见的正是他预料会听到的东西：山姆·科林斯谈及印支包机公司的全体员工时，说法小心翼翼，避免触及某大人物。

“可是，山姆，你不是提过，那家公司也有两个人不是华侨，”史迈利提醒他，“你说过，一个是笨笨的金发女人，另一个是飞行员瑞卡度。”

山姆四两拨千斤。

“瑞卡度是只鲁莽冒失的发情野兔，”他说，“那些华侨连邮票的钱也不放心交给他管。真正的工作都在内部办公室进行。如果有现金进来，就在内部办公室处理，也在那里面消失。俄国人的现金也好，鸦片钱也好，全都一样。”

慌张地猛拉耳垂的狄沙理斯这时马上附和：“然后重新出现在温哥华、阿姆斯特丹或香港，随某个华人中意的目的而定。”他大声宣布，对自己无所不知的能力欣慰得扭起身子。

史迈利心想，山姆再一次撇清关系。“好，好，”他说，“山姆，根据你的授权范围的版本，之后往哪里走？”

“案子被伦敦取消了。”

从一片死寂的气氛中，山姆必然顿时理解自己不慎触及大动脉。由他的身体语言可见一斑：他并没有环视众人脸孔，也丝毫没有好奇之情，反而以一种装模作样的谦逊态度，打量着自己油亮的夜间鞋以及正式场合穿的高雅袜子，一面沉思，一面吸着棕色香烟。

“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山姆？”史迈利问。

山姆说出日期。

“再往回走一点。还是假装没有档案存在。你处理过程中，伦敦方面对你作的调查知道多少？请告诉我们。你按日送出进度报告吗？麦克有没有？”

吉勒姆事后说，那时即使隔壁妈妈引爆炸弹，也没人会将视线从山姆脸上移开。

“这个嘛”，山姆轻松地说，仿佛为了讨好史迈利突如其来的奇想，“我是条老狗。”他说他从事外勤工作的原则，一向是先斩后奏。麦克的原则亦然。“若事事报备，很快伦敦方面会紧张兮兮，没有先换尿布，不准你过马路。”山姆说。

“结果呢？”史迈利耐心问。

结果是，针对该案，他们传至伦敦的第一份报告，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份。麦克承认进行过调查，报告了山姆发现的全部结果，请求上级指示。

“伦敦呢？伦敦怎么处理，山姆？”

“对麦克尖叫一声，以特急件命令我们两个停止调查，命令他即刻发电报证实我了解并遵从上级指示。为安全起见，他们还痛骂我俩一顿，不准我们再单飞。”

吉勒姆在纸上涂鸦，画了一朵花，再画花瓣，然后是雨滴落在花朵上。康妮紧盯山姆，仿佛今天是他大喜之日，令她如婴儿般的眼睛热泪盈眶，喜不自胜。狄沙理斯与往常一样，如旧引擎般东磨西蹭，但就算他的目光飘移不定，此时也尽量逗留在山姆身上。

“你一定气坏了。”史迈利说。

“倒不尽然。”

“当时你是不是希望办完整个案子？毕竟你大有斩获啊。”

“我当时是不太高兴，没错。”

“不过你还是遵守伦敦的指示？”

“乔治，我只是小兵一个。我们全都在外勤的战场上。”

“非常值得嘉奖。”史迈利说，再度端详山姆，认为身穿晚礼服的他出落得圆滑迷人。

“命令就是命令。”山姆微笑说。

“的确。我在想，你最后回到伦敦时，”史迈利继续说，语调节制而具有猜测意味，“跟比尔见了面，他也欢迎你回国，对你拍肩称许。你有没有碰巧对比尔提起这件事，随口提提？”

“问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吗？”山姆点头，不改悠闲态度。

“比尔怎么回答？”

“怪到表亲头上。说被他们抢先一步了。说案子归他们管，辖区也是他们的。”

“那样的说法，你有任何理由相信吗？”

“有啊。瑞卡度。”

“你猜他是表亲的人？”

“他帮表亲开过飞机。表亲的人事簿上早就列有他的大名了。他是个天生好手。表亲只需要掌握住他就行了。”

“我还以为，我们刚才不是有过共识，像瑞卡度那样的人，接触不到公司实质的营运吗？”

“表亲又不会因此不指使他。那不是表亲的作风。案子还是他们的案子，就算瑞卡度没帮上忙也一样。不管他有没有用，不插手的协议仍然适用。”

“回溯到伦敦要你停止调查的时间点。你接获命令，停止一切行动。你遵命。但是距离回伦敦还有一段时间，对不对？这期间有没有出现什么后续发展？”

“我听不太懂，老兄。”

史迈利再度在脑海深处细心记下山姆言词闪烁之处。

“举例来说，你在印支银行有个朋友。钱宁。你跟他当然一直有联络，对吧？”

“那当然。”山姆说。

“钱宁有没有碰巧对你提过，你收到停止办案的电报后，金陵线有何发展？是不是继续每月汇入，和以前一样？”

“一毛钱也没汇了。巴黎方面关掉了水龙头。没有印支包机。什么也没有。”

“商务波里斯呢？他有没有前科？是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回国了。”

“是时间到了吗？”

“三年合约到期。”

“他们签约的时间通常更长。”

“特别是地下工作者。”山姆微笑同意。

“瑞卡度呢？那个鲁莽冒失的墨西哥飞行员。你不是怀疑他是表亲的情报员吗？他后来怎样了？”

“死了，”山姆目不转睛地看着史迈利，“在泰国边境坠机了。调查结

果是超载海洛因。”

追问之下，山姆又报出日期。

“酒吧里有人为他哀悼吗？”

“不多。一般的感觉似乎是，少了瑞卡度，万象会比较安全，因为他生前动不动对着露露夫人的白玫瑰天花板开枪。”

“这样的看法是在哪里发表的，山姆？”

“噢，在墨里斯的店。”

“墨里斯？”

“群星酒店。老板是墨里斯。”

“原来如此。谢谢。”

这里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但史迈利似乎不打算加以填补。在山姆、三名助理以及总管法恩的注视下，史迈利拉下眼镜半英寸，露出眼睛，再将眼镜推回原位，双手重回玻璃面的办公桌。随后他请山姆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再度检查日期、姓名与地点，花费极大心血，如同全球受过训练的侦讯员一样。基于长久以来的习惯，寻找细微瑕疵与偶有出入之处、遗漏之处，以及重点的改变。细听之后，并无任何发现。而山姆在误以为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也任凭摆布，带着缺乏感情的微笑，如同观看扑克牌从绿毡牌桌对面发过来的神情，如同观看小白球在轮盘上从一个数字跳至另一个数字。

“山姆，不知道你能否设法在这里过一夜？”史迈利等房间剩下两人时说，“法恩会帮你准备一张床，也会料理其他事。意下如何？”

“好说，好说。”山姆语气慷慨。

接着史迈利做了一件令山姆失去自信的事。他先递给山姆一叠杂志，自己打电话派人送来山姆的个人档案，一册不漏，在山姆面前静静阅读，一页不漏。

“看来你很有女人缘嘛。”他最后说。这时窗外暮色渐深。

“偶尔啦，”山姆点头，仍保持微笑，“偶尔而已。”然而嗓音里的紧张成分甚为明显。

入夜后，史迈利让妈妈们下班，通过管理组发出命令，希望最晚八点将所有掘穴人手里的档案清光。他未说明原因。他们爱怎么想，史迈利任他们去想。山姆在喧闹室躺着待命，法恩则陪伴在侧，不准他乱跑。这则指示，法恩只听懂字面意思，因此久候之下山姆开始打起瞌睡时，法恩仍学猫趴在门槛上，一眼不眨。

后来四人闭关于档案室：康妮、狄沙理斯、史迈利、吉勒姆，开始进行漫长而谨慎的文件搜查作业。他们先找的是情报行动个案文件，而这些文件若妥善归档，应放在“东南亚区”，在山姆所说的日期之下。结果找不到目录卡，也找不到个案文件，然而当时这一点仍无伤大雅。海

顿的伦敦站习惯拦截行动档案，锁在自己的限阅存盘中。因此四人走到地下室另一边，脚底噼啪踩在茶色方块油地毯上，来到一处设有栏杆的壁龛，有如教堂门厅，从前伦敦站存盘室硕果仅存的资料在此封存着。四人同样找不到目录卡，找不到个案文件。

“找找电报。”史迈利下令。因此他们查看信号记录簿，发文与收文记录都查，这时吉勒姆开始要怀疑山姆说谎，但后来康妮指出，相关电报纸所使用的打字机有异，经察后发现，管理组人员采购这种打字机的时间，是在电报注明日期后的六个月。

“找找看散装的。”史迈利命令。

在圆场，散装文件指的是档案室在个案文件可能将频繁使用时，针对主要连续档案所印刷的副本。这些文件以活页簿档案夹装订，有如过期杂志，每隔六星期编入目录。经过多番搜寻，康妮·沙赫斯找出东南亚档案夹，包含了山姆发出调阅请求后六星期的时段。档案夹里并没有提及可疑的苏联金棱线，也未提及万象印支包机公司。

“试试看PFs6。”史迈利这么说，他可是难得使用缩写字。他憎恨缩写字。因此大家步行至档案室另一角落，遍寻目录卡满布的抽屉。首先寻找的是商务波里斯的个人档案，然后寻找瑞卡度，再寻找代号小不点、相信已身亡的人。山姆最初对伦敦站提出那份命运多舛的报告中，显然提到过这号人物。史迈利偶尔会请吉勒姆上楼问山姆一些小重点，发现他正在阅读《田野》户外活动杂志，啜饮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法恩则目不转睛监视着。吉勒姆后来才知道，法恩偶尔会做做伏地挺身作为监视中的调剂，一开始是以单手的两个指关节支撑，然后以指尖撑地。寻找瑞卡度的过程中，他们推敲出各种不同拼法，在目录中一一搜寻。

“这些组织是在哪里登记的？”史迈利问。

然而这所名为万象印支包机的公司，在组织目录中同样遍寻不着。

“查查看联络处的数据。”

海顿时期与表亲打交道，完全通过伦敦站的联络秘书处拉线，基于明显的原因他对此单位能发号施令，而部会间的文书往来，此单位也全数复印存盘。回到刚才的教堂门厅，四人再度无言以对。对彼得·吉勒姆而言，这一夜渐渐发展出超写实的意味。史迈利变得几乎惜字如金，圆嘟嘟的脸庞转为硬石。康妮情绪亢奋之下，淡忘了风湿痛，在书架间来回跳动，身手宛如青少年参加舞会。吉勒姆绝非天生的文件好手，在康妮身后手忙脚乱，假装勤奋，奉命上楼对山姆问话时却私下心怀感激。

“乔治，我们逮到他了，”康妮屡次悄声说，“肯定没错，我们逮着了这只人面兽心的蟾蜍。”

狄沙理斯博士以舞蹈的方式走开，去寻找印支包机的华人董事，而令人惊讶的是，山姆竟仍记得其中两人的姓名。狄沙理斯首先查询两人的中文姓名，接着找罗马拼音，最后查中文商用电码记录。史迈利坐在

椅子上，阅读置于膝盖上的档案，仿佛正在搭火车，悍然无视其他乘客的存在。他时而抬头，但耳中听见的声响并非来自室内。康妮主动搜寻交互参照的档案，因为理论上应该可以如此循线找出相关个案文件。有些档案的主角是佣兵，有些是兼职飞行员，也有探讨手法的档案，研究莫斯科中心洗钱支付情报员的方式，甚至也有一份论文，是康妮很久以前撰写的，主题是台面下的金主如何躲避主流驻地的追查，散财给卡拉的非法情报网。商务波里斯的姓氏拗口难拼，并未收录在附录里。也有背景档案，描述了印支银行，与印支和莫斯科国民银行之间的关联。也有数据档案，明示莫斯科中心在东南亚活动的扩展幅度。也有针对万象驻地本身的研究档案。然而，负面数据频频倍增，倍增过程中更加证明数据准确无误。追查海顿的过程前前后后，他们从未见识过如此系统化、全盘化的清除轨迹动作。这是空前绝后最大手笔的逆向操作。

而逆向操作的方向无情地指向东方。

当晚只有一条线索指向犯人。找到线索时，吉勒姆站着打盹儿，时间是清晨前的破晓。追查出线索的人是康妮，由史迈利轻声摊在桌上，三人挨着阅读灯专心看，宛如眼前摆了一张寻宝图。一叠批准销毁的许可，共十二份，在中线以黑麦克笔签下匿名核可，产生炭笔的效果，赏心悦目。这些被下令摧毁的档案与“总部致别馆最高机密文书往来”有关。这里指的是表亲的分站主任，当时与现在皆是史迈利的拜把兄弟马铁娄。销毁的原因，与海顿当初命令万象的山姆·科林斯放弃调查的原因雷同：“美方行动敏感，恐将危及其行动。”命令焚毁档案者的签名，是海顿的勤务名。

史迈利回到楼上，邀请山姆再度进办公室。山姆已摘下蝴蝶结，下巴的胡渣映衬在裸露脖子的白衬衫上，他原来光洁圆滑的形象大不如前。

史迈利首先请法恩去冲泡咖啡，等候咖啡端来，再等法恩倒完两杯后快步离去。两杯皆不加奶精，山姆那杯添的是砂糖，史迈利的那杯则是糖精，因为他口味过重。随后史迈利在山姆身边一张软椅上坐下，而非对坐办公桌两侧，为的是表示与山姆站在同一阵线。

“山姆，那个女孩的事，我认为我应该知道一点。”他说得非常轻柔，仿佛即将报告噩耗，“是为了表示骑士风范，才故意把她漏掉吗？”

山姆的心情似乎相当好。“是档案弄丢了，是不是啊，老兄？”他询问，亲密的口气如同男士洗手间里的对话。

有时候，为了取得机密，有必要先以机密交换。

“是比尔弄丢的。”史迈利柔声回应。

山姆故作姿态地陷入沉思。他曲起扑克玩家的一只手，审视指尖，对其污秽的情况唉声叹气。

“我那间俱乐部，我最近几乎放手不管事了，”他自言自语，“老实讲，我越来越感到厌倦了。除了钱，还是钱。是该换换口味，替自己找

个出路。”

史迈利了解，但他必须强硬。

“山姆，我没有资源。要养活我雇用的人几乎都成了问题。”

山姆若有所思地啜饮着纯咖啡，在蒸汽中微笑。

“她是谁，山姆？究竟是怎么回事？再怎么不堪回首，也没人会管，过去的事就当做桥下流水，我跟你保证。”

山姆站起来，双手插入口袋，摇摇头，以杰里·威斯特贝可能会做出的动作，开始绕着办公室漫步，盯着墙上那些朦胧古怪的东西：身穿军服的达官要人合照；加了框的已故首相的亲笔信；再度端详卡拉的照片，这次他凑得非常近，看了再看。

“绝对不能乱丢筹码，”他说，由于凑得太近，吐气让卡拉的玻璃模糊起来，“我老妈以前常这么说。‘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资产当礼物送。我们一生获得的东西少之又少，一定要斟酌善用。’好歹是牌局一场嘛，对不对？”他询问。他以袖口擦拭相框玻璃。“贵宝地弥漫着极为饥饿的气氛，我一走进来就感受到了。这张大餐桌，我对自己说，今晚势必饱餐一顿。”

走到史迈利办公桌前，他坐下来，仿佛想体验是否舒适。椅子既可左右摇摆亦能上下晃动。山姆上下左右试坐。“我需要一份搜寻请求单。”他说。

“右边最上面。”史迈利说完看着山姆打开抽屉，取出黄色复写纸，放在玻璃桌面上动笔。

山姆写了两三分钟，默不作声，偶尔稍停故作姿态，然后再度动笔。

“她来了的话，记得通知我一声。”他说，接着对卡拉挥手故作滑稽状后离去。

他走出办公室后，史迈利拿起桌上的表格，请吉勒姆过来，不发一语交给他。吉勒姆走到楼梯间时停下脚步，阅读内文。

“伊丽莎白·伍辛顿，别名丽姬，又名丽姬·瑞卡度。”最上面一行如此写着。接下来是细节：“年约二十七。英国籍。婚姻状态，已婚。夫婿背景不详，娘家姓亦不详。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是小不点瑞卡度的合法妻子。瑞卡度已故。已知的最后居住地点为老挝万象。已知最后职业为万象印支包机公司打字员兼柜台小姐。之前于夜总会担任服务生，推销威士忌，是高级妓女。”

近来演惯了黯淡角色的档案室，花了约莫三分钟调整，抱歉“查无此人，重复，查无此人”。除此之外，档案室的女王蜂对“高级”一词有意见。她坚称，那种妓女，应以“上流”描述较为适切。

奇怪的是，山姆的缄默让史迈利不为所动。他似乎欣然接受，认为

从事这一行必然有此举动。他只是要求调阅过去十年内山姆发自万象或他处、逃过海顿大检的全部源头报告副本。自此之后，他利用闲散时分轻松浏览，放任想像力勾勒出山姆混沌的世界。

在此悬而未决的时刻，史迈利展现亲和圆滑的一面，这一点事后众人皆有同感。换了较不稳重的人，可能会一气之下前去与表亲理论，以最急件要求马铁姿寻找美国方面是否仍有销毁文书的记录，希望对方特准他一看究竟，然而史迈利却不愿打草惊蛇，不愿放出信号，只是找上对他最毕恭毕敬的信差。默莉·米金外形端庄俏丽，刚从育成所毕业，或许骄矜女才子的气息浓了点，略嫌内向，却因内勤工作称职而小有名气。由于父兄皆为圆场人员，她血统纯正。圆场“堕落”时期，她仍属见习生，在档案室磨练身手。之后上级将她分发至基层，再擢升至调查处。“擢升”一词是否妥当尚待斟酌，因为据传男同事一旦调至调查处，无一能全身而退，女同事的话更难以脱身。但默莉或许得到父兄真传，拥有这一行所谓的天生好眼光。海顿遭逮捕后，她身边的人仍在讨论听见消息时身在何处、穿着什么衣物，她却着手建立无阻碍的非官方渠道，与葛若斯芬诺广场别馆的对等人员交流。“堕落”后，两边沟通时必须经过表亲设下的重重手续，她建立的渠道却畅行无阻。默莉最佳的屏障是例行公事。她每周五前去拜访，与计算机操作员艾德喝咖啡，与替艾德代班的玛吉聊聊古典音乐，有时候留下来跳跳英国土风舞，或是打打圆盘游戏，或是在别馆地下室的曙光俱乐部打打十瓶保龄球。无巧不成书的是，星期五也是她带着溯迹调查的请求名单前往采购的日子。即使当天没有要事待办，她仍编造一些来保持渠道畅通，而这星期五，默莉·米金在史迈利命令下，在名单中夹带小不点瑞卡度。

“不过，你可别太凸显他的姓名，默莉。”史迈利语带焦急。

“那当然。”默莉说。

为了制造她所谓的烟幕，她选择了十几个以R开头的姓氏，写到瑞卡度时她写下“瑞查兹，疑为瑞卡德，疑为瑞卡度，职业教师，疑为飞行教练”，让瑞卡度的真名只出现在可能的拼法中。国籍墨西哥或阿拉伯，她接着写道。之后她再额外提及他可能已故。

默莉回到圆场时又是夜阑人静时分。吉勒姆已精疲力竭。他认定四十岁是很难不打瞌睡的年龄。二十或六十岁时，人体知道何时睡何时醒，但四十岁算是青春期，睡觉不是为了长大就是为了保持年轻。默莉现年二十三。她直接进入史迈利办公室，端庄坐下，双膝紧紧并拢，开始取出手提包里的东西，康妮则以热切的眼神旁观。眼神更热切的是彼得·吉勒姆，只是原因不同。她严肃地说，很抱歉这一趟花这么久的时间，因为艾德坚持要请她看再度放映的《大地惊雷》。这部电影在曙光俱乐部大受欢迎，之后还必须摆脱艾德的纠缠，却不愿因此惹他生气，特别是今晚。她交给史迈利一个信封，史迈利打开，从中抽出长方形的暗黄色计算机卡。她究竟有没有摆脱艾德的纠缠？吉勒姆很想知道。

“过程如何？”这是史迈利的第一个问题。

“单刀直入。”她回答。

“这剧本写得精彩绝伦啊！”史迈利接着赞叹。然而他往下阅读后，表情慢慢改变，转为罕见、似狼的浅笑。

康妮的表现就没有这么节制。她把计算机卡转交给吉勒姆时已张口大笑。

“噢，比尔！噢，你这个小坏蛋！声东击西的功夫到家！噢，小恶魔！”

为了让表亲闭嘴，海顿推翻了原先的谎言。经译码后，计算机打印出以下扣人心弦的故事。

比尔·海顿担心，圆场屡屡调查有关印支包机公司，表亲可能也有相同动作，因此身为伦敦站主任的海顿对别馆发出正式通知，基于双方现有的协议，请其停止调查。这份通知让美国人知道，伦敦方面目前正密切审视印支包机，圆场已派人卧底。美方从善如流，答应退出调查，交换条件是希望最后结果出炉时能分一杯羹。表亲在协助英方情报活动时曾提到，他们与飞行员小不点瑞卡度的联机已断。

简而言之，以巧妙的说法双面欺瞒，手段高超。

“谢谢你，默莉，”史迈利在所有有机会赞叹后客气地说，“真心感谢你。”

“不敢当。”默莉说，表现矜持得如同保姆，“还有，瑞卡度肯定是死了，史迈利先生。”她报告完毕。她报出的死亡日期与山姆·科林斯先前述日期一致。说完，她合上手提包的扣夹，拉扯裙角盖住可人的膝盖，雅致地离开办公室，这一幕再度尽收彼得·吉勒姆的眼底。

如今圆场出现了大异于前的步调与气氛。先前仓皇寻找线索——任何线索都行的情势，已告一段落。现在大家能大步迈向单一目标，而非朝四面八方奔去。原本两大家族之间的隔阂也消退得所剩无几，苏联派与黄祸派在康妮与博士联合指导下合而为一，只是双方仍保有个别专长。对掘穴人而言，随后而至的欣喜如同漫漫长征途中发现水源，有时几乎乐得要晕倒路边。康妮只花不到一星期，便查出苏联驻万象的金主身份，这人负责监督汇入万象印支包机公司的款项。这人就是商务波里斯。他的真名是兹敏，退役军人，早年就读过卡拉位于莫斯科近郊的私人培训班。兹敏先前使用史米诺夫的假名。根据记录，六年前他曾担任过金主的角色，对德国驻瑞士某机构付款。在瑞士之前，他也曾用过库斯基的假名出现在维也纳。他也利用第二专长从事窃听与设陷阱的工作。有人说，他曾成功在西柏林利诱法国某参议员，让这位参议员出卖半数法国的机密。山姆的报告抵达伦敦后满一个月，他离开万象。

小唱凯歌后，康妮主动进行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解开卡拉，或他的出纳员兹敏，如何取代横遭拦阻的金棱线。她拥有数个试金石。第一，大型情报机构作风保守，人尽皆知，而且对已知的交易路线紧抱不放。第二，由于相关款项庞大，可想而知莫斯科中心必定渴望迅速更新老旧

的制度。第三，“堕落”前，卡拉让圆场动弹不得；“堕落”后，让圆场躺在脚边无助地喘息，令卡拉志得意满。最后一点很简单，她对这一个主题信手拈来、无所不知。康妮的团队将未经处理的原料聚集成堆。在她多年流亡期间，这些资料被刻意冷落。如今团队大肆翻阅这些档案，修正、商议、绘制图表、追查对照已知情报官的笔迹、忍耐偏头痛、争论、打乒乓球，偶尔在史迈利快速首肯下，以令人痛苦的谨慎进行小心翼翼的实地调查。他们说服了伦敦一位友人，去探访一名专精于海外香港企业的旧识。威普塞街货币交易员对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诚布公。托比是眼光锐利的匈牙利人。圆场的信差与“街头艺术家”军团一度战果辉煌，他是硕果仅存的一员。调查就这样以牛步进行，至少这头牛知道应该往何方前进。狄沙理斯博士以他惯用的疏离态度，走上华侨的路，努力打通印支包机与其难以捉摸的母公司之间年久失修的联机。他的助手与他本人同样异于常人，不是学习语言的学生，就是老而不修的中国通。时间一久，他们集体出现病容，犹如出身同一所阴冷潮湿神学院的院士。

在此同时，史迈利本人也以同样谨慎的脚步前进，惟一不同的是他采取更为狡猾的渠道，走通的门路更多。

他再度从众人视野中消失。这时属于等待期，他等待的方式是先照料其他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务。短暂团队合作一结束，他便退缩回单人世界。白厅看见了他；布鲁斯贝利也看见了；表亲也看见了。有时候，觐见室大门连续深锁数日，惟有黑皮肤的总管法恩获得允许，穿着运动鞋飞进飞出，端着热腾腾的咖啡、一盘盘软圆饼，偶尔是书面备忘录，呈给主子过目或为主子送出。史迈利一向避用电话，如今更是一概不接，除非吉勒姆认为事关紧急——然而没一个重要的。史迈利惟一无法关掉的机器，是直通吉勒姆办公桌的电话，如果史迈利一时兴起，甚至会将暖壶罩套在电话上，以盖住铃响。一有人来电，固定的手续是由吉勒姆接听，说史迈利有事外出，或正在开会，一小时后回电。然后写成字条递给法恩，最后若史迈利认为有需要，会主动回电。他会与康妮相商，有时与狄沙理斯讨论，有时找来两人面议，吉勒姆却不需要在场。卡拉的档案由康妮的研究处转至史迈利的私人保险柜，全数七大本好好保存着。吉勒姆签名取得后送至史迈利办公室，而当史迈利的眼光自办公桌面抬起看见档案时，会默默确认这些档案，伸手向前仿佛在迎接老友。大门再度关上，一过又是数日。

“有消息吗？”史迈利偶尔会问吉勒姆。他的意思是，“康妮有来电吗？”

香港的驻地人员此时撤离，管理组人员希望压下巍安居的新闻，做法却眼高手低，史迈利接获消息时已慢了一步。他立刻调阅库洛的档案数据，再度致电康妮进来磋商。几天后，库洛本人现身伦敦，只待四十八小时。吉勒姆曾在沙拉特听过他的演说，对他甚为憎恶。两三星期之后，老库洛那篇为人津津乐道的报道总算见到天日。史迈利热切细读，然后传给吉勒姆看，这次他总算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解释：圆场有何盘

算，卡拉一清二楚。逆向操作是一项历久弥新的消遣。尽管如此，卡拉好歹也是凡人，大肆烧杀后难免需要休憩。

“我希望他能听到，大家都在说我们死得很难看。”史迈利解释。

这项“装死”手法很快扩展至其他区域，而吉勒姆较具娱乐价值的任务，是确定罗迪·马丁台尔确实得知圆场陷入混乱、令人鼻酸的传闻。

同一时间，掘穴人继续辛勤工作。事后他们称呼这段时间为暴风雨前的宁静。康妮事后说，他们拿到了地图，也知道前进方向，无奈群山横阻，仍需以汤匙来移山。等待期间，吉勒姆请默莉·米金慢慢享用昂贵的晚餐，最后却无明确结果。他陪她打壁球，仰慕其明眸；陪她游泳，仰慕其肉体，而她却以神秘而有所保留的微笑避免与他进一步接触，一面继续掌握他，一面顾左右而言他。

持续无所事事的压力下，总管法恩出现了怪异的举止。史迈利消失时留下他看家，他殷切企盼主子回来，盼得日渐消瘦。吉勒姆有天晚上突然出现在他的小房间，发现他以近似胎儿的姿势伏着，手帕在拇指上如集结音符般缠绕再缠绕，借此弄痛自己，让吉勒姆大感惊讶。

“拜托你行吗？他不是对你有意见啦！”吉勒姆大喊，“乔治只不过暂时不需要你，休息几天罢了。别紧张兮兮嘛。”

然而法恩称呼史迈利为主子，一听有人直呼乔治大名，即以斜眼相待。

这段毫无成果的时期接近尾声时，五楼出现一种新奇的仪器。两名梳着平头的技工提着手提箱进来，花了三天的时间安装完成一部绿色电话，尽管史迈利对电话有偏见，但电话仍装在他的办公室里，线路直通别馆，途经吉勒姆办公室，接连至各式各样说不出名称的灰色盒子，常在无预警情况下嗡嗡作响。这部电话的出现，更加重了众人紧张的心情。大家彼此互问，如果用不上，干吗安装这台机器？

只是，他们用得上。

突然之间消息传出了。康妮发现了什么，她并不多说，但消息如野火般在大楼上下蔓延：“康妮回来了！掘穴人回来了！他们发现了新的金棱线了！他们一路追查出来了！”

追查出什么？追查至什么人？追查的终点在哪里？康妮与狄沙理斯保持缄默。一日一夜来，他们捧着档案进出觐见室，无疑是对史迈利展现两人工作的成果。

随后史迈利消失了三天，事过良久后吉勒姆才得知，“为了扭紧每颗螺丝钉”，他说，史迈利前往汉堡与阿姆斯特丹，与他认识的几位大银行家面谈。这几位绅士先花了很长时间对史迈利解释，战争已结束，他们不可能冒险违反道德伦理，随后仍给了史迈利迫切需要的信息；虽说掘穴人早已演绎出结果，这信息充其量是最终佐证。史迈利回办公室后，彼得·吉勒姆仍不得其门而入，若非受邀至拉康家共进晚餐，这种不上不

下的状况恐将无限期延长。

吉勒姆之所以受邀，完全靠运气。晚宴也是一样。史迈利请拉康午后至内阁府会面，事先与康妮和狄沙理斯准备。在最后一刻，拉康被国会上司召回，因此提议改到他位于阿斯科特街的丑陋豪宅吃个便饭。史迈利讨厌开车，也没有公务车可开。最后是吉勒姆自愿当司机，开自己那辆车窗关不紧的老保时捷送他去。他先为爱车换过地毯，以免默莉·米金答应与他野餐时显得寒酸。前往拉康豪宅途中，史迈利想聊聊天，无奈他并非聊天好手，只是心情空紧张。两人冒雨抵达，走在门阶上脚步凌乱，讨论若出现预料之外的部属时如何应对。史迈利坚持要吉勒姆自己到别处逛逛，于十点三十再回来接人，但拉康夫妇坚持要他留下，美食满山满谷。

“你决定吧。”吉勒姆对史迈利说。

“是啊，当然了。我是说真的，如果拉康夫妇没问题的话，自然可以了。”史迈利气鼓鼓地说完后，两人进门。

因此摆出第四个座位，煮得太熟的牛排已切成小块，有如脱水的炖牛肉。夫人给女儿一英镑，派她骑脚踏车去同一条街再买一瓶葡萄酒。拉康夫人一双棕色明眸温柔动人，金发，脸色红润，结婚时极年轻，初为人母时也极年轻。餐桌太长，不适合四人坐。她请史迈利与丈夫坐一端，另一端则由她与吉勒姆同坐。她问过吉勒姆是否欣赏清唱牧歌，接着开始滔滔不绝地叙述女儿就读的私立学校举行演唱会的过程。她说，学校为平衡收支，收了有钱的外国子弟，结果彻底毁了演唱会。其中半数根本不会演唱西式歌曲：

“我是说啊，那堆波斯人，每个人娶了六个老婆，谁家的小孩希望跟他们一起长大嘛！”她说。

吉勒姆一面与她搭腔，一面拼命收听餐桌对面的会话。拉康似乎同时担任投手与打击的角色。

“首先，你向我陈述想法，”他沉声说道，“你现在就是在陈述想法，非常合情合理。在这个阶段，你只应该画出初步的大纲。传统上而言，大臣只喜欢精简到能写在明信片上的东西。最好是风景明信片。”他说完，拘谨地喝了一小口红酒，难喝。

拉康夫人对事物难以容忍的态度，有一种天使般的纯真，这时她开始发犹太人的牢骚。

“我是说啊，他们连吃的东西都跟我们不一样哪，”她说，“潘妮说啊，他们午餐都吃那种特制的鲑鱼食品。”

吉勒姆再度错过话头，直到拉康提高音量表示警告。

“尽量别扯到卡拉，乔治。我以前要求过你。要开始改说是莫斯科，行吗？他们不喜欢耍个性，任凭你对他的恨意多么公平无私也一样。我也不喜欢。”

“莫斯科就莫斯科吧。”史迈利说。

“又不是说人家不喜欢他们，”拉康夫人说，“他们怎么看就是不一样。”

拉康重提刚才的话题。“你说数目很大，到底有多大？”

“现在还不方便说。”史迈利回答。

“好。不说更诱人。你难道没有恐慌因子？”

这问题史迈利听不懂，吉勒姆也好不到哪里。

“乔治，你的发现，最让你心惊胆战的是哪一点？你在这里担心的是什么，以你监督人的角色来说？”

“英皇殖民地的安全吧。”史迈利经过一番思考后说。

“他们谈的是香港啦，”拉康夫人向吉勒姆解释，“我伯伯当过政治人物的秘书。”她接着说：“至于舅舅嘛，从来没做过什么需要动大脑的工作。”

她说香港还好，只是味道难闻。

拉康脸色变得稍显粉红，略为语无伦次。“殖民地，我的天啊，听见了吗，瓦拉？”他对餐桌另一端大喊，拨冗教育妻子。“钱大概比我们多一半，而且比我现在坐的地方更安全，安全得令人嫉妒。要过整整二十年，条约才会到期，到时候中国要不要接管都还是问题。照这种速度来看，他们应该会舒舒服服看着我们倒下！”

“奥立佛认为我们死定了。”拉康夫人激动地解释给吉勒姆听，仿佛对他承认家私，还对丈夫投以天使般的微笑。

拉康重拾刚才吐露心声的语调，却继续口齿不清地说话，吉勒姆猜他是在对老婆炫耀。

“你不是也想向我强调，就当做是写那张明信片时的附加说明好了，强调苏联如果在香港布下大型情报单位，港府和北京的关系肯定难堪得要命，对不对？”

“在我强调之前——”

“多亏北京宽宏大量，”拉康紧接着说，“英国时时刻刻仰仗着北京才能生存下去，对不对？”

“正是因为这些指控——”史迈利说。

“噢，潘妮，你怎么没穿衣服嘛！”拉康夫人纵声大叫。

她跳下椅子去安抚出现在门口调皮捣蛋的幼女，吉勒姆正好趁机大口喘息。此时拉康则吸足了满腔空气，准备高唱咏叹调。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保护香港不受俄国人入侵。俄国人已经够糟了，我敢说，不过对有些眼光更高的大臣来说，或许还不够糟糕。我们还保护香港，不让北京一气之下动手修理。是不是啊，吉勒姆？话说回来

——”拉康说。为了强调话锋急转，他居然以修长的手掌握紧史迈利手臂，逼得他不得不放下酒杯——“话说回来啊，”他警告着，音量不规则的嗓门下冲后上扬，“我们的上司咽不咽得下去，还是另外一回事哪。”

“我要等到资料获得佐证，才会考虑对他们提出要求。”史迈利尖声说。

“啊，可惜你没办法，对不对？”拉康反驳，改变立场，“你没办法超出国内研究的范围。你没有特权。”

“不先对信息作一番侦察——”

“啊，那又代表什么，乔治？”

“派情报员去卧底。”

拉康扬眉，偏过头去，让吉勒姆不禁联想起默莉·米金。

“谈方法，不是我的专长，搞细节我也不行。你一没钱，二没资源，显然做不出让对方难堪的事。”他再倒一些酒，洒了一些。“瓦拉！”他大喊，“抹布！”

“钱我倒有一些。”

“可惜用途不同。”葡萄酒染红了桌布。吉勒姆在上面撒盐巴，拉康则拉起那一块桌布，以餐巾环抵住桌面，以防亮光漆受损。

随后久久无人出声，只听见红酒缓缓滴落镶木地板的滴答声响。最后拉康说：“在你的权限下，什么可以命令、什么不能命令，完全由你来决定。”

“可以请你写下来吗？”

“不行，先生。”

“能否借重你的权限，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佐证这份信息？”

“不行，先生。”

“可是，你不会阻止我吧？”

“既然我对方法一窍不通，也没必要学习，对你下命令几乎说不上是我的职责本分。”

“可是既然我正式提出——”史迈利开始说。

“瓦拉，快拿抹布来！一旦你正式提出，我就会跟你撇清关系。决定你行动范围的是情报程序小组，而不是我本人。你对他们推销你的想法。他们会坐下来好好听。之后就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了。我只是接生婆。瓦拉，拿抹布来，流得到处都是啦！”

“噢，等着被砍头的人是我，不是你，”史迈利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你是中立的。我很明白。”

“奥立佛才不中立咧。”拉康夫人说。她背着女儿，神情愉悦地重回

餐桌。女儿梳好了头发，穿上睡衣。“他呀，对你偏心得很哪，是不是啊，奥奥？”她递给拉康一条抹布，拉康开始擦拭。“他最近啊，变成了真正的鹰派。比美国人更厉害。好了，跟大家说晚安，潘妮，快说啊。”她将女儿抱到每个人面前。“先是史迈利先生……吉勒姆先生，现在是爸爸……乔治啊，安恩最近怎样？该不会又回乡下去了吧？”

“噢，她一切安好，谢谢你。”

“好吧，那就逼奥立佛答应你的请求。他呀，越来越自大了，是不是啊，奥奥？”

她踩着舞步离去，一面对女儿吟唱自创的睡前曲。

“希弟皮弟在墙外……希弟皮弟在墙内……泊弟佛啪一声掉下去！”

拉康骄傲地看着她离去。

“乔治，你会不会把美国人扯进来？”他装模作样地质问，“那样做才是高招，你也知道。把表亲推进来，你不发一颗子弹，就能带动整个委员会。外交部也会乖乖听你的话。”

“这件事，我宁可自行处理。”

绿色电话，吉勒姆心想，或许本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拉康沉思着，转动把玩酒杯。

“可惜啊，”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可惜。没有表亲，就没有恐慌因子……”他注视着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人物。史迈利双手交缠坐着，闭上双眼，似乎进入半沉睡状态。“而且也没有可信度。”拉康接着说，显然是直接针对史迈利的外表有感而发，“国防部不会为你动一根手指头，这个我可要先告诉你。内政部也不会帮你。财政部不一定，外交部嘛，要看他们派谁去开会，看他们请谁吃早餐。”他再度沉思。“乔治。”

“怎样？”

“不如我派一个代言人给你，帮你讲讲话，帮你起草提案，帮你跨过障碍。”

“噢，这些事我还能处理，多谢你了！”

“让他多休息一点儿。”拉康以震耳欲聋的耳语向吉勒姆建议，这时三人走向车子。“还有，劝劝他，别再穿那些个黑色外套了。那些东西，早跟蓬蓬裙一起过时了。再见了，乔治！明天如果改变心意，希望我帮忙，再拨个电话过来。吉勒姆开车要小心哟。记得你刚喝过几杯。”

两人开过大门时，吉勒姆说了非常无礼的话，但沉思中的史迈利没有听见。

“这么说，是香港喽？”吉勒姆边开车边问。

没有回答，也没有否认。

“这个幸运的外勤是谁？”吉勒姆稍后问，不抱任何得到回答的希

望，“或者只是用来对表亲故布疑阵？”

“我们一点也没有对他们故布疑阵，”史迈利反驳，总算有所反应，“让他们插手，会被他们压得喘不过气。要是不找他们，我们又没有资源。只是很简单的平衡问题。”

史迈利钻回刚才的思绪里。

然而说时迟那时快，隔天他们已准备就绪。

十点，史迈利召开情报活动理事会。史迈利发言，康妮发言，狄沙理斯心浮气躁地动着。他搔抓身体，如同王政复辟时期喜剧里满身虱子的宫廷教师。等轮到他发言时，才以沙哑聪慧的嗓音说话。同一天晚上，史迈利发电报至意大利，是真正的电报，而非仅仅打信号，代码是监护人，副件归至成长快速的档案夹。史迈利写好电报内容，由吉勒姆交给法恩，由法恩神气活现带到查令十字街的夜间邮局。法恩离去时一股郑重其事的姿态，会让人误以为那份暗黄色小表格是他封闭一生中的最高峰。其实不然。在“堕落”前，法恩曾为吉勒姆效力，在布里克斯顿负责剥头皮。只不过，若以实际行动而言，他属于悄声杀手。

5轻松漫步公园

杰里·威斯特贝度假那星期艳阳高照，整个礼拜充满热闹欢庆的气息，久久无法散去。如果伦敦刻意延长它的夏天，众人也可能联想到，杰里也不例外。这里净是后娘、疫苗接种、四处兜售的赛马情报贩子、出版经纪人，以及舰队街编辑；杰里尽管如同厌恶蚊虫般讨厌伦敦，仍欣然昂首阔步，把这一切照单全收。他甚至具有可以搭配羊皮靴子的身份：他的西装虽不尽然出自泽维尔罗西装街，却也无可否认是件西装。孤女口中那件囚衣，是件耐洗的褪色的蓝色西装，是名为“旁查克曼谷快乐屋”的裁缝师只花二十四小时交出的杰作，标签以光芒四射的真丝绣上保证不皱的字样。正午的和煦微风吹来时，西装如布莱顿码头上的裙衫般轻盈飞舞起来。他的丝质衬衫也购自同一家，已经泛黄，带有更衣室的外观，令人联想起温布尔登或亨里国际船赛。他经日晒的肤色虽然来自托斯卡尼，却与他系的板球领带同属英国。这条领带小有名气，如爱国旗帜般在他身上飞扬。惟有眼睛极尖的人方能察觉，他的表情带有某种警惕戒备的神采，而邮局局长史蒂凡诺大妈也曾注意到，直觉上称之为“专业气质”，但不继续追究。有时候，如果他预期需要久候，会带着书包前往，为自己增添一种土包子的风格——惠廷顿7进城喽。

若说他有落脚处，应属位于瑟罗广场的继母住处，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继母的公寓小巧，装饰繁复，堆满了自废屋回收的巨大古董。她涂脂抹粉有如母鸡，像个迟暮美人那样动辄发脾气，经常为了真正或空想出来的过错而咒骂杰里；比方说，抽掉她最后一根香烟，或漫步公园后鞋底拖着泥巴进门。杰里见怪不怪。有时候，他凌晨三四点才回家，却仍不想睡，他会敲打她房间的門，叫她起床，只不过她往往早已清醒。等她化好了妆，穿上饰品过多的晨袍，杰里会请她坐在床上，为她端来特大杯的薄荷甜酒，让她以小爪子抓着，杰里自己则在地板上满坑满谷的垃圾里四处翻找，开始他所谓的整理行李。垃圾山上堆满了一无是处的东西，有旧剪报，有成堆的发黄报纸，有以绿色缎带绑好的契约书，甚至有一双定做的马靴，装上了楦头，可惜发霉变绿。理论上，杰里是在决定是否需要全部带走，但他通常只带个小东西做纪念，引发两人一连串的回忆。举例来说，有一晚他挖掘出他最早期撰写的报道剪贴簿。

“嘿，佩特，这东西可精彩了！威斯特贝可真摘下这家伙的面具！看了心跳加速，对不对？让你热血沸腾了吧？”

“你应该学你叔叔做生意才对。”她反驳，一面极为满意地翻阅剪贴簿。她口中的叔叔是砂石业之王，佩特经常用来强调杉波缺乏先见之明。

另有一次，他们发现杰里父亲杉波多年前的遗嘱副本。“本人杉谬尔·威斯特贝，又名杉波……”与大批账单塞在一起，也有律师寄给遗嘱执行人杰里的书信，全都沾过威士忌或奎宁，全以“我们很遗憾”开头。

“这个嘛，有点出乎意料，”杰里不太自在地喃喃说，但要将信封埋回垃圾山时已经太迟，“塞回那堆旧东西里，没问题吧？”

但她一对靴扣般的眼珠冒出怒火。

“念出来听听。”她以戏剧化的嗓音沉声命令道，两人遂立刻携手漫游在复杂难懂的法律词汇中。为孙子孙女与受过教育的侄子侄女设立的信托，利息归这任妻子终身使用，谁结婚或死亡，本金归谁处置；追加条款则说明要报答他生前领受的好意，也惩罚对他无礼的人。

“嘿，知道他要报答的是谁吗？是恐怖表哥艾崔德啦，就是被关起来的那个！天啊，干吗留钱给他？准会一个晚上花光光！”

追加条款也嘱咐必须照料赛马，否则恐将沦为盘中餐：“位于拉飞特之家的爱马‘萝萨莉’，每年拨两千英镑供马厩用……爱马‘入侵者’目前于都柏林受训，将归我儿杰里照料，两马皆需照料至终老为止……”

老爸杉波与杰里一样，都视马如挚爱。

同样归杰里的还有股票。杰里独得公司股票数百万股。衣钵，权力，责任；继承了一整个世界，任其挥霍。送来了一整个世界，甚至是承诺，然后却扣住不放：“我儿必须依照我在世时建立的经营之道与风格，管理旗下所有报社。”甚至连私生子也榜上有名。两万英镑无条件拨给住在科布姆的玛莉某某人，是为我承认的儿子亚当之母。惟一的问题是，钱柜里空无一物。自从大家长的王国遭清算的那天起，户头里的数字便逐步缩水。后来出现赤字，再度成长为体形冗长的吸血昆虫，每年以多一个零的速度暴增。

“怎样，佩特？”杰里说。初露曙光的清晨四下寂静异常。他将信封扔回垃圾山。“听厌了，对吧，伙计？”他翻身抓了一叠褪色的报纸，是父亲生前最后的智慧财产。他以长年从事报社事业的人员才有的身手，一口气翻阅。“这下子，他没办法到处追小美女了吧，佩特？”纸张沙沙响。“就是没办法定下来，我敢说，他又不是没有努力尝试过。”他转身瞥见床边静坐的小女子，双腿几乎碰不着地毯。他压低嗓门说：“你一直都是他的太太，伙计，他的大老婆。总是为你赴汤蹈火。他告诉过我。‘佩特啊，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他告诉过我。字字不假。站在舰队街朝马路另一边的我猛喊：‘我最棒的一个妻子！’”

“死相。”继母轻声说，突然冒出标准英格兰北部方言，上下红唇接合处聚集了皱褶，宛若外科医生的缝线。“烂死相，他全身每一英寸，都让我痛恨。”两人保持沉默了好一阵子，杰里躺在自己的垃圾堆里，抓弄着额发，她则坐在杰里的床边，两人共同品味着对杰里父亲的一份情。

“当初你应该跟你叔叔保罗学卖石渣。”她叹气说，表达出屡遭欺瞒的女子那份洞悉力。

杰里出国前最后一晚，带着继母上馆子共进晚餐，餐后回到瑟罗广场，她为杰里冲泡咖啡，装在她收藏的赛佛尔全套餐具中仅存的咖啡杯里。这份心意却以灾难收场。杰里不经意将宽厚的食指伸入咖啡杯把

手，把手竟啪的一声轻轻脱落，幸好继母没有察觉。杰里以手心灵巧地捧着杯子，尽力掩饰，然后趁机进厨房换杯子。唉，凡人逃不出上帝之怒。班机在横渡西伯利亚途中，杰里动动脑筋升级至头等舱，等飞机降落在塔什干后，他讶然发现俄国当局在候机楼另一端开设了酒吧。杰里甚感惊讶，认为是自由化的一项明证。他点了大杯伏特加，在外套口袋里摸索着硬币时却找到问号形状的小巧瓷器把手，两端是脱落的痕迹。他再也不碰伏特加了。

在事业方面，他同等地毕恭毕敬，同等地有求必应。他的出版经纪人是他的板球旧识，出身小有来头，眼睛长在额头上，姓孟肯，大家称呼他小孟，是天生傻蛋一个，但在英国社会，特别是出版界，却随时能为这种人提供舒适的空间。孟肯为人豪爽，感情洋溢，蓄了一道灰白的胡须，或许为了暗示他兜售的书皆出自他手。两人在杰里的俱乐部共进午餐。这地方宽敞而污秽，得以存活至今，全赖与更低贱的俱乐部合并之赐，也多亏当地常客不断惠顾。两人低头坐在只有半满的用餐区，在帝国肇建先驱的大理石眼注视下，哀声惋惜着兰开夏欠缺快投。杰里希望肯特能“击中该死的球，小孟，而不是轻轻啄一下”。两人同意，密德塞斯的确引进了几个年轻好手，不过“上帝帮帮忙，看看他们是怎么选人的”。小孟边说边摇头，同时切着盘中餐点。

“可惜你过气了。”小孟大声喊叫，对象是杰里，也是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个人浅见是，最近东方小说没人能写得成功。格林是办到了，如果你看得下去的话，我是看不下去，太多教条了。马尔罗⁸，如果你爱看哲学的话，我倒不喜欢。毛姆倒是可以，在他之前也有康拉德。干杯。能不能恕我直言？”杰里为小孟斟酒。“海明威那一套，你就少写一点吧，什么压力之下乍见风范，鸟蛋都被射穿了还能钟爱世人。读者不喜欢啦，个人浅见。老早有人写过了。”

杰里送小孟上出租车。

“能不能恕我直言？”孟肯又说，“句子写长一点。你们搞新闻的人，一改行写小说，老是写得太短。段落短，句子短，章节也短。你们看文字，是以字段来看，而不是整页来看。海明威就是这样。一直想在火柴盒后面写小说。拖长一点嘛，个人浅见。”

“万事顺心，小孟。多谢了。”

“万事顺心，威斯特贝。代我向你老爸问好。大概过气了吧，我想。谁能不过气呢？”

即使与史大卜总编相处时，杰里也尽量保持同样的开朗；只不过康妮·沙赫斯会说，史大卜是蟾蜍，众人皆知。

新闻人与其他不坐办公桌的人一样，走到哪里，脏乱就带到哪里，而身为集团总编辑的史大卜也无法免俗。他的办公桌散放着沾有茶渍的校样与沾有墨水的茶杯，以及吃剩的火腿三明治，因久放而干燥。史大卜本人坐镇这堆东西之间，对杰里摆着臭脸，仿佛杰里是来清走所有东西的。

“老史，报业之光。”杰里喃喃自语，一面推开办公室门，挨着墙壁站着，双手压在身后，仿佛防止双手乱来。

史大卜咬着舌尖上某种肮脏的硬物，然后重回刚才研究的档案。办公桌一片凌乱。外界对编辑那些老掉牙的笑话，在史大卜身上一一应验。他令人憎恶，双下巴灰白厚重，眼皮沉重，活像以煤灰涂抹过似的。他将一直待在每日版（周一至周五），待到溃疡发作为止，然后上级会派他编辑周日版。再过一年，他会被下放到妇女杂志，接受儿童的命令，直到刑期届满为止。现在的他奸诈狡猾，记者从外面打电话回报社时，他会拿起话筒偷听，不让对话双方知道。

“西贡。”史大卜咆哮，然后以咬烂的圆珠笔在边缘写下东西。他的伦敦口音夹杂了半真半假的鼻音，是加拿大人主宰舰队街时遗留下来的产物。“三年前圣诞节。记得吗？”

“记得什么，老兄？”杰里问，身体仍紧贴墙壁。

“节庆气氛，”史大卜说，面带绞刑官的微笑，“在分社里，气氛热络亲密，那时候本集团还笨到在那边设分社。圣诞宴会，你办的。”他读着档案，“‘圣诞午餐，欧陆旅馆，西贡。’接着你列出宾客名单，因为我们要求你列出。记者、摄影师、司机、秘书、送信人，我懂什么？七十英镑大放送，打着公关和节庆的名号。记得吧？”他紧接着说，“宾客名单包括无毛司妥巫。他到场了，对不对？司妥巫？他的老套是跟最丑的小姐甜言蜜语。”

史大卜等着杰里回答，一面嚼着舌尖上的东西。然而杰里背靠墙壁，准备以全天相待。

“我们是左翼集团，”史大卜说，开始发表他最喜欢的声明，“意思是，我们看不惯猎狐狸的传统，也不准备仰仗不识字的百万富翁施舍。根据记录，司妥巫在金边吃圣诞午餐，对柬埔寨政府名流大献殷勤。我跟司妥巫谈过，他似乎认为他当时的确在场。在金边。”

杰里驼背走向窗边，将臀部靠在黑色旧暖气机上。屋外距他不到六英尺处，有个脏污的时钟，挂在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方，是创办人送给舰队街的礼物。时间是上午九十点钟左右，时钟却指着五点五十五分。马路对面一处门口，两名男子站着看报纸。两人戴帽子，报纸遮住脸孔，杰里想着，若是跟踪的人实际上都作这副打扮，人生该有多美好。

“他那家报纸啊，人人都唾弃，老史，”他静默了稍久，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你也包括在内。你讲的东西，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算了吧，伙计。我建议你，收起来不要管了，最好别碰。”

“还称不上是报纸。是三流报纸才对。说报纸太便宜他们了。”

“我认为是报纸没错，伙计。以前是，以后也一样。”

“随便你，”史大卜叹气道，“欢迎收听董事长语录。”他拿起印刷好的合约表格。“姓名：威斯特贝，杰里，”他语带不屑，假装照着上面

念，“职业：贵族。欢迎杉波老爸的公子。”他将合约扔到桌上。“周日版加每日版，你两边跑，一个礼拜跑七天新闻，从战争到性感秀。没有任期，没有退休金，开销以最低价计算。洗衣钱只限外出采访期间，不可以留一整个礼拜的脏衣服一起洗。给你一张报社电报卡，但别使用。报道写好，空运过来，运货单号码发电报过来，来了之后我们会把稿子插在‘不予采用’的长钉上。进一步款项视文章而定。好心的BBC也乐意采用你的采访录音，稿费照样可笑。董事长说这样有助维持声望，管他讲的是什么意思。至于联合供稿——”

“万岁。”杰里长长吐了一口气。

他从容走到办公桌前，拿起被咬烂的圆珠笔，史大卜的唾液仍未干。他连一眼也不看史大卜，也不阅读合约内容，只在末页底部缓缓以歪斜的笔迹签名，龇牙咧嘴笑得有点夸张。在此同时，一名身穿牛仔褲的小姐仿佛奉命前来阻挠这个神圣的场面，颇为唐突地踢开门，在办公桌丢下一叠新出炉的校样。电话响起，也许已经响了好一阵子，小姐离开，踩着巨大无比的面包鞋，努力保持平衡，极其滑稽。一个有点眼熟的头探进门来，嚷着：“老头的祈祷会，老史！”最后来了一名部属，没过多久杰里便由他陪同，大步走过如养鸡场的报社：管理处、国际新闻中心、社论、薪资、专栏、体育、旅游、不堪入目的女性杂志。陪同的人是现年二十岁的毕业生，蓄有胡子，杰里一路称呼他赛崔克。来到人行道时，他停下脚步，微微摇摆，重心由脚跟移至脚趾，再移回脚跟，仿佛酒醉，或是遭人重击而头昏眼花。

“太棒了。”他喃喃地说，音量之大，令两三名路过的女孩转头瞧，“高明。精彩。厉害。太完美了。”说完，他钻进最近一家酒吧，里面有一群老手杵在吧台上，主要是产业与政治记者聚头，向旁人吹牛说自己差点抢到第五版的头条。

“威斯特贝！是伯爵哪！是那件西装没错！同一件西装！里面包的是早起的鸟儿，天啊！”

杰里一直待到酒吧打烊。尽管如此，他喝得很省，因为他希望保持头脑清醒，以便陪乔治·史迈利到公园散步。

每个封闭的社会必有内圈与外圈，而杰里置身于外圈。在当时，陪乔治·史迈利到公园散步是专业术语，意思是与他秘密会面；或者以杰里自己的说法，为个人命运下个脚注：“纵身跃入另一个更好的人生。”他不常发表个人意见，因为上级严格禁止。要到公园散步，必须以小跑步从某个起点出发，通常是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如最近关闭的科芬园，于六点差几分时徒步抵达指定的目的地。他猜想，在这个时间，圆场人手短缺的街头艺术家看了他背后一眼，宣布无可疑迹象。第一晚，指定目的地是查令十字地下车站的路堤边。当年仍称查令十字，忙乱无章，马路上似乎总会发生怪事。前一晚，目的地是多线公交车的站牌，位于皮卡迪利南边人行道，紧临的是葛林公园。总共要见面四次，两次在伦敦，两次在育成所。沙拉特的课程与情报工作有关——属于强制性的进

修，所有外勤情报员必须定期注册。必须熟记的东西很多，例如电话号码、文字密码与联络程序。例如发给报社的零锁码电报中加入的零锁码字句；例如在远方发生急事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与紧急行动。上级是希望发生在远方。像很多运动员一样，杰里对事实论据过目不忘，考官测试他时也感到满意。受训时，他也练习打斗，结果因背部摩擦破旧的软垫而流血。

在伦敦的会面，一次是非常简单的简报，另一次是非常简短的道别。

接送手法不一，花样百出。在葛林公园，他提着福楠梅森茶行的手提袋作为识别标志，不管等着上公交车的队伍有多长，他微笑着，拖着脚步，优雅地维持在队伍最后段而在路堤逗留不去，他手握过期的时代杂志。在皑皑的背景与斜射的日光下，杂志封面的红字与红框更为醒目。大笨钟敲了六下，杰里数着钟响，然而会面时必须严守的一项规则，是绝不能在整点或十五分时见面，而是在两者之间较为模糊的时段，看在外人眼里较不显眼。秋天的晚上六点是天地变色的时间，英国乡间落叶纷飞的潮湿板球场，气味都随风往上飘，衬托湿沉而残破不全的暮色。杰里以怡然自得的半失神状态消磨时光，不动脑筋地嗅着气味，左眼不知何故紧闭。笃笃挨近他身前的面包车是遍体鳞伤的绿色贝德福车，车顶有架梯子，车身上“哈理斯建筑公司”的字样以油漆盖过，但仍依稀可见。这辆负责监看的老马被拖上草地，车窗以铁网遮住。杰里看见车子停下，开始走向前，司机也同时将一头直竖的头发探出车窗。司机是个先天兔唇、面貌阴沉的男孩。

“威富哪儿去啦？”男孩粗鲁地质问，“他们说威富跟你在一起。”

“只有我一个，你就凑合点吧，”杰里以高昂的兴致反驳，“威富有事要办。”说着打开后门直接爬上车，用力关上门。前方的乘客座位刻意堆满了长方形三夹板，不让他坐。

两人的对话仅止于此。

在早年，圆场仍维持一群编制外的人员时，杰里认为司机一定会和和气气与乘客聊天。现在不一样了。前往沙拉特时，程序大同小异，惟一不同点是，车子蹦蹦前进的十五英里中，如果他幸运的话，司机会记得扔给他坐垫，以防杰里臀部惨遭蹂躏。驾驶座与面包车中段隔绝，杰里驼背坐在木质长椅上，紧抓着把手，但仍不断前后滑动。车外景象，他只能透过车窗铁网边缘的隙缝向外看。透过铁网，能见度有限，然而杰里很快认出沿途重要景物。

至沙拉特途中，他路过陈旧过时、愁云密布的工厂区，活像二十年代白漆涂得拙劣的戏院，以及路旁一家砖造旅馆，以红色霓虹灯广告写着“婚宴备有外膳”。然而他的情绪最为强烈的时候，是在第一个晚上，以及最后一晚，在他前往圆场时。第一晚，当他逐步接近具传奇色彩又眼熟的角楼时，有种心情，一种迷杂而神圣的感觉袭上心头：“为国效忠的真谛在此。”一抹红砖的后面是暗沉的悬铃木枝丫，之后是沙拉特总汇

般的七彩灯光，再走过一座关口，面包车嘎嘎停下。外面有人用力打开车门，他同时听见大门关上，有男人以军士少校的嗓门大喊：“喂，快点动作，拜托你行不行？”是吉勒姆的声音，故意寻他开心。

“哈啰，彼得小朋友，工作怎样？天啊，好冷！”

彼得·吉勒姆懒得响应，只是快速拍打杰里的肩膀一下，仿佛命令他开始赛跑，然后关紧车门，上下加锁，将钥匙放进口袋，以小跑步带他走过一条走廊。这道走廊，雪貂一定大肆翻整过。大块大块的水泥被敲落，露出下面的板条；门与铰链被迫分家；托梁与门楣摇摇欲坠；遮尘布、梯子、瓦砾四处横陈。

“是爱尔兰人来过吧？”杰里高声说，“或者只是开了场不分阶级的舞会？”

他的问题散落在哗啦声中。两人快速向上爬升，彼此不相让，吉勒姆在前半跑半跳，杰里紧跟在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大笑着，四脚踩出隆隆巨响，也在裸露的木阶上摩擦出声。来到一道门前，两人停下，杰里等吉勒姆动手开锁。进了门后，再等吉勒姆重新锁上。

“欢迎光临。”吉勒姆稍微压低嗓门说。

他们来到了五楼。现在他们脚步放轻，不再嬉闹，成了奉命安静的英国部属。走廊往左弯，再弯向右边，然后他们走上狭窄的几个阶梯。一个出现裂痕的凸面镜，又是阶梯，两上三下，最后来到工友桌，没人看守。他们左边是喧闹室，空无一人，吸烟椅大致摆成圆形，壁炉里燃烧着熊熊炉火。由此通往一个长方形房间，铺有褐色地板，标明“秘书处”，其实是前厅，有三名妈妈佩戴珍珠、身穿两件式套头毛衣，凑着阅读灯默默打字。这个房间的另一端又有一道门，紧闭，未上油漆，门把周围非常污秽，没有手污防护板，门锁上也没有盾形盖板。只剩螺丝孔，以及门锁留下的圆形痕迹。吉勒姆没敲门便径自推开，探头进门缝，轻声对房间内说了一些话，接着后退，迅速将杰里推向前，杰里·威斯特贝登场。

“哇，太棒了，乔治，哈啰。”

“对了，别提到他老婆。”吉勒姆以快而柔的音调喃喃向杰里警告，事后在他耳际萦绕了良久。

父子？哪种关系？肌肉配大脑？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养子与养父的关系，在这行亲属是最坚不可摧的一种关系。

“伙计。”杰里低声说，沙哑地笑着。

英国人朋友之间见面时，并无一套打招呼的方式，尤其是在阴沉的公务员办公室里，两人各站一边，想不出什么话题，只见一张木质办公桌。在几分之一秒之间，杰里将他自己板球员的拳头摆在史迈利柔软迟疑的掌心旁，然后缓缓跟在他身后，保持一段距离，走到壁炉边，那里有两张扶手椅等着他们。扶手椅的皮面老旧龟裂，阅人无数。在这个捉

摸不定的季节，炉火在维多利亚式的壁炉里燃烧，但与喧闹室的那盆火比较起来小得多。

“卢卡那地方如何？”史迈利询问，一面以带盖玻璃瓶斟满两杯酒。

“卢卡很不错。”

“那可不妙了，离开时一定很难割舍吧。”

“哪里。很棒。我敬你。”

“随意。”

两人坐下。

“很棒？怎么说呢，杰里？”史迈利询问，仿佛他对“很棒”一词并不熟悉。办公桌上没有文件，办公室空空荡荡，比较像是备用房间，而不像他的个人办公室。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没用了，”杰里解释，“永远被冷冻起来。电报一来，我整个人瘫了下去。我心想，这下可好了，比尔把我轰上半天高了。其他人被轰惨了，我又何尝不惨？”

“对。”史迈利同意，仿佛能感受杰里的疑虑，同时直盯着杰里半晌，明白表现出臆测的神情。“对，对，有道理。只不过，总的说来，看来他根本没机会轰惨临时雇员。有关他的档案资料，每个角落我们几乎全翻遍了，临时雇员的数据归档在‘友好人脉’之下，归类在‘本土防卫队队员’里面，自成一个档案，他无权调阅。并不是说他认为你不够重要，”史迈利很快补充说明，“只是他另有优先处理的事项。”

“那我就放心了。”杰里露齿一笑说。

“那就好。”史迈利没有察觉对方在说笑。他起身斟酒，走到壁炉前，拿起黄铜火钳，开始一面沉思，一面拨动炭火。“卢卡。对，安恩和我去过。大概是十一二年前的事了吧。雨天。”他笑了一下。办公室另一端有个塞满东西的角落，杰里瞥见一张狭长、骨感的行军床，床头摆了一列电话。“我们去过澡堂，我记得，”史迈利接着说，“当时是很流行的疗法。我们去治疗什么，只有上帝清楚。”他再度戳戳炉火，这一次戳得火苗蹿旺，为他圆脸的轮廓涂抹上橙色，厚厚的镜片则形成两湾金池塘。“诗人海涅9在那边有段奇遇，你听过没？一段罗曼史？现在一想，我跟安恩去那里，原因大概就是这个。我们本以为有些过节可以一笔勾销。”

杰里嘟哝了一声，此时不太确定海涅是谁。

“他去了澡堂，泡了泡澡，过程中遇见了一位小姐，光是这位小姐的芳名就让他倾倒，结果还逼自己妻子从此改名。”火苗让他驻足了好一会儿。“你在那边也有一段奇遇，对不对？”

“昙花一现而已，不值一提。”

贝思·山德斯，杰里立即联想到，脑中世界顿时动摇一下，然后自行

站稳脚步。贝思这人，是天生好手。父亲是退役将军，曾任郡长。白厅各个秘密办公室里，老贝思肯定各安排了一个三姑六婆。

史迈利再度弯腰，将火钳立在角落，甚为吃力，宛如献上花圈致哀。“我们不尽然是在跟感情竞赛，只想知道那段情的地位。”杰里不发一语。史迈利回头瞥了杰里一眼，杰里报以龇牙咧嘴一笑，好让他开心。“告诉你好了，海涅的女友，她的姓名是尔雯·玛提德。”史迈利接着说，杰里的浅笑转为别扭的大笑，“没错，用德文发音比较好听，我承认。小说呢？写得怎样了？要是吓走了你的灵感女神，我们可担当不起。我绝对没办法原谅自己。”

“没问题。”杰里说。

“写完了吧？”

“这个嘛，多多少少。”

一时之间四下无声，惟有妈妈们打字的声音，以及楼下街道传来的车流噪音。

“这件事告一段落后，我们会对你有所补偿，”史迈利说，“我坚持。史大卜那边，场面弄得怎样？”

“没问题。”杰里又说。

“不需要再帮你铺路吧？”

“应该不必。”

前厅之外传来脚步声，全朝同一方向前进。杰里心想，是沙盘推演，召集相关部门会议。

“你呢？愿不愿意？”史迈利问，“怎么说才好……你，准备好了吗？有没有意愿？”

“没问题。”干吗老用这三个字？他问自己。死脑筋就是转不过来。

“最近很多人都不愿意。没意愿。特别是在英国。很多人将怀疑视为合理的哲学立场。他们自认中庸，其实啊，他们其实左右不是人。只有旁观者，战争怎么打得赢？这一点，我们这一行的人了解。我们很幸运。我们现在这场战争在一九一七年开打，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没有改变。”

史迈利走到另一个位置，隔着办公室中间与他对站，离行军床不远。在他身后有张老旧相片，颗粒粗大，在重新旺盛的炉火照耀下闪烁。杰里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在气氛紧绷的此刻，他觉得自己受到双重审视：一对眼睛是史迈利，另一对眼睛压在相框玻璃下，模糊不清，在炉火中跳跃。准备会议的声音加倍。他们听见人声与间歇笑声，听见椅子吱吱响。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史迈利说，“好像是历史学家写的。如果不是，至少是美国人没错。我读到的是，有些家族几世代出生在债权人的

监狱里，终生想办法偿债获得自由。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你不觉得吗？我仍然强烈认为自己有所亏欠。你不认为吗？对这个单位，我一直感激不尽，因为这个单位让我有机会偿债。你呢，是不是有同感？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害怕……贡献自己。我这样想，算不算太老套？”

杰里的脸孔紧绷无表情。离开史迈利身边时，他总是忘记史迈利的这一面，回到史迈利身边时想起来已经太迟。老乔治身上有点落魄神父的味道，年纪越大越明显。他似乎认定，整个西方世界对他的忧虑皆有同感，必须接受他的劝诫才能从事周到的思考。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认为我们或许能光明正大地恭喜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老套——”

杰里听够了。

“伙计，”他笨拙地一笑，脸色涨红，以规劝的语气说，“看在老天分上。你说个字，我一定照办。行吗？扮猫头鹰的人是你，不是我。告诉我怎么做，我一定遵命。这世上到处都是文弱的知识分子，想轰掉自己鼻子，脑袋里却有十五条互相矛盾的论点禁止自己动手。我们不需要再制造一个这种人。行吗？我的意思是，拜托。”

门上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宣布吉勒姆再度出场。

“主子，长烟斗全点燃了。”

让杰里诧异的是，在吉勒姆开门说话的时候，他似乎隐约听见“大情圣”一词，指的是他或是诗人海涅，他无法判断，也不特别在意。史迈利犹豫着，皱着眉头，随后回过神来，注意到周遭。他瞥了吉勒姆一眼，然后再度看着杰里，再将视线投注在两人中间的地方。英国学术人士专门以这种眼光看人。

“这样的话，好吧，我们开始为时钟上紧发条。”他以退缩的嗓音说。

三人列队走出办公室时，杰里歇脚欣赏墙上照片，双手插在口袋里，对着照片龇牙咧嘴笑，希望吉勒姆也能歇脚。吉勒姆果然停下。

“看来像是他吞下了自己最后一毛钱，”杰里说，“是谁啊？”

“卡拉，”吉勒姆说，“是他吸收比尔·海顿的。俄国间谍。”

“听来像女生的名字。怎么取的，知道吗？”

“是他第一个情报网的代号。有一派人士认为，卡拉是他一个女朋友的名字。”

“取得好啊。”杰里漫不经心地说，仍保持浅笑，轻步走向他身边，朝喧闹室的方向走去。史迈利或许有心，刻意走在前头，离开两人谈话的听觉范围。“还跟那个神经女孩在一起吗？那个吹笛子的？”杰里问。

“没以前那么神经了。”吉勒姆说。两人再走几步路。

“跑掉啦？”杰里以同情的口吻询问。

“差不多。”

“他呢？还好吧？”杰里随便一问，对着前方独行的人点头，“吃得好、穿得暖吧？”

“比以前都还好。为什么要问？”

“只是问问而已。”杰里说，口气非常愉悦。

到机场后，杰里打电话给女儿猫咪。他很少打电话给女儿，但这次非打不可。投币之前，他就知道不该打这个电话，但他坚持不放手，连熟悉至极的前妻嗓音也无法阻止他。

“哇，哈啰！是我啦。太棒了。飞利还好吧？”

飞利是她的丈夫，公务员，几乎到了可以领退休金的年龄，只不过比起杰里少了三十年奋斗的岁月。

“好得很，谢谢你关心，”她以冷若冰霜的口气回敬，这是前妻捍卫新任丈夫惯用的语气。“你打电话，想问的就是这个？”

“这个嘛，我其实是想跟小猫咪聊聊啦。要到东方去一趟。又开始卖命了。”他说。他觉得自己应该道歉。“因为报社想派人过去写东西。”他说，然后听见听筒触及门厅柜子的声音。橡木柜，他记得，柜脚呈螺旋卷。是老爸杉波遗留下来的东西之一。

“爸爸？”

“嗨！”他嚷着，仿佛电话线路有问题，仿佛她的声音让他措手不及。“猫咪？哈啰，我寄给你明信片之类的东西，你收到了吗？”他知道女儿收到了。每周一信里，女儿定期感谢他。

杰里只听见声声“爸爸”，尾音上扬。他以快活的口吻问，“你还收集邮票吧？可惜我要走了，去东方。”

扩音机宣布即将登机的班机，也宣布已经降落的班机，来来去去的世界都在变换位置，惟有与女儿通话中的杰里·威斯特贝，在人潮中不退。

“你以前集邮集得很疯嘛。”他提醒女儿。

“人家都十七岁了。”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改收集什么了？给我猜。男生！”他以最具机智的幽默维持对话进行，一面将重心由左边羊皮靴移向右边，如舞蹈一般，自顾自地讲笑话，也开自己女儿的玩笑。“是这样的，我想寄给你一些钱，布拉罗尼银行在处理，是生日加圣诞节的红包，最好先跟妈妈讨论怎么花。跟飞利讨论也行。什么？他做人真不错，对不对？你就饶了飞利吧，那种事他有时候看不太开嘛。”他打开电话亭门，制造匆忙的假象。“可惜宣布要登机了，猫咪，”他大声咆哮以盖过嘈杂声，“好了，你自己要小心哟，听到没？注意安全。别太轻易把自己送给别人。我说的意思你懂吧？”

他在酒吧排队排了一阵子，但到最后关头，内心里的东方好手却清醒过来，因此走向一旁的自助餐厅。下次再喝到新鲜牛奶，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了。排队时，杰里感觉有人在看他。不值得奇怪，在机场，大家都在看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想起了孤女，但愿自己在离开前有时间再找个女人，只为冲淡不得不分离时那份苦涩的回忆。

史迈利走着，矮胖的身形包裹在雨衣里。比杰里更具格调的社会记者，以敏锐眼光观察行走于查令十字街邻近地区的史迈利，必能立即辨识出这种类型：身穿防水衣潜伏于公园的寻芳客，或是流连桑拿浴与色情书店的色狼。长途跋涉近来成了他的习惯。凭借他近日泉涌的精力，可以不知不觉走完伦敦大半街道。从圆场出发，在摸熟了小路之后，有二十条路线供他选择，随便一条都不会有任何一段重叠。选好了起点，他会任凭运气与本能带路，让另半边的心思在灵魂偏远地带进行掠夺。然而这晚的路程具有拉力，冥冥之中带他往南、往西走，而他也不加抗拒。空气潮寒，飘在冷冽的雾气中，终日不见日光。他一面走，一面随身携带自己的小岛，岛上堆满了影像而非人物。白墙有如披在身外的另一件斗篷，将他包围在自己的思绪中。在门口，两名身穿皮外套的杀人犯低声交谈着；在街灯下，有个黑发男孩气冲冲地抓着小提琴盒。在戏院外，等候入场的群众接受头上布篷照耀而下的灼热强光，包围身边的雾气如同浓烟。所知的如此之少，期望得到的却如此之多，是史迈利上战场时从未碰到过的状况。他感觉前有引诱，也感觉后有追兵。然而他疲倦时，暂时向后退一步；考虑自身的逻辑时，几乎找不出逻辑可言。他转头一看，看见了败仗之影张开血盆大口等候。他往前瞭望，透过沾满湿气的镜片，看到远大希望形成的幻影在浓雾中舞蹈。他眨眨眼望向四周，知道这里没有他要的东西。然而他在没有百分之百笃定的情况下挺进。重温来时路，也无法获得答案：俄国的金棱线，卡拉私人大军的足迹，海顿彻底清除对这两者的所知。超出这些外在因素范围之外，史迈利在内心理出更黑暗的动机，模糊的程度也无限大，连他自己的理性也不断排斥。他称之为卡拉。事实如此，在内心深处，如同光环退尽的传奇般，仇恨的余烬未熄，仇恨的对象是一心希望摧毁他私人信仰殿堂的人，尽管殿堂已倾颓得所剩无几。这人一心想摧毁他热爱的单位，他的朋友，他的国家，对人间事物合理平衡点的概念。事实如此，在恍若前世的过去，史迈利与卡拉的确曾对坐于铁桌两边，只不过当时史迈利没有理由知道他面对的竟是自己的命运。在莫斯科，卡拉是待宰的羔羊；史迈利试着想引他投奔西方，而卡拉保持沉默，宁可一死，宁可承受更坏的下场，也不愿轻易投诚。事实如此，如今偶尔回想起当初见面的经过，回想起卡拉满脸胡子，回想起那双机警深沉的眼睛，这时往事宛如从他小房间的混沌中窜出的幽灵，指责着他，烦得躺在床上的他辗转难眠。

然而仇恨，这种情绪他无法维持太久，除非是敬爱的反面情绪。

他逐步接近切尔西的国王路。由于靠近河边，雾气更显浓厚。球状的街灯悬挂在头上，犹如中国灯笼挂在无叶的树枝上。往来车辆稀疏谨

慎。过街后，他一路循人行道走，最后转进贝瓦特街，走进一处死巷，三面是雅致的排屋，正面平坦。他现在压低身段行走，靠着西边，挨着停靠路边车辆的阴影前进。现在是喝鸡尾酒的时间（晚餐前，下午四至六点），他看见其他窗户内有交谈中的头，也有无声尖叫的口。有些他认得出，有些她甚至取了绰号：腓力猫，麦克白夫人，河豚。他来到与自家平行的地方。回来之前，她请人将百叶窗漆成蓝色，如今仍是蓝色。窗帘打开着，因为她讨厌被关在里面。她独坐书桌前，也许刻意为他编写了这个场景：美丽而细心的妻子，忙完一天家事后，照料着收支大计。聆听着音乐，回音飘荡在雾中，传进他耳里。西贝流士。音乐他不在行，但她所有的唱片，史迈利都能如数家珍，也数度出于礼貌而称赞西贝流士的音乐。他看不见留声机，却知道摆在地板上，是她与比尔·海顿偷情期间为了情夫而改放在地板上的。他纳闷的是，德文词典是否摆在留声机旁，德文诗集是否也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她几度表现出学习德文的意愿，通常是在求和的期间，如此史迈利就能够朗诵德文诗给她欣赏。

在他旁观下，她起身，走到客厅另一边，停在漂亮的镀金镜前整理头发。她写给自己的备忘纸条夹在镜框里。这次写了什么？他纳闷。丢垃圾。取消和麦德林的午餐。消灭屠夫。有时候情势紧绷时，她会以这种写法寄信给他：逼乔治微笑，为粗心之过虚情假意道歉。情势大乱时，她写给他完整的信，通过邮局寄给他，好让他收藏。

让他惊讶的是，她已经熄灯。他听见前门的门栓滑动。别麻烦了，他不自觉地想。班罕锁要锁两次。门栓和固定门栓的螺丝钉都一样不牢靠，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同样怪异的是，他竟假想她不会插上门栓，以免他万一回来。接着浴室灯亮起，他看见窗上映出她身体的轮廓侧影，以天使般的动作，将双臂伸展至窗帘，几乎将窗帘拉到身前，停止动作，一时之间他担心已经被她看见，后来才想起她近视，而且拒绝戴眼镜。她准备外出，他心想。她准备好好打扮一番。他看见她的头半转过来，像是有人对她说话。他看见她嘴唇在动，双手再度伸起时淘气一笑，这一次伸向颈后，开始解开家居长袍最上面的纽扣。在此同时，窗帘间的缝隙被他人不耐烦的双手骤然合起。

不妙，史迈利无望地心想。拜托！等我走了以后再关嘛！

他站在人行道上，有一分钟之久，或许更久，以不敢置信的眼神盯着漆黑的窗口，直到怒气、羞耻心以及自惭形秽，三种情绪同时爆发，有如肉体上的痛楚，他转身，盲目地快步往国王路走去。这一次是谁？又是嘴上无毛的芭蕾舞者，表演着某种自恋仪式？是她那个丑陋的亲戚，那个终生混政治圈的人？还是从附近酒吧钓上的一夜情美男子？

外面的电话铃响时，彼得·吉勒姆独坐喧闹室里，略有醉意，对默莉·米金的肉体，也对乔治·史迈利的归来同样充满渴望，因此而意志消沉。他立刻拿起话筒，听见法恩的声音，气喘不已，怒发冲冠。

“我跟丢他了！”他大喊，“他把我甩掉了！”

“你啊，一个天大的白痴。”吉勒姆语带满足地讥讽。

“才不是白痴！他不是要回家吗？跟往常一样。我在等他，我站在一边，他走回大街，看着我。把我当做粪土一样。只是粪土。结果一下子，我就孤零一个人了。他怎么做到的？他上哪里去了？我是他的朋友，不是吗？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可恶的矮冬瓜胖子。看我宰了他！”

吉勒姆挂掉电话时仍大笑不已。

6除霜10行动

香港又逢周六，但台风已为人淡忘，白天热如火炉，晴空万里，令人喘不过气。在香港俱乐部，静如基督徒的时钟敲了十一下，清脆的钟响在木板装潢的静谧中，宛如汤匙掉落在远方厨房地板上。较佳的座位，已由正在阅读上周四《电讯报》的人占据。报纸刻画出祖国道德与经济沉沦的景象，愁云惨雾。

“英镑又贬到谷底了，”苍老的嗓音咆哮着，仍咬着烟斗，“水电工罢工。铁路局罢工。飞行员罢工。”

“谁在上班？问题是这个。”另一人附和，嗓音同样苍老。

“如果我是克里姆林宫，我敢说我们的成绩一定最杰出。”刚才发言的人说。最后三个字用力吼出，以增加军人的愤慨意味。他叹了一口气，点了两杯无甜味的马丁尼。两人的年龄都不超过二十五，然而身为远走他乡、寻求快速致富的爱国人士，岁月不饶人的速度相当快。

外籍记者俱乐部这天气势不足，一般民众的数目压过新闻工作者。没有老库洛的召集，上海保龄球员已纷纷离去，其中几人甚至已离开殖民地。由于雨季已结束，摄影记者眼看激烈战事可望再起，因此被吸引至金边。牛仔到曼谷，期待学生暴动再起。陆克在分社里，侏儒老板一肚子火，驼背坐在吧台旁，四周都是嗓门洪亮的英国郊区人，身穿深色长裤与白衬衫，大谈汽车经。

“不过这次要凉的。听到了吗？冰冰凉凉的，快快端来！”

连摇滚客都沉默不语。今早夫人陪他前来。他的妻子从前在婆罗洲的圣经学校教书，是个干瘪的悍妇，头发扎了个髻，脚上穿的是及踝短袜，眼睛敏锐到能在别人犯下罪过前察觉出来。

市公交车三毛钱，一票到底，在据说是全地球人口最密集的本地，从云景道搭公交车往东两三英里，来到北角，是市区往山顶扩张的地点，在名为七A的高楼群十六楼，杰里·威斯特贝正躺在弹簧床上。他刚才小睡一阵，没有做梦。现在他顺着《迈阿密日出》的曲调，唱着自创的歌词，欣赏着一位漂亮小姐脱衣服。弹簧床长达七英尺，最初的用意是让华人一家横躺，但杰里直躺正好，是他一生中首度睡觉时脚丫不必悬空。这张床比佩特的小床多了一英里长，甚至比他在托斯卡尼的床还长，只不过在托斯卡尼时，不够长并不要紧，因为他有个女友相依偎，与女友同睡时，身体不必躺直。相形之下，他眼中的这位小姐身影映在他对面的窗框里，距离他有数英里之遥。在此地起床的九个清晨，每天早上她都以这种方式脱衣洗澡，让杰里看得兴致勃勃，甚至报以掌声。幸运的时候，他全程欣赏，从她偏头让黑发垂至腰际，到优雅地以床单裹住身体，重回隔壁房间，尽收眼底。她的十人大家庭就住在隔壁。他对这家人了如指掌。他们的沐浴习惯，他们在音乐、烹饪与做爱方面的嗜好，他们的兴高采烈，他们激烈而凶狠的争吵。杰里惟一不确

定的是，不知道她是两个女孩或是一个。

她离开后，杰里继续歌唱。他兴致高昂，每回行动前都有相同的感受，无论是在布拉格潜行暗巷，向站在门口、吓得不知所措的老百姓交换小包裹，或是在最出神入化的时刻，以临时雇员前所未有的英勇态度，划着颜色深沉的小艇，将无线电报务员从海滩抬走。情势一紧张起来，杰里发现自己有办法发挥同样的潜能，令自己暗暗称奇，也发现同样的欢乐感，同样的警觉心，还有同样想令人号叫的恐慌感。不尽然矛盾。他心想，就是今天了。好日子告一段落。

这里有三个小房间，全部铺上镶木地板。每天早上，他最先注意到的就是镶木地板，因为家具几乎付之阙如，仅有弹簧床，厨房椅，摆放他的打字机的餐桌，一只晚餐盘，充当烟灰缸倒也恰当。另外也有俏女郎的古董月历，年份是一九六〇，主角是红发美女，风姿早已过时。这一型，他最清楚不过了：绿眼珠，脾气大，皮肤敏感，每回以手指碰到，就变得像战场一般。加上一部电话，一台古老的唱盘，只能播放七十八转的唱片。两支如假包换的鸦片烟斗，挂在墙上如办公室的挂钩上。零零总总加起来，等于是寻死匈奴的全数家当与嗜好。寻死匈奴人在柬埔寨，杰里向他租来这间公寓。还有一个书包，他自己的，放在弹簧床边。

唱片播完了。他快乐地站起身来，将应急用的纱笼围在腰间，这时电话响起，因此他又坐下，抓住松紧带，将放在地板另一端的电话机拉过来。和往常一样，又是陆克，想找人陪他玩。

“对不起了，伙计。正在赶稿子。你自己打牌吧。”

杰里按了电话报时，先听到中文报时，再听到英文报时，调整自己的手表，精准到一秒不差。然后他走到留声机前，再播放《迈阿密日出》，音量开至最大。这是他仅有的唱片，却能压过没用的冷气机的闷呼声。他仍在哼歌，拉开惟一的衣橱，从底下一只古老的小皮箱里拿出父亲发黄的网球拍，是一九三〇年前的古董，球拍柄上以墨水注明父亲的姓名缩写SW。他扭开球拍柄，从凹洞里捞出四卷超小型底片盒，一团蠕虫状的灰色填絮，以及一架超小型照相机，附有测量链。沙拉特官僚逼他使用的那种较花哨的机型，个性保守的他比较不喜欢。他将卡式底片盒装进相机，调整底片速度，对准红发美女的胸脯拍了三张调光，然后拖着凉鞋走进厨房，以虔诚的姿势跪在冰箱前，松开“自由佛瑞斯特”板球队的领带。冰箱门关不拢，因此以领带绑住。在粗暴的撕裂声中，他以右手拇指伸进冰箱边缘破烂的橡皮条内，取出三颗鸡蛋，再绑紧领带。他一面等着鸡蛋煮熟，一面倚在窗口，手肘靠着窗台，以喜悦的眼神望着防盗铁丝网外的世界。防盗铁丝网设在他心爱的屋顶，往下垂的态势活像偌大的踏板，方便人一跃而至海边。

屋顶建筑自成一个文明世界，是令人屏息的剧场，演出扰攘城市里求生存的大戏。在带刺铁丝网包围的综合住宅区里，血汗工厂制造出风帽夹克，有的举行宗教仪式，有的打麻将，也有算命师在焚香并参考巨

大的褐色书籍。他眼前有座英式庭园，填满了走私进口的泥土。楼下有三名老妇养肥的松狮犬幼犬，准备下锅。有舞蹈班，有阅读班，有芭蕾舞班，有休闲娱乐班，也有武术班，还有传授文化、传授共产党奇迹的补习班。而这天早晨杰里煮蛋期间，一名老人做完了冗长繁琐的早操，接着打开小巧的折叠椅，读着每日必读的《毛主席语录》。家境稍好的穷人，如果没钱盖屋顶，会自行搭建摇摇晃晃的乌鸦巢，两英尺宽，八英尺长，搭建在固定于客厅地板上的自制悬臂梁。寻死匈奴信誓旦旦，这里经常传出自杀事件。他说，这是让他着迷此地的原因。寻死匈奴自己没跟人上床时，喜欢托着尼康相机探出窗户，希望捕捉到交媾的镜头，却从来没拍到。右下方躺着一片墓园，寻死匈奴说墓地招霉运，硬是与房东讨价还价，房租压低了几块钱。

他享用鸡蛋时，电话再度响起。

“赶什么稿子？”陆克说。

“湾仔妓女绑走了大牛，”杰里说，“绑到昂船洲等着收赎金。”

打电话的人除了陆克之外，通常是寻死匈奴的女人，她们找不到匈奴，却不肯要杰里。淋浴间没有防水帘，因此杰里不得不蹲在铺有瓷砖的角落，像个拳击手，以免弄湿整个浴室。他回到卧房，穿上西装，抓来面包刀，从卧室角落开始数着木板。数到第十三块后，他以刀锋挖起，底下有个掏空的凹穴，黑如柏油，平放的是一只塑料袋，装有一卷面额大小不一的美钞，一份逃命用的护照、驾照与航空卡，姓氏沃瑞尔，职业为承包商。此外也有一个小型武器。杰里违反圆场每项大大小小的规定，向寻死匈奴购来，因为寻死匈奴远行时不喜欢带在身上。从这个藏宝箱里，杰里抽出五张百元大钞，其余一碰也不碰，然后盖上木块。他将相机与两盒备用胶卷放进口袋，走上狭小的门口，吹着口哨。他的前门有涂上白漆的铁架子守卫着，能抵挡技巧尚可的窃贼九十秒。有天杰里无聊，自己撬开锁，就花了九十秒。他按下电梯按钮，抵达时站满了华人，全数下电梯。每次都一样。杰里身材太高大，太丑太洋，他们无法接受。

杰里一面走上漆黑一片、前往市区的公交车，一面努力保持愉悦的心情，心里想着，圣乔治的子民就是从这样的场面出发，卖命解救大英帝国。

在反跟踪方面，育成所耳提面命的座右铭是“有准备必定有所收获”。

有时候，杰里变成典型而纯粹的沙拉特人。依照寻常的逻辑，他大可直接前往目的地。他绝对有权这么做。依照寻常的逻辑，他绝对没有理由不直接搭出租车到前门，特别是他昨晚一夜狂欢后，没理由不欢欢喜喜、大摇大摆走进去，扯住刚拜把兄弟的胡子，两下解决。可惜现在无法依照寻常逻辑来办事。以沙拉特流传的轶事来说，杰里正走上情报行动的不归路，步出后门，门轰然关上后，无法回头，只得往前走。这时二十年来学习到的情报手法一一浮现，对他大呼“当心”。如果他正

要走进陷阱，此处就是设下陷阱的地方。就算他们事先知道这条路线，定点盯梢人会在他前头布桩，躲在车上，躲在窗户里，跟踪团队也会锁定他，以防失误或他临时更动路线。若说跳水前有最后机会试试水深，现在就是机会。昨晚在酒吧附近，可能早就有一百名当地的跟踪天使在监视他，而且还无法确定是否跟对了目标。然而到了这个地步，他能够以蛇行的方式数出跟踪的人影。就在这里，至少理论上而言，他有机会知道。

他看了一下手表。正好还有二十分钟，即使是以华人而非欧洲人的步调来算，他只需要七分钟。因此他漫步前进，却绝算不上步伐闲散。若在其他国家，几乎在除了香港之外的每个地方，他给自己的时间会长得更多。沙拉特的口传轶事指出，在铁幕内，最好花上半天或者更久。他会寄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以便能在马路上走到一半，忽然在邮筒前停下，调头往回走，察看慌乱的脚步，察看骤然偏头的脸孔，寻找典型的分组，这边有两人，马路对面有三人，前方是徘徊不去的前哨。

然而矛盾的是，虽然这天上午他一头热地履行步骤，内心却知道自己是在浪费时间，知道西方欧洲人住在东方时，可能在同一街区住了一辈子，却对门阶上神秘的声响毫无概念。熙来攘往的街道上，每次他一转进街角，总有男子在等候、闲荡、观望，费尽心机摆出什么也不做的姿态。乞丐会忽然伸展双臂打哈欠。跛脚擦鞋童会向下直击他的双脚，没抓中，便会并拢两只鞋刷背面，敲打出声。贩卖跨种族色情书报的老姬，会一手合成杯状，对着头上的竹竿鹰架尖声呼出一个字。这些人物景象，虽然杰里一一记录在脑海里，今天却如同初抵东方时一般模糊不解。二十年了吧？愿上帝保佑我们，二十五年了。皮条客？同性恋的男孩？推着糖果纸卷兜售毒品的摊贩：“黄色两元，蓝色五元，要不要？你爱追龙吗？爱快爽吗？”或者是坐在对面小吃摊，点着一碗米饭的人？在东方啊，伙计，想生存，就要弄清楚原本不知道的东西。

他正善用店面的大理石覆面的倒影。店面橱窗里摆了琥珀、玉饰，有信用卡标志，电子用品，以及黑色行李箱。这种行李箱堆积成金字塔，但似乎从来没看到有人提过。在卡地亚，小美女将珍珠放在天鹅绒浅盘上，让它们就寝。她察觉到杰里的存在，抬眼看人。尽管杰里心事重重，内心的亚当仍蠢动一下。但她只看了一眼杰里磨磨蹭蹭的浅笑，寒碜的西装，羊皮靴子，就得到了她所需的全部信息：杰里·威斯特贝不是潜在顾客。经过书报摊时，杰里注意到刚开打的战事消息。中文报纸头版刊登的相片，包括夭折的儿童、哭天喊地的母亲，以及戴着美式头盔的士兵。究竟是越南，或柬埔寨，或韩国，或菲律宾，杰里无法分辨。标题的红色中文字体，制造出血溅头版的效果。也许寻死匈奴走运了。

昨晚酒喝多了，杰里这时感到口渴，推开华人，钻进灯光昏黄的船长酒吧，但他只进男士洗手间喝自来水。走回大厅后，他买了一本《时代》杂志，却因不喜欢便衣守门人盯着他的眼神而离去。他再度走进人群，漫步往邮局前进。邮局于一九一一年落成，已闲置多年，但此时却

是稀有而狰狞的古迹，在笨拙的钢筋水泥高楼之间显得美轮美奂。随后他小跑穿越拱门，走上毕打街，穿过绿色波浪状的桥下。这里的邮件袋大排长龙，有如火鸡等着上绞刑架。他再度小跑，穿越干诺中心，走上人行天桥，以冲淡跟踪眼线。

在晶亮的钢铁大厅里，有位农妇正以钢刷清理静止的电梯凹槽。在丽海堤岸路，一群华人学生凝神欣赏亨利·摩尔11的双孔青铜雕喷泉。杰里回头看，瞥见旧法院的褐色圆顶，在希尔顿的蜂窝墙下显得矮小。公诉机关威斯特贝，他心想：“囚犯被控罪名包括敲诈、贪污、假示关爱，以及本庭结束前再编造出的其他罪名。”港口船来船往，热闹不已，多数都是小船。更远处是新界，挖掘得坑坑洞洞，被无力地推挤在齷齪的烟雾边。烟雾之下是新建的仓库，以及猛吐黑烟的工厂烟囱。

他往回走，经过苏格兰籍的商业集团，怡和、太古，也注意到铁栅门深锁。一定是假日，他心想。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假日？皇后广场正在举行园游会，气氛轻松，有喷泉，有海滩伞，有可口可乐的小贩，有大约五十万个华人，不是一群群站着，就是拖着脚步与他擦身而过，有如赤脚军团，对他的身材投射眼光。扩音器，建筑钻孔机，哇哇叫的音乐。他穿越昃臣道，噪音分贝降了一度。他前方有片修剪得无可挑剔的英式草坪，站了十五个白衣人。延续整日的板球赛刚开始。在打击区，一个表情轻蔑、身材瘦长的人，戴着过时的帽子，正在调整打击手套。杰里暂歇脚步旁观，浅笑中带有熟悉感。投手投出球。速度中等，略为内偏，死球。打击手以优雅的姿势挥板落空，以慢动作告别球场。杰里预见冗长枯燥的一局，没人鼓掌。他想知道对打的双方是谁，后来认定是山顶常见的那群人自己打自己。球场外，在马路对面，耸立的是中银大厦，占地辽阔，如同凹槽点点的纪念碑，挂满了深红色的口号——爱戴毛主席。银行正门前的花岗岩石狮茫然看守着，两侧有一群又一群的华人，身穿白色衬衫，互相拍照取景。

然而杰里注视的银行，却在投手的手臂正后方。银行顶端竖有大英国旗，一辆装甲面包车大胆停在底部。大门开着，抛光的门面犹如愚人的金子一样金碧辉煌。杰里继续以蹒跚的脚步朝银行前进，采取弧形路径，这时一队头戴钢盔的警卫在佩有猎象枪的高大印度人陪伴下，突然从阴暗的内部出现，怀抱三只黑色钱箱走下宽阔的台阶，仿佛怀中物是天主本人。装甲面包车开走，一时之间杰里看花了眼，以为银行大门随之关上。

不合逻辑。也不是因为紧张。只是一时之间，杰里认为自己可能出现失误，这种屡经历练而造就的悲观态度，如同园丁预见干旱，或是运动员在重大比赛前夕竟笨到扭伤脚踝，又或是具备二十年经验的外勤情报员，预见又将遇上无可预期的挫折。尽管如此，银行大门仍开着，杰里靠向左边。让警卫有时间放松心情，他心想。护送钞票会让警卫紧张，眼睛会变得太敏锐，会记住事物。

转身后，他幽幽缓缓朝香港俱乐部散步而去。威吉伍式门廊，百叶窗，门口可嗅到发霉的英国菜味道。掩饰并不算谎言，他们会告诉你。

掩饰是你相信的东西。掩饰是你的身份。“周六上午，名声并不十分显赫的杰里·威斯特贝先生前往知名社交场所……”来到俱乐部台阶，杰里停住脚步，拍拍口袋，然后转了一圈，刻意朝目的地推进，走完长方形的两个长边，一面再看最后一眼，注意有无乱了节奏的脚步以及忽然往下看的眼神。“杰里·威斯特贝先生发觉身上没带足周末花销的钱，决定到银行跑一趟。”印度警卫将猎象枪毫不经心地吊在肩膀上，了无兴趣地打量他。

“只是，杰里·威斯特贝先生进不去！”

他咒骂自己是大笨蛋一个，竟然忘记时间已过十二点，而银行准时在十二点打烊。十二点后，只有楼上开张，而这正是他事先计划好的部分。

他心想，放轻松，你想得太多了。别想了，做了就是。“最初有行动。”是谁对他说过这句话？老乔治，那还用说吗？是他引述歌德的诗句。不是别人，居然是他说的话！

他开始跑步，一股仓皇之情油然而生，他知道是恐惧感在作祟。他很饿，他很累。乔治为何放他一人单独行动？为何每件事他都必须自己来？“堕落”前，圆场必定会先派遣人马打前锋，甚至会安排某人在银行里，以防万一。他们几乎会在他离开大楼前派迎队来验收成果，也会安排逃命车，以防他离去时过于狼狈。他甜蜜地想着，努力压倒恐惧之心，在伦敦，他们也会逮住亲爱的比尔·海顿吧？将全部转交给俄国人吧？一想到这里，杰里任自己产生一种不寻常的幻觉，快如相机闪光灯，然后缓缓消散。上帝已经响应了他的祈祷，他心想。毕竟已恢复往日光景，街头又因出现阵容浩荡的配角而活跃起来。在他身后，一辆蓝色标致靠边停车，两名壮汉坐在车上研究跑马地的赛马顺序单。无线电的天线，一应俱全。他左边，几名美国夫人漫步经过，拿着相机与观光指南，履行观看的义务。他快步走向银行正门时，里面出现两名表情严肃的银行职员，眼神阴森，希望用来劝退有心询问的人。

老了，杰里告诉自己。伙计，你已经过气了，毫无疑问。老朽、恐惧，逼得你站不起来。他跃上台阶，如同知更鸟在炎热的春日般轻松活泼。

大厅宽敞如火车站，罐头音乐有如军乐。财务组装设铁窗，他看不见潜伏的人，连放哨的幽灵都没有。电梯是个金笼子，里面有个装沙的痰盂供人捻熄烟蒂，但上到了九楼时，楼下的气派已消失殆尽。空间就是金钱。乳白色的狭长走廊，将他带到无人坐镇的柜台。杰里轻松散着步，记住紧急出口与公务电梯。这些细节，老大已事先绘图告知，以免到时必须“鸭子潜水”。他心想，他们资源少得可怜，怎么知道这么多，真奇怪。想必是从建筑师那里挖出设计蓝图吧。柜台上有一面柚木牌子写着“信托部询问处”。牌子旁打开的是一本肮脏的平装书，内容是星座算命，密密麻麻地做了笔记。星期六不一样，柜台小姐不上班。圆场告诉过他，星期六进行最顺利。他高高兴兴地四下张望，没有令人不安的事

物。又一条走廊通往大楼纵深处，左边是一间间办公室的门，右边是覆盖潮湿塑料布的隔间板。隔间板后面传来电动打字机缓缓敲动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打法律文件。杰里也听见华人秘书周六以慢板节奏聊天的声音，只等午餐时间到来，等待没事做的下午。四道光面的门，硬币大小的窥视孔，从里面或外面都可窥视。杰里在走廊上散步，对着每个窥视孔瞥一眼，仿佛这是他的嗜好，双手插口袋，稍显疯癫的微笑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说过，左边第四个，一道门，一扇窗。一名职员走过他身边，接着是鞋跟精致、发出喀哒声的秘书。虽说杰里穿着邋遢，但因为他好歹是穿了西装的欧洲人，两人都没有停下来质问他。

“早安，各位。”他喃喃地说。而两人也回他：“你好，先生。”

走廊尽头设有铁栅栏，窗户也加装铁窗。一盏蓝色夜灯固定在天花板上，他想大概是为了安全吧。到底是为了消防还是保安，他并不清楚，老大并没提过，而搞破坏方面的事务他不常涉猎。第一个房间是办公室，没人，只在窗台上摆放几个布满灰尘的体育奖杯，在木栓板墙上挂有本银行体育社团的刺绣臂章。他走过一堆标了“理事”的苹果箱。里面似乎装满了契约与遗嘱。显然的，老式华人洋行锱铢必较的传统很难改掉。墙上贴了一张告示，“闲人勿进”，另一张是“来宾请先预约”。

第二道门通往走廊，再通往一小间档案室，同样无人。第三道门是“理事专用”的洗手间。第四道门边挂着员工公告栏，也在边框上装了一只红色灯泡，看似来头不小的名牌以专业字体写着：“弗罗斯特，副理事长，来宾请先预约，灯亮时切勿进入”。这时灯并没有亮，而硬币大的窥视孔显示有位男子单独坐在办公桌前，陪伴他的只有一叠档案，以及数卷价值不菲的文件，用绿色丝带绑着，上面有代表英国法律的图样。两台播放股价用的闭路电视机，没开。外面有海港的景观，是高级主管必备的配件，由必备的软百叶窗切割成铅笔灰色的线条。一名油亮、富态的矮小男子，身穿亚麻猎装，颜色是罗宾汉绿，工作辛勤的程度不像是星期六。额头潮湿；腋下出现黑色新月形汗渍。在杰里知情眼中，可看出他行动迟缓，显然是一夜淫乐后精力尚未恢复。

角落办公室，杰里心想。只有一道门，就这道。对方一推，你就进不去了。他对空旷的走廊上下打量最后一眼。他心想，杰里·威斯特贝上台了。如果口才不行就跳舞吧。门一推就开。他快活地走进去，挂出他最拿手的羞涩笑容。

“天啊，老弗，哈啰，太棒了。我是早到还是迟到了？好友啊，外面那堆东西，可真是不得了。在走廊，差点被绊倒了。好多苹果箱子，装满了法律文件。‘老弗的客户是何方神圣啊？’我问自己。‘是考克斯苹果吗？还是贝斯美女苹果？’肯定是贝斯美女，我懂得你这个人。想着想着噗嗤笑出来，因为昨晚在酒吧闹得太疯了。”

说了一大串，弗罗斯特在讶然之余或许觉得摸不着边际，却让杰里得以进入办公室，而且迅速关上门，以宽阔的背部遮住惟一的窥视孔，内心则因如愿滑垒成功而对沙拉特致上感激之情，也向上帝爱人之心致

敬。

杰里进门后，出现了充满戏剧性的一刻。弗罗斯特缓缓抬头，眼睛仍维持半闭，仿佛灯光刺眼，其实灯光可能真的刺眼。他一瞧见杰里，先是眯眼移开视线，接着再看一眼，以确认他是血肉之躯。然后他以手帕擦拭额头。

“老天哪，”他说，“是你嘛。你这个恶心的贵族，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仍站在门边的杰里一听，再度以咧嘴浅笑回敬，举起一手行印第安人礼，一面精准记下令人担忧之处：两部电话、办公室间通讯用的灰盒子、有锁孔却无号码锁的衣柜型保险柜。

“他们怎么让你进来的？我猜你是亮出‘阁下’的头衔吧。闯进来这里，你用意何在？”弗罗斯特口气虽冲，态度却和气。他离开办公桌，蹒跚走过去。“这里可不是什么妓院。这里是家有头有脸的银行。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走到杰里巨大身形前，他双手叉后腰，盯着杰里看，不解地摇摇头。然后他拍拍杰里的手臂，接着戳他腹部一下，继续摇着头。

“你这个爱喝酒、放荡、好色、淫乱的……”

“狗仔记者。”杰里提示。

弗罗斯特年纪未上四十，岁月却已在脸上印下残酷的痕迹，犹如卖场巡视员特别注重袖口与手指，喜欢舔嘴唇的同时皱皱嘴唇。幸好他为人轻松俏皮的一面透明易见，如日光般跃上潮湿的脸颊。

“来，”杰里说，“毒死你自己。”说着递给他一根香烟。

“老天哪。”弗罗斯特又说。他以钥匙圈上的钥匙打开老式胡桃木橱柜，里面贴满了镜子，有一排排鸡尾酒签，插上人工樱桃，也有精巧的有盖单柄大酒杯，画着美女与粉红大象。

“血腥玛莉要不要？”

“血腥玛莉感激不尽，伙计。”杰里回应。

钥匙圈上的钥匙，是黄铜制的恰伯牌钥匙。保险柜也是恰伯牌，高级产品，上面的圆形金浮雕褪色至接近柜子本身的绿色旧漆。

“你们这些出身显赫、作风放荡的人啊，”弗罗斯特大声说，一面倒酒并摇动原料，活像进行化学实验，“你们最知道哪里有好玩的。把你们眼睛蒙住，丢在萨里斯平原，我打赌，三十秒钟一到，你们一定能找到妓院。我这人本性敏感如童男，昨晚受到的打击实在太沉重，动摇了脆弱的根基。随时奉陪！改天我复原了，再跟你要几个地址，要是能复原的话——我很怀疑。”

杰里缓步至弗罗斯特的办公桌前，漫不经心翻阅着他的书信，然后开始拨弄通话盒上的按钮，以偌大的食指一一上下拍动，却没有回音。

另有一个按钮注明“使用中”。杰里按下，看见窥视孔出现玫瑰色亮光，因为走廊亮起警示灯。

“至于那些小姐嘛，”弗罗斯特开口时仍背对杰里，忙着摇动酒瓶，“她们啊真调皮。吓死人了。”弗罗斯特一面欣喜地大笑着，一面朝杰里站立处走去，端着酒杯的两手分得很开。“她们叫什么名字来着？真是的，真是的！”

“一个是小七，另一个是二十四。”杰里心不在焉地说。

他说话时弯着腰，寻找警报按钮。他知道一定在办公桌上某处。

“小七和二十四！”弗罗斯特重复，欣喜若狂，“多么诗情画意！留下多美好的回忆！”

杰里在与膝盖等高处发现一只灰盒子，以螺丝固定在直立式抽屉柜上。钥匙是垂直型钥匙，处于“未锁”的位置。他拉出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

“我说啊，那样的回忆多么美好。”弗罗斯特重复，语带疑惑。

“狗仔记者嘛，你也不是不知道，朋友。”杰里直起身子说，“说到回忆嘛，我们这些狗仔记者啊，比老婆更厉害。”

“给你。过来这边。那边是圣地。”

杰里拾起弗罗斯特的办公桌大记事簿，研究着这天的待办事项。

“天啊，”他说，“忙得很嘛。谁是N啊，朋友？N，八点到十二点？不会是你岳母吧？”

弗罗斯特低头凑酒杯，喝状贪婪，吞了下去，假装噎住了，脸孔扭曲，然后恢复原状。“别扯到她行吗？差点害我心脏病发作，臭小子。”

“N代表的是疯子吗？还是拿破仑？谁是N嘛？”

“娜塔莉。我的秘书。非常正点。两腿向上一路长到屁股去，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自己从没到过那边，所以不知道。我坚持这个原则。记得提醒我，哪天要丢掉这个臭原则。臭小子。”他又说。

“她在吗？”

“刚才好像听到她悦耳的声音，应该在。要不要我叫她进来？据说啊，她对上流人士特别有好感。”

“不用了，多谢。”杰里说完放下记事簿，双目直视弗罗斯特，一人对一人，打起来想必一面倒，因为杰里足足比弗罗斯特高出一个头，体形也比他粗壮得多。

“令人难以相信，”弗罗斯特虔敬地高声宣布，炯炯目光仍盯着杰里，“令人难以相信，就这么简单。”他的举止倾心热衷，甚至表现出占有欲。“令人难以相信的小姐，难以相信的朋友。我说嘛，像我这样的人，干吗跟你瞎混？你不过是个阁下，我的层次可是公爵。公爵和妓

女。今晚再来一次吧。好嘛。”

杰里大笑。

“我是认真的。以童子军的荣誉发誓。在老得动不了前，先死在牡丹花下。这一次我请客，全部我请。”走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知道我想怎么做吗？你猜猜看。我要跟你回流星，要找那个什么名字来着的老鸨，然后我坚持要——你怎么啦？”他瞄中了杰里的神情。

脚步声缓和下来，然后停止。黑影占据了窥视孔，逗留不去。

“他是谁？”杰里轻声说。

“小银。”

“谁是小银？”

“银河啦，我老板。”弗罗斯特说，脚步声也跟着离去，然后弗罗斯特闭上双眼，故作虔诚地画十字。“回家陪他那位非常可爱的娇妻，高贵的银河夫人，绰号大白鲸。六英尺八，留着骑兵的八字胡。不是指我老板。是他老婆。”弗罗斯特吃吃笑。

“他刚才为什么不进来？”

“大概以为我有客户吧。”弗罗斯特随口说，再度对杰里如此警觉感到不解，也不知道为何如此沉默。“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大白鲸闻到他在大白天嘴唇有酒味，肯定会踹死他。开心点嘛，有我照顾你，放心啦。剩下半杯，干了吧。你今天有点保守。让我觉得毛毛的。”

一进到里面，立刻行动，老大说过。别花太多时间摸他底细，别让他跟你称兄道弟。

“嘿，老弗，”脚步声退得差不多时，杰里唤他，“夫人近况如何？”弗罗斯特伸手要接杰里的酒杯。“你太太。她最近还好吧？”

“病情稳定，谢谢你。”弗罗斯特语气不太自在。

“有没有打电话到医院找她？”

“今天早上吗？你疯了不成？十一点以前，我讲话都还语无伦次。要是十一点打过去，也会被她闻出酒味。”

“下一次探病是什么时候？”

“喂。给我闭嘴。别再提她了。行吗？”

弗罗斯特看着他，他则缓步移向保险柜。他试试大把手，锁上了。保险柜上放了一根粗重的警棍，覆满灰尘。他以双手取来，漫不经心地拿来当做板球棒，放回原位，弗罗斯特大惑不解的眼光仍紧跟不放，态度机警。

“我想开个户，弗罗斯特。”杰里仍站在保险柜前说。

“你？”

“我。”

“从你昨晚说的东西判断，你连存钱罐都养不肥吧。除非你显赫的老爸在弹簧床垫里藏了一些。这一点我还是怀疑。”弗罗斯特快站不住脚了，不过他仍竭尽全力站稳。“喂，再喝一杯，别想学科学怪人在下雨的星期三走路，行吗？我们去看赛马。跑马地，我们来了。我请你吃午餐。”

“我其实不是想替自己开户，伙计。我是想开别人的。”杰里解释。

这时上演的是步调缓慢、场面伤感的喜剧，弗罗斯特小脸上的欢乐气息流失，他喃喃地说：“不要，噢杰里。”说给自己听，仿佛正目睹一场意外，遇害者是杰里而非弗罗斯特。脚步声二度从走廊另一端接近。是女生，步伐短促急速。接着是急促敲门声。然后一片寂静。

“娜塔莉？”杰里轻声说。弗罗斯特点头。“假如我是客户，你会不会把我介绍给她认识？”弗罗斯特摇摇头。“让她进来。”

弗罗斯特的舌头宛如受惊的粉红蛇，从双唇间探头偷看，快速看了四周一下，然后消失无踪。

“进来！”他以沙哑的嗓音呼唤，一名高挑、戴深度眼镜的华人女孩从他待发信件夹中取走几封信。

“祝你周末愉快，弗罗斯特先生。”她说。

“礼拜一见。”弗罗斯特说。

门再度关上。

杰里走过办公室，一手搂住弗罗斯特双肩，带着不加抗拒的他快步走到窗前。

“开信托账户，老弗。用你那对不贪不污的手。快一点。”

广场上，园游会持续进行。板球场上，有人出局。头戴过时球帽、身材瘦长的打击手弯腰，耐心修正投手的球路。外野手四处走动聊天。

“你陷害我，”弗罗斯特简单说，拼命想接受被陷害的这个概念，“我还以为终于交到真朋友了，你却想害我。亏你还有爵位。”

“不应该跟狗仔记者鬼混的，老弗。很难搞定，没有体育精神。你当初不应该吹牛的。记录都放在哪里？”

“朋友间本来就可以吹牛的，”弗罗斯特抗议，“朋友本来就这样！无话不说嘛！”

“那就说给我听吧。”

弗罗斯特摇摇头。“我是基督徒，”他傻傻地说，“我每个礼拜天都上教堂，一次也少不了。我恐怕帮不上忙了。我宁愿失去社会地位，也不愿意背信。这是我做人一向的原则，懂吗？我不答应。对不起了。”

杰里挨近窗台，直到两人手臂几乎相碰。大窗框因车流而震动。软

百叶窗沾上建筑工地的红灰。弗罗斯特的脸孔因努力应付个人噩耗而露出令人同情的神情。

“跟你谈个条件，好友，”杰里说，音量非常小，“仔细听我说了。这是萝卜和棍子的问题。如果你不照做，报社会放出对你不利的风声。头版大头照，大横幅标题，正文未完内页待续，六栏，等等。‘你愿向这名男子购买二手信托账户吗？’香港是贪污腐败的化粪池，而弗罗斯特是淌口水的怪兽。诸如此类。我们会跟他们说，你在银行青年俱乐部玩欧洲人的多人变交，像你讲的一样。我们也会说，一直到最近，你在九龙区还筑了个爱巢，可惜因为女的要更多钱，结果不欢而散。刊登出来之前，当然了，他们会先向你们董事长查证，也许还会向你夫人查证，如果她身体撑得住的话。”

弗罗斯特脸上的汗珠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中如暴雨直下。前一秒钟，他面带菜色的五官只见油亮潮湿的模样，如今却被汗水淋个湿透，毫无拦阻地流下他圆润的下巴，落在墨绿色的西装上。

“喝多了，”他傻傻地说，尽量以手帕止汗，“每次喝酒都这样。可恶的气候，我不应该住在这里。没有人应该住在这里。在这里等着烂掉，我最讨厌了。”

“听来不太妙呢。”杰里继续说。他们仍站在窗前，左肩碰右臂，如同两人正在欣赏美景。“好消息是，会有五百美金放进你发烫的小手，由潦倒文人奉送，不足为外人道也，而且推弗罗斯特担任董事长。所以说，为什么不干脆跷二郎腿享受享受？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可否容我请教一下，”弗罗斯特终于开口，希望造成讽刺的效果却弄巧成拙，“查阅此档案，你究竟是想到达什么目的？”

“犯罪和贪污，伙计。牵连至香港。落魄文人街点名了几个带罪在身的人。账户号码四四二。是不是放在这里？”杰里手指保险柜说。

弗罗斯特以嘴唇做出“不是”的形状，却无法出声。

“两个四，然后一个二。放在哪里？”

“喂！”弗罗斯特喃喃地说。他的脸交杂了恐惧与失望，神情绝望。“行行好嘛。别让我做这件事。找个华人职员去贿赂好吗？那样比较妥当。好歹我在这里小有地位啊。”

“老弗，俗话说，在香港，连蒲公英都会乱讲话。我要的是你。你在这里，你的资格比较符合。是放在这个金库里吧？”

一定要持续行动，他们说，一定要不断提高门槛。一旦失去主导权，就休想追回来。

正当弗罗斯特犹豫时，杰里假装失去耐心。他伸出巨无霸的手掌，抓住弗罗斯特的肩膀，将他转过来，往后推，把他的小肩膀抵在保险柜上。

“是不是放在金库里？”

“我怎么知道？”

“我来告诉你好了，”杰里承诺，对着弗罗斯特用力点头，额发因而上下摆动，“我告诉你，伙计，”他重复，一面以另一只手轻拍弗罗斯特的肩膀，“不依的话，四十岁的你，丢了饭碗，老婆卧病，小孩嗷嗷待哺，缴不出学费，大灾难一场。当做是非题，非现在选择不可。不是五分钟后，而是现在。你怎么做，我管不了，只要表面看起来正常，别让娜塔莉知道就行。”

杰里拉着他走回办公室中间，办公桌与电话就摆在这里。人生中有些角色，就是不可能秉持尊严来扮演。弗罗斯特这天扮演的角色正是如此。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数字。

“娜塔莉？噢，你还没下班啊。听好，我还想再待一个钟头，因为正好跟客户通电话。跟席妮说，钥匙就留在金库上，我下班前会锁上。”

他瘫在椅子上。

“头发整理一下。”杰里说。两人等待时，他走向窗前。

“犯罪和贪污个狗屁，”弗罗斯特喃喃地说，“好吧，就算他抄了几条快捷方式好了。哪个华人不是，你举个例子啊？哪个英国人不是？你还以为香港会因为这样倒下去吗？”

“他是华人吧？”杰里说得非常刺耳。

杰里走回办公桌，自己拨了娜塔莉的号码。没人接听。他轻轻扶弗罗斯特起身，带他到门口。

“别锁上了，”他警告，“你离开前，东西还得放回去。”

弗罗斯特走回来。他情绪低落地坐在办公桌前，吸墨纸上摆了三份档案。杰里为他倒了杯伏特加，站在他肩膀旁等他喝下，再解释如何合作。他说，老弗，你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只要物归原处，然后走进走廊，小心关上门。门边贴出员工公告栏，老弗无疑经常查看。老弗应该站在公告栏前，用心阅读告示，一项不漏地看，等杰里从门内敲两下再进门。阅读告示时，他应该刻意站到可遮掩窥视孔的角度，如此杰里才知道他仍站在门口，路过的人也无法窥向门内。如此一来，弗罗斯特也能安慰自己，因为他并未知情渎职，杰里解释。上级，或客户，对他的指控，最严重的不过是留下杰里在办公室，违反银行基本的保密规定。

“档案里有多少文件？”

“我怎么知道？”弗罗斯特问。因为的确不知情，对方这么一问，让他反而口气稍微大胆起来。

“数看看啊，伙计。真乖。”

总共正好五十份，比杰里最乐观的预期多出甚多。尽管防范措施周到，为了预防有人进来搅局，杰里仍有备用计划。

“我也需要申请表格。”他说。

“什么鬼申请表格？我这里不放表格。”弗罗斯特反驳，“表格的话，我都叫小姐送来。这里没有。小姐都回家了。”

“用来在贵银行帮我开信托账户，老弗。放在桌上，动动你的镀金钢笔，表现待客热诚嘛。趁我忙的时候，你就休息一下。头款在这里。”他说。他从后口袋掏出一小叠美钞，扔在桌上，发出悦耳的啪声。弗罗斯特注视着钞票却不伸手取走。

别无旁人时，杰里手脚很快。他将档案夹里的文件解开，两两并排拍照，大手肘贴近身体以防镜头震动，大脚则稍微岔开，以维持重心，宛如板球员准备接地滚球。测量链轻擦文件表面以测距离。不满意时，他会重拍一张。有时候他会以手遮光。他经常转头查看窥视孔是否仍呈现墨绿，以确定弗罗斯特是否仍坚守岗位，而不会趁机叫武装警卫。弗罗斯特一度失去耐性，敲着酒杯，杰里则对他咆哮，叫他安静。他偶尔听见脚步声接近，这时他会将所有东西留在桌上，与美钞、申请表放在一起，将照相机放进口袋，缓行至窗口，欣赏海港景色，拉拉头发，如同思索着人生重大决定。又有一次，碍于手指粗大，情绪紧绷，任务又如此精细，他因此更换胶卷匣，希望旧相机的声响能降低半度。等到他叫弗罗斯特进来时，档案夹再度摆在办公桌上，美钞放进档案夹，杰里感到自己的冷血，稍微动了凶意。

“你这个大笨蛋。”弗罗斯特高声说，一面将五百元喂进有扣的外套口袋。

“没错。”他说。他四下查看，抹清自己的痕迹。

“你少动歪脑筋了。”弗罗斯特对他说。他的表情坚决得出奇，“像他那样的人，你以为整得垮？别想搞垮他们那群人。你不如拿根撬棍、拿盒鞭炮去攻打诺克斯堡，可能比较轻松。”

“大人物先生本人。这个点子我喜欢。”

“别想，你不会喜欢的。”

“你，认识他吧？”

“我们就像火腿和炒蛋，”弗罗斯特口气刻薄，“他的地方，我每天进进出出。我对位高权重的人有股狂热，你也不是不知道。”

“是谁帮他开户的？”

“我的前任。”

“来过这里吧？”

“在我任内没有。”

“看过他吗？”

“在澳门的逸园。”

“什么地方？”

“澳门赛狗场。输得精光。跟老百姓混在一起。我跟我的华人小妞在一起，上一任的前一任。是她指给我看的。‘他？’我说。‘他，没错，他嘛，是我的一个客户。’她厉害得没话说。”弗罗斯特压抑下的表情闪现出从前的本色。“告诉你一件事，他啊，混得还不错。身边的金发妞真不赖。欧洲人。外表看来是电影明星。瑞典人。看来是精心挑选过的。这里——”

弗罗斯特挤出鬼魅般的微笑。

“快一点，伙计。想讲什么？”

“我们谈和吧。好嘛。我们进市区去。花光五百块。你本性不是这样吧？只是为五斗米折腰吧。”

杰里摸索口袋，掏出警报钥匙，放入弗罗斯特被动的手掌里。

“你用得上。”他说。

离去时，有个衣冠楚楚、身穿低腰美式西装裤的苗条青年站在大台阶上。这人正在阅读一本精装书，内容看似严肃，杰里看不出主题。书本才翻到前几页，却阅读得起劲，如同决心增长智慧的人一样。

又成了沙拉特人，其余一片空白。

先别干杯，老大说过。千万不要直接前往。要是无法得手，至少必须破坏线索。他搭出租车，却总是搭至特定地点。到女皇码头，观看乘客登上外岛渡轮，观看褐色中国式帆船穿梭于大船间。到香港仔码头，漫步于观光客之间，看着他们直瞪船民与海上餐厅。到赤柱村沿着公众海滩，看着身体肌肤苍白的华人玩水，和蔼地陪儿女游泳，他们有点驼背，仿佛城市的重量仍压在肩上。中秋节过后，华人绝不游泳。他不知不觉提醒自己，但他一时想不起中秋节是几月几日。他考虑过，把照相机留在希尔顿饭店的衣物寄放室。他考虑过夜间保险柜，也考虑过寄包裹给自己。也考虑利用记者的身份请特别送信人来帮忙。但对他而言，全部行不通。对老大而言，更是行不通。他们说过，这是单独行动。如果不能自行解决就功败垂成。所以他买了塑料购物袋，将相机装在里面，再买两件棉质衬衫充场面。教科书上说，被敌人追得紧时，务必使出障眼法。即使是最老到的监视人也会上当。要是对方朝你动手，你掉了袋子，说不定能拖延一点时间，得以全身而退。他全程对所有人保持距离，最怕不巧碰上扒手。在九龙区的租车场，他们为他准备好了车子。他心情平静——逐渐笃定下来，但警觉心丝毫不松懈。他觉得打了一场胜仗，其余的感觉都不重要。有些差事，做了本就会弄脏手。

他一面开车，一面特别注意本田车。在香港，可怜的跟踪部队爱用本田。离开九龙之前，他两度钻进后街。没人。上了联合道，他加入野餐行列，继续朝清水湾行驶一小时，庆幸塞车严重。在车阵中行驶十五英里，挤在三辆本田车之间，还想变换车道，简直比登天还难。其余工作事项是查看后视镜、开车、抵达目的地、单飞。午后烈日持续发威，冷气开至最大，却感觉不到丝毫凉意。他经过了数英亩的盆栽植物，精

工招牌，然后是如方块花布般的稻田，以及栽种春节应景小树的园地。来到左边一处狭窄的沙巷时，他陡然转弯，查看后视镜。他靠边停车一会儿，打开后车厢，假装要让引擎冷却。一辆豌豆绿的奔驰车滑过，毛玻璃，一名驾驶，一名前座乘客。已经尾随好一阵子了。但并未转入小巷。他过马路到对面的餐饮店，拨了号码，让电话响四声后挂掉，再拨同样号码，响了六声，有人接起时他再度挂掉。他继续开车，笨重地穿越废弃的渔村来到湖边，灯芯草蔓生至离岸甚远处，直立的倒影让它们数目加倍。牛蛙聒噪着，轻型游艇在蒸汽中转进转出。天空呈现死白，直接延展入湖水中。他下车。这时有辆旧雪铁龙面包车颠簸而来，车上有几个华人，戴着可口可乐帽子，鱼饵，儿童；两名男子，没有女人，对他视而不见。他朝一排有护墙板外加阳台的洋房走去，此处年久失修，门前竖立格栅状水泥墙，如同英国海边的房子，但这几栋的油漆因日晒而淡化。名称以制作木船剩下的木块雕刻，以火钳用力烫出字形：浮木、苏丝梅、当若敏。小路尽头有个泊船区，如今已关闭，游艇因此另泊他处。杰里向房子接近，随便看看楼上的窗户。从左边数来第二个窗户，里面摆了一瓶绚丽的干花，花梗以银色纸包裹。这表示一切安全。请进。他推开小栅门，按下门铃。雪铁龙停在湖边。他听见车门用力关上，同时也听见对讲机传出电子仪器操作错误的警报声。

“哪来的杂种？”沙石般的噪音质问，浓浓澳大利亚口音轰隆穿过杂音传来，但门锁这时已应声开启，他一推开立刻看见老库洛身穿和服的粗大身影，杵在楼梯最上层，神情甚为愉悦，以法文称呼他“先生”，以英文叫他“你这个英国贼狗”，催他拖着丑陋的上流臀部上楼，赶紧吞下一杯再说。

库洛的房子弥漫檀香味。底楼门口的阴影中，有位无牙的女佣对着他浅笑。库洛前往伦敦期间，陆克曾对这个小怪物问过问题。客厅在二楼，肮脏的木板装潢墙上贴满了卷曲的相片，都是库洛的老友，是他在五十年疯狂的东方岁月里共事过的新闻工作者。客厅中间有张桌子，上面摆着他身经百战的武器：雷明顿打字机。原本这桌子是供他撰写回忆录的地方。客厅装饰稀疏。库洛一如杰里，六七段人生中的各任妻子儿女散居各地，应付了日常生活当务之急后，钱已不够买家具。

浴室没有窗户。

洗手盆旁有个冲片罐，也摆了几罐定色剂与显色剂。也有一架小型编辑机，有用来查看底片的毛玻璃网板。库洛关灯，在全然漆黑的环境中卖命无数年，又哼又骂又向教宗祷告。站在他身边的杰里流着汗，尽量从老头的咒骂声想像出他的动作。他猜，现在库洛正取出胶卷中的狭长底片，绕上转轴。杰里想像他尽量放轻，以免指纹沾上感光纸。再过一分钟，他会开始怀疑是否根本没拿在手上，杰里心想。到时候，他必须强迫自己的指尖继续动作。他想吐。黑暗中，老库洛的咒骂声显得更吵，却仍盖不过湖上水鸟的啼声。杰里心想他双手灵活，因此放心不少。这事他睡觉都能做。他听见库洛转下盖子时胶木的摩擦声，也听见他喃喃说“上床去，你这个异教小杂种”。随后听到的是干燥而古怪的声

音，是他小心将气泡摇出显色剂的声响。随后安全灯亮起，啪的一声，如手枪发射般响亮，老库洛再度现身，在红光照耀下如鸚鵡般鲜红，弯腰于加盖的冲片罐之上，快速倒进海波，然后充满自信地将冲片罐倒置，再恢复原状，一面看着烹饪用的旧定时器，一秒秒答答而过。

紧张加上炎热，杰里几乎喘不过气，因此单独回到客厅，为自己倒一杯啤酒，无力坐在藤椅上，两眼无神地倾听水龙头持续流水的声响。窗户外传来华人交谈的吱喳声。湖边有两名钓客正在装鱼饵。儿童在一旁观看，坐在尘土上。浴室又传来盖子摩擦声，杰里赶紧跳起身来，但库洛必定听见了，怒吼着“再等一下”并关上门。

航空客机飞行员、新闻工作者、间谍，沙拉特教科书警告着，都属同一种人。可恶的惰性中穿插了间歇发作的慌乱。

杰里心想，他一定先看为妙，以免没冲洗好。依照资格，先向伦敦呈报的人是库洛而非杰里。假设出现最严重的突发状况，库洛会命令他暂时站一边，让他先咬弗罗斯特一口。

“你到底在里面干吗？”杰里大吼，“怎么啦？”

也许是在小便吧，他荒谬地想。

门缓缓打开。库洛一本正经的态度令人畏惧。

“还没洗好。”杰里说。

他以为库洛完全没听到。他其实正准备大声地重复一遍。他准备气得直跺脚，大闹一场。因此当库洛最后终于搭腔时，来得正是时候。

“正好相反，小子。”老头向前一步，杰里这时看得见底片，如湿答答的黑色毛虫吊在库洛身后的短晒衣绳上，以粉红色夹子夹住。“正好相反，先生，”他说，“每幅都是大胆而惊人的杰作。”

7再谈赛马经

在圆场，杰里大有斩获的新闻，于大清早一片死寂之中陆续抵达，之后整个周末因此翻天覆地。先前吉勒姆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前一晚十点便提早就寝，然而却辗转难眠，一面为杰里感到焦虑，老实说也因为脑中浮现默莉·米金的影像，或身穿庄重的泳装，或一丝不挂，令他心痒难熬。杰里在伦敦时间凌晨四点过后即将与弗罗斯特交手。到了三点半，吉勒姆开着保时捷老爷车铿锵穿越雾街开向圆场。若不知时间，会误以为是黄昏。抵达喧闹室后，他发现康妮正在玩《泰晤士报》的填字游戏，狄沙理斯博士阅读着诗人托马斯·特拉赫恩12的冥思，一面抓着耳朵，一面抖着脚，有如单人敲击乐队。法恩与以往一样坐不住，在两人之间穿梭，掸掸灰尘，打扫环境，活像等不及要安排下一批客人入座的领班。偶尔他会透过牙齿吸气，发出“啧啧”声，几乎不掩失望之情。香烟在喧闹室另一端上空形成烟幕，从茶汤壶里可闻到熟悉的陈年茶臭。史迈利的大门深锁，吉勒姆找不到理由去打扰他。他翻开一本《乡村生活》。好像是在等着看牙医，他心想。他心不在焉地坐着欣赏豪宅的相片，直到最后康妮轻轻放下填字游戏，坐直上身，说：“你听。”他听见表亲绿色电话发出急促响声，史迈利随后即接听。吉勒姆的办公室门没关，他瞥见里面一排电子盒，其中一个亮着绿色警示灯，表示对话进行中。随后喧闹室的“友情电话”响起——是内部电话的术语，这一次吉勒姆赶在法恩之前接听。

“他进了银行。”史迈利通过友情电话语带保留地宣布。

吉勒姆传话给在场人士。“他进银行去了。”他说，但这话如同说给死人听，因为现场无人作出丝毫反应。

到了五点，杰里已走出银行。由于反复思考其他可能的选择，想得紧张过度，吉勒姆感到浑身不舒服。硬上弓这种玩法具危险性，吉勒姆与多数专业人士同样痛恨，只不过痛恨之因并非有所顾忌。首要原因是对象，或者更糟的，当场还有保安人员。第二是硬上弓的做法，并非人人面对敲诈勒索时都能作出合乎逻辑的反应。有人装英雄，有人爱撒谎，也有人是歇斯底里的处子，头向后仰，尖叫着杀人啊，内心却喜不自胜。然而，真正的危险现在才开始，硬上弓告一段落，杰里必须背对冒烟的炸弹奔逃。弗罗斯特会往哪一方面跳下？他会打电话报警吗？还是打给母亲？上司？妻子？“亲爱的，我全部招了，救救我，我们重新来过。”吉勒姆甚至不排除下列这项恐怖的可能性：弗罗斯特或许会直接找上客户说：“先生，我严重渎职，违背银行规定，我是来自首的。”

清晨霉臭古怪的气氛中，吉勒姆打了个寒战，然后将心思坚决地锁定在默莉身上。

过了半晌，绿色电话铃响，吉勒姆没有听见。乔治一定是把电话放在正前方。突然间，吉勒姆办公室里的小灯闪动，持续亮了十五分钟，

熄灭后，众人将眼光集中在史迈利的门上，静候其变，希望他能结束隐居生活。法恩动作到一半，成了木头人，手上端着一盘没人想吃的棕色果酱三明治。随后把手转动，史迈利手持一份普通的检索令表格出现，已经用自己工整的笔迹填妥，标明“横杠”，意指“主任速件”，等于是最急件。他递给吉勒姆，请他直接送至档案室的女王蜂，盯着她调查上面的人名。吉勒姆收下表格时，回想起稍早前也收过类似表格，调查对象是伊丽莎白·伍辛顿，别名丽姬，最后脚注是“高级妓女”。他转身离去时，听见史迈利悄声请康妮与狄沙理斯陪他进入觐见室，同时派法恩到无机密等级的图书室检索最新一版的《香港名人录》。

女王蜂特别奉命清晨加班，吉勒姆走进来时，撞见她的巢穴如同《伦敦大火之夜》的场景，双层铁床、手提式煤气炉一应俱全，只不过走廊上有台咖啡机。他心想，就缺一套连身工作服和一幅丘吉尔的相片。表格上详述着“姓柯名德雷克，别名不详，一九二五年生，上海，现址香港赫兰道七门，职业为香港中国海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女王蜂接到后开始大量翻阅资料，最后却只发现，柯曾经于一九六六年在香港受大英帝国册封，原由是“对殖民地社会与慈善事业贡献卓著”。在册封审查通过前，总督府曾委托圆场进行调查，圆场的响应是“经查无不良背景”。吉勒姆赶紧带着这份情报上楼，略带睡意的头脑仍记得山姆·科林斯曾说过，香港中国海空公司是万象那家小航空公司最大的股东，从商务波里斯的战利品获利的单位，就是这家航空公司。如此一想，让吉勒姆理解出最合理的关联。他得意于自己头脑精明，回到觐见室碰见的却是一片死寂。散放在地板上的，不只是最新版本的《名人录》，还包括数份旧版本。法恩与往常一样，再度用功过度。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盯着一张自己笔迹写下的笔记。康妮与狄沙理斯盯着史迈利看，但法恩又不见人影，大概是又出去跑腿了。吉勒姆将检索表交还史迈利，附上女王蜂的检索结果，写在正中央，字体是她最美观的肯辛顿圆形草体。在此同时，绿色电话再度作响。史迈利拿起话筒，开始在眼前纸张上做笔记。

“好，谢谢。记下来了，请继续。对，我也记下来了。”这样持续了十分钟，最后他说：“好。今天晚上到。”然后挂掉。

街头上有位爱尔兰送牛奶工，口气激昂地宣布再也不要浪迹天涯了。

“威斯特贝拿到完整档案了。”史迈利终于说，只不过如其他所有人一样，他用的是杰里的代号。“数据全部到手。”他点点头，仿佛赞同自己的说法，目光仍研究着那张纸。“底片今晚才到，但一切总算有了眉目。所有最先通过万象支付的款项，最后都流进香港的账户。从一开始，香港就是金棱线的终点站。全部都是。每一分钱都是。没有扣钱，连银行手续费都没扣。最先是小数目，然后暴涨，原因何在，我们只能猜测。全部都如科林斯描述的。最后涨到一个月两万五，维持这个数字。万象的安排一结束，莫斯科中心连一个月也没有漏掉。他们立刻转到替代路线。康妮，你猜对了。卡拉做事，一定都有备用方案。”

“亲爱的，他是专业人士嘛，”康妮·沙赫斯喃喃地说，“像你一样。”

“才不像我。”他继续研究自己的笔记。“是个闭锁账户，”他以同样理所当然的语调宣布，“只写出一个名字，是信托的创办人。柯。‘收益人不详。’他们说。也许今晚就能分晓。一分钱都没被提领。”他专挑康妮·沙赫斯说。他重复一遍：“两年前开始付款后，账户里连一分钱都没被提领。结存总额有五十万美元。利上滚利，增值自然快速。”

对吉勒姆而言，最后这一点简直无可理喻。五十万美元转手后，竟然连一毛钱也没动过，究竟用意何在？对康妮·沙赫斯与狄沙理斯而言，这一点却含义深远。康妮脸上漾起鳄鱼般的微笑，婴儿眼安静而欣喜地直盯史迈利。

“噢，乔治，”理出头绪后，她吐气说。“亲爱的，闭锁账户！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怎么不是？迹象全部都很明显。打从第一天开始。如果又胖又笨的康妮不是这么瞎眼又老又朽又懒，老早就被她看穿了！你别来烦我，彼得·吉勒姆，你这条好色的小蟾蜍。”她正要努力起身，行动不便的双手紧抓椅子扶手。“只是，有谁值这么一大笔钱？难不成是整个情报网？对不对，他们绝不会帮整个情报网做这种事。没有前例可循。不是批发，因为前所未闻。这么说来，究竟是谁？这人能献什么宝，值这么多钱？”她跛着脚走向门口，拉拉肩膀上的披肩，思绪已从现场钻回自己的世界。“卡拉付钱不像那样。”他们从她身后听见喃喃自语声。她走过妈妈座位一列盖上盖子的打字机，如同蒙上嘴巴的哨兵站立阴影中。“卡拉是卑鄙小人，他认为情报员应该免费为他效劳才对！他当然有这种想法。他付给情报员的钱以毛计算。给零钱。管他通货膨胀率。五十万美金付给小小一个地鼠。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过！”

举止稍嫌古怪的狄沙理斯，专注的神情不下康妮。他偏斜不均衡的上半身往前倾，以银刀激烈拨弄烟斗，仿佛拨弄的是着了火的炖锅。他的银发歪斜矗立，在皱瘪黑夹克沾满头皮屑的衣领上有如鸡冠。

“难怪啊，卡拉想把尸体埋起来。”他突然脱口而出，仿佛拼命将这句话挤出口，“难怪。你们知道，卡拉也负责中国事务。有证据显示。是康妮说的。”他挣扎着起身，一双小手里握了太多东西：烟斗、烟草盒、削笔刀、特拉赫恩。“自然称不上很巧妙。料想不到卡拉有那份能耐。卡拉不是学者，他是军人。但也说不上盲目，一点也不盲目，康妮告诉过我。柯。”他以不同音量重复这个字数次。“柯，柯。这个中文字，我非确认它是不是‘柯’不可。关键全在中文字上。是怎么写来看？对，我甚至看见了‘郭’……是真的看见了吗？……噢，还有几个其他概念。德雷克，联想到教会学校，不用说。上海教会学校的学生。对，对。你们也知道，上海是源头。第一个党组织就设在上海。我为什么这样说？德雷克·柯。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对，好。我嘛，差不多该回去看书了。史迈利，你觉得是不是该发一个煤桶给我的房间？没有暖气，准会被冻死。我跟管家们要过十几次了，费尽唇舌只招来白眼。好歹也不是上古时代了嘛。不过冬天也快到了。原始数据一来，应该会给我们看吧？没人喜欢拿浓缩版研究太久。我会列出

一份简历。应该先做这件事。柯。啊，谢谢你，吉勒姆。”

他的特拉赫恩从手上滑下，接过来后，烟草盒又掉了，所以吉勒姆又帮他拾起。“德雷克·柯。上海人当然不代表什么。上海是真正的大熔炉。据我们所知来判断，答案就在潮州。话说回来，一定不能偷跑。浸信会。潮州的基督教徒多半都是吧？潮州人。我们以前在哪里碰过？对了，曼谷那家中介的银行。这样想，就容易想通了。或者是客家人。这两个族群并非老死不相往来，一点也不是。”他尾随康妮步入走廊，留下吉勒姆与史迈利独处。史迈利起身，走向扶手椅，弯腰坐下，两眼无神地盯着炉火看。

“真怪，”他最后说，“一点都没有震惊的感觉。怎么会这样，彼得？你很清楚我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吉勒姆具有保持缄默的智慧。

“一条大鱼。拿卡拉的钱。闭锁式账户，来自俄国间谍的威胁，竟在香港生活的最中心点。这么说来，为什么没有震惊的感觉？”

绿色电话再度吠叫。这一次吉勒姆接听。接听时，他讶然发现办公桌上出现山姆·科林斯的远东报告，是刚才没看见的一份档案。

该周末就如此度过。康妮与狄沙理斯消失无踪；史迈利专心准备提出报告；吉勒姆修身养性，召回妈妈们排班打字。星期一，史迈利对他耳提面命后，他致电拉康的私人秘书。吉勒姆表现非常出色。“别大肆声张，”史迈利警告过他，“尽量低调。”吉勒姆照办。他向对方说，前几天晚餐时有人提到要召开情报程序小组会议，一起讨论某些表面证据：

“这案子已经稍具雏形了，所以定个日期也许是合理的做法。打击顺序传过来，让我们先传阅一下。”

“打击顺序？雏形？你们的英语是跟谁学的？”

拉康的私人秘书名叫皮姆，嗓音听来脑满肠肥。吉勒姆从未与他见过面，对他却厌恶得不合情理。

“我只能转告他，”皮姆警告，“我只能转告他，再回电给你，向你报告他讲的话。他这个月的日程已经填得满满的了。”

“小事一桩，请他务必相助。”吉勒姆说完气得挂掉电话。

他心想，最好等着瞧，在你身上爆发以后保准好看。

据说伦敦总部进入产房时，外勤情报员只能在等候室来回踱步。民航机长、狗仔记者、间谍。杰里又产生该死的惰性。

“我们被冷冻了，”库洛宣布，“上级说，干得好，暂时按兵不动。”

他们至少每两天通一次电话，是“过渡电话”，经由两个第三方电话接通，通常是从旅馆大厅打至另一旅馆大厅。他们通话时夹杂沙拉特暗号与报社术语，以防露出马脚。

“你的报道，上级正在查证。”库洛说，“编辑若有智慧，会在适当时

机善用。现在，上级命令，要你一手叠在另一手上，乖乖坐着别动。”

库洛如何与伦敦通话，杰里并不清楚，只要安全，杰里也不在意。他猜想某个台面上的大型情报单位选出的官员，正在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至于是谁，他并不在意。

“你的任务是帮报社跑腿，多写些文章，下一次出现危机时，可以用来应付史大卜老哥。”库洛对他说，“没有别的任务了，听到了吗？”

杰里从自己与弗罗斯特交手的经过获得灵感，写出一篇文章，报道美军撤退对湾仔夜生活的影响：“口袋膨胀的美国大兵，不再涌入寻欢作乐，苏丝黄情何以堪？”他捏造了“破晓采访”——或以记者偏好的说法是“现场直击”，访问了一名虚构的苦情吧女，被迫接日本客人。写完后，他以空运送出，请陆克的分社将运货单号码电传给报社，全都依照史大卜的指示办事。再怎么讲，杰里不算是差劲的记者，但如同压力能让他表现出最佳身手一样，闲荡也能让他露出最恶劣的一面。陆克从分社打电话通知杰里，说史大卜不仅立刻采用，甚至表现得极有风度，令杰里震惊不已，因此决定再寻挑战。这时有两三件贪污官司开庭，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主角是常见的那种备受误解的警察。杰里看了一眼，认定这类新闻不值得远渡重洋报道。近来英国也有类似丑闻。一份“请查证”的线索，令他去追友报放出的风声，宣称香港小姐怀孕，然而在他起跑前毁谤官司就捷足先登。他出席“浅喉咙”主持的港府记者会，内容乏善可陈。“浅喉咙”个性沉闷，原服务于北爱尔兰一家日报，后来被开除。杰里检索过去的重大新闻，希望找出值得炒冷饭的材料，如此晃掉一上午的时间。当时盛传陆军财务吃紧，他由少校公关带着巡视廓尔喀要塞。少校看似十八岁左右，在杰里愉悦的访问下表示不知情，不知道一旦廓尔喀士兵的眷属被遣回尼泊尔后，他们要如何解决房事问题。杰里心想，大约每三年回老家一趟吧。他似乎认为，对任何人而言，三年一次就够了。他尽可能夸张事实，将廓尔喀人扯得有如一群军队鳏夫，“气候酷热，大英佣兵冲冷水澡”，而且也洋洋得意地找到内线消息来源。他另外写了两三份报道，以备不时之需。晚上到俱乐部闲晃，内心却焦躁万分，等着圆场生下娃儿。

“老天爷啊，”他向库洛抗议，“这人简直成了公家财产了。”

“没办法。”库洛坚定地说。

杰里只好以“是的，长官”回应。两三天后，他在穷极无聊的情况下，着手针对曾获大英勋章的德雷克·柯先生进行全然非正式的调查。柯也是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兼百万富翁，是不容怀疑的公民。没有戏剧化的背景；以杰里的字典定义，没有违法的背景；因为只要是外勤情报员，必定至少背离过个人信仰一两次。他以踌躇的态度着手进行，宛如正要去妈妈不准碰的饼干盒偷拿饼干。他也正好考虑向史大卜提议采访香港巨富阶级，分上中下三篇加以报道。有天午餐之前，他来到外籍记者俱乐部，无意中效法史迈利，从参考书架上找到最新版的《香港名人录》，查到德雷克·柯。已婚，育有一子，一九六八年夭折；曾于伦敦格

雷法律学院念法律，显然成绩不甚理想，因为没有记录显示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接着列出的是他近二十年担任过的管理职位。嗜好：赛马、游艇以及玉器。这些嗜好谁没有？接着列出他惠顾的慈善机构，包括一所浸信会，一间潮州庙宇以及德雷克·柯免费儿童医院。恩泽四方，杰里觉得很有意思。相片显示出寻常的容貌，目光温柔，年约二十，美德与身外之物同样满载，其余不值一提。早夭儿子名为纳尔森。杰里注意到：德雷克与纳尔森，同为英国海军名将。在他脑中萦绕不去的是，父亲的名字竟与首位进入南海的英国将领雷同，儿子竟以特拉法加战役13的英雄来命名。

将香港的中国海空公司与万象的印支包机公司联想在一起，彼得·吉勒姆认为非常困难，但杰里联想起来则比较轻松。阅读中国海空公司的简介时，杰里看得津津有味。简介将该公司描述为“于东南亚战区广泛从事贸易与运输工作”，包括稻米、海产品、电器、柚木、房地产与航运。

在陆克的分社叨扰时，他采取更大胆的一步：刻意以最凑巧的方式发现德雷克·柯的姓名。没错，他是利用检索卡调查过柯的背景。碰巧是在检索香港十几二十位华人富豪时顺带一查；碰巧是他向华人女职员询问，她认为谁是最国际化的华人百万富翁，问得落落大方。尽管德雷克或许并非名列前茅，只消稍微提示，就从她口中套出这个大名，随后也调出这人的资料。的确，他早已向库洛抗议过，这人众所周知，雕虫小技就能追查出其入其事，感觉不到成就感，甚至有点如梦似幻。杰里与苏联情报员接触的经验有限。苏联情报员的地位通常较低。相形之下，柯有如巨无霸。

杰里心想，让我不禁想起老爸杉波。忽然想起两者近似之处，这是第一遭。

最详细的资料出现在一份光鲜的期刊《金东方》里，如今已停刊。停刊前最后几期之一，刊出长达八页的专题报道，附有插图，标题为“南洋红骑士”，探讨越来越多海外华侨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获利颇丰。这些华商一般称为肥猫。就杰里所知，南洋指的是中国以南的领域，对华人而言，暗指遍地黄金的祥和国度。接受专访的名人各占一页，附上一张相片，背景是个人财产。接受采访的名人有曼谷人、马尼拉人，也有新加坡人，代表香港的是“备受爱戴的体育界人士，也是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德雷克·柯先生，中国海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总经理兼最大股东”。他与爱马“幸运纳尔森”合照，时间是爱马在跑马地凯旋一季后。马名一时之间镇住了杰里的眼睛。父亲居然以死去儿子的名字来为爱马命名，令他觉得毛骨悚然。

相片中的柯，比《香港名人录》的平板大头照透露出更多信息。柯显得神情愉快，甚至可说是神采飞扬，尽管戴了帽子，看来像顶上无毛。这顶帽子是现阶段让他最感兴趣的对象，因为以杰里有限的经验来看，他从未看见任何华人戴过这种帽子。帽子属于贝雷帽，斜戴，让柯有如英国军人与法国洋葱贩的综合体。然而最重要的是，这帽子让他显出华人身上最罕见的特质：自我嘲讽。他显然身材高大，身穿巴宝莉名

牌风衣，纤长的双手如树枝般伸出袖口。看来他真心衷情爱马，一手轻松搭在马背上。记者问他，一般认为经营帆船队无利可图，为何他仍执意经营，他的回答是：“我们是潮州来的客家人。我们呼吸的是水，栽种养殖也靠水，睡也睡在水上。出海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文章也提到，他喜欢描述一九五一年自上海前往香港的那段往事。当时边界仍开放，移民管制尚未实行。尽管如此，柯仍选择开着捕鱼用的帆船前行，不顾海盗、海上封锁，以及恶劣天气。这种做法至少也算是特立独行。

“我这人很懒，”报道引述他的话，“如果有风吹，免费推着我跑，我干吗走路呢？我现在拥有一艘六十英尺的动力游艇，还是喜欢海洋。”

文章表示，他的幽默感人尽皆知。

优秀的情报员，必须拥有娱乐价值，沙拉特的老大说。莫斯科中心也深知这一点。

杰里趁无人观看时，漫步走到检索卡边，几分钟后抱了厚厚一档案夹的剪报，主题是一九六五年一桩股票弊案，柯与一群潮州人涉案。不出人所料，证交所进行调查后不了了之，因此归档搁置。翌年柯获得大英勋章。“想买通人的话，”老爸杉波以前常说，“一次买个彻底。”

陆克的分社聘请了一批华人研究员，其中有位名叫占美的广东人，喜好交际应酬，经常出没外籍记者俱乐部，经常有人以华人行情付费给他，请他对中国事务发表预测。占美说，汕头人独树一帜，就像“苏格兰人或犹太人”一样，吃苦耐劳，向心力强，节俭得令人不敢恭维。汕头人喜欢住在海边，受人迫害、闹饥荒或是债台高筑时，方便逃命。他说，汕头的妇女是热门媳妇，因为不但长得美，个性勤勉节俭，床第之间也如狼似虎。

“阁下是想再写一部小说吗？”小矮人问得亲密。他走出办公室，看看杰里正在做什么。杰里本想问他，为何汕头人会从小在上海长大，但继而一想认为不妥，将话题转到较不敏感的方向。

隔天，杰里借来陆克的老爷车。他带了标准大小的三十五厘米相机，开车至赫兰道，位于浅水湾与赤柱之间，是百万富翁聚集之地。他故意学很多没事找事做的观光客，在此处别墅外徘徊引颈。他掩人耳目的说法，仍是为史大卜撰写香港富豪的深度报道。即使是现在，即使对他自己，他也几乎不会承认专为德雷克·柯而前来此地。

“他去台北花天酒地啦，”库洛打过渡电话给他时随口一提，“礼拜四之前不会回来。”杰里再次接受库洛的沟通方式，不加过问。

他并未对名为七门的房子拍照，却几度傻傻对着房子注视良久。他看见的是一幢低矮的别墅，上面铺着波形瓦，前门距离马路有段距离，靠海的一边有座大阳台，以白漆柱搭建的凉亭伫立在蓝色地平线。库洛说过，德雷克将房子命名为七门，想必与上海有关，因为上海的古城墙有七道门。“怀旧啊，小子，绝不能低估亚洲人怀旧的力量，也绝不能轻信。阿门。”他看见几片草坪，包括一处槌球场，令他眼睛一亮。他看见

整齐宜人的杜鹃与木芙蓉丛。他也看见帆船模型，大约十英尺高，漂流在水泥大海上，也看见有如舞台的圆形庭园吧台，上方以蓝白相间的条纹帆布遮盖。几张无人坐的白椅围成一圈，由一名身穿白外套、白长裤、白皮鞋的男孩负责照料。柯家显然邀请了客人。他看见另几名小男仆清洗着烟草色的劳斯莱斯幻影房车。长长的车库打开着，他看见克莱斯勒某款旅行车，也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车牌拆下，据分析正接受整修。然而杰里也极为细心，对赫兰道上其他住宅同等关切，也对其中三户拍照留念。

他继续往深水湾走，站在海边欣赏股市交易员的帆船与汽艇小舰队，这些船停泊在多浪的海面上，起伏不定。然而他找不到纳尔森司令号，柯那艘知名的大洋游艇。纳尔森之名随处可见，越来越令人透不过气来。正当他想就此罢手，他听见底下传来吆喝声，因此走下一条摇晃的木板堤道，看见舢板上有名老妇人。原本以没牙的嘴巴含着鸡脚的老妇，现正对着他龇牙咧嘴笑，以黄色鸡脚指着她自己。杰里爬上舢板，指着旁边的船只，她就摇船带杰里参观，一面摇橹，一面又唱又笑，鸡脚仍含在嘴巴里。纳尔森司令号流线光鲜。又有三名少年身穿白细帆布衣，认真地刷洗甲板。杰里心算着，光是这些工作人员，柯每月要拿出多少治家费用。

开车回家途中，他在德雷克·柯免费儿童医院稍事停留，认为就医院本身的价值而言，维修得也算是尽善尽美。隔天一大早，杰里来到中环一栋寒酸的大楼的大厅，看着贸易公司的黄铜名牌。中国海空与相关企业占据最高的三层，但并不太出人意料的是，万象印支包机之名并未出现其中。印支包机先前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固定收到两万五千美元。

陆克分社的剪报也建议参考美国领事馆数据库。杰里隔天致电美国领事馆，表面上是想报道湾仔美军的专题。杰里在一位美得不像话的女孩注视下，在档案室里游走，随手翻看，最后停留在年代最久远的一批数据上，是五十年代最初期杜鲁门对中国大陆与朝鲜实施贸易禁运的资料。驻香港领事馆应上级要求，必须报告违规情事，这份档案记录的是领事馆的调查结果。最受欢迎的走私物资是药品与电器，其次是石油，而“美国政府单位”——此处统一以这种称呼来代表相关部会——大举查缉，不但设下陷阱，而且派遣炮艇出巡，审问投奔人士与囚犯，最后于众议院与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前提出大批档案。

时间是一九五一年，是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的两年后，也是身无分文的柯自上海航向香港的同一年。陆克分社的参考数据将他归类于上海，而柯与上海的关联仅止于此。当年许多上海移民居住在德辅道一家拥挤又不卫生的旅馆。报告前言写道，上海移民有如大家庭，一同吃苦受难，因此团结在一起。

有人的说法较为咄咄逼人。“香港肥猫从这场战争里赚到好几百万。红军的电子仪器、青霉素、白米饭，都是谁卖给他们的？”

报告指出，一九五一年对大陆开放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贿赂边界

守卫，以卡车载石油穿越新界，开过边境。另一种方式是贿赂海港当局，以船运走私。

一名网民又说：“我们客家人对海最熟了。我们会找船，三百吨，先用租的，一桶桶石油往上载，捏造假的货单，谎报目的地。一到公海，开始朝厦门没命狂奔。获利率是百分之百。走私几次就能买船。”

“最初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审问官质问。

“丽致舞厅。”答案颇令人困窘。脚注写道：丽致就在国王路上，紧临海边，是供人挑选高级妓女之地，多数小姐是上海人。同一脚注也写出这一伙人的姓名。德雷克·柯名列其中。

“德雷克·柯是硬汉一条，”附录里以小字印刷的证词写道，“别想跟他胡诌。政治人物他一概不喜欢。”

至于组织犯罪方面，经调查后并无结果。根据历史记载，上海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黑道有四分之三倾巢迁入香港。根据历史记载，红帮与青帮为了在香港收取保护费争得你死我活，让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帮派火并显得像是扮家家酒。然而就三合会或其他犯罪组织而言，调查员找不到证人作证。

不出意料的是，星期六一到，杰里动身前往跑马地，对调查对象的面貌已所知甚详。

出租车加倍收费，因为目的地是赛马场，杰里乖乖付钱，他知道这是规矩。这一趟他向库洛报备过，库洛并未反对。他带陆克一起来，因为他深知有时两人比一个人较不醒目。他很担心撞见弗罗斯特，因为香港的欧洲人社群小之又小。来到大门口，他致电赛马场管理阶层，希望拉点关系，没多久一位名唤葛兰特上尉的年轻男子出现，是赛马场的高级职员，杰里向他解释这一趟公事公办，是想好好介绍这地方，刊登在报上。葛兰特机智、优雅，以托盘烟斗抽土耳其烟，杰里说的每件事，似乎都能让他欣然一笑，只是笑意稍嫌疏远。

“这么说来，你是他儿子喽。”他最后说。

“你认识他？”杰里龇牙一笑说。

“只是听过而已。”葛兰特上尉回答。他听过的事似乎让他很高兴。

他发给两人通行证，稍后再请他们喝饮料。第二场比赛刚结束。三人聊天时，他们听见观众的声浪此起彼落，有如雪崩一般。等待电梯时，杰里查看公布栏，看看私人包厢里有哪些人。这些大人物是山顶帮的人：有喜欢自称大银行的汇丰银行，有怡和集团，有总督、英军司令。德雷克·柯虽然贵为俱乐部理事，却未名列其中。

“威斯特贝！天啊，老兄，是谁让你进来的？喂，你爸死前破产了，是真的吗？”

杰里露齿一笑，犹豫一阵，迟迟从记忆库里搜索出名片：克莱夫，姓不详，是暴发户初级律师，家住浅水湾，苏格兰人，喜欢强人所难，

表面虚假可亲，众所周知爱走旁门左道。杰里曾在报道澳门一桩黄金欺诈骗案时向他请教该案背景，认定他其实也分了一杯羹。

“哇，克莱夫，太棒了，好极了。”

两人客套一番，仍等着电梯。

“来，赛马卡给我们。快嘛！让你赚大钱也不好吗？”朴尔腾，杰里回想起来：克莱夫朴尔腾。朴尔腾将杰里手中的赛马卡夺去，舔舔肥大的拇指，翻至中间一页，以圆珠笔圈起一匹马。“第三场七号，错不了的，”他以气音说，“孤注一掷，听到没？我可不是天天散财哟，告诉你。”

“那个舔手指的人卖你什么东西？”他走后陆克询问。

“叫做‘开阔空间’的东西。”

两人各走各的路。陆克前去下注，挤过人群上楼到美国俱乐部。杰里冲动之下买了一百元的“幸运纳尔森”，然后快步前往香港俱乐部的午餐室。“要是输了钱，”他意带挖苦地想，“我就找乔治销账。”双扉门开着，他直接走进去，里面弥漫着肮脏钱的气息，相当于萨里高尔夫俱乐部周末下雨时的情景，差别在于有些人胆量够大，敢冒着被扒的风险穿戴真正珠宝。一群太太分开坐着，宛如昂贵而未经使用的仪器，皱着眉头关上闭路电视，发牢骚抱怨下人与抢劫事件。空气中的气味夹杂了雪茄、汗酸与腐坏的食物。一见他蹒跚走来，难看的西装，羊皮靴子，全身上下写满了“报社”，她们的眉头皱得更紧。她们的脸孔说道，在香港啊，会员制俱乐部很不好的一点，就是应该被赶走的人永远不嫌多。一群认真的酒客聚集在吧台，主要是伦敦的商业银行外派代表，啤酒肚，脖子粗肥，外表比实际年龄老。这些人属于怡和集团的二流队员，想登上私人包厢还不够格。这些人梳理整齐，想法天真，却不讨人欢心，对他们而言，所谓的天堂是金钱与升官。他忧心忡忡地四下搜寻老弗，然而不是今天马儿拖不动他，就是与另有其他嗜好的朋友同在。杰里露齿一笑，一手朝他们全体挥动，目标不明，从中挑出了副经理，以失散好友的态度向他致敬，以爽朗的口气提及葛兰特上尉，塞给他二十元，违反所有规定，请他划位至楼座。然后杰里满心感激地走上顶层楼座，距离开赛仍有十八分钟。烈日、马粪的臭味、观众兽性的鼓噪，以及杰里加速的心跳，低声说着“赛马”。

杰里在上面逗留一阵子，欣赏美景，因为每次看见都算是第一次。

跑马地赛马场的青草必定是全球最具身价的作物。少得可怜。赛马场周围长出窄窄一环，看似伦敦自治区的休闲场地，任凭烈日与人脚踏踏成泥巴。八座磨损的足球场，一座橄榄球场，一座曲棍球场，散发出都市那种三不管的气息。然而，包围寒碜场地的这道细长绿缎带，一年却有可能利用合法下注而吸金上亿英镑，地下的赌注总额也同样高。此地英文地名为“快乐山谷”，其实称呼为“火盆”较为适切，因为一面是闪闪发亮的白色体育馆，另一面则是褐色的丘陵，在杰里正前方与左边则是另一个香港，是灰色大楼组成的贫民窟，犹如扑克牌搭成的曼哈顿，

簇拥成堆，在高温中仿佛彼此紧挨着站立。每个小小的楼座皆有一根竹竿，宛如用来固定结构。竹竿挂着无数似黑衣的旗子，仿佛庞然大物从空中扫过赛马场，身后留下残布片片。就在这样的地方，仅有极少数赌客今天荣获恩宠，获得跑马地速成的救赎。

在杰里右方闪耀的是较新、较宏伟的大楼。他记得，在那些大楼里，违法收注的组头建立基地，利用十几种老旧的手法，如收音机、对讲机、闪光灯，与在跑道周围收集情报的助手进行对话。这些手法一定会让沙拉特叹为观止。海拔更高处是采石后光秃的山脊，散立着电子窃听器转播站。杰里曾听说过，表亲在山上架设了小耳朵，借以追踪美军资助的台湾U2战机空中侦查。丘陵上方是饭团般的白云，无论天气如何，似乎总赖住不走。当天白云上方是由艳阳漂白的中国苍穹，孤鹰缓缓盘旋。这一切，杰里愉快地尽收眼底。

对观众而言，现在是全无焦点的时刻。如果硬说确有注意力集中点，应是场中的四名肥胖的华人妇女，头戴流苏客家帽，身穿黑色睡衣形套装，手持耙子，大步走在跑道上，将奔驰的马蹄踩乱的珍贵青草整理好。她们带有一种全然无视周遭环境的尊严，仿佛举手投足皆代表中国所有农民。短短一秒钟，观众全体对她们抱有一股亲切的感情，然而稍纵即逝。

下注结果，克莱夫·朴尔腾的“开阔空间”看好度排名第三。德雷克·柯的“幸运纳尔森”赔率是四十比一，几乎无人看好。杰里碎步挤过一群兴高采烈的澳大利亚人，来到楼座的角落，伸长脖子，跳过一层层的人头望向私人包厢。包厢以绿色铁门与一名警卫将普通老百姓隔绝在外。他一手遮在眼睛上方，暗想早该带望远镜来才对，最后分辨出一名外表强悍的肥胖男子，西装，墨镜，陪伴一旁的是极为美貌的年轻小姐。他看来是华人与南美人的混血儿，杰里猜测他是菲律宾人。身边的女孩是金钱能买到最好的一个。

一定是跟爱马在一起，杰里想着想着，回忆起老爸杉波。最可能的地方是围场，叮叮着驯马师与骑师。

他阔步走回午餐室，回到大厅，下了两层宽阔的后楼梯，走过一个门厅，来到参观廊。这里挤满了若有所思的华人，清一色男性，以虔诚静肃的神情向下盯着加顶的沙坑，里面满是麻雀，有三匹马，每匹由特定的马夫牵引。马夫执行任务起来神颓气丧，仿佛神经紧绷到浑身不适。姿态优雅的葛兰特上尉在一旁观看，一名白俄罗斯裔的老驯马师也在场。这位驯马师名叫沙侠，颇受杰里爱戴。沙侠坐在小折叠椅上，微微倾身向前，仿佛正在垂钓。沙侠在上海租界时期曾训练过蒙古迷你马，听他讲故事讲一整夜，杰里也不觉厌烦。他娓娓道尽上海曾有三座赛马场：英国、国际、中国；英国商业巨子每人拥有六十甚至多达一百匹赛马，利用船运沿着海岸线南征北讨，如精神异常般彼此竞争，从这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沙侠个性温和，富哲学思想，带有遥望远方的蓝色眼珠，以及自由式摔跤选手的下巴。他也负责训练“幸运纳尔森”。他独自坐着，看着杰里视线外应该是门口的地方。

看台忽然骚动起来，杰里因此陡然转身面对日光。哄堂鼓噪，随后听到被勒住脖子后的高声尖叫，一层群众倾向一边，身穿灰黑相间制服的男子如斧头般切入人群。转眼间，一队警察拖出狼狈的扒手，又流血又咳嗽，将他带进楼梯间作笔录。杰里眼睛被晒得发慌，因此将视线转移至黑暗的围场，一段时间后才聚焦在德雷克·柯先生的朦胧轮廓上。

要辨识出柯并不轻松。杰里注意到的第一人丝毫不像柯本人，而是站在老沙侠身旁的年轻华人骑师，高瘦如衣架，丝质长裤紧夹股沟。他以马鞭抽着自己的马靴，仿佛模仿自己曾在英国体育报刊看过的动作。他身穿柯的颜色（“天蓝与海灰的方格”，据《金东方》报道）。与沙侠一样，他也凝视着杰里视线之外的东西。接下来，杰里注意到自己站立的平台下方来了一匹枣红色新进马匹，牵引的马夫是个痴笑的胖子，穿的是肮脏的灰色连身服。它的号码被小毯遮住，不过杰里看过相片，亲眼看到后对它更加熟悉。其实他很了解这种马。有些马匹基本上就比同侪高出一等，在杰里眼中，“幸运纳尔森”就是这样的骏马。本质有点优秀，他心想，乖顺听话，目光大胆。但不是每场赛事让女人猛下注的年少栗色马。受本地气候的限制，马匹体型较小，但“幸运纳尔森”的状况不输任何人。这一点杰里很确定。一时之间，他为“幸运纳尔森”的状况担忧起来。它在冒汗，侧腹与蹄侧过于油亮。随后他再看一次“幸运纳尔森”大胆的目光，以及稍显不自然的汗水痕迹，他的心脏再度噗噗悸动。那家伙狡猾得很，事先为爱马淋过水，让它外表可怜。他津津有味地回想起老爸杉波。

细看良久，这时杰里才将视线由骏马移向马主。

德雷克·柯先生，曾荣获大英勋章、轻松赚进莫斯科中心的五十万美元、离群独立，站在直径十英尺宽的白色水泥梁柱阴影下。一眼望去，这人丑陋却不碍眼，高大而微微驼背，这种姿态本该与职业有关，像是牙医或补鞋匠的样子。他做英国式打扮，宽松灰色法兰绒长裤，黑色双襟西装外套，腰身过长，突显了双腿无法站直的缺陷，为削瘦的躯体增添皱垮的外貌。他的脸与颈光滑如旧皮件，无须，众多皱褶看来如熨过的褶线般明显。他的肤色比杰里料想的还深，几乎令人怀疑混有阿拉伯人或印度人的血统。他头戴相片中那顶不称头的帽子，是深蓝色贝雷帽，耳朵从帽子下探出，有如蛋糕上的玫瑰。眼睛极细，帽子压顶后显得更窄。棕色意大利皮鞋，白色衬衫，上排纽扣敞开。没有装饰品，连望远镜也没带，却带了五十万美元的迷人微笑，嘴角接近耳朵，露出金牙。他的微笑似乎品味着人人的好运，也包括自己的好运在内。

然而，他身上有点必须细察方能察觉的小细节。有些人具有这样的细节，如同紧绷的情绪，看在服务生总管、门房、记者的眼中，一眼就能看出。老爸杉波也几乎有。这种细节代表着坐拥资源、随传随到、呼风唤雨。需要东西时，躲藏一侧的人会跑步奉上。

现场活跃起来。赛马场职员借扩音器要求骑师上马。痴笑的马夫拉下小地毯，杰里很高兴地注意到，柯事先倒梳爱马的皮毛，以强调其状况差劲。高瘦的骑师别扭地缓缓走到马鞍旁，以紧张而亲切的口气对另

一边的柯呼唤。此时开始离去的柯忽然转身，爆出一个单音节的字回应，是什么字听不清楚，并没有特定对象，也不见任何人有所反应。是责骂，还是加油？是对下人的命令？丝毫无损他原有的灿烂笑意，噪音却严厉如鞭响。马匹与骑师纷纷离去。柯也离开。杰里火速冲上楼梯，走过午餐室，来到楼座，拖着脚步走到角落，向下望去。

这时柯已不再独身，有伊人随侍在侧。

两人是一同登上看台，或是女人间隔一段距离尾随柯而来，杰里无从确定。她好娇小。人群纷纷入座时，他只瞥见周围男人敬让时黑丝一闪，起初他视线过高，没瞧见她。她的头与周围男子的胸部等高。随后他再度瞧见坐在柯身边的她，娇小，毫无邪气的华人贵妇，上了年纪，肌肤白皙，打扮得整齐雅致，让人难以想像她曾年轻过，或曾穿过这身巴黎定做黑丝套装以外的衣服，上面的盘花纽扣和凸起的刺绣花纹，犹如轻骑兵制服。库洛播放迷你幻灯片供他欣赏时顺口提及，这老婆会很惹麻烦。爱去大商店拿东拿西。柯派手下抢先一步，向店家承诺有拿必付。

《金东方》里的报道指出，她是“早年的生意伙计”。杰里看出言外之意，猜想她曾在丽致坐过台。

群众的狂啸越来越带劲。

“威斯特贝，签了没？你签它了没，老兄？”苏格兰人克莱夫·朴尔腾冲着他直来，酒喝多了，汗水直流，“‘开阔空间’哪，老天爷！即使大家看好，你还是能赚个一两块啊！去签去签，必中无疑！”

“开跑”一声为杰里省下回应的口水。群众呼声暂停，高升，然后涨满全场。一连串马名与号码，噼噼啪啪从四周的座位传来，马匹从栅栏里飞奔而出，由嘈杂声牵引向前。起跑两百公尺步伐闲散。再等一阵，激烈癫狂会取代怠惰的气氛。杰里记得，破晓时分训练马儿时，马蹄必须罩上软垫以免扰人清梦。从前杰里跑战争新闻的空当，有时会起个大早，过来这里欣赏训马过程。幸运的话，会碰上够力的朋友，跟他们回到多层而具有空调的马厩，观看呵护宠爱的程序。由于日间车流声淹没了马匹嘶吼声，缓缓前进的耀眼马群看似无声无息，只是漂流在薄薄的翡翠河上。

“‘开阔空间’一路领先，”戴着眼镜的克莱夫·朴尔腾以不确定的语气高呼，“不愧大家看好。精彩。干得好，‘开阔空间’，干得好。”众马开始弯进最后直线跑道。“快呀，‘开阔空间’，跨大一点嘛！骑呀！抽鞭子啊，蠢材一个！”朴尔腾尖叫着，此时就算是肉眼也能看出，天蓝与海灰色的“幸运纳尔森”正往前头冲去，对手很识相地让路。另一匹马做出挑战之姿，随后泄气，不过“开阔空间”已落后三个马身，骑师则高举马鞭，猛力抽向后腿。

“抗议！”朴尔腾大喊，“理事哪里去了？有人作弊让马放慢脚步！一辈子从没看过作弊做得这么明显！”

“幸运纳尔森”优雅地奔过终点，杰里迅速将目光转向右边，压低视线。柯不为所动。不是东方人那份谜样的神情。杰里从不信那套迷思。当然也称不上是淡然无感。只像是心满意足观看仪式进行，如同德雷克·柯先生正在大阅兵。他娇小的疯妻直挺挺站在他身边，仿佛历经一生风风雨雨之后，总算听到专门为她演奏的颂歌似的。杰里霎时想起老佩特如花似玉时的模样。杰里心想，杉波的“骄傲”夺得第十八名时，佩特的神情正是如此。站姿也一样，勇敢面对失败。

颁奖仪式如梦似幻。

虽然典礼中缺少蛋糕桌，如此普照的阳光，连最乐观的英国村宴主办者也不敢奢求，只是镀银奖杯之华丽，远胜过赢得二人三脚赛跑后乡绅颁发的有磨痕的小杯。六十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或许有点夸张。一位头戴三十年代无檐帽的女士气质出众，站在白色长桌中间，显得既多愁善感又骄矜自大，如忧国忧民的志士。她行礼如仪。理事会主席递给她奖杯，她立刻转交出手，仿佛怕烫到玉手一般。德雷克·柯与妻子两人开怀浅笑，柯仍戴着贝雷帽，从欢欣簇拥的支持观众中走出接过奖杯；无奈仪式进行过快，他在围起来的草地上欣然来回走动时，摄影师没抓住镜头，只得要求演员重演光辉的一刻。气质出众的女士因此不太高兴，旁观者窃窃私语之际，杰里隐约听见她说出“真无聊”等字。奖杯最后总算归柯所有，气质出众的女士闷闷不乐地送出价值六百美元的栀子花，之后东方人与西方人心满意足地各自离去。

“签了它吗？”葛兰特上尉和气地问。两人漫步走向看台。

“这个嘛，对，没错，”杰里干笑着承认，“有点出乎意料，对不对？”

“噢，那场全看德雷克喽，没错。”葛兰特一本正经说。两人再走几步。“竟然被你看穿，厉害。比我们还高明。想不想访问他？”

“访问谁？”

“柯。趁他获胜之后陶陶然时。说不定你这次真能问出什么东西。”葛兰特以他惯用的宜人微笑说，“来，我来介绍。”

杰里并未迟疑。身为记者，他没有理由回绝。身为间谍的话呢，有时候沙拉特的人说，凡事无危险，多想多担心。两人漫步回人群中。柯一伙人围着奖杯，大致形成圆圈，笑声极大。圆圈中央最靠近柯的是那位菲律宾胖子，美丽女友陪伴一旁，柯则对着他女友耍宝，亲亲她双颊，然后又亲她一下，惹得众人大笑，惟一例外的是柯夫人。她刻意退到圆圈边缘，开始与年龄相仿的一名华人妇女交谈。

“他是阿沛戈，”葛兰特凑近杰里耳朵说，手指着菲律宾胖子，“马尼拉是他的，多数外岛也是。”

阿沛戈的大肚超前坐在皮带上，宛如石头塞在衬衫里。

葛兰特并未直接上前与柯交谈，而是挑上一名五官平坦的华人壮

汉，年约四十，身穿电光蓝色西装，似乎是助手。杰里远远站着，等待机会。华人壮汉向他走过来，葛兰特站在一旁。

“这位是刁先生。”葛兰特悄声说，“刁先生，这位是威斯特贝先生，是知名的威斯特贝先生的公子。”

“想访问柯先生吗，威斯特贝先生？”

“方便的话。”

“当然方便。”刁先生爽快答应。肥厚的双手在腹部前方不住浮动。右手戴着金表。手指弯曲，仿佛想舀水喝。他油光满面，年龄可以是三十到六十之间。“柯先生赢了赛马，一切都方便。我请他过来。别走开。令尊大名是？”

“杉谬尔。”杰里说。

“杉谬尔爵爷。”葛兰特语气坚定，用错了尊称。

“他是谁？”杰里偏头问，壮汉这时走回喧哗的华人圆圈。

“柯的总管。经理、负责人、杂役长、打杂人。一开始就跟着他。中日战争时两人一起逃难。”

也是他的主要打手吧，杰里心想，一面望着老刁大摇大摆走回主子身边。

葛兰特再度开始介绍。

“先生，”他说，“这位是威斯特贝，父亲是知名的威斯特贝爵爷，生前养了一批跑得慢吞吞的马，也替赌注经纪人买下几座赛马场。”

“哪家报纸？”柯说。他的嗓音深沉，严苛而有力，但令杰里吃惊的是，他发誓听到了一丝英格兰北方的乡下口音，令他想起老佩特的腔调。

杰里报上报纸名称。

“就是喜欢登女孩子相片的那家嘛！”柯高兴地大喊，“我以前在伦敦时常看，那时在名校格雷法学院念法律。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看你们的报纸吗，威斯特贝先生？依在下之见，现在更多家报纸偏好报道美女，尽量少报道政治，这世界就更有机会变得更好，威斯特贝先生，”柯大声说，言语中强烈夹杂了误用的成语与会议室英语，“请代我转述给贵报，威斯特贝先生。免费提供你做参考。”

杰里大笑一声，打开笔记簿。

“我签的是你的马，柯先生。赢了感觉如何？”

“总比输了感觉好吧。”

“不会越赢越乏味吗？”

“越赢越喜欢。”

“在商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还用说？”

“能让我采访柯夫人吗？”

“她在忙。”

杰里一面做笔记，一面嗅到一股熟悉的气味，令他心神不定。这种气味接近体臭，是极为浓烈刺鼻的法国香皂，混合了杏仁与玫瑰水，是前妻之一爱用的香皂。但显然的是，油光满面的刁先生也爱用，希望增加吸引力。

“制胜的公式是什么，柯先生？”

“努力工作，别钩心斗角，睡眠充足。”

“比起十分钟前，你是不是变得更有钱了？”

“十分钟前我就已经很有钱了。你也可以跟贵报说，我非常仰慕英国的生活方式。”

“就算我们英国人不爱努力工作，而且喜欢钩心斗角，你也欣赏吗？”

“帮我传话就是了。”柯当面对他说，等于是命令。

“怎么运气这么好，柯先生？”

这问题，柯似乎没听见，只是他的微笑慢慢消失。他直盯杰里，以非常细的双眼打量着他，脸部明显僵硬起来。

“怎么运气这么好，请问？”杰里再问一次。

两人静默良久。

“无可奉告。”柯仍紧盯杰里的脸说。

追问下去的诱惑变得难以抗拒。“公平一点嘛，柯先生，”杰里敦促着他，笑容满面，“这世界到处是梦想能跟你一样有钱的人。给他们一点建议，好吗？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

“你少管闲事。”柯对他说。他连最基本的虚礼也不屑，径自转身离去。在此同时，老刁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半步，截断杰里的前进路线，一手轻轻握住杰里的上臂。

“下一次还会赢吗，柯先生？”杰里探头往老刁肩头喊，希望渐去的背影能听见。

“问马儿比较好吧，威斯贝先生。”老刁露出肥滋滋的微笑对他提出建议，一手仍抓住杰里的上臂。

任他去抓吧，反正柯已回到菲律宾友人阿沛戈先生面前，两人一如刚才有说有笑。德雷克·柯是硬汉一条，杰里记得。别跟他乱编故事。老刁其实也不赖嘛，他心想。

他与葛兰特走回看台途中，葛兰特轻轻笑了起来。

“上一次柯赢了，比赛后甚至不愿意牵马回围场，”他回忆，“挥挥手把马赶走。不要了。”

“干吗不要？”

“没想到会赢啊。他事先没通知潮州的朋友，没面子。你问他怎么那么好运时，大概他就有这种感觉。”

“他怎么当上理事？”

“噢，肯定是老刁帮他买票。司空见惯了。干杯。别忘了领奖金。”

就这样：高手威斯特贝挖到了事先没料到的独家。

最后一场赛马结束后，杰里进账四千美元，陆克已不见踪影。杰里试过了美国俱乐部，葡萄牙俱乐部，也找过其他几个，问过的人不是说没见到他，就是把他赶走了。包厢处仅有一道门，因此杰里加入人潮。交通一团混乱。劳斯莱斯与奔驰互争路边停车位，人群则从后方推进。杰里决定别跟大家抢出租车，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没想到竟瞧见德雷克·柯，令他大吃一惊。柯独自从马路对面一处关口走出，这是杰里首度见到没有微笑的他。来到路边，他似乎打不定主意是否应过马路，接着站在原地，注视往来车流。他在等劳斯莱斯幻影，杰里心想，因为他记得赫兰道住处车库里的车队。或是奔驰，或是克莱斯勒。突然间，杰里看见他攒下贝雷帽，以耍宝的姿态对着马路握着，仿佛当做步枪标靶。他眼睛四周与下巴浮现皱纹，金牙闪闪发光，欢迎的不是劳斯莱斯，也不是奔驰或克莱斯勒，而是长型的红色捷豹E型敞篷车，车顶打开，紧急煞车停在他身旁，无视路上其他车辆。就算杰里不想注意也难。轮胎戛然而止的声响，令人行道所有人转头一看究竟。杰里以目光扫描车号，以大脑记录下来。柯爬上车，兴奋之情宛如一辈子从未搭过敞篷车。车子还没开走，就已经有说有笑了。开车前，杰里有机会看清楚驾驶，看见她随风飘逸的蓝色头巾，墨镜，长长的金发，也看够了她的上身，看见她靠向德雷克锁上车门，这才知道她是风情万种的女人。德雷克一手搭在她裸露的背部，手指叉开，另一手挥舞着，无疑正逐一描述胜利的过程。车子载着两人离去时，他在她脸颊献上非常不合乎华人作风的一吻，随后再补上两记。但这三吻与亲吻阿沛戈先生的女伴比较起来，诚意不可同日而语。

马路对面，柯刚才走出来的关口，铁门仍未关上。杰里动着脑筋，挡住车流，走到对面。他来到旧的殖民地墓园，葱葱郁郁，飘散着花香，头顶是枝叶繁茂下垂的大树。杰里从未到过这里，进入如此封闭的地方令他颇感震惊。墓园设在斜坡上，对面有座老旧的小教堂，逐步走进荒废的命运。教堂墙壁裂痕处处，在点点夜光中微微发亮。小教堂旁有座六角形铁丝网围成的狗屋，一只消瘦的亚尔萨斯狼犬对他愤怒咆哮。

杰里四处张望，不知道为何来这里，也不知道想寻找什么。葬身墓

园的人不分年龄、种族、教派。有白俄罗斯人的坟墓，东正教的墓碑阴沉，涡卷形装饰带出沙皇时代的光辉。杰里想像着大雪飘落在上，仍不掩其外形。另一块墓碑描述的是俄国公主马不停蹄的旅行，杰里停下脚步阅读：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至北京，附上日期，北京至上海，也附上日期，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后逝世。“祖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碑文结束得突兀。上海是中间站吗？

他重返活人世界。三名老人穿着蓝色睡衣，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没有交谈，鸟笼高挂头上枝丫，因为挂得够近，让鸟儿在车流与蝉声中彼此以音乐交流。两名掘墓工头戴钢盔，正铲土填上新坟。没有人致哀。他仍不清楚自己想找什么，不知不觉走到了小教堂台阶上。他往门内看，里面全无日光，漆黑一片。一名老妇人怒视着他。他往后退。有块招牌写着“教堂司事”，他循着指示方向前进。尖锐的蝉鸣震耳欲聋，甚至淹没了狗吠声。花香闻来湿热，带有些许腐臭。他忽然灵光一现，几乎是一道提示。他决心一试。

教堂司事和蔼而疏远，不会说英文。记录簿非常老旧，内容与古老的银行账簿相仿。杰里坐在书桌前，慢慢翻阅沉重的页片，阅读着姓名，出生、死亡、下葬的年月日。最后是图解，分区，分号。他终于找到了想找的数据，再度回到清风中，走上不同于刚才的小径，穿越浓密如云的蝴蝶群，朝上走向悬崖边。一群小学女生站在人行桥上看着他，嗤嗤笑着。他脱下外套，搭在肩上。他走过高树丛，走进大丛倾斜的黄草堆，里面的墓碑很小，坟堆只有一两英尺长。杰里小心走过坟墓，看着号码，最后来到注明七二八的低矮铁门前。铁门是长方形边界线的一部分。杰里抬头发现一尊小男童的塑像，穿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及膝短裤，披着伊顿夹克，与真人同高，石雕卷发与玫瑰花苞般的嘴唇，捧着石书朗读或歌唱，真正的蝴蝶则在头部周围翩然起舞。他是百分之百的英国男童，碑文却记载着“纳尔森·柯永在我心”。下面刻了很多日期，一时不解的杰里随后顿悟，连续十年，一年不漏，最后是一九六八，原来代表的是男童在世的十年，年年都值得珍惜留念。墓碑底座的最底层摆了一大束兰花，包装纸未拆。

柯是来感谢纳尔森保佑他胜利。如今至少杰里了解到，难怪他不喜欢记者追问他运气的问题。

有一种疲乏感，有时候只有外勤情报员能体会，是一种心软的诱惑，不慎落入，可能将与死神有约。杰里再多待一会儿，凝视兰花与石雕男童，将这些物体与他目前所知的柯联想在一起。结果他内心兴起一阵如狂浪席卷而来的感受，就那么短暂一刻，但何时出现都可能带来危险。是一份圆满的感受，仿佛他结识一家人，却发现是自己至亲。他有种抵达终点的感受。

此处这位男子，以这种方式居住，以那种方式结婚，以杰里理解起来毫不困难的方式奋斗玩乐。严格说来，这人并不特别，但此刻杰里能看穿他，比对自己的了解还清楚。他是潮州穷人子弟，摇身一变成为赛马会理事，获得大英勋章，赛马前以水管淋湿爱马。他是客家籍，海上

吉卜赛人，为儿子举行浸信会丧礼，为他雕刻英国人肖像。一个痛恨钩心斗角政治的资本家，半途而废的律师，黑道老大，开设医院却经营走私鸦片的民航公司，义助庙宇，喜欢打棒球，喜欢开劳斯莱斯。中国式庭园里盖了美国式吧台，信托账户里存了俄国黄金。如此复杂而相互抵触的特点，当时丝毫不让杰里兴起戒心。也未彰显出不祥前兆或似非而是的事实。相反的，他看到的是，上述特点与胼手胝足的柯结合为一，形成一位单一而多面相的男子，与老爸杉波并非相去甚远。这份感觉难以抗拒，维持了数秒钟，认为自己与好人同在，是他一向喜欢的感觉。重回关口时心情澄净，仿佛赢得赛马的人是他而非柯。一直等到他走上马路，真实世界才让他恢复神志理性。

车流已舒缓下来，他立即招到出租车。车子开出一百码，他才看见陆克在路边表演寂寞的回旋芭蕾。杰里劝他上车，载他到外籍记者俱乐部，赶他下车。他从富丽华酒店致电库洛寓所，让铃响两声，挂掉再拨，听见库洛破口质问：“他妈的谁啊？”他想找萨威奇先生，却遭对方呵斥，说他打错号码。他给库洛半小时，让他找另一部电话，然后走到希尔顿接听来电。

杰里告诉他，我们要的人亲自现身了。因为大胜一场而出现公众场合。结束后，一个金发美女开着跑车接他。杰里念出车牌号码。两人肯定是朋友，他说。表现得非常明显，很不像华人的作风。至少是朋友，应该这样说。

“欧洲人？”

“当然是欧洲人啦！有谁听过一个——”

“天呀。”库洛柔声说，然后挂掉电话，杰里还没机会提到小纳尔森的圣祠。

8大人物商议

美轮美奂的外交部会议中心位于卡尔登庭园，等候室里的人逐渐增多，三两成群，彼此不相往来，犹如丧礼中前往致哀的人。墙上挂了一张印刷告示，写着“警告，禁止讨论机密事宜”。史迈利与吉勒姆坐在告示下方的灯绒长椅上，郁郁寡欢。等候室呈椭圆形，装潢着建筑部门惯用的俗气过时风格。天花板绘有壁画，画中酒神巴克斯追逐着少女妖。她们远比默莉·米金更希望被追上。未装水的消防桶靠墙站，两名政府传达员守卫着通往内部的门。在弯曲的上下推窗外，秋天的日光洒满公园，晒得每片树叶松脆，互相摩擦。索尔·恩德比大步走进来，带领外交部代表团。吉勒姆只认得他的姓名。他是前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如今是东南亚事务首席专家，据说大力支持美国强硬派。伴随而来的是一名毕恭毕敬的国会事务次长，一名商业工会的代表，以及一名穿着过度花哨的男子。这名男子正朝史迈利方向踮脚尖前进，双手水平举起，仿佛逮到了史迈利打瞌睡。

“可能吗？”他低声说，感情丰富，“是吗？的确是！乔治·史迈利，如假包换。亲爱的，你掉了好几磅吧。这位年轻人是谁？别告诉我。彼得·吉勒姆。我久仰大名。据说他百折不挠。”

“啊，不会吧！”史迈利不自主地惊呼，“啊，上帝。罗迪。”

“什么意思？‘啊，不会吧。啊，上帝，罗迪。’”马丁·台尔质问，全然没有收敛之意，喃喃低声说，感情同样丰富，“应该是‘啊，是你’才对吧！‘是你，罗迪。真高兴见到你，罗迪！’言归正传。在闲杂人等进来之前，我想先问候你夫人。她最近如何？我不会到处乱讲的。能不能请两位到寒舍吃个晚餐？来宾由你们选。意下如何？对，我在名单上，如果你的小贼脑正在盘算的话，小彼得·吉勒姆，我被调动了。我做入正派。新老板欣赏我。是该欣赏我才对，看我对他们多尊敬。”

内门轰然开启。传达员之一高喊“男士们！”懂规矩的人向后站，让女士先行进入。只有两名。男士跟随在后，吉勒姆殿后。前几米犹如圆场：临时瓶颈形检查口，由看门人查看每人脸孔，然后是临时隔开的走廊，通往状似工棚的小屋，坐落于挖空的楼梯井中央。只是这个工棚没有窗户，而且是上面吊着钢丝，四周以钢缆紧紧固定。吉勒姆完全看不到史迈利人影，登上硬木阶梯、进入安全室时，他只看见蓝色夜灯下有阴影徘徊。

“动动脑筋嘛，来人啊。”恩德比咆哮，语调犹如穷极无聊的用餐者抱怨服务不周。“灯光啊，老天爷。你们这些人真可恶。”

吉勒姆进入后，门用力关上，钥匙转动门锁，电动仪器嗡嗡作响，耳朵几乎听不见。三盏日光灯嗤嗤闪烁后转为全亮，病态的惨白洒满每个人身上。

“好了。”恩德比说，然后坐下。事后吉勒姆回想，不知何以确定当

时是恩德比在黑暗中呼喊，不过有些人在出声前就能让人听见。

会议桌铺上裂开的绿色贝斯呢布，有如少年俱乐部的撞球台。外交部坐在一端，殖民部坐在另一端。双方隔桌而坐，象征了内心隔阂，而不是法令上的隔阂。过去六年来，两部正式结合，共处于外交事务部的宏伟布篷之下，但只要神志清楚的人，想必不会认真看待两部结合一事。吉勒姆与史迈利坐在中间，肩并肩，两侧各有空椅。吉勒姆观察着与会人士，竟荒谬到注意他们的服装。外交部衣冠笔挺，炭灰色西装，系上卓越特权的秘密表征——恩德比与马丁台尔皆系着旧伊顿领带。殖民部的人则如同身穿井字图案的乡下人，领带最体面的是一位皇家炮兵，是代表团的领队克理斯·威布汉，诚实正直，具有小学校长般精瘦身材，饱经风霜的脸颊浮出深红色静脉。一旁辅佐的冷静女士，身穿教堂风琴般褐色衣服。另一旁坐的是个初出茅庐的男孩，长了雀斑，一头蓬乱的姜黄头发。委员会其余人员坐在史迈利与吉勒姆对面，宛如以助手的身分参加一场他们不愿苟同的决斗，还两两成行，互相关照。肤色稍黑的是境内情报处长，其助手则是不知名的女性；来自国防部的两名肤色苍白的勇士；两名来自财政部的财金专家，其中一人是汉姆·韦尔斯，韦尔斯榔头。奥立佛·拉康远远离开众人独坐，与人绝少来往。每人双手前摆着史迈利的报告，放在粉红与红色的档案夹里，注明“最高机密，保留”，有如纪念品部卖的节目单。所谓“保留”，意思是禁止泄露给表亲。报告由史迈利起草，交由妈妈们打字，吉勒姆亲自操作复写机印刷十八页，监督二十四份的装订。如今他们的心血结晶散布在这张大桌上，摆在开水杯与烟灰缸之间。恩德比举起一份，离桌面六英尺高，然后任其降落，啪的一响。

“全都看过了？”他问。全看过。

“那我们就开始了。”恩德比以布满血丝、傲慢自大的双眼环视，“谁先开炮？奥立佛？是你找我们来的。你先请。”

吉勒姆忽然注意到，圆场与其业务的大祸害马丁台尔，竟出奇地收敛。他的双眼乖顺地固定在恩德比脸上，嘴角向下，不甚高兴。

拉康这时摆出防卫姿态。“我先声明，我和各位一样，看了报告后大吃一惊。”他说，“乔治，这事非同小可啊。要是能事先稍微准备一下该有多好。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看得有点不自在，因为我的工作是为本单位担任联络人，而最近本单位却希望切断联络关系。”

威布汉说：“说得好。”史迈利维持官僚的缄默。普利托里亚斯皱眉表示赞同。

“时机也不太对劲。”拉康接着以不祥的口气说，“我的意思是，这套理论，光是你的理论嘛，事关重大。很难下咽。很难面对啊，乔治。”

这话先为自己找台阶下后，拉康摆出“反正事态可能不算太紧急”的模样。

“我来概述一下好了。可以吗？摊开来明白讲，乔治。香港华裔名人

疑为苏联间谍。重点是这个吧？”

“经调查，他收受大笔苏联资助。”史迈利纠正他的说法，却对着自己双手说话。

“款项转自资助渗透情报员的秘密基金？”

“对。”

“单纯用来资助情报员，或者有其他用途？”

“就我们所知，完全没有其他用途。”史迈利以同样庄重简洁的语调回答。

“例如说，用来宣传，用在非正式的促进贸易行动上，回扣，诸如此类的用途。没有吗？”

“就我们所知，没有。”史迈利重复。

“啊，可惜，他们所知的，能好到哪里去？”威布汉白须下的嘴巴呼喊，“以前一向不太好嘛，对不对？”

“我想说什么，你清楚吧？”拉康问。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多的佐证。”身穿风琴褐色的殖民部女士说，亮出窝心的微笑。

“我们会的。”史迈利轻声同意。一两颗头讶然抬起。“我们要求许可，就是为了获得证据。”

拉康恢复攻势。

“暂时接受你的理论。一个秘密的情报基金，依照你的说法。”

史迈利冷淡地点头。

“有没有迹象显示，他意图颠覆香港？”

“没有。”

拉康瞥了一眼自己的笔记。吉勒姆心想，他事先做了不少功课。

“比方说，他没有倡议从伦敦提出英镑准备金吧？准备金一走，我们的赤字会增加九亿英镑的。”

“就我所知，没有。”

“他没有提倡赶我们走吧。也没有制造暴动或提倡与中国大陆统一，或是拿着条约在我们面前乱挥吧？”

“就我们所知，没有。”

“他不是追求平等的人吧？不会要求商业工会认真做事，不会要求自由选举，或是订立最低薪资，或是提供义务教育，或是提倡种族平等，或是让华人自组国会，撤除乖乖牌的什么会议来着？”

“立法会和行政会议，”威布汉脱口而出，“不是乖乖牌。”

“对，他的确没有。”史迈利说。

“这么说来，他做了什么事？”威布汉激动地插嘴，“什么也没有。没错。他们全搞错了。根本是白费心机一场。”

“其实呢，”拉康继续说，仿佛没听见，“他和有钱有势的其他华商一样，对殖民地作出的贡献可能一样多。或者一样少。他跟总督应酬，不过就我猜测，他不会去乱翻总督的保险柜吧。事实上，从外在每个角度来看，他是典型香港人，是赛马会的理事，支持慈善事业，是融合社会的支柱，飞黄腾达，乐善好施，富可敌国，具有妓院的商业道德。”

“那样讲，有点太过火了吧！”威布汉反对，“沉着一点嘛，奥立佛。那些新的住宅区，可别忘了。”

拉康再度不予理会，说：“只差没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战残抚恤金和准男爵的爵位了，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英国单位想骚扰他，为什么苏联单位想吸收他。”

“在我们的圆场里，我们认为那是很不错的伪装。”史迈利说。

“一针见血，奥立佛。”恩德比满意地说。

“噢，最近什么东西都说得上是伪装。”威布汉语调感伤，却未能替拉康解围。

吉勒姆欣然想着，史迈利撑过了第一回合，同时回忆起拉康家那顿可怕的晚饭：“希弟皮弟在墙外……泊弟佛啪一声掉下去！”他在心里念诵，向女主人致意。

“汉姆？”恩德比说。财政部曾与史迈利短暂交手一次，质疑史迈利的金融账户，进行严格调查，但除了财政部之外似乎没人觉得史迈利的逾矩与此事有所关联。

“当初准许给你秘密的散装文件，用意并不在此，”满怀韦尔斯怒火的汉姆紧咬不放，“那只是事后资金而已——”

“好了，好了，就算乔治以前是个坏小孩，”恩德比最后插嘴，阻止他继续发言，“问题是，难道他乱撒过银子吗，还是因此背着良心发财了？该轮到大英帝国请客了吧。”

接获邀约，殖民部威布汉正式起立发言，陪同的人有身穿教堂风琴褐色女士以及姜黄发色的助理。助理的年轻脸孔已摆出勇于护主的态势。

有些人一开始思考，往往忘记时间，威布汉就是这种人。“对，”思考了一世纪，他才开口，“对。对。可以的话，我希望先从钱开始谈起，和拉康一样。”至此明朗化的是，他认为此报告进犯了他的领土。“因为钱是我们目前惟一能查的线索。”他语气尖锐，翻过档案夹里的一页。“对。”之后又是一段永无止境的沉默。“你这里说，这笔钱最先从巴黎流向万象。”停顿。“然后俄国人等于是改变方式，可以说，改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渠道支付。汉堡加万象加香港的组合。可以说，复杂得无

以复加，无所不用其极的逃避。我们先把你的说法当真来看，好吗？可以说，同样款项，不同来源？对。他们为什么那样做，你有什么看法？”

对口头禅最敏感的吉勒姆记下，可以说。

“隔一段时间更动固定方式，是很合情合理的做法。”史迈利回答，说出报告里已提出的解释。

“情报手法，克理斯。”恩德比插嘴。他喜欢用术语。表情依旧乖顺的马丁台尔对他投以景仰的眼神。

威布汉再度慢条斯理热身起来。

“我们应该从柯做的事来探讨。”威布汉高声说，带有费解的热诚，指关节在绿布上嗒嗒敲。“而不是看他得到了什么。我的论点在此。再怎么讲啊，那钱又不是柯自己的钱，对吧？法律上来说，跟他没有关系。”这个论点引来一阵迷惑的肃静。“第二页，最上面。钱全存在信托里。”众人纷纷伸手翻开档案夹，惟有史迈利与吉勒姆例外。“我是说，不只是一毛钱未花，本身就有点怪异——这一点稍后容我再谈——根本算不上是柯的钱。钱存在信托里，领取人出面时，不管是男是女，钱才归这人所有。可以说，领取人出现前，钱是信托里的钱。所以，我想说的是，柯做错了什么事？开了信托账户吗？又没有法律禁止开信托账户。家常便饭。特别是在香港。信托的受益人呢？可能住在随便一个地方！莫斯科啦，或是廷巴克图14……”看来他想不出第三个地名，所以说不下去，让姜黄头发助理不甚自在。助理对吉勒姆怒目相向，仿佛想挑战他。“重点是，对柯不利的地方是什么？”

恩德比拿根火柴凑在嘴边，以门牙卷动着。或许是察觉到对手说得有理却词不达意——而他的专长却往往相反——因此取出火柴，看着潮湿的一端沉思。

“拇指纹呢，又有什么关系，乔治？”他问，或许是趁机挫挫威布汉的锐气，“像是小说家欧本海姆写的东西嘛。”

吉勒姆心想，伦敦上流口音，是语言崩盘的最后阶段。

史迈利的回答所带的感情，大约可比拟报时钟。

“中国沿海使用指纹来从事金融活动，由来已久，因为旧时文盲到处都是。很多海外华侨比较喜欢英国银行，不喜欢华人银行，这种账户的结构一点也不特别。开户时没有指定受益人，以视觉方式验明身份，例如从中撕开钞票，或以左手拇指盖印，因为右手经劳动的磨损比左手严重。只要开信托账户的人保障受托人不受意外支付或不当支付的风险，银行不太可能过问。”

“谢谢你，”恩德比说，继续以火柴棒挖嘴，“我猜大概是柯自己的指纹吧。”他暗示。“没人规定不行吧？这样看来，钱的确是他的没错。如果他既是受托人又是受益人，钱当然是他自己的。”

对吉勒姆而言，这件事已出现相当荒诞而错误的转折。

“那只是纯粹臆测而已。”过了寻常的两分钟沉默后，威布汉说，“假设柯是帮朋友一个忙。只是暂时假设而已。这个朋友是个骗子，或是隔好几层关系跟俄国人做生意。华人啊，最喜欢搞阴谋了。可是说，用到所有诡计，连心地最善良的华人都一样。柯也是，我敢担保。”

姜红头发男孩首次开口，正面支持老板的论点。

“这份报告依据的是谬论。”他唐突地宣布，对象是吉勒姆多于史迈利。吉勒姆心想，十六岁的清教徒，以为性爱伤身，以为间谍行动有违道德。“你们说柯拿俄国人的钱，帮他们办事。我们说，没有证据显示如此。我们说，信托可能含有俄国人的钱，不过柯和信托是不相干的两个个体。”愤慨之余，他的发言拖得太长。“你们谈的是有罪。我们呢，则认为柯没有触犯香港法律，应该享受殖民地子民应享的权利。”

几个嗓音同时扑向前去。拉康的嗓音获胜。“没人在谈有罪没罪的问题，”他反驳，“这里一丁点儿也扯不上犯罪。我们谈的是安全。很单纯。安全，以及有无意愿调查明显的威胁。”

韦尔斯榔头的财政部同事是个表情阴沉的苏格兰人，风格淡而无味，与那个小男生一样。

“没人打算侵犯柯的殖民地人权，”他脱口而出，“他什么权利都没有。香港法里又没规定总督不能拆开柯先生的信件、监听柯先生的电话、收买下女或在他家安装窃听器，搞到天下大乱为止。没有一条法律禁止。要是总督高兴，还有其他几件事可做。”

“同样纯属推测，”恩德比说，一眼瞥向史迈利，“圆场反正也没有地区性的编制耍这些把戏，就算有，反而会危及他们的安全。”

“会惹出丑闻的。”姜黄发男孩说得很不明智。恩德比懂得品味美食的眼睛抬起。眼球因一生享用午宴而变黄。他以眼光记下姜黄发男孩一眼，以便未来处置。

第二回合交战到此结束，并无结论。众人如此你来我往，一直讨论到休息喝咖啡为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尸体。吉勒姆认定，第二回合平手。他意志消沉地想，究竟会举行多少回合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在嘈杂声中压低声音问史迈利，“讨论再久，他们也不能把这件事变不见。”

“他们必须将这件事变小，小到他们的尺寸。”史迈利以不带批判意味的语气解释。除了这句话外，史迈利似乎坚决效法东方人自我贬抑的作风，任凭吉勒姆再如何旁敲侧击，他仍不愿恢复原来的他。恩德比叫人来倒烟灰缸。国会事务次长说，大家应该努力谈出个进展。

“想想看，光是找我们坐在这里，要花掉纳税人多少钱。”他骄傲地督促大家。距午餐时间仍有两小时。

第三回合开始，恩德比提议讨论是否告知香港政府。以吉勒姆的见解，他认为恩德比爱说笑，因为影子殖民部（恩德比如此称呼他平凡的

同行)的立场仍是没有威胁的存在,因此无需通知任何人任何事。然而诚实正直的威布汉未看清此陷阱,掉了进去,说:

“我们当然应该告知香港!他们是自治区。我们别无选择。”

“奥立佛?”恩德比镇定如手握好牌的赌客。拉康抬头,显然讨厌被拱出来。“奥立佛?”恩德比重复。

“我很想讲的是,这是史迈利的案子,是威布汉的殖民地,我们应该让他们自行解决。”他坚定中庸的立场。

史迈利只好说:“好吧,如果是总督,我就不太能反对其他人了,”他说,“换句话说,如果你们认为不算太麻烦他的话。”他说得模棱两可,吉勒姆看到姜黄发男孩再度扬首。

“太麻烦总督,扯什么鬼?”威布汉质问,这下子真正迷糊了,“他是经验丰富的行政官,精明干练的协商人。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为什么太麻烦?”

这一次,停顿的人换成史迈利。“从此他的电报,都要亲自锁码解码了。”他沉思后说,仿佛直到现在他才恍然大悟地考虑所有的影响。“我们当然不能让他的部属分享秘密。那样对任何人而言都太麻烦了。个人密码手册——我们当然可以帮他弄几本。若有必要,帮他恶补密码。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总督显然有必要继续在社交场合上接见柯,因此总督会被迫扮演卧底密探的角色。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打草惊蛇。他会不会在意呢?也许不会。有些人扮演起来轻松自然。”他瞥了恩德比一眼。

威布汉已开始说教了。“可是,天啊,老兄,如果柯是苏联间谍,我们可没说他是,如果总督私下请他吃晚餐,完全合情合理。若不小心泄露了机密,那样的话,也太不公平了,会坏了他的前途哪。更不用说会对香港造成什么危险!一定非告知他不行!”

史迈利的睡意更加浓厚了。

“对,当然了,如果他行事不够谨慎的话,”他顺从地喃喃说,“可能有人会说,根本就不适合通知他。”

冰冷的沉默中,恩德比再度懒洋洋地取出口中的火柴。

“后果会变得很怪,对不对,克理斯,”他欣然对会议桌另一端的威布汉高声说,“如果北京哪天早上醒过来,高高兴兴听见身兼女王代表、三军统帅等等的香港总督,居然每个月宴请莫斯科的王牌间谍,还颁发奖章给他。他目前为止拿过什么?没册封骑士吧?”

“大英勋章。”某人很轻地说。

“可怜的家伙。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大有前途。他会继续往上爬,跟我们一样。”

其实恩德比早已受封骑士,而威布汉则由于殖民地日渐减少,册封

之途上遇到塞车。

“本案不成立。”威布汉断然说，一只毛茸茸的手平放在眼前颜色艳丽的档案夹上。

接下来是自由讨论时间，在吉勒姆的耳里算是间奏曲，是众人默契下让小角色提出无关痛痒的问题，以求列名会议记录。韦尔斯榔头希望现在、当场确定，假使莫斯科中心的五十万元最后掉进英国手里，应该如何处置。他警告，这笔钱无疑会由圆场吸收。财政部具有独家处置权。懂了没有？

懂，史迈利说。

吉勒姆开始察觉出一道鸿沟。有些人假设，就算是假设得不情不愿，也认为这项调查是既成事实；也有一些人继续打后卫战，避免调查开始进行。他惊讶地发现，韦尔斯榔头似乎宁可进行调查。

一连串有关“合法”与“非法”驻地情报单位的问题，尽管讨论起来累人，却有助于巩固对红色灾难的恐惧心。国会派的勒夫希望明确定义出两者的相异处。史迈利捺着性子解释。他说，“合法”或“台面上”的驻地情报员，是顶着官方或半官方防护罩的情报官。北京对俄国敏感，港府为了尊重北京，禁绝苏联在香港建立任何形式的代表，无论是大使馆、领事馆、塔斯社、莫斯科电台、俄新社、苏联民航、苏联国际旅行社，以及其他合法驻地传统上方便利用的国家机构，全部免谈。因此就定义上而言，苏联在香港的任何活动，都是由非法或台面下的单位进行。

他说，在这个前提下，圆场的研究员才发现这笔款项的动线。他避免使用术语“金棱线”。

“那可妙了。是我们把俄国人逼上梁山了，”勒夫满意地说，“要怪就怪我们自己。是我们害惨了俄国人，现在他们反扑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上一任政府的烂账，由我们来收拾。根本不是我们的错。去引诱俄国人上钩，结果自作自受。理所当然。我们只是和往常一样自食恶果而已。”

“在这之前，俄国人在香港有什么机构？”内政部一个聪明的办公男孩问。

殖民部立刻生龙活虎起来。威布汉开始奋力翻阅档案夹，但一看红发助理急于表现的态度，他喃喃地说：“约翰，这题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说完靠后坐，表情凶悍。褐衣女士对着有破洞的绿桌布愁眉苦脸地微笑，仿佛记得桌布无破洞时的模样。小男生第二度出击，战果惨烈：

“我们认为，先例能提供非常好的教训，”他野心勃勃地开始说，“莫斯科中心先前想在香港建立小小的立足点，一概半途而废，完全属于低层次的做法。”他滔滔不绝搬出一堆乏味的例子。

他说，五年前一名俄国人假冒东正教修道院院长，从巴黎飞来希望与硕果仅存的白俄罗斯社群搭上线，“这人想强征一个开餐厅的老头为莫

斯科中心服务，结果立刻被逮捕。比较接近现在的案子，是俄国货轮进港修理，船员趁机上岸，想吸收左倾的码头工人和仓储工人，结果手法拙劣，被逮捕、被侦讯、被媒体当做傻瓜来耍，最后被软禁在货轮上，直到离港为止。”他继续道出无关痛痒淡而无味的实例，在场人都越来越觉昏睡，等着他说完最后一例。“我们的政策每回都完全一样。一旦他们被抓，马上就公然示众。记者想拍照？欢迎，拍越多越好。想找他们上电视？快去架好摄影机。结果呢？北京嘉奖我们，感谢围堵苏联的扩张。”激动过头了，他竟敢直接面对史迈利发言。“所以说嘛，你刚才所谓的非法情报网，老实讲，我们不相信。合法，非法，台面上下，我们的看法是，圆场其实是想求情，希望能东山再起！”

吉勒姆开口打算予以反驳，却感觉到手肘被人按住，因此闭上金口。

现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威布汉的表情比其他人都来得尴尬。

“依我看来是放烟幕弹，克理斯。”恩德比一本正经地说。

“目的是什么？”威布汉紧张地质问。

“只是响应你的打手帮你提出的见解而已，克理斯。烟幕。欺敌。俄国人会在敌人可见之处挥舞军刀，趁敌人的头全转错边时，他们在香港岛另一边干坏事。斗智，柯大哥。对不对，乔治？”

“这个嘛，我们的见解的确如此，”史迈利承认，“我想我应该提醒你，其实报告里有提到，海顿本人一直急着辩称，俄国人在香港搞不出名堂。”

“午餐。”马丁台尔以不太乐观的语气宣布。

他们上楼用餐，气氛低迷。是面包车送来的餐点，盛在外膳塑料餐盘上。餐盘中的间隔不够高，吉勒姆的布丁流进牛肉里。

填饱肚皮后，史迈利利用餐后头脑迟钝的机会，提出拉康之前说的恐慌因子。更确切而言，他希望在会议中确立苏联在香港抢滩背后的逻辑，就算柯案不成立亦然。

香港是中国第一大港，如何处理百分之四十的国际贸易。

香港居民中，据估计每年有五分之一合法进出中国，只不过重复进出的人无疑提高了这个平均数字。

中国大陆如何私下在当局默许下，在香港维持一流团队，有协商专家，有经济学家与技术人员，以关照北京的贸易、船运、开发等权益。团队成员，人人无不是理所当然的吸收目标，以进行各式秘密行动。

香港的渔船与帆船队，可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沿海两边重复注册，自由进出中国领海——

恩德比打断他的话，慢条斯理地提出相关问题：

“柯拥有帆船队。你不是说过，他是海上最后勇士？”

“对，他的确是。”

“不过他并没有亲自到大陆去？”

“没有，从来没有。他派助理去，我们猜柯本人不去。”

“助理？”

“他有个经理人，姓刁。两人合作已经二十年了。或者更久。两人背景一致，客家人，出上海等等。他有好几家公司，都是找刁来挂名。”

“刁定期去大陆吗？”

“一年至少一次。”

“走遍各地喽？”

“广州、北京、上海，根据记录。但记录不见得完整。”

“不过柯却待在家里。奇怪。”

这一方面由于无人提出进一步问题或意见，史迈利继续向大家介绍在香港成立间谍基地的优点。香港很特别，他简单说。想在中国抢占立足点，从香港出发只要花十分之一的资源，全球无人能比。

“资源！”威布汉附和，“换成诱惑，比较妥当吧。”

史迈利耸耸肩。“随你便，诱惑就诱惑，”他同意，“苏联的情报单位抗拒不了这些诱惑，人尽皆知。”在会意的笑声中，他继续重述莫斯科中心迄今试图对付中国的目标所作的努力，这是康妮与狄沙理斯联合撰写的摘要。他描述莫斯科中心努力从北方进击，整批吸收并渗透境内华人。无功而返，他说。他也描述出一大监听网络，沿着四千五百英里的中苏陆地边界建立。成效不彰，他说，因为监听成果属于军事方面，而威胁在于政治方面。他也重述苏联曾接触台湾的谣传，向台湾提议合作对抗大陆威胁，联合情报作业，分享成果。回绝，他说，或许用意在于恶作剧，以惹恼北京，不能看表面而误以为真。他也举例说明俄国人在海外华侨大城如伦敦、阿姆斯特丹、温哥华与旧金山，吸收人才。他也稍微提及莫斯科中心数年前秘密向表亲提议建立“情报资源库”，开放给同以中国为敌人的国家使用。没有成果，他说。表亲不从。最后他提到莫斯科中心长年对付北京驻外官员的历史，以霸王硬上弓与贿赂的方式进行活动。成效不明，他说。

——讲述完毕后，他往后坐，重新说明引起这阵风波的理论。

“莫斯科中心迟早必须进入香港。”他说。

这话再将话题转回柯，也转到罗迪·马丁台尔身上。在恩德比的鹰眼下，罗迪会主导下一场真枪实弹的争论。

“乔治，那笔钱做什么用？我们刚才听过了一堆理由，说明那笔钱不是用来做什么，也听到了一毛钱也没花。可是我们却没有进展嘛，对吧？好像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同样的老问题是，钱是怎么赚到、怎么花用、我们应该怎么办？”

“总共三个问题。”恩德比压低嗓音，残酷地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史迈利木然说，“所以才要求许可，以利调查。”

财政部的某人说：“五十万算很多吗？”

“就我经验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数字。”史迈利说，“莫斯科中心，”——他谨慎避免用到卡拉——“无论何时都痛恨收买忠诚。以这个数字收买，就他们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可是，他们收买的是谁的忠诚？”有人抱怨。

竞技场斗士马丁台尔再度攻击：“乔治，你有事情隐瞒着，我知道。你有一些直觉，你当然有。赶快讲出来嘛，别扭扭捏捏的。”

“是啊，难道不能提出一些看法，我们来讨论讨论？”拉康说，口气同样哀怨。

“稍微讲一点，有什么不行？”汉姆恳求。

即使在三方攻击之下，史迈利仍不为所动。恐慌因子总算有代价。是史迈利亲自触动的。他们有如吓坏了的病人，恳求他作出诊断。而史迈利拒绝诊断，推说资料不足。

“真的，我手上的事实全报告给各位了。要我在现阶段说出个人臆测，用处不大。”

会议进行至此，褐衣殖民部女士首度开口。她的嗓音聪慧，韵律优美。

“就先例来说呢，史迈利先生？”——史迈利低头做出微微鞠躬的姿势——“俄国人的钱，以前有没有付给利害关系人的例子？比方说在其他战区？”

史迈利并未立即回复。距离他身旁仅几英寸的吉勒姆发誓，他感觉气氛突然紧绷，如同能量直冲而上，传遍史迈利全身。但他瞥见史迈利无动于衷的侧面时，只见倦容渐深，微微压低疲惫的眼皮。

“从前发生过几个例子，我们称为赡养费。”他终于让步。

“赡养费，史迈利先生？”殖民部女士重复，一旁的姜黄头发男孩眉头皱得更加厉害，仿佛他不赞同离婚。

史迈利高度戒备恐惧，避免踩到地雷。“显然有些情报员，在敌对国家活动——以苏联的角度而言属于敌对国家——碍于伪装，无法享受外勤活动时赚取的金钱。”褐衣女士秀气点头，表示了解。“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把钱存进莫斯科的银行，等情报员能自由花用时再供其花用。或者是给家属——”

“如果不幸殉职的话。”马丁台尔饶富兴味地接下。

“可是，香港不是莫斯科啊。”殖民部女士微笑提醒他。

史迈利速度放慢，几乎停顿下来。“在很罕见的例子中，动机是钱，而情报员或许最后不愿定居苏联，这时莫斯科中心据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安排他们定居瑞士之类的国家。”

“不是定居香港？”她追问。

“不会。从莫斯科过去的做法分析，竟然会付出这么一大笔赡养费，令人难以想像。别的不说，情报员收了这么多钱，会成为从外勤退休的一大诱因。”

众人大笑，但当笑声退去时，褐衣女士已准备好下一个问题。

“但是，一开始的款项微薄，”她以愉悦的神情追问，“诱因只在最近的日期才发作吧？”

“正确。”史迈利说。

正确得很哪，吉勒姆心想，一面开始警觉。

“史迈利先生，如果对俄国人的利益够大，你认为他们准备压下反对声浪，付这么多钱吗？毕竟以绝对值而言，那笔钱和重大情报优势比较起来，根本不够看。”

史迈利哑然无语，纹丝不动。他保持礼貌，甚至挤出微微一笑，但他根本不想继续臆测下去。幸好恩德比这时以见怪不怪的语调慢条斯理发言，挡开了女士的问题。

“各位小朋友，不留意点，可能会整天谈理论，谈个没完没了，”他边大叫边看表，“克理斯，要不要找美国人？如果不通知总督，对其他英勇的盟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

乔治幸免于难，吉勒姆心想。

一提到表亲，殖民部威布汉如愤怒的蛮牛般直闯而入。吉勒姆猜他感觉到这问题即将浮现，因此决心在初露端倪时立刻砍除。

“否决，抱歉了，”他脱口而出，丝毫不见他惯用的拖延战术，“绝对否决。理由一牛车。先说主权好了。香港是我们的领土。美国连个鸟权都没有。再来，柯是英国子民，有权接受我们的保护。我猜这样讲，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老实讲，我才管不了那么多。让美国人知道，他们肯定气到没力。以前看过了。天知道他们何时能罢手。第三，是礼数方面的小问题。”他以反讽的方式说。他诉求的对象是前任大使，希望煽动其同情心。“只是小问题而已，恩德比。通知美国人却没通知总督嘛，假如我是总督，碰上这种状况，我会摸摸鼻子回家吃自己的。就只有这样而已。换了你，你也会这样做。我知道你会。你知道。我也知道。”

“假设你后来发现的话。”恩德比纠正他。

“别担心。我一定会发现的。我会先找人偷偷潜进他家，装上窃听器。非洲有一两个地方可以放他们进去。灾难。死光光。”说完前臂重重落在桌上，一手压在另一手上，怒气冲冲地瞪着双手。

这时只闻一阵急促的突突声，仿佛舷外马达声响，表示一台电子整流器接触不良，喘不过气后恢复正常，再消失在听力范围之外。

“敢要弄你的人，一定胆大无比，克理斯。”恩德比喃喃对着紧绷的寂静说，露出仰慕而灿烂的微笑。

“赞成。”拉康突然说出。

他们知道，吉勒姆简单地想着。乔治已经协调过了。他们知道乔治与马铁娄交换条件，他们知道他不会说出口，因为他决心不动声色。然而那天吉勒姆没看见任何明显迹象。别将美国人扯进来这一问题，看似直截了当，尽管财政部与国防的派系谨慎地附和，史迈利本人显得满心不愿意加入，神秘至极。

“不过，这份初步情报究竟如何处理，仍然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他说，“我是说，万一你决定禁止本单位追查下去的话。”他在一团雾水中添加了疑虑。

吉勒姆发现恩德比同样困惑，因此松了一口气。“讲什么鬼东西？”恩德比质问，大动一番脑筋。

“整个东南亚，柯都有投资，”史迈利提醒大家，“报告的第一页。”商业；哗啦一大叠。“举例来说，我们得到的信息显示，他通过白手套和中间人，经营了五花八门的行业，如好几家西贡夜总会，总部设在万象的航空公司，也拥有泰国一支油轮船队的股份……这些企业当中，有几家大可被视为具有政治内涵，全在美国影响力范围之内。假如要我忽视现行的双方协议，我自然必须取得各位的书面指示。”

“继续说下去。”恩德比命令，再从面前火柴盒取出另一支火柴。

“噢，我已经讲完了，谢谢，”史迈利客气地说，“真的，道理非常简单。进行调查，拉康告诉我，进行调查，才能平衡现今的可能性，假设我们不进行调查，我能怎么办？把这份情报丢到垃圾堆去？或是在现行的情报交换条约下，交给我们的盟友处理？”

“盟友，”威布汉大喊，口气不满，“盟友？你简直是拿手枪对准我们自己的头啊，老兄！”

史迈利硬邦邦的响应，在刚才被动的气氛中显得更加令人心惊。

“本委员会指示过我，必须修复英美关系，这项指示仍有效力，写在我的契约上，是你们亲笔写的，命令我尽全力培养特别关系，恢复双方互信的精神。互信的精神在海顿之前存在过。帮助我们重返上座，你们说过……”他正面看着恩德比。

“上座，”有人附和——至今鲜少发言，“不如说成献祭台吧。在这个献祭台上，我们已经宰过中东和半个非洲。只是为了培养特别关系。”

但史迈利似乎充耳未闻。他再度显出哀伤而不情愿的表情。他的悲情脸孔诉说着，有时候，公事的重担简直压得他直不起腰杆。

午餐后，重新漾起闷闷不乐的气息。有人抱怨烟味太重。因此召来传达员。

“抽风机怎么一回事？”恩德比不高兴地质问，“都快闷死了。”

“零件有毛病，”传达员说，“几个月前就申请过了，长官。现在想一想，是在圣诞节之前申请的，长官，都快一年了。看来要怪就怪罪事情耽搁了，长官。”

“天啊。”恩德比说。

茶水端了进来，盛在纸杯里，漏到桌布上。吉勒姆将心思转到默莉·米金完美的身材。

将近四点，拉康才满面轻蔑地起立，站在众人面前，邀史迈利说明。“讲实际一点，乔治，你究竟想要什么？全摊开来，大家一起讨论个结果。”

表现出热心的话，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史迈利似乎了解这一点。

“第一，我们需要在东南亚战区活动的权利与特许，这事可以商量。好让总督能跟我们断绝关系，”——对国会事务次长瞄一眼——“这边的主子也可以跟我们断绝关系。第二，在国内进行某些调查。”众人纷纷骤然抬头。内政部立刻不安地骚动起来。为什么？谁？如何？什么调查？如果是国内，应该找对方商量。境内情报处的普利托里亚斯已骚动起来。

“柯在伦敦读过法律，”史迈利强调，“他在这里有人脉，包括社交和企业界，我们没有道理不调查这些人。”他瞥了普利托里亚斯一眼。“会将所有调查结果摊开给竞争对手看。”他承诺。他继续陈述。

“至于金钱，我的报告完整分析了目前所需的各条款项，另外也对紧急应变方案作出估价。最后，我们要求地方层级和白厅的许可，恢复香港驻地的工作，作为此次行动的前置基地。”

最后这项要求震惊全场，众人陷入沉默，吉勒姆也讶然以对。就吉勒姆所知，在先前与圆场的讨论中，或与拉康对谈，或与任何人商议时，都未提及这一项，甚至连史迈利本人也不动声色，全不触及重开巍安居或派遣继任人选的问题。新一轮的喧嚷声再起。

“若无法办到，”他最后说，音量压过反对声浪，“如果无法建立驻地，恕我们要求，最低限度应闭眼核准在香港指挥台面下的情报员。当地人不知情，但是由伦敦方面核实、保护。现有的情报来源，就地合法化，白纸黑字。”他画下句点时对拉康狠狠瞄一眼，然后起立。

情绪低迷的吉勒姆与史迈利，再度坐在等候室，坐在刚才的鲑鱼色长椅上，肩并肩，如同朝同一方向前进的乘客。

“为什么？”吉勒姆一度喃喃地问，然而这天若向乔治·史迈利发问，不仅有失格调，而且是明言禁止的活动。高挂墙上的告示如是说。

手中握烂牌，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玩下去，这是最傻的一种玩法，吉勒姆心灰意冷地想。被你搞砸了，他想。可怜的老家伙，终于过气了。偏偏这次行动可以让我们重现江湖。贪婪之心啊，就这么简单。老间谍欲速则不达。我会跟在他身边的，吉勒姆心想。船要沉，我也跟着沉下去。一起去开个养鸡场嘛。由默莉来管账，安恩可以跟工人共谱乡间艳曲。

“你觉得怎样？”他问。

“不是觉得怎样的问题。”史迈利回答。

好心没好报，吉勒姆心想。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转眼已过二十分钟。史迈利纹丝不动，下巴落至胸口，双眼闭上，或许正进行祷告。

“你今晚休息一下比较好吧。”吉勒姆说。

史迈利只是皱眉。

一名传达员出现，请他们重回会议室。拉康如今端坐上座，采取长官的言行举止。恩德比距离他两个座位，正与韦尔斯榔头窃窃私语。普利托里亚斯的怒容如山雨欲来，不知名的女士伫立着紧皱双唇，无意间作出反对之吻。拉康摇摇手中笔记，要求肃静，然后有如爱卖关子的法官，开始逐一朗诵委员会讨论结果，再读出判决。根据会议记录，财政部严正抗议史迈利违规使用管理账户。此外，史迈利亦应谨记在心，要求国内的授权、许可，应该事先征求境内情报处同意，而非“在召开正式委员会时如小白兔跳出帽子，掉在他们身上”。重开香港驻地一事无从讨论起。单从时间问题来看，这一步窒碍难行。他暗示，提出如此要求其实算是厚颜无耻。此事涉及原则问题，必须请示最高层。既然史迈利已明确反对通知总督——说到这里，拉康举手向威布汉敬礼致意——在可预见的未来，重新建立驻地是难上加难，特别是，请记住，巍安居撤离时那段令人不悦的新闻仍挥之不去。

“尽管满心不愿意，我必须接受各位的见解。”史迈利语气沉重。

拜托老天爷啊，吉勒姆心想，要倒下去，至少先大战一场嘛！

“如何接受，随你便。”恩德比说。吉勒姆敢发誓，他看到恩德比与韦尔斯榔头两人眼睛闪现一丝胜利的光芒。

狗杂种，他心想。算你捡到便宜。他在心中向整群人告别。

“至于其他部分，”拉康边说边放下一张纸，拿起另一张，“在部分条件下，在顾及合适性、金钱与特许的期限之下，本会核准。”

公园空无一人。中下阶层的上班族退去，让位给专业人士。几个情侣躺在潮湿的草地上，有如战后士兵。几只红鹤打着盹儿。吉勒姆心情愉快地跟在史迈利身后漫步，罗迪·马丁台尔则走在他身旁，对史迈利大加颂扬：“我觉得乔治真的很杰出，天下无敌，而且具有掌握力。我仰慕掌握力。人类所有特质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掌握力。乔治掌握得没话

说。调职后，对这些事务的看法大不相同。我承认，成长了不少。你父亲生前是阿拉伯专家，我好像记得。”

“对。”吉勒姆说，心思再次转向默莉，心想是否仍有时间共进晚餐。

“令人肃然起敬的《哥达年鉴》。他喜欢A.D.还是B.C.？”

吉勒姆正要回以淫秽不堪入耳的答案时，及时回过神来，想到马丁台尔问得毫无邪念，只是想知道他父亲做学问的偏好，研究公元前（B.C.）还是公元后（A.D.）？

“噢，公元前啦——绝对是公元前，”他说，“要是他有能力，一定会回到伊甸园。”

“一起来我家吃晚饭。”

“谢谢。”

“来帮你介绍个女伴。换换口味，谁比较好玩？你对谁有意思？”

他们听见两人前方有人声飘浮于雾气沉重的空气中，是恩德比拖长尾音的口音，庆贺着史迈利的胜利。

“会议开得不错。谈出不少结果。没泄露什么东西。牌打得不错。这事一成功，你们就准备加盖大楼了吧？表亲呢？他们会跟着玩吧？”他咆哮，仿佛仍置身安全室，“那边，你测试过状况了吗？他们会帮你忙，不会霸占整场赛事吧？有点让人七上八下吧，应该是，不过我认为你们有能力应付。你告诉马铁娄，叫他有平底鞋的话穿平底鞋，不然马上就跟香港人吵个没完了。威布汉真可怜。原本印度归他管，应该很不错的。”

在他们两人更远处，几乎被树木挡住，矮小的韦尔斯榔头对着拉康生龙活虎地比手画脚，拉康则弯腰以免听漏。

吉勒姆心想，这阴谋也搞得不错嘛。他回头一看，看见法恩快步跟来，甚感惊讶。一开始他似乎距离遥远。阵阵浓雾完全遮掩了双腿，只有上身露出雾海之上。转眼间他已跟上，吉勒姆听见他熟悉的噪音，哀怨刺耳地叫着“长官，长官”。希望引起史迈利的注意。吉勒姆迅速抛开马丁台尔，不让他有机会旁听，自己跨步走向前去。

“到底怎么啦？干吗大声嚷嚷？”

“他们发现一个女孩子！长官，是沙赫斯小姐，她派我来特别通知他。”法恩双眼明亮，略显疯狂，“跟主子说，他们找到女孩了。一字不漏。亲自通知首领。”

“你是说，是她派你来的？”

“立刻亲自通知头子。”法恩语带闪躲地回答。

“我问的是：‘是她派你来的吗？’”吉勒姆动了肝火，“回答，‘不是，长官，她没有派我来。’你这个可恶的小子，装模作样，穿着布鞋跑遍全伦敦！你神经有问题。”他从法恩手里抢过捏皱的字条，随便看过。“连

名字都搞错。歇斯底里胡说八道一通。你直接回家，听到了没？头子回去后会亲自处理。再像刚才那样大声嚷嚷，看我要不要收拾你。”

“到底是哪里来的啊？”吉勒姆回来后马丁台尔询问，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小东西真可爱！所有的间谍都像他一样漂亮吗？多富有威尼斯风情啊。我应该自愿当一次间谍看看。”

同天晚上，喧闹室召开非正式会议，会议质量并未因欢乐气息而有所提升。欢乐气息来自史迈利在程序会议上的胜利，以康妮而言却来自杯中物。过去数月来的忍耐与紧绷后，康妮朝四面八方进击。那个女孩！线索在那女孩身上！康妮摆脱智慧上的枷锁。派托比·伊斯特哈斯去香港，给她房子住，对她拍照，跟踪她，搜她房间！找山姆·科林斯过来，马上去！狄沙理斯动来动去，假笑着，抽着烟斗，抖着双脚，但这天晚上，他完全臣服在康妮的魔咒下。他甚至一度提及“通往事物核心的自然线索”，意思仍是那位神秘女郎。难怪小法恩也被他们的热度感染。吉勒姆在公园对法恩发脾气，如今几乎感到抱歉。其实，若无史迈利与吉勒姆稍微浇熄热火，当晚他们极可能集体做出傻事，天知道这样的傻事会不会“扯出”什么样的后果。情报世界里，神智正常的人因此骤然失常，实例不胜枚举，但吉勒姆是首度见识到这种现象。

因此直至十点以后，才为老库洛草拟出一份简报，十点过半，吉勒姆走向电梯时才睡眠惺忪地撞见默莉·米金。偶遇正合彼得·吉勒姆之意——或者默莉事先计划过？他无从得知——结果在他生命中点燃烽火，从此猛烈燃烧着。默莉以平常那副默许的表情，同意让吉勒姆开车送她回家，只不过她住在海格区，距离他住处有数英里之遥。来到前门阶时，她一如往常请他进门喝一小杯咖啡。由于吉勒姆预期碰上熟悉的钉子——“不行彼得，拜托彼得，亲爱的，对不起”——吉勒姆眼看即将被婉拒，此时他看出对方眼神有种镇定的刚毅，因此改变心意。一走进她的公寓，她便关上门，拴上链条，然后端庄地牵他进卧房，充满欢愉高雅的肉欲，令他大开眼界。

9库洛的小战舰

四十八小时后在香港是星期日晚上。库洛在小巷子里小心走动。由于起雾，暮色提早降临，却因住家过于紧密接触，容不得暮色进逼，因此高挂数层楼上，与晒衣绳和电线同高。高温、污染的雨珠喷洒而下，小吃摊的柳橙香味随之扬起，滴答打在库洛草帽檐。他人在中国，身处海平面，他最爱中国的这一面。而中国人正逐渐清醒，准备庆祝夜晚来临：歌唱声、喇叭声、警报声、锣声、讨价还价声、烹饪声、以二十种乐器演奏小调，或是一动也不动站在门口，观看这位外表华丽的洋鬼子小心翼翼东闪西躲。这些库洛全都喜欢，却最疼爱小战舰，华人都如此称呼他们的秘密耳语人。其中他最疼爱的是菲比·崙费尔，是典型而平实的例子。这趟路为的就是去看她。

他吸了一口气，品味熟悉的乐趣。东方从未让他失望过。“阁下，我们对他们殖民，我们腐化他们，我们剥削他们，我们轰炸他们，抢尽他们的城市，无视他们的文化，再以我们分支无穷的宗教派系来混淆他们。我们又丑又臭，让他们遮眼又掩鼻。欧洲人之臭，让他们退避三舍，而我们钝到不自知。然而我们坏事做绝，还拼命想更尽力使坏，却几乎无法探知亚洲微笑下面的奥秘。”

其他独自前来此地的欧洲人，可能就不是如此心甘情愿了。山顶那帮人，就不会知道这地方的存在。居住跑马地的英国太太，整日闭关于政府住宅区，若来到这里，会发现本地最令她们讨厌的事物全集中在此。此区并非治安欠佳，但也不是欧洲。欧洲风情的中环与毕打街距离这里半英里远，那里电动门为你开启，迎接你进入空调室。其他欧洲人在担忧之余，恐怕会在无心的情况下瞪人几眼，那可太危险了。在上海，库洛知道因看人不顺眼而意外死亡的事件不下一桩。尽管库洛注视的眼光一向亲切，他尽量让步，言行举止保持谦逊。停下来购物时，他会向路边摊业者客气问好，他的广东话词汇丰富，发音却不标准。付账时，业者会因他是异族而加价，他也不找碴。

他买的是兰花与小羊肝。每星期日都买，光顾所有竞争的摊位以示公平。广东话派不上用场了，他会搬出辞藻华丽的英语来应付。

他按下门铃。菲比与库洛一样，都装有门口对讲机。总部曾下令，对讲机应该属于标准配备。她在信箱里塞进一片石南以招来好运，而这也是安全讯号。

“嗨。”是女孩的嗓音，从对讲机传出。有可能是美国人，也有可能是广东人。她以“什么事？”来质问对方。

“赖瑞叫我皮特。”库洛说。

“上来吧，赖瑞正好在。”

楼梯间伸手不见五指，散发着呕吐秽物的恶臭，库洛的脚跟踏地

时，发出锡板压石子路般的声音。他按下定时开关的灯光，灯没亮，因此不得不摸黑走上三层楼。上级曾通过提案，想为她找更好的公寓，却因西辛格离去而不了了之，如今希望消失，某种程度上讲，连菲比也一起完蛋了。

“比尔。”她喃喃地说，等他进门后关上门，在长了老人斑的双颊各亲一下，是漂亮女孩亲吻亲切叔伯的动作，只不过她并不漂亮。库洛送她兰花。他的神态温柔热切。

“亲爱的，”他说，“我亲爱的。”

她在颤抖。套房里摆了一张床，一台瓦斯炉，一座洗手台，另外有一附带淋浴间的厕所。如此而已。他走过菲比身边来到洗手台，打开羊肝，喂给猫吃。

“噢，比尔，你会宠坏她的。”菲比边说边对着鲜花微笑。他在床上摆了一只棕色信封，但两人避而不谈。

“‘比尔’最近怎样？”她说，故意把他的名字说得怪腔怪调。

库洛在门上挂好帽子与手杖，正在倒苏格兰威士忌：纯酒给菲比，加苏打的给自己。

“菲比最近怎样？这样问比较合适。那边情况怎样？又长又冷的一个礼拜？怎样，菲比？”

库洛进来前，她已将床铺弄乱，将蕾丝边的睡衣放在地板上，因为就这一带而言，菲比是半“鬼佬”混血儿，跟肥胖的洋鬼子上床赚钱。在压扁的枕头上方，挂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画，似乎每个华人女孩都爱挂，而在床边抽屉柜上贴的是她英国父亲的照片，是她惟一见过的照片：出身萨里郡多金的小职员，当时刚抵达香港岛，圆形衣领，蓄小胡子，直盯前方，眼神略显疯狂。库洛有时候心想，该不会是在他被枪杀后拍的吧。

“现在没事了，”菲比说，“现在还好，比尔。”

她站在他肩头边，让水注满花瓶，双手抖得厉害。星期天她的双手通常会抖。她身穿灰色长袍女装以表现北京精神，金项链是表扬她服务圆场十周年的纪念品。总部一时兴起，荒谬到想表达骑士精神，决定在珠宝名店“Asprey”定做，然后包装后寄给她，附上一封信，由潘西·阿勒莱恩亲笔签名。潘西在位时运气欠佳，后来由史迈利接班。那封信她只准看不准留。装满水后，她想将花瓶捧到桌上，手却滑了一下，所以库洛伸手接下。

“嘿，放轻松一点嘛。”

她站了一会儿，仍对着他微笑，随后长长缓缓地啜泣起来，瘫坐在椅子上。有时候她会啜泣，有时候她会打喷嚏，或是讲个不停，笑个不停，但是一定忍到与库洛见面后才开始，再忍也忍得下去。

“比尔，人家有时候好害怕。”

“我晓得，亲爱的，我晓得。”他坐在她身旁，握住她的手。

“深度报道版的那个新来的男生。他喜欢盯着我看，比尔，不管我在做什么，他都一直看。我敢确定，他一定是在帮人做事。比尔，他到底在帮谁？”

“也许他只是有点痴情而已，”库洛以最轻柔的语调说，一面有韵律地拍着她的肩膀，“菲比，你是个充满魅力的女人，你可别忘记了，亲爱的。你可能对人造成影响力而不自知。”他装起为人父亲严肃的神态。“你呢？有没有跟人家打情骂俏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像你这样的女人，有可能在浑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人打情骂俏。见过世面的男人，一看就知道了，菲比。一看就知道。”

上星期是楼下工友。她说工友记下她进出的时间。再上一个星期，是她不断看见的一辆车，是欧宝，一直是同一辆，绿色。库洛深知要诀，既要平息她的恐惧，又不能让她松懈警戒心。库洛绝不允许自己忘记的是，因为总有一天，她的疑心有可能成真。菲比从床边翻出一叠手写笔记，开始做简报，但动作之突然，连库洛也难以招架。她的脸蛋大而苍白，就白种人或黄种人而言，都称不上美丽。她的躯干长，双腿短，双手白皙，既丑陋又粗壮。她坐在床边，突然显出母仪庄重的神情。她戴上深度眼镜来阅读。她说，广州星期二即将派学生政委前来对干部演讲，因此星期四的会议取消，度埃伦又丢了一次当一夜秘书的机会……

“嘿，慢慢来嘛，”库洛笑着大喊，“难不成哪里失火了？别激动嘛！”

他翻开膝盖上的笔记本，尽量跟上，然而菲比不愿受约束，她甚至连比尔·库洛也不看在眼里，只不过别人告诉过她，比尔其实官拜上校，阶级可能更高。这整份告白书，她希望赶快忘掉。她日常的目标之一，是一个左派知青团体，成员有大学生与共产党记者，表面上稍微接纳了她。她每周做出报告，进展却不大。如今这团体因故大张旗鼓活跃起来。她说，比利·陈被召去吉隆坡参加特别会议，尊尼·方以及贝林达·方也奉命寻找放置印刷机的安全处。夜色快速降临。她一面继续叙述，库洛谨慎起身，打开台灯，以免日光消逝后打开电灯会吓她一跳。

她说，他们计划与北角的福建人会师，但学术界的同志一如往常加以反对。“他们什么都反对，”菲比以野蛮的口气说，“瞧不起人。还有，那个傻子贝林达已经好几个月没缴党费，除非她戒赌，否则干脆把她撵出党外算了。”

“很有道理，亲爱的。”库洛语气平静。

“尊尼·方说，贝林达怀孕了，孩子不是他的。我嘛，倒希望她真的怀孕了，可以让她闭嘴……”菲比说，而库洛心想，那种麻烦，你不是也惹过两三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结果你还不是没闭嘴？

库洛乖乖做笔记，心知伦敦或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看一眼。在圆场财

源充足的年代，曾经渗透过数十个类似团体，希望有朝一日能搭上北京——香港短程班机，借此进入大陆。短程班机的名称取得白痴。计划最后无疾而终，而圆场也无简报员的编制来监管香港的安全，因为这个角色已由伦敦警察局的政治治安处收编，惟恐肥水落入外人田。然而库洛深知，风向说变就变，却无法轻易改变小战舰的航道。库洛依着她的步调进行，偶尔追问几个问题，检查情报来源与次级来源。是传闻吗，菲比？那件事，比利·李是从哪里听来的，菲比？有没有可能是比利·李为了面子，在那个说法里加油添醋？他使用新闻界惯用的说法，是因为菲比与杰里和库洛一样，另一项专业是新闻工作者，是自由撰稿的八卦作家，专门报道香港上流华人的生活花絮，投稿香港英文媒体刊登。

倾听，等待，以演员的说法是“即兴演出”，库洛将她的故事说给自己听，如同五年前回沙拉特温故知新、重新磨炼地下工作技巧时说故事的方式。沙拉特的人事后告诉他，他的演讲是两星期来最轰动的一场。为了迎接这场演讲，他们顺便召开全体会议。连指挥处的工作人员都前来捧场。当天没上班的人，还申请专车，早早前来沃特福德镇的住宅区接他们去参加，为的是聆听东方老手库洛，坐在改装后的图书馆里，坐在墙上的鹿角下，听他概述一生的间谍故事。题目是，吸收自己的情报员。讲台上备有讲稿架，但他用不着，反而坐在普通椅子上，脱下外套，露出大肚子，膝盖张开，汗水沾湿衬衫形成深色片片。而他讲述的方式，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在香港的那个刮台风的周六，他也会用同样方式对上海保龄球会员演说。

阁下，吸收自己的情报员。

他们告诉他，没人比他对这行更熟，而他也听信了。若说东方是库洛的归宿，小战舰就是他的家人，他对小战舰宠爱有加。外面的世界，从来没给他机会表现温柔的一面。他以爱心培养、训练小战舰，直可比拟父爱。而当塔夫蒂·西辛格趁夜潜逃，未事先通知就留下库洛一个人，让他一时之间失去人生目标，失去生命线，是他这老人生命中最难熬的一刻。

各位，有些人从出生就是情报员，他告诉大家，由出生时的历史环境、地点，以及天生个性决定其任务。以这些人而言，谁先找上他们，他们就为谁服务。

“不管是我们，还是对手，还是他妈的传教士。”

哄堂大笑。

随后讲述个案史，姑且隐去其真名与地点，其中最特别的莫过于代号苏珊的小战舰，女性，东南亚战区，出生于混乱的一九四一年，混血儿。他指的是菲比·威费尔。

“父亲是多金人，是身无分文的小职员。来到东方，加入苏格兰海盗集团，一星期六天沿海抢夺，第七天则对加尔文祈祷。穷得娶不起欧洲女子，只好偷偷找了华人女孩，给她几便士，结果就有了苏珊。同一年，日本人登场。换成是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故事都一样，各

位。他们一夕之间到处都是。打算长住下来。在混乱中，代号苏珊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高贵的事。‘各位阁下，去你的谨慎行事，’他说，‘正直诚恳的好男人，挺身而出就要趁现在。’所以他迎娶那位女士，这种做法我通常不建议，不过他执意结婚，婚后为女儿施洗，自己加入自愿军。自愿军是一群有勇无谋的傻瓜，组成地区自卫队抵挡日本鬼子。隔天，由于他天生不是从军的料子，被入侵的日本人射中臀部，旋即气绝身亡。阿门。愿多金小职员安息，各位阁下。”

老库洛在身上画十字时，讲堂里掀起阵阵大笑。库洛并没有跟着笑，假装一本正经。前两排有新来的脸孔，没有刀疤，没有皱纹，一副看电视的脸孔；库洛猜想他们是新人，被迫前来听“伟人”演讲。有他们在场，库洛更加卖力演出。因此他才特别留心前几排。

“代号苏珊的慈父上天时，她还穿着连裤童装，不过她一辈子都将记得：在关键时刻，英国人坚守承诺不放。一年又一年，她都更加敬爱那位死去的英雄。战争过后，她父亲以前服务的贸易公司仍将她放在心上一两年，随后便自然忘记她。没关系。十五岁的她，由于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又要到舞厅上班赚学费，因此自己累出病来。没关系。一名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开始救济她，幸好是我们杰出的一员，引导她走向我们的方向。”库洛擦擦额头。“代号苏珊就此开始飞黄腾达，”他宣布，“我们为她准备新闻工作者的伪装，让她开始表现，先是给她中文报纸来翻译，派她跑点腿，让她参与，让她完成教育，训练她从事夜间作业。一点点钱，一点点施舍，一点点爱，一点点耐心，不消多久，我们的苏珊就已合法进入中国大陆七次，也用过硬虚晃一招的情报手法。表现很有技巧。她扮演过信差，紧急到北京接触一个舅舅，完成了任务。尽管她是半个‘鬼佬’，华人直觉无法信任她，但她却努力完成了这一切，各位。”

“这期间，她认为圆场是何许人也？”库洛对如痴如醉的听众咆哮，“她认为我们是谁？”老魔术师降低音量，举起肥胖的食指。“她父亲，”他静静地说，“我们相当于那位多金来的小职员。我们相当于圣乔治。说什么为海外华侨社群清除‘有害分子’，破坏三合会、稻米联合集团、鸦片黑道、雏妓问题。在有必要时，她甚至将我们视为北京的秘密盟友，因为我们，圆场，将所有善良中国人的利益摆在心中。”库洛以恶狠的眼光扫射前排稚气未脱、渴望被凶的脸孔。

“我是不是看到有人在微笑，各位？”他质问，嗓门如雷。没有看到。

“其实说实在话，阁下，”库洛最后说，“她内心时而感觉到，这一切其实全是扯淡。而各位想施展身手就趁这机会。外勤情报员随时待命，用意就在此。没错！我们是负责坚守信念的人。信念动摇时，我们来加强。信念崩盘时，我们伸出双臂扶正。”他达到最高峰。而为了制造效果，他将音量降至柔缓低语。“就算所谓的信念疯狂荒谬，阁下，千万不能加以唾弃。近来，我们能拿来抚慰人心的东西少之又少了。阿门。”

终其一生，老库洛回想起现场掌声时，会毫不羞愧地激动落泪。

菲比做完报告，弯腰向前，前臂放在膝盖上，大手的指关节如疲惫的情人慵懒地彼此依偎。库洛神情严肃地起身，拿起桌上的笔记，以瓦斯炉火烧掉。

“精彩，亲爱的，”他悄声说，“可以说是优秀的一星期。还有没有其他的？”

她摇摇头。

“我的意思是，要烧掉的东西。”

她再度摇头。

库洛研究着她。“菲比，我亲爱的，”他最后高声说，仿佛完成了重大决定，“起来吧，我该带你出去吃晚饭了。”她转头看着他，神态迷惘。酒精已冲至大脑，屡试不爽。“两个写稿子的同事，偶尔和和气气去吃个晚饭，应该不会坏了伪装身份。要不要？”

她叫库洛面壁，等她换上美美的连衣裙装。她以前养了只蜂鸟，可惜死了。他后来送她一只，结果也死了，所以两人一致认为这间公寓与蜂鸟的八字不符，因此不再养蜂鸟。

“找一天我带你去滑雪。”他说。两人出门后，她锁上前门。两人常开这个玩笑，原因是她床头墙上那幅雪景海报。

“就一天而已啊？”她回应。也是开玩笑，是两人惯耍的嘴皮子。

库洛向他人说，那年情势混乱，在铜锣湾的舢板用餐仍是聪明之举。聪明人尚未发现这里的餐饮便宜，风味与众不同。库洛决心赌运气，来到海边时，雾已散去，夜空净朗。他选择离岸最远的舢板，由一簇小帆船重重包围。厨子蹲在煤炭烤炉前，妻子负责端菜，帆船的船身则在背景里耸立，遮掩繁星，船家儿童则在甲板上奔跑，从一个甲板奔向另一甲板，如螃蟹一般，父母亲则在墨色海水另一边念经。库洛与菲比弯腰坐在木板凳上，上方是卷起的布幕，离海面两英尺高，两人凑着小灯光享用乌鱼。在台风避风区之外，大船驶过他们身边，如亮灯的大楼游街。往内陆看，香港岛呜咽着、铿锵着、脉动着，庞大的贫民窟一闪一闪有如珠宝盒，由擅长骗人的夜美人开启。船桅如向下沾料的手指，从支支桅杆间隐约可见黑色山顶，维多利亚山，高高在上，无表情的脸孔笼罩月光发丝之下，是女神，是自由，是山谷里抗争奋斗的诱惑。

他们聊着艺术。菲比聊的东西，在库洛听来是她爱好艺术的幌子。非常无聊。她睡意浓浓地说，总有一天，她想到如假包换的中国去导演一部电影，也许两部。最近她欣赏过邵逸夫的历史爱情剧，全是扑朔迷离的宫廷秘史。她认为拍得可圈可点，不过稍微有点太——太可歌可泣了。谈到戏剧，有个好消息不知道库洛听过没，就是剑桥剧团可能于十二月来港演出新的时事讽刺剧。目前仅止谣传，但她希望下星期能证实。

“应该会很好玩才对，菲比。”库洛开怀地说。

“一点也不会好玩。”菲比毅然反驳，“剑桥剧团的拿手好戏是讽刺时局的东西。”

库洛在黑暗中微笑，为菲比再倒些啤酒。他告诉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各位，活到老学到老。

后来在未经暗示的情况下，或有暗示但她并未察觉，菲比开始谈论她的华人百万富豪。库洛整晚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在菲比的世界里，香港富豪相当于皇室。他们的瑕疵与放纵，为人津津乐道，犹如其他地方的女演员或足球明星。这些人菲比倒背如流。

“菲比，这礼拜的冤大头是谁啊？”库洛开心地问。

菲比不确定。“应该选谁呢？”她假装娇羞，拿不定主意。冤大头PK，那还用说吗，星期二他过六十八岁生日，第三任妻子年龄只有他一半，结果PK如何庆祝生日？带二十岁的淫娃逛大街。

好恶心，库洛赞同。“PK啊，”他说，“PK不是那个立了门柱的家伙吗？”

十万港币，菲比说。九英尺高的巨龙，外层是玻璃纤维加透明塑料，内部的灯光可照亮整体。她贤明地转转脑筋，改变主意，或许本周冤大头非YY莫属。YY新婚刚满一个月，迎娶的是JJ何的宝贝千金。JJ何是油轮巨子“何陈”家的人。婚礼招待一千尾龙虾。前天晚上，他带着崭新的情妇出席宴会，是用他妻子的钱买来的；他以圣罗兰为这个默默无闻的女子打扮，还在她脖子缠上四串一组的御木本珍珠项链，当然是租来的，不是送她的。尽管说得兴高采烈，菲比的嗓音开始动摇，转为轻音。

“比尔，”她深呼吸，“那女生陪在老蟾蜍身边，看起来艳光四射，可惜你没看见。”

或者是哈勒戴陈，她懵懵沉思。哈勒戴最近特别爱乱来。这次过节，他把几个孩子从瑞士的社交礼仪学校接回来，日内瓦来回机票，头等舱。凌晨四点，子女和朋友在游泳池畔裸体嬉戏，酒醉之余，将香槟倒进游泳池，哈勒戴则在一旁捕捉镜头。

库洛伺机而动，心中为她敞开大门，可惜她仍无进门之意，而库洛这条老狗老得无法推她。潮州人最棒了，他调皮地说。“潮州人不会搞那套无意义的东西。对不对，菲比？潮州人口袋深得很，手却很短，”他忠告她，“你的潮州人，会让苏格兰人脸红，对不对，菲比？”

菲比不想玩反讽的游戏。“我才不信，”她端庄地反驳，“很多潮州人既慷慨又高尚。”

他想让她说出那人的名字，如同魔术师变出某张牌一样，然而她却迟疑着，绕过那人名字而行，另辟他径。她提到这个名字那个名字，忘了自己在说什么，再要一些啤酒，等到他几乎放弃了，她才以颇朦胧的

口气说：“至于德雷克·柯呢，他是彻彻底底的小绵羊。对德雷克·柯这人呢，别说他坏话，一个字都不准。”

现在轮到库洛撤退。菲比对老安竹·郭的离婚有什么看法？天啊，一定是天文数字吧！听人说，她老早想甩掉老郭了，现在才离婚，是因为她想等到老郭赚饱，身价百倍后再下堂求去。是不是真的啊，菲比？如此续谈了三五个姓名，再允许自己上钩。

“老德雷克·柯包养了一个欧洲情妇，你听说了吗？香港俱乐部的人，前几天才在谈这件事。金发美女，据说秀色可餐。”

菲比喜欢想像库洛在香港俱乐部的模样，因为这样能满足她的殖民渴望。

“谁没听说过，”她语带倦意，仿佛库洛又和往常一样，距离热门八卦数光年之遥，“以前有段时间，每个老头都在包养，你难道不知道？PK养了两个，那还用说？哈勒戴·陈养了一个，后来被犹斯第·周抢走。查理·吴想带情妇参加总督的晚宴，结果大老婆不让司机去接她。”

“他们都从哪里找到这些情妇啊，真是的。”库洛大笑一声，问道，“连卡佛名店吗？”

“航空公司啦，不然还有哪里？”菲比以重重反对之意反驳，“空中小姐过境兼差，五百美金，白人妓女陪你一夜。而且连英国的航空公司也包括在内，少自己骗自己了，英国人其实最糟糕了。那时候，哈勒戴·陈爱死了英国空姐，跟几个空姐定下条件，帮她们安排公寓，每次来香港四天，就带着她们逛街，把她们当做公爵妇人似的，恶心透顶。话说回来，丽泽与众不同。丽泽气质独具。她充满贵族气息，父母亲于法国南部拥有大片值钱的房地产，在巴哈马也拥有一座小岛。她拒绝接受父母的财产，单纯是为了在道德上保持独立。看看她的骨架就知道。”

“丽泽，”库洛重复，“丽泽？是不是姓克劳特的德国人？我看不起德国人。不是种族偏见，只是不喜欢他们而已。像德雷克那样好好的一个潮州男人，干吗找个令人讨厌的番婆当情妇嘛。我不懂。不过啊，你应该懂才对，菲比，你是专家，八卦是你的专业，亲爱的，我没有置喙的余地。”

他们回到舢板后方，并排躺在软垫上。

“少乱讲话了，”菲比脱口而出，“丽泽是英国贵族女孩。”

“被我说中了吧。”库洛说完，凝视着星光半晌。

“她对德雷克有极正面、极高尚的影响力。”

“谁？”库洛，仿佛已忘记她在讲什么。

菲比咬牙说：“丽泽嘛，她对德雷克·柯有高尚的影响力。比尔啊，你是不是睡着了？比尔，我看你还是带我回家算了。拜托，带我回家吧。”

库洛缓缓叹了一口气。这些情夫情妇，每六个月至少吵一次，对双方关系具有涤净的效果。

“亲爱的。菲比。你好好听我说，行吗？仔细听一下就好。英国女孩子，只要是出身望族，教养良好，或就座时双膝并拢的女孩，绝对不可能取丽泽这种名字，除非血统书里找得到德国祖先。其他的先不谈。她姓什么？”

“伍芝。”

“‘我值’多少？好吧，冷笑话一个。不好笑就算了。全名应该是伊丽莎白吧。简称丽姬。或是莉莎。家住兰贝斯区的莉莎。是你耳朵不管用了。血库不缺血，你可以去打一筒补补身子。伊丽莎白·伍芝小姐。这样看来，骨架的确不错。不是丽泽啦，亲爱的。是丽姬。”

菲比不掩怒意。

“怎样发音，用不着你管！”她对他大吼，“她的名字是丽泽，重音节元音是长音，拼成Liese。我问过她，还写下来，用印刷体写在——噢，比尔。”她将额头搭在库洛肩膀上。“噢，比尔，带我回家。”

她开始啜泣。库洛抱住她，柔柔拍着她的肩膀。

“好了，别难过了，亲爱的，是我不好，你没错。我早该知道她是你的朋友。像丽泽这样气质出众的上流女子，美貌、财富兼具，竟被香港新贵套牢，像菲比新闻跑得这么勤快的新闻人，怎么可能不结交这个朋友？是我有眼无珠，原谅我。”他空出合理的对话空当。“怎么了？”他以溺爱的口吻问，“你访问过她，对不对？”

菲比以库洛的手帕擦干眼泪，是当晚第二次。

“是她求我的。她不是我的朋友。她太上流了，我高攀不上。怎么可能是我的朋友？她求我别注销她的名字。她在这里隐姓埋名。不然会送掉小命。要是被她父母亲发现，肯定马上找人押她回家。她家的影响力大得惊人，有私人飞机，样样不缺。她和华人同居的事一旦被他们知道，一定马上对她施压，压到她不得不回家为止。‘菲比，’她说，‘香港这么多人当中，你一定最能体会活在歧视阴影下的滋味。’她向我恳求。我答应了。”

“做法很对，”库洛严肃地说，“菲比，可别食言喽，答应了就要做到。”他回以仰慕的叹息。“我老说啊，人生的小路，总比人生的公路来得奇怪。如果你写出来，编辑会认为你的心太软，我敢说。那样说其实没错。大大彰显出人性正直的一面。”说到这里，她的眼睛早已闭上，因此他轻推一下，希望她能睁开。“像那样的感情，是从哪里结缘的？是哪一颗星星，是什么样幸运的巧合，能让两个相互需要的灵魂结合在一起，而且还是在香港？”

“是天意。她当时甚至不住在香港。历经一次不愉快的恋情后，她已经与世隔绝，决定终生设计精美的珠宝饰品，为充满苦难的世界增添美

意。她飞来香港一两天，只是想买些金饰，碰巧参加萨莉·凯尔的盛大宴会，遇见了德雷克·柯，就这么简单。”

“从此甜蜜真情永不渝喽？”

“当然不是。丽泽碰上他，爱上他。不过她决定不要牵扯进去，因此打道回府。”

“打道回府？”库洛重复，满头雾水，“像她这样高洁的女子，回哪个家？”

菲比笑了起来。“不是回法国南部的家啦，傻瓜。回万象。是外人从来不去的城市。是没有上流社会的地方，没有出生至今习惯享用的一切奢侈品。是她自己选择这地方的。她的小岛。她有朋友在那里，她也对佛教、艺术、古董有兴趣。”

“现在呢？她都在什么地方逛？还是住在不起眼的小农场，紧抱着洁身禁欲的观念不放吗？或者柯大哥改变她的观念，让她走上比较不节俭的道路？”

“你嘴巴少贱了。德雷克当然是给她漂亮得不得了的公寓了。”

库洛的极限在此：走到极限，他立刻知道。他将手上这张牌混入其他牌中，告诉她老上海的故事，却不朝行踪隐秘的丽泽·伍芝更进一步，只不过菲比或许可以省下他不少脚程。

“在每位画家的背后，”他喜欢说，“在每位外勤情报员的背后，各位，都应该站着一名同事，拿着木槌。走得够远了，这名同事就准备敲他头。”

搭出租车回家途中，她心情再度平静下来，身体却不住颤抖。他维持绅士风度，送她到门口。他已经完全原谅她了。在门阶上，他作势亲吻她，却被她推离。

“比尔。我真的有用吗？告诉我。没用处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丢掉，我坚持。今天晚上什么成果也没有。你心肠好，你会假装，我尽了力。可是还是什么成果也没有。如果有其他任务给我，我一定接下。不然的话，你一定要把我丢开。手下不留情。”

“以后会有成果的。”他请她宽心，这时她才让库洛亲吻她。

“谢谢你，比尔。”她说。

“到此为止，阁下，”库洛搭出租车回希尔顿时愉悦地回想，“代号苏珊苦心奔走，身价一天不如一天，因为情报员的身价随瞄准目标的身价涨跌，这是事实。她捧来黄金的那次，黄澄澄的纯金，阁下，”——脑海浮现他举起同一根肥胖的食指，点醒前排如痴如醉的初生之犊——“那一次，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捧的是黄金，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

库洛曾经写过，香港最棒的笑话很少让人笑得出来，因为香港笑话过于严肃。那一年，举例来说，有栋未完工的摩天大楼开了一家都铎式

小酒吧，如假包换的英国姑娘板着脸，身穿历史剧的低胸露背礼服，端来如假包换的英国啤酒，温度比英国低二十度，而小酒吧外，在大厅里，头戴黄色头盔的苦力二十四小时无休，卖命完成电梯工程。或者你可以前住意大利餐馆看看，铸铁回旋梯指向朱丽叶的阳台，最后却通往空白的石膏天花板；或是苏格兰小旅馆，有身穿苏格兰裙的华人，偶尔因天气炎热而罢工，或是因为天星渡轮涨价而鼓噪。库洛甚至光顾过一家吸鸦片店，备有空调，电台播放着《绿袖子》。但库洛惠顾过最奇特、最格格不入的店家，莫过于这家屋顶酒吧，俯瞰港口，华人四重奏演出诺埃尔·科沃德15综艺秀，华人酒保一脸正经，头顶假发，身穿长礼服，缓缓从黑暗中出现，以标准美国腔询问：“请问您想品尝什么美酒？”

“啤酒，”库洛的客人咆哮，一面伸手取来一把盐粉杏仁，“要冰的，听到没？冰冰凉凉的。快快端来。”

“近日万事可顺遂？”库洛询问。

“少文绉绉了，可以吗？别惹我生气。”

警司沧桑的脸上有一种表情，只有这一种，诉说着无尽的愤世嫉俗。他的怒容说道，如果人类得以选择善恶，他随时都选恶。他也相信，这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知道这一点，也接受这一点的人，另一边则是白厅那些留长发、相信圣诞老公公存在的娘娘腔。

“找到她的档案没？”

“没有。”

“她自称伍芝。省略了好几个音节。”

“她自称什么，我他妈的知道了。就算她自称大间谍玛塔·哈里，我也管不了。现在还是没有她的档案。”

“这么说来，以前有喽？”

“对，朋友，以前是有。”摇滚客满面怒容地假笑，模仿库洛的口音，“‘以前是有，现在没了。’听懂了没？还是要请我用隐形墨水写在传信鸽的屁股上，你这个可恶的异族澳大利亚佬？”

库洛默默坐了半晌，持续做出稳定而重复的饮酒动作。

“是柯干的吗？”

“干了什么？”摇滚客刻意装迟钝。

“偷走她的档案。”

“不无可能。”

“档案遗失症似乎正在流行，”库洛继续喝酒后说道，“伦敦一打喷嚏，香港就感冒。是我职场上的同情心，是我父爱的关怀。”他压低音量，变成平板调的喃语，“告诉我，萨莉·凯尔这姓名有无印象？”

“从没听过。”

“做什么生意？”

“奇奇古董有限公司，九龙区。里面都是抢来的艺术宝藏，高级仿造品，佛祖的画像。”

“哪里来的？”

“真品打从缅甸过来，经过万象。冒牌货在本土生产。她是六十岁的男人婆，”他语带不满地说，以谨慎的神态再请自己喝一杯啤酒，“养亚尔萨斯狼狗和猩猩。跟你同一条街。”

“漂不漂亮？”

“你在开玩笑。”

“有人跟我说，把那女孩介绍给柯的人是凯尔。”

“那又怎样？凯尔帮那个欧洲骚包拉皮条。潮州人就是这样才看上她。我有一次也找她帮我介绍，竟然说她找不到够矮的。那条母猪真放肆。”

“据说我们这位纤弱的美女是来买金子，是真的吗？”

摇滚客再以嫌恶的眼光看着库洛，库洛也看着他，如同两个无法移动的物体正面撞击。

“当然是他妈的真的，”摇滚客口气轻蔑，“凯尔不是从澳门弄来一大堆金饰吗？”

“柯呢？他又扮演什么角色？”

“啊，少来了，别旁敲侧击了。凯尔是挂名负责人。公司真正的老板是柯。他那只胖牛蛙跟凯尔合伙。”

“姓刁吗？”

摇滚客再度陷入带酒意的忧郁中，但库洛不愿就此分心，将斑驳的头凑近摇滚客历经百战的耳朵，靠得很近。

“若提供有关凯尔小姐的任何情报，我叔父乔治会感激不尽，必有重赏。我叔父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她介绍小姐给潮州包养人的关键时刻，一直到现在。姓名、日期、背景，任何相关事项都行。听到了吗？”

“这样吧，你告诉你叔父乔治，他会害我进赤柱监狱蹲五年。”

“进去后，不愁没人陪你吧，阁下？”库洛语气尖锐。

这话说来伤和气，因为最近摇滚客两名资深同事各遭判刑数年，也有人悲哀地等着进去共襄盛举。

“贪污，”摇滚客盛怒之下喃喃地说，“接下来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可恶的童子军，让我想吐。”

这些话库洛已听过了，但他再度听进耳里，因为他具有宝贵的天

赋，懂得倾听的重要，在沙拉特，倾听的天分比沟通能力更受重视。

“三万个该死的欧洲人，四百万个该死的亚洲人，一套不同的道德观，全世界组织最完善的黑道之一。他们又能指望我们怎么办？犯罪，我们停止不了，我们又怎么维护治安？我们挖出老大，跟他们谈个条件，不然能怎样？‘好，大哥，别随便犯法，别侵犯领土主权，做什么事都得干干净净，光明正大，好让我女儿能在大白天或晚上任何时候安全上街。我想逮捕一大票，让法官高兴，赚赚少得可怜的退休金。谁坏了这规矩，谁不尊重权威，谁就该死。’他们是贿赂一下意思意思没错。你说说看，这个未开化的小岛上，有谁从来不贿赂一下意思意思？有人拿出钱来，就有人收钱。合乎常理。如果有人收钱……更何况，”摇滚客忽然对自己提出的主题感到厌倦，“你们乔治叔父早就知道了。”

库洛的狮子头缓缓抬起，最后吓人的视线紧盯摇滚客偏闪一旁的脸。

“乔治知道什么，愿闻其详。”

“他妈的萨莉·凯尔。几年前，我们早帮你们把她翻得一干二净了。计划颠覆英国货币或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在苏黎世黄金市场倾销金块。和往常一样，鬼话连篇，如果你想听我的见解的话。”

再经半小时，老澳大利亚人库洛才拖着疲惫的双腿起身，祝摇滚客幸福美满，长命百岁。

“你呢，皮捏紧一点。”摇滚客咆哮。

库洛当晚并未回家。他有朋友住在山顶，男主人是耶鲁毕业的律师，与妻子共同拥有一间私人住宅，这种房子在香港不到两百间。房子位于山顶的普乐道，他们给了他一把钥匙。车道上停了一辆使馆车子，但库洛的友人沉迷周旋于外交界，是人尽皆知的事。走进房间时，一名外表体面的美国青年坐在扶手藤椅上阅读厚重的小说，库洛发现时并不感到诧异。这名金发青年身材苗条，身上穿的是有外交人员味道的整洁西装。库洛并未向他打招呼，也未对他置身此地作任何评论，只是径自坐在玻璃面的写字桌前，取出一张纸，依恩师史迈利的习惯开始以大写印刷体写信，仅准恩师阅读，闲人勿近。之后，他取出钥匙，在另一张纸上描绘。一切完成后，他将两张纸递给青年，而青年也以高度顺从的态度收下，放进口袋，旋即离去，不发一语。独处的库洛等到听见大轿车引擎声，再打开并阅读青年为他留下的信息。然后他烧掉信息，将纸灰冲入洗手台，最后才快意地伸伸懒腰，上床睡觉。

神探的一天，不过我还能再让他们惊讶一下，他心想。他累了。天啊，他真的好累。他看见沙拉特子弟兵群集的脸孔。我们仍向前迈进，阁下。我们勇往直前。就算我们以盲人的速度前进，在黑暗中一脚一步前进也是一样。该抽点鸦片了，他心想。该找个好姑娘来让我高兴高兴了。天啊，他真的好累。

史迈利也同样累，或许吧，不过史迈利一小时后收到库洛的信息

时，心跳显著加快，特别是该档案主角是萨莉·凯尔小姐，最近已知定居点为香港，从事伪造艺术品工作，违法买卖金块，偶尔走私海洛因。她的档案，总算在圆场数据库中复活，安然无恙。不只如此。山姆·科林斯的匿名，以圆场驻万象台面下情报员的身份，在其中随处可见，如期盼已久的胜利彩旗般醒目。

10茶与同情

海豚案落幕后，大家不只一次把责任推到史迈利头上，认为进行到这一步时他早该回去找山姆·科林斯，直接对他严刑拷打。当初那样做的话，乔治可以省下不少工夫，知情人士说，可以省下关键时间。

他们说的根本是缺乏头脑的瞎话。

首先，时间并不重要。俄国的金棱线，以及资助的行动，暂且不管是何种行动，都已进行多年，若不受干扰，预计还会继续进行多年。惟一要求采取反制的人是白厅大亨、圆场，以及间接建议的杰里·威斯特贝。在史迈利一丝不苟为他下一步作准备时，杰里又枯守了两三星期，差点抓狂。此外，圣诞节即将来临，更让大家沉不住气。再来是柯，无论他控制的是什么行动，都没有显出进一步发展的迹象。“柯和俄国人的钱就像一座山，站在我们面前，”史迈利事后在终结海豚案的报告里写道，“我们想重审本案，随时可以，就是不能主动。采取主动后，问题将不是在于激发自己人，而是如何动摇柯先生到我们能解读他的地步。”

个中的启示显而易见：早在任何人（康妮除外）看清之前，史迈利已经将这位女孩当做具有潜在价值的杠杆，也是整个阵容中独挑大梁的角色，其重要性远比，举例来说，杰里·威斯特贝更大。而杰里无论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由他人替代上场。史迈利在安全考虑允许下，殚精竭虑设法接近她，其原因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原因是山姆·科林斯与那女孩的关系，其性质的真相仍在未定之天。如今凭后见之明表示“好明显”，说来轻松，但当时无人能斩钉截铁道出究竟。凯尔档案给了一道线索。史迈利对山姆脚下工夫的直觉，也有助于增添一些线索。档案室仓促逆向操作，也找出线索数条，以及数叠类似个案。山姆的外勤报告选集也具解开疑团的功效。事实依旧是，史迈利押着山姆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独立了解女孩与柯之间的关系，以及女孩与山姆的关系。下次与山姆面对面时，也具有较大的讨价还价筹码。

迫于压力，山姆会如何反应，世上又有谁说得准？侦讯官是有过成功的例子没错，但也不乏败阵的经验。山姆是颗极难敲破的坚果。

史迈利也斟酌过另一项考虑，只不过他重视绅士风度，在报告中并未提及。圆场“堕落”后的日子里，谣言如鬼影般流传，其中之一是惟恐比尔·海顿的指定接班人，仍躲藏在圆场某处；大家担心的是，比尔看上他，吸收他，教育他，为的是防范自己有一天因某种原因失势。山姆最初是海顿中意人选之一。他后来遭海顿陷害，极有可能是预设的伏笔。当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有谁敢说设法重新进入的山姆·科林斯，其实并不是海顿叛国行动的指定接班人？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乔治·史迈利披上雨衣，走向街头。这一趟无疑走得心甘情愿，因为他骨子里仍是办案人。甚至连批评他的人都不得不这样说。

伦敦的伊斯兰顿区老旧的邦斯贝里地带，在史迈利终于秘密前往的那天，雨水于上午十点左右停歇。维多利亚式小屋的石板屋顶上，滴着雨珠的烟囱管帽被电视天线簇拥，如同脏湿狼狈的鸟儿。更远处矗立的是大众住宅区的轮廓，搭着鹰架，早因资金不足而弃建。

“哪一位？”

“史坦法斯特。”史迈利客气地回答，手持雨伞。

正直人士彼此心有灵犀，一眼便能知晓。彼得·伍辛顿开启前门，对门阶上臃肿、雨水浸湿了的身形打个照面。这人手提黑色公家公文包，外层塑料夹鼓胀，印有EIIR的字样。来人神态畏首畏尾、略显寒酸。他只需打开门看一眼，就整脸堆满亲切的表情，欢迎对方进门。

“所以你来啦。欢迎光临寒舍。外交部最近搬到道宁街了是吧？你怎么过来的？搭地下铁从查令十字站过来的吗？进来喝杯茶吧。”

他是公立学校教员，进入义务教育界是因为感觉收获较大。他的嗓音不高不低，具有安抚的作用，感觉忠诚。在狭窄的走廊上，史迈利跟在他身后，这时注意到，即使是他的服装也带有一种忠贞之感。彼得·伍辛顿尽管年仅三十四，厚重的粗呢西装不计流行与否，只要主人有需要，将继续为他效劳。他家没有庭园。书房后直接与水泥游戏场接壤。一道坚固的铁窗保护着窗户，游戏场以高高的铁丝网围墙分隔为二。游戏场另一边是学校，是有卷纹装饰花纹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建筑，与圆场不无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外人可以看见学校内部活动。史迈利注意到，学校一楼墙上挂了学童的绘画作品。楼上有试管放在木架上。现在是下课时间，女生自成一国，穿着连身短裙装，中间系腰带，追着手球奔跑。在铁丝网另一边是男生成群静静站立，如同工厂大门外站岗抗议的人群，黑人与白人分开站。彼得的书房摆满了练习簿，堆积到与膝盖同高。烟囱架上放着一本介绍英国历代国王女王的图片集。乌云遮天，学校因此显得阴森锈蚀。

“外面的噪音，希望你别介意，”彼得·伍辛顿从厨房高呼，“我啊，早就听不见了。要不要糖？”

“不要，不要。不用加糖了，谢谢你。”史迈利露出告解般的浅笑。

“担心卡洛里是吧？”

“是啊，有点担心。”史迈利正在扮演自己，但扮演得更像，如萨拉特那些人说的。稍微更朴实，稍微更历尽风霜，是温文儒雅的公务员，四十岁不到已升不上去，从此在原地踏步。

“要柠檬的话也有！”彼得·伍辛顿从厨房大喊，生疏的手敲得盘子乱响。

“噢，不用了，谢谢你！加牛奶就行了。”

表层磨尽的书房地板上，是另一个更年幼的儿童存在的证据：积木，涂鸦簿里潦草写满了D与A。台灯下挂了一颗厚纸板裁成的圣诞星

星。灰褐色墙壁上贴着朝拜初生耶稣的东方三博士、雪橇以及脱脂棉。彼得·伍辛顿端着茶盘回来。他身形高大，不修边幅，铁线般的棕发出现少年白。茶杯被他敲了半天，仍然不算十分干净。

“你真聪明，我这节正好没课。”他说，一面对练习簿点头，“有那么多等着我改，没课也算上班。”

“我真的认为老师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史迈利边说边微微摇头，“我自己也有朋友在当老师，晚上一半时间熬夜改作业。是他们跟我保证的，我没理由质疑他们。”

“他们算是有良心的一群。”

“我应该可以把你归类于同一群吧。”

彼得·伍辛顿露齿一笑，突然喜上心头。“恐怕可以吧。值得做的事，就值得好好去做。”他说，一面帮史迈利脱下雨衣。

“老实讲，那样的见解，我倒希望更多人能认同。”

“你应该来当老师才对。”彼得·伍辛顿说，两人笑了起来。

“儿子怎么办？”史迈利边说边坐下。

“伊恩吗？噢，他在爷爷家。我爸。不是她爸。”他倒茶时接着说。他递给史迈利一杯。“你结婚了没？”他问。

“有，我已婚，生活可以说很美满。”

“有小孩吗？”

史迈利摇摇头，允许自己稍稍皱眉，露出失望之情。“唉。”他说。

“让人难过的就是这个了。”彼得·伍辛顿说得完全合情合理。

“应该是吧，”史迈利说，“我们倒希望能有人为父母的经验。在我们这年纪，感触更深。”

“你在电话说，你有伊丽莎白的消息。”彼得·伍辛顿说，“不瞒你说，你能说出来听听，我会感激不尽的。”

“这个嘛，其实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史迈利谨慎地说。

“满怀希望总行吧。一个人不能没有希望。”

史迈利弯腰取来官方黑色塑料公文包，打开粗制滥造的锁夹。

“好吧，现在有些事项，不知你愿不愿意配合，”他说，“不是我故意吊你胃口，是我们希望能先确定一下。我这人习惯系上皮带又挂吊带，喜欢查证再查证，这一点我不介意承认。处理海外死亡的同事时，我们也有相同的程序，不到百分之百确定前，绝对不能定案。姓、名、详细地址、出生年月日，如果能取得就尽量确认，再麻烦也不辞辛劳。以策安全。死因呢，我们当然不负责，死因要由当地警方判定。”

“有话尽管问吧。”彼得·伍辛顿说得开朗，史迈利不禁注意到他语调

中夸张的成分，抬头看他一眼，他的诚实脸孔却偏开，似乎研究着堆在角落的一叠旧的乐谱架。

史迈利舔舔拇指，煞费周章地打开大腿上的档案，翻了几页。档案是外交部档案，注明着“失踪人口”，是由拉康托词向恩德比取得。“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想从最开始跟你对照所有细节？只有最明显的细节，当然，只有你愿意向我透露的——我用不着这样说吧？是这样的，让我头痛的是，这项工作，通常不是由我负责。我的同事温多瓦你见过，他请病假。还有，我们不是凡事都喜欢写报告，他做人很好，不过在写报告方面，我觉得他有点太简洁了。不是漏东漏西，只是有时候稍微缺乏对人物的描写。”

“我一向百分之百坦诚，一向都是，”彼得·伍辛顿对着乐谱架说，口气相当不耐烦，“我认为坦诚最好。”

“至于我们的立场，我敢向你保证，外交部绝对保密。”

慵懒气氛突然笼罩下来。一直到这一刻之前，史迈利从来没想过，儿童的喧哗声竟然具有抚慰人心的功用。如今喧哗停止，游戏场空旷下来，他兴起一阵置身他处之感，过了半晌才调适过来。

“休息结束。”彼得·伍辛顿微笑说。

“什么？”

“下课时间。牛奶加面包。纳税人缴的钱。”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根据我同事温多瓦的笔记——我跟他无冤无仇，赶紧在此声明——毫无疑问的是，伍辛顿夫人是在任何压力下离开……等一等。让我解释一下。拜托。她自愿离开的。她独自离开。她不是在不公平的情况下被迫、被诱惑，或是成为非自然因素压力下的受害者。压力举例来说，可以这么说，可能你未来提出法律诉讼时，或其他人针对目前为止未出面的第三方提起诉讼时，可以拿这个压力来进行诉讼。”

史迈利深知长篇大论的妙用。必须忍受长篇大论的人，往往捺不住性子，几乎产生一股非说不可的冲动。这些人若不是直接插嘴，至少会以蓄势待发的能量加以反制，而身为老师的彼得·伍辛顿，就任何一方面而言，绝非天生好听众。

“她单独离开，绝对只有她一人，我自始至终的立场都是，她想离开是她的自由。如果她不是单独离开，如果有其他人牵扯在内，上帝知道我们都是凡人，有无第三者并没有差别。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儿童有权利拥有双亲。”他最后以格言结束。

史迈利认真做笔记，却写得很慢。彼得·伍辛顿以手指敲着膝盖，然后折手指发出声响，一指接着一指，以不耐烦的态度快速噼啪作响。

“目前的情况中，伍辛顿先生，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监护权事宜是否已经安排——”

“我们一向都知道她会走偏。我俩都了解。我以前是她的船锚。她把我称呼为‘我的船锚’。不然就是‘小学教员’。我不在意。反正她没有恶意。只是因为她叫不出‘彼得’。她爱我，是爱我的这个‘概念’，或许爱的不是我这个人，不是这个身体，这个头脑，这个实体，甚至不是这个伴侣。而是一个概念，是完成她个人、人体的必要附属品。她具有取悦他人的欲望，这一点我了解。与她的自卑感有关，她渴望受人仰慕。如果她称赞别人，是因为她希望别人也能称赞她。”

“原来如此。”史迈利说，然后继续做笔记，仿佛以实际行动表示信服此观点。

“我是说，像伊丽莎白这样的女孩子，没有人能娶来当老婆，还期望独享她的一切。那样做不自然。我现在已经可以面对了。就连小伊恩都一定要叫她伊丽莎白。这一点，我也了解。她无法忍受‘妈咪’这种称呼的锁链。无法忍受小孩跟着她跑，叫她‘妈咪’。她承受不了。那没关系，我也能了解。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理解，因为你没有儿女，这一点我能想像。你一定很难理解的是，怎么会有女人，身为人母，饱受呵护、疼爱、照顾，甚至不必出门赚钱，居然能丢下亲生儿子一走了之，而且从出走那天起，连一张明信片都不寄。换成是你，你可能会担心，甚至感到恶心。我呢，看法恐怕有所不同。在当时，我跟你保证，没错，一开始的确很痛苦。”他转向有铁丝网的游戏场。他悄声叙述，丝毫没有自怜的意味。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他正在对学童讲课。“在学校，我们教大家自由的意义。身为公民的自由。让他们发展出个体性。我又怎么能限制她的个性和想法？我当时只想陪在她身边，就这么简单。当伊丽莎白的朋友，她的外野手。这是她对我的另一个称呼，‘我的外野手’。重点是，她并没有一走了之的必要。在这里，她照样可以自由自在。在我身边。女人需要支柱，你也知道，没有支柱的话——”

“结果她还是音讯全无？”史迈利顺从地询问，“连一封信都没有，甚至连寄给伊恩的信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史迈利做笔记。“伍辛顿先生，就你所知，夫人是否曾使用过别名？”不知何故，这问题似乎引来触怒彼得·伍辛顿的危险。他的怒气向上冲，仿佛低下阶层人无礼犯上，一指陡然竖起，示意别出声响。但史迈利赶紧接着说。“她的娘家姓，比方说？也许用过夫家姓的缩写，或许在有些非英语系国家，夫家姓氏可能会与当地人产生摩擦——”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不了解基本的人类行为心理学不行。她是教科书上典型的个案。她等不及要改掉父姓。她嫁给我的一大原因，就是能换个父亲，换个姓氏。换了姓氏之后，干吗放弃？改姓和她喜欢空想的个性一样，希望漫天胡编故事。她是想脱离周边的环境。改了姓，成功了，找到了我，也看上我所代表的稳定性，她自然不再需要成为别人。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了。她满足心愿了。干吗要走呢？”

史迈利再度拖时间。他以仿佛不确定的眼神看着彼得·伍辛顿，再看

看自己的档案，再翻至最后记载处，调整眼镜位置，阅读笔记，显然绝不是第一次阅读。

“伍辛顿先生，如果我们的信息正确的话——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敢说保守估计也有百分之八十确定，我敢提出这个数字来保证——夫人目前使用的姓氏是伍芝。她使用的名字以德文拼音，说来也怪，拼成Liese。有人告诉我，发音不是‘莱莎’，第一个元音是长音。这个说法，不知你是否能够证实或否认。另外一个说法是，她积极从事一家远东珠宝公司的运作，公司营运范围遍及香港和其他大城市。她显然生活优渥，经常现身社交场合，涉足的圆场属于上流社会。”

彼得·伍辛顿显然听不太进去。他在地板上站定，却似乎无法弯下膝盖。他再次折手指，以不耐烦的神情怒视角落如枯骨般堆积的乐谱架，在史迈利的话仍未讲完时就想发言。

“听好，我希望不管是谁负责接触她，千万别激动向她恳求，别要求她拿出良心。别讲那些。只要直接表白我的心意：她随时能回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史迈利在档案中寻求庇护。

“这个嘛，暂时先不要讨论，我们先继续——对照事实，伍辛顿先生——”

“哪来的事实？根本没有，”彼得·伍辛顿说，脾气再起，“只有两个人。加上伊恩的话，三个。像这样的事情，没有所谓事实的存在。在任何婚姻里都一样。这是人生让我们学到的教训。感情关系完完全全属于主观。我坐在地板上，这是事实。你在写字，也是事实。她母亲在背后鼓动她，也是事实。懂了吗？她父亲是个目无法纪的疯癫精神病患者，也是事实。伊丽莎白不是希巴女王的千金，也不是前首相劳合·乔治的亲生孙女。别管她怎么说。她没有拿过梵文的学位，却向女校长撒谎，让她到现在仍坚信不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那位迷人的东方妻子？’她对珠宝的认识不比我还多。那也是事实。”

“日期和地点，”史迈利喃喃对着档案说，“让我先检查这两项再说。”

“没问题。”彼得·伍辛顿风度翩翩说，再持绿色锡壶倒满史迈利的茶杯。他的大手指沾上粉笔灰，有如他头发的银丝。

“带坏她的人，其实就是她母亲，”他继续以同样完全合乎情理的语调说，“老是急着让她上舞台，然后学芭蕾舞，接着想让她上电视。她母亲只希望别人仰慕伊丽莎白。把伊丽莎白当做是她个人的替代品，那还用说。心理学上而言，完全合乎自然。念念伯恩16。念念任何一个心理学家的书。她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定位自己的个体性。通过她女儿。这种事情，你不尊重不行。我现在一切都能谅解了。她很好，我很好，全世界都很好，伊恩很好，结果突然间她跑掉了。”

“她是否仍与她母亲保持联络，你该不会知道吧？”

彼得·伍辛顿摇摇头。

“恐怕完全不清楚。她离开之前，早已看清了母亲的用意。完全跟她断绝关系。这一个难关，我敢拍胸脯说，我帮她渡过了。我对她个人幸福的贡献——”

“她母亲的地址，你该不会有吧？”史迈利固执地翻阅档案。“不会——”

彼得·伍辛顿大声以听写的速度念出。

“现在来谈谈日期和地点，”史迈利重复，“拜托。”

她离开他是两年前的事。彼得·伍辛顿叙述的不仅是年月日，甚至详细到几点钟。当时没有大吵大闹的场面——彼得·伍辛顿无法容忍吵架的场面——因为伊丽莎白与母亲已经吵过太多架了。夫妻俩其实最后一晚过得快快乐乐，特别快乐。为了换换口味，他带妻子去烤肉串的馆子。

“你来的路上，或许看到了，店名是诺索斯，在乳品快餐店隔壁。”

他们享用美酒，吃得尽兴，而安德鲁·威特夏，新来的英文老师，也加入两人的行列。几星期前，伊丽莎白才介绍安德鲁练习瑜伽。他们俩一起到梭贝尔中心上课，变成好朋友。

“她真的对瑜伽很有兴趣，”他点着白发苍苍的头表示认同，“是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安德鲁的个性，正好有助于她发挥这一方面的兴趣。外向、不习惯沉思、喜欢肢体运动……正好适合她。”他语气坚定。

他说，因为帮忙照顾小孩的人十点下班，所以三人，他、安德鲁、伊丽莎白于十点回家。他冲泡咖啡，三人欣赏音乐，十一点左右伊丽莎白给两人各一吻，说她想过去看看母亲。

“据我了解，她不是和母亲断绝关系了？”史迈利轻微反驳，但彼得·伍辛顿置若罔闻。

“当然，对她来说，亲吻并不代表什么，”彼得·伍辛顿解释得理所当然，“她谁都亲，学生、姐妹，连清道夫都亲。她非常外向。值得再提一次的是，她喜欢缠着别人不放。我是说，她的每段人际关系，都非得是一场征战不可。她的小孩也好，餐厅里的服务生也好……等到赢得对方欢心，她又觉得对方好无聊。那还用说。她上楼看看伊恩，而且我相信她还趁这个时间从卧房找出她的护照和安家费。她留下纸条表示‘抱歉’，之后再也不见人影。伊恩也再没见过她。”彼得·伍辛顿说。

“呃，安德鲁有没有她的消息？”史迈利调整眼镜位置，询问彼得。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说他们是朋友关系，伍辛顿先生。有时候，第三者会变成中间人，在这种情事中。”

用到“情事”一词时，他抬头，发现自己与彼得·伍辛顿一对诚实、哀凄的眼睛四目相接，一时之间，两副面具同步卸下。史迈利是观察者

吗？或者他被对方观察着？也许只是他想像力太丰富，或者他察觉到，在他心中，以及对面这位文弱书生的心中，隐隐有种同病相怜之感？“戴绿帽又顾影自怜的丈夫，应该组成联盟才对。你们全都有无味而可怕的慈悲心！”安恩有次对他丢下这句狠话。史迈利心想，你从来都不懂你的伊丽莎白。他仍盯着彼得·伍辛顿看。我也从来都不懂我的安恩。

“我所记得的就只有这些了，真的，”彼得·伍辛顿说，“之后的事，是一片空白。”

“好，”史迈利无意间在伍辛顿反复强调的说法中找到庇护所。“好，我了解。”

他起身离去。门口站了一名小男童，发出伪装下具有敌意的目光。一名重量级妇女平静站在身后，握住他双手手腕高举，乍看之下如同他在荡秋千，其实他仍站在地上。

“你看，爸爸在那边。”妇女说，以令人依恋的棕色眼珠凝视伍辛顿。

“珍妮，嗨。这位是外交部的史坦法斯特先生。”

“你好。”史迈利客气地说。漫无边际聊了数分钟，史迈利承诺若有进一步消息会立刻通知，然后静静告辞。

“噢，祝你圣诞快乐。”彼得·伍辛顿从门阶上喊。

“啊，对。是的。我也祝你圣诞快乐。全家快乐。年年快乐。”

在休息站小吃店点咖啡，除非你请他们别加糖，咖啡一定是甜的。每次这位印度女子一泡咖啡，蒸汽就灌满小厨房。男人三两成群，默默吃着早餐、午餐或晚餐，要看此时对他们个别的时间而定。在这里，圣诞节也即将到来。六颗油腻的彩色玻璃球挂在柜台上，以增添节庆气氛，另有一只渔网丝袜请求捐款给脑瘫儿童。史迈利盯着晚报，无心阅读。距离他不到十二英尺处的角落，小法恩采取看护人典型的坐姿，深色眼珠对着用餐人与门口和善地微笑。他以左手举杯，右手则闲置于胸口。卡拉也有相同的坐姿吗？史迈利纳闷着。卡拉也在不起疑心的人群里找到喘息空间吗？老总是这样没错。老总在一房一厅的楼上公寓里，为自己找到第二、第三、第四条生命。该公寓位于西部便道旁，登记的姓氏平凡无奇，就叫马修斯，并未向管理组人员报备为假名。其实第二、第三、第四条生命是夸大的说法，但他的确把衣服留在那里，养了一个女人，马修斯夫人，甚至也养了一只猫。每星期四一大早去工匠俱乐部学习高尔夫球，而在圆场的办公桌前，他道尽了对中下阶层与高尔夫球的不屑的看法，对爱情也看不上眼，对其他可能偷偷心动的无聊事务一样不屑。他甚至租了一块公有园地，史迈利记得，在铁路侧轨边。史迈利向马修斯夫人报告坏消息那天，她坚持要开美容过的莫里斯车载史迈利前去参观。他的园地与其他人的同样紊乱：标准型的玫瑰，没吃过的冬季蔬菜，一个塞满水管与种子盒的工具房。

马修斯夫人为寡妇，柔弱却很能干。

“我想知道的只是，”她看过支票上的数字后说，“我只想确定的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是真的死了，还是回到他老婆身边？”

“他是真的死了。”史迈利向她保证，而她也深信不疑。他克制自己多话的冲动，没有说出老总的元配早在十一年前作古，死前仍相信丈夫在国家煤矿理事会上班。

卡拉有必要在委员会里阴谋算计吗？搞派系，欺骗愚人，巴结聪明人，照着彼得·伍辛顿这类人的哈哈镜，全是为了完成任务？

他看了一下手表，再看法恩。硬币盒立在洗手间旁。但当史迈利想向店主换硬币时，他推说太忙而拒绝。

“叫你换就换，你这个烂王八！”一个皮衣皮裤的长途卡车司机大吼。店主乖乖遵命。

“怎么样了？”吉勒姆问。他从专线电话接听。

“她背景不错。”史迈利回答。

“万岁。”吉勒姆说。

事后诸多不利史迈利的指控当中，有一项指出他浪费时间处理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非分配给部属办理。

在伦敦北郊的城乡景观高尔夫球场附近，盖了几个街区的公寓，犹如永久沉船的上部结构，躺在长长的草坪尽头。草坪上的花朵向来都是半开不开。丈夫在早上八点半左右匆忙驾驶救生船离去，女眷与子女则整日维持船只漂流水面，等男主人回家。回家后的男主人则累得无力扬帆航行。这些建筑物于三十年代兴建，从完工之日起，一直漆着脏兮兮的白色。公寓的窗户呈长方形，加装钢框，向外望去峰峰相连，波澜壮阔，周一至周五有不少女人涂着浓浓眼影，如游魂般闲逛此处。这里有一街区名为亚凯迪豪宅区，裴令夫妇住在七号，在众多建筑物间稍微可见九号果岭，但山毛榉树叶一长出来，果岭也不见了。史迈利按下门铃时，只听见细微的电子铃响，没有脚步声，没有犬吠，没有音乐。大门打开来，一名男子在黑暗中以破锣嗓子问：“谁啊？”开门后史迈利才发现对方是女人。她身材高挑却驼背，一手夹着香烟。

“敝人姓欧茨。”史迈利说着递出绿色大名片，以玻璃纸覆膜。不一样的伪装，需要不一样的姓名。

“噢，原来是你啊，请进。吃饭，看电视。你讲电话的声音比较年轻。”她的低沉嗓音带有不愉快的意味，却极力想增添高雅气质。“他在家。他认为你是间谍。”她说，一面眯着眼看名片。“你该不是间谍吧？”

“不是，”史迈利说，“我不是的。只是个打探消息的人。”

这间公寓里全是走廊。她在前带路，后面拖着一道琴酒味。她走路时拖着一条腿，右手臂显得僵硬。史迈利猜想她中风过。她的穿着仿佛透露出没人对她的身高或性别感兴趣。也仿佛她不在乎。她穿着平底鞋，男人式样的套头衫，系上皮带，让她肩膀显得宽阔。

“他说他从没听过你。他说他查过电话簿，你这个人不存在。”

“我们这一行喜欢保密。”史迈利说。

她推开一扇门。“他存在，”她人未进房间就大声报告，“他不是间谍，他只是来打探消息。”

在远处的椅子上，一名男子正在阅读《每日电讯报》，遮住脸孔，史迈利只见光秃秃的头，居家长袍，以及跷起的短腿，穿的是真皮卧房拖鞋。然而不知何故，他立即知道裴令先生是只愿娶高挑女人的那种矮子。房间的陈设以一个人生活使用为原则，有电视，有床铺，有煤气取暖器，有张餐桌，以及一张用来对号涂色的画架。墙上挂了一幅色彩过于艳丽的相片，主角是美丽非凡的女孩，角落上以对角线潦草签名，是电影明星向老百姓致意的签法。史迈利认出是伊丽莎白·伍辛顿。他已见过很多相片了。

“欧茨先生，这位是南可。”她说差着点行屈膝礼。

《每日电讯报》以卫队降旗的速度缓缓落下，显出一张咄咄逼人、闪闪发光的小脸，眉毛粗厚，戴着管理阶级的眼镜。

“我是。请问你究竟是谁？”裴令先生说，“你是特务对不对？别跟我支支吾吾的，说个清楚，一了百了。我不跟打探消息的人打交道的。什么东西？”他质问。

“他的名片，”裴令夫人说着递出，“绿色的呢。”

“噢，看来是要交换名片喽？这样的话，没名片不行吧，西丝？最好去印几张，亲爱的。快到史密斯的店去印，好吗？”

“想不想喝茶？”裴令夫人偏头看着史迈利问。

“泡茶给他干吗？”裴令先生质问，这时她已插上电热壶。“他不用喝茶了。他不是客人。他甚至不是情报单位的人。我没问过他。留下来住一星期，”他对史迈利说，“喜欢的话，搬进来住也行。睡她的床铺。环球黄金安全顾问公司，狗屁。”

“他想谈的是丽姬的事，亲爱的。”裴令夫人说，为丈夫端来茶盘，“就这么一次，做出爸爸的样子嘛。”

“睡她的床，保证你爽上天。”裴令先生说完再度举起《每日电讯报》。

“讲得真亲切。”裴令夫人大笑一声说。这句话只有两个语调，有如鸟鸣，不具幽默。一阵不协调的寂静随之而来。

裴令夫人端给史迈利一杯茶。他接下后，对着裴令先生的报纸背面自言自语。“先生，海外某大企业正考虑面试贵千金伊丽莎白，事关重大。敝公司接受委托必须保密，这是近年来非常必要的正当程序，我们得向本国的朋友和亲戚接触，取得当事人品行背景的参考。”

“他说的就是我们啦，亲爱的。”夫人解释，以免丈夫没听懂。

报纸刷的一声落下。

“你是在暗示，我女儿品行不良？所以你才坐在这边，喝我家的茶水，作这种暗示？”

“不是的，先生。”史迈利说。

“不是的，先生。”裴令夫人说，帮不上忙。

沉默了一阵，而史迈利也不想煞费苦心终结这段沉默。

“裴令先生，”他最后以坚定而具耐心的口气说，“据我了解，您在邮局服务多年，也晋升至要职。”

“很多很多年。”裴令夫人附和。

“我动手工作，”裴令先生再度从报纸后面说话，“这世上讲话讲太多了。工作做得不够。”

“贵部门是否曾雇用罪犯？”

报纸嗦嗦动了一下，随后静止。

“或是共产党员？”史迈利说，口气同样和缓。

“要是雇了，也会尽早扫地出门。”裴令先生说，这一次报纸总算放下。

裴令夫人弹指。“啪一声全扫出去了。”她说。

“裴令先生，”史迈利继续说，保持坐守床边的态度，“有意聘请贵千金的公司，是东方一家大企业。若被录取，贵千金将专门负责空运事宜，将能提前得知大批黄金运送进出我国的消息，她也将负责外交快递以及机密邮件的运送，薪资极为优厚。我认为，我相信您也有同感，如此责任重大而且人人争取的职位，贵千金应与其他人选接受同等程序的检验，这样的要求应不算不合理。”

“你老板是谁？”裴令先生说，“我只想知道这一点。是谁要你负责这件事的？”

“南可，”裴令夫人恳求，“谁说谁要负责的？”

“少乱叫我名字！再给他添茶水。你是女主人吧？要有女主人的样嘛。他们早该补偿丽姬了。老实讲，到现在才想到她，想到亏欠她一份人情，我很不高兴。”

裴令先生继续研究史迈利抢眼的绿色名片。“‘驻亚洲、美国与中东特派员。’大概是笔友吧。总公司位于南莫顿街。有问题请打电话几号几号。打过去，谁接？大概是你的共犯吧。”

“在南莫顿街的话就不会有问题的啦。”裴令夫人说。

“有权无责，”裴令先生边说边拨号，讲话的口气仿佛有人捏住鼻孔，“可惜我不信这一套。”

“有责，”史迈利纠正他，“本公司推荐客户雇用的员工若有不实情事，一概全力保障客户权益。本公司在这方面已投保。”

电话响了五声，圆场的交换机才接听，史迈利求上帝保佑不要有所闪失。

“找总经理接电话，”裴令命令，“他开不开会我才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来着？好，你去叫安德鲁·富比士莱尔，说裴令先生有话想直接跟他讲。现在就去叫他。”漫长等待。干得好，史迈利心想。这招厉害。“我是裴令。我这边来了一个自称欧茨的男人，坐在我面前，矮胖，一脸担忧。你要我怎么处置他？”

史迈利听见话筒那端传来彼得·吉勒姆的语调，中气十足，公事公办的口气，只差没有命令裴令起立遵命。息怒之后的裴令先生挂掉电话。

“你来找我们，丽姬知不知道？”他问。

“知道的话，一定会笑到没力。”他妻子说。

“可能连公司正考虑雇用她也不知道，”史迈利说，“最近越来越常见的做法，是先身家调查后再进行接触。”

“是为了丽姬好，南可，”裴令夫人提醒他，“尽管她已经有一整年没打电话回家了，你还是知道你疼爱她的。”

“你们从来不写信给她？”史迈利以同情的口吻问。

“她不要我们写信。”裴令夫人向丈夫瞄一眼。

史迈利嘴唇间冒出极轻微的咕哝声，可当做是惋惜，但其实是如释重负。

“再给他添茶水，”丈夫命令，“已经被他大口喝光了。”

他以质疑的眼光再度盯着史迈利看。“我还是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特务，甚至到现在都不确定，”他说，“是不怎么体面，不过有可能是故意的。”

史迈利带表格来。圆场负责印刷的人昨晚为他准备好，印在黄褐纸张上。幸好事先有所准备。因为史迈利这时发现，在裴令先生的世界里，任何事物合法的表征就是表格，而黄褐色是值得敬重的颜色。因此两人如朋友合作玩填字游戏，史迈利弯腰陪同一旁，裴令先生动笔，妻子则坐着抽烟，盯着灰色网状窗帘外面的景物，一面不停转动结婚戒指。填好了出生年月日与出生地——“在亚力山卓私人产院，就在同一条马路上。现在是不是关门了，西丝？变成卖冰淇淋的店了。”填好了学历，裴令先生针对这主题发表见解。

“我不让她在同一所学校待太久，对吧，西丝？让她头脑保持精明，不让她的想法固定下来。换个环境等于是度个假，我说。是不是啊，西丝？”

“他读过教育方面的书。”裴令夫人说。

“我们结婚结得晚。”他说，仿佛解释她为何在场。

“我们希望她能上台表演，”她说，“别的不说，他希望当她经理人。”

他填好其他日期。其中一所是戏剧学校，也修过秘书课程。

“新娘学校，”裴令先生说，“作准备，不是受教育。我觉得这样才对。什么都给她一点。让她见见世面。教她仪态。”

“噢，仪态她是有啦，”妻子附和，喉咙咋嗒一声，吐出白烟，“也见过世面。”

“她怎么没念完秘书专校？”史迈利指着表格问，“戏剧学校也没念完？”

“没必要。”裴令先生说。

填到过去任职单位，裴令先生列出伦敦一带六七家公司，任职期皆不超过一年半。

“全都很无聊。”裴令夫人愉快地说。

“她是在东看西找，”丈夫气定神闲地说，“在全心投入之前先把脉。是我叫她这么做的，是不是啊，西丝？那些公司全都想留她，可惜我才不上当。”他对妻子挥出一手。“到最后心血都有回报，你别不承认！”他大吼，“即使她不准我们谈！”

“她最喜欢芭蕾舞，”裴令夫人说，“教小朋友跳舞。她好爱小孩子。好爱小孩子。”

这句话大大激怒了裴令先生。“西丝，她在做的是生涯规划，”他怒吼，重重将表格拍在自己膝盖上，“上帝啊，你这个蠢女人，难道你希望她回去找那男的？”

“好了，她在中东待过，是做什么？”史迈利问。

“修一些课。商业学校。学阿拉伯文。”裴令先生说。他的眼光突然远大起来。令史迈利惊讶的是，他竟然起身，傲慢地比手势，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她到中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告诉你也没关系，是因为一场很不幸的婚事。”

“天哪。”裴令夫人说。

他挺直身子时，硬朗的身形让他显得难以对付。“不过后来我们把她救了回来。没错。她想回自己的房间住，随时可以。就在我隔壁。随时都找得到我。没错。我们帮她渡过那个难关，是不是啊，西丝？后来有一天，我对她说——”

“她带一个卷发的英国老师回家，很有人缘，”他妻子插嘴，“安德鲁。”

“苏格兰人。”裴令先生主动纠正她。

“安德鲁是很不错，可惜南可看不上，是不是啊，亲爱的？”

“他配不上我女儿。搞什么瑜伽的东西。我看以后没什么出息。后来有一天我对她说：‘丽姬，你的前途在阿拉伯。’”他弹着手指，指向想像中的女儿。“石油。钞票。权力。现在就去。打包。去买机票。去。”

“飞机票是夜总会帮她买的，”裴令夫人说，“结果占尽她的便宜。”

“才没有那回事！”裴令反驳，拱起宽厚的肩膀对她大骂，但裴令夫人视若无睹，继续说下去。

“是这样的，她看到广告去应征。那女人在布拉福，甜言蜜语的。老鸨一个。‘诚征女服务生，其实不是你想的那种。’她说。他们买机票给她，一降落巴林，就逼她签约，所有薪水用来付公寓的房租，从此以后她就成了他们的人，对不对啊？她哪里也去不了，对不对？大使馆帮不上忙，谁也没办法。跟你说，她长得好美。”

“你这个又丑又笨的老太婆。我们讲的是生涯规划啊！你难道不爱她？你自己的女儿哪！做什么母亲！我的天哪！”

“她是有生涯规划，”裴令夫人满足地说，“全世界最好的规划。”

气急败坏之下，裴令先生转向史迈利。“就写‘柜台工作，学习语言’，然后再写——”

“或许能请您介绍一下，”史迈利以轻缓的语气插嘴，一面舔舔拇指，翻至下一页，“这样说好了，她在运输业的历练。”

“再写”——裴令先生紧握双拳，先盯了妻子一眼，再盯着史迈利看，是否继续讲下去，似乎拿不定主意——“再写下‘英国高等特务’。地下工作。写啊！写下来！好了，总算说出来了。”他转身面对妻子。“他负责保密，他说过的。他有权利知道，她也有权利让别人知道这个背景。我女儿才不当什么无名英雄，或是什么不支薪员工！退休之前，她会得到乔治勋章的，等着瞧好了！”

“算了吧，”裴令夫人语带倦意，“只是她编的故事之一。你也知道。”

“能否请各位一件一件来？”史迈利要求，语气温柔而节制，“我们刚才提到运输业方面的经验。”

裴令先生摆出智者般的姿态，以拇指与食指顶住下巴。

“第一个商场上的经验，”他边沉思边说，“是自行处理自己的事业，你也了解，就是在所有事情有了眉目，具体成型，真正开始有所回报——除了我刚才提过的情报工作之外——她雇了一些员工，处理大笔现金，行使她负责的责任，地点是，那地方怎么发音来着？”

“万象。”他的妻子口气呆板，以标准英国腔说。

“雷国首都。”裴令先生将老挝发音为“雷国”。

“请问公司名称？”史迈利询问，铅笔停在应填的空格上。

“酒厂，”裴令先生堂皇说出，“我女儿伊丽莎白在那个战火蹂躏的国家开了一家大酒厂。”

“名称是？”

“一桶一桶没商标的威士忌，卖给美国浪人，”裴令先生朝窗户说，“一桶赚两成佣金。他们买下来，放在苏格兰酿熟，当做是投资，以后可以转卖。”

“您说的‘他们’，指的是……”史迈利问。

“后来她的钱被男朋友拐走了，”裴令夫人说，“是个吸金公司，手法很高明。”

“彻彻底底的狗屁胡说八道！”裴令先生大骂，“这女的疯了，别理她。”

“请问当时的地址是什么？”史迈利问。

“就写‘代表’，”裴令先生边说边摇头，仿佛状况失控，“酒厂代表兼秘密情报员。”

“她跟飞行员同居，”裴令夫人说，“她叫他小不点。幸亏有小不点，不然她就要饿肚皮了。他人长得不错，可惜战争一打下来，让他整个人彻头彻尾变了个样。是，当然是！就像我们英国的男孩子一样，不是吗？夜复一夜，日复一日出任务。”她往后仰，纵声尖叫，“拔腿跑啊！”

“她发疯了。”裴令先生解释。

“那些士兵有一半十八岁就精神崩溃。不过他们还是坚持下去，告诉你，他们欣赏丘吉尔，爱到心底去了。”

“瞎疯子，”裴令先生说，“乱吠乱叫，又疯又傻。”

“抱歉，”史迈利奋笔疾书，说，“那个飞行员，小不点姓什么？全名是什么？”

“瑞卡度。小不点瑞卡度。小绵羊一只。跟你说啊，他死了，”她正面对丈夫说，“丽姬的心都碎了，是不是啊，南可？话说回来，说不定这样最好。”

“她才没有跟任何人同居咧，你这个人猿！是表面工作，全部都是。她是替英国特务局工作！”

“噢，老天啊。”裴令夫人口气绝望。

“少叫老天了。梅伦（Mellon）。写下来，欧茨。写下来给我看。梅伦。她在英国特务里的直属长官是梅伦。”他将字母一个个拼出，“和香瓜（melon）同音，多一个l。梅伦。伪装是个普通的贸易商人，而且还赚得不少。他头脑聪明，自然会赚钱。不过面具下面啊，”——裴令先生一拳打在另一手的掌心，发出令人错愕的巨响——“平淡和气的英国生意人表面下，这个有两个l、叫做梅伦的人，秘密孤军奋战，对抗英国敌人，我的丽姬则在背后帮他。不管是毒枭、同性恋，只要是宣誓颠覆我

们的岛国，我英勇的女儿丽姬和她的朋友梅伦上校一定合作，破解对方阴谋！我说的句句属实。”

“她是得谁真传，问问我啊。”裴令夫人嘟哝给自己听，一面开着门出去，踽踽独行在走廊上。史迈利朝她背影瞄一眼，看见她停住脚步一会儿，似乎偏着头，在阴影中对他示意。他们听见远方有门用力关上的声响。

“是真的，”裴令勇敢地说，音量却稍压低，“她的确是，她的确是。我女儿是英国情报单位备受尊重的资深工作人员。”

史迈利最初并未搭腔，因为他全神贯注在做笔记上，因此有一段时间四下无声，只有铅笔在纸上搔刮以及翻页的声音。

“好。这样的话，如果不介意，连这些细节我都记下。当然保密。其实告诉你也无所谓，我们这一行经常碰到这种事。”

“那就好。”裴令先生说，接着用力坐在一只塑料面的大坐垫上，从皮夹里抽出一张纸，往史迈利手里塞。是一封手写的信，有一页半长。笔法时而高贵，时而童稚，第一人称写得既大又弯曲，其他字体则显得较谨慎。一开头写着“我最亲爱的老爸”，最后是“你惟一真心的好女儿伊丽莎白”，内容几乎全让史迈利默记在心，大致如下：“我已经抵达万象，是个平淡的城镇，有点法国味道，有点乱，不过别担心，我有重要消息相告，必须立即通知你。你有可能一阵子听不到我的消息，甚至听到坏消息也别担心。我没事，有人照顾，而且是为了远大志向而奋斗，你一定会感到骄傲的。我一到这里立刻通知英国贸易领事麦克尔沃先生，是英国人，派我向梅伦报到待命。上面不准我说出来，所以你一定得信任我，他的姓是梅伦，是这里一位有钱的英国贸易商，但是其实另有春秋。梅伦正要派我到香港，要我去调查金块和毒品，假装是另有任务，他在各地都安排了人照顾我，他的真名不是梅伦。这件事麦克尔沃只秘密知道而已。如果我发生了任何事情，一定不虚此行，因为你我都知道国家最重要，亚洲这么多条生命都不被当做人看，我一条命又算什么？爸，这是义行，是你我都梦寐以求的事，对你来说意义更重大，因为你曾经上过战场，为家人和心爱的人打仗过。帮我祈祷，照顾妈妈。我永远爱你，甚至进了监狱也一样。”

史迈利交回信纸。“没有日期，”他淡然说，“裴令先生，能不能让我知道日期？大致日期就行。”

裴令给的不是大致而是确切日期。总算不枉在皇家邮局服务一生。

“之后就再也没写信给我了，”裴令先生骄傲地边说边折好信纸，放进皮夹，“一个字也没有，从那天起，连一声也没听见。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父女连心。话已经说了，我绝口不提，她也一样。她对我偏头眨过眼。我晓得。她知道我晓得。父女之间的了解程度，不会比我俩更微妙了。随后发生的事：瑞卡度，管他叫什么名字，是死是活，谁管他。她跟某个中国佬混在一起，不管。男朋友，姐妹，生意，不管你听到什么，一概别理会。都是障眼法。他们拥有她，他们完全控制她。她为梅

伦效劳，而且她爱自己的父亲。完毕。”

“感谢您鼎力相助，”史迈利边说边收拾纸张，“请别担心，我会自己走。”

“随你自己走吧。”裴令先生自认机智地说。

史迈利关上门时，他已重回扶手椅，装模作样地寻找刚才看的《每日电讯报》文章。

黑暗的走廊上，酒味更浓。门用力关上前，史迈利数了九步，所以一定是左边最后一道门，距离裴令先生最远的一间。一定是洗手间，只不过洗手间以牌子写着“白金汉宫后门”。他以极轻的声音唤她的名字，听见她大喊“滚出去”。他走进去，发现置身于她的卧房。裴令夫人趴在床上，一手端着酒杯，翻着一堆风景明信片。房间本身一如丈夫的卧房，陈设以一个人生活使用为原则，有火炉，有洗手台，有一叠待洗的餐盘。四面墙壁上挂着相片，主角是高挑艳丽的女孩，有些与男性友人合照，有些是独照，背景主要是东方。空气中弥漫着琴酒与猫味。

“他就是不肯让她自由，”裴令夫人说，“南可就是不肯。一向都不肯。他是试过，就是不行。她长得漂亮，你也知道。”她二度解释起来，转身面朝上，高举一张明信片阅读内容。

“他会不会进来？”

“用拖的，才拖得进来吧。”

史迈利关上门，坐在椅子上，再次取出笔记簿。

“她找到一个华人，对她很好，”她说，仍注视着上下颠倒的明信片，“她为了救瑞卡度才去找他，结果最后却爱上他。他是她真正的父亲，是她从小到大第一个父亲。长大后，一切总算没有差错了。吃了那么多苦。全部都结束了。他叫她丽泽，”她说，“他认为她取这个名字比较美。真的很好笑。我们不喜欢德国人。我们爱国心重。现在他在帮她张罗好工作，对不对？”

“据我了解，她偏爱伍芝这个姓，比较不喜欢伍辛顿。原因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大概是想把那个无聊的老师砍成一半吧。”

“你说，她为的是救瑞卡度，意思当然是——”

裴令夫人做出演员般的呻吟声。

“噢，你们男人啊。什么时候？谁？为什么？怎么会？在草丛里啦，亲爱的。在电话亭里，亲爱的。她为瑞卡度买下一条命，用的是她惟一的货币。她让他感到光荣，然后离开他。管他的，那男的是条懒虫。”她拿起另一张明信片，研究着棕榈树与空旷的海滩。“我的小丽姬跑遍了半个亚洲的草丛，最后才遇上她的德雷克。最后还是遇上了。”她似乎听见声响，骤然起身，以极为热切的眼神直盯史迈利，一面整理头发。“我认

为你最好还是走吧，亲爱的。”她说，嗓音仍旧低沉，边说边转头面向镜子，“老实说，你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身边出现值得信赖的脸时，我会受不了。对不起，亲爱的，知道我的意思吗？”

回到圆场，史迈利花了两三分钟证实他已知道的重点。两个I的梅伦，如同裴令先生强调的一个字母不漏，是经过登录的勤务名与假名，使用人是山姆·科林斯。

11 上海特快车

如今众人忆起往事经过，表面上像是有一连串事件压缩在这段时期里。杰里的人生走到此处正是圣诞节前后，期间他在外籍记者俱乐部连续漫无边际地应酬，也在最后一刻包好一连串包裹，寄给猫咪，在夜半时分以红绿冬青图案的纸拙劣地包好。追查瑞卡度行踪的申请，经修正后已正式向表亲提出，而为了对马铁娄解释得更详尽，史迈利本人将申请函带到别馆。可惜的是，申请函卡在圣诞节，再加上即将沦陷的越南与柬埔寨，结果申请函一直到新年过后数日才走完美国相关部会，有海豚档案上的日期为证。的确，史迈利与马铁娄以及马铁娄的缉毒署友人那场关键的会议，一直到二月初才开会。事情耽搁了，让杰里的精神备受压力，圆场内部在理智上欣赏他，但在持续的危机气氛中，并没有人表示同情或采取行动。针对这一点，依个人立场而定，有人或许会再度怪罪史迈利，然而除了召回杰里之外，很难想像史迈利还能做出什么动作。尤其是库洛，他热情洋溢地继续报告杰里的意向。五楼夜以继日赶工，几乎没有人记得圣诞节，只有在二十五日正午举办个相当简陋的酒会，下午休息时康妮与妈妈们播放女王的演说，音量开得非常大，为的是让类似吉勒姆与默莉·米金的异端感到羞愧。这两人觉得女王演说爆笑，还在走廊上怪腔怪调学舌作乐。

正式将山姆·科林斯引进圆场微薄的支薪阶级，发生在元月中某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有轻松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轻松的一面是他遭到逮捕。星期一上午，他于十点整抵达，并未身穿晚礼服，而是整洁的灰色外套，纽扣孔别上玫瑰，在寒风中显得出奇年轻。但史迈利与吉勒姆出差，与表亲闭门研商，看门人与管理组人员皆未接获允许进入的指示，因此将他锁在地下室三个小时，害他直发抖，怒气冲天，直到史迈利回来，证实两人有约，他才恢复自由身。至于他的办公室，也闹了不少笑话。史迈利原本将他安排在四楼，在康妮与狄沙理斯隔壁，无奈山姆不喜欢，希望到五楼，他认为那里对于代理协调人的身份比较合适。可怜的看门人有如苦力，得把家具搬上搬下的。

黑暗面较难描述，但有些人试过。康妮说山姆冷感，形容词选得难听；对吉勒姆而言，山姆饥肠辘辘；对妈妈们而言，山姆鬼鬼祟祟；对掘穴人而言，山姆过于圆滑。对不明白背景的人，最奇怪的事莫过于他自给自足的程度。他不调阅档案，也不愿将责任左拢右揽过来，几乎不使用电话，只有偶尔赌马，或是关照俱乐部的经营状况。然而，他所到之处都带着微笑。打字员宣称，他连睡觉都在办公室里，周末还亲手打扫清洗。史迈利与他面谈时大门深锁，谈话内容一点一滴传至团队耳里。

没错，那名女孩在万象的确与两个常去加德满都的嬉皮凑在一起。没错，他们甩掉她后，她确实请麦克尔沃帮她安插工作。没错，麦克尔沃把她介绍给山姆，认为光靠姿色她必有可供利用之处。上述一切，多

半吻合女孩家书中的描述。山姆当时手上有两三件低级别的缉毒任务待办，除此之外，拜海顿之赐，他无事可做，所以心想干脆安排她去与飞行员鬼混，看看有何发展。他没向伦敦报告，因为当时伦敦样样封杀。他径自试用她，以自己的管理基金付她薪水。后来发展出瑞卡度。他也派她追寻一条老线索，到香港追查金块暴利集团的动静，直到后来他才了解这女孩只会闯祸。山姆说，瑞卡度将女孩从他手中接收过去，安排她到印支包机上班，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么说来，他还知道什么？”吉勒姆以愤慨的口吻质问，“那样太不够意思了吧？打乱了阶级顺序，还干涉到我们的行动。”

“他懂得她。”史迈利捺着性子说，然后继续研究杰里·威斯特贝的档案。近来杰里的档案成了他的主要读物。“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免不了稍微勒索他人啊，”他以令人抓狂的容忍态度说，“偶尔接受他人勒索，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而康妮却以罕见的粗俗口气引用显然是约翰逊总统对FBI局长胡佛的看法：“乔治宁愿拉山姆·科林斯进帐篷，对着外面小便，不愿他站在帐篷外面面向内小便。”她大声说，像女学童痴笑着自己的斗胆直言。

更特别的是，一直到元月中，在狄沙理斯博士持续调查柯背景的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查出某位希博特先生仍健在。此人代表浸信会至中国传教，柯申请就读伦敦的法律学院时，他是推荐人之一。

如此一来，事件脉络更加繁杂，记忆中难免遗漏，因此堆砌在杰里身上的压力更加沉重。

“他有可能受封骑士。”康妮·沙赫斯说。他们在电话中已谈过。

场面非常严肃。康妮剪短头发，头戴深棕色帽子，深棕色套装，手提内装无线电麦克风的深棕色手提包。小车道外停了一辆蓝色出租车，开着引擎与暖气，匈牙利街头艺术家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船形帽，佯装打盹儿，却暗中接收并记录对话，收录在座位底下的仪器里。康妮原本夸张的身形外表，此时显得端庄节制。她手握一本文具处的笔记簿，一支公家圆珠笔夹在她的风湿指间。至于冷淡的狄沙理斯，重点是让他的打扮稍微现代化。在他抗议声中，他穿上吉勒姆的条纹衬衫，配上相称的深色领带。结果令人微微称奇，竟然相当具有信服力。

“这事极为机密。”康妮对希博特先生说，音量大而清晰。这句话她在电话里也说过。

“极度机密。”狄沙理斯喃喃地附和，双臂乱挥，最后一手肘别扭地落在凸起如瘤的膝盖上，另一只龟裂的手掌握住下巴，然后搔着下巴。

总督推荐过了，她说，现在由理事会决定是否通过推荐案，再向白金汉宫推荐。说到白金汉宫时，她朝狄沙理斯抛出压抑的一眼，而狄沙理斯立即微笑起来，爽朗却矜持，如同参加脱口秀的名人。他的灰发涂上发油，模样（如康妮事后的说法）宛如涂抹上肉汁、准备送入烤箱一般。

“所以希望您能了解，”康妮说，她的腔调标准如女主播，“为了防止崇高的传统蒙羞，必须进行甚为彻底的调查。”

“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应和，朝狄沙里斯的方向眨眨眼，“哇，不得了。白金汉宫，听到没，朵乐丝？”他年纪非常大。数据上注明八十一岁，然而五官却到了无法增添岁月痕迹的年龄层。他围着神职人员顶圈，身穿棕黄色羊毛衫，手肘部位缝上真皮补丁，披着披肩。背景的灰色海洋在他的白发周围形成光圈。“德雷克·柯爵士，”他说，“说真的，这一点我倒没有料中。”他的英格兰北方口音之纯净，犹如顶上雪白的头发，都有可能是伪装。“德雷克爵士，”他重复，“哇，不得了。是不是，朵乐丝？”

女儿与他们坐在一起，三四十岁，金发，身穿黄色裙衫，施粉却未涂口红。自从少女时期过后，她的脸蛋似乎从未历经任何事，惟一稳步消逝的是希望。她开口讲话时会脸红，不过她鲜少发言。她准备了一些甜点，三明治做得薄如手帕，茶籽饼放在小布垫上。为滤出茶汁，她用一片胚布缝上珠子以增加重量。天花板垂挂着尖头星形羊皮纸灯罩。立式钢琴靠着墙边，《慈光引领》的乐谱摆在架上。吉卜林的名诗《倘若》挂在空荡的壁炉之上。海景窗两旁的天鹅绒窗帘厚重，如同用来遮掩人生废弃不用的一部分。房子里没有书，连《圣经》也付之阙如。有一台非常大的彩色电视，还有一长串的圣诞卡，横向挂在绳子上，翅膀向下垂，犹如中弹飞禽即将落地的模样。这里找不到可以回忆中国海岸的事物，除非将冬海阴影算在内。这一天天气不好不坏，也没有风。在庭园里，仙人掌与灌木在寒气里乖乖等候。步道上的行人快步走过。

康妮说他们希望做笔记，因为根据圆场流传的说法是，偷到声音后，应该留下笔记，当做是预防万一，也可以当做掩护。

“噢，尽量去写吧。”希博特先生语带鼓励，“我们又不全是大象，对不对啊，朵乐丝？朵乐丝啊，记性可好着呢，跟她母亲一样好。”

“这样的话，我们想先了解的是……”康妮说。她同样保持谨慎的态度，以配合老人的步调。“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是我们访问所有关键证人的标准程序，希望了解您与柯先生结识多久，以及两人之间的关系状况。”

她其实是以略有差异的语言说，描述一下你与海豚案的关联。

老年人论及他人时，其实是在谈论自己，面对消失的镜子端详自己的影像。

“我一出生就注定为上帝服务，”希博特先生说，“我祖父，他是神职人员。我父亲，他也是，在英格兰西北的麦克莱斯菲尔有片好大的教区。我叔叔十二岁就死了，不过他还是宣誓入教，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二十岁就进传教训练学校。二十四岁，我坐船到上海，加入主生教会。船叫做帝国女王号。就我记得，服务生比乘客还多呢。真是的。”

他说，他的目标是在上海教书学语言几年，后来碰巧转到中国内陆

教会，迁居内地。

“要是能在上海教书学中文就好了，我喜欢那种挑战。我一向喜欢中国人。主教的工作并不光鲜，不过照样完成任务。这些个罗马学校啊，比较像是你们那些修道院，以及和修道院相关的东西。”希伯特先生说。

曾经信奉耶稣会的狄沙理斯，淡淡一笑。

“我们是从街头找来小朋友，”他说，“跟你讲啊，上海这地方鱼龙混杂，是很少见的现象。我们碰过各种人各种事。黑道、贪污、卖淫，多得是。我们也有政治、金钱、贪婪、各种惨事。凡人的生活，在那边全找得到，对不对啊，朵乐丝？她记不得了，真的。大战过后，我们也回去过，是不是？不过他们马上把我们赶出来。她那时不超过十一岁吧，是不是？后来那地方面目全非，不像上海了，所以我们回到这里。不过我们很喜欢这里，是不是啊，朵乐丝？”希伯特先生说。他非常留心代表两人发言。“我们喜欢这边的空气。好喜欢。”

“非常喜欢。”朵乐丝说，然后清清嗓子，对着大拳头咳嗽。

“所以只要能找到人，一概拉进教会，”他继续说，“我们找到方小姐。记得黛西·方吗，朵乐丝？你当然记得——那个拿着铃铛的黛西。算了，她其实不记得了。哇，时间过得真快呀。黛西就像魔笛手一样，只不过她拿的是铃铛，而且她不是男人，而她做的是上帝的工作，可惜后来堕落了。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位改信基督教的人，直到日本鬼子来了。黛西她会上街，猛摇着铃铛，摇个不停。有时候老万查理会陪她去，有时候我会陪她去，我们会选择码头或是夜总会区，也许是去提防后面吧，那条街我们称作血巷，记得吗，朵乐丝？她其实不记得了。老黛西会摇着铃铛，叮当，叮当！”他回忆起来不禁大笑：他清楚看见黛西就在他面前，因为他在无意识间举起一手做出激烈摇铃的动作。狄沙理斯与康妮礼貌性地加入大笑的行列，然而朵乐丝只是皱眉。“霞飞路，那地方最糟糕了。在法国租界，没什么好惊讶的，罪恶之家就在那一带。那种地方其实到处都有，上海只是塞满了一大堆。他们叫做罪恶之城。那样叫就对了。后来有几个小孩子聚集过来，她会问：‘你们有谁没娘？’会有两三个举手。不是一次两三个，而是这里一个，那里又一个。有些小孩子会说谎，比方说是为了吃顿白米晚饭，结果吃了一巴掌后被扫地回家。不过我们总能找到几个真正没娘的小孩，是不是啊，朵乐丝？渐渐的，我们集合了一个班，最后有四十四个小朋友，对不对？有些住宿，不是全部。圣经班，教教读写算数，教一些地理历史。我们的能力就只有这么多了。”

狄沙理斯为了克制不耐烦的性情，凝神注视灰色大海，不愿移开视线，然而康妮则持续笑脸迎人，以示景仰，双眼寸步不离老人的脸。

“就是这样，黛西才遇上柯家兄弟。”他继续说，不顾跳跃式的逻辑。“在码头那边，对不对啊，朵乐丝，来寻找他们的母亲。他们是从汕头北上，兄弟俩。是哪一年来着？一九三六年吧。德雷克只有十岁或十一岁，他弟弟纳尔森八岁，两人瘦得像晒衣架，好几个礼拜没有好好吃

一餐了。他们一夜之间变成白米基督徒，不骗你！那个时候的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我是说英文名字。他们是船民，潮州人。我们从来没找到他们的母亲，是不是啊，朵乐丝？‘被枪射死，’他们说，‘被枪射死了。’有可能是日军，也有可能是国民军。我们一直都没有问出究竟。又何必问呢？她在上帝身边，那就好了。干脆什么都别问，继续过日子。小纳尔森的手臂血肉模糊，看了好吓人，骨头断了，穿透衣袖，大概也是被炮弹炸到的。德雷克一手握住纳尔森没受伤的手，起先说什么也不愿松手，甚至也不让他自己吃饭。我们以前常说，他们两人之间只用一只手，记得吗，朵乐丝？德雷克会坐在餐桌前，一手抓着弟弟，另一手拼命喂他吃饭。我们找来大夫，连大夫都没办法分离兄弟俩。我们只好忍耐了。‘从现在起，你叫做德雷克。’我说，‘你呢，叫做纳尔森，因为你俩都是勇敢的水手，怎样？’是你母亲的点子，对不对，朵乐丝？她一直都想生个男孩。”

朵乐丝望着父亲，本想说什么，最后却改变心意。

“他们以前常摸她的头发，”老人以略为神秘的语调说，“摸你母亲的头发，摇黛西的铃铛，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他们从来没看过金头发。喂，朵乐丝，添一点‘洩’吧？我的凉了，他们的肯定也凉了。洩是上海话的茶。”他解释，“广东人则说‘洽’。以前有些单字，现在我们还用，也不知道为什么。”

朵乐丝发出气急败坏的嘶声，跳出客厅，康妮抓住机会说话。

“是这样的，希博特先生，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笔记里都没有弟弟这个人。”她以稍显责备的语气说，“您说是弟弟，小他两岁，还是三岁？”

“怎么会没有纳尔森？”老人讶然说，“他好疼弟弟的！德雷克一辈子都疼纳尔森。什么事都帮弟弟。没有纳尔森的记载，朵乐丝？”

然而朵乐丝人在厨房，准备“洩”。

康妮参考笔记，露出严厉的微笑。

“恐怕要怪我们自己人喽，希博特先生。政府单位在兄弟姐妹栏留下空格。看样子没过多久，香港会出现一两张红脸，不骗您。纳尔森的出生年月日，您该不会还记得吧？记得的话可省下不少麻烦。”

“不记得了，怎么会记得！黛西·方会记得，当然，可惜她已经去世多年了。就算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黛西也会帮他们挑一个。”

狄沙理斯拉拉耳垂，低头下去。“他的中文名字，记得吗？”他以尖嗓子脱口说出，“如果要查的话，中文名字可能很有用。”

希博特先生摇摇头。“没有纳尔森的记载！保佑我的灵魂！想到德雷克时，怎么可能没想到他身边的小纳尔森？两人就跟面包和芝士一样，我们以前常说。孤儿嘛，那也难怪。”

从走道，他们听见电话铃响，令康妮与狄沙理斯暗暗称奇的是，他们竟清楚听见厨房里的朵乐丝冒出“该死，天杀的”，一面冲向电话。在

渐次升高的茶水壶呜咽声之外，他们听见愤怒的打电话声的片段。“怎样？为什么不是？如果是该死的刹车，干吗说是离合器？不要，我们不买新车。去你的，我们要的是把老车修好。”然后重重骂一声“天呀”，挂掉电话，回到厨房面对尖叫的茶水壶。

“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康妮轻柔地提示，面带微笑，然而老人摇摇头。

“那可非问老黛西不可喽，”他说，“她老早上天堂去了，保佑她。”老人宣称不知道，狄沙理斯似乎正要质疑，但康妮以眼示意他闭嘴。让他讲下去，她暗中要求。逼急了，可能全盘皆输。

老人坐的椅子是旋转椅。无意识之间，他以顺时针旋转，现在面对大海说话。

“他们就像粉笔和芝士，”希博特先生说，“从没看过差别这么大的兄弟，也没看过信仰这么坚贞的兄弟，是事实。”

“差别在哪里？”康妮以诱导的口气问。

“小纳尔森啊，他最怕蟑螂了，别的不说。我们当时当然没有现代这种卫生设备，上厕所要到外面茅屋，哇，那些蟑螂啊，像子弹一样到处乱飞！纳尔森说什么也不肯靠近。他的手已经复原得差不多了，吃饭快得像斗鸡，不过他宁愿一连憋上好几天，也不愿意去茅屋。你母亲千拜托万拜托，就希望他进去。黛西·方拿棍子伺候，我现在还看得到他的眼神，有时候会一直看着对方，完好的一手握拳，让对方觉得会被他变成石头，那个纳尔森啊，从出生那天就叛逆。后来有一天，我们望向窗外，看到他们两人，德雷克一手搂着小纳尔森的肩膀，带他走上小路，在他方便时在一旁陪他。船民的小孩，走路姿势不太一样，注意到了吗？”他问话的声音清亮，仿佛他们就在眼前。“O形腿，因为拥挤。”

房门哗然打开，朵乐丝以盘子端着刚泡好的茶进来，放下茶具时发出不少噪音。

“歌喉倒是一样好。”他说完再度沉默，凝望大海。

“唱赞美诗歌的歌喉吗？”康妮以爽朗的声音提示，朝擦亮的钢琴瞥一眼。钢琴上摆着无蜡烛的烛台。

“德雷克，他啊，只要你母亲坐在钢琴前面，他什么都会扯开喉咙唱。宗教颂歌。‘有座碧绿小山丘啊。’德雷克啊，愿意为你母亲割喉。可是小纳尔森呢，我从来没听见他唱一句。”

“后来听到了嘛。”朵乐丝提醒他，口气严厉，但他选择不去注意女儿。

“午餐晚餐时，他不肯说阿门，饭菜都撤走了，不肯说就是不肯说。他从一开始就爱跟上帝吵嘴。”他突然精神一振，大笑起来。“我老是讲啊，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信徒。其他人只是表示礼貌而已。没有跟上帝吵过嘴，就不是真正改信基督教的人。”

“可恶的修车行。”朵乐丝喃喃说，电话挂掉了仍火气十足，一面用力砍着茶籽饼。

“端去！你们司机还好吧？”希博特大喊，“要不要叫朵乐丝端去给他吃？一个人在外面，一定冷死了！带他进来，去啊！”在两人来得及响应前，希博特先生又开始谈论战争。不是德雷克的，也不是纳尔森的，而是他个人的战争，以残缺不全的图像记忆拼凑而成。“好笑的是，那时有很多人觉得日本鬼子来得正好。给那些中国国民军暴发户一点教训。也给共产党颜色瞧瞧。结果呢，好久以后情势才开始逆转。一直到开始轰炸之后。欧洲商店关门，大班也全家撤离，乡村俱乐部变成医院。可是还是有人嚷嚷‘别担心’。后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把我们全关起来，是不是啊，朵乐丝？结果害死你母亲。她的耐力不够，因为得过肺结核。尽管如此，柯家兄弟还是过得比多数人好。”

“噢。怎么说？”康妮询问，大感兴趣。

“他们拥有耶稣的知识，能引导他们，安抚他们，是不是啊？”

“当然了。”康妮说。

“自然是了，”狄沙理斯也应和，扣住十指互相拉动，“的确是。”他说得虚情假意。

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说，教会也关门，黛西·方拿着铃铛带着小孩加入难民潮，有的坐推车，有的搭公交车或火车，不过多半是徒步，往上绕去，最后到重庆。蒋介石的国民军已经在重庆建立临时首都。

“不能让他讲太久，”朵乐丝一度警告，偏头偷偷告诉康妮，“他会疯癫起来。”

“噢，我能讲很久，亲爱的。”希博特先生以窝心一笑纠正她，“我一辈子，该看的都看过了。想做什么随我高兴。”

他们饮茶聊着庭园。定居此地后，庭园一直令他们伤脑筋。

“他们告诉我们，要种就种有银色叶子的那种，能抵抗盐分。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朵乐丝？好像种不活吧？”

希博特不知因何提起，妻子过世后，他自己的生命也随之结束，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等待与亡妻会合。他在英格兰北部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到伦敦服务一阵，传播圣经福音。

“然后我们搬来南部，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这边的空气。”她说。

“是不是会开个宴会啊，在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问，“德雷克应该会把我们列入邀请名单吧。想想看哪，朵乐丝。你会喜欢的。皇家庭园宴会。礼帽。”

“可是您回到过上海，”康妮最后终于提醒他，一面翻动笔记来唤回他的思绪，“日本人战败，上海重新开张，您回上海。当然妻子没有跟您

回去了，不过您还是回去了。”

“噢，是啊，我们是回去了。”

“所以您又见到柯氏兄弟了。大伙见了面，欢欢乐乐叙旧一阵，一定是。是不是这样啊，希博特先生？”

一时之间，他似乎没将问题听进去，但忽然间他慢半拍地笑了出来。“哎呀，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小朋友啦。机灵得很哪！还在你面前猛追女孩子呢，朵乐丝。我老是说啊，德雷克本来会娶你的，亲爱的，如果你给他任何希望的话。”

“噢，别乱讲了，老爸。”朵乐丝喃喃地说，对着地板摆出苦瓜脸。

“纳尔森呢，他呀，血气方刚啊！”他以汤匙喝茶，小心翼翼，仿佛在喂小鸟。“夫人呢？”德雷克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想找你母亲。‘夫人呢？’他把英文全忘光了，纳尔森也一样。我后来不得不再帮他们上课。所以我告诉他。那个时候，他肯定已经看过够多人死掉了。但又不是说已经麻木了。‘夫人死了。’我说。其他没什么好说了。‘她死了，德雷克，她和上帝同在。’以前没看他哭过，以后也没有，不过他哭了，看了更让我疼爱。‘我失去了两个母亲，’他对我说，‘母亲死了，现在夫人也死了。’我们为她祷告。不然能怎样？小纳尔森呢，他不哭也不祷告。他不同。他从来没有像德雷克一样接受她。不是个人因素。她是敌人。我们全都是。”

“我们指的是谁，希博特先生？”狄沙理斯以诱导的口气问。

“欧洲人、资本家、传教士：我们全是外地人，来那里不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就是为了他们的劳动力，或是他们的银矿。我们全部都是——”希博特先生重复，丝毫没有恨意，“剥削者。他认为我们全是。其实就某些方面来说也对。”对话至此稍停，别扭了好一阵子，后来康妮才谨慎重开话匣。

“所以说，您重建教会，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是吧？那四年之间，您至少可以用父亲的角色照顾德雷克和纳尔森。是不是这样，希博特先生？”她问，圆珠笔停住不动。

“噢，我们是重新开张没错。一九四五年，我们满心欢喜，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战争结束了，日本鬼子被打败了，难民也可以回家了。马路上到处有人在拥抱。我们领到钱，应该是补偿金、补助金之类。黛西方也回来，不过没待很久。头一两年，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其实就算当时，也不是真的好过。只要蒋介石治理得了，我们就能待下去——这个嘛，他向来就不太能治理，对吧？一九四七年，共产主义在马路上随处可见，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就向下扎根了。国际殖民时代老早结束，租界也是，算是好事一桩。其他的東西，结束得比较慢。有些人瞎了眼，爱说什么老上海会永远不变，之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也说这样。他们说，上海腐化了满族人、军阀、国民党、日本人、英国人，现在上海即将腐化共产党。他们当然是料错了。朵乐丝和我，我们父女俩嘛，

不屑贪污腐败那一套，对不对啊？没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你母亲也没法子解决。所以我们回国了。”

“柯氏兄弟呢？”康妮提醒他，朵乐丝则从褐色纸袋拖出编织品，弄出不少噪音。

老人迟疑着，这一次并非因年老迟钝。年老迟钝或许减缓了叙述的速度。但这次迟疑是因为无法肯定。“这个嘛，好，”他经过突兀的停顿后退让一步，“那两个啊，我告诉你，历经了罕见的奇遇。”

“奇遇，”朵乐丝以怒音附和，一面敲得钩针咯咯响，“说成暴动比较对吧。”

日光仍依恋着海面，室内的光线则逐渐暗淡，煤气灯如远方的马达般噗噗响。

老人说，德雷克与纳尔森在逃离上海时，几度被拆散，没找到对方之前，处心积虑去找。弟弟纳尔森终于抵达重庆，毫发无伤，熬过饥饿、操劳，以及水深火热的军机轰炸，数千人因此丧生。但哥哥德雷克奉召进入国民党军队服役，只不过蒋介石束手无策，一路撤退，希望共军与日军能互相残杀。

“到处跑啊跑，德雷克想到前线，又担心纳尔森，担心得要死。当然了，纳尔森啊，他在重庆努力翻书，苦读教条。他们那边甚至有《新中国日报》，他后来告诉我，甚至还刊登蒋介石的协议书。想想看！当时有几个人跟他的想法一致，在重庆集思广益为战后重建世界而努力，结果有一天，感谢上帝，战争总算结束。”

一九四五年，希博特先生说，两人因奇迹出现而重逢：“千分之一的几率，百万分之一的几率。返乡的路络绎不绝的是卡车、推车、军队、枪炮，全往海岸一股脑前进，德雷克则像疯子一样来回奔跑：‘有没有看到我弟弟？’”

此刻的戏剧效果忽然触动了她内心的传教士，因此嗓门拉高。

“有个脏兮兮的小孩，一手搭在德雷克的手肘上。‘喂，你，姓柯的。’就像他想借火抽烟似的。‘你弟弟在后面，第三辆卡车，想骗得客家共产党团团转。’转眼间，兄弟彼此紧紧拥抱，回上海前，德雷克不愿让弟弟离开视线范围，之后也不愿意！”

“所以他们来看您喽。”康妮以舒缓的语气暗示。

“德雷克回到上海后，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弟弟纳尔森非接受正规教育不可。全天下再重要的事，也抵不过弟弟就学。纳尔森非上学不行。”老人一手重击椅子扶手。“兄弟至少一人必须受教育。噢，意志坚定如山，德雷克啊！最后也办到了，”老人说，“德雷克达成心愿了。当时的他，已经很能奔走谈条件了。战争结束，德雷克回家时还不满十九岁。纳尔森快十七岁了，不分昼夜用功——当然是看书了。德雷克也很用功，不过他用的是身体。”

“他专动歪脑筋，”朵乐丝悄声说，“他加入帮派骗钱，在他没有乱摸我的时候。”

希博特先生是没听见她，或只是响应标准的反对意见，不得而知。

“好吧，朵乐丝，三合会这东西，不能只看表面，”他纠正女儿，“上海是个城邦城市。统治者是一群商业巨子、抢钱大王，还有更坏的人。当地没有工会，没有法治，人命不值钱，生活困苦，要是你看仔细点，现在的香港我怀疑也差不到哪里去。有些所谓的英国绅士，相形之下让兰开夏郡的磨坊主人像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模范生。”提出轻度责难后，他继续面对康妮，继续叙述。康妮让他感到熟悉，是坐在前排的典型女士，肥胖、全神贯注、戴帽、倾全心注意老人的字字句句。

“他们会过来喝茶，五点，兄弟俩。我会先准备好所有东西，在桌子上摆吃的，准备好他们喜欢的柠檬水，说是汽水。德雷克从码头过来，纳尔森放下书本过来，吃东西时几乎不讲话，然后又回去上班念书，是不是啊，朵乐丝？他们会翻出某个传奇式学者，车胤。车胤小时候生活穷苦，不得不借萤火虫亮光识字写字。他们会一直说，纳尔森以后会效法他。‘车胤，再来块馒头吧，’我会说，‘再吃个馒头，才有力气念下去。’他们会笑一下，然后离开。‘拜拜，车胤，慢走哟。’偶尔纳尔森嘴巴没塞满东西，他会跟我讨论政治。哇，他的想法真多！老实讲，我们书读得不够多，教不了他那么多。金钱是万恶之根源，我可从来否认这一点呀！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宣扬这一点呢！博爱、义气、宗教是大众的鸦片剂，这个嘛，我可不赞同，不过在神职、教会高层的胡扯、天主教义、偶像崇拜方面，他啊，他的想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就我看来。他也讲了一些我们英国人的坏话，不过是我们活该，怨我直言。”

“骂归骂，还天天过来吃您的，不是吗？”朵乐丝又压低声音偏头说，“还扬弃个人的宗教背景，还捣毁教会。”

然而，老人只是捺着性子微笑。“朵乐丝，亲爱的，这话我以前说过，还是要再说一遍给你听。上帝显灵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好人准备到外面追求真理和正义和博爱，他就不会在门外苦等太久。”

朵乐丝脸红了，低下头编织去。

“她说的当然没错。纳尔森确实捣毁教会。也扬弃了宗教。”一抹哀伤的云眼看即将袭上他的老脸，后来笑声忽然胜出。“结果呢，德雷克点醒了他！好好训了他一顿！了不起，了不起！德雷克说：‘政治，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拿来卖，虽然朵乐丝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你也不能跟政治这东西上床！只能用来捣毁寺庙，滥杀无辜！’我从没看过他这么生气，而且骂得纳尔森一脸口水！德雷克在码头干活，的确是学到了一两招，没话说！”

“请您务必，”狄沙理斯在晦暗的光线中发出如蛇般的嘶声，“务必一五一十告诉我们。这是您的义务。”

“学生示威游行，”希博特先生继续说，“火把，宵禁开始后，一群人

走上街头，大闹一场。一九四九年初，应该是春天，情势才刚火热起来。”与先前的漫谈比较起来，希博特先生的叙述法变得意外地简明扼要。“我们当时坐在壁炉前，是不是啊，朵乐丝？十四个人，朵乐丝，还是十五人？我们以前喜欢生火，即使天气热也一样，可以带来一种麦克莱斯菲尔老家的感觉。那时我们听见外面有人敲敲打打，呼着口号。有铙钹，有哨子，有铜锣，有铃铛，有鼓，吵得令人心惊。我有预感，这种事可能正在酝酿中。我帮小纳尔森上英文课时，他不断警告我：‘你回家，希博特先生。你是好人。’他以前常说，保佑他，‘你是好人，但是水坝闸门一破，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淹死。’有必要时，纳尔森很会讲话。跟他的信念相辅相成。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感受。‘黛西，’我说，就是黛西，她跟我们坐在一起，摇着铃铛——‘黛西，你和朵乐丝去后院，看来有客人要上门了。’才说完，啪的一声，有人用石头扔破窗户。我们听到声响、叫嚣声，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分辨得出小纳尔森的嗓音，一听就知道是他。他是潮州出生的上海人，当然，不过他用上海话对青年喊话。‘谴责帝国主义走狗！’他大喊，‘打倒宗教土狼！’噢，他们真会乱编口号哪！中文听起来还可以，一换成英文就毫无意义。这时门被踢开，他们走进来。”

“他们打坏了十字架。”朵乐丝说，停下来盯着编织花样看。

这次是希博特而非女儿，以凡俗言语震惊听众。

“他们打坏的，可恶，还不只十字架呢，朵乐丝？”希博特快活地接着说，“他们打坏了所有东西。教堂座椅、圣桌、钢琴、椅子、电灯、诗歌集、《圣经》。噢，告诉你们，他们出手可凶得很哪！狠角色啊。‘随便你们，’我说，‘悉听尊便。凡人建造之物，必有毁坏之日，只是你们无法毁坏上帝的真言，整座教堂被你们拆掉做火柴棒，也毁不了上帝精神。’纳尔森他不愿正眼看我，可怜的小孩。他一看我，我会哭出来的。他们走了以后，我四处看了一下，看到老黛西·方站在门口，朵乐丝在她身后。黛西全看在眼里。乐在其中。我从她眼神里看得出来。她内心里其实跟他们是一伙人。她乐得很。‘黛西，’我说，‘收拾东西走吧。这一辈子，奉献自己或保留自己，随你高兴，不过千万别出借自己。那样的话，比当间谍还卑鄙。’”

康妮行注目礼表示赞同的同时，狄沙理斯冒出尖锐的一声喘息，带有受辱的味道。然而老人真的乐在其中。

“接着，我们坐下，我和朵乐丝，一起哭了，承认也没关系，我们没有哭，朵乐丝？掉眼泪不丢脸，我从来也不觉得流泪不好意思。我们好想念你母亲，想得心痛。跪下来祷告。然后开始打扫。不知从哪里开始。然后德雷克走进来了！”他摇头表示惊异。“‘晚安，希博特先生。’他用低沉的嗓门说，夹杂一点我的英格兰北方腔调，每次他开口讲英文都让我们开怀大笑。在他身后，站的是小纳尔森，手里拿着扫把和畚箕。他一手仍然弯曲，我猜现在也一样，小时候被炸伤过。一手弯曲，还是拿着扫把扫地。这时德雷克开始臭骂他，口气跟挖土工一样难听！从没听过他讲那种脏话。他啊，就某一方面来说，其实跟挖土工差不多

吧？”他悠悠然对女儿微笑。“幸好他讲的是潮州话，是不是，朵乐丝？我自己只听懂一半，那就够了！炮火猛烈，好像我完全听不懂似的。”

他停嘴，闭上双眼半晌，不是在祷告，就是舌头累了。

“当然了，错并不在纳尔森。我们啊，早就知道了。他是队长。”

事关面子。他们开始游行，漫无目标，然后有人对他大喊：‘嘿！教会小子！你的心偏那边，挖出来给我们瞧瞧！’逼得他只好下手。不做不行。即使这样，德雷克仍对他破口大骂。兄弟俩清理完毕，我们上床睡觉，两兄弟睡在小教堂地板上，以防暴徒回来。早上我回教堂，发现没被毁坏的诗歌集整整齐齐叠好，《圣经》也一样。他们也自己修好了十字架。甚至把钢琴拼凑好，只不过没有调音，不用说。”

狄沙理斯挪身另换坐姿，提出一个问题。他与康妮一样，也翻开一本笔记簿，只是一字未记。

“那段时期，纳尔森是受哪方面训练？”他质问，特有的鼻音显得气愤，握笔准备记载。

希博特先生皱眉，露出疑惑的神情。

“怎么了，当然是共产党了。”

朵乐丝低头钩毛线，低声说：“噢，老爸。”这时康妮连忙解释。

“纳尔森念的是哪一方面的书，希博特先生，在哪里念？”

“啊，原来如此。你指的原来是这个！”希博特先生恢复较自然的语调。

答案他完全清楚。否则上英文课时，除了纳尔森个人志向之外，他与纳尔森又能谈什么——共产党福音不算的话。纳尔森最热衷工程。他坚信能破除中国封建制度的东西是科技，而非圣经。

“造船、铺路、铺铁轨、盖工厂，那才是纳尔森的志向。他是拿着计算尺的天使加百利，是白领大学毕业生。在他心中，他就是这个模样。”

希博特先生说，在上海停留期间不够久，没能看见纳尔森顺遂心愿，因为纳尔森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才毕业——

狄沙理斯的笔在笔记簿上疯狂划动。

“可是，那些年来，德雷克为了弟弟到处挣钱。”希博特先生说，希望盖过方才朵乐丝对三合会的指涉。“德雷克熬过来了，总算得到报偿，纳尔森也是。他看见纳尔森手上领到那张关键的证书，知道自己的任务已完成，可以收山了，按照他一开始的计划去做。”

狄沙理斯兴奋之余，态度转变得热切万分。他的丑脸显出片片血色，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毕业后呢？”他急着问，“毕业后他做什么？他后来怎么了？请继续讲，麻烦您再讲下去。”

希博特先生见到他如此热切，不禁欣喜，微微一笑。他说，这个嘛，根据德雷克的说法，纳尔森在一家最先进造船厂当制图员，绘制蓝图，参与造船工程，疯了似的向俄国技师学习。共产党战胜后，俄国的技师纷纷涌进中国。然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如果希博特先生没记错，纳尔森有幸得到前往俄国列宁格勒大学深造的机会，一直待到，待到大概50年代末。

“噢，他就像长了两条尾巴的小狗一样，我说的是德雷克，讲得眉飞色舞的！”希博特先生叙述的对象若是自己的儿子，神情也不会比现在更骄傲了。

狄沙理斯突然往前倾，甚至在康妮以眼神警告他之下，仍以笔指着老人。“列宁格勒之后呢，他们怎么重用他？”

“他嘛，当然是回到上海了，”希博特先生大笑一声，“而且受到提拔，因为拿到了学位，有头有脸了，造船专家，留学俄国，科技专家，管理阶级！噢，他爱死了那些俄国人！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他们有机器的，有权力的，有点子，有哲学。俄国啊，简直是他的乐土。他景仰俄国的模样，就像——”他的嗓音，以及他的热度，双双落难。“噢，真是的，”他喃喃地说，沉默下来，是这次对话第二度中断，“向俄国学习，总不会一直学习下去吧？在共产党的新仙境，俄国热又能流行多久？朵乐丝乖女儿，帮我拿条披肩来。”

“已经在你肩膀上了。”朵乐丝说。

有欠圆通的狄沙理斯对他说话毫不留情。除了答案之外，他一概不管，连打开放在膝盖上的笔记簿都可抛开。

“他回国了，”狄沙理斯尖嗓说，“很好。一路向上爬。他留学俄国，向俄国看齐。很好。接下来呢？”

希博特先生注视狄沙理斯良久。老人脸上毫无虚假，目光流露真情，如同慧黠的男童看人的眼神，了无老练世故的横阻。豁然明朗的是，希博特再也不信任狄沙理斯，而且真的不喜欢他。

“他死了，年轻人。”希博特最后终于说。他转动椅子，凝视海景。室内已半暗，光线多半来自煤气灯。灰色的海滩空无一人。旋转栅门上只停了一只海鸥，在夜空最后一丝光线中显得身影幽暗，体型庞大。

“您刚说他现在一手还是弯曲，”狄沙理斯直接反攻，“您刚才说，现在应该还弯曲的。您自己刚才说的！我亲耳听见的！”

“好了，我们已经叨扰希博特先生够久了。”康妮爽朗地说，同时向狄沙理斯狠瞪一眼，弯腰取来手提包。但狄沙理斯不肯罢休。

“我不相信他！”他以尖锐的嗓门大叫，“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说出日期啊！”

但老人只是拉紧肩上的披肩，两眼直盯海面。

“那时候，我们在德罕市，”朵乐丝说，边说边打毛线，只不过天色

已暗得无法看清毛线，“德雷克坐着有司机开车的大轿车，过来看我们。他带着左右手过来，那个他叫做老刁的人。他们俩在上海搭档干坏事。想过来炫耀。送我白金打火机，捐一千英镑现金给我爸的教会，亮出镶框的女王勋章给我们看，还把我拉到角落，要我去香港当他小老婆，当着我爸的面呢。狗胆包天！他想叫老爸帮他签名，担保什么东西。说他要去做格雷法律学院念法律。那把年纪了，怎么念！四十二岁！什么活到老学到老！他当然不是。跟往常一样，只是为了面子。老爸对他说，‘纳尔森最近怎么样？’结果——”

“请等一下。”狄沙理斯再度误判情势插嘴进来，“日期呢？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非要日期不可！”

“一九六七年。老爸快退休了，是不是啊，老爸？”

老人没有动静。

“好吧，一九六七年。几月？请详细一点！”

他差点说的是“详细一点，娘们”，让康妮极为紧张。然而当康妮再度试图克制他，他置之不理。

“四月，”朵乐丝想了一下，说，“我们刚帮老爸过完生日。所以他才带一千英镑过来捐给教会。他知道老爸不愿意收下来自己用，因为老爸不喜欢德雷克赚钱的手法。”

“好了。好。解释得很好。四月。所以说，纳尔森是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之前死的。德雷克有没有详细解释当时状况？你记不记得？”

“没有。没有详细解释。我告诉过你了。老爸问了，他只是说‘死了’，好像死掉的是一条狗似的。谈什么手足之情。老爸不知所措。他听了差点心碎，德雷克却无动于衷。‘我没有弟弟。纳尔森死了。’亏老爸还替纳尔森祷告，是不是啊，老爸？”

这一次轮到老人开口。在暮色中，他的语气显著加强。

“我为纳尔森祷告过，现在还是为他祷告，”他口气直率，“他在世时，我祈祷希望他能在这世界服务上帝。我相信他有心成就一番大事业。德雷克呢，他到哪里都能应付。他骨头硬。我以前常这样想，主生教会门前的蜡烛不会白烧，如果纳尔森·柯能成功为中国打下正义公理社会的基础的话。纳尔森喜欢称之为共产主义，随他去。不过在漫长的三年里，你母亲和我为他灌注的是基督教的爱心。朵乐丝，我不愿你这么说，也不愿任何人说上帝的爱火能被熄灭，永远不再燃烧。政治没有办法熄火，刀剑也没办法熄火。”他长长吸了一口气。“现在他死了，我为他的灵魂祷告，如同我为你母亲祷告一样，”他说，奇怪的是口气不再那么笃定，“如果那样说算是说教，我也无所谓。”

康妮其实已经起身准备离去。她知道极限所在，她眼光敏锐，很害怕狄沙理斯持续猛攻下去。然而嗅出线索的狄沙理斯全然不顾极限。

“所以说，是惨遭横祸喽，对不对？政治和刀剑，您刚才说的。哪门

子政治？是德雷克告诉您的吗？您也知道，真正动刀剑杀人的事件相对罕见，我认为您有所隐瞒！”

狄沙理斯也站着，但他站在希博特先生身旁，向下对着老人的白头喋喋不休地问话，仿佛是在沙拉特表演短剧，模拟讯问手法。

“多谢你热情款待，”康妮对朵乐丝说，感情溢于言表，“真的，收获比我们想像的还丰富，相信对受封骑士有所帮助。”她说，话中充满了对狄沙理斯的暗示，“我们这就告辞了，真心感谢两位。”

然而这次拂逆她心意的是老人他自己。

“来年呢，他也失去了另一个纳尔森，愿上帝帮助他，是他的儿子，”他说，“德雷克从此是个寂寞的人。他写过信给我们，对不对啊，朵乐丝？‘为我犬子纳尔森祷告，希博特先生。’他写道。我们为他祷告。他希望我搭飞机过去，帮他主持葬礼。我没办法，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实讲，葬礼花那么多钱，我从来都不愿苟同。”

说到这里，狄沙理斯简直是直扑过去，让场面尴尬。他正对着老人弯腰下去，激动得以滚烫的小手一把抓住披肩。

“啊！看吧！他却沒有请您为弟弟纳尔森祷告？回答啊。”

“对，”老人简单说，“他没有。”

“为什么没有？除非他不是真死，那还用说！在中国，死的方式不止一种，对不对，不是每种死法都会要人小命！‘罢黜’，那样讲是不是更贴切？”

在煤气灯照亮的房间里，尖嗓说出的字句如恶灵般四处飘动。

“他们准备走了，朵乐丝，”老人对着大海平静地说，“向司机问候一声，好不好，亲爱的？刚才应该出去问候的，算了。”

他们站在廊厅，互相道别。老人留在椅子上，朵乐丝关上门。有时候，康妮的第六感灵敏得吓人。

“希博特小姐，丽泽这个名字，你听过没有？”她问，一面扣上厚重的塑料大衣，“柯先生的档案里，有提到丽泽这个人。”

朵乐丝未施脂粉的脸庞皱眉怒视。

“那是我妈的名字，”她说，“她是德裔路德教派信徒。那只猪连她的名字都不放过啊？”

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车，康妮·沙赫斯与狄沙理斯博士赶回去向乔治报告惊人的消息。路上，他们首先针对狄沙理斯不知自制一事吵嘴。托比·伊斯特哈斯特别感到震惊，康妮真的担心老人可能写信向柯报告。尽管如此，这一趟的发现很快压过了担忧，以凯旋的心情抵达秘密城市的大门。

安然进入城墙后，现在是狄沙理斯的光荣时刻。他再度召集黄祸家族，启动了各式各样的调查，众人连忙顶着各种假借口奔走于伦敦各

地，足迹遍及剑桥。本质上，狄沙理斯是个独行侠。没人了解他，或许除了康妮之外吧，但如果连康妮都不喜欢他，就没人喜欢他了。与人相处时，他显得格格不入，时常做出荒谬举动。但大家从来不怀疑他那种猎人般的意志力。

他翻阅上海交通大学的旧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大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狄沙理斯将目标集中在海洋系，课程包括管理与造船。他找出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之后的共产党干部名单。受命接收需要科技专长的大企业的人当中，线索少得可怜，但他一一加以审视。这些大企业，他特别注意的是江南船厂，其中的国民党党员不断遭到清算，工程浩大。他找出了不下数千人的名单，再调阅其中前往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学成归国重回船厂、职位晋升的人。列大的造船研究所三年毕业，依照狄沙理斯的计算，纳尔森应该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就读列大，随后正式分派到上海市政部，负责海洋工程，因此有机会重回江南。他先认定纳尔森不但有未知的中文名字，同时也很有可能连姓也顺便更改，因此提醒研究助理，纳尔森的资历可能分成两半，上下各有不同姓名，应该注意两者吻合之处。他从交大与列大骗来毕业生名单，两者并排加以对照。中国观察家彼此和乐融融，因臭味相投，规章与国别都能抛诸脑后。狄沙理斯的人脉不仅限于剑桥，也遍及所有东方数据库，连罗马、东京、慕尼黑也有。他写信给所有人，将真正意图埋藏在不相干的问题里。事后发现，甚至连表亲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公开档案。他也调查了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线索。他派遣掘穴人到浸信会，抱着一丝希望，但愿教会记下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归档。他也寻找上海造船业的中级官员去世的消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以上是他第一段辛苦的过程。第二段始于康妮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值六十年代中期，他寻找符合以下条件的上海官员：因亲苏遭到官方斗争、羞辱，或下放劳改，以重新发掘农民的美德。他也参考送往劳改的名单，但没有重大收获。他也查阅红卫兵的激昂演说，寻找是否谈及某位具有浸信会背景的下台官员，也与柯这个姓氏大玩猜字游戏。他隐约认为，纳尔森改姓的话，可能会采用与原姓具有某种渊源的姓，不是同音字就是谐音字。然而当他极力向康妮解释时，康妮不懂就是不懂。

康妮·沙赫斯追查的方向全然相异。她的兴趣围绕在卡拉调教出来的已知征才手，研究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大学针对外籍学生的活动。她也研究从未经证实的谣言。据谣言指出，卡拉年轻时曾任共产国际情报员，战后曾借调至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助重建秘密单位。

在这一次新的掘穴过程中，葛若斯芬诺广场送来一颗小炸弹。希博特先生的情报仍热腾腾之际，研究两个家庭的人员仍忙成一团，这时彼得·吉勒姆带来急件，面呈史迈利。史迈利一如往常正在阅读数据，浑然忘我，吉勒姆进入办公室后，他才将档案塞入抽屉关上。

“是表亲，”吉勒姆轻声说，“跟瑞卡度有关，你最欣赏的飞行员。他们想请你尽快到别馆会见他们。我昨天就应该回电的。”

“他们想干吗？”

“想见你。不过用的是‘会见’一词。”

“是吗？真的吗？天呀。大概是德文的影响吧。或者是古英文的影响？会见。真是的？”说完拖着沉重的身子进入浴室刮胡子。

吉勒姆回自己办公室，发现山姆·科林斯坐在软椅上，抽着他的野蛮棕色香烟，脸上挂着一抹一洗即去的微笑。

“有事吗？”山姆问，问得非常随意。

“给我滚出去。”吉勒姆动了肝火。

一般而言，山姆四处串门子太过火，让吉勒姆不高兴，但这天他有坚决理由对他不信任。他前往内阁府递送圆场每月定额账户请拉康过目时，讶然发现山姆从他私人办公室冒出来，与拉康以及外交部的索尔·恩德比有说有笑。

12瑞卡度复生

在“堕落”之前，具特别合作关系的情报双方经常认真举行非正式会议，每月举行，接着进行史迈利前任阿勒莱恩喜欢称为“酒池肉林”的酒会。若是轮到美国方面招待，阿勒莱恩与他的同伙，包括人缘极佳的比尔·海顿，会由美国人带上一家占地极广的屋顶酒吧，圆场内部昵称为天文馆，享用苦味马丁尼以及西伦敦的美景。若非美国人邀请，他们可无福享受。如果轮到英国人做东，他们会在喧闹室摆出支架桌，铺上补缀式的花缎桌布，美国代表团受邀前来向俱乐部区情报工作的最后要塞致敬，而这里碰巧也是美国情报单位的源头。双方啜饮南非雪利酒，以带盖的雕花玻璃瓶伪装，假设他们喝不出差别。进行没有议程的讨论，传统而言也没人做笔记。老友之间不需搞这一套，特别是反正隐藏式麦克风已安置妥当，比人工更可靠。

“堕落”之后，这些礼尚往来喊停了一段时间。马铁娄位于弗吉尼亚的兰利总部下令，“英国联络渠道”——美国对圆场的称呼——必须列入保持距离的名单中，与南斯拉夫以及黎巴嫩并列，一时之间两单位如同走在马路两旁人行道，路过时连眼睛也不抬起，双方犹如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分居夫妻。然而到了那天灰沉的冬日上午，在史迈利与吉勒姆匆忙赶到葛若斯芬诺广场的法律顾问别馆门口之前，双方关系解冻的迹象已随处可见，甚至从门口盘查的两名陆战队员僵硬的脸色也可看出。

大门为双扉门，黑铁门外装设黑色铁栏杆，栏杆上点缀着镀金羽毛。光是大门的造价，就足供全圆场至少苟延残喘个两三天。一走进大门，他们感觉如同从小村落进入大都会。

马铁娄的办公室非常大，没有窗户，就算是半夜也不知道实际时间。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后墙上挂着美国国旗，仿佛在微风吹动下飘逸，占据半面墙。办公室中央有一圈客机座椅，围绕玫瑰木桌摆设，马铁娄坐在其中，身材魁梧，神情愉悦，出身耶鲁的他穿着乡村西装，怎么看都不对季节。他两旁各坐一人，默默不语，两人同样面带菜色，表情诚恳。

“乔治，劳驾你了。”马铁娄诚挚地说，嗓音温暖、令人信赖，他本人则快步向前迎接。“不用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我晓得。索卢。”坐在他对面另有两名陌生人，史迈利现在才注意到，马铁娄转头介绍他们。其中一人与默默不语的两人同样年轻，只是略显不够圆滑；另一人矮胖、强悍、年纪大很多，脸上纹深如疤，理小平头，退伍军人的类型。“索卢，”马铁娄重复，“介绍你认识本行真正传奇人物之一，乔治·史迈利先生。乔治，这位是索卢·艾克朗。在本国优秀的缉毒署掌大权。缉毒署的前身是麻药与危险药品管制局，现在改名了，对不对，索卢？索卢，向彼得·吉勒姆说声哈啰。”

年纪较长的一位伸出手，史迈利与吉勒姆分别与他握手，握起来有

如干树皮。

“没错，”马铁娄边说边旁观，带着媒人的满足神情，“乔治，呃，记得艾德·芮斯妥吧？也是负责缉毒的，几个月前过去跟你打过招呼的那个？是这样的，索卢接替了芮斯妥的职位。他现在负责东南亚。这位是赛伊，同单位。”

美国人的姓名，只有他们自己记得住吧，吉勒姆心想。

赛伊是较年轻的一位。他留了腮须，戴着金表，看似传教士，虔诚却带戒心。他的微笑仿佛是家常便饭，吉勒姆也报以微笑。

“芮斯妥怎么啦？”史迈利问。大家坐下。

“冠状动脉。”退役军人索卢咆哮，嗓音与手一样干燥。他的头发有如钢丝卷，起伏成数道小沟。搔头时，头发沙沙作响。他经常搔头。

“真遗憾。”史迈利说。

“可能一辈子好不了。”索卢说，并没有看着他，径自抽着香烟。

就在此地，吉勒姆首度嗅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气氛。他察觉到两组美国人之间对立的情势。毫无预警的撤职，依吉勒姆与美国人交手的经验，发生的原因，鲜少是“因病离职”那么简单。他甚至进一步猜测，索卢的前任是如何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缉毒，呃，本来就对我们这种合作关系有强烈兴趣，呃，乔治……”马铁娄说。在这种有气无力的鼓吹中，他间接宣布了瑞卡度的关联，只不过吉勒姆察觉到，美国方面仍有一种神秘的冲动，假装这次会议谈的是其他事情，由马铁娄空泛的开场白可见一斑：

“乔治，我们兰利的人，希望跟缉毒署的好友密切合作。”他宣称，热度一如外交协议书般冰冷。

“对双方都好。”退役军人索卢咆哮应和，一面搔着铁灰色头发，一面继续吞云吐雾。在吉勒姆眼里，他似乎本质害羞，置身此地浑身不舒服。陪同的青年赛伊则显得自在多了。

“是范围问题，史迈利先生。在这种案子里，有些区域完全重叠。”赛伊的嗓音太尖，与身形不太搭调。

“赛伊和索卢先前跟我们搭档过，乔治，”马铁娄说，提供进一步保证，“赛伊和索卢是我们一家人，我说话算话。兰利让缉毒署加入，缉毒署让兰利加入，互蒙其利嘛，是不是，索卢？”

“是。”索卢说。

要是双方再不赶快一同上床，吉勒姆心想，可能反而会大打出手。他瞥了史迈利一眼，发现他也留意到紧绷的气氛。他像个假人似的坐着，两手各放一边膝盖上，双眼如常几乎闭上，美国人开始对他解释状况时，他似乎正将自己变为隐形。

“首先，也许我们应该了解最新的细节。”马铁娄这时提议，仿佛是

邀请大家洗手。

其次是什么？吉勒姆纳闷。

默默不语的男子之一的勤务名叫默非，皮肤白皙到近乎白化病人的地步。默非从玫瑰木桌取来一个档案夹，开始朗读内容，声音带有高度敬意。他以干净的手指翻阅，一次一张。

“长官，周一的案主搭乘国泰航空前往曼谷，班机号码注明于附录，由陈立接机，参考数据注明于附录，开着私家大轿车。他们直接前往位于四面佛酒店的海空公司永久套房。”他瞥向索卢。“陈先生是亚洲稻米百货的总经理，是海空位于曼谷的分公司，参考数据注明于附录。他们在套房待了三小时，之后——”

“呃，默非。”马铁娄打断。

“有何指教？”

“‘注明于附录’一直重复，可以略过不念吗？这些人，我们都有档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对，长官。”

“柯单独一人吗？”索卢质问。

“长官，柯带着经理人刁先生同行。刁先生几乎到处随行。”

此时，吉勒姆碰巧再看史迈利一眼，拦截到质疑的眼神，质疑对象是马铁娄。吉勒姆意识到，他想到的是那位女孩——她也跟去了吗？——但马铁娄满脸微笑并未松动，一阵子过后史迈利似乎接受了，继续摆出全神贯注的姿势。

索卢这时转头面对助理，两人私下简短对话：

“赛伊，那间酒店套房，怎么没人去装窃听器，搞什么鬼？大家都在忙什么东西？”

“我们跟曼谷建议过，索卢，不过他们对公用墙无可奈何，说是里面空间不足。”

“曼谷那些小丑，打炮打到脑筋不清不白了。这个姓陈的，是我们去年想抓的那个海洛因走私犯吗？”

“那个叫做陈合，索卢。这个叫做陈立。那边有很多姓陈的。陈立只是个幌子。他是洪胖子在清迈的中间人。种植人和大中介商之间的联系，由洪胖子负责。”

“那个狗杂种，应该找人去枪毙掉才对。”索卢说。哪个狗杂种，不得而知。

马铁娄朝苍白的默非点头，示意他继续。

“长官，三人接着开车前往曼谷港口，三人分别是柯、陈立以及刁先生，长官，他们看了沿河绑住的二三十艘沿岸贸易小船。然后开车回曼

谷机场，案主飞往菲律宾的马尼拉，参加伊甸巴厘岛酒店的水泥会议。”

“刁没去马尼拉？”马铁娄问，拖延时间。

“没有，长官。飞回家了。”默非回答，史迈利再度瞥向马铁娄。

“水泥个屁，”索卢怒骂，“那些船，是负责跑香港的吗，默非？”

“是的，长官。”

“那些船，我们知道，”索卢指出，“那些船，我们注意好几年了，对不对，赛伊？”

“对。”

索卢突然对准马铁娄，仿佛该怪罪在他个人身上。“离开港口时没运毒。一直到出海后，东西才送上船。没人知道哪艘船运毒，连中选那艘船的船长都不清楚，等到船靠过来，交给他们毒品时才知道。进入香港水域时，绑上浮标，把毒品丢下海，由帆船捞上船。”他说得很慢，仿佛说话会痛，粗着嗓子硬逼字句出口。“我们对英国人喊了好几年，叫他们查一查那些帆船，不过那些狗杂种全都被收买了。”

“报告到此为止，长官。”默非说，放下档案夹。

现场重回别扭的沉默。一名漂亮女孩端来一盘咖啡与小点心，暂时舒缓气氛，但她一离开，寂静更令人难以忍受。

“为什么不干脆告诉他？”索卢最后终于脱口而出，“不然由我来讲也行。”

之后大家总算谈到问题核心，套句马铁娄可能用的词。

马铁娄的态度变得既沉重又令人信任，一如家庭律师对继承人朗读遗嘱。“乔治，呃，应我们要求，缉毒署再看了一下失踪飞行员瑞卡度的背景和记录，正如我们半臆测的，他们挖掘出基于诸多因素、目前为止尚未浮上台面的资料，为数相当可观。依我浅见，没有必要指任何人，更何况艾德·芮斯妥已经生病。无论过程如何，让我们先达成共识，瑞卡度一事发生在缉毒署和我们之间的小缝里。那条缝已经补好，我们愿为你们修正信息。”

“谢谢你，小马。”史迈利捺着性子说。

“看来瑞卡度还活得好好的，”索卢大声说，“看来是重大疏漏。”

“是什么？”史迈利陡然说，或许一时之间无法理解索卢全句的含义。

马铁娄赶紧翻译。“错误，乔治，人为疏漏。经常碰到的。疏漏。连你也不例外吧？”

吉勒姆研究着赛伊的皮鞋，表面有层橡胶光泽，接缝皮很厚。史迈利的眼睛抬起，望向旁边的墙壁，上面挂着尼克松总统慈祥的相片，以鼓励的神情向下凝视着三方。尼克松早于六个月前辞职，但马铁娄似乎

决心继续追随他，令人动容。默非与哑巴同伴静静坐着，宛如等待主教颁发坚信礼的信徒。惟有索卢动作不断，搔抓波浪状的头，吸吮香烟，两种动作交替进行，像是运动型的狄沙理斯。他从来不微笑，吉勒姆接着心想，他忘记怎么微笑了。

马铁娄继续说：“瑞卡度的死，正式记录在我们的档案里，时间在八月二十一日当天或前后，乔治，正确吗？”

“正确。”史迈利说。

马铁娄吸了一口气，参考自己笔记时将头偏向另一边。“然而，他死后，在九月，呃，二日，两个礼拜，对吧？瑞卡度本人似乎和亚洲战区的缉毒单位联系，当时的缉毒单位缩写是BNDD，大致是相同的单位。索卢不太愿意提到究竟是哪个单位，我尊重他。”吉勒姆想通了，“呃”个不停其实是马铁娄边思考边继续说话的方式。“瑞卡度为该单位提供服务，按件计酬，据他的说法，呃，他执行的是运送鸦片的任务，飞越边境直接进入，呃，中国大陆。”

此时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冰手抓住吉勒姆的腹部不放。经过漫长的开场白，讲了一堆毫不相干的细节后，他的随机应变能力更加强化。他事后告诉默莉，感觉仿佛“该案所有线索忽然自动卷成一束”摆在他面前。不过这样说，其实是马后炮，多少有点吹牛的成分。尽管如此，当时感受到的震惊，几乎感觉本身被投射至中国大陆，那种震惊绝对真切无误，不需要添油加醋。

马铁娄再度表演起大律师的角色。

“乔治，我必须再向你报告，呃，一些家庭背景。在老挝那件事期间，公司利用了一些北方山区部落进行战斗用途，也许你已经知道了。就在缅甸，知道那些地方吧，掸族人？自愿军，明白吧？很多部落是单一作物社群，呃，鸦片社群。为了顾及当地的战事，公司不得不，呃，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视若无睹，明白吧？这些善良百姓必须生存，很多人认为种植那种作物没什么不好，也不知道更好的求生方式。明白吗？”

“上帝啊，”索卢悄声说，“听见了吗，赛伊？”

“听见了，索卢。”

史迈利说他明白。

“公司执行的这项，呃，任务，造成双方非常简短、非常暂时的嫌隙，双方指的是公司和，呃，在场的缉毒署，前身是麻药管制局。因为嘛，索卢的部属正在，呃，打压毒品滥用的情形，呃，他们的做法相当正确，拦截毒品走私是他们的工作，乔治，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为了替公司着想，为了替那场战争着想，在当时那一刻，你明白吧，乔治，必须假装没看见。”

“公司对山区部落扮演教父的角色，”索卢咆哮，“男人全都去打仗，公司人飞进村子里，强迫推销罂粟作物，强奸他们的女人，再用飞机载

走毒品。”

马铁娄可不是那么好对付。“这个说法嘛，我们认为是有点夸大其词，索卢，不过，呃，双方的嫌隙是在，而就我们的朋友乔治而言，重点就在这里。瑞卡度，这人很难缠。他替老挝的公司飞过多次任务，战争结束后，公司重新安置他，向他吻别，撤走梯子。那些人啊，战争一结束，没人敢惹。所以说，呃，也许正因如此，原来是，呃，保护野生动物的瑞卡度，变成了，呃，盗猎动物的瑞卡度，如果你明白——”

“不能说百分之百明白。”史迈利微微坦承。

对于难以下咽的实情，索卢丝毫没有顾忌。“只要战争还在打，瑞卡度就替公司运毒，好让山村的炊烟继续冒。战争一结束，他就自己运毒。他有人脉，知道守口如瓶。他变成个体户，就这么简单。”

“谢谢你。”史迈利说，索卢则继续搔着小平头。

瑞卡度的复活令人难堪，马铁娄二度回避提及来龙去脉。

吉勒姆心想，他们双方一定敲定过条件。由马铁娄负责发言。“史迈利是我们的人脉，”马铁娄原本应该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操纵他。”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马铁娄说：“东南亚战区一位不知名毒品干员，”他坚持如此称呼这人，“乔治，他是个年轻人，刚派至外勤。”这人晚间在家中接获电话，对方自称小不点瑞卡度机长，此间相信已故，曾追随洛基上尉在老挝担任佣兵。瑞卡度以标准买价求售鸦片原料，数量可观。然而除了鸦片之外，他也想卖烫手情报，价格是他所谓的地下室减价大甩卖，急着脱手。他要求五万美元，小额钞票，一本西德护照，方便他出境一次。不知名毒品干员当晚与瑞卡度约在停车场见面，迅速同意鸦片的买卖。

“你是说，他买下来了？”史迈利问，极为惊讶。

“索卢告诉我，像这种交易，有个，呃，定价，对吧，索卢？这一行的人全懂，乔治，呃，而且是以毒品黑市价的百分之几来计算，对吧？”索卢以低吼代表肯定。“那位，呃，不知名干员经过授权，随时可以依上述定价买进，他也行使这个权力。没问题。干员，呃，也表示同意，在上级核准许可下，愿提供瑞卡度快到期的文件，乔治，”——稍后才知道，他的意思是只剩几天就过期的西德护照——“乔治，在当时，瑞卡度的情报仍未经证实，不知道是否具有合理价值，而当局的政策是不计一切代价鼓励密报。不过干员表明，整套条件，护照和情报的款项，必须经过总部索卢的人手核准和授权。所以他买下鸦片，不过他握着情报不放。对吧，索卢？”

“没错。”索卢低吼。

“索卢，呃，也许这部分你来负责比较好。”马铁娄说。

索卢发言时，让其他部位保持静止不动，只有嘴巴在动。

“我们的干员要求瑞卡度提供一小部分的情报，让总部的人评估一

下。是我们所谓的送上一垒。瑞卡度的说法是，他接到命令，将毒品运到北边的中国大陆，运回数量不明的款项。他是这样说的。一小部分。他说他知道买卖双方的身份，他说他知道老大中的老大是谁，他们全都知道。他说他知道来龙去脉，不过他们也全都知道。他说一开始他往大陆飞，中途退缩，低飞回老挝，躲避雷达追踪。他只说这么多。他没从哪里出发。他说，他欠派他运毒的人一份人情，如果被他们找到，肯定会踢得他牙齿滚进喉咙。记录里是这样写的，一字不漏。牙齿滚进喉咙。所以他才急着跑路，只要五万。对方是谁，他并没有说。除了鸦片之外，他连一丁点儿证据也提不出来，不过他说飞机还在，藏起来了，是毕奇飞机。他主动说，下次见面时，愿意带干员去参观，如果总部真有兴趣的话。就这样而已。”索卢说，接着全心奉献给香烟。“鸦片有两百公斤。品质不错。”

马铁娄以巧妙的身手接下球。

“不知名毒品干员就这样报告，乔治。他做的是我们全都会做的事。他记下那一小部分情报，传回总部，叫瑞卡度低调行事，静候总部回音。十天后见面，也许十四天后。这里是鸦片钱，不过情报钱要再等一下。规定就是规定。明白吗？”

史迈利点头以示同情，马铁娄则点头回敬，继续说下去。

“就是这样。人为疏漏就发生在这里，对吧？情况可能会更糟，但也糟不到哪里去。在我们这一行，对历史有两种看法：阴谋和失误。这里算是失误，毫无疑问。索卢的前任艾德，现在养病中，当时评估了数据——乔治，你也见过他，艾德·芮斯妥，好好先生一个——艾德根据手中的证据，决定不要追下去。他的决定可以理解，却误判情势。瑞卡度要求五万。这个数字嘛，如果是重大情报，五万根本算是鸡饲料。可是瑞卡度这人，他要求一次付清。而艾德呢，艾德身负重任，家里也有不少问题，而艾德就是不愿意眼睁睁拿美国公家钱投资在瑞卡度这种人身，何况又无法保证获得重大情资。瑞卡度这人懂门路，知道怎么占人便宜，也许正准备暗算艾德那位外勤干员。那位干员只是个年轻小伙子，那一趟累惨了。所以被艾德否决掉，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归档遗忘，全收起来。买鸦片，其他别买。”

也许真的是冠状动脉出毛病吧，吉勒姆回想，想得出神。然而，他的头脑另一部分想的是，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已经发生过：兜售情报者握有大鱼，你却让大鱼从手上溜走。

史迈利不想浪费时间指责，反而默然继续询问剩下的可能性。

“瑞卡度现在人呢，小马？”他问。

“不详。”

隔了许久，他才提下一个问题，几乎不算是问题，比较像是自言自语。

“运回数量不明的款项。”他说，“是什么种类的款项，有没有人提出

理论？”

“我们猜是黄金。我们没有透视眼，跟你一样。”索卢口气严厉。

这时史迈利停口，暂时不参与讨论。他的脸色僵硬，表情越来越焦虑，懂得他的人知道他在沉思中，突然间轮到吉勒姆上场。他学史迈利，对着马铁娄问话。

“瑞卡度没有暗示他回程款项的交付地点吗？”

“我说过了，彼得，我们情报只有这么多。”

史迈利仍无心战斗。他以哀伤的神情盯着交握的双手看。吉勒姆再问下一个问题。

“也没有暗示回程款项的预期重量吗？”他问。

“老天爷啊。”索卢说。他误解了史迈利的态度，缓缓摇头，怀疑何需与这种小气鬼一同开会。

“不过，瑞卡度主动接触你的干员，这一点你很满意吗？”吉勒姆问，仍坚守岗位，持续出拳。

“百分之百。”索卢说。

“索卢，”马铁娄向他靠过去建议，“索卢，那份外勤报告的原版，为何不给乔治一份隐名副件？这样一来，我们知道的东西，他也能全部知道。”

索卢迟疑一下，瞥向随行人员，耸耸肩，最后在些许不情愿中，从身旁桌上的档案夹里取出薄薄一张粉面打字纸，板着脸孔撕下签名。

“不列入正式记录。”他低吼。这时史迈利的精神骤然为之一振，从索卢手中接过报告，默默全神研究纸张的正反两面。

“对了，请问，写报告的这位不知名毒品干员，人在哪里？”他最后询问，先看着马铁娄，再看索卢。

索卢抓抓头皮，赛伊开始摇头表示反对。而马铁娄的两个哑巴丝毫不显得好奇。苍白的默非继续阅读自己的笔记，同僚则呆呆凝视着前总统。

“住在加德满都以北的嬉皮共居营，”索卢低吼，一面吐出大片烟雾，“狗杂种加入了敌军。”

马铁娄精彩的结语与主题完全脱节：“所以说，呃，原因就在这里，乔治，所以我们的计算机才把瑞卡度归类为死亡，乔治，而整体的记录呢，在我们缉毒署友人的重新考虑下，发现，呃，查无实据。”

到目前为止，吉勒姆认为责任全在马铁娄身上。马铁娄暗示的是，是索卢的手下自己搞砸的，不过多亏表亲宽宏大量，愿意与索卢和解。马铁娄公开内情的激情过后，一片平静中，这份不实的印象又再持续了一阵。

“所以说，呃，乔治，从今以后，咱们——你们、我们、索卢——三方，彼此尽全力合作。这样的合作关系，我敢说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是吧，乔治？具有建设性。”

但史迈利此时另有思绪盘踞脑海，仅扬眉皱唇示意。

“有心事吗，乔治？”马铁娄问，“我是说，你在想什么吗？”

“噢，谢谢你。毕奇飞机，”史迈利说，“是单引擎飞机吗？”

“天哪。”索卢悄声说。

“双引擎，乔治，双引擎，”马铁娄说，“高层主管用的小飞机之类的东西。”

“鸦片重量是四百公斤，报告写着。”

“差一点就满半吨，乔治，”马铁娄口气极为热切，“一公吨。”他以怀疑的态度补充说明，对着史迈利布满阴影的脸。“不是你们的英吨，乔治，是公制。”

“放在哪里呢，我是说，鸦片？”

“座舱，”索卢说，“极有可能是拆开多余的座椅。毕奇的机型有很多。因为从来没机会亲眼看到这一架，所以无法确定。”

史迈利再度望向自己粗短手指握着的薄纸。“对，”他喃喃地说，“对，我想也是。”说完以金色铅笔在边缘留白处写下一个小符号，然后再度陷入沉思。

“好吧，”马铁娄爽朗地说，“看来我们这些工蜂最好回蜂窝去，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办，对吧，彼得？”

吉勒姆起身一半，索卢开口了。索卢具有一种罕见而相当令人不敢恭维的天赋，无礼的动作能自然流露。他内心毫无变化。丝毫没有失去控制。这就是他讲话的方式，这就是他办公的方式，其他方式一概让他觉得无趣：“老天爷啊，马铁娄，我们在这里搞的是什么游戏啊？这条鱼很大，对吧？整个东南亚战区，这个毒品目标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被我们盯上了。好，现在讲到跟各方的关联。公司终于跟缉毒署合作，因为必须买通我们，不去碰那个山区部落。我可不觉得哪一点性感。好，我们跟英国佬谈好了，不碰香港。不过泰国是我们的，菲律宾也是，台湾也是，整个该死的战区都是，战争也是，而英国佬坐着不管。四个月前，英国佬进来推销。好，所以我们推给英国佬。结果这段时间，他们做了什么？在漂亮的脸蛋上涂肥皂。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什么时候才想刮胡子啊？为这个案子，我们钱都准备好了。整个单位都在待命，准备摇出柯在整个半球的脉络。多年来，我们想抓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把握可以逮到他。有足够的立法——立法够得很哪！——能关他个十到三十年，甚至更久！我们查到他贩毒，也走私军火，也运送禁运物资，还查到我们一辈子见过的最大一批莫斯科交给一个人的共产党黄金，也握有第一手证据，如果这个叫做瑞卡度的家伙没说谎的话，证明了莫斯

科资助的毒品颠覆计划，磨刀霍霍向中国大陆，希望将对付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如法炮制在他们身上。”

这顿脾气发得史迈利如冷水浇头，惊醒过来。他坐在椅子前端边缘，一手将毒品干员的报告拧得皱烂，以惊恐的眼神凝视，先是凝视索卢，最后凝视马铁娄。

“小马，”他喃喃地说，“我的天啊。不会吧。”

吉勒姆显得较为镇定。至少他开口反驳。

“分配下去的话，可能少得可怜呢，索卢，想害八亿中国人口上瘾可不简单吧？”

然而索卢无暇理会幽默，也不理会反对意见，特别是发言人是英国小生的时候。

“结果，我们直捣任督二脉了吗？”他质问，态度坚定不移，“有才怪。我们轻手轻脚。我们站在边线。‘小心一点。是英国人的球赛。是他们的领域，他们的人，他们的宴会。’所以我们左躲右闪，学蝴蝶轻轻飞，咬人时也像蝴蝶不痛不痒。天啊，要是由我们来处理，保证几个月前就把那狗杂种五花大绑起来了。”他以手心重拍桌面，以答案明显的问题来重复自己的重点。“苏联人张牙舞爪想腐化老百姓，走私毒品败坏整个区域，还拿了俄国人的钱，被我们看在眼里，这是破天荒头一遭，而且我们提得出证据！”这些话全对马铁娄说。史迈利与吉勒姆犹如隐形人。“你好好给我记住一件事，”他对马铁娄提出结论，“我们有大人物等着邀功。等得不耐烦了。重量级人物。他们非常生气，因为公司扮演了半黑半白的角色，间接对我们在越南的子弟供应、买卖毒品，就因为这一点，你们才愿意分享情报。所以或许你最好告诉弗吉尼亚州兰利那些开大轿车的自由派，不大便的话就别占茅坑17。”他以不好笑的双关语结尾。

史迈利脸色苍白，吉勒姆真正为他担心。他心想史迈利是否心脏病发，或是即将晕倒。从吉勒姆的位置，史迈利的双颊与脸色霎时成了老年人，两眼也冒出老年人的火焰。他也只对马铁娄发言：

“话说回来，我们有协议在先。只要协议仍具效力，相信你会信守。你们宣誓过，除非获得允许，否则一概不插手英国区域的行动。你们也特别承诺过，本案的前后发展全由我方负责，不予监看通讯，无论发展方向如何。合约是这样写的。以完全不插手的条件，交换观看产品全貌的权利。我认为那样的条件意思是，兰利不采取行动，美国其他单位也不采取行动。我认为你们的说法绝对如此。我认为你们的承诺仍有效，我也认为这份共识不容折扣。”

“去告诉他——”索卢说完走出去，面色蜡黄的摩门教同伴赛伊跟在后面。走到门口时他转身，朝史迈利的方向伸出一指。

“你搭的是我们的马车，哪里下车哪里上车，由我们来决定。”他说。

摩门教徒点头：“当然。”他说着对吉勒姆微笑，仿佛邀请着他。马铁娄点头后，默非与哑巴同伙跟着他们步出办公室。

马铁娄正在倒酒。在他办公室里，墙壁也以玫瑰木装潢，吉勒姆注意到，是仅有表层的冒牌货。马铁娄拉动手把时，出现了一台制冰机，稳定吐出橄榄球形的小冰块。他不问其他人想喝什么，自己倒了三杯威士忌。史迈利显得精疲力竭。他的胖手仍呈杯状，分别摆在客舱椅扶手的末端，身体向后仰，犹如两局之间累垮了的拳击手，盯着天花板看。天花板点缀着闪闪亮光。马铁娄将酒杯放在桌上。

“谢谢你，长官。”吉勒姆说。马铁娄爱听“长官”。

“别客气。”马铁娄说。

“你们总部还对谁说过？”史迈利面朝星星说，“国税局？海关？芝加哥市长？他们最要好的十二个朋友？你知道吗，连我的长官都不知道我跟你们合作？愿上帝保佑。”

“啊，少来了，乔治。我们要兼顾政治，你们也一样。我们也有承诺必须信守。也要收买大嘴巴。缉毒署的人想追杀我们。这件毒品案子，在国会很受瞩目。参议员、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全想插一脚。打完越战回老家的男生，变成乱嚷乱叫的毒虫，老爸第一个想到的是写信给众议员。那些传得很难听的风言风语，公司才管不了那么多。公司喜欢找朋友站在自己这边。演艺圈就是这样，乔治。”

“能否让我知道你们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史迈利问，“能否至少以白话文告诉我？”

“噢，少来了，乔治，没有交换条件啦。兰利不会跟不属于自己的单位谈条件。这是你们的案子，你们的领土，你们的……我们负责钓他——你们负责钓，也许我们这里帮一点忙——我们尽力协助，如果没有进展，就稍微让缉毒署帮忙一下，在非常友善、可以控制的情况下，让他们试试身手。”

“他们一帮忙，就变成大家一起来了。”史迈利说，“天啊，办案竟可以这样办。”

提到安抚人心的手法，马铁娄的确老练：

“乔治，乔治。假设他们逮到柯好了。假设下一次他离开香港时，他们从树上跳下来抓住他。如果柯准备进入监狱，熬个十年到三十年，我们还是想办法替他脱身。怎么会突然认为像世界末日呢？”

的确没错，吉勒姆心想。直到他恍然想起一事，怀有恶意地欣喜起来，马铁娄自己对弟弟纳尔森一事并不知情，乔治紧紧抱着最好的一张牌不放。

史迈利仍坐在椅子前端。威士忌里的冰块在杯子外围结成潮湿的霜，他注视了一阵，看着水珠滑到玫瑰木桌上。

“我们自己能有多少时间？”史迈利问，“在缉毒署的人冲进来之前，

我们能抢先几步？”

“不一定，乔治，不能那样说！就像赛伊说的，时间有个范围。”

“三个月？”

“太乐观了，有点太乐观。”

“不到三个月？”

“三个月，不到三个月，十到十二个礼拜——大致是这样，乔治。范围会流动。由朋友之间决定。三个月吧，我认为。”

史迈利长长慢慢叹了一口气：“今天以前，我们时间还多得是呢。”

马铁娄将薄纱降下一两英寸。“索卢的感知度没有那么多高啦，乔治，”他说，谨慎使用圆场而非自己单位的术语，“呃，索卢有盲点，”他说，等于是半承认，“我们不会把整条鱼丢给他的，晓得我的意思吧？”

马铁娄停顿，然后说：“索卢只前进到第一梯队。到此为止。相信我。”

“第一梯队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柯收了莫斯科的钱。知道他卖鸦片。就这样而已。”

“他知不知道那女孩的事？”

“她倒是个恰当的例子，乔治。那女孩。那女孩跟他一起去曼谷。记得默非描述过曼谷之行吧？女孩跟他一起同住酒店套房。她接着跟他一起飞到马尼拉。你注意到了，我知道。我看见你的眼神。不过我们请默非删掉那部分的报告。只是为了索卢好。”史迈利似乎开始复苏，程度极为轻缓。“承诺仍然有效，乔治，”马铁娄慷慨地向他保证，“没加，没减。你扮演鱼，我们帮你吃下柯。过程中需要求助，只要拉拉绿绳子大叫一声就行。”他郑重其事一手搭在史迈利肩膀上安慰他，但察觉到史迈利不喜欢这种接触，赶紧放手。“然而，万一你想换手，我们只要对调——”

“然后剽窃我们的想法，以退出香港当做条件。”史迈利说，为他完成句子，“还有一件事我想确定。我希望能看到白纸黑字。我希望这事成为你我双方书信交流的主题。”

“是你开的宴会，游戏由你选择。”马铁娄说得豪迈。

“敝单位将扮演鱼的角色，”史迈利以同样直接的语气强调，“我们也负责钓上岸。钓鱼术语是这样说吧。可惜我很少运动。”

“钓上岸，拖上岸，钩上来，随便。”

马铁娄的善意在吉勒姆的有色眼镜下，显得有些老套。

“我坚持这是我们的行动。我们要抓的人。我坚持先到者拥有优先权。锁定他，掌握他，一直到我们认为适合放手为止。”

“没问题，乔治，一点问题也没有。随便你怎么处置，他归你处理。”

等到你想分享，再打电话给我们。就这么简单。”

“明天早上我会送来一份书面确认。”

“噢，不用麻烦啦，乔治。我们有的是人力，会派人过去拿的。”

“我会送过来。”史迈利说。

马铁娄起身。“乔治，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以前就已经说定了，”史迈利说，“是兰利先反悔的。”

两人握手。

这一刻，在个案历史上前所未有。在情报界，有几种聪明的说法。“乔治反手掌控的那日”是其一，只不过他花了整整一星期，马铁娄的期限也更逼近了一点。但对吉勒姆而言，整个过程具有更加堂皇的意义，比单纯技术加工精彩得多。他一面逐渐理解史迈利的意向，一面则出神地欣赏史迈利的做法，看着他一丝不苟布下每条钓线，召来这个或那个人来共同研究，在这里下钩，在那里系上索栓，吉勒姆不禁产生一种感觉，如同观看大型远洋船只转弯，小心更换方位前进，轻轻转回来时路径。

换言之，没错，就是将整件案子上下翻转过来，或是反手掌控。

回圆场路上，他们不发一语。上楼时爬到最后一层，史迈利步伐甚缓，让吉勒姆再度担忧他的健康状况，因此一有机会立刻致电圆场医生，逐一报告他所见的症状，医生却告诉他，其实史迈利两三天前曾为了不相干的事找过他，所有迹象显示他如一条活龙。觐见室的门关着，保姆法恩再度独拥心爱的主子。史迈利要的那些东西，泄露出来的部分让人联想到炼金术。毕奇飞机——他想取得结构图与目录，以及——如果能以不具名的方式取得——东南亚区域的飞机拥有人、买卖等细节。托比·伊斯特哈斯接到命令，乖乖消失于飞机买卖业的混沌丛林中，没过多久，法恩递给默莉·米金厚厚一叠过期的《运输世界》杂志。史迈利以他办公室传统的绿色墨水亲手写下指示，请默莉圈出任何可能吸引潜在买主的毕奇飞机广告，期间是飞行员瑞卡度半途放弃运送鸦片进入中国大陆之前的六个月。

在史迈利书面指示下，吉勒姆秘密探访狄沙理斯几位掘穴人，并且在脾气不稳的狄沙理斯不知情的情况下，知道他们距离找出纳尔森·柯仍路途遥远。其中一名老迈的掘穴人甚至暗示，德雷克·柯最后一次见老希博特时所言不假，弟弟纳尔森确实已经死亡。但当吉勒姆向史迈利报告这份消息时，他不耐烦地摇摇头，递给他一份传送给库洛的信息，并要他通过在香港警方的人脉，最好想个借口，收集柯的经理人老刁进出中国大陆的所有细节。

库洛的回音很长，四十八小时后出现在史迈利的办公桌上，显然带给他罕见的欣喜时光。他吩咐值班司机带他去汉普斯德一带，在石南园独行了一小时，走过阳光下的霜气，并且根据法恩的说法，呆呆看着圆

滚滚的松鼠，然后才回到觐见室。

“你还不懂吗？”他当晚向吉勒姆抗议，以同样罕见的兴奋之情说，“你难道不懂吗，彼得？”一面将库洛传来的日期推到他鼻子下，一指戳着其中一个日期，“瑞卡度出任务前六个礼拜，老刁去了上海。他在上海待多久？四十八小时。噢你这个低能儿！”

“我才不是低能儿，”吉勒姆反驳，“我只是碰巧没有直拨上帝的专线而已。”

来到地窖，史迈利与窃听主任米莉·麦克雷格闭门播放老希博特的独白，偶尔对狄沙理斯拙劣的高压问话方式皱眉头——米莉说。其他时间，他不是阅读就是四处走探，不时找山姆·科林斯来讨论一番，简短而激烈。两人的见面，吉勒姆注意到，耗损史迈利的不少元气，也害他脾气发作。以史迈利身负的负担而言，他的脾气已经够少了。而这段期间，他发脾气总在山姆离去后。即使在发完脾气后，他显得更加紧绷，更加寂寞，晚上散完习惯散步后才消火。

后来第四天左右，不知何故，第四天在吉勒姆生命中属于危机日——或许是与不愿发津贴给库洛的财政部争吵过的缘故吧，托比·伊斯特哈斯竟有办法逃过法恩与吉勒姆的眼线，直接溜进觐见室，呈给史迈利一大叠影印的买卖合约，主角是一架全新四人座毕奇，买主是曼谷公司瑞士空运，注册地点是苏黎世，细节随后送来。特别让史迈利欢欣鼓舞的是，这架飞机可坐四人，后面两个是可拆式座位，但机长与副机长的座位固定住。至于飞机买卖确切日期，是在七月二十日：不巧是在狂人瑞卡度侵犯中国领空的前一个月，但后来他改变心意。

“连彼得都能联想得到，”史迈利高声说，口气激动，“之后呢，彼得，之后呢？快说啊！”

“老刁从上海回来后两个礼拜，飞机才卖掉。”吉勒姆回复，满心不情愿。

“那又怎样？”史迈利质问，“那又怎样？接下来要注意哪里？”

“我们问自己，瑞士空运的老板是谁。”吉勒姆发火了，被史迈利惹得很不高兴。

“完全正确，谢谢你，”史迈利假装如释重负，“你恢复了我对你的信心，彼得。好，接下来，你认为，我们发现瑞士空运的掌柜是谁？就是曼谷代表。”

吉勒姆瞥了一眼史迈利办公桌上的笔记，但史迈利抢先一步，以双手盖住。

“老刁。”吉勒姆说，脸竟红了起来。

“万岁。是的。老刁。厉害。”

当晚史迈利再请山姆·科林斯进办公室时，阴影已重回他犹豫不决的脸上。

尽管如此，调查行动已然展开。托比·伊斯特哈斯调查飞机界大有斩获之后，新任务是调查酒业，飞往苏格兰西部群岛，假冒增值税督察，花了三天突袭抽查一批威士忌酒厂的收支簿。这些酒厂专营桶装酒未成熟前出售的生意。他回来后，套句康妮的说法，眼神活像是成功脚踏两条船的丈夫。

这一连串活动所产生的连续高潮，在于传给库洛一篇极长的电报，是在参加情报行动理事会正式会议后起草的；这种会议，再套句康妮的用语，称为黄金耆老会，但还多了个山姆·科林斯与会。会议之前，史迈利与表亲开过冗长的会议探讨手段，会中他克制自己绝口不提纳尔森·柯，只是要求为外勤增加监看通讯的设备。对合作对象，史迈利以这种方式解释其计划。

到目前为止，行动局限在取得有关柯的情报以及苏联金棱线的衍生结果。必须特别提防的是，别让柯注意到圆场对他产生了兴趣。

接着他概述了目前收集到的情报：纳尔森、瑞卡度、老刁、毕奇飞机、日期、种种推论、瑞士注册的航空公司。现在查出该公司既无房地产又无其他飞机。他说，他宁愿等待确实查出纳尔森的身份，然而每项行动都必须妥协，而某方面多亏表亲的帮忙，期限越来越紧迫。

他完全未提及那位女孩，对山姆·科林斯发言时，连正眼也不看他一眼。

然后他进行到他谦虚称为“下一阶段”的步骤。

“我们的问题在于突破僵局。有些行动，悬而未决时反而进行得比较顺利，也有些行动，一直要到解决了才有所价值，海豚案就是一例。”他慎重皱眉，眨眨眼，然后把摘下眼镜，在众人窃喜之下，无意中符合他人对他的传言，以领带较粗的一端擦拭镜片。“我建议将整个策略翻转过来。换言之，主动向柯宣布，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兴趣。”

与往常一样，这段静得可怕却很合适的场面终结者是康妮。她的微笑也是最快，是最善解人意的微笑。

“他是想引蛇出洞，”她欣喜若狂地对大家低声说，“跟他对付比尔的手法一样。好聪明的家伙！在他门口点火，是不是啊，亲爱的，看看他往哪里跑。噢，乔治，你好可爱、好可爱，是我所有乖孩子里面最乖的一个，我是说真的！”

史迈利捎给库洛的信息，描述策略的暗喻却有所不同。他用的是外勤情报员偏爱的“摇动柯的树”，而且从信息内容其他部分看来，尽管危险性相当高，显然他建议让肩膀宽厚的杰里·威斯特贝一肩挑下。

为这一切下脚注的是，两三天后，山姆·科林斯失踪了。人人因此欣喜异常。他不再进办公室，史迈利也不再找他。吉勒姆偷偷进他办公室翻了一下，除了几包没拆开的扑克牌，以及几本西端区夜总会俗丽的火柴以外，完全没有属于山姆个人的对象。他向管理组人员打探消息，他们以不常见的口吻直言不讳，说他的要价是一笔遣散费，而且要他们答

应重新检讨他的退休金权益。其实他可卖的东西并不多，他们说他是昙花一现，再也没有复出的机会。一走百了。

尽管如此，吉勒姆对山姆那份不安的感觉，就是难以消除。接下来几星期，他经常向默莉·米金传达这份感受。不只是因为在拉康办公室撞见他，他也对史迈利与马铁娄书信往来一事感到不舒服。上次史迈利与马铁娄口头承诺后，彼此答应以书面确认，史迈利不愿让表亲过来拿，因为对方免不了大摇大摆开着大轿车前来圆场，甚至还派出开道摩托车，所以史迈利吩咐吉勒姆亲自跑一趟葛若斯芬诺广场，让法恩看家。不巧吉勒姆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而山姆一如往常空闲无事，因此山姆自愿代替他跑腿时，吉勒姆求之不得，事后却向上帝祈祷这事从未发生过。现在仍虔诚祈祷着。

法恩说，山姆本可将乔治的信件交给默非或其他无名小卒，却坚持要亲自进办公室见马铁娄。而且还与他独处超过一个小时。

13 丽泽

星辰岗是半山一带最新也是地势最高的街区，自成一圈，在夜间宛如巨大光笔戳入山顶柔和的夜色中。有一条蜿蜒的堤道通往星辰岗，但惟一人行道却是夹在堤道与悬崖之间一道六英尺宽的路缘石。在星辰岗，步行的人品味令人质疑。时间是晚上六七点，社交尖峰期接近高潮。杰里在人行道上踉跄前行时，奔驰车与劳斯莱斯擦身而过，忙着送人载人。他捧了一束兰花，以薄纸包裹：比库洛送给菲比·威费尔那束大，比德雷克·柯送给夭折的儿子纳尔森那束小。这束兰花谁也不送。“小子，等你长到我这么大，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先想出个好理由。”

他情绪紧绷却也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漫漫等待已经结束。

昨天冗长的简报中，库洛对他建议过：“这是占据有利位置的行动，一脚直接踏进门，开始推销，一直到全身进门才可以停止。”

只剩一条腿吧，杰里心想。

条纹帆布篷通往门厅，空气中弥漫着女人的香水味，有如此次任务的开胃菜。“一定记得，那栋房子的主人是柯。”库洛语带不满地说，当做是告别之礼。内部装潢仍未完工。邮箱旁不见大理石名牌。玻璃纤维的鱼，本应对着水磨石喷泉吐水，然而水管尚未接通，一袋袋水泥堆在干池内。他朝电梯方向走。一间玻璃亭写着“招待处”，华人门房坐在里面看着他。杰里只见对方模糊的身影。杰里刚到时，他在看书，现在却直盯着杰里看，仍未决定是否前去盘查，却因来人手捧兰花而稍感安心。两位涂了大花脸的美国妇女抵达，在他附近站定。

“开得好美啊。”她们边说边戳着薄纸。

“好棒，不是吗？来，送你们。礼物！别客气了，美女。无花令人俗！”

大笑。英国人与美国人就是不一样。门房继续看书，杰里也获得认可。电梯来了。一群外交官、生意人以及老婆，拖着脚步走进大厅，神色阴沉，穿金戴银。杰里让美国妇女走在他前面。雪茄烟雾与香气混合，软弱无力的罐头音乐嗡嗡响着为人所淡忘的旋律。两名妇女按下十二楼。

“你也是来找汉墨斯坦的呀？”她们问，四眼仍直看兰花。

来到十五楼，杰里往楼梯间走。楼梯间有猫骚味，也有垃圾投送口的臭味。下楼时，他遇见一名女佣，捧着尿布篮，对着杰里摆脸色，直到杰里向她打招呼，她才哈哈大笑。他继续往下走到八楼，走回装潢豪华的住家区。他来到一条走廊的尽头。一座小圆厅里有两扇金色电梯门。这一层有四间公寓，每间占有圆形大楼的四分之一圆，每间各有一条走廊。他在B走廊站定，仅有兰花能保护他，观察着小圆厅，注意力

集中在C走廊的出口。包裹兰花的薄纸因他握得太紧而湿润。

“每个礼拜固定这一天，”库洛向他保证过，“每个礼拜一，在美国俱乐部有插花课。风雨无阻。她会跟一个女的朋友碰头，奈莉·陈，中国海空的员工。两人一起上插花课，下课后留下来吃晚饭。”

“柯呢？”

“在曼谷。交易。”

“最好向上帝祈祷，他乖乖待在曼谷别回来。”

“阿门，先生，阿门。”

新门的铰链发出吱呀一声，在杰里耳边应声打开，一名身穿晚礼服的细瘦美国年轻人走进走廊，忽然停下，盯着杰里与兰花看。他的蓝眼沉稳，手提公文包。

“你捧着那堆东西在找我？”他询问，操波士顿上流社会口音，尾音拉长。他外表显得富裕自信。杰里猜他不是外交官就是名校出身的银行职员。

“其实不是，”杰里承认，假扮起英国傻瓜，“卡文迪许。”杰里说。他看到美国青年背后那扇门静静关上，里面有座装满书籍的书架。“是我一个朋友叫我送给9D的卡文迪许小姐。自己跑去马尼拉，害我拿着兰花来这里。”

“走错楼了，”美国人说着漫步向电梯，“再上一层楼。走廊也错了。D走廊在另一边。那一边。”

杰里站在他身旁，假装等着上楼的电梯。下楼电梯先到，美国青年轻松走进后，杰里重回岗位。标明C的门打开，他看见她走出来，转身锁上两道门锁。她的打扮随意，长发呈灰金色，在颈背扎成马尾，身穿素色挂颈露背衫，脚踩凉鞋，虽然杰里看不见她的脸孔，却已知道她是美人一个。她走向电梯，仍未看见杰里，杰里起了一阵幻觉，想像自己站在街上望见窗内的她。

在杰里的世界中，有些女人将肢体当做城堡，只待最英勇的男人进犯，而杰里就娶过几个这样的女人。或许她们是在他的影响下有此转变。也有女人似乎打定主意痛恨自己，弯腰驼背，锁紧臀腿。也有些女人，只需向他走来，就算是送他一件大礼了。这样的女人稀有，而对此时的杰里而言，她属于个中翘楚。她停在金色电梯前，看着楼层号码逐楼亮起。电梯来时，他走到她身边，女子仍未注意到他。电梯挤满了人，正合他意。他侧身蟹行而入，关注着兰花，道歉连连，面带浅笑，故意将兰花举得高高的。她背对着杰里，而杰里向下看就是她的肩膀。她的肩膀强壮，裸露在颈带的两旁，杰里看得见小小的雀斑，以及一道极细的金色毛绒向下消失在脊椎。脸孔只见侧影，他向下凝望。

“丽姬？”他以不太确定的口吻说，“嘿，丽姬，是我啦，杰里。”

她陡然转身，抬头盯着他。他但愿能后退一步，因为他知道对方第

一个反应必定是害怕他的体型，他没料错。恐惧在她的灰眼珠里一闪而过，接着视线固定在他脸上。

“丽姬·伍辛顿！”他以较具自信的口吻大声说，“威士忌做得怎样？记得我吧？很荣幸投资贵公司。杰里。是小不点瑞卡度的朋友。五十加仑一桶，标签注明我名字。全部付清上船了。”

他压低声音，因为担心这话可能撩起一阵她急着撇清的往事。他的音量低到电梯其他人只听见闭路电台播放的“雨滴直直落在我头上”，或是担心封死在电梯里的希腊老人咕哝抱怨。

“原来是你啊，”她说，现出空姐般的爽朗微笑，“杰里！”她的嗓音转弱，假装一时想不起来。“杰里，呃——”她皱眉，抬头仰望，摆出剧场演员表演“健忘”的戏码。电梯在六楼停下。

“威斯特贝，”他立刻接着说，替她解围，“记者。你在群星酒吧害我上钩。我寻求的是温暖慰藉，结果只弄到一桶威士忌。”

他身旁某人笑了出来。

“没错！杰里亲亲啊！我怎么会……你怎么会来香港？我的天啊！”

“跑同样的线。火灾和流行病，饥荒。你呢？应该退休了吧，靠你的推销技巧。我一辈子从没被人押着做事，丢脸死了。”

她开怀大笑。电梯门在三楼打开，一名老妇拄着两支拐杖慢慢走进来。

丽姬·伍辛顿总共卖了五十五桶黄汤，老库洛说过。每一桶都是卖给男性买主，根据我的顾问，这些买主有不少人还得到免费服务。我敢说，她为宾主尽欢这成语作了新的诠释。

电梯来到一楼。她先下电梯，杰里走在她身边。通过大门时，他看见她的红色跑车，车顶开着，停在半圆形车道上，旁边挤满了亮晶晶的大轿车。她一定先打电话下来请人开过来待命，杰里心想。如果柯是大楼主人，肯定特别关照她。她正朝向门房的窗口前进。穿越大厅时，她继续说个不停，一直对他说话，一手张得很开，掌心向上，犹如时装模特儿。他刚才一定问过她喜不喜欢香港，只不过他不记得问过：

“我好喜欢，杰里。我爱死了香港。在万象感觉——噢，像是距离这里好几世纪呢。小瑞死了，你知道吗？”她随口提到，带有英雄般的语气，仿佛她与死亡彼此并不陌生。“离开小瑞后，我以为再也不会想去任何地方了。我完全料错了，杰里。香港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玩的城市。劳伦斯亲亲，我要去开我的红色潜水艇了。今晚是女士之夜。”

劳伦斯是门房，她的汽车钥匙吊在银色大马蹄铁上，让杰里联想到跑马地的赛马。

“谢谢你，劳伦斯。”她温柔地说，并对他微微一笑，足以供他消受一整晚。“这里的人都好好哟，杰里。”她以旁人听得见的低语对杰里坦承，两人朝大门前进。“在老挝时，我们还老讲华人的坏话呢！可是来到

这里后，华人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心、最外向、最有发明头脑的民族。”她的口音慢慢变成一种难以辨别国籍的外国腔调，杰里注意到。想必是被瑞卡度影响，为求时髦而保留下来。“大家想到香港时，都想到‘购物天堂，免税照相机，餐厅’。不过老实讲啊，杰里，如果看穿表面，认识真正的香港，认识真正的香港人，就会发现这里是应有尽有。我的新车，喜不喜欢？”

“卖威士忌赚的钱，都花在这里喽。”

他打开掌心伸向她，她则递出钥匙，让他为女士开门。仍继续表演傻瓜的杰里请她代捧兰花。黑色的山顶后方满月低垂，尚未升起，宛如森林大火般发光。她上了车，杰里交还钥匙，这一次接触到玉手，再度回想起跑马地，回想起柯一吻芳颊，两人开车离去。

“不介意让我挤后座，载我一程吧？”他问。

她大笑一声，为他推开前座车门。“兰花好漂亮，你到底要捧去哪里啊？”

她发动引擎，杰里却轻轻熄火。她讶然盯着他看。

“伙计，”他悄声说，“我这人没法子说谎。我对你不怀好意，在你开车载我出发之前，最好扣紧安全带，听我解释可怕的事实。”

他小心选择这一刻，是因为不希望让她感到备受威胁。她坐在自己车上，在自家公寓大楼大灯照亮的布篷下，距离门房劳伦斯不到六十英尺，他这时扮起谦逊罪人，以增加她的安全感。

“偶然相遇其实并不完全偶然，这是重点一。重点二，我不打算说得更好听，是报社叫我天涯海角追踪你，逼问你有关已故友人瑞卡度的事。”

她仍看着他，静待发展。她下巴尖端有两道平行小疤痕，有如被爪子抓伤过，相当深。谁造成的，以什么东西抓伤的，他很纳闷。

“可是瑞卡度已经死了啊。”她说，说得太快了。

“对，”杰里以安慰的口吻说，“毫无疑问。可惜报社手里握有所谓可靠线报，指出他其实活得好好的，而我的任务是迁就讨好老板。”

“可是，那未免太荒谬了吧！”

“我同意。完全同意。他们是疯了。安慰奖是两打握烂的兰花，以及全香港最豪华的晚餐。”

她转开原本看着杰里的视线，直盯挡风玻璃外，头上路灯正面打在她脸上。杰里纳闷的是，活在如此标致的肉体内是什么感觉，而且每天二十四小时必须全心配合。她的灰色眼睛再睁大了些，他精明地察觉到，这时他应该注意到对方泪水盈眶，注意到她双手紧握方向盘，寻求慰藉。

“原谅我。”她喃喃地说，“是这样的——爱上一个男人后——为了他

放弃了一切——结果他死了——后来有天晚上，突然冒出——”

“我了解，”杰里说，“很抱歉。”

她发动引擎。“何必抱歉？如果他还活着，算是我捡到了。如果他死了，一切都没变。反正胜率百分之百。”她笑了，“小瑞老是说他是金刚不坏之身。”

就像从瞎眼的乞丐身上偷东西，他心想。她这女人非管得紧紧的不行。

她开得不错，只是显得生硬，杰里猜想——因为她容易引发臆测——她最近刚通过路试，车子是她领到驾照的奖品。这晚是全世界最平静的夜晚。两人逐渐沉入市区时，海港宛如一面完美无瑕的镜子，躺在珠宝盒的中央。两人讨论上哪个馆子。杰里提议半岛酒店，但她摇头反对。

“好吧，不然先去喝一杯。”他说，“好嘛，一起去疯一阵嘛！”

让他惊讶的是，她伸手过去，在他手上捏一下。这时他回想起库洛。她对每个人都来这一招，他说过。

她没人看管，就这一晚。这种想法不断涌上心头。他记得女儿猫咪小时候放学后，他会开车带她从事各式各样的活动，以使午后时刻显得更充实。来到九龙区一家阴暗的迪斯科，他们饮用人头马加冰块与苏打。他猜是柯喜欢喝的酒，她为了迎合柯而习惯点同样的酒。时间还早，客人只有少少十几人。音乐声很大，他们不得不对着彼此大嚷才听得见，但她并未提及瑞卡度。她宁愿听音乐，头向后倾欣赏着。有时候她会握住他的手，一度头倚杰里肩膀，也一度漫不经心对他献上飞吻，轻盈步上舞池，表演单人慢舞，闭上眼睛，微带笑意。在场男士忘了女伴的存在，纷纷以肉眼为她脱衣，华人服务生则每隔三分钟过来清理烟灰缸，趁机向下眺望衣下风光。喝了两杯，过了半小时，她宣布自己想听艾灵顿公爵与大乐团的音乐，因此快车赶回香港岛，到杰里知道有菲律宾乐团现场演奏的地方，演奏公爵的歌曲具有相当水平。小号手卡特安德森是吐司问世之后最棒的发现，她说。有没有听过阿姆斯特朗和艾灵顿合作？他们两个真是全世界最棒的组合。她一面对杰里唱《心情湛蓝》，一面继续喝人头马。

“瑞卡度以前会跳舞吗？”杰里问。

“以前会跳舞吗？”她轻声呼应，配合旋律一脚拍着地板，弹着手指。

“瑞卡度不是有点跛吗？”杰里反问。

“跛也挡不住他，”她说，仍沉醉在音乐里，“你要明白，我永远不会回到他身边了。永远。那一章已经结束了。一了百了。”

“他怎么会……”

“跳舞吗？”

“跛脚。”

她一指绕在虚无的扳机上，朝空中开枪。

“不是打仗，就是碰上气呼呼的丈夫。”她说。他请她重复，她则将嘴唇凑近他耳朵。

她知道有家新开张的日本料理店，神户牛排煎得很好吃。

“那两道疤怎么来的，告诉我。”两人开车前去时他问。他碰碰自己的下巴。“左边和右边。怎么来的？”

“噢，猎捕无辜狐狸的时候，”她淡淡一笑说，“我亲爱的爸爸爱死了马。可惜现在还是。”

“他住哪里？”

“老爸吗？噢，一样待在英格兰夏洛普郡塌了一半的城堡里。有好几英里长，但他们就是不肯搬。没下人，没钱，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冷冰冰。妈妈连鸡蛋都煮不熟。”

他仍目眩神迷中，这时她却想到有家酒吧，咖喱小点心是天堂美味，所以开车到处找，最后终于找到，亲酒保一下。没有音乐。不知何故，他不知不觉对她倾诉孤女的一切，最后解释分手的原因时，他才故意一语带过。

“啊，杰里亲亲，”她睿智地说，“你跟她差了二十五岁，又有什么办法？”

你和德雷克·柯相差十九岁，还多了一个华人大老婆，你又能怎么办？他心想，不无愠意。

他们离开酒吧——她再对酒保献上几吻。杰里仍未被她迷昏，也未被白兰地加苏打灌醉，仍能留心注意到她去打个电话，说是想取消约会，电话却打了很久，回来后神情严肃。上了车，他从她眼神中看出微微一抹不信任。

“杰里？”

“什么事？”

她摇摇头，笑了一声，手心抚摸着他的脸，然后亲吻他。“我很开心。”她说。

他猜她是在纳闷，假如真的卖了他那桶无商标的威士忌，怎么可能忘得这么干净。他猜她也在纳闷的是，为了推销威士忌，她是否随货附送库洛粗野指出的那档好事。但他了解，那是她家的事。一开始就是。

来到日本料理店，服务生带他们坐在角落，多亏丽姬的微笑以及其他特征。她坐下后看着餐厅内部，而他坐下后看着丽姬。这种好事，杰里认为可有可无，但有机会的话，仍需向沙拉特鞠躬致谢。烛光下他清楚看见她的脸庞，也首度注意到年华的痕迹。不只是下巴的两道疤痕，也包括奔波、压力导致的小细纹。看在杰里眼里，这些痕迹具有坚定的

特质，如同身经百战荣获的伤疤。她佩戴一只金手环，新的，一只出现凹痕的锡质手表，有迪士尼的图案，戴了手套的指针有刮痕，指着罗马数字。她对旧表的忠诚度打动了，让他想知道手表是谁送的。

“老爸。”她漫不经心地说。

头上天花板镶着一面镜子，除了其他客人的头顶之外，他看得见丽姬的金发与丰满的胸脯，背部如金屑的毛发也见得到。他想追问瑞卡度的事时，她起了戒心。杰里早该想到才对，打过电话后，她的态度起了变化，但他却没想到。

“你怎么保证报纸不会注上我的姓名？”她问。

“我以人格担保。”

“可是，如果你的编辑知道我以前是瑞卡度的女朋友，他自己补上我的姓名，你又有什么办法阻止？”

“瑞卡度的女朋友多得是。你也知道。各种大小，各种形状，交往时间重叠。”

“可是，我这个人只有一个。”她语气坚定。他看见她眼睛瞟向门口。然而，她本来就有这种习惯，不管人在哪里，总喜欢一直搜寻室内各处，寻找某个不在场的人。他让她维持主动。

“你说你们报社接到可靠线报，”她说，“什么意思啊？”

这答案，他事先与库洛临时抱佛脚恶补过。也实际排练过。因此回答起来就算不是斩钉截铁，也具有三分力道。

“小瑞飞机失事是一年半前，地点在泰柬边界拜林佛蒙特州附近丘陵区。这是官方说法。尸体没找到，也没人发现飞机残骸，据说他当时是在运送鸦片。保险公司也没支付保险金，印支包机也从没告他们官司。为什么不告？因为瑞卡度跟他们签约，只帮他们开飞机。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人告印支包机？以你为例好了，你是他的女人。为什么不要求赔偿金？”

“那样讲太低俗了。”她以公爵夫人的口吻说。

“除此之外，最近有人在酒吧看到过他。他留了大胡子，可惜跛脚却治不好，他们说，一天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的习惯也改不了。还有，恕我直言，他站立地点方圆五英里内穿着裙子的所有东西，他也非追不可。”

她作势反驳，但他已讲了一半，不如继续讲完全部台词。

“清迈的琳康酒店门房总管看过照片，尽管留了胡子，他还是认了出来。好吧，我们这些欧洲人，他们认为全是从一个模子出来的。不过他十分确定。就在上个月，曼谷一个十五岁女孩，我们掌握了背景，她抱着小宝贝到墨西哥领事馆，指出幸运中奖的父亲是瑞卡度。怀孕十八个月，我才不相信，我猜你也不相信。少给我那种眼色看，伙计。这不是

我的点子吧？”

是伦敦的点子，他大可补上这句。用这套事实加编剧的说法来摇树，属于高招。然而她视点落在他身后，再度看着门口。

“另一件想请教你的问题是威士忌诈财的生意。”他说。

“才不是诈财呢，杰里，是光明正大的企业！”

“伙计。当时的你呢，的确老实正直，丝毫不沾丑闻，玉洁冰清之类的。不过如果小瑞走了太多小路，不正有理由来个人间大蒸发的戏码吗？”

“小瑞才不会来那一套。”她最后说，了无说服力。“他喜欢当风风光光的大人物，逃跑不是他的作风。”

让她浑身不自在，杰里真心感到遗憾。换成其他状况下，他多希望她的感受正好相反。他观察着她，知道她属于不善辩的人。争论一发生，她心头浮上绝望，死了心，准备接受失败。

“举例来说，”杰里继续说，她的头已经向前倾表示服从，“要是我们能证明你的小瑞卖掉酒桶后中饱私囊，没有交给酒厂——我纯粹是假设，一丁点证据也没有——然后呢——”

“我们两人拆伙时，每个投资人都领到认证过的合约，利息从购买日开始计算。我们借来的每一分钱算得清清楚楚。”

直到眼前这一刻之前的工作全靠双脚奔走。如今他终于看见目的地浮现在眼前，因此加快脚步前进。

“一点也不清楚，伙计，”杰里纠正她，而她继续低头凝视还没吃的食物，“完全不清不楚。那些赔偿金一直到应付日期的六个月后才付清。迟付。依我浅见，这一点值得详加探讨。问题是，是谁拉了小瑞一把？根据我们的情报，全世界都在找他。酒厂也好，债权人也好，警方也好，当地民众也好，人人都磨好了菜刀等他出现。结果有一天，宾果！诉讼撤回，监狱铁窗的阴影消散。怎么会？原来小瑞跪了下去。他的神秘天使是谁？是谁帮他偿债的？”

在杰里发问的过程中，她已经抬起头。让杰里讶异的是，她脸上忽然绽放出光芒四射的微笑，转眼间她朝杰里背后挥手，对面的杰里看不见，只好望向天花板镜子，才瞥见金光闪闪的电光蓝色西装，主人满头黑发，涂了层层发油。来到两人中间后，这位依比例缩制的华人伸出两只弯起来的手，摆出拳击手打招呼的态势，圆胖的脸托在一对强有力的肩膀上。这时丽姬尖着嗓子叫他过来。

“刁先生！怎么这么凑巧。这位是刁先生！过来过来！尝尝牛排。好好吃哟。刁先生，这位是杰里，英国记者。杰里，这位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对我照顾很多。他是在采访我，刁先生！我呀！好刺激哟。访问的内容都是在万象的事，跟我一百年前帮过的一个小飞行员有关。我的底细，杰里一清二楚呢。他真神奇啊！”

“我们见过面。”杰里说着龇牙咧嘴地笑。

“当然。”刁说，态度同样快乐。他开口时，杰里再度嗅到那种熟悉的气味，是杏仁加玫瑰水，是他前妻热爱的气味。“那当然，”刁重复，“你是那个赛马记者，对吧？”

“对。”杰里说，微笑已经向两旁撑到嘴角将近裂开的地步。

当然，随后杰里的世界观翻了数次跟斗，而他必须兼顾的事多如牛毛，其一是对老刁的幸运出席表现得与在场其他人一样惊喜；其二是握手，感觉有如承诺着未来的和解；其三是拉来一张椅子，请服务生端酒送筷子以及其他东西。做这些动作的同时，萦绕在他脑海的与刁先生几乎无关，也与他忽然现身无关。这段记忆在往后事件允许的情况下，永远逗留在记忆中。萦绕在杰里脑海的是丽姬一看见他时的脸部表情，在她的英勇细纹牵出欢颜前半秒的表情。这副表情比任何事物更能对杰里阐述她身上的矛盾：她坐困牢笼时幻想的美梦；她那借来的个性，仿佛披上这样的伪装她就能暂时逃脱自己的命运。刁先生当然是她找来的。她别无选择。让杰里讶异的是，圆场与他都没有料到这一招。瑞卡度一案，无论实情是什么，对她而言都属于极烫手的山芋，无法单独处理。刁先生一进料理店，她的灰眼珠中流露的不是如释重负，而是听天由命：大门再度在她面前轰然关上，乐趣也告一段落。“我们就像该死的小萤火虫，”孤女有次低声对杰里说，激动地抱怨着自己的童年，“背着该死的火到处跑。”

另一方面杰里立即体会到，刁的出现对于行动本身而言当然是天降大礼。如果情报非得回传给柯，通过刁先生这渠道远比丽姬·伍辛顿来得无限美好。

她亲完了刁，将他交给杰里。

“刁先生，你是我的见证，”她宣布，企图把这场面当成一场阴谋，“你千万要记得我说的每一个字。杰里，继续问吧，就当他没在这里。我是说，刁先生比坟墓还安静，对吧？亲亲。”她说着重度献吻。“好刺激哟。”她又说，三人逐渐在友善的气氛下聊了起来。

“这么说来，威斯贝先生，你是想写什么？”刁询问，态度全然亲切，一面将牛排塞入嘴里。“你是赛马记者，干吗专找小美女的麻烦？”

“有道理，伙计！有道理！找马麻烦还比较安全，对不对？”

三人开怀大笑，互相回避彼此的眼神。

服务生端来半瓶黑带苏格兰威士忌，放在杰里面前。刁先生扭开软木塞，以鉴赏家的姿态先嗅一嗅再倒酒。

“他想写的是瑞卡度啦，刁先生。你难道不明白吗？他认为瑞卡度还活着呢。那该多好！其实现在的我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不过他能回来团聚一下应该很棒。想想看一起吃饭时多热闹！”

“是丽泽跟你说的吗？”老刁边问边为自己倒了两英寸威士忌，“是她

跟你说瑞卡度还活着？”

“谁？老兄？我没听懂。刚才那个名字我没听懂。”

刁先生以一根筷子指向丽姬。“是她跟你说瑞卡度还活着？那个开飞机的？那个瑞卡度？是丽泽跟你说的？”

“我向来不透露消息来源的，刁先生，”杰里说，态度同样亲切，“记者乱编的时候，都这样说的。”他解释。

“赛马记者，对吧？”

“没错，没错！”

刁先生再度大笑，这一次丽姬笑得比他更大声。她再度慢慢失控。也许是酒精作祟吧，杰里心想，也许她喜欢喝更烈的东西，而这杯威士忌正中下怀。还有，如果他再叫我赛马记者，也许我会采取防卫措施。

丽姬再开口，应付场面：

“噢，刁先生，瑞卡度以前多幸运哪！想想看他当时，有印支包机，有我，所有人都归他管。当时的我呢，在那家小航空公司上班，是老爸认识的一些好心的华人，而瑞卡度像所有飞行员一样，做起生意来轰轰烈烈，搞了一大笔烂账，吓死人了。”她挥一挥手，请杰里共襄盛举，“我的天啊，他甚至想拐我去搞他那种骗人的事业，真是的！卖什么威士忌的，结果忽然间，我可爱的华人好朋友决定换飞行员。他们帮他还债，定期发给他薪水，请他飞一架老爷飞机——”

杰里这时在不归路上跨出第一步。

“瑞卡度失踪时，飞的可不是什么老爷飞机，好友。他飞的是全新毕奇，”他刻意纠正丽姬，“印支包机名下从来也没有毕奇飞机。现在也没有。我的编辑从头翻到尾找遍了。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别问我。印支包机从来没向人借过毕奇，也从没租过，更从没摔过毕奇。”

刁先生再次开心大笑。

刁是个非常冷静的主教，阁下，库洛警告过他。帮柯先生治理旧金山教区五年，成效卓著，缉毒署在他身上找到的最大的罪过，不过是他假日清洗劳斯莱斯。

“嘿，威斯贝先生，说不定是丽泽帮他们偷来的！”刁先生以半美式英语腔调大喊，“说不定她晚上去别家航空公司偷飞机咧！”

“刁先生，那样讲多调皮呀！”丽姬大声说。

“怎么样，赛马记者？你觉得怎样？”

三人谈笑的音量这时大到令人侧目，有几人转头看他们。杰里从镜子里看见，心中多少期望柯在其中，希望看见柯那种船民的扭曲走姿，穿越柳条门朝他们摇摆前进。丽姬连忙口没遮拦地加话进来。

“噢，完全是童话故事啦！本来小瑞连三餐都成问题，欠我们所有人

钱，查理的积蓄，我老爸给我的零用钱，全被他借光了，所有人几乎被他拖垮。当然，大家的钱自然都归属他。结果转眼间，小瑞找到工作，欠债还清了，人生又变成彩色的了。其他可怜的飞行员没得飞，小瑞和查理到处飞，像是——”

“像是蓝屁股的苍蝇。”杰里接话，刁先生捧腹大笑，不得不抓住杰里的肩膀以免跌下椅子，此时杰里浑身不自在，感觉对方正以手试探目标，准备待会儿以刀对付。

“嘿，听听看，说得多妙！蓝屁股苍蝇！我喜欢！你真幽默啊，赛马记者！”

就在此时，在刁先生笑里藏刀的压力下，杰里的确需要再多奔走一点。稍后再来。库洛说的最有道理。他完全不去理会刁先生，紧咬着刚才丽姬说溜嘴提到的那个名字。

“对呀，提到老查理，丽姬，他最近怎么了？”杰里对查理这人一点概念也没有。“瑞卡度表演人间大蒸发后，他过得怎样？可别告诉我，他也跟着船沉下去了。”

她再度悠然叙述起来，刁先生则对一切事物听得津津有味，一面进食，一面点头咯咯笑。

他是来了解状况的，杰里心想。他这人精得很，不会帮丽姬踩刹车的。他担心的是我，不是她。

“噢，查理啊，他有金刚不坏之身，完完全全百战不死。”丽姬大声说，接着再度选择刁先生为听众，“查理·马歇尔啊，刁先生，”她解释，“噢，如果你认识他该多好。他呀，有一半华人血统，皮包骨，爱抽鸦片，飞行技术一级棒。他父亲是老国民党，是很出名的山贼，住在掸族山区。他母亲是科西嘉岛穷人家的女孩。科西嘉岛人有一堆移民到中南半岛去。不过说真的，他这人妙透了。他为什么自称马歇尔，你知道吗？他爸不愿把自己的姓传给他，所以你猜查理怎么办？替自己冠上陆军最高阶。‘我老爸是将军，我却是元帅（与马歇尔同音）。’他说。是不是很绝？而且比将军高一大截呢。”

“太绝了，”杰里同意，“真妙。查理真厉害。”

“丽泽呢，她自己也妙透了，威斯贝先生。”刁先生风度翩翩地评论，因此在杰里的坚持下两人干杯，向她妙透了的个性致敬。

“嘿，你们一直讲的这个丽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杰里放下酒杯时说，“你是丽姬。谁是丽泽？刁先生，这个丽泽我不认识。你们只顾讲笑话，也不跟我解释一下？”

丽姬这时绝对是转向刁请求指引，但刁帮自己点了一些生鱼片，大口吃了起来，心无旁骛。

“有些赛马记者顶会问问题的嘛。”他满嘴生鱼片地说。

“新地方，新生活，新名字，”丽姬最后终于说，笑得很没有信服

力，“我想换个环境，所以用了新名字。有些女生会换新的发型，我呢，换新的名字。”

“顺便换个男人来搭配新名字？”杰里问。

她摇摇头，视线向下，而刁先生哗然大笑。

“这地方是怎么一回事，刁先生？”杰里质问，出于本能为丽姬护航，“男人全瞎了眼不成？为了她，我愿意飞越两大洲咧，你难道不愿意？管她改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我啊，从九龙区到香港区，再远就不追了！”刁说，被自己的伶牙俐齿惹得高兴万分。“不然我就待在九龙区，打电话叫她一个钟头内过来见我！”

这时丽姬的视线继续朝下，杰里认为如果换了一个场合，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他愿打断几节刁先生的肥脖子，一定很好玩。

可惜的是，打断刁先生的脖子目前并不列在庫洛的购物清单上。

那笔钱，庫洛说过，时机成熟时，打开金梭线的一端，那才是你的大结局。

因此他以印支包机为开场白，请她解释。他们是谁，为他们效劳有何感受？她回过神来，速度之快令杰里不禁纳闷，她是否比他所理解的丽姬更热爱走在刀口的生活。

“噢，那是段很精彩的历险记，杰里！你连想像都没办法，我敢跟你保证。”又流露出小瑞的多国口音，“航空公司！光是这个名词就够荒谬了。你可别以为是刷得亮晶晶的新飞机、光鲜亮丽的空中小姐、香槟、鱼子酱。告诉你，门都没有。全是公事。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才有兴趣参与。靠老爸的钱，或是姑姑的钱，就够我一辈子不愁吃穿了。我本来可以完全独立自主，不过谁能抵挡挑战的诱惑？我们起家的，不过是两三架老得吓人的DC3飞机，简直像是用绳子和口香糖拼凑出来的东西。连安全执照都要花钱买。不然没人愿意发给我们。之后，我们几乎什么都运，本田车、蔬菜、猪——那些可怜的猪啊，飞行员一谈就谈个没完。猪溜出来了，杰里，全跑进头等舱，甚至也闯进驾驶舱呢，想想看！”

“跟旅客一样，”刁解释，嘴里塞满东西，“她运的是头等猪啊，懂吗，威斯贝先生？”

“从哪里飞哪里？”笑声刚落，杰里接着问。

“看看他怎么侦讯我，刁先生？我有这么星光熠熠，怎么自己不知道？这么神秘！我们哪里都飞呢，杰里。曼谷，有时候飞柬埔寨。马德望，金边，磅湛开放时也飞磅湛。到处都飞。乱七八糟的地方。”

“客户是哪些人？贸易商，出租商——常客是哪些人？”

“什么人上门都行。付得出钱就可以。当然了，最好是能预先付

款。”

刁先生暂时对神户牛排喊停，有意进行一点应酬对话。

“你父亲是个大爵爷吧，威斯贝先生？”

“差不多。”杰里说。

“爵爷通常是很有钱的人。你干吗当赛马记者？”

杰里完全对刁先生置之不理，打出王牌，等待天花板镜子坠落在他们这桌。

“据说你们跟地方的俄国大使馆相关人员有来往，”他故作轻松地说，冲着丽姬而来，“有印象吗，伙计？恕我直问，客户里面有没有共产党？”

刁端起饭碗凑着下巴，忙着将白米不停铲进嘴里。但这一次值得注意的是，丽姬连半眼都未瞧刁先生一下。

“俄国人？”她说，一脸疑惑，“俄国人为什么要找上我们？他们每个礼拜都有民航总局班机进出万象啊。”

在当时以及事后，他都可发誓丽姬所言不假。但面对丽姬时，他假装不甚满意。“连国内的运送都没有？”他追问，“接件送件，快递服务之类的？”

“从来没有。我们怎么可能？更何况，华人根本就对俄国人恨之入骨，是不是啊，刁先生？”

“俄国人很坏的，威斯贝先生，”老刁附和，“他们的味道很难闻。”

你也一样，杰里心想，再度嗅到一丝前妻的气味。

杰里嘲笑着自己的荒谬之处：“我们那些编辑啊，就是爱乱猜。”他抗议，“我的编辑深信，我们能炒个‘共产党就在你床下’的新闻。‘瑞卡度的苏联金主’……‘瑞卡度是否为克里姆林宫效忠卖命？’”

“金主？”丽姬问，全然迷惑，“小瑞从没收过俄国人一分钱。你的编辑在讲什么鬼东西啊？”

杰里说：“不过印支包机收过，对不对？除非我老板和上司全买到假情报。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他们从当地大使馆领出钱，以美元传到香港。这是我们伦敦报社的说法，他们坚信不疑。”

“他们发疯了，”她很有自信地说，“我从没听过这一回事。”

对杰里而言，话锋朝这个始料未及的路径前进，更让她显得如释重负。瑞卡度还活着——她这时步步移向雷区。柯是她情夫——掌握这秘密的人是柯与刁，她无权散布。然而俄国人的钱——杰里大胆肯定她一无所知，也无从担忧起。

他主动想开车送她回星辰岗，不过刁先生住的地方顺路，她说。

“希望很快再见到你，威斯贝先生。”刁承诺。

“希望再见到你，伙计。”杰里说。

“最好继续当赛马记者，听到没？依我的看法，当赛马记者赚的钱比较多，威斯贝先生。”他的语音听不出威胁，拍拍杰里上臂的动作也很亲切。刁先生的说法，甚至并不希望对方接受，只不过是朋友间互相问候的方式。

突然间一切就结束了。丽姬亲吻领班，却没亲吻杰里。她请杰里帮她拿外套，而非刁先生，如此杰里便无法与她独处。她道再会时几乎不正眼看杰里。

应付美女时，阁下，库洛警告过，就如应付已知的罪犯，而你即将接触的这位女士，无疑属于这一类型。杰里在月色街头漫步回家——长途步行，路上有乞丐，眼睛却直盯各个门口——细嚼库洛的言辞。就罪犯一词，他其实毫无掌控能力，因为即使在全无变量的情况下，罪犯一词的标准何在仍待商榷，而圆场与旗下历代干员对法律也从来未曾怀抱任何褊狭的概念。库洛说过，在时局不济时，瑞卡度曾强迫她运送小包裹过边界。没什么大不了的。留给猫头鹰去办。反过来说，已知罪犯又是另外一回事。已知的话，绝对归他处理。他记得丽姬·伍辛顿看着刁先生时那种困守牢笼的眼神，他明了那种眼神，那种依赖之情，不管以何种外表包装，都逃不过他的检视，因为他清醒的大半生都熟悉这种眼神。

有些喜爱批评乔治·史迈利的无足轻重之人，后来曾经一两次提出批评，认为他早该在这个节骨眼看清杰里的意向，将他从外地召回。毕竟实质上史迈利是杰里的主管，杰里的档案只在他一人手上，由他负责关照、通报杰里。批评者说，若史迈利正值盛年，而非江河日下，早该明白库洛报告的弦外之音，及时拦截杰里。这些批判讲明了，等于是在批评他是二流算命师。史迈利得知的事实如下：

杰里与丽姬·伍芝或伍辛顿邂逅之后隔天上午——邂逅一词为术语，并无性暗示——库洛开车接走杰里，向杰里听取简报长达三个多小时。库洛稍后提出的报告将杰里心境描述为“高潮后的低潮”。这种心境相当合理。库洛表示，他显然担心刁先生，甚至柯，可能因“了解犯罪内情”而怪罪那位女孩，甚至对她不利。杰里不只一次提及刁先生对女孩明显的轻蔑态度，也对杰里不屑，杰里因此怀疑他对欧洲人一概有此态度。杰里也转述刁的说法：刁说他只愿意从九龙区到香港区找她，再远就不追了。库洛指出，刁想让她住嘴随时都行；而她所知的内情，就杰里的证词来判断，连边都没碰到俄国金棱线，更别说弟弟纳尔森了。

简而言之，杰里表现出的心境，是外勤情报员执行任务后标准的现象：罪恶感，加上不祥的预兆，不由自主地往目标人物靠拢。这些现象如运动员参加大赛后忽然泪流满面一样在意料之中。

下一次接触时，时间是隔天，在冗长的过渡电话中，库洛为了鼓舞杰里的士气，传达了史迈利个人热情的道贺，而库洛收到圆场的贺词还是稍后的事。杰里整体而言口气稍有好转，但他担心女儿猫咪。他忘了女儿的生日，他说是明天，希望圆场能立刻寄给她一台日本的卡式音

响，再加上一堆录音带，好让她开始收集。库洛在捐给史迈利的电报中指明录音带名称，要求管理组人员采取立即行动，并要求制鞋处——即圆场伪造文书处——以杰里笔迹写好卡片附上，内文如下：“亲爱的猫咪：我请朋友帮我从伦敦寄给你。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宝贝女儿，现在、永远都爱你的老爸。”史迈利核准了礼品的购买，指示管理组人员从杰里的薪水中扣除。包裹寄出前，他亲自检查，并核准了伪造字迹的卡片。他也证实了他与库洛早就怀疑的事：根本不是猫咪的生日，离她的生日远得很。杰里只是强烈希望表达父爱，而这又是外勤人员暂时显露疲态的正常现象。史迈利发电报请库洛看紧杰里，但主导权在杰里手上，一直到第五日的晚上他才进一步接触。他坚决要求一小时内见面，库洛也答应了。见面地点在一向约定好的夜间紧急约见处，是新界一处整夜营业的路边餐饮店，佯装两人是老同事不期而遇。库洛的信上注明“限亲交史迈利”，是继上一封电报后的后续联络。上述约见后两天，信件才由表亲的快递亲手转交到圆场，因此是第七天。尽管信件封死，也有其他预防偷看的设计，库洛写信时仍假设表亲会设法偷看，因此字里行间塞满了遁词、勤务名、匿名，以下还原为本意：

威斯特贝非常生气。他要求弄清楚山姆·科林斯在香港搞什么鬼，也想知道科林斯在柯案扮演什么角色。我从没看到过他这么激动。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科林斯人在香港。他的回答是，他当晚在半山看见了科林斯——十一点十五分——坐在车子上，车子停在星辰岗附近一处平地，停在路灯下，假装看报纸。威斯特贝表示，科林斯采取的位置可清楚看见丽姬·伍辛顿位于八楼的窗户，因此威斯特贝认为他正在进行某种跟踪任务。当时徒步中的威斯特贝，坚称“差一点忍不住走向山姆，劈头问个明白”。然而沙拉特的训练约束了他，他继续往山下走，没有过街。然而他也宣称，科林斯一见到他，立刻发动引擎，全速向上开去。威斯特贝记下车牌号码，正确无误。科林斯证实了其余部分。

遵照我们在此偶发事件中同意采取的立场（你于二月十五日发的电报），我给了威斯特贝以下的答复：

一、就算那人是科林斯，圆场也无权控制他的来去。科林斯在疑云遮天时离开圆场，在“堕落”之前。他是个已知的赌徒、浪人、奸商等等，东方是他的自然栖息地。我告诉威斯特贝，若认定科林斯仍为圆场服务，或更糟的是认定他插手柯案，威斯特贝未免也太愚蠢了。

二、我对他说，科林斯的脸型很普通，五官端正，留小胡子等等，跟伦敦一般的皮条客没两样。我质疑的是，在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威斯特贝如何肯定马路对面的人是科林斯。威斯特贝反驳说，他的视力超出正常人的标准，山姆的确正在看报纸的赛马版。

三、再怎么讲，我问威斯特贝他自己当时在做什么，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在星辰岗附近闲荡。答复是，与一群合众国际社记者喝完酒，希望叫辆出租车。一听到这里，我假装勃然大怒，对他说，跟合众国际社的人喝酒狂欢后，就算五码外来了一头大象，也没有人看得到，更别说二十五码外的山姆·科林斯，在车上，在大半夜里。就此打住，我希望。

毋庸置疑，史迈利对这件事极为关切。科林斯的部署，只有四人知悉：史迈利、康妮·沙赫斯、库洛以及山姆本人。杰里竟然撞见山姆，为原本已充满变量的行动增添了焦虑。然而库洛为人圆滑，自认已消解杰里的疑心，库洛是不二人选。稍微可能的是，如果一切皆依规矩行事，库洛可能会自行调查半山当晚是否真有合众国际社设宴一事。若得知并无此事，他可能会再度质问杰里，要他解释为何出现在星辰岗一带。果真如此，杰里可能会大发一顿脾气，再编出另一套无法查证的说辞，比如说，他会推说他看上一个女人，库洛少管闲事。几场争论下来，加分减分之后，结果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嫌隙，也会造成先前那种“要不要随便你”的情况。

史迈利身负重重压力，既要持续不懈寻找纳尔森的下落，每日又必须与表亲开会，在白厅走廊上又必须打后卫战，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往往期望他本该依个人寂寞的经验推论以下经过，但这种要求不近人情：当晚杰里无心睡眠，也不需人陪伴，漫步在人行道上，不知不觉间来到丽姬住处外，徘徊不去，如同史迈利经常从事的夜间漫游，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仅抱渺茫的希望，盼能看她一眼。

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快得让史迈利无神分心关照上述小事。这不只是因为从第八天之后，圆场实质上进入了战时状态；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各处都有的寂寞人假设没人像自己一样寂寞，这算是一种可以谅解的虚荣。

14第八日

五楼上次召开会议时一片愁云惨雾，如今欢欣鼓舞的气氛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吉勒姆称之为掘穴人的蜜月期，而今晚达到最高点，抵达盛极而衰之前的顶点，日后在历史学家依事件顺序列表时，正好是杰里、丽姬与刁先生就小不点瑞卡度与苏联金陵线开诚布公后的八天。三人能见面讨论出结果，让圆场的规划人大感欣慰。吉勒姆特别哄默莉一起来。这些昼伏夜出的动物，四方奔走，新旧途径全不放过，连杂草丛生的老路也再度开出新路。如今在两位领导人带领下，他们一行十二人，以绰号俄国妈妈的康妮·沙赫斯以及绰号博士、形象朦胧的狄沙理斯为首，布尔什维克派与黄祸派，最后全挤进觐见室，以半圆形聚集在卡拉的照片下，面对主子史迈利，召开全体会议。对不习惯如此盛大场面的人而言，绝对是历史上的一刻。默莉温顺地站在吉勒姆身旁，头发向下梳直，以遮掩脖子上的吻痕。

发言以狄沙理斯为主。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毕竟纳尔森·柯完全属于他的领域，因为狄沙理斯从头到脚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魂。狄沙理斯将自己穿戴得体，潮湿的头发直竖，双膝与双脚以及习惯动不停的手指全数总算稍微静止下来，压低嗓门以几近贬抑的语调道出难以阻挡的高潮，以制造惊悚效果。这个高潮甚至有名有姓，叫做柯胜修，别名纳尔森·柯，后来改名为姚凯胜，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批斗时的姓名。

“不过在此，各位绅士，”博士尖声说，他对女性的存在有时视而不见，“我们全以纳尔森称呼他。”

博士引述官方消息来源指出，纳尔森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汕头，家境清贫，属无产阶级，不久迁居上海。在官方或非官方资料中，遍寻不着他曾就读希博特先生的主生教会学校的记载，仅提及“幼年受尽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剥削”，以宗教毒害他，令人鼻酸。日军进入上海后，纳尔森加入前往重庆的难民潮，全如希博特先生所述。博士继续说道，根据官方记载，纳尔森早年便私下研读初期的革命读物，并积极参与地下共产团体的活动，不顾蒋介石乌合之众的欺压。在难民潮中，他曾“数度企图投奔共产党，却因年纪过轻而作罢。回到上海后，学生身份的他参加遭禁的共产学生运动，是带头的干部，并接下数项特殊任务，在江南船厂内部与周边颠覆国民党坏分子的影响。就读共产大学期间，他公然宣传学生与农民联合阵线。一九五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狄沙理斯叙述到此中断，举起一手陡然舒解张力，抓住后脑勺的头发。

“主子，制造具有先见之明的学生英雄，这种虚情假意的手法很常见。”他以吟唱的方式说。

“列宁格勒呢？”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问，一面偶尔记下几笔。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

“康妮，什么事？”

康妮又坐在轮椅上。她怪罪刺骨的寒冬，也怪罪到卡拉那只蟾蜍身上。

“我们查到一个姓卜雷列夫的老兄，亲爱的。卜雷列夫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从事学术研究，列宁格勒大学造船系教职员，是老中国通，曾在上海帮莫斯科中心的中国记者代笔。革命老兵，后来被卡拉训练为征才手，专找海外学生下手，征召合适的男女学生。”

对于研究中国的掘穴人——黄祸派——而言，这份情报前所未闻，震撼人心，因此现场产生骚动，一时椅子与纸张嗦嗦响起，最后史迈利点点头，狄沙理斯才放下抓头的手，继续叙述下去。

“一九五七年回到上海，指派负责铁路工厂——”

史迈利问：“可是，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时间不是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吗？”

“没错。”狄沙理斯说。

“这样说来，好像漏掉一年。”

现在没有纸张嗦嗦声，椅子也不动了。

“官方的解释是他巡视了苏联各地造船厂一圈。”狄沙理斯说着对康妮暗笑，并以神秘、你知我知的神态扭动脖子。

“谢谢你。”史迈利说，再记下一笔。“一九五七年，”他说，“是在中国跟苏联关系恶化之前还是之后，博士？”

“之前。一九五九年双方关系才急转直下。”

史迈利这时问，记载中是否曾提到纳尔森的兄长？或者说，在纳尔森的中国，他断绝了与德雷克的手足关系，与德雷克跟他断绝关系一样？

“在最早期的官方传记之一，曾经指出过德雷克，却没提到名字。后来的记载里，提到有哥哥在一九四九年死去。”

鲜少说笑话的史迈利，这时开了一个玩笑，引发密集而如释重负的笑声。“这个案子到处都有人装死啊！”他抱怨，“要是真能在哪里找出尸体，肯定会让我松一口气。”短短几小时后，大家回想起这句话时不禁发抖。

“我们也找到一段，叙述纳尔森在列宁格勒大学是模范生，”狄沙理斯继续说，“至少在俄国眼里是模范生。他带着俄国人的最高推荐回国就业。”

轮椅上的康妮允许自己再度突然惊叫。她带了小跑前来，是那条邋遢的棕毛杂种狗。小跑蜷成一团躺在她宽大的大腿上，散发臭气，偶尔还会叹息，但就连讨厌狗的吉勒姆都没胆驱逐他。

“噢，难怪他们要把他捧得高高的，”她大喊，“俄国人当然把纳尔森的才华捧上天去，特别是卜雷列夫从列宁格勒大学提拔他，卡拉的爱将还把他偷渡到训练学校去！像纳尔森这样的聪明小地鼠，让他尝点人生甜头，回中国后有个好起点！可惜后来反而对他没好处，对不对啊，博士？“文革”时害他被斗得惨兮兮！”

在康妮高声插嘴之下，博士也提高音量宣布，关于纳尔森的没落，相关资料很少，“肯定是暴落，像康妮刚才指出的，最受俄国人器重的人，跌得也越重。”他瞥了一眼手上揉得歪七扭八的纸张，凑近长满老人斑的脸。“主子，被斗争期间的工作，我在此就不一一报告，因为反正最后也做不久。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在造船界的确经营有方，在江南船厂时如此，后来负责中国海军一大部分时亦然。”

“原来如此。”史迈利轻声说。他撇着嘴唇做笔记，仿佛不表赞同，眉毛则抬得非常高。

“由于他在江南船厂任职，因此连续在数个海军规划委员会占有一席，在通讯和策略政策领域也有点分量。到了一九六三年，他的姓名开始定期在表亲的北京观察报告里冒出。”

“干得好，卡拉。”吉勒姆轻声说。他站在史迈利身旁。仍在动笔的史迈利竟也以“对”来附和吉勒姆的感受。

“亲爱的彼得，你是惟一个！”康妮大喊，突然无法自制。“所有蟾蜍里，惟一预测到后果的人！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声音，是不是啊，小跑？‘小心黄祸啊，’小跑告诉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反咬喂他们吃饭的那只手，我敢保证。等到那天，会蹦出八亿个新敌人敲着你家后门。而且枪炮全会指错方向。请大家记住我的话。’告诉他们，”她对杂种狗的耳朵激动咆哮，“白纸黑字写下，‘新兴社会主义伙计有意偏移走向’，传到莫斯科中心委员会每个混账委员手上。趁他在西伯利亚帮斯大林伯伯牧羊时凭着聪明的小头脑一字一字拟定。‘今日以间谍行动对付朋友，朋友明日必然成为敌人。’小跑告诉他们。这是这一行最古老的格言，是卡拉最喜欢的格言。重新任职后，他差点没把这句话钉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大门上。大家都懒得多看一眼。一眼也不看。大家置之不理，亲爱的。五年之后，他的话成真，委员会也不感谢他，真是的！他屡屡料中，让他们心有不甘，对不对啊，小跑！你知道，对不对啊，亲爱的，你知道这个老太婆在啰唆什么！”说着拉着小跑的前脚抬高几英寸，让它自行落在大腿上。

众人心底认定，康妮无法忍受博士霸占聚光灯。她看见了其中逻辑，却无法忍受事实。

“很好，他被清算了，博士，”史迈利轻声说，恢复原有的平静气氛，“我们回到一九六七年，好吗？”接着再度以手托着下巴。

在阴暗中，卡拉的照片以迟钝的眼神向下看，而狄沙理斯继续叙述。“这个嘛，和我们平常听见的凄惨故事没两样，主子，”他吟唱着，有份报告指出，他被送到农村公社试炼自己。爬回上海后，他们让他从

最基层做起，替铁轨打钉之类的工作。就俄国人而言，如果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的话，”——狄沙理斯赶紧接下去，以免又被康妮打断——“他成了过去式。没门道，没影响力，没人脉。”

“他花了多久才往上爬回去？”史迈利询问，依习惯放低眼皮。

“大概三年前，他又开始恢复功用了。以长期来看，他是北京最需要的人才，有头脑，有技术专才，有经验。不过他的正式复职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初才真正展开。”

狄沙理斯描述纳尔森的复职阶段时，史迈利悄悄取来一个档案夹，参考其中几个日期，虽然他当时没解释，这些日期忽然极为重要起来。

“付款给德雷克，是开始在一九七二年中，”他喃喃地说，“一九七三年中数字才暴涨。”

“凭纳尔森懂得的门路，亲爱的，”康妮在他之后低声说，有如隐藏两侧的字幕提示机，“他知道得越多，说的就越多，说得越多，钱就越多。卡拉只付钱买好情报，即使这样，荷包也要拉警报了。”

狄沙理斯说，到了一九七三年，该告解忏悔的事物，纳尔森全做了，因此受到上海市政革命委员会的拥抱，让他负责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海军单位。六个月后呢——

“日期？”史迈利插嘴。

“一九七三年七月。”

“纳尔森正式复职的日期是？”

“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开始。”

“谢谢你。”

六个月后，狄沙理斯继续说，纳尔森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担任不明职位。

“我的老天啊。”吉勒姆柔声说，默莉·米金暗暗捏了他的手一下。

“根据表亲的一项报告，”狄沙理斯说，“和往常一样没有注明日期，不过内容经过证实。报告指出，纳尔森在国防部担任军品委员会的非正式顾问。”

叙述过程中，狄沙理斯一改以往的言行举止，极力让手脚保持静止状态，效果不错。

“就资格而言呢，主子，”他继续轻声说，“从情报行动的观点来看，我们研究中国事务的人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政府里的一份关键工作。假设中国大陆随便让我们安插一个情报员，纳尔森是上上之选。”

“原因呢？”史迈利询问，不是做笔记，就是参考眼前打开的档案夹。

“中国海军仍停留在石器时代。对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情报，我们当然

还是具有正式的兴趣，但是我们真正优先关切的，跟莫斯科关切的一样，属于策略性质和政治性质的事务。除此之外，纳尔森还能提供我们全中国船厂的机能。除此之外，他也能告诉我们中国制造潜水艇的能耐。多年来，中国潜水艇一直让表亲吓得晕头转向。也把我们吓得很惨，偶尔而已。”

“所以莫斯科作何感想，可想而知。”一名年迈的掘穴人搞错发言顺序，喃喃地说。

“据说中国正在研发自己版本的俄国G-2级潜水艇，”狄沙理斯解释，“内情没人知道太多。他们有自己的设计吗？他们能载两个或四个弹头？能不能配备海对空或海对海飞弹？预算从哪里拨出来？听说也谈过汉级潜水艇。我们有情报指出，他们在一九七一年下海一艘。从没经过证实。在大连，一九六四年，听说他们打造了一艘G级潜水艇，配备弹道飞弹，不过还没有正式目击报告。诸如此类的。”狄沙理斯不屑地说。他与圆场多数人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洁癖，不喜欢碰军方事务，而偏好研究较具艺术气息的目标。“这些主题上，如果有快狠准的细节，表亲愿意付一大笔钱。两三年后，兰利可能会在研究上花费好几亿，搞凌空侦搜、人造卫星、窃听器之类天知道的东西。花了那么多钱，弄到的答案还不一定比得上一张相片来得货真价实。所以说，如果纳尔森——”他故意拖长句子，远比斩钉截铁叙述更具效果。康妮低声说：“干得好，博士。”但持续一段时间，仍无人开口。史迈利一面做笔记、一面参考档案夹的动作，让大家有所保留。

“跟海顿一样好，”吉勒姆喃喃地说，“甚至更好。中国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是这一行最难切入的一国。”

史迈利往后坐，心中的算计显然告一段落。

“纳尔森正式复职后的几个月，瑞卡度才动身出发。”他说。

众人皆认为不适合质疑这一点。

“刁前往上海，六个礼拜后瑞卡度——”

在远远的背景里，吉勒姆依稀听见表亲电话的吼声转接至他的办公室。不知是事实或是马后炮，他事后信誓旦旦，当时一听那个电话铃声，脑海下意识浮现山姆·科林斯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孔，有如油灯飘出的精灵，而此时他也再度纳闷，怎么可能没头没脑让山姆递送那封重要信件给马铁娄。

“纳尔森的弓上还有一条线，主子，”狄沙理斯继续说，此时人人都以为他已叙述完毕，“接下来这份报告，我不太有信心，不知应不应该提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完全漏掉不提。是跟西德人交换得来的报告，日期是几个礼拜前。根据他们的消息来源，纳尔森最近是所谓北京茶会的会员，这个机构我们欠缺相关信息。据我们了解，是用来协调中国情报界各方事宜，仍处于起步阶段。他入会时先担任电子监听顾问，然后被推举为正式会员。就我们所能解释的范围，该会的功能类似我们

的程序小组。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臆测而已。对中国这一方面的事务，我们一无所知，表亲也好不到哪里去。”

史迈利总算不知如何应答，只是盯着狄沙理斯看，嘴巴张开，合上，然后取下眼镜，加以擦拭。

“纳尔森的动机呢？”他问，仍对持续吠叫的表亲电话置若罔闻，“纯属臆测吗，博士？你怎么知道？”

狄沙理斯大大地耸耸肩，油腻的头发如撞上地板的拖把。“噢，任何人都会这样猜想，”他的口气很冲，“这个年头，有谁还相信动机？要是列宁格勒大学的人主动吸收他，做法又正确，他接受吸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一点也不算不够忠贞。至少就教义而言是如此。苏联毕竟是中国的老大哥。对方只需要告诉纳尔森，他获选为特别的民兵先锋。我看不出需要用上什么大学问。”

办公室外，绿色电话自顾自地响个不停，令人侧目。马铁娄通常不会如此坚持不懈。只有吉勒姆与史迈利可以接听。可惜史迈利没有听见，狄沙理斯即席列举纳尔森为卡拉担任地鼠的可能原因时，吉勒姆也不敢退席。

“‘文革’开始后，很多处境和纳尔森相仿的人相信毛泽东发疯了。”狄沙理斯解释，他仍不愿提出理论，“甚至部分将领都这么认为。纳尔森当时受尽羞辱，外表顺从，内心也许仍满腔怒火——谁知道？说不定满腔复仇愿望。”

“开始付款给德雷克时，是在纳尔森的复职几乎还没完成的时候，”史迈利微微反对，“你作何推想，博士？”

康妮实在忍无可忍，因此再度逾矩。

“噢，乔治，你怎么会这么天真？你自己可以推想得出来，亲爱的，你当然可以！那些穷光蛋中国人，不可能把顶尖技术人员冰冻半生、不去重用啦！卡拉看出了端倪，对不对，博士？他算准了，趁机利用。他紧盯着可怜的小纳尔森，等到纳尔森开始脱离荒原，他再派手下去说：‘是我们啦，记得吗？你的朋友啦！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不会让你游街、对你吐口水！让我们东山再起吧！’换了你，你自己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玩的，你也知道！”

“钱呢？”史迈利问，“那五十万呢？”

“萝卜和棍子的伎俩！勒索加厚礼。不管选择哪一项，纳尔森都算上钩。”

尽管在康妮纵声插嘴之下，作最后结论的人却是狄沙理斯：

“他是中国人。他讲求实际。他是德雷克的弟弟。他跑不出中国——”

“是时机未到。”史迈利柔声说，再度向档案夹瞥一眼。

“——替俄国人服务，他的市价多少，他自己非常清楚。‘政治不能拿来当饭吃，也不能拿来当小姐睡。’德雷克以前喜欢这样说，所以干脆用来赚钱——”

“算准了有朝一日可以离开中国，花个痛快。”史迈利总结。在吉勒姆踮脚尖走出办公室之际，史迈利合上档案夹，拿起笔记纸。“德雷克有一次想把他弄出来，却没有成功，所以纳尔森收下俄国人的钱，等……等什么？等德雷克运气变好吧，也许。”

身后咆哮不休的绿色电话终于安静下来。

“纳尔森是卡拉的地鼠，”史迈利隔了很久才说，几乎又是说给自己听，“他探到的中国情报矿层是无价之宝。光是这一个原因，我们就肯接受。他听卡拉的命令行事。命令本身，对我们而言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知道命令是什么后，能确切揭露俄国人对中国这个大敌明白多少，甚至能判断俄国人打算如何对付中国。我们可以尽情逆向操作了。什么事，彼得？”

通报坏消息时没有所谓的起承转合。前一刻，概念仍成立，转眼间概念却已遭击碎，卧倒粉尘中，对受到影响的人而言，这世界已起了变化，无法挽回。尽管如此，吉勒姆为了制造缓冲效果，使用圆场正式表格，以书面呈现。他呈给史迈利的坏消息是以暗码书写，希望史迈利一见暗码能作好心理准备。他轻轻走向办公桌，一手拿着表格，摆在玻璃板上静观其变。

“对了，另一个飞行员查理·马歇尔。”史迈利问与会人士，仍视而不见，“表亲是不是已经追他追到天涯海角了，默莉？”

“他的说法跟瑞卡度差不多。”默莉·米金回答，一面以古怪的眼神瞟向吉勒姆；他还是站在史迈利身边，但突然看起来脸色铁青，宛如步入中年，面带病容。“史迈利先生，他跟瑞卡度一样，也帮表亲在老挝战争中飞过飞机。兰利总部设在俄克拉荷马州的秘密飞行学校里，他们俩是同一届。老挝战争一打完，表亲就甩掉他，也没有他进一步的消息。缉毒署说他运毒，不过对表亲所有的飞行员，缉毒署都有相同的指控。”

“我想请你看看这消息。”吉勒姆边说边坚定指向表格。

“马歇尔一定是威斯特贝的下一步，我们必须持续施压。”史迈利说。

史迈利终于拿起电报表格，以严肃的表情拿到阅读灯最亮的左边看，眉毛扬起，眼皮下垂。他的习惯是阅读两次。他的表情没变，但最接近他的人却说，是脸部失去了动作的能力。

“谢谢你，彼得，”他轻声说，放下表格，“也谢谢各位。康妮，博士，两位请留步。我祝各位今晚睡得安安稳稳。”

这句祝福说得令较年轻的部属欣然大笑，因为时间已过午夜。

楼上下来的女孩沉睡着，像是摆在杰里长腿旁的一只精美的棕色洋

娃娃，在雨气凝重的橙黄色香港夜空下显得丰润无瑕。她鼾声震天，杰里则凝视窗外，想着丽姬·伍辛顿。他想起她下巴上那两道爪痕，再度纳闷是谁伸出的魔爪。他想到刁先生，将他想像为掌控丽姬的人。杰里不断重复想着“赛马记者”一词，一直想到厌烦至极为止。他也知道的是，还必须再等多久，等到最后是否会有机会与她相处。他要求的只有这么多：机会。身边的女孩动了起来，却只是在臀部抓痒。隔壁传来三缺一洗牌发牌的熟悉声响。

杰里对这女孩献殷勤，起初并未获得适当的回响。之前几天，杰里写了一封又一封激情洋溢的情书，不分昼夜塞进她的信箱。碍于生活所逼，她只好屈服。表面上，她是一名生意人的财产，然而这位生意人见她的频率却越来越低，最近竟不再上门，结果她既没钱算命打麻将，也买不起时髦衣裳。原本她盘算的是，一打进功夫电影界，就大肆采购衣物。因此她屈服了，却不忘明确的财务目标。她最担心的是被人知道自己与可憎的“鬼佬”交往，有鉴于此，为了下一层楼来见杰里，她必须穿上外出的全套行头。棕色雨衣，佩戴肩章，上面饰有欧洲的黄铜扣环。塑料黄雨鞋。红玫瑰塑料雨伞。如今这套行头躺在镶木地板上，宛如战役后的盔甲，而她沉睡的姿态带有同等高尚的精疲力竭。因此当电话铃响，她惟一的反应是昏沉沉地以广东话骂一声。

杰里拿起话筒，希望是丽姬打来的，可惜不是。

“你马上给我滚过来，”陆克要求，“史大卜会爱死你的。赶快。我是为了我俩的前途着想。”

“过去哪里？”杰里问。

“楼下嘛，你这个人猿。”

他将女孩推开身旁，但女孩仍未清醒。

不期然降下的雨将马路淋得闪光粼粼，月亮周遭泛起厚厚一圈光环。陆克把车子当吉普车开，高速挡，转弯时摇变速箱。阵阵威士忌的气息飘满整车。

“有什么好瞧的，搞什么鬼嘛。”杰里质问，“怎么一回事？”

“上等好肉。闭嘴别问了。”

“我不想吃肉。我一身西装。”

“这一个，保证你想吃。老兄，这个你非吃不可。”

他们开往港口隧道。一群没打灯的单车骑士从转弯处冲进来，陆克逼不得已转进中央保留车道，以免撞上。他说，注意找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一辆警车超前，闪着所有灯光。陆克以为警车即将请他靠边停下，因此摇下车窗。

“我们是记者哪，白痴，”他尖叫，“我们是大明星咧，听见没？”

警车超车时，他们瞥见车上坐了一名华人警官，一名驾驶，后座坐

了一位相貌威严似法官的欧洲人。前方马路的右边，他们寻找的建筑工地映入眼帘，黄色桁梁与竹竿鹰架搭成鸟笼状，汗流浹背的苦力穿梭其间。起重机在湿雨中闪亮，吊在他们上方有如皮鞭。地面的大灯将光线相当浪费地洒在雨雾中。

“找一个低楼，很靠近了，”陆克命令，将车速减至六十，“白色。找一间白房子。”

杰里指出来，是两层楼复合式住宅，外面是滴着水的粉饰灰泥，不新不旧，入口有二十英尺高的竹台，也停有一辆救护车。救护车的车门没关，三名驾驶闲散地坐在上面抽烟，看着在前院巡行的警察。警察的动作犹如正在处理暴动事件。

“他让我们抢先外勤情报员一个钟头。”

“谁？”

“摇滚客。是摇滚客嘛。不然是谁？”

“为什么？”

“因为想借钱吧，我猜吧。他欣赏我。他也欣赏你。他特别叮咛要带你一起来。”

“为什么？”

雨水阵阵落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陆克气冲冲地模仿，“走快一点就是了嘛！”

竹竿搭得歪歪斜斜，比围墙还高。两名身披橙袍的教士，手敲铙钹，挡在前面。另一人撑伞。旁边有花圈，主要是万寿菊，也有灵柩。视线之外的某处传来悠悠吟唱的声音。入口厅犹如发出甲醛恶臭的丛林沼泽。

“大牛的特使。”陆克说。

“记者。”杰里说。

警察点头让他们通过，连证件也不看。

“警司在哪里？”陆克说。

甲醛的气味令人掩鼻。一名年轻警官带他们推开玻璃门，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约莫三十名老先生老太太，多数穿着连身睡衣，漠然等待，仿佛在等误点班车，头上是无影霓虹灯，一只电扇。一名老人清清喉咙，以轻蔑的态度朝绿瓷砖闷哼一声。只有墙上灰泥在掉泪。一见巨大的鬼佬，他们以礼貌的态度讶然注视。病理专家的办公室漆成黄色。黄色墙壁。黄色百叶窗合上。一台没开的冷气机。同样是绿色瓷砖，清洗容易。

“真香。”陆克说。

“有家的味道。”杰里同意。

杰里但愿这是战场。是战场的话，应付起来比较轻松。警官请他们等他先进去。他们听见担架吱吱滚动，压低的噪音，冷藏柜门开合的声响，橡皮鞋底低沉的嘶声。电话旁放了一本《格氏解剖学》。杰里翻阅其中的插图。陆克坐在椅子上。一位穿着橡皮短靴与连身服的助手端茶过来。白色茶杯，绿色边缘，香港的缩写加上皇冠。

“能不能麻烦你请警官快一点？”陆克说，“再过一分钟，全香港的人都要赶过来了。”

“为什么找我们？”杰里又问。

陆克在铺了瓷砖的地板上倒了一些茶，让茶水流进水沟，自己则拿起威士忌壶倒满茶杯。警官回来了，快速挥动纤细的手。两人跟着警官走向等候室。往回走时没有经过门，只是走廊一条，转弯后来到像是公用厕所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杰里第一眼看见的是被敲得凹凸烂透的担架。他心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破旧的医院器材更加凄凉了。墙壁长满了绿霉，绿色钟乳石从天花板垂下，一只遍体鳞伤的痰盂装满了用过的卫生纸。他记得，他们先擤擤鼻，然后才掀开床单给你看，以免吓到你。甲醛的气味让杰里泪水直流。一名华人病理专家坐在窗前，在笔记夹上写字。两名接待员徘徊不去，警察更多。这里普遍弥漫一股歉意。杰里怎么想就是想不通。摇滚客不去理会他们。他在角落喃喃对着警车后座那位面貌威严的绅士讲话，然而角落距离杰里不远，杰里依稀听见“有害我们的声誉”说了两次，语调愤慨、紧张。白床单覆盖尸体，上面有个蓝十字，两画等长。如此一来怎么盖都行，杰里心想。整个房间就这台担架，就这一条床单。其他尸体放在两只大冰柜里，木门大得可以直立走进，大如屠宰户的门。陆克不耐烦得差点发疯。

“天啊，摇滚客！”他对着房间另一边大喊，“你打算还要再拖多久？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哪。”

大家懒得理他。陆克等得不耐烦了，自行扯开床单。杰里看了一眼，移开视线。验尸室在隔壁，他听得见锯子的声音，如同犬吠。

难怪他们全都面有难色，杰里心想：把欧洲人的尸体带来这样的地方。

“老天爷啊，”陆克说着，“神圣老天啊。是谁弄的？是怎么在他身上弄出那些个淤青啊？是三合会搞的。天啊。”

淋湿的窗户外面是院子。杰里看得见竹竿在雨中摇动，也看见救护车水淋淋的阴影，又送来一名顾客，然而他不太相信有什么顾客会是这副模样。警方摄影师来了，闪光阵阵。一架电话分机挂在墙上。摇滚客正在讲电话。他仍未正眼看陆克或杰里。

“赶快把他送走。”威严绅士说。

“尽快悉听尊便。”摇滚客说。他继续打电话。“在九龙城寨公园，长

官.....是的，长官.....在巷子里，长官。被脱光了。很多酒精.....法医病理专家一眼就认出是他，长官。是的长官，银行已经来了，长官。”他挂掉电话。“是的长官，不是的长官，满满三袋，长官。”他咆哮。他拨了一个号码。

陆克正在做笔记。“天啊，”他不断以震惊的语气说，“天啊。他们一定是花了好几个礼拜才做掉他。好几个月。”

杰里认定，事实上，他们杀了他两次。一次是逼他讲话，一次是要他闭口。他们首先对他下的毒手，证据遍及全身，淤青有大有小，如火苗蹿烧地毯，烧出焦洞，然后突然熄灭。此外他脖子上有一道，造成截然不同、速度更快的死亡。他们不再需要他时，才动最后这一记毒手。

陆克朝病理专家呼唤。“把他翻过来，麻烦你。可不可以请你把他翻过来，长官？”

警司摇滚客放下电话。

“讲讲来龙去脉好吗？”杰里冲着他说，“他是谁？”

“姓弗罗斯特，”摇滚客边说边以半闭的眼睛回瞪，“负责东南亚和中国的高级主管。信托部。”

“是谁杀的？”杰里问。

“对啊，是谁干的？那才是重点。”陆克拼命写笔记。

“地鼠。”摇滚客说。

“香港没有三合会，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对吧，摇滚客？”

“也没有妓女。”摇滚客咆哮。

威严绅士替摇滚客省下了口水。

“是抢劫抢过头了，”他从摇滚客的背后探头说，“强盗横行嚣张，显示社会大众必须随时随地提高警觉。他生前是本银行的忠诚员工。”

“才不是抢劫咧，”陆克说，再看弗罗斯特一眼，“是派对一场吧。”

“他的确是结交了一些怪得很的朋友。”摇滚客说，仍盯着杰里看。

“这话什么意思？”杰里说。

“说来听听吧？”陆克说。

“他狂欢到半夜。跟着两三个男性华人一起作乐。妓院一家逛过一家。随后他就失去联络。一直到今晚。”

“银行还悬赏五万元。”威严男子说。

“港币或美金？”陆克边问边写。

威严男子说“港币”，口气非常刻薄。

“你们两个可别乱来啊，”摇滚客警告，“他有个老婆在赤柱医院住院，还有几个小孩——”

“还有银行的声誉要顾。”威严男子说。

“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这个。”陆克说。

半小时后他们离去，仍抢在前头。

“谢谢你。”陆克对警司说。

“没帮上忙。”摇滚客说。杰里注意到，他疲倦时，半闭的眼皮会漏水。

两人开车离去时杰里心想，我们已经摇动了树。哇，我们可摇得精彩了。

众人依习惯坐姿坐着，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康妮坐在轮椅上，狄沙理斯怒视由烟斗懒散地缭绕而上的烟圈。吉勒姆站在史迈利身边，马铁娄粗哑的嗓音仍萦绕耳际。史迈利用拇指以稍呈圆形的动作，用领带末端擦拭着眼镜。

耶稣会教士狄沙理斯率先开口。也许最需要撇清关系的人是他。“就逻辑上而言，我们不会被扯上这件事。弗罗斯特是江湖浪子一个。他包养华人女子。他公然贪污受贿。被我们收买时，他毫无异议。以前另外收过谁的钱，只有天知道了。我不会怪罪到自己头上。”

“噢，废话。”康妮喃喃地说。她面无表情坐着，小狗睡在大腿上。她行动不便的双手放在爱犬棕色背部上保暖。黝黑的法恩则在后面倒茶。

史迈利对着暗码电报表格说话。自从他埋首阅读起，就没人看得见他的脸。

“康妮，你帮我分析一下。”他说。

“好的，长官。”

“在这四面墙之外，有谁知道我们找上弗罗斯特？”

“库洛。威斯特贝。库洛认识的警察。要是表亲有点常识的话，他们也会猜中。”

“拉康不知，白厅也不知。”

“卡拉也不知，亲爱的。”康妮高声说，瞪了模糊不清的照片一眼。

“对。卡拉也不知。这个我相信。”从史迈利的嗓音，他们能体会到这事件的冲击力，亦可听出史迈利正以理智压抑情绪。“对卡拉来说，这种反应实在太夸张了。如果银行账户曝光了，他只需在别处另外开个户头。他不需要做这种事。”他以指尖精确地将暗码电报表格向上抬高一英寸。“我们依计划进行。反应简直是——”他又开口，“反应超出我们的预期。就情报行动而言，什么也没遗漏。就情报行动而言，我们在本案上

有所斩获。”

“我们吸引上他们了，亲爱的。”康妮坚定地说。

狄沙理斯情绪彻底失控。“我坚持的是，大家讲话的口气，不要把在场人士全当做是共犯。目前仍没有已证实过的关联，而大家居然暗示我们涉案，让我觉得是恶意中伤。”

史迈利的回应语气仍显疏离。

“要是我暗示过别的，我也觉得是恶意中伤。这项行动是由我下令进行的。如果仅仅因为后果难看而拒绝正视，我办不到。尽管让我扛下来，别让我们欺骗自己。”

“那个可怜的小子，他知道的内情不够多吧？”康妮沉思着，似乎在自言自语。起初没人注意，随后吉勒姆想：她这话什么意思？

“可以让弗罗斯特拿来背叛我们的东西根本没有，亲爱的，”她解释，“任何人能遇到的倒霉事，就属这种状况最倒霉。对他们，他又能够露什么？一个狂热记者，姓威斯特贝。这一点，他们早就知道了，各位小亲亲。所以他们当然继续逼问再逼问。”她转向史迈利。史迈利是惟一与她同享诸多过往云烟的人。“乔治，以前派部下出任务时，我们习惯的做法是什么，记得吗？我们一定给他们一些可以供出的东西，愿上帝保佑他们。”

法恩以无微不至的姿态，在史迈利办公桌上摆了一纸杯的茶水，上面浮着一片柠檬。他骷髅头似的奸笑令吉勒姆的怒火几乎按捺不住。

“放下后滚出去。”他凑着法恩的耳朵发脾气。法恩离去时，嘴上仍挂着窃笑。

“现阶段，柯到底知道些什么？”史迈利问，仍对着暗码电报表格说话。他交缠手指托住下巴，状似祈祷。

“一团乱，”康妮语带自信高声说，“英国新闻界在追，弗罗斯特死了，仍没有进展。”

“对。对，他会坐立难安。‘他有没有办法撑住水坝？他能不能堵住漏水的地方？漏水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这些是我们先前想问的问题。现在得到解答了。”他一直压低的头，这时出现极微小的动作，偏向吉勒姆。“彼得，麻烦你请表亲加强对刁先生的跟踪。只派定点盯梢人就好了，告诉他们。别上街跟踪，别惊动猎物，别乱搞无意义的小动作。电话、邮件，简简单单就好。博士，刁先生上一次去大陆，是什么时候的事？”

狄沙理斯不太情愿地说出日期。

“调查一下他走的路线，看他在什么地方买的机票。说不定他会再走一次。”

“已经记录下来了。”狄沙理斯郁郁寡欢地反驳，作出极度不悦的冷

笑，望向天空，扭动嘴唇与肩膀。

“那就劳驾你另外帮我誊写一份。”史迈利回复，自制力难以动摇。“威斯特贝……”他继续以同样平坦的语气说，一时之间吉勒姆认为史迈利恐怕起了幻觉，误以为杰里在办公室里，与其他人一样正遵从他的指示，吉勒姆不禁感到浑身不对劲。“我把他撤出来——这一点我办得到。他报社叫他回国，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呢？柯等着。他听着。他什么也没听见。结果他松懈下来。”

“然后缉毒英雄上场，”吉勒姆边说边看了日历一眼，“又给索卢·艾克朗占便宜了。”

“不然，我将他撤出来，换上另一个外勤情报员，继续追查下去。这人会比威斯特贝目前处境安全吗？”

“不可能成功的啦，”康妮喃喃地说，“临时换马。不可能啦。你也知道。又要介绍案情，又要训练，又要重新分发装备，又要重新建立人脉。不可能。”

“我可不认为他现在处境危险！”狄沙理斯断言，嗓音刺耳。

吉勒姆气愤地转身过去正要制止他，但史迈利抢话。

“怎么说，博士？”

“你的假设我不接受，不过你的假设是柯不喜欢动用暴力，他是个成功的生意人，看重的是面子、私利、功过、勤奋至上。把他说成小流氓，我可无法认同。我敢保证，他有的是手下，可能手下作业时没有他那么好心。白厅的手下不也差不多？总不至于把白厅当做一群无赖吧？”

看在老天的分上，说出来吧，吉勒姆心想。

“威斯特贝不是弗罗斯特那种人，”狄沙理斯以同样爱说教、充满鼻音的声音抱怨，“威斯特贝不是不诚实的公仆。威斯特贝从来没有背叛柯的信任，也没骗过他的钱或他弟弟。在柯的眼里，威斯特贝代表一家大报社。而据我了解，威斯特贝也向弗罗斯特和老刁表明了，报社对这件事所知的比他个人更多。柯见过世面。除掉了一个记者，并没有除掉祸根。相反的，除掉记者可能会捅出一窝黄蜂。”“不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史迈利说。

“无所适从。如康妮刚才说的。他衡量不出威胁有多大。中国人拿抽象事物没办法，碰到抽象的状况更没辙。他希望安然度过威胁，如果没有发生具体的状况，他会当做警报已解除。这种习惯，并不局限在西方。我只是扩大阐述你的假设而已。”他起身，“并没有为你的假设担保。我拒绝担保。这件事我完全撇清关系。”

他大步走出去。史迈利点头示意吉勒姆跟着出去。只有康妮留下。

史迈利闭眼，眉头在鼻梁上方纠合僵结。康妮良久不发一语。小跑如断气般趴在大腿上，她低头凝视，抚摸着狗肚子。

“要是卡拉，他才不管呢，是不是啊，亲爱的？”她喃喃地说，“死了一个弗罗斯特不管，死了十个也不管。差别就在这里，真的。超过十，我们也写不下去了，近来是不是这样啊？以前不是有谁常说：‘我们为理性人的生存奋斗’？是司地亚斯培吗？还是老总？我喜欢这句话。全包括进去了，希特勒、新纳粹。我们就是有理性。是不是啊，小跑？我们不只是英国人。 we 有理性。”她的音调稍微下降。“亲爱的，山姆呢？你考虑过了吗？”

史迈利隔了半晌才开口。总算开口时，他的语气严厉，有如希望康妮别靠近。

“他在一旁待命。在获得许可前，什么也不做。他知道。一直等上面许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气。“甚至有可能用不上他。没有他，我们可能就应付得来。全看柯怎么跳了。”

“乔治亲爱的，亲爱的乔治。”

寂静中，她拖着身子来到壁炉前，拾起火钳，费了很大力气拨动煤炭，另一只手则抓着小狗。

杰里站在厨房窗户前，看着昏黄黎明切开港口雾气。昨晚风雨很大，他回想到。绝对是在陆克打电话来之前一个小时。他躺在床垫上注意风雨动静，女孩则躺在他大腿边打鼾。首先是植物的气味，接着是风愧疚地吹动棕榈树，如干燥的两手互相摩擦。随后是嘶嘶雨声，如同数吨灼热的散弹落入海水里。最后是片状闪电以缓慢的深呼吸动摇港口，而隆隆雷声则打在舞动的屋顶上。是我杀了他，他心想。或多或少，害死他的人是我。“不只是将领，是每个拿枪的人。”是谁说的，上下文是什么？

电话铃响。随它去响吧，他心想。大概是库洛，尿湿了裤子。他拿起听筒，是陆克，语调比平常更像美国人：

“嘿，老兄！天大消息！史大卜刚刚发电报过来。限威斯特贝阅读。阅读前勿进食。想不想听？”

“不想。”

“到战区绕一圈。柬埔寨的航空公司以及围城经济。我们的人陷入枪林弹雨！你走运了，水手！他们想派你去战地给子弹射中屁股！”

还有，把丽姬留给老刁处理，他边想边挂掉。

就我所知，也把她留给科林斯那个狗杂种算了，在她背后躲躲藏藏的，活像蓄奴的白人。山姆在万象以梅伦先生的身份指挥情报员时，杰里曾有两三次依其指示行动，他是个发神秘财的贸易商，是当地欧洲坏人的老大。他认为山姆是他遇见过的情报员指挥官中最面目可憎的人之一。

他回到刚才的位置，继续在窗前想着丽姬，想着她站在令人晕眩的屋顶上。也想着老弗，想着他对生命的热爱。想着自己回到公寓时迎面

而来的气味。

到处都是。盖过了女孩的体香剂，盖过了陈年烟味，盖过了煤气，盖过了隔壁麻将人家传来的色拉油味。杰里一闻到，着实在脑海里描绘出老刁翻箱倒柜时采取的路径，想像他徘徊不去的地方，想像他如何翻找杰里的衣物、食品储藏室、仅有的家当。是玫瑰水混合杏仁的气味，是前妻喜欢的香水。

15围城

离开香港时，香港便不复存在。通过最后一位穿着英国军鞋与绑腿的华人警察，憋着气飞越灰色贫民窟屋顶上方六十英尺时，当外岛缩小遁入蓝色水雾中，你就知道布幕已经落下，布景也清理一空，香港的生活全是幻影一场。然而这一次，这种感觉无法在杰里心中油然而生。已故的弗罗斯特与未死的女孩，这两人的往事他揽在心上，飞抵曼谷时仍在他左右。与往常一样，他花了整天寻找他想要的东西；与往常一样，眼看他就要放弃。以杰里的看法，在曼谷，这种事发生在所有人身上：观光客寻找某间寺庙，记者找新闻，或是杰里寻找瑞卡度的朋友与伙计查理·马歇尔。奖品就坐在某条可恶的巷尾，卡在塞满淤泥的河道与一堆水泥废弃物之间，而且花的钱比你预期多出五美元。此外，尽管理论上现在是曼谷的旱季，杰里却记得每次外出必定下雨，从备受污染的天空毫无遮拦地狂泻而下。事后，大家都说，他碰巧遇上惟一的雨天。

他从机场开始找，因为反正已经到了机场，也因为依他推论，在东南亚，长程飞行必经曼谷。其他人说，查理已经不在。有人向他信誓旦旦，说小瑞死后，查理也辞掉飞行员的工作。也有人说他被关起来了。另有人说，他极有可能在“贼窝之一”。一名性感销魂的越南航空空姐，嗤嗤笑着说，他跳火车溜到西贡去了。她只在西贡看过他。

“从哪里去的？”杰里问。

“可能是金边吧，可能是万象吧。”她说。不过她坚称，查理的重点站一向是西贡，他从不去曼谷。杰里翻阅电话簿，查不到印支包机公司。抱着渺茫的希望，杰里也查了“马歇尔”一姓，果真找到，甚至连名字都以C开头。打了电话过去，对方却不是国民党军阀的儿子，不是以元帅的称呼当做自己姓氏的那个马歇尔，而是一个头脑迷糊的苏格兰贸易商，不停地说“请务必光临”。他到专门关老外的监狱去检索资料。外国人付不出钱或对将军不敬时，就关进这里。他在走道上走动，望向牢门里，与两三个脑筋失常的嬉皮对话。尽管他们可以滔滔不绝讲述被关的经过，却从未见过查理·马歇尔，也没听过这人，说得好听点，他们连他是谁也不屑知道。心情郁闷之下，他开车前往所谓的疗养院，是毒瘾犯勒戒中心，当时现场情绪高亢，因为有个五花大绑的病人成功用自己的手指挖出眼球，但这人不是查理·马歇尔，没有，他们没有收飞行员，没有科西嘉岛人，没有科西嘉岛人和华人的混血儿，当然也没有国民党将领的儿子。

所以杰里再从飞行员过境时可能留宿的旅馆开始找。他不喜欢这样找人，因为无聊至极，更因为他知道柯在此地有个大本营。他几乎敢肯定弗罗斯特泄露了他的天机；他知道多数富裕的华侨都能合法拥有几本护照，汕头人的护照更多；他知道柯口袋里放了一本泰国护照，也许也收了两三个泰国将领。他也知道，泰国人一不高兴，杀起人来比其他人种都来得快狠准，只不过枪毙死囚时，他们会在死囚面前撑开毛毯，对

准毛毯上的十字射击，以免触犯佛祖不杀生的戒律。有鉴于此，也有鉴于其他不少理由，杰里周游大旅馆喊着查理·马歇尔的大名时不是非常自在。

他试过了四面佛、凯悦、美丽华、东方酒店，以及其他大约三十家旅馆。在四面佛酒店时，他脚步放得特别轻，因为他记得中国海空在此处租了长期套房，库洛说柯经常光顾。他脑海想像金发飘逸的丽姬殷勤款待他，或是在泳池畔伸展修长的胴体，大亨们则在一旁啜饮威士忌，盘算着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下她的一个钟点。他开车四处探访时，暴雨突然来袭，肥大的雨珠落下，污黏恶臭，玷污了街头寺庙上的金色。出租车司机在积水道路上滑行而过，只差几英寸就撞上水牛。图案俗艳的公交车摇着铃，朝他们猛冲过来。沾有血迹的武打海报朝他们嘶吼，然而马歇尔，查理·马歇尔，马歇尔机长这个姓名，任凭杰里牺牲咖啡钱慷慨解囊，就是没人听过。他找到小姐，杰里心想。他找到了小姐，睡在她住处，换成我也会这样做。来到东方酒店，他塞钱给门房，请他代收留言，让他使用电话，最绝的是，他还弄到住宿两夜的收据，可以用来惹史大卜不高兴。然而一路与旅馆周旋下来让他感到害怕，感觉暴露行踪，有危人身安全，因此他以一夜一元的代价住进无名小巷里的低级旅店，“请先缴清住宿费”，连登记的手续也免了。这家旅店有如一排海滩茅舍，所有房门外面就是人行道，以方便“办事”，开放式车库以塑料帘幕遮住汽车牌照。当天晚上，他沦落到探访空运公司，打听印支包机这家公司，只不过他也提不起劲，而且认真怀疑是否应该相信越南航空的空姐，到西贡去找人。这时一家空运公司的华人女孩说：

“印支包机？是马歇尔机长的公司嘛。”

她向杰里指点一家书店，是查理·马歇尔每次来曼谷买书收信的地点。书店也是由华人经营，当杰里提起马歇尔时，老店主爆笑出来，说查理已经好几个月没来了。老人身材非常矮小，脸皮不笑时假牙也会暗笑。

“他欠你钱吗？查理·马歇尔欠你钱，摔了你飞机吗？”他发不出R音。他说完再度爆笑，杰里也加入。

“太棒了。很好。是这样的，他很久没来，信件你怎么处理？帮他转寄吗？”

查理·马歇尔，他才没人寄信给他咧，老人说。

“啊，可是，伙计，如果明天有信寄到，你会怎么转寄？”

寄到金边去，老人说，一面收下五元，从桌上找来一小张纸，让杰里抄下地址。

“我买本书送他好了，”杰里四下看看，“他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法文书。”老人连想也不想，带着杰里上楼，让他参观欧洲人文化的圣地。给英文读者看的，是布鲁塞尔印刷的色情刊物。给法文读者看的，是一列又一列的破旧经典：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杰里买了一

本《憨第德》，放进口袋。参观这房间的人，显然都大有来头，因为老人取来一本房客签名簿，而杰里也签了字。J.威斯特贝，新闻记者。评语栏是用来写笑话的，所以他写了“声誉极为卓著的百货商场”。接着他翻看前几页，问道：

“查理·马歇尔也签过吗，好友？”

老人指出查理·马歇尔两度签名之处，“地址，在这里。”杰里抄下。

“他的朋友呢？”

“朋友？”

“瑞卡度机长。”

老人一听，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轻轻取走签名簿。

他前往东方酒店的外籍记者俱乐部，里面只有一群刚从柬埔寨归来的日本人。他们向杰里叙述了到昨天为止的情势，杰里也喝得有点醉意。正当他即将离去时，让他一时惊恐的是，小矮人出现了，他来曼谷与本地分社开会。他身后跟着一个泰国男孩，让他显得特别敏捷轻快：“哇，威斯特贝！特务局今天情况怎样？”这个笑话，他几乎逢人必开，却无法改善杰里的心境。回到低级旅店后，他继续喝威士忌，无奈邻人费力的呼喊声令他难以成眠。最后为求自保，他到外面去，到同一条街的酒吧里找了一个女孩，柔弱纤细。不过当他又单独躺着时，他的心思再度飞回丽姬。不管她喜不喜欢，她都是杰里的床伴。她在个人清楚的范围内，究竟与他们有多深的牵连？他纳闷着。她找老刁来见杰里时，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德雷克的手下干掉弗罗斯特，她知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他们也可能干掉杰里？他甚至不禁想到，他们下毒手时，她可能在场，这个念头令他不寒而栗。无疑的是，弗罗斯特的尸体仍记忆犹新。是极为可怕的一抹记忆。

到了凌晨两点，他判断自己即将发高烧，因为他汗流不止，辗转难眠。他一度听见房间里有人放轻脚步声，于是立刻冲向角落，扯掉插在插座上的柚木台灯，抓在手上。四点，他听见令人惊异的亚洲喧嚣声而清醒过来，是如猪嚎叫的声音、钟声、老人临终的哀嚎、一千只公鸡的啼声，在那道铺有瓷砖的水泥走廊上回响。他拼命扭动破烂的水管，冷水细流而出，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洗完澡。五点，打开收音机，音量大到极限，逼得他起床，哀怨的亚洲音乐幽幽宣布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时他早已刮好胡子，仿佛今天是他大喜之日。八点，他发电报给报社，报告计划，希望圆场拦截到。十一点，他赶上飞往金边的班机。登上柬埔寨航空卡乐帆客机时，地勤女服务员将可爱的脸蛋转向他，以轻快悦耳的英语祝他“‘虑’途愉快”。

“谢谢。好。太棒了。”他说。他选择机翼上方的座位，生还率最高。飞机缓缓起飞时，他看见一群泰国胖子在紧邻跑道处修剪得无懈可击的高尔夫球场上乱打小白球。

登机前，杰里注意到旅客名单上有八个姓名，真正上机的旅客却只

有两人，另一人是身穿黑衣的美国男孩，提着公文包。其余都是货物，以黄麻布袋与灯芯草箱堆在后舱。围城班机，杰里不由自主地想到。带着货物飞进去，带着幸运的人飞出来。空姐送他一本旧的《今日法国》杂志，一颗大麦色糖果。他阅读着《今日法国》，希望温习一下法文，接着想起《憨第德》，取出阅读。他也买了康拉德的作品，因为在金边他总是阅读康拉德。康拉德笔下真正的河港所剩无几，他正坐在其中之一，一想到这里，他会心一笑。

降落之前飞机先高飞，然后环绕云朵，以小螺旋状盘旋而下，令人紧张，为的是躲开丛林射出的零星枪火。这里没有地面管制导航设备，如杰里所料。空姐并不清楚红色高棉距离市区多近，但日本人说过，在所有前线是十五公里，若没有道路，距离更短。日本人也说过，机场在射击范围之内，不过只有火箭炮，而且零星出现。没有一〇五厘米榴弹炮，还没有，不过凡事总有开头，杰里心想。飞机仍在云端，杰里对天祈祷，希望高度仪正确无误。接着橄榄色泥土跃入眼帘，杰里看见炸弹坑如鸡蛋落地般撒了满地，也看见车队的车胎滚出的黄线。飞机如羽毛般轻轻降落在坑坑洼洼的跑道时，随处可见的褐皮肤裸体儿童自得其乐地在满是泥泞的炸弹坑里玩耍。

太阳破云而出，尽管飞机声响隆隆，杰里仍产生步入宁静夏日的错觉。杰里到过很多地方，但在金边，战争是在和平的气氛中开打，与众不同。他记得上一次来这里时，是在轰炸停止之前。一群飞往东京的法国航空旅客好奇地在停机坪上漫游，浑然不知降落在战役之中。没人告诉他们就地找掩蔽物，没人跟在他们身边。F4战机与111战机在机场上方呼啸而过，周遭传出射击声，美国空军直升机放下托着死尸的网子，如同刚从红海捞起海产，怵目惊心。波音707为了起飞，不得不爬过整个机场，以慢动作接受夹道攻击。杰里出神看着波音飞机懒懒爬出地面射击范围，而途中杰里等着听见闷轰声，通知他飞机尾翼中弹。然而波音飞机勇往直前，仿佛无辜者免疫，温柔地消失在未受侵扰的地平线。

这时讽刺的是，由于尾声将近，他注意到重点摆在求生货物上。在军用机场另一端，各式各样的大型包机，有银白机身的美国运输机、707、704引擎涡轮螺旋桨C130飞机，有的注明跨界航空，有的注明大鸟航空，有的毫无名称，依序起飞降落，飞得笨拙而危险。这些飞机载着来自泰国与西贡的军火以及白米，或者泰国的石油与军火。杰里快步走向机场大厅，途中看见两架飞机降落，每次降落都让杰里屏息等待喷射引擎的后座力发威，在降落跑道地面松软的一端又扭又抖地停下来，周围是填满泥土的弹药箱叠成的堤坝。飞机尚未停妥，身穿防弹外套与钢盔的行李搬运工就开始像一排未武装士兵聚集过来，从机腹拖出宝贵的货物袋。

尽管恶兆连连，仍无法摧毁他旧地重游的喜悦。

“您打算待多久，先生？”入出境官员以法文询问。

“一直待下去。”杰里说，“你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越久越

好。”他本想当场打听查理·马歇尔，但机场警备森严，散布了各色情报人员，由于他不知道对手是谁，最好别宣扬自己的志向。机场有各式各样的老飞机漆上新标志，他却看不到印支包机的飞机。库洛在他离开香港前叮咛，印支包机的注册商标颜色，据信与柯的赛马颜色相同：灰色加上浅蓝。

他召来出租车，坐上前座，委婉拒绝了司机的好心推荐：女孩、表演、夜总会、男孩。道路两旁的凤凰木构筑成橙色隧道，在石板色的季节雨天空衬托下格外华丽。他在杂货店停下，依照“浮动汇率”换钱。他喜欢“浮动汇率”一词。兑换货币的商家以前是华人，杰里记得。这一家却是印度人。华人及早退出，印度人留下来吃残骸上的剩肉。马路两旁是简陋的房舍群。四处是难民，或坐或卧，有的在煮食，有的静静群聚打盹。有几名幼童围成圆圈坐着，轮流抽着一根香烟。

“本村人口一百万。”司机以小学课堂的法文说。

一队陆军车队朝他们开过来，亮着车头灯，坚守马路正中央。出租车司机乖乖靠边开进泥巴里。车队最后一辆是救护车，两扇门都敞开，里面堆有数具尸体，脚丫露在外面，腿有如猪脚，表面光滑，淤青处处。是生是死，几乎无关紧要。他们通过一簇被火箭炮炸毁的高脚屋，之后开进地方性的法式广场，有一间餐厅、一间杂货店、一间熟肉店，还有拜尔奎宁红酒以及可口可乐的广告。有儿童蹲在路边，看守着偷来的汽油，以一公升葡萄酒瓶装。这幅景象杰里也记得。轰炸时会发生这种事。炸弹碰上汽油，后果是血流成河。这一次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没有人学到教训，一切都没有改变，隔天清晨之前会有人收走残骸。

“停车！”杰里说。他一时兴起，递给司机那张他在曼谷书店抄下来的查理·马歇尔地址。他原本想趁夜黑风高悄悄过去，但在阳光照射下，似乎已没必要那样做。

“去这里？”司机转身问，很惊讶地看着他。

“没错，伙计。”

“你知道这房子？”司机以法文问。

“我一个好友的。”杰里以英文回答。

“你的？是你的好友？”

“记者。”杰里说。这话能解释任何不合常理的现象。

司机耸耸肩，将车子开上一条长长的大道，经过法国大教堂，转进一道泥土路，路旁是一排排庭园别墅。越往市区边缘，别墅就迅速变得邈远。杰里两度问司机，究竟那地址有何特别之处，但司机已失去兴趣，耸耸肩，不置可否。停车后，司机坚持要杰里先付钱再下车，然后气呼呼换挡高速冲去。这幢别墅与其他别墅没两样。下半部由围墙半掩，墙壁里有道铸铁大门。他按下门铃却什么也没听见。他用力推门，门却一动也不动。他听见窗户用力关上的声音，赶紧抬头看，隐约看见

纱窗内有棕色脸孔移开。随后大门吱吱响，应声开启，他往上走了几阶，来到铺了地砖的走廊，又有一道门。这一道门是以实心柚木打造，开了一个阴暗的小栅栏窗，可由内向外看，由外向内却不行。他等着，然后重重敲击门环，接着听见回音在屋内四处弹跳。这道门属于双扉门，连接处在中间。他将脸贴在门缝，看见一条狭长的地砖地板以及两阶，应该是楼梯最后的两阶。楼梯之下站了无腿毛的两条棕色腿，裸露出两条光秃秃的小腿，但向上只能看见膝盖。

“哈啰！”他大叫，眼睛仍正对门缝。“日安！哈啰！”双腿仍无动于衷。“我是查理·马歇尔的朋友！女士，先生，我是查理·马歇尔的一个英国朋友！可不可以请你转告？”他以法文说。

他取出美元五元硬币，塞进门缝，却没人上钩，因此他收回，从笔记簿撕下一张纸，在最上面写着“致马歇尔机长”，自我介绍为“英国记者，有事相商，与彼此利益有关”，然后写下旅馆地址。他又将纸条塞进门缝，再看看那对棕色腿，然而腿已经消失。他只好一直走，遇到三轮摩托车，坐上去，一直坐到找到出租车为止：不用了，谢谢，不用了，谢谢，他并不想要女孩——只不过，和往常一样的，他的确想要。

旅馆以前是“皇家”，如今改叫“高峰”。旗子在旗杆顶端飞扬，但雄伟的气势却显牵强。他签名后进入，看见活人在庭院游泳池边晒太阳，再度想起丽姬。对女孩子而言，这里是训练扎实的学校，如果丽姬帮瑞卡度夹带过小包裹，她十之八九在这里领过结业证书。最漂亮的归最有钱的，最有钱的是金边的扶轮社猪哥：走私黄金与橡胶的恶棍、警方首长、拳头大的科西嘉岛人。科西嘉岛人喜欢在战役方酣时与红色高棉订定干净利落的条约。有人留了一封信给他，信封口没封，柜台服务生自己看过后再客气地旁观杰里看信。里面是镶金边的大使馆邀请卡，邀他参加晚宴。邀请人的姓名他从未听过。一头雾水，他将邀请卡翻过去，背面以潦草字迹写着“我认识您的监护人老友乔治”，“监护人”一词点明了一切。晚宴与“你丢我捡信箱”¹⁸，他心想。这两项正是沙拉特严加批判的外交部严重脱节之处。

“电话？”杰里以法文询问。

“坏了，先生。”

“电呢？”

“也没有，先生，不过自来水倒是很多。”

“凯勒呢？”杰里露齿一笑说。

“在庭园里，先生。”

他走进庭园。如云的胴体之间坐了一群英国新闻界重量级战地记者，喝着苏格兰威士忌，互道艰辛往事，看来如同英德不列颠空战中的少年飞行员来替外国人打仗，而他们观察的眼神也带有一种集体性的轻蔑，一致不屑他的出身。一人包了方头巾，长长的直发以英勇之姿往后梳。

“天啊，是公爵大人，”他说，“你怎么来的？踩着湄公河来的吗？”

然而杰里并不想理会他们，他想找的是凯勒。凯勒是全职情报员。他是窃听专家，美国人，杰里是在别处战地跑新闻时与他结识。更确切说来，外籍记者一到此地，无不先拜凯勒的码头，而如果杰里希望取得他人信任，凯勒的大印章就有这种效力。对杰里而言，他越来越珍惜他人的信任。他在停车场找到凯勒。肩膀宽厚，一头灰发，一条袖子卷起。他站着，袖子放下的一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司机以水管冲洗奔驰车内部。

“麦克斯。太棒了。”

“好极了。”凯勒瞥了他一眼后说，然后继续看着司机。他身边站了一对细瘦的柬埔寨男孩，外表看来像时装摄影师，穿着高跟鞋、喇叭裤，相机悬在亮晶晶的衬衫之上，纽扣没扣上。杰里也驻足旁观，司机停止冲水，开始以陆军软麻布刷洗汽车内部，越搓揉越呈褐色。另有一名美国人加入，杰里猜想他是凯勒最新的助理。凯勒的助理淘汰率相当高。

“怎么了？”杰里说。司机又开始冲水。

“‘两元英雄’挡到一颗很贵的子弹，”助理说，“就这么一回事。”他是南方人，肤色苍白，态度愉快，而杰里已有心理准备自己会不喜欢他。

“是吗，凯勒？”杰里说。

“摄影。”凯勒说。

凯勒服务的新闻通讯社聘请了一群摄影记者。所有大型通讯社皆然，都是柬埔寨男孩，就像站在那边那两位一样。通讯社给他们两块钱，请他们到前线去拍照。照片见报后，一幅二十美元。杰里听说过，凯勒的摄影记者阵亡速率是每周一个。

“他弯腰闪躲逃命时，贯穿了一边肩膀，”陌生男子说，“痛得屁滚尿流。”他似乎感到大开眼界。

“他人在哪里？”杰里没话找话说，司机仍继续刷洗冲水。

“在马路那一头，快死了。是这样的，两三个礼拜前，纽约分社那些死脑筋，就是不发药品下来。我们以前常送他们去曼谷。现在不送了，老兄，现在不送了。知道吗？就在马路那一头，他们躺在地板上，为了请护士送水来，还得包红包呢。是不是啊，小朋友？”

两名柬埔寨男孩客气地微笑。

“你要什么，威斯特贝？”凯勒问。

凯勒的脸看起来灰沉又凹凸不平。杰里对他最深的印象是六十年代在刚果时，凯勒为了解救困在卡车上的小孩而灼伤一手。如今手指长在一起，犹如长了蹼的兽爪，除此之外他的外貌并无变化。那次事件杰里记忆犹新，因为抱着那小孩另一端的正是杰里。

“报社要我过来看看。”杰里说。

“还能只过来看看吗？”

杰里哈哈大笑，凯勒也笑了起来，两人去酒吧喝苏格兰威士忌，等车子洗好，聊聊往事。来到大门口他们接了一位女孩，她等了凯勒整天。这女孩是身材高挑的加州人，背了不搭调的高倍数相机，修长的双腿无法站定。由于电话不通，杰里坚持在英国大使馆下车，让他响应邀请函。凯勒不太客气。

“威斯特贝啊，最近是当间谍还是怎么了？报道偏心，为了挖到更深的内幕而拍马屁、想弄个退休金之类的东西吧？”有人说凯勒个人的志向大约如上，但谣言随人去讲。

“那当然，”杰里和颜悦色地说，“干了好几年了。”

入口处堆的沙包是新的，新的反手榴弹铁丝网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大厅贴了巨幅海报，刺眼得令人不敢恭维，这事也只有外交官才办得到。海报推销的是“英国高性能汽车”，可惜金边汽油枯竭。上面眉飞色舞地附上几幅买不到的车款的相片。

“我会转告参赞您接受了邀请。”柜台人员语气严肃。

尽管清洗过，奔驰车内部仍嗅得到热血气息，不过司机已经加强了冷气。

“他们在里面干吗，威斯特贝？”凯勒问，“打毛线之类的东西吗？”

“之外的东西。”杰里微笑着，主要是冲着加州女孩。

杰里坐在前座，凯勒与女孩在后座。

“好吧，你听着。”凯勒说。

“没问题。”杰里说。

杰里打开笔记簿，凯勒叙述时他奋笔疾书。女孩穿了短裙，杰里与司机能借后视镜瞧见大腿。凯勒完好的一手放在她膝盖上。别的不谈，她名叫萝莲，和杰里一样，正式的工作是跑跑各地战区，服务对象是美国中西部的日报集团。转眼间，路上只剩这一部车。转眼间，甚至连三轮摩托车都不见了，只剩农民、脚踏车、水牛，以及代表越来越靠近乡间的花丛。

“所有主要公路都发生激战，”凯勒以单调的口气说，速度慢到几乎适合听写，“火箭炮晚上攻击，黏土炸弹白天攻击。龙诺仍认为自己是上帝。美国大使馆原先当他靠山，后来想推翻他，忙得脸色难看。”他列举出数据、火炮名、死伤人数、美援规模。据说部分将领把美国军火转卖给红色高棉，他举出这里将领的姓名，也说出带领幽灵部队请领部队薪资的将领，以及上述两件勾当都干的将领。“是常见的烂摊子。坏人太弱，攻不下城镇；好人太逊，拿不下乡村；除了共军之外，没人想打仗。原本学生免上战场，现在禁令一解除，他们准备放火烧掉这地方，

随时可能发生粮食暴动。贪污严重得不得了，薪水族的生活过不下去，这地方气数已尽，流血等死。皇宫不真不实，大使馆是疯人院，间谍比普通人多，所有人都假装手中握有秘密。要继续吗？”

“你估计维持多久？”

“一个礼拜。十年。”

“航空公司呢？”

“这里就只剩航空公司了。湄公河等于是死了，马路也一样。航空公司在这里称霸。我们写过一篇报道。你看过吗？被编辑砍得不像样了。真是的，”他对女孩说，“我干吗再讲一遍给英国佬听？”

“继续讲。”杰里边说边写字。

“六个月前，金边有五家注册过的民航。过去三个月发了三十四份新的执照，另外还有大概十几家正在审查。行情是三百万柬币给部长个人，另外两百万分给他身边的部下。拿黄金的话打折优待，在国外付款的话，折扣更大。我们走的是第十三条路线，”他对女孩说，“你应该想看一看才对。”

“太好了。”女孩说着合上双膝，夹住凯勒健全的那只手。

他们驶过一座一手被射断的雕像，之后马路沿河流弯道前进。

“威斯特贝应付得来的话才行。”凯勒补充说明。

“噢，我应该没问题。”杰里说，女孩笑出来，稍微移动腰部。

“红色高棉在那边河岸盖了新的据点，甜心。”凯勒说明，主要是对那女孩说话。在湍急昏黄的河水对面，杰里看见两架T28，四处巡行，寻找可以轰炸的目标。那边有一场大火燃烧，烟柱直蹿上天空，如同信徒虔诚献贡。

“华人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杰里问，“在香港，没人听过这地方。”

“华人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商业活动，航空公司也包括在内。新旧都一样。柬埔寨人很懒啊，知道吗，甜心？能拿美国人的救济金，柬埔寨人就满足了。华人就不一样了。华人啊，先生，喜欢工作，喜欢钱上滚钱。华人操纵资金市场、运输独家专营、通货膨胀率、围城经济。战争变得像是香港的分公司，股份全归华人。嘿，威斯特贝，你跟我说的老婆，眼睛很可爱的那个，现在还好吧？”

“分道扬镳了。”杰里说。

“好可惜，听你说她好像很不错。他以前那个老婆很不错。”凯勒说。

“你呢？”杰里问。

凯勒摇摇头，对女孩微笑。“我能抽支烟吗，甜心？”他窝心地问。

凯勒黏合的手指间有道裂缝，可能是特别为了抽烟而钻的，裂缝周遭被尼古丁熏成棕色。凯勒将健全的一手放回女孩大腿上。马路转为小径，很深的轮痕出现在陆军车队经过之处。他们进入一道短短的树阴隧道，这时右边传来如雷的炮火声，树木如台风来袭弯腰下去。

“哇，”女孩惊叫，“能不能放慢一点？”她开始拉着相机背带。

“请便。中级炮兵，”凯勒说，“我们的。”他在说笑。女孩摇下车窗，拍了一些相片。轰炸声持续，群木乱舞，稻田里的农民却头也不抬。炮声止息后，水牛铃铛持续如回音般响着。他们继续往前开车。接近河岸处，两名儿童轮流骑一辆旧单车。河里有一大群小孩在一个车轮内胎上钻进钻出，褐色的肉体闪闪发光。女孩也拍下来。

“还会讲法文吧，威斯特贝？我和威斯特贝以前在刚果合作过。”他对女孩解释。

“我听说了。”她表示她知道。

“英国人受过教育，甜心。”凯勒解释，杰里印象中的他不是如此健谈，“他们接受栽培。是不是啊，威斯特贝？特别是贵族，对吧？威斯特贝是某种阶级的贵族。”

“没错，好友。我们就是爱卖弄。不像你们那种乡巴佬。”

“好吧，你来跟司机沟通，可以吗？路接下来怎么走，你来告诉他。他还没时间学英文。左转。”

“左转。”杰里以法文说。

司机是个男孩，却已培养出导游的无聊神态。

在镜子里，杰里注意到凯勒灼伤的一手，抽烟时会跟着颤抖。他心想，是否一向会抖？车子开过两三个村落。非常安静。他想起了丽姬，想到她下巴上的爪痕。他渴望与她做一些简单的事，如在英国乡野散步。库洛说她在郊区长大。她对马儿有遐想，令杰里感动。

“威斯特贝。”

“怎么样，伙计？”

“你的手指。一直敲一直敲。能不能停下来？听了很烦。感觉很像有心事压着。”他转向女孩。“这地方被他们轰炸了好几年，甜心，”他声音洪亮，“好几年了。”他猛吐出一阵烟。

“航空公司呢，”杰里提示，握着铅笔准备继续写字，“他们怎么做生意？”

“多数公司都向万象‘干租’，包括维修、飞行员、折旧，不过没包括油料。也许你早就知道了。最好是拥有私家飞机。那样的话不但能发战争财，大结局快到时也能赶快逃跑。找找看有没有小孩，甜心。”他一面抽烟一面告诉她，“有小孩在的地方就不会出事。小孩子一消失，大难就要临头了。表示小孩子被他们藏起来了。注意找小孩准没错。”

女孩萝莲又在把玩照相机。他们来到一处简陋的检查哨。两名卫兵在他们经过时朝车内看，但司机连速度也不放慢。他们来到岔路，司机停车。

“那条河，”凯勒命令，“叫他沿河岸开。”

杰里翻译给男孩听。男孩显得讶异，甚至作势反对，随后改变心意。

“村里的小孩，”凯勒说着，“前线的小孩。没有两样。不管在哪里，小孩子都是风向仪。红色高棉军人打仗时携家带眷，通常是这样。要是父亲死了，一家人也会一无所有，所以干脆跟着军队跑，至少还有饭吃。另外，甜心，另外还有一点，家长一死，寡妇必须当场收集证据，对吧？这是报道人性冷暖的好题材，威斯特贝，对吧？如果不收集证据，长官会否认有人阵亡，将阿兵哥的薪饷收进自己口袋。别客气，”他说，女孩正在动笔，“别以为会有报社想登。战争结束了，对吧，威斯特贝？”

“完结篇。”杰里赞同。

她会很爱笑的，他认定。假设丽姬在场，她绝对会看出好笑的一面，大笑出来。在她模仿他人的诸多动作中，他认为必然有份纯真已经失散，他决心找回。司机开到一名老妇人身边停下，以高棉语向她询问，她却双手捂脸转头过去。

“拜托，她为什么遮脸啊？”女孩生气地大喊，“我们又没有做坏事，天啊！”

“害羞。”凯勒淡淡说。

他们身后，炮兵再度进行另一次攻势，犹如有人重重摔门，让人不禁往后退。他们路过一座寺庙，进入市集广场，四处是木造房舍。身披橘红色长袍的和尚盯着他们看，照料摊位的姑娘们却视若无睹，婴儿则继续玩弄矮脚鸡。

“那个检查哨的作用是什么？”女孩边拍照边问，“是不是进入危险地带了？”

“快到了，甜心，就在前面。别问了。”

就在前方，杰里听见自动步枪发射声，有M16也有AK47。一辆吉普车从树林里冒出，朝他们急驶而来，在最后一秒紧急转弯，在地面轮痕上颠簸不定。阳光于同一时间露脸，撒下暴雨洗净的流动光线。在此之前，他们将这种日光视为理所当然。时节是三月，属于旱季；这里是柬埔寨，打仗与打板球一样，只在好天气进行。然而如今乌云密布，在树林包围下犹如冬季，木造房舍陷入黑暗。

“红色高棉穿什么衣服？”女孩以较低的音量问，“他们穿不穿军服？”

“羽毛衣加丁字裤，”凯勒大吼，“有些甚至连裤子都不穿。”他大笑

起来，杰里听出他嗓音带有紧绷的压力，瞥了一眼抽烟颤抖的手。“拜托你，甜心，他们穿得跟农夫一样嘛。就只穿那种黑色睡衣。”

“是不是一向都这么空旷？”

“不一定。”凯勒说。

“还穿胡志明凉鞋。”杰里心不在焉地补上一句。

一对绿色水鸟腾空飞越小径。射击声不比它们更响。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怎么了？”凯勒说。

“她很好，好极了。”

“叫什么名字？”

“凯瑟琳。”杰里说。

“看来我们越走越远了。”萝莲难掩失望之情。他们经过一具没手的烂尸。苍蝇群聚脸上伤口宛如一道黑色熔岩。

“他们是不是一向都这样做？”女孩好奇地问。

“做什么，甜心？”

“脱掉靴子。”

“有时候脱掉靴子，有时候尺寸不对，”凯勒又发了一顿怪脾气，“有些牛有角，有些牛没角，有些牛是马。给我闭嘴听到了没？你哪里来的？”

“圣塔芭芭拉。”女孩说。倏然间，树林到了尽头，他们绕过一处弯道，再度来到空旷地面，旁边是棕色河流。没人下令，司机却停下车，慢慢倒车进入树林。

“他想开到哪里去？”女孩问，“是谁叫他倒车的？”

“我想他在担心轮胎。”杰里在说笑。

“一天三十块，有啥好担心？”凯勒也在说笑。

他们发现了一处小战场。在他们前方，一座被摧毁的村庄坐落于河道弯曲处高地，四周连一株幸存的树木也没有。倾颓的墙壁是白色的，破裂的边缘则是黄色的。植物少得可怜，有如外国军团要塞的遗迹，也许正是外国军团的要塞。墙壁里面停放几辆褐色卡车，如同建筑工地的卡车。他们听见几声枪响，一阵轻轻骚动。有可能是游击队射击夜间班机。曳光弹闪现，一连三发炮弹落下，动摇了地面，车子也随之震动，司机静静摇下车窗，杰里也跟着做。女孩却开了车门，准备下车，先后踏出堪称经典的美腿。她拿着黑色航空旅行袋翻找，取出长镜头，扭上照相机，研究着放大的影像。

“就这样而已啊？”她语带怀疑，“不是应该也会看见敌军吗？我只看见我们的人，还有一堆脏兮兮的烟。”

“哎，他们在另一边啦，甜心。”凯勒说。

“不能过去看吗？”两名男士默默交换意见一阵子。

“这样说吧，”凯勒说，“这只是观光而已，行吗，甜心？细节谁都说
不准的，行吗？”

“我只是觉得，要是能看见敌军的话该多好。我想拍对峙的情况，麦克斯。我真的很想。我很喜欢。”他们开始步行。

有时候这么做是因为爱面子，杰里心想，有时候则是因为没有吓破胆就不算尽了本分。也有时候，一头走进去只是为了提醒自己，死里逃生只是侥幸。然而，多数时候只是因为其他人也走进去了；或者为了男子气概；或者是必须先共患难，才能够真正入伙；或为了了解自我，这是海明威的方式；或为了提高吃苦的能耐，因为战场如恋爱，欲望与日俱增。遇过机关枪射击后，单发子弹变得微不足道。碰过炸弹后，机关枪就有如小孩游戏，只因子弹的冲击让人脑袋清楚，而炸弹开花时，能让大脑穿耳而出，而且还会兴起一阵祥和感，这一点他也记得。在人生遭逢变故时，金钱、儿女、女人全付诸东流时，他内心也因顿悟而兴起祥和感，因为他了解到活下去是他惟一的责任。然而这一次，他心想，这一次的原因是再傻不过了，因为我在寻找一个吸毒吸得头脑不清醒的飞行员，而这飞行员认识以前包养丽姬·伍辛顿的男子。三人缓步前进，因为女孩身穿短裙，很难在滑溜泥泞的轮痕间行走。

“这妞真不错。”凯勒低声说。

“天生迷你裙的料子。”杰里乖乖附和。

杰里回想起在刚果那段日子，不禁尴尬，当时哥俩好互相坦承爱慕的对象以及弱点。女孩为了在泥地上维持重心，双手四处乱挥。

别乱指，杰里心想，看在老天的分上别乱指。摄影记者都是这样吃子弹的。

“继续走吧，甜心，”凯勒尖声说，“什么都别想。走就是了。想回去了吗，威斯特贝？”

三人绕过一个小男生，他正自顾自地在泥堆中玩石头。杰里在想，他是否被枪炮震聋了。他往后瞧。奔驰仍好好停在树林里。前方他隐约能辨别出瓦砾间有人压低身体采取射击姿势，比他预料的人数还多。突然噪音大作。河岸另一边，两颗炸弹在大火间爆炸。两架T28正想让火苗扩散开来。一颗流弹飞进他们下方的河岸，激起湿泥与灰尘。一名农民骑着脚踏车经过，安详自在。他骑进村子，穿越村子，再骑出来，慢慢通过废墟，骑进远方的树林。没人朝他开枪，没人盘问他。可能是敌方，也可能是我方，杰里心想。他昨晚进市区，朝戏院扔进一颗黏土炸弹，现在要重回同伙阵营。

“天啊，”女孩边笑边大叫，“我们怎么没想到骑脚踏车？”

一阵机关枪子弹扫射他们四周，一层砖块哗啦落下。他们下方的河

岸，感谢上帝恩典，有一排空荡的沙坑，是用来射击的浅坑。杰里早已看准目标。他抓住女孩，将她往下扔去。凯勒已经趴下。趴在女孩身旁的杰里，察觉出自己兴趣缺缺。在这里吃一两粒子弹，总比老弗的下场好。子弹扬起一片沙幕，在马路边哀叫。他们趴平，等待射击趋缓。女孩兴奋地看着河流对面，面对微笑。她有着蓝眼珠，头发是亚麻黄，属印欧民族。一枚炮弹落在他们身后的河岸，杰里再度将她压倒在地。炸弹波及他们上方，一切平静后，泥土如羽毛般坠落，具安抚人心的作用。抬起头后，她依旧面带微笑。杰里心想，五角大楼若想到文明两字，一定会想到你。在要塞里，战云忽然密布。卡车已消失踪影，扬起浓密的烟尘，闪光与炮声不曾歇止，轻型机关枪的枪火挑衅，以越来越快的动作加以响应。凯勒凹凸不平的脸苍白如纸，出现在沙坑之上。

“红色高棉逮住他们了，”他大喊，“在对岸，在前面，现在从另一侧过来。早知道就走另一条路！”

天啊，杰里心想。由于其余往事陆续回到心上，他也想到，凯勒曾经跟我争一个女孩子。他拼命回想是哪个女孩，最后赢得芳心的是谁。

他们等着，战火终于停息。他们走回停车处，及时来到岔路，碰上撤退中的车队。道路两旁散落着死伤，妇女俯身其间，以椰叶扇着惊慌无助的脸孔。他们再度下车。难民赶着水牛，推着手推车，彼此搀扶，一面吆喝着猪以及儿童。一名老妇对着女孩的相机尖叫，以为长镜头是枪管。有些声响，杰里分辨不出从哪里传来，如脚踏车铃铛与啜泣声，有些他辨别得出方位，如临死的呻吟以及越来越接近的阵阵炮声。凯勒追着卡车旁边奔跑，想找一位会讲英文的军官，杰里拖着高大身材在他身边大声翻译成法文。

“啊，管他的，”凯勒说，突然厌倦了，“我们回家算了。”他以英国小贵族的语气说，“又是人，又是噪音的。”他解释。他们回到奔驰车上。

一时之间，他们困在纵列里，因为军用卡车将他们推挤至路边，而难民客气地敲着车窗，要求搭便车。杰里一度以为看见寻死匈奴坐在某部军用摩托车后座。到了下一个岔路，凯勒命令司机左转。

“比较隐蔽。”他说着将健全的一手放回女孩膝盖上。杰里想到的却是躺在停尸间的弗罗斯特，想到他尖尖的下巴一片惨白。

“我老妈以前老爱告诉我，”凯勒大声以乡下腔调说，拉长尾音，“儿子啊，走丛林回家时，万万不要走同一条路啊。甜心？”

“什么事？”

“甜心，你刚失去了宝贵的第一次呢。容在下恭贺。”他的手再往上稍微移动。

四周传来众多水管爆裂、四散奔流的声音，原来是暴雨凌空而降。他们通过一处屯垦地，到处是奔逃的鸡群。一张理发店的椅子孤立雨中。杰里转向凯勒。

“围城经济这题材，”气氛又活络起来后他问，“市场力量等等的东西。你认为这样的新闻能见报吗？”

“有可能，”凯勒悠悠地说，“上过了几次。不过算是耐炒型。”

“主导的人有哪些？”

凯勒举出几个名字。

“印支包机？”

“印支包机是其中之一。”凯勒说。

杰里冒着姑且一试的心情问：“有个家伙叫做查理·马歇尔，有一半华人血统，也帮他们飞过。有人说他愿意接受采访。碰过他吗？”

“没。”

他认为点到为止即可。“他们都飞什么样的机器？”

“能到手的都行。DC4，随便一架都行。一架不够。至少需要两架，飞一架，另外一架拆开供应零件。地面留一架飞机来拆，比起收买海关放行零件还划算。”

“利润怎么算？”

“不能见报。”

“有很多鸦片吗？”

“在巴沙河，天啊，有他妈的整套提炼设备呢。像是美国禁酒时代的产物。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带你去参观。”

女孩萝莲盯着窗外的雨。

“看不见小孩子了，麦克斯，”她高声宣布，“你不是说要注意找小孩吗？我一直在找，就是不见小孩人影。”司机停下车子。“现在正在下雨，我以前念过，下雨时亚洲小孩喜欢到外面玩。结果呢，小孩哪里去了？”她说。然而杰里并没有将她解读的信息听进去。他低头望向挡风玻璃外的光景，看见司机看见的东西，顿时喉咙干燥。

“你是老大，伙计，”他轻声对凯勒说，“车子是你的，战争是你的，女孩也是你的。”

透过后视镜，杰里很痛苦地看见凯勒浮石般的脸孔，在经验与无能之间游走。

“慢慢朝他们开过去，”杰里说，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改以法文说，“慢慢开。”

“没错，”凯勒说，“慢慢开。”

距离他们前方五十码，在浓密雨线笼罩之下，有一辆灰色卡车横挡在小径上。后视镜映出另一辆卡车停靠他们车子后方，堵住退路。

“最好跟他们摊牌。”凯勒声音急促而沙哑。他以健全的一手摇下车

窗。女孩与杰里也摇下车窗。杰里将挡风玻璃的水汽擦拭干净，双手摆在仪表板上。司机握住方向盘上端。

“别对他们微笑，别跟他们讲话。”杰里命令。

“耶稣基督啊，”凯勒说，“上帝圣明啊。”

杰里心想，一谈起与红色高棉交手的经验，亚洲各地的新闻记者都有一套自己最津津乐道的故事，而多数故事属实。即使是弗罗斯特，此时此地可能要庆幸自己死得相对平静。他认识有些记者随身携带剧毒，甚至偷藏手枪，万一碰上这种情况时可以自救。要是被抓去，过了第一晚，就别想活着逃出去了，他记得。他们会先夺走你的鞋子，你的健康，以及上帝才知道的哪些部位。根据传言，第一晚是惟一的机会。他心想是否应该转述给女孩听，但他不希望伤到凯勒的自尊。他们踽踽前行，引擎呜咽转动。雨水四处飞溅，隆隆打在车顶，啪啪击中引擎盖，射进敞开的窗户。要是我们陷入泥沼，我们就完蛋了，他心想。前方的卡车仍不见移动，距离只剩不到十五码了，在滂沱大雨中像条闪闪发光的怪兽。卡车驾驶座漆黑一片，他们看见几张瘦脸监视着他们。到了最后关头，卡车往后窜入树叶中，仅留下通行的空间。奔驰车倾斜，杰里必须抓住车门梁，以免被摔到司机身上。右侧两个轮胎打滑哀叫，引擎盖摇动，几乎撞上卡车的挡泥板。

“没车牌，”凯勒吸了一口气说，“老天爷啊。”

“别急，”杰里警告司机，“放慢准没错。别开灯。”他紧盯后视镜。

“那些人就是穿黑睡衣的人啊？”女孩兴奋地说，“你连让我拍张照片也不准啊？”

没人搭腔。

“他们想干吗？他们想偷袭什么人？”她追问。

“别人，”杰里说，“不是我们。”

“跟在我们后面的混蛋，”凯勒说，“管他们是谁。”

“难道我们不应该警告后面的人？”

“没有工具。”凯勒说。

他们听见后方传来枪响，却头也不回地前进。

“该死的雨！”凯勒吸了一口气，有点自言自语的意味。“怎么搞的，突然下起雨来？”

雨势已接近尾声。

“可是，天啊，麦克斯，”女孩抗议，“他们刚才已经把我们盯得死死了，干吗不干脆解决掉我们？”

凯勒来得及回答前，司机以法文回答，轻柔而客气，只不过惟有杰里听懂。

“他们想来的时候就会来，”他边说边对着后视镜里的她微笑，“天气不好的时候。趁美国人在大使馆屋顶多加五公尺的水泥时，趁美军还披着斗篷，弯腰躲在树下时，趁记者在喝威士忌时，趁将军在抽烟时，这时候红色高棉走出丛林，割破我们的喉咙。”

“他刚说什么？”凯勒质问，“翻译啊，威斯特贝。”

“是啊，他讲了一堆，什么意思啊？”女孩说，“听起来很不错，好像是在提议什么。”

“听了不太懂，伙计。讲得像机关枪一样快。”

三人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太大声，连司机也跟着笑。

在此过程中，杰里发现，他其实脑中只有丽姬。并非为了逃避危险——正好相反。如同现在包围他们的耀眼日光，如果他幸存，丽姬就是他的奖品。

来到金边，同样的太阳热情洒落游泳池畔。市区并没有降雨，但女子学校附近飞来一颗飞弹，炸死了八九名学童。南方人助理刚从现场数完尸体后回来。

“老麦在枪林弹雨中的表现怎样？”两人在走廊碰见时他问，“我总觉得他最近情绪有点紧张。”

“少在我眼前奸笑，”杰里忠告他，“否则别怪我真的一拳打烂你的小脸蛋。”南方人走开时持续奸笑。

“我们明天可以聚一聚，”女孩对杰里说，“明天整天没事。”

在她身后，凯勒正缓缓上楼，佝偻身躯穿着单袖衬衫，拉着扶手上楼。

“你要的话，今晚要聚一聚也可以。”萝莲说。

杰里单独坐在房间里一阵子，写明信片给猫咪。然后他前往麦克斯的分社。他有几个关于查理·马歇尔的问题要问。除此之外，他认为老麦希望有人陪伴。尽完职责，他叫辆三轮摩托车，再度前往查理·马歇尔住处，然而尽管他一再捶门叫喊，只能看见同样一对赤裸的棕色腿默默站在楼梯底部，这一次借着烛光。但他从笔记簿撕下的纸条已经不见。他回到市区，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消磨，因此选择路边咖啡座，坐在一百张空椅子之间，慢慢饮用佩诺茴香酒，回想过去市区的姑娘坐着柳条小车，轻轻荡过他身边，低声以念经般的法文说出爱情的陈腔滥调。今晚，伴随暗夜颤抖的不是美景，而是偶尔传来的枪炮闷响，全市屈身静俯，等待致命的一击。

然而，最令人恐惧的不是轰炸，而是寂静。如同丛林一样，敌军逼近时产生的就是这种寂静，而非枪炮声。

外交官想开口时，首先想到的是美食，而在外交圈，碍于宵禁，用餐请早。并不是说外交官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只是全球外交官皆有一

种迷人的傲慢气质，喜欢假想自己树立了榜样——对象是谁？什么样的榜样？只有天知道了。参赞宅邸位于低平多树的圈地，隔壁正是龙诺的豪宅官邸。杰里抵达时，车道上停了一辆官方大轿车，乘客正陆续下车，旁边吉普车上民兵绷着脸监看。杰里一面下车一面思考，不是皇室就是宗教老大。然而下车的人不过是美国外交官以及夫人，前来吃顿饭而已。

“啊。你一定是威斯特贝先生了。”女主人说。

她身材高挑，一身哈洛德服饰，一听“新闻工作者”之名喜上眉梢，其实只要不是外交官，不是参赞阶级，都让她喜上眉梢。“约翰啊，一直非常想认识你呢。”她爽朗地宣布，杰里猜她是想让他感觉自在一点。他跟着人潮上楼。男主人站在楼梯尽头，体型精瘦，蓄有小胡子，驼背，略带男孩气息，让杰里不禁联想到神职人员。

“哇，太好了！真棒。你就是那个打板球的。太好了。我们认识同一批朋友，对吧？今晚可惜不能用阳台。”他以调皮的眼神瞟了美国人的角落一眼。“显然好人太稀有了，不得不靠伪装过活。找到你的位置了吗？”他以指挥官的姿态指着以真皮框起的“座位配置”表。“过来跟你介绍一些人，一分钟就好。”他稍微将杰里拉到一旁，动作非常微细。“全都要经过我同意，懂吗？我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别让他们把你逼进角落，懂吗？发生了小小的骚动，不瞒你说。是本地的小事，跟你没关系。”

这位年老的美国人由于肤色黝黑，梳理整洁，第一眼看到觉得他身材矮小，然而当他站起来与杰里握手，他几乎与杰里同高。他穿的是生丝制的苏格兰花格外套，另一只手握着无线电对讲机，以塑料黑套子装着。他的棕眼珠充满智慧却过度令人尊敬，两人握手时，杰里内心响起一声“表亲”。

“幸会幸会，威斯特贝先生。听说你是从香港来的。港府总督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贝齐，这位是威斯特贝先生，是香港总督的朋友，也是主人约翰的好朋友。”

他指着一名体型庞大的妇女，张灯结彩地挂满市集买来的手工银饰，光泽暗淡。鲜艳飘逸的服装状似亚洲组曲。

“噢，威斯特贝先生，”她说，“来自香港。哈啰。”

其余来宾是本地各行各业的贸易商，女眷是亚欧混血儿、法籍以及科西嘉岛人。小男仆敲着银锣。餐厅天花板是光秃秃的水泥，客人鱼贯而入时，杰里看到有几双眼睛向上看，以确定没看走眼。一只银色卡片夹注明他是“威斯特贝阁下”，一只银色菜单夹说明晚餐是英式烤牛肉。银色烛台插有长长的蜡烛，具有宗教意味。几名柬埔寨男孩四处奔走，以鞠躬的姿势端来今早仍有电时煮好的餐点。一位足迹遍及全球的法国美女坐在杰里右边，蕾丝手绢塞进乳沟，另一条手绢握在手上，每次吃喝完毕，必以手绢轻点小嘴。她的名牌注明着希薇雅伯爵夫人。

“我拥有很多很多学位，”她对杰里低声说，一面轻啄牛肉，轻拍嘴唇，“我念过政治学、机械以及电机。一月的时候我心脏不好，现在复原了。”

“啊，轮到我了，我可是什么专长都没有啊。”杰里强调，玩笑发挥得太过头，“样样通，样样松，就是我们这一行的写照。”将这句话翻译成法文说出，花了他不少工夫。正当他仍费力讲法文时，相当靠近此地的某处传来机关枪声，连续发射很久，有害机身。没有传出回应的枪响。对话停滞。

“大概是某个天杀的白痴对着壁虎开枪吧。”参赞说，夫人则在餐桌另一端甜甜地朝他笑着，仿佛战争是他俩为宾客准备的短剧。寂静再度降临，比先前更加深沉，意味更为深长。娇小的伯爵夫人将叉子放在盘子上，发出如夜间电车的铿当响声。

“天啊。”她以法文说。

众人不约而同开始聊天。美国人的妻子问杰里从小生长在哪里，聊过之后，她接着问他现在家住哪里，杰里回答瑟罗广场，是老佩特的住处，因为他不想谈到托斯卡尼。

“我们在佛蒙特州有块地，”她语气坚定，“只是还没盖房子而已。”

两枚火箭炮同时落地。杰里估计大约在东方半英里处。他转头看窗户是否关上，瞥见美国丈夫的棕眼珠带有神秘的迫切感，盯着他看。

“明天有计划吗，威斯特贝先生？”

“重要的倒是没有。”

“如果我们能帮得上忙，请别客气。”

“谢谢。”杰里说，但他觉得对方的问话另有用意。

一名一脸聪颖的瑞士贸易商想到好笑的事，利用杰里在场的机会讲给大家听。

“没多久以前，整个金边枪林弹雨的，闪闪发光，威斯特贝先生，”他说，“我们以为这下死定了。噢，死路一条。今晚非死不可！什么都有，有炸弹，有曳光弹，全都倒进天空中，后来听说弹药就值一百万。连续打了好几个钟头。我有些朋友还到处找朋友握手。”一队蚂蚁雄兵从桌面下出现，开始以单一纵列行军横越清洗得一尘不染的花缎桌布，小心绕过银烛台与插满芙蓉的花盆。“美国人到处用无线电联络，跳上跳下的，我们全都用心考虑自己在撤退名单上的排名，不过好笑的是，你知道吗，电话线没断，我们甚至还有电可用。结果攻击目标竟然是什么？”——大家已笑得歇斯底里——“青蛙！一堆非常贪吃的青蛙！”

“蟾蜍。”有人纠正他，却止不住笑声。

美国外交官为做出彬彬有礼而能自我批判的典范，说出以下的话作为结尾，令人莞尔。

“柬埔寨人有一种古老的迷信，威斯特贝先生。月食发生的时候，必须制造大量噪音，必须放烟火，必须敲易拉罐，最好是发射价值一百万的炮弹。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青蛙啊，会吞掉月亮。我们早该知道这一点，可惜却不知道，结果害自己老脸挂不住。”他语带骄傲。

“是啊，你是料错了，老兄。”参赞满意地说。

尽管美国外交官的微笑保持坦然开放，双眼却继续流露出更加迫切的内涵，有如两位专业人士之间的沟通讯号。

有人聊到仆人，谈到他们听天由命的态度。这时响起单一爆炸声，既响亮又似乎相当接近，因此结束了这段表演。伯爵夫人希薇雅伸出手去握杰里的手时，女主人以质询的神态朝餐桌另一边的伯爵微笑。

“约翰，亲爱的，”她以极为好客的语调说，“是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他大笑一声，“噢，越来越远，绝对是。不信问问大记者。他历经过不少战争，对不对啊，威斯特贝？”

此话一出，寂静的气氛如禁忌话题般笼罩全场。美国太太紧抱佛蒙特州那块地不放。也许啊，再怎么说明，应该在上面盖点东西才对。也许啊，再怎么说明，时候到了。

“也许我们应该写信给那个建筑师。”她说。

“也许我们的确应该写信。”她丈夫同意。这时全场陷入激战。从非常近处，机关枪爆裂声拖得很长，照亮了院子里晾的衣物，多达二十支机关枪持续没命集中发射。借着闪光，他们见到仆人匆忙走进屋内，在枪声下隐约听见下令、应答的声音，互相扯开喉咙大喊，以及铜锣乱敲的声响。在餐厅内，除了美国外交官，大家保持静止状态。美国外交官拿起对讲机凑在嘴边，拉出天线，喃喃讲了一句话，然后凑在耳边。杰里向下瞥见伯爵夫人一手安心地钉牢他的手。她的脸颊轻擦杰里肩头。火力转弱。他听见附近有小枚炸弹爆炸。没有震动，不过烛火应声倾斜，壁炉架上两张厚重的邀请卡啪的一声落下，静静躺着，是惟一可确认的伤亡人口。最后是独立的声响，是渐行渐远的单引擎飞机的呜咽声，如同儿童在远处闹别扭。参赞的轻松笑声盖过飞机，对着夫人说：

“啊，这一次恐怕不是月食喽，是不是啊，西尔斯？跟龙诺毗邻而居的好处就在这里。一定是他某个飞行员，因为薪水时有时无终于受不了，开走一架飞机对着皇宫扫射。亲爱的，你不是准备带女士们去补妆，做你们女人做的事吗？”杰里再度瞥见美国外交官的眼神，这次判定，他的眼神代表愤怒。他就像是立志济贫，却逼不得已与富人瞎耗时间。

下楼后，杰里、参赞与美国外交官静静站在一楼书房。参赞显出如狼见人般的羞怯。

“好吧，”他说，“总算把你们两人凑在一块儿了，那我就告退了。威

士忌装在带盖酒瓶，对吧，威斯特贝？”

“对，约翰。”美国人说，但参赞似乎没听见。

“要记住一点，威斯特贝，命令是下给我们的，对吧？由我们来负责。对吧？”接着以你知我知的手势摇摇手指然后离去。

书房点了蜡烛，是个具有男人味的小房间，没有镜子，没有图画，只有肋骨状的柚木天花板，以及一张金属书桌，漆黑的屋外再度一片死寂，只不过壁虎与牛蛙的叫声喧天，恐怕连最精密的窃听器都可能录不着东西。

“嘿，让我来拿。”美国人挡住杰里前往餐具橱的脚步，表演出为他调一杯正合他意的好酒。“水还是苏打，别让我倒太多了。”

“大老远把两个朋友凑在一起，好像太扯了点。”美国人说，他的音调紧张而啰唆，在餐具橱边一面倒酒一面说。

“的确。”

“约翰做人是不错，不过他有点拘泥规矩。你们的人现在在这里没有资源，不过他们拥有某些权利，所以约翰希望确定球不要从自己球场漏掉，永远追不回来。我能了解他的观点。只不过，有时候得花上一些时间。”

他从花格外套里取出一个长长的棕色信封，递给杰里，然后再以与先前同样意义深远的态度看着杰里拆信。信纸上的字似乎一抹即去，如光面相纸。

某处传来儿童啼哭声，随即止住。他心想，在车库，仆人收留大群难民，参赞则被蒙在鼓里。

缉毒署西贡报告查理·马歇尔。报告：马歇尔预计明晚七时三十分经拜林佛蒙特州抵达马德望……改装DC4卡菲尔飞机，有印支包机标志，“各样货物”……预计下一站金边。

杰里接着看了电报传送日期与时间，不禁勃然大怒。他记得昨天在曼谷奔波走访，今天则与凯勒以及那女孩心情浮躁地搭出租车，因此一声“去你的”，将电报用力摔在两人之间的桌上。

“这东西你收到多久了？不是明天，是今晚哪！”

“很不幸的，我们的主人无法提早举行婚礼。他的社交时间表排得很满。祝你好运。”

他悄悄收回电报，态度与杰里同样气愤，收进外套口袋里，转身上楼去找妻子。他妻子正忙着欣赏女主人因缺乏鉴赏力而收集到的赃物佛像。

他独自站着。一枚火箭炮落下，这一次相当靠近。蜡烛熄灭，夜空在这场若真似假、荒谬诙谐的战争中，似乎终于抵不住压力而裂开。机关枪也没头没脑地一起吵闹起来。空荡荡的小书房铺了地砖，嘎嘎动

摇，如点播机般歌唱起来。

转眼之间，声响停止，整个市区寂静一片。

“什么事不对劲，老弟？”参赞从门口真心询问，“美国佬惹你不高兴了吗？最近他们好像总想单手统治全世界。”

“我需要六个小时的选择。”杰里说。参赞不太懂。杰里解释了行动程序后，快步消失在夜色里。

“有交通工具吗，老弟？那就对，不然他们会开枪射你。小心慢走啊。”

他跨步疾行，驱动力是一肚子火与厌恶感。宵禁早已开始。没有街灯，没有星光。月亮不见了，皱橡胶的鞋底吱吱作响，如影随形，宛若不请自来的隐形同伴。马路对面的皇宫周围发出惟一的光线，却没有一丝照到杰里这边的街道。高墙挡住内部建筑物，高高的铁丝网冠在墙头，在黑夜与无声的天空衬托下，轻型地对空炮管闪现青铜色。年轻士兵聚在一起，打着盹，杰里走过他们身边时，又响起一阵锣声，是哨兵长想吵醒哨兵。路上没有车辆，但在哨兵站之间有难民沿着人行道建立起长形夜间村落。有些以长条褐色油布遮盖，有些睡在厚木板双层床上，有些则以微小的火焰煮食。他们找到的食物是什么，只有天知道了。有些紧紧围成一圈，向内面朝彼此。一辆牛车上，有个女孩与男孩躺着，年龄与他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猫咪时相仿。难民达数百人，却连丝毫声响也没发出，因此杰里走了一段距离后竟然回头确定难民是否存在。如果难民确实存在，夜色与寂静也将他们隐藏起来了。他回想晚宴。晚宴是在另一国度举行，完全属于另一个宇宙。在此地，他毫无关联，却不知不觉间接促成这场灾难。

要记住，命令是下给我们的，对吧？由我们来负责。对吧？

汗水开始流下，出于什么原因他不清楚，而夜间空气了无冷却效果。黑夜与白天同样闷热。在他前方的市区，一枚流弹毫不留心地落地，随后又来了两枚。他心想，他们一定是潜进稻田里，将距离拉近至火箭炮攻击范围之内，静静埋伏，搂着小段小段的排水管以及小炸弹，然后发射，没命狂奔进丛林。皇宫在他身后。连续炮声响起，几秒间，他能借闪光看清前方路线。马路宽敞，是一条大道，他尽可能保持在马路中间。偶尔他能分辨出横向街道，间隔规律。如果他弯腰，甚至能看见树梢撤退至颜色较淡的夜空。有辆三轮摩托车噗噗经过，转弯时神态紧张，撞上人行道，然后停下。他本想叫车，却认为继续步行比较妥当。黑暗中，有男性嗓音以怀疑的语气向他招呼，是低语，内容却不是秘密。

“晚安，先生？晚安？”

每隔一百公尺，有哨兵一至两名，双手握着卡宾枪。他们的喃喃话语传到杰里耳朵里，听似邀请，但杰里保持戒慎恐惧，双手摊开，远离口袋，让士兵看个清楚。有些哨兵看见来人是汗流浹背的欧洲巨无霸，

大笑着对他挥手，要他通过。也有哨兵持手枪对着他脑袋，命令他止步，抬头借着脚踏车灯专心打量他，一面问他问题，以练习法文。有些人向他讨香烟，他免费奉送。他解开风衣，将衬衫敞开至腰际，空气却仍无法冷却他，他不禁纳闷自己是否发烧，是否如昨晚在曼谷，会不会在床上醒来，俯卧黑暗中拿着台灯，准备击破某人的脑袋。

月亮露脸了，由似泡沫的雨云半遮掩。在月光下，他的旅社犹如上锁的城堡。他走到庭园围墙边，顺着墙壁向左走进树林，直到墙壁转弯为止。他将风衣丢上墙，吃力爬过。他走过草坪来到门阶，推开进入大厅的门，向后退了一步，发出惊呼声。大厅漆黑一团，只有一柱月光，如聚光灯般照在发光的大茧上，茧则包着棕色的蛹，是具裸身的人体。

“有何贵干，先生？”对方以法文轻声问。

原来是守夜人睡在吊床上，挂着蚊帐。

守夜的男孩递给他一把钥匙与一张纸条，静静收下小费。杰里借打火机的光阅读字条。“亲爱的，我在二十八号房间，好寂寞。过来陪我。L。”

搞什么鬼？他心想。也许能因此再拼凑出线索来。他登上二楼，忘记了她可憎的陈腐平淡，只想着她的长腿，想着她在河岸小心踩着轮痕时扭臀的模样，想着她如矢车菊般紫蓝色的眼珠，想着她卧在沙坑时那份寻常的纯种美国人重力，只想着自己对人性温情的渴望。凯勒管他去死，他心想。拥抱某个人才算是活着。或许她也很害怕。他敲门，等待，然后推一下。

“萝莲？是我。威斯特贝。”

仍无动静。他走向床边，注意到遍闻不着女性气味，甚至连粉扑或体香剂的气味也没有。走向床铺时，他借月光看见熟悉得令人惧怕的景象，蓝色牛仔裤，厚重的两色靴，以及一台奥里维提手提式打字机，与他自己的不无相似之处。

“再靠近一步就告你强奸少女。”陆克边说边扭开床边桌上酒瓶的软木塞。

16查理·马歇尔之友

他在天明之前起床。在陆克的地板上睡了一晚。他取出打字机与肩袋，只不过两者他都用不上。他留下纸条请凯勒发电报给史大卜，报告他即将到偏远地区报道围城的新闻。睡地板让他背痛，那瓶酒让他头痛。

陆克说，他来这里采访战地新闻，是因为分社希望他暂时对大牛歇手。此外，他那位脾气暴躁的房东积克·赵终于将他赶出公寓。

“我走投无路了，威斯特贝！”他哭叫着，然后开始在房内四处哀嚎着“走投无路了”，最后杰里为了替自己争取一点睡眠机会，也为了阻止邻居敲门声，将备用钥匙从钥匙圈取出，朝他扔过去。

“我回来的话，”他警告，“你就得搬走，懂了吗？”

杰里问他弗罗斯特案情发展情况。陆克已忘得精光，杰里不得不提示。啊，他呀，陆克说。他呀，对啊，是有一些报道，说他耍过三合会，也许再过一百年那些报道说不定全会成真，不过现在有谁管那么多？

可惜就算当晚，他仍难以成眠。两人讨论过今天的行程。陆克提议，不管杰里做什么，他也要跟着做。他强调，孤零零死去太无聊了。最好是一起买醉寻欢。杰里的回应是，想等两人一起步入夕阳余晖走上尽头，陆克可要再等一阵子，因为他今天想打探消息，而且想单独行动。

“打探什么鬼消息嘛。有新闻要同享。是谁免费给你弗罗斯特消息的？没有小陆在场，哪来的好事？”

杰里很不客气地对他说，几乎到处都找得到。隔天早上他设法在不吵醒陆克的情况下离开。

他首先往市集走，喝了一碗中国汤，研究着摊贩与店面。他选中一名印度年轻人，卖的不外乎塑料桶、水瓶与扫把，收益却似乎非常可观。

“你另外还卖什么，伙计？”

“先生，对所有绅士，我什么都卖。”

两人玩起猜谜语。不对，杰里说，他想买的不是用抽的，也不是用吞的，也不是用鼻子嗅的，也不是打在手腕上的。至于众多美貌的姐妹、亲戚、少年，他也兴趣缺缺。杰里在这方面的需求已经满足了。

“这么说来，真好，先生，你是个非常快乐的男人。”

“我其实是想买东西送朋友。”杰里说。

印度男孩以尖锐的眼光前后扫描街道，不再玩猜谜语。

“是友善的朋友吗，先生？”

“不十分友善。”

两人共乘一辆三轮摩托车。印度男孩有个伯伯在银市卖佛像。他的店后面有个房间，上了门栓也上了锁。杰里花了三十美元买下一把精致的棕色华瑟冲锋手枪，可装二十轮弹药。他回到三轮摩托车时想到沙拉特的老大，一定会因此气得重度昏厥。首先，他们认为“不当配备”是罪上加罪。第二，他们倡导小枪制造的麻烦多过于好处，这根本是胡说八道。然而，如果杰里将他在香港的卫卜利手枪偷渡到曼谷，再转来金边，他们得知后必定更加暴跳如雷，因此杰里认为，他们应该庆幸才对，因为不管他们本周中心目的是什么，他都不想不带枪行动。来到机场，没有飞机前往马德望，但这里的飞机其实哪里也不飞。跑道上呼啸起降的飞机是全身银色的稻米喷射机，昨晚火箭炮刚炸出坑洞，因此正在兴建新的堤坝。杰里看着卡车运来一车车泥土，苦力忙着填满火药箱。他决定的是，如果不干这一行，我要改做沙土生意，专门卖给围城。

来到候机楼，杰里发现一群空中小姐喝咖啡谈笑，他摆出潇洒的姿态加入。一位高挑的女孩会讲英文，显出怀疑的脸色，拿着他的护照与五元后离去。

“不可能的啦，”她们全以法文向他保证，一面等着长腿空姐回来，“座位全满了。”

长腿空姐面带微笑回来。“机长的疑心非常重，”她以英文说，“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不载你。不过我给他看你的相片，他同意超载。按照规定他只能载三十一人，不过他答应载你，他不管，他重义气，只要你给他一千五百柬币的话。”

飞机有三分之二是空位，露水从机翼上的弹孔滴落，犹如未经包扎的伤口。

在当时，马德望在这个龙诺政权日渐缩水的半岛上是最安全的市镇，是金边最后一座农场。他们在公认红色高棉肆虐的领域上空吃力回旋了一小时，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飞机绕圈时，有人从稻田懒懒地发射子弹，机长象征性转了两个弯躲子弹，但杰里比较关心的是在飞机降落前记住地形地貌：停机湾；哪些跑道供民航，哪些供军机起降；以铁丝网封起的围地，里面有货仓。飞机降落在富裕田园的氛围里。枪炮掩体四周开了花朵，胖胖的棕色鸡在炸弹炸出的坑洞里疾行，水电不虞匮乏，只不过电报发至金边需一星期。

杰里此时小心翼翼走着。他寻找掩护的本能变得敏锐无比。“杰里·威斯特贝阁下，杰出记者，报道围城经济。”伙计，如果你个头跟我一样高大，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提出好得不得了的理由。因此他放低身段。来到询问柜台，在数名沉默男子的监视下，他询问了本地最高级旅馆的名称，写下两三个，同时继续研究飞机与建筑物的配置。他从一间办事处绕到另一间办事处，询问如何空运新闻稿件到金边，大家却丝毫

没有概念。他持续进行秘密侦查，拿着报社电报卡到处询问总督皇宫怎么走，暗示着他与大人物有事相商。自古到今，他是来到马德望的记者中最显眼的一位。这时他记下注明“工作人员”与注明“闲人勿进”的门，也记下男士洗手间，以便闯关成功后能描绘整个中央大厅的草图，重点放在通往机场铁丝网封锁区的出口。最后，他询问目前有哪些飞行员在马德望。他表示，他认识几名飞行员，因此万一逼不得已，最简单的计划是请飞行员帮他带新闻稿件到金边。一位空姐拿出名单，朗诵出姓名，这时杰里轻手将名单翻过来，其他姓名尽收眼里。印支包机的班机列名其中，但没有附上飞行员姓名。

“安崔亚斯机长还帮印支包机开飞机吗？”他询问。

“哪位机长，先生？”

“安崔亚斯。我们以前都叫他安崔。矮矮的，喜欢戴墨镜。专门飞磅湛。”

她摇摇头，说只有马歇尔机长和瑞卡度机长飞印支包机，不过小瑞机长已在坠机后被烧死。杰里假装不感兴趣，反而随口问到马歇尔机长的卡菲尔是否预计下午起飞，他的根据是昨晚的电报。然而已经没有空位供货机起降，已预订一空，印支包机总是满当当。

“知不知道上哪里才找得到他？”

“马歇尔机长从不飞上午，先生。”

他搭出租车进市区。最高级的旅馆是主要道路上一处跳蚤猖獗的棚舍。马路本身狭窄，令人掩鼻，震耳欲聋，是蓬勃发展中的亚洲新兴市镇，灌满了本田汽车的噪音，挤满了一肚子怨气的暴发户奔驰车。为了保持伪装身份，他开了房间，预付住宿费，包括“特殊服务”费。所谓特殊服务，其实只是将床单清洗干净，而不是直接睡在前人躯体轮廓尚存的床单上。他请司机一小时后回来。碍于习惯，他忍不住要了一张灌水收据。他冲了澡，换了衣服，客气地倾听小男仆解释，过了宵禁时间应从哪里爬进来。之后他到外面吃早餐，因为当时才上午九点。

他提着打字机与肩袋。他没看见欧洲人。他看见制篮工，卖皮摊贩，水果摊贩，也再度发现随处可见偷来的汽油装在瓶子里，摆在人行道上，等待炮弹触发。树上挂了一面镜子，杰里看着牙医帮病人拔牙，病人被绑在高椅上，而尖端红色的牙齿则慎重加入展示今日战果的行列。这一切，杰里装模作样记录在笔记簿上，以符合狂热报道社会现状的记者形象。坐在路边咖啡店享用冰啤酒与鲜鱼时，他看着马路对面注明“印支包机”的办公室，既寒酸又呆滞。杰里等人前来开门。苦等无人。“马歇尔机长从不飞上午，先生。”来到专卖儿童脚踏车的杂货店，他购买一卷橡皮胶带，回到房间，将华瑟枪贴在肋骨上，以免挂在皮带上荡来荡去。着装完毕后，胆大无畏的记者准备继续秉持伪装身份行动。在外勤情报员的心态上，在情势越来越紧张时，伪装身份有时只不过是自我合理化的举动，多此一举。

总督府位于市区边缘，前方有阳台与法国殖民地式大门，助理七十余人。宽广的水泥廊厅通往一间从未完工的等候室，也通往后面小得多的办公室。经过五十分钟的等待，杰里终于获准进入其中一间，接见他的柬埔寨人身形迷你，身穿黑西装，阶级极高，是从金边派来处理多嘴的特派记者。有人说，他父亲是将领，他负责马德望一带的家族鸦片生意。他的办公桌很大，大得不相称。在场几人懒散地或坐或站，表情非常严肃。其中一人穿着制服，挂了不少勋章彩条。杰里深度探访背景，写下了一串迷人美梦：共军即将败阵；目前正认真考虑是否重开全国道路系统；观光业是本省的带头成长的产业。将军之子说话温吞，一口法文讲得漂亮，显然自己听得也很舒服，因为他眼睛半闭，说话时面带微笑，仿佛正在欣赏动人的音乐。

“先生，容我最后警告贵国。你是美国人吗？”

“英国人。”

“一样。告诉贵国政府，先生，如果不帮我们继续对抗共产党，我们会改向俄国求助，请他们接替贵国的角色，协助我们抗战。”

噢，老母，杰里心想。哇塞。老天爷啊。

“我会代为传达的。”他承诺，作势离去。

“请留步，先生。”高级官员尖声说，半打瞌睡的朝臣起了一阵骚动。他打开抽屉，抽出一个慑人的档案夹。弗罗斯特的遗嘱，杰里心想。我的赐死令。给猫咪收集的邮票。

“你是作家？”

“对。”

柯对我伸出手。今晚动笔，明天醒来时我喉咙多了一道。

“你念过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先生？”官员询问。

“牛津。”

“伦敦的牛津？”

“对。”

“这么说来你念过法国大诗人的作品喽，先生？”

“兴味盎然。”杰里热情回答。朝臣脸色极为凝重。

“这样的话，请先生为以下这段诗贵赐高见。”迷你官员以高贵的法文开始朗诵，并以手掌缓缓指挥。

爱侣成双，端坐地表，

凝望大海。

他开始朗诵，接着又念了大约二十句令人如坐针毡的诗句，杰里听了一头雾水。

“怎样，”官员最后说，将档案夹放在一旁，“意下如何？”他询问，炯炯目光对准办公室内不明之处。

“太棒了！”杰里热忱如泉涌。“精彩。感觉敏锐。”

“你认为谁写的？”

杰里随便找来一个名字。“拉马丁？”

高官摇摇头。朝臣将杰里盯得更紧了。

“雨果？”杰里再猜。

“我写的啦。”官员叹了一口气，将自己的诗放回抽屉。朝臣放松心情。“好好关照这位文人。”他命令。

杰里回到机场时，发现情况一片混乱，极为危险。奔驰车在降落跑道来回奔驰，仿佛有人入侵巢穴，前院则是灯光大作，到处是摩托车与警报声。廊厅围起封锁线，他以争论的方式通关，里面挤满了一脸惊恐的民众，争先恐后看着公告栏，彼此呼喊，同时听着震天响的扩音器。他努力推开人群走到柜台，发现已经关闭。他跳上柜台，透过防炸板的小洞看到机场。一班武装士兵正在空荡荡的跑道上，往一群白旗杆小跑而去，国旗因无风而下垂。士兵将两面旗子降至一半，廊厅里的扩音器中断，播放几音节的国歌。在热腾纷扰的当口，杰里寻找可以交谈的对象。他选上了一位高瘦的传教士。传教士的黄发剃成小平头，戴眼镜，褐色上衣口袋别了一个六英寸银色十字架。两位围上教士项圈的柬埔寨人站在他身边，神情悲苦。

“您会说法文吗？”

“会，我也会说英文！”

口音轻快地纠正他。杰里猜他是丹麦人。

“我是记者。这里出了什么事？”他将嗓门拉到最大。

“金边机场关闭了，”传教士大声回应，“飞机一律不准起降。”

“为什么？”

“红色高棉击中了飞机场的军火库。至少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开放。”

扩音器又开始吱喳起来。两名柬埔寨教士聆听着。传教士几乎折腰才能听见他们喃喃翻译的声音。

“灾情惨重，已经炸掉六七架飞机了。噢，对了！他们机场完全瘫痪。当局政府怀疑遭到暗算。也许抓了几个人进监狱。说也奇怪，怎么会把军火库设在机场呢？太危险了吧。到底是什么原因？”

“问得好。”杰里赞同。

他如犁田般在廊厅吃力前进。A计划已胎死腹中。他的A计划通常会难产。“限工作人员”的门由一对非常严肃的保镖看守，碍于情势紧张，

他不愿厚脸皮贸然闯关。群众朝旅客出口处推挤而去，饱受侵扰的地勤人员拒收登机证，饱受侵扰的警方则受到通行证轰炸。通行证的设计用意是预防他们骚扰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任凭人群推挤他前进。来到边缘处，一组法国贸易商嚷着要求退票，老年人则准备就地过夜。然而人群中心则相互推挤，四处张望，传播最新谣言，人潮动力以稳定的速度将他推到前方。到了前方，杰里偷偷取出报社电报卡，翻越临时路障。高阶警官满头油光，好整以暇看着杰里，眼神轻蔑，下属则努力对付群众。杰里直接大步走过去，肩袋在手上晃来晃去，将报社电报卡推向他鼻下。

“美国安全人员。”他以难听的法文吼叫，接着朝旋转门边的两人咆哮，一路闯进停机坪，继续往前挺进，不断料想着背后有人命令他止步或对空鸣枪，或在开枪作乐的气氛下连鸣枪示警也省略，直接送上一枪。他怒气冲冲地走着，带有粗暴的权威，晃着肩袋，以沙拉特的作风来分散注意力。在他前面，六十码，迅速减为五十码之处，停了一排单引擎空军教练机，没有标志。更远处是圈地，以及货物仓库，号码从九到十八。在仓库更远处杰里看见一簇飞机棚与停机湾，以中文外几乎各种语言标明“禁止进入”。杰里来到教练机前，以傲慢的大步走过，仿佛正在进行督察。教练机以牵着铁丝的砖块固定。他稍停脚步，却没有完全站住，不耐烦地以羊皮靴踢踢砖头，拉拉副翼，摇摇头。在他左边的沙包掩体里，一组地对空射击人员无精打采地看着他。

“你干吗？”他们以法文问。

杰里半转身，以双手围成喇叭说：“帮老天爷看天空啊。”他以标准美语说，生气地指向上天，继续向前走，最后来到高高的圈地。圈地敞开，仓库则在他前方，通过后，机场与塔台都将看不见他。他走在破碎的水泥地上，裂缝长出茅草。视线所及处不见人影。仓库以挡雨板搭建，三十英尺长，十英尺高，以棕榈叶罩顶。窗上的木板注明“无雷管炸弹碎片存放处”。另一侧，有一条被踏烂的泥土路通往停机棚。杰里从裂缝中看到停放的货机，色彩有如鹦鹉。

“给我逮着了吧。”杰里大声自言自语，进入仓库另一侧安全地带。这时，如同寂寞行军数月后首度见到敌军，前方清清楚楚摆了一架破烂的蓝灰色DC4卡菲尔，肥如青蛙，蹲在破碎的停机坪上，机鼻打开。柴油从右引擎如黑雨般迅速滴落，一名瘦长如纺锥的华人戴着满是军方标志的航海帽，站在装货区下抽烟，清点货物。两名苦力来回忙着搬布袋，另一名则以古老的起重机运送。他脚边有群鸡猛刨地。在机身上，德雷克·柯赛马招牌的颜色褪色，上面以火红漆上印支包机，前三个字母与后两个字母因进行整修而不见。

“噢，查理啊，他有金刚不坏之身，完完全全百战不死！查理·马歇尔啊，刁先生，他呀，很厉害哟，有一半华人血统，皮包骨，爱抽鸦片，飞行技术一把罩……”

杰里打了个寒战，心想，他最好是金刚不坏之身。苦力将货物一袋

袋扛进机鼻，进入破损的机腹。

“阁下，瑞卡度老大的终生好友，”库洛说过，为丽姬的描述补充，“那位好小姐敬告过我们，他一半是潮州人，也参加过数场徒劳无功的战事，是光荣的老将。”

杰里维持站姿，不多加隐藏自己，拳握肩袋晃动，面带英国人那种不起作用的歉意微笑。苦力现在似乎从数处朝飞机集中，全数远大于二。杰里转身背对他们，重复巡行仓库的动作，姿态如他刚才巡行经过教练机，或是前往弗罗斯特办公室的走廊上，窥视挡雨板的隙缝，却只见几只破纸箱。“想在马德望营运，权利金就要花上五十万美金。”凯勒说过。以这种价格，哪来重新装潢的钱？仓库打开，他看见四辆军用卡车满载蔬菜水果，以及没有标志的黄麻布袋。军卡的后挡板朝向飞机，漆上炮兵标志。每辆卡车上站了两名士兵，将黄麻布袋下传给苦力。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将卡车开到停机坪，但此地弥漫谨慎行事的气氛。“陆军喜欢参一脚，”凯勒说过，“海军派船队沿湄公河直下，一次可赚好几百万。空军喜欢漂漂亮亮的，派轰炸机载水果，派直升机空运有钱的华人，而不是去受到攻击的城镇空运伤员。开战斗机的男孩就吃不到了，因为他们哪里降落就要在哪里起飞。不过陆军真的必须到处挣点外快求生。”

杰里比较靠近了飞机，能听见查理·马歇尔对苦力吆喝。

他又走到有仓库的地方。第十八号有双扉门，印支包机的大名以绿漆涂在木造部分，由上而下，如此一来从任何距离看来都类似中文字体。在阴暗的内部，一对华人男女乡下人蹲在泥土地板上。一头被绑起来的猪趴在地上，头靠在老人穿着拖鞋的脚上。两人另外拥有一个长型的灯芯草包裹，以细绳一丝不苟地包扎。有可能是尸首。一个水瓶放在角落，旁边摆了两只饭碗。仓库里别无他物。“欢迎光临印支包机转机休息室。”杰里心想。汗水流下肋骨，他随着苦力行列前进，直到与查理·马歇尔并肩而立。查理·马歇尔以高棉语扯开嗓门吆喝，一面摇着笔清点货物。

他穿了一件油腻的白色短袖衬衫，肩章上的金杠多到能让他在任何空军当上正式将军。两个美国战斗缝章缝在正面，旁边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勋章彩带与共产党的红星。一块缝章写着“为耶稣杀共产党”，另一块缝章写的则是“耶稣的内心是资本主义者”。他面朝下，脸孔在巨大的航海帽阴影中。帽子随时可下滑盖住耳朵。杰里等他抬头。苦力已经嚷着要杰里走开，但查理·马歇尔继续顽固地面朝下，一面在清单上写字，愤怒地吆喝回去。

“马歇尔机长，我是伦敦一家报社的记者，想写篇有关瑞卡度的报道，”杰里轻声说，“我希望能搭你的飞机到金边，顺便跟你请教几个问题。”

他边说边轻轻将那本《憨第德》摆在货物上，三张百元钞票呈扇形夹在书里，偷偷露出。沙拉特派的伪装大师说，声东方能击西。

“听说你喜欢伏尔泰。”他说。

“我谁都不喜欢。”查理·马歇尔对着货物以沙哑的假音反驳，帽子再往下滑，盖住更多脸。“我痛恨全人类，听懂了没？”他的辱骂语句尽管带有华人的下降调，无疑是法裔美国人的口音。“拜托老天爷，我痛恨人类的程度之深，如果人类不赶快自动爆炸成碎片，我可要买一堆炸弹亲手引爆了！”

他的听众走了。在查理·马歇尔的论点阐述完毕前，杰里已登上钢梯一半。

“伏尔泰懂个屁！”他对下一个苦力大骂。“他打错战争了，听懂没？放到那边去啦，你这个又懒又蠢的东西，再去抓一把！笨蛋！”

尽管如此，他仍将伏尔泰放进松垮长裤的后口袋。

飞机内部漆黑宽敞凉爽，犹如大教堂。座椅已拆除，有如建筑模型的穿孔架子装在墙上。猪与珠鸡的死尸从舱顶垂下。其他货物都堆在进出通路，从机尾开始堆起，让杰里对起飞怀有不祥预感。货物不外乎杰里刚才看见军卡上的蔬果与黄麻布袋，标出“谷物”、“稻米”、“面粉”，字体大到连最不识字的缉毒干员也看得懂。然而黏稠的酵母与蜜糖气味充满货舱，不需要标示。有些布袋围成圆圈，围出供其他乘客乘坐的区域。这些乘客以两名面貌庄严的华人为首，穿着寒酸的灰布衣。从两人类似的外貌、静肃而高人一等的姿态来判断，杰里立刻推论出两者必定具有某种专业知识。他记得，以前偶尔会帮忙带炸药专家以及钢琴师脱离危险地带，对方毫无感激之情。在他们身边坐了三名山民，稍微保持距离以示尊重，全副武装，抽着香烟，端着饭碗扒饭。杰里猜想可能是北边国境的苗人或掸族人。查理·马歇尔的父亲就是在当地拥兵自重。从他们怡然自在的神态判断，可能属于常驻的帮手。另一人的层级则完全不同，是炮兵上校，设想周到，供应运输与护送士兵，随行人员是海关高官，少了这人，凡事都难办成。他们坐在通道上特别提供的椅子上，以雍容的姿态向后靠，骄傲地看着持续进行的搬运，穿的是这种典礼中最佳的制服。

此行另有一人，独自躲在机尾的箱子顶端，头几乎碰到舱顶，完全无法辨别面貌细节。他自己喝着一瓶威士忌，甚至自己有个酒杯。他戴着卡斯特罗帽，蓄有大胡子。深色手臂上几条金色袖口链扣闪闪发亮，当时大家称之为CIA手链（只有戴这种炼链的人不知道），因为众人乐观的臆测是，如果有人陷入敌境，可以一次送一节，直至脱困为止。他的双眼靠在AK47自动步枪油光闪闪的枪管旁，盯着杰里不动，却晶亮异常。“他从机鼻监视我，”杰里心想，“我一离开仓库，就被他盯上了。”

两名华人是厨师，他忽然灵光一闪。化学师在黑道的绰号就是厨师。凯勒说过：“鸦片航空”经常载运原料至金边提炼，但苦口婆心就是劝不动厨师前来围城效命。

“嘿，你过来！伏尔泰！”

杰里连忙向前走到机舱前端。他向下看，看见老农夫妇站在梯子最下面，查理·马歇尔则从他们手上抢来那条猪，一面推着老妇人走上钢梯。

“她爬到上面后，你伸手抓住她，听懂了没？”他呼喊，双手抱住猪。“要是她摔下来跌破屁股的话，跟那些蠢蛋有理也讲不清了。你是什么缉毒英雄吗，伏尔泰？”

“不是。”

“好吧，那你就紧紧抓牢，听懂了没？”

她开始向上爬，上了几阶，她开始哀嚎，查理·马歇尔则设法一手夹着猪，另一手一巴掌响亮地打在她臀部，以中文对她破口大骂。丈夫匆忙跟在她身后，杰里则将两人安然拉上来。最后是查理·马歇尔如小丑的头部探入机鼻。虽然脸部大半被帽子遮住，杰里仍首度看清帽下面貌：棕色皮肤，骨瘦如柴，半垂的华人眼皮，一张法国人的大嘴，吆喝时朝四面扭曲变形。他将猪推过去，杰里抓住，猪又叫又蠕动，他送还给老农夫妇。随后查理将一身无肉的躯干拉上飞机，如同蜘蛛爬出水沟一般。他一上来，海关官员与炮兵上校立刻起立，拍拍屁股，迅速走向阴影中头戴卡斯特罗帽的男子。男子仍跨坐在纸箱上。来到他面前后，他们尊敬地等候，如同教区副执事将献金送上祭坛。

手链亮光闪动，一手向下伸出，一次，两次，接着一阵崇敬的寂静降临现场，两人仔细数着一堆钞票，众人旁观。几乎不约而同的，他们回到梯子顶端，查理·马歇尔拿着货单等待。海关官员签了名，炮兵上校以赞同的眼光看着，接着两人敬礼后爬下梯子。机鼻振动至将近全闭合的位置，查理·马歇尔踢了一下，扔了几张草席挡住空隙，再快速爬过包装纸箱，来到通往座舱的内梯。杰里跟着他身后爬上去，在副机长座位坐定，默默祷告。

“飞机大约超重五百吨。飞机漏油。飞机载了一个武装保镖。机场禁止我们起飞。金边机场禁止降落，当地大概被炸出白金汉郡一样大的大洞。脱离赤柬抵达安全之地需一个半小时，如果对方任何人告密，高韦斯特贝的手脚会被绑起来，抱着装有鸦片原料的两百个布袋。”

“这东西怎么飞，你会吗？”查理·马歇尔边喊边启动一排发霉的按钮。“你是个飞行大英雄吧，伏尔泰？”

“我痛恨得要死。”

“我也是。”

查理·马歇尔抓住苍蝇拍，扑向挡风玻璃上嗡嗡飞的大苍蝇，然后一个个发动引擎，最后整架可怕的飞机喘气动摇，如同驶回克拉珀姆丘的伦敦末班公交车。无线电嗤嗤作响，查理·马歇尔还有时间对控制塔台讲黄色笑话，先以高棉语说，然后遵循飞航传统，以英文报告。前往跑道最远一端时，飞机经过两三座炮台，一时之间杰里认为激动过度的士兵会朝机身扫射，后来他以感激之情想起陆军上校与军用卡车以及贿赂。

又来了一只大苍蝇，这次杰里取来苍蝇拍。飞机似乎丝毫不见加速，然而仪表盘半数指标都指向零，因此他无法确定。跑道上机轮的声响似乎比引擎还吵。杰里回想起老爸杉波的司机开车送他回学校的经过：缓缓驶过必经的西部便道，往斯劳而去，最后抵达伊顿。

两名山民前来参观，笑得合不拢嘴。一丛棕榈树朝他们跳跃而来，但飞机双脚稳稳踩住地面。查理·马歇尔心不在焉地往后拉操纵杆，收拢起落架。杰里不太确定机鼻是否真已拉起，再度回想到就学的情景，回想到跳远竞赛，忆起同样的感受——没有起飞，却脱离地面。他感受到振动，听见机腹掠过树林时树叶的唰唰声。查理·马歇尔对着飞机臭骂，要飞机往该死的天空上升，但有一世纪之久的时间，飞机的高度丝毫不见增加，只是在蜿蜒的道路上空数英尺嗡嗡悬挂。道路一意向上伸入山脉里。查理·马歇尔想点烟，所以让杰里握住他面前的方向盘，感受活蹦乱跳的方向舵。查理·马歇尔重掌方向盘后，飞向山脉最低点的一处缓坡。转弯后，掠过山脉顶端，接着再回旋三百六十度。向下望着棕色屋顶、河流、机场时，杰里盘算高度大约一千英尺。就查理·马歇尔而言，以这高度来定速航行很舒服，因此他现在总算摘下帽子，摆出大功告成的姿态，以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犒赏自己。酒瓶放在他脚边。飞机下方的暮色越来越浓，褐色的泥土则柔柔地融入淡紫。

“谢谢，”杰里接下酒瓶说，“对，我也想喝。”

杰里开始与他闲聊——如果扯开嗓门对谈也算闲聊的话。

“赤柬刚炸掉机场军火库！”他吼叫，“机场关闭，不准起降。”

“是吗？”查理·马歇尔说。自从杰里见到他，这是他首度表现出高兴又佩服的模样。

“听人说，你和瑞卡度以前是哥俩好。”

“我们什么都炸。我们已经害死了一半的人类了。我们见过的死人比活人还多。巨石罐平原，岷港，我们变成了天下大英雄，我们死了的话，连耶稣基督都要开直升机亲自下凡，把我们捞出丛林。”

“听人家说，小瑞做起生意很有一手！”

“没错！他最厉害了！我跟瑞卡度拥有几家海外公司，你知道吗？六家。我们在列支敦士登有几个基金会，在日内瓦有几家企业，在荷属安地列斯群岛有一个银行经理，还有律师，天啊。我的财产有多少，知道吗？”他拍拍后口袋。“整整三百美元。查理·马歇尔和瑞卡度联手杀害他妈的一半人类。没人给我们一毛钱。我父亲杀了另一半，赚钱赚翻天。瑞卡度，他老是异想天开想捞钱。弹壳。天啊。我们准备付钱找那些蠢蛋来捡全亚洲的弹壳，卖给下一场战争！”机鼻往下沉，他骂了一句法文脏话，再往上拉回。“胶乳！非偷走所有胶乳，运出磅湛才行！我们飞到磅湛，找来大直升机，红色十字架。我们怎么搞？怎么运走该死的伤员。给我安静别动，这个疯杂种，听懂没？”他又对着飞机讲话。杰里注意到，机鼻有一长排弹孔，补贴得不很妥当。他荒谬地想到“封口撕开

处”。“人发。我们准备卖头发当百万富翁。村子里所有女孩都得留长头发，剪下来运到曼谷做假发。”

“是谁帮瑞卡度偿清债务，让他帮印支包机开飞机的？”

“没有人！”

“有人跟我说，是德雷克·柯。”

“德雷克·柯，我从没听过。我对祖宗八代发誓，杂种儿查理，将军之子，一辈子从来没听过德雷克·柯这名字。”

“瑞卡度帮柯做了什么特别的事？特别到柯愿意帮他偿还所有债务？”

查理·马歇尔直接拿起酒瓶灌威士忌，然后交给杰里。他无肉的双手一脱离操纵杆就狂挥乱舞，鼻子则不断流鼻涕。杰里暗想他一天抽几管。他以前认识一个朗勃拉邦的旅馆业者，是科西嘉岛的“黑脚”（北非殖民者），一天要抽上六十管才能好好上班。“马歇尔机长上午从不开飞机。”他心想。

“美国人老是忙个不停，”查理·马歇尔摇头抱怨，“为什么非现在载这堆东西到金边，你知道吗？大家都没耐性。最近大家都想快打快享受。没人有闲工夫用吸的。大家都想快快乐一下。你想干掉全人类是吧，要慢慢来，听懂了没？”

杰里再试一次。飞机四个引擎坏了一个，但另一个引擎的静音器似乎破损，嚎声震天，因此他的音量不得不比刚才更大。

“瑞卡度是做什么的，怎么能拿那么多钱？”他又问。

“听好，伏尔泰，我不喜欢政治，我只是一个平凡的鸦片走私人，懂吗？你喜欢政治的话就回下面去，去访问那些神经病掸族人。‘政治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女人操，也不能当烟来抽。’他告诉我父亲。”

“谁？”

“德雷克·柯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再告诉整个他妈的人类！德雷克·柯是了不起的哲学家，听懂了没？”

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开始稳定下降，降到距离稻田只有两三百英尺。他们看到下面的村落，有炊烟，有人向树林狂奔，杰里认真想着，查理·马歇尔是否注意到这些。然而在最后一分钟，他有如具有耐心的骑手，又拉又靠，最后让爱马的头抬起，两人继续喝苏格兰威士忌。

“你跟他熟吗？”

“跟谁？”

“柯。”

“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他，伏尔泰。你想访问德雷克·柯，就去找我父亲。他会割破你的喉咙。”

“刁先生呢？——告诉我，带猪上飞机的那对夫妇是什么人？”杰里大喊，以维持对话进行，查理则拿回酒瓶，再灌一口。

“霍族人，从清迈来的。他们担心住在金边的烂儿子，以为他饿肚皮，所以带只猪送他。”

“刁先生呢？”

“我从来没听过刁先生，听懂了没？”

“三个月前，有人在清迈看见瑞卡度。”杰里大喊。

“是啊，小瑞是笨蛋一个，”查理·马歇尔语带情感，“小瑞一定不能再去清迈，不然有人会拿枪射穿他屁股。装死的人，烂嘴巴非闭紧不可，听懂了没？我对他说：‘小瑞啊，你是我合伙人。闭上你那张烂嘴巴，别让人看见，不然有人会被你气炸。’”

飞机进入一朵雨云，速度立刻陡降。雨水狂溅在铁翼上，流下窗户内侧。查理·马歇尔上下拨动几个开关，仪表板冒出一阵哔声，两个针头灯应声亮起，任凭他再怎么骂脏话也无法熄灭。让杰里惊讶的是，飞机再度爬升，只不过在飞奔的乌云中，他怀疑自己是否错判升降的角度。为了确定，他瞥向身后，正巧瞧见头戴卡斯特罗帽、留着大胡子的黑皮肤金主，正握着AK47的枪管走下梯子。飞机持续爬升，雨止住了，夜色如异乡包围他们。星星忽然在上空破云而出，云层顶部是月光照亮的褶皱。飞机再度爬升，云层完全消失，查理·马歇尔戴上帽子，宣布两部右引擎已拒绝再玩。趁噪音稍停，杰里问了最大胆的问题。

“瑞卡度现在人在哪里？我非找到他不行。我跟报社保证过，一定能访问到他。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

查理·马歇尔的睡眼几乎全闭。他进入半恍惚的状态坐着，头靠着椅背，帽檐压到鼻梁。

“什么，伏尔泰？你在讲话吗？”

“瑞卡度现在到哪里去了？”

“小瑞？”查理·马歇尔说，出神望着杰里，“瑞卡度在哪里，伏尔泰？”

“对，伙计。他人在哪里？我想跟他交换一点意见。所以才拿出那三百块。如果你能抽空帮我引介，会再给你五百。”

查理·马歇尔忽然精神为之一振，翻出《憨第德》，摔在杰里的大腿上，对他大发脾气。

“瑞卡度在哪里，我从来都不知道，听懂了没？我一辈子从来不想交朋友。如果那个疯子瑞卡度上街被我看到，我一定当街射掉他的鸟蛋，听懂了没？他死了。在他死之前，他可以乖乖装死。他跟大家说他死了。所以或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打算相信那个混账！”

盛怒之下，他让飞机朝云层飞去，任其朝金边炮兵部队缓缓的闪光

前进，在杰里认为一片漆黑的环境里表演出完美的降落，三点同时触地。他等待地面防卫部队发射机关枪，等待飞机失速坠毁成超大型坑洞，然而倏然间他只见熟悉的火药箱搭成新的堤坝，箱子里装着泥巴。他也看见有人在微薄光线中展开双臂，等着迎接他们。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一辆褐色吉普车停在前面，后方绿灯闪烁，宛如有人以手开关着手电筒。飞机停在草地上。在堤坝旁边，杰里依稀认出两辆绿色卡车，一组人彼此紧靠等待，朝他们的方向投射焦虑的眼光，身后则是一架双引擎休闲飞机的黑影。飞机一停妥，杰里立即听见底下货舱传来机鼻打开的声响，随后是人脚走下钢梯，以及快速呼叫响应的人声。他们离去的速度令杰里措手不及。然而他听见了另外的声响，令他的鲜血结冻，促使他冲下梯子到机腹去。

“瑞卡度！”他大喊，“站住！瑞卡度！”

然而仅剩的旅客只有那对老夫妇，搂着猪，捧着包裹。他抓住钢梯，让自己自由落地，触及停机坪时震到脊椎。吉普车已经载着华人厨师以及掸族保镖扬长而去。杰里一面向前跑，一面看见吉普车朝机场边缘打开的关口急驶而去。吉普车通过门，两名哨兵关上铁门，采取先前的立姿。在他身后，头戴钢盔的飞机指挥人已经向卡菲尔飞机聚集过去。载满警察的两辆卡车旁观着，一时之间杰里竟傻傻认为他们可能扮演某种抑制的角色，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金边的荣誉警卫，前来护送三公吨的鸦片。然而他眼光主要仍盯住蓄大胡子、身材高大、头戴卡斯特罗帽那人身上。那人手持AK47，走起路来严重颠簸。橡胶底的飞行员靴子踩着铁梯而下时，脚步宛如忽轻忽重的鼓声。杰里恰巧瞧见他。毕奇小飞机的机门为他敞开，两名地勤人员准备扶他上飞机。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伸出手想接过步枪，瑞卡度却挥手要他们退下。他转身过来，正在寻找杰里。短短一秒钟，他们看到了对方。瑞卡度举枪，杰里卧地。二十秒间，杰里温习了出生至今的岁月，随后又有几枚子弹在战火蹂躏过的机场上呜咽而过。这时杰里抬头，射击已停止，瑞卡度上了飞机，助手则拉开防滑塞块。小飞机在闪光中起飞时，杰里没命朝机场边缘最阴暗的部分拔腿奔去，以免另有他人发现他的存在有碍交易顺畅。

“只是情人间的小口角罢了。”他告诉自己。他坐上出租车，双手抱在头上，尽量平息狂跳的胸腔。跟丽姬·伍辛顿的前男友耍个动作，后果就是这样。

某处有火箭炮落地，他丝毫不在意。

他给查理·马歇尔两小时，只不过他认为一个小时就够用了。时间已进入宵禁，然而白天的危机并未随黑夜降临而结束，前往金边一路上皆有检查哨，哨兵随时拿着冲锋枪待命。来到广场，有两人在手电筒光线中对骂，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再往大道开下去，士兵包围住一栋以泛光灯打亮的房子，斜倚在墙边，玩弄着枪支。司机说，秘密警察在那里逮捕了某人。一个上校和部下仍在里面跟涉嫌煽动群众的人交涉。来到旅馆，前院停着坦克。进入房间后，他发现陆克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喝

酒。

“有没有水？”杰里问。

“有。”

他放了洗澡水，开始脱衣服，这才想起华瑟枪。

“发了吗？”他问。

“对，”陆克说，“你也是。”

“哈哈。”

“我叫凯勒用你的名义发了电报给史大卜。”

“机场的那篇？”

陆克递给他一张报纸。“增添了几许威斯特贝的真正本色。什么花苞在墓园绽放。史大卜爱死你了。”

“多谢了。”

进了浴室，杰里将华瑟枪拆下，放进外套夹克，要用时能伸手够到。

“今晚哪里去？”陆克对着浴室门高声问。

“哪里也不去。”

“什么意思？”

“我要出去约会。”

“跟女的？”

“对。”

“带小陆克去嘛。床上三人行。”

杰里心情愉快地沉入微温的洗澡水里。“不行。”

“打电话给她嘛。叫她帮小陆克找个妓女嘛。对了，那个圣塔芭芭拉来的妓女在楼下。我不觉得值得骄傲。我带她过来好了。”

“不要。”

“拜托你行不行，”陆克大喊，态度严肃起来，“干吗不要？”他直接来到上锁的浴室门，抗议起来。

“伙计，你少来烦我了。”杰里建议，“说真的。我欣赏你，不过你不是我的一切，懂吗？所以请保持距离。”

“像屁股上的一根刺，对吧？”沉默良久。“好吧，你可别被子弹射烂屁股了，朋友，今晚外面乱得很。”

杰里重回卧房时，陆克已侧卧床上，呈胎儿姿势，盯着墙壁看，以规律的节奏喝着酒。

“你比女人还糟糕，你知道吗？”杰里停在门口转身对他说。

两人之间的儿戏，原本不会勾起杰里回忆。然而之后的发展为情况投下变量。

这一次，杰里懒得按门上的电铃，直接翻墙。墙头的碎玻璃刺破了双手。他也不往前门走，也不再遵守老规矩，看着棕色双脚站在楼梯底部。这次他站在庭园里，等待自己沉重的落地声平息，等待眼睛与耳朵发现大别墅里的人迹。别墅在背后的月光衬托下，高高耸立在杰里身上。

一辆汽车开过来，没亮灯光，两人下车，从身形与缄默程度判断是柬埔寨人。两人按下门铃，朝前门缝喃喃说出暗语，立刻有人静静开门。杰里尽量揣摩出平面构造。让他不解的是，房子前方或他站立的庭园里，连一丝明显的气味都嗅不出来。四下无风。他明白，对于大型“吸烟室”而言，隐私至上，原因并非法律严苛，而是贿赂金丰厚。别墅有柱烟囱，也有院子，有两层楼。对法国殖民地人而言，是可以舒适生活的地方，可以养活一个小家庭，养几个小老婆，几个混血儿女。他猜测，厨房会让出来做准备之用。最安全的吸毒地点无疑是楼上，是能俯瞰院子的房间。由于前门没有传出气味，杰里认为他们使用的是院子后方而非厢房或前厅。

他无声无息走到围出后院的桩篱。后院花草蓊郁，长满爬墙虎。一扇装了铁窗的窗户让他得以用羊皮靴踩着登上，另一脚接着踏上排水管，第三步踩上高高的抽风机，之后爬至楼上阳台，嗅到了预想中的气味，对着他温柔地招手。阳台上灯光仍付之阙如，只不过两名柬埔寨女孩蹲坐阳台上，在月光下清晰可辨，也能看见她们受惊的眼睛紧盯着从天而降的他。他示意要她们站起来，跟在她们后面走，循着气味前进。炮轰声已经停止，这晚接下来由壁虎接手。杰里回想起，柬埔寨人很喜欢赌壁虎叫几声：明天我会走运；明天运气不好；明天我会娶老婆；不对，是后天。两个女孩年纪极轻，必定是在等待客人。来到草门前，两人迟疑了一下，以哀怨的眼神回头看他。杰里向她们示意，她们开始拉开层层草席，直到最后一道微弱灯光照在阳台上，不比烛光强。他走进去，继续让女孩走在前面。

房间以前想必是当主卧房，连接着另一个较小的房间。他一手搭在其中一女孩肩膀上。另一女孩服从地跟着。第一个房间躺了十二个顾客，全是男性。几个女孩躺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赤脚的苦力照料大家，煞费苦心地逐一呵护一个个斜躺的身体，将小球绑在细棍上，点燃后伸至烟斗上方，让顾客长长缓缓吸一口，直到小球燃烧殆尽。对话进行缓慢，呢喃细语，偶尔引发几阵感激的笑声。杰里认出参赞晚宴邀请的那位瑞士聪明人。他正与一个柬埔寨胖子聊天。没人对杰里有兴趣。如同在丽姬·伍辛顿的公寓一般，这两个女孩为他验明了正身。

“查理·马歇尔。”杰里轻声说。一位苦力指向隔壁房间。杰里将女孩打发走。第二个房间较小，马歇尔躺在角落，有个华人女孩身穿豪华旗

袍弯腰替他准备烟斗，杰里认为她是屋主的女儿。查理·马歇尔得到特别礼遇，因为他既是常客，也是供货者。杰里跪在他另一边。有位老人站在门口看。女孩也在看，烟斗仍在手上。

“你想干吗，伏尔泰？干吗老缠我？”

“陪我散个步就好，伙计。马上放你回来。”

杰里抬起他手臂，轻轻搀扶他起身，女孩在一旁帮忙。

“他抽了多少？”他问女孩。女孩伸出三根手指。

“他习惯抽多少？”他问。

她低下头微笑，意思是，很多很多。

查理·马歇尔起初走得摇摇晃晃，但走到阳台时他已作好辩论的准备，因此杰里以火场救生的方式将他扛起来，走下木造楼梯，穿越院子。老人毕恭毕敬鞠躬，开前门让他们外出，龇牙咧嘴的苦力则开着通往街道的大门，两人对杰里显然心存感激，因为杰里表现得很有技巧。他们走了约莫五十码，这时一对华人男孩从马路另一端冲过来，挥舞着小球拍之类的东西叫嚷着。杰里让查理·马歇尔站直，却以左手紧紧握住他，任第一个男孩攻击，然后挡开球拍，半握拳头用一半的力气击向男孩眼睛下方。男孩逃开，朋友也跟在身后。杰里仍抓着查理·马歇尔，两人继续走到河边，夜色浓密，然后让他如木偶一般坐在河岸倾斜的干草地上。

“是打算拿枪轰烂我的脑袋吧，伏尔泰？”

“那样的工程，还是留给鸦片来成就吧，伙计。”杰里说。

杰里喜欢查理·马歇尔，若是一切环境条件许可，他很乐意陪他上鸦片馆听他讲述落魄却独特的一生。然而现在的他，拳头无情地紧抓查理·马歇尔的细小手臂，防止他空空的脑袋忽然动了逃跑的念头。查理心觉走投无路时，逃跑起来身手可能矫健异常。因此杰里半躺着，就像他在老佩特住处如仙山般堆积的对象中闲躺那样，以左臀与左肘支撑，将查理·马歇尔的手腕压进泥巴里，让查理·马歇尔朝天平躺。三十英尺外的河面上传来舢板的喃喃低吟，宛若长叶片片漂过狭长的金月倒影。天空则传来渐行渐远的零星炮声，忽而在前，忽而在后，好像炮兵指挥闲着没事，决定以炮声来为自己的存在提供正当性。偶尔从较近之处，红色高棉以较轻、较刺耳的炮火反击，但话说回来，这些声响充其量只是壁虎叫声与远方大片寂静之间的短暂间奏。杰里借月光看表，再看查理·马歇尔一张狂乱的脸，思忖着他的毒瘾多大。和婴儿吃奶的胃口一样大吧，他心想。如果查理习惯在夜间抽鸦片，习惯早上睡觉，他对鸦片的瘾头肯定转眼就来。他脸上的汗湿已让他不成形。汗水从粗大的毛孔、从睁大的眼睛、从抽咽的鼻子流出，让深刻的皱纹巧妙汇聚成河，在洞窟形成小巧的水库。

“天啊，伏尔泰。瑞卡度是我的朋友。那个家伙啊，他懂不少哲学。

你应该访问的人是他嘛，伏尔泰。你应该听听他的想法。”

“对，”杰里同意，“是的。”

查理·马歇尔握住杰里一手。

“伏尔泰，他们全是好人，听懂了没？刁先生……德雷克·柯。他们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想做生意。他们有东西想卖，也有人想买他们的东西！是一种服务嘛！又没人因此打破饭碗。你干吗想搅局？你自己也是个好人的，我看得出来。你不是帮老头抱猪吗？有谁看过欧洲人帮亚洲人抱猪过？可是啊，天啊，伏尔泰，要是你逼我讲实话，他们会把你砍得七零八落，因为那个刁先生啊，他公事公办，非常讲究哲学，听懂了没？他们会杀掉我，会杀掉瑞卡度，会杀掉你，会杀掉全部该死的人类！”

炮兵发射一阵，这次丛林以连续火箭炮回应，也许有六颗，嘶嘶掠过头上，如同弹射器发射出的巨石。半晌后，他们听见市区中心某处传来数起爆炸声，随后归于平静。没有消防车的呜咽，没有救护车的哀嚎。

“他们为什么要杀掉瑞卡度？”杰里问，“瑞卡度做错了什么事？”

“伏尔泰！瑞卡度是我的朋友！德雷克·柯是我父亲的朋友！那些老头是哥们儿，两百五十年前一起在上海打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仗啦。我去找我爸，跟他说：‘爸，你至少疼我这么一次吧，不要再叫我小王八了，叫你的好朋友德雷克·柯别再追杀瑞卡度了。你一定要跟他说，德雷克·柯，那个瑞卡度和我的查理啊，他们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是好兄弟，跟我们一样。他们一起在俄克拉荷马州学开飞机，他们也一起杀人。而且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是事实。’我父亲对我恨之入骨啊，懂吗？”

“懂。”

“可是他还是写了长长一封信给德雷克·柯。”

查理·马歇尔吸气，一口接一口，仿佛小胸腔几乎无法容纳足够空气来满足他。“那个丽姬啊。那女人厉害。丽姬啊，她自己跑去找德雷克·柯。也是私下去找。丽姬对他说：‘柯先生，你别再追杀小瑞了嘛。’这个情况非常微妙，伏尔泰。我们全都必须紧紧抓住对方，不然会从乱七八糟的山顶掉下去，听懂了没？伏尔泰，放我走。求求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我求求你，听懂了没？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杰里看着他，倾听他爆发激动情绪，观察他崩溃、打起精神、再度崩溃、更打不起精神来，杰里觉得宛如目睹壮烈成仁的朋友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本能想缓缓诱导查理，让他说个没完。杰里的难题是，他不知道毒瘾发作有何预兆，不知道在毒瘾发作前他有多少时间。他问了问题，但查理往往没听见。有时候他回答杰里并没问他的问题。有时候他慢半拍，针对杰里早已放弃追问的问题，他会忽然丢出答案。在沙拉特，讯问人说，心防溃散的人很危险，因为他付出他身上没有的钱，为的是收买你的爱心。然而在宝贵的几分钟之间，查理什么也没付出。

“德雷克·柯一辈子从没去过万象！”查理忽然脱口大喊，“你疯了，伏尔泰！像柯那样的大人物，才懒得管一个肮脏兮兮的亚洲小城。德雷克·柯是个厉害的哲学家，伏尔泰！那个人，你最好多留心点！”似乎人人都是哲学家——或者说，除了查理·马歇尔之外每人都是。“在万象，没有人听过柯的大名！听懂了没，伏尔泰？”

隔没多久，查理·马歇尔啜泣起来，紧握杰里的手，边哭边问杰里是否也有父亲。

“对，伙计，已经过世了，”杰里耐心地说，“他也以他的方式当将军。”

河面上亮起两道白色照明弹，如日照般炫目，令查理忆起他们早年在万象吃苦的经过。他挺直上身，在泥巴上画出房子，是丽姬和小瑞和查理·马歇尔住的地方，他很骄傲地说，就住在市区边缘一个发臭的跳蚤茅屋。小瑞与丽姬住皇家套房，是跳蚤茅屋惟一的房间，而查理的任务是尽量别碍事，付付房租，买买酒。然而一回想起手头拮据的辛酸，查理的泪水又突然如暴雨直下。

“照你这么说过，你们靠什么过活，伙计？”杰里问，不预期能得到什么答案，“说嘛，反正都结束了。你们靠什么过活？”

查理坦承他敬爱的父亲每月拨款济助，让他泪水再流。

“那个发疯的丽姬，”查理伤痛之余说着，“那个发疯的丽姬，她帮梅伦跑香港。”

杰里尽可能保持镇定，以免使查理偏移正道。

“梅伦。谁是梅伦？”他问。他的语调轻柔，令查理昏昏欲睡，开始为泥屋添上烟囱与烟。

“快说啊，可恶！梅伦。梅伦！”杰里正对查理脸孔大喊，想吓得他回答，“梅伦是谁，你这个没用的烂东西！跑香港做什么？”他扶查理起立，像摇晃布娃娃一样摇晃他，然而继续摇了好一阵子查理才回答。回答之前，查理·马歇尔央求杰里体会一下爱的感觉，真爱的感觉，爱上一个发疯的欧洲妓女，却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拥有她，连一晚也不行。

梅伦是个古怪的英国贸易商人，没人知道他做什么生意。这个做一点，那个做一些，查理说。别人很怕他。梅伦说他能叫丽姬去跑重要的海洛因路线。“凭你的护照和肉体，”梅伦告诉她，“就能比照公主一样进出香港。”

精疲力竭的查理沉坐地上，驼身看着泥屋。杰里蹲在他身旁，拳头紧抓查理颈后的衣领，小心不要弄痛对方。

“所以说，丽姬帮他跑，对不对，查理？丽姬帮梅伦带东西。”杰里以手掌轻轻将查理的头扭过来，直到失魂的双眼对准他为止。

“丽姬没帮梅伦带东西，伏尔泰，”查理纠正他，“丽姬是帮瑞卡度带东西。丽姬不爱梅伦。她爱的是小瑞和我。”

查理眼神阴郁盯着泥屋看，突然爆出阴险的大笑，随后渐渐平息，也不作交代。

“被你搞砸了，丽姬！”查理以逗人的口气高声呼唤，以一指戳进泥门，“和以往一样，又被你搞砸了，蜜糖！你太多嘴了。干吗到处说你是英国女王？干吗到处说你是什么超级女间谍？梅伦对你好生气啊，丽姬。梅伦把你赶出去，一脚踢出去。小瑞也很生气，记得吗？小瑞毒打你一顿，查理三更半夜他妈的不得不带你去看医生，记得吗？你真是长舌妇，丽姬，听懂了没？你是我妹妹，不过你是有史以来舌头最长的女人！”

后来被瑞卡度缝上了，杰里回想起她下巴的两道凹痕。因为她搞坏了与梅伦的协议。

杰里仍倚在查理身旁，拎住他的后颈，发现周遭一切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山姆·科林斯坐在车上，停在星辰岗下，清楚可见八楼，一面在晚间十一点研究报纸的赛马版。一枚火箭炮落在相当靠近的地方，却无法让他从那一幅停格的画面中分心。他也在炮声之外听见库洛的声音，细数丽姬的犯罪事迹。库洛说过，资金短缺时，瑞卡度会逼她为他走私小包裹过边界。

他本想问老库洛的是，如果消息来源不是代号梅伦的山姆·科林斯的活，伦敦城如何得知这一点？

三秒钟的暴雨冲走了查理的泥屋，让他气愤不已。他以四肢胡乱画地寻找，狂哭臭骂。情绪发泄完毕，他又开始谈论起父亲，讲述父亲如何替亲生儿子在万象某大航空公司安插职位——只不过当时查理因为胆子越来越小，坚持想永远停飞。

后来有一天，将军似乎对查理失去了耐性。他召来保镖，从掸族山顶下山到一个名为方昂的鸦片小镇，距离泰国边界不远。将军以全世界大家长皆然的方式在方昂训诫查理花钱如流水的态度。

对父亲表达抗议，查理有自己的一套，以军方不表赞同的方式鼓起失色的脸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啊，你最好改一改，乖乖干点真差事，你这个鬼佬小王八。最好别再碰赌马，听见了没？也别再碰酒和鸦片。最好甩掉那个损友瑞卡度。还有，你最好别再拿钱给他的女人，听见了没？因为我不打算再多养你一天，连一个小时都不行，你这个小王八。我很讨厌你，讨厌到总有一天会动手宰掉你，因为你让我想起你母亲那个科西嘉岛娼妓！”

随后话题转到工作，发言人仍是查理的将军父亲：

“有一些非常正直的潮州绅士，是我好朋友的好朋友，听见了没？他们正好投资一家航空公司。我也有一些股份。这家公司的大名是印支包机航空。笑什么笑，你这个鬼佬人猿！别笑我！所以这些好朋友帮我做个人情，在我无助时帮助我这个三脚小王八儿子。我诚心祷告，希望你从天上掉下来，摔断你那条鬼佬脖子。”

因此查理为印支包机飞运父亲的鸦片：起初每星期一两趟，工作规律，诚实无欺，他很喜欢。他的胆量又大了起来，定下心来，真心感激老爸。他当然也尽量请潮州佬帮瑞卡度安插工作，但他们不愿意。过了几个月，他们答应请丽姬坐在前面的办公室，对客户甜言蜜语，周薪二十元。查理暗示，那些日子是黄金岁月。查理与丽姬赚钱，瑞卡度拿来浪费在更异想天开的事业上，大家都开心，大家都有事做。后来有天晚上，刁先生有如复仇之神一样现身，打乱了好事。他出现时，他们正好要锁上公司办公室。他直接从人行道走进来，没有事先约时间，劈头指名要找查理·马歇尔，自称是公司驻曼谷的主管。潮州佬从后面办公室出来，看了刁一眼，为他担保，然后离开。

查理语气中断，靠在杰里肩膀上啜泣。

“伙计，你给我仔细听好，”杰里督促，“听着。这一部分我很喜欢，懂吗？这一部分你好好讲个清楚，我就带你回家。我发誓。拜托。”

可惜杰里料错了。现阶段，重点已不再是逼问查理吐实了。杰里如今成了查理·马歇尔仰赖的毒品。重点也不再是高压对付查理了。查理·马歇尔紧抓住杰里的胸膛，仿佛是苍茫大海中最后一根桨，对话也转变为绝望的独白，杰里从中攫取数据，查理·马歇尔则卑屈畏缩、又乞求、又咆哮着希望杰里注意，一面讲笑话，自己破涕为笑。河下游有一把还未卖给红色高棉的龙诺的机关枪，借着另一道照明弹的光线对准丛林发射曳光弹。金色光柱在水面上拖得很长，照亮一个小坑，然后消失在树林里。

查理头发被汗水沾得湿透，刺痛了杰里的下巴。查理则边淌口水，边急促而含糊地叙事。

“刁先生才不想在办公室谈事情，伏尔泰。才不呢！刁先生穿得也不太体面。刁这个人非常潮州，和德雷克·柯一样拿泰国护照，也用天花乱坠的假名，来万象后保持得非常非常低调。‘马歇尔机长，’他对我说，‘想不想在上班时间以外赚点外快，换换口味啊？想不想帮我飞一趟非传统的路线？他们跟我说，最近你是个好得不得了飞行员，稳得很。想不想一天赚个四五千块，甚至还用不着一整天呢。你个人意下如何，马歇尔机长？’刁先生，’我告诉他”——查理这时歇斯底里地叫嚷起来——“在不危及我谈判地位的情况下，刁先生，为了五万美元，以我目前宁静的心情，我愿为你下地狱，帮你带回撒旦的蛋蛋。’刁先生说他会再过来，不准我乱讲话。”

忽然间，查理转操父亲的语调，称呼自己为小王八，是科西嘉岛娼妓的儿子，后来杰里逐渐明了，查理原来是在描述下一幕。

令人讶异的是，刁先生提出的条件，查理并未向人透露，直到后来至清迈庆祝农历春节，与父亲见面。他没有告诉小瑞，甚至也未向丽姬透露，也许是因为这时友谊已出现裂痕，小瑞自己也另外又找了几个女人。

将军的建议并不振奋人心。

“别碰那匹马！那个刁啊，人脉又高又广，才看不上你这个神经小王八，听懂了没？天啊，有谁听过汕头人给没出息的半鬼佬五千块帮忙开飞机？”

“所以你也让给小瑞，对吧？”杰里很快说，“对不对，查理？你对刁说：‘抱歉，不过你可以试试瑞卡度。’经过是不是这样？”

然而查理·马歇尔已魂飞天外，凶多吉少。他直接从杰里胸口瘫下，平躺在泥土上，双眼紧闭，只有偶尔喘气声，贪婪、沙哑地喘着气，杰里握着他的手腕，脉动狂乱，为躯壳内的生命做了最佳见证。

“伏尔泰，”查理低声说，“我对圣经发誓，伏尔泰，你是个好人的。带我回家。天啊，带我回家吧，伏尔泰。”

杰里哑然盯着魂飞魄散的身躯，知道仍有一个问题非问不可，就算这问题是两人生命中最后一个也要照问不误。他伸手向下，最后一次搀扶起查理。两人摸黑步行一小时，漫无目标的炮火刺穿暗夜，查理·马歇尔又尖叫、又央求、又发誓，若能不供出瑞卡度为生存而谈妥的条件，他会永远爱杰里。然而杰里解释，如果不知道瑞卡度谈的条件，整个谜团甚至连一半也没能解开。也许查理·马歇尔在失魂落魄之中，明了了杰里的理解方式，哭着说出禁忌秘密。杰里的理解方式是，在即将回归丛林的城市里，除非彻底回归，否则不算灭亡。

杰里尽可能动作放轻，将查理·马歇尔搀扶上马路，走向别墅，步上楼梯，同样几张静默的脸孔心怀感激地让他进门。他心想，我应该多问一些才对。也应该多告诉他一些才对。他们命令我进行双向交流，我并没有照做。我在丽姬与山姆·科林斯身上逗留太久。我颠倒了次序，弄乱了上级吩咐的采购单，像丽姬一样搞坏了大事。他是想难过一番，却难过不起来，而他记得最清楚的事，根本不列在采购单上。他打字致函给亲爱的老乔治时，脑子里想的，同样是这些如石碑耸立的事情。

他锁上门，枪插在皮带上，开始打字。陆克不见人影，所以杰里猜他在醉意惺忪间去了妓院。这封信很长，是他间谍生涯中最长的一封信：“目前只知道这么多，先向您报告，以免我没机会再发信。”他报告了与参赞的接触，报告了下一站，附上瑞卡度的住址，描写查理·马歇尔的长相，也描述了跳蚤茅屋里一家三口的景象，全文却以最正式的用语报告。至于他的新发现——令人厌恶的山姆·科林斯扮演的角色，他只字未提。毕竟，如果他们早已知道，又何必再报告一次呢？他空出地名与专有名词，另外附上索引，然后花了一小时将两条信息转成基本密码。这样的做法，无法蒙骗密码专家五分钟，却能让普通老百姓摸不着头脑，邀请他的英国参赞就是一例。他最后提醒管理组人员查看，布拉罗尼银行是否兑现了他寄给猫咪的汇票。他烧掉没用密码的信，将改成密码的信卷进一份报纸里，接着趴在报纸上睡着，腰间的手枪插得很不舒服。他于六点起身刮胡子，将密码信插进一本他认为可以挥别的平装小说，然后外出散步，享受宁静晨光。来到“当地”，参赞的座车停得很醒目。参赞本人坐在漂亮小餐厅的平台上，头戴里维埃拉海滩草帽，也同

样醒目。他的草帽令杰里想起库洛。参赞享用着热腾腾的牛角面包与加奶精的咖啡。一见到杰里，他夸张地挥手。杰里漫步过去。

“早。”杰里说。

“啊，准备好了嘛！真可靠！”参赞大喊，准备起立，“出炉后，一直渴望拜读呢！”

挥别了密码信，杰里只注意到其中隐而未提的部分，这时兴起一阵期终之感。他也许会旧地重游，也许不会，就算旧地重游，人事地物永远也不会相同了。

杰里离开金边时的实际状况必须在此一提，因为与后来的陆克有关。

见过参赞后，当天上午杰里连忙寻求掩饰身份的动作，也许能舒解他越来越重的赤裸感。他专心追起难民与孤儿的新闻，正午通过凯勒发出，另外加上一篇报道马德望当地气氛的文章，写得还不错，尽管未能见报，至少能以他之名归档保存。当时有两处难民营，人数急速增加，一处位于巴沙河上一座巨大的旅馆，是施亚努个人的梦想乐园，也是未完成的乐园；另一处位于机场附近的列车编组场，每个车厢住了两三个家庭。他走访了两地，状况相同：澳大利亚籍青年英雄排除万难；惟一的水源受到污染；一周配米两次；儿童在他身后吱喳说着“嗨”以及“拜拜”。他跟在柬埔寨翻译身后在难民营前后走动，逢人就问个不停，大摇大摆，寻找能再融化史大卜心脏一角的题材。

来到一家旅行社，他大声嚷嚷地订了过境曼谷的机票，抱着渺茫的希望，但愿能借此消除自己的脚印。前往机场途中，他不禁兴起似曾相识之感。上一回我来这里时，我去玩滑水，他心想。欧洲贸易商住在湄公河畔的船屋里。一时之间他看见自己——以及市区——当年柬埔寨战争仍天真得令人不寒而栗。一流好手威斯特贝冒险首度尝试独自在湄公河滑水，以男童的动作在棕色河水上跳跃，前方拖着他的是位好脾气的荷兰人，开着快艇，用掉的汽油足够养活一家人一星期。他记得，最危险的是两英尺浪。两英尺浪生成的原因，是桥上的卫兵施放深水炸弹，防止红色高棉潜水夫炸桥。然而现在这条河归他们所有，丛林亦然。市区也将归他们所有，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在机场，他把华瑟手枪扔进垃圾筒，而且在最后一分钟以贿赂的方式登上前往西贡的飞机，而西贡正是他的目的地。起飞时，他纳闷的是，究竟何者的预期生存率较高，是他自己或是金边。

另一方面而言，陆克口袋放着杰里在香港公寓的钥匙。确切来说，应该是寻死匈奴的公寓。陆克名义上飞往曼谷，却在冥冥之中以杰里之名搭上班机，因为杰里列名该班飞机旅客名单，而陆克姓名不在其中，而且所有座位客满。抵达曼谷后，他参加了分社的会议，会中仓促决定将杂志社的当地人力依崩溃中的越南前线分配，陆克分到顺化与岷港，因此隔天飞往西贡，之后转搭中午班机往北飞去。

与事后的谣传相反的是，他与杰里并未在西贡见面。

他们也未在北方撤退期间相遇。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从各方观点而言，是在金边最后那晚，而这是事实，而事实这种商品，稍后变得极难得手，其困难度众所周知。

17瑞卡度

全案自始至终，乔治·史迈利袖手旁观的力道，从不如现在这么执拗顽强。在圆场，情绪紧绷到吹弹即破。沙拉特习惯性叮咛，切勿染上惰性，避免惊慌失措，如今两者合而为一。香港方面只要不传来实实在在的新闻，每天都是灾难一场。杰里的长信被放在显微镜下解析，公认写得模棱两可，随后认为具有神经质。为何不再加压逼问马歇尔？为何没有再度提及俄国人的阴影？他应该逼问查理金梭线的事，从刁先生那里没问出的东西，应该要查理说清楚。难道他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埋下警告的种子，事后再收割信息？至于他对女儿念念不忘一事——万能的上帝，难道这家伙不知道密码信的成本多少？（他们似乎忘记，掏腰包的人是表亲。）另外，圆场驻地情报员的空缺，他不希望英国大使馆官员替代，又是怎么回事？好吧，就算表亲将密码信传至圆场时有所延误，杰里不是仍对查理·马歇尔打破沙锅问到底了吗？外勤情报员绝对无权指挥伦敦的做法。安排合约的管理组，希望回信时能斥责他一顿。

来自圆场外界的压力更加沉重。殖民部威布汉的动作仍积极，而程序小组则作出令人咋舌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决定仍应尽快通知香港总督此案原委。此间盛传以借口召回港督回伦敦述职。当柯再度成为港府座上宾时，制造了一阵恐慌，因为这回是总督的民情晚宴，用意是听取华人贤达发表高见，不列入正式记录。

相形之下，索尔·恩德比与同伙强硬派人士则反向而行：“去他的总督。我们需要立刻跟表亲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乔治应该今天去找马铁娄，恩德比说，将整个案子交代清楚，请他们接下案情发展的最后阶段。关于纳尔森的存在，他不应该再继续再玩捉迷藏，应该承认自己缺乏资源，应该让表亲自行计算潜在的情报利益，如果他们能完成任务更好，让他们去向国会山庄邀功，让敌人一头雾水。由于正值越战浑水一团糟之际，我方的善意来得适时而慷慨，恩德比认为，结果有利于未来建立牢固的情报合作关系。而这一点，习惯闪烁不定的拉康似乎支持。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史迈利忽然发现自己被贴上双重标签。威布汉派认定他反殖民、支持美国，而恩德比派指控他在处理这份特殊关系时表现得极端保守。然而更严重的是，史迈利有这么个印象，似乎有人利用其他渠道对马铁娄提示这场口水战的内容，让马铁娄一有机会便能大做文章。举例而言，默莉·米金的情报来源提及，恩德比与马铁娄越走越近，原因不只是两家小孩同样就读南肯辛顿的国立高校。两人似乎周末经常相约前往苏格兰垂钓。恩德比在当地买下一小段河流。事后有人开玩笑，马铁娄提供飞机，而恩德比提供鱼。约莫此时，史迈利才得知此事，符合他不够世故的形象。这事大家从一开始就听说，所以推想他必然知情。恩德比最近娶了第三任妻子，是美国富婆。两人共结连理前，她曾活跃于华府交际圈，现在转进伦敦如法炮制，成果也颇为可观。

众人心浮气躁，追根究底而言原因不谋而合。在柯案方面，丝毫没

有重大进展。更不妙的是，行动情报短缺得令人捶胸顿足。如今每日十点，史迈利与吉勒姆前往别馆报到，每天离开时都比前一天更不满足。刁的国内电话线被窃听，丽姬·伍辛顿的电话亦然。窃听带在当地监听后空运回伦敦详细处理。杰里对查理·马歇尔逼供是在星期三。星期五，查理已复原得差不多，能从曼谷致电刁先生，倾吐心声。然而刁先生听了不到三十秒便打断他，叫他“立刻跟哈利联络”，让大家一头雾水。大家从没听过哈利这号人物。星期六有好戏上场，因为监听柯家电话的人报告，他取消每周日上午与阿沛戈先生的高尔夫球会。柯的借口是生意上有要事处理。总算来了！这是重大突破！隔日在史迈利首肯下，驻香港的表亲在柯的劳斯莱斯进市区时，派遣一辆监听车、两辆汽车、一辆本田车跟踪。柯有什么大事必须在星期日清早五点半处理，还得取消每周定期举行的高尔夫球会。答案是算命。占卜师是汕头老翁，执业场所位于荷李活道旁的小巷里一处龌龊的庙宇。柯与他共处了一个多小时后返家。表亲监听车里某位热心小朋友以隐藏式方向性麦克风对准神庙窗口，全程录音，录到的声响除了车流外，只有来自老翁鸡舍的咕咕声。在圆场，史迈利请狄沙理斯进来。究竟有谁会在大清早六点去找算命师，更何况柯是百万富翁？

狄沙理斯对众人的困惑大感喜悦，高高兴兴扭绕着头发。他说，以柯的地位，会坚持抢在算命师开张后第一个上门，因为大师的头脑此时仍清楚，能够接收神明的信息。

之后五个星期无所进展。完全没有。邮箱与电话传来的是一团团无法消化的原料，经过提炼后，无一是一可供利用的情报线索。在此同时，缉毒署理论上的期限步步逼近，一到期，柯就成为公开猎物，谁能抢先查出他的底细就各凭本事了。

然而史迈利保持镇静。他不顾所有责难，对他人批评他处理本案与杰里行动的手法置之不理。他坚称，树已摇过了，柯被吓到了，时间会证明他的手法正确。他拒绝在半迁就的情况下对马铁娄做出大动作，也坚守他在信中定的条件。信件副本其中一份握在拉康手中。他也依职权拒绝讨论任何情报行动细节，无论是上帝或是逻辑，或是柯施加的外力，除非牵涉到规定或当地命令。他心知肚明，若有所让步，只会徒增质疑派人士的疑虑，加强对他的抨击火力。

他坚守这条阵线五周之久，到了第三十六天，不知是上帝或逻辑，或是柯施展出人类化学作用力，为史迈利提供一项说来神秘却意义重大的安慰。柯走上水路。在刁的陪同下，随行的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华人，事后经确定为柯的帆船队的大船长，三人花了三天，大部分时间巡视香港的外岛，每晚黄昏时返回。他们到过哪里，至今仍无从判断。马铁娄提议连续派遣直升机，从空中观察路径，但史迈利断然拒绝。港口的定点跟踪证实，他们每天出港与回航路线显然不一，如此而已。最后一天，也就是第四天，船根本没有回来。

一阵恐慌。去哪里了？马铁娄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上司急如热锅蚂蚁，认定柯与纳尔森司令号故意混进中国水域。甚至认定他们遭绑架。

永远别想再见到柯了，而心情急速恶化的恩德比，竟致电史迈利告诉他：“如果柯出现在北京，高喊着特务局迫害他的话，全是你的错。”就连史迈利也内心煎熬了一整天，隐隐思考着，尽管全然不合理，柯是否真的回中国与弟弟团圆。

随后，当然了，隔天一大清早，船平静航回大港口，活像刚参加过赛船会，柯快快乐乐地下船，跟在美丽的丽泽身后，一同走在走道上，金发在日光下飘逸，如同洗发精广告。

基于这份情报，史迈利陷入沉思，反复详读柯的档案，更与康妮与狄沙理斯激烈辩论，之后决定立即实行两项决策，若以赌博来比喻，是打出手上最后两张牌。

其一：杰里应该进行至“最后阶段”，史迈利之意是瑞卡度。他希望这一步能持续对柯施压，必要时对柯提供必须行动的最后证明。

其二：山姆·科林斯应该“进入”。

第二项决策于请教康妮·沙赫斯后达成。这项决策在杰里的主要档案中遍寻不着，只在略作删改后，出现在事后公布的秘密附录中，以供外界审视。

延误与迟疑一再发生，对杰里造成莫衷一是的作用，这一点，连全球最高明的情报头子也无法事先料到。察觉这种作用是一回事——史迈利无疑察觉到了，甚至采取了一两个步骤来防范；但若以此为行动准则，拿来与史迈利每天面对的各种决策工作相提并论，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办事无轻重缓急之分，就没有资格为人将领了。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让杰里歇脚耗时间，西贡这地方是下下之策。案情越拖越久，圆场有人建议派他到比较有益身心健康的地方，如新加坡或吉隆坡，无奈这么做是否得当、伪装身份如何处理的问题一浮现，就一直让他停留原地。更何况，明天一到，一切情势可能为之改观。其中也涉及他的人身安全。香港不列入考虑，而在新加坡与曼谷两地，柯的影响力必定不小。之后又回到掩护身份的问题，崩溃之日逐渐逼近，还有什么地方比西贡更显自然？然而，杰里过的生活是半人生活，生活在半个城市里。大约四十年来，战争一直是西贡的主要产业，但美国于一九七三年撤军却导致经济萧条，西贡从此无法恢复荣景，因此即使上演了企盼已久的最后一幕时，演员有数百万，观众却寥寥可数。即使杰里碍于职责前往战斗较激烈的那端，观战时感觉却如同欣赏一场大雨浇熄战火的板球赛，选手只想回休息室躲雨。圆场禁止他离开西贡，理由是可能随时需要派他前往别处，然而这份禁令如果依字面意义来遵守，必定会令他显得荒唐，所以他不予理会。春禄距离西贡五十英里，是个无聊的小镇，出产橡胶，居民说法语，地点位于西贡的防卫边线。因为这场战争与金边截然不同，较为讲究技术性，较具欧洲风格。红色高棉没有装甲部队之处，北越却有俄国坦克以及一百三十厘米炮，以典型俄国阵式排列整齐，宛如正要突击苏联元帅朱可夫手中的柏林，在最后一架大炮安置妥当、装好火药之前一切按兵不动。他觉得春禄人跑了一

半，天主教堂仅剩法国牧师一人。

“全完了。”牧师简单向他说明。南越将做出他们一向做的事，他说。他们会停止前进，转身奔逃。

两人共饮葡萄酒，凝望空旷的广场。

杰里将报道传回报社，这次情势恶化得没有挽回的余地，而史大卜则下了简短评语：“重人物轻预言，史大卜笔。”暂不刊登。

回到西贡，在卡乐帆旅馆的台阶上，有小乞儿兜售一无是处的花环。杰里给他们钱，收下花环，给足面子，回房间后丢进废纸篓。他到楼下坐时，乞儿又来敲窗户，卖《星条新闻报》给他。他走进空旷的酒吧喝酒，女孩围着他，迫切之情宛如他是沦陷前最后的机会。只有警察维持常态，头戴白色钢盔，手戴鲜白手套，站在每个角落，仿佛静候凯旋的敌军开进市区。他们乘坐白色吉普车，如同君主般开过住在人行道鸡圈里的难民。他回到旅馆房间，赫丘力打电话过来。赫丘力是杰里最喜欢的越南人，却尽可能避不见面。他自称赫丘力，反体制，反阮文绍，秘密对英国记者提供越共情报，借此维生。他认定英国与越战无关。“英国人是我的朋友！”他对着电话央求，“把我弄出去！我需要证件。我需要钱！”

杰里说：“去找美国人看看。”然后绝望地挂掉电话。

杰里传回那份永不见天日的报道时，是借路透社办公室传的。这所路透社办公室是座纪念碑，彰显被人遗忘的英雄，缅怀失手的事迹。玻璃桌面下陈列了头发蓬乱的男孩照片，墙上则挂了著名的退件书与严辞抗议的社论。空气中弥漫了旧报纸的臭味，以及来自“英国某地”、在此暂居之感，铭记珍藏每位流亡记者窃窃思乡的情怀。转角处有家旅行社，杰里在那段期间两度订了前往香港的机票，却没出现在机场。为他服务的是一名热心的表亲青年人，名叫帕克，掩饰身份是信息处人员，偶尔带黄色信封的密码信前来旅馆，外面印有“新闻急件”以求逼真。然而信封里的内容却无二致：尚无决策，静候待命，尚无决策。他读了作家福特的作品，以及一本描写旧日香港、真正难看的小说。他也阅读格林、康拉德与劳伦斯，而仍未有进一步消息。轰炸声在晚上听来最可怕，恐慌气氛到处皆然，犹如瘟疫大流行。

为了遵照史大卜指示，寻找人物的题材而非预言，因此他前往美国大使馆，因为当地有不下一万名越南人猛敲大门，希望证明自己是美国公民。他驻足旁观之际，一名南越军官开着吉普车过来，跳下车，开始对女人大骂，骂她们全是妓女与叛国贼，而他选中的正是一群正牌的美国人妻，一阵唇枪舌剑。

杰里再度发稿，史大卜又扔掉他的稿子，无疑更加深了他的忧郁。

数日后，圆场规划人失去了耐性。各方扰攘声持续恶化，他们传密码信请杰里立即飞往万象，保持低调，直到表亲派邮差另下指示为止。因此他前往万象，住进群星酒店，是丽姬以前喜欢逗留的地方。他也在

吧台喝酒，是丽姬以前喜欢喝酒的地方。他偶尔与老板墨里斯聊天，一面等待指示。酒吧以水泥搭建，有两英尺深，因此如果有需要，可以充当防空洞或射击掩体。有间与用餐室连接的酒吧，气氛低迷，一名老殖民地法国人以一丝不苟的手法吃喝，餐巾塞进衣领。杰里坐在另一张餐桌看书。除了两人之外别无顾客，一向都是，而两人却从不交谈。在街上，来自距离山区不远处的老挝共产党两两并排、正气凛然地走着，戴着军帽身穿战袍，回避女孩的眼光。他们接管了角落几间别墅，以及通往机场沿途的别墅。老挝共产党搭起一丝不苟的帐篷，高过枝叶芜蔓的庭园围墙。

“联军撑得下去吗？”杰里曾经问墨里斯。

墨里斯不喜欢谈政治。

“就像现在的情况。”他以做作的法国口音回答，静静递给杰里一支圆珠笔当做安慰，上面印有卢云堡的字样。据说墨里斯拥有全老挝的卢云堡专卖权，一年能卖出几瓶。杰里完全避开印支包机办公室那条街，同样也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要去看查理·马歇尔供出的跳蚤茅屋。那间跳蚤茅屋位于市区边缘，曾有一妻二夫其乐融融。杰里向墨里斯询问，墨里斯的回答是，最近留在市区的华人已经非常少见。“华人不喜欢。”他又面带微笑说，偏头指向外面人行道上的老挝共产党。

谜团待解的也包括电话窃听记录。杰里是否从群星酒店打电话给丽姬？如果他打过，是否有心与她交谈，或只是想听她的声音？如果他有心想与她交谈，他打算说什么？或者，打电话之举一如在西贡订购机票的动作，本身足以宣泄情绪，帮助他逃避现实？

能够确定的是，包括史迈利、康妮或任何看过这份关键记录的人在內，无人能严正指责任何人玩忽职守，因为这个电话最多只称得上是含义模糊：

“洞洞五五香港时间。国外来电，案主私人电话。接线生在线。案主接电话，说‘哈啰’数次。

“接线生：来电者请说话！

“案主：哈啰？哈啰？

“接线生：来电者，听得见我的声音吗？请说话！

“案主：哈啰？我是丽姬·伍芝。请问你是谁？

“来电者挂掉电话。”

这份记录从头到尾并未指明万象是发话地，更令人怀疑的是史迈利可能从未过目，因为他的代号没出现在签名栏里。

无论打电话的人是杰里还是其他人，隔天有两位表亲，而非一位，捎来行动指令，漫长等待后终于让他如释重负。可恶的惰性，尽管延长了似无止境的数周，总算告一段落，而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

他整个下午忙着办理签证与交通事宜，翌晨破晓时渡过湄公河进入泰国东北部，随身携带肩袋与打字机。长形的木制渡船挤满了农民与吱吱叫的猪。来到管制国界的小屋，他宣誓将循相同路线回老挝。否则的话，官员郑重警告他，将不发给入境许可。他心想，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成问题。他回头望越来越远的老挝河岸，看见一辆美国车停在拖船道上，旁边站了两个细瘦的人，纹丝不动地看着。表亲永远与我们同在。

来到泰境河岸，一切顿时成了问题。杰里有签证仍不够，因为相片不像他，整个区域禁止老外进入。十元修正了对方意见。签证之后是交通问题。杰里坚持要找会讲英文的司机，索价也因此哄抬，然而等着帮他开车的老人却只会讲泰文，而且不爱开口。杰里只好对附近米店大喊英文，终于找到会说一点英文的胖小子，说他会开车。三方大费周章拟好了合约。老人的保险并未涵盖另一名驾驶，就算有，反正也早已过期。一个忙坏了的旅行社员工发出新的保单，男孩则回家作好安排。车子是红色福特轿车，摇摇晃晃，轮胎已磨平。接下来一两天，杰里可能碰上的死法有千万种，他不打算碰上，而出车祸是其中之一。讨价还价之后，杰里再拿出二十元。来到满地是鸡的修车厂，他监视修车工人的一举一动，直到新轮胎装妥为止。

浪费了一小时后，他们总算上路，以足以断颈的高速往东南前进，穿越平坦的农田。男孩播放《麻州电灯天天不亮》五次，杰里才要求他停止。

道路铺了柏油却空无一车。偶尔会出现一辆黄色公交车，正对他们蛇行而下，杰里的司机会立刻加速，维持在路中央，一直到公交车让步一英尺，轰然驶过为止。有一次杰里正在打瞌睡，被竹篱压碎声惊醒，正好看到炮弹如泉涌，从他正前方喷进日光中，也见到一辆小卡车以慢动作滚进水沟。他看见车门如树叶向上浮起，双手乱甩的司机从门里滚出来，撞向竹篱，掉入高高的草堆里。男孩并未减速，只不过大笑之下车子在马路上左扭右转。杰里斥喝：“别闹了！”男孩却不予理会。

“你想让西装沾到血吗？留给医生办吧。”他严肃警告，“我会照顾你的，懂吗？这一带乡下很可怕的，很多共产党。”

“你叫什么名字？”杰里听天由命地问。

名字拗口难念，因此两人决定以米奇称呼。

继续开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抵达第一道路障。杰里又打起瞌睡，演练着台词。他心想，一脚踏进去后，一定还会有另外一道门。他思忖着是否总有一天，对圆场而言，对报社而言，这位老艺人再也变不出戏法，连抬腿跨越门槛都没力气，软软站立，面带友善的推销员露齿一笑，言语却死在喉咙里。这一次不行，他很快想到。亲爱的上帝，这一次不行，拜托。

车子停下，一名年轻和尚连忙从树林里捧钵而出，杰里给了几个泰铢。米奇打开行李箱。警察哨兵向里面望去，然后命令杰里下车，带他去见警官。警官单独坐在阴凉的小屋里。花了很长的时间，警官才注意

到杰里的存在。

“他问你是美国人吗。”米奇以洋泾浜英文说。

杰里出示证件。

路障另一边，完美的柏油路面笔直穿越平坦的树丛地带。

“他问你来这里做什么。”米奇说。

“有事找中校。”

继续往前行驶，路过一座村庄，一家戏院。此地连最新电影都是哑剧，杰里回想起。他曾写过一篇报道。本地演员负责配音，剧情全由演员临时编出。他记得约翰·韦恩被配上泰国人尖嗓子，观众哄堂大笑，翻译向他说明，他们听到的是模仿当地村长的声音，而村长是众所周知的娘娘腔。他们正通过森林，但两旁路肩各清除出五十码，以预防有人突袭。偶尔他们会看到地上画出亮眼的白线，其用意不是在指引地面交通。这些马路是由美国人铺设，可充当战备跑道。

“你认识这个中校吗？”米奇问。

“不认识。”杰里说。

米奇开怀大笑。“找他干吗？”

杰里懒得回答。

行驶二十英里后，来到第二个路障，位于一座小村落中央，而小村落已由警方接管。一辆灰色卡车停在寺庙的院子里，四辆吉普车停在路障旁。村子坐落于数条路的交叉口，在他们这条路右转的方向，有条黄色泥土路穿越平原，蜿蜒走上山区两侧。这一次杰里采取主动，立刻跳下车欢呼着：“带我去见你们领导人！”他们的领导人居然是个容易紧张的年轻队长，常焦虑地皱眉，极力想吸收他学习范围之外的事物。他坐在警察局里，手枪摆在桌上。警察局是个临时站，杰里注意到。他看到窗户外面遭轰炸过的废墟，应该是警局旧址。

“我的中校是个忙人。”队长通过司机米奇说。

“他也是非常勇敢的人。”杰里说。

对方一脸茫然，最后总算厘清了“勇敢”一词的英文含义。

“他射过很多共产党，”杰里说，“本报希望报道这位伟大的泰国中校。”

队长说了一会儿，米奇突然噗嗤狂笑起来。

“队长说，我们才没有共产党！我们只有曼谷！这里的穷人什么都不懂，因为曼谷不给他们学校，所以共产党晚上过来跟他们聊天，叫他们把所有儿子全送到莫斯科，念书当大医生，以后可以炸掉警察局。”

“我上哪里找中校？”

“队长要我们待在这里。”

“他会请中校过来吗？”

“中校是大忙人。”

“中校人在哪里？”

“他在邻村。”

“邻村的名字是什么？”

司机再度笑得直不起腰杆。

“那村子没名字，村人死光光啦。”

“村人死光光之前叫什么名字？”

米奇说出一个名字。

“马路能通到那个死村子吗？”

“队长说是军事秘密。表示他也不知道。”

“队长能不能放我们过去看看？”

两人讨论甚久。

“当然，”米奇最后说，“他说我们可以去。”

“能请队长以无线电通知中校我们就要过去了？”

“中校是大忙人。”

“队长能不能用无线电通知他？”

“当然。”司机说，仿佛只有面目可憎的老外才能在这么明显的细节上大做文章。

他们回到车上。栅栏升起，车子继续行驶在完美的柏油路上，路肩清理得干干净净，偶尔冒出路标。开了二十分钟，他们连一个生物的影子都没看见，但杰里并不因空荡而感到安慰。他听说过，若要支持山区每个带枪战斗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平原必须有五人种植稻米，生产弹药，提供基础建设，而这里正是平原。他们来到右边一条泥土路，因最近有人使用，泥沙飞扬到柏油路上。米奇转进这条路，循着沉重的轮胎痕迹前进，大声播放《麻州电灯天天不亮》，不顾杰里抗议。

“这样共产党会以为我们有很多人。”他笑着解释，让杰里无法反对。让杰里惊讶的是，他也从座位底下的袋子取出一把大型点四五口径练习射击手枪，枪管很长。杰里尖声命令他收回原位。几分钟后，他们嗅到火烧气味，然后开过一阵柴烟，接着抵达村子，仅存的几群人个个魂飞魄散，两三百亩的柚木林经大火焚烧后有如化石森林区。也有三辆吉普车，不到二十名警察，中间站着一位粗壮的中校。村人与警察凝视着一块闷烧冒烟的地，宽约六十码，几根焦黑的柱子勾勒出大火肆虐在房屋前的轮廓。中校看着他们停车走过来。他是个骁勇善战的人，杰里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身材矮壮，既不微笑也不皱眉，皮肤黝黑，头发灰

白，有可能是马来人，只不过他的躯干比较粗壮。他佩戴空降肩章与飞行肩章，以及两列勋章彩带。他身穿野战制服，佩戴制式自动手枪，插在右大腿的皮套里，皮带没系上，垂了下来。

“你是那个新闻人吧？”他问杰里，语调平坦，口音是军队的美语。

“没错。”

中校的目光转向司机，说了几句话，米奇快步走向停车处，上车坐好。

“你想问什么？”

“这里有没有死人？”

“三个人。刚被我枪毙掉。我们有三千八百万。”他的美式英语流畅，几乎称得上完美，让杰里内心的问号越变越大。

“为什么枪毙他们？”

“晚上‘共恐’过来开课，四面八方的人都过来听共恐上课。”

“共产恐怖分子。”杰里心想。他直觉认为这个词源自英国。一列卡车开上泥土路前来，村民一见卡车，纷纷收拾地铺，抱起儿女。中校下令部属将村民集合为粗略的纵列，等卡车转弯。

“我们帮他们找到更好的地方，”中校说，“让他们重新开始。”

“你枪毙了谁？”

“上个礼拜，我有两个手下被炸死。这村子是共恐发号施令的地方。”他选上一名面容阴郁、正要爬上卡车的妇女，命令她走回来，让杰里好好看她一眼。她低头站着。

“他们住在她家。”他说，“这一次我枪毙她丈夫，下一次就枪毙她。”

“另外两个呢？”杰里问。

他发问是因为继续发问等于持续出拳，然而接受审问的人不是中校，而是杰里。中校的棕色眼珠严峻，带有审核的意味，态度多有保留，以质问的眼神盯着杰里，却了无焦虑感。

“有个共恐睡了这里一个女孩，”他轻描淡写，“我们不但是警察，我们也是法官和法院。这里没有其他人。曼谷才不想在这里举行公审。”

村人上了卡车。卡车离去时他们头也不回。只有儿童从后挡板上方挥手。吉普车跟着卡车走，留下他们三人，两辆车，以及一个年约十五岁的男孩。

“他是谁？”杰里问。

“他跟我们走。明年，也许后年，连他我都会枪毙。”

杰里上了吉普车，坐在中校旁边，由中校开车。男孩被动地坐在后

面，中校以坚定而机械化的语调向他说教，他喃喃地应答着。米奇驾驶出租车跟在后面。在吉普车地板上，在座位与踏板之间，中校放了一个厚纸箱，里面有四颗手榴弹。后座摆了一把小机枪，男孩上车时，中校懒得移开。后视镜上方，在宗教图片旁，挂的是肯尼迪的画像明信片，底下注明：“问你能为国尽什么力，别问国家能为你尽什么力。”杰里取出笔记簿。他继续对男孩说教。

“你跟他讲什么？”

“我是在解释民主的原则。”

“什么原则？”

“没有共产党，没有将军。”他边笑边回答。

上了柏油路，他们右转，继续深入内陆，米奇则开着红色福特汽车跟在后面。

“跟曼谷打交道，就像爬那棵大树一样，”中校对杰里说，一面手指着森林，“爬上一根树枝，高度就增加一点，换了树枝，树枝断了，又爬得更高。也许有一天，你会当上最高将领。也许永远不会。”

两名幼童朝吉普车招手，中校停下车，让他们上来挤在男孩身边。

“这种事，我不常做，”他边说边忽然微笑，“只是想对你表示我是个好人。共恐如果知道你会停车载小孩，就会找更多小孩子来让你停车。要懂得变通，这样才能生存。”

他又转弯朝森林开去。走了几英里路，他让幼童下车，郁闷的男孩则留下。树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荒凉的矮丛区。天空泛白，丘陵的阴影正要穿透薄雾而出。

“他怎么了？”杰里问。

“他？他是个共恐，”中校说，“被我们逮到了。”来到森林里，杰里看见金光一闪，只是座寺庙。“上个礼拜，我有个警察变节，帮共恐卧底。我派他去巡逻，枪毙他，让他当大英雄。我还帮他老婆弄个养老金，买了大国旗包住尸体，葬礼办得很大，村人也稍微变得有钱一点。那人已经不再是通风报信的人了。他变成了地方英雄。非赢得这些人的心不可。”

“有道理。”杰里赞同。

车子开到一处宽阔的旱田，两名妇人在中央锄地，除了远处的树丛之外空无一物，多岩沙丘渐次消失在白色天际。杰里叫米奇留在福特车上，与中校开始步行到旱田另一边，郁闷男孩跟在后面。

“你是英国人？”

“是。”

“我在华盛顿国际警察学校待过，”中校说，“很不错的学校。我在密执安州大念过警政。他们让我们大开眼界。请你稍微离开我一点行

吗？”他客气地要求，这时两人正谨慎跨过一个犁。“他们射击的对象是我，不是你。射中老外，在这里会惹上太多麻烦。他们不想惹麻烦。在我的地盘，没人射老外。”

他们来到两名妇人处。中校向她们说了几句话，走了一段距离，停下，回头看看郁闷男孩，再回到妇女身边，又对她们说了几句话。

“怎么了？”杰里问。

“我问她们这附近有没有共恐。她们说没有。后来我想到，说不定共恐想把这男孩抓回去。所以我回去跟她们说：‘如果一有不对劲的地方，我先枪毙你们两个女的。’”他们来到树丛处。沙丘在他们前方，高大的树丛与如刀剑般的棕榈茂密丛生。中校双手围在嘴边大喊，直到有人响应为止。

“这是我在丛林里学会的，”他面带微笑说明，“一走进丛林，就一定要先呼叫。”

“你说的是什么丛林？”杰里问。

“现在跟我讲话时，请靠近我一点。说话时微笑。他们希望把你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走到一条小河边。绕过小河，有一百多名男人与男孩心不在焉地以镐与圆锹挖着石头，有的则扛着一袋袋石灰，从这一大堆搬到那一堆。五六名武装警察虽然监着工，却似乎玩忽职守。中校叫郁闷男孩过来，对他说话，男孩低头，中校则猛然打了他几耳光。男孩喃喃说话，中校又赏他耳光，然后拍拍他肩膀，男孩接着如折翼的放生鸟仓皇加入劳动的行列。

“你报道共恐，也报道我的水坝，”中校命令。两人开始往回走，“就盖在这片美好的青草地。会以我命名。”

“你在哪个丛林里打过仗？”往回走时杰里再问一次。

“老挝。战况惨烈。”

“你自愿参加的吗？”

“当然。我有小孩，需要用钱。我加入paru。听过paru吗？是美国人的单位。由美国人负责。我写信向泰国警方辞职，被他们收进抽屉。如果我死了，他们会拿出辞职信证明我在加入paru前辞职。”

“打仗时认识了瑞卡度喽？”

“当然。瑞卡度是我朋友。我们一起打仗，开枪打死了很多人。”

“我想见他一面，”杰里说，“我在西贡碰见他的一个女朋友。她跟我说，瑞卡度住在这附近。我想跟他谈个生意。”

他们再度走过那两名妇人。中校朝她们挥手，但她们置之不理。杰里盯着他的脸观察，但他看到的表情不比沙丘上的巨岩多到哪里。中校爬上吉普车，杰里也跟着跳上。

“我希望你能带我去找他。我甚至可以让他过几天有钱人的生活。”

“是为了报社吗？”

“是私事。”

“私下谈生意？”中校问。

“没错。”

开回柏油路上时，两辆黄色水泥搅拌卡车朝他们开来，中校不得不倒车让他们通过。杰里自然而然注意到漆在搅拌车旁的名称，这时他瞥见中校正在打量他。他们继续朝内陆前进，以吉普车最高速限行驶，为的是防止路上遭小人暗算。忠心的米奇跟在后面。

“瑞卡度是我的朋友，这里是我的地盘。”中校以极标准的美语说。这句话尽管耳熟，这一次却具有全然明显的警告意味。“他住在这里接受我保护，因为我们定过协议。这里人人知道这件事。村人知道，共恐也知道。没人敢动瑞卡度汗毛，否则看我枪毙水坝那边的每个共恐。”

他们离开柏油路，转进泥土路时，杰里看见柏油路面上有小型飞机的轻微煞车痕迹。

“这里是他降落的地方吗？”

“只有在雨季。”中校继续描述他的道德立场，“如果瑞卡度杀了你，那是他自家的事。在我地盘上，老外枪毙老外是天经地义的事。”口气宛如对儿童解释基本算术。“瑞卡度是我的朋友，”他毫不羞赧地重复，“是我的同志。”

“他知道我要来吗？”

“请多留心他。瑞卡度机长有时候很变态。”

“刁特别为他准备了一个地方，”查理·马歇尔说过，“一个只有疯子才去的地方。刁对他说：‘你好好活着，飞机你留着开，想武装护送查理·马歇尔随时请便，如果查理要你帮他运钱，帮他注意小人，你就照做。说话要算话，德雷克·柯说话向来都算话。’他说。不过，如果小瑞惹了麻烦，或是小瑞捅出篓子，或是大嘴巴泄露秘密，刁和他的手下会把他这个烂杂种砍得不像话。”

“小瑞为什么不干脆开了飞机逃命？”杰里当时问。

“刁拿走了小瑞的护照啦，伏尔泰。刁帮小瑞偿还债务，让他做生意，替他清除前科。刁也让他扯上大约五十吨的鸦片，必要时能对缉毒署提供证据。小瑞啊，他想走随时都行，全世界都有监狱等着他。”

房子建筑在高架上，位于宽阔泥土路正中央，四周有阳台环绕，旁边有小溪流过，两名泰国女孩在房子下，一个正在喂婴儿，另一个正在搅动锅子。房子后面有片平坦的棕色原野，一端建了茅屋，大得足够容纳小飞机——比方说毕奇——原野则出现一道青草被压扁的银色轨迹，可能最近有飞机降落。房子附近没有树木，坐落于微微隆起之地，三百

六十度无障碍景观，宽阔的窗户建得不十分高，杰里推测窗户经改装，以提供屋内更宽广的射击角度。快到屋子时，中校要杰里下车，往回走向米奇的车子。他对米奇说话，米奇跳下车，打开行李箱。中校伸手到座位下取出练习手枪，以轻蔑的态度扔进吉普车。他对杰里搜身，然后对米奇搜身，然后亲自检查车子。然后他叫两人在外面等，他爬上阶梯来到一楼。两名女孩对他视而不见。

“他是个好中校。”米奇说。

两人等着。

“英国是个有钱国家。”米奇说。

“英国是很穷的国家。”杰里反驳，两人继续盯着房子。

“国家穷，人民有钱。”米奇说，对自己的笑话笑得全身抖动，这时中校走出门，登上吉普车，开车离去。

“你在这里等着。”杰里说。他缓步走向阶梯底部，双手围在嘴边向上呼唤。

“敝姓威斯特贝。几个礼拜前，你在金边对我开过枪，你可能还记得。我是个穷记者，点子却能赚大钱。”

“你想干吗，伏尔泰？有人说你早就死了。”

南美口音，深沉而轻快，从黝黯的上方传来。

“我想向德雷克·柯勒索。我在想，我们两人可以跟他敲诈两百万，你就能赎回自由之身。”

杰里看见上方阴暗的通风口中，有一支枪管如同独眼龙的眼睛眨动，然后再度对准他。

“分开算，”杰里呼唤，“你两百万，我两百万。我有周详的计划。凭我的头脑和你的信息，再加上丽姬·伍辛顿的身材，我们稳赢。”

他开始慢慢上楼。“伏尔泰。”他心想。

查理·马歇尔传话起来丝毫不马虎。至于“早已死了”，再花一点时间吧，他心想。

杰里爬过通风口，从黑暗之处移进光明之处，南美口音说：“站住别动。”杰里遵命，这时能够四下观察室内，是个小型军事博物馆与美军福利社的综合体，中央有张桌子，三脚架上安装AK47，类似瑞卡度朝他开火的那一把。正如杰里怀疑的，这把枪透过窗户能掌握由四面八方前进的人车。万一有所闪失，也有两把枪备用，旁边各放一排可观的弹药匣。手榴弹三四成堆，像水果一样到处放，在丑陋的胡桃木酒柜上，在塑料圣母像之下，摆出五花八门的手枪与机关枪，可应付各种场合。房间只有一个，占地却非常大，低矮的床铺两端涂上日本漆与亮光漆。杰里一时兴起愚蠢的念头，不知道瑞卡度是怎么有办法爬上毕奇飞机。冰箱有两台，制冰器有一台。几幅画得用心过度的泰国裸女油画，煽情之

余却比例有误，这种错误通常由于太少接触作画对象。卧房里也有个档案柜，上面放了一把卢格尔手枪，书架上的作品有《公司法》、《国际税务》、《性爱技巧》等书。墙上挂了几个本地人雕刻的圣像、圣母、年幼的耶稣。地板上摆了划船器的钢架，上面有移动座椅以保持身材。

这些陈列物的中央，瑞卡度以杰里首度看见他时的坐姿，坐在高级主管的旋转椅上，戴着CIA手链，身缠纱笼，在壮观的裸胸上挂了金十字架。他的大胡子比杰里上次见到时短得多，他猜楼下的女孩帮他修剪过。他没戴帽子，卷曲的黑发以小金环串上，荡在后颈上。他肩膀宽厚，肌肉结实，皮肤黝黑油亮，胸毛茂盛。

他肘边也放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罐水，没有冰块，因为没电供冰箱运作。

“请脱下外套，伏尔泰。”瑞卡度命令，杰里遵命。瑞卡度叹了一口气起立，拾起桌上一把自动手枪，慢慢绕着杰里走动，打量他的身体，一面轻轻搜身，检查是否携带武器。

“你打不打网球？”他从身后询问，一手向下摸着杰里的背部，动作非常轻，“查理说你肌肉发达得像猩猩。”然而瑞卡度其实并未向任何人发问。发问对象是他自己。“我很爱打网球。我打起来好得不得了。每次都赢。可惜在这里，打网球的机会很少。”他坐下。“有时候不得不跟敌人躲在一起，以避开朋友。我会骑马、打拳击、射击。我有学位，我会开飞机，我对人生懂得不少，我头脑很好，不过碍于无法预知的状况，我跟猴子一样住在丛林里。”自动手枪随使用左手拿着。“你们所谓疑神疑鬼，就是这样吧，伏尔泰？把所有人都当做敌人。”

“应该是的。”

瑞卡度为了说出以下经常讲的俏皮话，伸出一指戳着自己泛着油光的古铜色胸膛。

“我这个疑神疑鬼的人，却有真正的敌人。”他说。

“有了两百万，”杰里仍站在原地说，“我相信能消灭大半敌人。”

“伏尔泰，容我坦白说一句话，我认为你的生意经是鬼扯淡。”

瑞卡度大笑，大方展示出白牙，衬托了刚修剪过的胡子，也微微展现腹肌，双眼则直瞪杰里脸孔，一面啜饮着酒杯里的威士忌。杰里心想，他跟我一样，接获过通报。

要是他出现，你听他把话讲完，刁无疑如此告诉过他。瑞卡度听他把话讲完，之后呢？

“你发生过意外，我绝对谅解，伏尔泰。”瑞卡度伤感地说，摇摇头，仿佛抱怨着他获得的信息质量低下，“要喝一杯吗？”

“我自己倒。”杰里说。杯子放在橱柜里，有各式各样颜色与大小。杰里从容走到橱柜边，自己拿来一个细长的粉红色玻璃杯，外面画了穿上衣服的女孩，里面则是裸女。他倒了几厘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加一

点水，隔着桌子坐在瑞卡度对面，瑞卡度则一面兴味盎然地研究他。

“你运动吗？举重之类的？”他以诉说心事的语气询问。

“只是偶尔喝一杯而已。”杰里说。

瑞卡度毫无节制地大笑，仍以闪烁不定、眼皮下垂的双眼紧紧观察他。

“你对小查理做的那种事很可恶，你知道吗？半夜押走我的朋友，坐在他头上，逼他戒毒，我很不喜欢。查理要很久才能复原。伏尔泰，想跟查理的朋友交朋友，那样可不是办法。他们说，你甚至对柯很失礼。还带我的小丽姬去吃晚餐。是真的吗？”

“我是请她吃过晚饭。”

“搞过她吗？”

杰里没有回答。瑞卡度再度爆笑。笑得突然，停得也突然。他长长喝了一口威士忌，叹息说：“我倒希望她心怀感激，就这么简单。”他立刻又成了备受误解的人。“我原谅她，行了吧？你再见到丽姬时跟她说，瑞卡度原谅了她。我训练她。我培养她走对路。我告诉她很多东西，艺术、文化、政治、商业、宗教，还教她怎么做爱，派她出去见见世面。没有我的人脉，她会沦落到哪里？哪里？跟瑞卡度像猴子一样住在丛林里。她欠我一切。《窈窕淑女》。看过那部电影吗？我是她的教授。我跟她讲过一些东西，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跟她讲过的一些东西，是除了瑞卡度之外没人能教她的东西。在越南七年。在老挝两年。CIA一个月给四千块，我是天主教徒。你认为我没办法教她一些东西吗？出身卑微的英国浪女。她有个小孩，你知道吗？小男孩，在伦敦。她丢下儿子离家出走，想像一下。这种母亲？比妓女还烂。”

杰里找不到可以应答的话。他看着瑞卡度沉重的右手中指与无名指各有一只大戒指，凭记忆来比对丽姬下巴那两道疤痕。他认定是朝下挥出的一拳，是趁她在低处时挥出的右钩拳。没有打烂她的下巴，还真奇怪。也许被他打烂了，她只是有幸修补起来而已。

“你聋了是吗，伏尔泰？我说，你要谈的生意说来听听。没有偏见，懂吗？只不过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杰里自己又斟了一点威士忌。“我是在想，要是你能告诉我，那次德雷克·柯要你帮他飞的东西是什么，要是丽姬能让我接近柯，我们三人都不搞小动作的话，很有机会大大敲诈他一顿。”

终于说出口了，听起来比他演练时更加蹩脚，但他不太在意。

“你疯了，伏尔泰。疯了。你是对着空气画饼。”

“要是柯找你帮他飞中国大陆，我就不算发疯了。就我所知，柯有财力买下整个香港。不过如果总督听见你跑的那一小趟，我保证他和柯会在一夕之间闹翻。这还只是开场。好戏在后头。”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伏尔泰？中国？胡说八道个什么劲？中国大陆？”他耸耸亮闪闪的肩膀，拿起酒杯喝酒，对着酒杯窃笑，“我搞不懂你，伏尔泰。你根本是在放屁。你凭什么认为我帮柯飞中国？荒唐。可笑。”

杰里发现，以说谎技巧而言，瑞卡度的层次比丽姬还要低三级，遥不可及。

“凭我的编辑，好友。我的编辑头脑精得很。认识不少很有影响力的朋友，见多识广的朋友。他们会跟他通风报信。举例来说，我的编辑有个很厉害的直觉，认为你不幸坠机惨死后没多久，卖了很大一批鸦片原料给友好的美国人，而这个美国买家的工作是遏阻危险药物的传播。他的另一个直觉是，那批鸦片的主人是柯，卖家根本不是你，对象是中国大陆。只不过你决定冒充一下。”瑞卡度的眼睛从威士忌酒杯上方望着他，他紧接着说：“果真如此，假设柯真正的野心是让大陆人再染上鸦片毒瘾，慢慢来，逐渐开创出新市场，懂了吗？这样的话，我保证他会使出全力预防这消息登上全球报纸的头版。还不只这样。另外还大有千秋，甚至更有赚头的事业。”

“那又是什么，伏尔泰？”瑞卡度问，继续紧盯他，仿佛以步枪准星锁定了他，“你所谓的事业是什么？愿闻其详。”

“这个嘛，我希望暂时保留，”杰里坦然微笑，“我希望你先讲一些东西来交流交流。”

一名女孩悄悄上了楼梯，端来几碗米饭与柠檬香茅鸡。她身材苗条，全身上下无不动人。房子下传来人声，包括米奇的声音在内，也有婴儿咯咯笑的声响。

“楼下是谁，伏尔泰？”瑞卡度含糊地问，仍未完全回过神来，“你是带了该死的保镖还是什么来？”

“只是司机而已。”

“带枪吗？”

杰里没有作答，瑞卡度摇摇头，露出不解之情。“你这家伙疯了，”他边说边挥手要女孩退下，“你这家伙真的发疯了。”他递给杰里碗筷。“圣母玛丽亚。那个姓刁的，他是个很难缠的人。我自己也很难缠。不过那些华人啊，发起狠来也能六亲不认，伏尔泰。惹到像刁那种人，你的麻烦可大了。”

“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杰里说，“我们会找英国律师。我们把罪状堆得老高，任他们派出一整个棋盘的主教也打不倒。我们可以开始找证人。你，查理·马歇尔，知道内情的人全找出来作证。说出他讲话的内容，做了什么，讲出日期和时间。接着寄一份给他看，剩下的东西，我们也会相信，然后跟他订个契约。签名、封缄、寄出。全照法律规矩。他喜欢照规矩来。柯是个凡事讲求法律的人。我查过他的商业活动。我也看过他的银行存提款明细，他的资产。光有这些东西，已经很

够看了。如果再加上我刚讲的那些事业，我保证五百万已经算他便宜了。你两百万，我两百万，丽姬一百万。”

“一毛也别给她。”

瑞卡度弯腰打开档案柜的一个抽屉，开始一份份寻找，研究着手册与信件。

“去过巴厘岛吗，伏尔泰？”

瑞卡度脸色凝重地戴上老花眼镜，坐在桌前，开始研究档案。“几年前我在巴厘岛买了一些土地。是我谈成的一桩生意。我谈成的生意可多着呢。走路，开车，买了一辆本田，一九七五年，一个女孩。在老挝，我们见人就杀，在越南我们烧掉整个他妈的乡下。我在巴厘岛买了这块地，一小块总算没被我们烧杀过的土地，买了这个没被我们杀掉的女孩，知道我的意思吗？五十英亩的矮丛地。这里，你过来。”

杰里从他肩膀后望去，看到建筑师的油印图解，画的是一处地峡，分割成建筑用地，加以编号，左下角写着：“瑞卡度与伍辛顿股份有限公司，荷属安第列斯群岛。”

“你来跟我合伙做生意好了，伏尔泰。我们一起开发这块地好了。盖五十栋房子，一人一栋，找几个好人，让查理·马歇尔当管理人，找几个女孩，弄成小小区，聚集艺术工作者，有时候办个演奏会。你喜欢音乐吧，伏尔泰？”

“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杰里语气坚定不移，“日期、时间、地点、证人的说法。你一告诉我，我就跟你交换。刚才提过的事业，我会解释给你听，赚大钱的事业。我会解释整件生意。”

“当然，”瑞卡度心有旁骛地说，仍研究着地图，“我们来整整他，由我们来整。”

这就是他们同居的情形，杰里心想，他们一脚踏在幻想世界，另一脚踩在监狱里，互相强化彼此的美梦，是只有三名演员的乞丐歌剧。

有半晌的时间，瑞卡度沉浸于自己的罪恶，杰里则束手无策，无法制止他。在瑞卡度的简单世界里，多谈谈自己的事，可以借此多了解他人。因此他谈及自己偌大的气魄，吹嘘自己的性能力，担心盛年能持续多久，但他谈最多的莫过于战争的恐惧，在这一方面他自认无所不知，高人一等。“伏尔泰，我在越南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我，瑞卡度，坠入爱河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对我具有神圣的意义。黑头发，腰杆直，脸蛋像圣母，奶子小。每天早上她上学路上，我停下吉普车，每天早上她都说：‘不要。’我告诉她：‘听着，瑞卡度不是美国人。他是墨西哥人。’她连墨西哥都没听过。我抓狂了，伏尔泰。我，瑞卡度，过了好几个礼拜的和尚生活。其他女孩子，我连碰都不碰了。每天早上。后来有一天，我已经换成一挡了，她举起手来——停车！她上了车，坐在我旁边。她不上学了，跟我跑到一个小村子同居，村名我以后告诉你。B52轰炸机飞来了，炸平了整个村子。某个大英雄地图看不太懂。小村

子，一个个都像海滩上的石头，每个都一样。我开的直升机就在后面。没有人阻止得了我。查理·马歇尔在我旁边，对着我大骂说我疯了。我才不管。我降落，找到了她。整个村子都死光光。我找到她了。她也死了，不过还是给我找到了。我回到基地，宪兵把我毒打一顿，关禁闭七个礼拜，丢了军阶跟资历。我。瑞卡度。”

“好可怜。”杰里说。这些游戏，他以前也玩过，无论相信或不相信，都痛恨这种游戏。

“你说的没错，”瑞卡度说，一鞠躬接受了杰里的致意，“‘可怜’这词用得好。他们拿我们当农夫。我和查理，我们什么都飞。从来没拿过像样的薪饷。伤员、死者、尸块、毒品。结果什么都没得到。天啊，那场战争打得真惨。我飞进云南两次。我不怕。什么都不怕。连我俊美的外表都没办法让我为自己担心。”

“连德雷克·柯的那一趟都算进去，”杰里提醒他，“总共飞了三趟，对不对？”

“我帮柬埔寨空军训练飞行员。结果什么都没得到。柬埔寨空军啊，伏尔泰！十八个将军，五十四架飞机，加上瑞卡度。条件是服役完毕能拿到寿险。十万美金。只给本人。瑞卡度一死，最近血亲什么都领不到，合约是这样写的。瑞卡度成功，什么都拿得到。我有一次跟法国外籍兵团的几个朋友谈过，他们知道这种骗人的把戏，警告我：‘小心一点啊，瑞卡度，没过多久他们会派你到没办法脱身的危险地带，那样的话，他们就不用付你钱了。’柬埔寨人只让我加半满的油料，给我辅助油箱和废物。也有一次，他们在我的液压机上动了手脚。修飞机，我自己来。那样他们就害不了我。告诉你，我一弹手指，丽姬就乖乖回到我身边，懂吗？”

午餐结束。

“照你这么说，刁和德雷克那边又是怎么一回事？”杰里说。沙拉特的人说，想取得告白，只需给点颜色。

杰里首度体会到，瑞卡度以一种野蛮愚昧的眼神全盯着他看。

“我被你搞糊涂了，伏尔泰。要是跟你讲太多了，我不枪毙你不行。我是个非常多嘴的人，懂了吗？我一人住在这里很寂寞，我的个性一向喜欢寂寞。我一欣赏某个人，就会跟他聊天，然后会后悔。我记得生意上的承诺，懂了吗？”

顿时杰里内心泛起一阵宁静，如同沙拉特人变成沙拉特天使，除了接收并记忆之外无计可施。他知道，就情报行动而言，他已走到旅程的尽头：即使在最佳状况下，回程无法想像亦然。就情报行动而言，以他了解的先例，无声的凯旋钟早应在他耳边响起，令他感动万分。然而钟声并未响起。钟声未响，对他而言是一项早期警讯，即使在当时，这项警告意味着他追求的目标就各方面而言，再也不符合沙拉特老大的目标。

起初在允许瑞卡度自吹自擂的情况下，叙事内容与查理·马歇尔所言出入不多。老刁来到万象，衣着如苦力，全身散发猫臊味，到处打听当地最棒的飞行员，自然而然有人介绍瑞卡度给他，而瑞卡度也正值两趟行程之间的空当，有时间进行航空领域的某项获利颇丰的专业任务。

与查理·马歇尔不同的是，瑞卡度叙述时专心、直接，仿佛听众的智慧不如自己。老刁自我介绍时自称在航空界人脉很广，提及与印支包机之间不明的关联，然后叙述他已与查理·马歇尔谈过的部分。最后他说了该项任务，若以沙拉特优美的说法是他替瑞卡度想好的掩饰之词。他说，与老刁有来往的某大曼谷贸易公司正和友好邻邦部分官员接洽，希望凑合一顶极为合法的交易。

“伏尔泰，我非常严肃地问他：‘刁先生，难不成你刚登陆月球了吗？我从没听过哪个亚洲国家有什么友好邻邦。’老刁被我逗笑了。显然他觉得我讲得很机智俏皮。”瑞卡度说得非常严肃，再度用上间歇性出现而不搭调的商学院英语。

然而，在这项高获利而且合法的交易成交之前，根据瑞卡度的说法，老刁说明，他的同事面临的问题是必须先买通友好邻邦的某些官员与其他人士，以清除烦人的官僚障碍。

“那算什么问题？”瑞卡度当时问，问得不能说不自然。

老刁说，假设该国是缅甸。只是假设。在现代的缅甸，政府官员不得营私，转账进银行也不容易，因此必须另寻付款之道。

瑞卡度的建议是黄金。瑞卡度说，老刁反悔了：他心目中的这个国家连黄金都很难转让兑现，因此他说交易货币必须选用鸦片，总共四百公斤重。距离并不遥远，瑞卡度一天之内可以来回，费用是五千元，其余细节在起程前向他担保，以免导致瑞卡度所言的“不必要的记忆侵蚀”。瑞卡度这种怪异的用语，必然对他一手栽培的丽姬具有重大影响。老刁向瑞卡度保证，这一趟航程毫不痛苦，别具启发性，一返回原地，立刻以便利的货币种类送上五千美元的酬劳。但瑞卡度当然必须先出示委托物抵达目的地的证明，例如收据。

瑞卡度描述着个人历程，如今显露出与老刁交手时那种未经雕琢的狡猾。他告诉老刁，他会考虑他提出的条件。他提到其他迫待进行的任务，也提及开办自己航空公司的心愿。接着他着手调查老刁是何许人等。两人见面后，他立刻发现老刁并未返回曼谷，而是直飞香港。他叫丽姬向印支包机的潮州佬套套风声，其中一人口无遮拦，说出老刁是中国海空的老大，因为他在曼谷时投宿四面佛大酒店的中国海空套房。在老刁重返万象听取瑞卡度的回答前，瑞卡度已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甚至知道老刁是德雷克·柯的左右手，只是不愿大肆声张而已。

两人二度见面时，他告诉老刁，一天来回，五千元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多。如果这趟任务如老刁强调的那么轻松，五千元就算太多了。如果正如瑞卡度怀疑的毫无章法，五千元就算太少了。瑞卡度建议改变交易条件，“商业上的妥协”他说。他解释自己“暂时因流动性问题而周转不

灵。”无疑的，他常用这种说法。换言之（依杰里的诠释），他与往常一样一贫如洗，而债权人频频上门讨债。他立刻提出要求，希望能有份定期收入，最好是由老刁安排他进入印支包机担任飞行员顾问，为期一年，双方同意月薪两万五千美元。

据瑞卡度说，老刁对他提出的条件似乎不感震惊。在高脚屋的楼上，室内变得寂静无比。

其次，与其完成交递后领收五千元，瑞卡度希望先领两万美元以推却现有的任务。一旦送完鸦片，立刻可再领一万，剩下一万可由“源头”扣除。以瑞卡度的专门用语而言，表示可从他在印支包机剩下几个月的薪水扣除。如果老刁与同事无法答应，瑞卡度解释，很不幸的，他在运送鸦片前必须出差一趟。

隔日，老刁更动了部分条件，答应了瑞卡度的要求。老刁与同事不愿预支瑞卡度两万美元，提议直接向瑞卡度的债权人偿还债务。他解释，这样他们会感觉比较自在一点。同一天，双方订下一纸慎重的“圣盟”——瑞卡度坚贞的宗教信念随处可见，以英文立约，由双方签名。瑞卡度就此出卖了灵魂，杰里暗自记下。

“对这个交易，丽姬作何感想？”杰里问。

他耸耸油亮的肩膀。“女人嘛。”瑞卡度说。

“是啊。”杰里边说边以会心微笑响应。

瑞卡度的前途就此定案后，恢复了他所谓的“适合专业身份的生活方式”。他看上了一项创业机会，希望成立足球签赌事业，只针对亚洲人。同样获得他青睐的是曼谷一位名叫萝西的十四岁少女。凭他在印支包机工作的财力，能定期前往探望，为她的人生大舞台作好准备。他偶尔会替印支包机跑几趟，次数并不频繁，行程也不辛苦。

“清迈两三次。西贡。去掸族山区两三次，看看查理·马歇尔的老头，也许拿一点鸦片，帮他带一些军火、白米、黄金。也跑跑马德望。”

“丽姬那时候人在哪里？”杰里问，语调如前，轻松自在，是男人聊天的口气。

又是轻蔑的耸肩。“坐在万象。钩钩毛线，到群星钓钓凯子。她已经是老女人一个了，伏尔泰。我要的是青春、乐观、有活力又尊敬我的人。我本性乐善好施。对一个老女人，我能给什么？”

“到什么时候？”杰里问。

“呃？”

“友好的态度，什么时候结束的？”

瑞卡度误解了这个问句，突然目露凶光，嗓音压低，具警告意味。“这话什么意思？”

杰里以最友善的微笑来缓和局面。

“多久领一次钱？老刁多久依合约叫你出发一次？”

瑞卡度说，六个星期。他恢复了镇定。有时候八星期。有两次出发后又取消。有一次，他接获命令到清迈，游手好闲了两三天，直到老刁最后打电话说那边的人还没准备好。瑞卡度说，他逐渐领会到自己被卷进深不可测的局面，不过他暗示，历史之神总分配给他人生中重大的角色，何况债权人也不再上门了。

瑞卡度歇口，再度仔细端详杰里，搔着胡子沉思。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为两人各斟一杯威士忌，将酒杯推向桌子另一边。在他们下方，完美的一天正缓缓日薄西山，绿色大树转为沉重。女孩锅子下的柴烟带有潮湿的味道。

“你接着要上哪里，伏尔泰？”

“回家。”杰里说。

瑞卡度突然笑起来。

“你今晚在这里过夜，我派一个女孩给你。”

“其实我想走自己会走，伙计。”杰里说。两人如对打中的动物，观察着对方，一时之间战斗的火花确实一触即发。

“你真是头脑有问题，伏尔泰。”瑞卡度喃喃地说。

然而沙拉特人胜出。“后来有一天你飞成了，对不对？”杰里说，“没人取消行程。然后呢？快讲啊，伙计，说来听听。”

“当然，”瑞卡度说，“那当然，伏尔泰，”再喝一口，仍观察着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听好，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伏尔泰。”

说完后枪毙你，他的双眼说。

瑞卡度人在曼谷。萝西吵着要他来。老刁坚持要瑞卡度一直待在能够联络的范围之内。后来有天一大早，大概五点钟，有个传信人来到两人的爱巢，通知他即刻前往四面佛酒店。瑞卡度对那间套房赞不绝口。要是自己能有一间该有多好。

“看过凡尔赛宫吗，伏尔泰？办公桌跟B52一样大。这个老刁，跟当初来万象那个浑身猫躁的苦力可是天南地北，懂吗？他可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瑞卡度，’他告诉我，‘这一次确定了。这一次我们要送货了。’”

他的命令很简单。几个小时后，有班民航将飞抵清迈。瑞卡度应该搭那班飞机。琳康旅馆的房间已经帮他订好。他应该在旅馆过夜。一个人。不准碰酒色，不准交际。

“‘最好多带一点书去看，瑞卡度先生。’他告诉我。‘刁先生，’我告诉他，‘要飞哪里，由你吩咐，不过要在哪里看书，你可管不着，懂吗？’这家伙一坐大办公桌就牛得不得了，了解吗，伏尔泰？我不得不教

他一点待人之道。”

隔天上午，有个自称钱宁先生的朋友的人会在六点到旅馆叫他。瑞卡度应该跟他走。

过程依计划顺利进行。瑞卡度飞至清迈，在琳康度过无酒无色的一晚，清晨六点两名华人，而非一名，过来找他，开车送他往北，走了几个小时，来到一个客家庄。三人下车后，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空旷的原野，一端有间小屋。小屋里面放了一架“可人的小毕奇”，全新。老刁坐在驾驶座旁边，膝盖上摆了许多地图与文件。后座已拆除，腾出空间来装黄麻布袋。两名华人保镖站立一旁监视，瑞卡度暗示，现场气氛并不尽然讨他欢心。

“一开始是要我掏出口袋里所有东西。口袋对我来说是很私人的东西，伏尔泰，就像女士的手提包一样。纪念品。信件。相片。我的圣母像。他们扣押了所有东西。我的护照，我的飞行执照，我的钱……连我的手链都扣。”他说着举起棕色的手臂，让金链条铃铃作响。

他皱眉表示不愿苟同，接着说，之后还有更多文件等他签。例如代理人，把瑞卡度签下印支包机合约后仅存的人权全签让出去。例如坦承“之前严格说来违法的行为”共有数桩——瑞卡度说来愤慨——是为印支包机执行的任务。他后来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华人保镖竟是律师。瑞卡度认为这样做特别有违道德原则。

签完文件后，老刁才打开地图，指出路径，瑞卡度此时回想起来，话中带有个人风格与老刁的风格：“你往北走，瑞卡度，一直向北走。就算你削掉老挝的一角，就算你待在掸族山区，我也不管你。开飞机是你的事，我管不着。进入中国边境五十英里后，你沿着湄公河上空飞，一直往北，飞到一个叫做天保的小镇，就在知名的湄公河支流上。往正东方飞二十英里，你会发现一条起降跑道，一个白色照明弹，一个绿色，然后请帮我一个忙。你在那里降落。有个人会在那里等你。他的英文讲得很破，不过还是说得通。这里有半张一元钞票。另一半在那人手里。卸下鸦片。那人会给你一个包裹，会给你一些特别指示。这个包裹就是你的收据，瑞卡度先生。回来时包裹要带在身上，绝对遵守每项指示，特别要注意降落地点。我讲的话，你是不是全听进去了，瑞卡度先生？”

“什么样的包裹？”杰里问。

“他没设，我也不想问。‘照我的话去做，’他告诉我，‘闭上你那张大嘴巴，瑞卡度先生，我的同事会把你当儿子，一辈子好好照顾你。你的小孩，他们也会照顾，你的小姐也一样。你在巴厘岛的小姐。他们一辈子会对你感激不尽。不过要是你扯他们后腿，或是到处乱讲话，他们肯定会干掉你，瑞卡度先生，相信我。也许不是明天，也许不是后天，不过肯定会干掉你。我们订了合约，瑞卡度先生。我的同事订下合约后绝不反悔。他们是非常讲法律的人。’我吓出一身汗哪，伏尔泰。我身体状况优良，经常运动，却吓出一身汗。‘你别担心了，刁先生。’我告诉他，‘刁先生，您想载鸦片进红色中国时，找瑞卡度准没错。’伏尔泰，

相信我，我当时担心得很。”

瑞卡度捏捏鼻子，仿佛被海水刺痛般。

“这个你听好，伏尔泰。仔仔细细听着。我年轻莽撞的时候，曾经帮美国人飞进云南两次。想当英雄，不得不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如果坠机了，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救你出来。不过每次我开飞机进中国，我往下看着苍黄的泥土，看见瑞卡度被关在木笼子里。没有女人，吃的东西难以下咽，没地方可坐下，没地方可站可睡，两手被链条绑住，没有身份地位。‘看看那个帝国主义间谍、走狗。’伏尔泰，这种景象我可不喜欢啊。因为走私鸦片，一辈子被关在中国？我不太热衷。‘没问题，刁先生！拜拜！下午见！’不认真考虑不行。”

逐渐下沉的太阳引来棕色的暮气，突然灌满了整个房间。在瑞卡度胸膛上，尽管状况无懈可击，同样的汗珠越聚越大，遍布茂密的黑色胸毛之上以及油光闪亮的肩膀。

“这些任务里，丽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杰里再问。

瑞卡度回答起来紧张，已带怒气。

“在万象！在月球上！在查理的床上！我管那么多干吗！”

“跟老刁打交道的事，她知不知情？”

瑞卡度只是发出轻蔑的嚎叫声。

该走人了，杰里心想。点燃最后一根引信然后逃命。屋子下方的米奇正与瑞卡度的女人打情骂俏。杰里听得见他吟唱似的聊天声，穿插着两女孩高频率的笑声，宛如女校一整班学生齐声欢笑。

“所以说，你开了飞机上路。”他说。他静候着，然而瑞卡度仍迷失在思绪中。

“你起飞后往北走。”杰里说。

瑞卡度稍稍扬眉，以盛怒的眼神紧盯杰里，最后描述个人英勇事迹的邀约总算征服了他。

“我一辈子从来没飞得那么棒。从来没有。我飞得可圈可点。那架黑色的小毕奇。在北边一百英里，因为我谁也不信不过。说不定那些混账在什么地方用雷达锁定我了吧？我不敢冒险。然后往东，飞得非常慢，非常低，低飞过山头啊，伏尔泰。等于是穿过母牛的腿飞过去，懂吗？战争期间，我们在那边有小型起降跑道，在荒地里装了监听设施。我专飞那些地方啊，伏尔泰。我知道地方。我找到一个在山顶的地方，只能从空中降落。我看了一眼，看到临时加油站，我降落，我加油，睡一觉，真是疯了。可是啊，伏尔泰，那里毕竟不是云南啊，懂吗？那里不是中国，而美国战犯兼鸦片走私者瑞卡度，才不愿意在北京蹲下半辈子咧，懂吗？听好，我把飞机开回南方。我懂得地方，我知道能够甩掉一整个空军的地方，相信我。”

对于他接下来几个月的人生，瑞卡度忽然轻描淡写起来。他听过漂泊的荷兰人，说他后来就是变成了漂泊的荷兰人。他飞了一趟，再躲起来，重新替毕奇飞机喷漆，一个月换一次执照，小批卖鸦片以免树大招风，这里一公斤，那里五十公斤，从印度人那里买来一本西班牙护照，却对假护照没信心，躲着他认识的所有人，避不见面，包括曼谷的萝西在内，连查理·马歇尔也一样。杰里回想起老库洛对他简介时提过，就在这段期间，瑞卡度把柯的鸦片卖到缉毒署英雄的手上，他想提供的情报却被打入冷宫。瑞卡度说，在老刁的吩咐下，印支包机那帮人很快通报他死亡的消息，将他的飞行路径改往南方以避人耳目。这事瑞卡度听说了却不反对被宣告死亡。

“丽姬呢？你怎么处置？”杰里问。

瑞卡度再度燃起怒色。“丽姬，丽姬！你很迷那个骚货嘛，伏尔泰，非得老拿丽姬两字往我脸上甩，是吧？我从来没认识过跟我关系这么一刀两断的女人。听好，我把她送给德雷克·柯了，懂吗？我帮她走运。”他一把攫起威士忌酒杯喝酒，怒火仍旺。

她是在为他游说，杰里心想。她与查理·马歇尔，四处为瑞卡度的小命奔走。

“你刚才以吹嘘的口气指出此案另有高获利的面相，”瑞卡度以那份商学院英语的专断口气说，“愿闻其详，伏尔泰。”

以下部分，沙拉特人倒背如流。

“第一点：俄国驻万象大使馆付了好几笔大款项给柯，通过印支包机洗钱，最后汇进香港一个信托账户。我们握有证据。我们有银行提存款明细影印本。”

瑞卡度摆出犹如威士忌味道不对劲的脸色，然后继续喝酒。

“无论那笔钱是用来重振红色中国吸鸦片的毒瘾，还是用在其他服务上，我们还不知道，”杰里说，“不过查得出来。第二点。你是想听还是想睡？”

瑞卡度刚才打了个哈欠。

“第二点，”杰里继续说，“柯有个弟弟在红色中国。以前叫做纳尔森。柯假装他死了，不过现在这弟弟在北京政府可是大人物。柯多年来一直想把他弄出来。你的任务是走私鸦片进去，带一个‘包裹’出来。这个包裹就是他弟弟纳尔森。所以柯才会说，如果你带他出来，准备把你当做亲儿子看待。要是这趟不值得花五百万，还有什么值得花这笔钱？”

杰里借越来越暗淡的光线观察瑞卡度，而瑞卡度无动于衷，但内心沉睡的动物则显然清醒过来。他为了放下酒杯，慢慢弯腰向前，却隐藏不了肩膀的紧绷，也掩饰不住腹肌的纠结。为了对杰里展现异常的善意，他懒散地转身微笑，但双眼的亮度却有如攻击讯号，因此当他感情洋溢地伸出右手拍拍杰里脸颊时，杰里准备抓住他的手往后倾倒，有必

要时可将瑞卡度抛向房间另一边。

“五百万哪，伏尔泰！”瑞卡度以钢铁般清亮的兴奋之音感叹，“五百万！听着，我们一定得帮帮可怜的查理·马歇尔，懂吗？为了爱。查理老是闹穷。也许可以让他当当足球签赌的组头一下。你等一等。我去再拿点苏格兰威士忌庆祝庆祝。”他起身，头偏向一侧，伸出赤裸的双臂。“伏尔泰，”他柔声说，“伏尔泰！”他以充满感情的动作捧住杰里脸颊亲吻。“听好，你们的功课做得真不赖！你那个编辑真是聪明。你来跟我合伙做生意好了。就跟你所说的那样，懂吗？我的人生正缺英国人。我想当一下丽姬，跟小学老师结婚。你帮一下瑞卡度，行吗，伏尔泰？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吗？”

“没问题。”杰里以微笑回敬。

“你就玩玩枪吧？”

“好。”

“我有件小事要吩咐女孩们。”

“好。”

“私人家庭小事。”

“我会待在这里的。”

他一下楼，杰里从通风口顶端急着往下看。司机米奇将婴儿舞弄在手臂上，轻捏耳朵下方。在失序的世界里，虚构情节必须持续进行，他心想。坚守虚构情节，直到最后，让对方愿者上钩。杰里重回办公桌，拾起瑞卡度的铅笔与便笺，写下一个不存在的香港地址，表示随时可联络。瑞卡度仍未返回，但杰里站起来时看见他从车子后面的树林走出。他喜欢合约，杰里心想。给他可以签字的东西。他再取来一张纸：“本人杰里·威斯特贝在此郑重声明，针对吾友小不点瑞卡度机长的一生事迹，双方共同经营后若有收益，全数由两人共享。”他写完签名。瑞卡度走上楼梯。杰里本想自己取用私人军械，但他猜想瑞卡度正等着他动手。在瑞卡度倒威士忌时，杰里将刚才写妥的两张纸递给他。

“我会拟定一份公证函。”他边说边直盯着瑞卡度燃烧的双眼，“我在曼谷认识一个英国律师，完全信得过，我会请他帮我们看一下，再拿回来请你签名。之后我们再来规划合作计划，我也会跟丽姬商量。好吗？”

“当然。听着，天色暗了，那个森林里躲了很多坏人。你就在这里过夜。我会跟女孩们讲。她们很喜欢你。她们说你是个很强壮的男人。没有我壮，不过很壮就是了。”

杰里推说不想浪费时间之类的话。他希望明天赶到曼谷，他说。在自己的耳朵听来，他的说辞如同三脚骡子般蹩脚，让对方半信半疑还可以，却无法全然取信对方。然而瑞卡度听了似乎满意，心情平静。也许是与埋伏的人谈了条件，杰里心想，由中校来安排。

“一路顺风了，赛马记者。一路顺风，我的朋友。”

瑞卡度双手放在杰里颈背，让大拇指掐进杰里的下巴，然后将杰里的头拉向前，再亲一下，杰里也不反抗。虽然心跳如鼓，汗湿的脊椎贴在衬衫上痛楚不堪，杰里仍不反抗。外面的天色已经半黑。瑞卡度并没有送两人上车，而是从高脚屋上凝神注视，挥动裸露的双臂，两女则坐在他脚边。坐在车上的杰里转头也向他挥手。最后一道日光在柚木林中奄奄一息。是我最后一道日光，他心想。

“先别发动引擎，”他悄声告诉米奇，“我想检查机油一下。”

也许失序的只有我一人。也许我真的谈定了一桩交易，他心想。

米奇坐在驾驶座上，放开引擎盖栓，杰里打开引擎盖，却没有发现小片黏土炸弹，没有新朋友兼事业伙计送别之礼。他拉出量尺，假装查看机油深度。

“想要机油吗，赛马记者？”瑞卡度朝泥土路的方向呼喊。

“不用了，我们没问题。再见！”

“再见。”

他没有手电筒，在黑暗中俯身下探底盘时仍未发现任何东西。

“丢了什么东西吗，赛马记者？”瑞卡度再度呼唤，双手在嘴边围成杯状。

“发动引擎吧。”杰里说完上车。

“要开灯吗，先生？”

“好，米奇，开车灯。”

“他干吗叫你赛马记者？”

“共同认识的朋友都这样叫我。”

要是瑞卡度向共恐分子通风报信，杰里心想，开不开灯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米奇打开车灯，美国车的仪表板在车内亮起，宛如一座小城市。

“走吧。”杰里说。

“快快走吗？”

“对，快快走。”

车子开了五英里，七英里，九英里。杰里注意着里程，知道距离第一个检查哨有二十英里，第二个检查哨有四十五英里。米奇将时速开到七十，杰里无心抱怨。车子开在马路中央，马路笔直，在比埋伏区更远处有高大的柚树，有如橙色的鬼魂般掠过。

“厉害，”米奇说，“他是个很厉害的老公。那两个女孩说他技巧很好。”

“注意铁丝。”杰里说。

马路右边的树林出现空隙，一条红土路消失在其间。

“他在那里真享受啊，”米奇说，“有女人，有小孩，有威士忌，什么都有。他真懂享受。”

“靠边，米奇。停车。停这里，停在马路中间平坦的地方。叫你停就停，米奇。”

米奇开始大笑。

“女孩也很享受啊，”米奇说，“那两个女孩有糖果吃，小婴儿也有糖吃，大家都有糖吃！”

“叫你停车，耳聋是不是？”

米奇优哉游哉减速停车，仍嗤嗤笑着那两个女孩。

“那东西精准吗？”杰里问，手指压在汽油计上。

“精准？”米奇重复，听不懂这个英文单字。

“油。汽油。满的吗？还是半满？还是四分之三满？一路上是不是正确？”

“当然。是正确的。”

“我们开到那个烧光光的村子时，米奇，你的油箱半满。现在油箱却还是半满。”

“对。”

“你加过油吗？用罐子？你加油了吗？”

“没有。”

“下车。”

米奇正准备抗议，但杰里靠向他身边，伸手打开车门，将他一把推下车，推到柏油路上，然后跟着他下车。他抓住米奇的手臂押在背后，押着他小跑步过马路，到宽阔的软地路肩边缘，走了二十码，然后将他推向小树丛，自己也半蹲在他身边，半倚在他身上，导致米奇打了一个惊嗝，过了足足半分钟后，他才有能力冒出“干吗呀”出出气。然而这时杰里已将脸埋在泥土里，闪避爆炸。老福特车首先似乎自燃起来，随后爆炸，最后蹦入空中，仿佛咽下最后一口气，接着落地侧躺燃烧。米奇看得直咽口水，杰里则看一下手表。离开高脚屋已有十八分钟。也许二十。他心想，早该爆炸了才对。难怪瑞卡度急着赶我们上路。若是在沙拉特，他们甚至无法预见这种事。这是东方小点心，沙拉特拿手的是欧洲以及冷战那段美好时光：捷克斯拉夫、柏林以及旧前线。杰里思忖着是什么品牌的手榴弹。越共偏好美军手榴弹。他们看上的是双重效果。他们说，只要油箱颈子够宽就行了。拔下插鞘，以橡皮筋缠住弹簧，将手榴弹放进油箱，耐心等候汽油腐蚀橡皮筋。结果西方的发明在越共手里发扬光大。瑞卡度用的橡皮筋一定太粗了，他判定。

花了四小时，两人走到第一个检查哨。由于事先保过险，米奇乐不可支，心想既然付保费的人是杰里，理赔金自然可供两人挥霍。杰里无法制止他这番见解。但是米奇也感到害怕：先是共恐分子，然后是幽灵，再来是中校。因此杰里向他解释，出了那件小事，幽灵或共恐分子都不会冒险靠近路面。至于中校，杰里尽管未向米奇提起，他身为入父，也是军人，有水坝等着他去盖。利用德雷克·柯的水泥与中国海空的飞机，他可不是盖着玩的。

来到检查哨后，他们终于找到愿载米奇回家的卡车。杰里陪他搭了一段便车，承诺米奇，若需要找人帮忙处理理赔事宜，他可以找报社帮忙，无奈沉浸欣快感中的米奇听不进疑虑。两人在笑声连连中交换地址，热情握手后再握手，之后杰里在一处路边餐饮店下车，等了半日才等到公交车，带他往东走向另一片战场。

杰里找上瑞卡度，是多此一举吗？若没有找上瑞卡度，对他个人而言，结果是否有所差别？或者如史迈利派人士至今所坚称的，杰里与瑞卡度交手是为摇树工作提供关键的最后一把，导致令人垂涎的水果落地？对于拥护史迈利的群众来说是毫无疑问：走访瑞卡度是最后一根稻草，导致柯不支崩溃。若非杰里走访瑞卡度，柯可能会撑到众人齐上，届时想得到柯本人与关于他的情报，都凭各家本事。肯定是。表面上，这些事实展现了美好的因果关系。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杰里与司机米奇爬出泰国东北部路边泥土堆后仅仅六小时，整个圆场五楼喜气洋洋，米奇租来的福特车烧得再旺，在张灯结彩的圆场比较下也会相形失色。史迈利在喧闹室宣布上述消息，狄沙理斯博士竟跳了一小段舞，身手僵硬，而康妮若非风湿缠身，苦坐轮椅，无疑也会加入。康妮的爱犬小跑嚎叫，吉勒姆与默莉相拥，仅有史迈利在欢庆气氛中维持他惯有的微微吃惊的神态，只不过默莉发誓说她看到史迈利眨眼环视在场众人时，脸色居然泛红起来。

他说，他刚接获消息。是表亲传来的快报。香港时间今晨七时，刁致电星辰岗的柯家。柯刚与丽姬·伍芝共度一夜春宵。电话一响，接听的人是丽姬，但柯接起分机，呵斥丽姬挂断，她乖乖挂掉。刁建议立刻进市区共进早餐：“到乔治的店去。”刁说，让窃听人不觉莞尔。三小时后，刁打电话给旅行社订购机票，表示必须尽快出差到中国大陆。他第一站是广州，中国海空在当地派驻一名代表，但最终目的地则是上海。

瑞卡度没有电话，如何如此快速通报老刁？最有可能的理论是通过泰国中校的警力与曼谷之间的联机。从曼谷呢？怎么转，只有上帝知道。商业电传，汇率网络，任何方式都有可能。做这些事情，华人自有办法。

另一方面而言，也有可能只是柯的耐性选择在此刻自行崩盘，所谓“到乔治的店”共进早餐一事，其实完全不相干。无论怎样，都算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突破，大大证实史迈利的辛勤奔走确有收获。午餐时间前，拉康已亲自登门道贺，晚上六点左右，索尔·恩德比也做出特拉法加广场不同边的人从未做过的举动。他送来一箱贝利罗德香槟，是陈年克

鲁格，绝对是标致醇酒，同时附上献给乔治的一段话：“敬夏季的第一天。”的确，尽管时节尚属四月下旬，气候似乎正有夏意。透过低层楼厚厚的网状窗帘，可见悬铃木已开始吐送新叶。在较高的楼层，一簇风信子开在康妮的窗台花箱里。“红色，”她一面祝索尔·恩德比身体健康一面喝酒说，“是卡拉最爱的颜色，愿上帝保佑他。”

18河湾

这座空军基地既不优美也不具胜姿，严格说来是隶属泰国管辖，实际上却只准泰国人收垃圾，在靠近周遭的地方围栏自用。检查哨自成一镇。煤炭、尿臊、腌鱼、瓦斯等气味弥漫，连串摇摇欲坠的铁皮屋代表了军事占领的传统。妓院由瘸脚皮条客坐镇，裁缝店提供婚礼燕尾服，书店提供色情书刊与旅游书籍，酒吧名称是日落大道、夏威夷、幸运时光。来到宪兵室，杰里指名找新闻官厄克哈上尉，黑人士官长却摆好架势，在他表明自己是记者时准备将他扔出去。杰里使用基地的电话，只听见喀哒声与啪声混杂，然后才有人以南方口音慢条斯理地说：“厄克哈现在不在。我姓迈司特。你是哪位？”

“我们去年夏天在科罗斯将军的简介会上认识。”杰里说。

“这个嘛，没错，”对方以慢得出奇的语调说，杰里不禁回想起寻死匈奴，“付清车钱。我马上过去。蓝色吉普车。等车子闪白光。”

接着沉默了良久，据推测是在“偶发状况簿”里查阅厄克哈与科罗斯这两个暗语。

空军人员川流不息地进出营地，有黑有白，摆着臭脸，各群体间互不往来。一名白人军官通过。黑人使劲敬礼，军官懒懒回礼。募兵制服上缝有查理·马歇尔式的缝章，多半是在讴歌毒品的好处。气氛沉郁，如吃了败仗，内心充斥暴力倾向。泰国士官见了任何人都不打招呼。别人也不向他们打招呼。

一辆蓝色吉普车闪着灯，警笛呜咽，以滑垒的姿态停在栅栏另一端。士官长挥手让杰里通过。转眼间，他在跑道上以足可断颈的速度，冲向位于机场中央一长排低矮的白色小屋。驾驶是个瘦长的男孩，上下都是见习生的模样。

“你是迈司特？”杰里问。

“不是，长官。长官，我只是少校的跟班。”他说。

两人驶过一场衣衫褴褛的棒球赛，警笛响个不停，灯光仍持续闪动。

“很不错的掩饰。”杰里说。

“您说什么，长官？”男孩大喊，以盖过噪音。

“算了。”

这不算是最大的基地。杰里看过更大的。他们通过一列列幻影大轿车与直升机，接近小屋时他才理解到，这些行头组成的是独立的谍报单位，有自己的营地与天线杆，有自己的黑色小飞机群——以前人喜欢称为怪物飞机，撤退前在何处载运了什么人，只有上帝知道。

男孩打开侧门锁，两人进门。短短的走廊空荡无声，尽头有道大开的门，材质是传统的仿玫瑰木。迈司特身穿短袖空军制服，标志很少。他佩戴勋章，官阶是少校，杰里猜他是辅助正规军类的表亲，也许甚至不是专业。他面带菜色，身材精瘦，紧闭的双唇带有憎恶的意味，脸颊凹陷。他站在假壁炉前，上方挂着美国画家魏斯的画作复制品。他这个人静肃得出奇，而且与外界脱钩，就像是在众人匆忙时刻意放慢动作的人。男孩为双方作介绍后，迟疑不走。迈司特盯着他看，直到他离开为止，然后将不带任何色彩的目光转向玫瑰木桌。桌上有咖啡。

“你大概想吃早餐。”迈司特说。

他倒了咖啡，递过一盘甜甜圈，全以慢动作进行。

“设备。”他说。

“设备。”杰里赞同。

办公桌上有一台电子打字机，旁边放了白纸。迈司特僵硬地走向椅子，一手撑在椅子上，拿起一份《星条新闻报》，在杰里坐下时假装看报纸。

“听说你单枪匹马，准备帮我们全赢回来，”迈司特对着《星条新闻报》说，“总算。”

杰里舍弃电子打字机不用，取出自己的手提式打字机，噼啪打出报告，在自己耳朵听来，音量越来越大。也许迈司特也有同感，因为他经常抬头看，只不过他眼光仅逗留在杰里的双手，以及玩具型的手提式打字机。

杰里将报告递给他。

“根据命令，你继续待在这里。”迈司特说，字字清晰，郑重其事。“根据命令，你继续待在这里，由我们帮你传送信息。保证会帮你传送信息。根据命令，你在这里待命，等候确认和进一步指示。了解吗？你了解吗，先生？”

“了解。”杰里说。

“那件好消息，听说了吧？”迈司特询问。两人面对面。距离不到三英尺。迈司特直盯着杰里的报告，双眼却没有扫描内容的迹象。

“什么消息，老兄？”

“我们战败了，威斯特贝先生。没错。最后一批勇士，刚被直升机从西贡大使馆屋顶扫掉，就像一群菜鸟脱了裤子在妓院被逮个正着。也许你无动于衷。大使馆的狗活了下来，你听了一定很庆幸。记者从他的膝盖上救出来。也许你又无动于衷。也许你不爱狗。也许你对狗的感觉，跟我个人对记者的感觉一样，威斯特贝先生。”

杰里这时已察觉迈司特带有白兰地酒味，喝再多咖啡也隐瞒不了。杰里猜想，他一定是喝了很久却无法灌醉自己。

“威斯特贝先生？”

“什么事，老兄。”

迈司特伸出一手。

“老兄，我想跟你握手。”

他一手伸在两人之间，拇指向上。

“为什么？”杰里说。

“我希望你能表达欢迎之意，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刚提出申请，希望加入二流国家俱乐部。据我了解，贵国在这个俱乐部担任主席、会长，也是资格最老的会员。握手啊！”

“很荣幸能欢迎你加入。”杰里说，顺从少校的意思与他握手。

少校立刻报以灿烂的微笑，带有虚假的感激之情。

“你真是太客气了，威斯特贝先生。只要是能为你服务得更周到，有话直说。如果你想租下这个地方，只要提出个合理的数字，我们马上答应。”

“送点苏格兰威士忌，其实就够了。”杰里说着龇牙咧嘴笑得僵硬。

“在下荣幸之至。”迈司特说，尾音拖得很长，宛如出了一记缓拳，“出自内心深处，是的，先生。”

迈司特留给他半瓶从橱柜取出的珍宝威士忌，以及几本过期的《花花公子》。

“这些东西，是给懒得伸出尊手帮忙的英国绅士使用。”他以告密的口气说明。

“设想真周到。”杰里说。

“我帮你把信寄回家给妈妈。女王最近可好？”

迈司特并未上锁，但当杰里测试门把时，却发现已经锁上。俯视机场的窗户装上双层毛玻璃。跑道上有机起降，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杰里心想，原来他们想更胜一筹的做法是这样，在隔音间里，透过毛玻璃，机器伸手可及。而他们也因此败下阵来。他喝着酒，感觉麻木。就这样结束了，他心想，就这样了。他下一步怎么走？查理·马歇尔的老头？上山找掸族人，与将军的保镖称兄道弟？他等着，不成形的思绪在脑海推挤。他坐下，然后躺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怎么想也想不出睡了多久。他忽然被罐头音乐惊醒，偶尔穿插居家智慧隽语。请某某上尉到某地。扩音器一下子广告高等教育。一下子是洗衣机大减价。一下子是祈祷。杰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被火葬场般的寂静与音乐搞得心神不定。

他走向房间另一边的窗户，脑海中，丽姬的脸孔在他肩膀旁上下浮动，如同以前的孤女一样，可惜昔日光景不再。他继续喝威士忌。早知

道在卡车上补眠才对，他心想。平常应该多睡一点。睡到自然醒，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老弗害的。他的手在发抖。天啊，你看看。他想起陆克。是该一起出去大喝一场了。要是他没被子弹射穿屁股，现在应该到家了。该让脑筋稍微休息一下了，他心想。然而有时脑筋硬是自动转个不停。转得太厉害了，说真的。他严肃告诉自己，应该绑起来才对。唉。他想起了瑞卡度的手榴弹。赶快，他心想。快，快作个决定。接下来到哪里？现在要找谁？别问为什么。他的脸又干又热，手心冒汗。眼睛正上方的头部痛了起来。可恶的音乐，他心想。可恶又可恶的世界末日音乐。他四下张望，想找出开关，这时看见迈司特站在门口，一手握着信封，双眼却毫无一物。杰里阅读信号。迈司特再度撑在椅子扶手上。

“儿子，回家吧。”迈司特以平板调说，嘲笑自己的南方口音，“直接回家。别贪图两百块，那还得经过此地。表亲会送你搭飞机到曼谷，再从曼谷立刻返回英国伦敦，我重复，不是安大略省的伦敦，班机由你自由决定。绝不能回香港。绝对不准！不行，长官！任务完成。圆满成功，感谢你。女王感激不尽。所以赶快回家吃晚餐，我们准备了去皮玉米碎粒和火鸡，还有蓝莓派。照这样看，你的上司是一群娘娘腔，老弟。”

杰里再看一遍。

“飞机么么洞洞飞曼谷。”迈司特说。他把表面戴在手腕内侧，让时间变成个人机密。“听见了没？”

杰里露齿笑。“抱歉，伙计。我看书速度比较慢。谢谢你。用了太多难字。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对了，我有东西留在旅馆。”

“我的手下悉听尊便。”

“谢谢你，如果你不在意，我不愿动用官方关系。”

“随你便，长官，随你便。”

“出大门后，我自己叫出租车。一个小时来回。谢谢。”他再度道谢。

“该道谢的人是我。”

沙拉特出身的人，临别时懂得使出这招。“留在这里，应该没关系吧？”他边问边朝邋遢的打字机点头。他的打字机放在迈司特的IBM高尔夫球型打字机旁。

“长官，我们会以最珍贵的物品看待。”

若是迈司特稍费心思，当时多看杰里一眼，看出杰里目光中的心机，或许会有所迟疑。若是他听出杰里的口气，或是注意到特别友善的低沉嘶哑嗓音，也许会有所迟疑。若是他看见杰里包着额发，一手抱身体，做出本能上掩饰自我的姿态，或是在见实习生开蓝色吉普车送他到大门时，会意出杰里如做错事般龇牙笑着道谢的涵义，这样的话，他也许

会有所怀疑。然而迈司特少校不仅是个心怀不满的职业军官，诸多梦想一一幻灭，他也是败在化外之民手上的南方绅士。这时他没太多时间与困顿的英国佬瞎混，这个英国佬只是利用他这间即将报废的情报室送送信而已。

圆场驻香港的情报团撤退时气氛欢畅，而由于撤退的消息密不透风，气氛更加热烈。杰里重新露脸的消息触发了这种气氛。他的电报内容也强化这种气氛。碰巧这时表亲传来消息，指出德雷克·柯取消了所有社交与生意应酬，退居赫兰道号称七门的自宅。表亲躲在监听车里以长镜头拍摄到柯上半身，坐在大庭园里，在玫瑰凉亭的末端，凝视着海。水泥帆船并未出现在相片中，但他仍戴那顶垮垮的贝雷帽。

“像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主角的现代版！”康妮·沙赫斯乐得呼喊，众人则逐一细看。“是在凝望码头尾端的强光吧，那个蠢材！”

两小时后监听车再经过原地，柯仍维持相同姿势，因此表亲也懒得再拍一次。更具意义的是，柯已经完全不用电话，至少不用遭表亲窃听的电话线。

山姆·科林斯也捎来一份报告，是一连第三份，也是他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与往常一样，这份报告的封面特别指名史迈利亲阅，而一如既往，他只与康妮·沙赫斯讨论内容。正当一伙人准备动身前往伦敦机场时，马铁娄送来一份紧急信息，通知他们刁已从中国返回香港，此刻正与柯在赫兰道闭门商议。

然而在吉勒姆回忆中，当时与事后，最为重要亦是最伤脑筋的仪式是在马铁娄的办公室举行的小型沙盘推演。出席人士不只有平常的五人组：马铁娄、两个哑巴、史迈利与吉勒姆，还包括拉康与索尔·恩德比，两人搭乘同辆公务车抵达，耐人寻味。这次沙盘推演由史迈利召开，目的是正式移交钥匙。如今马铁娄可一窥海豚案的全貌，包括自始至终最重要的纳尔森这条线索。他接受洗礼，就此成为全面合伙人，只有小部分遗漏之处，事后才浮现。拉康与恩德比动了什么手脚才能出席，吉勒姆永远不得而知，而会后史迈利也绝口不提，能令人谅解。恩德比坦然宣布他代表军方。拉康则比往常更显无精打采而轻蔑。吉勒姆强烈感觉到他们意图不轨，观察了恩德比与马铁娄两人的互动后更坚信不疑：简言之，这两位新朋友打得火热，吉勒姆不禁联想到大地主宅邸里偷情男女共进早餐的情景。这种情景，他经常置身其中。

会中恩德比说明，问题是本案的规模。本案闹得这么大，他认为应该派几个官方人士来旁听。他在会中也解释，是殖民地游说的结果。威布汉正与财政部大吵大嚷。

“好吧，该听的都听过了。”恩德比在史迈利作完冗长的概论后说。马铁娄对报告赞不绝口。恩德比说：“乔治，重点是，放在扳机上的手指是谁的？”他质问，之后会议转变为恩德比的单人秀。是与恩德比开会的必然结果。“事情闹开了以后，由谁来发号施令？是你吗，乔治？依然是你吗？你规划得是很不错，我承认，不过提供炮火的人则是小马，是不

是？”

这时马铁娄耳聋症复发，目光炯炯地看着在场亲切的英国大人物，心觉与有荣焉，让恩德比继续为他挥动刀斧。

“小马，你认为呢？”恩德比逼问，仿佛他真的毫无概念似的，仿佛他从未与马铁娄一起去钓鱼，也未盛宴款待他过，也未在上班時間之外讨论最高机密。

此时吉勒姆出现一丝奇异的见解，只不过他事后责怪自己没有多加重视。马铁娄早已知情。公开了纳尔森这份秘密时，马铁娄曾假装讶异，其实对他根本不是秘密，而是重新叙述他与两名哑巴早已得知的信息。吉勒姆从他们苍白木然的脸孔中、从他们眼观四路的态度中解读出来。他从马铁娄过分恭维的态度解读出。马铁娄早已知情。

“啊，严格说来，这会是乔治召开的，索尔。”马铁娄以忠心的态度提醒恩德比，算是回答他的问题，却用了“严格说来”一词，让这话启人疑窦。“乔治站在舰桥上，索尔。我们只是在那边添燃料，照顾引擎。”

恩德比摆出皱眉不悦的神情，将火柴棒塞进嘴巴咬着。

“乔治，你认为如何？放手让一切发生，你能满意吗？让小马停止香港那边的掩饰身份、住宿、通讯、所有谍报东西、跟踪之类的？让你来发号施令？天哪。我认为有点像是穿了别人的晚礼服。”

史迈利的回答语气够坚定，但在吉勒姆眼里，有点过于着重问题本身，对薄纱遮掩的共谋不够担心。

“一点也不，”史迈利说，“马铁娄和我有明确的共识。这次行动的矛头由我们自己主掌。如果需要支持行动，马铁娄会提供。随后的产品由双方分享。如果各位想的是美国投资所产生的获利，必须连带考虑到分工。取得产品的责任仍在我们身上。”他结尾的语气强烈。“安排这一切的协议书当然存盘已久。”

恩德比瞥了拉康一眼。“奥立佛，你说过要送过来给我。在哪里？”

拉康将长长的头偏向一侧，在没有特定对象的情况下惨淡一笑。“大概在第三室的什么地方吧，索尔。”

恩德比改变方向。“双方协议挺得过所有应变情况吗，你们两人认为呢？我的意思是，像安全联络站之类的东西由谁处理？埋尸体之类的事呢？”

又是史迈利。“管理组已经在乡下租了一栋小别墅，正准备找人进驻。”他说得不动感情。

恩德比从口中取出湿火柴棒，折断丢进烟灰缸。“你们事先问我的话，可以用我那栋的，”他心不在焉地喃喃说，“空间大得很。有用人。样样不缺，就是缺人住。”但他继续担心刚才的主题。“好，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的手下心慌了。钻香港小巷子溜掉了。谁要玩官兵捉强盗，把他抓回来？”

千万别回答！吉勒姆祈祷着。他绝对没有资格如此东戳西问！叫他滚蛋！

史迈利的回答尽管实际，却缺乏吉勒姆期望的热度。

“噢，我认为总想得出一套假设吧。”他轻轻反驳，“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到了那个阶段由马铁娄和我集思广益，采取最佳行动。”

“乔治和我合作关系融洽，索尔，”马铁娄爽朗地宣称，“非常融洽。”

“其实啊，乔治，”恩德比继续说，又拿来一根火柴棒咬着，“如果全由老美来办，其实干净利落得多，也比较安全。小马的人搞糟了局面，只会向总督道歉，派两三个手下到瓦拉瓦拉，答应不会再犯，就这样而已。反正大家对他们的期望也只有这样。名声败坏后就有这种好处，对吧，小马？如果你搞了女佣，也没有人会惊讶。”

“说得也是，索尔。”马铁娄说，被伟大的英式幽默逗得开怀大笑。

“如果是我们乱来的话就有待商榷了，”恩德比接着说，“或者乱来的是你们。照目前的状况，总督吹一口气就能把你们吹垮。威布汉已经趴在桌上哇哇大哭了。”

在史迈利冥顽冷淡的抗拒下，实在讨论不出什么进展，因此恩德比暂时告退，双方重新讨论“牛肉与马铃薯”，这是马铁娄针对沙盘推演各种可能所发明的昵称。但在双方结束讨论前，恩德比使出最后一招，希望史迈利中箭下马。恩德比选择的主题又是如何有效率处置人犯与事后照料事宜。

“乔治，拷问之类的东西，由谁来负责？你打算派那个滑稽的耶稣会教士吗，那个名字奇怪的人？”

“狄沙理斯将会负责中国事务方面的简介，俄国方面则由苏联研究处负责。”

“找那个跛脚的女学究啊，乔治？她不是因为爱喝酒，被该死的比尔·海顿赶走了吗？”

“是他们两人，就他们两人，才把案情调查到今天这个地步。”史迈利说。

无可避免的，马铁娄挺身而出。

“好了好了，乔治，别讲了！别吵了！索尔、奥立佛，我希望你们了解，我认为海豚案就各方面而言，是乔治个人的一大胜利，功劳全在乔治一人身上！”

众人为亲爱的老乔治热烈鼓掌后，他们回到圆场。

“火药、叛变、阴谋！”吉勒姆强调，“恩德比干吗出卖你？那封信怎么会寄丢，讲什么鬼话嘛！”

“对，”史迈利最后终于说，不过语气疏远，“对，他们也太不小心

了。我还以为寄了一份给他们。隐名，手写，仅供情报参考用。恩德比刚才也真粗野，是不是。彼得，你来查一下，问问妈妈们，好吗？”

一提及协议书，即拉康口中的口头协议，令吉勒姆最忧心的事浮上脑海。他记得自己一时不察，让山姆·科林斯担任送信人，也记得法恩所言，他假借送信的机会，与马铁娄闭门商谈一个多小时。他也记得看过山姆·科林斯在拉康的接待室，是拉康与恩德比的神秘密友，在白厅懒洋洋地游走，有如可恶的笑脸猫。他记得恩德比喜欢玩十五子棋，赌注下得非常高。他尽量想嗅出阴谋的气息时，脑海里甚至出现一个念头，恩德比可能是山姆·科林斯俱乐部的客户。一出现这个念头，他立刻停止想像，认为过于荒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后证明他的想法没错。他也记得脑海稍纵即逝的想法——根据只不过是场三名美国人的神态，因此很快也被自己驳斥为无稽。当时的想法是，史迈利前来通报的消息，他们其实早已知道。

然而有一个想法并未让吉勒姆停止想像：山姆·科林斯是那天晨宴的幽灵。与默莉一夜缠绵道别而筋疲力尽的他，在伦敦机场登机时，同一个幽灵在山姆恶魔般的棕色香烟烟幕中，对他龇牙咧嘴奸笑。

飞行过程平淡无奇，只有一件事例外。一行三人浩浩荡荡，在安排座位时吉勒姆小胜一场战役。他与法恩争战已久。在管理组抵死不从的情况下，吉勒姆与史迈利仍搭乘头等舱，管家法恩则坐在经济舱的前方走道座位，与几名航空公司警卫摩肩接踵。一路上警卫多半睡得安详无邪，法恩则闷闷不乐。幸运的是，没有迹象显示马铁娄与哑巴也搭同一班机，因为史迈利认定他们绝对不可同行。事实上，马铁娄往西飞，在兰利短暂停留听取指示，再飞往檀香山与东京，为的是在他们抵达时能随传随到。

他们走前出了一件不经心的小插曲，颇为讽刺：史迈利手写了一封长信给杰里，留在圆场，希望杰里可以看到，内容是恭喜他表现一流。复写本仍在杰里的档案里。没有人想过要删除。史迈利称赞杰里“忠诚坚贞”，也“为本单位三十余年的历史添上登峰造极的一笔”。他也假装以安恩的名义附上，“内人与我敬祝你在小说界同样表现杰出”。最后写得相当蹩脚，“这份工作的优点之一，是让我们有幸与如此出色的同僚共事。容我在此表白，我们全将你铭记在心。”

飞机起飞前，的确有人仍在问，杰里下落不明，为何圆场仍未接到关切之意。毕竟他已失去联系数日。他们再度找机会怪罪史迈利，但没有证据显示圆场失职。为了让杰里从泰国东北部传回报告，最后一份报告，表亲为他空出了一条经过曼谷直通伦敦别馆的线路。可惜这条线路仅供来回传递各一次，无法追问。因此消息传来时，先经军方情报网转到曼谷，接着再经表亲的情报网转给驻香港的表亲——因为香港对海豚案相关资料具有完全的留置权。传到香港后，标上“一般”等级，再由香港传至伦敦，在几个涂上亮光漆的发件匣中游荡几遭，最后才有人发现其重要性。无可否认的，反应迟钝的迈司特少校对他口中这位“流浪英国仙人”的失踪并不太关切，“请彼方说明”，他以这句话结尾。迈司特少校

目前定居俄克拉荷马州的诺曼，下乡经营汽车修护的小生意。

管理组也没有任何理由恐慌——至少他们至今仍如此强调。对杰里下的指示是，一到曼谷，替自己找一班飞机，任何航空都行，利用他的航空卡，自行回伦敦。指示中未提日期，也未指定航空公司，目的在于提供弹性。最有可能的是他在某地转机时，逗留休闲了一阵子。许多归乡的外勤情报员都这样做，而根据档案，杰里属于性饥渴型人物。因此他们照常观察班次，在沙拉特暂订为期两周的解压与充电仪式，然后将注意力转回更具迫切性的公事：设立海豚案的安全联络站。这栋房子是座迷人的磨坊，位置相当偏远，坐落于苏塞克斯的小镇梅斯非。多数时间，他们都找得到理由南下度假。除了狄沙理斯与庞大的中国档案外，一小队翻译与窃听人也必须留宿，更别提技师、管家以及一名会说中文的医生了。没过多久，附近居民纷纷向警方申诉，说本地日本人暴增。当地报纸报道，他们是访问英国的舞蹈团。外泄这条新闻的人是管理处。

杰里在旅馆根本没什么行李好收拾，事实上，他根本连旅馆也没有，不过他知道自己只有一小时可以走人，至多两小时。他毫不怀疑的是，美国人在整个泰国布下窃听网，若伦敦提出要求，迈司特少校可将杰里的姓名与特征公告周知，将他当成持外国护照的美国逃兵来通缉。他的出租车一驶出大门的眼界，他请司机开往最南边，等待，然后换辆出租车，往正北方而去。一阵潮湿的雾气铺在水田上方，笔直的马路穿田而过，漫无尽头。收音机强力放送着泰国女性的歌声，宛如永不歇止的慢转儿歌。车子经过一个美军电子基地，是一个圆形栅栏设施，有四分之一英里宽，飘浮在雾气里，当地居民称为象笼。偌大的锥柱围出界线，中央由层层铁丝包围着的是一盏恶魔似的灯，活像承诺着未来必定会有战争。他听说这地方关了一千两百名外语学生，却连半个鬼影也没看见。

他需要时间，此时他自行调用了一个多星期。即使是现在，他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自我调适，因为杰里具有军人的本性，以双脚投票。史迈利喜欢对他说：“太初有行动。”以他那种一事无成的牧师口气，引述自他喜爱的德国诗人。对杰里而言，简简单单的这句话成了他单纯的个人哲学的支柱。一个人脑里想什么，是他自家的事。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大清早抵达湄公河，他选择一个村子落脚，沿河岸懒散地漫步了两三天，背着肩袋，以羊皮靴尖踢着可口可乐的空罐。在湄公河对岸，在棕色蚁丘的背面是胡志明小道。他曾看过B52从这个地点出击，距离老挝中部三英里。他记得地面在脚下震动的感觉，天空被清扫一空，燃烧起来，此时的他能确切体会到置身其中是什么感觉。

当晚，套句他的开心用语，杰里·威斯特贝尽情纸醉金迷，被管理组人员料中，只不过情况不太一样。他来到河边一家酒吧，投五分钱能点播一首老歌，他畅饮黑市PX苏格兰威士忌，夜复一夜，将自己灌得失忆，牵着一个又一个欢笑的女孩走上没灯光的楼梯，进入一个破败的卧

房，直到最后他留在房间里睡觉，没有下楼。破晓时分公鸡啼叫、往来船只噪音惊醒了他，只好逼自己细细回想恩师与好友乔治·史迈利。逼他回想史迈利，凭的是意志力，几乎称得上是服从的举动。他的心愿很简单，是重复个人信条，而他的个人信条至今为止就是老乔治。在沙拉特，盘算外勤情报员的动机时，他们抱持一种非常世故、闲散的态度，对双眼冒火的狂热分子一点耐心也没有，因为他们只会咬牙切齿嚷嚷“我恨共产主义”。沙拉特的说法是，如果真的如此痛恨，极可能已经爱上了共产主义。沙拉特人真正欣赏的，正是杰里当时所坦诚的态度，是没太多时间空谈，且深爱情报工作，也知道“我们”是正确的一方。所谓的“我们”是个具有弹性的概念，但对杰里来说，“我们”指的是乔治一人。

老乔治。太棒了。早安。

他心目中的乔治，是记忆中乔治最美好的一面，也是两人初次见面时，地点是沙拉特训练中心，时间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杰里仍在陆军担任低阶军官，眼看即将退伍，因此无聊得头皮发麻。沙拉特的课程是为“伦敦临时雇员”开设的。临时雇员是从事过一两件谍报工作的人，仍未正式成为圆场的支薪员工，在沙拉特受训成为辅助预备人员。杰里已自愿申请成为全职员工，但圆场人事婉拒他的申请，使他的心情雪上加霜。因此当史迈利拖着脚步走进以石蜡油烘暖的教室时，身穿厚重大衣，戴着眼镜，杰里内心不禁发了一阵牢骚，准备再度迎接五十分钟的无聊时光，主题不外乎是如何寻找“你丢我捡信箱”的好地方，接着外出进行秘密远足，穿越瑞曼硕斯，在墓园里寻觅空心树。滑稽的是，指挥处人员七手八脚为乔治将讲稿架扭低，以免挡住他的视线。总算搞定了，乔治上台，站在讲台一边手脚不停动着，宣布今天下午的主题是“在敌境维护通信线路的问题”。杰里慢慢理解到，原来乔治授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经验谈，这个像猫头鹰的矮小学究，嗓音羞怯、频频眨眼、连声道歉的人，曾在某个未开化的德国城镇熬过三年，主导过一个非常像样的情报网，一面等待有人一脚踹破门板或以枪托击脸，好让他尝身受讯问的乐趣。

授课结束后，史迈利要求见他一面。两人相约在一家生意清淡的酒吧相见，坐在角落，墙上挂在鹿角上的是飞镖板。

“很抱歉我们没办法录取你，”他说，“我认为我们的感觉是，你需要先在外面多待一会儿。”这是“不够成熟”的委婉说法。太迟了，杰里记得史迈利是遴选委员会无发言权的委员之一，而该委员会并未录取他。“也许你可以先拿个学位，先过一点不一样的人生，说不定他们会改变看法。你会保持联络吧？”

那次见面后，老乔治总是陪伴在他身边，从不表示惊讶，从未失去耐性，以温柔却坚定的手法扶持杰里的生活，直到他成为圆场的财产。杰里父亲的报业帝国垮台了，乔治伸出双手，等着接住他。杰里的婚姻垮台了，乔治整夜与他促膝长谈，充当他的支柱。

“对本单位，我一向很感激，因为给了我付出的机会，”史迈利说

过，“我相信这样的感觉没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贡献自己。我这种态度，算不算老套？”

“你指挥，我跟从；”杰里当时回答，“你发号施令，我言听计从。”

还来得及。他知道。搭火车到曼谷，跳上回家的班机，最惨的状况顶多因失去联系几天被讥讽几句。“回家。”他对自己说。有点问题。是回托斯卡尼的家吗？空旷得令人哈欠连连的小山顶，没有孤女的陪伴。还是回老佩特的家？为弄坏茶杯一事向她道歉。还是回亲爱的史大卜身边？指派他坐镇办公桌，特殊责任是管理退稿。或者是回圆场：“我们认为你在财务组最能如鱼得水。”甚至能回沙拉特。想得美。担任讲师，每天从沃特福德镇的公寓冒生命危险上班，赢得新进人员的心与情。

第三天早晨，他起得非常早。晨曦刚从河面升起，先转红，再转橙，现在则成了褐色。一家子水牛在泥浆里涉水而过，铃铛叮叮当当响。河流中间有三艘舢板，互相联结成长而复杂的拖网。他听见刷的一声，看见渔网飞出，然后如同冰雹般落在水面。

然而他心想，我来这里的目的，并非追求一个未来，而是追求一个现在。

家，是无家可回时的投奔之处，他心想，让我不禁想到丽姬。头痛。暂时别想了。找地方吃早餐吧。

杰里坐在柚木阳台上嚼着鸡蛋配饭，回想起乔治向他报告海顿的消息。在舰队街，在美酒酒吧，雨天的中午。杰里从来不擅长记恨太久，最初震惊一阵后，其实没什么好多说的。

“借酒浇愁，愁更愁，是不是啊，好友？总不能扔下船不管，让老鼠去霸占吧。秉持军人精神撑下去，这样才对。”史迈利同意他的看法：对，这样才对，秉持军人精神撑下去，感激能有这个付出的机会。杰里发现海顿是自己人以后，甚至有一种酣醉的舒畅感。他从未认真怀疑过，英国正步上无可挽回的下坡，也未怀疑过自己这群人应该承担罪过。“海顿是我们造就出来的，”这是他的论点，“他叛变的冲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才对。”其实动词应该用“付出”才对。付出。就是老乔治强调的。

杰里再度徘徊河畔，呼吸自由温煦的空气，捡来扁石打水漂。

丽姬，他心想。丽姬·伍辛顿，郊区逃兵。瑞卡度的学生兼出气筒。查理·马歇尔的姐姐与大地之母，以及可望不可求的娼妓。德雷克·柯的笼中鸟。我的晚餐客人，为时仅四小时。对山姆·科林斯呢？她对他有何意义？梅伦先生是查理口中一年半前的“猥琐的英国贸易商”，对梅伦而言，她负责走私香港线的海洛因。然而她代表的意义不仅于此。过程中，山姆曾向她透露，她其实是在为国效劳。丽姬兴奋之余立刻将消息通报给朋友知道，引来钦羡的眼光。山姆盛怒之下将她甩得不见人影。所以山姆将她当做代罪羔羊来陷害。仰人鼻息的见习生。就某一方面而言，这个念头让杰里想得津津有味，因为山姆指挥情报员时领导有方，

颇受好评，而丽姬·伍辛顿在沙拉特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典型的“只要一息尚存、本局永不招募的女人”。

比较不好笑的问题是，她目前对山姆有何重要性？为何他仍如耐心十足的杀人凶手，继续潜行在她的背影后，露出阴险铁青的微笑？这问题令杰里十分担心。讲明白了，这问题其实让杰里走火入魔。他绝不希望见到丽姬再次沉沦。如果她离开柯的床铺，下一站非到杰里的卧房不可。有好一阵子了，其实是自从结识她之后，杰里不时想像着，托斯卡尼清爽的空气对丽姬该有多好。虽然他不清楚山姆·科林斯来香港的目的何在，甚至也不知道圆场对德雷克·柯的意图为何，他仍强烈感觉到——这才是全局的重点所在——此刻若动身前往伦敦，而非骑乘白马带走丽姬，等于是留下丽姬，让她坐在巨型炸弹上。

他无法接受。若时空转移，他可能会准备将问题留给猫头鹰部队处理，正如他抛开众多问题的手法一样，无奈时空无法转移。这一次，他如今领会到，这一次是由表亲来承担后果。尽管杰里与表亲并无多大过节，但表亲一插手，让局面更难掌握。因此，尽管他对乔治具有的人性有点模糊的概念，在此却无法适用。

除此之外，他也关心丽姬，非常关切。他的七情六欲明确之至。他对丽姬的渴求之心明白露骨。她是他喜欢的那类沦落人，也爱上了她。他已经理出头绪，画清蓝图，经过数日沉淀后，拟出自己坚定如山的解决方案。他微感畏惧，却大为欣慰。

杰里·威斯特贝，他告诉自己，你诞生时，自己在场。几次结婚、几次离婚时，自己也在场。葬礼时，自己当然也会在场。依我们明智的见解，在你个人历史某些关键时刻，你应该也要出席。

他搭公交车沿河岸逆流而上数英里，然后下车步行，搭乘三轮摩托车，坐在酒吧里，找小姐做爱，心里只想丽姬。他投宿的小旅馆住满了儿童，有天早晨他醒来时发现两个儿童坐在床上，睁大眼睛看着老外好长好长的腿，嗤嗤笑着他的脚丫凸出床尾的模样。我干脆待在这里算了，他心想。然而这时他是想自欺，因为他知道自己非回去问她一个明白不可，就算她以蛋糕砸脸当做回答也好。他从阳台射出纸飞机，儿童又拍手又舞蹈，看着飞机飞走。

他找到船夫，夜幕低垂时渡河到万象，逃避入出境手续。翌晨，他又省略正式手续，溜上未排定班次的老挝皇家航空DC8客机，下午起飞，携带暖口的威士忌，与两位友善的鸦片商畅谈。飞机降落时，天下着黑雨，打脏了机场巴士的车窗。杰里一点也不在意。毕竟怀抱着归乡的心情回到香港，这是他人生第一遭。

尽管如此，走进入境区时，杰里谨慎行事。他告诉自己，不准大肆声张，绝对不准。过去几天的休息颇具神效，让他心情笃定不少。他先四下观察后，朝男士洗手间走去，而非前往入境桌。他在洗手间等到一大群日本观光客过来，赶紧冲过去问谁会讲英文。他拦下四人，将香港记者证给他们看，在他们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时，问这四人入境的目的、

打算做什么，有什么人同行，自己则拼命做笔记，然后再访问四人，重复上述动作。这时他等待值勤的警察换班。四点一到，警察果然换班，他立刻走向一道写着“不准进入”的门。他事先已相中这道门。他敲敲门，等门一打开，他马上走进去。

“你搞什么鬼？”一名苏格兰巡官怒气冲天地说。

“传回给报社，朋友。访问完友好的日本观光客，发稿子回去。”

他亮出记者证。

“那就乖乖走那边的门，跟其他人一样。”

“别傻了。我没带护照，所以你那位优秀的同事才带我来这里。”

魁梧、嗓音出类拔萃、外貌明显是英国人、微笑动人，五分钟为他在他前往市区的巴士上赢得一席之地。来到他的公寓大楼区，他先在外面徘徊，但没有看见可疑人物，只是这里是中国，可疑不可疑，又有谁看得出来？他等的电梯一如往常是空的。上了电梯，他哼着寻死匈奴那张唱片的音乐，期待泡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衣物。临走时，他在门缝插上几片小楔子。如今回到门口，他发现小楔子躺在地板上，一时焦虑起来，后来才想起陆克，微笑着期待两人重逢。他打开防盗门的锁，门还没开，就听见里面嗡嗡响，是单调平稳的低鸣，可能是冷气机，却不是寻死匈奴的冷气机，因为他的冷气不够冷，一无是处。陆克这可恶的白痴，一定忘了关留声机，就快烧坏了。但他继而一想：错怪他了，是冰箱啦。接着他打开门，看见陆克的尸体横陈地板，头颅被轰掉半边，全香港半数苍蝇不是停在上面就是围在旁边。他赶紧进门，关上门，将手帕塞进嘴里，一心只想冲进厨房，以免仍有人在场。回到客厅后，他推开陆克的双脚，挖起镶木砖，取出他那把禁忌手枪以及逃生随身包，放进口袋，然后才开始呕吐。

当然，他心想，所以瑞卡度才那么肯定赛马记者已死。

我也成了一员，他心想。这时他又重回街头，哀伤与愤怒之情重击着他的耳鼓与眼睛。纳尔森·柯已死，却是中国官员。瑞卡度已死，德雷克·柯却说只要别在街头声张，他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赛马记者杰里·威斯特贝同样也百分之百死亡，只可惜柯那个又蠢又贼又狠又贱的左右手，那个可恶的刁先生，竟然笨到毙错了欧洲人。

19黄金线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内部装潢一如别馆，连随处可见的仿玫瑰木、表皮式的礼貌、机场椅子、窝心的总统照片都一样。只是这次换成了福特总统。欢迎光临豪华大间谍屋，吉勒姆心想。他们上班的区域称为隔离室，有门直通马路，由两名陆战队员守卫。他们的通行证注明了假姓名，吉勒姆成了果顿。在领事馆期间，他们除了打电话或自己人彼此对话之外，绝对禁止与领事馆内任何人交谈。“我们不仅可以一概否认，各位，”马铁娄在简报时骄傲地告诉他们，“我们也全是隐形人。”这里上演的戏码正是如此，他说。美国总领事可以把手放在《圣经》上，对总督发誓，他们从未进过领事馆，工作人员也不牵涉其中，马铁娄说。“从上到下，全都睁眼说瞎话。”说完，他将权力交给乔治，因为：“乔治，这戏从头到尾都由你来导演。”

往下坡走五分钟就是希尔顿饭店，马铁娄帮他们订了房间。往上坡走，尽管累人，步行十分钟就是丽姬·伍芝的公寓住宅区。他们已经在领事馆待了五天，现在是晚上，不过他们浑然不知，因为情报行动室里没有窗户，只有地图与海图，两部电话由马铁娄的两名哑巴管理，默非与默非的朋友。马铁娄与史迈利各占一大张办公桌。吉勒姆、默非与默非的朋友则与电话共享一张桌子，而法恩则郁闷地坐在后墙一排空的戏院椅中间，活像出席试映会、感觉乏味的影评人，有时候剔剔牙齿，有时候打打哈欠，吉勒姆三番两次劝他离开，他硬是不肯。库洛接受过吩咐，别碰任何东西，尽量躲得无影无踪。弗罗斯特死后，史迈利惟恐他出事，希望他离境，但老库洛不从。

现在总算轮到哑巴登场了，是马铁娄所谓的“最后一次详细简报”。“啊，乔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苍白的默非身穿白衬衫与蓝长裤，站在凸起的讲台上，背后墙壁挂了一张图表，自言自语念着笔记。其他人，包括史迈利与马铁娄，围坐他脚边聆听，大半时间不发一语。默非有如描述吸尘器，独白起来更让吉勒姆昏沉欲睡。海洋在图表上占了大半，只有在最顶端以及左边各有蕾丝边状的中国南方海岸。香港后方是破碎的广东沿岸，在固定图表的板条之下微微露出。香港正南方，在图表正中央画出类似云朵的轮廓，分成四区，分别标明A、B、C、D。默非以恭敬的语气说，这些地方是捕鱼区，中央以十字标出的是中点，长官。默非只对马铁娄发言，管他是不是乔治从头到尾导演的戏。

“长官，根据上次德雷克离开中国大陆时，长官，综合了目前为止针对情势所作的评估，我们和海军情报单位之间，长官——”

“默非、默非，”马铁娄以相当亲切的口吻插嘴，“放轻松一点，行吗，老弟？这里又不是训练学校，懂吗？轻松一下嘛，老弟。”

“长官。第一。天气。”默非说，他对长官的请求无动于衷，“四月和

五月是换季的月份，长官，介于东北季风和西南气流之间。每日气象预报都很难准确，长官，不过这段航程预计不会遇上极端天气。”他以教鞭指出汕头往南至捕鱼区的线，然后从捕鱼区往西北画过香港，往珠江直上广州。

“雾呢？”马铁娄说。

“这种季节经常起雾，云量大约有六到七奥克塔，长官。”

“奥克塔是什么鬼东西啊，默非？”

“一奥克塔代表天空有八分之一被云盖住，长官。奥克塔已经取代以前使用的十分制单位。过去五十多年来，四月从来没出现过台风，而海军情报单位也认为这时不可能形成台风。风向由东向西，九到十海里，不过顺风而行的船队一定要考虑风停的时刻，有时也会出现逆风，长官。湿度在百分之八十左右，气温是摄氏十五到二十四度。海相平静，偶有小浪。汕头附近的海水多半往东北流过台湾海峡，一天约三海里。不过再往西走——在这一边，长官——”

“你在废话什么，默非。”马铁娄语气尖锐，“搞什么，我当然知道那边是西方。”接着对史迈利咧嘴一笑，仿佛说“这些小毛头啊”。

默非再度不为所动。“我们必须准备计算速度的因素，以及船队在航程中任何一点的进度，长官。”

“当然，当然。”

“月亮，长官，”默非继续说，“假设船队离开汕头的日期，是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晚上，距离满月还有三天——”

“为什么作这种假设，默非？”

“因为船队确实在四月二十五日离开汕头，长官。一小时前，我们接获海军情报的证实。他们在捕鱼区C的东端观测到一系列帆船，顺风慢慢向西航行，长官。带头的帆船已经确认无误。”

此时出现了突兀的停顿。马铁娄脸色泛红。

“你这小子很聪明，默非，”马铁娄以警告的语气说，“不过你应该提早跟我报告才对。”

“是的，长官。再假设搭载纳尔森·柯的帆船意图在五月四日晚间进入香港水域，月亮会只剩四分之一，长官。如果我们依循先例——”

“依循先例没错，”史迈利语气坚定，“逃脱路线应该跟德雷克在一九五一年路线完全一致。”

这次又没有人质疑他，吉勒姆注意到。为何不质疑？令人百思不解。

“——然后这艘帆船应该在明天两洞洞洞抵达最南端的外岛蒲苔岛，与船队在珠江会合，及时抵达广州港，时间是在隔天的洞么三洞和么两洞洞之间，五月五日，长官。”

默非以平板语调介绍时，吉勒姆偷偷望向史迈利，像往常那样想着，他现在对史迈利的了解，不比在欧洲冷战的黑暗期与他初见时多到哪里。他三更半夜溜到哪里？是去遐想安恩吗？还是想着卡拉？他跟谁在一起，怎么会到凌晨四点才回旅馆？别跟我讲乔治正在享受第二春，他心想。昨晚十一点，伦敦那边传来叫嚣声，因此吉勒姆来这里接电话。伦敦说，威斯特贝下落不明。他们恐怕柯派人谋杀了他，或是更惨，遭到绑架凌迟，此次行动恐将被迫终止。吉勒姆认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杰里在回伦敦途中碰上两三个空中小姐，躲了起来，然而伦敦表示事态紧急，他别无选择，只好去叫醒史迈利，向他报告。他拨了电话到史迈利的房间，没人接听，因此穿上衣服，敲他房门，最后逼不得已只好撬开门锁，因为这时轮到吉勒姆恐慌起来：他认为史迈利可能病倒了。

但是史迈利的房间空无一人，床铺没人睡。吉勒姆检查史迈利的私人物品时，发现这位老牌外勤人竟大费周章在衬衫绣上假名条，暗暗称奇。然而他只发现这么多。所以他坐在史迈利的椅子上，打起盹来，一直到四点才醒过来，因为他听见一小阵骚动声，睁开眼睛，看见史迈利弯腰望着他，距离约六英寸。进房间怎么有办法如此轻声，只有老天爷知道。

“果顿？”他轻轻问，“有何贵干？”——因为他们处于情报行动状况，当然，日常生活中必须假设房间已遭窃听。基于相同原因，吉勒姆并未开口，只是递过装有康妮传来信息的信封。史迈利看了再看，然后烧毁。他对这项消息认真看待的态度，让吉勒姆叹为观止。即使是凌晨时分，他也坚持立刻前往领事馆处理，因此吉勒姆帮他提了公文包，陪他前往。

“今晚收获可好？”他随口问。两人正一步步往上坡走。

“我？噢，是有一点，谢谢，有一点。”史迈利回答，四两拨千斤。吉勒姆或其他人问到他夜间散步时，只能套出这么多风声。如今，乔治在丝毫不说明消息来源的情况下，提供实实在在的情报，不容任何人质疑。

“啊乔治，这东西，我们信得过吧？”马铁娄困惑之余问道。这是头一遭。

“什么？对，对，的确信得过。”

“那就好。调查得很棒，乔治。佩服佩服。”马铁娄真心地说。说这句话前，他又沉默了一阵，表情疑惑。自此以后，他们是有情报必信，别无选择。因为没有人，甚至连马铁娄也包括在内，胆敢挑战他的权威。

“捕鱼捕了几天，默非？”马铁娄问。

“船队捕鱼七天，可望满载渔获抵达广州，长官。”

“听到了吗，乔治？”

“有，听到了，我没什么好补充的，谢谢你。”

马铁娄问，船队若要准时在明晚与纳尔森的帆船会合，必须几点离开捕鱼区。

“据我估计，明天上午十一点。”史迈利看着笔记，头也不抬。

“我同意。”默非说。

“这艘单飞的帆船啊，默非……”马铁娄说，一面又对史迈利投以毕恭毕敬的眼光。

“怎样，长官？”默非说。

“能这么简单就脱队吗？进入香港水域时，用的是什么借口，默非？”

“这种情况很常见，长官。中国大陆的帆船队实行集体捕捞作业，长官。结果是，晚上脱队的单飞帆船不开灯进港，把鱼卖给外岛人赚现金。”

“分明是加夜班嘛！”马铁娄惊叹，对自己一语双关的机智沾沾自喜。

史迈利已转身面对另一面墙上的蒲苔岛地图，歪着头以加强老花眼镜的效果。

“这种帆船多大？”马铁娄问。

“二十八人，延绳钓船，长官，专钓鲨鱼、金线鱼和康吉鳗。”

“德雷克以前也开这种船吗？”

“对，”史迈利说，仍盯着地图，“没错。”

“那艘船能开得那么靠近吗？要是天气允许的话。”

回答的人又是史迈利。一直到这天，吉勒姆一辈子从未听过他如此大谈船经。

“延绳钓船吃水少于五浔，”他说，“只要海面风浪不算太大，想怎么靠近都不成问题。”

坐在后面长椅上的法恩恣意大笑一声，吉勒姆坐在椅子上转身，狠狠瞪他一眼。法恩斜眼看，摇摇头，对主子无所不知的能力感到钦佩。

“一个船队有多少帆船？”马铁娄问。

“二十到三十。”史迈利说。

“正确。”默非乖顺地说。

“这么说来，纳尔森怎么行动，乔治？是开到船队边缘，然后稍微乱走一通？”

“他会待在后面，”史迈利说，“船队喜欢成纵队行进。纳尔森会吩咐

船长跟在屁股后。”

“他会吗，上帝保佑。”马铁娄喃喃地说给自己听，“默非，传统上使用什么识别方法？”

“这一方面所知少之又少，长官。船民最善于东躲西藏，这点人尽皆知，他们对海洋法规完全不尊重。一到海上，他们一盏灯也不亮，主要是担心引来海盗。”

史迈利再度沉思起来。他没入一种木然静止状态，虽然双眼仍直盯大幅海图，吉勒姆知道他的心思绝未放在默非呆板叙述的数据上。马铁娄则不然。

“海岸贸易，一年总共多少，默非？”

“长官，官方没有管制，也没有数据。”

“帆船进入香港水域，有进行隔离检疫吗，默非？”马铁娄问。

“理论上所有船只应该停下，接受检查，长官。”

“实际上呢，默非？”

“帆船有帆船自己的法律，长官。严格说来，中国籍帆船禁止航行在维多利亚岛和九龙角之间，不过英国佬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跟中国方面为了航道优先权的问题吵架。抱歉这么说，长官。”

“何必。”史迈利客气地说，仍盯着海图，“吾人是英国佬，终身是英国佬。”

这是他对卡拉的看法，吉勒姆认定，是他在欣赏照片时习惯说的一句话。他瞥见了照片，惊动了他，似乎研究了半晌，细看他的轮廓，细看那模糊无神的凝视。然后他眼中的火光逐渐消失，不知怎么的连希望也随之而去，令人感觉他有所警觉，开始反省。

“默非，你刚才提到导航灯了吗？”史迈利转头询问，却仍盯向海图。

“有的，长官。”

“我料想纳尔森的帆船会有三盏，”史迈利说，“两盏绿灯，垂直打在船尾桅杆上，一盏红灯在右舷上。”

“对，长官。”

马铁娄尽量想抓住吉勒姆的视线，吉勒姆却不依。

“不过事实可能相反，”史迈利考虑过后警告，“可能一盏也没有，只是在靠近时打灯号。”

默非继续报告。新标题：通讯。

“长官，在通讯方面，长官，很少帆船具备自己的发报机，不过多数都有接收器。偶尔会有船长买个便宜的对讲机，接收范围大约一英里，以方便拖网作业，不过因为作业已久，也没什么话好报告吧，我猜。至

于寻找方位嘛，海军情报说，几乎算是谜团一个。根据可靠信息，很多延绳钓船靠的是一种原始罗盘，以手拿吊铅块的线，或者甚至拿个生锈的闹钟来找正北方。”

“默非，他们究竟怎么办到的啊？”马铁娄大喊。

“用绳子绑铅锤，在上面涂蜡，长官。让铅锤沉到海底，看看蜡黏上什么东西，就知道船来到什么地方。”

“看来他们真辛苦。”马铁娄大声说。

电话铃响。马铁娄的另一个哑巴助手过去接听，然后一手捂住话筒。

“追捕对象伍芝刚回家，长官，”他对史迈利说，“开车开了一小时，刚在附近停好车，麦可说听起来好像她正在放洗澡水，所以大概准备待会儿再出门。”

“她一个人？”史迈利面无表情地说。是个问句。

“她一个人吗，麦可？”他猛笑一声。“我打赌你会，你这个龅牙王八。对，长官，只有女士一个人，正在洗澡，监听的麦可问，什么时候才能装摄影机。麦可，女士有没有在浴室唱歌？”他挂掉电话。“她没有唱歌。”

“默非，继续报告战情。”马铁娄脱口而出。

史迈利希望再演练一次拦截计划，他说。

“没问题，乔治！请便！导演是你，记得吧？”

“或许可以再看一下蒲苔岛这张大地图吧？然后再请默非为我们解说，可以吗？”

“可以，乔治，当然可以！”马铁娄大喊，因此默非继续讲解，这次动用了教鞭。海军情报观察站在这里，长官……经常与基地维持双向通讯，长官……靠岸地带两海里内全无部署……柯的船开始转回香港时，海军情报将立刻通知基地，长官……柯的船一进港，拦截将由一般英国警船进行……美国也将提供反向情报，只旁观，发生无法预见的情况时才加以支持……

对于每一细节，史迈利拘谨地点头表示听到。

“再怎么说明，小马，”期间他插嘴，“一旦柯把纳尔森弄上船后，他也别的地方可去了，对吧？蒲苔岛在中国海域的边缘。不住我们这边走，就无处可去了。”

吉勒姆边听边想着，总有一天，乔治会碰上以下两件事之一。他不是会停止关心一切，就是会因内心矛盾百出而害死他。如果他停止关心，他主导情报行动的功力将减半。如果不停止关心，他那小小的胸腔会因拼命想为我们的行动寻找解释而爆炸。凄惨的是，史迈利自己在与高级长官进行不列入记录的闲聊时，一一说明令他进退维谷的问题，

让吉勒姆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尴尬。史迈利当时说，为维护我们的人性而采取不人道的手法，为维护同情心而铁石心肠，为维护我们的差异性而团结一致。长官怒气贲张，鱼贯退席以示抗议。乔治为什么不闭上鸟嘴乖乖做事，何必将自己的信念掏出来，当众擦拭，擦到缺陷毕露？康妮甚至凑着吉勒姆的耳朵，喃喃说了一句俄国格言，坚持要扯上卡拉。

“该不会发生战争吧，彼得亲亲？”她以放心的口吻对他说过，捏捏他的手，他则牵着康妮走在走廊上。“但是在为和平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会全力以赴，愿上帝保佑老狐狸。我敢打赌，他做的这件事，人民委员会也不会对他感激涕零。”

一阵重击声令吉勒姆转身。法恩又在调动戏院椅子了。他瞧见了吉勒姆，鼻孔朝天，摆出粗鲁无礼的窃笑。

“他脑子坏了。”吉勒姆心想，不禁打了个寒战。

基于不同原因，法恩最近也让吉勒姆认真焦虑起来。两天前，在吉勒姆陪同下，他主导了一件怵目惊心的事件。史迈利一如往常单独出游。为了消磨时间，吉勒姆租了一辆车，开车载法恩到中国边界，让他对着神秘山丘窃笑闷哼。回程途中，他们停在乡下的红绿灯前，这时一个华人男孩开着本田车停在旁边。开车的是吉勒姆。法恩坐在前座。法恩将车窗摇下，脱下夹克，左手靠在车门上，欣赏在希尔顿购物厅新买的镀金手表。正当车子要开走时，华人男孩竟朝手表猛扑，可惜法恩手脚更快，他抓住男孩的手腕，紧抓不放，拖着他走，男孩则挣扎着想脱身。吉勒姆开了约莫五十码才发现不对劲，立刻停车，而法恩正在等待这一刻。在吉勒姆来得及制止他之前，他跳下车，一把将男孩从本田车里拉出来，将他带到路边，打断他双手，然后笑着回到车上。吉勒姆生怕丑闻缠身，开快车逃离现场，留下尖叫的男孩盯着两条无力垂摆的手臂看。回到香港后，他决心立刻向乔治报告法恩的好事，然而法恩走运，过了八小时史迈利才现身，这时吉勒姆认为值得让乔治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因此作罢。

另一部电话在响，红色电话。马铁娄亲自接听。他听了一下，然后大声爆笑出来。

“找到他了。”他告诉史迈利，将话筒递给他。

“找到谁了？”

话筒悬在两人之间。

“你的手下。你的威瑟贝——”

“威斯特贝。”默非纠正他，马铁娄因此狠狠瞪他一眼。

“找到他了。”马铁娄说。

“人在哪里？”

“你问的是，他跑到哪里去了吧！乔治，他去过湄公河岸两家妓院了。要是我的手下没有夸大其词，他是一九四九年巴南姆马戏团小象移

师之后最热门的动物了！”

“请问他现在人在哪里？”

马铁娄递过电话。“你自己为什么不干脆叫他们把电报念给你听？根据他们的说法，他已经渡河了。”他转向吉勒姆，眨眨眼。“他们说，万象有两三个地方，可能会成为他寻欢的目标。”他说，然后继续纵声狂笑，史迈利则耐心坐着，耳朵贴在听筒上。

杰里选择一辆两侧有后视镜的出租车，坐在前座。到了九龙，他向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租车行租了一辆车，拿出逃生用的护照与驾照，因为他内心微微觉得，假名比较安全，就算只多安全一个小时也好。他往半山区开去时已近晚上，仍在下雨，照亮山坡的霓虹灯产生巨大光环。他经过美国领事馆，也路过星辰岗两次，有点希望能见到山姆·科林斯。第二次路过时，他确定找到了她的公寓，知道她的电灯开着。从外观看来，是意大利的美术灯，以优雅的弧度挂在观景窗的对面，花费三百元来附庸风雅。此外，浴室的毛玻璃里面也亮着。第三次路过时，他看见她披上披肩，从直觉或她循规蹈矩的姿态看来，她又准备在外过夜，不过这一次她的打扮冶艳到足以置人于死地。

每一次他允许自己追念陆克，眼前便蒙上一层黑影，想像自己正在做一些高尚却无用的事，例如致电陆克位于加州的家人，或是分社的小矮人，甚至摇滚客，管他原因是什么。以后再说吧，他心想。以后吧，他承诺自己，他会以合宜的方式哀悼陆克。

他缓缓驶入通往入口的车道，最后来到通往停车场的支路。停车场有三层深，他在里面绕圈子，总算找到丽姬的红色捷豹，停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以链条围起，避免粗心的邻居靠近爱车超群的烤漆。她也为方向盘装上豹纹布。布置这辆车，她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忽然一怒之下心想，去怀孕嘛。买条狗嘛。养小老鼠嘛。他恨不得敲碎挡风玻璃，却狠不下心。如果她不开这辆，对方要派大轿车来接她，他心想。也许老刁甚至会坐前座押车。也许他会自己来。也许她打扮得美美的，只是为了今晚任人在床上宰割，根本不是为了出门。他但愿今天是星期日。他记得库洛说，每逢星期日，德雷克·柯要陪家人，因此丽姬必须自己开车。然而今天不是星期日，而且亲爱的老库洛也不在身边告诉他，依据杰里只能猜测的证据来分析，柯人在曼谷或随便哪个鬼地方谈生意。

所幸降雨已转为雾气，他回头往支路开向车道。来到交叉口，他发现有一片窄窄的路肩，因此硬是挨着护栏停靠的话，其他车主会发牢骚，却仍能勉强通过。他擦到了护栏，但他不在意。从他现在坐的地方，可以看见行人在公寓区条纹帆布下进进出出，也能看见车辆加入或离开大马路。他丝毫没有警觉感。他点燃香烟，进出的大轿车擦身而过，却没有一辆是柯的车。偶尔有车挤过时，司机会稍停，猛按喇叭，或大声抱怨，杰里则置若罔闻。每隔几秒钟，他瞄一下后视镜。有个胖子鬼鬼祟祟从后面走来，外形不能说不像老刁，令杰里放开夹克口袋里手枪的保险，后来却发现这人缺少老刁的肌肉。这人经过他时他心想，大概是来

跟出租车司机收赌债吧。

他记得在跑马地与陆克共处的时光。他记得与陆克共处。

红色捷豹嘶嘶开上他后方的支路时，他仍注视着后视镜，只有一人开车，敞篷放下，没有乘客。他惟一没有料到的是，她可能搭电梯直接下停车场，亲自取车，不像先前那样劳驾门房帮她开到门口。他尾随而去，抬头瞥见她公寓的灯光仍亮着。她留了人看家吗？或是她打算很快回家？接着他想到，少耍小聪明了，她只是忘记关灯而已。

最后一次对陆克讲话，是叫他别老是烦我，他心想，而最后一次陆克对我讲话，是告诉我说，他会在史大卜面前帮我找借口。

她朝市区方向开下山。他跟在她车子后面开去，有一大段时间，他后面没有车子跟来，感觉不太自然，但是这个时间本来就不太自然，他内心的沙拉特人正快速死去，他措手不及。她的方向是市区最明亮的地带。他猜自己仍爱着她，然而此刻他准备怀疑任何人、任何事。他继续紧跟在后，因为他记得丽姬鲜少注意后视镜。在昏暗的雾气中，反正她也只能看见车头灯。雾气一团团笼罩，港口宛如失火，条条起重机灯光在袅袅烟雾中宛若水屋。来到中环，她开进地下室车库，他也直接开进去，停在六个停车位之外，不过她没有注意到。她待在车上补妆，杰里竟可以看见她扑粉掩饰下巴的疤痕。然后她下车，如常地上锁，只不过随便一个小孩拿着刮胡刀片就能一刀划破敞篷。她身披丝质斗篷，里面是丝质长洋装。走向旋转石梯时，她举起双手，细心拢拢落在颈子上的头发，将马尾放在斗篷外面。他下车跟踪，一路跟到旅馆大厅，及时转身，没被记者拍到。一群男女时装记者这时正在聊天，身穿缎衣，系着蝴蝶结。

杰里逗留在相对安全的走廊，端详着场面。这是个大型私人宴会，丽姬从他看不见的地方进入会场。其余宾客陆续从前门抵达，劳斯莱斯如林，没人显得特别。一名头发染成蓝灰色的女人坐镇前门，左摇右晃，说着酒气浓厚的法文。一个拘谨的华人女公关带了两名助理，一排站开接待来宾。宾客一一进门后，女公关与助理则以真心真意得令人害怕的姿态向前迎接，询问来宾姓名，有时请对方出示邀请函，接着再翻找名单说：“噢，没错，当然了。”蓝灰发女人微笑、咆哮。助理递给男客襟领针，递给女客兰花，然后迎接下一批宾客。

丽姬·伍辛顿木然走过这道过滤程序。杰里多给她一分钟通关，看着她穿越双扉门。门上注明“夜宴”，附上丘比特的神箭。她进门后，杰里才开始排队。公关女孩看到他的羊皮靴后不知如何是好。西装是够难看了，不过让她打不定主意的是那双靴子。她盯着靴子看时，杰里判断，她受训时老师必定教过，要特别重视鞋子。百万富翁就算袜子以上邋遢如流浪汉，一双两百元的古奇鞋绝对是保身护照。她皱眉看着杰里的记者证，然后再看宾客名单，然后又看他的记者证，再度看着他的靴子，朝蓝灰色树丛投以不知所措的眼光。蓝灰女则继续微笑、咆哮。杰里猜她是嗑药嗑到神志不清了。最后公关女孩摆出特别为“边际消费者”准备

的笑容，递给他一片咖啡碟大小的圆牌，荧光粉红，“记者”两字则以白色注明，有一英尺高。

“今晚我们要让每个人变漂亮，威斯特贝先生。”她说。

“拿我试试看吧，伙计。”

“喜欢我的香水吗，威斯特贝先生？”

“香得不得了。”杰里说。

“这叫做葡藤液，威斯特贝先生，一小瓶要卖一百港币，不过今晚福楼拜之家免费赠送给所有客人。孟堤费理夫人……噢，当然，欢迎光临福楼拜之家。喜欢我的香水吗，孟堤费理夫人？”

一名身穿旗袍的欧亚混血女孩端着盘子，低声说：“福楼拜预祝您今晚享受异国情趣。”

“拜托老天爷。”杰里说。

走进双扉门，另有一道三名美男子的接待行列，特别由巴黎飞来迷死人。另外还有一群保安人员，阵势直可比拟总统护卫。一时之间，他以为保安可能会搜身，他知道如果保安硬上，他准备玉石俱焚。他们以欠缺友善的眼光打量杰里，认定他是下人，但因他头发不是黑色所以放行。

“记者席在伸展台后第三排。”一名金发双性人说。这人身穿皮革牛仔套装，交给他一叠新闻稿。“您没带相机吗，先生？”

“我只负责图说，”杰里说着以拇指朝肩膀后面指，“拍照的史拜克在那边。”说完走进接待室，四处观望，龇牙咧嘴笑得铺张，对任何接触到他视线的人挥手。

香槟酒杯叠成的金字塔有六英尺高，旁边有绸缎阶梯，让服务生能从最上面取用。在凹陷的冰棺里躺着几个大酒瓶，等待下葬。有一台独轮车装满了煮好的龙虾与一个鹅肝酱结婚蛋糕，上面以花色肉冻排出福楼拜之家的字样。现场播放着空灵音乐，甚至隐约听得见对话的声音，说穿了不过是极富级人士无聊之余的应酬语。伸展台从长窗底部延伸到房间中央。窗户正对港口，但雾气将美景切割成块状。冷气开得很强，好让身穿貂皮大衣的女士不至于流汗。多数男客穿了晚礼服，但年轻的华人花花公子则穿纽约风格的长裤、黑衬衫，戴金项链。英国大班与女眷自成一圈，气氛低迷，犹如闷得发慌的驻防部队军官聚餐。

杰里察觉有手搭在他肩膀上，迅速转身，只见眼前一位矮小的同性恋华人，名叫戈兰牡，服务于香港一家八卦小报。他曾想向主任推销一篇文章，杰里帮过他忙。一排排扶手椅面对伸展台，大致排成马蹄形，丽姬坐在前座，两旁是阿沛戈先生与夫人或情妇。杰里在跑马地看过这一对。看起来他们好像是丽姬今晚的伴游。阿沛戈夫妇对她说话，但她似乎听进去的不多。她坐得直挺，外表美丽，已经脱掉斗篷，从杰里的座位看，她仿佛全身精光，只佩戴珍珠项圈以及珍珠耳环。至少她毫发

未损，他心想。至少她没有腐烂，没有染上霍乱，没有被子弹轰破脑袋。他记得第一晚在电梯里，站在她背后，由上而下看见她脊背那一道金毛。同性恋戈兰牡坐在杰里旁边。杰里与菲比·威费尔中间隔了两人。他只对她有些许印象，却仍盛情对她招手。

“哇。太棒了。菲比。你真好看。应该走走伸展台才对，朋友，秀一点大腿嘛。”

他觉得菲比稍显放不开，也许她对杰里也有同感，只不过杰里下飞机后就滴酒不沾。他取出笔记本写字，假装专业，尽量克制自己。慢慢来。别吓到了猎物。他看看自己写的东西，只见“丽姬·伍辛顿”几个大字。华人戈兰牡也看到了，大笑起来。

“我的新笔名。”杰里说，两人笑成一团，笑得太大声了，前排的人因此转头看，这时灯光渐渐暗下。丽姬却未回头，只不过他认为她可能已经认出他的嗓音。

他们身后的门一一关上，灯光也变暗，杰里有意在这张又软又舒服的椅子上睡一觉。空灵音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丛林节奏声，以铙钹声带出，最后只剩一盏吊灯在黑色伸展台上闪烁，呼应后窗外港口紊乱的块状灯光。鼓声从各处喇叭传来，缓缓升高，持续了很久，只有鼓声，敲击得很有技巧，声声迫切，最后丑陋不堪的人影渐次出现在港口窗户前。鼓声停止。在折腾人的安静中，两名黑人女孩大步走向伸展台，肩并肩，身上只穿戴珠宝。她们剃了大光头，戴着圆形象牙耳环，钻石项圈，有如女奴戴的铁环。油光的四肢与丛聚的钻石、珍珠、红宝石相互辉映。两人身材高挑美丽，体态轻盈，完全出人意料，一时之间对全体观众撒下绝对性感的魔咒。鼓声恢复，飘扬，聚光灯在珠宝与肢体速窜。她们扭着身体走出冒着蒸汽的港口，朝观众走去，带着奴役肉欲的怒气。她们转身，慢慢走开，以臀部挑逗、蔑视。灯光亮起，爆出一阵紧张的掌声，接着是欢笑、畅饮。人人同时开口，杰里则嗓门最大：敬丽姬·伍辛顿小姐，上流社会名媛，母亲连鸡蛋都不会煮；敬阿沛戈夫妇，他们拥有全马尼拉以及一两座外岛，这是香港赛马会的葛兰特上尉曾向他保证的。杰里有如服务生总管似的捧着笔记本。

“丽姬·伍辛顿，哇，容我说一句话，全香港拜倒在你脚下呢。本报想对今晚作个独家报道，伍芝或伍辛顿小姐，我们希望能采访到你，报道你的穿着，令人神往的生活方式，更加令人神往的朋友。摄影记者随后就来。”他向阿沛戈夫妇鞠躬。“晚安，夫人。先生。很荣幸能与两位共聚一堂。这是您首度来港吗？”

他表演的是拿手的小可爱戏码，是宴会中专门逗人笑的大男孩。服务生端来香槟，他坚持要为大家端到手上，不愿大家自己来。阿沛戈夫妇对他的表演觉得很有意思。库洛说他们是骗徒。丽姬盯着他看，眼神有一种说不出的含义，感觉真实而胆战，仿佛打开门看见陆克的人是她而非杰里。

“威斯特贝先生已经专访过我一次，据我了解，”她说，“好像没有见

报嘛，是不是啊，威斯特贝先生？”

“你帮哪家写报道？”阿沛戈先生忽然质问。他已经收起笑容。他面貌狰狞丑陋，显然丽姬一席话让他想起某件他听过而不喜欢的事。例如是老刁曾警告过他的事。

杰里告诉他。

“那就乖乖去写啊。少来烦这位女士了。她不愿接受访问。你有任务在身，去别的地方执行任务，不是来这里耍宝。去赚你自己的钱。”

“要我走就走，不过，阿沛戈先生，我走之前，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您希望我怎么描写您呢？是没礼貌的菲律宾百万富翁？还是半百万富翁？”

“拜托。”丽姬喘气，幸好这时灯光又暗下，鼓声再响，大家心平气和下来，一位带法文口音的女士开始以麦克风柔声解说。伸展台后方，两名黑人女孩正表演修长而妩媚的影子舞。第一位模特儿出现时，杰里看见丽姬在黑暗中起身，站在他前方，披上斗篷，轻轻快步走向走道，走过他身边，低头朝门口走去。杰里跟在她身后。来到大厅，她半转身，仿佛在看他，他不禁想到，她是有意引他过来。她的表情一样，反映出他自己的心情。她看来备受惊吓，面露疲态，全然不知所措。

“丽姬！”他呼喊，仿佛刚撞见老友，然后尽快跑到她身边，赶在她走进补妆室之前。“丽姬！天啊！好几年没见了！太棒了！”

两名保安警卫静静旁观，他则振臂拥吻，表现历久弥新的友谊。他已将左手伸进斗篷下，笑脸向下凑近她的脸时，将小左轮手枪顶住她背部肌肤，枪管抵住颈背正下方，如此表现老友情意之下，他带着她走上街头，一路上有说有笑，招来出租车。他原本不想动枪，但是不动枪的话，恐怕必须动手制伏她。真讽刺啊，他心想。回来是想对她说我爱你，结果却以枪押走她。她全身颤抖，怒发冲冠，然而他不认为她在害怕，他甚至不认为她被迫离开那场低俗的宴会时感觉很失望。

“正是我想要的。”她说，这时出租车开往山上，穿透雾气，“太好了，好得不得了。”

她的香水很陌生，不过他认为总比葡藤液好上百倍。

吉勒姆的感觉其实称不上无聊，但他的注意力实在也称不上无限，而乔治似乎总有办法集中精神。吉勒姆脑子不在思考杰里·威斯特贝打什么鬼主意时，便会不知不觉沉浸在默莉·米金的肉体中，或者回想起那个双臂向外翻的华人男孩，像被射得半死的野兔在飞遁而去的车子后哀嚎。默非的主题转到蒲苔岛，巨细靡遗地详尽叙述。

火山岛，长官，他说。

是全香港群岛最坚硬的岩层，长官，他说。

也是最南端的一个，就在中国海域的边缘，他说。

海拔七百九十英尺，长官，渔人出海作业时，以这个小岛作为导航点，长官，他说。

严格说来不是一个岛，而是六个小岛，其他五个一毛不生，无人定居。

庙盖得很棒，长官。古董很精彩。木雕功夫很好，可惜天然水很少。

“耶稣基督啊，默非，我们又不是要买小岛。”马铁娄劝他。行动结束了，伦敦也远在天边，马铁娄失去了不少光彩，吉勒姆注意到，也失去了全身的英国气息。他的热带西装是地道美国土包子的穿着，而且有必要拉拉交情，最好是跟自己人拉。吉勒姆怀疑，甚至连外派伦敦，对他都算是一段奇妙的历练，进而把香港当成敌境。压力大的时候，史迈利与他正好相反。史迈利变得内向，礼貌得过于拘谨。

蒲苔岛的人口一百零八人，逐渐减少中，从事农渔业，多半是共产党员，三个村落，三个废村，长官，默非说。他继续念经。史迈利继续专心听讲，但马铁娄则不耐烦地在笔记本上涂鸦。

“而明天呢，长官，”默非说，“明天啊，就是蒲苔岛一年一度的庙会，祭拜天后，长官。”

马铁娄停止涂鸦。“那些人还信那种鬼东西啊？”

“人人都有信教的权利，长官。”

“你在训练学院时学的，是不是啊，默非？”马铁娄继续涂鸦。

这时泛起一阵令人不自在的宁静，然后默非才英勇地抬起教鞭，顶端落在蒲苔岛南方海岸线的边缘。

“这个庙会，长官，集中在主要港口举行，长官，就在东南角这边，是古庙坐落之处。根据史迈利先生统合信息后所作的预测，长官，柯将在这里上岸，远离大湾，在本岛东岸的一个小海湾。东岸没有部落，没有天然海港，这段期间庙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大湾，如果在这里登陆——”

吉勒姆没听见铃响。他只听见马铁娄另一个哑巴接听电话的声音：“喂，麦可啊，”接着是他挺直上半身时飞机座椅发出的吱吱声，直盯着史迈利，“对，麦可。当然，麦可。现在。好。等一下。就在我身边。一切暂停。”

史迈利已经站在他身边，一手伸出去准备接电话。马铁娄看着史迈利。讲台上的默非背对着大家，继续指出蒲苔岛奇妙的特点，不太注意到这阵骚动。

“航海人对本岛的绰号是幽灵岩，长官，”他以同样疲惫的嗓音解释，“原因何在，似乎没人清楚。”

史迈利听了一下电话，然后挂掉。

“谢谢你，默非，”他客气地说，“讲解得非常有意思。”

他忽然静静站了半晌，手指摸着上唇沉思，姿态显得善良老实。“好，”他重复，“好，非常好。”

他最远走到了门口，然后停下脚步。

“小马，原谅我，我有事要离开一阵子。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应该。有什么事，我会打电话通知你。”

他伸手握门把，然后转向吉勒姆。

“彼得，你最好一起来，可以吧？可能用得上车，而你对香港的交通毫不畏惧，令人佩服。法恩不是在这里吗？啊，没错。”

赫兰道上的花朵盛开，呈毛茸茸状，有如为圣诞节喷上彩漆的羊齿植物。人行道狭窄，鲜有人使用，只有女佣带主人的儿女运动时才用得到。带他们出来散步时，女佣不发一语，活像在遛狗。表亲的跟踪车是棕色奔驰面包车，外表斑驳，刻意让人过目即忘，两侧染上尘土，一边漆有香港开发建筑勘测公司的字样。车上有根老旧天线，挂着中国结，垂在驾驶座上方，以悲伤的姿态钻至柯宅，过门不入。是第二次，还是当天上午第四次？没人想过。在赫兰道，正如在香港各处，总会有人在盖什么东西。

面包车上两人趴在人造革覆盖的双层床上，透过丛林般的镜头、摄影机、无线电电话器材，专心监视。对他们而言，通过七门的动作也成了例行公事。

“没有变化？”其中一人说。

“没有变化。”另一人证实。

“没有变化。”第一人对着无线电电话重复，听见另一端传来默非令人安心的声音，表示听到。

“说不定是蜡像，”第一人边看边说，“我们也许过去戳他们一下，看看他们会不会喊痛。”

“说不定有效。”第二人说。

两人同意，在专业生涯中，他们从未跟踪过如此静止的对象。柯站在他一直站立的地方，在玫瑰凉亭的尽头，背对着他们，向大海瞭望。他的矮小妻子坐得远远的，与平常一样穿黑衣，坐在白色庭园椅上，似乎凝视着丈夫。只有老刁有所动作。他也坐着，坐在柯另一边，嚼着类似甜甜圈之类的东西。

监听车开到大马路，拖着笨重的身躯往赤柱前进，为了维持掩饰身份，继续假装勘察本区环境。

20丽泽的情人

她的公寓大而无当，是机场休息厅、主管套房与妓女香闺的混合体。客厅天花板被耙成不对等的尖点，有如即将塌陷的教堂中殿。地板的高度不断变换，地毯厚如草地，踏过后留下亮亮的脚印。巨大的窗户提供了无限景观，却显得孤寂。当她关上百叶窗，拉上窗帘，两人转眼间置身没有花园的郊区小木屋。女佣进了她房间后面的厨房，走出来时，丽姬叫她回厨房。她悄悄走开，臭着一张脸，嘶嘶说着话。看我会不会跟主人告状，她说。

他拉上前门的链栓，之后杰里押着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逼她走在左前方一步，替他开门，甚至连橱柜也不放过。卧房有如电视剧蛇蝎女的布景，圆形床铺盖上花格棉被，在西班牙式布幔后有个凹陷状的圆形浴缸。他翻找床头柜，没找到小型武器，因为尽管枪支在香港不特别泛滥，住过中南半岛的人通常会有防身物品。她的更衣室看似一个电话打到中环，把时髦的北欧装潢店里所有东西订购一空。餐厅以毛玻璃、擦亮的镀铬与皮革装饰，挂有仿庚斯博罗画风的祖先画像，目光呆滞地盯着空椅子。连鸡蛋也不会煮的妈咪全部到齐，他心想。黑色虎皮台阶通往柯的书房，杰里在此逗留，四处张望，尽管忐忑不安仍看得出神。他在每件物品中看见老爸杉波，看见两人的父子之情。超大型书桌的桌脚呈半球形，底部则是有爪子的圆形，总统级的利器，镶在桌上的墨水池、带鞘的拆信刀与剪刀，没摸过的法律参考书籍，与老爸杉波搬家时必带的书名一样：《赛门斯谈税务法》，《查斯沃谈公司法》。见证加框，挂在墙上。大英勋章的荣誉状以“伊丽莎白二世在上恩典下……”开头，勋章本身以绸缎包裹，有如死去骑士的武器。华人长辈站在庙宇前合照。胜利的赛马。丽姬对他笑着。丽姬穿着泳装，令人惊艳。丽姬在巴黎。他轻轻拉出书桌抽屉，发现十几家不同公司的压纹信纸。橱柜里有空白档案，有一架IBM电动打字机，没有插头；有地址簿，没有地址。丽姬腰部以上赤裸，露出修长的背，向后看着他。丽姬，愿上帝救救她，身穿婚纱，握了一束栀子花。一定是柯叫她去婚纱馆拍的。

没有装鸦片的黄麻布袋照片。

杰里站在书房里心想，这里是主管的避风港。老爸杉波也有几个。他给了几个女孩公寓，甚至给其中一个一栋房子，那女孩一年却只见到他几次。然而再怎么说，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秘密的特别房间，有书桌，有不使用的电话，有快餐型的纪念品，是从别人生命中切割而出的一个实体角落，是他逃避其他避风港时使用的避风港。

“他在哪里？”杰里问，再度回想起陆克。

“德雷克吗？”

“难不成是圣诞老公公吗？”

“我也不知道。”

他跟着她走进卧房。

“你通常都不知道？”他问。

她正一一摘下耳环，放进珠宝盒。然后取下发夹、项链与手环。

“他人在哪里，就从哪里打电话回来，白天或晚上，谁管那么多。

这是他头一次不主动联络。”

“你可以打给他吗？”

“随时都行。”她以蛮横的讽刺语气反驳，“当然行。大老婆跟我相处得很融洽。你难道不知道？”

“公司呢？”

“他不进公司。”

“老刁呢？”

“去他的老刁！”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只猪。”她动了肝火，打开橱柜。

“有消息，他可以转给你。”

“要是他高兴的话。可惜他不高兴。”

“为什么？”

“我又怎么知道？”她拉出一件套头毛衣以及牛仔裤，丢在床上。“因为他讨厌我。因为他不信任我。因为他不喜欢欧洲人跟大老板走得太近。我要换衣服，给我滚出去。”

因此他再度漫步走进更衣室，背对着她，听见丝布与皮肤摩擦的窸窣声。

“我见到了瑞卡度，”他说，“我俩开诚布公，交换了很多意见。”

他迫切想听的是，他们有没有告诉她。陆克的命案，他希望为她脱罪。他听着，然后继续说：

“查理·马歇尔把他的地址给了我，所以我过去跟他聊一聊。”

“好啊，”她说，“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

“他们也跟我说过梅伦这个人。说你帮他运毒。”

她没有搭腔，因此杰里转身看着她，她正坐在床上，双手抱头。换上牛仔裤与套头毛衣的她，外表年约十五岁，身高也少掉半英尺。

“你究竟想要什么？”她终于低声说，声音轻到有可能是自言自语。

“你，”他说，“据为己有。”

她有没有听见，他不清楚，因为她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低声以“噢，天啊！”结尾。

“梅伦是你朋友吗？”她最后问。

“不是。”

“可惜。他正需要像你这样的朋友。”

“阿沛戈知不知道柯在哪里？”

她耸耸肩。

“你最后一次接到他电话，是什么时候？”

“一个礼拜前。”

“说了什么？”

“说有事要安排。”

“什么事？”

“拜托你别再问了行不行！整个该死的世界都在问问题，所以你也非问不可，对不对？”

他盯着她看，她的双眼浮现怒火与绝望。他打开阳台门走出去。

他忿忿地想着，我需要人对我简报。沙拉特的老大们，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跑到哪里去了？直到现在他仍未恍然大悟的是，一旦切断关系，也等于切断了生命线。

阳台围绕房子三边。雾气已暂时散去。山顶高挂在他身后，山肩缀饰着金色灯光。朵朵浮云在月亮周围制造千变万化的洞穴。港口将全部华丽的家当穿戴在身上，正中央有艘美国航空母舰，从舰头至舰尾打着泛光灯，如备受宠爱的女人沉浸在喜悦中，旁边挤满了随行船只。航空母舰甲板上有一列直升机与小型战斗机，勾起他泰国空军基地的回忆。一排即将出航的帆船漂过母舰旁，朝广州前进。

“杰里？”

她站在敞开的门口，看着他站在一排盆栽的末端。

“进来吧。我好饿。”她说。

这间厨房从来没开过伙，却有个巴伐利亚式的角落，有松木高背长椅，有高山图片，有写着“嘉士伯”啤酒的烟灰缸。她以随煮随好的咖啡壶泡好咖啡，倒给他喝。他也注意到，在她提高警觉时，肩膀拱向前，前臂抱住身体，与孤女习惯的做法一致。她在发抖。他认为，从他以枪抵住她之后，她就一直发抖不止。要是没有动枪就好了，因为他逐渐理解到，她的处境其实与他一般糟，也许更糟糕。两人之间的心情有如历经一场大灾难，置身个别的地狱里。他替她斟了一杯白兰地加苏打，也为自己倒一杯，让她坐在比较暖和的客厅，看着她抱着自己，喝着白兰地，盯着地毯。

“要不要听音乐？”他问。

她摇摇头。

“我代表我自己，”他说，“没有跟任何公司挂钩。”

她好像没听见。

“我自由而且自愿，”他说，“只是因为有朋友惨死。”

他看见她点头，却只是聊表同情。他确定她丝毫没有印象。

“柯这档子事越来越棘手了，”他说，“看来无法善了。你交往的那群人，全是狠角色啊。包括柯在内。一眼看去，他是第一级的公敌。我在想，说不定你希望摆脱他们。所以我才回来。算是日行一善。我只是不明白，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比方说梅伦。也许我们应该一起调查，看看真相是什么。”

经过一番不甚明确的解释，电话铃响。铃声有如掐喉咙时发出的嘶哑声，目的是避免刺耳。

电话在厨房另一边，放在镀金的推车上，每次闷响，上面的小灯应声眨动，反射到波状玻璃架上。她看了电话一眼，再看杰里，脸上立刻激起希望。杰里一跃而起，把推车推到她面前，滚轮深陷地毯绒毛中，走起来跌跌停停。他一面走，线圈跟着在身后拉长，最后宛如幼童的草写字迹。她很快拿起话筒说：“伍芝。”语气稍嫌无礼，是独居女子学会的口气。他本想告诉她，电话线遭人窃听，但他不知道要她防范的对象是谁。如今的他已经没有立场，不是这边，也不属于那边。他不知道双方各代表什么，但头脑忽然又涨满了陆克，内心的猎人也清醒过来。

她将电话贴在耳朵上，却不再说话。她说了一次“好”，仿佛正在接受指示，也一度以强烈的语气说“不对”。她的表情转为空白，嗓音不带任何涵义。然而他察觉到遵从，察觉到隐瞒，出现这种感觉时，内心怒火不禁熊熊燃起，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不对，”她对电话说，“我提早离开晚宴。”

他跪在她身边想一听究竟，可惜她耳朵紧贴听筒。

为什么不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不问什么时候能见面？他是否安好？为何一直没打电话来？为什么她以这种眼神看着杰里，没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一手按在她脸颊上，强迫她将头转过来，对她另一耳悄悄说话。

“告诉他，你非见他一面不可！你可以去找他。什么地方都行。”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好。是的。”

“告诉他啊！告诉他，你非见他一面不可！”

“我非见你一面不可，”她最后终于说，“不管你在哪里，我都可以去见你。”

听筒仍在她手上。她耸了一下肩膀，询问方位，双眼仍转向杰里，眼中的人却不是日行一善先生，只是包围她四周的凶险世界的一部分。

“我爱你！”他悄悄地说，“跟他说啊！”

“我爱你。”她说得短促，闭上眼睛。杰里还来不及阻止，她就已挂掉电话。

“他要到这里来，”她说，“你好可恶。”

杰里仍跪在她身边。她站起来，为的是摆脱他。

“他知不知道？”杰里问。

“知道什么？”

“我在这里。”

“也许吧。”她点了一根烟。

“他现在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到？”

“他说很快。”

“他自己一个人来吗？”

“他没说。”

“他有没有带枪？”

她来到厨房另一边。紧张的灰眼珠仍直瞪着他，充满怒火与惊恐。然而杰里毫不关心她的心情。期待行动的狂热已制约了其他所有感觉。

“德雷克·柯。那个包养你的好好先生。他有没有带枪？他会不会对我开枪？老刁是不是跟着他？只是问问而已。”

“他上床时不带枪，如果你要问的是这个的话。”

“你要上哪里去？”

“你们两个男人可能比较喜欢独处吧。”

杰里带她回沙发，让她面对客厅另一端的双扉门坐下。这扇双扉门以方块毛玻璃组成，外面是入门厅与前门。他打开门，如此一有人进门，她能一目了然。

“你们让人进门，有什么规定吗？”她听不懂他的问题，“这里有个窥视孔。他有没有坚持要你在开门前先察看一下？”

“他会从楼下对讲机打上来。然后会用他自己的钥匙开门。”

前门是光面处理过的硬木板，并非实心，却坚固耐用。根据沙拉特的口传轶事，若想出其不意拿下入侵的独行侠，别站到门后面，否则永远也出不来。这一次杰里不得不赞同。然而，站在门打开的一边，遇上

具有暴力倾向的对手，无异于坐以待毙。何况，柯是否知情，是否独行，杰里毫无概念。他考虑躲到沙发后面，但如果会引发枪战，他不希望丽姬被子弹波及，他绝对不希望。丽姬如今变得被动，眼神也懒散无主，让他更不敢大意。桌上放着他的白兰地酒杯，就放在她的酒杯旁，他轻轻将杯子移到插了塑料兰花的花瓶后，以免挡住视线。他将烟灰缸清理干净，打开一本《时尚》杂志，放在她眼前的桌上。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放音乐的习惯？”

“有时候。”

他选择艾灵顿公爵。

“是不是太大声？”

“再大声一点。”她说。他起了疑心，调低音量，注视着她，这时对讲机从入门厅吱吱叫了两声。

“保重。”他警告，一手持枪走到前门打开的一边，采取坐以待毙的位置，距开门的半圆弧形三英尺，近到足以往前跳跃，远到足以开枪并且躲避——他弯腰成半俯卧姿势时，心里如是想。他左手握枪，空出右手，因为在这种距离下，用哪只手都不可能失守，但如果必须出拳，他希望能用右手。他记得老刁半举双拳的模样，因此警告自己别太靠近。无论采取什么行动，尽量保持距离。踹他鼠蹊一下，不过别趁机靠近。维持在他出拳范围之外。

“你说：‘上来吧。’”他告诉她。

“上来吧。”丽姬朝对讲机重复。她挂掉对讲机，打开链栓。

“他进来的时候记得微笑。别大叫。”

“你下地狱吧！”

他的耳朵机灵起来，听见电梯方向传来抵达时的闷击声，以及单调的“叮”一声。他听见脚步声朝门接近，只有一双脚，脚步稳定，这时回想起德雷克·柯在跑马地那种稍像人猿般的滑稽走姿，而且膝盖从法兰绒长裤里凸出。钥匙插进锁孔，一手扭开门，身体其余部分跟着进来，显然未经大脑。这时杰里奋力跳出，将毫不抵抗的身体压在墙壁上。一幅威尼斯的风景画掉下来，玻璃破碎，他用力关上门，一气呵成，看准喉咙，将枪管深深刺入颈肉。这时又有人以钥匙打开前门，动作非常快速，他气力尽失，双脚朝天飞，一阵痛楚从肾脏扩散开来，令他全身麻痹，因此倒在厚厚的地毯上，随之而来的一击打中鼠蹊，使他张口喘气，膝盖缩到下巴。从泪水直流的眼中，他看见管家法恩矮小的身材，满脸怒气，高高站在他身前，作势再出一击。杰里也看到山姆·科林斯僵硬地咧嘴笑，从法恩肩头望过来，心平气和，看看造成了什么伤害。另有一人站在门口，面带严重关切的表情打直领子，杰里刚才突袭的对象就是他。这人紧张不安，就是杰里从前的向导兼恩师乔治·史迈利先生，气喘吁吁地命令手下歇手。

杰里能够坐下，却只能在上身前倾时坐下。他双手向前，手肘挤向大腿，全身痛苦不堪，如同毒药从中心点散发出去。丽姬在入门厅的门口观望。法恩伺机而动，希望再找到借口毒打他一顿。山姆·科林斯坐在客厅另一端，跷起二郎腿坐在有侧翼的扶手椅上。史迈利帮杰里倒了一杯未掺水的白兰地，弯腰将酒杯送到他手上。

“你在这里干吗，杰里？”史迈利说，“我不懂。”

“求偶。”杰里说，这时一阵痛楚袭来，眼前一黑，因此闭上眼睛，“与女主人培养不期而遇的感情。抱歉。”

“你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杰里，”史迈利斥责，“有可能坏了全盘行动。假设我是柯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

“我想也是。”他喝了一点白兰地，“陆克死了。躺在我公寓，头被子弹打破了。”

“谁是陆克？”史迈利问，忘记曾在库洛家中见面一事。

“算了。只是朋友一个。”他再喝一口。“美国记者。酒鬼。对谁都没有损失。”

史迈利对山姆·科林斯瞥一眼，不过山姆耸耸肩。

“不是我们认识的人。”他说。

“认不认识，照样要打电话。”史迈利说。

山姆拿起移动电话，走出客厅，因为他知道这里的格局。

“有没有拿红铁烙她啊？”杰里边说边朝丽姬的方向点头，“教科书里列出的手法，大概只差这一项没用上。”他朝丽姬的方向呼唤，“你还好吧？刚才扭打成一团，抱歉了。没有打破什么东西吧？”

“没有。”她说。

“他们拿你荒唐的过去来敲你竹杠，对不对？一手胡萝卜，一手棍子？答应让你重新来过？你真傻，丽姬。这种游戏不允许过去，也无法拥有未来。严禁。”

他转回史迈利。

“就这么一回事了，乔治。没有大道理，只是丽姬引起我的兴趣而已。”

他向后仰，以半闭的双眼端详史迈利的脸。皮肉之痛有时能让人神志清醒，他观察到自己的行动已威胁到史迈利的人身安全。

“别担心，”他柔声说，“我不会看上你的，我肯定。”

“杰里。”史迈利说。

“有！”杰里说，做出专心听讲的姿态。

“杰里，你不懂状况。你有可能逆转情势。动用好几十亿的钱，动用

好几千人，都无法得到我们有机会从这项行动中获得的几分之一。战场上的将领如果听到以这么小的牺牲换取这么大的利益，一定会笑掉大牙的。”

“别拜托我来替你解围，老兄，”杰里说，再度抬头看史迈利的脸，“扮演猫头鹰的是你，记得吧？不是我。”

山姆·科林斯走回来。史迈利投以疑问的眼神。

“他也不是他们的人。”山姆说。

“他们本来是想暗算我，”杰里说，“结果误杀了陆克。他很高大。生前很高大。”

“他在你公寓里？”史迈利问，“死了，被枪毙了。在你公寓里？”

“死了好一阵子了。”

史迈利对科林斯说：“看来我们得清除线索了，山姆。我们可不想冒着闹出丑闻的风险。”

“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络。”科林斯说。

“查一查班机，”史迈利朝他背后呼唤，“两个，头等舱。”

科林斯点点头。

“那家伙我一点也不喜欢，”杰里坦承，“从来都不喜欢。一定是他留了小胡子的关系。”他以拇指对着丽姬指。“她对你们有什么重要性，干吗追得这么紧，乔治？柯又不会把最重大的机密告诉她。她是欧洲人哪。”他转向丽姬。“对不对？”

她点头。

“就算他对丽姬泄密，她也记不得了，”他继续说，“对那些事情，她是一窍不通。她大概连纳尔森这个人都没听过。”他再度对她呼喊，“你。纳尔森是谁？说啊，他是谁？是柯天折的儿子，是吧？没错。还拿他的名字来当船名，对不对？还有他的爱马。”他转回史迈利。“看吧？一窍不通。别把她扯进来，听我的忠告。”

科林斯已拿了一张班机时刻表回来。史迈利看着，眼镜下的眉毛深锁。“看来我们得马上送你回国了，杰里。”他说，“吉勒姆在楼下的车上等你，法恩也跟着走。”

“我只想继续养病，希望你别在意。”

杰里向上抓住史迈利的手臂想撑起身子，法恩立即跳向前，杰里却对他指出一指，以示警告，史迈利则命令他退后。

“给我保持距离，你这个恶毒的矮妖精，”杰里说，“只准给你咬一口，下一次想再咬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弯腰走动，一步步缓缓前行，双手握紧，盖住鼠蹊。走到丽姬面前时，他停下脚步。

“他们来过这里商量事情吗，柯和他的好兄弟？柯会带他的弟兄过来这里闲聊吗？”

“有时候。”

“你帮他们装过麦克风吧？乖乖的像个家庭主妇？让窃听男孩进来，调整台灯？你当然有。”

她点点头。

“那还不够，”他说，一面朝浴室一拐一拐前进，“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一定还有更多。多了很多。”

进了浴室，他将脸浸入冷水，喝了一些，立刻呕吐起来。回到客厅途中，他寻找丽姬，看见她在客厅，如同身受沉重压力的人专找小事情做，整理着唱片，放回相对应的唱片封套里。史迈利与科林斯在远处的角落低声商谈。在较靠近他的地方，法恩在门口等他。

“再见了，朋友。”他对丽姬说。他一手搭在她肩膀上，拉她过来，让她的灰眼珠正对他。

“再见。”她说，亲他一下，说不上热情，但至少比她对服务生的亲吻更用心一点。

“我类似案发前的共犯，”他解释，“这一点我很抱歉。其他的事我并不后悔。你最好替那个姓柯的混账留心点。因为如果他们没宰成他，我有可能亲手宰他。”

他摸了摸丽姬下巴的爪痕，然后迈步走向门口法恩等待的地方，再转身向史迈利告辞。史迈利再度独处，因为他刚派科林斯去打电话。史迈利的站姿，是杰里记忆中最清晰的姿势，短短的手臂在腰间微微上扬，头微微向后仰，表情既流露歉意又具询问的意味，仿佛刚把雨伞忘在地铁里。丽姬背对着两人，继续整理唱片。

“代我向安恩问好。”杰里说。

“谢谢你。”

“你错了。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只知道你错了。话说回来，大概也太迟了。”他再度恶心，身体的痛楚令他头疼欲裂。“你再靠近一点，”他对法恩说，“看我会不会扭断你脖子，听懂了吧？”他再转回史迈利。史迈利以同样姿势站立，没有做出听见的表示。

“祝你佳节愉快。”杰里说。

最后再点头一次，不是朝向丽姬。杰里一跛一跛走到走廊，法恩跟在后面。等电梯时，他看见那位优雅的美国女人站在打开的门口，看着他离去。

“啊对了，我倒把你给忘记了，”他拉开嗓门说，“窃听她公寓的人就是你，没说错吧？英国佬勒索她，表亲窃听她，她运气真好，受到各方关照。”

美国人消失，很快关上门。电梯来了，法恩推他进去。

“别推我，”杰里警告，“这位绅士的大名是法恩。”他告诉电梯里其他人，声音非常大。他们多数穿的是晚礼服与缝上亮片的洋装。“他是英国特务，刚踢我蛋蛋一下。俄国人来了，”他对这些表情呆板、漠不关心的人说，“要来抢走你们的钱。”

“喝多了。”法恩面露灰色。

走到大厅，门房劳伦斯看得出神。来到前院，停着一辆标致房车，蓝色。吉勒姆坐在驾驶座上。

“给我上车去。”他说。

前座的门锁上。杰里爬进后座，法恩跟上。

“你在搞什么飞机啊？”吉勒姆咬牙切齿地质问，“伦敦临时情报员半途跳船的事，这倒是头一遭。”

“别靠近！”杰里警告法恩，“现在你一稍微皱眉头，就准备讨打。我是说真的。我警告你。试试看。”

地面的雾气再起，卷上引擎盖。路过的市景如同一幕幕垃圾场风情画：油漆招牌，商店橱窗，条条电线交横在霓虹灯前，团团令人窒息的绿叶，还有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以泛光灯照亮。从后视镜里，杰里看到一辆黑色奔驰车跟在后面，驾驶、乘客各一人，男性。

“表亲帮我们断后。”他大声说。

腹部一阵绞痛，几乎令他晕眩，一时之间他错认法恩又打了他一下，后来发现其实只是刚才那一击的余波。来到中环，他叫吉勒姆靠边停车，在众目睽睽下对着水沟呕吐，将头探出车窗，法恩则紧张地倚过去。身后的奔驰车也停下。

“痛得要命的时候啊，”他缩回车上，叹了一口气说，“最能让头脑清醒一下子了。对吧，彼得？”

吉勒姆气昏了，以脏话回答。

你不懂状况，史迈利刚才说。你有可能逆转情势。动用好几十亿的钱，动用好几千人，都无法得到我们有机会从这项行动中获得的几分之一……

怎么说？他不断自问。获得什么？纳尔森在中国事务方面的立场，他所知模糊。库洛向他透露的分量，是他所需知道的下限。“纳尔森能取得北京皇冠上的珠宝，阁下。谁跟纳尔森搭上关系，不但保证一生荣华富贵，连他家的鸡狗都能升天。”

他们绕过港口，朝港口隧道驶去。从海平面看，美国航空母舰在繁华的九龙背景下小得出奇。

“对了，德雷克怎么把他弄出来的？”他以闲聊的口气问吉勒姆，“不会是想再用飞机载他出来吧？当然不会。瑞卡度已经堵死了这条路，对

不对？”

“靠虹吸作用啦。”吉勒姆动了怒——杰里欣喜地想着，他真傻，应该闭嘴才对嘛。

“用游的吗？”杰里问，“让纳尔森游到大鹏湾是吧？不像德雷克的作风嘛。何况以纳尔森的年纪也不适合。就算没被鲨鱼咬掉什么的，也会被冻死。运猪火车呢？跟猪一起投奔自由？可惜你错过大场面了，伙计，都是我的错。”

“老实讲，我也觉得可惜。真想踹掉你的大牙。”

杰里脑海里响起甜美的庆贺之乐。果然没错！他告诉自己。情况就是这样！德雷克要带纳尔森出来，他们全都排队等他穿过终点线！

吉勒姆一时不察——就那么一个词，依沙拉特的说法却是罪无可恕，千夫所指——他吐露的信息，比起杰里目前忍受的任何痛苦都更加明确，在某些方面也更加痛彻心扉。以沙拉特而言，泄露天机情无可悯，但若能减轻失察的罪过的话，吉勒姆过去一小时的体验必然能提出来博得庭上的同情。其中有半小时，他开车载着史迈利在交通尖峰中疯狂乱窜，剩下半小时则在星辰岗外停车守候，六神无主。他在伦敦时担心过的每件事，恩德比与马铁娄两者的关联、拉康与山姆·科林斯扮演的配角地位最令他忧虑的地方，在过去这六十分钟都经确认，别无疑问，如假包换，其确凿程度再怎么形容也是枉然。

他们先来到半山区的白云道。这里有一处公寓住宅区，外表清淡，了无特征，占地广大，即使是居民，必定也需要仔细看门号才不至于走错门。史迈利按下标出梅伦的电铃。白痴的吉勒姆呆呆问：“谁是梅伦？”话一出口，立刻回想到那是山姆·科林斯的勤务名。然后他继续思考，问了自己——他不问史迈利，这时两人已上电梯——在海顿翻云覆雨一阵后，怎么有人神经错乱到以“堕落”前使用的勤务名来搞赏自己？随后科林斯开门，穿的是丝质的泰衫，棕色香烟插在烟嘴上，带着耐水洗、免熨烫的微笑，接着三人进入镶木地板的客厅，围坐在竹条椅上，山姆将两台收音机调至不同电台，一台播放人声，另一台播放音乐，提供基本防窃听的环境，以利于三人对话进行。山姆听着，完全忽略吉勒姆的存在，然后立刻联络马铁娄——请注意，山姆有电话线直通马铁娄，不需拨号，不经转接，显然是电话线一条通。他以隐闪的言语问马铁娄：“好朋友那边的事情怎样？”吉勒姆事后才知道，所谓好朋友是赌徒俚语，意思是呆头鹅。马铁娄的回应是，监听车刚回报。好朋友与老刁目前坐在铜锣湾的纳尔森司令号上，跟踪人说，方向性麦克风还是老样子，收到的尽是水声，转译员必须费上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才能排除杂音，弄清楚两人的对话是否重要。他们已经在港口安排了一个人站岗，船一起锚，或者两名对象之一上岸，必须立刻通报马铁娄。

“这么说，我们非得马上赶过去不行了。”史迈利说，因此众人回到车上，由吉勒姆开一小段路到星辰岗，一路上生着闷气，听着两人简短的对话，苦无对策，随着一分一秒过去，他更加相信自己发现了一大张

蜘蛛网，只有史迈利懵懂不知。史迈利脑海里只有本案的潜在希望，只有卡拉的影像，却过分短视，过分轻信他人，也在内心矛盾之余天真无知，居然一头栽入蜘蛛网正中央。

乔治年龄大了，吉勒姆心想。恩德比具有政治野心，作风鹰派倾美，更别提那箱香槟，对五楼大献殷勤的丑态。拉康对史迈利的支持有气无力，私底下则四处物色接班人选。马铁娄前往兰利。近在日前，恩德比企图强迫史迈利放手，双手将本案奉给马铁娄。而现在，最显而易见的是，山姆·科林斯又以鬼牌的姿态重出江湖，竟然电话线直通马铁娄！乔治的信息从何处来，马铁娄竟装傻，直通电话线却摆在眼前。

对吉勒姆而言，这些线索只能归纳出一个结论，他等不及想拉史迈利到一边，以他能力所及的方式让史迈利偏离行动一阵子，一下子就好，好让他看清前方。告诉他那封协议书的事。说出山姆前去白厅拜访拉康与恩德比。

结果呢？史迈利命令他回英国。为何回英国？因为有个姓威斯特贝的憨傻大间谍竟胆敢逃脱掌握。

即使没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奉命回英国的失望之情也让吉勒姆的心境雪上加霜。为了这一刻，他忍气吞声已久。被海顿放逐到布里克斯顿，当老乔治的哈巴狗，无法重回外勤情报界，必须忍受乔治的神秘兮兮，让吉勒姆私下感到备受羞辱，自暴自弃。尽管如此，至少那段时间像是一段有目的的旅途，直到这个可恶的程咬金威斯特贝杀出来，连他那么一丁点儿的慰藉也剥夺殆尽。他知道，回伦敦的话，至少接下来二十四小时史迈利将置身狼群之中，而他却苦无机会警告史迈利，是吉勒姆挫折不断的情报生涯中最大的一场折磨。如果怪罪杰里能抒发郁闷，去他的，不怪罪杰里，怪罪谁都行。

“派法恩去嘛！”

“法恩不是绅士。”史迈利本想如此回答，却以意义相近的话来回应。

这话一针见血，吉勒姆心想。他回想起被打断的手臂。

将某人遗弃在狼群一事，杰里也有同感，只不过他指的是丽姬·伍辛顿而非乔治·史迈利。他凝望后座车窗外，感觉路过的这个世界也被遗弃了。街头市集被遗弃了，人行道，甚至门口，也被遗弃了。山顶在他们头上忽隐忽现，鳄脊般的山形在残月照耀下斑斑点点。今天是殖民地的末日，他认定。北京已经下了电话。“撤退，宴会结束。”最后一间旅馆关闭，他看见停放港口的劳斯莱斯空无一人，有如废车。看见最后一个头发染蓝的欧洲贵妇，满身免税皮草与珠宝，在最后一艘邮轮的上岸走道踉踉前行。最后一个中国观察家手忙脚乱地将最后一份错判的报告绞成碎纸。遭人洗劫的商店，空荡荡的市区，宛如死尸般等待掠食。一时之间，整个世界正在消失中，这里，金边，西贡，伦敦，一个债台高筑的世界，债权人站在门口，而杰里本身在阴错阳差间成为债务的一部分。

我一直对本单位心存感激，能给我贡献的机会。你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以幸存者的身份来说？

没错，乔治，他心想。尽管帮我回答吧，老兄。我正好有同感。不过大概和你指的意思不尽相同，好友。他看见与弗罗斯特饮酒作乐时那张亲和快活的脸。二度看见时，他的脸定格在哑然尖叫。他感觉陆克伸出友善的手，搭在肩膀上，看见同样一只手瘫在地板，举过头，仿佛正要接一个永远飞不过来的球。这时他心想，可惜啊，好友，事实上贡献的工作是由其他可怜人来负责。

丽姬就是一例。

有朝一日，若两人有缘举杯畅谈，万一重提这段难缠的往事，他会乔治提起上述想法。他会在此特别指出——不会咄咄逼人，不会大吵大闹的，放心——我们牺牲他人时，例如陆克、弗罗斯特以及丽姬，怎么能牺牲得无私无我、尽心尽力？乔治当然会提出好得无懈可击的答案。合理。恰如其分。连声道歉。乔治顾及大局。了解上级命令。他当然了。他是猫头鹰。

港口隧道近在眼前，他想起丽姬颤抖吻别的情景，同时想起驶往停尸间的那段路，因为一栋新大楼的鹰架笼罩在雾气中，耸立在他们前方，一如前往停尸间看见的大楼，打上泛光灯，汗光闪烁的苦力戴着黄色安全帽聚集一团。

老刁也不喜欢她，他心想，不喜欢泄露老大机密的欧洲人。

他强迫思绪转向，尽量想像他们如何处置纳尔森：无国，无家，是一尾等着被吞噬或随手被扔回海里的小鱼。这种小鱼，杰里看过了几尾。他们被捕时，他们迅速接受讯问时，他也在场。他也带过不止一尾走向不久前刚跨过的国境，以待迅速“循环处理”——沙拉特的术语用得巧妙，“趁引起注意前赶紧送回”。要是不把纳尔森送回呢？如果留下他呢？毕竟这份大奖人人梦寐以求啊？报告了几年后——两年，甚至三年，他听说有人撑到五年之久——纳尔森将成为谍报界又一名浪人，被人藏起来，搬家，再被藏起来，甚至连他掏心的对象都不爱他。

整件事发展下去，德雷克会如何对待丽姬？他纳闷。她这次将被丢到哪个废铁堆去？

车子来到隧道口，时速几乎减到零。奔驰车紧跟在后。杰里让头往前垂。双手掩盖鼠蹊，前后摇摆，痛苦呻吟。如哨兵站的临时警察哨里，有华人警官好奇地观望。

“他过来的话，告诉他车上有人喝醉了，”吉勒姆说得怒气冲冲，“让他瞧瞧吐得一地的脏东西。”

车子爬进隧道。北向的两线车道因天气不佳而塞爆。吉勒姆转进右车道。奔驰车开到他们左边。通过后视镜，杰里以半闭的眼睛看到一辆棕色面包车慢慢开下来，跟在后面。

“给我零钱，”吉勒姆说，“我下车会用到。”

法恩伸手进口袋，只用一手。

隆隆引擎声敲击着隧道。这时响起一阵叫嚣声。其他人也跟进。团团包围的雾气，增添了汽车废气的恶臭。法恩关上车窗。嘈杂声加大，回音阵阵，车身也跟着振动。杰里双手捂住耳朵。

“抱歉。又想吐了。”

不过这次他倚向法恩，逼得法恩暗骂“肮脏的杂种”，赶紧摇下车窗，这时杰里一头撞向他的脸下半部，手肘向下攒进他的鼠蹊。一面开车又必须一面自卫的吉勒姆，被杰里以手刀砍在肩窝与锁骨之间。这一招出击时手臂放松，在最后关头才将速度转为力量，直劈而下，砍得吉勒姆尖叫“天啊！”跳出驾驶座，车子也应声偏向右侧。法恩一手搂住杰里脖子，另一手想压住杰里的头，眼看杰里是死路一条。然而沙拉特教过一招，在拥挤的空间中可以使出“虎爪”，掌心底部朝上掐住敌人气管，手臂保持弯曲，手指向后施压，以增加张力。杰里使出这一招，法恩一头撞向后车窗，力道之猛，安全玻璃被撞出辐射裂痕。奔驰车上两名美国人继续注视前方，仿佛正前往参加国葬仪式。他考虑以食指与拇指掐住法恩的气管，却觉得没有必要。他从法恩皮带取回自己的手枪，打开右车门。吉勒姆情急之下扑向他，扯下西装手肘以下的袖子。杰里这件蓝色西装忠实可靠，可惜已年代久远。杰里把手枪对准他的手挥过去，看见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法恩一腿踏出，但杰里关门夹上，听见他又大叫：“杂种！”之后他头也不回地往市区跑，逆车流而行。他在动弹不得的车辆间蛇行跳跃，冲出隧道，往上坡跑，一直跑到哨兵小屋。他好像听见吉勒姆的喊叫。他好像听见枪响，不过有可能只是汽车逆火的声音。他的鼠蹊疼痛难忍，却在痛苦的刺激下跑得更快。路边一名警察对他大喊，另一名则伸手拦他，却被他推开。警察看他欧洲人，再放他一马。他跑到拦下出租车为止。司机听不懂英文，因此他只好用手指。“对，就这样，伙计。这里往上。左转，可恶的白痴。就这样。”——最后终于到了她的公寓区。

他不知道史迈利与科林斯是否仍在，也不清楚柯有没有来，也许连老刁也一起来，但他所剩时间不多，无法玩把戏来探个究竟。他不敢按铃，因为他知道会被窃听。他从皮夹取出名片，潦草写了几个字，插进送信孔，半蹲守候，又发抖又冒汗又喘气，活像一匹拉车马，一面仔细听她的脚步声，照料鼠蹊。他等了一个世纪，门总算打开，她站在门口盯着他，他则极力直起身子。

“天啊，是日行一善先生。”她喃喃地说。她脂粉未施，瑞卡度的爪痕既深且红。她并没有哭；他不认为她哭过，但她的脸看来比其他部位显得更老。为了谈话，他拉她到走廊上，她并没有抗拒。他指着通往防火梯的门。

“五秒钟后到另一边等我，听见没？别打电话给任何人，走开时别太大声，也别问任何傻问题。带些暖和的衣服。好了，快去。别拖拖拉拉

拉。拜托。”

她看着杰里，看着他被撕断的袖子，以及汗湿的西装，蓬乱的额发吊在眼前。

“不听我的就等死，”他说，“相信我。死得很惨。”

她单独走向公寓，门也不关。但她很快就出来，为了安全起见连门也没关上。来到防火梯，他走在前头。她背了肩袋，穿上皮外套。她帮杰里带来一件羊毛衫，好换掉破西装，他猜是德雷克的衣服，因为尺寸小了一号，但他仍设法把自己挤进去。他清光了西装口袋，放进她的包包，将西装扔进垃圾口。她一路不做声跟着他，他两度回头确定她是否跟了过来。来到楼下，他先探查网状玻璃窗外的动静，及时退后看见摇滚客本人，由体型沉重的部署陪同，前来门房的小亭，出示警察证。他们顺着阶梯一路走到停车场，她说：“我们去开那艘红色独木舟。”

“别傻了行不行，把车子留在市区啦。”

他摇摇头，带她走过停车场，来到一处废墟，满是垃圾与建筑工地废弃物，如同圆场的后院。废墟两道渗水的水泥墙夹着通往市区方向的阶梯，由晚宴的马路切割成数段，高度令人晕眩，上方垂挂的是黑色的枝叶。向下延展的阶梯让他的鼠蹊疼痛难耐。第一次碰上马路，杰里直接带她穿越。第二次由于远方有血红的警灯闪烁，他将她拉进树林躲避呜呜飞驰而过的警车。在高架桥下的地下道他们叫到没牌照的出租车，杰里报上住址。

“什么鬼地方啊？”她问。

“你不必知道，”杰里说，“乖乖给我闭嘴，让我独裁一下，可以吗？身上带了多少钱？”

她打开包包，数着钱包里厚厚的钞票。

“打麻将时赢老刁的钱。”她说，但他不知何故认为她在编故事。

司机在巷子尾端让他们下车，他们走一小段路到低矮的关口。这栋房子没有开灯，但他们一靠近，前门自动打开，另一对男女立刻从黑暗中窜出，经过他们身边。他们走进门厅，大门关上，循着小灯走过砖墙砌成的小迷宫，最后来到时髦的内厅，播放着背景音乐。大厅中央摆着绵长如巨蟒的沙发，上面坐的是一名苗条的华人女士，大腿上放了笔记簿与铅笔，再怎么看也像是典型的豪宅女主人。她看见杰里，微笑，看见丽姬，笑得更开心。

“整晚。”杰里说。

“没问题。”她回应。

两人随她上楼，走进小走廊，敞开的房门让他们一窥丝床罩、昏黄灯光、镜子。杰里选择最没性暗示的一间，回绝了对方再安排一个小姐凑数的好意，付给她钱，订一瓶人头马。丽姬跟着他进房间，肩袋丢到床上，门还未关上就爆出一阵如释重负而不自然的笑声。

“丽姬·伍辛顿，”她高声说，“人家都说，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准会沦落到这种下场。看吧，他们没说错！”

房间里有张躺椅，杰里躺下，盯着天花板，双脚交叉，白兰地酒杯在手。丽姬上了床，两人沉默了好一段时间。这地方很静。偶尔楼上传来欢乐的叫声或闷笑声，有一次是抗议声。她走到窗前向外眺望。

“外面有什么？”他问。

“该死的砖墙，大概三十只猫，一叠空箱子。”

“有雾吗？”

“浓得很。”

她漫步走进浴室，东摸西碰后走出来。

“伙计。”杰里轻声说。

她动作暂停，忽然忧心起来。

“你头脑清醒，能作适当的判断吗？”

“干吗问？”

“你告诉他们的事，我要你一五一十跟我讲。全讲完了，我再请你一五一十对我说，他们问了你什么问题，你回不回答得出来都一样。之后呢，我们再来试试所谓的逆向操作，以理解出那些狗杂种在这个人骗人的世界扮演什么角色。”

“是重演。”她最后说。

“重演什么？”

“我不知道。跟以前发生过的事一模一样。”

“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管他什么事，”她语带倦意，“会再发生一次就对了。”

21 纳尔森

凌晨一点。她刚洗过澡，走出浴室时围着白色浴巾，赤脚，头发以毛巾裹住，身体的比例因此完全走样。

“连马桶上都用纸条包住呢，”她说，“漱口杯也用玻璃纸包得好好的。”

她在床上打盹，他则躺在沙发上，她一度说：“我愿意，可惜现在没感觉。”他响应说，反正被法恩踢那么一脚，欲望也稍微进入休眠状态了。她向他叙述了那位小学教员，称呼他为该死的伍辛顿先生，是她“走上正道的一次尝试”，也谈到为了表示礼貌而生下的小孩。她也谈到自己很差劲的双亲，谈到瑞卡度，骂他是个混账，说她爱得有多深，说群星酒吧有个小姐教她用金链花下毒，结果有天被瑞卡度打得半死后，“在他的咖啡里掺了重药”，可惜她大概买错药，她说，因为事后他只是病了几天，而“在垂死边缘的瑞卡度比健康时的瑞卡度更糟糕”。又有一次，她趁瑞卡度洗澡时拿刀杀他，结果他只是抹抹膏药，继续揍她。

她又说，瑞卡度表演失踪戏码时，她与查理·马歇尔拒绝接受他已死的事实，还举办了所谓“瑞卡度活着！”的宣传活动。她也叙述查理去缠老爸的经过，与他向杰里描述的大同小异。丽姬也说，她拎起背包前往曼谷，一脚踏进中国海空位于四面佛酒店的套房，打算找老刁算账，碰到的却是柯。之前两人仅有一面之缘，在香港一场宴会上，举办人是萨莉·凯尔，是个染蓝发的壮硕男人婆，经营古董买卖，同时卖海洛因赚外快。进了套房后她大闹，首先柯呵斥她滚出去，结尾却“顺其自然”——她开心叙述着。“在丽姬·伍辛顿直通堕落之路的路上再踏出一步。”如此，慢慢在邪念引导之下，查理·马歇尔的老爸半推，丽姬半就，订下一份华人味十足的合约，由柯与查理的老爸签字，交易的商品其一是瑞卡度，其二是他最近退休的人生伴侣，丽姬。

上述的合约，杰里听见后并不特别惊讶，她与瑞卡度则满心感激地默许。

“你当初应该丢下他不管才对。”杰里回想起他右手两个戒指，也想起被炸得粉碎的福特车。

但丽姬过去没这么想过，现在也不这么想。

“那时他跟我们是一国的，”她说，“只不过他是混账一个。”

买下他一条命后，她觉得因此摆脱他，重获自由。

“中国人托媒讲亲的事每天都有，为什么德雷克跟丽泽不行？”

为何老讲丽泽这名字？杰里问。为何用丽泽而不用丽姬？

她不知道。德雷克不想谈这件事，她说。他告诉她，他人生中有过一个叫做丽泽的女人，算命师向他保证，将来肯定会再出现一个。他认为

丽姬这个名字很接近，所以顺水推舟，干脆叫她丽泽。既然要改名，她也干脆将姓缩水为伍芝。

“金发小鸟。”她说得心不在焉。

改名其实也具有现实的考虑，她说。柯帮她改了姓名后，原本在当地警察局登记有案的前科，柯也请他们一笔勾销。

“后来那个王八梅伦大摇大摆走进来，说他会叫警方再把前科登记上，还特别加上说明：曾为他走私过海洛因。”她说。

结果沦落到今日的田地。

对杰里而言，两人的呓语漫谈带有热恋之后的平静气氛。他躺在长沙发上，头脑清醒，而丽姬却边说话边打盹儿，懵懵接着沉睡前没叙述完的往事，而他也知道，她即将据实相告，因为反正她不明白杰里已知道、明了的事。他也了解，时间一久，柯成了她的船锚。柯放任她自由探险，与那位小学教员不无相似之处。

“德雷克一辈子从来没有食言过。”她有次翻身时说，然后再度陷入时睡时醒的梦乡。他回想起孤女：千万别对我撒谎。

过了几小时，几个世纪，她被隔壁一阵欢欣的喧哗吵醒。

“天啊，”她语带欣赏地高声说，“她还真的爱到最高点哩。”喧哗声再现。“啊哈！装的。”一片寂静。

“你醒着吗？”她问。

“对。”

“你打算怎么办？”

“明天吗？”

“对。”

“我不知道。”他说。

“跟我一样。”她低声说，似乎再度沉睡。

我需要沙拉特对我简报，他心想。迫切需要。打个过渡电话给库洛算了，他想。向亲爱的老乔治请教，听听他近来动不动就分享的哲学高见。他一定在。在某地。

史迈利的确在，但当时即使杰里向他请教，他也帮不上忙。若能换取些许领悟，他愿以全部所知来交换。隔离房没有日夜之分，他们在天花板打下的零碎日光下或躺或卧，房间一边是三名表亲以及山姆，史迈利与吉勒姆则占据另一边，法恩在一排戏院椅子前来回走动，表情有如愤怒的笼中兽，两个小手各捏一个看似壁球的物品。他的嘴唇乌黑肿胀，一眼闭上，一团干血挂在鼻子下拒绝落地。吉勒姆右手吊着肩膀，双眼一直盯着史迈利。不过除了法恩之外，众人的视线也同样直盯着史迈利。电话铃响，但来电的人是楼上的通讯室，通知说曼谷捎来报告，

已经确切掌握杰里的行踪，知道他跑到万象。

“跟他们说追查结果不了了之，默非。”马铁娄下令，双眼仍盯着史迈利，“随便跟他们讲什么鬼话都行。只要他们别来烦就好。对不对，乔治？”

史迈利点头。

“对。”吉勒姆坚定地说，替他回答。

“追查结果不了了之，亲爱的。”默非对着话筒重复。“亲爱的”一词听来颇为突兀，因为默非至今尚未表露出人类温情。“你是想发个电报，还是要我帮你发？我们没兴趣，对吧？算了。”

他挂掉电话。

“洛克斯特找到她的车了。”吉勒姆再说一次，史迈利却仍直盯前方，“在中环一个地下停车场。同一个地方也找到一辆租车。是威斯特贝租的。今天。以他的勤务名登记。乔治？”

史迈利点点头，动作轻巧到足以让人误解为极力挥走的昏睡虫在作祟。

“至少他有在动作，乔治。”马铁娄口气尖锐，从房间另一边说，身旁是科林斯与哑巴。“有些人会说，大象不听话乱跑的时候，最好是出去枪毙掉。”

“不先找到，枪毙什么？”吉勒姆怒火上升。他的神经已濒临临界点。

“彼得，乔治愿不愿意，我还说不准呢，”马铁娄又以父执辈的口吻说，“我认为乔治可能眼睛稍微不盯紧，就会置我们共同进行的事业于险境。”

“不然你要乔治怎么办？”吉勒姆以刻薄的语气顶嘴，“难道要他走遍大街小巷去找？还是叫洛克斯特通报他的姓名与特征，让全香港的记者知道警方正在通缉他？”

坐在吉勒姆身旁的史迈利仍维持驼背怠惰的姿态，宛如老年人。

“威斯特贝很专业，”吉勒姆坚称，“他不是天生好手，不过人很精明。在香港那样的地方，他可以躲就是几个月，洛克斯特也嗅不出一丝蛛丝马迹。”

“带了一个女孩，也找不到他吗？”默非说。

虽然手臂包着绷带，此时吉勒姆仍弯腰靠近史迈利。

“行动是你负责的，”他以迫切的语气低声说，“你想叫我们等下去，我们就等下去。下道命令就是了。这些人只想找借口接手。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真空。什么都行。”

法恩在戏院椅前来回巡行，发出语带讥讽的低语。

“讲讲，这些人就只会讲。”

马铁娄再试一次。

“乔治。这个岛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领土？随时想拿起来翻一翻、抖一抖，应该没问题吧？”他指向无窗户的墙壁，“我们有个人在那边——你的人，似乎一心想作怪。纳尔森·柯有可能是你我最大的成就。是我从事这一行以来最大尾的一条鱼，我敢拿自己的老婆打赌，拿自己的祖母、拿自己的田产来打赌，这尾鱼肯定也是你见过最大的一条。”

“没人跟。”赌徒山姆龇牙笑着说。

马铁娄坚持到底。

“你打算眼睁睁让他抢走大奖吗，乔治？就这么被动坐在这里，讨论着耶稣基督为什么生在圣诞节而不是十二月二十六或二十七日？”

史迈利最后望向马铁娄，然后仰头看吉勒姆。吉勒姆僵在他身边。史迈利双肩向后拉，最后他低头看着自己十指交扣矛盾的双手，半晌在脑海中重温追捕卡拉的过程。安恩将那场行动称为“黑色圣杯”。他回想起安恩以追求个人圣杯之名，追求她所谓的爱情，对他一次又一次背叛。他也忆起自己不顾理智，尝试着分享她的信念，宛如虔诚信徒，每日不忘重拾信念，无视她妄然曲解这份信念的意义。他也想起海顿，由卡拉指使，用来对付安恩。他想起杰里与那个女孩，也想起女孩的丈夫彼得·伍辛顿，前往他位于伊斯林顿的排屋探访之际，想到伍辛顿那份令他狼狈不堪的神情，令他觉得两人心有灵犀：“你跟我都是被她们甩下的人。”那份神情诉说着。

他想起杰里一路走得不干不净，处处留情，也想起圆场为杰里付了一半的账单，很容易就把丽姬当成只是又一笔烂账，但他下不了手。他不是山姆·科林斯，他毫无疑问的是，杰里此时对丽姬的感情，如果换成安恩肯定会大力支持。话说回来，他也不是安恩。尽管如此，在折腾人的这一刻里，他仍在犹疑无主之间进退维谷，居然认为安恩的想法是否正确，他的这次行动已经成为私人的心路历程，为的是击败因个人力有未逮而产生出的野兽与恶人；他毫不留情把杰里这种简单的心灵也算在内。

你错了，好友。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只知道你错了。

就算我错了，他曾在一次无尽的争论中对安恩响应，你也不会因此而对。

他又听到马铁娄开口。

“乔治，我们有人张开双手，等待接受我们能给的东西，接受纳尔森能给的东西。”

电话铃响。默非接电话，将信息传达给无声的隔离室：“航空母舰打来的电话，长官。海军情报指出，帆船队分秒不差，长官。南风有助航

行，一路上渔获丰富。长官，我认为纳尔森根本不在船上。我看不出他上船的道理何在。”

众人焦点骤然转向默非，因为他在此之前从未表达个人见解。

“胡说八道什么，默非？”马铁娄质问，口气相当讶异，“你是跑去算命了不成啊，小子？”

“长官，我今早上了航空母舰，那些人有很多资料。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住上海的人会想从汕头出海。换成他们，他们的做法会完全不同，长官。他们会先搭飞机或火车到广州，然后大概再搭公交车到惠州。他们说这样比较安全，长官。”

“这些人是纳尔森的人，”史迈利说，这时众人猛然将头转向他，“他是他的部下。即使冒险，他也宁愿跟他们出海。他信得过这批人。”他转向吉勒姆。“这样好了，”他说，“告诉洛克斯特，通缉威斯特贝和那个女孩。你说他用勤务名租了一辆车吗？是用他的跑路文件？”

“对。”

“沃瑞尔？”

“对。”

“这样的话，警方要找的人是沃瑞尔夫妇，英国人，没有照片，通缉令尽量写得模糊，别引起疑心。小马。”

马铁娄全神贯注。

“柯还在船上吗？”史迈利问。

“跟老刁一起待在船上，乔治。”

“威斯特贝有可能想接近他。你在港口布下一个定点哨。加派几个人过去。叫他们多注意背后。”

“找什么东西？”

“找碴。对他家的监视也一样。彼得——”他陷入沉思，但吉勒姆不需要担心，“彼得，能在柯的电话线动点手脚吗？”

马铁娄向默非瞥一眼。

“长官，我们没有这样的设备，”默非说，“不过我们倒是可以……”

“那就剪线，”史迈利简单说，“必要时剪断电话线。尽量靠近道路工地。”

下完了命令，马铁娄轻轻走过房间，坐在史迈利身旁。

“啊，乔治，明天的话，你认为啊，我们是不是也要先准备一些器材？”正在打电话给洛克斯特的吉勒姆专心注意两人的对话。房间另一端的山姆·科林斯亦然。“你的威斯特贝会做出什么事，实在很难说，乔治。针对各种突发事件，有防无碍，对吧？”

“一切请待命。如果你不介意，拦截计划暂时不更动，请你对我的能力有信心。”

“当然，乔治，当然。”马铁娄说得过分恭维，带着教堂般的崇敬态度，踮脚尖走向自己的阵营。

“他刚才什么意思？”吉勒姆压低嗓音质问，弯腰靠在史迈利身边，“他想叫你同意什么事？”

“我受不了你了，彼得。”史迈利警告，同样压低嗓门。突然间他勃然大怒。“我不想再听你讲话了，老爱搬弄阴谋理论。这些人是我们的东道主，也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跟他们订过书面协议。现在要担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老实讲，没必要胡思乱想、疑神疑鬼了。现在请你——”

“你给我听好！”吉勒姆正要继续讲下去，但史迈利逼他住嘴。

“你去联络库洛。必要的话登门造访。也许出去走走对你有好处。跟他讲，威斯特贝脱离掌握了。如果有威斯特贝的消息，立刻会通知我们。他知道怎么办。”

法恩仍在椅子前来回走动，看着吉勒姆离去，拳头则持续捏着某种东西，态度烦躁。

在杰里的世界，时间同样是凌晨三点，女主人替他送来刮胡刀片，却没送来干净的衬衫。他尽可能刮好胡子洗好澡，身体却仍从头痛到脚。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床上的丽姬，向她保证会在两三个钟头后回来，但他怀疑她有没有听进去。越多家报纸偏好报道美女，尽量少报道新闻，他回想起，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威斯特贝先生。

他叫来无照出租车，知道这些非法出租车比较会躲警察。不搭车时就徒步走。步行有助于身体康复，也对神秘的决策过程有所帮助，因为躺在宾馆的长沙发上，忽然变得很难做决定。他前往深水湾，知道自己正步步进逼恶土。既然他逃脱了掌握，他们会像水蛭般紧咬那艘船不放。他想着他们找了什么人，利用什么手法。如果是表亲出动，他会注意硬件与人力过多之处。雨水开始落下，他担心雾气将因此散去。他头上的月亮已部分清朗，他静静往下坡走，借着淡淡月光分辨出最近几艘股市交易员的帆船，在码头呻吟拉扯。东南风，他注意到，风势渐起。他心想，如果是定点观察哨，他们会寻找制高点，没错，就在他右侧的突出岩角，有辆外表老旧的奔驰面包车停在两树间，天线系着中国结。他伺机而动，看着雾气翻搅，等到有车下山，车灯全开。车一经过他，他立刻箭步过马路，因为他明白，就算他们拥有全世界的硬件，他躲在车头灯之后，他们绝无法看清迎面而来的车头灯后面有人。来到水平面，能见度降到零，他必须摸索着摇晃的木质堤道前进，凭着先前侦察的印象。接着他找到了心目中的人。那位无牙的老妇，坐在舢板上，在雾气中对他抬头咧嘴笑。

“柯，”他低声说，“纳尔森司令号。柯？”

她嘎嘎笑声的回音在水面上弹跳而去。

“蒲苔岛！”她尖声说，“天后古庙！蒲苔岛！”

“今天吗？”

“今天！”

“明天吗？”

“‘民’天！”

他扔给她两块钱，她的笑声随着他远去的背景消散。

我说对了，丽姬说对了，我们都猜对了，他心想。他要去庙会。他对上帝祈祷，希望丽姬别轻举妄动。如果她醒过来，杰里认为她很可能会乱跑。

他一面走着，一面希望借踏步的动作减轻鼠蹊与背部的疼痛。一步步来吧，他心想。别做出大动作。见招拆招。雾气有如走廊，通往各个房间。一度有辆病恹恹的车子慢慢行驶路边，车主开车溜着亚尔萨斯狼犬。他也见到两名身穿背心内衣的老人做着晨操。来到公共花园，他见到几名幼童从杜鹃丛下盯着他看。他们似乎以杜鹃丛为家，因为有衣物挂在枝叶上，全身赤裸，有如金边的小难民。

他回到宾馆时，丽姬坐着等他，表情恐怖。

“再来一次试试看。”她警告，一手插入他怀中。两人准备外出吃早餐，租船。“再一声不响溜出去，给我试试看。”

当天香港一艘小船也找不到。杰里不愿考虑载运观光客的大型外岛渡轮。他知道摇滚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他也拒绝到码头明目张胆地询问。他打电话给电话簿上的水上出租车公司，但对方手中的船不是已出租就是太小，不适合这趟航程。随后他想起跑腿人吕吉·陈，他在外籍记者俱乐部是传奇人物：吕吉能帮你弄到任何东西，从韩国舞蹈团到减价机票，速度比全香港任何人都快。他们搭出租车到湾仔另一边，吕吉的巢穴在此。他们下车走路。时间是早上八点，燠热的雾气却仍不见消散。没有亮灯的招牌在窄巷里散乱布置，有如精疲力竭的情侣：“快乐男孩”、“幸运地”、“美式风情”。拥挤的小吃摊散出暖暖的气味，加入汽油废气与污泥臭味中。透过墙壁隙缝，他们有时可见运河。“想找我的话，”吕吉·陈喜欢这么说，“就找只有一条腿的大个子。”

他们在店面柜台后找到他，个头只高出台面，在店里来回穿梭，是中葡混血儿，曾经在澳门污秽的小篷里靠打太极过活。他的店面只有六英尺宽，卖的是新的摩托车与老旧的中国军品，他称之为古董。他也卖戴帽女士的银板相片，以龟甲镶框；也卖几个历尽沧桑的旅行箱，以及一本鸦片快艇的航海日志。吕吉已经认识杰里，不过他比较喜欢丽姬，坚持要丽姬走在前头，让他研究研究她的臀腿，请两人走过晒衣绳下，来到一间注明“闲人勿入”的小屋，有三张椅子，电话放在地上。吕吉半蹲成一团小球，以中文讲电话，以英文与丽姬交谈。他已经当上祖父了，他说，不过性能力还很强，生了四个儿子，全都很长进。连老么都

长大成人了。全都是好司机、好工人、好丈夫，他对丽姬说。除此之外，他也有辆备有立体音响的奔驰。

“找一天，我带你去兜兜风。”他说。

杰里不知道她是否清楚对方正在求婚，或是在要求稍微不是那么认真的东西。

对，吕吉认为自己也有一艘船。

打了两个电话后，他知道自己果然有船，只借给朋友，收点意思意思的费用。他让丽姬看看他的信用卡盒，让她数一数总共几张，然后现出皮夹，展示家庭照，其中一张是老么最近结婚时钓上的龙虾，只是老么并不在照片中。

“蒲苔岛很烂，”吕吉·陈对丽姬说，一面讲着电话，“非常脏的地方。浪很大，庙会很糟，东西也难吃。干吗去那里？”

当然是去朝拜天后，杰里耐心说，为她回答。去参观著名的天后古庙以及庙会。

吕吉·陈比较喜欢对丽姬讲话。

“去大屿山，”他以洋泾浜英文建议，“大屿山这个岛不错。东西好吃，鱼也鲜，人也好。跟你们说，去大屿山，去查理的店吃饭，查理是我朋友。”

“蒲苔岛。”杰里语气坚决。

“蒲苔岛要花很多钱哪。”

“我们有很多钱。”丽姬露出甜美微笑，吕吉再度端详她，陷入沉思，慢慢上下打量她。

“我跟你们去好了。”他对她说。

“不必。”杰里说。

吕吉开车送他们到铜锣湾，与他们同上舢板。小船是十四英尺的动力船，与漂浮木一般平常，但杰里认为这艘应该很耐用，吕吉也说这船龙骨很深。一个男孩懒懒坐在船尾，一脚伸入海水。

“我外甥，”吕吉边说边骄傲地抓抓男孩的头发，“他母亲住在大屿山。他带你们去大屿山，到查理的店吃饭，让你们开心。钱以后再给。”

“老兄，”杰里耐心说，“伙计。我们不想去大屿山。我们想去的是蒲苔岛。只想去蒲苔岛。不去蒲苔岛就不上船。载我们去蒲苔岛，然后把船开走。”

“蒲苔岛天气很糟啊，庙会也很糟。那地方很糟。太靠近中国水域了。很多共产党啊。”

“不去蒲苔岛就不上船。”杰里说。

“船太小了。”吕吉说，因有失颜面而显得惊恐，多亏丽姬展现魅

力，他才重建信心。

接下来一个小时，甥舅两人准备出海，杰里与丽姬无事可做，只好坐在半船舱里，避人耳目，啜饮着人头马。两人间歇性轮流遁入沉思。丽姬沉思时双手抱胸，缓缓低头以大腿摇动身体。杰里则把玩额发，一度因拉力过猛而使她出手制止，他笑了起来。

几乎在无意间，船离开了港口。

“别让人看见。”杰里命令。为求安全，他一手搂着她，让她留在寒酸的开放式船舱中。

美国航空母舰已卸除装饰，灰色的舰身带有威胁性，宛若带鞘菜刀平放水面上。起初，四面了无波动，只有同样黏腻的平静。岸边层层薄雾压在灰色的摩天大楼上，棕色烟柱直升入白色无表情的天空。在平坦的水面上，他们的船有如气球，高高浮在空中。然而滑离避风港、往东前进时，海浪猛拍船侧，力道足以让船打转，船头上下颠簸，两人不得不相拥以免倾倒。小小的船头如劣等马般起伏摇摆不定，航过起重机、仓库、工厂，以及采石山坡地。小船逆风前进，溅起来的水花四散纷飞。舵手大笑着，对水手呼喊，杰里猜想他们嘲笑的对象是发神经病的欧洲人，竞选在这个颠簸的小浴缸里谈情说爱。一艘巨大的油轮经过小船，似乎没有前进的迹象，褐色帆船则追在后方。船坞停放一艘货轮，焊接工的焊枪白光闪动，在海水另一端对他们打信号。甥舅的笑声消退，开始以理性对话，因为如今已出港口。杰里回头看，看见船船相接的运输船摆动，也看见香港慢慢远离，被云层切割成像个平台山。香港再度不复存在。

小船又通过一个岬角。海浪变大后，颠簸之势稳定下来，头上云层落下，底部距离桅杆只差几英尺，小船躲在这个不切实际的低海拔世界，借着保护罩前进。雾气忽然到了尽头，带给他们舞动的日光。南方山丘狂乱的绿意上，有盏橙色导航灯透过净朗的空气对他们眨眼。

“接下来怎么办？”她柔声问，往舷窗外观望。

“微笑，祈祷。”杰里说。

“我来微笑，祈祷由你负责。”她说。

领航小艇靠过来，一时之间他预料会见到摇滚客那张狰狞面孔向下怒视，然而船上人员完全对他们视若无睹。

“是谁啊？”她低声问，“他们认为怎样？”

“例行巡逻，”杰里说，“毫无意义。”

对方驶去。就这样，杰里心想，没有特殊感觉，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

“你确定只是例行巡逻吗？”她问。

“去看庙会的船有好几百艘。”他说。

小船激烈摆动，持续摆动着。什么海相良好，他心想，紧紧搂住丽姬。龙骨很好。要是这样持续下去，我们什么都不必决定了，大海会替我们作出决定。这种旅行，如果抵达目的地，没人会注意到，但如果没能抵达目的地，别人会说你是拿命开玩笑。东风随时可能吹起，他心想。在两道西方气流之间的季节，一切皆无法确定。他焦急地倾听引擎不规则的呼噜声。如果引擎停摆，我们将葬身海岩上。

忽然间，他的梦魇急转直上，失去了理智。瓦斯桶，他心想。天啊，瓦斯！甥舅俩忙着出航事宜时，他瞥见前舱水箱旁存放两只瓦斯桶，推想应该是用来烹煮吕吉的龙虾。真傻，到现在才想到。他想通了。瓦斯比空气重。哪个瓦斯桶不漏气。只是漏气程度多寡而已。波涛拍打着船头，漏气速度更快，瓦斯如今沉积在底舱，距离引擎的火花大约两英尺，混合了氧气助燃。丽姬脱离了他的手，站在后方。海面突然拥挤起来。不知从何处聚集了一群捕鱼帆船，她热切注视。他抓住丽姬的手臂，拖她回船舱之下。

“你以为这里是哪里？”他大吼，“看帆船赛吗？”

她端详他一阵，然后轻轻吻他一下，再吻一下。

“你心情静一静。”她警告。她再吻他一下，喃喃地说，“是的。”仿佛期望已获得满足，接着静静坐了一会儿，望着甲板，继续握住他的手。

杰里算出小船以时速五海里逆风前进。一架小飞机飞越上空。他将她按在船舱盖下，猛然抬头想看清标识，却为时已晚。

“也不道声早安。”他心想。

小船绕过最后一个角，在白沫中转动呻吟。有一次，推进器完全脱离水面，发出呼呼狂响，再度碰击水面时，引擎吞吞吐吐，咽不下气，最后却决定好好活下去。杰里碰碰丽姬肩膀，指向前方，光秃陡峭的蒲苔岛隐约可见，在云朵破碎的天空中犹如剪纸画。两座山峰，耸立海面上，较高的一座在南方，双峰之间有个鞍部。海水转为铁蓝色，强风阵阵横扫，刮得他们无法呼吸，激起海沫如冰雹打在身上。船首可见螺洲岛，上面有座灯塔，一道防波堤，没有居民。风势剧降，仿佛从未刮风似的。进入小岛背风处，海面无波无纹，一丝微风也不见。太阳的热度直接而严酷。小船前方大约一英里，是蒲苔岛的大湾开口处，后方是隶属中国的小岛，是低矮而棕黄的幽灵。很快他们能辨认出一整片杂乱无章的帆船与观光船，挤满海湾，第一道鼓声、铙钹与未经协调的吟唱声也从水面上飘荡而来。后方小山上有个破烂的小村庄，铁皮屋顶闪烁，而天后古庙坐落于独立的小岬角上，是个坚固建筑物，四周有竹竿搭建的鹰架，算是初具雏形的看台，大批人群上方烟雾弥漫，点缀着点点金光。

“在哪一边？”他问丽姬。

“我不知道。我们向上爬到一栋房子，从那里开始走。”

每一次杰里开口对她说话，总是看着她，但现在她却回避杰里的眼光。他拍拍舵手的肩膀，指向他想前往的路线。男孩立刻开始抗议。杰里向他凑过去，现出一叠钞票，几乎是其所剩的一切。男孩面有难色，将小船开过港口，穿梭众船之间，往花岗岩小岬角驶去。岬角有个崩塌的防波堤，为安全靠岸埋下变量。庙会的喧闹变得更加大声。他们能嗅到煤炭与烤乳猪的香味，也听得见集体爆笑声，但目前暂时看不见群众，因为他们想避开群众的眼光。

“这里！”他大喊，“在这里下锚。快！快！”

他们爬上岸时，防波堤如酒醉般歪斜。两人甚至还未踩到陆地，小船就已调头回航。没人道再见。他们爬上岩石，手牵手，直接步入一场金钱游戏，旁观者众，笑声连连。观众之间站了一个状似小丑的老人，带了一袋硬币，一枚枚朝岩石下面扔，让赤脚男孩纵身接钱，在热烈气氛中，每每几乎彼此推挤至悬崖边缘。

“他们租了船，”吉勒姆说，“洛克斯特跟船主谈过。船主是威斯特贝的朋友，那人的确是威斯特贝没错，带了一个美女，两人想去蒲苔岛看天后庙会。”

“洛克斯特怎么反应？”史迈利问。

“他推说：‘这样的话，就不是他想找的情侣。’鞠躬离开。神情失望。港口警方迟迟才报告，看见小船开往庙会的方向。”

“要不要我们派侦察机去，乔治？”马铁娄紧张地问，“海军情报说有各式各样的侦察机待命中。”

默非想出了聪明的点子。“干吗不干脆开直升机去，直接把纳尔森从最后一艘帆船上捞走？”他质问。

“默非，闭嘴。”马铁娄说。

“他们往小岛去，”史迈利语气坚定，“我们知道。用不着动用飞机来证明。”

马铁娄仍未满意。“不然的话，我们派两三个人去蒲苔岛，乔治。说不定最后稍微干涉一下。”

法恩纹丝不动站着，双拳已停止动作。

“不用。”史迈利说。

马铁娄身旁的山姆·科林斯，咧嘴笑时唇形变得更细。

“理由说来听听。”马铁娄说。

“在最后一分钟，柯可能暗示弟弟别上岸，”史迈利说，“岛上只要出现一点点骚动，他就有可能下令取消登陆。”

马铁娄叹了一口气，紧张而愤怒。他已放下他时抽时停的烟斗，现在猛吸山姆提供的棕色香烟。他的香烟似乎不虞匮乏。

“乔治，这人到底想要什么？”他气急败坏之下质问，“现在想敲诈了吗？还是想搅局？我看不出他属于哪一类型的人。”一阵恐怖的想法袭来。他的嗓音下沉，伸出整条手臂直指房间对面。“可别告诉我，我们碰上的新品种啊！你可别说，这人是冷战变节人士，面临中年危机，因此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赎罪。因为如果这人打算这样做，下礼拜的《华盛顿邮报》上，我们就准备看他坦白叙述一生故事了，乔治，如果有必要拿下他，我个人准备派整个第五舰队到岛上。”他转向默非，“我有应变措施吧？”

“有。”

“乔治，我希望派几人登陆待命。你们可以上船，也可以待在这里，悉听尊便。”

史迈利盯着马铁娄，然后再看吉勒姆。吉勒姆仍一手吊着绷带。然后再看法恩，静止如跳水选手站立跳板末端，双眼半闭，脚跟并拢，以脚趾为底，慢慢踮脚尖，落下。

“法恩和科林斯。”史迈利终于说。

“你们两个带他们去航空母舰，直接把他们交给舰上的人。默非要回来。”

科林斯座位周遭烟雾缭绕。法恩原本站立之处，两颗壁球缓缓滚开，最后停下。

“上帝保佑我们。”有人诚心地喃喃说。是吉勒姆，不过史迈利置之不理。

舞狮有三人长，频频逗着观众，奋勇向上的民众则以棍子戳弄，闹得群众大笑。舞狮以舞步跃过窄道，随着铙钹鼓声起舞。来到岬角，行进队伍慢慢调头，开始往回走，此时杰里赶紧将丽姬拉入人群中，自己压低身子，以免人高醒目。小路上满地泥泞，水坑处处。很快的，舞狮带着群众通过庙口，往水泥阶下，来到一处沙滩，有人正烤着乳猪。

“往哪边走？”他问丽姬。

她迅速带杰里往左走，离开舞狮群，沿着寒怆村落后面走，走上木桥，横越小港湾。两人沿着一丛丝柏向上爬，由丽姬带头，最后只剩他们两人，站在整齐的马蹄形海湾，向下看见柯的纳尔森司令号，停泊在最中央，如同大小姐一般，身旁围有数百艘观光船与帆船。甲板上不见人影，连水手也没有。警船聚集了五六艘，下锚停泊在较近港外的地方。

未尝不可嘛，杰里心想，毕竟是庙会嘛？

她已放开杰里的手，这时他转向她，她仍盯着柯的船看，而杰里看出她脸上一抹困惑。

“他真的带你走过这里吗？”他问。

是这条路没错，她说完转向他，以确认或衡量记忆中的事物。接着她以食指重重画着他嘴唇，画出她吻过的地方。“天啊。”她说，沉重地摇摇头。

他们又开始向上爬。杰里仰头瞥见褐色的山峰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在山坡上，片片种水稻的梯田已废耕。他们进入一个小村庄，里面只住着一群恶犬，海湾也从视线中消失。校舍敞开，空无一人。走进门口后，他们看见战斗机的图片。几口坛罐立在阶梯上。丽姬双手捧水洗脸。小屋绑满铁丝与砖头，以抵挡台风吹袭。小路越走砂石越多，变得寸步难行。

“没走错吧？”他问。

“往上就对了，”她说，仿佛已说烦了，“往上就对了，然后是房子。拜托行不行。你把我当做什么啊，该死的傻瓜吗？”

“我闭嘴就是了。”杰里说。他一手搂她，她则向他倚过去，一如两人在舞池上她放开自己时一样。

他们听见古庙传来音乐巨响，有人在测试扩音器，随之而来的是柔缓哀怨的小调。海湾再度入目。一群人聚集在海岸上。杰里看见更多烟柱，在岛上这边无风的热气中，稍稍嗅到焚香的气味。海水湛蓝而清静，四周是白灯，在柱子上大放光明。柯的船不见动静，警方亦然。

“看见他了吗？”他问。

她细看群众，摇摇头。

“大概是吃完午饭去睡午觉了吧。”她漫不经心地说。

烈日野劲十足。他们走进山坡阴影中，感觉如同暮色突降，走进日光时又如近火灼脸。空气因蜻蜓翱翔而热络，山坡散布着巨岩，树丛得以生存的地方则蔓生四处，开放着鲜艳的小喇叭花，有红有黄有白。陈旧的野餐罐头随处可见。

“你指的房子，就是那栋？”

“我说过了。”她说。

废墟一间：破碎的棕泥别墅，墙壁裂开，景观不错。新居落成之际必定光彩夺目，下面是干涸的山涧，往来有水泥桥连接。泥巴发出恶臭，昆虫嗡嗡叫。在椰子树与蕨丛之间，有座破败的阳台，海面与海湾的风光一览无余。过桥时他握住她的手臂。

“从这里开始好了，”他说，“我不拷问你了。你自己来讲。”

“我们那时往上走，跟我说的一样。我，德雷克，还有该死的老刁。叫手下提来一篮东西和酒。我说：‘我们要去哪里？’他说：‘野餐。’老刁不想让我来，不过德雷克说我可以跟来。‘你最讨厌走路了不是吗？’我说，‘我甚至从来都没看你过马路！’今天我们要用走的。”他说，摆出一副首脑的姿态。所以我乖乖闭嘴跟着走。”

一片浓云遮掩了山顶，缓缓往山下卷来。阳光已不见。转眼间，云已笼罩下来，两人孤单伫立在世界尽头，连双脚都看不见。他们摸索着进房子。她坐在倾颓的屋顶梁柱上，离他远远的。门廊上贴有大红对联。地板上到处是野餐垃圾，以及几卷长长的内衬纸。

“他叫手下跳，手下就跳。他和老刁谈得起劲，聊的是那个礼拜聊得起劲的话题，午餐吃到一半，他开始讲英文，对我说蒲苔岛是他的小岛。是他离开中国时上岸的第一个地方。船民把他丢在这里。‘我的人民。’他称呼他们。所以他才每年来这里看庙会，才捐钱给古庙，所以才流了满身大汗，爬这座烂山来野餐。之后他们又继续讲中文，我觉得老刁是在怪他讲太多了，不过德雷克正在兴头上，活像个小男生，怎么也听不进去。然后他们继续往上爬。”

“往上爬？”

“爬到山顶。‘老办法是最好的办法，’他对我说，‘经过验证的，我们就要坚守。’——是他那套浸信会的老调——‘好的东西就要紧紧把握，丽泽。上帝喜欢这样。’”

杰里朝顶上的浓雾瞥一眼，相信自己听见了小飞机的运转声，但当时他并未太注意，因为他已经拥有了最迫切需要的两件事物。他有丽姬在身边，也有了信息。因为这时他终于了解丽姬对史迈利与山姆·科林斯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也明白她如何在无意间泄露天机，提供了重大线索，有利他们解读柯的意图。

“所以他们爬到山顶。你有没有跟去？”

“没有。”

“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往哪里上去？”

“到山顶去。不是跟你说过了？”

“然后呢？”

“他们看另一边的风景。聊天。指来指去。继续聊天。再指来指去，然后下山，德雷克的兴致更高了。每次他谈成了大生意，大老婆不在场反对时，他就像这样乐不可支。老刁表情好严肃，每次德雷克对我表现好感时，他就有这种表情。德雷克想待下来，喝一两瓶白兰地，所以老刁气呼呼回香港去。德雷克变得色眯眯，决定两人上船过夜，早上再回去，所以就照他的话去做。”

“船停在哪里？这里吗？在这个海湾？”

“不是。”

“哪里？”

“在大屿山。”

“你们直接开去，是不是？”

她摇摇头。

“我们绕了小岛一圈。”

“这座小岛？”

“有个地方，他想趁夜去看看。在另一边的海岸。他叫手下打灯。‘一九五一年，我就是在那里登陆的，’他说，‘船民吓得不敢进大湾。他们害怕警察，害怕鬼魂，害怕海盗，害怕海关。他们说岛民会割断他们的喉咙。’”

“结果晚上呢？”杰里柔声问，“你们在大屿山旁下锚时？”

“他对我说，他有个弟弟，很疼这个弟弟。”

“是他第一次对你说吗？”

她点头。

“他有没有说，这个弟弟人在哪里？”

“没有。”

“不过你知道？”

这一次，她没点头。

庙会的喧哗声由下而上，蜿蜒入云霄。他轻轻扶她起立。

“问个没完。”她喃喃说。

“快问完了。”他应允。他亲吻她，她随他，却全然被动。

“我们上去看看。”他说。

过了十分钟，阳光重现，蓝天也在头顶开展开来。在丽姬带路下，两人快速翻越数个半山顶，往鞍部前进。海湾传来的声响已停息，寒风充满了盘旋的海鸥尖叫声。接近山顶时，小径变宽，两人并肩前进。又走了几步，疾风迎面扑来，令他们大口喘气，节节后退。他们来到刀锋口，下方是无底深渊。他们脚下踩的是悬崖，垂直而下就是翻腾的海水，泡沫掩盖了岬角。包子状的云朵从东吹来，他们身后的天空呈黑色。大约两百公尺以下有道小港湾，海面平静。五十码外有道棕色礁岩抵挡住海浪，泡沫呈圆形冲刷其上。

“就这里？”他在风中大喊，“他在这里登陆？就是这个海岸？”

“对。”

“朝这里打灯？”

“对。”

他留下她，自己慢慢走向刀锋口，几乎半蹲着走，强风吹过耳际，黏咸的海水遍布脸上，胃痛如绞，他猜不是肠穿孔就是内出血，或以上皆是。来到凹缘最深处，在崖壁转往大海延伸之前，他再度向下俯瞰，能依稀分辨出无人小径，有时候只不过是道小岩缝，有时是隆起的杂草堆，谨慎朝小港湾而去。小港湾内没有沙滩，不过部分岩石显得干燥。

他走回她身边，带她离开刀锋口。风势缓和，两人又听得见庙会喧闹声，比刚才更加响亮。鞭炮啪啪爆炸，点燃了一场玩具战争。

“是为了他弟弟纳尔森，”他解释，“如果你还没想通的话，柯想把弟弟从中国带出来。就在今晚。问题是，他是个大红人。很多人想跟他聊聊天。所以梅伦才会介入。”他深吸一口气。“我的看法是，你应该赶快离开这里。我怎么知道？德雷克肯定不希望你在这一带。”

“他希望看到你来这里吗？”她问。

“我认为，你应该做的是，回到港口，”他说，“你在听吗？”

她尽量，“当然。”

“去找个看来和气的欧洲人家庭，找人诉苦。这次找女的，别找男人。然后告诉对方，你跟男朋友吵架，能不能请他们开船带你回家？如果对方愿意，就在他们家住一晚，否则去找旅馆。就编个故事唬他们。天啊，你不是最会编故事吗？”

警方直升机呼呼掠过头顶，绕了一大圈，应该是在观察庙会。他直觉抓住丽姬肩膀，将她拉进岩穴。

“记得我们去的第二家酒吧？那家播放大乐队歌曲的酒吧？”他仍抱着她。

她说：“记得。”

“明天晚上，我过去那里接你。”

“我不确定。”她说。

“不管了，七点见。七点，知道了吗？”

她轻轻推开他，仿佛决心独立。

“跟他讲，我坚守了信念，”她说，“这是他最关切的事。我信守承诺。如果你见了，跟他讲：‘丽泽信守承诺。’”

“没问题。”

“别讲没问题。答应我。告诉他。他承诺过的事都做得好。他答应要照顾我。他真的照顾了我。他说他会让小瑞走。他也办到了。他一向信守承诺。”

他抬起她的头，双手捧着，她却执意说下去。

“再告诉他——再告诉他——是他们害我无路可走的。”

“七点到那里等，”他说，“就算我稍微迟到也得等下去。好嘛，应该不算太困难吧？又不需要学士学位才能办到。”他轻轻抚她，拼命挤出笑容，极力在分手前达成最后默契。

她点点头。

她本想再说什么，却来不及说。她走了几步，转身看他，他挥手

——振臂大挥一下。她继续走了几步，一直走到山线之下，却仍听见她大喊“七点见”，或者只是幻觉。看见她离开视线，杰里回到刀锋口，在表演泰山绝活前坐下喘口气。他忽然回想起一段多恩（John Donne）的诗，是在学期间学到的少数学问之一，只不过这段他总是没法完全背下，或以为自己背得不齐：

山岭巍峨，
真理昂然，立志登顶人，
勇往直升。

大约如此。沉思了一小时，躺在山岩背风处两小时，看着日光转为暮色，降临在数英里外的中国小岛上。随后他脱下羊皮靴，重新将鞋带系成人字形，是他以前习惯系板球鞋的方式。然后他穿上，尽量绑紧。情境犹如托斯卡尼，他心想，如同他以前常从黄蜂原野眺望的那五座山丘。只不过这次他不打算背弃任何人。不背弃丽姬，不背弃陆克，连他自己也不背弃。就算必须费尽脚程也不背弃。

“海军情报显示，帆船队以时速约六海里前进，路径完全相符，”默非宣布，“么么洞洞准时离开捕鱼区，简直像是遵照我们的预测。”

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组电木玩具船，用来固定在海图上。他站着骄傲指出一列朝蒲苔岛前进的玩具船。

默非回来后，另一个哑巴与山姆·科林斯和法恩在一起，因此总共剩下四人。

“洛克斯特找到那女孩了。”吉勒姆悄声说，放下另一部电话。他的肩膀尽量往上抬，脸色极为苍白。

“在哪里？”史迈利问。

仍指着海图的默非转身。办公桌上摆着记事簿的马铁娄放下笔。

“在香港仔码头上岸，去那里接她，”吉勒姆继续说，“她在蒲苔岛骗了一个汇丰银行职员和老婆，搭便船回香港。”

“所以呢？她怎么说？”马铁娄在史迈利来得及开口前质问，“威斯特贝哪里去了？”

“她不知道。”吉勒姆说。

“啊，少来了！”马铁娄抗议。

“她说他们吵了一架，分别搭船回来。洛克斯特说，再给他一个钟头讯问她。”

史迈利发言。“柯呢？”他问，“他在哪里？”

“他的船还在蒲苔岛码头，”吉勒姆回答，“其他船已经走了大半。不过柯的船留在今天早上的地方。洛克斯特说，姿态很高。”

史迈利盯着海图，然后看着吉勒姆，然后再看着蒲苔岛的地图。

“如果她把告诉科林斯的话转告威斯特贝，”他说，“那么他会留在岛上。”

“打算干什么？”马铁娄质问，非常大声，“乔治，他留在那个岛上，用意何在？”

众人沉默良久。

“他在等待。”史迈利说。

“等什么，请问？”马铁娄以同样坚决的语调追问。

没人看见史迈利的脸孔。他的脸孔找到阴影，躲藏了起来。他们看见史迈利的肩膀拱起，看见一手伸至眼镜，好像想摘下，也看见那手如吃了败仗般空手而回，放在玫瑰木桌上。

“无论如何，非让纳尔森上岸不可。”他坚定地说。

“我们究竟如何做？”马铁娄质问。他起身绕过桌子。“威勒贝不在这里啊，乔治。他没有回到香港。他可以循天杀的同一条路线离开啊！”

“请别对我吼叫。”史迈利说。

马铁娄不予理会。“要选哪一项？是阴谋还是恶搞？”

吉勒姆站直身体，挡在史迈利身旁，尽管肩骨被打断，他仍毅力卓绝，决心以肉身制止马铁娄再靠近史迈利座位一步。

“彼得，”史迈利悄声说，“你后面应该有个电话吧。能不能请你传过来给我。”

满月上天，风势减缓，海面平静。杰里并未一路爬下小港湾，而是在三十英尺的上空扎营，以矮树丛为掩护。他双手与双膝已伤痕累累，树枝也刮伤了脸颊，但他感觉不错：饥饿而警觉。爬山的危险与汗水让他忘却疼痛。小港湾比他从上面看时大，花岗岩悬崖在海平面坑洞处。他尽量猜测德雷克的计划。自从与丽姬在一起时，他就将自己想像为德雷克。他尽情猜想了整天。德雷克无论必须做什么事，一定是从海边做起，因为悬崖陡峭如逗噩梦，他没能力爬下。杰里起初料想，德雷克是否会在纳尔森上岸前出海拦截，不过他却否决这个想法，因为他想不出任何安全的方式让纳尔森脱离船队，在海上与哥哥会面。

天空变黑，星星露脸，月光倒影被海面拖长，越来越亮。威斯特贝呢？他心想：现在A应该怎么办？这个A，实在与沙拉特提供的解决方案相差十万八千里。真惨。

他判定，德雷克若想将船开到小岛这面也是不智之举。大船难操纵，海岸风大浪高，难以停靠。小船比较好，舢板或橡皮艇最适合。杰里爬下悬崖，最后皮靴碰触鹅卵石，躲在岩石边，观看碎浪澎湃，看着粼粼波光随泡沫移动。

“现在她应该回到香港了。”他心想。运气好的话，她能凭一张嘴骗进某人家中，讨小朋友欢心，双手捧着一杯浓缩牛肉汤。“告诉他，我坚

守了信念。”她说。

月亮向上升起，杰里仍静观其变，将视线固定在最黑暗之处，以增进视力。接着在海水哗啦声中，他隐约听见水花打在木船的怪声，也好像听见引擎运转、停止的短噗声。他没有看见灯光。他一步步沿着岩石阴影移动，尽量靠近水边，再弯腰守候。海浪打湿到他大腿时，他看见了苦等的目标：在长长的月光斜影照耀下，距离自己不到二十码处，有个拱形船舱，有弯曲的船头，是一艘舢板，下了锚后在海面摇摆。他听见溅水声，也听见有人压低声音下命令。他尽可能往下走，在布满星星的天空衬托下，辨识出戴着贝雷帽的德雷克·柯，那轮廓绝不可能看走眼。德雷克谨慎涉水上岸，后面跟着老刁，双手捧的是M16机关枪。原来是你啊，杰里心想，自言自语，而非对德雷克·柯说。漫漫长路，总算走到尽头。杀害陆克的凶手，杀害老弗的凶手。借刀杀人与否并不重要。丽姬的情人，纳尔森的父亲，纳尔森的兄长。欢迎这位一辈子从不背信的男子。

德雷克也背了一件物品，但不如机关枪沉重，杰里在能看清之前就知道，那东西是电灯加上电源组，很像他在赫佛德河口参加圆场举办的水上庆典时使用的电灯，只是圆场偏好紫外线以及眼镜。那种铁丝框的眼镜粗制滥造，一遇雨或水花时便无用武之地。

两人上了海滩，气喘吁吁走在卵石上，最后来到最高点，接着学杰里靠着阴暗岩石躲藏。他算算两人距离他六十英尺。他听见闷哼声，看见打火机亮起，然后看见两支香烟的火光，接着是两人以中文低声对话。杰里心想，也不请我抽一根。他弯腰，伸出一只大手，开始收集鹅卵石，拿了满满一把，然后踮脚尖，尽可能偷偷沿着岩石底部，朝两点烟头火光走去。根据他的估算，他距离两人有八步。他左手拿手枪，右手握鹅卵石，倾听浪花拍打声，注意潮浪聚集、缓冲、落下的模式，心里盘算着如果老刁不在场，与德雷克·柯对话起来会比较简单。

他以极慢的动作，采取外野手典型的姿势，背向后靠，左手肘向前抬起，右手臂弯在背后，准备振臂投石。一阵潮水退下，他听见下层逆流冲刷声，另一阵浪花推进时发出呼噜声。他继续等待，右臂在后，紧握鹅卵石的掌心冒汗。潮水推至最高点时，他使尽全力将石头尽量往悬崖上投掷，接着俯卧，注视两个烟头的火点。他等着，听见石头敲击上方的岩石，如冰雹落下。紧接着，他听见老刁短促的咒骂声，看见一个红点飞进空中。老刁一跃而起，手持机关枪，枪管朝悬崖上方，背对杰里。德雷克则仓皇躲避。

杰里先以手枪重击老刁，手指小心维持在保险栓的位置。接着他再以右拳直击，全力以两指关节进击，如沙拉特传授的螺旋拳，最后再补上数拳。老刁倒下时，杰里使出回旋踢，右靴全力踢中他的颊骨，听见下巴合上时的嘎声。他弯腰拾起M16，以枪托猛挫老刁的肾脏，盛怒中回想起陆克与弗罗斯特，同时也想起老刁在口头上占丽姬便宜，说她若住到比九龙区更远之处，就不值得从香港区前往光顾了。赛马记者向您问好，他心想。

随后他往德雷克的方向看。德雷克已向前一步，却仍只是海面衬托出的一个黑影，一个弯曲的剪影，耳朵如馅饼皮般突出在怪里怪气的贝雷帽之下。一阵强风再起，也可能是杰里现在才察觉到。强风刮在两人身后的岩石上，刮得德雷克宽松的长裤呼呼作响。

“是英国记者威斯特贝先生吗？”他询问，一如在跑马地时的语调，低沉而严厉。

“正是在下。”杰里说。

“你是个非常喜欢搞政治的人，威斯特贝先生。来这里究竟想搞什么鬼？”

杰里仍在喘气，一时之间尚无回答的准备。

“瑞卡度先生告诉我手下，你的目的是想敲诈我。你要的是钱吗，威斯特贝先生？”

“你女朋友要我传达，”杰里说，心想应该先实现诺言，“她说她坚守信念。她跟你是同一国。”

“我不属于哪一国，威斯特贝先生。我是单人军团。你想干什么？马歇尔先生告诉我手下，说你想当什么英雄。英雄是非常爱搞政治的人，威斯特贝先生。我不喜欢英雄。”

“我是来警告你的。他们想抓纳尔森。你一定不能带他回香港。他们布下天罗地网想抓纳尔森。他们拟好了计划，准备一辈子扣住他。也扣住你。他们正在排队等着兄弟俩上钩。”

“你想干什么，威斯特贝先生？”

“想谈条件。”

“没人想谈条件。他们要的是商品。条件换得商品。你想干什么？”德雷克以命令的口吻再说一遍，提高音量，“请告诉我。”

“你用瑞卡度的生命买来那女孩，”杰里说，“我想是不是能以纳尔森的生命来换她回来。我会在他们面前讲你好话。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愿意和解。”

对我来说，这是踏进最后一道门的最后一脚，他心想。

“政治大和解吗，威斯特贝先生？跟你们那些人？我跟他们政治和解过很多次。他们告诉我，上帝爱儿童。你注意过吗，威斯特贝先生，上帝爱不爱亚洲儿童？他们告诉我，上帝是个鬼佬，上帝母亲的头发是黄色。他们告诉我，上帝爱好和平，可是我也读过，耶稣王国发生的内战次数空前绝后。他们也告诉我——”

“你弟弟就在背后，柯先生。”

德雷克转身。在两人左方，十几艘帆船成大致纵队，张满帆全速往南颠簸，横渡月光斜影，点点渔火反射海面。德雷克跪下来，开始手忙脚乱摸索着电灯。杰里找到三脚架，用力撑开，德雷克将电灯固定在

上，双手却抖得太厉害，杰里不得不帮他。杰里攥住电线，划了火柴，将电线插进发电机插座。两人向海眺望，肩并肩。德雷克闪一下灯光，再闪一下，先闪红灯，再闪绿灯。

“等一等，”杰里柔声说，“打太快了。别太紧张，紧张反而坏了大事。”

杰里轻轻将他推开，弯腰凑向望远镜，扫描忙碌的船队。

“哪一艘？”杰里问。

“最后一艘。”柯说。

他将望远镜锁定在最后一艘上，不过这时仍只是一个小黑点，杰里再度放出讯号，一红灯，一绿灯，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德雷克欢呼一声，只见海面传来回应的闪光。

“他能锁定方位吗？”杰里问。

“当然，”柯说，仍眺望着海面，“当然。他能锁定。”

“那就别再打灯了。”

柯转向他，杰里看得出他脸上的亢奋之情，感觉到他有所依赖。

“威斯特贝先生。我诚挚建议你。如果你敢为了我弟弟纳尔森而在我身上玩把戏，你可有罪受了。你的浸信会地狱，跟我手下对待你的方式比较起来，会是个非常舒适的地方。不过，如果你帮我，我愿意给你一切。我说的话就是合约。我一辈子从不毁约。我弟弟也定过一些合约。”他眺望海面。

走在前面的帆船已脱离视界，仅剩尾随的几艘。杰里出现幻觉，以为听见远方传来引擎不规则的噗噗声，但他明了自己心神不定，很有可能只是浪涛声。月亮已移至山顶后面，山影如黑色刀锋落在海面上，远方则呈现银色。德雷克弯腰凑向望远镜，再度欢呼。

“这里！这里！看啊，威斯特贝先生。”

杰里凑向望远镜，看出一艘幽灵船，只打着三盏昏暗的灯，两盏绿灯在桅杆上，一盏红灯在右舷，往他们的方向前进，航过银色地带，进入黑影，失去踪迹。他听见身后老刁呻吟的声音。德雷克置若罔闻，继续弯腰看望远镜，一手向外伸展，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摄影师，一面开始柔声以中文呼唤。杰里向上跑在卵石滩上，没收老刁皮带上的手枪，拾起M16，带到海边，双双投入海里。德雷克正想再打讯号灯，幸好他找不到按钮，杰里及时制止。杰里再次认为自己听见引擎声，不止一个引擎，而是两个。他奔向岬角，焦急地向南向北瞭望，寻找巡逻艇，却什么也没看见，因此再度怪罪浪涛声，怪罪自己想像力过于丰富。帆船越来越靠近，踏浪朝小岛前进，蝙蝠翼形的褐色船帆倏然高耸，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极为醒目。德雷克已跑至水滨，对着大海挥手呼喊。

“别大声嚷嚷！”杰里在他身边咬牙说。

然而杰里已成了无关紧要的人物。德雷克一生为纳尔森而活。在附近岬角的避风处，德雷克的舢板在起伏不定的帆船旁跌跌撞撞。月亮露脸，一时之间杰里淡忘了焦虑感，看见一身灰衣的矮壮身形出现，与德雷克正好相反，身披爪哇棉大衣，头戴鼓胀的无产阶级小帽，低身来到船边，跳下来由舢板船员接住。德雷克再欢呼一声，帆船扬帆，滑向岬角后面，最后仅见两盏桅杆绿灯在岩石上亮着，然后消失。舢板正往海滩前进，杰里看得见纳尔森矮壮的轮廓，站在船首，双手挥舞，头戴贝雷帽的德雷克在海滩上欣喜若狂，如疯汉般手舞足蹈，向他挥手。

引擎声阵阵加强，但杰里仍抓不住方向。海面空无一物，向上看只见锤头状的悬崖，以及背景为星空的黑色山顶。兄弟重逢相拥，紧抱不放，一动也不动。杰里抓住两人，以拳头捶打，拼命对他们大叫。

“快回船上！赶快！”

兄弟眼中只看得见彼此。杰里奔回水滨，抓来舢板的船头，握在手上，仍朝他们大喊，这时见到山顶后方的天空转黄，迅速变亮，引擎声则提升为狂啸，三盏炫目的探照灯从黑暗的直升机打在他们身上。在晃晃的着陆灯下，岩石舞动着，海浪翻搅，鹅卵石蹦跳飞舞，宛若风暴。刹那间杰里看见德雷克的脸转向他，露出求助的眼神，仿佛认清了救星何在却为时已晚。他张嘴说话，却被轰隆声淹没。杰里猛扑向前，却不是为了纳尔森，也非为了德雷克，而是为了三人之间的关联，为了他与丽姬的关联。冲到他们身边未久，一团黑影降落在兄弟身上，硬将两人剥开，绑起粗壮的纳尔森，送上直升机。混乱中，杰里拔枪，握在手里。他尖声叫嚷，在兵荒马乱中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直升机向上升起，机门没关，站了一个身影，向下观望，也许是法恩，因为看起来阴鸷疯狂。随后机门发出橙色闪光，第二道与第三道紧接而来，之后杰里就数不下去了。一气之下，他双手高举，张口继续呼喊，脸孔仍静静央求。接着他倒下，躺在海滩上，最后一切回归平静，只剩浪涛拍打海滩的声响，以及德雷克柯绝望的呜咽，眼看西方大舰队凯旋而归而心有不甘。西方大舰队窃走了他弟弟，扔下奋战不懈的士兵，死在他脚边。

22重生

在圆场，表亲通报大好消息后，爆发一阵欢庆的气氛。逮住纳尔森，纳尔森入网！毫发无损！一连两日，不断有人臆测着奖章、封爵、晋升等事。这回总算要给乔治一个交代了吧，非交代不可！冷眼旁观的康妮则认为不然，上级绝不会原谅他逮捕比尔·海顿。

随欢欣鼓舞的气氛而来的是某些令人困惑的谣言。举例来说，康妮与狄沙理斯被急着送往如今昵称为“海豚馆”的梅斯非镇安全联络站躲藏，两人苦等一整个星期，却未见期待对象现身。同样苦等的人还有翻译员、转译员、审问组、管理组，以及相关单位人员，这些人在安全联络站组成迎新与讯问小组。

管理组人员说，原定行动因雨顺延，择期再办。随时待命，他们说。然而，才过不久，邻近厄克非镇从事房屋中介的网民通报，管理组人员其实正想放弃租约。果然隔周小组接到命令解散，“静候决策”，从此不见复合。

接下来，有人漏出风声，指出恩德比与马铁娄联手——就算在当时，这种组合也令人匪夷所思——两人联手担任一个英美程序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轮流在华盛顿与伦敦召开，责任是同步分配海豚案的产品，代号是“鱼子酱”，同步配发至大西洋两岸。

凑巧的是，有消息指出，纳尔森人在美国境内，在费城一处为他准备的武装营舍里。原因为何，传开的速度更慢。有人感觉到——是谁的感觉就很难说了，因为渠道如此之多，无从追查起——纳尔森在那里会比较安全。人身安全。想想看俄国人。想想看中国人。此外，管理组人员坚称，表亲的处理单位与评估单位较具规模，较能处理这种前所未有的渔获。此外，他们说，这种成本，表亲负担得起。

此外——

“此外，胡言乱语个什么劲！”康妮耳闻后怒骂。

她与狄沙理斯郁闷地等着表亲邀请两人入列。康妮甚至还先把该打的针打好，预做准备，却苦等无人。

更多解释传来。表亲找来哈佛的新人，管理组人员说，康妮则正好推着轮椅前来。

“谁啊？”她怒火直上，质问。

某个教授，很年轻，莫斯科观察家，据管理组人员说，一生以研究莫斯科中心的黑暗面为志业，最近发表一份限内部传阅的论文，内容的根据却是“公司”档案，其中提及“地鼠原则”，甚至还影射到卡拉的私人大军。

“那还用说吗？那条肥蛆！”她对他们脱口而出，备感挫折之余，凄

泪怆然流下，“还霸占了康妮那份报告，对不对？姓寇培坡的。他对卡拉的所知，不比我左脚脚趾的所知更多！”

尽管如此，管理组人员不为所动。新委员会票选出来的是寇培坡，而非沙赫斯。

“看乔治怎么对付他们！”康妮警告，嗓音如雷。面对这道威胁，他们却出奇地无动于衷。

狄沙理斯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别人告诉他，中国观察家在兰利多到不值钱。老兄啊，供过于求。抱歉了，是恩德比的命令，管理组人员说。

恩德比的命令？狄沙理斯反问。

他们含糊其辞地说，是委员会的命令。是联合决策。

因此狄沙理斯向拉康求情。面对这种事务，拉康喜欢自认是低阶层的行政督察。他带狄沙理斯共进午餐，两人平分账单，因为拉康不喜欢公务员拿纳税人的钱互相请客。

“对了，你们对恩德比的感觉怎样？”他在午餐时间，打断了狄沙理斯平板单调的独白，谈着自己对潮州与客家方言的熟悉程度。目前“感觉”扮演了重大角色。“你们那边对他感觉怎样？我一直认为，你们欣赏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你认为呢，他是不是相当不错？”

“不错”在当时白厅的字典里意味着“鹰派”。

狄沙理斯冲回圆场，据实向康妮转述这个惊人的问题。而拉康正指望他传达。之后就鲜少见到康妮的人影。她悄悄“收拾行李”，换言之，她正为后人整理莫斯科中心的档案。她偏好一名新进的年轻掘穴人，状似山羊，是个很听话的年轻人，姓杜立妥。她叫这位杜立妥坐在脚边，与他分享智慧。

“老规矩要被扫地出门啦，”她向任何愿意驻足倾听的人警告，“恩德比那个混账专走后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大屠杀。”

众人看待她的态度，起初犹如诺亚开始打造方舟时必须忍受的揶揄。康妮是搞情报的人，可不愿让一身功夫闲着，此时偷偷将默莉·米金拉到一边，劝她递出辞呈。“跟管理组人员说，你想找份更有成就感的事做，亲爱的。”她一面建议，一面频频眨眼，频频捏小手，“至少啊，他们会替你加薪。”

默莉不太敢确定她所言是否属实，但话说回来，康妮对这种游戏最清楚不过了。所以她写好辞呈，管理组人员立刻命令她下班后留步。他们坦承，目前改革气氛确实浓厚。他们准备将本单位改造得更年轻，更具活力，与白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默莉严肃地答应重新考虑，康妮·沙赫斯则继续打包，离意更加坚定。

这些时候，乔治·史迈利人在何方？在远东吗？不对，在华盛顿！胡说八道！他回老家，躲在某地的乡下——他最喜欢康瓦尔郡了——休一

个辛苦赚来的假期，与安恩重修旧好！

后来一个管理组人员不慎说溜嘴，指出乔治可能罹患过劳症。此话一出，听者无不寒战哆嗦，因为即使是财务组头脑最钝的干瘪小老头也知道，过劳症这种疾病与老年一样，已知的疗法只有一种，却无法让人康复。

吉勒姆最后回来了，却只是回来带默莉去度假，拒绝开口表示任何意见。看见他在五楼来去匆匆的人说，他看来精疲力竭，显然需要休假。此外他的锁骨似乎出过意外，右肩绑得牢牢的。根据管理组人员，他到圆场医师位于曼彻斯特广场的私人诊所求医，住院两三天。尽管如此，众人仍未见史迈利出面，问管理组人员他何时回来，他们只显出冷淡的客套态度。管理组人员此时成了专断暴虐委员会，人人闻之色变，却缺少不了他们。在不显突兀的情况下，卡拉的照片不见了，众才子语带讥讽地说，是拿去清洗了。

奇怪的是，就某一方面而言也相当差劲的是，竟然没人想到前往贝瓦特街那栋小房子按按电铃。如果有人前去拜访，就会找到史迈利，极可能身穿睡袍，不是正在洗盘子就是烹煮自己不吃的东西。有时候，通常是在黄昏，他自己到公园散步，以似曾相识的眼神看着路人，路人也回看一眼，然后视线在往下移。或者他会去国王路一间较便宜的小吃店坐坐，带一本书做伴，喝点甜茶醒脑——因为他已经不顾原来的坚持，不再为了腰围而只用糖精。若有人留心，也会注意到他花很多时间注视自己双手，以领带擦拭眼镜，或是重新阅读安恩留给他的那封信。信写得很长，内容却不断重复。

拉康登门拜访，恩德比也去了，有一次马铁娄也跟着他们去，再度穿上符合其伦敦风格的服装。因为大家都同意——而最诚心同意的人莫过于史迈利——为了本单位的利益，移交应尽可能进行得平顺无阵痛。史迈利要求增加人手，拉康谨慎考虑后告知，现阶段财政部有心在圆场与其他单位身上多花钱。至少在地下工作界，英镑日渐看俏。拉康说，促成这种改变的，不仅是因为海豚案的成功。美国对恩德比的任命也盛赞有加。甚至在外交的最高层级也能感受到。拉康以“同声喝彩”来描述。

“索尔真的知道跟他们沟通的方法。”他说。

“噢，是吗？啊，那就好。那就好。”史迈利说，上下点头表示赞同，一如聋人的举动。

即使在恩德比向史迈利坦承他有意任命山姆·科林斯主导情报行动，史迈利对此建议也只是客气表示赞同。山姆是推销员，恩德比解释，而兰利近来欣赏的，就是推销员。爱穿丝质衬衫的人啊，行情一落千丈，他说。

“说得对。”史迈利说。

两人也同意，罗迪·马丁台尔尽管具有极高的娱乐价值，并不适合这

场游戏。罗迪真的是太娘娘腔了，恩德比说，大臣被他吓呆了。美国方面也与他看不对眼，就算是本身娘娘腔的人也无法接受他。此外，恩德比不太希望再引进伊顿帮，怕给人错误的印象。

一星期后，管理组人员重开山姆以前在五楼的办公室，搬走家具。部分不智人士津津有味地说，科林斯阴魂不散。结果星期一，有人搬来一张华丽的办公桌，桌面覆以红革，也从山姆的俱乐部墙上移来几张印刷的狩猎照。山姆的俱乐部目前正由较大型的赌博企业集团逐步接管，让各方皆感到满意。

小法恩，再也没人看见。连较具规模的几处伦敦分站重新开张后，也没人看见他。这些地方包括他原先隶属的布里克斯顿剥头皮部队，以及托比·伊斯特哈斯掌管的亚克顿点路灯组。话说回来，也没人想念他。他如同山姆·科林斯，在本案中随处可见，却不知为何，从来都不太属于本案一部分。然而不像山姆的是，一切结束时他留在草丛里，再也不现身。

至于山姆·科林斯，恢复上班第一天，他担起报告杰里身亡的坏消息这项重任。他在喧闹室报告，演说简短而不带感情，众人皆认为他表现得不错。大家没想到他有这份能耐。

“只限五楼人知道。”他告诉大家。他的听众感到震惊，之后觉得光荣。康妮掉下眼泪，想将他归类于卡拉的受害者，但旁人发言制止，因为信息不足，死因与凶手皆无从判断。就是说是殉职吧，情操高尚。

在香港，外籍记者俱乐部起初对陆克与威斯特贝失踪极为关切。在会员积极游说下，时刻警惕的警司洛克斯特主导全面性秘密调查，以解开两记者双双失踪的谜题。有关当局承诺，一有发现，必定照实公开，美国总领事也自掏腰包拿出五千元悬赏，希望有人能提供有助破案的线索。为了顾及在地人的心情，总领事也将杰里·威斯特贝的姓名列入悬赏告示里。两人成了“失踪新闻人”，坊间更盛传两人之间关系暧昧。陆克的分社另外提出五千元奖赏，小矮人尽管悲恻难耐，也与人打赌，非拿到两份悬赏不可。再怎么讲，小矮人在双头追查案情时，从寻死匈奴处得知陆克最后使用的云景道公寓，已在摇滚客眼尖的调查员前去搜证前重新装潢，从地板到天花板焕然一新。是谁下令的？是谁付的钱？没人知道。同样也是小矮人，他搜集到第一手资料，知道有人见到杰里曾在启德机场访问日本观光团。可惜摇滚客的调查委员会不得不婉拒这些线索。这些日本人“愿意合作却不是可靠的目击证人”，委员会说，特别是在漫长航程后蹦出一个欧洲人进行访问，他们就算指证历历也不足采信。至于陆克，这个嘛，调查委员会说，就他当时的走向，反正迟早会导致精神崩溃。知情人士提出失忆症的理论，罪魁祸首是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过了一阵子，连最合理的说法也冷却下来。外传有人在顺化战役崩盘时，看见两人一起采访——是在蚬港吧？——也看见两人在西贡举杯共饮。另一种说法是有人看见他俩肩并肩，坐在马尼拉的海边。

“牵小手吗？”小矮人问。

“比牵手更劲爆。”对方回答。

摇滚客的大名也频频见报，原因是他在美国缉毒署协助下，破获毒品走私案，最近开庭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打赢官司。被告包括几名华人以及一名美艳的英国冒险女郎。女郎负责运送海洛因。只可惜，与往常一样，仍然无法将大哥绳之以法，但据说摇滚客仅欠临门一脚。“香港强悍而正直的执法人”，《南华早报》在社论中称赞他机敏精明。“本港不可多得的精英。”

为了找余兴话题，俱乐部的话锋转向巍安居戏剧化的重新开张，外围盖了二十英尺高的铁丝网围墙，以泛光灯照射，有警卫犬负责巡逻。可惜已经不再提供免费午餐，这个余兴话题也很快退了流行。

至于老库洛，已有数月不见人影，也无人提起。后来有天晚上他出现了，看来老了许多，穿着素净，坐在以前习惯坐的角落，两眼无神。俱乐部仍有几人认得出他。加拿大牛仔提议玩几局上海保龄球，不过他婉拒了。随后发生一件怪事。有人为了俱乐部规章某个微不足道的条文争吵起来。丝毫不足挂齿，吵的是俱乐部成员是否仍应遵循传统签字据。无关紧要。但不知何故，老库洛硬是大发雷霆。他站起来，愤然走向电梯，老泪纵横，对他们脏话一句接一句骂。

“什么都别变。”他建议，一面愤怒挥舞着手杖，“老规则不变，让一切延续下去。你们阻止不了巨轮，联手无法阻止，个别也无法阻止，你们这堆乳臭未干、专拍马屁的菜鸟！敢动老规矩的脑筋，等我来收拾你们！”

“不中用了。”众人同意，不欢迎他再来。可怜的家伙。多丢人现眼。

是否真有针对性史迈利而来的阴谋，真有吉勒姆猜测的那番规模？如果真有，威斯特贝个人鲁莽干涉后，对阴谋造成什么影响？不得而知，尽管在彼此信任的人士之间，也不太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恩德比与马铁娄之间必然存在秘密共识，纳尔森一到手，应该先让表亲咬第一口，而且功劳双方各记一笔，以换得他们支持恩德比担任首长。当然拉康与科林斯两人，尽管专业范围南辕北辙，他们也脱不了关系。然而，他们在何时提议径行逮捕纳尔森，利用何种方式——例如比较传统的方式，由伦敦部长层级联合出招——恐怕永远也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威斯特贝对他们而言是塞翁失马，为他们提供了苦寻不着的借口。

内心深处，史迈利究竟对这项阴谋知不知情？他是否知道，是否他私下甚至乐见这条解决之道？自此之后，彼得·吉勒姆有幸被放逐到布里斯克斯顿三年，得以思考自己的见解，他坚称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皆为大大的“是”。他说，在危机紧急的阶段，乔治写给安恩一封信，据推测应该是在隔绝室漫长等待之际。吉勒姆这番理论的根据，那封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前去安恩位于威尔特郡的住处，希望促成破镜重圆，安恩拿出那封信给他看。尽管他的任务功败垂成，两人交谈间安恩从手提包里

取出信件。吉勒姆声称他记住了一部分，一回车上立刻写下。别的不谈，文笔优美之处，是吉勒姆本人不敢企求的。

我不愿多愁善感，只是诚心想知道自己如何走进眼前的死胡同。就我幼年时代记忆所及，选择地下工作是因为要达成祖国的目标，这条路似乎最直接也能走得最远。当年的敌人众所周知，能在报上看到。如今我只知道，我已学会以阴谋的角度诠释人生的整体。我以这支宝剑求生至今，今日环顾四周，势必也将以此宝剑断了残生。这些人令我胆战心惊，而我却是其中一员。如果他们朝我背后放冷箭，甚感安慰的是，至少是我的同侪下的判决。

吉勒姆也指出，这封信根本是出自陷入忧郁的史迈利之手。

他说，近来老乔治大致恢复了本色。偶尔他会偕安恩共进午餐，吉勒姆个人深信，两人有朝一日势必重修旧好，肯定无疑。但是乔治从未提及威斯特贝。为乔治着想的吉勒姆亦然。

[1]越南最大的城市，1976年更名为胡志明市。——译注，下同

[2]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军队不敌德军，从法国的敦刻尔克大批撤退，当时还征用民间渔船才得以成功。

[3]吉卜林小说中为英国效命的少年间谍。

[4]源自于俾斯麦用来贿赂新闻记者的费用，此笔费用称为爬虫基金。后泛指支付无法曝光的地下活动的基金。

[5]即印度支那。

[6]PFs, Personal Files, 个人档案。

[7]迪克·惠廷顿（1354—1423），英国商人，传说和童话中的著名人物。

[8]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

[9]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

[10]霜，Frost，与文中人名弗罗斯特的英文相同，这里暗指弗罗斯特。

[11]亨利·摩尔（1898—1986），英国著名雕塑家。

[12]托马斯·特拉赫恩（1637—1674），英国神秘派诗人。

[13]1805年著名海战，大英舰队在这场战役中击败西法联军。

[14]廷巴克图：非洲马里古城。

[15]诺埃尔·科沃德（1899—1973），英国剧作家。

[16]伯恩（1910—1970），加裔美国心理学家。

[17]别占茅坑（get off the pot）的另一解释是“戒掉大麻”。

[18]Dead letter boxes，投递与收件双方互不相见的留言之处。

第3册 史迈利的人马

机构、人物和术语表

圆场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位于剑桥圆场

中心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莫斯科中心的简称

沙拉特圆场培训中心所在地，俗称“训练所”

剥头皮组圆场内负责搞暗杀、绑架、讹诈的机构，位于布里克斯顿

点路灯组圆场内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的机构，位于阿克顿，旗下人员俗称“街头艺术家”

火烧圆场术语，指以勒索的方式，迫使掌握情报资源的人提供协助或招供

乔治·史迈利圆场资深间谍，小说开始时已被迫退休

安恩史迈利的妻子

卡拉苏联情报机构头目

比尔·海顿圆场前任伦敦站站长，实为卡拉手下，潜伏在圆场二十多年，被史迈利揭发后遭暗杀

康妮·沙赫斯前圆场研究组女王

彼得·吉勒姆圆场资深间谍，现为剥头皮组组长

拉康内阁办公室负责监督圆场的首席行政官员

索尔·恩德比从外交部空降的接替史迈利成为圆场的最高主管

劳德·斯屈克兰圆场财政部门主管

山姆·科林斯圆场行动组主管

托比·伊斯特哈斯点路灯组前组长，现从事可疑的艺术品买卖

瓦拉狄米尔将军原籍爱沙尼亚的政治难民，苏联军官，原为史迈利手下，遭暗杀

欧斯特拉柯娃住在巴黎的俄裔流亡分子

奥图·莱比锡瓦拉狄米尔将军手下的情报员，声誉不佳的情报贩子

克劳斯·克列兹奇玛莱比锡的好友兼老搭档，以经营色情夜总会为业

格里高利耶夫苏联驻瑞士波恩大使馆的二等商务领事

欧雷格·基洛夫本名欧雷格·寇斯基，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二等秘书

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促使乔治·史迈利先生从他那启人疑窦的退休生活中重出江湖。第一件事发生在巴黎，溽暑蒸腾的八月，正是巴黎人惯常将他们的城市弃留给炽烈艳阳与一车又一车观光客的季节。

就在这八月里的一天，八月四日十二点整，教堂的钟声刚刚敲响，工厂的铃声也紧接着响起。在一度聚居众多穷苦苏联移民的区域，一名年约五十的矮胖妇人，带着一只购物袋，从一座老旧仓库的阴影中现身。她一如往常地精力充沛，目标明确，沿着人行道走向公交车站。这条街道灰暗狭窄，店家门窗紧闭，有几家过时的小旅馆与许多猫。不知为何，此处显得格外寂静。处理腐坏物品的仓库，在假期中仍开工。似有若无的微风吹不散暑气，加上废气的恶臭，仿佛排气孔的热气直冲身上，但她那张斯拉夫人的脸却毫无怨色。她的衣着与身材都不适合这样的大热天。她实在很矮，又胖，必须左摇右摆，才能往前移动。身上朴素的黑洋装既无腰身又无装饰，只有领口镶了一圈白色花边，胸前垂着一个久经抚弄，但无甚价值的大型金属十字架。脚上那双走起路来向外翻斜的鞋子，啪啦作响，在紧闭的门户之间留下肃然规律的踢踏声。那只从清晨就塞满东西的破旧购物袋让她身体略向右倾斜，清楚显示她惯常背负重担。然而，她也并非完全索然无趣。她的灰发在脑后缩成一个发髻，但仍留下一绺活泼的刘海，随着行进的节奏在前额跃动。勇敢无惧的幽默神色，让她的棕色眼睛闪动光辉。在拳击手似的下巴上方，她的嘴似乎随时准备好要绽开微笑，即使毫无缘由。

抵达平常候车的公交车站之后，她放下购物袋，用右手按摩臀部与脊椎接连处。这是她近日常有的动作，略微舒缓了身体的不适。她每天上午在仓库担任验货员，但工作时坐的高凳子没有靠背，令她怨气益增。“恶魔！”她忿忿地低声咒骂。嘴里一面咒骂，摆在背后的黑色手肘也开始甩弄，就像一只振翅待飞的黑色大乌鸦。“恶魔！”她又骂了一声。此时，她突然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便一转身，抬头仰望矗立在她背后的高壮男子。

除了她之外，这男子是惟一等候公交车的人，事实上，也是此刻街上惟一的人。她从未与他交谈，但却早已熟悉他的脸：如此庞大，如此不安，如此汗水淋漓。昨天她曾看到这张面孔；前天也看到这张面孔；而且，就她记得，大前天也曾看到过——老天哪，她可不是活动日志！最近的这三四天，这个迟钝、充满渴望的巨人，或等候着公交车，或在仓库外人行道徘徊，对她而言，已成为街道的一景；甚至，已成为某种可供辨识的类型，虽然她尚且无法指认。她觉得，这人看似遭遇了大搜捕，就像近日来的许多巴黎人一样。他们在他们脸上看到许多恐惧，恐惧让他们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也许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她不知道。而且，不只一次，她感觉到这人对她有兴趣。她很好奇，他到底是不是警察。她曾想过要问他，因为她有着都市人的傲慢自信。他郁郁寡

欢的外型像个警察，汗湿的西装和挂在手腕上像是旧制服却毫无用处的雨衣，也像警察。如果她猜对了，这人是警察，那么——也该是时候了，这几个月来的一连串偷窃事件，让她的存货查验工作一片混乱，那些白痴终于采取一些行动了。

然而，陌生人已低头凝视着她好一会儿了。及至此时，也还直直地盯着她看。

“我背痛得难受，先生。”最后，她还是对他表白。她的法文说得很慢，但发音典雅清晰。“我的背不大，痛得却很厉害。你是位医生，也许？骨科医生？”

然后，她抬头望着他，心中暗自揣度，他是不是病了，她的玩笑是不是不合时宜。他的脸颊与脖子油光闪烁，黯淡的眼眸中有一丝隐而不见的迷乱。他的目光似乎超越了她，看着自己的某些私密问题。她打算问他——你或许是恋爱了，先生？妻子欺骗你了？——她真的考虑要拉他到咖啡馆，喝杯水或草药茶。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将目光移开，看看自己背后，又回过头来越过她，看着街道的另一边。她觉得，他真的很害怕，不仅仅是心怀警戒，而且是恐惧万分。因此，也许他不是个警察，而是个小偷，虽然这两者的区别——她可清楚得很——常常微乎其微。

“你的名字是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欧斯特拉柯娃？”他猛然问道，仿佛这个问题令他害怕。

他说的是法文，但她知道，这不是他的母语，正如她一样。而他字正腔圆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让她知道他的来处。她立即认出他的发音，和念出这些音的舌形，但她却迟迟辨识不出她之前无法指认的类型，也满心惊惧。

“如果是，那么，你又是谁？”她昂起下巴，沉着脸反问。

她向前踏进一步。两人的高矮差距显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显露了他不讨喜的个性。抬头仰望，欧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惧。他濡湿的下巴浮起狞笑，双唇扭曲，让自己看起来强壮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为了驱走不可救药的懦弱。他像是个以英勇行为强化自己的人，她想。又或者，是以犯罪行为。他是个没有任何自发行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宁格勒？”陌生男子问。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后她却不肯定。她看见他疑惧的目光望向逐渐接近的公交车。她看见优柔寡断近乎惊慌失措的情绪攫获了他，令她想到——就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不啻为洞烛先机——他可能要迫她就范。他没有，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用的是俄文，而且还是莫斯科官僚那种令人生厌的腔调。

“一九五六年，你获准离开苏联，为了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同时还负有另一个任务？”

“欧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断他的话，回道，“他很爱国。”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购物袋，紧紧抓住提把。

为了盖过公交车驶近的声响，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会她的辩驳：“欧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儿亚莉珊卓托我问候你，还有几个官方机构也要问候你。我想和你谈谈亚莉珊卓的事，别搭这班公交车！”

公交车停了下来。司机认识她，伸手要帮她提购物袋。陌生男子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更骇人的话：“亚莉珊卓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公交车司机唤她上车，好继续上路。他以平日相互开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鲁地说：“来吧，妈妈。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谈情说爱。把你的袋子拿过来，我们走吧！”司机吼道。

公交车里响起笑声，接着有人咆哮——老女人，让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觉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专业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脚的裁缝师摸索着纽扣一般。她挣脱开来。她想告诉司机一些事，但却没有办法；她张开了嘴，却忘记该如何说话。她惟一能做的，是摇摇头。司机又对她吼叫一声，然后挥挥手，耸耸肩。咒骂声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个妓女！欧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逐渐驶出视线，等待自己的视野恢复清澄，心不再疯狂跳动。现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够坚强，可以保护我自己。上帝保佑我远离懦弱。

她随他走进咖啡馆，步履蹒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劳改营里，她从煤堆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三处。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来的信息极尽胁迫之能事，让她重新想起尘封已久的跛足感觉。

这家咖啡馆即使不是全巴黎绝无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一家既无点唱机，也无霓虹灯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还开门营业——但屋里几张桌球台倒是从清晨直到夜深都厮杀不断。至于其他人，就只是寻常的日间喧闹，讨论着政治、赛马和其他巴黎人爱谈论的话题；几个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窃窃低语；衬衫脏污、满脸不快的年轻侍者，领着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脏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标，标示着这是保留订位的桌子。接着，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戏码。陌生男子点了两杯咖啡，但侍者抗议说，白天保留屋里最好的位子，不能只来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方言，欧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译。陌生男子涨红了脸，点了两份火腿蛋卷加薯条，两瓶亚尔萨斯啤酒，完全没问欧斯特拉柯娃的意见。然后，起身到洗手间重振自己的勇气——非常有自信，竟认定她不会逃开——回到座位时，他脸上的汗水已干，姜色的头发也已梳理整齐，但他们现在身处室内，他身上的臭气让欧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审讯室。他从洗手间走向座位的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

告诉她的任何一句话，更加让她确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惧。他们是他们之间的一员。那压抑的得意阔步，脸上精心掩饰的残暴兽性，他这会儿把手腕笔直摆在桌上的沉重神态，还有假装不情愿地从篮中捻起面包，仿佛以笔蘸墨般的作态——无处不勾起她最丑恶的回忆，一个饱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体系重压下生活的回忆。

“那么——”他一面说，一面开始吃面包。他选了有硬皮的一端。虽然有双看似一秒钟就可以捏碎面包的手，但他却用肥胖的指尖秀气地撕下小片，仿佛这是官式的进食方法似的。小口吃着时，他的眉毛扬起，看起来像是感叹：我，一个陌生人，在这片外国的土地上。“这里的人可知道你在苏联过着堕落的生活？”他终于开口问，“也许满城都是妓女，他们也不在乎。”

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势待发：我在苏联的生活并不堕落，堕落的是你们的系统。

但她并没有说出口，仍保持缄默。欧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气与快言快语，此时，她强忍住一触即发的压力，透过袖子，紧紧拧住手腕内侧的柔软皮肤，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岁月中，当这些审讯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时，她曾做过的千百次一样——你最后一次听到你丈夫的消息，那个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是什么时候？过去三个月以来，你和什么人有过往来，通通列出名来！在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她也学到了接受讯问的其他教训。此刻，她正在重温那些教训，虽然那已属于整整一个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跃然眼前：千万不要硬碰硬，千万不要激怒对方，千万别想占上风，千万别耍聪明、优越感或学识，千万别让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个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热情绪所误导。要以愚蠢响应愚蠢，以墨守成规响应墨守成规。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处所抱持的两个秘密信念，才能让她忍受这一切屈辱：她对他们的恨，还有她的希望，希望终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们，并经由他们庞杂笨拙的诉讼程序，奇迹似的从他们手中夺回她被剥夺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笔记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摆在面前的就会是她的档案，但这里是巴黎的咖啡馆，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笔记本。在莫斯科，这是连官员都必须靠运气才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档案或笔记本，开场白都是一样：“你原名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宁格勒出生。”他重复述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嫁给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依格尔。他当时是红军的步兵上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〇年，这个欧斯特拉柯夫派驻东柏林，在爱沙尼亚移民反动分子的协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国，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权，后来又在巴黎归化成法国公民，也不断和反苏联分子往来。他叛逃时，你还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正确吗？”

“正确。”她说。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会是“正确，上尉同志”。或“正确，调查员同志”。但是，在喧闹的法国咖啡馆里，这么正式的称呼显然时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肤已失去感觉。松开，她让血液恢复畅通，然后又拧紧另一片皮肤。

“身为欧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大赦，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获释。正确吗？”

“正确。”

“返回莫斯科之后，你明知不太可能获准，却还是申请出国旅行护照，想到法国和丈夫会合。正确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提出申请，就有失我为人妻子的责任。”

侍者端来了装着蛋卷与薯条的盘子，以及两瓶亚尔萨斯啤酒。欧斯特拉柯娃请他送杯柠檬茶来，她很渴，但不爱喝啤酒。她和男孩说话的同时，也试图以微笑和目光与他沟通，但徒劳无功，他的冷酷回绝了她。她意会到，自己是除了那三个妓女之外这里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看上去像本赞美诗，然后铲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欧斯特拉柯娃紧紧捏住手腕，亚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仿佛流血不止的伤口，她心中反复忖度成千上百种“迫切需要母亲帮助”的各种“严重问题”。

陌生男子一面吃着，一面继续残忍地追溯她的历史。他是因为喜欢而吃，还是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结论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与此同时——”他边吃边开口说。

“与此同时。”她不由自主地低声说着。

“与此同时，你一面假装关心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他塞满食物的嘴继续说着，“一面却和所谓的音乐学生葛利克曼·约瑟夫有了男女关系。这个犹太人犯过四次反社会罪行，和你在劳改营中认识。你和这个犹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确或不正确？”

“我当时很孤单。”

“和葛利克曼的关系，让你生了一个女儿，亚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产科医院出生。出生证明上署名的父母是葛利克曼·约瑟夫和欧斯特拉柯娃·玛丽亚。女孩是以犹太人葛利克曼的姓注册登记。正确或不正确？”

“正确。”

“与此同时，你还是继续申请出国旅行护照，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丈夫生病了。我有责任继续申请。”

他又大吃一口，动作粗鲁得让她看见了他嘴里的许多颗蛀牙。“一九

五六年一月，当局宽宏大量地核准你的护照，条件是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必须留在莫斯科。你超过核准的期限，继续留在法国，抛弃了你的女儿。正确或不正确？”

通向街道的门是玻璃的，墙面也是。一辆大货车停在外面，咖啡馆陷入阴影之中。年轻的侍者重重地放下她的茶，连看她一眼都没有。

“正确。”她又开口，并趁这个机会看着审讯她的人，她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因此强迫自己让那人了解，至少在这些事情上，她既无犹疑，也不后悔。“正确。”她带着挑衅意味地再说一次。

“为了让当局从优考虑你的申请，你曾向国家安全部门签下一份保证，承诺在巴黎期间将为他们进行几项工作。第一，说服你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返回苏联——”

“是‘努力’说服他，”她淡淡一笑说，“他不听我的建议。”

“第二，你也承诺要提供反苏联移民团体复辟活动与成员的情报。你只提出了两份毫无价值的报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为什么？”

“我丈夫看不起这些团体，和他们断绝来往了。”

“没有他，你还是可以参与这些组织。你签过同意书，却又不履行责任。对或不对？”

“对。”

“你就这样把女儿抛弃在苏联？留给一个犹太佬？就为了把你的心力用在照顾人民的敌人、国家的叛徒上？你就这样无视于你的责任？超过了许可的期限，留在法国？”

“我丈夫快死了，他需要我。”

“那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呢？她就不需要你？垂死的丈夫比活生生的女儿更重要？一个叛国贼？与人民为敌的叛徒？”

欧斯特拉柯娃松开手腕，不慌不忙地握住她的茶，端详着举到面前的玻璃杯，柠檬浮在水面。透过玻璃杯，她看见肮脏的马赛克地板。透过地板，她看见葛利克曼那张可爱、残忍又温柔的脸向她迫近，劝她去签、去做、去承诺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事。一个人获得自由，比三个人同当奴隶好，他低声说；有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女儿在苏联根本不可能有前途，无论你留下或离开，都没什么不同；离开，然后我们再尽量想办法走下一步；什么都签，然后远走高飞，为我们三人而活；如果你爱我，就走吧……

“他们过得很苦，一直都是。”最后，她以近乎怀旧的口吻对陌生男子说，“你太年轻了。他们过得很苦，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仍然很苦。”

“那个罪犯葛利克曼还写信给你吗？”陌生男子以优越感十足、凡事了然于胸的态度问道。

“他从没写过信。”她说了谎，“他这样一个生活受到限制的异端分

子，怎么可能写信呢？留在法国是我自己作的决定。”

把自己形容得很悲观，她想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尽量多争取一些空间。

“二十年前来到法国之后，我就没再得到葛利克曼的消息。”她重拾勇气，继续说，“我辗转听说，他很气我的反苏联行为。他不希望再听到我的消息。在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渴望获得改造。”

“他没写信告诉你有关女儿的事？”

“他没写信给我，也没捎来任何信息。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女儿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她和你联络过吗？”

“当然没有。我只听说她进了国家孤儿院，改了另一个名字。我敢保证，她一定不知道我的存在。”

陌生男子一手叉起食物送入口中，一手握住笔记本。他塞满嘴，用力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就着啤酒大口吞下食物。但是，那充满优越感的笑容再度浮现。

“现在，这个罪犯葛利克曼已经死了。”陌生男子宣布，他的小秘密终于揭晓了。他继续吃。

突然之间，欧斯特拉柯娃希望这二十年是两百年。她希望葛利克曼的脸从未俯视过她，她希望自己从未爱过他，从未关心过他，从未为他下过厨，从未在那仰赖友人接济的放逐生活中，日复一日与他醉卧在那仅有一间房间的公寓里，被剥夺工作权利的他俩，整日弹奏音乐、做爱、醉酒、散步林间，邻居对他们都不理不睬。

“下次我进了监狱，或是你，他们就会把她带走。不管如何，亚莉珊卓都一定会被带离我们身边。”葛利克曼说，“但你可以救你自己。”

“我到时候会决定的。”她回答道。

“现在就决定。”

“到时候再说。”

陌生男子把空盘子推到一边，再次用双手捧起那本光滑的法国笔记本。他翻了一页，仿佛进行到新的一章。

“现在谈谈你那罪犯女儿亚莉珊卓。”他塞满食物的嘴宣布道。

“罪犯？”她低声说。

令她惊讶的是，陌生男子列举了一连串新的罪行。在他滔滔不绝的陈述中，欧斯特拉柯娃丧失了对当下的最后一丝注意力。她的目光定在马赛克地板上，看见许多龙虾壳与面包屑。但她的心却回到了莫斯科的法庭，她自己的审判又一次上演。如果不是她的审判，那就是葛利克曼

的——但也不是葛利克曼的，那是谁的呢？她还记得，他们两个出席那些审判时，是不请自来的旁听者。那是朋友们的审判，尽管只是些偶然碰上的朋友：这些人中或质疑当局的绝对权力，或敬拜某些不被接受的神祇，或画些违法的抽象画，或出版具政治危险性的情诗。咖啡馆中喋喋不休的顾客，变成了替国家警察摇旗呐喊的鼓噪群众；桌球台的乒兵声响，变成了铁门的撞击声。在某年某月某日，她逃离了位于某条街上的国家孤儿院，因此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月的惩治监禁。某年某月某日，她侮辱国家安全部门，因行为不端又多关了好几个月，接着又是多少年的下放。欧斯特拉柯娃觉得肠胃翻绞，她想，自己或许病了。她伸出双手握住茶杯，看见自己手腕上的红色掐痕。陌生男子继续陈述，她听见女儿又因为拒赴某工厂任职，多了两年牢狱之灾。上帝帮助她，她又为什么不帮帮自己呢？欧斯特拉柯娃问着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她到底从哪里学到这些？在他们把她带走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葛利克曼到底教了她什么，能根深蒂固到让她反抗所有教化？恐惧、狂喜、惊讶的情绪在欧斯特拉柯娃的心中交织起伏，但陌生男子的一句话，让这一切转瞬消逝。

“我没听见，”半晌之后，她低声说，“我有点儿分心。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他又说了一次。她抬起头，凝视着他，努力回想别人曾警告她提防的所有诡计，但诡计实在太多，而且她也不再精明机敏。她已经没有葛利克曼的那种精明机敏——如果她以前曾有的话——能辨识他们的谎言，抢先一步玩他们的把戏。她只知道，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与心爱的欧斯特拉柯夫团聚，她犯下了重罪，身为母亲的最重大罪行。陌生男子开始威胁她，但是，这威胁却显得毫无意义。倘若她不愿合作——他这样说，她承诺为苏联当局执行任务的文件副本，将会送到法国警方手上。她那两份毫无用处的报告（他很清楚，她只是为了让那些土匪闭嘴才写的）副本，将会在幸存的巴黎移民圈中流传——尽管，天晓得，如今在移民圈中，“他们”的人数已少之又少了！然而，为何她必须屈服于压力，接受这无价的礼物——当这个人、这个系统，出于难以解释的宽厚行为，提供给她一个弥补自己，也弥补女儿的机会？她知道，她夜以继日祈求原谅的祷告，成千上万根蜡烛，成千上万次垂泪，已得到响应。她让他再说一次。她让他把笔记本从易怒的脸孔前推开，她看见他疲弱的嘴角扬起，露出一丝笑意，愚蠢至极，他竟要求她原谅似的，再次提出了这个疯狂、神赐的问题。

“如果苏联决定除去这个腐败的反社会分子，你会希望你的女儿亚莉珊卓追随你的脚步来到法国吗？”

会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在悄悄进行——秘密造访苏联大使馆，填写表格，签署保证书（居住证明），辛苦地跑过一个又一个法国部门——欧斯特拉柯娃小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追踪别人的行动一般。她经常祷告，但就连祷告她都小心翼翼，分在几个不同的东正教教堂进行，以免有人察觉到她过度虔敬的异常举止。有些教堂其实

只是散落在第十五区与十六区的小小民舍，夹板上钉着特殊的双重十字架¹，门上贴着被雨水浸湿的陈旧俄文布告，或是想找便宜的住宿，或是想教授钢琴。她去过苏联海外教会、圣母显灵教会、萨洛夫圣塞拉芬教会。她到每一个教会去。她按着门铃，直到有人应门，教堂执事或是面带病容的黑衣女子。她给他们钱，他们让她在烛光闪烁的神像面前，跪在湿冷的地上，闻着香料的气味，直到微醺。她对全能的上帝许下诺言，她感谢他，请求他的指引，她甚至问他，如果那名陌生男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找上他，他会怎么做，她提醒他，她毕竟面对着压力，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摧毁她。然而，与此同时，她心中不愿折服的常识却不断质疑，她也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何在所有人之中，她，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之妻，异议分子葛利克曼的情人，暴乱与反社会分子——他们让她相信是这样——的母亲，能被挑选出来，获得如此异于寻常的宽赦恩惠？

在苏联大使馆，当她第一次去提出正式申请时，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礼遇，完全不合乎她这叛国者、变节间谍与桀骜不驯扰乱分子母亲的身份。他们并未粗鲁地命令她到等候室去，而是护送她到面谈室，一位年轻的人事官员展现绝佳的西方礼仪，在她下笔踌躇或畏缩之时，甚至还提供帮助，让她能顺利完成申请手续。

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人——尽管她最亲近的人也并非真的非常亲近。那名易怒男子的警告，日日夜夜在她耳际回响：只要轻举妄动，你的女儿就别想恢复自由。

而且，除了上帝，又能找谁呢？找她住在里昂、嫁给汽车销售员的同父异母姐姐华伦蒂娜吗？光是想到欧斯特拉柯娃与莫斯科来的情报官员为伍，就足以令她抓狂，跑上跑下找她的嗅盐，以免昏倒。在咖啡馆吗，玛丽亚？大白天，玛丽亚？没错，华伦蒂娜，而且他说的是事实。我和一个犹太人生下了私生女。

平静无波反而是最令她恐惧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在大使馆，他们说她的申请会“从优考虑”；法国当局向她保证，亚莉珊卓会很快获得法国国籍；那名易怒的陌生男子说服她将亚莉珊卓的出生日期往前挪，才能姓“欧斯特拉柯娃”，而非“葛利克曼”；他说法国当局会比较能接受这样的情况；结果似乎也是如此，尽管她当初在面谈时，并未多谈到这个孩子的存在。现在，突然之间，没有其他的表格要填，没有其他的障碍要清除，欧斯特拉柯娃只能等候，却又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麼。那名陌生男子是否会再度现身？他不再存在了。一份火腿蛋卷与薯条，一些阿尔萨斯啤酒，两片附赠的面包，显然已完全满足了他的需求。他与大使馆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她无从想像。他告诉她，到大使馆去，他们会等着她；他说得没错。但当她提到“你们那位先生”，甚至“你们那位金发高大、先前来找我的先生”时，却只得到一无所知的微笑。

就这样，无论她等待的是什麼，都渐渐地消逝无踪了。起初，她衷心渴求，接着，希望都已无踪影，她不知道这一切为何转变，又何时发生。亚莉珊卓已抵达法国了吗？带着她的证件，动身踏上旅程了吗？欧

斯特拉柯娃开始想，她应该已经做到了。沉溺于新的失望情伤，她偷偷望着街道上年轻女孩的面孔，揣测亚莉珊卓的长相。回到家中，她的眼光会自动投向门口的脚踏垫，希望能看到一张手写的便条或快信：“妈妈，是我。我住在某某旅馆……”或是一封电报，写着航班号码，明天抵达奥利2，今晚；或者不是奥利机场，而是戴高乐机场？她对航空班机不熟悉，所以还造访旅行社，只为了探询。两个机场都有班机。她也考虑要花钱装一部电话，这样亚莉珊卓就可以打电话给她。然而，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她到底还指望些什么呢？与从未厮守的成年女儿，涕泗纵横地团聚？当年她背弃了骨肉亲情，二十年之后，又期望能重拾天伦之乐？我对她没有任何权利，欧斯特拉柯娃严正地告诉自己；我有的，只是欠她的债，与我的义务。她问过大使馆，但他们也不知道进一步的消息。正式的手续都已完成，他们说。他们知道的也就仅止于此。如果欧斯特拉柯娃想寄钱给女儿呢？她狡猾地问——好让她支付费用，例如，签证费？——他们或许能给她一个地址，一个可以找得到她的办公室？

我们可不是邮局，他们告诉她。他们的冷漠严峻吓坏了她。她没再去。

在此之后，她又挂心起那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那是他们给她用来贴在申请表格上的。她看到过的就只有那几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现在，她真希望有一张留在身边，当时却没想到，真蠢，她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本人。那几张照片在她手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带着照片，急急冲出大使馆，赶往主管部门；而离开时，那些照片已进入了另一个官僚作业的流程之中。但她曾仔细端详！天哪，她曾仔仔细细地端详每一张照片，不管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在地铁上，在等候室里，甚至在走进各主管部门之前的人行道上，她都盯着女儿那几张了无生气的照片，尽力想在那毫无表情的灰暗阴影中，找出她曾深爱过的那个男人的踪迹。但失败了。一直以来，她每次鼓起勇气怀想，总是想像成长中的孩子明显有着葛利克曼的形貌，如同刚出生时那般。如此生气蓬勃的男子，不可能不深深烙下永久的印记。然而，欧斯特拉柯娃在照片上却找不到葛利克曼的丝毫印迹。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的犹太身份，俨然成为他孤军革命的一部分。他不是东正教徒，他甚至没有宗教信仰，他厌恶欧斯特拉柯娃暗自保有的虔敬态度，程度不下于他对苏联官僚体系的厌恶——尽管他还是借用欧斯特拉柯娃的火钳，烫卷鬓角，把自己弄得像个哈西典教徒3，但他说，这只是为了凸显当局的反犹太政策。然而，从照片上，欧斯特拉柯娃看不到他的任何一滴血缘，看不到他的任何一丝火光——虽然照那名陌生男子的说法，他的熊熊烈火已令她永志难灭。

“如果他们挖出尸体来拍了这些照片，”欧斯特拉柯娃在她的公寓中自言自语，“我也不会觉得惊讶。”经过这透彻的观察，她首次说出了心中日渐加深的疑虑。

在仓库辛勤工作，在狭小的公寓独坐度过漫漫长夜，欧斯特拉柯娃

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能信任的人，一个不谴责也不赦罪、能明了她这一路走来的崎岖的人，最重要的是，不会对外泄露而致破坏了她与亚莉珊卓团聚机会的人——他们已让她明白，轻举妄动绝对会破坏团聚的机会。然后，一天晚上，不知是上帝或她自己，从记忆中找出了答案：将军！她想着，从床上坐起身，点亮了灯。欧斯特拉柯夫曾亲口对她提起这个人！那些流亡团体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他总是这样说，你一定要远远躲开他们，像远离瘟疫一般。你惟一能信任的只有瓦拉狄米尔将军。他是个老魔头，爱玩弄女人；但他是个男子汉，他有关系，而且知道如何闭紧嘴巴。

但欧斯特拉柯夫说这些话，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就算是老将军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吧。更何况——瓦拉狄米尔姓什么？她从来就不知道。就连瓦拉狄米尔这个名字——据欧斯特拉柯夫告诉她——也是他加入军队后才取的；因为他的真名是爱沙尼亚名字，不适合在红军中使用。尽管如此，第二天，她还是到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4旁边一家可以打探苏联侨民消息的书店，开始了第一次的查访。她问到了一个名字，甚至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电话已经停用了。她到邮局，连哄带骗地请求帮助，最后终于拿到了一本一九五六年的电话指南，上面列出了“波罗的海自由运动”的名衔，还有一个位于蒙帕纳斯5的地址。她可不笨。她搜寻那个地址，发现至少还有其他四个组织列名在同一个地方：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团体、苏联帝国主义受害者协会、自由拉脱维亚之四八委员会、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自由委员会。她仍清楚地记得欧斯特拉柯夫对这些组织的严厉批评，虽然他还曾付过会费。纵然如此，她还是到了那个地址，按了门铃。那幢房子与她平常去的那些小教堂没什么两样：奇特古趣，而且总是门户紧闭。最后，终于有个白俄老人来开门，他穿着开襟毛衣，纽扣扣得歪歪斜斜，拄着手杖，露出高人一等的神情。

他们走了，他说，“手杖敲着铺鹅卵石的路面。搬出去了。结束了。更大规模的团体把他们给赶出这一行了，他笑着加上一句。他们人太少，组织又太多，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争吵不休。难怪沙皇会被打败！”这位白俄老人装了一口不大合适的假牙，稀疏的头发将将盖住头皮，掩藏他的秃顶。

“但将军呢？”她问，“将军到哪里去了？他还活着，或者——”

白俄老人挤出不自然的笑容，问这是不是公事。

“不是的。”欧斯特拉柯娃狡黠地说，她记起将军有着爱拈花惹草的名声，试着装出羞涩女人的微笑。白俄老人大笑，牙齿咯咯作响。他又是一阵大笑，说：“噢，将军！”然后，他拿来一张卡片，紫色的戳印盖着一个伦敦的地址，交给了她。“将军本性难移，”他说，“就算上了天堂，他也会追着天使，把她们搞得鸡犬不宁，绝对会。”那天晚上，在周遭的一切都沉睡之后，欧斯特拉柯娃坐在死去丈夫的书桌旁，写信给将军。她以法文而非俄文写就，好让自己保有更加超然的感觉，而信中的笔调，更是孤寂的人们面对陌生人才可能吐露的坦率心声。她告诉将

军，她对葛利克曼的爱，而知道将军就像葛利克曼一样爱过女人，让她觉得很宽慰。她即刻坦承，自己是以间谍的身份到法国，同时也说明，她曾为了自己的自由，付出卑劣的代价，拼凑出两篇琐碎无聊的报告。那是违心之事，她说；虚构与谎言，她说；毫无内容。但是那两篇报告的存在，以及她亲手签名的承诺，已为她的自由铐上沉重的限制。接着她谈到了自己的心声，她到各个苏联教会向上帝祷告的事。自从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找上她之后，她的日子就变得虚妄不实；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一个自然合理的解释，就算那样的解释可能令人痛苦。她毫无保留地对他述说，无论她的罪恶感有多么深重，这些感受与她努力把亚莉珊卓带来西方无关，而是因为她决定留在巴黎，照顾欧斯特拉柯夫直到生命的尽头——在欧斯特拉柯夫去世之后，她说，苏联当局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她使自己成为一个叛徒。

“但是，将军，”她写道，“如果今夜我能当面见到造物者，倾诉我心灵最深处的一切，那么，我告诉他的，将会是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事。我的孩子亚莉珊卓在苦痛中出生。日以继夜，她不断与我搏斗，我也一直与她奋战。就连在子宫中，她都是她父亲的孩子。我没有时间去爱她；我只知道，她是她父亲所造就的一个犹太小斗士。但是，将军，我却知道：照片上的人，既非葛利克曼的孩子，也非我的孩子。他们故意偷天换日，一方面是以为这个老女人很愿意上当，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可恨的诡计。”

她一写完，就把信装进信封，封好，不让自己再看一遍，免得改变心意。接着，她又仔细地贴上过多的邮票，数量之多，犹如她为爱人所点的蜡烛。

寄出信之后，接下来的整整两个礼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颇不寻常的，这样的沉寂对她竟是一种解脱。暴风雨之后必是宁静，她已经竭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她坦承了自己的脆弱，自己的背叛，与自己犯下的重罪——其余的，就交在上帝手中，与将军的手中。法国邮政服务的中断，并未令她忧心。她认为，这是塑造她命运的人所必须克服的另一项障碍，如果他们真的意志够坚定的话。她如常地去工作，背痛不再困扰她，她把这当成一个预兆。她甚至又让自己变得冷静达观。反正非此即彼，她想：亚莉珊卓在西方，固然比较好——如果那真的是亚莉珊卓的话，可如若亚莉珊卓留在原来的地方，也没有比较不好。然而，慢慢地，她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想法，看穿了这种乐观心态的谬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是最糟的情况，也是她认为可能性最高的情况，那就是，亚莉珊卓被利用来达成不祥甚或邪恶的目的；他们强迫她，正如他们以前强迫欧斯特拉柯娃一样，要她误用父亲葛利克曼所赋予她的仁慈与勇气。因此，在第十四天晚上，欧斯特拉柯娃不禁激动痛哭。泪流满面的她走过大半个巴黎，寻找一间还开着的教堂，一直走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教堂还开着。她跪下，对着圣约瑟夫祈祷好几个小时，因为圣约瑟夫不但是位父亲与守护者，也是葛利克曼命名的由来，虽然葛利克曼对此一定嗤之以鼻。就在她竭力寻求圣灵力量协助的隔天，她的

祈祷获得响应了。一封信出现了。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她曾以防万一地附上工作地点的地址。在她抵达时，已有一封信等着，很可能是在夜里专人送达的。这是一封简短的信，没有寄信人的名字，也没有地址。信中没有署名。就像她寄出的那封信一样，这信以矫揉造作的法文写就，手写的字迹显然出自独断的老人之手，她立即就知道这是将军的回信。

“夫人：“信一开始，就像一道命令，“你的信已安全抵达收信人手中。我们的一个朋友很快就会与你联络。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会带着信中所附的另半张风景明信片表明身份。在他到达之前，请别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会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到你的公寓，并按三次门铃。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请全然相信他，夫人，我们会尽可能地协助你。”

欧斯特拉柯娃除了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之外，也暗自从信中的戏剧性语调得到一些娱乐。信为何不直接送到她的公寓呢？她觉得很奇怪；为何只因为他给了半张英国风景明信片，我就要觉得比较安全？那是一张皮卡迪利圆环（伦敦市中心的繁华街区）的风景明信片，从对角线细心地撕开——不是剪开——成两半。应该写字的那面全是空白。

令她惊讶的是，将军派来的使者在当夜就来访。

如同信中所约定的，他按了三次门铃，但他应该知道她人在公寓中——他一定看着她进门，亮了灯——她听见信箱咔嚓一声，比平常的声音更响一些，等她走到门边，就看见半张风景明信片躺在门垫上——过去她渴望看见女儿亚莉珊卓来信时，不时查看的那个门垫。她拾起明信片，直奔卧房，她的那半张明信片夹在《圣经》中。没错，两相吻合，上帝站在她这边，圣约瑟夫代她求情。（但这又是多么没有必要的无聊想法，真是！）她打开门，他就从她身边溜进屋里，像个影子似的：一个小妖魔，身上领口镶有天鹅绒边的黑色大衣，让他散发出歌剧般的阴谋叛乱气息。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派了一个侏儒来捉巨人。他有弓形的眉毛，纹路深刻的面孔，在门口镜子前，他脱下帽子，露出尖尖的耳朵上方一头蓬乱的黑发，用他小巧的手掌略加梳理——如此鲜明且具喜剧感，如果是在其他场合，欧斯特拉柯娃一定会很无礼地对他畅怀大笑。

但今夜不行。

今夜，她立即感觉到，他有着异于寻常的严肃庄重。今夜，他仿佛刚下飞机的忙碌营业员；她也感觉到，他是城里的崭新面孔，他的干净整洁，他散发出的旅行气息——今夜，他只想谈生意。

“你安全地收到我的信了，夫人？”他的俄文流畅，带着爱沙尼亚腔。

“我以为那是将军的信。”她回答道，对他——她不由自主地——装出一种严厉的态度。

“是我替他带来的。”他严肃地回答。他把手伸进衣服的暗袋，欧斯

特拉柯娃很怕他会像那个陌生男子一样，掏出一本黑色皮面笔记本。但他拿出的是一张照片，一瞥就已足够：那苍白、闪着油光的面容，蔑视所有女人——不仅是她——的表情，一种心中渴望，却不敢真正动手的模样。

“没错，”她说，“这就是那个陌生人。”

看着他逐渐显现的喜悦之情，欧斯特拉柯娃立即明白，他就是葛利克曼和朋友所说的“我们的人”——不一定是犹太人，而是有心也有力的人。自此刻起，她在心中称他为“魔术师”。她想，他的口袋中一定装满聪明的把戏，他愉快的双眼中闪烁着魔术的光芒。

大半夜的时间，她都以为离开葛利克曼之后就不曾有过的热烈情绪，和魔术师谈话。首先，她把事情从头再说一遍，仔细回想，她不禁暗自吃惊，在信中她竟略去如此多的细节，而魔术师却好像都能真正了解。她对他说明她的感觉，她的悲泣，她内心可怕的骚动，她毫无保留地述说自己饱受痛苦煎熬。那个陌生男子显得如此笨拙——她继续述说，也怀疑——这像是他的第一次，她说——他既无谋略，也无自信。把魔鬼想成笨蛋，也太奇怪了吧！她谈到火腿蛋卷、薯条、亚尔萨斯啤酒和他的笑声；她觉得他是一个胆怯又压抑的危险人物——绝对不是讨女人喜欢的男人——矮小的魔术师对她大部分的看法，都由衷赞同，仿佛与那个姜色头发的男子早已熟识一般。她对魔术师全然信任，一如将军所嘱咐的；她对猜忌疑心已感到厌烦。她不断回想，不断诉说，真诚坦率。仿佛年轻时，在自己的家乡，她与欧斯特拉柯夫这对年轻恋人，以为再无机会相见的夜晚，彼此拥抱，在迫近的枪炮声中低声诉情衷；也仿佛她与葛利克曼在等着押他回监狱的敲门声响起时，吐露的真情。她对着他机警、谅解的眼神倾诉，对着他的笑声也对着他的苦楚倾诉，她立即感受到，他那种感同身受的苦楚，是他非东正教，甚至反社会天性中较好的一面。而且，在持续不断的诉说中，渐渐地，她的女人直觉告诉她，她正在助长他心中的一股热情——这次并非爱情，而是一种强烈、特殊的恨意，让他所问的每一个小问题，都别有深意。她并不知道，他恨的究竟是谁，或究竟是什么，但无论是谁引起了魔术师的怒火，不管是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她都不由得替他们感到担忧。她忆起葛利克曼的热情，那是一种对抗不公的广泛、无休无止的热情，随机投注在不同的议题上，范围可大可小。而魔术师的热情却是单一的火柱，聚焦在她无法看见的目标上。

但不管怎么样，魔术师离开的时候——我的天哪，她想，已经差不多是她要再去上班的时间了——欧斯特拉柯娃已诉尽心中的话，而魔术师回报她的则是唤起多年以来，直到今夜一直埋藏在过往回忆中的那种情感，对亚莉珊卓、对自己、对那两个去世的男人的复杂的情感。她一面整理杯盘瓶罐，一面失声大笑，嘲笑自己的妇人之愚。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她大声地说，自嘲地摇摇头。“我怎么找你？”她曾问他，“如果他又来找我，我怎么通知你？”

她不能，魔术师回答说。但如果有危机发生，她可以再写信给将军，但要写上他的英文名字，寄到另一个地址。“米勒先生。”他很慎重地说，以法文念出名字，并给她一张以大写字母写着伦敦地址的卡片。“但请小心，”他警告说，“你一定要写得迂回隐晦。”

这一整天，以及后来的许多天，魔术师告别时的身影一直在欧斯特拉柯娃脑海萦回不去，她不断忆起他从她身边溜过，走下昏暗的楼梯。他最后的一瞥，带着坚定与兴奋的炽热眼光：“我保证解救你，谢谢你找我帮忙。”他苍白的小手顺着楼梯的宽阔栏杆向下移动，恰似在火车窗外挥动的手帕，不断地告别，逐渐地缩小远去，直到消失在隧道的黑暗之中。

促成乔治·史迈利重出江湖的第二个事件，发生在第一个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也就是同一年的九月初，但不在巴黎，而是在汉堡，一个曾经是古老、自由的汉萨6一员，今日却因自身的繁华昌盛而几乎难以负荷的城市。但不容否认的，迄今仍无人抽干或以混凝土填塞的阿尔斯特湖7，在夏秋之交，金橙交错的湖滨景色之辉煌瑰丽，没有其他地方堪与匹敌。乔治·史迈利，毋庸赘言，当然看不见这慵懒的秋日丽景。在事情发生的这一天，史迈利正在圣詹姆斯广场的伦敦图书馆，坐在他惯常使用的书桌前，鼓起最坚定的信念，案牍劳形。从阅览室的窗棂向外望，有两棵细长的树。他可能会说，自己与汉堡的惟一关联——如果他事后试图建立关联性的话，但其实他并没这么做——在于探求德国巴洛克时期诗文的灵山泉源，因为当时他正在编写有关奥皮兹8的论文，并竭尽心力在那个时期繁冗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真正的热情。

那天，在汉堡，上午十一时许，通往湖堤的小道，布满落叶与斑驳的阳光。外阿尔斯特湖9如镜的湖面泛起一层薄雾，透过雾气望去，突起的东堤仿佛水平面上挥洒出的点点绿彩。沿着湖岸，许多红色松鼠穿梭跳跃，忙着为冬天作准备。但是，站在小道上，穿着运动服与慢跑鞋，看似无政府主义者的纤瘦年轻男子，目光与心思都未注意到这些松鼠。他眼眶泛红，凝视着逐渐驶近的汽船，两天未刮的胡子，让他毫无表情的面容更形黯淡。他左臂下夹着一份汉堡报纸，但任何一双如乔治·史迈利般富有洞察力的眼睛会立即察觉，那是昨天的报纸，不是今天的。他右手抓着一只蔺草购物篮，但购物篮好像还比较适合放在粗壮的欧斯特拉柯娃夫人手上，而不是这个柔弱、汗湿，看似随时会跳进湖里的运动者。篮子顶端露出了几颗柳橙的踪迹，一个印着英文的黄色柯达信封，躺在柳橙上方。小道别无人踪，水面的雾气更加深了他的孤独疏离。他身边只有汽船的时间表，和一张想必是躲过战火幸存下来的古老通告，告诉他如何在半溺水的状态下挽救生命。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只有将军的指示，他像祈祷般不断反复背诵。

汽船滑过岸边，年轻男子跳上船，恰似玩舞蹈游戏的孩子——一阵狂乱的脚步，然后静止不动，等待音乐再次响起。四十个小时以来，夜以继日，他一心一意，只想着这个时刻——现在。他一路开车，保持清醒盯住路面，眼底闪过妻子与女儿的影像，他想像着任何差错所可能造成的种种不幸后果。他知道自己有制造灾祸的天分。在停下来喝咖啡的空当，他把柳橙一次次重新装排进篮子里，不下十余次，把信封直放、侧放——不，这个角度比较好，这样比较合适，比较容易拿。接近市区边缘时，他开始搜集零钱，以便支付船费，不需找零——如果售票员抓住他，和他闲话家常，该怎么办？他该做的事这么多，而时间又这么短。他费心推敲过，他不会开口说任何一句德语。他会喃喃低语，面带微笑，满怀歉意，但保持沉默。或者也可以说他仅有的几句爱沙尼亚

语——在父亲坚持让他学俄文之前，深受路德教派熏陶的童年生活，还让他记住了一些《圣经》的词句。但现在，时间如此迫近，年轻男子突然觉察到这计划仍窒碍难行。如果其他的爱沙尼亚乘客来协助他，又会如何？汉堡这一个多种语言流通的城市，距东部仅几英里的距离，任何六个人聚在一起，都可能操好几种语言！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漠然以对。

我真希望自己刮过胡子。他希望自己看起来不要那么醒目。

走进汽船的主舱，年轻男子不看任何人。他低垂目光。避免目光接触，将军这样命令。售票员正和一位老妇人聊天，对他视而不见。他笨拙地等待着，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平静。船上有大约三十名乘客。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无论男女，都穿着绿色的大衣，戴着绿色的毡帽，也都对他颇不以为然。轮到他了。他伸出汗湿的手掌。一马克，一个五十芬尼，一把十分铜币。售票员自顾自地忙着，没说一句话。年轻男子笨手笨脚地在座位间摸索前进，走向船尾。码头渐渐远去。他们一定怀疑我是个恐怖分子，年轻男子想。他双手沾上了发动机油，我真希望洗掉。也许我脸上也有。一定要漠然，将军说。让你自己不受注意。别微笑，也别皱眉。让自己看起来平凡正常。他瞄了一眼手表，想让自己的行动维持缓慢。他事先已卷起左臂的袖口，特别是要让手表可以露出来。身材并不高大的年轻男子，低下身子，突然走到船尾的部分。因天气许可，船尾部分开敞，只张起天篷。这只是几秒之间的事，不是几天或几公里，甚至不是几小时，而是几秒钟。他手表的指针颤动着穿过六。等指针下一圈走到六时，你就行动。微风徐来，但他根本没注意。时间对他而言实在是很大的困扰。只要一兴奋——他自己知道——他就完全丧失时间感。他很怕等自己发现时，秒针早已绕过两圈，使一分钟变成两分钟。船尾的座位空无一人。他急急地冲到最后一排长椅，双手将装满柳橙的篮子揽在腹前，一面将报纸夹在腋下：这就是我，请看我的记号。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柳橙显然太过可疑了。一个没刮胡子、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会提着一篮柳橙，带着昨天的报纸呢？全船的人一定都注意到他了！“船长——那个年轻人——在那里，他是个炸弹客！他篮子里有一颗炸弹，他想挟持我们，或想炸沉这艘船！”一对伴侣手挽着手，背对着他，站在栏杆旁，凝望着湖面的水雾。那男人个子很小，比那女人还矮。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领口镶有天鹅绒边。他们对年轻男子视而不见。坐得越后面越好，而且要确定坐在走道旁，将军说。他坐下，暗自期盼自己的祷告能首次应验，不需任何的撤退行动。“贝琪，我是为你而做！”他暗自低语，想着女儿，回忆将军所说的话。尽管是路德教派的信徒，他仍在颈间戴了一个母亲送的木十字架，但被外套的拉链掩住了。为何要藏起十字架？这样上帝就不会亲眼目睹他的劣行？他不知道。他只希望能再开车上路，一直开一直开，直到他放弃，或安全抵家。

别看任何地方，他记得将军这样说。他哪里也不看，只盯着前方。你是被动的一方。你什么都不必做，只要提供机会。没有密码，什么都

没有，只有篮子、柳橙、黄色信封，和你腋下的报纸。我不赞同，他想。我让女儿，贝琪，身陷险境。丝黛拉绝对不会原谅我的。我会丧失我的国籍，我赌上了所有的一切。为我们的目标而做，将军说。将军，我不明白：这不是我的目标，而是你的目标，我父亲的目标。就因为这样，我把柳橙丢下船了。

但他没这么做。他把报纸丢在身边吱嘎作响的长椅上，发现报纸都已被汗水浸湿——他刚才夹着报纸的腋下也沾染上油墨。他看着表。秒针指向十。表停了！从上次看表到现在，只过了十五秒——根本不可能！他焦急地望向湖岸，确信汽船已驶到湖中央。他再次看表，看见秒针正滑过十一。笨蛋，他想，冷静下来。他倾身向右，假装看报，同时不断地盯着手表读秒。恐怖分子。就只有恐怖分子，他想，标题已读了第二十遍。毫无疑问，其他乘客一定认为我是其中的一员。这就是他们的大搜捕。他觉得很不可思议，自己竟记得这么多德文。为我们的目标而做。

装着柳橙的篮子，小心地靠在他的脚边。你站起来的时候，要把篮子放在椅子上，好占住位子，将军这样说。如果柳橙倒了出来，怎么办？在他的想像中，他看见柳橙在甲板上四处滚动，黄色信封混落其间，照片飘散一地，全是贝琪的照片。秒针跳过六。他站起来。现在。他的腹部一阵凉意。他拉下外套盖住腹部，却不经意地露出母亲的木十字架。他拉上拉链。悠闲漫步，别看任何地方，假装你是爱做梦的那种人，将军说。你父亲绝不会有片刻迟疑，将军说。你也不会。他小心翼翼地将篮子放在长椅上，用两手稳住，然后靠在椅背上，让篮子更加平稳。然后加以测试。至于《汉堡晚报》，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是该带走，还是留在椅子上？也许他接头的对象还没看到信号？他拿起报纸，夹在臂下。

他回到主舱。一对伴侣走向船尾部分，可能是要透口气，他们年龄较大，非常平静沉着。第一对伴侣洋溢着性感，即使从他们背后看来亦是如此——那小个子的男人，身材姣好的女子，还有他们两人的精心修饰。你知道他们两人有美妙的床第时光，只要看一眼就会知道。在他看来，第二对伴侣像是一对警察；年轻男子确信，他们的闺房一定毫无乐趣可言。我的心思飘到哪里去了？他疯狂地想。答案是飘向我的妻子，丝黛拉。飘向我们可能再也不会有的极至欢愉。他遵照指示，悠闲漫步，沿着通往密闭驾驶舱的走道前进。不看任何人并不难，所有的乘客都是背向他而坐。他走到最前面，容许乘客活动的范围到此为止。驾驶员坐在他的左方，一个高起的平台上。走近驾驶舱的窗边，称赞景观优美。留在那里，一分钟整。这里的舱顶较低；他必须弯下身子。透过挡风玻璃，林木与房舍不断移动。他看见一艘八人船划过，接着是一艘小艇，独坐一位金发美女。胸部浑似雕像，他想。为了看起来更加漫不经心，他把一只穿着慢跑鞋的脚撑在驾驶舱的平台上。给我一个女人吧，他热切地想着，在危机降临的时刻；给我我的丝黛拉，在清晨微曦中，慵懒、引人遐思的丝黛拉。他的左腕靠在栏杆上，手表依然在视线范围

内。

“我们不在这里清理靴子！”驾驶员咆哮道。

年轻男子急忙把脚放到甲板上。现在他知道我说德文，他想，觉得自己的脸因困窘而刺痛。但反正他们早知道了，他愚蠢地想，要不然我为什么会带着一份德文报纸？

时间到了。他再次直起身来，转头向座位走去。尽管心中仍牢记着不要看其他人的面孔，但却已失去效用，因为其他人正盯着他看，对他两天没刮的胡子、对他身上的运动服，以及他粗野的样貌不以为然。他的目光扫过一张面孔，又迎向另一张面孔。他想，他从来不曾碰到过这么多不怀善意的沉默人群。他的运动服又从腰腹裂开一条缝，露出一根黑色细线。丝黛拉洗得太用力了，他想。他再次拉下外套，大步踏向船尾，木十字架仿佛勋章一般在他胸前垂动。在他跨步前进时，有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在长椅上，篮子旁边，他看见自己所等待着的黄色粉笔记号，画过两条椅板，如金丝雀般明亮，告诉他，递交过程已顺利完成。一看见这幅景象，他心中立即涌起了一股荣耀的感觉，他知道这在他一生中是无可比拟的时刻，比任何女人所能给他的满足感更加完美。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他曾问将军；为何必须如此精心安排？

因为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将军回答说，这是无可匹敌的宝藏，失去这个宝藏将是自由世界的悲剧。

而他选择了我，来担任信差，年轻男子觉得非常骄傲，尽管在内心深处，他仍觉得老人做得有点过分。他平静地拿起信封，丢进外套口袋，拉起拉链，还用手指按压，确定拉链都已密合。

几乎就在同一刻，他察觉到有人正注视着自己。站在栏杆边的女子仍然背对着他，他再次注意到她非常美丽的臀部与腿。但她那位穿着黑色大衣的性感同伴，却已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那人脸上的表情，让年轻男子才刚体验到的美好感受都烟消云散了。他只看过一次像这样的表情，那是在抵达英国的几个月之后，他父亲在他们的第一个英国新家——位于赖斯利普10的一个房间——临终时的表情。他从未在任何人身上看过如此绝望、如此深沉严肃、如此欠缺保护的表情，从来没有。更令人心生警觉的是，他知道——正如欧斯特拉柯娃也了解的——这种不顾一切的神气与这人外型气质形成强烈对比，因为这人的外型有着喜剧演员的气质——或者，如欧斯特拉柯娃所认为的，有着魔术师的气质。因此，这小个子、尖脸的陌生男子富有深意的眼神，带着热切的恳求——“孩子，你不知道你带着的是什么！用你的生命去保护它吧！”——这是喜剧演员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

汽船停了下来。他们已抵达对岸。年轻男子紧紧抓住篮子，跳上岸，几乎跑着穿过喧闹的购物人群，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却根本不知道这些街道会通到什么地方。

开车返程的途中，方向盘不断敲击着手臂，发动机声在耳边轰隆作

响，年轻男子在眼前潮湿的道路上看见那张面孔，经过这么多小时之后，他不禁怀疑，自己在递交过程中涌起的千情万绪，是否全然出于想像。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真正的接触是由完全不同的人所完成的，他这样想，试着自我宽慰。可能是那群头戴绿毡帽的老妇人之一，甚至可能是那个售票员。我太神经紧张了，他告诉自己。在那关键的时刻，一个不知名的男子转身，看着我，我就在他身上编出了整部的故事，甚至还想像他是我死去的父亲。

抵达多佛11时，他已几乎相信自己将那名男子的身影赶出脑海了。他把那些该死的柳橙丢进垃圾箱；黄色信封舒适地躺在他外套的口袋里，尖锐的一角刺着他的皮肤，就只有这样。那么，他推论出他的共犯了吗？忘了他们吧。更何况，就算纯属巧合，他碰巧猜对了，对方就是那个表情空洞、目光炽烈的男子——那又如何？拿这个问题去向将军嚼舌，绝对是不智之举，因为如此一来，在关切安全问题的将军眼中，年轻男子无异是怀抱炽烈热情的幻想家。对丝黛拉的思念，成为他最迫切的渴望。在嘈杂不已的路程中，随着里程数的增加，他的欲望也愈强烈。这时还是清晨。他想像着她在自己的爱抚中苏醒；他看见她睡意迷蒙的微笑，慢慢地转化成热情。

就在这晚，史迈利接获了重出江湖的召唤。说来奇怪，虽然在这老年时期，他根本就睡不安稳，但他还是让床边的电话响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了起来。他从图书馆直接回家，然后很不舒服地在国王街上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还带了一本《欧雷瑞尔斯游记》¹²作为护身符。他回到位于水滨街的住所，继续写论文的工作，专心致志的程度，正是那个没其他事可做的男人所能投注的心力。几个小时之后，他开了一瓶勃艮第红酒，喝掉半瓶，听着收音机播送的一出拙劣戏剧。然后，打起瞌睡，和纷乱喧扰的梦境搏斗。但是，在他听到拉康声音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硬生生地从一个温暖的珍贵秘境被拉出来，那是一个他希望能永远停驻、不受干扰的地方！同时，尽管他很快地行动，却仍觉得自己好像花了很长的时间着装；他在想，这是否就是老人听见死亡消息时的反应。

“您认识他，对不对，先生？”刑事督察长以恭敬的语气，尽量压低声音问，“或者，我不该追问。”

这两人待在一起已十五分钟了，但这是督察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似乎没听见问话，但他的沉默并非出于防卫心理，而是他有静默的天性。更何况，一起检视尸体的两人之间，存在着情谊。此时距日出尚有一小时，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13，是烟雨迷蒙、人踪绝迹的时刻，既不温暖也不寒冷，伦敦市区的灯光在天边渲染出橙色的光彩，树木仿佛披上防水布般闪闪生辉。他俩并肩站在长满山毛榉的林阴道上，督察长高史迈利一个头，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一头少年白的灰白头发，或许有些傲慢，但巨人般的温柔亲切，却很自然地让他显现出乐于助人的友善。史迈利短胖的双手交叠在腹前，神似站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的市长，眼睛直盯着在督察长手电筒灯光照射下，躺在他脚边的那具尸体。走这么长的一段路显然让他气喘吁吁，因为他盯着尸体时还不住大呼几口气。从他们周遭的一片漆黑中，传来警方通话器在暗夜空气中的嘈杂通讯声。别无其他灯光，督察长命令他们熄灭灯火。

“他只是我曾一起工作过的人。”史迈利沉默许久之后解释道。

“据我了解也是如此，先生。”督察长说。

他满怀希望地等着更多答案，但史迈利没再多说一句话。“甚至别和他说话，”副局长（犯罪与执行部门）告诉他，“你从来没见过他，还有其他两个家伙。只给他看他想看的，然后就把他忘了。快。”及至此时，督察长完全遵照指示办理。依照他自己的估计，他行动的速度可比光速。摄影师已拍完照，医生已证实无生命迹象，病理学家已在现场检验过尸体，为接下来的验尸工作揭开序幕——速度之快，迥异于平常的步调，这一切只是为了替非正规军（这是犯罪与执行助理副局长喜欢用来称呼他的称号）的来访铺路。非正规军抵达现场——像个抄表员般拘谨有礼，督察长注意到——督察长带着他以慢跑的速度巡行一周。他们查看脚印，追寻老人的踪迹，直到此处。督察长重建犯罪现场，在此情况下竭尽所能。督察长是个很能干的人。现在，他们站在一个凹处，正当林阴大道转弯之处，也是飘腾的雨雾最稀薄之处。在手电筒灯光的照耀下，尸体是周遭一切的中心点。尸体面朝下躺着，双臂张开如鹰展翅，仿佛被以十字形钉在沙砾地上一一般，而塑料布更强调了它的了无生气。这是一具老人的尸体，但胸膛宽阔，是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身躯。一头白发剪得很短。强壮、布满青筋的手仍抓着一根稳固的手杖。他身披黑色大衣，脚穿橡胶套鞋。一顶黑色贝雷帽掉落身边，头部的沙砾混杂血迹，凝结成黑色。四周散落着一些零钱，一条手帕和一把看起来像是纪念品而不像工具的小刀。很可能他们一开始时打算搜他的身，但后来放弃了，先生，督察长这样说。他们很可能遇到阻碍，史迈利先生。但史迈利想知道的却是，碰触一具你刚开枪射杀、体温犹存的尸

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他的脸呢，督察长先生？”史迈利说。

这回反倒是督察长觉得迟疑了。“噢，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先生？”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丝困窘，“如果要指认他，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你知道的。”

“没错，没错，我很确定。”史迈利郑重地说，仿佛他已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了一番。

督察长朝林木的方向轻声叫唤，他的手下都在那里，站在熄了灯光的车辆之间，蓄势待发。

“你，霍尔，派克警官，跑步过来，把他翻过身来。”

快，副局长（犯罪与执行部门）如是说。

两个人影从暗处现身。年纪较长的那个留着黑色胡子。他们手上长及肘部的外科手术手套，闪着鬼魅的灰光。他们穿着蓝色的罩袍，长及大腿的胶靴。留着胡子的那人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拉开塑料布，较年轻的那个警员则将手放在死者的肩头，仿佛要叫醒他似的。

“你们得用力一点，小伙子。”督察长以更明快的声调警告说。

年轻的警员用力一扳，留胡子的巡官助他一臂之力，尸体勉强地翻身朝上，一条手臂僵硬地挥动一下，另一只手仍抓着手杖。

“噢，老天哪，”巡佐说，“真是血淋淋！”——他用一手掩住嘴巴。警官抓住他的手肘，把他拖走。他们听见作呕的声音。

“我不碰政治，”督察长目光停驻在地上，突如其来地对史迈利吐露心声，“我不碰政治，也不碰政治人物。依我之见，他们大多是公认的疯子。这也是我为什么加入警界的原因，坦白说。”在他的手电筒灯光照射下，浓雾奇异地盘旋缭绕。“你不会刚好知道这是什么吧，是不是，先生？十五年来，我从没看过像这样的伤口。”

“弹道学恐怕并不是我的专长。”史迈利停顿了一会儿，略加思索之后回答。

“不，我并不期望您是，对不对？看够了吗，先生？”

史迈利显然还没看够。

“大部分人都会希望射中胸口，是不是，先生？”督察长伶俐地说。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扯闲谈有时可以缓和气氛。“整洁的圆形子弹会钻出一个干净利落的洞口。这是大部分人所期望的。受害者会缓缓曲膝倒下，还配合圣歌的节奏。电视上都这么演，我猜。其实，现在的子弹可以射掉一条手臂或一条腿，我那些突击队员朋友也这样说。”他的声调变得较实事求是，“他还是有留髭须吧，先生？我的巡佐觉得很奇怪，在他的上颚有些白胡须。”

“军人的髭须。”史迈利沉默一会儿才回答，他以大拇指和食指在自

己的上唇比出形状，但目光仍凝视着那老人的尸体。“我在想，督察长，我是否可以查看他口袋里的东西，可能吗？”

“派克警官！”

“长官！”

“把塑料布盖回去，告诉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在厢型车里帮我准备好他口袋里的东西，也就是他们保留的那些。跑步。”督察长出于习惯地加上一句。

“长官！”

“过来。”督察长轻轻地拉住巡官的上臂，“你告诉年轻的霍尔警员，我没办法让他不吐，但我不想听他那些对上帝的敬词。”在自己的领地里，督察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不怕人知道。“这边请，史迈利先生，请。”他又恢复了较温和的语调。

他们往上走到林阴大道的较高处，嘈杂的无线电声渐渐隐没，代之而来的是白头鸦忿然盘旋的声音与城市的怒吼。督察长顺着绳索围起区域的左侧，精神抖擞地走着。史迈利加快脚步，跟随他前进。一辆没有窗户的厢型车停在林阴间，后门敞开，车里亮着幽微的灯光。他们进了车，坐在硬条椅上。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头发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装。他拿出一只像是透明枕头套的塑料袋。塑料袋顶端打了个结，他动手打开。里面，装满了更多的小袋子。莫戈特洛依德先生逐一掏出，督察长先用手电筒查看卷标，再交给史迈利去研究。

“一个磨损的皮制零钱盒，欧陆货。在他外套的左侧口袋，一半在衣袋里，一半露在外面。你看见零钱散落在尸体旁边——七十二便士。他身上就只有这么多钱。他还是会带皮夹吧，是不是，先生？”

“我不知道。”

“我们猜想，他们拿走了皮夹，从钱包下手，然后跑了。一串家里和其他用途的钥匙，在右裤袋……”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但史迈利仍毫不松懈地仔细查看。有些人会演出记忆，督察长注意到史迈利的专心，不禁想着，其他人则是拥有记忆。在督察长的清册中，记忆是智能较优越的部分，他将之推崇为所有心智成就中的最高境界；而史迈利，他知道，就拥有这样的成就。“一张派丁顿区图书馆借书证，名字是V.米勒，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在大衣左口袋。一张外国人居留证，号码已登录，名字也是瓦拉狄米尔·米勒。一罐药片，在大衣左口袋。这药是做什么用的，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吗？药名是‘速斯塔克’，不管是什么，一天服用两次或三次？”

“心脏。”史迈利说。

“还有一张收据，总金额是十三英镑，北区伊斯林顿的快稳出租车服务。”

“我可以看一下吗？”史迈利说，督察长把收据递到他面前，让他可

以看见上面的日期和司机的签名，J.兰伯，在复写纸上草草写就的字迹。

下一个袋子，是一截学校用的粉笔，黄色，而且奇迹似的并未粉碎。较细的一端仿佛画过一笔，沾染上棕色，但较粗的一端则无使用过的痕迹。

“他的左手也有黄色的粉笔灰。”莫戈特洛依德先生说，这是他首度开口。他外表像块灰色岩石，连声音都是灰色的，哀悼的口吻神似殡葬业者。“我们想知道，他是不是教书的，真的。”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加上一句，但史迈利不知是出于故意，或根本没注意，并未回答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含蓄的问话，而督察长也没追问。

接着，是第二条棉质手帕，这回是莫戈特洛依德先生拿出来的。半染血迹，半仍干净的手帕，仔细熨烫成平整的三角形，放在上装的饰巾口袋里。

“他是不是正要去参加宴会，我们猜想。”莫戈特洛依德先生说，这次他完全不抱期望。

“犯罪与执行部门在线上，长官。”声音从厢型车前座传来。

督察长未发一语地消失在黑暗中，留下史迈利面对莫戈特洛依德先生消沉的凝视目光。

“您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吧，先生？”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哀伤地仔细观察来客良久之后，开口问道。

“不，不是，恐怕并不是。”史迈利说。

“内政部吗，先生？”

“唉，也不是内政部。”史迈利一面说着，一面和善地摇摇头，让他看起来与莫戈特洛依德先生的不知所措有些相同味道。

“我的上司很担心媒体，史迈利先生。”督察长把头探进厢型车，说，“他们好像已经上路了，先生。”

史迈利迅速地爬出车子，两人在林荫大道上面对面站着。

“你真的太仁慈了，”史迈利说，“谢谢你。”

“荣幸之至。”督察长说。

“你该不会刚好记得，粉笔是放在哪一个口袋里的吧？”史迈利问。

“大衣的左口袋。”督察长有些惊讶地回答。

“那么，对他的搜身——你能否再次告诉我，你们的看法究竟是如何？”

“他们没有时间，或者不想把他翻过来。他们跪在他身边，搜寻他的皮夹，抽出他的钱包。散落了一些东西，正如我们在现场所见。但他们已拿到足够的东西了。”

“谢谢你。”史迈利再次道谢。

片刻之后，他轻快地消失在树林间，肥胖的体型显然并未限制他行动的速度。警察长扬起手电筒，照亮史迈利的全脸。他迟至此时才这么做，完全是审慎衡量之后的结果。对这位传奇人物以专业眼光热烈地一瞥，只为了年老时可以告诉儿孙：特务头子、当时已退休的乔治·史迈利，如何在某一夜现身林间，检视一具死状甚惨、曾是他手下的外国人的尸体。

事实上，那根本不是单独的一张脸，警察长回想。在手电筒由下往上，间接的照明下，你看见的并不是一张单独的面孔，而更接近于各式各样的脸孔。更接近于各种不同年龄、不同人、不同努力的组合，甚至——警察长想——是不同信仰的组合。

“我所见过最好的。”不久以前，曾经是警察长上司的老孟德尔，几杯酒下肚之后这样对他说。孟德尔现在已退休了，和史迈利一样。但孟德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他不喜欢特务，和警察长不相上下——他们大多是装腔作势的外行人，只会误入歧途。但史迈利并非如此。史迈利不一样，孟德尔说。史迈利是佼佼者，是孟德尔所曾见过最好的一个，而且，老孟德尔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一座大修道院，警察长最后认为。这就是他，一座大修道院。下一次，在他的时机来临时，他就会在任务中表现出这样的精神。一座大修道院，融合各种冲突、年代、风格与信念。警察长越深入思考，就越喜欢自己的这个比喻。回家之后，他要先试验一下，说给妻子听：人就像上帝的建筑，亲爱的，在岁月手中脱胎换骨，随着自己的努力与变化，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但就在此时，警察长伸出了自制的手，终止了自己辞藻华丽的想像。也许并非如此，他想，毕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儿好高骛远了，亲爱的朋友。

另外还有一件事，同样令警察长难以忘怀。稍后，他对老孟德尔提及此事，当时他还和老孟德尔谈到许多事。濡湿。他一开始并没有认为那是露水——因为如果是露水，为何警察长自己的脸上滴水未沾？那不是露水，也不是哀伤，如果他的预感正确的话。这是偶尔曾发生在警察长身上，也偶尔会发生在小伙子（即使是最强悍的小伙子）身上的情况，它会悄悄地袭上他们，警察长像只老鹰般地留心这种事。但这通常都是因为跟孩子有关的案子，没来由、无预警地穿透你的心——儿童虐待、暴力攻击、幼儿性侵害。你不会崩溃、捶胸顿足或做出其他戏剧化的举动。不会。你只会在无意间抚着脸时，发现脸已濡湿，而你会质疑，基督究竟为了什么见鬼的原因而死，如果他真的曾死去的话。

当你出现了这种情绪时，警察长也有些毛骨悚然地告诉自己，你最好是放自己几天假，带妻子到马尔盖特14，否则，在你真正弄清楚情况之前，你就会发现自己言行暴躁，极难相处。

“警官！”警察长大声吼叫。

留着胡须的警官随即出现在他面前。

“打亮灯，恢复原状。”督察长命令道，“请哈洛斯督察到上面来负责执行。跑步！”

他们解下锁链，开门让他进去，他们问他话，甚至在接过他的外套之前就已开始，简洁但热切。尸体上有任何遗留的蛛丝马迹吗，乔治？任何可以把他和我们扯上关系的东西？天哪，你已经碰过一次了！他们告诉他到哪里去清洗，竟忘了他其实早已知道。他们让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史迈利谦逊地坐着，似乎已被遗弃。此时，奥立佛·拉康，白厅15情报部门的首席行政官，正在陈旧磨损的地毯上来回踱步，像是出于良心不安而走动不休；劳德·斯屈克兰则把相同的一句话，以十五种不同的方式，对十五个不同的人说：“把我接回警方联络渠道，女人，马上！”——他时而恫吓，时而奉承，端视对方的阶级而定。督察长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但事实上，才刚过了十分钟。这层闻起来有陈旧酒味与腐坏香烟味的公寓，位于一幢雕饰漩涡状花纹的爱德华时代公寓顶楼，离汉普斯特德石南园不到两百码。在史迈利心中，瓦拉狄米尔碎裂的脸，与活着的这些人的苍白面容混在一起。然而，此刻死亡并不让他震惊，而只是让他确信，自己的生命也正在流逝，他正与情势奋战。他毫无期待地坐着，像个坐在乡间火车站的老人，看着特快列车呼啸而过。一直就只是坐看快车飞驰，怀想古老的旅程。

危机总是这样，他想，一群乌合之众谈话毫无重心。一个在打电话，一个死了，还有一个不停踱步。神经紧张，却又行动迟缓，无所事事。

他环顾四周，想让自己的心智停驻在身边正步向衰微的事物上。破损的灭火器，公共工程部的事。破了洞的棕色沙发——污渍让情况更糟。但安全公寓，永远不死，不像老将军们，他想。甚至也不慢慢凋零16。

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情报员待客的笨重器具，专门用以唤醒了无生气的客人。史迈利拿起存货。一桶融化了的冰。一瓶斯托利奇纳雅伏特加17，瓦拉狄米尔登记在案的最爱品牌。盐渍鲱鱼，仍封在罐头里。腌黄瓜，散装买来，已干燥。还有一条不可或缺的黑面包，就史迈利所知，几乎每一个苏联老男孩喝伏特加时，都不能缺少此物。两只马克与史宾塞连锁百货的伏特加酒杯，可能是干净的。一包苏联香烟，尚未开封；如果他来到这里，必会抽上许多根；但他死时却一无所有。

瓦拉狄米尔死时一无所有，他再次对自己说，但却出于心理因素吞吞吐吐，像他手帕上的一个死结。

一阵噼里啪啦声打断了史迈利的冥想。厨房里，男孩莫斯汀打碎了一个盘子。正在打电话的劳德·斯屈克兰转过身来，要求安静。但他早已重获安静。莫斯汀到底在准备什么？晚餐？早餐？葬礼的香菜籽饼？而莫斯汀又是什么人？莫斯汀是谁？史迈利曾握过他潮湿、颤抖的手，但却很快就忘记他的长相，只知道他很年轻。然而，不知为什么，他记得

莫斯汀，尽管只记得他大概的类型。莫斯汀是我们的苦恼，他没来由地想。

踱着步的拉康突然停下脚步。

“乔治，你看起来很烦恼。别担心。我们完全没有嫌疑。我们所有人！”

“我并不担心，奥立佛。”

“你看起来像在自责，我看得出来！”

“当情报员去世——”史迈利说，但没把整句话说完，而拉康也没有等他。他又开始走动，像有长路要走的徒步旅人。拉康，斯屈克兰，莫斯汀，在斯屈克兰如雷贯耳的爱尔兰土腔声中，史迈利想着。一个内阁办公室的听差，一个圆场协调人，一个恐惧的男孩。为何不是真正的人物？为何不是瓦拉狄米尔项目官员，无论他是谁？为何不是索尔·恩德比，他们的首脑？

他在莫斯汀这个年纪所读过的一首奥登18的诗，突然在他心里响起：“如果可以，让我们称颂至尊无上之人；虽然我们重视的是平凡之辈。”或其他什么的。

而且，为何是史迈利？他想。最重要的是，为何是我？在这么多人之中，而且就所有相关的人看来，我比老瓦拉狄米尔更无生气。

“您要茶吗，史迈利先生？还是要烈一点的东西？”莫斯汀透过开着的厨房门廊叫道。史迈利觉得很怀疑，他是天生就这样苍白吗？

“他只要茶，谢谢你，莫斯汀！”拉康猛然转身，突然开口，“受惊之后，喝茶比较安全。加糖，对不对，乔治？糖可以补充流失的能量。会不会很可怕，乔治？那真是遭透了，够你受的。”

不，那并不糟糕，而是事实，史迈利想。他被枪打中，我看见他死了。或许你也该这么去瞧瞧。

拉康显然无法弃史迈利于不顾，因此走到房间的这一头，以聪慧、难以理解的眼光瞧着他。他是个令人感伤的人物，行动迅速却缺乏活力，年轻的容貌残酷地老去，衬衫领子在他脖子的皮肤上磨出一圈不健康的粗糙皮疹。在日出微曦、充满宗教色彩的光线里，他的黑色背心与白色衣领，闪耀着如神父长袍般的光泽。

“我几乎还来不及说声嗨呢，”拉康抱怨道，好像是史迈利的错，“乔治，老朋友。我的天啊！”

“你好，奥立佛。”史迈利说。

拉康仍站在那里，目光朝下瞧着他，他的头侧向一边，像个正观察昆虫的孩童。史迈利在记忆中回放两个小时前拉康那个急迫的电话。

“事出紧急，乔治。你记得瓦拉狄米尔吗？乔治，你醒了吗？你记得老将军吗，乔治？以前住在巴黎的？”

对，我记得将军，他回答说，对，奥立佛，我记得瓦拉狄米尔。

我们需要了解他过去的人，乔治。一个了解他那些龌龊事的人，去指认他，以免有丑闻发生。我们需要你，乔治。现在，乔治，醒醒。

他努力要清醒过来。他将听筒换到听力较佳的一只耳朵上，在对他而言有些过大的床上坐起身来。他的身子横过被妻子抛弃的寂冷空间，因为电话在床的那一侧。

你是说，他被枪击了？史迈利复述一次。

乔治，你为何不听呢？被枪打死了。今天晚上。乔治，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快醒过来，我们需要你！

拉康又开始踱步，一面用力拉扯着他的图章戒指，好像戒指太紧似的。我需要你，史迈利想，望着他来回打转。我爱你，我恨你，我需要你。千金散尽，或情爱耗尽的安恩，说出的这些犹如天启的宣言，依然在他心中。这个句子的重心是主语，他想。不是动词，更不会是受词。那是自我，需要满足。

需要我做什么？他再度想着。安慰他们？给他们赦免？他们做了什么，需要以我的过去弥补他们的未来？

房间的另一头，劳德·斯屈克兰举起一只手，一面行了个法西斯式的敬礼，一面与当局对话。

“是，长官，他现在和我们在一起，长官……我会告诉他，长官……的确，长官……我会转告他这个消息……是的，长官……”

为何苏格兰人对神秘世界如此着迷？史迈利觉得很奇怪，在职业生涯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船舶轮机员、殖民地行政官、间谍……苏格兰的异教历史，驱使他们寻找远方的教堂，他这么想。

“乔治！”斯屈克兰突然大声叫唤史迈利的名字，仿佛下达命令：“索尔长官要向你表达个人最诚挚的问候，乔治！”他转过身，手仍举着，“在较安静的时刻，他会更適切地向你表达感激之意。”又回头打电话，“是的，长官，奥立佛·拉康也和我在一起，而他在内政部的同等官员此刻正和警察局长协商，讨论我们过去对死者的兴趣，并准备对新闻媒体发出D通告19。”

过去的兴趣，史迈利暗自记下。我们过去对他感兴趣，但他脸孔碎裂，口袋里没有香烟。黄色粉笔。史迈利以坦率的眼光打量斯屈克兰：可怕的绿色西装，刷制成麂皮式样的猪皮皮鞋。史迈利看到他身上惟一的改变是一道红褐色髭须，但不像瓦拉狄米尔生前的那种军人胡须。

“是的，长官，‘纯粹只具历史性的陈年旧案’，长官。”斯屈克兰继续对着电话说。是陈年旧案没错，史迈利想。陈年旧案，灰飞烟灭，他加上一句。“这真是了不起的用词。”斯屈克兰说，“奥立佛·拉康提议在D通告的文字中加上这一句。我说的对吧，奥立佛？”

“只关乎历史，”拉康气急败坏地纠正他，“不是具历史性，是关乎历

史。这是我们最不需要的！历史！”他大步穿过房间，假装望着窗外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天。

“现在还是恩德比负责，是吗，奥立佛？”史迈利在拉康背后问道。

“对，没错，还是恩德比，你的老对手，而且他可神了。”拉康很不耐烦地回嘴。他把窗帘扯离轨道。“不是你的风格，我承认——但他干吗要有你的风格？他是大西洋岸的人。”他使劲想打开窗扉。“要在这样的政府底下做事，可真不容易，我可以告诉你。”他又用力敲了把手一记。一阵寒风爬上史迈利的膝头。“要花许多脚力。莫斯汀，茶呢？我们好像要永远不停地等。”

一辈子，史迈利想。

在货车吱吱嘎嘎爬上山坡的声音中，他又听见了斯屈克兰的声音，永无止境地与索尔·恩德比对话：“我认为处理媒体的重点是，别把他贬得太低了，长官。模模糊糊最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私人生活的角度也是危险的，就此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完全和现在没有关联，任何关联都没有。噢，真的，真的，的确，长官，对——”他平板单调的声音谄媚奉承，但仍充满警觉。

“奥立佛——”史迈利已失去耐性，开口说。

但拉康正在说话，而非聆听：“安恩还好吧？”他站在窗边，前臂伸直在窗台上，含糊地问，“和你的相处，诸如此类，我相信？不会彷徨徘徊吧，她？天哪，我真恨秋天。”

“很好，谢谢你。那么——”他努力回想拉康妻子的名字，却没成功。

“遗弃我了，该死。和她那个讨人厌的骑术教练跑了，畜生！把孩子留给我。女孩就都交给寄宿学校，感谢上帝。”拉康双手撑住窗台，仰望逐渐明亮的天空。“猎户座是不是在那里？像在烟囱顶管间粘了一颗高尔夫球似的。”他问。

又是另一桩死亡事件，史迈利悲伤地想，他的心瞬间留驻在拉康破碎的婚姻上。他记得一位美丽脱俗的女子和好几个女儿，在他们位于阿斯科特20那幢有宽阔房舍的庭园中，骑着小马的景象。

“我很遗憾，奥立佛。”他说。

“你有什么好遗憾的？又不是你老婆。她是我老婆。男人只会为自己的爱感到遗憾。”

“你可以关上窗户吗，拜托！”斯屈克兰一面说，一面还拨着号，“真是冷死了！”

拉康心不甘情不愿地关上窗，又踱回房里。

史迈利再试一次。“奥立佛，到底怎么回事？”他问，“你们为什么需要我？”

“只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认识他。斯屈克兰，你快好了没？他真像机场的广播员，”他露出愚蠢的笑容，对史迈利说，“永远没完没了。”

你可以打断啊，拉康，史迈利想，他注意到拉康在灯光下的双眸，有着疏离的神情。你已经做得太多了，他突然同情地想。我们都是。

神秘的莫斯汀从厨房端出茶来：一个热诚、外表时髦的男孩，穿着花哨的长裤，有一头浓密棕发。看着他放下托盘，史迈利终于在自己的过往记忆中找到他的踪影。安恩以前曾有过一个像他一样的情人，一个出身威尔斯科技学院、预备担任神职的人。她助他走下凡俗，后来却又说只是为了让他不致成为同性恋。

“你在哪个部门，莫斯汀？”史迈利平静地问他。

“后勤组，长官。”他弯下腰，与桌面齐平，放上一壶亚洲货。“事实上是从您的时代就开始了，长官。这是一种执行部门。主要是等待外派海外的见习生。”

“我懂了。”

“我在沙拉特的训练所听过您的课。新生训练的课程。‘干员实务操作’。那是那两年里最棒的一门课。”

“谢谢你。”

但莫斯汀稚嫩的眼光仍热切地凝望着他。

“谢谢你。”史迈利又说了一次，但比之前更困惑。

“牛奶，长官，或柠檬，长官？柠檬是给他的。”莫斯汀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仿佛在推荐柠檬似的。斯屈克兰挂掉电话，拉扯着长裤的腰带，不知道是弄松还是弄紧些。

“没错，好了，我们得稍微调整一下事实，乔治！”拉康突然大声吼叫，仿佛宣扬自己的信仰一般，“有时候有些人根本是无辜的，但情况让他们看起来又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只有中庸这条黄金法则。我们必须记住。用粉笔写在我们刮胡子的镜子上。”

用黄色粉笔，史迈利想。

斯屈克兰摇摇摆摆地走过房间：“你，莫斯汀，年轻的奈吉尔。你，先生。”

莫斯汀抬起他棕色的眼睛作为响应。

“无论如何，千万别对媒体承认任何事。”斯屈克兰边警告他边用手背抹着唇上的髭须，好像髭须湿了似的。“听到我说的了吗？这是高层的命令。没有过任何接触，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填写一般的接触报表或其他任何东西。你没什么要做的，除了闭紧你的嘴。了解吗？你要把你的费用列入普通的零用费支出。对我负责，直接的。没有档案资料。了解吗？”

“我了解。”莫斯汀说。

“还有，别对登记处那些小媳妇掏心掏肺地咬耳朵，否则我一定会知道。听到了吗？给我一些茶。”

听到这段对话时，史迈利心中涌起了一些波涛。不是因为这些对话所隐含的欺骗意味，不是因为石南园中骇人的场景，而只是一桩惊人的事实令他惊骇不已。他觉得胸口一紧，而且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和这个房间，还有出没在这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抽离开来。接触？莫斯汀与瓦拉狄米尔的接触？老天爷啊，他想，努力弄清楚这疯狂的念头。上帝保护、宠爱、关照我们。莫斯汀是瓦拉狄米尔的项目官员！那个老头子，将军，曾经是我们的荣耀，他们竟把他交给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他心中的惊骇已转化成怒火，不禁又是一阵踉跄，比之前更为猛烈。他觉得自己的双唇颤抖，他觉得自己的喉咙被莫大的屈辱紧紧锁住，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当他转向拉康时，他的眼镜似乎已因心中的怒火而蒙上一层烟雾。

“奥立佛，我在想，你能不能好心地告诉我，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他听见自己第三次提出问题，几乎是喃喃自语。

他伸出手，把伏特加瓶移出桶子。仍然没人招呼，他打开瓶盖，给自己倒了大大的一杯。

即使到了此时，战栗、沉思、目光巡狩的拉康，仍迟迟未语。在拉康的世界，直言不讳的问题是最最糟糕的品位，但直言不讳的回答更等而下之。有那么一会儿，拉康定定地站在房间中央，带着怀疑的眼光瞧着史迈利。一辆汽车摇摇晃晃地开上山坡，带进了窗外真实世界的信息。斯屈克兰喝着他的茶。莫斯汀小心翼翼地坐在钢琴椅上，虽然这里并没有钢琴。但维持着可笑姿势的拉康，仍只能努力搜寻足够简略的字句，来掩饰自己的意图。

“乔治。”他说。骤雨打在窗上，但他毫不在意。“莫斯汀呢？”他问。

才刚坐下的莫斯汀，又飞快地掠过房间，去应付焦急的需求。他们听见奔腾的雨声，宏亮如铜管乐团，整幢建筑的水管都哗啦作响。

拉康举起一手，摸着颈部粗糙的皮疹。他极不情愿地开口：“三年前，乔治——让我们从头说起——在你离开圆场不久之后——你的接班人索尔·恩德比——你杰出的接班人——受到内阁关切的压力——我指的是最近才形成的关切——决定对情报工作进行某些范围广泛的变革。我是在向你说明背景，乔治。”他突然改变话题，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过往的年代，因为——”他伸出手指戳着窗户，“因为这一切。”

斯屈克兰解开腰带，躺下打盹，像夜航班机上的头等舱旅客般心满意足。但他那双充满警戒的小眼睛，仍紧紧跟随着拉康的每一个动作。门打开又关上，莫斯汀走了进来，重新在钢琴椅上落座。

“莫斯汀，我希望你关上耳朵，不要听。我要讲的是最重大、最重大

的政策。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其中一项，乔治，就是决定设立一个跨部会的指导委员会。一个混合委员会——”他用手在空中写出字来，“一部分是西敏寺（英国国会）的人，一部分是白厅的人，代表内阁以及白厅的那些家伙。通称为‘贤士’。但地位——乔治——地位介于情报机构与内阁之间。作为一种渠道，扮演过滤器的角色，煞车的角色。”他一手仍前伸，洗牌似的说出这些比喻，“凌驾于圆场之上，执行控制，乔治。为了符合更开放的政府利益，负起监督的责任。你不会喜欢的。我可以当着你的面这样说。”

“我已经离开了。”史迈利说，“我没有资格评断。”

突然之间，拉康脸上出现了不寒而栗的表情，音调低落至几近绝望。

“你应该听他们怎么说，乔治，我们那些新主子们。你应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我们圆场的！我是随便他们差遣的手下，该死，我知道！每天都这样。嘲弄，怀疑，不信任，每次都一样，甚至那些应该比较了解情况的部会官员也是如此。好像我们圆场是超乎他们理解范围的流浪野兽。好像英国情报单位是完全隶属于保守党的分支机构。完全不是他们的盟友，而是他们社会主义巢穴中不受控制的毒蛇。三十年代又卷土重来。你知道吗，他们甚至重新倡议要以美国模式制定英国信息自由法案。从内阁内部开始。听证会，揭密，都只为了供大众消遣娱乐。你会很吃惊的，乔治。很痛苦。想想看，这种事光在道德上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媒体上听到这类恶名昭彰的劣行之后，莫斯汀还会加入圆场吗？你会吗，莫斯汀？”

这个问题似乎对莫斯汀打击甚深，因为他那双严肃的眼睛，黯淡的颜色更加深重，显得愈益严肃。他举起拇指与食指，贴在唇上。但未发一语。

“我讲到哪里了，乔治？”拉康问，突然有些失神。

“贤士。”史迈利同情地说。

劳德·斯屈克兰从沙发上丢出评论：“贤士？还我的芬妮姑妈呢！一群油腔滑调的左翼商人。替我们支配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的本行。如果我们没照着做分内的事，就鞭打我们。”

拉康责难地瞪了他一眼，但没出声驳斥。

“贤士较不引起争议的一项职权，乔治——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我们的主子们特别赋予他们的——铭记在附带的征召授权书中——是盘点存货。检查圆场在全球各地的资源，配置在合法的当前目标下。别问我在他们眼中什么叫做合法的当前目标。这是非常具争议性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不应该不忠诚。”他回到正题，“别的不提，就只说六个月的评估期限一到，削减人力的大斧就如期开铡。”他停了下来，盯着史迈利，“你还在听我说吗，乔治？”他的声音有些疑惑。

但是，此时实在难以断定史迈利到底有没有听任何人说话。他沉重

的眼睑几乎已闭上，双眼惟一可见的部分，也已被眼镜上的厚重镜片遮蔽。他仍坐得直挺，但却低垂着头，沉重的下巴直抵胸前。

拉康又迟疑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现在，开铡的结果——或盘点存货，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说法的话——在我们的贤士看来——某些类型的秘密行动，事实上根本是超出权限。被禁止的，对吧？”

平躺在沙发上的斯屈克兰，念咒似的吐出一串拗口字句：“不准策反。不准设陷阱。不准用双面间谍。不准引诱叛逃。不要流亡团体。什么家伙都不要。”

“这是什么？”史迈利仿佛从深沉的睡梦中猛然惊醒问道。但是，这种直截了当的对话非拉康所喜欢，因此他听而不闻。

“不要过度简化，拜托，劳德。让我们探讨事情的根源。概念的思考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贤士们拟定了一套准则，乔治。”他继续对史迈利说，“列举了所有禁止从事的行为，对吧？”但史迈利与其说是正在聆听，毋宁说是正在等待。“所有的范围都包括在内——干员的利用与滥用，我们在英联邦国家的钓鱼权——或不具此权——各形各色。监听，海外监视，嫁祸行动21——这是庞大的任务，勇敢的行动。”拉康手指交缠，双掌朝下，毫不在意地把关节弄出喀啦声响，这让其他人有些不自在。

他继续说：“他们的禁止清单上还有别的——这是赤裸裸的手段，乔治，毫不尊重传统——例如行之多年的双面间谍的运用。执迷，我们的新主子在他们的判决书里这样说。还有策反的老把戏——策动我们敌人的情报人员转投阵营。在你那个年代，是反情报工作的无上乐趣；今天，乔治，贤士们共同的想法——今天，这个做法应该淘汰不用。不符合经济。全盘否决！”

另一辆货车轰隆隆地开下山丘，也或许是上山。他们听见车轮驶过路边石的颠簸声。

“老天！”斯屈克兰喃喃低语。

“或者——例如——我随便再举个例子好了——对流亡团体的过度重视。”

这次，没有货车的轰隆声；只有车迹远去之后，留下的深沉、责难似的寂静。史迈利坐姿未改，只聆听，不评断。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拉康身上，以盲人般的敏锐听觉凝神倾听。

“流亡团体，你会想要知道的。”拉康继续说，“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圆场与他们由来已久的关系——贤士们喜欢称之为依赖，但我觉得这个措词稍嫌强烈——我曾和他们争论，但没有用——在今天，被看成是挑拨、反低荡22、煽风点火。太过昂贵的沉溺行为。凡是干预他们这么做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被驱逐离开。我是说真的，乔治。我们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他们的统治权无远弗届。想想看。”

拉康张开手臂，仿佛要阻挡史迈利攻击他胸部似的。他仍站着，俯视着史迈利，但背景里传来斯屈克兰的苏格兰腔，更不留情地述说同样的事实。

“那些团体被丢进垃圾桶了，乔治。”斯屈克兰说，“许多都是。高层下的命令。不准接触，连走近一臂的距离都不行。已故的瓦拉狄米尔那些从容就义的艺术家的档案，特别装上双重锁，除非有头子手写的同意书，否则没有任何官员可以进入。每周抄录，送交贤士检查。乱世啊，乔治。我可以告诉你实话，乱世啊。”

“乔治，请镇静。”拉康不安地提醒，他捕捉到了其他人所没听见的一句话。

“真是荒谬！”史迈利郑重其事地再说一遍。

他抬起头，目光凝注在拉康身上，仿佛要强调他的反驳有多直率。“瓦拉狄米尔并不昂贵。他也不是沉溺于此。更不能说他不合经济。你很清楚，他讨厌拿我们的钱。我们必须强迫他拿，否则他就会饿死。至于煽风点火——反调和，无论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没错，我们偶尔牵制他一下，就像我们对大部分优秀情报员做的一样，但每次有情况发生，他都像绵羊一样乖乖听从我们的指示。你很迷他，奥立佛。你和我一样清楚他的价值。”

平静的声调无法掩藏史迈利的责难意味。而拉康也没忽视他脸颊上的颜色变化。

突然间，拉康转向在场最弱势的成员。“莫斯汀，我希望你忘掉这一切。听到了吗？斯屈克兰，告诉他。”

斯屈克兰干脆利落地照办：“莫斯汀，今天早上十点三十分整，你必须到家务管理处，签署一份我亲自撰写、见证的信条奉行证明！”

“是的，长官。”莫斯汀怯畏地略一迟疑后说。

此时，拉康才响应史迈利的重点：“乔治，我很敬佩这个人，但不是他的组织。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人，没错，在许多方面，是个英雄人物，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但与他为伍的那些人并不是，只是一些空想家，落魄的王公贵族。莫斯科中央的那些渗透人员对他们根本没兴趣。从来都没有兴趣。贤士的确指出了重点，你无法否认。”

史迈利拿下眼镜，用领带宽的一端擦拭着。在透过窗帘照进室内的朦胧光线中，他丰满的脸显得湿润，毫无防备。

“瓦拉狄米尔是我们所曾有过的最优秀的情报员之一。”史迈利毫不掩饰地说。

“因为他是你的人，你指的是？”斯屈克兰在史迈利背后嘲讽地说。

“因为他很优秀！”史迈利高声怒斥，四周顿时惊骇沉默，但他瞬即恢复冷静。“瓦拉狄米尔的父亲是爱沙尼亚人，热情的布尔什维克信徒，奥立佛。他的忠诚，换来的斯大林的回报，却是在整肃中被谋杀。瓦拉

狄米尔出生时名叫沃尔德玛，后来出于对莫斯科和革命的效忠，才改成瓦拉狄米尔。虽然他们对他父亲痛下毒手，他仍然想要相信他们。他加入红军，在上帝的眷顾下躲过整肃。战争让他获得晋升，他像狮子一样奋战，战争结束后，他等待着自己梦想已久的伟大解放，让自己的同胞重获自由。但这个梦想始终没有降临。相反的，他亲眼看到家乡被自己服务的政府无情蹂躏。数以万计的爱沙尼亚同胞被送进集中营，其中还包括他自己的亲戚。”拉康张开嘴，想打断他的话，但又明智地闭上。“走运的人逃到瑞典和德国。我们说的是一百万个质朴、勤奋的人民，被摧残殆尽。一晚，陷入绝望的他为我们提供服务。我们，英国。在莫斯科。往后三年，他一直在首都的核心为我们从事情报工作。为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每一天。”

“而且，不必说，当然是我们这位乔治负责他。”斯屈克兰咆哮道，他仍认为这个不争的事实已让史迈利失去抗辩的资格。但史迈利不会因此而停步。年轻的莫斯汀站着，听得入迷。

“我们甚至还颁奖章给他，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奥立佛。不能戴，也不能持有，当然。但在某个地方，记载在某张羊皮纸上，他偶尔可以获得去看一眼，而且上面的签名，非常像元首。”

“乔治，这都是历史，”拉康无力地反驳，“不是现在。”

“漫长的三年里，瓦拉狄米尔是我们最好的情报来源，让我们了解苏联的能力和意图——在冷战的高峰期。他非常接近他们的情报圈，也可以接触到他们的报告。然后，有一天，他趁着到巴黎出差，掌握机会，投奔自由。感谢上帝，还好他这么做了，否则他会在更早以前就死在枪口下。”

拉康突然有些失神。“你说什么？”他问，“什么更早以前？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后来圆场被莫斯科中央情报员掌控住了。”史迈利极有耐心地说，“真是幸运，瓦拉狄米尔为我们工作的那段时间，比尔·海顿正好派驻国外。要是再过三个月，比尔就会把他整得很惨。”

拉康无言以对，所以斯屈克兰替他回答。

“比尔·海顿这样，比尔·海顿那样，”他嘲讽说，“就因为你和他有其他的纠葛——”他正要继续往下说，但考虑之后却改变心意。“海顿已经死了，该死！”他沉着脸下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瓦拉狄米尔也一样。”史迈利平静地说，他开口之前，再次略显迟疑。

“乔治，”拉康严肃地说，仿佛太晚找到祈祷书中的页数，“我们是务实主义者，乔治。我们适应了。我们不是什么圣火的传递者。我请求你，我命令你，记住这一点！”

平静但坚决的史迈利，还没讲述完瓦拉狄米尔的生平事迹，而且他

也感觉到，这是他惟一想做的事。

“而当他出来之后，很好，他就成了贬值的资产，像所有的前情报员一样。”他继续说。

“就是这样。”斯屈克兰轻声说。

“他留在巴黎，全心全意地推动波罗的海独立运动。没错，这是注定要失败的运动。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英国拒绝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的合法性——但也不太在乎。爱沙尼亚，你可能不知道，奥立佛，在女皇大道上还保有非常体面的公使馆和总领事馆。很显然，这些注定要失败的运动一旦完全失败，我们也不再给予支持。但事前可就不同了。”他深呼一口气，“好啦，他在巴黎成立了波罗的海组织，这个组织开始走下坡路，就像所有的流亡团体与注定失败的运动一样——让我继续，奥立佛，我不常这么啰嗦。”

“我亲爱的伙伴，”拉康脸红地说，“随你高兴。”制止了斯屈克兰的再次咆哮。

“他的组织分裂，有一些纷争。瓦拉狄米尔很性急，想把所有的党派都纳入旗下。每一个党派都有各自的盘算，并不同意。后来发生了一场斗殴，有些人打破了头，因此法国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境。我们把他和他的几个军官安置到伦敦。晚年的瓦拉狄米尔又归正回祖先的基督教信仰，从马克思主义的救世主改信耶稣基督。我们应该也鼓励这么做，我相信。或者，这已经不再是政策了。现在，他被谋杀了。因为我们要讨论背景，所以这就是瓦拉狄米尔。那么，我又为什么在这里？”

门铃恰在此时响起，精准无比。拉康脸色仍泛着红晕，史迈利呼吸沉重，再次擦拭着眼镜。莫斯汀毕恭毕敬地当起跑腿，打开门，领进一个骑摩托车来的信差，高个子的信差戴着手套，拎着一串钥匙。莫斯汀毕恭毕敬地将钥匙交给斯屈克兰，斯屈克兰签收了之后，登载到工作日志里。信差对着史迈利凝视良久，然后离开，让史迈利觉得有些罪恶感，因为即使在这一身行头下，自己也应该能认出他来。但史迈利有更迫切的事要担心。斯屈克兰毫无恭敬之意地将钥匙放进拉康张开的手掌里。

“好吧，莫斯汀，告诉他吧！”拉康突然高声说，“你自己来告诉他吧！”

莫斯汀沉静异常地坐着。他静静地说。为了听他说，拉康退到角落，双手交聚在鼻下。斯屈克兰则坐得直挺，似乎——和莫斯汀自己一样——在提防男孩犯下言词错误。

“今天午餐时间，瓦拉狄米尔打电话给圆场长官。”莫斯汀开始述说，但他所指的“长官”究竟是谁，则不甚清楚。“我正好是后勤组的值班官，所以接了电话。”

斯屈克兰很不悦地匆促纠正他：“你说的应该是昨天。要精确，知道吗？”

“对不起，长官。昨天。”莫斯汀说。

“很好，要正确。”斯屈克兰警告说。

身为后勤组值班官，莫斯汀解释说，必须在午餐时间留守，并且在下班时间检查桌面与垃圾箱。后勤组的人员太过资浅，不能值夜班，因此值班只有午餐时间与傍晚。

而瓦拉狄米尔，他复述说，在午餐时间透过生命线取得联络。

“生命线？”史迈利非常迷惑地说，“我想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生命线是我们与已故情报员联系的一套系统。”莫斯汀说，他随即把手指放在太阳穴上，囁嚅说，“我的天哪，”他接着说，“我指的是已不再从事任务，但仍列在福利名册中的情报员，长官。”莫斯汀快快不乐地说。

“所以他打了电话，是你接的。”史迈利和善地说，“那是几点钟？”

“一点十五分，长官。后勤组有些像舰队街（伦敦报业街）的编辑部，你知道。有十二张桌子，组长的那张在房间的尽头，有一道玻璃隔屏和我们隔开。生命线放在一个上了锁的箱子里，通常由组长保管钥匙。但在午餐时间，他会交给值班的家伙。我开了锁，听到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说：‘你好’。”

“继续说吧，莫斯汀。”斯屈克兰咆哮说。

“我回了一句‘你好’，史迈利先生，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不给号码。他说：‘这是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非常紧急的事要找他。请马上帮我接麦斯。’我问他是从哪里打来的，这是例行程序，但他只说他已改变甚多。我们没有追踪来电的训令，而且，那毕竟太花时间了。生命线旁边有一部电动卡片选择器，收录所有的工作人员化名。我请他稍候一下，输入‘葛利戈里’。这是我们问过他们从哪里打电话来之后，下一个动作。选择器上出现资料：‘葛利戈里等于瓦拉狄米尔，前情报员，前苏联将军，前里加集团领导人。’接着是档案参考。我输入‘麦斯’，就找到你了，长官。”史迈利微微点头。“‘麦斯等于史迈利’。接着我输入‘里加

集团’，才知道你是他们的最后一位主教，长官。”

“他们的主教？”拉康仿佛发现了异端言论，“史迈利是他们的主教，莫斯汀？这到底是——”

“我以为你已经听过事发经过了，奥立佛。”史迈利打断他的话说。

“只听了要点。”拉康反驳说，“面临危机时，我们只需要掌握要点。”

斯屈克兰眼光盯住莫斯汀，以沉重的苏格兰腔对拉康提出解释：“像集团这样的组织，在传统上都有两个项目官员。一个是邮差，替他们处理些琐碎纷争。而主教则超脱于争斗之上，等于是他们的教父。”他说，一面敷衍似的对史迈利点点头。

“依据卡片上的登记，谁是他的最后一位邮差，莫斯汀？”史迈利问，完全无视斯屈克兰的举措。

“伊斯特哈斯，长官。化名是赫克特。”

“而他没要求找他？”史迈利直接问莫斯汀，再次跳过斯屈克兰。

“什么，长官？”

“瓦拉狄米尔没要求找赫克特？他的邮差？他要求找我。麦斯。只有麦斯。你确定吗？”

“他只要求找你，没找其他人，长官。”莫斯汀认真地说。

“你做了记录吗？”

“生命线会自动录音，长官。同时也联结一个闹钟，因此我们也可以得知正确的时间。”

“你真该死，莫斯汀，这是机密。”斯屈克兰猛然怒骂，“史迈利先生以前或许是极为重要的成员，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位了。”

“那么，你接下来怎么做，莫斯汀？”史迈利问。

“标准作业指令给我的权限很少，长官。”莫斯汀答道，就像史迈利一样，他故意对斯屈克兰视而不见。“‘史迈利’和‘伊斯特哈斯’都列在延缓名单上，意思就是说，必须通过五楼才能联络他们。我的组长出去吃饭，一直要到两点十五分才回来。”他轻轻耸肩，“我进退两难。我告诉他，两点半再打来。”

史迈利转头对着斯屈克兰：“我记得你刚才说，所有流亡团体的档案都交付特别保管？”

“正确。”

“选择器的卡片上不是应该特别注明这一点吗？”

“是应该注明，但却没有。”斯屈克兰说。

“问题就在这里，长官。”莫斯汀颇表赞同地对史迈利说，“在这个阶

段，我们无从得知瓦拉狄米尔，或他的集团已列入机密。从卡片看来，他就像其他领退休金的情报员，想筹措资金。我以为他想要一些钱，或同伴，或什么的。我们碰到许多这样的情况。把他留给组长，我这样想。”

“别提名字，莫斯汀，”斯屈克兰说，“记住。”

此时，史迈利突然想到，莫斯汀的谨慎自抑——在他陈述时，一直有着某种危险秘密的不快气息，挥之不去——或许与保护某位不小心的上司有关。但莫斯汀的下一句话，解答了他的疑惑。他在言词中暗示，错在他的主管。

“问题是，我的组长去吃午饭，一直到三点十五分才回来。所以，两点三十分，瓦拉狄米尔又打电话来时，我必须再次挂掉他的电话。他很生气。”莫斯汀说，“我的意思是，瓦拉狄米尔很生气。我问他，其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他说：‘找麦斯来。只要给我找麦斯来。告诉麦斯，我和某些特定的朋友有接触，同时也通过邻居的朋友。’卡片上登记了许多他所用的密语，我看见‘邻居’代表苏联情报局。”

史迈利脸上浮现中国人般的平静神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消逝无踪。

“你在三点十五分，把一切都向你的组长报告？”

“是的，长官。”

“你播录音带给他听吗？”

“他没有时间听。”莫斯汀无情地说，“他要离开去度周末。”

莫斯汀倔强不屈地一语带过，让斯屈克兰觉得自己有义务加以补充。

“是啊，好了，那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乔治，莫斯汀的组长就大出洋相了，毫无疑问的。”斯屈克兰轻快地说，“他没有送出瓦拉狄米尔的报告——当然，这已经不会有下一次了。他没有熟记处理流亡团体的标准作业程序。而且，他显然抵挡不了周末狂欢的诱惑，没有按照规定交待行踪。周一早上，得靠上帝帮他了，我敢说。噢，没错。来吧，莫斯汀，我们等着呢，孩子。”

莫斯汀顺从地接续故事：“三点四十三分，瓦拉狄米尔打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电话，长官。”他说，声调比之前更为缓慢。他应该在三点四十五分打来，但他迫不及待地提前了两分钟。当时，莫斯汀已经向组长作过概略的报告，他把经过说给史迈利听：“他说这是无聊的工作。如果有的话，我应该去找出那个老头子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别的办法都行不通，就和他订个约会，让他冷静下来。我应该给他一杯酒，让他坐下来，拍拍他的背，除了带回他的口信之外，什么都别答应。”

“那么‘邻居’呢？”史迈利问，“你的组长不觉得这很重要吗？”

“他宁可认为那只是情报员的惺惺作戏。”

“我知道了，没错，我看得出他这么想。”但他的眼睛，却很矛盾地完全闭上了一会儿，“那么，你与瓦拉狄米尔的第三次对话，讲了些什么？”

“瓦拉狄米尔说，如果不能立即见面，就一切免谈。我依照作业准则，想提供他一些其他的选择——‘写信来——你想要的是钱吗？当然可以等到礼拜一。’但他在电话里对我大声叫嚣。‘不见面就免谈。今晚，否则免谈。莫斯科规则。我坚持莫斯科规则。把这个告诉麦斯——’”

莫斯汀突然住口，抬起头，一眨也不眨的眼睛迎向斯屈克兰充满敌意的目光。

“把什么告诉麦斯？”史迈利问，目光在他们身上流转。

“我们讲的是法文，长官。卡片上说法文是他喜欢用的第二种语言，而且我的俄文程度只得了个B。”

“毫不相干！”斯屈克兰怒斥。

“把什么告诉麦斯？”史迈利坚持地问。

莫斯汀的眼睛搜寻着离脚一两码处的地板污渍。“他说的是：‘告诉麦斯，我坚持这是莫斯科规则。’”

这段时间里，异于寻常、一直沉默不语的拉康，此刻出声附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乔治。圆场并不是提出请求的一方。他才是。这个前任情报员，是他强逼蛮索，是他造成所有的后果。如果他肯接受我们的建议，写出他的情报，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自己守口如瓶。乔治，我请你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斯屈克兰给自己重新点了一根烟。

“反正，在要命的汉普斯特德，又有谁会听过什么莫斯科规则？”斯屈克兰问，火柴在他手里摇晃着。

“汉普斯特德倒真是了了命。”史迈利平静地说。

“莫斯汀，快把故事说完。”拉康面红耳赤地命令道。

他们定了一个时间，莫斯汀面无表情地继续述说，他盯着左手掌，仿佛想看自己手相上的运势：“十点二十分，长官。”

他们同意遵照莫斯科规则，他说，以及一般的接触程序。莫斯汀在当天下午已预先查阅过后勤组的接触索引。

“接触程序到底是什么？”史迈利问。

“老套的会晤，长官。”莫斯汀回答说，“重复沙拉特训练课程的那一套，长官。”

史迈利突然觉得，莫斯汀尊敬万分的亲密感，排山倒海而来。他不希望自己成为这孩子的英雄，也不希望自己在乎他的声音，他的凝望，他的那声“长官”。他还没准备好要接受这陌生男孩令人窒息的崇拜。

“汉普斯特德石南园有一座锡架凉亭，离东海斯街约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可以俯视林阴大道南侧的竞赛场，长官。安全记号是一根新的图钉，插在你进园之后左侧的第一棵树。”

“相对记号呢？”史迈利问。

但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一截黄色粉笔。”莫斯汀说，“我知道从很久以来，这类集团就用黄色当注册商标。”他用了收场的声调。“我放上图钉，回到这里等候。他没出现，我就想：‘好吧，如果他真的守密到极点，我只好再上去一趟，查看他的相对记号，然后我就会知道他是不是在附近，接着可以尝试提出撤退计划。’”

“那是什么？”

“十一点四十分，会有一辆车在靠近瑞士农庄的隐秘处接人，长官。我正打算出去看看，斯屈克兰先生就已打完电话，命令我好好坐在这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史迈利以为他已讲完，但事实并非如此。莫斯汀似乎遗忘了其他人的存在，摇着他长相英俊的头。“我从没见过他。”他惊讶地说，“他是我的第一位情报员，我却没见到他。我不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他说，“我的第一位情报员，而他死了。真是难以相信。我觉得自己真像约拿23。”讲完话之后，他的头仍不住摇着。

拉康神采奕奕地加以补充：“对，没错，苏格兰场最近已有计算机，乔治。石南园的巡逻员发现尸体，封锁那个区域，而当名字输进计算机时，有个灯亮了，或有些数字的什么东西显示了，总之，他们立刻知道他在我们的观察名单上。然后他们就像发条一样按部就班运作。局长打电话给内政部，内政部打电话给圆场——”

“然后你打电话给我。”史迈利说，“为什么，奥立佛？谁建议你把我拖下水的？”

“乔治，这有关系吗？”

“恩德比？”

“如果你坚持的话，是的，是索尔·恩德比。乔治，听我说。”

终于，拉康上场了。他们面对重大的问题，无论问题的本质如何，即使尚未真正定义好，至少也已划定界线了。莫斯汀已被遗忘。拉康很有自信地面对坐着的史迈利，表现出老朋友的姿态。

“乔治，以目前的态势而言，我可以在贤士们面前说：‘我已经调查过，圆场和这件事无关。’我可以这样说：‘圆场没给这些人或他们的领导人任何鼓励。一整年来，他们没付钱给他，也没给他任何福利！’这绝对是实情。他们没拥有他的公寓、他的车，他们没帮他付租金，教育他的私生子，送花给他的女人，也没与他或他的同类有任何其他的旧牵绊——可悲的旧关系。他的惟一关联属于过去。他的项目官员已永远离开岗位了——你自己与伊斯特哈斯，都是老人，都已除名了。我可以郑重

发誓。对贤士们，如果需要，也可以对部长本人这样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史迈利故作迟钝地说，“瓦拉狄米尔曾经是我们的情报员。他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我们的前情报员，乔治。我们又怎么知道他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给他任何指示。他提到紧急事故，甚至苏联情报部——许多前情报员需要补助时都会这样说！”

“瓦拉狄米尔不会。”史迈利说。

但是，诡辩是拉康的天性。他生而善辩，他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翱翔自在，悠游自如，白厅没人胜得过他。

“乔治，我们的前情报员，深夜走在伦敦日益危险的公共区域，招致危险，我们无法对他们每一个人负责呀。”他请求似的张开手，“乔治，想想后果吧。作个选择，你来选。一方面，瓦拉狄米尔要求和你聊聊。退休的伙伴——聊聊往事——有何不可？而且，为了筹措资金，就像我们任何人一样，他假装要提供给你一些东西。一些贵重的情报。有何不可？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长会支持我们的。没有人会被点名，没有人会暴跳如雷，内阁也不会歇斯底里。他会帮我们把这个案子给淹了。当然不是要文过饰非。但他会运用他的判断力。如果正好碰上他心情不错，他或许还会决定这个案子根本不需要烦劳贤士。”

“阿门。”斯屈克兰回道。

“至于另一方面，”拉康使足说服力，挥军进击，“如果事情没那么轻易解决，乔治，部长会想，我们有一些未获授权的行动宣告失败，而为了湮灭行迹，必须将他的优秀官员拖下水——”他又开始踱步，绕过想像中的泥淖。“那么就会是一桩丑闻，乔治，而圆场难辞其咎——你过去服务的单位，现在仍深爱的单位，我确信——直到现在还与恶名昭彰的复国流亡团体牵扯不清，那些反复无常、口舌生非、暴力反和平的团体，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偏执狂，纯粹是冷战高峰时期的残留物，而这正是主子们要我们敬而远之的一切东西。”他又走到角落里，略微偏离灯光照亮的范围。“而且有一桩死亡事件，乔治，一个有意图掩饰的行为——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这样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肆渲染，那么，这就会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丑闻。我们的单位还是个虚弱的孩子，乔治，一个生着病的孩子，而且现在交在这些异常娇弱的新人手里。在这个重生的阶段，极可能因普通感冒就致命。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你们这一代人逃不过谴责。你有责任，就像所有人一样。忠诚不渝。”

对什么事情的责任？史迈利不禁怀疑，心中有着旁观者似的态度。对什么人的忠诚？“没有背叛，就没有忠诚。”年轻时，每当他鼓起勇气抗议安恩的出轨时，安恩总是这样说。

顷刻之间，没有人说话。

“凶器呢？”最后，史迈利以测试某种理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看法如何，奥立佛？”

“什么凶器？那里没有凶器。他被射杀。下手的很可能是他自己的伙伴，因为他知道他们的阴谋。更别提他对其他人妻子的垂涎。”

“没错，他被射杀。”史迈利同意道，“正面射击。在非常接近的距离。用的是软头子弹。在他身上草草搜索。拿走了他的皮夹。这是警方的调查判断。但我们的分析可能完全不同，对不对，劳德？”

“门都没有。”斯屈克兰说，透过香烟云雾对他怒目相视。

“我倒是有。”

“那么，说来听听，乔治。”拉康潇洒地说。

“用来杀瓦拉狄米尔的凶器是标准的莫斯科中央暗杀工具。”史迈利说，“隐藏在照相机、手提箱，或其他东西里。软头子弹是以水平射程射出。用来除掉、惩罚或阻止其他人。如果我记得没错，在沙拉特，酒吧隔壁的黑色博物馆里就展示了一个。”

“现在还在，很恐怖。”莫斯汀说。

斯屈克兰狠狠地瞪了莫斯汀一眼。

“但是，乔治！”拉康叫道。

史迈利等着，他知道在这种情绪之下，拉康可以对着大笨钟（英国国会大厦上的共鸣钟）指天誓地。

“这些人——这些移民——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是其中之一——他们难道不是从苏联来的吗？他们有一半不都与莫斯科中央有接触——无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像这样的武器——当然我并不是说你是对的——像这样的武器，在他们的世界里，就像起子一样普遍。”

反对愚行，诸神奋战，徒劳无功，史迈利想，但席勒24却遗忘了官僚。拉康正对着斯屈克兰说：“劳德，媒体的D通告问题还没解决。”这是命令，“也许你该再盯他们一下，看到底进展如何。”

斯屈克兰着袜没穿鞋，顺从地走到房间的另一端，拨了一个号码。

“莫斯汀，也许你该把这些东西弄进厨房。我们可不希望留下一些不必要的痕迹，对不对？”

莫斯汀也退下之后，只剩史迈利与拉康独处。

“这是个是非题，乔治。”拉康说，“我们还有清理的工作要做。我们要给上门的零售商一个交代，我知道什么？邮件，牛奶，朋友。这类人所拥有的东西。没人像你这么了解这个过程。没有人。警方已经给你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不会故意拖延，但会仔细查阅特定的程序准则，照章行事。”拉康焦急地跳到史迈利椅边，笨拙地在扶手上坐下。“乔治，你是他们的主教。好吧，我是在请求你去找出解答。他要的是你，乔治，不是我们，是你。”

斯屈克兰从电话的位置打断拉康的话：“他们需要有人签发D通告，奥立佛。他们要你签字，如果对你来说没差别的话。”

“为什么不是头儿签字？”拉康留神地追问。

“可能是觉得你的签名比较不引人注目吧，我想。”

“叫他等一下。”拉康边说边以风车的姿势，将拳头伸进口袋，“我可以给你钥匙，乔治？”他把钥匙拿在史迈利面前摇晃。“条件交换，好吗？”钥匙仍在晃动，史迈利盯着钥匙，或许问了：“什么条件？”也许只是盯着。他根本没有交谈的心情。他的心思停驻在莫斯汀身上，在没吸到的香烟，在有关“邻居”的电话，在不知长相的情报员，在睡眠上。拉康正一一细数，在每一句话前面都加上一个大条件。“第一，你是一个平民百姓，瓦拉狄米尔的遗嘱执行人，不是我们的人。第二，你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依据这个原则行事。神智健全的过去。你会平息风波，而不是兴风作浪。你会压抑自己对他的专业兴趣，很自然地，为了我们的缘故。在这些条件之下，我可以给你钥匙，要？不要？”

莫斯汀站在厨房的门口，对着拉康说话，但他热切的眼光却一直注视着史迈利。

“到底是什么，莫斯汀？”拉康追问，“快点！”

“我刚刚才想起来，瓦拉狄米尔卡片上的注记，长官。他有个太太在塔林。我在想，是不是应该通知她。我只是想，我最好提一下。”

“卡片的资料已不正确。”史迈利迎向莫斯汀的眼光说，“他叛逃时，妻子和他住在莫斯科，后来被逮捕，送进劳改营。她死在劳改营里。”

“史迈利先生必须做他认为这种情况下适合的事。”拉康很快地说，深恐有新问题发生，把钥匙塞进史迈利的手掌心。突然之间，所有的事物都开始运转。史迈利站起身来，拉康已走向房间另一端，斯屈克兰把电话递给他。莫斯汀溜进阴暗的廊道，从衣架上取下史迈利的风衣。

“瓦拉狄米尔在电话上还跟你说了什么，莫斯汀？”史迈利平心静气地问，一面把手套进袖子里。

“他说：‘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25的事。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或许他就会见我。’他说了两遍。这段话在录音带上，但斯屈克兰洗掉了。”

“你懂瓦拉狄米尔的意思吗？小声一点。”

“不懂，长官。”

“卡片上没有？”

“没有，长官。”

“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史迈利问，很快地朝斯屈克兰和拉康的方向轻点了个头。

“我想斯屈克兰可能知道，我不确定。”

“瓦拉狄米尔真的没找伊斯特哈斯？”

“没有，长官。”

拉康讲完电话。斯屈克兰接过话筒，继续打电话。看见史迈利站在门边，拉康快步走过来。

“乔治！干得好！再会吧！听着，我要另外再找时间和你谈谈婚姻。开诚布公地讨论。我指望你告诉我婚姻的艺术，乔治！”

“好啊，我们要再聚聚。”史迈利说。

低头往下看，他看见拉康握着他的手。

这场会面犹有后文，怪异的发展打乱了原先的阴谋布局。标准的圆场作业人员都被要求在安全公寓中装设隐藏式麦克风。情报员在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要求，尽管他们并未被告知，尽管他们的项目官员一直都在做笔记。为了与瓦拉狄米尔会晤，莫斯汀很尽责地打开系统，等候老人来到，但在后续的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没有人想到要关掉麦克风。录音带依例行程序送到缮写部门，忠实地抄缮数份，送交圆场的多位阅读者手中。那位倒霉的后勤部部长拿到一份，秘书处拿到一份，人事、执行与财政处的处长也都各拿到一份。一直到有一份抄本放进了劳德·斯屈克兰的收文夹里，整件事才爆发开来，而这些无辜的收文者，也受尽胁迫之能事，誓言守密。录音带非常完美，录下了拉康永不停歇的脚步声，伴着斯屈克兰的轻声吟唱，有些还颇猥亵。只有莫斯汀在门廊慌慌张张的告白，逃过录音。

至于莫斯汀本人，在这个事件中并未继续扮演任何角色。几个月后，他自动辞职，那些日子以来的人员耗损率，着实令每个人都极为担忧。

史迈利缓缓步出安全公寓，走进汉普斯特德早晨的清新空气中，迎接他的朦胧光线，此刻也正迎着欧斯特拉柯娃，只是巴黎的秋色更深一重，仅有几片树叶旧抹布似的仍挂在筱悬木上。与史迈利一样，她一夜未得安稳。天未亮就起床，仔细着衣。这个早晨看来更冷了，她考虑着是否该拿出冬靴，因为仓库里湿气极重，让她的腿很吃不消。她犹豫不决，从柜子里找出靴子，擦拭干净，甚至还上了鞋油，但仍然无法决定是否要穿上。每次她有大问题要奋力解决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对小问题则束手无策。她很清楚所有的征兆，她可以感觉到诸事将临，但她无能为力。她会遗忘自己的钱包；在仓库里记账不断出错；把自己锁在公寓外，只好找来皮埃尔太太，那个像荨麻地上的羊一般挑三拣四、鼻音浓厚的老笨蛋管理员。每回陷入这种情绪时，她就很容易搭错公车，然后怒气冲冲地在陌生的区域下车，尽管她搭相同的路线已十五年了。最后，她终于套上靴子——喃喃自语“老笨蛋，真是！”之类的话——然后，拎起她前一夜已准备好的沉重购物袋，走上每日相同的路径，经过三家每日必经的商店，却没走进任何一家，因为她正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脑袋是否出了问题。

我疯了。我没疯。有人想要杀我，有人想要保护我。我很安全。我面临生死存亡。就这样周而复始。

自从接待过那位听她告白忧虑的小个子爱沙尼亚人之后，四个礼拜以来，欧斯特拉柯娃察觉到自己身上产生了许多变化，而对那些她毫不感激的人，她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她是否爱上他其实无关紧要。他的出现正逢其时，而且他立即感染到她一触即发的反抗意识。他重新点燃她的希望，他身上的野猫气息让她回想起葛利克曼和其他男人；她从来就不曾特别克制欲望。而且，最重要的是，她认为，魔术师是擅长察言观色的人，也了解女人，他走进我的生命，带着那个折磨我、统治我的人的照片，显然是要为我除害——那么，如果我没当场爱上他，岂不是个低俗、孤独的老笨蛋！

但是，他的严肃认真比他的魔法更令她印象深刻。“千万别招摇。”他异常尖锐地告诉她，因为她在写给将军的信中说，有时为了娱乐或变化起见，她会让自己小小地偏离常轨。这样，你自己会松懈下来。别误以为危险已过去了。”

她答应要自我改进。

“危险是绝对的，”他离开前告诉她说，“不会因为你而变得更糟，或变得更好。”

虽然以前也有人对她谈到危险，但魔术师一提及，她就相信了。

“我女儿的危险？”她问，“亚莉珊卓的危险？”

“你女儿和此事无关。你可能也确信，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么，是谁的危险？”

“我们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的危险。”他回答说，当时她正高兴地与他在门廊拥抱，“特别是你的危险。”

而现在，这三天以来——或者是两天？也许是十天？——欧斯特拉柯娃可以发誓，她看见危险群聚身边，就像幽冥军队集结在她临终卧榻一样。危险是绝对的，不会因她而恶化或好转。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当冬靴在她脚上闪闪发亮，沉重的购物袋在她身边摆动时，她又看见了逼近的危险：相同的两个男子，跟随着她，即使在周末也不例外。健壮的两个男子。比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更健壮。是那种坐镇总部，聆听审讯的男子。而且，从不说一句话。其中一个走在她背后五米处，另一个则在对街和她并行前进，此时正走到蜡烛制造商流氓默西的门口，他门廊上挂着的红绿相间的雨篷非常低，连欧斯特拉柯娃这样身材不高的人都很容易撞到。

第一次认真注意到他们时，她判断他们是将军的人。那是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五？瓦拉狄米尔将军为我派出他的保镖，她颇陶醉地想。为了这个危险的早晨，她想要设计出友善的姿态来表达她的感谢：在没有其他人看见时，她给他们一个同谋的微笑；她会准备肉汤，端给他们，让他们打发在门廊站哨的时间。两个彪形大汉，她这样想，就只为了一位老妇人！欧斯特拉柯娃是对的，将军毕竟是个男人！第二天，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不在了，而且她也认为，自己之所以渴望见到这些人，无非是渴望再次与魔术师重聚：我期盼与他有所联系，她想，正如我还没动手清洗他用来喝伏特加的酒杯，也还没拍松对我谈及危险时他坐过的那个椅垫。

但是，第三天，或是第五天？——对于这两个她原以为是保护者的人，她有了不同也更严酷的看法。她不再扮演小女孩的角色。无论那到底是哪一天，那天，她提早离开公寓，到仓库查验一批托售货品，她仿佛走出了逃避现实的迷离幻境，踏上莫斯科的街道，正如与葛利克曼共度的那些年她常做的一样。天光未明，铺着鹅卵石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一辆黑色汽车停在离她公寓门廊二十米处。这辆车很可能才刚抵达。事后，她有个印象，好像看见车停下来，可能是送放哨的人来到岗位。就在她走出门的时候，急急停下车，并且关掉车灯。她毅然走上人行道。“对你的危险。”她仍然记得，“对我们所有知情者的危险。”

那辆车跟着她。

他们以为我是个妓女，她徒然想着，那种做早市的老妓女。

突然之间，她想要进到教堂里去。任何一间教堂。最近的一间苏联东正教教堂在二十分钟的路程外，那间教堂非常小，在里面祈祷就像参加降灵会，与神圣家族亲密接触，蒙受宽恕。但二十分钟似乎就是一辈子的时间。一直以来，她对非东正教教会敬而远之，奉若规范，因为那是对祖国的背叛。然而，这个早晨，有辆车紧随背后，她暂时搁下自己

的偏见，急忙逃入她所经过的第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不仅是天主教堂，而且还是现代的天主教堂。因此，她听了两遍全本弥撒，由一位满口大蒜臭味的劳动阶级神职人员以不纯熟的法文念出。但当她走出教堂时，那些人已不见踪影，这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在抵达仓库之后，她必须允诺多工作两个小时，以弥补因迟到所带给大家的不方便。

接下来的三天，平安无事，或者是五天？欧斯特拉柯娃已变得无法积蓄时间，一如无法储存金钱。三天或五天，他们离开了，他们已不复存在了。这都是因为她的“招摇”，就如魔术师所说，都是因为她想得太多，看了太多人，也想像出太多意外的愚蠢习惯。直到今天，他们又回来了。只是，今天比以前更糟上五万倍，因为今天的街道就像世界末日或盘古开天时一样空无一人，走在她背后五米处的男子趋近前来，而走在默西那座危险雨篷下的另一名男子，正穿过街，与那人会合。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欧斯特拉柯娃的描述或想像中，犹如雷电闪光般迅即发生。前一分钟，你还好好地走在人行道上，下一分钟，一阵闪光骤现，号角哀鸣，你已飘到手术台上，身旁环绕着戴不同颜色面罩的外科医生。或者，你已到了天堂，在全能造物者面前，低喃着为自己并不真正感到后悔的小过错找借口；而他——如果你真正了解他的话——其实也并不感到遗憾。或者，最糟的情况是，你苏醒过来，带着伤痕，走向自己的公寓，你那位乏味的姐姐华伦蒂娜，极不情愿地抛下一切，一路从里昂赶来，在你床边唠叨不休。

但这些期待都未实现。

事发经过犹如水上芭蕾般缓慢。从背后赶上她的那名男子，从右边，或者应该说是靠内的位置，拉住她。从默西店门口跨过街来的那个人，从左侧，不走人行道，而是走在排水沟上。他大步跨进，突然将昨天的雨水溅到她身上。欧斯特拉柯娃一向有着窥视别人眼睛的要命习惯，此时，她盯着这两个她不愿见到的同伴，看到了她早已认出也打心底了解的脸孔。是他们搜捕欧斯特拉柯夫，是他们谋杀葛利克曼，在她自己看来，世代以来，就是他们谋杀了整个苏联民族，无论他们是以沙皇、上帝或列宁的名义。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她看见了跟踪她到教堂的那辆黑色汽车，驶过空荡荡的街道，朝她接近。她依计行事，这是她彻夜未眠，躺在床上筹划出来的做法。她在购物袋里放了一片陈旧的扁平铁片，那是欧斯特拉柯夫捡回来的废铁。当时，这个垂死的可怜老人，一心以为自己可以做出一些特别的法郎，好从事古董买卖。她的购物袋是皮制的——绿棕交错——非常坚固。她把购物袋向后一拉，使尽全力挥向站在排水沟上的那名男子——打在他的鼠蹊部，最令人痛恨之处。他出声咒骂——她听不出来是哪国语言——屈膝跌倒。此时，她的计划开始脱离掌控。她没料到左右会各有一个恶棍，她需要时间来恢复身体的平衡，同时把铁片挥向第二个人。但他不让她有时间这样做。他伸出双手，环住她的手，把她整个人抓起来，像抓住一个大袋子似的，抬离地面。她看见袋子掉落地面，也听见铁片掉出袋子，落在排水沟盖上的声音。她目光朝下，看见靴子悬在离地十公分处，仿佛自己

也像弟弟尼基一样吊起来——尼基的双脚交叉，活像个蠢蛋。她注意到脚趾的部分，左脚，已有部分磨损了。攻击她的这个人，双手更用力地扣住她的胸部，让她不禁怀疑，自己在窒息之前，肋骨可能就已碎裂。她感觉到那人将她往后拖，她猜想，他可能是要把她丢进车里，那辆车正不急不徐地驶过街道，逐渐接近——她是被绑架了。这个想法令她不寒而栗。此刻，除了死亡之外，最令她胆战心惊的，莫过于想到这些猪猡要把她送回苏联，强迫她接受那凌迟至死的教条炼狱，她确信，那就是谋杀葛利克曼的元凶。她使尽力气挣扎，设法咬他的手。她看见几个旁观者，与她一样惊恐。接着，她意识到，那辆车并未减速，这个男子心中另有盘算：不是要绑架她，而是要杀了她。

他丢下她。

她踉跄了一下，但未倒下，正当车子要撞上她时，她不禁感谢上帝与所有的守护天使，让她决定穿上冬靴，因为那辆车的前保险杠从后面撞上她的小腿，她查看双腿时，看见两脚还好，但露出靴子的部分则皮肉绽开如婴孩出生。她逃开来，但全身立即撞上路面——她的头，她的背脊，她的脚跟——像根香肠似的滚过鹅卵石。那辆车驶过她身边，她听见急速的煞车声，心想，他们是否要掉过头来，再次碾她。她努力想要移动身子，却觉得昏然欲睡。她听见人声与车门摔上的声音，她听见发动机的轰隆声，逐渐消失，不知是车已远离，还是她已失去听觉。

“别碰她。”有人说。

“不，别这样。”她想。

“我缺氧，”她听见自己说，“扶我站起来，就没事了。”

她到底为什么这样说？或者，她只想到这句话吗？

“茄子，”她说，“找茄子！”她不知道自己说的是采买的清单，或是巴黎俚语中对女性交通警察的称呼。

一双女人的手为她盖上毯子，然后，是一阵喧闹的法文争论着接下来该做什么。有人记下号码吗？她想问。但她真的非常想睡，不想卷入争论，而且，她缺氧——跌倒把她体内的氧气全给带走了。她仿佛看见自己曾在苏联乡间见过的被枪击受伤的小鸟，无力地坠落地面，等着狗儿来捉。将军，她想着，你收到我的第二封信了吗？意识逐渐飘远的她，期待他、恳求他读那封信，并响应信中的请求。将军，读我的第二封信。

她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陷入绝望情绪时所写的。昨天，当她再次陷入绝望时，寄出了那封信。

巴汀顿车站附近的维多利亚式宅院，外表都粉刷得像豪华邮轮般雪亮，而内部却都像坟墓般阴暗。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西河苑也像其他宅院一样闪闪发亮，但通向瓦拉狄米尔住处的公共信道，一端被整堆烂床垫挡住，另一端则是一根破碎的船杆，像个边境的邮筒。

“谢谢你，载我到这里。”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付了出租车费，在床垫前下车。

他直接从汉普斯特德过来，膝盖都伸不直了。那个希腊司机整路都在谈塞浦路斯，出于礼貌，他必须在跳动的座位上屈身向前，才能在嘈杂的发动机声中，听见司机所说的话。瓦拉狄米尔，我们应该对你更好一些，他想，也注意到从阳台流下的污水，把人行道弄得脏污不堪。圆场对顶尖的人应该表现出更高的敬意。

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缓缓地走着，知道早晨是一天之中较宜外出，却不适合进入建筑之中的时间。巴士站排了一小队人。一个送牛奶的人正沿路送货，还有一个报童也是。一群栖陆的海鸥，在满溢出来的垃圾箱上优雅地觅食。如果海鸥都飞到了城市里来，他想，那么鸽子会飞到海上吗？穿过公共信道时，他看见一个摩托车骑士，骑着一辆附有挎斗的黑色公务车，在距路边石约一百码处停下他的坐骑。那人的一些神态让他想起送钥匙到安全公寓的信差——相同的专注稳定，即使隔了这么远的距离，充满敬意的亲切态度，几乎就是军人的那种模样。

树叶落尽的洋栗树为柱状的门廊投下阴影，一只伤痕犹在的猫留神盯着他。门铃是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但史迈利没按，他只一推，那扇双扉门就毫不设防地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同样萧条的回廊，漆上鲜亮的颜色，以掩盖墙上的涂鸦；同样铺着油毡布的楼梯，像医院推车般嘎嘎作响。他记得这一切。什么也没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没有灯光开关，随着他越爬越高，楼梯愈加昏暗。为何谋杀瓦拉狄米尔的人没偷走钥匙？他很纳闷，每走一步，就觉得钥匙好像轻刺了他的臀部一下。也许他们不需要钥匙。也许他们已有了整套的钥匙。他走上一个楼梯平台，身体挤过一辆豪华的婴儿车。他听见狗的嚎叫，德文的早间新闻，共享厕所的冲水声。他听见一个孩子对着母亲尖叫，然后是一个巴掌声与父亲对孩子的吼叫声。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这儿有着咖喱、便宜油炸食物和消毒水的气味。这气味表示有太多口袋不丰的人挤在一起呼吸着太过稀薄的空气。他也记得这个。什么也没改变。

如果我们对她好一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史迈利想。被忽视的人太容易被杀了，与欧斯特拉柯娃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记得他们带他到这里来的那一天，主教史迈利，邮差托比·伊斯特哈斯。他们开车到希思

罗（伦敦的国际机场）去接他：托比这个协调人，满身江湖色彩，他就是这样说自己的。尽管托比车开得像风一样快，但他们还是几乎迟到。飞机已抵达。他们赶到闸门，他已在那儿：满头银发，威仪堂堂，一动也不动地矗立在入境区的临时信道上，无视其他凡夫俗子从身边呼啸而过。他记得他们郑重其事地拥抱——“麦斯，我的老朋友，真的是你吗？”“是我，瓦拉狄米尔，他们又把我们凑在一起了。”他记得托比带着他们穿过移民局宽阔的后信道，因为愤怒的法国警方在丢出这位老兄之前，没收了他的证件。他还记得他们在史考特店里吃饭的情景，他们三个一起，这位老兄意气风发，不仅喝了很多酒，也高谈阔论他们都知道他不会有的未来。“这次又是莫斯科，麦斯。或许我们对睡魔也还有机会呢。”第二天，他们去找公寓。“只是让你看看一些可能性，将军。”托比·伊斯特哈斯解释说。那时正值圣诞节，年度的再安置预算已用罄。史迈利向圆场的财务处求援。他游说拉康和财务处，希望追加预算，但徒劳无功。“一剂现实的药，可以让他脚踏实地。”拉康宣称，“运用你对他的影响力，乔治。这是你的任务。”第一剂现实之药，是位于肯辛顿的一个妓女窝。第二个是靠近滑铁卢车站26，俯瞰铁道分辙场的房子。西苑苑是他们看的第三幢房子。当托比领头带他们吱吱嘎嘎走上相同的楼梯时，老头子突然停住脚步，把他白发斑驳的大头往后一靠，夸张地皱起鼻子：

噢，如果我饿了，只消往走廊一站，吸一口气，肚子就不饿了！他用口音浓厚的法文说。这样一来，我一整个星期都不必吃东西了！

在当时，即使是瓦拉狄米尔都猜想他们会永远抛弃他。

史迈利回到现在。他继续往上爬，注意到下一层有乐音流泻出来。一扇门里以最大的音量播放着摇滚乐，另一扇门后则传来西贝流士（Sibelius）的音乐，还有培根的香味。从窗户外望，他看见两个人在洋栗树下闲荡。他进门时，那两个人已不在那里。团队是会这样做的，他想。只要有外人进入，团队就会部署哨站。另一个问题是，这是谁的团队？莫斯科的？督察长的？索尔·恩德比的？在路较远的那一头，那个高个子摩托车骑士抱了一叠画报，坐在车上读着。

史迈利身边的一扇门打开来，一位穿着晨袍的老妇人，肩上抱了只猫，走了出来。在她还没开口之前，他已从她的呼吸中嗅到昨夜的酒味。

“你是个小偷吗，亲爱的？”

“恐怕不是，”史迈利笑着回答，“只是个访客。”

“虽然如此，问一问还是好的，对不对啊？亲爱的。”她说。

“这倒是真的。”史迈利礼貌地回答。

最后一段楼梯既陡又窄，靠着斜面上射进来的微弱天光照明。顶楼有两扇门，都关着，也都很窄。其中一扇门，正面贴有一张打字的通告：“V.米勒先生，翻译”。史迈利还记得当时对瓦拉狄米尔化名的争

论，他已成为伦敦人，必须保持低调。“米勒”没有问题。出于某些原因，这位老兄觉得“米勒”很气派。“米勒，很好。”他说，“米勒，我喜欢，麦斯。”但“先生”可就不妙了。他坚持要用“将军”，然后退而求其次地要求用“上校”。但史迈利以主教的身份，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比起伪称的邪恶军队阶级，“先生”所引起的麻烦要小得多，他命令道。

他大胆地敲门，他知道轻声敲门比用力敲门更惹人猜疑。他听见回音，此外什么都没有。他没听见足球的声音，没有声音突然冻结的迹象。他从投信孔里叫着“瓦拉狄米尔”，仿佛是个来访的老友。他从那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来试开门锁，转不动，他又试另一把，转开了。他走进房里，关上门，等待着什么东西从背后袭击他的头，但他宁愿一枪轰上脸，头骨迸裂。他觉得头昏，赫然发现自己屏住呼吸。相同的白色油漆，他注意到，监狱似的空无一物，完全没变。依旧是寂静得出奇，像个电话亭；依旧混杂着各种气味。

这是我们站的地方，史迈利记得——我们三个，在那天下午。托比和我自己就像拖船一样，拉着我们之间的老战舰。不动产经纪人的介绍里说这是“阁楼”。

“没指望。”总是第一个开口的托比·伊斯特哈斯以带匈牙利腔的法文说，他已转身开门，准备离开。“我觉得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先来看上一眼的，我真是白痴。”瓦拉狄米尔没有动静，托比说：“将军，请接受我的道歉。这真的是太无礼了。”

史迈利也加上自己的担保。我们可以为你做得更好，瓦拉狄，好得多，只要我们坚持到底。

但老人的眼睛望向窗外，就像史迈利现在一样，望向栏杆外林立的烟囱顶管，与层层叠叠的瓦砌山形屋顶。突然，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掌拍着史迈利的肩膀：“你最好把钱省下来对付莫斯科那些猪猡，麦斯。”他建议说。

泪水淌下双颊，但脸上的微笑依然坚定，瓦拉狄米尔继续凝望着莫斯科的烟囱，怀抱着有朝一日再度生活在苏联天空下的褪色梦想。

“到此为止。”最后他以法文下令道，仿佛下达坚守最后防线的命令。

一张狭小的睡椅靠墙摆放，一只烹调铃放在窗沿上。从油灰的气味，史迈利猜想老人努力靠自己维持房间的洁白，用油漆去除房间的湿气，填补裂缝。在他用来打字与吃饭的桌上，放了一部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与两本破旧的字典。他的翻译工作，他想，一些微薄的额外收入，贴补他的养老金。他手肘往后扶背，仿佛脊椎有毛病似的，史迈利尽力克制自己激荡的心绪，代之以惯常面对死去情报员的固定仪式。一本爱沙尼亚《圣经》放在床边的松木置物柜上。他仔细地查看置物柜内部，然后整个翻倒过来，搜寻纸张或照片的踪迹。从拉出的橱柜抽屉里，他找到一瓶提振性功能的回春药丸，和三个嵌在铬条上的红军英勇奖章。要掩饰的何其多，史迈利想，不禁怀疑，瓦拉狄米尔和他那许多情妇们

到底如何能挤在这么小的一张床上。一张马丁·路德的画像挂在床头。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名为“古老塔林的红屋顶”，瓦拉狄米尔一定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第二张照片是“卡萨利海岸”，第三张是“风车与倾圮的城堡”。他仔细地查看每一张照片的背后。床边的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试试开关，发现不亮之后，他拔下插头，旋下灯泡，搜寻木头底座，但一无所获。只是个坏掉的灯泡，他想。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悲鸣，让他急忙后退，背抵墙边，但一镇定下来，他就发现，那不过是陆生海鸥的叫声——那一整群定居在烟囱管周遭的移民。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栏杆，望向街道。那两个闲荡的人已经离开。他们正走上来，他想，我先发制人的优势已经结束了。他们一定不是警察，他们是刺客。那辆有着黑色挎斗的摩托车，就那样停在那，无人看管。他关上窗户，心想，不知有没有专为死去情报员所设的英灵殿，让他可以和瓦拉狄米尔相聚，弥补一切；他告诉自己，他已活过漫长的一生，这正是结束的时刻。但有那么一瞬间，他自己并不相信。

桌子的抽屉里有空白的纸张，一个订书机，一支旧铅笔，一些橡皮圈，和最近一季的电话账单，还没付清，总额是七十八英镑，令他非常吃惊，以瓦拉狄米尔简朴的生活状态来说，这笔金额高得超乎常理。他打开订书机，什么也没发现。他把电话账单放进口袋，留待稍后研究，同时继续搜查。他也知道，这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搜查，真正的搜查得要三个人花上好几天工夫，然后才能确定地说他们已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如果说他找的是某些特定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通讯簿或日记，或用来做这些用途的东西，就算只是一小张纸也好。他知道，有时候老情报员，即使是最顶尖的也一样，就像老情人；当岁月悄悄袭上身，他们会开始自欺欺人，原因是害怕权力离他们而去。他们假装仍拥有记忆中的一切，私底下却努力抓住青春活力，他们会暗地里写下一些东西，通常是用自创的密码，但对于熟知这套把戏的人来说，只消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以破解开来。联络的姓名与地址，下属的情报员。没什么是神圣至善的。都是例行公事，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化名、电话号码，甚至是以社会安全号码与生日拼凑成的安全密码也一样。在史迈利的时代，他曾见过整个网络因此而陷入危险，只因为某个情报员不敢再信任自己的脑袋。他不相信瓦拉狄米尔会这样做，但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正站在老人曾称之为厨房的地方：瓦斯管环在窗台上，一个自制的小食品柜，上面钻了孔，以便空气流通。我们这种自己下厨的男人只能算是半吊子，他想像他卷起袖子，托出炖锅与煎锅，在辣椒与干红椒里忙得团团转。在屋里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在床上——你都可以让自己与世隔绝，读你自己的书，让自己相信离群索居是最好的事。但在厨房里，却充斥着犹有不足的刺眼迹象。半条黑面包，半条劣质香肠，半个洋葱，半瓶牛奶，半个柠檬，半袋红茶，半个人。他把所有能开的东西都打开来，他用手指探进干红椒里。他发现一片松脱的瓷砖，便剥了下来；他旋下煎锅的木柄。正准备拉开小衣橱时，他停了下来，仿佛

再次倾耳聆听，但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他眼中所见之物，而非他耳中所听见的声音。

食品柜上有一整条高卢牌凯帕罗（法国烟名）香烟，这是瓦拉狄米尔在没有苏联烟抽时的最爱。香烟倒了出来，他注意到，并读着上面不同的文字。“免税品”。“滤嘴”。标示着“输出品”与“法国制造”。玻璃纸包装。他把烟拿下来。一条里原有十包，但有一包已不见了。在烟灰缸里，有三根相同牌子的烟蒂。在空气里，除了食物与油灰的味道之外，现在他也闻到了法国烟淡淡的香味。

而且，口袋里没有半根烟，他回想。

史迈利用两手握着蓝色的包装盒，缓缓转动，想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直觉——或更好一些，是浮出表面的潜在认知——让他立即感觉到，这香烟有些不对劲。不是外观。不是盒里塞进了小型照相机、高爆破力或软头子弹，或其他这类老掉牙的把戏。

纯粹只是这条烟出现的地方，在这里而非其他地方，不对劲。

这么新，一尘不染，一包不见了，三根烟蒂。

而且，他口袋里没半根烟。

他加快进行的速度，渴望着离开。这公寓太高了。太空虚，也太满溢。他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无法连贯起来。他们为何不拿走他的钥匙？他拉开小衣柜，里头放着衣服和纸片，但瓦拉狄米尔这两样东西拥有的数量都不多。纸片大多是复印的小册，有俄文、英文，还有一些史迈利认为是波罗的海文字。一个卷宗夹放了集团在巴黎旧总部的来信，和一些写着“记得拉脱维亚”、“记得爱沙尼亚”、“记得立陶宛”字样的海报，想来是作为公开展示之用。一盒学校用的粉笔，黄色的，有几支已经不见了。还有瓦拉狄米尔珍藏的诺福克外套，从挂钩上掉落地板。外套之所以会掉下来，或许，是因为瓦拉狄米尔关上衣柜门时太匆忙了。

而瓦拉狄米尔这么好面子？史迈利想。他的外表这么军人作风？却会把他最好的外套丢在衣柜地板上？或者，是另一双不如瓦拉狄米尔细心的手，没将外套吊回挂钩上？

拾起外套，史迈利翻找口袋，然后挂回衣柜里。他用力摔上门，看看外套会不会掉下来。

会的。

他们没拿走钥匙，他们也没搜索公寓，他想。他们搜过瓦拉狄米尔，但依督察长之见，他们并未得逞。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回到厨房，站在食品柜前，再次仔细地看了放在顶上的蓝色包装盒一眼。接着看着废纸篓。又看了烟灰缸，满怀悼念。接着是垃圾桶，只为了以防万一那包不见了的烟，可能揉成一团丢在里面。但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欣慰。

该走了。

但他没走，没真的离开。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史迈利竖起耳朵防范可能的干扰，到处挖掘探测，挪移复原，继续搜寻着松脱的地板，或架子后面可能会有有的壁龛。但这一次，他希望什么都没发现。这一次，他希望确认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直到他勉强满意了，才悄悄地走到楼梯平台，锁上背后的门。在一楼的楼梯口，他遇见一个戴着GPO（邮政总局）臂章的临时邮差，从另一条走廊现身。史迈利碰碰他的手臂。

“如果有要给六B的信，我可以让你省掉爬楼梯的麻烦。”他客气地说。

邮差忙乱翻找，拿出一个棕色信封，盖着巴黎邮戳，日期是五天前，第十五区。史迈利偷偷放进口袋里。二楼的楼梯口，有一道只能从里向外开启的防火门。他拾级而上，心中作好盘算。他一推，门就打开来。他走下一道粗劣的混凝土楼梯，穿过天井，到一个废弃的马厩。他心中仍不断思考着遗漏之处。为何他们没搜索他的公寓？他觉得很纳闷。莫斯科中央，就像其他的庞大官僚体系一样，有一套固定程序。你决定杀一个人。所以你在他房子外面布置圈套，你派出定点岗哨盯住他的日常路线，你派出暗杀团队，你杀了他。这是标准的做法。那么，他们为何没有搜索他的公寓呢？——瓦拉狄米尔，一个光棍，住在一间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建筑里——为何在他采取行动时他们并未布置圈套？因为他们知道他会带在身上，史迈利想。至于对尸体的搜查，督察长觉得如此草率的搜身，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是受到阻挠，而是已经找到他们想要的？

他招了一部出租车，告诉司机：“切尔西的水滨街，请走国王街。”

回家，他想。泡个澡，好好想一想。刮胡子。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会带来。

突然，他倾身向前，敲着玻璃隔屏，改变了他的目的地。出租车一回转，高个子的摩托车骑士在车后紧急煞车，并下车若无其事地把他那辆大型的黑色挎斗摩托车转进对面的巷子。一个行人，史迈利想，窥伺着他。一个行人，推着载茶的手推车。像个官方的随扈，弓着背，伸展开手臂。摩托车骑士尾随他们穿过卡姆登水门27外闸，然后，仍保持固定的距离，缓缓爬上山丘。出租车停下来，史迈利倾身向前付了车费。就在此时，那个庞大的黑影从他们身边若无其事地驶过，一条手臂从手臂举起，行了个夸张的礼。

他站在林阴大道的入口，凝望着一排排山毛榉，仿佛撤退的军队，从他眼前没入迷雾之中。暗色仍徘徊不去，大地犹如室内般幽暗。天色有可能已是黄昏：在古老乡间屋舍喝茶的时间。他两侧的街灯只有微弱的烛光，什么也照不亮。空气感觉起来温暖且沉重。他期待看到警方仍在现场，看到绳索围住的区域。他期望看见新闻记者或好奇的旁观者。他缓缓地望下斜坡，什么都没有，他告诉自己。我一离开，瓦拉狄米尔就高兴地站起来，拄着手杖，抹去可怕的化妆，轻快地和他的演员同伴们到警察局去喝杯啤酒。

拄着手杖，他对自己说，记起督察长曾告诉他的一些事。左手或右手？“他的左手也有黄色的粉笔灰。”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在厢型车里说，“大拇指、食指与中指。”

他继续前行，林阴大道越来越幽暗，雾越来越浓。他的脚步声在身前微弱地回响。二十码高处，褐色的阳光像微弱的烽火在自己的烟雾中燃烧。但朦胧迷离的此处，迷雾却已凝聚成寒气逼人的浓雾，瓦拉狄米尔也已尸骨冰冷。在警车原本停放的地方，他看见轮胎的痕迹。他注意到落叶不见了，沙砾地也干净得极不自然。他们做了什么？他很纳闷。在沙砾地灌水？扫集落叶，好塞进更多塑料枕头套里？

身体的疲累反而让他的思绪出奇的澄明。他沿着林阴大道继续往上走，祝福瓦拉狄米尔日夜平安，他并不觉得这样做是蠢事。他专心地思考图钉、粉笔、法国烟和莫斯科规则，同时寻找竞赛场旁的锡架凉亭。按顺序来，他告诉自己。从最开始着手。把凯帕罗先留在柜子上。他走到一个交叉路，穿过路口，继续往上爬。在他右边，出现了球门的门柱，再过去，则是一座覆盖波状铁皮的绿色凉亭，显然空无一人。他举步穿过竞赛场，雨水渗进他的鞋子里。小屋后面有一道陡斜的泥堤，留有孩子们溜滑下来的痕迹。他爬上泥堤，走进矮树丛里，继续往上爬。浓雾并未穿透树丛，而当他抵达丘顶时，雾已散去。四周仍空无一人。他折返穿过树林，走向凉亭。这座凉亭只能算是个锡盒子，一侧开向竞赛场。亭里惟一的设施是一张粗糙的木条长椅，刀痕累累，刻满了字。占据其上的，是一具俯卧舒展的身躯，毛毯直拉盖头，只露出棕色的靴子。一刹那，史迈利还怀疑他是不是也被杀了。梁柱撑起屋顶，斑驳的绿色油漆上，许多热切的道德宣言跃然眼前。“浪人是破坏性的。社会不需要浪人。”这个论点让他刹那间有些犹豫。“噢，但社会需要啊。”他想要回答，“社会是由许多少数民族组合而成的。”图钉就在莫斯汀所说的位置，依据沙拉特遵守规律的优良传统，正好与头齐高，圆场出品的铜制钉头，仍然如莫斯汀放在这里时一样，崭新且无记号。

进行会晤，上头说，未见危险。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再次思索。莫斯科，外务员得花三天工夫才能

把信送达安全地址的地方。在莫斯科，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浪人。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瓦拉狄米尔的粉笔记非常靠近图钉，潦草的信息，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虫爬过柱子。也许老人是担心下雨，史迈利想。也许他担心雨水可能冲刷掉他的标记。或者，也许他的情绪状态让他握着粉笔的手太过用力，就像他把那件诺福克外套掉在地板上一样。会面，否则免谈……他告诉莫斯汀……今晚，否则免谈……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虽然粉笔迹很重，但要特别留心才会注意到这个记号，闪亮的图钉也是，不过，即使是特别留意的人也不会觉得它们很奇怪，因为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里，总不断有人贴上宣传单或信息给彼此，而他们并不全都是间谍。有些是孩子，有些是流浪者，有些是信徒，有些是慈善活动的发起人，有些是遗失宠物的人，还有些是为了追寻新欢而必须在山顶发出渴求的人。而他们，无论如何，并不会全都被莫斯科中央的暗杀武器从正面直射轰掉头。

那么，这个响应记号的目的何在？在莫斯科，当史迈利还坐在伦敦的办公桌前，全权负责瓦拉狄米尔的案子时，这些记号是为随时可能失去踪影的情报员设计的；他们是道路上零碎的细小分支，随时都可能是穷途末日。我没见到危险，依约定进行会晤，这是瓦拉狄米尔留给世界最后——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信息。

离开小屋，史迈利回头，顺着来时的路径走了一小段距离。一面走，他一面仔细回想督察长所重建的瓦拉狄米尔的最后旅程，像档案般在心中重现。

那双橡胶套鞋简直是天赐神助，史迈利先生，督察长虔诚地说，北英世纪牌，钻石花纹鞋底，先生，而且无遮无掩地走——所以，如果有必要，你也可以穿过一大群足球观众，追踪到他的足迹！

“我会给你官方说法的版本。”督察长说，他说得很快，因为他们时间不多，“准备好了吗，史迈利先生？”

准备好了，史迈利说。

督察长改变了声调。交谈是一回事，证据是另一回事。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电筒照亮封锁区内的潮湿沙砾地。就像放幻灯的演讲，史迈利想，在沙拉特，我可能就必须做笔记了：“他在这里，现在走下山坡，先生。看见他了吗？正常的步伐，脚跟与脚趾运作良好，正常的行进，一切都显得光明磊落。明白吗，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很明白。

“那是手杖的痕迹，你看见了吗？在右手，先生。”

史迈利也看见了，每隔两个脚印，胶环手杖就留下一个圆形的深痕。

“当然，他被射杀时，手杖是在左手，对不对？你也看见了，先生，

我注意到。你会不会刚好知道他有毛病的是哪一条腿，先生，如果他腿真有毛病的话？”

“右腿。”史迈利说。

“噢，那么他平常很可能都是右手拄手杖。请从这里下来，先生，他从这里走！正常步伐仍然是，请记住。”督察长说，但却很罕见地失神脱口说出不合文法的措辞。

在督察长的手电筒光束下，还有五个规则钻石花纹的脚印，后脚跟与脚趾，仍然行进无碍。此时，在白昼的光线下，史迈利只能看见隐约的痕迹。雨水，其他的足迹，和违规闯入的脚踏车轮胎轨迹，让大部分脚印都消失了。在夜里，督察长的幻灯表演中，他清楚地看见那些脚印，就像躺在斜坡上那具裹着塑料布的尸体那般清楚，足迹就在那里结束了。

“现在。”督察长满意地说，略一停顿，他的手电筒停驻在地面一块磨损的区域。

“你刚才说他几岁来着，先生？”督察长问。

“我没说，但他应该是六十九岁。”

“加上你刚才说的心脏病，我想。现在，先生。首先，他停了下来。非常突然的。别问我为什么，也许是有人叫他停下来。我猜想是他听见了什么。在他背后。注意他步伐间的距离缩短了，注意双脚的位置，他半转过身，可能是看背后或什么的。无论如何，他转身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在他背后’的缘故。无论他看到或没看到什么——或者听到或没听到什么——他决定转身。不再往前走，看！”督察长带着运动员般骤起的兴奋之情说，“较大的步幅，脚后跟没有完全着地。一个完全不同的脚印，他尽全力地走。你可以看见他为求保命，拄着手杖离开的位置。”

在白昼的日光里，史迈利不再确定能看见什么，但他昨夜看见了——今天清晨也在记忆中再度看见了——手杖的箍环突然猛力向下刺的深痕，接着又刺向另一个角度。

“麻烦的是，”督察长平静地说，重拾起他高居法庭的神态，“杀他的人是从正面动手的，不是吗？并不是从他的背后！”

这对动手的时机其实是有利的，史迈利此时想。他们驱赶他，但史迈利怎么都想不起来沙拉特对这种特殊技巧的术语。他们知道他的路径，然后他们驱赶他。在目标背后负责制造惊吓的人将他往前赶，射手则好整以暇地躲在前方，等待目标闯进险境。莫斯科中央暗杀小组也知道，即使是最资深的高手也会耗费许多时间担忧自己的背后，担忧自己的侧翼，担忧经过的车辆与没经过的车辆，担忧他们穿过的街道与他们走进的房舍。但只有到了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竟没发现危险早就与他们面对面了。

“他还在跑，”督察长说，一面不慌不忙地朝山坡下移动，“注意到他

两步之间的距离拉长了一些，因为坡度变陡了？也显得不规则，看到了吗？脚步到处飞奔。为了宝贵的生命而跑。绝不夸张。手杖还握在右手。看到他改变方向了吗，朝向边缘？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毫不怀疑。走这边。如果可以的话，请解释这个！”

手电筒照出五六个非常接近的脚印，全部挤在草地边缘的两棵高树之间，那里空间非常小。

“又停了下来。”督察长宣称，“也许不是完全停下来，只是颠颠簸簸。别问我为什么。或许他只是脚步不稳。或许他担心发现自己靠树太近。或许是他的心脏问题，如果你能证实他的心脏病很严重的话。接着，他又像之前一样地走开了。”

“手杖握在左手。”史迈利平静地说。

“为什么？这就是我问自己的问题，先生，但也许你们的人会知道答案。为什么？他又听见什么了吗？想起什么了吗？为什么？当你为保全生命而跑的时候，为什么停下来，是躲避危险的欺敌手法，换手，然后继续跑？直冲进射杀他的那人手里？除非他背后的东西把他赶到那里，或许是绕过树林，转了个弯？你们那行的人有何解释，史迈利先生？”

这个问题犹在史迈利耳际回荡，他们就已抵达尸体旁边。在塑料布的覆盖下，那具尸体宛如胎儿。

但是，经过了这个早晨，史迈利不再袖手旁观。相反的，他将脚上那双浸湿了的鞋子尽量踏在正确的位置，试图模仿出老人可能有过的动作。史迈利缓慢的动作和非常专注的表情，看在两个遛着亚尔萨斯狼狗的裤装女士眼里，活像在演练某种新风行的中国武术。她们一定认为他疯了。

首先，他把两脚张开，朝向山坡下方。接着，他左脚往前，转动右脚，直到脚趾指向一丛幼小树林。在这样的动作中，他的右肩自然地跟着移动，直觉告诉他，瓦拉狄米尔很可能就在此刻将手杖转交到左手。但为什么？如同督察长所问的，为何要换手呢？为什么，在攸关生死的关头，为何还要郑重其事地将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呢？当然不是为了自我防卫——因为，就史迈利记忆所及，他是个惯用右手的人。为了自我防卫，他只会把手杖握得更紧。或用双手抓住手杖，像握住球杆。

难道是为了空出右手？但空出右手做什么？

此时史迈利察觉到有人在看他，迅即回头，看见两个穿着鲜艳运动上衣的小男孩，停下来看这个戴眼镜的矮胖老头踏着古怪的步伐。他装出校长的模样，瞪着他们。他们慌忙溜走。

空出右手来做什么？史迈利再次问自己。为什么在片刻之后又开始奔跑？

瓦拉狄米尔向右转，史迈利想，再次模仿出想像的动作。瓦拉狄米尔向右转。他面对树丛，他把手杖握在左手。有那么一会儿，根据督察

长的说法，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然后，他又开始奔跑。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想，盯着自己的右手。慢慢的，他把目光移向风衣的口袋。口袋是空的，瓦拉狄米尔的口袋也是空的。

他是想写下信息，或许？他嘲笑自己这个注定无法成立的理论。写下信息，用粉笔，例如？他是否认出追他的人，想用粉笔写下名字，或在什么地方留下记号呢？但写在哪里呢？当然不会是在湿漉漉的树干上。不在泥土、不在落叶、不在草地！环顾四周，史迈利了解到他所在位置的独特之处。这里，几乎在两棵树之间，极靠林阴大道的边缘，正是雾气转为最浓之处，他几乎隐蔽在视线之外。林阴大道向下延伸，然后又在他前面隆起。但林阴大道同时也是弯曲的，在他所站的位置，两边高处下望的视线都被树干和茂密的小树丛遮断。在瓦拉狄米尔最后的狂乱路程——这条他熟知也记得用来进行相同会晤的路径——这就是重点，史迈利欣喜地发现，这个奔跑逃脱的人站在此处，无论是前方或背后的人都看不见他。

而他停了下来。

空出右手。

把手放进——假设说——他的口袋。

拿心脏病药片吗？不，就像黄色粉笔与火柴一样，药片在左口袋，而不在右口袋里。

是要拿——假设说——尸体被发现时已不在口袋里的某样东西。

那么又是什么呢？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也许他会见我……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事要找他，请……

证据。证据太过珍贵，不能邮寄。他带着东西。两样东西。不只在脑袋里，而且在他的口袋里。而且要遵照莫斯科规则。从将军弃暗投明的那一天起，史迈利自己和他的现场项目官员就把这些规则深深灌输进他心中。史迈利觉得有一种如同恶心反胃的刺激感攥住胃部。莫斯科规则规定，如果你身上带着某种消息，你也必须带着毁弃消息的方法！无论是经过伪装或藏匿——微缩文件，秘密文字，未冲洗的底片，还有成千上万种危险的、吹毛求疵的方法——那都还是一个最轻巧、最易到手而且在抛弃时又最不引人疑窦的物体。

例如装满药片的药瓶，他想，就很有可能。例如火柴盒。

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大衣左口袋，他记得。老烟枪的火柴，值得注意。

而在安全公寓，他怜悯地想——他努力压抑自己，不下最后断言——桌上有一包香烟等着他，那是瓦拉狄米尔最爱的牌子。同时，在西河苑，食品柜上有九包高卢牌凯帕罗烟。十包少了一包。

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半根烟。没有半根，就像那位好督察长说的，他身上没有半根烟。或者，是他们发现尸体时没有香烟，换句话说。

所以前提是什么，乔治？史迈利模仿拉康问自己——拉康颐指气使的手指控诉似的在他完好无缺的脸孔前挥舞——前提呢？前提就是如此，奥立佛，一个抽烟的人，一个老烟枪，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出门赴一个秘密约会，带着火柴，却口袋空空没带半根烟，虽然他明明有一整条烟。因此若不是被暗杀者发现了之后拿走——瓦拉狄米尔所说的证据，或许不止一项的证据，就是——就是什么呢？否则就是瓦拉狄米尔及时把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及时把右手放进口袋里。把东西拿出来，当然也是及时，趁他站在视线看不到之处。然后丢掉，依据莫斯科规则。

乔治·史迈利对自己的逻辑推理感到满意，于是小心翼翼地踏过草长没膝的草地，走向小树丛。他搜索了半个小时或更久，在草丛和落叶堆中摸索，反复踩踏相同的轨迹，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放弃，又再开始，还要回答过路人从淫秽到极度关心的白痴质问。甚至还有两位本地的佛教和尚，身罩橘黄长袍，脚踏系带靴子，头戴编织帽，动手提供协助。史迈利谦和有礼地婉谢。他找到两个坏掉的风筝，许多可口可乐罐子。他找到一些印有女性胴体的碎片，有黑白，有彩色，全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他找到一只旧的慢跑鞋，黑色的，但有一些烧灼的白痕。他找到四个啤酒瓶，空的，还有四个空烟盒，但太潮湿也太旧，所以只瞧一眼，他就排除它们。在一根树枝斜斜地从母干岔出之处，有着第五个烟盒——或者也许是第十个——而且不是空的；一包相对而言比较干燥的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且是免税品，高踞枝上。史迈利像采摘禁果一般伸手去取，但它也像禁果一般采摘不到。他跳起来够，却觉得背部撕扯开来。事后，肌肉组织明显的撕裂拉伤，让他痛苦了好些天。他大声骂道“该死”，揉着背，很可能就像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两个正要上班的打字员，咯咯笑着安慰他。他找到一根棍子，把那盒烟弄下来，打开它。里面还有四根烟。

在那四根烟后面，藏着半根烟，用玻璃纸保护着，他辨识出某种东西，但却不敢用他潮湿且颤抖的手指去碰。他甚至不敢对这东西有所打算，直到离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咯咯笑的打字员与佛教和尚无心践踏的瓦拉狄米尔陈尸之处。

他们有了一件，我有了另一件，他想。我和凶手分享了老人的遗产。

无视来往的人车，他顺着狭窄的人行道走下山丘，直到南端绿园，希望找到可以喝杯茶的咖啡馆。发现没有咖啡馆这么早开门，他便坐在一间电影院对街的长椅上，对着大理石喷泉与红色电话亭发呆。电话有两部，一部比较脏。天空飘起了温暖的毛毛雨，几个店家开始拉低雨篷，一家熟食铺正运送面包。他缩起肩膀坐着，每一转头，淋湿了的风衣衣领就刺痛他没刮胡子的两颊。“看在上帝的分上，哀悼吧！”安恩有一次曾对史迈利暴跳如雷，因为他在面对另一位朋友的去世时漠然冷

静。“如果你不为死去的人悲伤，又如何能爱活着的人呢？”坐在长椅上考虑下一步的当下，史迈利很想告诉她当时他无以言对的回答。“你错了。”他心神狂乱，“我真心诚意地哀悼死者，还有瓦拉狄米尔，此时此刻，非常深沉的。”爱活着的人，有时候反而是个问题。

他试着电话，第二部是好的。奇迹似的，不仅S到Z的电话名录完好无缺，更神奇的是，北区伊斯灵顿快稳出租车服务还特别付费刊登庞大的篇幅。他拨了号码，但电话铃响时，他却有些惊慌，怕自己忘了瓦拉狄米尔口袋中那张收据上的签名。他挂掉电话，收回他的两便士。兰安？兰恩？他再拨一次。

一个单调似吟诵的女声回答：“快——稳——！贵姓——时间——和地址，请说。”

“我想和兰伯先生说话，麻烦你，他是你们的司机。”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

“抱——歉，这个电话不能接私人电——话。”她唱道，挂掉电话。

他拨第三次。这不是私人电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对自己的立场更有信心。他要兰伯先生来载他，只要兰伯先生，不要别人。“告诉他长途车。到斯特拉福28。”——信手挑了一个城镇——“告诉他我要到斯特拉福。”她坚持一定要有名字。“桑普森”他回答说，中间有个P的Sampson。

他回到长椅上继续等待。

打电话给拉康？为了什么？赶回家，打开香烟盒，找出藏在里面的珍贵的东西。这是瓦拉狄米尔首先丢掉的东西，他想：在间谍这一行，我们会先放弃我们最爱的东西。毕竟我还是占了上风。一对老夫妇在他对面坐下。先生戴着僵硬的汉堡帽，用一只锡哨吹着战争曲调。太太对着过路人露出空洞的微笑。史迈利避开她的目光，记起那个从巴黎寄来的棕色信封，拆开来，期望什么呢？或许是一张账单，这位老兄过去生活的旧债。或许是移民们像寄圣诞卡般寄给彼此的循环式战争标语。但这不是账单，也不是传单，是一封私人的信，一个请求，非常特别的一种请求。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的地址。用法文手写，写得很快。史迈利读了一次，正读第二次时，一辆福特柯蒂纳轿车驶了过来，一个穿着套头马球衫的年轻男子驾车，在戏院门口煞车停了下来。史迈利把信放回口袋里，过街朝车走去。

“有个P的桑普森？”年轻男子很粗鲁地透过车窗叫道，然后从车内把后门推开。史迈利坐进车里。一股刮胡水的香味混合着陈腐的香烟气味。他在手上放了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展示出来。

“可以请你关掉发动机吗？”史迈利问。

年轻男子顺从照做，一面从镜子里看着他。他有棕色的非洲头，洁白的手，指甲修得很干净。

“我是个私家侦探。”史迈利解释说，“我相信你一定碰过不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很麻烦，但我很乐意为你提供的情报付一些报酬。你昨天签了一张十三英镑的收据。你还记得你载的人吗？”

“高个子。外国人。有白色髭须，脚有点跛。”

“年老？”

“很老。拄着手杖。”

“你在哪里载他的？”史迈利问。

“柯斯莫餐厅，普雷德街，早上十点三十分。”年轻男子审慎地说。

普雷德街离西河苑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

“你载他到哪里？”

“查尔顿。”

“伦敦东南的查尔顿？”

“尼罗河战役街上的一座圣什么教堂旁边。找一家叫‘挫败青蛙’的小酒馆。”

“青蛙？”

“法国人嘛。”

“你留他在那里吗？”

“我等他一个小时，然后回普雷德街。”

“中途在其他地方停车吗？”

“去的时候，在一家玩具店停了一下。回程的时候，在电话亭停了一下。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他转头，把下巴抵在椅背上，大大咧咧地把手张开，比画着大小。“黄色的。他打的是市内电话。”

“你怎么知道？”

“我借他两便士，对不对？然后他回来借两个十便士，以防万一。”

我问他从哪里打来的，但他只说他有足够的零钱。莫斯汀这样说。

付给年轻男子十英镑钞票后，史迈利手伸向门把。

“你可以告诉公司说我没出现。”他说。

“告诉他们我有多开心，可以吗？”

史迈利迅速下车，赶着在年轻男子以相同的惊人速度飞快驶离之前关上车门。站在人行道上，他又读了一遍，此时，信的内容已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一个女人，他想，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她认为自己快死了。没错，我们都是，一点也没错。他假装自己漫不经心，漠然以对。每个人的同情心都是有限的，他辩称，我今天的同情心已经用完了。但这封信同样令他心生恐惧，再次升高了他的急迫感。

将军，我不希望显得太过戏剧性，但有两个男人在监视我的房子，我不认为他们是你或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我有个印象，他们试图要杀我。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他有东西要藏。要隐匿，就如他们在沙拉特所坚称的。他搭上巴士，换了几次车，注意背后，打着瞌睡。有着挎斗的黑色摩托车未再出现，他也没找出其他的监视者。在贝克街的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一个大型的硬纸板盒，一些报纸，一些包装纸和一卷思高牌胶带。他把瓦拉狄米尔的那包香烟放进盒里，还有欧斯特拉柯娃的信，用报纸塞满空隙。他包起盒子，用手纸缠住思高牌胶带。他对思高牌胶带一向没有办法。他在盒盖写上自己的名字，“亲自领取”。他雇了出租车到萨佛依饭店，将盒子托付给一个男柜台接待员，并附上一张一英镑钞票。

“这重量太轻，不可能是炸弹，对不对，先生？”接待员问，开玩笑地将盒子贴近耳边。

“我可不确定。”史迈利说，两人都一起笑了起来。

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瓦拉狄米尔，他满怀期待地问，你的另一项证据呢？

低垂的天际线拥塞着起重机与煤气筒；烟囱懒洋洋地朝着雨云吐出黄褐色的烟雾。如果这天不是星期六，史迈利就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但在星期六，他准备好要开车，尽管他一向与燃化的发动机相看两相厌。他从瓦克斯霍尔桥过河。格林威治已在背后。他进入船坞遍布的平坦河岸地区。雨刷瑟瑟抖动，豆大的雨点打过他这辆悲惨英国小车的车身。在公车站躲雨的孩子冲他嚷嚷：“继续开啊！”他已经刮过胡子，洗过澡，但并没睡。他把瓦拉狄米尔的电话账单寄给拉康，要求把清查所有可追踪的电话列为紧急要务。开着车，他的心智很澄净，但情绪却异常起伏。他穿着一件斜纹软呢大衣，是他旅行常穿的外套。他转过一个弯道，爬上坡，一间精美的爱德华式小酒馆，挂着红脸战士的招牌，突然出现在面前。尼罗河战役街从酒馆向上蜿蜒，直到一片长满枯草的土地。园地里耸立着圣主教堂，是个以石块与燧石建成的建筑，对着四周逐渐消失的维多利亚式仓房传布上帝福音。海报上说，下个星期天的布道者是救世军的一位女性军官。在海报前，有一辆货车：六英尺长的巨大拖车，深红色，侧窗挂着一面足球旗，门上贴着色彩杂乱的外国入境登记贴纸。这是眼前最庞大的物体，甚至比教堂还大。隐隐约约，他听见摩托车发动机慢慢减速又再激活的声音，但他连回头望一下都没有。这熟悉的随扈从切尔西就开始跟着他；但是，恐惧，就如同他在沙拉特所传授的，永远是选择的问题。

顺着便道，史迈利进入一个没有坟墓的墓园。几排墓石围起园界，一个攀藤的框架与三幢标准规格的新房子雄踞中央。第一幢房子叫“锡安”，第二幢完全没有名字，第三幢叫“三号”。每一幢都有宽大的窗户，但“三号”有蕾丝窗帘。他推开大门，就只见到阴暗的楼梯。他看着它静止不动，然后看着它下沉，看着它消失，仿佛没入地板，有那么一会儿他满心恐惧地怀疑，自己目睹了另一桩谋杀。他按了门铃，屋里响起悦耳的铃声。门是雕花玻璃做的。他把眼睛贴在门上，看见棕色的楼梯毯和看似摇篮车的东西。他又按了一次门铃，听见一声尖叫。起初声音很低，然后转为大声，他本来以为是孩子的叫声，接着认为是猫，最后知道是哨音壶。哨声高到极点，持续不断，接着突然停止，不是有人关掉炉火，就是壶嘴已经烧掉了。他绕到房子背后。这里跟正面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了排水管，一小片菜园，和一个用预铸板做成的金鱼池。池里没有水，当然也就没有金鱼，但在一个混凝土钵里，躺着一只黄色的木头鸭子。侧躺着的木鸭嘴张着，一只眼睛凝望天堂，两个轮子仍在转动。

“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出租车司机边说边用他洁白的手比画着，“黄色的。”

后门有一个门环。他轻敲了一下，试试门把，竟开了。他走进屋里，小心地关上背后的门。站在通往厨房的杂物间，厨房里首先吸引他

注意的是已移离炉火正无声冒着蒸汽的烧水壶。托盘上有两个杯子，一个奶精罐和一个茶壶。

“克瑞文太太？”他轻声叫唤，“丝黛拉？”

他穿过用餐室，走进大厅，踏着棕色地毯，站在摇篮车旁，在他心中，他正与上帝谈条件；只要不再有人死，不再有更多的瓦拉狄米尔，我将为我们的生活而敬拜您。

“丝黛拉？是我，麦斯。”他说。

他推开客厅的门，她坐在钢琴与窗户之间角落里的安乐椅上，冷淡坚决地望着他。她并不害怕，但她看起来像恨他的样子。她穿着一件亚洲式长洋装，没有化妆，抱着一个婴儿，是男是女，他无法分辨，也不复记忆。她让婴儿将乱发蓬生的头靠在她肩上，一手放在婴儿嘴上，不让孩子发出噪音。她的视线越过婴儿头顶看着他，充满挑战意味，大胆反抗着。

“伟林在哪里？”他问。

她缓缓地挪开手，史迈利预期婴儿会放声大叫，结果孩子只是一直盯着他看。

“他的名字是威廉。”她平静地说，“搞清楚，麦斯。那是他的选择。威廉·克瑞文。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不是爱沙尼亚人，不是苏联人，是英国人。”她是个漂亮的女人，黑色头发，非常平静。坐在角落里，抱着孩子，她宛如黑色背景上一幅永恒的画。

“我要和他谈谈，丝黛拉。我不是要找他做任何事。我甚至可以帮他。”

“我以前就听过这些话了，不是吗？他出去了，去他该去的地方工作。”

史迈利听了并没有发火。

“那么，他的货车为什么还在外面？”他温和地反驳。

“他到仓储中心去了。他们派车来接他。”

史迈利仍没有发火。

“那么，厨房里的第二个杯子是谁的？”

“他到仓储中心去了，他们派车来接他。”

他走上楼，她随他去。有一扇门在他的正前方，左边和右边各有一扇门，都开着，一间是婴儿房，一间是主卧室。面对他的门关着，他敲敲门，没人回答。

“伟林，我是麦斯。”他说，“我一定要和你谈谈，拜托。然后我就会离开，还你平静，我保证。”

他逐字再说一次，然后走下楼梯，回到客厅。婴儿开始放声大哭。

“也许你可以泡些茶。”他在婴儿哭泣间歇时建议道。

“你不能和他单独谈话。我不会让你们再引诱他卷入是非。”

“我从来没那么做。那不是我的工作。”

“他仍然怀念着你们的世界。我已经受够了。”

“是有关瓦拉狄米尔的事。”史迈利说。

“我知道是什么事。他们打了大半夜的电话，不是吗？”

“谁打的？”

“‘瓦拉狄米尔在哪里？瓦拉狄呢？’他们以为威廉是什么人？开膛手杰克吗？他没听到或看到瓦拉狄，天知道有多久的时间了。噢，贝琪，亲爱的，安静点！”她走过房间，在一堆洗涤物下找出一罐饼干，塞了一块到婴儿的嘴里。“我并不常这样。”她说。

“谁找他？”史迈利温和地追问到底。

“米凯尔，还有谁？记得米凯尔吗，我们自由电台的王牌，爱沙尼亚尚未就任的总理，要打探消息吗？今天早上三点，贝琪长出一颗牙，该死的电话就来了。米凯尔呼吸沉重地说，‘瓦拉狄在哪里，丝黛拉？我们的领袖在哪里？’我告诉他：‘你疯了，是不是？你以为只要小声说话，就不容易被窃听吗？’我劝他说，‘迷赛马吧，别搞政治了。’我告诉他。”

“他为什么担心？”史迈利问。

“瓦拉狄欠他钱，这就是原因。五十英镑。也许是一起赌马的时候输的。他们常输钱，一定是某一次输钱的时候欠的。他答应要带钱到米凯尔的住处，一起下盘棋。在深夜，我告诉你。他们显然都有失眠症，当然也都很爱国。我们的领袖没出现。戏剧性吧。‘天杀的为什么威廉要知道他在哪里？’我问他。‘去睡觉！’一个小时之后，猜猜谁又打电话来？像之前一样呼吸沉重？我们的米凯尔上校又来了，爱沙尼亚皇家骑兵队的英雄，喀哒靠脚脚跟，道歉。他沿着瓦拉狄的路往回走，用力敲门，大声按铃。没有人在家。‘听着，米凯尔，’我说，‘他不在这里，我们没把他藏在阁楼里。从贝琪的洗礼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对吧？威廉刚从汉堡回来，他需要睡眠，我不要叫醒他！’”

“所以他又挂掉电话了。”史迈利试探地说。

“他会挂掉才怪！他这个吸血鬼。‘伟林是瓦拉狄的最爱。’他说。‘干吗？’我说，‘三点半在亚斯寇特？听好，你该死的睡觉去吧！’瓦拉狄总是对我说，如果有任何事出差错，就该去找伟林。’他说。‘那你要他怎么做？’我说，‘开着拖车进城，也去用力敲瓦拉狄的门吗？’老天！”

她把孩子放在一把椅子上。孩子乖乖待在椅子上，满足地啃她的饼干。

一阵用力摔门的声音，接着从楼梯传来快速的下楼脚步声。

“威廉来了，麦斯。”丝黛拉直直地盯着史迈利，警告说，“他既不搞

政治，也不滑头，他爸爸是个烈士，但他的心情已经平复过来了。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而且他正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对吗？我说，对吗？”

史迈利走向房间较远的一端，让自己与门保持一些距离。伟林果决地走进来，依旧穿着运动服和慢跑鞋，他大约比丝黛拉年轻十岁，而且有些太过瘦弱。他坐进边缘的一张沙发里，炽烈的目光在妻子和史迈利身上逡巡，好像在猜谁会先开口似的。在往后梳的黑发衬托之下，他的高额头显得异乎寻常的白。他已刮过胡子，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他因开车而眼眶泛红的眼睛是棕色的，而且充满热情。

“你好，伟林。”史迈利说。

“威廉！”丝黛拉纠正他。

伟林紧张地点点头，同时对两人致意。

“你好，麦斯。”伟林说。他双手放在膝上，交缠着。“你好吗，麦斯？你们的作风就是这样，嗯？”

“我想你已经听到瓦拉狄米尔的新闻了。”史迈利。

“新闻？什么新闻，拜托？”

史迈利耗着时间。看着他，感受到他的紧张。

“他消失了。”最后，史迈利轻声回答，“我想他的朋友在非常不合宜的时间打电话给你。”

“朋友？”伟林依赖的眼光投向丝黛拉，“老移民，整天喝茶、下棋，谈政治？谈些疯狂的梦想？米凯尔不是我的朋友，麦斯。”

他说得很快，对用这种差劲的外国语言代替自己的母语，觉得很不耐烦。然而史迈利说话的速度，却好像他有一整天的工夫似的。

“但瓦拉狄是你的朋友。”他反驳说，“在你之前，瓦拉狄也是你父亲的朋友。他们一起在巴黎。军中袍泽。他们一起到英国来。”

衡量着这些话的分量，伟林瘦弱的身躯似乎正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他双手分开绷成弧形，他的棕发竖起，又再贴平。

“当然！瓦拉狄米尔，是我父亲的朋友。他的好朋友。也是贝琪的教父，可以吧？但没有政治目的。完全没有。”他看着丝黛拉，征求她的许可。“我，我是威廉克瑞文。我有个在英国的家，英国妻子，英国小孩，英国名字，可以吗？”

“还有英国工作。”史迈利很平静地加上一句，看着他。

“一份很好的工作！知道我赚多少钱吗，麦斯？我们买了房子，可能还要买车，够了吗？”

伟林的神态里，有某些东西——或许是他的能说善道，或是他生气蓬勃的抗辩——吸引了妻子的注意，此时，丝黛拉就像史迈利一样专注地观察伟林，她漫不经心地抱着婴儿，非常漫不经心。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威廉？”史迈利问。

“谁？麦斯，见到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拜托。”

“告诉他，比尔29。”丝黛拉命令他，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身上。

“你最后一次见到瓦拉狄米尔是什么时候？”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再问一次。

“很久了，麦斯。”

“好几个星期？”

“当然，好几个星期。”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在洗礼上。他是教父，我们办了一个宴会。但无关政治。”

史迈利的沉默开始制造出令人手足无措的紧张情绪。

“之后就没见过？”长时间的沉默后他终于开口问道。

“没有。”

“威廉昨天什么时候回来？”

“很早。”她回答。

“早到上午十点钟吗？”

“很可能，我不在这里。我去看我妈妈了。”

“瓦拉狄米尔昨天搭出租车来这里，”他解释说，仍然是对着丝黛拉，“我想，他见过威廉。”

没人助他一臂之力。史迈利没有，丝黛拉没有，连小婴儿都静止不动。

“在来的路上，瓦拉狄米尔买了玩具。出租车在巷口等了一个钟头，又载他回巴丁顿，他住的地方。”史迈利说，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持此刻的紧张气氛。

最后，伟林终于开口：“瓦拉狄是贝琪的教父！”他用力挥着手臂，一口英文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丝黛拉不喜欢他，所以他只能像个小偷，偷偷摸摸地来，懂吗？他带了玩具给贝琪，不行吗？这也犯法吗，麦斯？有法律规定老人不能送玩具给教女吗？”

再一次，史迈利与丝黛拉都没说话。他们都等待着无可避免的崩溃。

“瓦拉狄是个老人，麦斯。谁知道他能不能再见到贝琪？他是整个家族的朋友！”

“不是这个家族。”丝黛拉说，“再也不是。”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同志！在巴黎，他们一起对抗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带玩具给贝琪。为什么不行？拜托。为什么不行，麦斯？”

“你说那个该死的玩具是你自己买的。”丝黛拉说。她把手伸到胸前，扣上一颗纽扣，仿佛要砍了他似的。

伟林转向史迈利，恳求地说：“丝黛拉不喜欢那个老人，可以吧？她怕我和他搞太多政治，可以了吗？所以我没告诉丝黛拉。她到史丹斯医院去看她妈妈，瓦拉狄就趁这个机会来看贝琪，打声招呼，不行吗？”他绝望地跳起来，不断地挥动手臂抗议。“丝黛拉！”他叫喊着，“听我说！所以瓦拉狄昨晚没回家？拜托，我很难过。但这不是我的错，可以吗？麦斯！瓦拉狄是个老人！孤单的老人。也许他去找女人了，可以吗？他力不从心但仍然喜欢有女人做伴。在这方面，他可是很有名的，我想，不是吗？有何不可？”

“那么，昨天以前呢？”史迈利沉默良久后问。伟林似乎没太听懂，因此史迈利重新提出问题，“你昨天见过瓦拉狄米尔。他坐出租车来，还带了一只黄色木头鸭子给贝琪。有轮子的。”

“没错。”

“很好。但在昨天以前——昨天不算——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有些问题是孤注一掷，有些问题是全凭直觉，有些问题——就像这一个——是基于初步的了解，不全是直觉，但也还算不上是知识。

伟林用手背擦着嘴。“星期一。”他凄然地说，“我星期一见过他。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碰面了。没错。”

丝黛拉低声说：“噢，威廉。”她抱紧孩子——一个小战士，她低头望着细织地毯，等待自己的情绪平复。

电话响起。伟林像个被激怒的孩子，冲过去抓起话筒用力摔回去，接着把整部电话摔在地板上，又踢走听筒。他坐了下来。

丝黛拉转向史迈利。“我要你走。”她说，“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别再回来。拜托，麦斯。现在！”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似乎非常认真地考虑她的请求。他带着父辈的感情望向伟林；他望着丝黛拉。他的手探进内侧口袋，掏出一份折叠起来的第一版《标准晚报》，交给丝黛拉而非伟林，部分原因是他想伟林会崩溃。

“恐怕瓦拉狄已经永远消失了。”他略带歉意地说，“就在报纸上。他被射杀了。警方会找你问话。我必须先听过事情的经过，再告诉你如何回答。”

伟林绝望地开始说起俄文，而丝黛拉，似乎是因他的声调而非字句感染，放下手上的孩子，过去安慰另一个孩子，史迈利在这房间里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他独坐了一会儿，想着瓦拉狄米尔那卷未冲洗的底片

——直到冲洗之后才能看清楚，放在萨佛依饭店的盒子里，与那封令他一筹莫展的巴黎来信一起。他也想着第二项证据，猜想那会是什么，老人如何带着它，或许就在皮夹里；但他了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伟林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已在参加瓦拉狄米尔的丧礼。丝黛拉坐在他旁边，手放在他的手上，婴儿贝琪躺在地上，睡着了。伟林述说时，泪水不时滑下他苍白的脸颊。

“对其他的人，我什么也不会做，”伟林说，“但对瓦拉狄，我愿意付出一切。我爱这个人。”“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对我来说，瓦拉狄就是父亲。有时候我甚至会叫他‘我的父亲’。不是伯父，是父亲。”

“也许我们可以从星期一开始说起。”史迈利建议，“第一次的会面。”

瓦拉狄打电话来，伟林说。这是几个月来，伟林第一次接到他或集团里任何人的消息。瓦拉狄出乎意料地打电话到仓储中心找伟林，当时伟林正在捆牢要发往多佛的一批货物，并与办公室查对他的转运文件。这是他离开之后集团所作的安排，伟林说。他已经离开了，就像大家一样，多多少少，但如果有紧急需要，他们可以在星期一早晨到仓储中心找他，不到家里，因为丝黛拉的关系。瓦拉狄是贝琪的教父，身为教父，他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家里。但不谈公事。绝不。

“我问他：‘瓦拉狄！你要干吗？听着，你还好吗？’”

瓦拉狄米尔在路上的电话亭打的。他想立刻私下谈谈。伟林违反所有雇员所应遵守的规定，在转弯处载他上车，并让他跟着到多佛跟了几乎一半的路程“黑的”，伟林说，意即非法的。这老兄带了一个装满柳橙的藺草篮，但伟林可没心情问他干吗带着几磅重的柳橙上车。开始，瓦拉狄米尔谈起巴黎和伟林的父亲，以及他们相互扶持的奋斗；接着，他就谈到伟林可以帮他一个小小的忙。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一个小小的忙。也看在集团的分上，因为伟林的父亲曾是这么伟大的一个英雄人物。

“我告诉他：‘瓦拉狄，我不可能帮你的忙。我答应过丝黛拉了，这是不可能的！’”

丝黛拉的手抽离丈夫身边，她独自坐下。她想为老人的死而安慰丈夫，却又因为丈夫毁弃承诺而伤心。

只是一个小小的忙，瓦拉狄米尔坚持说，很小，不麻烦，没有风险，但对我们的目标有极大的帮助，这也是伟林的义务。接着，瓦拉狄米尔拿出他在洗礼上拍的贝琪的照片。照片放在黄色的柯达信封里，洗好的照片在一边，有玻璃纸保护的底片放在另一边，蓝色货签仍盖在外面，一切都如那天般纯真无邪。

他们欣赏着照片，片刻之后，瓦拉狄米尔突然说：“这是为了贝琪，伟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贝琪的未来。”

听到伟林的陈述，丝黛拉握紧拳头，当她再次抬起头时，显得更加坚决，但却也更老，双明的眼角已然浮现许多细碎小皱纹。

伟林继续述说经过：“然后瓦拉狄告诉我：‘伟林，你每个星期一开车到汉诺威和汉堡，星期五回来。你在汉堡停留多久？’”

伟林回答说，他尽可能停留得越短越好，但要看他重新装货所需的时间，也要看他是否送到代理商或特定的收件人，还要看他抵达的时间与他文件上的停留时间，以及他回程所载的货物，如果有的话。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伟林现在就可以一一列举，都是非常琐碎的事——在途中，伟林在哪里睡觉，在哪里吃饭——史迈利知道，老人正以极端怪异的方式做着他自己也会做的事；他用谈话把伟林逼进困境，让他的回答成为服从的前奏。在问过这些问题之后，瓦拉狄米尔才对伟林说明，运用他在军队中与家庭中的所有权威，他想要伟林做的事。

“他告诉我说：‘伟林，替我把这些柳橙送到汉堡。拿着这个篮子。’干吗？”我问他，“将军，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个篮子？”接着他给了我五十英镑。“以备急用。”他告诉我说，“如果有紧急情况，这里有五十英镑。”但我干吗带着这个篮子？”我问他，“你说的是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将军？”

然后，瓦拉狄米尔对伟林详述他的指令，包括撤退与突发事故，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用这五十英镑多留一个晚上。而史迈利注意到，正如他对莫斯汀所说的，老人是多么坚持莫斯科规则，甚至是过于坚持，一向如此。年纪越大，老人就越陷入自己的阴谋情境，不可自拔。伟林必须把装有贝琪照片的黄色柯达信封放在柳橙上面，他必须漫步到客舱前方——伟林要做的就只有这样，他说——信封等于是个信箱，而东西送达信封的讯号是一个粉笔记号，“也像信封一样是黄色的，我们集团的传统。”伟林说。

“那么，安全记号呢？”史迈利问，“表示‘没有人跟踪我’的记号呢？”

“前一天的汉堡报纸。”伟林很快地回答，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坦承，他与瓦拉狄米尔有一点小小的意见不合，虽然他尊敬瓦拉狄米尔是位领袖，是位将军，也是他父亲的朋友。

“他告诉我说：‘伟林，你把报纸放在口袋里。’但我告诉他：‘瓦拉狄，拜托，看看我，我只有一套运动服，而且没有口袋。’所以他说了：‘伟林，那就把报纸夹在腋下。’”

“比尔，”丝黛拉吸一口气，略带敬畏，“噢，比尔，你这个该死的傻瓜！”她转向史迈利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干吗不用邮寄，无论是什么东西，干吗非要这么做不可？”

因为那是底片，只有底片才符合莫斯科规则。因为将军害怕被人背叛，史迈利想。那老家伙看见到处都有背叛者，他身边的任何人都。而如果死亡是最终的定论，那么他显然是对的。

“成功了吗？”史迈利非常温和地对伟林说，“递交的过程顺利吗？”

“当然！我做得很好。”伟林欣然承认，抛给丝黛拉一个大胆违抗的眼神。

“那么，你有没有任何想法，例如，谁可能是与你接头的对象？”

此时伟林有着更多犹豫，但在更多催促之下，部分是来自丝黛拉的催促下，他又陆续说起那张看起来绝望、令他想起父亲的空洞面孔，那警告的眼神，无论是真有其事，或只是因为他太兴奋而想像出来的，说起他有时候，看电视里播出的他心爱的足球赛，摄影机捕捉到的某个人的脸孔或表情会突然深印在记忆中，即使以后永远不会再看见，而汽船上的那张脸孔，就是这样的情形。他描述说那人头发飘扬，裹在手套里的指尖轻抚着光洁的脸颊，身材纤小，却很性感——伟林说他看得出来。他说自己有被那人警告的感觉，警告他要小心照料珍贵的东西。伟林自己也会有相同的眼神——他突然以悲剧式的浮夸神态对丝黛拉说——如果有另一场战争，必须战斗，他不得不将贝琪留给陌生人照顾的话！这句话带来了更多泪水，更多安慰，更多对老人之死的悲叹，而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不啻为一大解脱。

“所以你带回黄色信封，昨天将军带鸭子来给贝琪时，你亲手把信封交给他。”他温和地说，仿佛已知道一切，但是，仍有一些尚待补充。

他有个习惯，伟林说，星期五开车回家之前，会在仓储中心，坐在驾驶座上睡几个小时，然后刮个胡子，与小伙子们喝杯茶，这样回家时就会觉得神清气爽，不至于紧张又坏脾气。这是他从老手身上学到的办法，别赶着回家，否则你只会觉得后悔。但昨天不同，他说，昨天丝黛拉带贝琪到史丹斯去看她妈妈了。所以他直接回家，打电话给瓦拉狄米尔，告诉他我们事先约定好的代号。

“打电话到哪里？”史迈利问，轻声打断他的话。

“公寓。他告诉我：‘只能打到公寓找我。别打到图书馆。米凯尔是个好人，但他不知情。’”

然后，伟林继续往下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忘了多久——瓦拉狄米尔坐着出租车到家里来，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事，还带了鸭子给贝琪。伟林把装着照片的黄色信封交给他，瓦拉狄米尔拿到窗边，非常缓慢地，“就像那是来自教堂的圣物，麦斯。”瓦拉狄米尔背对伟林，把底片一张张对着光查看，直到找着他要的那张，然后凝视着底片很久。

“只有一张？”史迈利很快地问——他心中仍挂念着两项证据——“一张底片？”

“没错！”

“是一张，还是一卷？”

一张，伟林非常确定。一张小小的底片。没错，3cm×5cm，就像他自己的爱格发自动相机一样。没有，伟林不可能看到内容，无论是写的东西或其他什么。他只看见瓦拉狄米尔，就只有这样。

“瓦拉狄脸色泛红，麦斯。脸上散发着野性，麦斯，从他的眼睛透露出来。而他是个老人家。”

“在你的旅途中，”史迈利说，他用这个重要的问题打断伟林的故事，“从汉堡返家的途中，你也没想过要看一眼？”

“那是机密，麦斯。是军事机密。”

史迈利瞥了丝黛拉一眼。

“他不会的，”她回答着他未问出口的问题，“他太正直了。”

史迈利相信她。

伟林继续讲他的故事。瓦拉狄米尔把黄色信封放进口袋，拉着伟林到花园里，对他表示感谢。瓦拉狄米尔双手握住伟林的手，告诉他说，他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最棒的；说伟林是他父亲的儿子，是比父亲更好的战士，有着爱沙尼亚最优秀的血统，沉稳、正直、可靠。有了这张照片，他们可以报答许多恩义，也可以对布尔什维克造成极大的伤害。那张照片是一项证据，一项不容忽视的证据。但是什么样的照片，他没说。只有麦斯能看，只有麦斯会相信，会记得。伟林不太了解他们为何必须到花园里去，但他猜想，老人可能情绪激动，怕有麦克风，因为瓦拉狄不断谈着安全问题。

“我送他到大门口，但没送他上出租车。他告诉我说，我不必送他上车。‘伟林，我是个老人。’他对我说。我们用俄文交谈。‘下个星期也许我就死了。谁在乎？今天我们打了漂亮的一仗。麦斯会非常以我们为荣。’”

将军最后对他说的话竟然一语成谶。伟林再次暴怒地跳了起来，他的棕色眼睛愠怒欲燃。“是苏联！”他大叫，“是苏联间谍，麦斯，他们杀了瓦拉狄米尔！他知道得太多了！”

“你也一样。”丝黛拉说，随后是一阵颇不自在的漫长沉默。“我们都一样。”她说，瞥了史迈利一眼。

“他只说了这些？”史迈利问，“没有别的，例如你完成的工作的价值？麦斯会相信的事？”

伟林摇摇头。

“或者还有其他的证据，例如？”

没有，伟林说，没有了。

“他没有解释最初如何和汉堡联络，订下约会？是否还有集团里的其他人参与？请想一想。”

伟林想了一想，但没有结果。

“那么，除了我之外，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威廉？”史迈利问。

“没有，麦斯，没有任何人！”

“他没有时间。”丝黛拉说。

“没有别人！在路途中，我睡在驾驶座上，省下一晚十英镑的住宿费。我们用这笔钱买了房子！在汉堡，我没告诉任何人！在仓储中心也没有！”

“瓦拉狄米尔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就你所知？”

“在集团里，只有米凯尔知道，这是必要的，但并不知道全部，即使是米凯尔。我问他：‘瓦拉狄米尔，谁知道我帮你做这件事？’只有米凯尔，但他只知道一点点。”他说，“米凯尔借我钱，借我影印，他是我的朋友。但即使是朋友，我们也不能信任。敌人我不怕，伟林。但我最怕的是朋友。”

“如果警察到这里来，”史迈利对丝黛拉说，“如果他们来了，他们只会知道昨天瓦拉狄米尔坐车到这里来。他们会找上出租车司机，就像我一样。”

她那双灵活的大眼睛望着他。

“所以呢？”

“所以别告诉他们其余的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事。太多信息反而会使他们难堪。”

“是让他们难堪，还是你？”丝黛拉问。

“昨天瓦拉狄米尔来看贝琪，还带了礼物给她。这是表面上的故事，就像威廉起初讲的。他不知道你带她去看你妈妈。他在这里见到威廉，谈起往事，走到花园里。他不能等太久，因为出租车的关系，所以他没见你和教女就走了。这就是全部的故事。”

“你来过这里吗？”丝黛拉依然望着他。

“如果他们问起我，没错，我今天来过，带给你们坏消息。警方不在乎伟林以前曾属于那个集团。对他们来说，眼前的问题才重要。”

史迈利把注意力拉回伟林身上，“告诉我，你带了其他东西给瓦拉狄米尔吗？”他问，“除了信封里的东西之外？一份礼物，也许？他喜欢却无法自己买到的东西？”

在回答之前，伟林全神贯注地思索这个问题。“香烟！”他突然大叫，“在船上，我为他买了法国烟当礼物。高卢牌，麦斯。他很喜欢！‘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伟林！’当然！”

“那么，他向米凯尔借来的五十英镑呢？”史迈利问。

“我还他了，当然。”

“全部？”

“全部。香烟是礼物，麦斯。我爱这个人。”

丝黛拉看着他向门走去。在门边，他谦和地握住她的手臂，领了她

几步，走进花园里，避开她丈夫的听觉范围。

“你已经落伍了。”她告诉他，“无论你在做什么，迟早有一边要停手。你就像集团一样。”

“安静听我说。”史迈利说，“你在听吗？”

“没错。”

“威廉不能对任何人提到这件事。在仓储中心，他喜欢和谁说话？”

“全世界的人。”

“那么，尽你所能吧。除了米凯尔之外，还有谁打电话来？即使是打错电话的？铃响——然后挂掉的？”

她想了一想，摇摇头。

“有人来过这里吗？推销员，市场调查员，传福音的人，兜揽生意的人，任何人？你确定？”

丝黛拉仍然凝视着他，她的眼睛似乎真正了解了，流露出欣赏的神色。接着，她再次摇摇头，否认有任何他所说的共犯来过。

“走吧，麦斯。你们都走开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有多糟。他已经长大了，他不再需要主教了。”

她目送他离去，也许是要确定他真的离开了。他开着车，有好一会儿，瓦拉狄米尔那卷放在箱里的底片，仿佛藏起来的钱一般，令他烦躁不安——它是否依然安全，他是否应该查看一下或换个地方，因为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穿越边界带回来的。但驶抵河畔时，他却有了其他的想法和目标。避开切尔西，他加入北区星期六繁忙的车阵中，旁边多是开着旧车的年轻家庭。一辆有着挎斗的黑色摩托车，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到布鲁斯贝利30。

自由波罗的海图书馆位于三楼，楼下是一家尘埃遍布的古书店，专营圣灵书籍。图书馆小小的窗户斜对着大英博物馆的前院。史迈利踏上一道木头回旋梯，穿过许多年代久远、用图钉钉着的手绘标志和一大堆隔壁药房的棕色化妆品箱，才到达图书馆。走到头，他发现自己已经喘不过气来，所以在按门铃之前，很明智地歇息一会儿。他等候着，用沉思冥想忘却暂时的精疲力竭。他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一再拜访相同的高楼：汉普斯特德的安全公寓，瓦拉狄米尔在西河苑的阁楼，现在是这幢曾是所谓“布鲁斯贝利劣品”的五十年代遗风建筑。他觉得很奇怪，这几处都是单独的处所，单独的测试处所，用来测试尚未言明的价值。错觉消失了，他按了门铃，三短一长，心里琢磨他们是否更改了记号；他仍担心着伟林，或者丝黛拉，或者只是那个孩子。他听见近处响起地板的噼啪声，猜想自己正被仅一步远的某人，从窥视孔里观察着。门很快打开，他踏进阴郁的玄关，一双肌肉结实的臂膀拥抱着他。他闻到身体的热气、汗水和香烟的气味，也感觉到那未刮胡子的脸颊贴近自己的脸颊——左颊，右颊，好像在颁发奖牌——左颊又多了一次，代表特别的情感。

“麦斯！”米凯尔以安魂曲似的声音低声说道，“你来了。我很高兴。我希望你来，但不敢抱太大期望。虽然如此，我还是等着你。我等了一整天。他爱你，麦斯。你是最好的。他总是这么说。你启发了他。他告诉我。他的模范。”

“我很难过，米凯尔。”史迈利说，“我真的很难过。”

“我们都是，麦斯。我们都是。伤心透顶。但我们是战士。”

他短小精悍，背脊凹陷，仪表整洁，正符合他自己宣称的前骑兵队上校的身份。他的棕色眼睛因彻夜守候而泛红，显得有些下垂。他肩上披了一件色彩鲜艳的运动上衣，像披风似的；脚上的黑色靴子擦得锃亮，随时可以上马奔驰。他的灰色头发依军人作风打理得很整齐，他的髭须稀疏，但精心修剪过。乍看之下，整张脸显得很年轻，只有细看，才会看见苍白的皮肤满布细碎的三角洲，泄露了他的年龄。史迈利随着他走进图书馆。图书馆与房子等宽，依消失的几个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当然还有爱沙尼亚——分隔成三小间，每一间都有一张桌子，一面旗子，和几张摆放棋盘等待赛局的桌子，但没有人在下棋，也没有人在看书；里面没有人，只有一个年约四十，穿着短裙、短袜的丰满女人。她有一头发根呈暗色的黄头发，梳成简单的发髻。她闲适地坐在茶炉31旁，正在读一本介绍秋季桦树林的旅游杂志。米凯尔与她四目交接，停顿了一下，似乎准备开口介绍，但看在史迈利眼里，她的目光却充满了强烈、不容置疑的怒火。她看着他，轻蔑地瘪起嘴，目光转向雨滴飘落的窗户。她的脸颊因落泪而闪着水光，低垂的眼睑下，有着橄榄色的淤伤。

“艾薇拉也很爱他。”走出她的听力范围之后，米凯尔解释说，“他是她的兄弟。他教导她。”

“艾薇拉？”

“我太太，麦斯。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终于结婚了。我坚持的。这对我们的工作不见得有利。但我欠她一份保障。”

他们坐下来。在他们四周、沿墙挂着那些已被遗忘的行动中的牺牲者。这个已经是入狱了，透过铁丝网拍到的。这个已经是死了——就像瓦拉狄米尔一样——他们拉开罩布，露出他那张血淋淋的脸。第三个，笑嘻嘻的，戴着游击队的宽松帽子，扛着长枪身的来复枪。从这个房间里，他们听到一声小小的爆炸声，就紧接在一句嘹亮的俄文咒骂之后。艾薇拉，米凯尔的新娘，正在点茶炉。

“我很难过。”史迈利又说了一遍。

敌人我不怕，伟林，史迈利想，我最怕的是朋友。

他们坐在米凯尔的小隔间里，米凯尔称之为他的办公室。一部老式的电话放在雷明顿立式打字机旁。这台打字机和瓦拉狄米尔房里的一样。一定是有人同时买了好几台给他们，史迈利想。但这个小隔间的焦点是一张手工雕刻的高椅子，螺旋状的椅脚别无装饰，但椅背上却精雕着帝王徽饰。米凯尔堂而皇之地在那张椅子上坐下，皮靴抵着膝，对这张王座而言，他是个太过娇小的代理国王。他从底下拿出一根烟来，点亮。在他上方，笼罩着一片香烟云雾，而那里正是史迈利记忆所及之处。在废纸篓里，史迈利注意到有几本丢弃的《运动生活》。

“他是领袖，麦斯，他是英雄。”米凯尔说，“我们必须从他的勇气和典范中获益。”他停顿了一下，好像是期待史迈利记下来好对外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自然地会问自己，如何能坚持下去。谁有分量能追随他？谁有他的声望，他的荣誉，他的使命感？很幸运的，我们的运动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这比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都更伟大。”

听着米凯尔琢磨得闪闪发亮的言辞，看着他擦得闪闪发亮的皮靴，史迈利不禁为这个男人的年龄感到惊叹。苏联在一九四〇年占领爱沙尼亚，他回忆道。当时担任骑兵队军官的米凯尔，现在至少六十岁了。他努力想拼凑出米凯尔颠沛流离的生平——经历外国征战与无法信赖的民族军队，一条漫漫长途，所有这些历史章节，都写在这一个小小的躯体里。他也很好奇，这双皮靴的年纪有多大？

“告诉我，他的最后一段日子，米凯尔。”史迈利建议，“他一直到最后都很活跃吗？”

“绝对活跃，麦斯。在所有方面都很活跃。无论是身为爱国者、身为男人，还是身为领袖。”

表情依旧轻蔑的艾薇拉把茶放在他们两人中间，当然还有两个放了

柠檬的杯子，和一小盘核桃脆片饼干。她的动作隐隐有着暗讽意图，无论是她摆动着的腰臀，还是快快不乐的挑衅。史迈利也努力回想她的背景，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许他根本从来就不知道。他是她的兄弟，他想，他指导她。但从很久以前，他就已经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到教训，千万别相信解释，特别是有关爱情的。

“身为集团的一员呢？”史迈利等她离去之后问道，“也很活跃？”

“一直都是。”米凯尔严肃地说。

一阵沉默，两人都很有礼貌地等对方先开口。

“你想是谁干的，米凯尔？有人背叛他吗？”

“麦斯，你和我一样，很清楚是谁干的。我们全部都冒着危险。我们全部。任务随时会来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准备好。我自己是个战士，我已有所准备，我已就绪。如果我走了，艾薇拉会有她的保障。就是这样。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我们这些流亡人士，还是头号敌人。被诅咒驱逐的人。只要他们可以，就会摧毁我们。现在依然如此。就像他们摧毁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文化一样。他们是对的，麦斯。他们对我们心生恐惧是对的。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击败他们。”

“但他们为何特别挑这个时机呢？”在这篇行礼如仪的宣言之后，史迈利温和地反驳，“他们在好几年前就可以杀了瓦拉狄米尔。”

米凯尔拿出一个扁平的锡盒，上面有两个滚动条，像是轧布机似的，以及一包粗糙的黄色烟纸。他舔了舔烟纸，放在滚动条上，然后铺上黑色烟草。噼啪一声，轧布机转动，银白色的表面上出现了一根丰硕、蓬松的香烟。他正要点燃，艾薇拉走了过来，把烟拿走。他又卷了一根，然后把锡盒放回口袋。

“除非瓦拉狄米尔正着手做某些事，我猜。”史迈利在这场演出结束之后继续说，“除非他做了什么激怒他们的事——他可能已经做了，你知道他的。”

“谁会知道？”米凯尔说，漫不经心地将更多烟雾吐到他们头顶上的空气里。

“嗯，你可以，米凯尔，如果有人能知道的话。当然他会对你透露。二十多年来，你一直是他的心腹。起初在巴黎，然后在这里。别告诉我说他不信任你。”史迈利率直地说。

“我们的领袖是个神秘的人，麦斯。这是他的力量。他必须如此。这是军事的需要。”

“但对你不会，对不对？”史迈利以极尽奉承的声调坚称，“他的巴黎副官，他的侍从武官，他的机要秘书？别这样，你说话要凭良心。”

米凯尔从他的王座上前倾身体，把小小的手掌整整齐齐地放在心脏上。他沉重的音调变得更加深沉。

“麦斯，甚至是对我。到后来，甚至对米凯尔都是如此。这是为了保护我。不让我知道危险的内情。他甚至对我说：‘米凯尔，如果你——即使是你——不知道我们抛弃了什么样的过往，可能会比较好。我恳求他，但没有用。有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这里。我在楼上睡觉。他按了特殊的门铃声：‘米凯尔，我需要五十英镑。’”

艾薇拉又走进来，这次拿了一个空的烟灰缸。当她把烟灰缸放到桌上时，史迈利顿时感觉到一阵紧张，如同药效突然发作。他开车时曾有过相同的经验，等待着并未发生的撞击。他也在安恩身上体会过相同的经验，看着她从某些看似无害的约会中归来，心中却知道——只是单纯地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他等艾薇拉离开后才问。

“十二天以前。上个星期一。从他的态度，我马上看出来，这一定有关公事。他以前从来没问我借钱。‘将军，’我告诉他说，‘你有阴谋在进行。告诉我是什么。’但他摇摇头。‘听着，’我对他说，‘如果是阴谋的话，那么听我的忠告，去找麦斯。’他拒绝了。‘米凯尔，’他对我说，‘麦斯是个好人，但他对我们的集团不再有信心。他甚至希望我们结束我们的奋斗。但只要我如愿抓起这条大鱼，我就会去找麦斯，要求支付我们的费用，或许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我事后才会这样做，不是事前。同时，我总不能衣衫不整地去做事吧。借我五十英镑。在我的一生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任务。这追溯到我们久远的过往。’他就是这样说的。我皮夹里有五十英镑——很幸运的，我那天的投资很成功——我交给他。‘将军，’我说，‘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去。我的财产也是你的。拿去。’”米凯尔说，用力挥着他的黄色香烟，似要画下句点，也或许是要强调确认。

透过他们头顶上的脏污窗户，史迈利瞥见艾薇拉站在房间中央的倒影，她正在倾听他们的谈话。米凯尔也看到她了，甚至皱起眉头，但他似乎不愿意——也许是无法——命令她走开。

“你人真好。”史迈利略作停顿之后说。

“麦斯，这是我的本分。真心诚意。这是我惟一的法则。”

她看不起我，因为我没帮助那个老人，史迈利想。她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她知情，而现在，她看不起我，因为我没有在老人需要帮忙的时刻助他一臂之力。他是她的兄弟，他记得。他指导她。

“他来找你——向你要求活动经费，”史迈利说，“是不是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事，让你觉得他在着手作一些大计划？”

米凯尔再次皱起眉头，耗了许多时间，很显然，米凯尔并没有太在乎这些问题。

“几个月前，也许是两个月吧，他收到一封信。”他谨慎地说，“在这里，这个地址。”

“他很少收到信吗？”

“这封信很特别。”米凯尔说，仍然小心谨慎。突然之间，史迈利了解到米凯尔是处在沙拉特审问技巧中所谓的“输家的绝境”，因为他不知道——他只能靠猜测——小史迈利到底知道了多少。因此，米凯尔会对情报的提供戒慎恐惧，希望能趁机了解史迈利手上握有的优势。

“谁寄来的？”

米凯尔，一如常态，回答的答案与问题有些不对应。

“是从巴黎寄来的，麦斯，一封长信，许多页，手写的。寄给将军个人，不是米勒。给瓦拉狄米尔将军，私人性质的。信封上写着私人信函，法文。收到信后，我锁在书桌里；十一点钟，他像往常一样进来：‘米凯尔，我向你致敬。’有时候，相信我，我们甚至会彼此致敬。我把信交给他，他坐下来。”——他指向艾薇拉所在房间那端——“他坐下，很不在意地打开，仿佛他对那封信毫无期待，但我发现他渐渐地凝神贯注。全心全意。我会说是完全被吸引住了。甚至是热情洋溢。我对他说话。他没回答。我又说了一遍——你是知道他的——他完全没理我。他出去散步。‘我会回来。’他说。”

“带着信？”

“当然。这是他的作风，当他有重要的事要考虑时，就会出去散步。他回来时，我注意到他非常激动。可以说是兴奋。‘米凯尔。’你知道他说话的方式。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米凯尔，拿出复印机。替我放进几张纸。我有一份文件要影印。’我问他要印几份。一份。我问他有几页。‘七张。我操作机器时，请站在五步的距离之外。’他对我说，‘我不能把你卷进这件事。’”

米凯尔再一次指出位置，好像要用以证明故事的正确无误。黑色的复印机单独放在一张桌上，像是一部老式的蒸汽发动机，有着滚动条，以及放进不同化学药剂的孔洞。“将军不太懂机器，麦斯，我替他设定好机器。然后，我站在这里隔着整个房间，大吼大叫地教他操作。印完，等油墨干了以后，他拿起副本，折好放进口袋里。”

“原件呢？”

“也放在他的口袋里。”

“所以你没看过信？”史迈利说，语气中有些惋惜。

“没有，麦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我没看过。”

“但你看见信封了。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交给他。”

“我告诉你了，麦斯。那是从巴黎寄来的。”

“哪一区？”

又有些犹疑。“第十五区。”米凯尔说，“我相信是从第十五区寄来的。我们有很多人住在那一区。”

“日期呢？你能说得更精确吗？你说大约是两个月前。”

“九月初。我记得是九月初。不可能是八月底。大约六个星期，左右。”

“信封上的地址也是手写的？”

“没错，麦斯，是手写的。”

“信封是什么颜色？”

“棕色的。”

“墨水呢？”

“我想是蓝色的。”

“用什么封起来？”

“什么？”

“信封是用封笺腊或胶带封起来的？或只是用普通的胶粘住？”

米凯尔耸耸肩，仿佛这种细节不劳他费心。

“但寄信的人把他的名字写在信封上，不是吗？”

即使米凯尔看见了，也不承认。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的心思围绕在寄存萨佛依饭店的棕色信封，以及信中需要帮助的殷切恳求上。今天早上，我有一种感觉，他们试图要杀我。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巴黎邮戳，他想。第十五区。在第一封信之后，瓦拉狄米尔把家里的地址给对方，他想，就像他把家里的电话给伟林一样。在第一封信之后，瓦拉狄米尔确实找过米凯尔。

电话响起，米凯尔去接，只说了一声“嗯？”就静静聆听。

“那就每一个都给我押五吧！”他低声说，然后以堂皇的威仪挂掉电话。

逐步趋近来造访米凯尔的主要目的，史迈利非常谨慎地继续进行。他记得米凯尔——在巴黎加入集团时，已见识过东欧大半审问中心的米凯尔——在面对测试时会想办法放慢速度。当时他就靠着这种手法，把沙拉特的讯问人员搞得快疯了。

“我可以问你一些事吗，米凯尔？”史迈利小心地选择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提出质问。

“请说。”

“他来找你借钱的那个晚上，有没有逗留？你有没有替他泡茶？下一盘棋，或许？你可以告诉我详情吗，拜托，关于那个晚上？”

“我们下了棋，但不太专心。他心里想着别的事，麦斯。”

“他谈到那条大鱼吗？”

“什么，麦斯？”

“大鱼。他说他正在计划的行动。我在想，他有没有再多谈一些？”

“没有，什么都没有，麦斯。他完全保守秘密。”

“你有没有印象，那件事可能涉及其他国家？”

“他只提到说没有护照。他深受伤害——麦斯，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他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圆场无法信任他拥有护照。在提供了这么多服务，奉献了这么多心力之后——他真的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是为他好，米凯尔。”

“麦斯，我完全理解。我是个比较年轻的人，通达世故，很有弹性。而将军有时很冲动，麦斯。必须采取一些步骤——即使是由很敬仰他的人动手——去控制他的精力。拜托，但对他自己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是一种羞辱。”

史迈利听到背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是艾薇拉傲然走向她的角落。

“所以，他想要派谁替他出国？”史迈利问，再次忽视她的存在。

“伟林。”米凯尔颇不以为然地说，“他没告诉我详情，但我相信他派了伟林去。这是我的印象。伟林会去的。瓦拉狄米尔将军对伟林的年轻和荣誉大为赞赏。还有他的父亲。他甚至还提到过去的历史。他提到要引进新生代，去替老一辈雪耻复仇。他非常激动。”

“他派伟林去哪里？瓦拉狄提到任何蛛丝马迹吗？”

“他没告诉我。他只对我说：‘伟林有护照，他是个勇敢的孩子，一个优秀的波罗的海子民，非常沉稳，他可以旅行，但也必须保护他。’我没再刺探，麦斯。我没追根究底。这是我的作风，你是知道的。”

“但你仍然归结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我想。”史迈利说，“一贯的作风。毕竟，伟林能自由出入的地方并不多。仅仅靠这五十英镑。还有伟林的工作，对不对？更别提他的妻子。他不能一时兴起就海阔天空到处去。”

米凯尔做了一个非常军人作风的姿态。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灵巧地拉住鼻子，嘴唇外张，直到髭须几乎都朝天竖起。“将军也问我要地图。”最后他说，“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你是他的主教，麦斯。但你与我们的运动无关。但我信任你，我会告诉你。”

“哪里的地图？”

“街道地图。”他一手朝书架轻挥着，好像命令它们靠近一些。“城市规划。丹泽（波兰北部港口）、汉堡、卢比克（德国北部城市）、赫尔辛基。北部沿海。我问他：‘将军，长官。让我帮你吧。’我对他说：‘拜托，我是你所有事情的助手。我有权利。瓦拉狄米尔，让我帮你吧。’他拒绝了我。他希望全部自己来。”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再次想起。许多地图，其中只有一份相关。而且，再一次的，他注意到，瓦拉狄米尔对自己最信任的巴黎副官，也采取了防范目的曝光的措施。

“在这之后，他就离开了？”史迈利问。

“没错。”

“大约几点？”

“非常晚。”

“能告诉我有多晚吗？”

“两点，三点，甚至是四点。我不确定。”

此时，史迈利感觉到米凯尔的目光飘起，越过他的肩头，停滞不动，史迈利出于他一向拥有的直觉，问道：“瓦拉狄米尔独自一个人来吗？”

“当然，麦斯。他会带谁来？”

一阵陶器的铿锵声打断他们，是房间另一端的艾薇拉笨手笨脚地处理家务。此时方有勇气直视米凯尔的史迈利，发现米凯尔的目光紧随艾薇拉，脸上露出一一种史迈利能认得出来、却有一瞬间难以形容的表情：融合着绝望与爱恋，在依赖与厌恶之间煎熬。史迈利发现自己以近乎病态的同情看着那张脸，仿佛看见自己的脸孔，那熟悉的表情，像米凯尔似的红眼睛，映在美丽金箔雕饰的镜子里，在水滨街家中安恩的镜子里。

“所以，如果他不让你帮他，你怎么做？”史迈利仍旧假装不经心地问，“坐下来，看书，与艾薇拉下棋？”

米凯尔的棕眼睛凝望他良久，然后转开，最后又回到他身上。

“不，麦斯。”他彬彬有礼地说，“我给他地图。他希望自己处理那些地图。我祝他晚安。他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很困了。”

但艾薇拉不困，很显然的，史迈利想。她跟在这位兄长后面，等候指示。身为爱国者，身为男人，身为领袖，他都很活跃，史迈利又重新想起。在所有方面都很活跃。

“在那之后，你与他有过联系吗？”史迈利问。米凯尔跳到昨天。一直到昨天才再联络，米凯尔说。

“昨天下午，他打电话给我。麦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看见他这么兴奋。很快乐，可以说是欣喜若狂。‘米凯尔！米凯尔！’麦斯，他真的很愉快。他晚上会来找我。昨晚。可能会很晚，但他会还我五十英镑。‘将军，’我对他说，‘什么五十英镑？你还好吗？你安全吗？告诉我。’米凯尔，我已经完成了，我很高兴。别睡着。”他对我说，‘我会在十一点来找你，十一点多一点。我会带钱来。我当然还要和你下棋，大胜一场，来稳定我的情绪。’我没睡，泡了茶，等着他。一直

等着。麦斯，我是个军人，我自己并不害怕。但对将军——这么一个老人，麦斯，我很害怕。我打电话到圆场去，紧急状况。他们却挂掉我的电话。为什么？麦斯，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

“我没当班。”史迈利说，现在他极尽所能地凝神注视米凯尔。“告诉我，米凯尔。”他说。

“麦斯。”

“你想，瓦拉狄米尔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之后——来这里还你五十英镑之前——打算去做什么？”

米凯尔毫不迟疑。“理所当然的，我猜他会去找麦斯。”他说，“他抓到了他的那条大鱼。现在他会去找麦斯，要求支付他的费用，奉上他的好消息。理所当然的。”他又重复了一次，眼光直直地盯着史迈利。

理所当然，史迈利想；而你知道他离开公寓的时间，也知道他到汉普斯特德公寓所走路径的距离。

“所以，他没出现，你打电话给圆场，我们帮不上忙。”史迈利重新确认，“我很抱歉。你接下来怎么做的？”

“我打电话给伟林。首先是要确定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还好，然后也要问他，我们的领袖在哪里？他那个英国老婆叫骂着把我的电话挂了。最后，我到他的公寓去。我不喜欢这样，这是一种侵扰——他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但我去了。我按了铃。他没应门。我就回家。今天早上，十一点钟，朱利打电话来。我没读第一版出刊的晚报。我对英国报纸没兴趣。朱利看了报。瓦拉狄米尔，我们的领袖，死了。”他结束了故事。

艾薇拉就在他旁边。她端来一个托盘，放了两杯伏特加。

“请用。”米凯尔说。史迈利拿起一杯，米凯尔拿起另一杯。

“敬生命！”米凯尔大声地说，喝了一口，泪水开始涌出眼眶。

“敬生命！”史迈利跟着说。艾薇拉看着他们。

她与他一起去的，史迈利想。她强迫米凯尔到老人的公寓去，她拉着他到门口。

“你告诉过其他人吗，米凯尔？”史迈利等她再次走开之后问。

“我不信任朱利。”米凯尔抽着鼻子说。

“你对朱利提到过伟林吗？”

“什么？”

“你对他提到过伟林吗？你是不是对朱利提到，伟林可能和瓦拉狄米尔的事有关？”

很显然，米凯尔不曾犯下这种罪行。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信赖任何人。”史迈利以更为正式的语调说，他已准备离开了。“即使警察也一样。这是命令。警方不必知道瓦拉

狄米尔遇害时所从事的行动。这攸关安全。你们的安全与我们的安全。他没给你其他信息？没有给麦斯的话，例如？”

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

米凯尔很抱歉地笑一笑。

“瓦拉狄米尔最近提到过赫克特吗，米凯尔？”

“赫克特对他不好。”

“瓦拉狄米尔这样说？”

“拜托，麦斯。我个人对赫克特没有任何成见。赫克特是赫克特，他不是个绅士，但在我们的工作里，我们必须用到各形各色的人。这是将军说的。我们的领袖是个老人。‘赫克特，’瓦拉狄米尔对我说，‘赫克特不好。我们的邮差赫克特就像城里的银行。他们说，一下雨，银行就要收走你的伞。我们的邮差赫克特也一样。’拜托，这是瓦拉狄米尔说的。不是米凯尔。‘赫克特不好。’”

“他什么时候说的？”

“他说了好几次。”

“最近？”

“对。”

“多久以前？”

“可能有两个月了。或许不到。”

“在他接到巴黎的来信之后还是之前？”

“之后，毫无疑问。”

米凯尔陪他走到门边，像个绅士，尽管托比·伊斯特哈斯并不是。艾薇拉在她原来的位置，坐在茶炉旁，抽着烟，看着相同的桦树林照片。史迈利走过她身边时，听到一阵嘶嘶声，不知是从她的鼻子或嘴里发出来，或者口鼻都有，似乎是她轻蔑之情的最终宣告。

“你现在要怎么做？”他像慰问死者家属一样问米凯尔。在眼角的余光中，他瞥见她因这个问题而抬起头来，她的手指滑过书页。

他突然又兴起一个想法：“你不认得那个笔迹吗？”史迈利问。

“什么笔迹，麦斯？”

“在巴黎那封来信的信封？”

顿时，他没有时间等待回答；顿时，他已为尔虞我诈感到恶心。

“再见，米凯尔。”

“好走，麦斯。”

艾薇拉的头又没入桦树林中。

我不会知道的，史迈利想，快步走下木制楼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知道的。米凯尔是不是叛徒？他是不是因老人染指他的女人而心生怨恨，同时也渴望着那顶觊觎已久的冠冕？或者，米凯尔是个毫不自私的军官与绅士，米凯尔是个绝对忠诚的仆人？或者，就像许多忠诚的仆人一样，他两者兼具？

他想起米凯尔的骑兵骄傲，像其他英雄气概那般脆弱得惊人。他以身为将军的监护人而自豪，他以身为他的总督而自豪。他绝不容许有受伤的感觉。他的骄傲——能因千百种原因而崩裂。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例如，到以伺候好每一个主子而自豪？各位，我一直对你们双方都提供很好的服务，一个完美的双面间谍在性命危在旦夕之时说。而且，是很自豪地说，史迈利想，他知道有不少这样的人。

他想起巴黎寄来的那封七页信。他想起第二项证据。他很纳闷，影印本到谁那里去了——也许是伊斯特哈斯？他也纳闷，原件在哪里。那么，谁到巴黎去了？他觉得很奇怪。如果伟林是到汉堡去，谁是个小魔术师？他觉得很疲累。他的疲累像病毒般突然袭击而来。他感觉到它，在膝盖，在臀部，在整个下沉的身体里。但他继续走着，因为他的心拒绝休息。

欧斯特拉柯娃还能走，她所企求的，也就只是能走而已。能走，并且等待着魔术师。没有骨折。虽然他们让她洗澡之后，她矮胖的身躯上伤痕累累，淤青遍布，活像西伯利亚煤田的地图，但没有骨折。而她可怜的臀部，在仓库里带给她许多折磨的臀部，像是被一群苏联秘密军队用皮靴从巴黎的这头，踢到另一头似的，但是，仍然没有骨折。他们用X光照遍她全身的每一部位，他们戳刺着她，像是一块有着内出血迹象的可疑肉块。但最后，他们很悲哀地宣布，她是创造奇迹的受害者。

他们想要留住她，为了林林总总的原因。他们想要治疗她所受的惊吓，让她镇定——至少一个晚上。警方找到六个目击证人，对事发经过却有七种相互冲突的说法（车子是灰色的，或是蓝色的？挂的是马赛的车牌，还是外国的车牌？）警方已经替她作过一个很长的证供，还威胁着说会回来再作一个。

尽管如此，欧斯特拉柯娃还是要出院。

那么，她有子女可以照顾她吗？他们问。噢，她有一大堆呢！她说。女儿们会满足她所有任性的要求；儿子们会扶着她上下楼梯。几男几女——只要符合他们的期望，几个都行！为了取悦修女，她甚至还编造出儿女们的生活情景，尽管她头痛欲裂。他们送她去穿衣。她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撕裂成碎片，如果看到她被发现时的模样，连上帝都会脸红。她给了一个假的地址和一个假名；她不要被追查，不要有访客。然后，在傍晚六点整，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苍白的欧斯特拉柯娃如同其他出院的病人，走下这幢宏伟的黑色医院。就在他们尽力想永久除掉她的同一天。她小心翼翼地，每一步都痛苦万分地，重新走进这个真实的世界，她脚上依旧穿着靴子。这双靴子像她一样，备受摧残，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这双靴子提供给她的保护，令她引以为傲。

她仍然穿着靴子。她重新亮起公寓幽微的灯，坐在欧斯特拉柯夫破旧的安乐椅上，与他的那把老式军用左轮手枪奋斗，想搞清楚这把该死的枪该怎么上膛，怎么扣扳机，怎么开火。而她脚上依然套着靴子，仿佛穿着制服一般。“我是个军人。”活下去，是她的目标；活得愈久，她的胜利也就越大。活下去，直到将军来到，或派他的魔术师来。

逃离他们，像欧斯特拉柯夫一样？很好，她已经做到了。愚弄他们，像葛利克曼一样，把他们逼进绝境，让他们除了鄙视自己的卑劣行为之外无计可施？她喜欢陶醉在自己的思绪中，在她的年代，她也完成了不少这样的事。但是，为了生存——她的两个男人都没能达成的目标，为了保住性命——对抗那些残忍无人性的走狗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图谋，为了在每一天、每一刻，靠自己还活着的事实，靠着呼吸、吃饭、行动和机智，让他们如坐针毡——欧斯特拉柯娃下定决心，她将以此为职志，付出自己的勇气，自己的信仰，与自己的两段爱情。

她立即着手，奉献全部的心力。她已经派那个傻里傻气的门房替她到店里去，行动不便也自有好处。

“我遭遇了一个小小的攻击，皮埃尔夫人，”——她没对这老山羊掏心掏肺，当然也没提苏联秘密警察的事——“他们建议我请假几个星期，完全休息。我精疲力竭，夫人——有时我们就只想独处。这个，拿着，夫人，您不像其他人，那么贪心，过度警戒。”皮埃尔夫人把钞票握在掌心，在塞进腰际之前，只瞥见了一角。“听着，夫人，如果有人问起我，请帮我一个忙，说我已经离开了。靠街的那一面，我不会亮灯。像我们这样敏感的女人总是很难获得平静，你说的是吗？但是，夫人，请记住来过的人，所有的访客，告诉我——燃气收费员、慈善机构的人——告诉我所有的事。我喜欢知道周遭生活的情形。”

门房的结论是，她疯了，毫无疑问的，但她的钱可没疯，钱是门房最爱的东西，更何况，她疯了是她自己的事。几个钟头里，欧斯特拉柯娃变得甚至比在莫斯科时更狡猾。门房的丈夫上楼来——他是个土匪，比老山羊还糟——看在更多钱的分上，修好了她前门的锁链。明天，他会装上窥视孔，也是为了钱。门房答应替她收邮件，并在特定的时间送上来——早上十一点整，下午六点整，两短声门铃——为了钱。欧斯特拉柯娃勉强打开洗手间的小通风扇，只要站上椅子，就可以随时监看楼下的庭院，知道谁来谁走。她送了一张短笺给仓库，说她身体不适。她无法移动她的双人床，但她用枕头和羽绒被，铺成了一张睡椅，像鱼雷一样，穿过客厅敞开的门，直对着前门。她所必须做的，就只是躺在睡椅上，用靴子瞄准入侵者，以靴子形成的准线开枪，如果她没轰掉自己的脚的话，她就能在入侵者企图扑上来时，让他毫无防备地挨上一枪。她拟定详尽的计划。她头痛欲裂，像有猫在脑袋里发春似的大吵大闹，只要头移动得太快，她的眼前就会一阵暗黑，她发起高烧，有时甚至还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但她拟定了详尽的计划，她作好了自己的部署，直到将军或魔术师来，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莫斯科。“你必须靠自己，老笨蛋。”她大声地告诉自己，“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你自己，所以面对现实吧。”

欧斯特拉柯娃把一张葛利克曼和一张欧斯特拉柯夫的照片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一个圣母玛丽亚的雕像放在羽绒被里，开始了她第一夜的守望，她向一大群圣徒祷告，当然包括圣约瑟，希望他们会送来她的救主，那位魔术师。

水管上没贴任何给我的信息，她想，甚至也没有警卫的辱骂声来唤醒我。

依旧是同一天；还没有结束，没有床。离开米凯尔之后好一会儿，乔治·史迈利任凭他的脚带领他前进，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太疲倦，也太激动，无法信任自己开车，但还清醒得足以注意背后的动静，以突如其来的转弯摆脱后面可能的追踪者。浑身湿透、眼皮沉重的他，等待着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努力想要放松，一步一步脱离自己长达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马拉松冲刺状态。他走过堤岸，到过诺珊伯兰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可能是“福尔摩斯”，他给自己点了一大杯威士忌，忍不住想打电话给丝黛拉——她还好吗？他觉得这样根本没有意义——他不可能每晚打电话给她，问她和伟林是否还活着——于是他又跨步前行，直到发现自己置身“苏活”，星期六的夜晚，比平日更喧闹污秽的苏活。他想起大胡子拉康，要求对那个家庭提供保护。但他光想像那个场景，就知道这个想法完全无望。如果瓦拉狄米尔都不是圆场的责任，那么伟林更算不上是。而且，拜托，你如何能派遣一队保姆跟着一个横跨欧陆的长途货车司机呢？他惟一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暗杀瓦拉狄米尔的凶手已经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了——他们别无其他需要。但是，那个巴黎的女人呢？写那两封信的人呢？

回家吧，他想。有两次，他在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趁机查看着人行道。有一次，他走进死巷，然后迅速倒退，搜寻着零乱的步伐，与避开他目光的眼睛。他考虑过要在旅馆订一个房间。有时他会这么做，只为寻求一夜安宁。有时他的家对他而言是太过危险的地方。他想到那卷底片，该是打开盒子的时候了。他发现自己凭着直觉已朝剑桥圆环走去，便急急转向东，再次开车上路。他相信自己并没有被监视，便顺利地开上坦途，回水滨街，但仍不时注意着后视镜。他在一个什么都卖的巴基斯坦五金行那里，买了两个塑料洗涤盆和一块三英寸半宽、五英寸长的长方形商业玻璃；在隔不到三户之处，一家现金交易的药房里，他买了十张相同尺寸的二号树脂纸，以及一支小孩用的口袋型手电筒，把手上有一个航天员，只要按下一个镍制按钮，红色的滤光片就会滑出来盖住镜片。从水滨街，沿着一条苦心规划的路线，他开到萨芙伊，从靠堤岸的一侧进入。他仍然独自一人。在柜台，值班的是同一个接待员，他甚至还记得他们开的玩笑。

“我还在等它爆炸呢。”他微笑着说，交还那个盒子，“我想我有一两次听到它滴答响，就这样。”

他起程前往查尔顿之前在前门放置的楔子仍在原处。在左邻右舍的窗户里，他看见星期六的烛光摇曳中交头接耳的人影；但他自己的窗户，仍与离开前一样，窗帘低垂，大门里，一片漆黑，只有安恩祖母的那座美丽小钟迎接着他。但他将立即改变这一切。

虽然疲倦至极，但他仍按部就班地做。

首先，他在客厅的壁炉里丢进三块火种，点燃，加进无烟煤，然后挂上安恩的室内晒衣绳。他穿上一件旧的厨房围裙当罩衫，把系带紧紧绑在肥硕的腰上，作更好的防护。从楼梯底下，他拖出一堆灯火管制时期所用的绿色遮光素材和一对厨房踏垫，拿到地下室。把窗外的光线全遮住之后，他走回楼上，拆开包装纸，打开盒子，不，这不是炸弹，这是一封信和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里头塞了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取出底片，回到地下室，打开红色的手电筒，开始工作，尽管天知道，他根本什么摄影才能都没有，而且以前有需要时，通过劳德·斯屈克兰，圆场自己的摄影部门总会帮他打理得好好的。或者，他也可以把这些事交给六七名“工匠”之中的一个。“工匠”顾名思义，是指某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合作者，他们承诺无论在任何时间接到召唤，都要立即放下一切，不问任何问题，提供所有的技术服务。事实上，就有一位“工匠”住在离史隆广场不远处，是个擅长婚礼摄影的好人。史迈利只要走上十分钟，按这人的门铃，就可以在一个半钟头之后拿到照片。但他没这么做。他宁可忍受不方便与不完美，在自己家里的隐秘处所洗出照片。楼上的电话响起，但他不加理会。

他宁可一再从错误中学习，在房间的主灯下，把底片曝光得太久，接着又曝光得太短。他用一个讨厌的厨房定时器来计算时间，定时器的滴答声，活似出自“柯蓓莉亚”32中的怪物。他宁可愤怒地咆哮咒骂，在黑暗中大汗淋漓，浪费掉六张树脂纸，才让碗里的显影剂勉强显出模糊可辨的影像，然后他上了快速定影剂，等候三分钟。接着加以冲洗。用干净的抹布轻轻按压，这或许会让抹布万劫不复，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接着，他上楼，把照片挂在晒衣绳上。对于那些喜欢挖掘象征意义的人而言，这不啻为一项历史事件。虽然放进火种，但炉火几乎全灭了，因为煤里有太多潮湿的残渣。所以为了让炉火不致熄灭，史迈利必须手脚全趴在地上，对着火苗吹气。这或许会让他想到——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他的好奇心再次令他将内省的情绪搁在一旁——这个动作与拉康先前要他浇熄火花、不准煽风点火的不情之请恰恰相反。

接下来，把照片安全地挂在地毯上方之后，史迈利把注意力移到那张美丽的细木镶嵌写字桌，安恩把她的“东西”以令人难堪的公开方式保存在这张写字桌里。例如有一张她只写上“亲爱的”的信笺，也许她不确定是写给哪一位亲爱的；例如餐厅的火柴盒，但那些餐厅他从没去过；例如一些手写的信，他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从这些令人伤情的古玩中，他抽出一支镶有母贝握柄的放大镜，那是安恩用来读她从未完成的填字游戏提示用的，以此武装起自己。因为太过疲累，他接下来的举动颇匪夷所思。他拿出安恩给他的马勒唱片，坐在一张皮制阅读椅上。这张椅子附有桃花心木阅读架，可以旋转，像床上餐台一样横过腰际。他再次感觉累到极点，很不明智地，在听音乐时他闭上眼睛，一方面由于音乐，一方面由于照片久久落下一滴的水声，一方面由于炉火的噼啪声。醒来已是三十分钟之后的事，他发现照片干了，马勒的唱片无声地在唱机的转盘上旋转。

他一手扶着眼镜，一手拿着放大镜在照片上缓缓移动，仔细查看。

照片上是一群人，无关政治，也非游泳派对，因为没有人穿着泳装。总共四个人，两男两女，躺卧在环绕矮桌的沙发上，桌上摆满酒瓶与香烟。两名女子都年轻、貌美，而且一丝不挂。两名男子衣不遮体地躺卧两侧，女郎们善尽本分地蜷绕在各自的男伴身上。照片里的光线看来苍白而怪异，史迈利从他仅有的一些摄影常识推论，这张底片一定是高感度胶卷，因为洗出的照片粒子也很粗。史迈利仔细观察照片的质地，觉得很像常见的恐怖分子的人质照片，差别在于这张照片中的四人只关注着彼此，不像人质总是直视着镜头，仿佛将照相机当成枪一般。他依然凭借着他所谓的“情报实务”能力，检视着照相机可能的位置，最后判断，相机应该在高于人物的位置。这四个人应该是躺在低于地面的凹室，照相机从上而下对着他们。一道阴影，非常黑——一道栏杆，或许是个窗台，或只是前面的人的肩膀——横在下侧的前景处。尽管是在有利的位置，但看起来只有半个镜头可能抬高超过眼睛平视的范围。

因此，史迈利获得初步的结论。一步——不太大的一步，但在他心中已有足够的一大步进展。技术性的一步，应该说是稳健、技术性的一步。这张照片的所有特质都指向“偷拍”这个勾当。而偷拍更进一步而言就是“烧灼”，意即“勒索”。但向谁勒索？为了什么目的？

思考着这个问题时，史迈利可能睡着了。电话放在安恩的小桌子上，必然已响上三四声，他能感觉到。

“嗯，奥立佛？”史迈利谨慎地说。

“啊，乔治，我之前打过电话来。你回来以后都还好吧？”

“从哪里回来？”史迈利问。

拉康宁可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欠你一个电话，乔治。我们道别的时候不太愉快。我太率直了。事情太多了。我道歉。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你都完成了吗？结束了？”

史迈利听见背景里有拉康的女儿们争论着公园道33上的饭店房租要多少钱。他要带她们去度周末，史迈利想。

“内政部又打电话来了，乔治。”拉康压低声音，甚至没等史迈利答话，“他们已经拿到病理学家的报告，尸体可以领回了。他们建议尽早火化。我想，如果我给你处理这些事务的公司名称，你或许会愿意转交给相关的人。不勉强，当然。你看到新闻发布了么？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很适当。我认为分寸拿捏得很好。”

“我拿支铅笔。”史迈利说，再次翻找抽屉，找着一个梨状的塑料物体，上面有一条皮制的带子，安恩有时会拿来戴在脖子上。他颇为费力地撬开，写下拉康口述的资料——公司，地址，又是一家公司，又是另一个地址。

“写好了吗？要我再说一遍吗？或者你念给我听，再次确认？”

“我想我已经记下了，谢谢你。”史迈利说。迟至此时，他才逐渐明白，拉康喝醉了。

“现在，乔治，我们有约，别忘了。开诚布公探讨婚姻的研讨会。我派你担任元老的角色。楼下有一家很高尚的牛排馆，我会请你吃一顿高级晚餐，听你传授智慧。你有日程本吗？请写下来。”

因为有着可怕的自制力，史迈利答应赴约。他这一辈子，不断为不同场合编造不同的故事，掩人耳目，到头来，他却连推却晚餐约会的借口都说不出来。

“你什么也没发现？”拉康问，声调转趋谨慎，“没有暗潮汹涌，阻碍牵绊，杂乱纷扰。只是茶壶里的风暴，就像我们猜测的，对不对？”

史迈利心中掠过许许多多的答案，但他看不出有必要用上任何一个。

“电话账单怎么样了？”

“电话账单？什么电话账单？噢，你说他的。先付清，再把收据寄给我。没问题。最好还是邮寄给斯屈克兰。”

“我已经寄给你了。”史迈利捺住性子说，“我要你清查可追踪的电话。”

“我马上查。”拉康爽快地说，“没别的事了吗？”

“没有，没有，我想没有。没事了。”

“睡一下吧。你听起来好像筋疲力尽了。”

“晚安。”史迈利说。

史迈利再次将安恩的放大镜牢握在掌中，继续他的查验工作。凹室的地板铺了地毯，显然是白色的；车饰缝线的沙发，顺着背后的布幔，弯成马蹄形。背景里有一扇被帘幕掩住的门，还有那两名男子脱下的衣服——外套、领带、长裤——像在医院般整整齐齐地挂着。桌上有一个烟灰缸，史迈利认真地想要读出边缘所写的字。经过放大镜的仔细查看之后，他这位不及格的语言学家推断，那是四个字母“A—C—H—T”组成的星星（或想像的）形状，但整个字的真正意思到底是德文的“八”或“注意”，还是其他更罕见的字——或者这四个字母是某一个字的一部分，他无法判断。在目前的阶段，他也不想尽力探究，宁可将这些情报储存在他的心灵深处，等到拼图的其他部分浮现，再来完成。

安恩打电话来。再次地，或许，他又打盹了，因为他事后回想，自己完全没听到电话铃声，但当他缓缓地将听筒举到耳边时，就听见了她的声音：“乔治，乔治。”仿佛她已哀求他许久，而他直到此时才有力气或意愿回答。

他们宛如陌生人般展开对话，或许更贴切地说，是宛如求爱。

“你好吗？”她问。

“很好，谢谢你。你好吗？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说真的，”安恩坚称，“你好吗？我想要知道。”

“我告诉你了，我很好。”

“我早上打电话过来，你为什么没接？”

“我出去了。”

一片沉默，她显然正在思考这个薄弱的借口。对她而言，电话从来就不是干扰，从来不会让她联想起紧急事故。

“出去工作？”她问。

“拉康的一些行政事务。”

“他现在都这么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

“他太太离开他了。”史迈利解释说。

没有回答。

“你常说她聪明的话就会离开他。”他继续说，“她应该及早脱身，你常这样说，免得成为另一个为国服务的艺伎。”

“我改变看法了。他需要她。”

“但她，我想，已经不需要他了。”史迈利说，以一本正经的口吻隐藏自己的情绪。

“傻女人。”安恩说，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沉默的是史迈利，他思索着安恩突然推到他面前的抉择，这是他未曾企求的重大抉择。

重新在一起，她有时会这样说。

忘却伤痛，忘却一长串的情人；忘却比尔·海顿，那个圆场的叛徒，每一次看见她，海顿的阴影就笼罩着她的脸庞，那是他永远背负的伤痛记忆。比尔，他的朋友；比尔，他们这一代的精英，开心果，万人迷，破除旧习又循规蹈矩的人物；比尔，生性狡诈，他对终极背叛的渴求，引领他走到苏联床边，以及安恩的床上。接着上演另一段蜜月，飞到法国南部，吃美食，买新衣，玩所有爱人们都会玩的“让我们假装”的游戏。但能维持多久呢？还要多久，她的笑容就会开始消退，她的眼神开始呆滞，而那些虚构关系就开始需要她到远方去治疗那些虚构关系失调症呢？

“你在哪里？”他问。

“希尔达家。”

“我以为你在科尼什。”

希尔达是个离婚女人，运气还不错。她住在肯辛顿，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

“希尔达呢？”他问，对这个消息安然处之。

“出去了。”

“整晚？”

“我想是，你知道希尔达的。除非她带他回来。”

“嗯，那么我想，她不在，你就要尽量自己找乐子。”他说，但他说话时，却听到她轻声唤着“乔治”。

一阵深沉、猛烈的恐惧紧紧攫住史迈利的心。他的目光愤然穿过房间，投注在阅读椅上，看见那张照片仍在阅读架上，摆在放大镜的旁边；记忆澎湃潮涌，他记起了在这不见尽头的一天里，所有暗示他、悄悄告知他的事；他听见来自过往的鼓声，召唤着他付出最后的心力，去揭露、去解决他曾与之共生的冲突；而且，他希望她别靠近他。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饥饿、疲累与困惑却使史迈利的思绪格外清澈，他很确定，他不应该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扯上任何关系。他知道——他才正要开始——但他仍知道，尽管非常怪异，他却很可能有机会在迟暮之年，重返生命中那些因雨取消的赛程，重新完成赛局。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他的行动中，他不要有安恩，不要有假装出来的平静，不要有污点证人来阻挠他的独力追索。他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心意。但现在，他明白了。

“你不应该，”他说，“安恩，听着，你不该来这里。这与选择无关，而是现实的问题。你不该过来。”他的话听在自己的耳朵里显得很奇怪。

“那你过来。”她说。

他挂掉电话。他想像她哭了起来，然后掏出通讯簿，看谁是她的头号忠诚使徒——她自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能在他的住处带给她安慰。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拉康的解决方案。他走进厨房，却忘了为什么，于是开始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苏打水，他想。太迟了。没加也无所谓。我一定是疯了，他想。我在追寻幻影，什么也没有。年迈的将军有个梦，而且因此丧生。他还记得王尔德说：人因某个目标而死，并不会让这个目标变成正确无误。一幅画歪了，他动手扶正，太过了，太少了，每一次都后退几步瞧着。告诉他，是有关睡魔的事。他回到阅读椅，和他的那两个妓女身上。他用放大镜集中焦点，观察之入微，足令那两名女郎狂奔去着衣。

显而易见，她们都是这一行的高档角色，肉体鲜嫩，年轻，修饰得宜。而挑选她们的人，似乎也刻意——或许只是出于巧合——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左边的女郎金发碧眼，容貌姣好，甚至有些古典美，长腿，胸部小而挺。而另一名女郎则是黑发，壮硕，臀部丰满，容貌艳丽，或许是欧亚混血儿。他记下来，金发女郎戴着弓形的耳环，这突然令他心中一动，因为在他有限的女性经验中，耳环总是最先脱下的东西。安恩离开家时没戴耳环，令他心灰意冷。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对这两名女郎还有什么可评论的，因此，再吞下一大口纯威士忌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两名男子身上，再一次——如果他肯承认，其实从见到这张照片的第一眼起，他的注意力就在这两人身上。就如同两名女郎

各异其趣，这两个男人也完全不同，虽然在男人身上——因为他们年纪较大——这种外貌差异表现出的是城府与个性的不同。抱着金发女郎的男人金发白肤，乍看之下有些迟钝；而抱着黑发女郎的男子，不仅皮肤黝黑，而且容貌里还有着拉丁人——甚至是地中海东岸与爱琴海诸岛人种——的机灵，那抹具感染力的微笑，让他成为照片中最引人注意的人。金发男子体形高大，慵懒俯卧着；黑发男子个头小，却聪明风趣，足以成为他的弄臣：一个古灵精怪的小鬼头，有一张和善面孔，耳朵上方却长了一对扬起的角。

突如其来的焦虑——事后想想或许是一种预感——让史迈利先观察金发男子。这该是对陌生人感到较自在的时候了。

这人的躯体结实，但不是运动员型的，他的四肢笨重，看来缺乏力道。皮肤与头发的颜色，让他更显肥胖。他那一双手，一只张开放在女郎的身侧，另一只环住女郎的腰，肥胖而拙劣。史迈利举起放大镜，缓缓地从他光裸的胸膛，往上移动到他的头。有个聪明的家伙曾宣告恶兆似的写道：年到四十，男人会有他应得的面容。史迈利并不相信。他知道有些诗人的灵魂，禁锢在粗野的面貌之下，而有些罪犯却有着天使的外表。无论如何，这张面孔既算不上资产，在照相机镜头的捕捉之下，也完全没有魅力可言。以性格而论，那张脸可以分成两部分：下半部，因赤裸裸的感官欢愉而露齿作笑，张着嘴，正对着他的男伴说话；上半部，主宰的是一对小而无光泽的眼睛，既无笑意也无欢愉，似乎以孩子般冷淡、目不转睛的漠然神态看着他们周遭的一切。他的鼻子扁平，头发丰厚，是中欧的发型。

贪婪，安恩可能会这样说，她常看了报纸上的照片，就对人断下定论。贪婪，软弱，邪恶。别这样。很可惜，她没对海顿作出相同的定论，他想，或者应该说是没有及时作出判断。

史迈利走向厨房，洗把脸，然后想起来，他进厨房是为了替他的威士忌加些水。重新坐回阅读椅后，他用放大镜开始查看第二个男人，那个弄臣。威士忌让他保持清醒，但也让他想睡。她为何没再打来？他想。如果她再打来，我会去找她。但在现实里，他的心思全在第二个男人脸上，因为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他非常困扰，就如同之前困扰伟林与欧斯特拉柯娃的那种共谋感觉一样。他凝视着这张面孔，疲倦翩然离去，他似乎已从中得到能量。有些脸孔，如同伟林今早所说的，在我们看见之前就已熟悉；有些脸孔我们只见过一次，就终生记得；有些脸孔我们天天看见，却完全记不起来。但这张脸孔呢？

法国画家图卢兹—洛特雷克34的脸——如果看他那双凝神注视着某人，甚至带着色欲的迷情乱意的眼睛史迈利想，惊奇地看着。安恩可能会立即掳获他，因为他具有她所喜欢的危险特质。一张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如果看那幻彩绚灯所照亮的瘦削、纠结的侧脸。一张劈开的脸，消瘦、棱角分明，从额头、鼻子到下巴，仿佛都在一阵强风肆虐后裂开来。一张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敏捷而令人喜爱。一张伺候、等待着的脸，他绝非受人服侍的那一方。在奉承的微笑背后，有着燃烧至最

高点、伺机而动的怒火。安恩可能较不喜欢这一面。史迈利放下照片，缓缓地站起来，好让自己保持清醒。他蹒跚地在房间里踱步，想理出头绪，但枉然。他怀疑这一切是否真如他的想像。有些人会传送信息，他想。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们，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让你了解他们过去的一切。有些人就是亲密的化身。

在安恩的写字桌旁，他停了下来，再次盯着电话。她的。她的和海顿的。她的和每一个人的。平整型，他想。或者是细长型？为了这过时、充满未来派风格的外型，邮局还多收了五英镑，但带来的欢乐效果实在令人怀疑。我的浪女电话，她常这样说。小声的鸟鸣给我的小情人，大声的鸟鸣声给我的大人物。他知道电话正在响。响了好久，小声的鸟鸣给小情人。他放下酒杯，依旧瞪着颤动不已的电话。她听音乐时，常把电话放在地板上，在她的唱片堆中，他还记得。她喜欢躺在电话旁边——在火炉旁，就在那里——一腰拱起，以备随时可以接电话。睡觉时，她会拔掉插头，带着电话上床，好在夜里带给她慰藉。当他们做爱时，他知道自己不过是那些没打电话给她的男人的替代品。第一号使徒的替代品。比尔·海顿的替代品，尽管他已去世。

电话铃声停止了。

她现在在做什么？试着找第二号使徒？身为美人儿，安恩是一回事，她不久之前曾对他说，但不久后身为迟暮美人的安恩就是另一回事了。身为迟暮而丑陋的我则又是另一回事，他愤然想。拿起照片，他重新凝聚注意力，再次沉湎于思虑中。

阴影，他想。光明与黑暗的污痕，忽而在前，忽而在后，就在我们蹒跚前行的道路上。小鬼头的犄角，魔鬼的犄角，我们的影子比我们自己还大得多。他是谁？他以前是谁？我见过他。我没有。如果我没见过他，我又怎么会知道他？他是某种供货商，有东西要卖的人——那么，是情报？梦想？现在已睡不着的他，伸展四肢瘫在沙发上——只比上楼躺在床上好一些——面前摆着照片，开始潜入记忆深处，搜寻他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幕幕场景，拿起灯，照亮那些几乎已遗忘的面孔。江湖郎中、炼金术士、杜撰故事的人、沿街叫卖的人、中间人、无赖、流氓，偶尔还有一些英雄人物，但这在他阅人无数的经历中，却只是配角。他寻找着一张神圣的脸孔，像分享秘密的人一样，游出这张小小的照片，停泊在他摇荡不定的意识中。灯的光束倏然飞过，略一迟疑，又再回来。我被黑暗骗了，他想。我是在光线明亮处见到他的。他看到一间气氛诡谲、亮着霓虹灯的旅馆房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这陌生男子微笑着盘踞在角落，叫着他“麦斯”。一个小个头的大使——但代表了什么团体，什么国家？他只记得一件天鹅绒衣领的大衣和一双结实的小手，兀自舞动着。他记得那对热情洋溢、充满笑意的眼睛，利落的嘴巴快速开合，但他听不到只字片语。他感觉到一种失落感——失去目标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感觉，在他们说话时罩下朦胧的阴影。

或许，他想。一切都只是或许。或许瓦拉狄米尔是被一个嫉妒的丈夫射杀，他想。此时，前门的门铃却突然像秃鹰般对他尖叫，两声。

她忘了她的钥匙，一如往常，他想。他还没意会过来，就已走到门口，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他也锁上门链。他拉着锁链，叫道：“安恩，等一下！”手指却没有任何感觉。他用力扯下门链，听见整个房子响起刺耳的回声。“我来了！”他大叫，“等一下，别走！”

他用力把门推得大开，只见门在门槛上摆动。他伸出肥胖的头，像是一份祭品，献给午夜的空气，也献给那包裹在黑亮皮衣里的人。那人手夹安全帽，站在他面前，宛如死神的哨兵。

“我不是有意要惊动您，长官。我确定。”那陌生人说。

史迈利手抓住门口，只能瞪着这个入侵者。他个头很高，短发，眼睛里反射出毫无必要的效忠精神。

“傅格森，长官。您记得我吧，长官？傅格森。我以前替伊斯特哈斯先生的点灯者安排交通工具。”

他那辆附有挎斗的黑色摩托车，停在他背后的路边石上。在路灯的照耀下，摩托车擦得晶亮的美丽外表闪闪发光。

“我以为点路灯组已经解散了。”史迈利说，依旧瞪着他。

“是解散了，长官。分散到四个单位去了，真是遗憾。袍泽的感情，精神，全都消失不见了。”

“那么，是谁雇用你？”

“嗯，没有人，长官。非正式的，你可能会这样说。但我还是站在天使这一边，一直如此。”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天使。”

“不，这当然是事实。所有的人都难免犯错，我会这么说。特别是在这些日子以来。”他拿着一个棕色信封，要交给史迈利。“您的某些朋友，长官，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了解这是您所要求的电话账单。一般来说，我们都可以从邮局得到很好的响应。晚安，长官。很抱歉打扰您。该是您睡一下的时间了，不是吗？好人很少见，我总是这么说。”

“晚安。”史迈利说。

但他的访客仍然踌躇不走，仿佛讨赏的人。“您真的记得我，是不是，长官？只是有些迟疑而已，对不对？”

“当然。”

天上有星星，他关门时注意到了。澄亮的星星，被露水吞噬。他打了个寒战，在安恩为数甚多的相本中抽出一本，从中央翻开。这是她的习惯，在她喜欢拍快照的那段期间，她都把底片藏在后面。史迈利挑了一张他俩在费拉角35的照片——安恩穿着泳衣，他则惜肉如金——他把底片拿出来，放进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清理化学药剂与器材，把照片藏进他那套一九六一年版《牛津英语辞典》的第十册里，在“昨天”（yesterday）的“Y”项下。他打开傅格森的信封，疲倦地看了一眼内

容，记住几个打进来的电话，和“汉堡”这个字，就把全部的明细表丢进书桌的抽屉里。明天，他想；明天是另一个谜题。他爬上床，一如往常，无法确定该睡哪一侧。他闭上眼睛，所有的问题立即轰然而至，他早已料到，疯狂、杂沓地轰炸着他。

为什么瓦拉狄米尔不找赫克特？他已问过上百遍。为什么老人把伊斯特哈斯，别名赫克特，比拟成“城里的银行，一下雨就要收走你的伞”？

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

打电话给她？火速穿上衣服，赶到她身边，像个秘密情人，天亮时偷偷溜走？

太迟了。她已经有伴了。

突然之间，他极度渴望着她。他无法忍受没有她的空间，他企盼着她笑得花枝乱颤的身体，听她恳求着他，说他是她惟一的真爱，她最好的爱人，她不要别人，永远。“女人是无法无天的，乔治。”她有一次对他说，那时他们躺着，享受难得的平静。“那我算什么？”他问，她回答说：“我的法律。”“那海顿是什么？”他问。她笑着说：“我的无政府状态。”

他又看见那张小小的照片，洗好的照片，就像那个小个子的陌生人，在他逐渐沉没的记忆里。一个小个子男人，一道庞大阴影。他记得伟林描述的那个在汉堡渡轮上的小个子，随风扬起如犄角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带着警告意味的眼睛。将军，他思绪混乱地想着，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或许。一切都是或许。

汉堡，他想，迅速地起床，披上晨袍。回到安恩的书桌，开始仔细研究瓦拉狄米尔的电话账单明细，那是某位邮局职员用工整的笔迹所缣写的。拿出一张纸，他开始摘要写下日期与注记。

事实：在九月初，瓦拉狄米尔接到巴黎来信，并将之移出米凯尔的掌握。

事实：大约在相同的日期，瓦拉狄米尔很罕见地打了花费极高的长途电话到汉堡，由总机转接，可能是为了便于日后申请费用。

事实：三天之后，八号，又有一次，瓦拉狄米尔接到一个汉堡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费用是两英镑八，来电号码、通话长度、时间，都在明细上，来电号码与瓦拉狄米尔三天前打的那个电话号码相同。

汉堡，史迈利再度思索，他的心思又飘向照片上的那个小鬼头。对方付费的电话热线持续不断，直到三天前；九个电话，总金额为二十一英镑，所有的电话都是从汉堡打给瓦拉狄米尔。但是，到底是谁打给他？从汉堡？谁？

突然之间，他记起来了。

在旅馆房间里的朦胧身影，那个笼罩小鬼头的巨大阴影，就是瓦拉狄米尔自己。他看见他俩并肩站着，都穿着黑色外套，巨人与侏儒。那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的低级旅馆，就在希思罗机场附近，这两个外表极不相称的男人，飞到这里进行会谈。那是史迈利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职业身份在他耳中轰然粉碎。麦斯，我们需要你。麦斯，给我们一个机会。

史迈利拿起电话，拨了汉堡的电话号码，听见另一端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只说了“喂”，非常轻柔的德文，接着就是一片沉寂。

“我想找狄特·法斯班德先生。”史迈利说，随口杜撰了一个名字。德文是史迈利的第二语言，有时甚至是他的第一语言。

“这里没有法斯班德。”同一个声音略微停顿之后冷淡地说，仿佛讲电话的人一面在与其他人商量着什么事。史迈利隐约听见背景里的音乐声。

“我是列伯。”史迈利不为所动，“我有紧急的事要找法斯班德先生。我是他的合伙人。”

又是一阵延宕。

“不可能。”一阵停顿之后，那个声音不客气地说——然后挂掉。

不是私人住宅，史迈利想，立即将他的印象写下来——接电话的人有太多选择。不是办公室，因为有哪一种办公室会播放轻柔的背景音乐，而且在星期六午夜还上班的？旅馆？有可能，但如果是旅馆，无论规模大小，一定会将他的电话转到接待柜台，而且多少都会以礼相待。餐厅？太鬼鬼祟祟，太戒备了——而且，他们一接到电话，不也一定会先报出名号吗？

别再勉强拼凑了，他警告自己。先收在一边吧。耐心。但时间如此之少，他又如何能有耐心呢？

回到床上，他翻开一本科贝特36的《骑马乡行记》，想要读，但他的思绪仍散漫地徘徊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他对公民义务的体认，以及他对奥立佛·拉康所说的话，有多看重，或有多轻忽：“你的责任，乔治。”然而，谁又能真正听命于拉康？谁又能把拉康的只字词片语当成恺撒的令箭？

“移民进，移民出。两脚好，两脚坏。”他大声地自言自语。

史迈利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类似的顺口溜，似乎总代表了白厅政策的大转变；代表了自制，克己，永远是啥事都不做的另一个理由。他看着白厅的裙子缩短，又放长；她的皮带勒紧，放松，又勒紧。他曾经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受害人，甚至是情非得已的先知，见证着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狂潮，从单边主义，平行主义，分离主义，运作移转，迄至现今的整合，如果他对拉康最近的漫谈记忆无误的话。每一个新的主义，都被吹捧成无所不能的万灵丹：“现在我们可以克服一切，

现在机器可以运转了！”但每一个主义都挥泪出局，只留下依旧混沌的英国。身处其中，回顾过往，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终此一生都是个调停者。他非常容忍自制，希望其他人也能自我节制，但却失望了。他在后面的房间劳苦工作，那些浅薄的人却把持了舞台。他们牢牢把持。要是在五年前，他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如此感情用事。但今天，平静地凝视自己心灵深处，史迈利知道自己不受驾驭，或许是无法驾驭；惟一能限制他的，是他自己的理性，与他自己的人性。他的婚姻是如此，他的公务生涯亦如此。我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制度上——他不带怨恨地想——而今我所留下的，就只有我自己而已。

对卡拉是如此，对我的黑色圣杯也是如此。

他无法克制自己，他永不歇息的心使他无法平静。他瞪着眼前的幽暗朦胧，想像他看见卡拉站在自己面前，在流转不止的夜色中，不断碎裂、重组。他看见那双紧紧相随的棕色眼睛估量着他，正如百年前在德里监狱的那间审问地窖里，他也从一片暗黑中估量着自己。那双眼睛乍看之下非常敏感，似乎流露出极好的情谊；接着，却像融化的玻璃逐渐变硬，直到变得易碎、无可曲挠。他看见自己踏上德里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从柏油碎石路跃上身的印度高温，令他望而生畏。史迈利化名巴拉克劳夫，或史坦法斯特，或者是他那周随手抓起的任何名字——他忘了。这是六十年代的史迈利，无论如何，商务旅客史迈利，他们这样叫他，圆场负担经费，让他跑遍四分之一地球，对那些想投诚的莫斯科中央官员，提供重新安置的条件。莫斯科中央当时正进行定期整肃，苏联原野的林木又正茂密，官员们都很怕回家。这是安恩的丈夫与比尔·海顿的同事史迈利；他最后的幻想仍未破灭。这是再次面临家庭危机的史迈利，因为那年安恩爱上了一个芭蕾舞者，还没轮到海顿呢。

依然处在安恩卧室的暗黑中，他回想起搭着嘎嘎作响、喇叭乱鸣的吉普车到监狱，笑闹的孩子们吊在车尾板上；他看见牛车和无止境的印度人群，以及棕色河堤上林立的临时小屋。他闻到粪肥和烟熏不断的火的气味——烹调的火和净化的火，收拾死者的火。他看见古老监狱的铁门纳他入内，穿着无懈可击笔挺英国制服的狱卒穿过满坑满谷席地而坐的囚犯走来。

“这边请，阁下，长官！麻烦请跟我来，阁下！”

一个欧洲囚犯，自称格茨曼。

一个灰发的小个子，有双棕色眼睛，穿着红色的棉袍，宛如早已绝迹的祭司，惟一的幸存者。

他的手腕上了手铐：“请松开他，警官，给他一些烟。”史迈利说。

一个囚犯，伦敦识破他莫斯科中央情报员的身份，现在等着被遣返莫斯科。一个冷战的小步兵，身份被揭发之后，谁知道——确定地知道——被遣送回莫斯科之后，会是面对劳改营或行刑队，或两者皆是；落入敌人手中，在中央眼里，就等于变成敌人——是说出秘密还是保持缄默，都不重要。

加入我们，史迈利隔着铁桌对他说。

加入我们，我们会救你一命。

回家，他们会送你一死。

他的手冒着汗——史迈利的手，在监狱里。高温逼人。来根烟吧，史迈利说——这里，用我的打火机。那是金色的打火机，因史迈利自己手掌的汗湿而闪闪发亮。刻着字。是安恩为了弥补行为不端所送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爱有小爱与大爱，安恩喜欢这么说，但在构想题词时，她把两种爱都赠给了他。这或许是她惟一一次这么做。

加入我们，史迈利说。救你自己。你没有权利不救你自己。起初是机械化的动作，接着是充满热情的诉说，史迈利不断重复相同的论点，他自己的汗水如雨滴般洒落桌面。加入我们。你没有任何损失。你早已失去了那些在苏联爱你的人。你回国，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更糟，不会更好。加入我们。我求你。听我说，听我的论点，我的哲学。

等待着，他益加恳切的要求，等待着他一丝一毫的响应，但一而再，再而三，一切都只是枉然。等待着那双棕色眼睛灵光闪动，等待着那坚毅不屈的嘴唇从香烟翻腾的云雾中吐出一个字——好，我加入你们。好，我同意提出报告。好，我会接受你们的钱，你们安置的承诺，以及叛国者的余生。他等待着那双没铐手铐的手，停止把玩安恩的打火机，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

但史迈利越是恳求，死守教条的格茨曼就越沉默。史迈利硬塞给他答案，但格茨曼却没有问题来支持这些答案。渐渐地，格茨曼的坚持到底，令人心生敬畏。他是个准备好要上绞刑台的人；他宁可死在朋友之手，也不愿在敌人手中苟延残喘。第二天早晨，他们分道扬镳，各自面对注定的命运：格茨曼，不顾一切，飞回莫斯科，设法撑过整肃，追求发展，而史迈利，发着高烧，回到他的安恩身边，享受她不算完全的爱。根据事后的了解，格茨曼不是别人，正是卡拉本人，也就是吸收比尔·海顿的人，他的项目官员，良师益友。卡拉鼓动比尔上安恩的床——正是史迈利现在躺着的这张床——以遮蔽史迈利无情的眼光，让他看不见比尔更大的背叛，对组织、对情报员的背叛。

史迈利的眼睛直视眼前的黑暗，卡拉，你现在又要找我做什么？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

睡魔，他想，在你该让我回去睡觉的时候，为何要吵醒我呢？

欧斯特拉柯娃依旧禁锢在她狭小的巴黎公寓中，身心同受折磨，她无法入睡，即使她很想。睡魔全部的魔术也无法帮她。她转身侧躺，被挤压的肋骨苦苦哀鸣，仿佛刺客的手臂仍然攥住她，准备将她抛到车下。她试着背朝下躺，但臀部的疼痛让她恶心欲吐。而当她腹部朝下俯卧，胸部的酸痛恰似她哺育亚莉珊卓时的经验，那只有几个月，就在她抛弃亚莉珊卓之前，而她痛恨那种感觉。

这是上帝的惩罚，她告诉自己，但却非坚信不疑。不待清晨来临，她回到欧斯特拉柯夫的安乐椅上，把他的手枪摆在膝上，让清醒着的世界，一个或两个小时都好，拯救她脱离她的思绪。

艺廊位于庞德街上，在艺术交易商称之为邪恶一端的位置。星期一早晨，史迈利抵达艺廊门口的时间，远远早于任何受敬重的艺术交易商起床的时间。

他的星期天过得出奇平静。水滨街醒得很迟，史迈利也是。睡梦中，他的记忆源源涌出，一整天，持续不断，带给他一种获得启发的微微悸动。至少就记忆而言，他的黑色圣杯又更近一些了。他的电话一次都没响，轻微但挥之不去的宿醉，让他一直陷于沉思。他是靠近帕尔摩街37一家俱乐部的会员——实在有违他的高明判断——他如帝王般孤绝地在那儿用餐，吃了一道重新加热过的牛排羊肾派。之后，他找领班从俱乐部的保险箱中拿出他的盒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些非法财物，包括一本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是他以前的工作化名史坦法斯特，他从未认真打算还给圆场的“管家”；一本相同身份的国际驾照；金额相当多的瑞士法郎，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但这当然也违反了外汇管制法。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他的口袋里。

艺廊洁白得令人目眩，玻璃橱窗里的油画看来大同小异：白色的画布，白色的油彩，只有隐隐约约的轮廓，是清真寺或圣保罗大教堂——或是华盛顿的大教堂？——用手指蘸着浓烈颜料画出来的。六个月前，悬挂在人行道上的招牌写着“漫游蜗牛咖啡馆”。而今，却是“阿特利尔·班纳堤，阿拉伯艺术品鉴赏，巴黎，纽约，摩纳哥”，门上还有一张精心设计的菜单，写着最新的主厨精选：“伊斯兰新古典风。概念式室内设计。宴席承办。请按铃。”

史迈利依指示按铃，一阵嗡嗡声响起，玻璃门开了。一个苍白、金发、半睡半醒的女孩，像陈列在店里已久似的，隔着白色的桌子无力地看着他。

“我想先随意看看。”史迈利说。

她的眼睛微微抬起，朝向伊斯兰天堂。“红色圆点表示已经卖掉了。”她懒洋洋地说，递给他一张打字的价目表，叹口气，又回到她的香烟与占星图前。

史迈利很不愉快地走过一张又一张的油画，最后又停在女孩面前。

“我不可以和班纳堤先生说几句话吗？”他说。

“噢，我怕班纳堤先生现在正在忙。有些国际性的麻烦问题。”

“请你告诉他，我是天使先生。”史迈利维持谦和的态度说，“如果可以，只要这样告诉他。天使，亚伦·天使，他认识我。”

他径自坐在S形的沙发上。这张沙发标价两千英镑，盖着保护用的玻璃纸。他移开玻璃纸时，发出一阵吱嘎声。他听见她举起电话，叹了口气。

“有个天使找你。”她懒洋洋地用那闷着枕头似的声音说，“天堂的天使，听到了吗？”

片刻之后，他走下一道螺旋梯，踏进一片漆黑之中。他走到底，等候着。喀嚓一声，六盏画灯亮起，照着空荡荡的空间，没挂半幅画的空间。一扇门开启，出现一个短小精悍的身影，几乎完全静止不动。一头全白的头发，虚张声势地往后梳。身上一套宽条纹的黑色西装，脚上是一双有搭扣的皮鞋。西装上的条纹，对他而言实在过宽。他的右掌插在外套口袋里，但一看见史迈利，就缓缓地抽出来，像握着一把危险的刀锋。

“啊，天使先生。”他用浓厚的中欧口音说，锐利的目光瞥向楼梯上方，仿佛查看有谁在听。“真是荣幸，先生。好久不见了。请进。”

他们握了手，仍旧保持着距离。

“你好，班纳堤先生。”史迈利说，跟着他走进一间内室，再穿进第二间。班纳堤先生关上门，背轻轻地靠在门上，这似乎是他抵御入侵的堡垒。好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只是带着相互敬重的心情，静静地打量着对方。班纳堤先生的棕色眼睛目光流转，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也从不毫无目的地看着一个地方。这个房间有着荡妇闺房的味道，角落里有一张躺椅和一个粉红色洗手盆。

“生意如何，托比？”史迈利问。

对于这个问题，托比·伊斯特哈斯以颇特殊的方式露出微笑，也以颇特殊的方式斜伸出他小小的手掌。

“我们运气不错，乔治。我们有很好的开始，我们有一个很不赖的夏天。秋天，乔治，”——相同的手势——“秋天，比较不景气一点，可以说，我们得要靠存粮过日子。来杯咖啡，乔治？我那个女孩会泡咖啡。”

“瓦拉狄米尔死了。”史迈利沉默了半晌之后说，“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被枪杀。”

“太糟了，那个老家伙，嗯？太糟糕了。”

“奥立佛·拉康要我收拾善后。因为你是集团的邮差，我想我应该和你谈谈。”

“当然。”托比颇为赞同。

“你当时就知道了？他的死讯？”

“我在报上看到的。”

史迈利的目光巡视过整个房间。没看见报纸。

“你觉得是谁干的？”史迈利问。

“以他的年纪，乔治，度过失望的一生，你可能会这样说？没有家庭，没有前途，集团已洗手不干——我认为他自己干的。理所当然。”

史迈利谨慎地在躺椅上坐下，在托比的注视下，拿起放在桌上的一个铜雕舞者塑像。

“这如果是德加38的作品，岂不是应该打上标价，托比？”史迈利问。

“德加，那是非常灰色的领域，乔治。你必须彻底了解你所交易的东西。”

“这是原作？”史迈利问，流露出真的很想知道的神情。

“如假包换。”

“你会卖给我吗？”

“干吗？”

“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这是要卖的？如果我出价想买，会不会被驳回？”

托比耸耸肩，有些尴尬。

“乔治，听着，我们谈的是上万英镑的交易，你懂我的意思吗？等于一整年的退休金或什么的。”

“你和瓦拉狄米尔的网络最后一次扯上关系，是什么时候，说真的，托比？”史迈利问，把舞者放回桌上。

托比气定神闲地咀嚼这个问题。

“网络？”最后他难以置信地复述，“我听到的是网络吗，乔治？”托比的笑声很少是普通的音量，但此时他却刻意压低笑声，免得引起紧张。“你叫这个疯狂的集团‘网络’？二十个神志不清的波罗的海人，漏洞百出像个谷仓，却已经结合成网络了？”

“嗯，我们总得称呼他们什么东西吧。”史迈利平静地反驳。

“什么东西，当然。只是别用网络，好吗？”

“那么，答案是什么？”

“什么答案？”

“你最后一次和集团接触，是什么时候？”

“好几年前。在他们把我革职之前。好几年前。”

“有多少年？”

“我不知道。”

“三年？”

“也许。”

“两年？”

“你想要盯死我，乔治？”

“我想是的。没错。”

托比严肃地点点头，仿佛他早已猜到这一切。“难道你忘了，乔治，我们在点路灯部门的经历？我们如何加班工作？我的那些小伙子和我，如何担任圆场里大半网络的邮差？记得吗？一个礼拜有多少次会面、接送？二十、三十次？有一次在高峰期——四十次？到登记处去，乔治。如果你有拉康当靠山，就到登记处去，抽出档案，查看接触记录单。那样你才能查个清楚。别想来这里设计我，知道我的意思吗？德加，瓦拉狄米尔——我不喜欢这些问题。一位朋友，一位过去的上司，我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让我失望，可以了吗？”

他的长篇大论，长得出乎他俩原本的预期。托比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史迈利对他的滔滔不绝给出合理的解释。接着，他向前踏近一步，摊开手掌做出请求的手势。

“乔治，”他责难地说，“乔治，我的名字是班纳堤，好吗？”

史迈利似乎坠入忧郁的情绪。他神情抑郁地盯着摊在地板上那一大堆脏兮兮的艺术品目录。

“我不叫赫克特，当然也不叫伊斯特哈斯。”托比坚持，“这一年的每一天，我都有不在场证明——我的银行经理不知道。你想我会要惹祸上身吗？招惹移民局，甚至是警察。这是审问吗，乔治？”

“你了解我的，托比。”

“当然，我了解你，乔治。你想要火柴，好烧掉我的脚？”

史迈利的目光仍然停驻在目录上。“瓦拉狄米尔丧生之前——几个钟头前——他打电话给圆场，”他说，“他说他有情报要给我们。”

“但这个瓦拉狄米尔是个老人，乔治！”托比坚持己见——他的抗议太过强烈，至少听在史迈利耳中是如此。“听着，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大有来头，长期领津贴；他们老了，脑袋不清楚了，就开始编造一些疯狂的记忆，以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有阴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一而再的，史迈利审视着那些目录，圆圆的头撑在握紧的拳头上。

“你现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托比？”史迈利批评说，“我不了解你的理由何在。”

“你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这样说？老叛徒，老间谍，他们都有些神志不清。他们听见声音，对着小小鸟儿说。这很正常。”

“瓦拉狄米尔听见声音？”

“我怎么知道？”

“这就是我问你的问题，托比。”史迈利条理分明地解释，对着那些目录。“我告诉你，瓦拉狄米尔说有情报要给我们，你回答说，他的脑袋不清楚了。我很纳闷，你怎么会知道。关于瓦拉狄米尔脑筋不清楚的事。我很纳闷，你对他心智状态的了解，是多久之前的事？还有，你对

他要说的，为什么这样不屑一顾。就这样。”

“乔治，你玩的这是老掉牙的把戏了。别扭曲我的话，好吗？你想要问我，就问吧。拜托。但别扭曲我的话。”

“那不是自杀，托比。”史迈利说，仍没看他一眼，“那绝对不是自杀。我看过尸体，相信我。也不是嫉妒的丈夫下的手——更别提杀他的凶器是莫斯科中央的谋杀武器。我们以前怎么说来着，那些手枪之类的，‘无人性的凶手’，对不对？没错，就是莫斯科用的凶器。一个无人性的凶手。”

史迈利再次陷入沉思，但这一次——尽管已太迟——托比已经聪明地静默以待。

“你知道，托比，瓦拉狄米尔打电话到圆场时，要求找麦斯。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是他的邮差——你。没找赫克特。他要求找他的主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就是我。违反所有的仪节，违反所有的训练，违反所有的程序。前所未有的。我当然不在那里，所以他们给了他一个替代品，一个叫莫斯汀的傻小子。这无关紧要，因为反正他们也没见着面。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不找赫克特？”

“乔治，我是说真的。你真的是捕风捉影！我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不找我吗？我们要开始为别人的疏忽负责任了，突然之间？这算什么？”

“你和他有过争执吗？为了什么事？”

“我干吗和瓦拉狄米尔起争执？他很戏剧化，乔治。他们都是这样，那些老家伙，退休之后。”托比停顿了一下，仿佛暗示史迈利自己也难逃这些缺点。“他们觉得无聊，他们怀念行动，他们想要出击，所以他们就编出了一些米老鼠的故事。”

“但他们并没有全被射杀，是不是，托比？这就是令人忧心的地方，而你知道原因和结果。有一天，托比和瓦拉狄米尔起了争执，接着，瓦拉狄米尔就被人用一把苏联枪给杀了。用警方的术语说，这是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事件。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其实也是一样。”

“乔治，你疯了吗？什么该死的争执啊？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和老头子有过争执。”

“米凯尔说你有。”

“米凯尔？你去找米凯尔谈？”

“据米凯尔说，老头子对你有许多怨气。‘赫克特不好。’瓦拉狄米尔不停告诉他。他是完全引述瓦拉狄米尔的话。‘赫克特不好。’米凯尔觉得很惊讶。瓦拉狄米尔一向把你看得很重。米凯尔想不出来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才造成这么重大的情感变化。‘赫克特不好。’为什么你不好，托比？发生了什么事，让瓦拉狄米尔这么气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让警方知道，你了解。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缘故。”

但是，托比·伊斯特哈斯身上实务情报员的性格，此刻已全然苏醒，

他知道，审问从来不会赢，只会输。

“乔治，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以怜悯而非伤害的语调说，“我的意思是，很显然你是在愚弄我。知道吗？就因为有些老人在空中筑城堡，所以你就去找警察？这是拉康雇请你的原因吗？这就是你正在收拾的善后吗，乔治？”

这一次，漫长的静默似乎让史迈利下定了一些决心，当他再度开口时，仿佛他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他的声调很快，甚至有些不耐烦。

“瓦拉狄米尔来找你。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就在最近几个星期。你见到他，或和他通过电话——电话亭对电话亭，无论用的是什么技巧。他要求你为他做一些事，你拒绝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星期五晚上打电话到圆场时，要找麦斯的原因。他已经得到赫克特的答案，就是不。这就是‘赫克特不好’的原因。你拒绝了他。”

这一次，托比没试图打断史迈利的话。

“如果情况如同我所说，你现在一定很害怕。”史迈利继续说，故意不看托比外套口袋隆起的一块。“你对谁杀了瓦拉狄米尔，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认为他们也可能会杀你。你甚至会想，我可能不是正当的天使。”他等待着，但托比并没反抗。他的声调变软。“你记得我们在沙拉特的时候怎么说的，托比。恐惧是没有解药的情报？我们如何尊重恐惧？好，我尊重你的恐惧，托比。我想要多了解一点。你的恐惧从何而来。我是否应该一起分担。就是这样。”

托比·伊斯特哈斯小小的手掌仍在门上，平抚着镶板，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史迈利，但镇静的神态无丝毫减损。他甚至透过目光的深度与质疑，试图告诉史迈利，他现在关注的不是自己，而是史迈利。接着，他将热切的态度化为行动，向前踏进一步，又一步，到房间中央，但带着些尝试的意味，仿佛是到医院探视生病的朋友。直到此刻，神态宛如探病的他，才以一个极度深刻的问题，响应史迈利的控诉。而这个问题，巧合的是，也正是过去两天以来，史迈利不断深入思索的问题。

“乔治，请回答我的问题。站在这里说话的到底是谁？是乔治·史迈利？是奥立佛·拉康？米凯尔？说话的是谁，拜托！”没有得到立即的回答，他继续举步前进，走近一张脏兮兮的缎面凳子，让自己如猫般灵巧地坐下，双手放在双膝上。“因为如果是官方的身份，乔治，你问了很多该死的非官方问题，这很让我震惊。你根本是站在非官方的立场，我想。”

“你见过瓦拉狄米尔，也和他谈过话。发生了什么事？”史迈利问，并未因这项挑战而动摇，“你告诉我详情，我就告诉你，站在这里说话的是谁。”

在天花板最远的角落上，有一块黄色的玻璃嵌板，约一米见方，上面影影绰绰，全是街道上行人的足影。不知为了什么，托比的目光停驻在这奇怪的地方，他似乎正在那上面读着自己的决定，就像读打在屏幕

上的告示一般。

“瓦拉狄米尔发出求救信号。”托比说，声调完全如常，既未承认，也未吐露心迹。事实上，凭借声调或感染力的技巧，他甚至想要以声音传达出警告的信息。

“通过圆场？”

“通过我的朋友。”托比说。

“什么时候？”

托比说了一个日期。两个星期前。一次失败的会晤。史迈利问会晤的地点在哪里。

“在科学博物馆，”托比带着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说，“顶楼的咖啡厅，乔治。我们喝着咖啡，赞赏屋顶悬吊的飞机。你会把这些全部都对拉康报告吧，乔治？随便你，行吧！任君享用。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他提出提议？”

“没错。他给我一个提议。他要我做点灯者的工作。当他的骆驼。这是我们的笑话，在古老的莫斯科时代，还记得吗？去收东西，越过沙漠，去递送。‘托比，我没有护照。帮助我，我的朋友，帮助我’你知道他是怎么说话的。像戴高乐。我们以前都这样叫他——‘另一个将军’，记得吗？”

“带什么东西？”

“他没明讲。是一份文件，很小，不需要掩藏。他就只告诉我这么多。”

“就提出试探的人而言，他似乎告诉你不少。”

“他的要求，也该死得多。”托比平静地说，等待着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

“去哪里？”史迈利问，“瓦拉狄米尔也告诉你了吗？”

“德国。”

“哪一边？”

“我们这一边39。北部。”

“非正式的会晤？死信信箱还是活的？哪一种会晤？”

“移动式的会晤。我应该要搭上火车。从汉堡北站。递交的程序将在火车上进行，按照约定的细节。”

“这是私人安排的会晤，没有圆场，没有麦斯？”

“暂时是非常私人的，乔治。”

史迈利老练地刺探他的话：“你辛苦的代价呢？”

托比的回答带着明显的怀疑：“如果我们拿到文件——他是这么说的，文件。如果我们拿到文件，而且文件是真的，他发誓说一定是真的，我们立刻可以在天堂赢得一席之地。首先，我们把文件带给麦斯，告诉麦斯整个故事。麦斯会了解这代表的意义，麦斯会了解这具有的绝对重要性——关于这份文件。麦斯会给我们回报。礼物，升迁，奖章，麦斯会把我们送进上议院。一定会。惟一的问题是，瓦拉狄米尔不知道麦斯已经被束诸高阁，圆场已经加入童子军了。”

“他知道赫克特也已经被束诸高阁了吗？”

“一半一半，乔治。”

“这是什么意思？”但史迈利随即说了一声“别在意”，取消了自己的问题，再次陷入长长的思索之中。

“乔治，你想要放弃询问。”托比恳切地说，“这是我对你最强烈的建议。放弃吧。”他说，并等待着。

史迈利可能没听见。陡然震惊的他，似乎正衡量着托比酿成的错误有多大。

“重点是，你打发他走开。”他低声说，目光仍凝视着空间，“他向你提出请求，你却当着他的面摔上门。你怎么能这样做，托比？你们所有的人？”

斥责让托比愤怒地站了起来，这或许也是史迈利说这些话的用意。托比眼睛亮了起来，双颊泛红，他身上沉睡着的匈牙利血统已然苏醒。

“你想要听听为什么？你想要知道我为什么对他说：‘该死！瓦拉狄米尔。离开我的视线，拜托，你让我恶心。’你想要知道他在那里的联络人是谁——那个在德国北部带着满罐金子，能让我们一夜致富的神奇家伙，乔治——你想知道他真正的身份？记得奥图·莱比锡这个名字吗？那个常常登上我们讨厌鬼年度榜单的人。编故事的，情报贩子，骗子，性爱狂人，皮条客，还有很多不同的罪名。记得那个大英雄吗？”

史迈利又看见旅馆的格子花纹墙壁和贾洛克40穷追不舍的可怕狩猎图。他看见两个穿着黑色外套的身影，巨人与侏儒，以及将军斑痕点点的巨掌放在他同伴的狭小肩膀上。麦斯，这是我的好朋友奥图。我带他来说他自己的故事。他听见飞机在希思罗机场起飞降落的规则的轰隆声。

“很模糊。”史迈利冷静地说，“没错，我依稀记得奥图·莱比锡。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我似乎记得他有许多名字。但当时我们也都一样，不是吗？”

“大约有两百个，但莱比锡是他最后所用的名字。知道为什么吗？莱比锡在东德，他喜欢那里的监狱。他是那种疯狂爱开玩笑的人。记得他兜售的东西吗？“托比相信自己可以先发制人，所以大胆跨步向前，站在居于守势的史迈利面前，低头对他说：“乔治，难道你不记得那些不可思

议的无聊把戏，年复一年，用十五个不同的线民名字向我们的西欧驻站，特别是德国，出售情报？我们新爱沙尼亚秩序的专家？我们在列宁格勒城外苏联武器运输的头号线民？我们在莫斯科中央的耳目？甚至我们对卡拉的主要监视者？”史迈利不为所动。“他光是抄《茎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从我们驻柏林的代表手中骗到两千马克。他又是怎么欺骗老将军的，在他身上下工夫，像是乳臭未干的吸血鬼，一次又一次的——‘我们波罗的海同胞’——这套台词？‘将军，我刚为你找到皇冠的珠宝——只是有个麻烦，我没有钱付飞机票！’老天爷！”

“但尽管如此，那些情报也不完全是杜撰的，是不是，托比？”史迈利温和地反驳，“有一部分，我似乎记得——至少在某些领域——是提供很好的情报。”

“一只手都数得出来。”

“例如他的莫斯科中央情报。我记得我们可没发现有任何问题，不是吗？”

“好吧，莫斯科中央偶尔喂他一些无关痛痒的零碎消息，他就可以塞给我们其他的狗屎！那他玩的那些双面手法又怎么说？看在老天的分上！”

史迈利似乎打算反驳，却又改变了主意。

“我知道了，”他最后仿佛作出裁决般地说，“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一个奸细！”

“不是奸细，是卑鄙小人。做一点这个，弄一点那个。一个生意人。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只要能给他甜头，他就帮任何人做事。”

“我了解了。”史迈利严肃地说，声调也随之转低，“他当然也定居在德国北部，是不是？在特拉文穆德41还是哪里？”

“奥图·莱比锡这辈子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定居过。”托比轻蔑地说，“乔治，那家伙是随波逐流的人，不折不扣的无赖。他穿着打扮得像公子哥儿，养只猫，有辆脚踏车。知道他最后一个工作是什么吗，这个伟大的间谍？在汉堡货柜仓库之类的地方当守夜员！忘了他吧。”

“他还有个同伴。”史迈利依然用单纯的怀旧语调说，“没错，我想起来了。一个移民，一个东德人。”

“比东德还糟，是萨克森人42。姓柯列兹奇玛，名叫克劳斯。克劳斯的第一个字母是‘C’，别问我为什么43。我的意思是，这些家伙根本一点逻辑都没有。克劳斯也是个卑鄙小人。他们一起偷东西，一起行骗，一起伪造报告。”

“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托比。”史迈利客气地接口说。

“谁在乎？那真是完美的姻缘。”

“那么，我相信这段关系并不持久。”史迈利自言自语地说。

也许是史迈利的态度太过谦抑；也许只是托比太了解他了。那双快速转动的匈牙利眼睛亮起了警报灯，温和的眉头聚起了怀疑的皱纹。他后退，审视着史迈利，一只手若有所思地抚过雪白无瑕的银发。

“乔治，”他说，“听着，你在开谁的玩笑？”

史迈利没说话，但拿起德加，转了一圈，又放下。

“乔治，听我一次，拜托。好吗，乔治？或许我要好好地给你上一堂课。”

史迈利瞧了他一眼，然后看向别的地方。

“乔治，我欠你。你听我说。我还是个臭小子的时候，你把我从维也纳的贫民窟救了出来。我那时就像莱比锡，是个无赖。你在圆场里帮我找到工作。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时间在一起，干了许多好事。你记得退休的第一条法则吗，乔治？‘不兼差。不玩业余把戏。不做私人企业，永远！’你记得是谁教这条法则的吗？在沙拉特。在回廊里。是乔治·史迈利。‘结束的时候，就是结束了。关上店门，回家去！’所以，现在你要做什么，突然之间？和死了却不甘心躺下的疯狂将军玩亲亲，还有奥图·莱比锡那种多面小丑！这算什么？突然对克里姆林宫发动最后的骑兵攻击？我们已经结束了，乔治。我们没有执照了。他们已经不要我们了。忘了吧！”他迟疑了一下，突然有些尴尬，“好吧，安恩的确让你很不好过，因为她和比尔·海顿的事。那是卡拉，卡拉是比尔在莫斯科的大老爹。乔治，我知道这很残忍，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双手垂在两侧，凝视着在他面前的身影。史迈利的眼睛几乎闭上，头向前垂。两颊的牵动让他的嘴巴和眼睛周围出现深深的凹痕。

“我们从来没有指责莱比锡对于莫斯科中央的报告。”史迈利说，仿佛根本没听见托比后一部分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从来没指责过他。即便是关于卡拉的事情也没有。瓦拉狄米尔对他完全信任。关于莫斯科的情报，我们也一样。”

“乔治，谁曾经指责过莫斯科中心的报告？！拜托！好吧，我们偶尔弄来一个投诚者，他会告诉你：‘这件事是胡说八道，但那件事可能是真的。’哪里有什么可信的担保？哪里有什么可靠的基础？你以前常说的。有些家伙喂你一个故事：‘卡拉刚在西伯利亚成立了一个情报训练中心。’谁敢说他们没有？保持模糊，你就不会输。”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他往来的原因。”史迈利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托比的话，“只要牵涉到苏联，他就不会玩花样。”

“乔治，”托比轻声说，一面摇着头，“你一定要醒醒。所有的人都回家了。”

“现在，你会告诉我其他的部分吗，托比？你会一五一十告诉我，瓦拉狄米尔到底是怎么说的？拜托。”

最后，勉强作为友谊赠礼，托比如史迈利所请，一五一十地，像被

击溃的人那样坦诚相告。

这座铜雕，很可能是德加描摹的芭蕾舞者。模特儿的双手高举过头，身体向后弯曲，双唇浑然忘我地微张，一切都很完美，只是，无关仿作或真品，那神态竟与安恩相仿得令人不自在。史迈利再次把雕像握在手中，缓缓地旋转，出神地盯着，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欣赏之情。托比又坐回那张缎面凳子。从天窗上，映照出轻快走过的足影。

托比和瓦拉狄米尔是在科学博物馆航空科学那层的咖啡馆见面的。瓦拉狄米尔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一直抓着托比的手臂。托比很不喜欢这样，因为他觉得太过惹人注意了。奥图·莱比锡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瓦拉狄米尔不断说。这是个大案子，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托比；奥图·莱比锡拿到了麦斯一直梦想的东西，‘把我们所有的账全部算清’，瓦拉狄米尔这样说。当托比有些尖酸地问他，他心目中的账是什么，瓦拉狄米尔不知是不愿还是不能说：“问麦斯。”他坚持，“如果你不相信我，去问麦斯。告诉麦斯，这是个大案子。”

“那么，条件是什么？”托比问——他知道奥图·莱比锡总是先关心钞票，货物则要很久、很久以后才送到。“他要多少，那位大英雄？”

托比对史迈利坦诚，他实在很难掩饰心中的怀疑——“这会让晤从一开始就没好心情”。瓦拉狄米尔提出条件。瓦拉狄米尔说，莱比锡有故事，但他也有某些证据，可以证明故事是真的。首先是一份文件，莱比锡称这份文件为，前菜或开胃菜。还有第二项证据，一封信，在瓦拉狄米尔手中。而故事本身还有其他资料，由莱比锡交付保管。文件会显示取得故事的过程，而资料本身则不容置疑。

“目标呢？”史迈利问。

“没说。”托比简洁地回答，“对赫克特，不能泄露。找麦斯，就没问题。瓦拉狄米尔会揭开谜底。赫克特必须暂时闭嘴，去跑腿。”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似乎准备要发表第二篇浇冷水的演说。“乔治，我要你听着，那个老家伙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奥图·莱比锡根本就是在骗他嘛。”接着，他看到史迈利的表情，如此深沉，如此不可捉摸，于是便转变话题，重新谈到奥图·莱比锡可恶至极的要求。

“文件将由瓦拉狄米尔本人亲自交给麦斯，完全遵照莫斯科规则，没有中间人，没有通信。他们已通过电话做好准备工作——”

“伦敦与汉堡之间的电话？”史迈利插嘴道，从他的声调听来，这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新信息。

“他们使用密语，他告诉我。老搭档，他们知道如何玩把戏。但这项证据不同，瓦拉狄米尔说，对于证据，没有把戏可言。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以物易物，他们需要一个骆驼。瓦拉狄米尔对安全的狂热，这我们早已知道。从此时开始，只适用莫斯科规则。”

史迈利记起自己在星期六晚上打到汉堡的电话，再次百思不解，奥

图·莱比锡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场所，当自己的电话转接站。

“一旦圆场确认了证据的价值，”托比继续往下说，“就要付给奥图·莱比锡五千瑞士法郎现金的试听费。乔治！五千瑞士法郎！还只是开头而已！只是进场费！接下来——乔治，你该听听——接下来，奥图·莱比锡会飞到英格兰的某个安全所在进行试听。乔治，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听过这种疯狂事。你如果想要其他的，如果，试听之后，圆场想买下资料——你想知道多少钱吗？”

史迈利想听。

“五万瑞士法郎。也许你想签一张支票给我？”

托比等待着愤怒的吼叫，但什么都没有。

“全给莱比锡？”

“当然。这是莱比锡的条件。还有谁会这么神志不清？”

“瓦拉狄米尔自己呢？他要什么？”

略微迟疑了一下。“什么都不要。”托比不情愿地说。然后，像是要把这个话题抛开似的，他又燃起了一股新的怒火。

够了！所以，赫克特要做的就是自己花钱飞到汉堡，搭火车北上，在莱比锡一手导演的疯狂的陷阱游戏里扮演兔子的角色，莱比锡准备拿那些把戏应付东德人、苏联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古巴人，当然，现在还有中国人。我告诉他——乔治，听我说——我告诉他：‘瓦拉狄米尔，老朋友，原谅我，请注意听我说。告诉我，这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让圆场必须付五千瑞士法郎的预付款，就为了奥图·莱比锡的一场劳什子的试听？玛丽亚·卡拉斯44从来都没要这么高的代价，而且相信我，她唱得可比奥图好太多了。’他握住我的手臂，这里。”托比示范地抓住自己的双头肌。“他抓住我，像抓住一颗柳橙似的。那个老家伙有些特别的技巧，相信我。‘替我去拿文件，赫克特。’他用俄文说。那是很安静的地方，博物馆。每个人都停下来听他说话。我感觉很不舒服。他哭着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赫克特。我是个老人。我没有腿，没有护照，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只有奥图·莱比锡。到汉堡去，拿文件回来。麦斯看到证据，就会相信我，麦斯有信心。’我试着要安抚他。我告诉他，这些日子以来移民绝不是什么好事，政策改变，新政府上台。我劝他：‘瓦拉狄米尔，回家吧，下几盘棋。听着，我会找一天到图书馆去，也许去玩一盘。’然后他对我说：‘赫克特，这件事是我起的头。是我带消息给奥图·莱比锡，叫他去探查情势。是我给他钱去做基础工作，我所有的钱。’听着，这是个悲哀的老人。忘了吧。”

托比停顿了一下，但史迈利没有动静。托比站起来，走向酒柜，倒了两杯非常普通的雪莉酒，一杯放在桌上，德加的铜雕旁。他说：“干杯。”一饮而尽，但史迈利仍然一动也不动。他的毫无反应重新激起托比的愤怒。

“所以是我杀了他，乔治，可以了吗！是赫克特的错，可以了吧。赫克特个人要对这个老人的死负全部的责任。这正是我需要的！”他挥舞双手，手掌朝上。“乔治！你来告诉我吧！乔治，为了这个故事，我应该到汉堡去，非正式的，没有掩护，没有保姆？知道东德的边界在哪里吗？离吕贝克45两公里？甚至更近！记得吗？在特拉沃明德，我们必须留在街道的左边，否则你就误投敌营了。”史迈利没笑。“如果我在极渺茫的机会下活着回来，我就可以去拜访乔治·史迈利，和他一起去找索尔·恩德比，像个无赖一样敲他的后门——‘让我们进去，索尔，拜托，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情报，是最最可靠的奥图·莱比锡提供的，只要五千瑞士法郎，就可以试听童子军规则绝对禁止的情报？’我应该这样做吗，乔治？”

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史迈利抽出一包皱巴巴的英国香烟。从香烟盒子里，他抽出一张土法炼钢洗出的照片，静静地递过桌子，交给托比看。

“另一个人是谁？”史迈利问。

“我不知道。”

“不是他的搭档，那个萨克森人，以前和他一起偷鸡摸狗的那个人？柯列兹奇玛？”

托比·伊斯特哈斯摇摇头，继续看着照片。

“那么，另一个人是谁？”史迈利又问一次。

托比递回照片。“乔治，注意听我说，拜托。”他平静地说，“你在听吗？”

史迈利可能在听，也可能没听。他把照片收回香烟盒子里。

“现在，这样的照片已经可以伪造了，你知道吗？非常简单，乔治。如果我想把某个人的头接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只要给我器材，两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你对科技不在行，乔治，你不了解这些事。你不能从奥图·莱比锡手中买照片，你不能从班纳堤先生手中买德加，懂了吗？”

“也可以伪造底片吗？”

“当然。你伪造照片，然后拍下来，你就有一张新的底片了——为什么不行？”

“这张是伪造的吗？”史迈利问。

托比迟疑良久。“我不这样认为。”

“莱比锡经常旅行。如果我们需要他，如何召唤他？”史迈利问。

“我们对他敬而远之。彻底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找他？”

“例行的会面就登在《汉堡晚报》的征婚广告上。佩特拉，二十二岁，金发，娇小，前歌手——这些鬼话。乔治，听我说。莱比锡是个危

险的无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关系，大部分都还在莫斯科。”

“紧急情况呢？他有房子，有女朋友吗？”

“他一辈子都没有房子。如果是紧急的会面，克劳斯·柯列兹奇玛就扮演关键角色。乔治，看在上帝的分上，听我一次——”

“我们如何找到柯列兹奇玛？”

“他有好几家夜总会。妓院。我们在那里留下口信。”

一阵警告鸣声响起，他们也听见从楼上传来的争论声。

“班纳堤先生今天恐怕在佛罗伦萨有个会议，”那个金发女郎说，“有国际性的问题要处理。”

但来访的人拒绝相信她；史迈利可以听见他如潮水般涌起的抗议声。一刹那，托比那双棕色眼睛顺着声音猛然一抬，接着，他便叹口气，拉开衣橱，拿出一件脏兮兮的风衣，和一顶棕色的帽子。头上，阳光亮晃晃地洒落天窗。

“叫什么名字？”史迈利问，“柯列兹奇玛的夜总会——叫什么名字？”

“蓝钻石。乔治，别做，好吗？无论如何，放弃吧。照片是真的，那又如何？圆场有一张照片，几个人在雪地里打滚，拜奥图·莱比锡所赐。你突然觉得那是个金矿了？你觉得这样就会让索尔·恩德比硬起来？”

史迈利看着托比，想他，想他们相知甚深、一同工作的那些年。托比从来不会自愿吐露实情，情报对他就如同金钱。即使他认为那些情报毫无价值，他也从不轻易透露。

“关于莱比锡的情报，瓦拉狄米尔还对你说了什么？”史迈利问。

“他说那是死而复活的案子。许多岁月的投资。还有些关于睡魔的鬼话。他又变成小孩子了。记得那些童话故事？饶了我吧。你懂我的意思吗？”

“什么关于睡魔的事？”

“告诉你，这是关于睡魔的事。就这样。睡魔正在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麦斯会了解的。乔治，他还掉眼泪，真是够了。他想到什么就说。他想要行动。他是莽莽撞撞的老间谍。你以前常说这是最糟的。”

托比站在另一边的门口，正准备离开。但他转身又走回来，因为史迈利的某些神态似乎很令他困扰——“非常严厉的凝视”，他事后回想，“好像我侮辱了他似的”。

“乔治？乔治，我是托比，记得吗？如果你不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楼上那个家伙就会逼你帮我一半的钱，听到我的话了吗？”

史迈利几乎没听见。“许多岁月的投资，和睡魔正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他重复说，“还有呢？托比，还有呢？”

“他的举止又像个疯子。”

“将军会这样？瓦拉狄？”

“不是，是睡魔。乔治，听着。‘睡魔的举止又像个疯子了，睡魔正在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麦斯会了解。’没有了全是垃圾。我把每一个字都告诉你了。现在可以放心走了，听见我的话了吗？”

楼上传来的争吵声音更大了。一扇门重重摔上，他们听见脚步声用力踏向楼梯。托比很快地朝史迈利手臂轻轻一拍。

“再见，乔治。听我说。哪天你需要一个匈牙利保姆，就打电话给我。听到没？你和奥图·莱比锡那种卑鄙小人周旋，最好就要有像托比这种卑鄙小人来照料你。晚上别独自外出，你太年轻了。”

史迈利爬上铁梯回到艺廊，险些被气冲冲奔下楼梯的债主击倒。但这对史迈利并不重要；那个灰金头发女郎在他踏向街道时发出的无礼叹息声，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已为照片上的第二张脸孔找到名字；那个名字，那段故事，在过去的三十六个小时里，像无名病痛般，不断在他的记忆中隐隐作痛——托比或许会说，那个故事是个传奇。

事实上，在相关的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当然是在这件事结束的几个月之后——要分析史迈利的智慧与行动之间如何交互运作，确实是个难题。他们说，托比告诉他这么多，所以他就做这么多；或者，如果某些事没发生，那么这件事也就会悬而未决。但是，事实却复杂得多，而且也没那么轻率大胆。他自己做了一个麻醉病人的清醒测试——这条腿，那条腿，两手张开、合上——然后，史迈利凭借着身体与意志的力量，继续谨慎行动，探究对手的动机，一如探究他自己。

他正开上高原。高原在林木顶缘，因为这里的松树都低低种在山谷的凹处。这是同一天的傍晚时分，平地上初亮的华灯，照穿了雨湿的阴霾。迤迤在地平线上的是牛津市，一座学术的耶路撒冷在田野的雨雾中升起。从这方向望去的景观，对他而言很新鲜，也加深了他的不真实感：走上这段旅程，似乎不是自己所决定的；脑中盘旋的万千思绪，似乎也不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的。他造访托比·伊斯特哈斯，或许还有理由可以说是在拉康演示文稿的指导原则范围内；但这段旅程，他知道，无论是好是坏，都会通向他个人秘密兴趣的禁区。然而，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也毫无所求。就像终生挖掘却一无所获的考古学家，史迈利只恳求再有最后一天，而此刻就是那一天。

起初，他不停地看着右边的后视镜，那辆熟悉的摩托车紧跟在后，像海上的海鸥。但在离开最后一个环状交叉路之后，那个名叫傅格森的人就没再跟着他，而当他停下来看地图时，也没有任何车辆超越他，因此，若不是他们猜到他的目的地，就是基于某些不可思议的程序因素，他们禁止他们的人越过郡界。有时候，开车时，会有一阵惊惶的情绪攫住他。让她去吧，他想。他听到过一些事，不多，但已足够猜想其他的了。让她去吧，让她在可以找到平静的地方重获平静吧。但他知道，平静不是他的，也不是能给的，他所卷进的这场争斗，必须继续，直到找出意义，方能终止。

狗饲养场的招牌像个画上的笑容：“梅瑞莉宠物旅馆，欢迎所有宠物，蛋亦欢迎”，上面草草画着一只头戴礼帽的黄色小狗，一掌朝下，指着一条车道；他开上这条车道，一路向下陡降，宛如自由落体。他穿过一个塔门，听见风呼啸而过的声音，进入一片人造林。首先穿过的是树龄尚浅的小树林，接着是遮荫蔽日的大树，他仿佛置身童年时的德国黑森林，正要踏进尚未揭晓的内在世界。他打亮车头灯，转过一个险峻的弯道，然后又一个，第三个，眼前出现了一间木屋，与他想像中的模样相去不远——她的“达佳”（俄文，郊外的避暑别墅），正如其一向所说的。曾经，她在牛津拥有一幢房子，“达佳”是一个避居的地方。而现在，只有“达佳”；她永远离开城市了。木屋矗立在树干间从饱经践踏的泥泞中整理出来的一片空地上，有着摇摇晃晃的阳台和木瓦屋顶，烟囱里正冒出烟来。装上护板的墙壁因涂上木焦油而变黑，一个白铁喂食槽几乎把前面的走廊完全挡住。在一小片草地上，有一张鸟食台，摆放了足以喂饱整个诺亚方舟的面包；在空地周围，像分配的营房般散布着几间石棉搭建的棚屋，围着铁丝，养着鸡和一律受欢迎、不受歧视的宠物。

卡拉，这真是个好找你的地方啊。

停好车。他的到达引起一阵骚动，狗儿不安地低吠，奋不顾身地向外扑，让薄薄的墙壁如雷震动。他走向木屋，手拎提袋，瓶子不断撞他

脚。在一片喧闹声中，他听见自己的脚步吱吱嘎嘎踩上阳台的六级阶梯。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出门时勿置宠物于危险中”，下面，似乎是出于愤怒地加上一行：“该死的猴子勿入”。

门铃的拉环是塑料的驴子尾巴。他伸手要拉铃，但门早已打开，一位柔弱的美丽女子从木屋里的一片漆黑中看着他。她的眼睛是灰色的，略带羞怯；她有一种英国的古典美，是安恩以前曾拥有的特质：知心，庄重。她看见他，刹时无法动弹。“噢，天哪！”她低声说，“我的天哪！”然后，她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厚底工作鞋，用一根手指拨开前额的头发，狗儿们声嘶力竭地在铁丝网后对着他吠叫。

“对不起，希蕾莉，”史迈利非常温和亲切地说，“只要一个小时，我保证。就这样，一个小时。”

一个深沉的男性声音，从她背后的暗处缓缓传来：“什么事，希儿？”那声音咆哮道，“沼泽象鼻虫？长尾小鹦鹉？还是长颈鹿？”

紧接着，是一阵缓缓的声响，像是某种中空物体覆盖着布移动的声音。

“是人，康。”希蕾莉转头说完，又回过头来盯着自己的工作鞋。

“是女人，还是其他的？”那声音追根究底。

“是乔治，康。别生气，康。”

“乔治？哪一个乔治？开货车的乔治？把我的煤弄湿的那一个。还是卖肉的乔治，毒死我的狗的那一个？”

“只是有几个问题。”乔治对希蕾莉保证，用的是同样深表同情的声调，“一件老案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保证。”

“没关系，乔治。”希蕾莉说，眼光依旧看着下方，“老实说，这样很好。”

“别在那里调情！”屋内的声音命令道，“放开她，不论你是谁。”

飒飒的声响缓缓接近，史迈利向前越过希蕾莉，对着门里说话。“康妮，是我。”他说。再一次，他的声音尽可能表现出最大的善意。

首先出现的是一群小狗——一共四只，可能是惠比特犬——非常快速地冲出来。接着是一只脏兮兮的杂种狗，活力充沛地直冲到阳台，跌倒在地。此时，门颤抖着打开到极限，出现一位体型庞大如山的女人，身体靠着一对木制的粗大拐杖支撑着，但她的手似乎并未握在杖上。她的一头白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人似的；而那对水汪汪、非常锐利的眼睛，严厉地瞪着他。她打量他良久，事实上是好整以暇仔细打量——他一本正经的脸孔，他宽松的西装，在他左手摇晃的塑料提袋，他温顺地等待许可的神态——这给了她近乎帝王的权势来凌驾他，她的静止不动，她困难的喘息，她的残障状态，都只有让她的力量更加强大。

“噢，哎呀呀，”她大声说，依然注视着他，吐出一口蒸汽，“真吓了

一大跳。你真该死，乔治·史迈利。你真该死，还有那些帮你做事的人也该死。欢迎到西伯利亚来。”

此时，她露出微笑。她的微笑如此出乎意料，如此清新，如此孩子气，几乎把先前的一连串询问都一扫而空。

“你好，康。”史迈利说。

她的眼睛，尽管微笑着，仍然定定地看着他。那双眼睛像新生儿般苍白。

“希儿，”最后她说，“我说，希儿！”

“嗯，康？”

“去喂那些小狗吧，亲爱的。喂完之后，就去喂脏兮兮的小山雀。让那些畜生吃个够。做完之后，就去混拌明天的饲料。如果全部都做完了，就带一个无痛的凶器来，好让我收拾这个碍眼的东西，早点送他上天堂。乔治，跟我来。”

希蕾莉微笑着，但似乎无法移动，直到康妮用手肘轻轻碰她，催她走开。

“走啊，亲爱的。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可以替你做的了。他尽力而为，你也是，天知道，我也一样！”

这是一间白昼与黑夜并存的房子。房间中央的松木桌上，散置着吃剩的吐司和一罐“马密特”酱料，一只旧油灯摇曳着昏黄的光线，让周围益显阴暗。蓝色的雨云，在夕阳的缀饰之下，熠熠生辉，映满房间另一端的法式窗。跟着康妮举步维艰地前行，史迈利逐渐了解，这间原木房间就是全部了。这是办公室，有张顶盖可以卷起来的写字台，放着支票和跳蚤粉；这是卧室，有张双人铜床，枕头间躺满填充的动物玩偶，宛如死去的士兵；这是客厅，有康妮的摇椅，和碎裂的藤沙发；这是厨房，煤球在圆柱桶中燃烧；而处处清理不尽的垃圾，则是年华老去的装饰品。

“康妮不回来了，乔治。”她蹒跚走在他前面，“野马呕心沥血，死而后已；老笨蛋靴高挂，金盆洗手。”走近摇椅，她困难地转动庞大的身躯，将背靠到椅上。“所以，如果这是你来的目的，你可以告诉索尔·恩德比，叫他好好想一想。”她朝他伸出手臂，他想她可能是要他吻她吧。“不是这样，老色鬼。扶着我的手。”

他照办，让她坐进摇椅里。

“那不是我来的目的，康。”史迈利说，“我不是来追你的，我保证。”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她快死了。”她坚定地说，似乎没注意他的感叹声，“该把老笨蛋送进碎纸机了，还有那些辉煌时光。吸血鬼医生想愚弄我。因为他是个懦夫。支气管炎。风湿症。天气的影响。鬼话连篇，全都是。其实是死亡，这才是我受折磨的原因。手指和脚趾受到的

系统性侵犯。你袋子里装的是酒吗？”

“对，没错，是酒。”史迈利说。

“好家伙，让我们痛饮一场吧。邪恶的安恩近来如何？”

在排水板上，一大堆待洗的东西之中，他找出两只杯子，倒进半杯酒。

“春风得意吧，我猜。”他回答说。

他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递给她一杯酒，回报她对他来访的欣喜欢迎。她用戴着露指手套的双手握住酒杯。

“你猜，”她回应道，“希望你还能猜。猜她在做什么是你该做的。否则你就该在她的咖啡里加玻璃粉。好了。你要干什么？”她一口气说完，“我从来没看过你做任何事是没有理由的。干杯！”

“干杯，康。”史迈利说。

为了喝这口酒，她必须把整个身子往前倾，贴近酒杯。她巨大的头在油灯的灯光中晃动，他知道，因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她的肌肉已出现死亡的斑斑白迹。

“来吧，喝完吧。”她以最严厉的语气命令道，“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帮你，注意。我们分开之后我发现了爱。荷尔蒙打乱了，尖牙利齿也软化了。”

他需要时间去重新了解她。他对她不确定。

“是我们的一个老案子，康，就是这样。”他带着歉意说，“老案子又复活了，就这样。”他试着提高声调，让这段话听起来更随意。“我们需要更多细节。你知道你一向对保存记录很有一套。”他试探性地加上一句。

她的眼光一动也不动地盯住他的脸。

“基洛夫，”他继续说，非常缓慢地念出那个名字，“基洛夫，名叫欧雷格。想起来了吗？苏联大使馆，巴黎，三年或四年前，二等秘书？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莫斯科中央的人。”

“他是。”她说，身体稍向后靠，仍然看着他。

她提到要根香烟。桌上有一包十根的烟。他把烟放进她的嘴唇之间，点亮，但她的眼睛仍然没从他的脸上移开。

“索尔·恩德比把这个案子丢到窗外。”她说，撅起嘴像吹长笛似的，向下直直吹出一口烟，避免喷到他脸上。

“他决定那个案子应该放弃。”史迈利纠正她。

“有什么差别？”

史迈利从没想到过自己会为索尔·恩德比辩护。

“那个案子进行了一段时间，刚好在我和他交接的那段期间，他判断那个案子不会有结果，这点可以理解。”史迈利地说，很谨慎地选择字句。

“而现在他改变心意了？”她说。

“我记得一些，康，我要知道全部。”

“你一向如此，乔治，”她喃喃地说，“乔治·史迈利。上主重生。上主赐福我们，保全我们。乔治。”她的目光半是怜爱，半是不以为然，仿佛他是她深爱的误入歧途的儿子。目光凝视他良久，然后转向法式窗和窗外夜色渐浓的天空。

“基洛夫。”他再说一次，提醒她，等待着。他认真地思索，这一切是否都仍在她心中；或者，这一切已随她的肉体逐渐死去。但这一切都仍在。

“基洛夫，欧雷格。”她以沉思的声调重复说，“一九二九年十月生于列宁格勒，依据他护照上的资料是如此，但这什么他妈的意义也没有，只可能代表他一辈子都没有踏进列宁格勒一步。”她微笑着，仿佛这就是邪恶世界之道，“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抵达巴黎，职衔是商务二等秘书。三到四年前，你说？老天爷，可能有二十年了。没错，亲爱的，他是个流氓。他当然是。可怜的老里加集团在巴黎的会所认出他来，但他们没帮上任何忙，特别是五楼。他的真名叫什么来着？寇斯基。当然是。没错，我想我记得欧雷格·基洛夫，原名寇斯基。没错。”她的微笑又回来了，而且一如往昔，非常美丽。“那可能是瓦拉狄米尔最后的案子，非常接近。那只老鼬鼠现在如何？”她问，她水汪汪的慧黠眼睛等待着他的回答。

“噢，他适得其所。”史迈利说。

“还在吓巴丁顿的小姑娘？”

“我相信是。”

“老天保佑，亲爱的。”康妮说。她转过头，又望着法式窗窗外，侧面对着史迈利。非常暗，只能借着油灯看见她美好的侧面轮廓。

“去瞧瞧那个疯女人，可以吗，爱人？”她怜爱地问，“确定那个白痴没把自己丢进水车的引流沟里，或喝掉万能除草剂。”

史迈利走到外面，站在阳台上，在逐渐深浓的夜色中，看见希蕾莉的身影笨拙无力地穿梭在笼舍间。他听见她的汤匙碰在饲料桶上的哐啷声，还有夜凉空气中传来的只字片语，是她教养良好的声音呼唤着孩子气的名字：来吧，小白！布布！波波！

“她很好。”史迈利回到屋里说，“在喂鸡。”

“我应该叫她离开，是不是，乔治？”她自顾自地说，完全忽略他所提供的情报，“‘踏进世界吧，我亲爱的希儿。’我应该这么说，‘别把你自己和像康这样老朽的傻大个儿绑在一起。去嫁个没下巴的傻瓜，生一群

傻孩子。实现你卑微的女人梦。”他记得她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说话声音，甚至是对她自己也是。她现在仍然如此。“如果我这样做，就不是人，乔治。我需要她。她每一丝每一毫的宜人部分。只要有一半的机会，我就会带着她。有时你就是想试试看。”略停顿，“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还好吧？”

一时间，他没听懂这个问题；他的思绪还留在希蕾莉身上，还有安恩。

“高贵的索尔·恩德比还是高高在上？吃得不错，我相信。没脱胎换骨？”

“噢，索尔愈挫愈勇，谢谢。”

“那个讨厌的山姆·科林斯还是执行处的头儿？”

她的问题无边无际，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回答。

“山姆也很好。”他说。

“托比·伊斯特哈斯仍然在回廊上阿谀奉承？”

“就像往常一样。”

她的脸已笼罩在暗黑的夜色中，看得出来她是否仍要继续开口。他听到她的呼吸声，还有胸部的喘气声。但他知道，自己仍然是她仔细观察的对象。

“你从没为那群人工作过，乔治。”最后她评论说，仿佛这是最不证自明的陈腔滥调，“你没有过。再给我一杯。”

习惯于移动的史迈利再度走向房间的另一端。

“基洛夫？”康妮对他喊道。

“没错。”史迈利愉快地说，端来她的酒杯作为回报。

“奥图·莱比锡那个小侦探是第一个障碍。”她喝下一大口酒，津津有味地说，“五楼不相信他，他们干吗信？我们那个小奥图——噢，不！奥图是个杜撰故事的人，就是这样。”

“但是，关于那些莫斯科目标，我不认为奥图曾经对我们说谎。”史迈利说，重拾起怀旧的口吻。

“没有，亲爱的，他没有。”她赞同道，“他有他的弱点，我向你保证。但碰到大情报，他一向是很诚实的。而且你了解，在你们那伙人里，我只会对你这样说。但你从其他大人物那里没得到多少支持，对不对？”

“他也从没对瓦拉狄米尔说谎。”史迈利说，“前提是瓦拉狄米尔的逃跑路线让他能逃离苏联。”

“嗯，很好。”康妮沉默良久之后说，“基洛夫，原名寇斯基，那只姜黄猪。”

她又说了一遍“基洛夫，原名寇斯基”她似乎在挖苦自己庞大如山的记忆。当她这样说时，史迈利的心灵之眼又看见了那间机场旅馆房间，两个奇怪的同伙人，穿着黑外套，坐在他面前：一个如此巨大，一个如此纤小；老将军卯足全部的体力，强化自己热情的恳求；纤小的莱比锡瞪着热烈如火的眼睛，像只被皮带缚住的愤怒狗儿，在他身旁守望。

她禁不住诱惑。

油灯的火焰变成了烟雾迷蒙的光球，康妮坐在摇椅的边缘，像个苏联母亲——这是他们在圆场里给她的封号——逐渐衰老的脸庞沉浸在怀旧的情绪中，娓娓道来，而这只是她那一家子无法数计的误入歧途孩子们中的一个的故事。无论心中如何怀疑史迈利来此的动机，她都暂时搁在一旁：这是她赖以生存的本领；这是她的歌，即使是最后一首；这些追忆的庞大工程，正是她的天赋所在。史迈利记得，在过去的日子里，她会嘲笑他，卖弄她的声音，看似天外飞来一笔地高谈阔论莫斯科中央历史，只为了诱使他靠近前来。但今夜，她的陈述却有种令人敬畏的严肃意味，仿佛她已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欧雷格·基洛夫从莫斯科直接赴巴黎，她再说一遍——六月，亲爱的，就像我告诉你的一样——那年六月倾盆大雨不断，沙拉特的年度板球赛一连顺延了三个礼拜无法举行。胖子欧雷格在名单上的记录是单身，他的到职并非要取代任何人的职位。他的办公桌在二楼，俯瞰圣西蒙路，交通混乱，但景观不错。亲爱的，莫斯科中央驻法办公室则霸占了三、四楼，这让大使很生气，觉得自己被这些讨人厌的邻居挤进一个小柜子里了。从外表看，基洛夫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苏联外交圈里的稀有动物，也就是说，是个如假包换的外交官。但当时在巴黎的作业方式——就康妮所知，迄今仍是，亲爱的——只要苏联大使馆出现一张新面孔，照片就会送达各流亡团体的头目手里。基洛夫弟兄的照片一送到各个团体手里，瓦拉狄米尔那个老魔头立即满怀兴奋地去敲他项目官员的门——当时斯蒂夫·麦克尔沃负责巴黎，上帝保佑他，没多久之后就因心脏病过世，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坚持说“他的手下”认出基洛夫是以前专门搞煽动的情报员，名叫寇斯基，他在塔林工艺学校就读时，就纠结一些持异议的爱沙尼亚码头工人，组成一个小团体，称之为“不合作讨论俱乐部”，然后向秘密警察密告小组的成员。瓦拉狄米尔的消息来源，当时刚好在巴黎，就是那些倒霉的工人之一，他自作自受，到投诚之前都还与寇斯基有往来。

及至此时，一切都还好，只除了瓦拉狄米尔的消息来源，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小奥图，也就是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已无可挽回了。

康妮继续述说，而史迈利的记忆也再次开始补充。他看见自己，那是即将卸下圆场首长职务的几个个月前，他从五楼开完周一会，驼着背，疲倦地走下木头楼梯，腋下夹了一大叠页角卷折的档案。在那段日子里，圆场像是个遭受轰炸的建筑，官员四散，预算被砍，情报员不是精疲力竭，就是死了，再不然就是被解雇了。比尔·海顿真面目的揭露是每

一个人心中的伤口：他们称之为“堕落”，并共同承担着最原始的羞耻感46。也许在他们内心深处，甚至会暗自责怪史迈利造成这一切，因为是史迈利揭发了比尔的变节。他看见自己主持会议，一张张带着敌意的脸孔面朝他而坐，本周案件一件接一件的演示文稿，紧接着是一成不变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发展这个？我们应该再给一个星期吗？再一个月？再一年？这是陷阱吗？这可以否定吗？这在我们的规章范围内吗？需要什么样的消息来源，用在别处会更适合吗？谁授权？应该知会谁？要花多少钱？他还记得，只不过提到奥图·莱比锡这个名字，或化名，就引起一阵猛烈批评，劳德·斯屈克兰、山姆·科林斯那一帮靠不住的判官立即大加挞伐。他努力想要回忆起来，除了康妮和她苏联研究部门的那队人马外，还有什么人在场。财务处长，西欧处长，苏联攻击处长，几乎全都是索尔·恩德比的人。恩德比本人，当时名义上仍是外交官员，由他自己的亲信帮他以白厅联络人的名衔加以掩护，但是早在当时，他只要一微笑，他们就放声大笑，而他一皱眉，他们就反对。史迈利看见自己聆听提交的报告——康妮自己的——正如她现在所重述的，以及她初步分析的结果。

奥图的故事有凭有据，她坚信。就目前看来，不可能是假的。她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

她自己的苏联研究部门依据书面文件资料证实，有一个名叫欧雷格·寇斯基的法学院学生，在相关的时间内，就读于塔林工艺学校。

外交部的当代档案载明码头的不安定形势。

从美国表弟那得来的一份投诚者报告说，有一个寇斯基，疑为克斯基，是律师，名为欧雷格，一九七一年于基辅完成莫斯科中央的训练课程。

相同的消息来源指称，尽管可疑，寇斯基后来接受上司的建议改名，“念及他以前的实战经验”。

法国联络处的例行报告指出——虽然一向都很不可靠——以驻巴黎的二等商务秘书而言，基洛夫享有颇不寻常的自由，例如独自外出购物，参加第三世界的酒会，却未依常规与十五个同伴同行。

所有的这些资料显示，简而言之，康妮总结说——就五楼的品味而言，她有些太过生气蓬勃——所有的资料都证实莱比锡的故事，确实值得怀疑基洛夫具有情报员角色。接着她啪的一声把档案丢在桌上，传阅她的那些照片——非常普通的照片，是法国监视小组例行的任务，也是在里加集团巴黎总部引起大骚动的照片。基洛夫坐进大使馆的车。基洛夫带着手提箱从莫斯科国民银行现身。基洛夫在一家情色书店的橱窗下脚步，对着杂志封面皱眉头。

但没有一张，史迈利想——回到现在——没有一张是欧雷格·基洛夫和他以前的受害者奥图·莱比锡与两名女子嬉戏的照片。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亲爱的。”康妮说，喝下一大口酒，“我们从档

案中找到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小奥图是对的。我们有一些其他情报来源提供的间接证据，没有很多，我承认，但是一个起步。基洛夫是个流氓，他刚到任，但大家都在猜他是哪一种流氓。这就让他变得很有趣，不是吗，亲爱的？”

“没错，”史迈利有些心不在焉地说，“没错，康妮，我记得是这样。”

“他不属于莫斯科中央驻法办公室的主流，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知道了。他从不用驻处的车子，从不轮夜班或与特定的流氓同伙结伴出现，也不使用他们的密码室，不参加他们每周的祈祷会，不喂驻处的猫或其他什么的。另一方面，基洛夫不是卡拉的人，对不对，爱人？这是件古怪的事。”

“为什么不是？”史迈利问，眼睛却没看着她。

但康妮却坦率地看着史迈利。她停顿良久，好让自己有时间来衡量他，屋外奄奄一息的榆树上，白嘴鸦聪明地抓住这沉寂的片刻，嘶喊出莎士比亚式的预兆。“因为卡拉在巴黎已经有他的人了，亲爱的。”她耐心地解释，“你应该非常清楚。那个小题大做的老家伙普丁，助理武官。你记得卡拉总是对军人情有独钟。现在仍是，就我所知。”她又停下来，再次端详着他毫无表情的面孔。他用手托住下巴，眼睛半闭着，注视着地板。“此外，基洛夫是个白痴，而卡拉绝对不会喜欢的，就是白痴，对不对？你自己对他们也不会太客气，想想看吧。欧雷格·基洛夫举止猥琐，浑身恶臭，汗流浹背，走到哪里都像树上的鱼一样惹人注意。还没雇用这种白痴之前，卡拉早就跑到一英里外去了。”她再次停顿，“你也一样。”她加上一句。

史迈利举起一只手掌，放在前额，手指朝上，像在考试的孩子。“除非——”他说。

“除非什么？除非他走向衰败，我猜！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一定要这么说。”

“那是谣言四起的年头。”深陷思索之中的史迈利说。

“什么谣言？谣言随时都有，你这个傻瓜。”

“噢，就是投诚者的报告。”他轻蔑地说，“卡拉宫廷里发生的一些奇怪故事。二手消息来源。但他们没——”

“他们没怎么样？”

“嗯，他们没说卡拉雇用了奇怪的人吧？难道他们在三更半夜进行面试？那全都是低层次的情报，我知道。我只是顺便提一下。”

“而我们奉命对这些报告不可完全相信。”康妮非常肯定地说，“目标是基洛夫。不是卡拉。这是五楼的规定，乔治，而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别再望月兴叹，做些踏实的事吧。’你说。”她拧起嘴唇，头往后靠，神情竟与索尔·恩德比如此相像，令人不快。“我们的工作负责情

报的搜集，”她懒洋洋地说，“不是进行斗争。”别告诉我他的调调改变了？亲爱的。他有吗？乔治？”她低声说，“噢，乔治，你真坏。”

他给她又倒一杯酒，当他回来时，看见她眼中闪烁着淘气兴奋的光彩。她抓着一绺绺白发，就像她还留长发时一样。

“重点是，我们批准了行动，康。”史迈利说，他以实事求是的声调想要钳制住她，“我们否决了怀疑者的意见，我们准许你们把他送上一垒。后来怎么了？”

酒，回忆和心中重新燃起的狩猎刺激之情，让她如脱缰野马，超出了他所能掌控的范围。她的呼吸加快。她像是冒险移除控管机制的老发动机般急躁地嘎嘎响。他明了，她述说莱比锡故事的方式，恰就是莱比锡对瓦拉迪米尔述说的方式。他想起那时，自己仍与她在圆场里，对付基洛夫的行动蓄势待发。但在她的想像中，她却跳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塔林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她非比寻常的心灵中，她正置身该地；她认识莱比锡与基洛夫，当时他们两人是朋友。一段爱情故事。小奥图和胖欧雷格。这正是事情的中枢，让老笨蛋忠实陈述整个故事，你就从中追索你的邪恶目的，在我进行的时候，乔治。

“乌龟和兔子，亲爱的，就是他们两个。基洛夫是个可悲的大婴孩，离家在工艺学校读法律，利用秘密警察当老爹；小奥图·莱比锡是不折不扣的魔鬼，什么不法勾当都插一脚，一大堆牢狱之灾等着他，他整天在码头工作，晚上则鼓动那些不合作分子骚乱。他们在一间酒吧相遇，乍看之下，就像是爱情。奥图钓女孩子，欧雷格·基洛夫跟在他后面，捡他留下的。你打算怎么做，乔治？把我当圣女贞德给烧了？”

他为她点了一根烟，放进她的嘴巴，希望能安抚她，但她狂烈的言谈却让香烟几乎燃尽，险些要灼伤她。他迅即拿走香烟，在她用来当烟灰缸的锡盖里捻熄。

“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共同拥有一个女朋友。”她说，声音大得近乎吼叫，“有一天，如果你能相信，那个可怜的傻女孩去找小奥图，坦白警告他：‘你那个胖朋友嫉妒你，他是个现职的秘密警察。’她说，‘不合作讨论俱乐部就要有大变化了，注意三月十五日！’”

“轻松点，康。”史迈利担忧地警告她，“康，平静下来！”

她仍很大声：“奥图把那个女孩赶出去，一个礼拜之后，整群人全被捕了。包括胖欧雷格，当然，是他设计他们的——他们知道。噢，他们知道！”她仿佛迷路般迟疑，“那个企图警告他的傻女孩死了。”她说，“据说是因审问而失踪。奥图踏遍山林搜寻，最后发现她和另一个人在地牢里。死得像渡渡鸟47。两只渡渡鸟。我也会这样，该死，很快的。”

“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史迈利说。

他也会制止她——泡壶茶，聊聊天气，或任何可以让她停下进攻速度的事。但她已再次跳跃，回到了巴黎，描述奥图·莱比锡如何在五楼的

许可与老将军的热情协助下，着手安排与二等秘书基洛夫——她管他叫姜黄猪——的团聚，在这么多年之后。史迈利怀疑，这就是她当时给他取的称呼。她的脸赤红，呼吸急促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不断发出咻咻声，但她强迫自己继续。

“康妮。”他再次求她，但这仍然不够，也许没有什么是不够的。

首先，她说，为了寻找姜黄猪，奥图走访了几个基洛夫常有往来的法苏友好协会。

“可怜的小奥图一定看过十五次《波坦金战舰》48，但姜黄猪一次也没出现。”

有些传言说，基洛夫对移民有很高的兴趣，甚至表明自己是他们的秘密同情者，询问以他新进官员的身份，对他们在苏联的家人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在瓦拉狄米尔的协助下，莱比锡企图在基洛夫进出的路途中现身，但运气再度背弃他。接着，基洛夫开始旅行——到处旅行，亲爱的，真正的飞翔的荷兰人号船长49——所以康妮和她的孩子们开始怀疑，他可能是莫斯科中央的某种书记行政官，而不属于执行部门：例如会计稽核人员，负责西欧各地驻处，以巴黎为中心，包括波恩、马德里、斯德哥尔摩、维也纳。

“替卡拉或替主流派工作？”史迈利平静地问。

没人敢说，她说，但在她看来，应该是替卡拉工作。尽管已经有普丁在巴黎了。尽管基洛夫是个白痴，而且不是军人；仍然应该是替卡拉工作。康妮说，执拗地坚持这个论点。如果基洛夫是造访主流派的驻处，应该会有可辨识的情报官员出面接待和留宿。但相反的，他维持掩护的身份，而且只与本国相同层级的商务部门人员往来，她说。

无论如何，飞行终成其事。小奥图等到基洛夫订了飞往维也纳的航班，确定他是单独旅行之后，也搭上同一班飞机，于是他们交手了。

“完全是老掉牙的桃色陷阱，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康妮唱道，声音真的非常大，“你们这些真是老套的把戏。有分量的行家可能会一笑置之，但基洛夫同志可不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他真的在卡拉名册中的话。龌龊的照片，可以用来恐吓的资料，这就是我们要的。如果我们能从他身上下手，找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邪恶朋友是些什么人，谁给他这些随性而为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可收买他成为投诚者，或者把他丢进水塘里，就看他还有什么剩余价值而定。”

她完全停下来。她张开嘴，合上嘴，吐出几口气，把杯子递给他。

“亲爱的，给老酒鬼再倒一杯酒吧，动作快！可以吗？康妮受不了诱惑。不，别，留在那里。”

在这致命的一瞬间，史迈利完全迷失了。

“乔治？”

“康妮，我在这里。”

他动作很快，但不够快。他看见她的脸逐渐僵硬，变形的手在她面前挥动，眼睛嫌恶地扭曲，仿佛看见了令人厌恶至极的意外。

“希儿，快！”她大叫，“噢，天哪！”

他抱住她，感觉到她的前臂扣住他的颈背，把他抱得更紧。她的皮肤冰凉，她在颤抖，是出于惊骇而非寒冷。他撑住她，闻着威士忌、药粉与老妇人的气味，努力想要安抚她。她的泪水沾满他的脸颊，他可以感觉到泪水，甚至尝到泪水的咸味，就在她推开他时。他找到她的手提袋，替她打开，然后迅速走到阳台上，呼唤希蕾莉。她从深沉的夜色中跑出来，双拳半握，手肘在臀部摆动着，姿势足令男人发笑。她很快越过他身边，羞涩地露齿一笑。他留在阳台上，夜色寒气刺痛了他的脸，他凝望着逐渐聚积的雨云和松树，在初升的皎月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辉。狗儿的嘶吼已平息。只有不断盘旋的白嘴鸦，依旧鸣叫着刺耳的警告声。走吧，他告诉自己。离开这里吧。放弃吧。他的车等着他，在不到一百英尺之外，车顶已开始结霜。他想像自己跳上车，开上山，穿越高原，远走高飞，永远不再回来。但他知道自己无法这样做。

“她要你进来，乔治。”希蕾莉站在门里坚定地说，满是照护濒死病人特有的权威感。

当他回到屋里，发现一切都安好。

一切都安好。康妮抹了粉似的一丝不苟地坐在她的摇椅上，他走进来时，她的眼睛直直盯着他，就像他第一次进门时一样。希蕾莉已经安抚了她，希蕾莉已经让她镇静下来，此时，希蕾莉双手放在康妮颈部，拇指朝内，按摩着她的颈背。

“死亡的恐惧50，亲爱的，”康妮解释说，“吸血鬼医生开了安定，但老笨蛋比较喜欢果汁。你向索尔·恩德比汇报的时候，不会提到这点吧，是不是，爱人？”

“不会，当然不会。”

“你什么时候汇报，不久之后吗，亲爱的？”

“很快。”史迈利说。

“今晚，你回家时？”

“必须看要说的是什么。”

“康把所有的事详细写出来了，你知道，乔治。老笨蛋对这个案子的评估非常完整，我认为。非常详尽。非常旁征博引，绝无仅有。但你们根本没当一回事。”史迈利不发一语。“报告已经遗失。销毁了。被介壳虫吃掉了。你们没有时间。很好，很好。你们这些热爱文书工作的魔鬼。更高一些，希儿。”她命令道，但闪闪发光的眼神仍未离开史迈利身上。“高一点，亲爱的。就在脊椎骨插进扁桃腺的地方。”

史迈利在那张老旧的沙发上坐下。

“我曾经很爱这种双面间谍对双面间谍的游戏。”康妮如置身梦境地告白，轻轻晃着头，接受希蕾莉双手的抚摸。“是不是，希儿？所有的人生都在那里。你已经不再了解了，是不是？”

她转向史迈利：“要我继续吗，亲爱的？”她用伦敦东区贫民阶级的尖酸口吻问。

“如果你能简洁地告诉我，”史迈利说，“但如果不——”

“我们讲到哪儿了？我想起来了。与姜黄猪同在飞机上。他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正在喝啤酒。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对他不安好心的，不是别人，就是他二十五年前相亲相爱的兄弟，小奥图——正宛如恶魔般咧嘴笑。基洛夫，原名寇斯基的弟兄有什么感觉？我们问自己，假设他还有任何感觉的话。奥图是否知道，就是可恶的我把他出卖到古拉格群岛51？他会怎么做？”

“他怎么做？”史迈利问，没回应她的嘲讽。

“他决定要好好地演一出戏，亲爱的。是不是，希儿？叫来一份鱼子酱，然后说：‘感谢上帝！’”她低声说了一句话，希儿歪着头倾听，咯咯

笑起来。“香槟！”他说。我的天哪，他们真的有香槟，姜黄猪付的账，他们一起喝了，然后一起搭出租车到城里，甚至在姜黄猪去干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前，他们还在咖啡馆里很快地喝了一杯小酒。基洛夫喜欢奥图。”康妮坚持，“爱他，是不是啊，希儿？他们是一对疯狂的搭档，就像我们一样。奥图很性感，奥图很风趣，奥图很有魅力，而且反独裁，步履轻快——还有——噢，姜黄猪所无法拥有的一切，再一千年都不会有！为什么五楼老是认为人只有一个动机？”

“我确定我不是。”史迈利诚挚地说。

但康妮又回头对希蕾莉说话，完全不理史迈利。“基洛夫很无趣，甜心。奥图就是他的生命。就如同你对我一样。你为我的步伐带来了活力，是不是，爱人？这当然没让他不出卖奥图，不过那是天性，对不对？”

希蕾莉一面轻按着康妮的背，一面不置可否地点头。

“基洛夫对奥图·莱比锡而言又是什么呢？”史迈利问。

“恨，亲爱的。”康妮毫不迟疑地回答，“纯粹、无法稀释的恨。单纯、对天立誓的绝对厌恶。恨与金钱。这是奥图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奥图一直觉得，他应该为那几年所受的屈辱得到补偿。他也想要替那个女孩讨回公道。他的最大梦想是，有一天，他可以出卖原名寇斯基的基洛夫，换得一大笔钱。大笔、大笔、大笔的钱。然后花掉。”

等待者之怒，史迈利想，记起那张照片。再次回想起那间在机场旁贴满花格纹壁纸的房间和奥图那平心静气、带着爱抚尾音的德文；回想起他那双一眨不眨的棕色眼睛，宛如他郁闷灵魂的窗户。

在维也纳的会面之后，康妮说，两人约定要在巴黎再会，而奥图很聪明地放长线钓大鱼。在维也纳，奥图没问到任何一个会让姜黄猪反感的问题；奥图是个职业高手。基洛夫结婚了吗？他问道。基洛夫挥起手臂，对这个问题哄然大笑，显示他随时都准备抛开婚姻的束缚。结婚了，但妻子在莫斯科，奥图这样报告——这让桃色陷阱更为有效。基洛夫问奥图近来做什么工作，莱比锡气势恢宏地回答：“进出口”，并说自己是个追名逐利的人，今天在维也纳，明天在汉堡。结果，他等了整整一个月——在二十五年之后，他禁得起漫长的等待——而在这一个月中，法国方面发现基洛夫分别锁定了三个定居巴黎的年老苏联移民：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商店老板，一个餐馆老板，三个人都有眷属在苏联。他提议帮忙带信、传消息和地址；他甚至建议帮忙送钱和礼物，只要体积不是过大。而为了提供有来有往的服务，下次他会再回来。没人逮捕他。在第五周，奥图打电话到基洛夫的公寓，说他刚从汉堡飞来，提议他们可以找些乐子。在晚餐上，奥图抓住时机说，这晚算他请客；他刚把某些货运到某个国家，大赚一票，有钱可以挥霍。

“这是我们替他计划好的诱饵，亲爱的。”康妮解释，这次她终于直接对着史迈利说话，“而姜黄猪上钩了，他们都一样，不是吗？保佑他们，鲑鱼每次都扑向苍蝇，不是吗？”

哪一种货？基洛夫问奥图。哪一个国家？奥图没开口回答，只在自己的鼻子上画出鹰勾鼻的形状，然后迸出一阵大笑。基洛夫也笑了，但他显然非常感兴趣。运到以色列？他问，是哪一种货？莱比锡又举起食指，指向基洛夫，做了个扣扳机的手势。运武器到以色列？基洛夫惊奇地问，但莱比锡是个职业高手，不会再多透露。他们喝酒，到脱衣舞俱乐部，聊起旧日时光。基洛夫甚至谈到他们共同拥有的那个女朋友，问莱比锡知不知道她的下落。莱比锡说他不知道。凌晨时分，莱比锡建议找个伴，带回他的公寓，但基洛夫，很令他失望地拒绝了。不能在巴黎，太危险了。在维也纳或汉堡，当然没问题。但不能在巴黎。在早餐时刻，他们分手，酩酊大醉，而圆场的荷包又瘦了一百镑。

“接着，血淋淋的钩心斗角粉墨登场了。”康妮说，话锋突然一转，“首脑办公室大辩论，见鬼，你不在，索尔·恩德比小人得志地一脚踩进来，其他人就跟着凭空发挥，事情就是这样。”她又用那种名流大亨的声音说，“奥图·莱比锡在骗我们……我们没让法国佬先清除行动的障碍……外交部担心会有纠纷……基洛夫是个间谍……里加集团完全不够格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计划。’你到底到哪里去？可恶的柏林，是不是？”

“香港。”

“噢，那里。”她模糊地说，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垂下眼帘。

史迈利要希蕾莉去泡茶，她在房间的另一端，叮叮当当地弄着碗。他望着她，心想是否应该出声叫她。他看见她站着，如同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时一样，就在那一夜，在圆场里，他们请他过去——她的指关节抵住嘴唇，压抑住无声的尖叫——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他正准备起程前往香港——他的内线电话突然响起，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非常紧张，请他立即到密码室。史迈利先生，长官，非常紧急。顷刻之后，他匆匆穿过空无一物的回廊，两个忧心忡忡的工友簇拥着他。他们为他推开门，他踏进房里，他们退缩不前。他看见碎落一地的机器，档案、卡片索引、电报散落在房间各处，像足球场上的垃圾，墙上有用口红涂抹着的淫秽涂鸦。而在这一切的中央，他看见希蕾莉，这个被告——正如她现在的姿态一样——目光穿透厚重的织花窗帘，凝视着窗外自由明亮的天空：希蕾莉，我们献祭的圣洁处女；希蕾莉，我们圆场的新娘。

“你到底在干什么，希儿？”康妮在摇椅上粗暴地大声吼叫。

“泡茶，康。乔治想要喝杯茶。”

“你管乔治要什么。”她夸张地一口顶回去，“乔治是五楼的人。乔治把基洛夫的案子压下来，现在又想要痛改前非，在这把年纪玩单人飞行的特技，对不对，乔治，对不对？甚至还对我扯谎，瓦拉狄米尔那个老魔头，已经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吃了一颗子弹，报纸是这么说的，他显然没看，除了我的报告之外，什么也没看！”

他们喝着茶。暴雨来了。第一滴雨水，重重地打在木头屋顶上。

史迈利对她使出浑身解数，史迈利谄媚着她，史迈利希望她继续。

她已经为他拉出了半条线索。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她全拉出来。

“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的来龙去脉，康。”他重复说，“我一定要听到全部的经过，只要你还记得，即使结局是痛苦的。”

“结局真是他妈的痛苦。”她反驳说。

现在，该轮到基洛夫打传统牌了，她厌烦地说。下一次的会面，是一个月后在布鲁塞尔，基洛夫提到，他曾和大使馆商务部门一位对以色列军事经济特别有研究，甚至还领有研究经费的朋友谈到他们上回的对话。莱比锡是否考虑——不，是很认真地——和那个家伙谈一谈，或者，在此时此刻告诉他的老朋友欧雷格整个故事，如此一来，他甚至还能在户头里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呢。奥图说：“只要有钱拿，又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喂给基洛夫一小袋康妮和中东部门准备的饲料——全是真的，当然，也可以查证，但却对任何人都没啥大用——基洛夫认真地写下来，尽管他们两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基洛夫与他的老板，无论是谁，都与以色列的货运、军事、经济等等毫无关系，至少在这个案子上没有。基洛夫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同谋关系，一如他们下一次在巴黎的会面所显示的那样。基洛夫对那篇报告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坚持要奥图收下五千元，不拘形式地签一张收据。奥图照办。上钩之后，基洛夫就单刀直入地露出最狰狞的面目——可够狰狞的了，康妮说——问奥图与当地苏联移民的关系有多密切。

“拜托，康。”他低声说，“我们已经几乎讲到重点了！”她就在眼前，但他感觉得到她逐渐漂流远去，越来越远。

希蕾莉坐卧在地板上，头靠在康妮膝上。康妮心不在焉地用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抓着希蕾莉的头发，眼睛几乎完全闭上。

“康妮！”他又叫道。

康妮睁开眼睛，露出疲惫的微笑。

“这只是羽扇脱衣舞，亲爱的。”她说，“他知、我知、你知的游戏。一般的羽扇脱衣舞。”她宽容地复述，眼睛再次闭上。

“那么，莱比锡怎么回答他？康妮！”

“他做的就和我们所做的一样，亲爱的。”她喃喃地说，“推脱。他承认与流亡团体关系不错，与将军有秘密往来。然后推脱。说他并不常造访巴黎。‘为什么不雇用当地的人呢？’他说。他在戏弄基洛夫，希儿，亲爱的，你知道。他又问：‘会伤害任何人吗？’又问了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代价是什么？给我酒吧，希儿。”

“不！”希蕾莉说。

“去拿。”

史迈利倒了两指高的威士忌，看着她啜饮。

“基洛夫想要奥图对移民做什么？”他说。

“基洛夫想要一个传奇，”她回答说，“他要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

史迈利的神态丝毫没有透露，几个小时之前，他才从托比·艾特哈斯口中听到这句话。四年前，欧雷格·基洛夫想要一个传奇，康妮重复说。正如睡魔想要一个传奇，托比与瓦拉狄米尔曾说起。基洛夫想要为一个女情报员编造掩护身份的故事，让她能潜入巴黎。这就是重点，康妮说，基洛夫当然没这样说，事实上，他只是旁敲侧击地提到。他告诉奥图莫斯科刚对所有的大使馆下达秘密指令，宣布说在某些条件下，分散的苏联家庭可以在海外团聚。指令上说，如果可以找到足够数量的家庭有此意愿，莫斯科将会公开宣布此一政策，借以改善苏联在人权方面的形象。就理想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引起同情的个案：比方说，女儿在苏联，与在西方的家人失去联络的单身女孩，或许正值适婚年龄。守密是最重要的，基洛夫说，必须等到搜集完成合乎条件的个案名单——想想看会有多么大的抗议声浪，如果事前泄露消息的话！

姜黄猪的这个球实在投得不漂亮，康妮说，所以奥图为了逼真起见，一开始就嘲笑这个提案：这太疯狂了，太漏洞百出了，秘密名单？真是无聊！为什么基洛夫不直接去找流亡组织，要他们发誓守密呢？为什么不雇用完全没有瓜葛的人去做他的龌龊工作呢？莱比锡越是嘲笑，基洛夫就越是激动。莱比锡的工作不是去取笑莫斯科的秘密命令，基洛夫说。他开始对莱比锡大声吼叫，而康妮此时也找到大声吼叫的能量，至少是将她微弱的声音提高音量，以她想像基洛夫应该有的苏联喉音说：“‘你的同情心哪里去了？’他说，‘你难道不想帮助别人吗？你为什么要嘲笑这种人道措施，只因为那是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基洛夫说他自己接触了几个家庭，但无法取得信任，因此也没有进展。他开始对莱比锡施加压力，一开始是用私人情谊——“你不想帮我发展事业吗？”——失败之后，他告诉莱比锡，既然已经为钱提供秘密情报给大使馆，他或许可以慎重考虑继续合作，以免西德当局得知这段关系，把他丢出汉堡，甚至赶出德国。奥图怎么可能希望有此下场呢？最后，基洛夫付钱，而这就是奥妙之所在。“每促成一个家庭成功团聚，一万美元。”她宣布，“每找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无论后来是否团聚，立即付给一千美元。现金交易。”

就在此时，五楼理所当然地认为基洛夫是脑袋出了问题，命令他们即刻放弃这个案子。

“然后，我从远东回来。”史迈利说。

“就像可怜的理查国王从十字军东征回来，你就是这样，亲爱的。”康妮附和道，“然后发现农民暴动，而你坏心眼的弟弟已坐上王位。”她说，“德国佬的警方要把莱比锡从法国引渡回去；我们大可以求他们放过一马，但我们没这么做。没有桃色陷阱，没有红利，没有卑鄙小人，所有的任务都取消。”

“瓦拉狄米尔对这一切有什么反应？”史迈利问，仿佛他真的不知情。

康妮很困难地睁开眼睛。“什么反应？”

“对取消任务反应。”

“噢，大声咆哮，你还能期望他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咆哮，再咆哮。说我们毁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猎杀行动。发誓要用其他方式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哪一种猎杀行动？”

她没理会他的问题。“这已经不再是真枪实弹的热战了，乔治。”她说着，眼睛又闭上了。“这就是麻烦所在。一切都变成灰色了。半个天使对抗半个魔鬼。没有人知道界线何在。没有砰砰！”

再一次，史迈利又从记忆里看见那间贴满格花壁纸的旅馆房间和两个穿着黑色大衣并肩站立的身影，瓦拉狄米尔恳切地请求重新开启这个案子：“麦斯，再听我们说一次，听听看自从你命令我们停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自己花钱从巴黎飞来告诉他，因为在恩德比的命令下，法国分部已停止支付这个案子的费用。“麦斯，听我们说，拜托。”瓦拉狄米尔恳求道，“昨天深夜，基洛夫叫奥图到他的公寓去。他们有了另一次会面，奥图和基洛夫。基洛夫喝醉了，说出了令人无法置信的事！”

他看见自己回到圆场的旧办公室，恩德比已经占据了她的桌子。那是同一天，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听起来像是小奥图想逃离德国佬手掌心的最后一搏。”恩德比听完史迈利的话之后说，“他们到底想用什么罪名逮他，盗窃还是强暴？”

“诈欺。”史迈利绝望地回答，因这被曲解的事实而绝望。

康妮喃喃自语。她想唱成歌，接着又想吟成诗。她想要再来些酒，但希蕾莉拿走她的杯子。

“我要你走。”希蕾莉直视史迈利说。

史迈利背靠着藤沙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有人或许会认为，他是极不情愿地问这个问题，甚至是有些嫌恶。他柔和的面容因下定决心而变得强硬，但仍不足以掩藏非难的痕迹。“你是否记得瓦拉狄米尔常说的一个故事，康？一个我们不曾向别人提起的故事？我们收藏起来，像是私人的珍藏？就是卡拉有个女人，他所爱的人？”

“他的安恩。”她模糊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他最重要的东西，她让他的举止像个疯子！”

她的头缓缓抬起，他清楚地看见她的脸，他的声音加快，重拾力量。

“莫斯科中央流传的那些谣言，那些知情的人？卡拉的发明，他的创造，康？他如何发现她——她还是孩子，在战火摧毁的村庄里徘徊？领养她，抚养她长大，爱上了她？”

他望着她，无视于威士忌，无视于她如死一般的倦意，他看见最后一丝兴奋，宛如瓶底的最后一滴酒，让她的面容重现光彩。

“他当时在德国阵线后方，”她说，“那是四十年代。他们有一个团队，在波罗的海地区活动。建立网络，潜伏组织。那是很大的行动，卡拉是首领。她成为他们的吉祥物。他们带着她到处征战。一个孩子，噢，乔治！”

他屏住呼吸，仔细聆听她的话。屋顶上的雨声越来越响。他的脸靠近她的脸，非常近；生气蓬勃的光彩，与她的脸相辉映。

“然后呢？”他说。

“然后他杀了她，亲爱的。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他仍然靠得很近，仿佛怕她在关键时刻会欲言又止，“为什么，康妮？为什么他爱她，却杀了她？”

“他为她做了一切。他替她找养父母。教育她。让她长成他理想的小魔女。扮演父亲，扮演爱人，扮演上帝。她是他的玩具。然后，有一天，她突然有了逾越身份的想法。”

“哪一种想法？”

“迷上了革命。与该死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希望国家逐渐衰微。诘问‘为什么？’与‘为什么不？’。他叫她闭嘴，但她不听。她心中自有主见。他斥责辱骂她，但只让她变得更糟。”

“而且还有孩子。”史迈利鼓励着她，将她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握在掌中，“他让她生了个孩子，记得吗？”她的手在他掌中，在他俩的脸之间。“你研究过，是不是，康？有个没啥大事可做的时节，我让你放手去做。‘追下去吧，康。’我对你说，‘尽力追查吧，无论有什么结果。’记得吗？”

在史迈利的使劲鼓励下，她的故事重燃起最后爱恋般的热情。她说得很快，眼睛闪闪发亮。她曲折迂回地在记忆深处回溯探索。卡拉拥有这个小魔女……没错，亲爱的，是有个故事，你在听我说吗？——是的，康妮，继续，我在听。那么，听着。他把她养育成人，让她成为他的情人，然后有个小鬼，因小鬼而起争执。乔治，亲爱的，你像过去一样爱我吗？——继续，康妮，告诉我其他的部分，没错，我当然还爱你。他指责她在孩子珍贵的心灵中灌输进危险的思想，例如自由。还有爱情。一个女孩，酷似她的母亲，听说是个美人坯子。最后，这个老暴君由爱转恨，亲手毁了他的理想情人，故事结束。最初我们是从瓦拉狄米尔那里听到这个故事，接着又有零零碎碎的消息，但从来没有真凭实据。名字，不知道，亲爱的，因为他销毁了她所有的记录，杀了每一个可能听说过这件事的人，这是卡拉的作风，上帝保佑他，是不是，亲爱的，他一直是这样？其他人说她并没有死，她被谋杀的故事，只是为了误导视听，让人不再追查她的行踪。她做到了，是不是？老笨蛋还记得！

“孩子呢？”史迈利问，“那个酷似母亲的孩子呢？有投诚者的报告——是什么来着？”她一刻没停顿。这事她也记得很清楚，她的心在她前面狂奔跳跃，正如她的声音将她的呼吸远远抛在背后一般。

列宁格勒大学的某个研究员，康妮说。他说，他接受指令，要在晚上对一个古怪的女孩进行特别的政治教育，那是一个有反社会倾向的病人，高级首长的女儿。塔蒂亚娜，他只知道她叫塔蒂亚娜。她在城里到处惹是生非，但她的父亲是莫斯科的大人物，所以没人能动她一根汗毛。那女孩试图引诱他，或许也成功了，然后，她告诉他一些故事，说她爸如何因为她妈对历史阶段的缺乏信念而杀掉她。第二天，他的教授叫他去，告诉他说，如果他敢泄露半个字，他就会发现自己跌死在一块非常大的香蕉皮上……

康妮如脱缰野马般奔驰，述说着什么结果都没有的线索，消息来源在发现的那一刻就消逝无踪。她紧张欲裂、酒意醺然的身体，似乎无法再唤起如此大的力量。

“噢，乔治，亲爱的，带我一起走吧。这是你在追寻的，我知道！谁杀了瓦拉狄米尔，为什么！从你走进来的那一刻，我就在你丑陋的脸上看见了。我以前无法辨别，现在可以了。你有你那个卡拉表情！瓦拉狄又掀开这些事，所以卡拉把他给杀了。这是你的主旨，我可以看见你正在前进。带我一起走，乔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会离开希儿，我会放下所有的一切，不再喝酒，我发誓。带我上伦敦，我会替你找出他的魔女，即使她根本不存在，即使这是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瓦拉狄米尔为什么叫他睡魔？”史迈利问，尽管他早已知道答案。

“这是他的笑话。是瓦拉狄米尔还在爱沙尼亚时，从他的某位德国祖先那里听来的童话故事。‘卡拉是我们的睡魔。任何人靠他太近，就会沉沉入睡。’我们从来不知道，亲爱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在卢比安卡，有人见过一个男人，说是碰到了见过她的一个女人。另外有人说是认识某个帮忙埋葬她的人。那个魔女是卡拉的神庙。但她却背叛了他。双子座，我们以前常这样说你们俩，你和卡拉，同一个苹果的两半。乔治，亲爱的，别这样！拜托！”

她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她正充满恐惧地抬头瞪着他，她的脸在他下方；他站着，低头凝视着她。希蕾莉靠着墙，叫道：“住手，住手！”他站在她上方，因她廉价且不公的同情而怒火中烧，他知道，无论是卡拉的手段或卡拉的专制，都与自己不同。他听见自己说：“不要，康妮！”并发现自己的手举至胸口的位置，手掌僵直朝下，仿佛想将什么东西压平到地面似的。他明了，自己的热情令她恐惧；他从未对她的信念或感情作出如此之大的背叛。

“我渐渐老了。”他喃喃自语，露出羞怯的微笑。

他放松下来，随着他的改变，康妮的身体也慢慢松懈下来，睡梦袭上她。刚刚还紧紧抓着他的双手已垂在膝上，宛如战壕里的尸体。

“全都是废话。”她快快不乐地说，笼罩着深沉的漠不关心的神色，“无聊的移民，哭喊着要他们的伏特加。放弃吧，乔治。卡拉终究还是会击败你。他欺骗你。他愚弄你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她喝了一口酒，不再在乎自己说什么。她的头再度向前低垂，有那么一刹那，他以为她真睡着了。“他像狐狸一样欺骗你。他欺骗我。而当你闻出叛徒的气味，他就派那个该死的比尔·海顿去把安恩骗上手，瞒过你的追踪。”她很困难地抬起头，再次凝视他。“回家吧，乔治。卡拉不会把你的过去还给你。就像在这里的老笨蛋一样。给你自己找点儿爱，等待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吧！”

她又开始咳嗽，绝望地，一声作呕的干咳，接着另一声。

雨停了。从法式窗望出去，史迈利再次看见洒在笼舍上的月光轻抚着铁丝网上的夜雾；看见戴上雾冠的枞树，爬上山冈，直入暗夜的天空；他看见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明亮的事物隐遁入黑暗，黑暗的事物却如烽火笼罩白亮的大地；他看见突然出现的月亮，逐渐从云雾中露出清晰的身影，召唤他踏进骚动不安的裂隙里；他看见一个黑色身影，穿着威灵顿靴，戴着头巾，跑上巷道，他知道那是希蕾莉；她一定是偷偷溜出去，没引起他的注意。他记起自己曾听到门关上的声音。他走回康妮身边，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康妮流着泪，晃着身子，不断谈论爱情。爱是积极的力量，她口齿不清地说——去问希儿。但希蕾莉不在这儿，没人可问。爱是投向水中的石子，如果石子够多，我们就会彼此相爱，而掀起的涟漪也会大到足以横越海洋，征服憎恨与愤世嫉俗。“甚至是无恶不作的卡拉，亲爱的。”她向他保证，“这就是希儿说的。废话，对不对？这是废话，希儿！”她大叫。

然后，康妮又闭上眼睛，一会儿之后，从呼吸听来，她已经睡了，又或许她只是假装入睡，以避免向他道别的痛苦。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冰冷的夜色里。真是奇迹，汽车的发动机竟然发动了。他开始爬上巷道，但仍望着希蕾莉。他转过一个弯道，看见她沐浴在车头灯的光线里。她瑟缩地站在树丛中，等待他离去，之后才回康妮身边。她又用手捂着脸，他觉得自己看见血迹；也许她用指甲抓伤了自己。他驶过她身旁，从镜子里看着她，在车尾灯的亮光中，她凝望着他，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幻化成混沌的鬼魂，那些真正在冲突中罹难的鬼魂，那些在战火硝烟中落难，遇袭、挨饿、被剥夺曾拥有的一切与爱的人。他直等到她再度走下山冈，走向达佳的灯火。

在希思罗机场，他买了第二天早晨的机票，然后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这是同一个房间，据他所知，虽然墙壁并没有格花壁纸。整个晚上，旅馆都喧闹不休，史迈利也一样彻夜未眠。他听见水管的叮当声，电话的铃声，还有那些不想睡或不能睡的爱侣们的轰然巨响。

麦斯，再听我们说一次，他心中复述，是睡魔本人派基洛夫去接触移民，寻找一个传奇。

史迈利在上午稍晚时分抵达汉堡，搭机场巴士到市中心。雾气徘徊不散，天气非常冷。在车站广场几度被拒后，他终于找到一家生意清淡的饭店，这家年代久远的饭店还高挂着一张同时发给三个人的许可执照。他签下了“史坦法斯特”的名字，然后，快步跟随租车营业员，租了一辆小型的欧宝，停放在有扩音器轻声播放贝多芬音乐的地下停车场。车子是他的后门。他不知道何时会派上用场，但他知道必须有辆车在那里。他再次漫步，走向阿尔斯特湖，以特有的敏锐感受着周遭的一切：狂躁的交通，和只给百万富翁子女的玩具店。城市的噪音像猛烈的火墙向他袭来，让他忘却寒意。德国是他的第二天性，甚至是第二灵魂。在年轻岁月，德国文学曾是他热爱的对象、他教养的泉源。他可以把德文像制服般穿在身上，勇敢无畏地流利言说。然而，他每踏出一步，都有危险的感觉，因为大半个战争期间，年轻的史迈利在这里度过孤寂恐怖的间谍岁月，那种置身敌人领土的危机意识，永远滞留心头，挥之不去。在孩提时期，他就知道汉堡是一个富裕优雅的港口城镇，在英国作风的外衣下，掩藏着轻浮的灵魂；成年之后，在空袭的千百颗炸弹轰炸下，汉堡被粉碎成中世纪时的黝暗阴森。他曾见过战后第一年的汉堡，无数冒着硝烟的炸弹坑，幸存者清理着宛如战场的瓦砾石堆。而今天，他眼中的汉堡充斥着不知名的罐头音乐，以及高耸的混凝土与被烟熏黑的玻璃。

抵达阿尔斯特湖之后，他走上那条怡人的便道，来到伟林登上汽船的码头。他记下来，在平日，第一班渡轮是早上七点十分开出，最后一班是晚间八点十五分。伟林来的那天是平日。十五分钟后有一班汽船。他看着轻艇与红松鼠打发等待的时间，就像伟林当时一样。汽船抵达时，他坐上伟林当天所坐的船尾座位，一处位于顶篷下的开放空间。与他同船的包括一群学童和三个修女。他微觉头晕，闭眼坐着，耳中尽是他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汽船走到湖心时，他站起来，穿过客舱，到船首的窗边，向外望，显然是想要确定些什么事，瞄了一眼表，然后走回座位，直坐到金方史帝格，也就是他上船的地方。

伟林的故事完全吻合实情。史迈利的期望也是如此，但在一个疑问不绝的世界，再确认总是没错的。

他吃过午饭，然后到邮局总局去，花了一个小时查阅旧的分类电话号码簿，和欧斯特拉柯娃在巴黎所做的颇为相似，尽管理由完全不同。他的研究圆满完成，他愉悦地在四季饭店的沙龙休息，读着报纸，直到黄昏。

在一本汉堡娱乐场所指南中，“蓝钻石”并不列在夜总会，而是在“情色”项下，而且奢华程度与消费水准评列三颗星。“蓝钻石”位于圣保利，但小心翼翼地避开主要区域，僻处于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巷弄，贴有瓷砖，阴暗，满是鱼的气味。史迈利按下门铃，电动开关打开来。他走进

屋里，立即站在一间整齐的接待室中，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伶俐年轻人操控着一部灰色的机械装置。在墙上，灰色的录音带卷轴缓缓转动，但录音带的音乐却是从其他地方播放出来的。桌上有一部精巧的电话系统，也是灰色的，亮光闪烁，滴答作响。

“我想在这里打发一些时间。”史迈利说。

这里就是他们接我电话的地方，他想，当我拨打瓦拉狄米尔在汉堡的联络电话时。

那个伶俐的年轻人从桌上抽出一张印刷的表格，透露秘密似的低声解释手续，像个律师，或许那正是他白天的职业呢。会员费一百七十五马克，他轻声说。这是一年的年费，史迈利在这一整年中可以免费入场，只要他愿意，来多少次都可以。第一杯酒必须再付二十五马克，其后的饮料价格高昂，但并非不合理。第一杯酒非点不可，就像会员费，必须在入场时缴纳。所有其他形式的娱乐完全免费，当然女郎们会很乐意接受礼物。史迈利可以用任何名字填写表格，并由年轻人在此亲自归档。他惟一必须做的，就是下次造访时记住自己登录入会的名字，无须再办任何手续就可获准入场。

史迈利放下钱，在他一生中所用过的数十个假名中再添一个。他走下楼梯，穿过第二道电动门，进入一条窄窄的信道，旁边是一列小房间。房间都还是空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此刻黑夜才刚刚揭开序幕。在信道的尽头，矗立着第三道门。一穿过门，他就进入一片漆黑之中，震耳欲聋的乐声，是那名伶俐年轻男子录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一个男声对他说话，一小丝光束引他到桌旁。他拿到一张饮料单。“经营者，C.柯列兹奇玛。”他读着酒单下方的一小行字。点了一杯威士忌。

“我想独处，不要人陪。”

“我会知会工作人员，先生。”侍者以俨然推心置腹的态度说，并收下了他的小费。

“关于柯列兹奇玛先生，他该不会刚好是萨克森人吧？”

“没错，先生。”

比东德还糟，托比·艾特哈斯如是说。萨克森。他们一起偷东西，一起行骗，一起伪造报告。那真是完美的姻缘。

他啜着威士忌，等待眼睛适应室内的灯光。不知从何处射出蓝色的光，让裤脚和衣领闪着诡异的光芒。他看见许多白色的脸庞与白色的身体。这里有两层，他所坐的底层，布置着桌台和扶手椅。上层有六个独立的包厢，就像剧院里的包厢一样，各有着蓝色的照明。他推断，就在这些包厢的其中一间，无论是否知情，那四个人被拍下了照片。他回忆照片的画面，想找出拍摄的角度。那是从上方往下拍的——从正上方。但“正上方”意味着墙壁上方黑漆漆的某处，某个目光无法穿透的地方，即使是史迈利的眼睛也无法透视。

音乐静息，从同一个扩音器传来余兴节目开始的消息。主持人说，节目名称是“老柏林”，而主持人的声音也是老柏林式的：虚张声势，鼻音浓重，充满挑逗意味。一定是那伶俐的年轻男子换了录音带。帘幕升起，露出一个小小的舞台。在灯光乍现的那一瞬间，他很快地抬头一瞥，这一次，他看见了想找的东西：在墙上非常高的地方，有一个镶着烟熏玻璃的小观测窗。他隐约觉得摄影师有使用特殊照相机；有人告诉他，现在昏暗已无碍摄影。我应该问托比的，他想，托比对这些技术有很透彻的了解。舞台上，开始表演做爱的场景，机械式的动作，不得要领，无精打采。史迈利把注意力转向房里散落各处的人身上。女郎们都很漂亮，一丝不挂，而且年轻，和照片里的女郎一样年轻。已有伴侣的女郎，坐卧在伴侣身上，仿佛很以他们的年迈与丑陋为乐。而没伴侣的女郎则静静坐在一起，像是等待召唤上场的橄榄球球员。扩音器里传出的喧闹变得非常大声，混杂着音乐与歇斯底里的旁白。在柏林，他们居然会把节目叫做“老汉堡”。舞台上的那对男女加倍努力，但成果却极其有限。史迈利怀疑，如果照片里的女郎出现了，自己能否认得出来。他最后断论，认不出来。帘幕关上。他点了另一杯威士忌，松一口气。

“柯列兹奇玛先生今晚在店里吗？”他问侍者。

柯列兹奇玛是很负责任的人，侍者解释说，柯列兹奇玛先生必须把时间分配给好几间店。

“如果他来了，请让我知道。”

“他会在十一点整到店里来，先生。”

在吧台旁，几对赤身裸体的伴侣开始跳舞。他又忍耐了半个钟头，才走回前厅的办公室。途中又经过那一列小房间，有些都已有人。那个伶俐的年轻男子问他应该如何通报。

“告诉他，这是非常特殊的请求。”史迈利说。

伶俐的年轻男子按下一个钮，非常平静地说话，一如他对史迈利说话的声调。

楼上的办公室像外科手术室一样整洁，有一张晶亮的塑料桌，与更多的机械装置。一架闭路电视播映楼下的场景，画面清晰，如同白昼。还有史迈利已注意到的那一面观测窗，俯瞰个别的包厢。柯列兹奇玛先生是标准的德国人所谓的“严肃的人”。年约五十，外表体面，矮壮结实，穿着黑西装，打着浅色的领带。他有一头稻草黄的头发，是个好萨克森人应该会有模样，温和的面容，既无欢迎也无拒绝的神色。他神采奕奕地与史迈利握手，示意就座，似乎非常习惯处理特殊请求。

“请坐。”柯列兹奇玛先生说，开场白已结束。

无处可走，只能前进。

“我知道你以前和我认识的一个叫奥图·莱比锡的人是生意伙伴。”史迈利说，他自己觉得声音似乎有些过大，“我刚好到汉堡来，不知道你可

不可以告诉我他人在哪里。到处都找不到他的地址。”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咖啡装在银壶中，壶把裹着纸巾，让他倒咖啡时不致伤了手指。他喝了咖啡，小心地放下杯子，避免碰撞。

“你是谁？请告诉我。”柯列兹奇玛先生问。萨克森腔的鼻音，让他的声音显得平板单调。微皱眉头，更增添几分令人尊敬的气息。

“奥图叫我麦斯。”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对这句话毫无反应，但他不急着想提出下一个问题。他的目光，史迈利再次注意到，颇不寻常的纯真无邪。奥图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托比这样说。如果是紧急的会面，柯列兹奇玛就扮演关键的角色。

“你找莱比锡先生有什么事？请容我这么问。”

“我代表一家大公司。”史迈利说，“在许多业务中，有一项是为自由报道者设的文学与摄影部门。”

“所以呢？”

“从很久以前，我的母公司就很乐意偶尔从莱比锡先生那里收到一些作品——通过中间人——交给我们的客户去加工与处理。”

“所以呢？”柯列兹奇玛先生又说一次。他的头微微上扬，但表情毫无改变。

“最近，我们母公司与莱比锡先生的交易关系作了一些修正。”他略微停顿，“最初是通过电话。”他说，但柯列兹奇玛很可能没听过电话的事。“他再次经由中间人寄给我们一份作品的样本，我们很希望能向他订购。我来这里就是想和他讨论合作条件，以及未来的委托事宜。当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应该由莱比锡先生提出。”

“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莱比锡先生寄给你们的作品——请告诉我，麦斯先生？”

“是一张情色照片的底片。我的公司一向坚持只收底片。当然，莱比锡先生很清楚。”史迈利很谨慎地指着房间的另一端。“我很相信照片是从这个窗户往下拍的。很特别的是，这张照片里，莱比锡先生亲自上阵当模特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操作相机的必然是他的朋友或生意伙伴。”

柯列兹奇玛先生蓝色的眼睛仍然直视前方，也仍然天真无邪。他的脸，尽管很怪异地毫无特色可言，却给史迈利一种勇敢无畏的感觉，但他也不知道是何缘由。

你要和莱比锡那种卑鄙小人周旋，最好就要有像我这样的卑鄙小人来照料你，托比曾说。

“还有另一个问题。”史迈利说。

“嗯？”

“很不幸的，在这张底片引起我们的注意之后不久，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中间人角色的那位先生，遇到了严重的意外。因此也就影响了与莱比锡先生的一般联络渠道。”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忧虑形于色。他颇为关切地皱起眉头，柔和的脸庞被乌云笼罩，他非常尖锐地开口说：“什么意外？哪一种意外？”

“致命的意外。我来警告奥图，同时也要和他谈谈。”

柯列兹奇玛先生有一支纯金铅笔。他不慌不忙地从衣服内侧的口袋掏出来，拍拍笔头，仍然皱着眉头，在面前的便笺上画了一个圆形。然后他在上头加了一个十字架，又画了一条线穿过他的创作，接着咋舌说：“可怜！”他做完这一切之后，重新整顿好，对着机器简洁地说：“不准打扰！”只听见一阵喃喃低语声，是那个浑身灰色的接待员表示收到指示。

“你说莱比锡先生是你母公司的一个旧识？”柯列兹奇玛先生重拾话题。

“我相信你也是，很久以前，柯列兹奇玛先生。”

“请说得清楚一些。”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两手把玩着铅笔，仿佛在检视黄金的品质似的。

“我们谈的是陈年旧事，当然。”史迈利颇不赞同地说。

“我了解。”

“莱比锡先生逃离苏联之初，是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52。”史迈利说，“安排他逃亡的组织是以巴黎为根据地，但身为波罗的海人，他宁可住在德国北部。德国仍被占领，他很难维持生计。”

“对每一个人都是。”柯列兹奇玛先生纠正他，“每一个人都很难维持生计。那是财政极度困难的时期。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

“没错。”史迈利同意，“对难民来说尤其艰难。无论是来自爱沙尼亚还是萨克森，生活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艰难。”

“完全正确。难民的情况最糟。请继续。”

“在那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情报产业。各式各样。军事的，工业的，政治的，经济的。战胜国准备要付出大笔金钱，搜集彼此的重要资料。我的母公司就参与这些产业，并在此地派驻代表，负责更正资料，并传回伦敦。莱比锡先生与他的伙伴成为我们偶尔交易的对象。论件计酬的自由工作者。”

尽管听到了将军遭遇致命意外的消息，一抹出乎意料的微笑，从柯列兹奇玛先生脸上倏然掠过。

“自由工作者。”他说，仿佛他是初次听到这个名词，而且很喜欢。“自由工作者，”他复述，“就是我们。”

“这样的关系当然是暂时性质。”史迈利继续，“但莱比锡先生身为波

罗的海人，有着其他的利害关系，因此一直和我的公司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往来，通过巴黎的中间人。”他略停顿，“一位将军。几年前，在一场争执之后，将军受命移居伦敦，但奥图仍与他保持联系。而将军也仍然是他的中间人。”

“直到他发生意外。”柯列兹奇玛先生插嘴道。

“确实如此。”史迈利说。

“是交通意外吗？一个老人家——不太小心？”

“他被枪杀。”史迈利说，他看见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脸再次因不快而畏缩。“是谋杀。”史迈利加上一句，仿佛是要向他保证似的。“不是自杀，也不是意外或其他的情况。”

“当然。”柯列兹奇玛先生边说边请史迈利抽烟。史迈利辞谢，他便为自己点了一根烟，抽了几口，然后按熄。他的面容显得更加苍白。

“你见过奥图？你认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以轻松聊天的口气问道。

“我见过他一次。”

“在哪里？”

“我不方便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但并非不以为然，而是茫然困惑。

“告诉我，拜托。如果你的母公司——好吧，伦敦——想要直接与莱比锡先生接触，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通过《汉堡晚报》的广告安排。”

“如果他们有很紧急的事要与他联络呢？”

“那就通过你。”

“你是警察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镇静地问，“苏格兰场？”

“不是。”史迈利瞪着柯列兹奇玛先生，柯列兹奇玛先生也回敬他一眼。

“你带什么东西来给我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史迈利有些不知所措，没能立即回答。“例如一封介绍信，一张名片，比方说？”

“没有。”

“没有任何东西？真是可怜！”

“也许等我见到他，就会更了解你的问题。”

“但你见过证据，一张照片？你带在身上，或许？”

史迈利掏出皮夹，把那张照片递过桌子。柯列兹奇玛先生握住照片边缘，仔细查看了好一会儿，但只是为了确认，然后就放在面前的塑料

桌面上。看到这个动作，史迈利的第六感告诉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就要发表声明了，就像德国人发表声明时偶尔会有的模样一般——无论声明的内容关乎哲学，或个人的遭受排挤，或是为了赢得喜爱，或引起怜悯。他开始怀疑，至少是以他自己的判断，柯列兹奇玛先生其实是个富有同情心却遭误解的人，一个真心诚意的人，甚至是一个好人；他最初的沉默不语，是极不情愿却必须常穿在身上的职业套装，因为他的深情重义，在身处的这个世界中，难以找到共鸣。

“我希望向你说明，我在这里经营一家高尚的店。”柯列兹奇玛先生说，在宛如诊所的摩登照明下，他再次看着面前的照片。“我并没有拍摄顾客照片的习惯。其他人卖领带，我卖性爱。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以规矩、正确的态度经营我的生意。但这不是我的生意。这是友谊。”

史迈利聪明地保持沉默。

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他压低声音，仿佛吐露心声：“你认识他，麦斯先生？那个老将军？你和他有亲身接触？”

“是的。”

“他是个人物，就我所知？”

“他的确是。”

“一头狮子，呃？”

“一头狮子。”

“奥图一直狂热地爱他。我的名字是克劳斯。‘克劳斯，’他这样对我说，‘那个瓦拉狄米尔，我爱那个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奥图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将军也是吗？”

“他是。”史迈利说。

“很多人不相信奥图。你的母公司也是，他们一向不相信他。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怪他们。但将军不同，他相信奥图。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大事他都相信。”柯列兹奇玛先生举起前臂，握紧拳头，那真是非常大的拳头。“事情变得棘手时，老将军完全信任奥图。我也相信奥图，麦斯先生。在大事上。但我是个德国人，我不介入政治，我是个生意人。对我来说，难民的故事已经结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

“但对奥图来说，事情并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奥图是个梦想家。我可以用这个字。梦想家。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南辕北辙的一个原因。然而，他还是我的朋友。任何人伤害他，柯列兹奇玛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脸上瞬间蒙上困惑神色。“你确定没带任何东西来给我，麦斯先生？”

“除了照片之外，我没有东西给你。”

柯列兹奇玛先生极不情愿地再次对此表示轻蔑；但这让他沉默了好

一会儿；他很不安。

“老将军在英国被枪杀？”最后他问。

“是的。”

“你认为奥图也有危险？”

“是的，但我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柯列兹奇玛先生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活力充沛地连点了两次头。

“我也这样认为，我也是。这是他给我的鲜明印象。我告诉他很多次：‘奥图，你真该去当走钢丝的特技演员。’就我看来，对奥图而言，没有一天是值得活的，除非有至少六个不同的理由，让那一天有可能成为他一生的最后一天。你容许我稍微描述我和奥图的关系吗？”

“请说。”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手肘放在塑料桌面上，换了一个宜于倾诉心声的舒适坐姿。

“有一段时间，奥图和克劳斯·柯列兹奇玛做什么都在一起——干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勾当，可以这么说。我来自萨克森，奥图来自东边。波罗的海人。不是苏联人——他坚持——是爱沙尼亚人。他有过很艰困的时期，蹲过好几个牢房，有些坏家伙背叛他，回爱沙尼亚去。有个女孩死了，他几乎要疯了。我们没有钱，我们是鸡鸣狗盗的同伙人。这很正常，麦斯先生。”

史迈利了解。

“我们的生意中有一项是卖情报。你说得很对，在那段时间，情报是很有价值的商品。例如，我们听说有个难民刚抵达，还没接受联军的讯问。或者有个苏联的投诚者。或者是货柜船的船东。我们听说有这个人，就去问他话。如果我们够灵活，还可以把相同的情报，包装成不同的版本，卖给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买家。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当然，德国人自己，早就蓄势待发。有时候，暧昧不明的情报，甚至有五个买家。”他脸上堆起笑容，“但只有暧昧不明的情报才能这样，是吧？在其他的情况下，例如当我们没有情报来源，就自己编造。我们有地图，有丰富的想像力，有频繁的接触。别误会我的意思，柯列兹奇玛是共产党之敌。我们谈的是陈年往事，就像你说的，麦斯先生。我们必须生存。奥图构想，柯列兹奇玛执行。奥图不是创造这些情报的人，我会这么说。”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但就某个角度来说，奥图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他有债要讨。他常常这样说。或许是那些背叛他、杀了他女人的家伙，或许是全人类。我究竟知道什么？他必须采取行动。政治行动。就为了这个缘故，他到巴黎去，参加了许多活动，许多。”

柯列兹奇玛先生让自己稍加沉思。

“我坦诚相告。”他宣称。

“我会尊重你对我的信任。”史迈利说。

“我相信你。你是麦斯。将军是你的朋友，奥图告诉过我。奥图见过你一次，他很敬佩你。很好。我应该对你坦白。很多年以前，奥图·莱比锡曾经为我下狱。那个时候，我没有地位。现在，我有钱，负担得起社会地位了。我们偷了一些东西，他被抓，他说谎，揽下所有的责任。我想给他钱。他说：‘这是干什么？如果你是奥图·莱比锡，待在牢里一年，简直是度假。’我每个星期去看他，我贿赂警卫，带给他特别的食物，有一次甚至还带了个女人。他出来以后，我又想给他钱。他拒绝了。‘有一天，我会向你提出一些要求。’他说，‘也许是你的老婆。’你就上她吧，’我告诉他，‘没问题。’麦斯先生，我相信你是个英国人。你会认同我的立场。”

史迈利说他会。

“两个月前，也许更久以前，也许不到两个月，老将军打电话来。他有急事要找奥图。‘不能明天，一定要今晚。’有时候，他会从巴黎打来，使用代号，很无聊。老将军是个神秘兮兮的人。奥图也是。就像小孩，知道我的意思吗？别提了。”

柯列兹奇玛先生用他的大手拂过脸庞，像是抹掉蜘蛛网似的。“听着，’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奥图在哪里。上次我听到他的消息，他正因为某些新开创的生意，惹上了大麻烦。我会去找他，但这要花时间。也许明天，也许十天。’然后那个老头子说，‘我寄给你一封给他的信。你不惜生命，也要保护那封信。’第二天，来了一封信，寄给柯列兹奇玛的快信，伦敦的邮戳。里面有第二层信封。‘给奥图，机密’机密，是吧？所以那个老家伙疯了。别提了。你知道他手写的字迹，又大又粗，像军队的命令？”

史迈利知道。

“我找到奥图。他又在避风头，没有钱。他只有一套西装，但穿得像个电影明星。我把老家伙的信给他。”

“那是很厚的一叠。”史迈利试探地说，他想到那长达七页的影印纸。想到米凯尔的那部黑色机器，像坦克一样停放在图书馆里。

“当然。一封长信。我人在那里，他就打开信——”

柯列兹奇玛先生突然停下来，从他的表情看来，他似乎是极不情愿地察觉到自己应有所保留。

“一封长信。”他又说，“很多页。他读了信，显得非常兴奋。‘克劳克斯，’他说，‘借我一些钱。我要到巴黎一趟。’我借他一些钱，五百马克，没问题。在这之后，我有一段时间不常见到他。偶尔几次，他到这里来，打电话。我没听。然后，一个月前，他来找我。”他再次停顿，而且史迈利也再次感觉到他有所保留。“我很坦白。”他说，仿佛再次要求史迈利守密，“他——嗯，我会说他很兴奋。”

“他想要用夜总会。”史迈利满怀希望地试探。

“‘克劳斯，’他说，‘照我的要求做，你就不欠我什么了。’他说这是个桃色陷阱。他会带一个人到夜总会来，一个苏联人，他很熟的人，一头卑鄙无耻的猪。这个人是目标。奥图叫他‘目标’。他说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机会，是他所等待的一切。最好的女郎，最好的香槟，最好的表演。只有一夜，克列兹奇玛招待。是他所有努力的高潮，他说。讨回旧债，也可以赚点钱的机会。这是他们欠他的。现在，他要讨回公道。他保证没有后续影响。我说：‘没问题。’同时，克劳斯，我希望你帮我们照相。’他对我说。我又说：‘没问题。’因此他来这里。带了他的那个目标。”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叙述突然变得毫无特色的淡薄。抓住空当，史迈利问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意旨却远超过其简单的内容：“他们讲什么语言？”

柯列兹奇玛先生略微迟疑，皱起眉头，但终究还是回答了：“起初，那个目标假装是法国人，但女郎们不太能说法文，所以他和她们讲德文。但和奥图，他讲俄文。他很惹人厌，那个目标。身上有异味，汗流浹背，而且很多行事作风都算不上绅士。女郎们不喜欢和他在一起。她们来找我抱怨。我赶她们回去，但她们还是一直发牢骚。”

他似乎有些困窘。

“另一个小问题。”史迈利说，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又回来了。

“请说。”

“奥图·莱比锡着手计划勒索这个人时，怎么能保证绝对不会有后续影响？”

“这个目标并非最终目的。”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他缩皱起嘴唇，强化这个重点，“他是手段。”

“找上其他人的手段？”

“奥图没说得很清楚。‘将军梯子上的一阶，’他是这样说的，‘对我来说，克劳斯，这个目标已经足够。目标，以及之后的钱。但对将军来说，他只是梯子上的一阶。对麦斯也是。’基于我所无法理解的原因，钱也必须视将军满意的程度而定。或者是你满意的程度。”他顿了一下，仿佛希望史迈利点醒他。但史迈利没有。“我并不希望提出问题或条件。”柯列兹奇玛先生继续说，遣词用句更加严谨，“奥图和他的目标从后门进来，直接进到一个包厢里。我们小心安排，不让他从任何地方看出这间夜总会的名字。不久以前，这条路下去一点的地方，有家夜总会倒闭。”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但从声调听来，他对这件事并未感到不安。“那个地方叫‘富丽殿雅特’（Freudenjacht）。我在拍卖时买了一些配备，火柴，盘子。我们把这些东西布置在包厢里。”史迈利还记得在那张照片里，烟灰缸上有“ACHT”的字样。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俩人谈什么？”

“不行。”他改变答案，“我不懂俄文。”他说。他的手又做了个否认的手势。“他们讲德文时，谈的是上帝和世界。无所不谈。”

“我懂了。”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奥图的态度怎么样？”史迈利问，“他仍然很兴奋吗？”

“在我这一生中，从没见过奥图这个样子。他像刽子手一样放声大笑，同时讲三种语言，没喝醉酒，但举止却像喝醉了一样，唱歌，讲笑话。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柯列兹奇玛先生又说了一次，略带困窘。

史迈利谨慎地望着观测窗，以及灰色的机械箱。他也再次瞥了柯列兹奇玛先生小小的电视屏幕一眼，那一墙之隔，两两成对的白色肉体，无声的画面。他审度自己的最后一个问题。他了解其逻辑。他察觉到其价值。一路引领他探索至此的直觉，此时也制止着他。此刻，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短视近利，能值得他冒险失去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相知相惜，关闭通往奥图·莱比锡之路。

“对于他的目标，奥图没多加描述？”史迈利问，只是为了问些问题，让他能继续进行对话。

“那天晚上，他上来找我一次。上来这里。他暂时离开同伴，到这里来，确认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看着这里的屏幕大笑。‘现在，我已经把他逼上悬崖，他无路可退。’他说。我没再多问。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柯列兹奇玛先生在皮底镶金边的便笺上，为史迈利写下他的指引。

“奥图生活的环境很糟。”他说，“没人能改变。给他钱也无法提升他的社会地位。他仍然——”柯列兹奇玛先生略显迟疑，“在他内心，麦斯先生，仍然是个吉卜赛人。别误会我的意思。”

“你会警告他说我来了吗？”

“我们同意不使用电话。我们之间的正式渠道已完全封闭。”他递过那张纸，“我很认真地建议你小心。奥图听到老将军被枪杀的消息，一定会非常愤怒。”他看着史迈利走到门边。“楼下收了你多少钱？”

“抱歉？”

“楼下。他们拿了你多少钱？”

“一百七十五马克的会员费。”

“包括饮料，至少两百马克。我会叫他们在门口退还给你。这些日子以来，你们英国人可穷了。太多贸易联盟。你觉得表演怎么样？”

“非常有艺术性。”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再次对史迈利的回答大感欣喜。他拍拍史迈利的肩膀：“或许你该在生活中多找些乐子。”

“也许我已经找到乐子了。”史迈利表示赞同。

“替我向奥图问好。”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我会的。”史迈利答应。

柯列兹奇玛先生略显迟疑，同样迷惑的神情倏然掠过。

“你没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他再次问，“没有文件，例如？”

“没有。”

“可怜。”

史迈利离开时，柯列兹奇玛先生已坐在电话旁，处理其他的特殊请求。

他回到旅馆。一个醉醺醺的夜间门房替他开门，不断提议要送几个棒透的妞儿到史迈利房里。在随风飘送的教堂钟声与港口装卸货的喧闹声中，他醒了过来，倘若他真曾入睡的话。但是，夜晚的梦魇并未随日光的降临而消散，当他开着租来的欧宝，往北开过沼泽区时，夜里缠绕着他的惊惧，依旧在迷雾中徘徊不去。

道路像风景画一样空无人车。在迷雾的间隙，他一会儿瞥见一片玉米田，一会儿瞥见蜷伏在风中的红色农舍。在一个蓝色写着“KAI”的标志处，他突然转进一条下坡的道路，开下两段坡道。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码头，几幢低矮的灰色建筑，侏儒一般匍匐在货柜船的甲板之下，入口处矗立着红白相间的标竿，以及好几种不同语言书写的海关公告，但放眼望去，杳无人迹。史迈利停下车，走了几步到栅栏边。红色的按钮大得像茶杯碟一样。他按了一下，刺耳的鸣声让一对苍鹭拍翅飞进白茫茫的雾气中。在他左边，矗立着管状支柱的管制塔。他听见门用力关上与金属环的声音，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制服、蓄着胡子的人影，从铁梯上砰砰走下来。那人对他叫道：“你要干吗？”但没等史迈利回答，就解开木栅，挥手要他通过。柏油与碎石混合的地面，简直像一大片被轰炸粉碎再用水泥黏结的区域，边缘耸立着起重吊架，上方则是雾气未散的苍白天空。再远处，低伏的海洋似乎无法承受如此多的货运而支离破碎。从后视镜望去，海滨小镇高高低低的建筑轮廓，宛如老照片里若隐若现的景色。他望向大海，在浓雾中看见浮标与明灭闪烁的灯光，标示着与东德的海界，以及苏联帝国长达七千五百英里的疆界的开端。那是苍鹭飞去的方向。他在红白相间的圆锥柱中穿梭前进，开到一个堆满汽车轮胎与圆木的货柜场。“货柜场的左边。”柯列兹奇玛先生如是说。史迈利遵照指示缓缓左转，寻找一间老旧的房子，虽然老房子在这倾圮之地简直是不可能有的事。但柯列兹奇玛先生说：“找一间标示着‘办公室’的老房子。”而柯列兹奇玛先生从不犯错。

他颠簸驶过一段铁轨，开向货柜船。朝阳的光束穿透迷雾，让货柜船的白漆发出炫目光芒。他驶进一条巷道，两旁是起重机的控制室，每一间都像是摩登的信号房，每一间都有着绿色的杠杆与大大的窗户。在巷道的尽头，一如柯列兹奇玛先生所言，有一间老旧的锡板屋，顶上搭着高耸如浮雕的山形屋顶，竖着一根表漆剥落的旗竿，杂乱拉进房里的电线，仿佛将房子缠住一般，屋旁有一个老旧的汲水池，底座放着一个锡杯。木门上，褪色的哥德字体写着“BUREAU”（办公室），是法文而非德文。在上方，一行较新的字迹写着“P.K.柏根，进出口”。他在那里当夜班职员，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他白天干些什么，只有上帝和魔鬼知道。

他按了门铃，然后后退几步，让自己明显可见。他的手放在口袋外，也明显可见。他把大衣的纽扣直扣到颈部。没戴帽子。把车停在房子旁边，让屋里的人可以看见车里没人。我独自一人，而且没带武器，他试着这么说，我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你这一边的人。他再次按铃，叫着：“莱比锡先生！”一扇较高的窗打开来，一个漂亮的女人睡眼迷蒙地探出头，肩上还裹着毛毯。

“对不起，”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对她说，“我要找莱比锡先生。有很重

要的事。”

“不在这里。”她说，露出微笑。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很年轻，没刮胡子，双臂和胸前都有刺青。他们彼此交谈，史迈利猜他们讲的是波兰文。

“不在这里。”男人颇有戒心地说，“奥图不在这里。”

“我们只是暂时租用的房客。”年轻女人朝下喊道，“奥图破产，搬到他的乡下别墅以后，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

她把这句话再对她的男人说一次，男人笑了起来。

“不在这里。”他再次说，“没有钱。没人有钱。”

他们享受着这怡人的清晨，相偎相伴。

“你们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史迈利问。

两人又是一番讨论。是这天或那天？史迈利认为他们已失去时间概念。

“星期四。”女人宣布，再次露出微笑。

“星期四。”她的男人附和道。

“我有好消息要通知他。”史迈利受到她情绪感染的感染，愉悦地解释。他拍拍衣服口袋：“钱，哗啦啦，全是给奥图的，他赚的佣金。我昨天答应要送来给他的。”

女孩翻译这段话，男人与她争论。女孩又笑了起来。

“我朋友说别给他，否则奥图就会回来，把我们赶出去，那么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做爱了。”

试试看水畔营区，她建议，用赤裸的手臂指引方向。从大马路过去两公里，穿过铁路，经过风车，然后右转——她看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姿态优美地将一条手臂缠绕在爱人身上——没错，右边；向右走到湖边，除非走到湖边，否则你根本看不见湖的踪影。

“那个地方叫什么？”史迈利问。

“没有名字。”她说，“就只是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出租的假日房舍，然后开到船边。找华瑟。如果奥图在附近，华瑟会知道上哪里找他。”

“谢谢你。”

“华瑟什么都知道！”她叫道，“他像个教授！”

她也翻译了这句话，但这回，男人看似发怒。

“坏教授！”他朝下喊，“华瑟是坏蛋！”

“你也是教授吗？”女孩问史迈利。

“不，不是，很可惜我不是。”他笑着谢谢他们，他们像庆祝会上的

孩子，看着他上车。这一天，这洒落大地的阳光，以及他的来访——所有的一切，都为他们平添乐趣。他摇下车窗，向他们道别，他听见她说了什么，但不清楚。

“你说什么？”他抬头对她喊道，仍然面带微笑。

“我说：‘那么，奥图就有双重的好运可以翻身了。’”那女孩说。

“为什么？”史迈利问，并停下发动机，“为什么他有双重的好运？”

女孩耸耸肩。毛毯从她的肩头滑落。除了毛毯，她身无寸缕。她的男人用手臂环住她，为了维持体统，拉起她的毛毯。

“上个星期，从东边来了不速之客。”她说，“今天又有钱。”她张开手。“奥图是个幸运儿。就这样。”

然后，她看着史迈利的脸，笑意倏然消退。

“不速之客？”史迈利问，“是什么人？”

“从东边来的。”她说。

看到她神色惊慌，害怕她就此消失，史迈利勉为其难地维持愉快的表情。

“不是他的兄弟，是吗？”他愉快地问，非常热心。他伸出一手，比画着那神秘弟兄的身形。“矮个子？像我一样戴眼镜？”

“不，不是！一个高个子的家伙。有司机的。很有钱。”

史迈利摇摇头，假装有些失望的样子。“那我就不知道是谁了。”他说，“奥图的兄弟肯定从来没有钱过。”他继续大笑，“除非他是那个司机。”他加上一句。

他完全遵照她的指引，虽面对紧急状况，却出奇的平静。听天由命。没有自己主观的意愿。听天由命，祈愿祷告，与你的造物主达成协议。噢，上帝，别让这事发生，别有另一个瓦拉狄米尔。在阳光的照耀下，棕色的田野转为金色，但史迈利背上的汗水，却像一只冰冷的手刺痛他的肌肤。他遵照她的指引而走，看着一景一物，仿佛这是他的最后一日，因为他知道那个有司机的大个儿已抢在他前面。他看见一幢农舍，谷仓里有着老旧的马犁，粗糙的啤酒标示闪着霓虹灯，窗台上的天竺葵红似鲜血。他看见状似巨大胡椒研磨机的风车，白鹅满地逐风奔跑的田野。他看见宛如风帆轻掠过围篱的苍鹭。他开得太快了。我应该更常开车，他想，我疏于练习，难以掌控。路面从柏油变成石砾，再变成沙土，沙土卷起，盖上车子，仿佛沙尘暴。他进入疏落的松树林里，在树丛的另一边，他看见一个写着“假日房舍出租”的标示，和一排门窗紧闭、等待夏日粉刷的石棉平房。他继续往前开，一段距离之后，他看见林立的桅杆，和一汪低落的棕色湖水。他朝桅杆开去，驶过一个坑洞，听见车底传来一声恐怖的巨响。他猜想是排气管，因为他发动机的噪音骤然变大，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半的水鸟都因他的抵达而受惊。

他经过一个农场，驶进浓密的防风林中，接着，一幅明亮的白色图画呈现眼前，破败的防护堤与淡淡橄榄绿的芦苇是前景，其余的部分则是无边无际的辽阔天空。船只停泊在他右边，就在湖湾旁。破旧的篷车停在路旁，肮脏的洗涤衣物挂在电视天线间。他经过一顶有着菜圃的帐篷，和几间以前可能是军事用途的小屋。其中一间彩绘着幻想的日出，但色泽已斑驳剥落。屋旁有几辆旧车和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他停下车，沿着一条泥泞小径，穿过芦苇到湖岸。在长着草的港口边，停了几艘即兴翻造的船屋，有几艘还是从战时的登陆艇翻修而成。这里更冷，不知为何，也更暗。眼前所见的船都是日间停泊的船，胡乱地系泊在一起，大部分都覆盖着防水油布。好几部收音机在响，但他起初没见到任何人。然后，他注意到一阵浪纹，以及在水波上快速前进的快艇。在快艇上，一个看似乖戾的老人，穿着帆布外套，头戴黑色鸭舌帽，按摩着自己的脖子，仿佛刚刚睡醒。

“你是华瑟吗？”史迈利问。

依旧轻抚着脖子的老人似乎点了头。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在码头那边，他们告诉我说应该来这里找他。”

在华瑟宛如棕色皱纹纸的脸上，剪出一对杏仁形的眼睛。

“伊莎朵拉。”他说。

他指着湖岸更远处一段东倒西歪的防护堤。“伊莎朵拉”就在防护堤的尽头，一艘走霉运的四十英尺长的机械动力船，一幢等待倾圮的豪华大饭店。舷窗全挂上窗帘，其中一扇窗已粉碎，其他的则用思高牌胶带修复。他危危颤颤地踏上防护堤的条板。差点儿跌倒，一次，两次，为了跨越间隙，他不得不加大步幅，这对他的一双短腿来说，似乎颇不安全。走到防护堤的尽头，他发现“伊莎朵拉”没系上缆绳，随波漂动。船尾从系泊处松脱开来，漂流到离岸十二英尺之处，这或许已是她航行过最远的航程了。舱门紧闭，窗户全掩上窗帘。旁边也没有小艇。

老人在六十码外，停下快艇。他向后划动，看着史迈利。史迈利把手圈成杯状，大叫：“我怎么找他？”

“如果你要找他，就叫他吧。”那老人回答，声音似未提高。

史迈利回头面对老船，叫道：“奥图。”他轻声地叫，然后稍微提高声音，但“伊莎朵拉”里毫无动静。他查看窗帘。他查看拍打腐朽船身的油渍水浪。他侧耳倾听，认为自己听到了和柯列兹奇玛先生夜总会里相仿的音乐，但那很可能是从另一艘船传来的回音。华瑟棕色的面孔仍然从快艇上望着他。

“再叫一次。”他喊道，“继续叫，如果你要找他的话。”

但史迈利却直觉地抗拒老人的指挥。他可以感觉到他的独断，他的轻蔑，而他对这两者都颇感愤慨。

“他在这里，还是离开了？”史迈利叫道，“我说，他在这里吗？”

那老人一动不动。

“你看见他上岸来吗？”史迈利坚持追问。

他看见那张棕色的面孔转过头，知道老人对着湖水吐了口痰。

“那头野猪来来去去，”史迈利听见他说，“我他妈的干吗管他？”

“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随着他俩对话的声音，好几个人从其他船上探出头来。他们面无表情地望着史迈利：一个站在碎裂防护堤上的陌生矮胖子。湖岸上聚集了一群衣衫不整的人：一个穿短裤的女孩，一个老女人，两个衣着类似的金发少年。他们虽然外型互异，却有相似之处：有着囚犯的外表，遵循着相同的恶法。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史迈利对着他们喊道，“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拜托，他到哪里去了？”不远的一艘船屋上，一个蓄胡子的男人将水桶垂放进湖里。史迈利的眼睛选定他。“有人来过‘伊莎朵拉’吗？”他问。

水桶哗啦哗啦地装满水。蓄胡子的男人拉起水桶，但没说话。

“你应该去看他的车。”一个女人用刺耳的嗓音从岸上叫道，或许那是个孩子，“他们把车拖到林子里了。”

林子距湖岸约一百码，杂生着小树和桦树。

“谁做的？”史迈利问，“谁把车拖到那里去的？”

无论刚才说话的是谁，这次都选择不再出声。老人把快艇划向防护堤。史迈利看着他接近，看着他把船尾靠在防护堤的阶梯上。史迈利毫不犹豫地爬上船去。老人在距“伊莎朵拉”船侧几桨之处拉他上艇。老人皱巴巴的嘴唇间夹着一根香烟，和眼睛一样，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烁着非常不自然的邪恶光芒。

“从远地来？”老人问。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史迈利说。“伊莎朵拉”的梯子上满是铁锈与杂草，史迈利登上甲板时，露水湿滑。他找寻着生命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他找寻露水上的足印，徒劳无功。几条固定的钓鱼绳紧紧拴在生锈的栏杆上，垂入水中，但可能已悬在此几个星期了。他侧耳倾听，又隐隐约约地听见乐团音乐缓慢的曲调。从岸上传来？或从远处？两者皆非。音乐从他脚底传来，仿佛有人正播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八转唱片。

他往下看，只见老人斜倚在快艇上，鸭舌帽盖住眼睛，手跟着音乐打着节拍。他试试舱门，门已上锁，但看来并不牢固，没什么是牢固的。他在甲板上逡巡，找到一支生锈的螺丝起子，充当铁锹。他把螺丝起子钻进缝隙，前后旋转，然后，出乎意料的，整扇门都掉了下来，门框、铰链、锁，连同其他的一切，都像爆炸一样轰然落下，锈蚀的材料掀起一阵红色烟尘。一只硕大的昆虫猛然撞上他的脸颊，并怪异地长长

叮了他一口，让他怀疑那是一只蜜蜂。舱房里一片漆黑，但音乐变得更大声了。他站在梯子顶端，尽管背后有日光，但底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他按下电灯开关，坏了。他往回走，对快艇上的老人说：“火柴！”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几乎要发脾气了。那顶鸭舌帽一动也不动，仍未停止指挥。他放声大叫，这一次，一盒火柴躺在他脚边。他拿起火柴，走进舱房，点亮一根，看见一架电力耗竭的晶体管收音机，正以仅余的电力播送音乐。在一片狼藉之中，这是惟一保持原貌，惟一维持运作的东西。

火柴烧尽了。他拉开窗帘，但靠岸的那一侧没拉开，然后点亮第二根火柴。他不希望老人看进舱里。在灰蒙蒙的侧光里，莱比锡竟然像柯列兹奇玛先生所拍摄的那张照片中的身影一样可笑。他全身赤裸，躺在他们捆绑他的地方，然而，身旁没有女郎，也没有基洛夫。那张斧劈的图卢兹-洛特雷克面孔，虽然因淤伤而变黑，且嘴里还塞着几捆绳索，但仍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如同史迈利记忆中生前的模样。他们严刑拷打他时，一定是利用音乐掩饰噪音的。但他怀疑音乐声是否足以掩盖。他继续盯着收音机作为参考的要点，探查一个必须用耳力与眼力细心追溯的东西，而在火柴熄灭前，是不可能探查完尸体的。日本货，他注意到。很奇怪。他觉得这实在是太怪异了。技艺精湛的德国人竟然买日本收音机，岂不怪哉。不知道日本人是否会受宠若惊。满心疑惑的他愤然催促自己，就让自己全神贯注在高度工业化国家间物品交换的这种有趣经济现象吧。

史迈利一面盯着收音机，一面扶起一张折叠凳坐了上去。缓缓地，他把目光转回莱比锡脸上。有些死者的脸，会有麻醉病人那种呆滞甚至是愚蠢的模样。有的则是在生前的多重身份中，让某一种情绪永远定格——是个情人，是个父亲，是个汽车驾驶员，是个桥牌玩家，或是个暴君。有些死者，像瓦拉狄米尔，什么都没留下。但莱比锡的脸，即使没有绳索捆绑，仍然有着情绪，那是愤怒：因痛苦而激化的愤怒，转而为狂暴；在身体失去气力之时，愤怒却愈益加深，充满全身。

恨，康妮如是说。

有条不紊地，史迈利凝视着他，尽可能缓慢地思索，他仔细查看碎片残骸，希望重建他们动手的程序。在他们制伏他之前，有一场打斗，他从桌脚、椅子、灯泡和架子的碎片中推断出来，而且其他的一切都被扫落或丢离原来的位置。接着他们进行搜索，在捆绑他之后进行的，间或讯问着他。他们的受挫痕迹处处可见。他们剥下墙板，撬开地板，拉开置物柜抽屉，扯落衣服与床单，后来，所有的东西都四分五裂，所有的东西都不复原貌，但奥图-莱比锡仍然拒绝透露。他也注意到，血迹出现在几个不该有的地方——在洗脸盆里，在火炉上。他宁可认为，那不全是奥图-莱比锡的血。最后，在绝望之中，他们杀了他，因为这是卡拉的命令，这是卡拉的作风。“杀戮为上，审问其次。”瓦拉狄米尔常这样说。

我也相信奥图，史迈利愚蠢地想，回忆起科列兹奇玛先生所说的话。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对大事深信不疑。我也是，他想。他相信他，在彼时彼刻，深信不疑，如同他相信死亡，相信睡魔一样。对瓦拉狄米尔如此，对奥图莱比锡亦如此，而死亡正是他们所言属实的明证。

从岸边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他在干吗？他找到什么了？他是谁？”

他回到甲板上。老人已收起桨，任小艇随波漂荡。他背靠梯子坐着，头佝偻着低垂在宽阔的肩膀之间。他已抽完香烟，又点了另一根，仿佛今天是星期天。史迈利看见老人的那一刻，也看见了粉笔记号。就在同一个视线上，离他非常近，弯弯曲曲地浮现在他满是雾气的眼镜片里。他必须低下头，透过镜片的上方，才能看清楚。一道粉笔记号，锐利鲜明，黄色的。一条线，小心地画在栏杆的铁锈上，一步之遥处，垂着一条以水手绳结系住的钓鱼绳。老人望着他；而且，就他所知，岸上围观的群众也望着他，但他别无选择。他拉起钓鱼绳，非常重。他稳稳地拉着，一手上一手下，直到绳索变成了肠线，他继续拉着肠线。肠线突然变得非常紧。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拉着。岸上的人满怀期待；一水之隔，他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兴味盎然。老人的头后仰，在鸭舌帽的阴影里望着他。突然，噗通一声，钓获的东西跃出水面，围观的群众响起一阵猥亵的笑声：一只旧运动鞋，绿色的，仍然系着鞋带，勾着鞋的是一个大鱼钩，大得足以拖起一条鲨鱼。笑声慢慢平息。史迈利解下球鞋。然后，他仿佛还有其他事要处理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到舱房，离开众人的视线，任门半敞着迎进些许光线。

但他手上还拿着那只运动鞋。

一个防水布包缝在鞋趾里。他拉了出来。那是一个香烟袋，顶端缝合，折叠数次。莫斯科规则，他木然地想，始终都是莫斯科规则。我还要承接多少死者的遗物？他怀疑。就算我们重视的都是平凡之辈。他打开缝线，烟袋里是另一个折叠起来的東西。这次是袋口密封的橡胶护套。藏在护套里的秘密，是一团比火柴盒略小的硬纸板。史迈利打开来。那是半张风景明信片。黑白，甚至不是彩色的。半张阴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风景画，半幢荷尔斯泰因城堡凝望着灰暗的阳光。边缘呈锯齿状，是刻意撕成两半。背面没写字，没地址，没邮票。只是半张单调、未付邮寄的明信片；但他们为着这个东西拷打他，然后杀了他，却从头到尾没找着这个东西，或这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把这张明信片与它的包装，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回到甲板上。老人的小艇靠近舷侧。史迈利一言不发缓缓爬下梯子。岸上聚集的营地民众越来越多。

“喝醉了？”老人问，“睡沉了？”

史迈利踏进小艇，在老人划离时，再次回头望着“伊莎朵拉”。他看着破碎的舷窗，想着船舱里的一片狼藉，那纸一般薄的船板，让他可以听见岸上杂沓的足音。他想像着那场打斗以及莱比锡的尖叫声，直入云霄，回荡在整个营区。他想像着，沉默的群众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的位

置，未发一声，也未伸援手。

“有一场派对。”老人把小艇系在防护堤时，漫不经心地说，“很多音乐，歌声。他们警告我们说，那并不大声。”他打了个结。“也许他们吵架了，又怎么样？很多人都吵架。他们很吵，播放爵士乐，又怎么样？我们就是爱听音乐的人！”

“他们是警察。”一个女人在岸上的群众中喊道，“当警察来执行勤务时，市民就有义务要闭紧嘴巴。”

“带我去看他的车。”史迈利要求。

他们群起而动，没有人带头。老人走在史迈利身边，半是监护，半是保卫，让他自己有种滑稽的仪态。孩子们到处奔跑，但都与老人保持距离。那辆福斯汽车停放在矮树丛里，和“伊莎朵拉”的船舱一样狼藉不堪。车顶的衬里被撕成碎片，座位都被翻起扯裂。轮胎已不见踪影，但史迈利猜这是事后才发生的。营地的群众虔敬地围在车旁，仿佛那是他们的展示品一般。有人想要烧了车子，但火没烘起来。

“他是个无赖。”老人解释道，“他们全是。看看他们，波兰佬，罪犯，次等人。”

史迈利的欧宝还停在原处，在小径尽头，靠近垃圾箱的地方，两个穿着很相似的金发男孩站在行李厢上，用锤子敲打车盖。走近前去，可以看见他们额上的头发随着手中的动作而跳跃。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装饰着爱情雏菊的黑色靴子。

“告诉他们，不要再敲我的车。”史迈利对老人说。

营地的人跟随着他们，但保持了一段距离。他可以听见他们踏出的鬼鬼祟祟的脚步声，活像难民大军。他走到自己的车边，手中握着钥匙，那两个男孩依旧弓起背，使足全力地敲打。他环绕车身加以检视，发现他们就只有把行李厢的盖子敲得松脱开来，然后拆下来，再在地面敲平，像一片未经加工的铁片。他查看轮胎，但似乎没什么损伤。他不知道还要查看什么。然后，他看见他们用绳子把垃圾箱绑在前保险杠上。他保持冷静，扯着绳子想要拉断，但绳子牢不可摧。他改用牙齿咬，但徒劳无功。老人借他一把小刀，他切断绳子，仍然对那两个拿锤子的男孩保持冷静态度。营地的人围成半圆形，抱着孩子，准备道别。史迈利坐进车里，老人大大叹一口气，用力关上车门。史迈利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当他转动钥匙时，其中一个男孩有气无力地滚上发动机盖，像是摩托车表演中的模特儿，另一个则礼貌地拍打窗户。

史迈利摇下窗户。

“你们要干吗？”史迈利问。

男孩伸出手掌。“修理。”他解释说，“你的行李厢关不紧。时间费加材料费再加上管理费用。停车费。”他指着他的大拇指指甲。“我的同事割伤了手。那可能会很严重。”

史迈利看着那男孩的脸，看不到任何他所能理解的人类本性。

“你们什么都没修，你们只有破坏。叫你的朋友离开这辆车。”

两个男孩彼此商量，似乎有所争论。他们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神志清醒，缓缓地互相推搡着肩膀，做着与他们的言辞完全不相符的夸张手势。他们谈论大自然，谈论政治，如果不是车上的那个男孩站起身来借以渲染论点的话，他们柏拉图式的对话可能会无休无止。那个男孩站起身时，还折下一支雨刷，宛如摘取花朵，递给老人。史迈利开车上路，从后视镜中，他看见一圈以老人为中心的面孔瞪着他看。没有人挥手道别。

尽管车子像救火车般叮当作响。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开，衡量着眼下的形势，他猜想他们还动了其他手脚，他所没有察觉的手脚。以前他曾离开德国，他曾非法地进出，也曾因被通缉而逃亡，但此时，他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置身于全然不同的德国，仿佛重返到蛮荒世界。他无从得知，水畔营地是否有人打电话通知警察？他想那应该已然发生。那艘船已被撬开，秘密都已揭露。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现在都争相抢着当好市民。他以前就已领教过了。

他进入一个海滨小镇，行李厢——或者应该说是曾经是行李厢的东西——仍在其背后咣啷作响。也或许是排气管，毁于我在开进营地时撞上的那个大坑洞。一个火热、不合时节的太阳，取代了清晨的浓雾。没有树木。炫目迷离的耀眼光芒环绕着他。时间还很早，空荡荡的马车犹等待着第一批游客的到来。沙滩挖成弹坑的模样，那是夏日的阳光膜拜客用来躲避海风用的。他可以听见车子行进的声音在彩绘的店面间轻声回荡，而阳光似乎让回音变得更加大声。因为车子发出的嘈杂噪声，他所经之处，人人都抬头张望。

“他们会记住这辆车。”他想。即使水畔营地没人记得车号，粉碎的行李厢也会让他无所遁逃。他转进大街。太阳真的非常明亮。“一个男人来过，警察先生。”他们会对警方巡逻员说，“今天早上，警察先生。他说是那人的一个朋友。他到船里查看，然后开车走了。他没问我们什么，警察先生。他很镇静。他钓起了一只鞋，警察先生。想像一下——一只鞋！”

他朝火车站的方向开，遵循标志，寻找可以把车停放一整天的地方。车站是宏伟的红砖建筑，他猜可能是盖于战前。他开过车站，在左边找到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一排遮阴的绿树迤逦蜿蜒，有些车上都已覆满树叶。一部机器收走他的钱，并给他一张票粘贴在挡风玻璃上。他倒车到一排的中央，让一道泥堤尽量遮住行李厢。走下车，异常炎热的太阳像火辣的巴掌打在他脸上。一丝风都没有。锁上车，把钥匙藏在排气管里，他不太明白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只觉得对租车公司很是歉意。他捡起树叶和沙土，把前面的车牌几乎全盖住。一个小时之内，在这圣卢克的夏日里，停车场会停满上百辆车。

他注意到大街上的一家男装店。他只买了一件亚麻外套，没别的，

因为买整套服装的人会被记得。他没穿上新外套，而是放进塑料袋里。在一条开满服饰店的斜街上，他买了一顶草帽。在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这个地区的假日地图，以及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低萨克森地区的火车时刻表。他也没戴上帽子，而是像外套一样将其放进提袋里。出乎意料的炎热让他汗流浹背。炎热令他沮丧；这和酷暑天下雪一样荒谬可笑。他走进电话亭，再次翻找电话号码簿。汉堡没有克劳斯·柯列兹奇玛，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电话号码簿里有一个柯列兹奇玛，住在一个史迈利从没听过的地方。他查了手上的地图，找到了一个相同地名的小镇，位于通往汉堡的主要铁路线上。这让他非常高兴。

史迈利保持平静，心无杂念，再次精细地盘算。找到那辆车之后，警方会很快就找上汉堡的那家租车公司。从租车公司取得他的名字和外型描述之后，就会立即在机场和其他边界地区严加戒备。柯列兹奇玛是夜猫子，睡得很晚。他住的小镇搭普通列车要一个小时。

他回到火车站。车站大厅是华格纳幻境似的哥特式宫廷，有着拱形屋顶与巨大的彩绘玻璃窗，阳光穿透玻璃，在陶砖地板上映照出丝丝缕缕的斑斓色彩。他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说他姓“史坦法斯特”，名字缩写为“J”，这是他从伦敦那个俱乐部取出的护照中其中一本的名字。第一班飞往伦敦的班机是下午六点，但只剩头等舱有空位。他预订了一个头等舱的座位，并且说，他在抵达机场之后，会办理经济舱机票的升级。电话另一端的女郎说：“那么，请提前一个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史迈利答应——他想让对方印象深刻——但是表明史坦法斯特先生很糟糕地没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络。从她的声调听起来，不像有手握电报的安全官站在她背后，贴着她耳朵低声指示，但他猜几个小时之内，史坦法斯特先生的订位消息就会触动许多警铃，因为租欧宝车的，正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回到大厅，走进缤纷的光影里。大厅有两个售票柜台和两条排队的人龙。在第一个柜台，一个聪慧的女郎替他服务。他买了一张到汉堡的二等单程车票，但购买的过程颇费些劲，犹疑不定，又异常紧张。在终于买好之后，他又坚持一定要写下离站和抵达的时间，还向她借了一支原珠笔和一张便条纸。

在男厕里，他先从自莱比锡船上拿到的那半张风景明信片开始，把衣袋里的东西换过来，再换上亚麻外套与草帽，接着走到第二个柜台，非常镇静地买了一张普通车票，到柯列兹奇玛所住的小镇。在买票的过程中，躲在草帽宽阔帽檐下的他，完全不看售票员，只专注在自己所买的票与所找的零钱上。离开之前，他采取了最后一道防范措施。他打了一通拨错号码的电话给柯列兹奇玛先生，他太太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不该这么早打电话给任何人，但他也印证了电话无误。他最后做的是把塑料袋折叠放进口袋里。

小城林木苍翠，清幽雅致，草地宽广，每一幢房舍的领域都精心划分。无论这里的乡村生活是否已因城郊人士大举入侵而遭破坏，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非常美丽。八号在右手边，是一幢坚固的两层楼建筑，有着倾斜的斯堪的那维亚屋顶，双车库，和多种种得过密的

小树。花园里有一张刻花塑料座的摇椅，和一个浪漫风格的新鱼池。但整幢房子最引人注目之处，也是柯列兹奇玛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是铺着艳红色瓷砖的内院里的露天游泳池。史迈利就在那里发现了他，一家和乐，在这个不像秋天的日子里，与几个邻居即兴欢聚。柯列兹奇玛先生穿着短裤，正在准备烤肉，当史迈利打开大门的门闩时，他停下手边的动作，抬头四望，看看是谁来了。但史迈利身上的新草帽与亚麻外套令他困惑，因此他叫妻子来应门。

柯列兹奇玛太太手上端着香槟杯，走下小径。她穿着粉红色的泳装，肩上的粉红色透明披肩在背后飘荡。

“现在又是谁？谁带来惊喜？”她用开玩笑的声音不断问着。她很可能是在对着她的小狗说话。

她在他面前停下来。她晒得黝黑，身材高挑，和她丈夫一样，体格健美。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因为她戴了一副加了白色塑料框的黑色眼镜，以保护鼻子免于晒伤。

“柯列兹奇玛家正在欢聚，”他仍未自我介绍，因此她不太安心地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先生？我们可以提供你什么服务吗？”

“我必须和你丈夫谈谈。”史迈利说，这是他自买车票之后首次开口，他的声音显得稀薄而不自然。

“但克劳斯白天不谈生意。”她坚定地说，仍然面带微笑，“白天，我们家里是不准谈论商业利润的。我应该给他铐上手铐，向你保证日落后他就会是你的囚犯吗？”

她的泳装是两件式的，露出平坦丰润的腹部，因涂满乳液而油光闪烁。腰间系了一条金链子，似乎是返璞归真的进一步征兆。脚下踏着一双鞋跟非常高的金色凉鞋。

“请告诉你丈夫，不是关于生意的事。”史迈利说，“是关于友谊。”

柯列兹奇玛太太啜了一口香槟，拿下黑眼镜，宛如在化装舞会中介绍自己一般。她有个狮子鼻。脸孔虽然亲切，却比她的身体老得多。

“但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有友谊可言？”她追问，不再确定自己该摆出迷人或严厉的姿态。

但此时，柯列兹奇玛先生本人已随后走下小径，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目光从妻子身上转向史迈利，然后又瞪着史迈利看。或许是史迈利不自然的面容与神态，以及呆滞的凝视目光，让柯列兹奇玛先生惊觉到他的来意。

“去看着炉上的食物吧。”他草率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伸出手臂，引领史迈利进到客厅。客厅里有着黄铜烛台，以及一扇映满仙人掌丛林的观景窗。

“奥图·莱比锡死了。”门一关上，史迈利就直截了当地说，“在水畔

营地，两个人杀了他。”

柯列兹奇玛先生睁大眼睛；他毫不以为耻地转身背对史迈利，双手掩住脸。

“你录了音。”史迈利完全无视于他的动作，“我给你看过那张照片，而你还替他保管了录音带。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背影，看不出他是否听见。“昨天晚上，你自己对我提到这件事。”史迈利仍以卫兵似的声调继续说，“你说，他们谈论上帝和世界。你说，奥图笑得像个刽子手，同时说三种语言，唱歌，说笑话。你替奥图拍照片，但你也替他录下了谈话的内容。我猜，你也替他收了那封伦敦寄来的信，现在还在你手中。”

柯列兹奇玛先生转过身来，愤愤不平地看着史迈利。

“谁杀了他？”他问，“麦斯先生，我以军人的身份问你。”

史迈利从口袋中掏出那半张撕开的风景明信片。

“谁杀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又问一次，“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你昨天晚上希望我带来给你的东西。”史迈利没理会他的问题，“谁带来这张风景明信片，就能拿到那卷录音带，以及你替他保管的其他东西。这是他与你商量好的做法。”

柯列兹奇玛接过明信片。

“他说这是莫斯科规则。”柯列兹奇玛说，“奥图和将军都坚持这么做，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荒谬。”

“你有另外半张明信片？”史迈利问。

“是的。”柯列兹奇玛说。

“那么就比对一下，把东西交给我。我会完全照奥图的希望去运用那些材料。”

他以不同的方式说了两遍，柯列兹奇玛才回答：“你保证？”柯列兹奇玛追问道。

“是的。”

“凶手呢？你会拿他们怎么办？”

“他们很可能已经安全地越过水域了。只要开个几公里就成了。”

“那么那些材料有什么用？”

“对派遣凶手的那个人来说，这些是很难堪的东西。”史迈利说，这一次，或许是史迈利强如钢铁的冷静神态让柯列兹奇玛先生相信，这位访客与他一样痛心疾首——甚至，比他更加强烈。

“这会杀了那个人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史迈利沉吟半晌才回答：“比杀了他更惨。”

有那么一会儿，柯列兹奇玛先生似乎想问比杀了他更惨的是什么，

但终究没问。他死气沉沉地拿着那半张明信片，走出客厅。史迈利耐心等待。一个万年铜钟孜孜不倦地循径前进，红色的鱼儿从鱼缸里瞪着他。柯列兹奇玛回来了。他拿着一个白色的硬纸盒。盒里垫着卫生纸，躺着一沓字迹已然熟悉的影印纸，和六卷迷你录音带，蓝色塑料材质，是现代男士喜爱的流行款式。

“他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他很明智。”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史迈利肩上，“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让我知道。”他说，“我有自己的手下。这是暴力的时代。”

史迈利再次从电话亭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这一次是为了再确认史坦法斯特先生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订位。做完这件事，他买了邮票和一个很结实的信封，写上澳大利亚阿德雷德的一个虚构地址。他把史坦法斯特先生的护照放进信封，丢进邮筒。然后，就以平凡无奇的乔治·史迈利先生，一个专业雇员的身份，展开旅程。他回到火车站，无惊无险地穿越边境到丹麦。在旅途中，他进到厕所里读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总共七页，是在大英博物馆隔壁那个小图书馆里，由将军亲自用米凯尔那部古董复印机所影印的。他所读到的内容，正印证了他这天眼中所见的一切，也让他心中的警铃愈发响亮，几乎难以承受。他搭火车，转渡轮，最后再乘出租车，一路赶到哥本哈根のカ斯特洛普机场。从カ斯特洛普，搭乘下午的班机飞往巴黎。航程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史迈利的世界中却恍如一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绪，与所有的期待如潮汹涌起伏。莱比锡遭人谋害，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愤怒和反感，此时已慢慢平抑，逐渐枯竭，代之而起的，是他为欧斯特拉柯娃担忧的恐惧：如果他们对莱比锡和将军下手已如此之重，那么，他们会怎么对付她呢？开车穿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他不断回味青春岁月的流转，但此刻，在逃亡的反高潮里，他却只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摧残。死亡如此迫在眉睫，死亡如此挥之不去，继续奋斗的目的何在呢？他再次想起卡拉，以及他的专制残暴，这至少让缠扰终生的混沌有了意义，让暴力、让死亡都有了意义。他想到对卡拉而言，杀戮只不过是宏大计划的附属品罢了。

我怎么可能赢？他问自己，独自一人，心怀疑虑，顾及礼法。我们任何一个人，如何能对抗这无情的猛烈炮火呢？

飞机的下降，以及重启棋局的希望，让他恢复常态。有两个卡拉，他推断着，再次忆起那张冷静克己的脸，那充满耐心的眼睛，精瘦的身体达观地静候自我毁灭。一个是专业、沉着的卡拉，如果必要，他可以容许耗费十年工夫经营，等待开花结果。比尔·海顿的案子，花了二十年。卡拉这个老间谍，这个务实主义者，可以容忍十二次的损失，只为换取一次的大胜利。

但还有另一个卡拉，一个有着人心，有着伟大爱情的卡拉，一个因人性而有瑕疵的卡拉。如果他为了掩藏弱点而采取条件交换的手段，我

绝不能裹足不前。

伸手到座位上方的置物柜拿他的草帽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的豪言壮语，预言卡拉的终将败亡。“不，”在当时回答一个恰似他现在问自己的问题时说，“不，卡拉并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的人。有一天，如果我还和他有纠葛的话，他的不知节制将导致他的灭亡。”匆忙冲向排班的出租车时，他想起自己的这一段话是对一个名叫彼得·吉勒姆的人说的。此刻，这个人的影像恰好映上心头。

欧斯特拉柯娃躺在睡椅上，凝望着黎明微曦，认真想着，这是否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一整天，相同的灰沉阴郁一直笼罩着中庭，伴随她的小小宇宙进入永无止境的黑夜。天亮时，一道暗沉的光线稍微穿透阴郁；白天，在那些人来后不久，天空就像被切断电力似的，更加阴沉，预示着她的末日。而此刻，在夜里，随着光线消退，浓雾让这一片漆黑愈加浓重。欧斯特拉柯娃心里也一样，她毫无痛苦地下定决心：我带着浑身乌青淤伤的身体，连同我那长期的病痛，等待救主再次来临；属于我的时日，也确实是在逐渐消逝。

这个早上醒来，她发现自己似乎缚手缚脚，难以动弹。她试着想要移动一条腿，但大腿、胸口、腹部的肌腱立即拉紧，如火烧灼。她试着举起一只手臂，却只能勉强拉动手上缠缚的铁索。她花了似乎一辈子的时间，才爬到浴室，又花了相同的时间，脱下衣服，泡进温水里。泡进水里时，她很害怕自己会因疼痛而昏迷，因为路面擦撞而遍体鳞伤的身体痛楚难耐。她听见一阵槌打的声音，以为那是自己脑袋里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暴躁邻居的杰作。她数着教堂的钟声，发现它在第四下就停止了，难怪邻居要抗议老旧水管发出的水流轰隆声。煮咖啡的动作，耗尽她全身的力气。然而，在那一刻，坐下竟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而躺下也一样难受。她惟一能休息的方式是身体前倾，手肘靠在流理台上。从这里，她可以望见中庭，既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小心提防；从这里，她看见了那两个人，那两个邪恶的家伙，他们正装模作样地应付管理员，那只老山羊管理员——皮埃尔太太，她正摇着头，顶回去说：“不，欧斯特拉柯娃不在这里，不在这里。”——用十种不同方式讲了“不在这里”，回声像咏叹调在中庭回荡——不在这里——盖过了拍打地毯的声音，盖过了孩子叽叽喳喳的谈话声，还有三楼两个绑头巾的老太婆从相隔两米的窗户探出头聊天的声音——不在这里！直到连小孩都不信她的话。

如果她想要看书，她必须把书放在流理台上。在那两个人来过之后，她把枪也放在流理台上。后来她注意到枪托部分的旋轴，出于女人务实的天性，她将一条厨房的绳子改装成拉火绳。如此一来，她就可以把手枪挂在脖子上，空出双手，在必要时撑住自己穿过房间。但当手枪刺痛胸口时，她总觉得她会因痛苦难熬而反胃。在那两个人离去之后，她一面手边打理着杂务，一面嘴里大声吟诵着她答应自己要在这段闭关时间留意观察的结果。“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顶汉堡帽。”她自言自语，慷慨地倒给自己一大杯伏特加提神。“一个个头胖，一个脑袋光，一双灰鞋脏。”把记忆里的影像编成歌，她想，唱给魔术师听，也唱给将军听。噢，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第二封信呢？

她又回到孩提时代，她从小马背上跌下来，小马转过身来，踩踏着

她。她又回到少妇时代，努力要成为母亲。她还记得，亚莉珊卓奋力抗拒降生到莫斯科那间污秽的产房里。在那灰暗危险的光线中，整整三天，满是无法承受的痛苦。而现在，她窗外就有着相同的光线，静静淌进公寓光洁的地板上，宛如一道非自然的尘埃。她听见自己叫唤着葛利克曼“把他带来，把他带来”。她还记得，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生育下来的是他，葛利克曼，她的爱人，而不是他们的孩子——仿佛是他那刚强、毛发浓密的身体奋力挣扎着离开她的身体——或者是进入她的身体？——仿佛一生育下来，就会把葛利克曼送进她极度恐惧的禁锢牢狱里。

为何他不在那里，为何他没到医院？她问自己为何把葛利克曼和将军与魔术师混为一体。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信？

她很清楚，在她与亚莉珊卓奋斗时，葛利克曼为何没出现。是她求他别来的。“你有勇气承受痛苦折磨，这就够了。”她当时告诉他，“但你没有勇气目睹其他人受痛苦折磨，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基督可以轻易面对。基督可以治愈麻风病人，基督可以让盲人看得见，让死人复活，甚至可以因为天理正道而死。但你不是基督，你是葛利克曼，你除了旁观，除了感同身受之外，对我的痛苦无能为力，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但将军和他的魔术师不同，她有些愤愤不平地辩驳道，他们自许是为我治病的医生，我有权利要求他们！

在她指定的时间，那个又矮又呆、声音像驴子嘶叫的管理员上楼来，她那个神似人猿的丈夫也带着螺丝起子一起上来。他们充满兴奋地带来找欧斯特拉柯娃，充满喜悦地给她带来振奋的消息。欧斯特拉柯娃已仔细地作好准备，等候他们的到访，她播放音乐，化好妆，睡椅旁堆放了许多书，营造出休憩自在的气氛。

“有访客，夫人，男的……不，他们没留下姓名……从国外来，只在这里停留几天……他们认识你的丈夫，夫人，移民，他们是，和你一样……不，他们希望这是一个惊喜，夫人……他们说为你带来亲戚的礼物，夫人……一个秘密，夫人，其中一个很高大、强壮，而且英俊……不……他们改天再来，他们是来谈生意的，许多约会，他们说……不，搭出租车，而且叫车子等着——费用喔，想想看！”

欧斯特拉柯娃笑起来，把手放在管理员的臂膀上，好像把她拉进一个大秘密似的，而她那个人猿丈夫正站在一旁，对着她俩吐出香烟和大蒜的气味。

“听着，”她说，“请听我说，皮埃尔先生和夫人。我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人，这些有钱又英俊的访客。他们是我丈夫不成材的侄子，从马赛来的，懒惰鬼，浪荡子。如果他们带礼物来给我，你可以确定，他们也会要求有张床和像样的晚餐招待。所以，拜托，告诉他们，我会出国一段时间。我爱他们，但我必须保持宁静。”

无论那两个山羊头里装着的是怀疑或失望，欧斯特拉柯娃都用钱打发走他们。现在，她又是独自一人，手枪挂在脖子上。她在睡椅上舒展

身体，抬起臀部到一个勉强可以忍受的姿势。枪握在手中，指向门口，她可以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有两双脚，一双脚步重，一双脚步轻。

她喃喃地说：“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个个头胖，一双灰鞋脏……”

接着是敲门声，胆怯如孩提时的爱情表白。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带陌生口音的法文，缓慢而典雅，像她丈夫欧斯特拉柯夫一样，有着相同的温柔魅力。

“欧斯特拉柯娃夫人，请让我进去。我是来帮你的。”

欧斯特拉柯娃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她审慎地扣着已死丈夫那把手枪的扳机，迈着坚定但痛苦的步伐前进，走到门边。她横着蟹行前进，脚上没穿鞋子，而且并不信任那个鱼眼窥孔。她绝对不相信那个窥孔只能由里而外单向窥视。因此，她在房里迂回前行，希望能避开窥孔的视线。行经欧斯特拉柯夫那张模糊的照片时，她不禁深深怨恨他如此自私地早死，而不能活着保护她。接着她想：不，我已经渡过险境。我有了自己的勇气。

她的确有勇气。她正准备作战，每一分钟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分钟，但痛苦已消失，她的身体已准备好随时为葛利克曼而战，一直如此，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像援兵驰至般涌入她的四肢。她有葛利克曼在身边，她无须祈求，就能记起他的力量。她相信这是圣经的旨意，他永不匮乏的做爱，都是为了在此刻激励鼓舞她。她有着欧斯特拉柯夫的平静与欧斯特拉柯夫的荣誉，她有他的枪。但她奋不顾身、孤注一掷的勇气，毕竟是她自己所有的，这是一个被激怒、被剥夺而愤恨不已的母亲勇气。亚莉珊卓！来杀她的人，就是羞辱她秘密生女的那些人，就是杀了欧斯特拉柯夫与葛利克曼的那些人，如果她不能出手制止，他们也会杀了整个可怜的世界。

她只希望在开枪之前能瞄准目标，她知道，只要门还关着，锁链和窥孔还在原处，她就能非常近距离地瞄准——越近瞄准越好，因为她对自己的枪法实在不敢自夸。她把手指放在窥孔上，不让他们看进屋里，然后她把眼睛贴近，看他们在哪里。她首先看到的是她自己的那个笨蛋管理员，靠得非常近，在扭曲的镜片里活像个圆滚滚的洋葱，在楼梯平台瓷砖的光影照耀下，顶着一头绿色头发，一个巨大橡胶似的微笑和一个鸭嘴样的鼻子。欧斯特拉柯娃突然想到，那较轻的脚步声想必是她——轻快，就像痛苦与快乐，总是与先前或随后而来的事物息息相关。她看见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士，在窥孔的镜片里，肥胖得像米其林轮胎的大力士。在她观察他时，他一本正经地摘掉像屠格涅夫53小说里提到的草帽，握在身旁，像刚听到自己的国歌奏起时那样。她从这个动作推论，这个小个子男士是要告诉她，他知道她很害怕，也知道被盖住的脸孔是她最害怕的，因此，露出脸来，也是一种表达善意的方式。

他的静默与庄重，有一种忠实顺从的味道，就像他的声音，让她再

次联想起欧斯特拉柯夫；窥孔的镜片或许让他看起来像只青蛙，但无法扭曲他的举止。他的眼镜也让她想起欧斯特拉柯夫，他仰赖眼镜，一如跛子仰赖拐杖。心脏猛烈跳动，眼光却依旧冷静的欧斯特拉柯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仍然把枪抵在门上，手扣在扳机上，考虑着是否该在此时此刻，隔着门开枪杀他——“替葛利克曼报仇，替欧斯特拉柯夫报仇，替亚莉珊卓报仇！”

疑神疑鬼的她已准备相信，是他们刻意挑选了这个看来颇具仁慈风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欧斯特拉柯夫就是一个肥胖却不失高贵尊严的人。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最后终于决定回答，然后恐惧万分地观察他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就在她观察之时，那个笨蛋管理员却决定要径自开口大叫。

“夫人，他是个绅士！他是英国人！他很关心你！你病了，夫人，整条街的人都被你吓坏了！夫人，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己锁在里面。”停顿一下。“他是个医生，夫人。是不是，先生？有名望的精神科医生！”然后欧斯特拉柯娃听到那个白痴低声对他说：“告诉她，先生。告诉她，你是医生。”

但陌生人不赞同地摇摇头，回答说：“不，这不是真的。”

“夫人，开门，否则我要叫警察了！”管理员大叫，“苏联人，搞这种丑事！”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又说一次，更加大声。

但她心知肚明，比起其他任何事物，帮助，正是她此刻最需要的。没有帮助，她无法动手杀人，就像葛利克曼一样。即使是那个恶魔亲自出现在她眼前，她也无法杀任何女人的孩子。

在她持续的警戒中，那个小个子男人缓缓地跨前一步，让他的脸，活像在水里扭曲的脸，占满整个窥孔；她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上的疲惫，藏在眼镜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眼镜下方的沉重阴影；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热心关怀，无关死亡，而是关乎生存；她感觉到自己看见一张关切忧心的脸，而不是早已忘却悲悯为何物的脸。那张脸继续往前靠，信箱的啪嗒一声，几乎令她错误地扣下扳机，这让她不寒而栗。她感觉到手掌的痉挛，就在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突然住手，然后从门垫上捡起信封。这是她自己的信，寄给将军的信，她的第二封信，诉说：“有人想杀我”，用法文写的。但她仍不愿轻言相信，她宁愿怀疑那封信是个诡计，他们拦截了这封信，花钱买，动手偷，或使尽任何手段。但看见自己的信，认出开头的字句与绝望的语气，她顿时对尔虞我诈感到全然的厌倦，她厌倦不信任，厌倦在满心期待善意之时犹不断揣度恶意。她又听见那个胖男子的声音，学得很好的法文，但有些生疏，让她想起她从隐约记得的学校里学到的押韵诗。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言，那么这就是她一生中所听过最狡猾诡诈的谎言了。

“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

玛莉-克莱儿·吉勒姆在六点整打电话给丈夫，当时，吉勒姆正准备把他的密码簿锁回保险库。吉勒姆桌上有两线电话，一线理论上自动拨接外线，另一线则必须通过大使馆的总机转接。玛莉-克莱儿打的是外线，他们之前曾说好，只有在紧急状况才能这么做。她说的是法文，这是她的母语，但他们最近都以英文沟通，以增进她英文的流畅程度。

“彼得。”她说。

他立即感觉到她声音中的紧张。

“玛莉-克莱儿？怎么了？”

“彼得，有人在这里。他要你马上回来。”

“谁？”

“我不能说。这很重要。请马上回家来。”她再说一遍，就挂了电话。

电话进来时，吉勒姆手下的头号办事员安斯崔瑟先生，正站在保险库门口，等候他旋转暗码锁，好插上两把他们两人分别保管的钥匙。透过通向吉勒姆办公室的门廊，他看见吉勒姆重重摔下电话，而他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吉勒姆把东西丢向安斯崔瑟——很远的一扔，可能有十五英尺——那是主任最神圣的个人钥匙，几乎等同于他职位的象征。安斯崔瑟奇迹似的接住了，伸出左手，用手掌接住，像个美国棒球球

员；即使试上一千次，他也无法再次做到，他后来告诉吉勒姆说。

“在我打电话给你之前，别离开一步。”吉勒姆叫嚣道，“你坐我的位子，还有，管那些电话。听到了吗？”

安斯崔瑟听到了，但吉勒姆已冲下大使馆可笑的旋转楼梯，闯进打字员、警卫和准备晚间鸡尾酒会的伶俐年轻人群中。几秒钟之后，他已坐在保时捷车上，发动发动机，像个赛车选手，在另一世他很可能真是赛车手呢。吉勒姆的家位于讷伊，在平常的日子里，驾着这辆跑车穿越拥挤的车潮，是颇令他快乐的，可以一天两次地提醒他无论大使馆的例行公务如何的单调乏味扭曲心灵，他周遭的生活如何令人厌烦、吵嚷不休，生活其实还是颇有乐趣的。他甚至还为自己驶过的这段距离计时。如果他走戴高乐大道，一路绿灯地顺畅通行，在傍晚的交通尖峰时间里，只花二十五分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在晚间较晚或早晨较早的时间，靠着车少路空和外交车牌之赐，他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十五分钟；但在尖峰时间，三十五分钟算是快的，四十分钟是家常便饭。这天傍晚，他脑海中盘旋着玛莉-克莱儿被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持枪挟持的画面，只花了十八分钟就开完全程。稍后警方向大使提出的报告指出，他闯了三个红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时速高达一百四十公里，但这些都是根据事后追溯所重建的经过，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能追上他。吉勒姆自己对这段驾驶的过程也不太记得，他只记得一辆幸运的厢型车逃过一劫，还有一个疯狂的单车骑士，在吉勒姆距他背后一百五十米时突然想到要左转，才得以死里逃生。

他的公寓在一幢大别墅的三楼。他在入口处重重踩下煞车，熄掉发动机，在门外的街道上停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大门。他预期会有辆车停在附近，或许还会有一个准备接应逃跑的驾驶员在车上等候，但眼前什么都没有，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卧房的灯光亮着，所以他想像现在玛莉-克莱儿嘴里塞着布、被绑在床上，而绑匪就坐在她身边，等着吉勒姆到家。如果他们要的是吉勒姆，吉勒姆并不打算让他们失望。他赤手空拳地回来；他别无选择。圆场的管家们对武器恐惧到极点。他非法持有的那把左轮枪锁在床头柜里，现在，想必已被绑匪发现了。他悄然无声地爬上三楼，在门口，脱下外套，丢在身旁的地板上。他手中握着钥匙，轻轻地把钥匙插进锁孔，然后按下电铃，透过信箱孔叫道：“邮差”，接着又叫：“限时专送！”他的手握在钥匙上，等待脚步声靠近，这样他立即就会知道那不是玛莉-克莱儿的脚步声。缓慢，甚至有些沉重，听在吉勒姆耳里，显得非常有自信。脚步声从卧室的方向走来。他下一步的动作必须一气呵成。他知道从室内打开门有两个步骤：首先要卸下门链，接着再把弹簧锁解开。吉勒姆蜷伏着身子，等到听见门链滑动的声音，才用上他出其不意的武器：他转动手中的钥匙，使尽全身的力气往门顶去。此时，他很得意地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被他撞得往后踉跄，把门口的镜子撞得从墙上掉下来。当吉尔曼抓住那人的手臂，恶狠狠地制服住对方之后，却只看见他一生的良师益友乔治·史迈利那张吃惊的面孔正无助地凝视着他。

这次会面余波荡漾，吉勒姆描述得语焉不详；当然，他事先不知道史迈利要来，而史迈利，或许是怕有麦克风，在公寓里也没对他多作说明。玛莉-克莱儿在卧房里，但嘴里没塞布，手也没被绑；欧斯特拉柯娃，仍然穿着她的黑色洋装，在玛莉-克莱儿的坚持之下，躺在床上。玛莉-克莱儿用尽所有想得到的方法来照料她：鸡胸肉冻，薄荷凉茶……所有她为自己分娩那天所准备的养病餐点——当然分娩的日子还远得很，但吉勒姆也可能卧病啊。吉勒姆注意到欧斯特拉柯娃（虽然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似乎被打了一顿。她的眼睛和嘴唇周围有大片的淤青，手指也被砍伤，显然是为防卫而受伤。在让吉勒姆看见这个场景——一个忧心的娃娃新娘照料被饱揍一顿的妇人——之后，史迈利很快就把他拉进客厅，以老长官的权威（史迈利过去的确是吉勒姆的顶头上司）提出要求。直至此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吉勒姆先前的匆忙急促才有了正当性。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提到她时只说是“我们的客人”）必须在今夜离开巴黎，他说。在奥尔良门外的安全房舍（他称之为“我们的乡间宅邸”）不够安全；她需要其他可以提供照顾与保护的地方。吉勒姆记得有一对住在阿拉斯的法国夫妇，一个退休的情报员和他的妻子，过去曾为圆场偶然过境的候鸟提供庇护所。史迈利同意由吉勒姆打电话给他们，但不能从公寓里打，史迈利要他去找公共电话亭。在吉勒姆作好必要的安排之后回来时，史迈利用玛莉-克莱儿印着小兔吃草图案、可爱得惊人的便条纸，写好了一个简短的信息，要吉勒姆立即传送给圆场，“交给索尔·恩德比本人，由你亲手译码”。史迈利坚持要吉勒姆先读过内文（但别出声），内文是对恩德比提出礼貌的请求：“为了您无疑已获悉的第二桩死亡事故”，四十八小时之后在班的地方见面。吉勒姆完全不知道班的地方在哪里。

“还有……彼得。”

“嗯，乔治？”吉勒姆说，仍然一片茫然。

“我想，应该需要一本派驻本地外交人员的官方名录。你该不会刚好有一本在家里吧？”

吉勒姆的确有。事实上，玛莉-克莱儿就靠这本名录过日子。她完全无法记住人名，所以名录就摆在卧室的电话旁，以备有外交使节团的成员打电话邀请她去喝茶、吃饭，或最恐怖的，参加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吉勒姆取来名录。等了一会儿，他越过史迈利的肩头往下看。“基洛夫，”他跟随着史迈利的拇指指甲往下读，“基洛夫，奥雷格，二等秘书（商务），未婚。”后面跟着的地址是苏联大使馆位于第七区的住宅。

“你碰过他吗？”史迈利问。

吉勒姆摇摇头。“好几年前我们曾盯过他。但已标明‘罢手’了。”他回答说。

“这本名录是什么时候修订的？”史迈利问。答案就在封面上：前一年的十二月。

史迈利说：“很好，你到办公室时——”

“我会查一下档案。”吉勒姆允诺。

“还有这个。”史迈利交给吉勒姆一个普通的信封袋，吉勒姆后来打开看，发现是几卷录音带与一个厚厚的棕色信封。

“请用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邮袋54。”史迈利说，“与电报相同的等级。”

留下继续翻阅名单的史迈利，和两个隐遁在卧房的女士，吉勒姆火速赶回大使馆，解除了安斯崔特呆守电话的任务，把信封袋交给他，执行史迈利的指令。吉勒姆也感染了史迈利的紧张情绪，汗流浹背。他认识乔治这么多年，他事后说，从没看过乔治这么内敛沉潜、这么心无旁骛、这么语带保留、这么奋不顾身。他重新打开保险库，亲自译码拍送电报，然后等待总部收到电报的回复，之后又抽出苏联大使馆动态的档案，浏览着过去为数众多的监视名单。他的搜寻并没花很多时间。第三篇，抄送伦敦的档案，载明了他必须知道的所有资料。基洛夫，名奥雷格，二等秘书（商务），但这次的婚姻状况却是“已婚，但妻子未随同赴任”，两周前已返回莫斯科。在备注栏里，法国联络单位注明，苏联方面的情报来源指出，基洛夫“突然被苏联外交部召回，准备接掌一个意外出缺的资深职务”。定例举办的告别宴会，也因此不便举行。

回到讷伊，史迈利异常沉默地接收吉勒姆的情报。他似乎并不惊讶，但却有些骇然。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那时他们已全部坐在车上，快速驶往阿拉斯——他的声音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是了，”他说，仿佛吉勒姆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了。这当然就是他的目的，不是吗？他一定要用升职的理由召回基洛夫，才能保证他会真的回国。”

吉勒姆，说无疑有着后见之明的智能，说自从那夜揭发了比尔·海顿的真面目之后，乔治从没用过这样的语气说话；比尔·海顿，卡拉的走狗，安恩的情人。

欧斯特拉柯娃回想起来，对那夜发生的事不太记得，对那趟她设法睡着的汽车旅程也不太记得，甚至第二天早晨她很晚醒来之后，那个矮胖男子对她耐心但持续的询问，她也记得不甚清楚。也许，她当时暂时失去了感知能力，进而也失去了记忆的能力。她回答他的问题，她对他心怀感激，她给他和她给魔术师相同的信息，不加油添醋，也不卖弄风情，虽然大部分他似乎都已知情。

“那个魔术师，”她提起过，“死了。天哪。”

她探询将军的情况，但对史迈利的不置可否却不甚在意。她想着欧斯特拉柯夫，接着是葛利克曼，现在则是魔术师，而她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主人夫妇对她很好，但也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天下着雨，她无法看见远方的田野。

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欧斯特拉柯娃逐渐让自己安于这田园式的冬眠生活。隆冬提早降临，她让冬雪拥抱着她。开始只是稍微走动，随后四处游走，每天很早就寝，很少说话，在身体逐渐复原时，她的精

神也日益康复。起初，一种情有可原的困惑情绪笼罩着她的心，她发现自己不时想起女儿，想她就像那个懦弱的陌生男子描述的那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太妹，无法驯服的造反分子。接着，慢慢的，整件事的逻辑逐渐呈现在她眼前。她知道，在某个地方，真正的亚莉珊卓就像以前一样存在且生活着。或者，像以前一样，已不存在了。但无论亚莉珊卓在或不在，那个陌生男子的谎言指的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家伙，一个为他们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她甚至会想像，她的女儿，如果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对他们的计谋一无所知，并以此来自我安慰。或许，袭击她的伤痛——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发挥了长年祈祷、担忧所无法达成的效果，涤清了她对亚莉珊卓的自责。她在闲暇的时光里，哀悼着葛利克曼，她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孑然一身，但在这冬日景色里，孤独却不令她难受。一位退休的陆军准将向她求婚，但她婉拒了。后来发现，他向每个人都求婚。彼得·吉勒姆每周至少来探望她一次，有时他们会一起散步个一两小时。他以完美的法文和她谈论庭园造景，这是他拥有丰富相关知识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欧斯特拉柯娃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后的生活。她消磨着时光，浑然不知自己写给将军的第一封信已引发了一连串的后果。

“你知道他的名字真的叫傅格森？”索尔·恩德比以懒洋洋的贝尔格维亚55伦敦腔缓缓地说，这可是英国上流阶级仅存的粗俗遗风。

“我从不怀疑。”史迈利说。

“他可能是我们在点路灯组硕果仅存的人了。现在，聪明人都不做这种内部监视的工作。反政党或别的什么该死的事。”恩德比继续研究他手上的那一大叠文件。“那么，你的名字是什么，乔治？夏洛克·福尔摩斯追索他可怜的老莫里亚蒂56？还是亚哈船长在追他的白鲸57？你是谁？”

史迈利没回答。

“我得说，真希望我有个敌人。”恩德比评论说，翻过几页，“我花了老长时间，想找一个敌人。是不是啊，山姆？”

“夜以继日地找，长官。”山姆·科林斯衷心赞同，对他的上司露出信任的笑容。

班的地方是骑士桥58一家阴暗旅馆后面的房间。一小时之前，这三个男人在此见面。门上的标示写着“私人专用”，里面先是一间摆放外套、帽子与隐私的前房，再里面则是这间满是书籍与麝香的橡木镶嵌密室，屋后一块长方形的庭院，其实是公园，有鱼池、大理石天使和一条适于沉思漫步的小径。班的身份，如果他曾经有过的话，早已遗失在圆场口耳相传的神话里了。但他遗留的这个地方，是恩德比以及在他之前的乔治·史迈利登记无案的约会处所，同时也是召开事后一概否认的秘密会议的地点。

“我要再看一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恩德比说，“每到这个时间，我的理解力就变得有些迟钝。”

“我想这应该会很有帮助，真的，长官。”科林斯说。

他调整了他那副只有半个镜片的眼镜，但却是从眼镜上方往外看。史迈利秘密揣测，他那副眼镜可能只是平光镜片。

“都是基洛夫在说话。这是在莱比锡咬紧他之后，对不对，乔治？”史迈利淡淡地点头。“他们还脱着裤子，在妓院里。但时间已经是清晨五点，女郎已经都被打发回家了。首先我们听到基洛夫哭丧地说：你怎么对我做这种事？‘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奥图！’他说。老天，他可选错朋友了！接着是他的自白，几个翻译写出来的英文可真是拙劣。不过倒是挺一致的——那些字，乔治？嗯嗯啊啊的全省略了！”

史迈利没有任何回应，无论是言语还是动作。或许也没人期待他会回答。他静静地坐在扶手皮椅中，身体前倾靠在合拢的手掌上，他没脱掉身上那件棕色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套基洛夫录音带的抄本压在他手肘

下。他凝神注视，后来恩德比说，他看起来像在国会里。山姆·科林斯，执行处长，非常守本分地坐在恩德比的阴影里。他蓄着黑色的髭须，脸上挂着随时准备好的矫情微笑。有一段时间，科林斯曾是圆场里的硬汉，多年的实战经历，让他鄙视五楼的空口清谈。而今，他已从盗猎者变成猎场的看守者，小心呵护着自己的退休金与安全，一如当年小心呵护他的网络一般。他身上尽是挥之不去的漠然；他抽着棕色的香烟，但都只抽到一半，就按熄在一个碎裂的贝壳里，而他像狗似的目光则忠实地停驻在他的主人恩德比身上。恩德比自己倚站在法式窗的窗台边，户外的光线照出他侧面的剪影。他正用一根火柴棒剔着牙。一条丝质手巾从他的左边衣袖露出来。一个膝盖微微向前弯曲，仿佛是站在阿斯科特马场的会员专属围栏里。庭院里，点点雾气洒落，宛如一张精美的薄纱披覆在草地上。恩德比回过头，像拿起菜单一样拾起文件。

“我们开始吧。我是基洛夫。‘从一九七〇到一九七四年，担任莫斯科中央的财务官员，我的任务是揭发海外驻处的不法账目，并讯问涉嫌的人。’”他停顿下来，目光又从眼镜上方露出来。“这是基洛夫派驻巴黎以前的事，对吧？”

“完全正确。”科林斯热切地说，瞥了史迈利一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落空了。

“我只是要把事情弄清楚，你知道的，乔治。”恩德比解释说，“把我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理清楚。我没有你那种小小的灰色细胞59。”

对于长官表现出的谦逊，山姆·科林斯会心一笑。

恩德比继续念：“我执行这些极为敏感且机密的审问，在部分案子里，还让莫斯科中央的资深官员遭受惩处，我也因此认识了隶属于共党中央委员会，独立的第十三情报处首长。我通过莫斯科只知道他的化名叫卡拉。这是个女人的名字，听说是他第一个线民的名字。’没错吧，乔治？”

“那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事。”史迈利说。

“伟大的战场。嗯，好吧，让我们继续。‘第十三处是莫斯科中央的独立单位。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招募、训练、派遣非法的情报员渗透到法西斯主义国家，称为鼯鼠……通常鼯鼠在从事情报工作之前，要花上许多年在目标国之中找到潜伏的位置。’该死的比尔·海顿。‘对这些鼯鼠提供服务的，并不是一般的海外驻馆，而是卡拉的代表。就他所知，通常是一位军官，正式的职衔是大使馆的武官。这些代表都由卡拉亲手挑选，也都是精英……享有其他官员所没有的信任度与自由，可以旅行，也有钱。因此，他们也成为其他人嫉妒的对象。’”

恩德比假装叹一口气：“老天爷，这些翻译！”他叫道，“或者只是基洛夫太过无聊了。你想，一个人要做临终告白，一定会是很简短的，对不对？但我们的基洛夫可不一样，绝不。你还好吧，山姆？”

“很好，长官，很好。”

“我们继续吧。”恩德比说，重拾起他行礼如仪的声音，“在我查访财务不法行为的过程中，卡拉一个手下的廉洁受到怀疑，他就是驻里斯本奥罗夫上校。卡拉用他自己的人组成一个秘密法庭来审理这个案子，结果，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我的被告奥罗夫上校就在莫斯科被清算掉了。’查证过了，你说，山姆？”

“我们有一份未经证实的投诚者报告，说他是被行刑队枪决的。”科林斯轻松地说。

“恭喜，基洛夫同志，侵吞公款者之友。天哪。真是个毒蛇窝，比我们还惨。”恩德比继续念，“因为我把罪犯奥罗夫绳之以法，所以卡拉亲自向我道贺，也要我发誓保密，因为他觉得奥罗夫上校的不法行为是他们十三处的耻辱，会危及他在莫斯科中央的立场。大家都公认卡拉是对清廉有非常高标准的同志，也因此，在自我放纵的阶级里有许多敌人。”

恩德比刻意停顿下来，从他那有半个镜片的眼镜上方再次瞥着史迈利。

“我们都在作茧自缚，对不对，乔治？”

“我们是一群自寻死路的蜘蛛，长官。”科林斯言切由衷地说，在他们两人之间闪出更耀眼的微笑。

但史迈利专注地看着基洛夫的自白，对他的玩笑毫不理会。

“跳过基洛夫第二年的生活与爱情，我们直接来看他和卡拉的下一次会面。”恩德比无惧于史迈利的沉默，提议说，“夜间的召唤……这是标准做法，我想。”他翻过几页。史迈利也跟着这么做。“一辆车停在基洛夫莫斯科的寓所外——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大家一样说是‘公寓’呢，真是可以了——他被从床上拉起来，载往未知的目的地。他们过着怪异的生活，是不是，这些莫斯科中央的大猩猩，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面奖章还是一颗子弹？”他又回头看报告，“这些都符合，对不对，乔治？车程和内容？一个半小时，搭车、小飞机，等等。”

“第十三处有三或四个设施，包括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大型训练中心。”史迈利说。

恩德比翻过几页。

“这里，基洛夫又谈到卡拉的出现了，在中间的部分，同一个晚上。基洛夫和卡拉独处。小木屋，修道院式的气息，没有装饰品，没有证人——什么都看不见。卡拉开门见山。基洛夫想不想派驻巴黎？基洛夫很想要，长官——”他翻过一页，“基洛夫一直很敬佩第十三处，长官，等等——一直都是卡拉忠实的信徒——卑鄙小人，逢迎巴结，卑鄙小人。就和你一样，山姆。很有意思的是，基洛夫认为卡拉看起来很累——注意到这一点了吗？——烦躁不安。卡拉很紧张，抽烟抽得像根烟圈。”

“他一直都这样。”史迈利说。

“都怎样？”

“他一直都是老烟枪。”史迈利说。

“是吗？他真的这样吗？”

恩德比又翻过一页。“现在，基洛夫比较简单扼要了。”他说，“卡拉对他详细说明。‘表面上，我是大使馆的商务官员，实际上，我的特殊任务是负责控管第十三处外站的财务账目，范围包括几个国家……’基洛夫列出全部的地点，也包括波恩，但没有汉堡。跟得上吗，山姆？”

“没问题，长官。”

“你没被这些复杂的内情搞迷糊吧？”

“一点都没有，长官。”

“聪明的家伙，这些苏联人。”

“可厉害呢。”

“基洛夫又说：‘他让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重要——等等——提到我在奥罗夫的案子里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而且因为我处理的是非常敏感的事务，所以我应该直接对卡拉的私人办公室报告，同时有一套特殊的密码……’翻到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长官。”科林斯说。

史迈利早已翻到了。

“除了担任第十三处外馆的稽核工作外，卡拉也预先告知，我还要负责执行特定的秘密任务，例如寻找掩护基地，或替未来的情报员安排身世背景。他处里的成员都负有这样的任务，他说，但出身背景的工作是非常机密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和其他人谈论，无论是我的大使，还是卡拉派驻在巴黎大使馆的代表普丁少校，都不可以。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并参加了安全与通讯方面的特别课程，然后赴任。我到了巴黎很久之后，才接到卡拉亲自下达的指令，要我替一位年约二十一岁的女情报员，紧急安排背景故事。’现在，我们可讲到重点了。”恩德比很满意地说，“‘卡拉的指令里提到几个移民家庭，说他们可能会愿意在压力下接纳一位情报员当他们的女儿，因为卡拉认为勒索是比贿赂更好用的手法。’他妈的真说对了。”恩德比由衷赞同，“在现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时代，勒索是惟一任何时候都有效的东西。”

山姆·科林斯不吝发出欣赏的笑声。

“谢谢你，山姆。”恩德比愉悦地说，“非常谢谢你。”

一个重要性比不上恩德比的人，或者是较不肤浅的人，对下列几页可能会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因为主要的内容印证了三年前康妮·沙赫斯与史迈利认为应该善加利用莱比锡与基洛夫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

“基洛夫很尽责地一一寻访移民，但毫无所获。”恩德比宣称，仿佛他正在念的是电影字幕，“基洛夫根本就不行，是不是，乔治？”他说。

“是的。”史迈利说。

“卡拉不能相信他自己的人，这是你的重点。他得到外面去找一个像基洛夫这种非正规军。”

“没错。”

“一个乡下老粗。这种家伙绝对进不了沙拉特。”

“一点都没错。”

“他创设了自己的组织，换句话说，训练他们来接受他铁的纪律。你可能会说，他没胆用这个组织来进行他的特别勾当。这是你的重点？”

“没错，”史迈利说，“这是我的重点。”

因此，当基洛夫在飞往维也纳的飞机上碰见莱比锡——恩德比重拾话题，回到基洛夫的自白——莱比锡的出现，响应了他所有的祷告。尽管他现在以汉堡为根据地，尽管在塔林有段不堪的过去，但都不要紧：奥图是个移民，是那些团体里的一员。金童奥图。基洛夫紧急向卡拉呈报，建议吸收莱比锡，负责侦察移民与情报来源。卡拉同意了。

“这又是一件怪异的事，如果你仔细推敲的话。”恩德比评论道，“老天爷，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冷静而且心智健全的人，怎么可能找上莱比锡这个麻烦？特别是像这样的工作？”

“卡拉有很大的压力。”史迈利说，“基洛夫这样说，我们从其他地方也得到印证。他赶时间，必须冒一些风险。”

“像是杀人之类的？”

“那是最近的事。”史迈利说，虽然恩德比看他的目光非常锐利，但他的语调却是一派轻松宽容的态度。

“你他妈的已经谅解那些时日的事了，是不是，乔治？”恩德比满腹怀疑地说。

“我？是吗？”史迈利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很不解，“你说了算，索尔。”

“他妈的懦弱。”他回到录音抄本上。“第二十一页，我们稳操胜券。”他读得很慢，以示特别强调这一页。“第二十一页。”他又说一次，““在成功地吸收了欧斯特拉柯娃，并让法国核准她女儿亚莉珊卓的入境申请之后，我接到指令，每个月从巴黎的预算中拨出额外的一万美金，供这个新鼯鼠之用，她的化名是蔻梅特。这位情报员蔻梅特在处里享有最高等级的保密措施，所有关于她的通讯事项都必须亲自送交处长，使用个人对个人的密码，不通过任何中间人。而且，此类的通讯最好是通过信差送达，因为卡拉反对经常利用无线电。”这是真的吗，乔治？”恩德比随口问道。

“就因为无线电，我们才能在印度逮到他。”史迈利仍埋头抄本，回答说，“我们破解了密码，后来他发誓说，他再也不用无线电。但就像大

部分的诺言，是时时可能修正的。”

恩德比咬下一截髭须，然后用手背抹了抹。“你想脱掉外套吗，乔治？”他说，“山姆，问他要喝什么。”

山姆问了，但史迈利太专注于抄本，根本没回答。

恩德比又开始大声朗诵：“我也接获指令，必须确定蔻梅特的资料不会出现在西欧的年度账目中。身为稽核，每年会计年度结束时，我必须在账目上签字，送给卡拉，再提交莫斯科中央……不，我从来没见过情报员蔻梅特，我也不知道她的现状，或她在哪一个国家活动。我只知道她用亚莉珊卓·欧斯特拉柯娃的名义，成为归化的法国公民之女……”又翻过几页，“每个月一万美元的津贴，并不是由我本人送交，而是转账到瑞士波恩省图恩的一家银行。钱是转给一位阿道夫·葛拉瑟博士。葛拉瑟博士是名义上的账户所有人，但我相信，葛拉瑟博士只是卡拉派驻在波恩苏联大使馆人员的化名。他的本名是格里高利耶夫。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有一次我寄钱到图恩时，银行出了差错，钱没汇到；卡拉知道之后，就命令我在银行还继续追查时，立即再汇一次钱给格里高利耶夫本人。我照指示办理，事后再归还多汇出的钱。我知道的就只有这样。奥图，我的朋友，我求你保守秘密，他们可能会杀了我。‘他说的真是他妈的没错。他们是做掉他了。’恩德比把抄本摔到桌上，发出沉沉的声响。“基洛夫最后的遗嘱与遗言，你可能会这么说，就是这个，乔治？”

“没错，索尔。”

“真的不喝点东西？”

“谢谢你，我很好。”

“我还得要再仔细推敲一下，因为我很笨。看看我的算术，一点都比不上你。看好我的每一个动作。”像拉康一样，他举起苍白的手，张开手指，准备开始数数儿。

“第一，欧斯特拉柯娃写信给瓦拉狄米尔。她的信唤起了陈年旧事。或许米凯尔拦截了这封信，也看过了，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可以拷问他，但我怀疑会不会有用，而且这样做，不就是对卡拉打草惊蛇吗？”他抓起第二根手指。“第二，瓦拉狄米尔把欧斯特拉柯娃来信的影本寄给奥图·莱比锡，要他赶快重新拉拢和基洛夫的关系。第三，莱比锡赶到巴黎，去看欧斯特拉柯娃，然后到他亲爱的兄弟基洛夫身边，引诱他到汉堡——基洛夫可以自由出入汉堡，毕竟莱比锡在卡拉的名册上还是基洛夫的线民。现在，有一个问题，乔治。”

史迈利等待着。

“在汉堡，莱比锡把基洛夫给烧成灰了，对不对？证据就在我们汗涔涔的手上。但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做到的？”

史迈利是真的不明白，或者他只是想让恩德比更加一把劲？无论如

何，他都选择将恩德比的问题当成一句修辞。

“莱比锡到底是怎么逼他的？”恩德比追问，“压力是什么？下流照片——嗯，很好。卡拉是个清教徒，基洛夫也是。但我的意思是，老天爷，这不是五十年代，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偷偷放纵一下的自由，不是吗？”

史迈利对苏联的风俗没多作评论；但关于压力，他很清楚卡拉的看法。“他们的伦理观念和我们不同。笨蛋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认为自己比苏联人更敏感脆弱，事实却非如此。这绝对不是事实。”他对此似乎非常确定。他似乎已对这件事重新思考过了。

“基洛夫既无能力，也不够慎重。光不够慎重这一点，卡拉就可以毁了他。莱比锡有这个证据。你可能会记得，在我们刚开始部署对付基洛夫的行动时，基洛夫曾喝醉了酒，说溜嘴卡拉的事。他告诉莱比锡说，卡拉亲自命令他替一个女情报员编造身世背景。当时你不信这个故事，但这是真的。”

恩德比不是个会脸红羞愧的人，在从口袋掏出另一根火柴棒之前，他仍勉力挤出一个笑容。

“他搬了石头，总会砸到自己的脚。”他有感而发，但不知他指的是自己，还是基洛夫。“‘告诉我们其余的部分，兄弟，否则我就把你告诉我的话说给卡拉听。’小奥图对这只臭虫说。老天，你说得没错，他真的抓住基洛夫的小辫子了！”

山姆·科林斯鼓起勇气，插嘴打圆场。“我想，乔治的观点与第二页所提到的非常吻合，长官。”他说，“里头有一段，莱比锡确实提到‘我们在巴黎的讨论’。奥图那时就已经把刀架上基洛夫脖子了，毫无疑问。对不对，乔治？”

但山姆·科林斯仿佛是在另一个房间说话似的，因为他们两人完全没注意。

“莱比锡也有欧斯特拉柯娃的信。”史迈利补充说，“信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指证基洛夫。”

“另一件事。”恩德比说。

“什么，索尔？”

“四年了，对不对？从基洛夫开始和莱比锡接触，已经有四年了。突然之间，他找上欧斯特拉柯娃，想做相同的事。四年之后。你认为这些年来，为了相同的理由四处游荡，却毫无进展？”

史迈利的回答却是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我们只能假设，卡拉的要求撤销了，然后又重新提出。”他说得一本正经，而恩德比也知道不能逼他。

“重点是，莱比锡把基洛夫烧成灰，然后让瓦拉狄米尔知道他做到了。”恩德比又伸出手指来，继续数数儿。“瓦拉狄米尔派伟林去当信

差。在此同时，消息也传回莫斯科，也许是卡拉发现事有蹊跷，也许是米凯尔去告密，比较可能是米凯尔搞的鬼。无论如何，卡拉以升职为借口召基洛夫回国，然后吊起来拷打。基洛夫很快就全招了，要是我也会这样。卡拉想把牙膏挤回管里。在瓦拉狄米尔带着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来赴我们的约时，把他给杀了。杀了莱比锡。但在那位老妇人门口布哨，却搞砸了。他现在的心情如何？”

“他正坐在莫斯科，等着福尔摩斯或亚哈船长来追上他。”山姆·科林斯用他圆滑似天鹅绒的声音说，又点燃了一根棕色的香烟。

恩德比却不觉得有趣。“那么，卡拉干吗不挖出他的宝藏，乔治？放在其他地方？如果基洛夫向卡拉坦诚他对莱比锡说出实情，卡拉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湮灭行迹啊！”

“也许宝藏无法移动。”史迈利回答说，“也许卡拉已别无选择。”

“但是，如果让银行账户保持原封不动，简直就是疯了。”

“就是疯了才会用像基洛夫这种笨蛋。”史迈利说，但语气并不似平常一般严厉，“就是疯了才会让他吸收莱比锡，疯了才会让他找上欧斯特拉柯娃，疯了才会相信杀掉三个人就能滴水不漏。我们不能认为他神志清醒。为何会如此呢？”他停顿了一下，“卡拉深信不疑，很显然的，否则格里高利耶夫不会还留在波恩。你说他还在，我猜？”他略瞥了科林斯一眼。

“到今天为止，他还坐得好好的。”科林斯说，脸上依旧是光鲜的笑容。

“那么，也不太可能采取移动银行账户的措施。”史迈利推断，“即使是个疯狂的人。”

非常怪异的——恩德比和科林斯事后都私下认为——史迈利所说的话，就像一阵寒风吹过房间；而他们虽不明究竟，却不由自主地遵循更高的行为准则，尽管他们完全无法胜任。

“那么，他的秘密女士到底是谁？”恩德比追问，“谁值得他每个月花上一万块，还赔上他的事业？让他不得不用笨蛋来代替他训练有素的刺客？一定是女孩！”

史迈利为何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又是个谜团，或许只能用他一向的拒人千里的态度来加以解释，也或许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天生的项目员，对于和合作无关的内情，坚持不向主管人员吐露。当然，他的决定必有逻辑可循。史迈利早已在心中问过自己，为何他的做法看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我自己的一生。”他的动机或许在此。“为何把残屑片断送到我的对手手中，只为了可以操纵我？”他可能又以为，非常客观地以为——恩德比像史迈利一样了解卡拉背景的复杂；即使并非如此，恩德比也还拥有苏联研究部门，可以彻夜探查，直到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史迈利还是不开口。

“乔治？”恩德比终于开口。

一架飞机低空掠过。

“这只是你要不要成果的简单问题。”最后史迈利说，“我看不出来其他事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性。”

“你看不出来，老天爷！”恩德比说，把他的手从嘴巴和髭须间伸出来，“噢，没错，我想要他。”他继续说，仿佛这只是半个重点，“我想要蒙娜丽莎，还有明年的爱尔兰讨厌鬼得主。我想要卡拉坐在沙拉特的电椅上，对着审问员招出他一辈子的故事。我想要美国表弟未来在我的掌控之下。我想要掌握全局，我当然想要。只要还没丢掉工作！”

但是，史迈利对恩德比的困境却很奇怪地漠不关心。

“拉康兄弟告诉你实情了，我猜？动弹不得的僵局和所有的一切？”恩德比问，“年轻、抱持理想主义的内阁，美苏关系小小的缓和，鼓吹开放的政府，所有这些蠢事？结束冷战的条件反射60？在白厅的每张床底下嗅嗅看有没有保皇党的同路人，特别是我们这里？他告诉你了吗？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们正准备签署英国与布尔什维克该死的和平协议，就在下一个圣诞节？”

“没有，没有，他没告诉我这个部分。”

“没错，他们是要这样做。而且我们不能从中破坏。提醒你，只要我们没照着做，那些击打和平大鼓的家伙就会鬼吼鬼叫。他们已经在问苏联的条件会是什么，现在就在问。一直都是这样吗？”

史迈利沉默良久，仿佛必须经过元老审判似的，迟迟才回答，“是的，我想一直都是这样。我想形式虽不同，却一直都是这样。”仿佛这个答案对他至关重要。

“真希望你警告过我。”

恩德比踱回房间中央，从餐具柜里为自己倒了一杯苏打水；他凝望着史迈利，目光似乎充满了犹豫神色。他望着史迈利，他转开头，又回头望，显然面对着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很棘手，长官，真的是。”山姆·科林斯说，但两人都没响应。

“这难道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邪恶伎俩，引诱我们走向最后的灭亡，你确定吗？”

“恐怕我们已经一文不值了，索尔。”史迈利露出歉然的微笑说。提起大英帝国堂皇威仪的穷途末日，恩德比并不在意。有那么一会儿，他的嘴角露出一抹酸涩的笑容。

“好了，老头，”最后他说，“我们到花园去吧。”

他们并肩而行。在恩德比颌首示意下，科林斯留在屋里。轻缓的雨滴在池塘漾起涟漪，也让大理石天使雕像在幽微的暮色里熠熠生辉。偶

尔，一丝微风拂过，悬挂枝头的水珠滴落草坪，也让他俩不免沾湿。但恩德比毕竟是个英国绅士，尽管有时雨滴只落在史迈利身上，他仍像雨水滴落自己身上一样出声咒骂。点点灯光洒在他们身上。从班的法式窗，照射出一格格黄色的长方形灯影，映在池塘上。而映在砖墙上的，则是一盏现代街灯病态的绿色光芒。他们沉默地走了一圈，恩德比才开口说话。

“你可给我们找了不少麻烦，真的，乔治。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伟林，米凯尔，托比，康妮。在你再次出发之前，可怜的老傅格森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填请款单。‘他从来不睡觉吗？’他问我，‘他从不喝酒吗？’”

“很抱歉。”史迈利说，只为了找话说。

“噢，不，你不抱歉。”恩德比说，突然停下脚步，“该死的鞋带。”他低声咒骂，弯腰绑鞋带，“麂皮的鞋总是这样，洞眼太少，这是个问题。你不会认为该死的英国人连洞眼的问题都处理不好吧？”

恩德比换一只脚站，抬起另一只脚。

“我要他这个人，乔治，听到了吗？给我一个活生生、会说话的卡拉，我会收下他，以后再来找借口。卡拉要求庇护吗？很好，嗯，当然，他一定反抗到底。在贤士们把枪上膛来对付我时，我已经从他身上得到足够的子弹来打倒他们了。给我这个人，其余免谈，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继续散步，史迈利走在后面，恩德比不断说话，却没回头。

“你难道从来没想过，他们也会逃过一劫。”他警告说，“当你和卡拉在莱辛巴赫瀑布61的悬崖上殊死决战，你用手勒住卡拉的脖子，而拉康兄弟却站在你背后，拉住你的衣角，告诉你说不能对苏联人太粗暴。你懂吗？”

史迈利说他了解。

“到目前为止，你逮住他的什么把柄了？滥用办公室设施，比如？诈欺。侵吞公共资金，就像里斯本那个家伙一样。海外的非法行动，包括几件暗杀工作。我猜，你可以找出满满一大本的罪行。再加上莫斯科中央那些善嫉的野兽，早就想找借口宰了他。他说得没错——他妈的勒索比贿赂好用多了。”

史迈利说，没错，看起来是这样。

“你会需要人手。保姆、点灯人，所有禁用的玩具。别告诉我这些，去找你自己的。钱是另一个问题。我可以在账目里支应你几年，就像那些小丑在财政上玩的把戏一样。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多少钱，我就会弄个卡拉给你，在账目上动些手脚。护照和现金呢？需要一些地址吗？”

“我想我可以应付，谢谢你。”

“我会二十四小时监视你。如果计划失败，就会酿成丑闻。我不要再

人来说告诉我，我应该派人盯你的梢。我会说，我怀疑你可能在瓦拉狄米尔的事件上不受控制，所以我决定派人查看你的行动。我会说，这整件事只是个失去冷静态度的老间谍，个人策划的行动的一部分。”

史迈利说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我可能无法在街上部署太多人，但我仍然可以监听你的电话，检查你的邮件，如果我想要的话，也可以在你的浴室里装窃听器。从星期六开始，我们就在监听。当然是什么收获都没有，但你又能期望什么呢？”

史迈利同情地点头。

“如果你神秘兮兮地突然出国，我就要往上呈报。我也得替你编个故事，好去造访圆场的登记处。你应该在晚上去，但他们可能会认出你，我还没想出该怎么说。”

“以前曾有委托制作组织内部服务沿革的计划。”史迈利解释说，“不对外公开，当然，只是一些延续性的记录，供新进人员和特定的联络工作人员参考。”

“我会寄给你一封正式的信。”恩德比说，“当然也会把日期提前。如果你在那栋大楼里滥用发给你的许可，可不是我的过错。基洛夫提到的那个在波恩的家伙，格里高利耶夫，商务领事。是那个拿到现金的家伙？”

史迈利似乎陷入沉思。“对，对，当然。”他说，“格里高利耶夫？”

“我猜他是你的下一站，是不是？”

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在那一瞬间，他俩都抬头观赏。

恩德比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叠折着的纸。“那么，这是格里高利耶夫的血统书，是我们目前所知的资料。他干净得像只哨子。非常稀有的那种人。以前是某家布尔什维克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员。老婆是个老魔女。”

“谢谢你。”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非常谢谢你。”

“祝福你，但我会全盘否认。”他们开始走向屋里时，恩德比说。

“谢谢你。”史迈利又说了一次。

“很抱歉，让你成为帝国伪善行动的工具，但事情就是这样。”

“别在意。”史迈利说。

恩德比停下脚步，让史迈利赶上来走在他身边。

“安恩还好吧？”

“很好，谢谢你。”

“你有多少——”他不再往前走。“这么说吧，乔治，”他深吸了一口夜凉的气息，说，“在这件事上，你是因公，或是为了娱乐？哪一种？”

史迈利的回答姗姗来迟，而且迂回间接：“我从未想过娱乐，”他说，“或者，我的意思是，我从未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卡拉仍然保有她给你的那个打火机？这是真的，对不对？那次你到德里去看他——想劝他投诚——听说他偷了你的打火机。他还拿着，对不对？仍然在用？真是令人不快，我会去找回来，如果那是我的。”

“那只是普通的隆森牌打火机。”史迈利说，“应该还在，它很耐用，不是吗？”

他们分手，没道再见。

在与恩德比见面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史迈利发现自己在进行诸多准备工作的同时，有着复杂与多变的情绪。他并不平静；简单来说，他并不能以单纯的一种身份来加以界定，尽管他的决心历久弥坚。猎人，隐士，爱人，追求完成目标的遗世孤独者，大赛局机敏的参赛者，复仇者，寻求安心的怀疑者——这些角色轮流交替出现在史迈利身上，有时甚至是多种角色同时出现。在后来记得他的那些人之中——老孟德尔，那个退休的警察，他少数的知己之一；葛瑞太太，那家只提供男士留宿与早餐的朴素旅馆的房东太太，为了安全，他选择位在宾利可的这家旅馆当临时总部；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化名班纳堤，杰出的阿拉伯工艺品交易商——他们最记得的是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平静沉着，少言少语。他们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因着他们对他了解程度的不同，也因着他们自己人生体验的差异。

孟德尔，这个安适、寡言、观察力敏锐、以养蜂为嗜好的人。很直率地说，史迈利是在为他的背水一战调整步伐。孟德尔曾参加业余的拳击赛，在分区赛中打中量级，他说他看得出来比赛前夕的征兆：严谨稳健的态度，了然于胸的孤寂感觉，还有他称之为凝视的表情，他认为那是史迈利正在“思考他手上的牌”。孟德尔似乎偶尔收留他，给他饭吃。尽管孟德尔有敏锐的觉察力，却也没能注意到他的其他面貌：困惑混乱，常被搪塞解释为社会约束；常用随便什么借口偷偷溜走，仿佛突然之间，安坐不动变得太过冗长难耐，仿佛他需要做些动作，来逃避自己。

对房东葛瑞太太来说，很简单，史迈利就是个失去亲人而悲伤孤独的人。她对她的背景来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姓“罗瑞莫”，是个退休的图书馆员。但她告诉其他的房客说，她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曾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他才会不吃他的培根，才会经常独自外出，才会开着灯睡觉。他让她想起她父亲“在我母亲离开之后的样子”。这就是葛瑞太太的观察，在两桩暴力死亡事件紧紧缠绕史迈利之后，有一阵风雨暂歇的平静，尽管史迈利并未放缓速度，反而更加快脚步。她说他心情烦乱，也说对了，因为他总在许多小事情上不断改变心意；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史迈利发现生活中越琐碎的小事越难下定决心。

另一方面，与史迈利交往较深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则采取了较了解内情的观点；同时对于重返战场，托比自己也难掩兴奋之情。想到要与卡拉“殊死决战”，他坚持要这么形容，托比就像变了一个人。班纳堤先生成为如假包换的国际人士。整整两个星期，他穿梭在欧洲寒碜的城乡镇巷，寻找各具专长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怪异兵团——有街头艺术家，有货真价实的小偷，有司机，有摄影师——而且每一天，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会以事先约定的暗号，打电话到离史迈利寄宿处不远的几个不同电话亭，报告他的进度。如果托比途经伦敦，史迈利就会开车到机

场的旅馆，在已然熟悉的房间里，听取报告。乔治——托比如是说——正在做的是“Flucht nach vorn”，无人能精确加以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向前杀出一条生路”，但当然隐含有奋不顾身的意思，也指背后犹有弱点，即便不是真正背水一战。但背后的弱点何在，托比就说不出所以然了。“听着，”他会说，“乔治总是很容易受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得越多，眼睛里的痛苦也就越深。乔治看得太多了，或许。”他又说——这句话后来已成为圆场的流传经典——“乔治的帽子底下有太多头了。”另一方面，对他的领导才能，托比倒是深信不疑。“极度小心谨慎。”他充满敬意地说，小心谨慎到查核托比的预付款时，连一毛钱的错误也不放过，害他平白受罚。乔治很紧张，他说，像大家一样；而当托比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团队到波恩这个目标城市时，他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最高点，非常非常谨慎地展开猎杀的第一步。“他太注重细节。”托比抱怨说，“他恨不得能和我们一起站在街头。身为项目负责人，他发现很难委派别人去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甚至当团队都已整備，分派好任务，完成演练，身在伦敦基地的史迈利仍坚持要有三天不活动的时间，让每个人都“适应城市的温度”，去用当地的服装和交通工具，并演练通讯系统。“我们必须步步为营，托比。”他一再焦虑地说，“每平安度过一个星期，卡拉就会觉得更安全。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卡拉就会惊惶，我们也就完了。”在第一次行动结束之后，史迈利召回托比，再次听取报告。“你确定没有眼神交会吗？你试过各种方式了吗？你需要更多车、更多人手吗？”然后，托比说，他又从头演练一遍，利用街道图和目标房舍的照片，清楚明确地说明，应该在哪里布置静态的岗哨，另一组人又应该从哪里离开编队，好挪出下一步行动的空间。“一直要等到你摸熟了他的行为模式，”分手时史迈利说，“等你们弄清楚他的行为模式，我就会来。之前不会。”

托比说他可清楚得很，还有得等。

在这段部署期间，史迈利到圆场的探访当然没有官方记录可循。他像个幽灵似的进入那个地方，隐形地飘过熟悉的走廊。在恩德比的建议下，他在傍晚六點十五分抵达，就在日班刚交接，夜班人员还没就绪的空当。他预期会有关卡；会碰到那些他已认识二十年之久、不时被电召到五楼打扫的清洁工。但在恩德比的安排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证件的史迈利到了那里，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示意他走进开着的电梯。搭乘电梯，他一路畅行无阻地到了地下室。出了电梯，他首先看见的是福利委员会的告示板，上面张贴的告示，与他那个时代的一模一样，只字未改：免费猫咪征求善心家庭；戏剧社周五于福利会朗诵《顽皮的奎奇顿》62，还拼错字了。相同的回力球竞赛，基于安全理由，参赛者都以化名参加。相同的抽风机发出恼人的噪音。因此，当他推开登记处的嵌丝玻璃门，闻到油墨与图书馆灰尘的气味时，他几乎期望会在角落书桌那个缺损的绿色阅读灯下，看见自己圆滚滚的身影伏案阅读，就像当年他埋首分析比尔·海顿的叛变事件，并逆向思维地指出莫斯科中央的防御弱点时一样。

“噢，我听说现在，你正在编写我们过去辉煌的历史。”夜班登记员宽容地说。她个儿很高，走路的神态与希蕾莉颇相似，即使坐着的时候都有点儿摇摇欲坠。她砰的一声把一个装文件的旧锡盒放在桌上。“五楼送给你这个，装满了他们的爱。”她说，“如果你需要到其他地方，就叫一声，好吗？”

握柄上的卷标写着“大事记”。打开盒盖，史迈利看见一沓用绿色绳子捆在一起的发黄旧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翻开第一个卷档，看见卡拉模糊的照片，仿佛棺木里的尸体，从黑暗中瞪着他。他彻夜详读，几乎一动也不动。他探索着卡拉的过往，也追索着自己的往事，有时，他甚至觉得两人的生命互补，也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质疑，倘若他拥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将会如何。他努力尝试，却一如既往地无法抗拒自己的感同身受。苏联人民所承受的痛苦，苏联政府毫不在意的残暴蛮行，苏联英雄的流离失所，处处令他怵目惊心。这一切都让他自惭形秽，相较之下自己是如此轻松自在，尽管自己的生活也不乏痛苦。夜班结束时，他还在那里，瞪着发黄的册页，“像马儿站着睡觉似的”，曾参加骑术竞赛的夜班登记员说。甚至当她把档案从他面前拿走归还五楼时，他还一直瞪着前方，直到她轻轻碰了他的手肘。

隔天晚上他又来了，再隔天也一样；他销声匿迹，隔了一周又再度出现，却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读完卡拉的资料之后，他抽出基洛夫的资料，还有米凯尔、伟林和所有关于集团的资料，希望能为他所听到、所记得的莱比锡——基洛夫的故事找到具体的佐证文件。史迈利还有另外一面，可以说他是拘泥于形式的，或者是学者性格。对他来说，惟一真实可信的就是档案，其他的一切除非符合或切中记录，否则都只是浪费时间的东西。他也抽出奥图·莱比锡和将军的档案，即使不为其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们的纪念，他在两份档案中都加进了备忘录，平实记载他们死亡时的现场状况。他最后抽出的一份档案是比尔·海顿的档案。最初他们对于这份档案的解密还有疑虑。五楼的执行官，无论这晚是谁当班，还把恩德比从部长级官员的私人晚宴中叫出来，请示这件事。恩德比，他这次倒是颇值得称道，愤怒地说：“老天在上，最开始写这些该死的东西的人就是他，不是吗？如果乔治不能读他自己的报告，还有哪一个该死的人可以看？”然而，史迈利并没有真的读这份报告，据那位暗中登录他所阅取的所有档案的登记员报告说，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浏览。据她的形容，他若有所思地缓缓翻阅，“仿佛在找一张曾看过却遍寻不着的照片”。他只把档案留在手中约莫一个小时，然后很有礼貌地归还。“非常谢谢你。”自此而后，他未再现身，但清洁工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当晚十一点过后，他整好报告，清理桌子，把几张用手抄写的札记丢进放置机密文件废纸的垃圾箱，然后，有人看见他在后院站了很长一段时间——阴森黝暗的后院，满是白色瓷砖、黑色排水管与猫的恶臭——望着他以前所在的楼层，以及他以前房间的幽微灯光，宛如老人望着自己出生的房子，自己以前读书的学校，以及自己举行婚礼的教堂。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从剑桥圆环——当时已十一点半——搭出

租车到巴丁顿，搭乘午夜后不久发车的卧铺夜车到彭赞斯63。他没有预先买票，也没用电话订票；他没带任何过夜的东西，甚至没有刮胡刀，直到早上才设法向服务生借了一把。此时，山姆·科林斯正在集合那群负责监视的乌合之众，也就是公认的大外行，他们事后能记得的，就只是史迈利曾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但当时他们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行动。

“选这个时机去度假，可真是他妈的怪异，对不对？”恩德比暴跳如雷地说。当他接获这个情报时，幕僚也传来一大串超时工作、差旅时间、耽误社交活动津贴等等抱怨。然后，他突然想起来，说：“噢，我的天哪，他是去看他那个婊子女神！他的麻烦难道还不够吗？单手就可以对付卡拉啊？”不知为何，这段插曲惹恼了恩德比。他一整天都暴怒不安，当着所有人面辱骂科林斯。外交官出身的他，极看不起抽象的事物，虽然他自己也免不了要常寄情其中。

那幢房子矗立在山丘上，周遭光秃秃的榆树丛行将枯萎。花岗石的建筑非常宏伟，但山形屋顶已开始崩塌，叠摞的屋瓦像是搭在树顶上的破旧黑色帐篷。屋前占地甚广的暖房已荒废；顺着山谷而下，是倾圯的马厩和乏人照料的菜园。山丘铺满橄榄绿的矮树丛，以前曾是防御的山丘堡垒，“哈利的科尼什重镇。”她这样说。在山丘之间，迤逦着海岸线，这天早晨，在低垂的云层下，大海坚硬如板岩。出租车载他开上颠簸的山路，是一辆像战时参谋车的老“汉柏”。这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史迈利想，也是她接纳我的地方。车道坑坑洼洼，倒卧的树干像黄色的墓石，散落两旁。她会在主屋里，他想。他们一起来度假时，会住在山巅的小屋，但她独自回来时，就住在主屋，她未婚时所住的房间里。他告诉司机不用等他，然后开始朝大门走去。他踩着他的伦敦鞋，小心翼翼地避开水坑前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水坑上。这不再是我的世界了，他想，这是她的，他们的。他善于观察的眼睛扫过建筑正面的许多扇窗户，希望能瞥见她的身影。她会到车站接我，只是搞混时间，他想像着，只是无心之过。但她的车停在马厩里，晨雾的痕迹犹存，他还在付出租车费时就发现了。他按下门铃，听见她踏在火石板上的脚步声，但来开门的是崔曼达太太。她领他进了客厅——吸烟室，起居室，会客室，他永远也搞不清楚。柴火正旺。

“我去请她。”崔曼达太太说。

至少我不必和疯子哈利讨论共产党，等候时史迈利想。再不然就是说应该逼得那些该死的罢工者走投无路，全部枪毙，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的服务精神都到哪里去了？诸如此类十分怪异而他自己却深信不疑的念头。

她要家人避开，他想。

他从燃烧的柴烟里闻到蜂蜜的味道，一如往常，令他怀疑味道是从哪里来的。是家具上打的蜡？或者，是在地下墓穴的某处，有一间蜂蜜室，就像有枪械室、渔具室、杂物房以及——就他所知——情爱室一样？他寻觅着以前挂在壁炉上方那张描绘维纳斯生命中一景的提埃波罗

64画作。他们卖掉了，他想。每次他来，就会发现收藏里又少了一件珍品。哈利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了，这是每个人心里的疑问——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用在房子的维修上。

她穿过房间，向他走来。他很庆幸，是她走来，而不是他走过去，否则他一定会被屋里的什么东西绊倒。他口干舌燥，胃里像吞了一大团仙人掌；他不希望她靠近自己，突然之间，她的真实存在令他无法负荷。她看起来很美丽，颇有凯尔特65风情，一如往常地翩然而至，一路行来，她的棕色眼睛凝望着他，探索他的心绪。她亲吻他的唇，把手指放在他的颈背，支配着他，海顿的阴影像一把剑落在他俩之间。

“你没想到要在车站带份报纸过来，对不对？”她问，“哈利又把报纸停掉了。”

她问他吃过早餐没，他撒谎说吃过了。也许他们可以一起散个步，她建议道，仿佛他是个想看看这地产的人。她带他到枪械室，翻箱倒柜地找合适的靴子。靴子有的亮得像板栗，有的却似乎永远潮湿不干。海岸步道沿着海湾，向两个不同方向延伸。哈利定期会拉起带倒钩铁丝的围栅，阻断步道，并挂上“地雷危险”的告示。哈利为了争取搭建营地的许可，和议会展开无休无止的奋战，而议会的否决，有时会令他愤怒抓狂。他们选择朝北顺风而行，她挽着他的手臂，侧耳聆听。往北的路较弯曲，但往南走，有大片仅容一人通过的金雀花丛，他俩就必须一前一后地分开走。

“我要离开一阵子，安恩。”他说，尽量自然地叫出她的名字，“我不想通过电话告诉你。”这是他作战时的声音，听到自己用这样的声音讲话，他觉得自己简直是白痴。“我要去勒索一个深陷爱河的人。”他应该这么说的。

“是为了某些特别的事离开，或者只是为了离开我？”

“我有工作要做，必须出国一趟。”他说，他仍然努力想摆脱英勇飞行员的角色，却未成功，“我想，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该到水滨街去。”

她的手指紧紧扣住他，但她心里想的却又是另一回事，她能很自然地应付别人，所有的人。在他们下方的岩石缝隙里，汹涌的海浪碎裂成翻滚的泡沫。

“你大老远跑来，就只为了告诉我，那栋房子已经禁止进入了？”她问。

他没回答。

“让我换个方式说吧。”他们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她说，“如果水滨街的房子可以自由出入，你是不是会建议我到那里去呢？或者你要告诉我的是，那房子已经永远不准进入了？”

她停下脚步，凝视着他，放开手，想从他的脸上读出答案。她低声说：“行行好吧。”他可以看见她脸上同时出现的疑虑、自尊与希望，也

不禁纳闷她会在自己脸上看见什么样的神情，因为他完全无法了解自己的感觉，只知道她遥不可及，他不属于这个地方。她宛如漂流海岛上的女郎，带着所有爱人的阴影，逐渐漂离远去。他爱她，他对她漠不关心，他超然地观察她，但她正离他远去。如果我不了解自己，他想，又怎能分辨你是谁呢？他看见岁月的皱纹，以及他们共同生活所留下的痛苦和争斗。她是他所渴望的一切，她一无可取，她让他想起他很久以前就已知道的事；她遥不可及，但他全然了解她。他看见她脸上的庄重神态，有那么一分钟，他在想，自己是否能宽大为怀地承受这一切；但下一分钟，他便鄙视她对她的依赖，只想离她而去。他想大叫“回来”，但无能为力，他甚至无法伸出手来，阻挡她从自己身边溜走。

“你常告诉我说，永远别放弃期待。”他说。这句告白的话听来像是问题的导言，但却没有任何问题提出。

她等候着，然后说出了自己的告白。“我是个滑稽演员，乔治。”她说，“我需要一个可以调侃的对手66。我需要你。”

但他远远地看着她。

“这是工作。”他说。

“有他们，我活不下去。没有他们，我活不下去。”他猜想她又提起她的那些情人了。“比改变更糟的，就是维持现状。我痛恨抉择。我爱你。你了解吗？”他必得说些话来弥补这交谈的间隙。她并不依赖他，但她落泪时却靠在他身上，因为哭泣让她全身乏力。“你从来不知道你有多自由，乔治。”他听见她说，“我必须让我们俩人自由。”

她似乎意会到自己的荒谬悖理，因此破涕为笑。

她放开他的手，他们重新上路。为了导回正轨，她问了些普通的问题。他说要几个星期，或许更久。“住旅馆。”但没说是哪个城市或哪个国家。她再次面对着他，泪流满面，比之前更糟，但泪水并未打动他，虽然他希望可以。

“乔治，就止于此了，我保证。”她停下脚步，恳求地说，“汽笛声已远离了，在你我的世界里。我们拥有彼此。不会再有了。根据平均值，我们是这个地球上最心满意足的人。”

他点点头，似乎了解了她所说的重点，但并未全然同意。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他发现，她沉默不语时，他反而更能感受到与她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所谓的“关系”，也不过就是意识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与自己沿着相同路径前进罢了。

“我要做的事，和毁了比尔·海顿的那个人有关。”他对她说，既非安抚，也非自己抽身的借口。但他心里想的是：“跟毁了你的人有关。”

他错过火车的班次，有两个小时要打发。退潮了，他沿着玛拉西昂附近的海岸走，对自己的漠然感到非常恐惧。天是灰色的，海鸟衬映在灰色的海面上，显得非常洁白。几个大胆的孩子泼溅海浪。我是个心灵

的窃贼，他沮丧地想，我自己毫无信仰，却追求着其他人的信念？我想用别人的火来温暖自己。他看着那些孩子，从记忆深处挖掘出以前曾读过的诗句：

转身，如泳者跃入澄净
从逐渐衰老、冰冷、厌倦的世界
喜悦，油然而生
没错，他郁郁不乐地想。这就是我。

“现在，乔治，”拉康追问，“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把女人捧得太高了，这就是我们这些英国中产阶级犯的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英国人从传统和学校教育里，就把女人捧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又怪她们不如理想——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把女人当成一种概念，而不是血肉之躯。这就是我们问题的症结。”

史迈利说或许吧。

“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瓦拉干吗老是扯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拉康大声咒骂，让坐在隔桌的人吓了一跳。

史迈利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在拉康推荐的牛排馆里，一起吃了顿讨厌的饭。他们喝从玻璃水瓶倒出来的西班牙葡萄酒，而拉康对英国的政治困境大发雷霆。现在，他们喝着咖啡和值得怀疑的白兰地。反共产主义恐惧症是太过火了，拉康说他很确定。毕竟，共产党员也是人。他们并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不再是。共产党员所追求的和每个人都一样——繁荣，以及一点和平与安宁。他们想在该死的敌对状态中，找一个休息片刻的机会。而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有些问题——就说爱尔兰吧——还悬而未决，但你绝对无法让美国人承认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英国人根本无法治理；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几年就搞定了。我们的未来是靠集体行动，但我们的生存却要独力奋斗，这个矛盾的难题一天天地扼杀我们。

“现在，乔治，你怎么看呢？毕竟你已经不在位了。你有客观的立场，宏观的视野。”

史迈利听见自己喃喃吐出一些有关光谱的无意义字句。

而现在，史迈利担忧了一整个晚上的话题终于来了，他们对婚姻的讨论会开场了。

“我们一直被教导，应该宠爱女人。”拉康愤慨地说，“如果我们不能让她们时时刻刻都觉得被宠爱，她们就会抓狂。但跟瓦拉在一起的家伙——嗯，如果女人惹恼了他，或随便乱讲话，他就会赏她个黑眼圈。你和我，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对不对？”

“我确信我们不会。”史迈利说。

“听我说。如果我去找她，深入虎穴到他的房子，用非常强硬的做法，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什么的，你觉得可以逆转形势吗？我的意思是，我的块头比他大，天晓得。我不乏胜算，不管你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他们站在星空下的人行道，等着史迈利的出租车。

“无论如何，去好好度个假吧。你应得的。”拉康说，“到温暖的地方去？”

“嗯，我想我可能只会到处走走。”

“祝你好运。我的天哪，我嫉妒你的自由。嗯，你真是太有帮助了，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听你的建议，写信去。”

“但是，拉康，我并没有给你任何建议。”史迈利略带警告意味地抗议。

拉康毫不理会。“另一件事也准备好了，我听说。”他沉着地说，“没有闲杂人等，没有混乱麻烦。真有你的，乔治。忠贞不二。我会看看能不能给你一点表彰。你已经有什么了？我忘了。那天我们的庙堂诸公还说你应该封个骑士爵位呢！”

出租车来了，拉康坚持要握手，让史迈利觉得很难堪。“乔治，祝福你。你真是个亲切的人。我们是物以类聚，乔治。都是爱国的人，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要奉献。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如果安恩是你的情报员，而不是你的妻子，你一定能把她管得服服帖帖的。”

第二天下午，托比来了一个电话说：“交易已准备就绪，等待完成。”乔治·史迈利便化名巴拉克劳夫，悄悄动身前往瑞士。他从苏黎世机场，搭乘瑞士航空的巴士到波恩，直接住进丽景皇宫饭店。这是一家宏伟豪华的饭店，有着爱德华式的醇厚宁静，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熠熠生辉的阿尔卑斯山，但这天傍晚，一切都笼罩在浓重的冬雾中。他原来考虑要住小一点的地方；也考虑过要住托比的安全公寓。但托比劝他说，丽景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好几个出口，位于市中心，任何想找他的人都会第一个想到这个地方，因此，如果卡拉要找他的话，这里就会是卡拉认为他最不可能栖身的地方。踏进宏伟的大厅，史迈利觉得自己像踏上一艘空荡荡的轮船，在大海上远洋。

他的房间是瑞士典型的小巧多功能房间。圆书桌镶嵌黄铜，桌面是大理石。古意盎然的双人床上方挂了一张巴列特印行的画，画着拜伦爵士笔下的哈罗德公子67。窗外的浓雾，筑起一堵灰墙。他打开行李，再度下楼到酒吧。一个年长的钢琴师弹奏着五十年代流行曲，那些曾经是安恩最爱的歌曲，也是他自己的最爱。他吃了些奶酪，喝了一杯芬丹白酒68，想着眼下。现在就要开场了。从现在开始，没有退路，没有迟疑的空间。十点钟，他走到旧城区69，这是他最爱的地方。街道铺着鹅卵石；冷冽的空气里有烧烤洋栗和雪茄的味道。古老的喷泉穿透浓雾迎向前来，中世纪的房舍宛若戏剧布景，而他，置身戏外。他走进拱廊，穿过艺廊、古董店，以及高得足容骑马通过的门廊。在尼迪格桥上，他停下脚步，凝望着河水。这么多个夜晚，这么多街道犹在。他想起黑塞的句子：“漫步雾中……树不互见。”凝冻的雾气低回盘旋在流淌的河面；河堰升起淡淡黄色。

一辆橘黄色的富豪房车在他背后停下，波恩车牌，突然熄掉车灯。史迈利回头一望，驾驶座旁的车门由里打开。靠着车内亮起的灯，他看见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驾驶座，后座是一个面容严肃的女人，穿着波恩家庭主妇的标准装束，膝上抱着一个孩子。托比利用他们作为掩护，史迈利想，监视者的术语称之为“剪影”。他们开车上路，女人开始和孩子说话。她的瑞士腔德文有一种沉着但义愤填膺的语气：“看，那里有起重机，爱德华……我们经过熊公园了，爱德华……看，爱德华，火车……”他记得监视者总是不满意，这是每个偷窥者的宿命。她挥着手，要孩子看这看那的。一个家庭团聚的夜晚，长官，剧本如是说，我们开着橘色的富豪汽车出门访友，长官。我们正要回家。而此人，当然是，长官，就坐在前面。

他们开进艾尔芬诺，波恩的外交人员住宅区。透过浓雾，史迈利瞥见结满白霜的花园，以及别墅的绿色廊柱。车灯照见了一面标示着某个阿拉伯国家的铜牌，有两名警卫保护。他们经过一座英国教堂和一排网球场，弯进一条有光秃秃的山毛榉整齐排列的街道。街灯高悬在他们头顶，像白色的气球。

“十八号，就在左边五百米外。”托比轻声说，“格里高利耶夫和他老婆住在一楼。”他开得很慢，利用浓雾作为掩护。

“很有钱的人住在这里，爱德华。”那女人在他们背后说着，“都是从国外来的。”

“铁幕来的人大多集中住在慕里，而不是艾尔芬诺。”托比继续说，“那是个公社，他们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集体去买东西，集体去散步，你一看就知道。但格里高利耶夫不一样。三个月前，他们搬出慕里，租了这幢公寓，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三千五百元一个月，乔治，他

个人付给房东。”

“现金？”

“每个月用百元大钞付房租。”

“大使馆其他人的房租是怎么付的？”

“都通过大使馆的账户。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是例外。”

一辆警察巡逻车像河上游艇般缓缓超过他们。史迈利看见车里的三个人都转头看他们。

“看，爱德华，警察！”女人大叫，想让孩子向警察挥手。

托比也很小心，没停下谈话。“这些警察小伙子担心炸弹。”他解释说，“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会把这个地方炸得粉碎。那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乔治。如果我们笨手笨脚，格里高利耶夫会告诉自己说，我们是本地的守护神，所以就不会去找警察。一百米，乔治。前院停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其他人员都共乘大使馆的车。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自己的奔驰。”

“他什么时候买车的？”史迈利问。

“三个月前，二手车。就在他搬出慕里的时候。他真的是发了，乔治。就像过生日，有这么多礼物。车子，房子，从一等秘书晋升成领事。”

那是一幢灰泥别墅，坐落在广阔的花园中，但因浓雾，看不见背景。从房子正面的凸窗，史迈利瞥见窗帘后闪耀的灯光。花园里有座小孩滑梯，还有一个此刻干涸的游泳池。铺着碎石砾的车道上，停了一辆挂有外交车牌的黑色奔驰。

“苏联大使馆所有的车牌最后两个数字都是七三。”托比说，“英国是七二。格里高利耶娃两个月前拿到驾驶执照。大使馆里只有两个女人有驾照，她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个恐怖的驾驶，乔治。我的意思就是恐怖。”

“房子其余的部分谁住？”

“房东。一个波恩大学的教授，痞子一个。前一阵子，美国表弟找上他，说他们想在一楼装几个窃听器，还付他钱。这个教授收了钱，然后像个好公民，向警方报告。警方很害怕。他们答应美国表弟，只要放弃监视，他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行动停止了。看来我们的美国表弟对格里高利耶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

“格里高利耶夫的孩子呢？”

“在日内瓦念苏联使节学校，平常住校，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末全家出游。到森林里游玩，滑雪，打羽毛球，采香菇。格里高利耶娃是个热爱户外活动的怪人。他们也去骑脚踏车。”他说，目光暗示似的一瞥。

“格里高利耶夫也和家人一起出游吗？”

“他星期六还要工作，乔治。而且，我很确定，他工作只是为了避开家人。”史迈利注意到托比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婚姻状态已有定论。他怀疑，这是不是托比自己婚姻状态的投射。

他们离开那条街，转进旁边的一条小路。“听我说，乔治，”托比仍然在谈论格里高利耶夫的周末，“好吗？跟踪的人猜到内情。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个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孩，黑眼黑发，而且，就苏联人来说，长得很性感。那些小伙子叫她‘小娜塔莎’。她的本名不叫这个，但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娜塔莎。每个星期六，她到大使馆，去工作。有好几次，格里高利耶夫开车送她回慕里。我们拍了照片，还不坏。她在她的公寓附近下车，走五百米回家。为什么？另一次，他哪儿也没载她去，只是开车在古尔腾兜圆场，非常热烈地交谈。或许这只是那些小伙子的期望，因为格里高利耶娃的关系。他们喜欢这个家伙，格里高利耶夫。你知道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他们喜欢他。”

他停下车。一家小咖啡馆的灯光照透浓雾。咖啡馆的前院，停了一辆绿色的雪铁龙双发动机跑车，日内瓦车牌。后座堆满了硬纸板箱，看似货物样品。收音机天线上垂了一条狐狸尾巴。托比跳出车子，拉开雪铁龙脆弱的门，催促史迈利坐进驾驶旁的座位，然后，递给他一顶软帽，他立即戴上，而托比自己则戴了一顶苏联式的毛皮帽。他们再次开车上路，史迈利看见那个波恩主妇爬上他们刚抛弃的那辆橘色富豪的驾驶座。他们离开时，她的孩子还透过后车窗无精打采地挥手。

“大家都还好吧？”史迈利问。

“好极了。他们到处刨根问底，乔治，每一个人。萨特兄弟其中一个因为孩子生病，必须回维也纳去，他心都快碎了。其他都很好。对他们来说，你是第一号重要的。从右边赶上来的哈利·史林戈。记得哈利吗？以前是我行动的伙伴。”

“我听说他儿子拿奖学金上牛津。”史迈利说。

“物理系。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那孩子是个天才。眼睛继续看着路面，乔治，别转头。”

他们超过一辆蓝色厢型车，车身上用活泼的字体漆着“汽车快递”，驾驶一面开车一面打瞌睡。

“后面是谁？”摆脱阻碍之后，史迈利问。

“佩特·拉斯提，以前是个猎人头的。那些家伙日子很不好过，乔治。没有工作，没有行动。佩特签约加入罗得西亚70军队。杀了几个人，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难怪他们这么爱你。”

他们再次驶过格里高利耶夫的房子。另一扇窗户里亮起灯光。

“格里高利耶夫很早就上床睡觉。”托比有些敬畏地说。

一辆挂着苏黎世领事馆车牌的礼车停在他们前面。驾驶座上，司机正捧读一本平装本的书。

“那是加拿大比尔。”托比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离开家，右转，会经过佩特拉斯提。左转，会经过加拿大比尔。他们都是好孩子。非常有警觉性。”

“在我们后面的是谁？”

“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们。最大的一个已经结婚了。”

浓雾避人耳目，让他们的前进无声无息。他们驶下一个缓坡，经过右手边的英国大使官邸，看见大使的劳斯莱斯停在车道上。这条路弯向左边，托比顺路而行。就在转弯时，后面的车子赶过他们，以车头灯为他们照亮前方。在车灯的光束中，史迈利发现映入自己眼帘的是一条林木蔽隐的死巷，尽头矗立着两扇紧闭的大门，一小群人在门内戒护。

“欢迎莅临苏联大使馆，乔治。”托比非常小声地说，“二十四个外交官，五十个其他阶级的工作人员——密码翻译员、打字员，和一些非常差劲的驾驶员，全部都是本国直接派遣。贸易代表处在另一栋建筑，史崔任纳克街十七号。格里高利耶夫常到那里去。在波恩，我们也盯上了塔斯和诺佛斯帝，这两个混混应该是主流派的。主要的驻处在日内瓦，以联合国为掩护，总数高达两百人。这里只算是余兴节目：总共就是十二或十五个人，还在扩编，但速度很慢。领事馆就在大使馆后面。你必须穿过围篱上的门，活像间鸦片馆或妓院。他们在那条通道上装了闭路电视摄影机，等候室里也有扫描机。试着申请一次签证看看！”

“我想我还是躲远一点，谢谢了。”史迈利说，托比露出罕见的笑容。

“大使馆的领地。”托比说，车头灯照过向右倾斜而下的树林，“这是格里高利耶娃玩排球、给孩子们政治教育的地方。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大使馆的幼儿园，教室，乒乓球俱乐部，女子羽毛球室——都是那个女人一手包办。别管我说的话，听听看我那些小伙子们怎么说她。”他们转出死巷时，史迈利瞥见转角楼顶上的窗户里，一盏灯熄了，接着又亮起来。

“那是保利·史柯戴诺在说：‘欢迎莅临波恩。’”托比说，“上个礼拜，我们想办法租下顶楼。保利是路透社的特派记者。我们甚至还帮他伪造了一张记者证。还有电报卡，所有的东西。”

托比在桑帕拉特兹附近停下车。一座现代的钟楼敲了十一下。纤柔的雪花飘下，但夜雾并未散去。两人好半晌都没开口。

“今天是上个星期的翻版，上个星期则是再上一个星期的翻版，乔治。”托比说，“每个星期四都一样。下班之后，他把奔驰开到修车厂，加满油，检查电池，要求收据，然后回家。六点钟过后不久，一辆大使馆的车抵达他家门口，下车的是克拉斯基，周四定期从莫斯科来的信差。独自一人。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很专业。在其他的任何情况下，

他无论到哪里都和伙伴波格达诺夫结伴而行。一起搭飞机，一起送东西，一起吃饭。但拜访格里高利耶夫，克拉斯基打破惯例，独自前往。他会停留半个小时，然后离开。为什么？对信差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做法，乔治。很危险，如果他没有后台的话，相信我。”

“你们对格里高利耶夫的了解呢，托比？”史迈利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托比用张开的手掌，比了个刺枪的手势。“格里高利耶夫是个受过训练的恶棍，不是吗，乔治？没有贸易专长，彻头彻尾是个大麻烦。他也不是名门正派，是半路出家，乔治。”

基洛夫也是，史迈利想。

“你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住他吗？”史迈利问。

“技术上来说是没问题。银行，假身份，甚至小娜塔莎——技术上来说，我们有一手王牌。”

“所以，你认为我们可以宰了他？”

在黑暗中，托比的手掌又比了个刺枪的手势。

“宰人，乔治，总是要碰点运气，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马上为国捐躯。其他人则翻来覆去满口谎言，但一被扣押就完全不同了。宰割，反而会让某些人更顽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知道。”史迈利说。他再次想起德里，那张静默的面孔透过香烟的云雾凝望着他。

“放轻松，乔治，好吗？你应该常常歇歇腿。”

“晚安。”史迈利说。

他搭上最后一班电车回市中心。抵达丽景时，已然大雪纷飞。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黄色的灯光中飘舞、破碎，太过潮湿，无法驻留。他把闹钟设定在七点钟。

叫亚莉珊卓的那个年轻女孩，在清晨的集合钟声响起前一个小时就已醒了，但她一听见钟声，就缩起白棉布睡衣里的膝盖，紧闭眼睑，告诉自己说她还在睡。一个需要休息的孩子。集合的钟声和史迈利的闹钟一样，在七点钟响起，但在六点钟时，她已听见山谷里的钟声，先是天主教堂，接着是基督教会，再来是镇公所，她哪一个都不信。她不信这个上帝，不信那个上帝，也不信任何一个挂着屠夫面容的镇上的人，那些在年度庆典上听见救火队合唱团以方言唱着爱国歌曲时，还坚持要立正的那些镇上的人们。

她之所以知道年度庆典，是因为那是少数获得许可的远征节目之一，她不久之前刚获得特许参加，这是她的第一次，而她格外觉得好玩的是，这竟是为平凡无奇的洋葱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她站在乌苏拉修女与贝缇杜德修女中间，她知道她们小心戒备，生怕她会跑掉，或跳进庆祝的队伍里发一阵疯。她看了一小时最最无聊的演讲，接着是一小时无聊的军乐队伴奏的歌唱。然后，是游行队伍，镇上的人穿着乡村装束，长长的木棍上扛着一串串洋葱。领队的是村里的旗手，平常负责送牛奶到小屋，而且，只要溜得开，就会跑到宿舍门口，希望可以从窗户里瞥见女孩们，或者，只是亚莉珊卓自己想瞥见他一眼。

村里的钟敲响六声之后，躺在床上最深、最深处的亚莉珊卓，决定开始一分钟、一分钟地数到永远。在她替自己所设定的儿童角色里，她一秒一秒地轻声数：“一千零一，一千零二。”过了十二分钟，在她孩子气的数数声中，她听见费莉希狄院长骑着那辆夸张的机车从梅斯回来的声音，告诉每一个人：费莉希狄-费莉希狄——噗——不是别人——噗——是我们的院长和正式的发令员——没有别人——噗——能这么做。最好玩的是，她的本名根本不是费莉希狄，费莉希狄是她为了其他的修女而取的名字。据她私下告诉亚莉珊卓，她的本名是娜德兹达，意即“希望”。因此，亚莉珊卓也告诉费莉希狄，她的本名是塔蒂亚娜，根本不是亚莉珊卓。亚莉珊卓是个新名字，她解释说，是特别为了在瑞士使用才取的。但费莉希狄-费莉希狄很严厉地告诉她，别像个傻女孩。

费莉希狄院长抵达之后，亚莉珊卓拉起白色的床单盖住眼睛，决定时间就此冻结，决定她置身在孩童的白色幽冥之境⁷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影子，无论是亚莉珊卓，无论是塔蒂亚娜。白色的灯泡，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铁制床架，白色的暖气机。透过高高的窗户，是白色的群山，衬着白色的天空。

卢迪医生，她想，我有一个新的梦可以讲给你听，等我们下次的周四会谈，还是周二？

现在，仔细听好，医生。你的俄文好吗？有时候你假装听懂了，其

实并没有。很好，我就开始了。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穿着我的白色睡衣站在白色的阿尔卑斯山水前面，想用费莉希狄的白色粉笔在白色的山头写字。费莉希狄的名字其实叫作娜德兹达。我睡衣底下什么也没穿。你假装不在意这些事，但每当我谈到我有多爱自己的身体时，你总是特别注意，不是吗，卢迪医生？我用粉笔在山头写字。我把粉笔像香烟一样用力搥熄。我想到我所知道最猥亵的字——没错，卢迪医生，这个字，那个字——但我怕你的俄文词汇里不太可能有这些字。我也想写出这些字，但白色叠在白色上，一个小女孩又能有多大的能耐呢，我问你，医生？

医生，这很恐怖，你一定没做过我这种梦。你知道我曾经是个名叫塔蒂亚娜的妓女吗？知道我做的都没错吗？我可以放火烧东西，甚至我自己；可以毁谤国家，就算当权的那些聪明人也不会惩罚我？相反的，他们还从后门放我走——“走吧，塔蒂亚娜，走吧。”——你知道吗？

听到回廊上传来的脚步声，亚莉珊卓在床单里埋得更深。法国女孩被带到厕所去了，她想。法国女孩是这里最漂亮的女孩。亚莉珊卓很爱她，只因为她的美丽。她以美貌击败整个体系。即使她们让她穿上外套——因为她抓伤或弄脏自己，或打碎什么东西——她的天使脸庞仍然像她们的圣像般凝望着他们。即使她穿上没有纽扣、无形无状的睡衣，高耸的胸部依旧如波涛起伏。即使是最嫉妒的人，即使是秘密名唤“希望”的费莉希狄，都没有办法让她看起来不像个电影明星。当她脱掉衣服，即使是修女也会又羡又恨地看得目不转睛。只有美国女孩能和她的外貌相匹敌，但美国女孩已经被送走了，因为她太坏。法国女孩也很坏，她无法掩藏怒气，她割腕自杀，她对费莉希狄拳打脚踢，但比起美国女孩离开时的情形，她还不算一回事。修女们必须把克伦可从小屋叫来，好让她镇静下来。她们处理她时，只好把休息区关闭，但当厢型车把美国女孩载走，贝缇杜德修女整个晚祷都垂泪不止，像家里有人死了一样。事后，亚莉珊卓强迫她说出内情，她叫着她的小名，萨莎，这是她不幸的恶兆。

“美国女孩被送到安特西去了。”在亚莉珊卓的强迫下，她泪流满面地说，“噢，萨莎，萨莎，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到安特西去。”正如在她某段不复记忆的生命里，她们哀求她，“塔蒂亚娜，别再做这些疯狂且危险的事！”

自此以后，安特西成为亚莉珊卓最深的恐惧，在任何时刻都能立即让她安静下来的威胁，即使是在她最粗暴不端的时刻。“如果你这么坏，就会到安特西去，萨莎。如果你嘲弄卢迪医生，在他面前拉起你的裙子，跷起腿来，费莉希狄院长就会把你送去安特西。嘘，安静，否则她们就会送你去安特西。”

脚步声又沿着回廊回来了。法国女还被送去穿衣服。有时她会反抗，结果就是穿上外套。有时亚莉珊卓会被叫去安抚她。亚莉珊卓会一再梳着法国女孩的头发，不说一句话，直到法国女孩放松下来，开始亲吻她的手为止。然后，亚莉珊卓就会被带走，因为爱绝对绝对绝对不在

课表上。

门突然打开，亚莉珊卓听见费莉希狄曲意逢迎的声音，像苏联戏剧里的老护士一样令她痛苦：“萨莎！你一定要马上起床！萨莎，赶快醒来！萨莎，醒醒！萨莎！”

她走近一步。亚莉珊卓怀疑她是不是要扯下床单，拉她的脚。费莉希狄可以像士兵一般粗暴，虽然她有着贵族的血统。她并不是爱逞威风，只是率直，容易激动。

“萨莎，你会来不及吃早餐。其他的女孩都会看着你，笑你说我们苏联人老是迟到。萨莎？萨莎，难道你想错过祷告吗？上帝会很气你，萨莎。他会很难过，会哭泣。他可能会想法子惩罚你。”

萨莎，你想到安特西去吗？

亚莉珊卓把眼睛闭得更紧。我六岁，我需要睡眠，费莉希狄院长。上帝让我变成五岁，上帝让我变成四岁。我三岁，我需要睡眠，费莉希狄院长。

“萨莎，你忘了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了吗？萨莎，你忘了今天你有访客？”

上帝让我变成两岁，上帝让我变成一岁，上帝让我变得不见，未曾出生。不，我没忘记我的访客，费莉希狄院长。我还没入睡之前，就已记得我的访客，我梦见他，自从我醒来之后，就只想着他。但是，费莉希狄院长，今天我不想要访客，其他任何日子也不想要。我不能，不能活在谎言里，也不想知道如何能活在谎言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不能，不能让这天开始。

亚莉珊卓顺从地爬下床。

“那里。”费莉希狄院长说，心不在焉地吻了她，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出回廊，大叫，“又晚了，又晚了！”拍着手掌，“嘘，嘘！”好像她面对的是一群愚蠢的母鸡似的。

搭火车到图恩，花了半个钟头。出了车站，史迈利四处闲逛，浏览橱窗，绕了些路。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为国捐躯，他想……宰割，反而会使某些人更顽固……他怀疑，自己又会如何面对宰割呢？

这是个阴沉单调的日子。少少几个行人，是缓缓飘过雾中的影子；湖里的水流在水闸处冻结成冰。偶尔，云雾裂开隙缝，让他瞥见城堡、树木和城墙的一角。接着，云雾又再次掩盖一切。雪花堆积在鹅卵石上，堆积在温泉树瘤结满布的枝桠上。几辆车亮着车灯驶过，轮胎在雪融的泥泞中发出噼啪声。只有橱窗里有不同的颜色：金色的手表，缤纷如国旗的滑雪装。“最早十一点到那里。”托比说，“十一点已经算太早了，乔治，他们要十二点才会到。”此时才十点半，但他需要时间，他需要在安顿下来之前四处逛逛；他需要时间，就像恩德比说的，“好让我的家伙准备就绪”。他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见城堡耸立在面前。拱廊变成人行道，接着是阶梯，然后是陡峭的斜坡。他继续往上爬，经过一间英国茶馆，一间美国酒吧，一间绿洲夜总会。每一间店都有地名，每一间都有霓虹灯，每一间都是无色无味的仿作。但这些无法摧毁他对瑞士的热爱。他走进一个广场，看见银行，就是那家银行。对街上有一家小旅馆，就像托比描述的，一楼是咖啡馆兼餐厅，楼上才是一间间的客房。他看见一辆黄色邮车大大咧咧地停在不准停车的弯道里，他知道那是托比布下的定点岗哨。托比对邮车的信心终生不渝；他走到哪里都偷邮车，说这些车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也不容易让人记得。他换上新的车牌，但车牌看起来比车还旧。史迈利穿过广场。银行门上的告示写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五点；周五，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时十五分。”“格里高利耶夫喜欢午餐时间，因为在图恩，没有人会浪费午餐时间到银行去。”托比这样说，“格里高利耶夫错得离谱，他以为安静就是安全，乔治。空荡荡的地方，空荡荡的时间，格里高利耶夫这么醒目，反而让自己很尴尬。”他穿过一座行人桥。时间约在十到十一点之间。他穿过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览格里高利耶夫银行全貌的小旅馆。真空里的压力，他边想边倾听自己滑溜的脚步声，与排水沟里的潺潺水声。宰人，乔治，总是要碰运气。卡拉会怎么做？他纳闷地想。专制主义者会做哪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史迈利想不出来，因为缺乏准确合理的不明推论法。卡拉会搜集作战情报，然后他会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险碰运气。他推开咖啡馆的门，温暖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在标示着“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贾可比先生。”他告诉那个女孩。她避开他的眼睛，不以为然地点点头。那女孩苍白木然，完全没有表情。他点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装，但她说，如果是玻璃杯装的咖啡，就必须加杜松子酒。

“那么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说。

为何他一开始时要用玻璃杯装？

真空里的压力，他再次想着，环顾四周。运气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馆满是摩登的瑞士古风。灰泥壁柱上悬挂着交错的塑料枪。隐藏式扩音器播放着无害的音乐；吐露衷情的声音，随着每一次播报的内容转换不同的语言。角落里，四个男人静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着空无一人的广场。雨又开始下了，雪白的天地变成一片灰蒙蒙。一个戴着红色羊毛帽的男孩骑脚踏车经过，帽子像个手电筒，沿路远去，直到为雾气所淹没。他注意到，银行的门有两扇，由电眼控制开关。他瞧着手表，十一点十分。收钱的抽屉叮当作响。咖啡机发出嘶嘶声。玩牌的人又开始新的一把。墙上挂着几个木盘。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男女。还有什么可看的？灯是锻铁打造的，但室内的照明却是从环绕天花板的一圈毫无遮掩的灯光而来，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于十五楼的巴伐利亚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着永远不会有解释。今天只是准备而已，今天连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着银行。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出来。他想起自己耗费一生等待着他再也无法界定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决心吧。他记起安恩，和他们最后一次散步。真空里的决心。他听见椅子的吱嘎声，看见托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风范地握了手。托比的脸闪闪发亮，仿佛刚跑完步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离开艾尔芬诺的家。”他很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娃开的车。很可能他们在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没命了。”

“脚踏车呢？”史迈利担心地说。

“像平常一样。”托比拉开椅子说。

“上个礼拜是她开车吗？”

“上上礼拜也是。她坚持，乔治。我是说，这个女人简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唤就径自端了一杯咖啡过来。“上个礼拜，她真的把格里高利耶夫从驾驶座上拉下来，然后开车撞上大门的门柱，动弹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尔笑到不行，害我们还以为是受到静电干扰才有杂音呢。”他友善地拍着史迈利的肩膀，“听着，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线，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着，欣赏表演。”

电话响了，女孩叫着：“贾可比先生！”托比随意地走到柜台。她把话筒递给托比，托比不知低声说了什么，让她脸红起来。厨师和他的小儿子从厨房走来：“贾可比先生！”史迈利桌上的菊花是塑料的，但有人在花瓶里装了水。

“再见！”托比愉快地对着电话说，然后走回座位。“每个人都就绪了，每个人都快乐。”他很满意地宣布，“吃点东西，好吗？享受一下，乔治。这里是瑞士。”

托比欢欢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赏表演，史迈利想。没错。我编写剧本，托比制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观赏。不，他纠正自己，是卡拉编写剧本，这有时很令他担忧。

两个背着登山背包的女孩走进银行。一会儿之后，托比也跟着进去。他要把银行挤个水泄不通，史迈利想。在托比之后，是一对手挽着手的年轻夫妇，接着是提着两个购物袋的肥胖妇人。黄色的邮车稳如泰山，没有人会移动邮车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电话亭，有两个人挤在里面，或许是在躲雨。两个人比一个人不易引人注目，他们在沙拉特总是这么说，而三个人又比两个人更不醒目。一辆没载人的游览车经过。钟敲响了十二下。一如预期，一辆黑色的奔驰从雾中左摇右晃地出现，湿湿的车头灯在鹅卵石上闪闪发亮。车子笨拙地撞上路边石，在银行门口停下，离托比的邮车六英尺远。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七三，托比这么说，她让他下车，开车来回绕着街道，等他出来。但今天，因着这见鬼的天气，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显然决定蔑视停车法规，以及卡拉的律法，靠着外交车牌让他们免于麻烦。前座乘客席的门打开来，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结实男人，带着一个公文包，跑向银行入口。史迈利刚把格里高利耶夫一头灰发与无边眼镜的影像记在心中，一辆货车就挡住了他的视线。等货车移开，格里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但史迈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见格里高利耶娃本人，惊人的庞大身躯，一头红发，脸上挂着新手驾驶的不悦神色，独自坐在驾驶座上。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着她，她下颚的模样，她莽撞的目光，史迈利第一次，尽管仍稍有保留，同意托比的乐观主义。如果恐惧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里高利耶娃必定是那个会恐惧害怕的人。

透过心灵之眼，史迈利想像着银行里上演的场景，一如他和托比所策划的一样。这家银行很小，七个人就能把它挤爆。托比要替自己开个私人账户：贾可比先生，几千法郎。托比会占据一个柜台，办理小小的手续。汇兑柜台也没问题。两个托比的手下，带着货币兑换表，足让他们忙上好几分钟。他想像托比欢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让格里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量。他想像那两个背登山背包的女孩集体行动，一个背包不小心砸到格里高利耶夫脚上，趁机记下他对出纳讲的话，隐藏式的照相机从手袋、背包、手提箱、铺盖，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门。“就和行刑队一样，”史迈利担忧按快门的聲音时，托比解释说，“每个人都听见扣扳机的声音，只有受刑的人听不见。”

银行门缓缓滑开。两个生意人出现，调整着身上的雨衣，仿佛刚从厕所出来似的。带着购物袋的胖妇人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再来是托比，喋喋不休地和那两个出行的女孩聊天。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他什么都没注意地跳上黑色奔驰，飞快地在妻子脸颊上亲了一下，格里高利耶娃来不及转开头。史迈利看出她的话里流露出批评，但他回答时却带着安抚的微笑。没错，史迈利想，他一定对她怀有罪恶感；没错，他想起监视者对他的喜爱；没错，我了解。但格里高利耶娃并没开车离去，还没离去。格里高利耶夫还没关好车门，一个穿着柠檬黄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妇人，沿人行道走来，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户，递给格里高利耶娃一张似乎是告发停车在人行道罪行的单子。格里高利耶夫很尴尬。格里高利耶娃倾身越过他，对着车外的妇人大声咆哮——即

使在过往车辆的噪音中，史迈利仍然听见她用笨拙的德文说着“外交官”之类的字眼，但那妇人站在原地不动，手挽着手提袋，在他们车子离去时仍咒骂不已。她一定以银行门口为背景，拍了一张他们坐在车里的照片。他们利用针孔相机照相，六个针孔，镜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托比回到咖啡馆，坐在史迈利身边，点燃一根小雪茄。史迈利可以感觉到，他像狗刚追完猎物一样兴奋颤抖。

“格里高利耶夫照旧领了一万。”他说，他的英文变得有些草率，“和上礼拜一样，也和上上礼拜一样。我们拍到了，乔治，全部的场景。小伙子们很开心，女孩们也是，乔治。我是说，他们真是太神了。绝对是最顶尖的好手。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团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史迈利没想到他会这样问，笑了起来。

“他一定很怕老婆。”他赞同地说。

“好人一个，知道我的意思吗？很讲理。我想他的行为也会很合理。这是我的看法，乔治。那些小伙子也这样想。”

“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离开这里之后去哪里？”

一个尖锐的男声打断他们：“贾可比先生！”

但那只是厨师端着一杯杜松子酒来祝托比健康，托比也回敬。

“在车站的餐厅吃午饭，第一流的。”他继续说，“格里高利耶娃吃猪排和薯片，格里高利耶夫吃牛排，一杯啤酒。他们可能也会喝几杯伏特加。”

“午餐之后呢？”

托比神采奕奕地点点头，仿佛这个问题不言自明。

“当然，”他说，“他们是到那里去了，乔治，打起精神。那个家伙一定会屈服的，相信我。你没有像那样的老婆。而且娜塔莎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压低声音，“卡拉是他的饭票，乔治。你总是不了解这些简单的事。你想她会让他放弃那间新公寓？奔驰？”

亚莉珊卓的每周访客抵达了，总是同一天，总是相同的时间，在星期五的午休时间之后。一点钟吃午饭，星期五总是吃冷肉配薯片，加上苹果派，或者是梅子派，视季节而定。但她没办法吃，有时她会表演一场呕吐，或冲进厕所，或叫费莉希狄来，用最下流的言语抱怨食物的品质。这招每次都能惹恼她。宿舍一向以自家种植的水果自豪，而且费莉希狄办公室里的宣传小册也有许多水果、花卉的照片，和阿尔卑斯山的溪泉山景相提并论，仿佛上帝，或修女们，或卢迪医生，是专为病人种植了这一片富饶之地。午餐之后是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在星期五，这就是亚莉珊卓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一整个礼拜里最难熬的时间。她必须在白色的铁床上，假装放松，事实上却暗自向所有能帮她的神祈祷，希望安东叔叔被车碾过，或心脏病发，或最好是不再存在——与她自己的过去，她自己的秘密和她自己的名字，塔蒂亚娜，一起尘封。她想起

他那副无边眼镜，想像自己用眼镜戳进他的头，从另一边抽出来，挖出他的眼睛，这么一来，他就不能再用湿漉漉的目光看着她，而她，可以直直地穿透他，看见外面的世界。

此刻，休息时间终究还是结束了，亚莉珊卓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站在空荡荡的饭厅，穿过窗户，望向小屋，两个照料琐事的姐妹刷洗着瓷砖地板。她觉得想吐。粉碎，她想，在你那愚蠢的脚踏车上摔个粉碎。其他的女孩也有访客，但其他访客都是星期六来，而且没有人有安东叔叔，甚至连男人都很少，大多都是虚弱的姑姑阿姨，以及随侍在侧、无聊至极的姐妹们。而且，没有人能到费莉希狄的书房坐下，关上房门，等候访客单独现身。这是亚莉珊卓和安东叔叔享有的特权，贝缇杜德修女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但亚莉珊卓很愿意把这些特权，和一些其他的特权，拿来交换安东叔叔永远不再造访。

小屋的大门打开了，她刻意让自己全身战栗，两手不停搓着手腕，仿佛看见老鼠、蜘蛛，或赤裸的男人在挑逗她。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胖人影，骑着脚踏车滑下车道。他不是天生的单车手，她可以从他的小心翼翼中分辨得出来。他并非自远方骑着脚踏车前来，也没带来任何一丝外界的气息。有时天气像烤箱一般热，但安东叔叔没流汗，也没被烤焦。有时下着大雨，但安东叔叔抵达门口时，身上的雨衣和帽子很少淋湿，他的鞋子也从不沾染泥泞。只有当暴风雪纷飞时，例如三个星期前，或者几年前，死寂的城堡堆上几米厚的积雪，安东叔叔看起来才像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物：他穿着厚重的及膝长靴，御寒外套和毛皮帽，绕过松树，蹒跚走上小路，他从她未曾提及的记忆里走了出来。而当他抱着她，叫道：“我的小女儿！”把大手套放在费莉希狄擦得晶亮的桌上时，她感觉到澎湃潮涌的血缘情感，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天都能忍住不微笑。

“他是这么温暖。”她用仅有的一点法文对贝缇杜德修女倾诉，“他抱着我，像抱着朋友！为什么大雪会让他变得如此温柔呢？”

但是，今天只有些许雨雪和雾，大片大片落下的雪花，无法在黄色的沙砾地上停驻堆积。

他搭车来，萨莎——有一次贝缇杜德修女告诉她——和一个女人，萨莎。贝缇杜德看见他们。两次。她留心观察他们，理所当然。他们有两辆脚踏车捆在车顶，上下颠倒。那女人开车，块头很大的女人，有些像费莉希狄院长，但没那么高尚，头发红得足以吓退公牛。他们抵达村外时，把车停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然后安东叔叔解下脚踏车，骑到小屋来。但那女人留在车里抽烟，读《瑞士画报》，有时也对着镜子皱眉头。而她的脚踏车从没离开过车顶，她读杂志时，那辆脚踏车就像一只朝天仰卧的猪！猜猜怎么着？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是非法的！那辆脚踏车——身为瑞士好公民，贝缇杜德修女很理所当然地检查过——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没有车牌，没有执照，他是个逍遥法外的罪犯，那个女人也一样，尽管她胖得无法骑上车去！

但亚莉珊卓对非法的脚踏车毫不关心。她只想了解那辆车。哪一种车？豪华还是寒酸？什么颜色？最重要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莫斯科，从巴黎，还是其他地方来的？但贝缇杜德修女是个单纯的乡下女孩，越过山去，大部分的外国地方对她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车牌上的字母呢，行行好，别傻了？亚莉珊卓哭了起来。贝缇杜德修女没注意这些东西。贝缇杜德修女头摇得像个笨拙的挤牛奶女郎，她原本就是。脚踏车和牛，她很了解。汽车，已超越她的理解范围。

亚莉珊卓看着格里高利耶夫抵达，等待他把头前倾到手把上，抬高肥硕的屁股，将一条短腿跨过横杆，仿佛爬到女人身上一样。她看见，骑这短短的一段路，让他脸色泛红；她看见他解下后轮车架上的公文包。她跑出门去，想吻他，先吻脸颊，再吻嘴唇，因为她有个念头，想把舌头放进他嘴里，当成欢迎的举动。但他匆匆低头从她身边走过，仿佛已要走向妻子身边。

“你好，亚莉珊卓·波里苏娜。”她听见他低声说，他有点狼狈地匆匆念出她的姓，仿佛那是国家机密。

“你好，安东叔叔。”她回答说。贝缇杜德修女抓住她的手臂，低声要她放规矩些，否则的话……

费莉希狄院长的书房既贫乏又奢华。书房很小，装饰不多，而且非常卫生，负责打扫的妇人每天刷洗擦亮，让房里有着一股游泳池的味道。然而，她的苏联小玩意儿却像珠宝盒一样闪烁着灿烂光芒。她有很多圣像，还有精心装裱的黑白照片，包括她所喜爱的公主，她所服侍的主教，而在她的圣日——还是她的生日，或主教的生日？——她会把这些圣像和照片都拿下来，用蜡烛围成一个圣坛，放上圣母玛丽亚与圣子。亚莉珊卓知道这些，是因为费莉希狄曾叫她一起坐下，对着她大声念出俄文祷辞，用进行曲似的旋律唱诵圣餐仪式的赞美诗，还给她甜饼和一杯甜酒，只为了在圣日——还是复活节或圣诞节——有个苏联人为伴。苏联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她说。渐渐地，虽然亚莉珊卓吞了一大堆药，但她知道，费莉希狄醉得一塌糊涂，因此她抬起费莉希狄老迈的腿到床上，再帮她枕上枕头。她亲吻费莉希狄的头发，让她沉睡在那张为新病人办理住院手续的父母休息时所坐的藤沙发里。亚莉珊卓此刻正坐在这张沙发上，望着安东叔叔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今天又是棕色的，她注意到，棕色的西装，棕色的领带，棕色的衬衫。

“你应该给自己买个棕色的脚踏车裤夹。”她用俄文对他说。

安东叔叔没笑。他的笔记本用一条像袜带的黑色松紧带环住，他一面舔着他那官员模样的嘴唇，一面颇不情愿地迅速解开松紧带。亚莉珊卓有时认为他是个警察，有时是讨厌的教士，有时是个律师或校长，有时甚至是某种特别的医生。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都很明显地希望借着松紧带和笔记本，以及充满焦急的慈悲表情，让她了解，有一种超乎他或她个人所能负责的更高律法存在，他并无意成为她的狱卒，他希望获得她的原谅——因为让她离群索居囚禁此地。她也知道他想让她了解，

他很悲伤，甚至也很孤独，而且要她相信，他很喜欢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是带给她生日礼物、圣诞礼物的叔叔，每年把她抵在颌下，“我的天哪，萨莎，你长大了。”然后拍拍她圆润的身体，意思是说，“天哪，萨莎，你很快就要成为盘中餐了。”

“你阅读的进度如何，亚莉珊卓？”他问道。他把笔记本在面前摊开，翻找他的清单。这只是闲聊。这不是更高的律法。这就像谈着天气，或她穿的衣服有多美，或她今天看起来有多快乐之类的——和上个星期完全不同。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从月球来。”她回答说。

安东叔叔的反应，像是她这句话从没说出口似的，所以，也许她只是对自己说的，在心里静静地说，就像她也在心里说了许多其他事一样。

“你已经看完我带来的那本屠格涅夫的小说了吗？”他问，“你在读《春潮》72，我想。”

“费莉希狄院长正在念给我听，但她喉咙痛。”亚莉珊卓说。

“这样啊。”

这是个谎言。费莉希狄已经不念书给她听，以惩罚她把食物丢到地板上。

安东叔叔已经在笔记本上找到写着清单的那一页，他也找到他的铅笔，一支顶端可以按压的银色铅笔——他为这支铅笔感到很自豪。

“那么，”他说，“那么，亚莉珊卓！”

突然之间，亚莉珊卓不想等待他的问题。突然之间，她无法等待。她想要扯下他的长裤，与他做爱。她想要在角落里把自己弄脏，像那个法国女孩一样。她让他看她在手上咬出的鲜血。她必须通过自己神圣的血，向他表明，她不想要听他的第一个问题。她站起来，一只手伸向他，另一只手埋进牙齿里。她要向安东叔叔展示，不只是这一次，也是永远，他心中的问题对她是一种亵渎，一种侮辱，无法接受，疯狂至极，而如果这么做，她就只好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最唾手可得也最好的模范。他难道不是悬挂在费莉希狄的墙上俯视着她，手肘流淌着鲜血？我为你流血，安东叔叔，她解释说，想起复活节，想起费莉希狄在城堡里到处打破蛋。拜托。这是我的血，安东叔叔。我为你流血。但因为手塞在嘴里，她惟一能发出的声音就只是呜咽。因此，最后，她坐了下来，皱起眉头，手贴在膝上，并没有真的流血，她注意到，但至少沾上了口水。

安东叔叔用右手压住打开的笔记本，左手握着铅笔。他是她认识的第一个左撇子，有时，看着他写字时，她会怀疑他是不是镜中的影像，而真实的他正坐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谷仓后面的车里。她想，如果能有像卢迪医生说的那种“分裂人格”该有多好——一半骑脚踏车离开，另一

半与载他来的那个红发女人留在车上。费莉希狄，如果你借我那辆喋喋摩托车，我会让我坏的那一半离此远去。

突然之间，她听见自己开口说话。很美妙的声音。和收音机里的政客，以及在床边俯瞰她的医生发出的声音一样强劲。

“安东叔叔，你从哪里来？拜托。”她听见自己问道，好奇但谨慎，“安东叔叔，注意我，拜托，我在说话。除非你告诉我你是谁，你是不是我真正的叔叔，还有你那辆黑色大汽车的注册号码，否则我就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我很抱歉，但必须这么做。还有，那个红头发的女人是你的妻子吗？或者是费莉希狄染了头发，就像贝缇杜德修女劝我做的一样？”

但是，太多次了，亚莉珊卓的心说着话，但她的嘴却无法传达，结果那些话语在她内心飞旋，她成为那些话语的狱卒，就像安东叔叔假装自己是她的狱卒一样。

“谁给你钱付给费莉希狄，支付我在这这里的拘留费？谁付钱给卢迪医生？谁每个礼拜决定你的笔记本里要写什么问题？你小心翼翼写下的这些答案，又是送给谁看的呢？”

但是，再一次的，话语在她的躯壳里飞翔，就像水果成熟时节，鸟儿盘旋在克伦可的暖房一样。亚莉珊卓无能为力，她无法劝服它们飞出来。

“那么，现在，”安东叔叔第三次说，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就像卢迪医生要替她打针时的那种笑容，“现在，你首先要告诉我你的全名，亚莉珊卓。”

亚莉珊卓举起三根手指，像个好孩子般数着。“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她用稚嫩的声音说。

“很好。你这个礼拜觉得如何，萨莎？”

亚莉珊卓带着礼貌的微笑回答：“谢谢你，安东叔叔。这个礼拜我觉得好多了。卢迪医生说我的危机已经远离了。”

“你是否收到——信，电话，或传话——与任何外界的人联络？”

亚莉珊卓决定让自己是个圣人。她两手在膝上交叠，头倾向一边，想像自己是挂在书桌后面墙上那些费莉希狄苏联东正教圣人中的一个。薇拉，代表信仰；柳波夫，代表爱；苏菲亚，欧雷格，或金妮亚——全是费莉希狄在坦承自己本名是“希望”的那个晚上告诉她的名字——亚莉珊卓的本名是亚莉珊卓或萨莎都好，但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是塔蒂亚娜，只要记住这一点。亚莉珊卓对着安东叔叔微笑，她知道自己的微笑高尚、宽容且睿智；她知道自己聆听着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安东叔叔的声音；而安东叔叔也知道，因为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推开笔记本，然后按铃，请费莉希狄院长来进行付钱的仪式。

费莉希狄院长很快就进来了，亚莉珊卓猜她根本就在门的另一边不

远处。她手中握着已算好的账目。安东叔叔审视着，皱起眉头，和往常一样，然后数了钞票放在桌上，蓝色和橘色的钞票一张张地数，让每一张都透明地呈现在台灯的光线下。然后，安东叔叔拍了拍亚莉珊卓的肩膀，仿佛她是十五岁，而不是二十五岁，或二十岁，或无论她弃离那段生命中的禁忌岁月时是几岁。她看着他再次走出门去，骑上脚踏车。她看着他的臀部努力地摇摆出节奏，离她远去，穿过小屋，经过克伦可，滑下山丘，骑向村落。就在他凝望时，她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至少未曾发生在安东叔叔身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两个别有用心的男人，一男一女，骑着一辆摩托车。他们一定是坐在小屋另一侧的夏日长椅上，避开其他人的视线，或许为了做爱。他们移动到巷子里，盯着他，但并未骑上摩托车，还没有。相反的，他们等待安东叔叔的身影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才跟随着他骑下山去。亚莉珊卓决定放声大叫，这一次，她发现自己的呐喊与尖叫声很响，响到可以让房子从屋顶到地板都碎裂开来。贝缇杜德修女逼近她，狠狠打她一巴掌，要她安静下来。

“就是那些人。”亚莉珊卓哭喊道。

“什么人？”贝缇杜德修女追问，她扬起手，准备随时再度派上用场，“你说的是什么人，你这个坏女孩？”

“就是那些跟踪我母亲，把她拖走杀掉的人。”

贝缇杜德修女轻轻舒了一口气。“骑黑马，我猜！”她嘲笑说，“用大雪橇拖着她，是不是？穿越整个西伯利亚！”

亚莉珊卓以前就编过这些故事了。她说，她父亲是个比沙皇更有权势的秘密亲王。她说，他宰制黑夜，就像猫头鹰主宰黑夜，而鹰主宰白昼一样。无论她到哪里，他秘密的眼睛就跟随她到哪里，而他秘密的耳朵可以听见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一天晚上，他听到她母亲在睡梦中的祈祷，就派出手下追捕，把她母亲拖到雪地里，从此再无踪影，即使是上帝也没再见到她，他直到今日还在找她。

宰割烫手东尼的故事，后来已成为圆场里著名的传奇。烫手东尼是跟踪的人给格里高利耶夫取的奇怪化名。让他落网，其实是很罕见的机遇，是运气、时机与准备功夫完美结合的产物。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找到格里高利耶夫独处的时机，让他能在几个小时之后毫无异样地回到日常生活里。但是，在图恩银行那场演出之后的周末，他们反复深入研究格里高利耶夫的行为模式，却还是找不出适当的时机。在绝望中，托比的两个强悍的手下，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甚至还想出在他上班途中掳人的危险计划，打算在离家与大使馆几百米的人行道上动手。但托比否决了这个计划。一个女孩愿意当诱饵。或许她可以在什么地方绊住他？她牺牲小我的精神赢得喝彩，但并未解决实际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格里高利耶夫有双重安全保护。不只是大使馆的安全人员会按惯例查核他，还有他的妻子。跟踪的人很肯定，她对他与小娜塔莎的关系早已起疑。托比的监听小组想办法在街角的电话转接箱动了手脚之后，更证实了他们的疑虑。光是一天早上，格里高利耶娃就至少打了三次电话给丈夫，没有特别的缘故，就只是为了确定他人在大使馆里。

“乔治，我就说这个女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吧！”托比听到这个消息时，怒气冲冲地说，“爱情——我的意思是，那倒也罢了。但占有，只为了满足占有欲，是我绝对无法忍受的。这是我的原则。”

星期四下午有一个空当，也就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的奔驰去修车厂检修时。如果一个老练的汽车好手，如加拿大比尔，能在星期三晚上给发动机动个手脚——让车子还能动，但也就只是能动而已，那么，当格里高利耶夫在修车厂等技工找出毛病时，他们或许就能动手？这个计划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了。即使所有的一切都没问题，他们又能留住格里高利耶夫多久呢？因为，每个星期四，格里高利耶夫都必须准时回家，好接待每周到访的信差克拉斯基。然而，这是他们惟一的计划，托比说糟得不能再糟，却聊胜于无。接下来，他们按兵不动，静静等候五天，在这段期间，托比和小组的组长们忙着筹划撤退方案，因为有太多的突发事件会迫使计划中止。每一个人都必须打包好行李，随时准备撤出旅馆；离境的证件和现金必须随身携带；无线电装备必须装箱，以美国人的身份存放在大银行的保险库里，如此一来，即便有任何蛛丝马迹，线索也都会指向美国表弟，而非他们自己；除了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谈之外，不准有任何形式的聚会；波长每四小时变更一次。托比对瑞士警方很了解，他说。他以前曾在此地被追捕。如果事情暴露，他说，他的小伙子和小女孩们越少被捉去回答问题越好。“我的意思是，感谢上帝，瑞士还只是保持中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为了聊以宽慰，也为了鼓舞监视者微妙的士气，史迈利和托比下

令，在等候的这几天里，监视格里高利耶夫的行动不能丝毫放松。对布伦纳德瑞恩73的监视必须二十四小时进行；汽车与脚踏车的巡视增加；每一个人都必须提高警觉，以防万一——尽管机会渺茫，但不敢说上帝会不会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时刻决定插手此事。

事实上，上帝所做的，是让星期天有个晴朗闲适的好天气，而这正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星期天早上十点钟，阿尔卑斯山区的太阳仿佛走下高地，照亮云雾深锁的低地的万事万物。在丽景皇宫，星期天的早晨格外宁静，一个侍者正为史迈利铺上餐巾。史迈利悠闲地喝着咖啡，正想专心阅读星期天版的《先锋论坛报》，一抬头，却看见领班法兰兹温文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巴拉克劳夫先生，电话。有位安瑟姆先生。”

电话在大厅，话筒里传来的是托比的声音。安瑟姆是他们约定好的名字，代表了紧急状况。“日内瓦办事处刚通知我们，常务董事此刻正在赶往波恩的途中。”

日内瓦办事处是布伦纳德瑞恩岗哨的代号。

“他带妻子同行吗？”

“很不巧地，夫人因孩子的缘故不同行。”托比回答说，“也许你可以到办公室来，巴拉克劳夫先生？”

托比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大厦旁边一个精雕细琢的花园里，就在一座遮阳亭下。史迈利五分钟后抵达。在他们的下方，流淌着绿色的河水。远方，蔚蓝的晴空下，波恩高地的层叠山峰在阳光中耸立着。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独自离开大使馆，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史迈利一抵达，托比就开始说，“他走路，往城区去。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星期天监视他。他走路到大使馆，十分钟后，就往城区去了。他是要去看棋赛，乔治，毫无疑问。你怎么说？”

“谁跟着他？”

“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走路，一辆支持车在后面，还有两辆在前面。一组人正朝大教堂出动。我们要动手吗，乔治，还是不要？”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领会到每次在行动开始全速进行时似乎就会困扰史迈利的那种抽离的情绪——不能说是优柔寡断，而是不知为何却不愿前进的那种感觉。

他催促着：“绿灯吗，乔治？或者不是？乔治，拜托！我们讨论的可是分秒必争的事啊！”

“格里高利耶娃和小孩回来时，房子那边是不是还有人监视？”

“绝对是！”

在那一刻，史迈利迟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衡量着利害得失，卡拉那遥远的灰色身影正在告诫他。

“绿灯。”史迈利说，“好，动手吧！”

他还没说完，托比已经站在离遮阳亭不到二十米处的电话亭了。“我的心脏跳得像蒸汽发动机。”他后来说。而他眼中也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在沙拉特，甚至还有这个场景的比例尺缩小模型。偶尔，负责指挥的人会找出模型，述说这个故事。

波恩的旧城区，就如同模型所展现的一般，最好是以山脉、城堡与半岛的混合体来加以说明。在克金菲德和谷仓桥之间，蜿蜒成马蹄形的阿勒河奔向令人目眩的悬崖——旧城即始于此——从山脚的中世纪街道盘旋而上，直到大教堂的晚期哥特式尖塔，形成山峰的顶点，也是旧城的荣耀。大教堂旁边，相同的高度，耸立着“讲坛”，从讲坛南面的边缘，不留心的游客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正俯瞰着上百英尺的岩面，直抵山脚涡旋奔淌的河流。这是个诱人寻短见的地方，毫无疑问，也确实有人无法抗拒诱惑。根据民间流传的历史，这里曾有个虔信上帝的人摔下马背，虽然摔下很远的距离，但上帝解救了他，让他继续为教堂服务三十年，直到高龄才安详辞世。讲坛的其他部分是非常安宁的地方，有着长椅、精心修葺的树木，与儿童的游戏场。近年来，这里也成为大家下棋的地方。棋子有两英尺高或更高，要够轻，便于移动，但也要够重，才能抵挡得住从周围山丘偶尔吹来的南风。缩小模型上甚至有这些棋子的复制品。

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托比·伊斯特哈斯抵达时，出乎意料的，阳光吸引了一小群井然有序的棋赛爱好者，或站或坐在棋盘旁。在人群的中央，离托比站立之处六英尺远的地方，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身影，是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领事（商务）安东·格里高利耶夫。他从工作与家庭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正透过脸上的无边眼镜，追随着棋手的每一步动作。格里高利耶夫的背后，站着史柯戴诺和他的伙伴狄·席尔斯基，监视着格里高利耶夫。棋手很年轻，留着胡子，轻浮易变，即便不是学艺术的学生，也是希望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在众人的凝神注视下，他们异常兴奋地进行着殊死决斗。

托比以前也曾如此靠近格里高利耶夫，但这苏联人的注意力从未像此刻这般专注于某处。带着战斗来临前的宁静，托比估量着他，再次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看法：安东·格里高利耶夫并非实战人员。他着迷似的全神贯注，随着每一步棋的移动流露出毫无掩饰的率真表情，在莫斯科中央的钩心斗角之下，这样的天真神态绝对不可能幸存。

托比自己的外貌，也是这天另一桩可喜的机缘巧合。他无视于波恩的周日气息，穿着深色外套，戴着黑色毛皮帽。因此，在这个事出突然的关键时刻，他看起来确似计划缜密，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的：他是个有地位的要人，在周日稍事轻松一下。

托比深色的眼睛抬起，望向大教堂的领地。负责载他们离开现场的车辆已准备就绪。

一阵笑声响起。一个留胡子的棋手夸张地举起他的皇后，假装棋子

重得吓人，踉跄几步，呻吟着放下。格里高利耶夫看见这出乎意料的动作，脸色一沉，皱起眉头。托比点头示意，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一左一右地逼近格里高利耶夫，史柯戴诺的肩膀甚至已碰到他，但他丝毫未注意。其他的跟踪者随即开始在人群中漫步，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背后形成第二个编组队形。托比并没有多作等待。他直接站到格里高利耶夫面前，微笑着举起帽子。格里高利耶夫报以微笑，不太确定的微笑，他或许以为对方是不太有印象的外交同僚，并举起帽子。

“你今天好吗，领事？”托比用俄文问，语气诙谐十足。

格里高利耶夫更为疑惑，他说，谢谢，很好。

“我希望你还喜欢周五小小的乡间郊游。”托比仍然用轻松却相当平静的声音说，同时把手臂滑向格里高利耶夫。“我们在此地的一些高贵的外交使节团成员，对图恩的旧城不够欣赏。依我之见，图恩的古色古香值得一游，银行的服务更值得推荐。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段俏皮的开场白够长，也够烦扰，让格里高利耶夫无力抵抗，就这样被带到人群边缘。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紧随其后。

“我的名字是寇特·塞贝尔，先生。”托比贴着格里高利耶夫的耳朵说，手仍抓着他，“我是图恩的波恩标准银行首席调查员。我们对于阿道夫·葛拉瑟博士在敝行的私人账户有些问题。你必须假装你认识我们。”他们仍在走动。在他们背后，跟踪者形成交错的队伍，像是随时待命准备发动奇袭的橄榄球球员。“请不要引起注意。”托比继续说，一面注意着让格里高利耶夫跟上他的脚步，“如果你能为我们拨出一个小时，先生，我相信我们就能摆平这些事，不至于对你的家庭或事业上的地位造成困扰。拜托。”

在秘密情报员的世界里，安全与绝对冒险之间的墙界几乎不存在，只有一张吹弹可破的薄膜。他可能诱捕一个人许多年，养肥对方，就为了这个关卡。但这个关卡本身——“是吗，不是吗？”——就是个跃进的分界点，不是大获全胜，就是溃不成军。有那么一瞬间，托比觉得他已看见溃败近在眼前。格里高利耶夫停下脚步，转头瞪着托比，脸色苍白似病人。他下巴仰起，张开嘴，吐出抗议的咒骂。他扯着自己被抓住的手臂，想恢复自由，却只是让托比抓得更紧。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左右游移完全堵住了可能的逃跑路线，但车子仍在十五米外，对托比来说，要拖着一个矮胖的苏联人走过去，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此时，托比出于直觉，继续说着。

“这里有些违法的事，领事先生。严重的违法。我们有一份关于你的档案，读来令人悲叹。如果我把档案放在瑞士警方面前，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抗议也无法让你免于最不堪的公开羞辱。我更不必提醒你，这会对你的事业造成什么样影响。拜托。我说，拜托。”

格里高利耶夫还是一动也不动。他似乎举棋不定，不知如何反应。托比推着他的手臂，但格里高利耶夫坚若岩石，对施加在他身体上的压力似乎毫无知觉。托比更加用力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也接近前

来，但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着精神病人的顽固力量。他的嘴张开，似乎正忍气吞声，只目光愚钝地盯着托比。

“什么违法的事？”他声音里的惊吓与平静，还让托比抱有一线希望，但他粗壮的身体仍然僵直不动，拒绝前进。“你说的葛拉瑟是谁？”他声音沙哑地追问，仍然是惊魂未定的语气。“我不是葛拉瑟。我是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你说的那个账户，完全是正当合法的。我是商务领事，我有豁免权。我也有权利拥有外国银行账户。”

托比使出最后也是仅有的撒手锏。那笔钱和那个女孩，史迈利说，那笔钱和那个女孩是你惟一能玩弄他的筹码。

“关于你的婚姻，也有个小小的问题，先生。”托比又显出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我要警告你，你在大使馆里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可是会让你的家庭面临极大的危险。”格里高利耶夫瞪大眼睛，嘴里喃喃念着“银行职员”——到底他是在怀疑还是在嘲弄，就不得而知了。他闭上眼睛，嘴里反复念着，而这一次——根据史柯戴诺的说法——语气里带着格外鄙夷的意味。但他又开始向前走。车子的后门已打开。支持的车辆等在后面。托比絮絮叨叨地讲着瑞士银行账户滋生的利息应先扣缴所得税之类的废话，但他知道格里高利耶夫根本没在听。狄·席尔斯基迅速超前，跳进车子后座，史柯戴诺把格里高利耶夫塞进车里，自己在他身边坐下，然后关上车门。托比坐在前座；开车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一个女孩。托比用德文告诉她放轻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忘了这是波恩的星期天。别让他听见英文，史迈利这么嘱咐他们。

开到车站附近时，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继而制造了一阵小小的扭打，托比从镜子里查看时，看见格里高利耶夫满脸痛苦，两手捂住鼠蹊部。他们开到兰葛斯路——一条位于大学后面的沉寂长路。车一停下，公寓的大门就打开了。一个苗条的管家在门阶上等候。她是米莉·麦克雷格，圆场的老骑兵。一看见她的微笑，格里高利耶夫就收敛了。此刻，重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掩护。史柯戴诺跳上人行道，抓着格里高利耶夫的一条手臂，几乎是扯着他出来；狄·席尔斯基一定又揍了他——虽然狄·席尔斯基事后发誓说纯属意外——因为格里高利耶夫下车时缩着身子。两人架着格里高利耶夫，像挽着新娘，跨过门槛，冲到会客室里。史迈利坐在角落里等候他们。这是一间用棕色印花布与蕾丝花边布置的房间。门关着，这些诱拐者让自己稍事庆祝。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松了一口气，放声大笑。托比拿下毛帽，抹掉汗水。

“嘘。”他轻声说，要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立即从命。

格里高利耶夫揉着肩膀，除了疼痛之外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史迈利审视着他，对他只注意自己的动作觉得很快慰。不自觉地，格里高利耶夫承认自己是个生活的失败者。史迈利记起基洛夫，记起他笨手笨脚地纠缠欧斯特拉柯娃，并费尽心血地吸收奥图·莱比锡。他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眼中所见尽是无可救药的平凡庸俗：身上那件崭新却不合宜的条纹西装，凸显他的肥胖；脚上那双昂贵的灰色皮鞋，显然太紧不舒服，

不时要让脚出来透透气；那头烫卷的头发也一样看着不舒服。所有这些琐碎、无用的虚荣誉举，都传达出他有远大的抱负，但史迈利知道——格里高利耶夫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达成。

以前是学术研究人员，他记起恩德比在班的地方交给他的档案中曾提到，放弃大学教职，追求更大的官僚特权。

没用的东西，安恩一定会这么说，只消看一眼就能衡量他的性欲。别理他。

但史迈利无法不理他。格里高利耶夫是上钩的鱼，史迈利要考虑的则是如何拉他上岸。他戴着无边眼镜，下巴长出一圈肥肉，发油因身体发热而暖腻，散发出柠檬的气味。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开始环视绑架他的人。脸上汗流如雨。

“我在哪里？”他狂暴地追问，略过史迈利，把托比当成头头。他的声音刺耳，调儿很高。他说德文，带着斯拉夫的齿擦音。

苏联驻波茨坦一等秘书（商务），三年，史迈利记得，没有明显的情报接触。

“我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个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我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谈话。”

他不断用手揉着受伤肩膀的动作，削弱了他愤愤不平的气势。

“我被绑架了！被带到这里，非自愿的！如果你不马上把我送回大使馆，就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

格里高利耶夫搭起了自己的舞台，却只是自说自唱。只有乔治可以问问题，托比曾这么告诉他的团队，也只有乔治能回答问题。但是，史迈利只是静静坐着，像个殡葬业者；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有反应。

“你们要赎金吗？”格里高利耶夫对着他们大叫。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掠过他心头：“你们是恐怖分子？”他低声问，“但如果你们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不蒙住我的眼睛？为什么让我看到你们的脸？”他的目光扫过狄·席尔斯基，接着是史柯戴诺。“你们应该遮住脸的。遮住吧！我希望对你们一无所知！”

持续的静默激怒了格里高利耶夫，他举起肥胖的拳头捶打自己另一只张开的手掌，叫嚣着：“我抗议，我抗议。”此时，史迈利略微露出高级官员式的遗憾神色，像格里高利耶夫一向所做的那样，打开放在膝上的笔记本，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官员式的：“你是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格里高利耶夫领事？”他尽可能以最平淡单调的声音问。

“格里高利耶夫！我是格里高利耶夫！是的，没错，我是格里高利耶夫！你是谁，请问？你是谁？黑帮老大？凭什么像个人民委员74似的对我说话？”

用人民委员来形容史迈利的态度并不见得是恭维，他强调的是那种漠不关心的姿态。

“那么，领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耽误，我必须请你看一下桌上的这些犯罪照片，就在你面前。”史迈利说，依然审慎地维持着平淡单调的语气。

“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能说外交官犯罪？我要求立即打电话给我们大使！”

“我建议领事先看这些照片。”史迈利用阴郁、毫无口音的德文说，“只要领事看过照片，就有自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请先从左边那张开始。”他建议，“照片是从左到右排列的。”

被勒索的人有着我们所有人的弱点，史迈利想。他暗自观察格里高利耶夫搜寻桌上照片时的样子，像在外餐会上审视自助餐台一般。被勒索的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努力想躲开陷阱，却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史迈利自己动手排列了照片的顺序。他想像着在格里高利耶夫心中，奏起一串连续不断的灾难之歌。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把他们的奔驰停在银行外面。脸上永远挂着不满神色的格里高利耶娃独自坐在驾驶座上等候，紧抓方向盘不放，像随时防范有人抢走她的车。长镜头捕捉到的格里高利耶夫和小娜塔莎，在一张长椅上，坐得非常近。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在银行里，有好几张，精良的镜头越过肩膀，拍到他在出纳的收据上签名，在他签名的上方，很清楚地打着全名：阿道夫·葛拉瑟。随后是格里高利耶夫很不安地骑在脚踏车上，正要进入疗养院；格里高利耶娃又很不情愿地坐到车上，这一次是在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她自己的脚踏车还绑在车顶上。但史迈利注意到，让格里高利耶夫凝视最久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用模糊的长镜头捕捉到的照片。照片的品质并不好，但是车里的两个人，虽然嘴巴贴在一起，却仍然可以清楚辨识。一个是格里高利耶夫。另一个，头压着他，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似的，是小娜塔莎。

“电话任你使用，领事先生。”史迈利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动静。

但格里高利耶夫仍然凝视着最后一张照片，一动也不动，从他的表情判断，他已不安至极。他不只是一个东窗事发的人，也是一个渴求爱情的男人。而今隐秘的恋情却突然公开，一切变得荒谬可笑。

史迈利依旧用他那公事公办的阴郁声调开始说明，卡拉可能会称之为施压。托比说，其他的审问者，可能会提供格里高利耶夫选择，如此一来，无可避免地会激起他顽固的苏联脾气，自我毁灭的苏联习性。巨大的压力很可能导致巨大的灾难。其他的审问者会提高声音，威胁恫吓，诉诸恐吓性的甚至实质性的暴行。但乔治不会，从来不会。乔治的举止像个低调而无立场的官员，而格里高利耶夫，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的世界已到末日似的，无可奈何，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乔治完全不给格里高利耶夫选择的机会。乔治很平静，也很清楚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明，他跟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重要的是，领事，史迈利说，仿佛他说明的是税务问题，要想想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照片散发，那

么这些照片很快就会落到其他人手里，到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首先是瑞士当局，一位驻瑞外交官滥用瑞士护照，一定会让他们很火大，更别提严重违反银行法。他们会签发最强烈的官方抗议，格里高利耶夫一家会连夜被送回莫斯科，全家人，永远无缘再享受派驻国外的丰裕生活。并且，回到莫斯科后，格里高利耶夫也无法平反。他在外交部的上司对他的行为会不敢苟同，无论是对于私人生活还是公务领域。格里高利耶夫在官场上的前途就此结束。他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流放，他的家人也一样。全家人都是。“想像一下，在外西伯利亚的荒原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格里高利耶娃的咒骂。”他的话奏效了。

格里高利耶夫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仿佛头会爆炸开来。

“但最后，”史迈利说，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抬起，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在笔记本上看些什么，托比说，真是天知道，因为笔记本上只有一行行的线，此外一片空白——“最后，领事，我们必须思考，这些照片对某个国家安全机构所造成的影响。”

此时，格里高利耶夫的手放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开始擦着额头，但无论他怎么用力擦，汗水还是不停地冒出来。汗水迅速滴落，就像史迈利自己在德里的审问室里与卡拉面对面坐着时一样。

史迈利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代表官僚体系来宣达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后命运。他又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把笔记本翻过另一页。

“领事，我问你，你太太和家人去野餐，几点会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仍然不断用手帕擦着额头，似乎没听见史迈利的话。

“格里高利耶娃和孩子们在艾尔芬诺森林野餐。”史迈利提醒他，“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但如果你没回家而引起关切可就不好了。”

格里高利耶夫拿开手帕。“你们是间谍？”他低声说，“你们是西方间谍？”

“领事，你最好别知道我们是谁。”史迈利真诚地说，“这些信息是危险的负担。只要你照我们的吩咐做，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我们向你保证。你的妻子，甚至莫斯科中央，都永远不会知道。请告诉我，你的家人几点钟会从艾尔芬诺回来——”史迈利突然停住。

或许不是出于真心，格里高利耶夫竟然做出奋力一搏的样子。他站起来，转身冲向门。就一个硬汉来说，保利·史柯戴诺看起来或许有些怠倦无力，但在格里高利耶夫还来不及做出第二个动作之前，他的手臂就已紧紧扣住他，把他轻轻地压回椅子上，非常小心地不在他身上留下伤痕。格里高利耶夫又作态地呻吟，非常绝望地垂下手。他的脸涨得通红，并开始痉挛，宽阔的肩膀不断抖动，嘴里喃喃冒出自我斥责的字句，交杂着一半俄文和一半德文。他缓慢但激动地咒骂着自己，接着，他咒骂他的母亲，他的老婆，他的厄运，以及他身为人父的极端脆弱。他应该留在莫斯科，留在贸易部。他根本就不该离开学术界，只因为他那个蠢老婆想要外国衣服、音乐和特权。他老早以前就看穿她了，但他

不忍放弃孩子，他是个笨蛋，是个小丑。他才应该住进庇护所，而不是那个女孩。他在莫斯科被找上时，他应该说不。他应该坚持程序。他应该在回来时把这件事向大使报告。

“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软弱了，太软弱了！”

接着，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斥责阴谋。他对阴谋深恶痛绝。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好几次，他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里受命与可恶的“邻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场大灾难。搞情报的都是罪犯，骗子，笨蛋，一群怪物。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爱他们呢？噢，因为苏联人的灵魂里就有酷爱秘密的致命缺陷。

“阴谋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对他们咆哮，“这是我们秘密的替代品！情报员是我们的阴谋家，这些卑鄙小人，他们毁了一切！”

他握起拳头，自责地捶打自己的脸颊。史迈利仍然翻动膝上的笔记本，厉声将他拉回眼前的问题：“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领事。”他地说，“我们真的必须知道他们预定几点回家。”

每一个成功的审问——就像托比·伊斯特哈斯每谈及这个时刻都要特别训示的——都建立在一个无法弥补的疏失上。一个手势，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个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烟，都代表了心态的转变，从反抗变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托比所描述的场景里，就在此时犯下严重的疏失。“她会在一点钟回家。”他喃喃地说，避开史迈利与托比的目光。

史迈利瞧了一眼手表。让托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可能会迟一些？”史迈利反驳说。

“她从来不迟到。”格里高利耶夫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请你先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向右走到远处——托比说，他是在暗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续格里高利耶娃不时会被问到的那些寻常事情罢了。然后，他准备好笔。如此一来，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必须给他一些信息，好写下来。

纵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的爱国情操至少还得再上演一回。他张开手，仿佛在向托比请求：“欧斯特拉柯娃！”他以夸张的轻蔑态度又重复一次，“他问我一个叫欧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认识，但我不认识。我是个外交官。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

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这也是很经典的手法，托比喜欢加以说明，聪明的审问者总会故意点燃一些诱敌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说。

“哪一年？”史迈利一面问，一面写。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托比。“哪一年？我说九月，他问哪一年的九月？他是个历史学家吗？我想他是个历史学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对史迈利说，“因为一项紧急的商务会议，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果我没出席，这场会议就没意义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吗？”

格里高利耶夫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他以为我们是资本主义者。”他对托比说，“他以为我们能带着老婆回去开两个礼拜的会，还搭瑞士航空头等舱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单独飞回莫斯科，去参加为期两周的经济会议。”史迈利说，仿佛大声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波恩。请描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高层讨论的主题是绝对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认命地回答，“我们部里希望讨论具体的措施，贯彻苏联官方反对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立场。我们讨论的就是，对违反的国家能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迈利毫无个性的风格，以及佯装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态，此时不

仅已树立威信，而且还臻于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哲学式也是非常苏联式的悲观心态，全盘接受。其他在场的人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似乎他还没被带到公寓来之前，就已有意倾诉心声了。

“会议在哪里举行？”史迈利，仿佛对他而言，形式的细节比机密的事务更值得关切。

“在贸易部。四楼……会议室。在洗手间对面。”他以绝望的轻浮态度回嘴说。

“你住在哪里？”

在资深官员住的招待所。他报出地址，甚至还带着讥讽意味地报出房号。有时候，我们的讨论结束得很晚，他说——已不吐不快似的主动提供信息；但在礼拜五，因为仍然是夏季气候，非常炎热，所以他们结束得较早，好给想到乡间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没有这样的计划。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周末，而且另有缘由。“我安排好了要到一个女孩的公寓住两天，她名叫爱芙朵琪亚，是我以前的秘书。她丈夫当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释说，仿佛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心，至少是像托比这样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样，尽管那些无血无泪的人民委员并不能体会。然后，很令托比惊讶的是，他竟单刀直入。他毫无预警也毫无其他引言地，从他与爱芙朵琪亚的调情，直接切入这次审问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计划被破坏了，因为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也就是大家称为卡拉处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参加一场会谈。”

此刻，电话响起。托比接起电话，挂断，对史迈利说：

“她回到家了。”依旧讲德文。

史迈利毫不迟疑地转头对格里高利耶夫说：“领事，我们得到通知，你太太已经回家了。现在，你必须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给她？”格里高利耶夫一脸惊骇地转头看托比，“他告诉我，打电话给她！我该怎么说？‘格里高利耶娃，我是你亲爱的丈夫！我被西方间谍绑架了！’你们这些人民委员疯了！都疯了！”

“请你告诉她，你不得已要晚回家。”史迈利说。

他的沉着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怒气无异火上加油：“我这样告诉我太太？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你以为她会相信我吗？她会立刻向大使打我的小报告。‘大使，我的丈夫跑了，去找他吧！’”

“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送来莫斯科的指令，是不是？”史迈利问。

“人民委员无所不知。”格里高利耶夫对托比说，一手轻拂过脸颊，“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干吗不自己对格里高利耶娃说？”

“你必须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对她说，领事。”史迈利建议道，“别提到克拉斯基的名字，但暗示说，他要你立刻到城里某处和他见面，商讨机

密。紧急状况。克拉斯基改变了计划。你不知道几点能回家，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如果她抗议，就斥责她。告诉她，这是国家机密。”

他们看到他面露忧色。他们看到他惊叹诧异。最后，他们看到一抹浅浅的微笑浮上他的脸。

“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自言自语说，“国家机密。没错。”

他无畏地走向电话，拨了号码。托比站在他后面，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随时按下听筒，如果他胆敢耍把戏的话。但史迈利带着微笑摇摇头，示意托比走开。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娃的声音，用德文说：“你好！”在她高声追问丈夫人在哪里之后，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夫无畏的回答。他们看到他挺直身子，抬高下巴，换上官式的面孔；他们听见他断然说出几句简短的字句，问了一个显然没得到答案的问题。他们看到他挂掉电话，因喜悦而眼睛发亮，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挥动粗短的双臂，就像上阵得分的球员一样。接下来，他们知道的是，他开始大笑，又长、又充满激情的斯拉夫式的大笑，音调高低起伏。其他人也无法遏止地大笑起来——史柯戴诺、狄·席尔斯基和托比都笑起来。格里高利耶夫握着托比的手。

“今天我真喜欢阴谋！”在两段更加激情的畅快笑声的空当，格里高利耶夫大叫，“今天，阴谋真是太棒了！”

然而，史迈利并没有加入这全体庆祝的行列。他有意扮演扫兴的角色，坐着翻阅笔记，等待欢笑结束。

“你说说看，第十三处的人是怎么找上你的。”当一切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史迈利说，“第十三处，人称卡拉处。请继续你的叙述，领事。”

格里高利耶夫是否感觉到周围涌起一股警觉的气氛，所有人的姿势都冻结不动了？他是否注意到，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的眼睛追索着史迈利毫无表情的脸，凝神注视？还有，米莉·麦克雷格静悄悄地溜进厨房，再次查看她的录音机，以免在狠心上帝的作为下，主机与备用的机器都同时故障？他是否注意到，耐心地舔着拇指与食指，翻动笔记本的史迈利，此刻几乎像东方隐士般谦逊自抑，完全没有兴趣似的把整个身体缩进那件满是皱折的棕色斜纹旅行外套里？

至少，托比全注意到了。托比坐在电话旁的阴暗角落里，从这个视野极佳的位子，他可以观察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却又让别人无法观察他。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地板，托比那锐利的目光也能记录下它完整的冒险旅程。托比甚至描述了自己的症状，颈周的部分有发热的感觉，喉咙和胃的肌肉都打结了。托比不仅忍受了这些不适，还把这些牢牢记住。但是，格里高利耶夫是否对这些气氛有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很可能仍只沉迷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角色里。电话的胜利刺激了他，振奋起他的自信心。显然如此，因为当他再次发言时，他首先陈述的，不是有关卡拉处的事，而是他身为小娜塔莎爱人的英勇行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女孩。”他对托比眨眨眼，“她们会让我们变回年轻人，像我们以前一样。”

“很好，你独自飞到莫斯科。”史迈利非常急躁地说，“会议进行期间，你被找去参加一场面谈。请从这里开始。我们不能浪费整个下午，你知道的。”

会议从礼拜一开始，格里高利耶夫顺从地重新开始他的正式告白。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回到招待所，收拾东西，打算带到爱芙朵琪亚的公寓，共度我们的小小周末。但是，却有三个男人找上我，命令我跟他们上车，也没多作解释，比你们还不如——瞄了托比一眼——说我受命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在路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的人，在莫斯科官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单位全是精英。我的印象是，他们是聪明人，干他们那一行的人，请恕我这么说，才智都不太高，但他们超过一般的水准。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官员，而不只是打杂的人。尽管如此，我并不太担心。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某些机密事务需要我的专业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很殷勤，所以我甚至有些飘飘然……

“路程花了多少时间？”史迈利一面打断他的话，一面还在写字。

穿过市区，格里高利耶夫模糊地回答。穿过市区，然后驶进乡间，直到天黑。直到我们见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看着应是他们的主子。

再一次，托比认为自己见证了史迈利控制这种场面的不凡能力，而这也正是史迈利专业能力的最佳证明，当然也证明了他对格里高利耶夫

的完全控制。在格里高利耶夫冗长的叙述过程中，他从来没有一句过度急切的追问，声音的抑扬顿挫里也从来没有一丝最微小的破绽来背离他在这场审问里为自己设定的无个性角色。托比坚称，史迈利掌控整个场面，“像手上握着画眉鸟的蛋”。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毁了一切，但他丝毫没有。而托比更喜欢把卡拉的真正身影首度出现这个关键的一刻，奉为至高无上的典范。其他的审问者，在听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看似他们的主子”时，一定会催促对方多作描述，比如他的年纪、阶级，他身上的衣服、抽的烟，你怎么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子？但史迈利没有。史迈利强掩不耐烦似的用原珠笔敲着簿子，用备受折磨的声音告诉格里高利耶夫，自此而后，请别省略事实的细节：

“让我再问一次。路程花了多少时间？请就你所记得的，尽量精确描述。让我们从这里继续。”

格里高利耶夫垂头丧气地道歉。他会说，车子以相当快的速度开了约四小时，先生，也许更久。他现在想起来，中途他们两度停下来去上厕所。在四小时之后，他们进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不，先生，我没看见告示标志，警卫都穿便服——然后又开了至少半个小时，才抵达中心。像个梦魇，先生。

再一次，史迈利出声反驳，建议他别那么激动。这怎么会是梦魇呢，他想知道，格里高利耶夫不是刚刚才说自己并不害怕？

好吧，不完全是梦魇，先生，更像是一场梦。在这个阶段，格里高利耶夫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贫困的农民，被带到地主——他用俄文说出这个名词，托比加以翻译——面前。所以他并不害怕，先生，因为他无法控制这些事，所以也没有人能责怪他。但当车子终于停下来，一个男子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警告他说，从此时开始，他的态度要完全改变。“你将要见到苏联伟大的斗士，也是极有权势的人士。”那人告诉他，“如果你对他不尊敬，或企图说谎，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妻子和家人。”

“这人叫什么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

但那人毫无笑容地回答说，这位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是不是卡拉本人，因为他知道第十三处首脑的化名叫卡拉，但那些人还是只说，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

“所以，梦境就开始变成梦魇，先生。”格里高利耶夫低声下气地说，“他们也告诉我说，我应该告别我的爱情周末。小爱芙朵琪亚会另寻新欢，他们说。然后，其中一个人笑起来。”

此时，极大的恐惧攫住他，格里高利耶夫说。接着，他踏进第一个房间，迈向第二扇门，他害怕得双膝发抖。他居然还有时间替他心爱的爱芙朵琪亚担心。这个超乎寻常的人是谁，他心怀恐惧地想，他甚至比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还要先知道，他允诺与爱芙朵琪亚共度周末？

“所以你敲了门。”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写着。

他叫我进去！格里高利耶夫继续叙述。他坦诚告白的热忱一发不可收拾，他对审问者的依赖也一样不可收拾。他的声音变大了，他的手势更丰富了。托比说，他仿佛是想用肢体的动作诱使史迈利摆脱沉默寡言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是史迈利佯装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诱使格里高利耶夫更加奔放。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不大也不豪华的办公室，先生，不太符合资深官员与伟大苏联斗士的身份。那是个小房间，简陋得像监狱牢房，中央有一张旧木桌，还有一张供访客坐的硬椅子：

“想像一下，先生，一位伟大的苏联斗士与权贵人士！他所拥有的，就只有一张旧书桌，惟一的照明是一盏劣质的灯！书桌后面，就坐着那位教士，先生，一个完全不装模做样、没有虚伪矫饰的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敢说——一个根植于自己国家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目光直率，灰色短发，抽烟时习惯双手交握。”

“抽什么？”史迈利问，一面还在写。

“嗯？”

“他抽什么？这个问题够简单了。烟斗，香烟，还是雪茄？”

“香烟，美国烟，整个房间都是香烟的味道。就像在波茨坦一样，当时我们和柏林来的美国官员谈判。我想‘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抽美国货，那么他一定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格里高利耶夫兴奋地转头面向托比，用俄文再说一次重点。抽美国烟，持续地抽，他说，想想看，要拿到这么多香烟，得花多少钱，需要多少影响力！

接着，史迈利依旧秉持他那卖弄学问的神态，要求格里高利耶夫表演一下什么叫抽烟时“两手交握”。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格里高利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棕色的木质铅笔，圆胖的双手在面前相扣，铅笔握在两手之间，笨拙地把笔塞进嘴里，就像有人用两手握马克杯喝东西似的。

“就是这样！”他解释说，心情再度变得轻松愉快，高声笑着用俄文对托比大叫，但托比觉得不适合翻译，事后在记录中也只写着“秽语”二字。

教士命令格里高利耶夫坐下，然后花了十分钟，详尽描述格里高利耶夫与爱芙朵琪亚爱情故事的细节，以及他的另外两段婚外情，一段在波茨坦，一段在波恩，对象都是他的秘书，最后不知为何都上了他的床。此时，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所言属实的话，他表现出了勇敢的行为。他站起来，追问道，他穿越大半个苏联，难道就是为了来参加道德法庭的审判：“和秘书睡觉又不是很罕见的事，即使在政治局也是如此。我向他保证，我没和外国女孩有越轨的行为，只有苏联女孩。‘这我也知道，’他说，‘但这对格里高利耶娃来说可没什么差别。’”

接着，还是很让托比惊讶的，格里高利耶夫又爆出一阵嘶哑的笑声；虽然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也谨慎地跟着笑起来，但格里高利耶夫的笑声比其他人持续得更久，所以他们只好等待笑声停歇。

“请告诉我们，拜托，为什么你称为教士的这个人会找你去？”史迈

利缩在他的棕色外套里说。

“他告诉我说，第十三处在波恩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交给我。我不应向任何人透露，包括我的大使在内，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太过机密了。‘但是，’教士说，‘你应该告诉你的妻子。依据你个人的状况，你不可能保有任何秘密，又不让妻子知道。这我很了解，格里高利耶夫。所以告诉她吧。’他说得一点都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评论说，“他真是聪明！这个男人显然很了解人情世故。”

史迈利翻过一页，继续写着。“请继续。”他说。

首先，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要开一个瑞士的银行账户。教士交给他十张百元钞票，共计一千瑞士法郎，告诉他用这笔钱去开户。他的账户不能开在波恩，因为那里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能开在苏黎世，因为那里有一家苏联贸易银行。

“瓦兹荷银行，”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解释说，“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转汇都通过这家银行。”

不能在苏黎世，而要在距离波恩几公里之外的小城——图恩。他应该用瑞士人的身份，以葛拉瑟的名义开设账户。“但我只是个苏联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反驳说，“我不是葛拉瑟，我是格里高利耶夫！”

教士毫不退缩地交给他一本瑞士护照，名字是阿道夫·葛拉瑟。教士说，每个月，账户会收到几千瑞士法郎，有时甚至会有一万或一万五千。格里高利耶夫会知道这些钱的用途。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教士耐心地复述，要严守机密，有利诱也有威胁。就像史迈利自己在一个小时之前所做的一样，教士毫不客气地一一详述。“先生，你应该看看他面对我时的沉着态度。”格里高利耶夫难以置信地对史迈利说，“他的冷静沉着，他的威严权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如果是在棋局里，他一定会大获全胜，因为他胆识过人。”

“但他并不是在玩棋。”史迈利冷淡地反驳。

“先生，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赞同，悲伤地摇着头继续述说他的故事。

有利诱，也有威胁，他又说了一次。

威胁是，格里高利耶夫所属的部会将收到消息，说他拈花惹草，不值得信赖，如此一来，他将永远无法再获派国外任职。这将毁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事业，以及他的婚姻。很严重的威胁。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可怕了。”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

接下来是利诱，而且诱因甚丰。如果格里高利耶夫善尽义务，严守机密，他的事业将飞黄腾达，他的出轨行为也会被视为不见。在波恩，他将有机会搬到更宜人的住所，足令格里高利耶娃雀跃；他也会得到一笔钱，购买一辆符合格里高利耶娃品位的进口车；同时他也不必再仰赖大使馆的司机，虽然司机大多是“邻居”，但还不够格参与这项大机密。

最后，教士说，他会加速升职为领事，以便解释他生活水准的提升。

格里高利耶夫看着他俩之间的那张书桌，目光扫过一沓瑞士法郎，接着是瑞士护照，接着又回到教士脸上。他问道，如果他说自己宁可不参与这项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教士点点头。他对格里高利耶夫说，他也考虑过第三种可能性，但很遗憾的，因为需求的迫切，让他无法有其他的选择。

“那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用这些钱？”格里高利耶夫说。

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说，也是格里高利耶夫获选的另一个原因。“在例行的事务方面，我听说你表现很出色。”他说。虽然此刻他对教士所说的话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评价感到自豪。

“他听到我的一些正面报告。”他欣然对史迈利解释道。

然后，教士告诉格里高利耶夫那个疯女孩的事。

史迈利一动也不动。他动笔时，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他还是写个不停，尽管他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东西，因为乔治从来就没想过要在纸上留下任何东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但自此刻起，托比说，在格里高利耶夫说话时，乔治会从他外套领子里抬起头来，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脸。而其他时候，他却像飘离房间里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米莉·麦克雷格站在门廊里，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而托比只为格里高利耶夫祈祷着。“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不计代价地说，谁在乎？我们都听说过卡拉的本领。”

教士说他会毫无隐瞒，他对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证——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了解，这就是有什么要隐瞒的前奏。

教士说，在瑞士的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里，有一个饱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苏联，这种疾病并没有被充分的了解。”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回忆起自己还曾被教士决绝的语气深深感动。“诊断和治疗都因政治考虑而变得复杂。”教士继续说，“这个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在我们的医院接受过四年的治疗，被医生指控许多罪状。‘偏执的改革主义与虚妄错误的思想……过度高估个人人格……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过度膨胀自身能力……资产阶级堕落的性行为。’苏联的医生一再要她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根本不是医疗。”教士颇为不悦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医院里，对这些事有比较进步的态度。”因此名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必须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时已然了解，这位高级官员亲自负责这个女孩的问题，也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开始为她难过。她是一位苏联英雄的女儿，教士说，这位苏联英雄以前是红军军官，后来伪装叛国，周旋于反革命的沙皇主义分子之间，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许格里高利耶夫知晓这项最高机密。“他的名字，是欧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们最顶尖，也是最有行动力的情报员。我们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义分子的情报。”

托比说，房里的人，听到这个已死的苏联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惊讶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开始述说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让格里高利耶夫了解情报工作的秘密世界。为了避免引起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警觉，教士解释说，必须为情报员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报员能让反苏联分子接受。因此，欧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红军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着又转往巴黎，妻子与女儿则留在莫斯科。但为了确保欧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团体里的地位，不得不让他妻子为丈夫的叛逃行为而受惩罚。

“因为，”教士说，“如果帝国主义间谍得到情报说，叛国者与变节者的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过着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占住同一间公寓——想想看，这会对欧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响！”

格里高利耶夫说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态度，他对房里其他人解释说，毫无霸气，反而以平等的态度相待，这无疑是由于对格里高利耶夫学术素养的尊重。

“无疑。”史迈利说，记了下来。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来地说，欧斯特拉柯娃和女儿亚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迁移到偏远的省份，有一间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们为求谨慎且大公无私——在必要时也有她们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说，这在献身机密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的现实。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别有深意地继续说——想想看，这种被剥夺一切、欺瞒隐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会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儿身上造成何等影响。父亲不在身边，他的名字又要从她的生活中连根拔除！而移居安全处所之前，母亲也必须忍受众人的羞辱！你将心比心，教士说，你，身为父亲，将心比心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年轻易感的心灵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面对如此有力的滔滔论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说，身为父亲，他很能体会这样的压力。而此时，托比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人也都这样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几年，教士继续用深感遗憾的声音说，亚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称的，塔蒂亚娜——在她所居住的那个省份，惹是生非，破坏社会秩序。由于承受太大的压力，她做了许多犯罪的事儿，包括在公共场所纵火、偷窃。她和一些假冒知识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难以想像的反社会分子鬼混。她随便与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几个。起初，在她被捕时，教士和他的助手还能压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决。但慢慢的，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这项保护措施也被撤销了。亚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进专门治疗不满社会现状分子的精神病院，结果却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说的一样。

“有好几次，她还被监禁在正规的监狱里。”教士低声说。然后，据格里高利耶夫说，他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亲爱的格里高利耶夫，身为一位学者，一位父亲，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了解，我们这位独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听到他女儿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会有多么难熬。”

再一次，教士通过这段故事所传达的情感，打动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称这份情感为绝对的个人责任感。

声音依旧冷淡单调的史迈利又打断他的叙述。

“母亲人在哪里？领事，你的教士怎么说？”他问。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她死在偏远的省份里。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个省份。当然，她是用另一个名字下葬的。根据他告诉我的故事，她是死于心碎。这也对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报员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苏联当局也一样。”

“理所当然。”史迈利说，他严肃的气息也感染了房里其他四个纹丝不动的人。

最后，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简要说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来的原因。欧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亚莉珊卓悲惨的命运，对莫斯科这位英勇情报员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他甚至一度企图放弃其至关重要的工作，返回苏联，照顾他这个失去母亲、又心智失常的女儿。无论如何，最后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既然欧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苏联，他的女儿就必须前往西方，住进私人疗养院，让父亲随时可以去探访她。就这个目的而言，法国太过危险，但越过毗邻的瑞士，就可以让她远离欧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伙伴怀疑的目光，接受治疗。身为法国公民，父亲可以为女儿取得身份与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适合的疗养院，从波恩开车过来不远。现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孩子，从她抵达的那一刻起。他必须去探望她，付钱给疗养院，每周向莫斯科报告她的境况，好让消息同时传达给她父亲。这是开设银行账户的目的，也是教士给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

“而你同意了。”格里高利耶夫略一停顿，史迈利便说，大家都听见他的笔在纸上疾书的飒飒声。

“不是马上。我先问他两个问题。”格里高利耶夫说，很古怪地有些自鸣得意的味道，“我们学术界的人没那么容易被骗，你了解的。首先，我当然先问他，我们国家安全部派驻在瑞士有那么多人员，为什么不找其中一个来执行这项任务呢？”

“很好的问题。”史迈利很罕见地带着恭贺的态度说，“他怎么回答？”

“这个工作太过机密了。他说，机密就必须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欧斯特拉柯夫的名字和莫斯科中央主流的人扯上关系。他说，如果照现在的安排，即使有漏洞，也只有格里高利耶夫个人要负责任。我可不喜欢这

样的抬举。”格里高利耶夫一面说，一面对狄·席尔斯基露出一个不太自然的虚弱微笑。

“你的第二个问题呢，领事？”

“是关于在巴黎的那位父亲，他是否常来探访？如果父亲经常来访，那么我充当代理父亲的地位就有些多余。可以作一些安排，直接付钱给疗养院，然后父亲可以每个月从巴黎来，关心自己女儿的健康。对于这一点，教士说父亲不能常来，更不用说和亚莉珊卓谈话。但他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加上一句，女儿的情况真是她父亲最沉痛的问题，所以可想而知，父亲可能根本不会来探访她。他告诉我说，能替苏联伟大的情报英雄担负这项重要任务，我应该觉得很光荣。他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告诉我，我没有资格用门外汉的逻辑来质疑专业的考量。我道歉。我告诉他，我真的觉得很光荣。能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尽一己之力，我觉得很骄傲。”

“但你心里还是半信半疑？”史迈利试探地问，再次抬起头，停下笔。

“没错。”

“为什么？”

起初，格里高利耶夫似乎也不确定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要他说出心中真正的感受。

“也许你不相信教士？”史迈利暗示说。

“那个故事有太多前后不连贯的地方。”格里高利耶夫皱起眉头说，“当然，就情报工作来说，难免如此。但是，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不太可能或不符实情。”

“你能解释为什么吗？”

格里高利耶夫沉浸在告解的舒畅情绪中，再次忘了自己身陷险境，竟露出了优越的微笑。

“他太感情用事了。”他说，“事后，第二天，我躺在爱芙朵琪亚身边，和她讨论这件事，我问自己：教士和那个欧斯特拉柯夫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兄弟？是老同志？他们带我去见的这个伟大的人，这么有权势，这么神秘——他在世界各地策划阴谋，施加压力，讨论特殊行动。而当我，格里高利耶夫，和他坐在一起，谈着某人的疯女儿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读着他最私密的情书。我告诉他说：‘同志，你告诉我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的事，就别告诉我吧。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但他告诉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当那个女孩的朋友。这样你就是我的朋友。他父亲坎坷的一生对她造成很坏的影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她高谈自由，却根本不管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她是受资产阶级幻想毒害的牺牲者。她满口都是不适合年轻女孩的下流言语。她活在谎言的世界里，完完全全疯了。但这不是她的错。’然

后我问他：“长官，你见过这个女孩吗？”但他只对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成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受过很多折磨。你一定能体会这些事。在最后几年，她变得愤世嫉俗，甚至支持女儿的反社会幻想。”

格里高利耶夫沉默许久，令托比·伊斯特哈斯很欣喜地歇一口气，因为格里高利耶夫花了几个小时谈论卡拉对那位小姐的安排，已经让他头昏眼花了。

“我觉得他仰赖我。”格里高利耶夫又开始叙述，“我觉得他不只隐藏了事实，也隐藏了情感。”

格里高利耶夫说，当然还有些具体的细节要了解，教士都一一详述。管理那家疗养院的是一个白俄女人，修女，原本是在耶路撒冷的苏联东正教团体服务，是个心地很好的女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太政治取向，教士说。这个女人在巴黎与亚莉珊卓会面，陪她到瑞士去。疗养院有说俄文的医生。这个女孩因为母系血统的关系，也能讲德文，但常常不愿讲。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偏远，所以选择了这家疗养院。汇到图恩银行的钱足以支付疗养院的费用和每个月高达一千法郎的医护费，此外，还可以支配格里高利耶夫新生活所补给的秘密津贴。如果格里高利耶夫觉得需要，还有更多的钱可以提供；他不被允许保留任何账单或收据；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有欺骗的行为，教士很快就会知道。他应该每周探访疗养院，支付账单，并亲自了解那个女孩的情况；驻波恩的苏联大使馆会得到通知说，格里高利耶夫被赋予秘密工作，因此可以享有某些弹性。

接着，教士谈到格里高利耶夫与莫斯科联系的问题。

“他问我：‘你认识信差克拉斯基吗？’我回答说，我当然认识这个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都会到大使馆一次，有时候还来两次，都是和他的伙伴一起。如果你和他交情不错，他可能会直接从莫斯科帮你带一条黑面包来。”

教士说，以后，克拉斯基每周四到波恩时，会在傍晚私下与格里高利耶夫接触，不是在格里高利耶夫家里，就是在他大使馆的房间里，但最好是在家里。克拉斯基来不会讨论任何机密的事，只会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个信封，里头有他在莫斯科的姑妈写的私人信函。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按照指示，在特定的温度下，加上三种在一般市场很容易取得的化学溶液——教士说出三种化学溶剂的名称，格里高利耶夫此时一一复述。教士说，如此一来，信上就会浮现文字，告诉格里高利耶夫下次探访亚莉珊卓时该问哪些问题。在与克拉斯基会面时，格里高利耶夫也要交给他一封给姑妈的信，信中详述妻子格里高利耶娃的近况，当然，事实上是向教士报告亚莉珊卓的近况。这就是所谓的文字密语。以后，倘若需要，教士也会提供给格里高利耶夫秘密通讯器材，但在目前，只用给格里高利耶夫姑妈的密语信就可以了。

然后，教士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张医疗证明，署名的是一位知名的莫斯科医生。

“你在莫斯科的这段期间，因为紧张与工作过度的关系，有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教士说，“医生建议你常骑脚踏车，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妻子也该陪你一起去。”

无论是骑脚踏车还是走路到疗养院，教士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都可以避免汽车上的外交牌照曝光。

因此，教士要他去买两辆二手脚踏车。一整个星期里，哪一天最适合格里高利耶夫去疗养院探访，也是个问题。星期六是一般的探访日，但那太危险了；有些病人的亲朋好友来自波恩，“葛拉瑟先生”的身份也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他们知会院方星期六不可行，于是破例在每周五下午允许探访。大使不会反对，但格里高利耶夫如何能在大使馆例行的工作日里每周五缺席呢？

没问题，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大使馆允许工作人员周五和周六互调，因此，格里高利耶夫只要申请在星期六工作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空出星期五来。

格里高利耶夫的告白到此结束，他对听众露出一个短暂、浅淡的微笑。

“在星期六，有一个签证部门的女孩刚好也在工作。”他对着托比眨眼，“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一些隐秘时光。”

这一次，大家的笑声不像之前那么热烈。时间，就像格里高利耶夫的故事，已用尽了。

他们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突然之间，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要担心，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处理，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保护。他坐在沙发里，装出笑容，但傲慢的气息已离他远去。他顺服地扣紧双手，目光逐一扫过他们身上，仿佛期待接受指令。

“我太太不会骑脚踏车。”他带着忧伤的微笑说，“她试过很多次。”她的失败对他似乎事关重大。“教士从莫斯科写信告诉我：‘带你太太去看她。或许亚莉珊卓也需要母亲。’”他摇摇头，表情呆滞。“她不会骑。在这么重大的机密事件里，我怎么能跟莫斯科说，格里高利耶娃不会骑脚踏车？”或许自史迈利担负执行官角色以来，此刻正是最大的考验，因为他几乎已将暂时的情报来源格里高利耶夫，转变成适时弃暗投明的投诚者格里高利耶夫。

“领事，无论你的长期计划是什么，请你继续留在大使馆，至少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史迈利合上笔记本，正色说，“如果你照我的提议做，将会获得热烈的欢迎，将可以选择在西方的某处展开新生活。”他把笔记本塞进口袋，“但下个星期，你不能去探访亚莉珊卓。你告诉你太太，这是你今天和克拉斯基会面讨论的结果。下个星期四，信差克拉斯基交给你信时，你照常收下，但事后告诉你的太太，亚莉珊卓仍无法会面。用神秘的态度对付她。用神秘蒙蔽她。”

格里高利耶夫接受他的指令，不安地点点头。

“我必须警告你，无论你是犯了最微小的错误，或者尝试耍花样，教士都会发现，并且毁了你。你也将失去接受西方热忱款待的机会。清楚了吗？”

他们给格里高利耶夫联系电话，对他说明从电话亭打到电话亭的程序，史迈利违反一切交易守则地准许格里高利耶夫写下来，因为他知道不写下来，这人根本不可能记得住。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若有所思的颓丧心情离去。托比载他到安全的地点，放他下车，然后回到公寓，举行简短的告别会议。

史迈利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双手合掌，靠在唇边。其他人在米莉·麦克雷格的命令下，忙着收拾善后——擦拭、拂尘、清烟灰、倒垃圾，清除掉所有的痕迹。托比说，每一个在场的人，除了他自己和史迈利之外，都要立刻离开，监视小组也一样。不是今夜，不是明天，是现在。他们正坐在巨大的时间炸弹上：或许就在此时，格里高利耶夫在急欲告白的冲动下，把整个故事，对他那个可怕的老婆全盘托出。如果他告诉爱芙朵琪亚有关卡拉的事，那有谁能确定他不会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不会告诉小娜塔莎，他今天与乔治的恳谈？没有人会觉得被抛弃了，没有人会觉得被踢走了。他们完成了伟大的工作，他们会很快再相见，为成功加冕。他们握手道别，甚至掉一两滴眼泪，但成功在望的远景，让每个人都满心喜悦。

当众人散去，史迈利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有什么感觉呢？表面上看，这是他获得极高成就的时刻。他已完成了自己所计划的一切，甚至犹有过之，尽管他为达目的不得不诉诸卡拉的伎俩。他独力完成一切。今天，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就击溃并策反了卡拉亲手挑选的干员。他孤立无援，甚至还受到那些后来召他回来服务的人的阻挠。他一路独力奋战，直到此刻，他可以坦然地说，他已冲破了最后一道重锁。年岁已大，但他的专业技巧登峰造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他比夙敌更占上风。

另一方面，他的夙敌出乎意料地竟清晰展现了其人性的一面。他不是史迈利竭力追索的那头野兽，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不是机械。他是一个人。而这人的落败，倘若史迈利选择让这样的结局发生的话，全都只因过度沉重的爱。历尽生命沧桑的史迈利，对于这个弱点了然于胸。

俗语说，每一个秘密行动，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时间多。对乔治·史迈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说——尽管两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从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间的日日夜夜似乎数之不尽，而且绝对与来生无关。

他们并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规则，托比说，反而是严守乔治的战争规则。星期天晚上，他们两人都换了旅馆，也换了身份。史迈利撤退到旧城区一家附家具的出租公寓——雅卡；而托比则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顶的汽车旅馆。自此而后，他们利用事先约定顺序的公共电话亭互通消息，如果需要见面，就选择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后各奔东西。托比决定改变他的作息，尽可能不用汽车。他的任务是继续监视格里高利耶夫。一整个星期他都紧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格里高利耶夫享受过豪华的告白飨宴之后，一定会想再享用一回。为了防范于未然，他尽量看紧格里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紧盯人简直就是噩梦一场。例如，格里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离家，走五分钟的路到大使馆。很好！托比就要安排一辆车在七点五十分准时通过那条街。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托比就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紧急状况”，必须在艾尔芬诺宫的花园里紧急会面，并从城里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里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着雪，他想把眼镜擦干净，因此停下来掏手帕，结果，托比一眼就看见公文包在左手，但当他火速在路口回转回来确认时，却看见格里高利耶夫像个疯子似的露齿微笑，对他摇着右手的公文包。据托比自己的说法，他简直要“心脏病发作”了。第二天，关键的星期四，托比和格里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车里会面，让两人可以面对面晤谈。一个小时之前，信差克拉斯基来过，带来卡拉的本周指令，托比看见他进到格里高利耶夫的住处。莫斯科来的指令呢？托比追问。格里高利耶夫心情恶劣，还有点儿醉意。他要一万元才愿意交出那封信，托比很火大，当场威胁要揭发格里高利耶夫；他威胁说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伪持瑞士国籍，滥用外交身份，违反瑞士税法，还有其他十五种罪名，包括好色与间谍罪。这招威胁恐吓的做法果然奏效，格里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经过处理，在每一行之间出现了秘密书写的文字。托比照了几张照片，然后交还格里高利耶夫。

当晚稍后，在乡间的一间小旅店里，托比把卡拉的信拿给史迈利看。卡拉从莫斯科送来的问题，充满了恳求的意味：“……多报告亚莉珊卓的外表与心理状态……她意识清楚吗？她笑了吗？她的笑是开心或悲伤？她个人的卫生习惯好吗？指甲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梳整？医师最近的诊断如何？他建议做其他的治疗吗？”

格里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会晤中的失神，并非因为克拉斯基，并非

因为这封信，更非因为写信的人。他说，他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问他每周五的行踪，这让他沮丧，酒醉。格里高利耶夫只能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怀疑她是莫斯科的间谍，可能是教士所布的线，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来自苏联安全部门其他令人闻之丧胆的单位。托比听到这件事时，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觉得并没有说出口的必要时。

“我告诉她，我不能再和她做爱，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里高利耶夫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无法决定，是不是应该带她一起到澳大利亚展开新生活。”

“乔治，这是个疯人院！”托比气急败坏地对史迈利说，此时史迈利正研究着卡拉那些热切恳求的问题，尽管是用俄文写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能让水坝撑住多久不溃堤？这个家伙根本是疯子！”

“克拉斯基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史迈利问。

“星期六中午。”

“在他离开之前，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安排和他再见一面。他要告诉克拉斯基，说有特别的信息要交给他。很紧急。”

“当然，”托比说，“当然，乔治。”就这样。

乔治心里在想什么？望着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托比不禁纳闷。非常怪异，卡拉给格里高利耶夫的指令，似乎让史迈利很消沉。“我就处在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一个非常沮丧的人之间。”这是托比自己的评论。

托比至少还有老板与手下的反复无常可以烦恼，相形之下，史迈利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可以打发时间，这可能就是他的问题。星期二，他搭火车到苏黎世，在高级餐厅克罗纳霍尔，悄悄地和奉索尔·恩德比之命从伦敦飞来的彼得·吉勒姆吃了一顿饭。他们无法畅所欲言地讨论，但不全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吉勒姆承认自己在伦敦时与安恩谈过，所以也很热心地想知道是否有消息要带回去给她。史迈利冷冰冰地说没有，他的厉色斥责让吉勒姆没齿难忘。下一次——他拐着弯说——或许吉勒姆可以行行好，别插手管他的事。吉勒姆急忙把话题转回公事。关于格里高利耶夫，吉勒姆说，索尔觉得把他卖给美国表弟，要比留在沙拉特好。乔治觉得如何？索尔的看法是，资深的苏联投诚者，能在华盛顿给表弟提供更有用的帮助，即使他并没有什么内情可说；这样说来，格里高利耶夫如果留在伦敦，只不过糟蹋了一坛即将酿成的醇酒。乔治觉得如何，说真的？

“说得也是！”史迈利说。

“索尔也很想知道，你星期五的计划是不是绝对必要？”吉勒姆说，显然颇不情愿。

史迈利拿起餐刀，盯着刀刃。

“对他来说，她比事业还重要。”最后他说，语气难掩消沉讥讽，“她为她偷窃，他为她说谎，他为她冒生命的危险。他必须知道，她的指甲

是不是干净、头发有没有梳。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欠她一面之缘吗？”

欠谁？吉勒姆飞回伦敦去报告时，非常焦虑地想。史迈利指的是他欠自己吗？或者他指的是欠卡拉？但他非常谨慎，没拿他的这些推论向索尔·恩德比夸耀。

远远望去，这里原本可能是一幢城堡，或者是坐落于瑞士酒乡山顶的小农场，塔楼耸立，护城河围绕，穿过有顶盖的桥梁才能进到内院。近看，外表却更具实用性，有着焚化炉、果园，和现代化的别馆，一排排小小的窗户开在高处。在村庄边上，有一块通向此处的指示牌，赞扬此地环境清幽，设备舒适，员工热忱。所属的团体是“跨教派的天主教通神论者”，专收外国病患。古老、沉重的雪花堆积在原野与屋顶上，但史迈利开车行经的道路却很干净。这天，一切都是洁白的；天空与飞雪融为一体，幻化成不可名状的虚无飘渺。门口传达室里，一个执拗的门房当着他的面打电话，获得某人的许可之后，才挥手让他通过。一块停车区标示着“医生”，另一区标示着“访客”，他停在第二区。他按下门铃，一个外貌平凡、穿着灰色修女服的女人来开门，还没开口就先脸红。他听见焚化炉的音乐，厨房瓶瓶罐罐的哐啷声，还有人的声音。这个房子铺的是硬地板，而且没有窗帘。

“费莉希狄院长在等你。”贝缇杜德修女羞涩地低声说。

一声尖叫就能响彻全屋，史迈利想。他注意到，种在盆里的植物都可望而不可即。在标示着“办公室”的门前，陪他进来的修女用力地敲了一敲，然后推开。费莉希狄院长是个高大、看来情绪激动的女人，眼中流露出令人不安的凡俗之气。史迈利在她对面坐下。一个华丽的十字架躺在她硕大的胸部。她一面说话，一面用肥胖的双手抚着十字架。她的德文说得很慢，很有气派。

“那么，”她说，“那么，你是拉奇曼先生。拉奇曼先生是葛拉瑟先生的朋友，葛拉瑟先生这个星期略有微恙。”她把玩着这些名字，仿佛她也和他一样知道这些都是谎言。“他的微恙没有大碍，所以还能打电话，但他确实有恙，所以不能骑脚踏车。对吗？”

史迈利称是。

“别因为我是修女就压低你的声音。我们管理的是一间闹哄哄的房子，但没有人因此而变得比较不虔诚。你看起来很苍白。你感冒了吗？”

“没有，没有，我很好。”

“那你最好离葛拉瑟先生远一点，他患了感冒。去年我们有埃及型感冒，前年是亚洲型感冒，但今年厄运似乎是我们自己的。拉奇曼先生有没有证件，请容我这么问，可以证明他是谁？”

史迈利递给她一张瑞士身份证。

“拿来。你的手在发抖。但你没得感冒。‘职业：教授’”她高声念出来，“拉奇曼先生真人不露相。他是拉奇曼教授。他是哪一科的教授，请

容我这么问？”

“哲学。”

“原来是哲学。葛拉瑟先生呢？他的职业是什么？他从来不对我透露。”

“据我的了解，他在做生意。”史迈利说。

“说一口完美俄文的生意人。你也能说一口完美的俄文吗，教授？”

“啊哈，不行。”

“但你们是朋友。”她递回身份证，“一位苏联裔的瑞士商人，和一位谦逊的哲学教授是朋友。这样啊。我们希望这段友谊获益良多。”

“我们也是邻居。”史迈利说。

“我们全都是邻居，拉奇曼先生。你以前见过亚莉珊卓吗？”

“没有。”

“被送来这里的年轻女孩，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教女。我们有被监护人。侄女、孤儿、表妹、姨妈。各形各色。还有很多姐妹。现在多了一位教授。但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女儿竟是如此稀少。葛拉瑟先生和亚莉珊卓有什么亲戚关系？”

“就我了解，他是欧斯特拉柯夫的朋友。”

“欧斯特拉柯夫先生人在巴黎，但从从不露面。还有欧斯特拉柯娃夫人，也不露面。而今天，葛拉瑟先生也没露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多难掌握世事了，拉奇曼先生。我们自己都很难了解我们是谁，又如何能告诉她们，她们是谁呢？你和她在一起一定要很小心。”铃声响起，宣告午休时间结束。“有时候，她活在黑暗中。有时候，她又看见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痛苦。她在苏联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个错综复杂故事，充满对立，充满鸿沟。如果这不是她病症的成因，也一定是，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主要的骨架。你该不会认为葛拉瑟先生是她的父亲吧？”

“不，不会。”

“我也不这么认为。你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吗？你没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存在吗？亚莉珊卓坚持说他是个幻影。亚莉珊卓有完全不同的出身背景。嗯，我们很多人都是。”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跟她提起我的。”

“就我所知的一切。其实我根本一无所知。你是安东叔叔的朋友，但她根本不承认那是她的叔叔。安东叔叔生病了，这个消息可能让她很高兴，也有可能让她非常担心。我告诉她，她父亲希望有人每周来探望她，但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土匪，在深夜把她母亲推下山去。我叫她要德文，但她可能还是觉得说俄文最好。”

“我了解。”史迈利说。

“那么，你很幸运。”费莉希狄院长回道，“我就没那么运气了。”

亚莉珊卓走进来。起初，他只看见她的眼睛：如此清澈，如此不设防。在他的想像中，他曾勾勒过她的形象，不知为何，他觉得她应该比较高大。她的双唇中心饱满，两端纤细，太过灵巧；而她的微笑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费莉希狄院长叫她坐下，用俄文说了几句话，在她淡黄色的头发上亲了一下。费莉希狄院长离开房间，他们听见她走下回廊时，钥匙叮当作响，还用法文大声咆哮，要修女把脏乱清理干净。亚莉珊卓穿着绿色的长袖袍子，袖子卷起到手肘，肩上披着开襟毛衣，像是披风似的。衣服看起来像是挂在她身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仿佛有人帮她着装来赴会。

“安东死了吗？”她问，史迈利注意到，她脑中所想的事，很自然地流露在表情上。

“没有，安东得了重感冒。”他回答说。

“安东说他是我叔叔，但他不是。”她解释说。她的德文非常好，他想，除了卡拉曾告诉格里高利耶夫的，她母亲有德国血统之外，她是不是也遗传了父亲的语言天分，或者两个原因都有。“他也假装他没有车。”就像她父亲以前曾做过的一样，她不带任何感情、不作任何承诺地盯着他看。“你的单子呢？”她问，“安东每次都带一张单子。”

“噢，我的问题记在脑子里。”

“没有单子，不准问问题。我父亲禁止别人问脑子里的问题。”

“谁是你父亲？”史迈利问。

刹那间，他又只看见她的眼睛，从最隐秘孤独之处，凝望着他。她从费莉希狄院长桌上拿起一卷思高牌胶带，用手指轻划过光滑闪亮的表面。

“我看见你的车。”她说，“‘BE’代表波恩。”

“是的，没错。”史迈利说。

“安东的车是哪一种？”

“奔驰。黑色的。很豪华。”

“他花了多少钱？”

“他买的是二手车。大概花了五千法郎，我可以想像得到。”

“那他干吗骑脚踏车来这里看我？”

“也许他需要运动。”

“不是，”她说，“他有秘密。”

“你有秘密吗，亚莉珊卓？”史迈利问。

她听见他的问题，微微一笑，点了好几次头，仿佛是对着远处的人。“我的秘密是，我叫塔蒂亚娜。”

“很好的名字。”史迈利说，“塔蒂亚娜。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她扬起头，对着墙上的圣像粲然一笑。“不准提这个名字。”她说，“如果你提到这个名字，不会有人相信你，只会把你关进疗养院。”

“但你已经在疗养院里了。”史迈利指出。

她的声音并没有提高，只是加快了。她仍然动也不动，在遣词造句之间似乎连喘息都没有。她的清醒和礼貌令人敬畏。她很敬佩他的亲切，她说，但她知道他是个极度危险的人，比老师和警察都来得危险。卢迪医生捏造了财富、监狱和许多聪明的论调，足令世界依赖谎言而运转，她说。费莉希狄院长太亲近上帝了，她不了解上帝其实就像马一样，需要人骑、脚踢，才能把你带向正确的方向。

“但你，拉奇曼先生，代表了当局的宽大为怀。没错，我怕你是如此。”

她叹口气，给他一个疲倦的宽容微笑，但当他低头看着书桌，却看见她握住自己的拇指，猛力后扳，像要折断似的。

“也许你是我的父亲，拉奇曼先生。”她带着微笑说。

“不是，哎，我没有小孩。”史迈利回答说。

“你是上帝吗？”

“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费莉希狄院长说，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一部分是上帝。”

这一次，换史迈利沉吟良久才回答。他张开嘴，却又不知为何迟疑地闭上。

“你应该要问我，我是不是觉得好些了。”

“你觉得好些了吗，亚莉珊卓？”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她说。

“那么，塔蒂亚娜觉得怎么样？”

她笑起来。她的眼睛充满愉悦的光彩。“塔蒂亚娜的父亲太过重要，无法存在。”她说，“他控制了整个苏联，但他不存在。别人逮捕她的时候，她的父亲会作好安排，让她恢复自由。他不存在，但每一个人都怕他。塔蒂亚娜也不存在。”她又加上一句，“这里只有亚莉珊卓。”

“塔蒂亚娜的母亲呢？”

“她被处罚了。”亚莉珊卓平静地说，她告白的对象是墙上的圣像，而不是史迈利，“她不顺从历史。也就是说，她相信历史走错了方向。她犯错了。人不应该尝试改变历史。只有历史能改变人。我想要你带我走，拜托。我想离开这间疗养院。”

她两手胡乱地互斗，但仍对着圣像微笑。

“塔蒂亚娜见过她的父亲吗？”他问。

“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常常看着孩子们上学。”她回答说。他等待着，但她没再多说什么。

“然后呢？”他问。

“从车里。他会摇下车窗，但他只看着我。”

“你也看着他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他在看我？”

“他长什么样子？他的态度呢？他微笑吗？”

“他抽烟。放轻松，如果你想的话。费莉希狄院长偶尔也喜欢抽根烟。嗯，这很自然，不是吗？抽烟能镇静自我，我听说。”

她按下铃；伸出手，按了长长的一声。他又听见费莉希狄院长钥匙的叮当声，从回廊朝他们走来，她的脚步声在门前暂停，打开门锁，听起来和世界上任何一所监狱一样。

“我想坐你的车离开。”亚莉珊卓说。

史迈利付钱，亚莉珊卓看着他在灯光下一张张数钞票，和安东叔叔的做法一模一样。或许是因为意识到有麻烦，费莉希狄院长阻断亚莉珊卓专注凝神的视线，狠狠地盯着史迈利，仿佛她怀疑他行为不端似的。亚莉珊卓陪着他走到门边，帮助贝缇杜德修女开门，然后非常时髦地握着史迈利的手，抬起手肘前伸，屈下前膝。她想要亲吻他的手，但贝缇杜德修女不让她这么做。她看着他坐进车里；她开始挥手；车一开动，他就听到她近在耳边的尖叫声，看见她想要打开车门，与他一起上路。但贝缇杜德修女抓住仍然尖叫不已的她，往后拉进房子里。

半个小时之后，在图恩上周观察格里高利耶夫造访银行的同一家咖啡馆里，史迈利将早已准备妥当的信交给托比。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交给克拉斯基，今晚或其他约定的会面时间。

“格里高利耶夫想要在今晚投诚。”托比反驳说。

史迈利大声怒斥。他这一生从未如此，大声怒斥。他的嘴张开，大声怒斥，整个咖啡屋都为之震惊——吧台女侍从征婚广告中抬起头，角落里的四个牌友，至少有一个转过头来。

“还不行！”

接着，为了显示他已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心平气和地再说一次：“还不行，托比。原谅我，还不行。”

史迈利通过格里高利耶夫送给卡拉的信，没有副本存在，或许史迈利原就有意如此，但信的内容倒无太大疑问，因为就这种卡拉喜欢称之为施压的艺术而言，卡拉自己就是个内行。史迈利会罗列赤裸裸的事

实：亚莉珊卓是他的女儿，她已死的母亲有反苏联倾向；他佯称她是秘密情报员，以非法的手段安排她离开苏联；他盗用公家的钱与资源；他策划了两起谋杀，或许也导致了基洛夫被处死，一切都只为了保护他的犯罪计划。史迈利会指出，这些历历事证已然足够让卡拉在莫斯科中央的地位岌岌可危，必遭同僚的清算；倘若这一切果然发生，她女儿在西方的未来——她持伪造身份证居留——将极不确定，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金钱来源，亚莉珊卓会终生流放，贫病交加，从一家公立医院转到另一家公立医院，没有朋友，没有文件，名下也没有一毛钱。最糟的情况是，她可能会被送回苏联，面对她父亲仇敌的无情报复。

威胁之后，他施以利诱，就像二十年前他在德里提供给卡拉的条件一样——保全自己，到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就给你一个家。精彩回放，索尔·恩德比后来说，他喜欢用运动作比喻。史迈利答应给卡拉豁免权，让他不致作为瓦拉狄米尔谋杀案的共犯而遭起诉；而恩德比从德国联络处得到的消息也证实，他在奥图·莱比锡的谋杀案也有豁免权。毫无疑问，史迈利也保障了亚莉珊卓在西方的未来——医疗、照护，如果必要的话，也提供国籍。他是否故技重施，就像他以前在德里所做的一样？他是否诉诸卡拉的人性——现在已如此清楚呈现的人性？他是否增添了一些高明的调味料，用以减轻卡拉的羞愧，而且也了解他的自尊心，让他不致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

当然，他只给卡拉很短的时间作决定。卡拉一定很清楚，这也是施压的金科玉律：思考的时间是很危险的。除此之外，在这案子里，也有理由相信，思考的时间对史迈利而言也是危险的，虽然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他很可能在第十一个钟头突然心肠变软了。只有立即付诸行动，沙拉特口耳相传的要诀如是说，才能强迫猎物溜出套在身上的绳索，对抗与生俱来、或教化而来的种种冲动，毅然航向碧海蓝天。在这个案子里，这个说法或许同样适用于狩猎者。

这就像把钱全押在黑牌上，吉勒姆望向咖啡屋窗外，一面想着：你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妻子，你还没出世的孩子。然后等待着，一小时又一小时，等着庄家旋转赌轮。

他早已见识过柏林，当时这里还是冷战世界的首都，当时从东到西的每一个交会点，都陷入重大外科手术式行动的紧张状态。他还记得，在像这样的夜晚，大批柏林警察和盟军士兵常群集在弧光灯下，跺着脚，咒骂寒夜，烦躁地把来复枪在两肩换来换去，呼出的白色雾气，喷到彼此脸上。他还记得，坦克车蓄势待发，发动机轰隆隆地保持运转，枪管挑选着另一边的目标，虚张声势。他还记得，突如其来的警报悲鸣，军警冲向伯诺尔街或有人企图逃跑的其他地方。他记得，消防队的云梯升起；命令说回击；命令说不要；死者，有些是情报员。但今夜之后，他只会记得像这样的夜晚：如此阴暗，让你想要带只手电筒上街；如此沉寂，让你可以听见河对岸来复枪扣上扳机的声音。

“他会用什么掩护？”他问。

隔着小小的塑料桌，史迈利坐在他对面，手里握着一杯凉掉的咖啡。在外套里，他看起来非常小。

“朴素的东西。”史迈利说，“适合的东西。渡河来的，大多是领养老金的老人，我猜。”他抽着吉勒姆的烟，注意力似乎全在烟上。

“领养老金的人干吗来这里？”吉勒姆问。

“有些来工作，有些来探亲。恐怕我没仔细问。”

吉勒姆还是不太满意。

“我们领养老金的人不想让人知道内情。”史迈利卖弄幽默地加上一句，但不太成功。

“你告诉我了。”吉勒姆说。

咖啡馆位于土耳其区，因为在现今的西柏林，土耳其人是最穷困的白人，这里的地产因靠近围墙，所以最糟，也最便宜。史迈利和吉勒姆是仅见的两名外国人。在一张长桌上，坐了一家土耳其人，嚼着无味的面包，喝着咖啡和可口可乐。孩子们头发修短，有着难民般困惑的大眼睛。老旧的录音机里传来伊斯兰音乐。硬纸板搭成的伊斯兰式拱形门廊，垂下一条条塑料彩带。

吉勒姆的目光又飘向窗外那座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架铁路的桥柱，接着是一幢老旧的砖房，山姆·科林斯和他的团队已偷偷征用此地作为观测中心。过去两天，他的手下已悄悄进驻。然后，他看见钠弧光灯的白色光晕，后面是一道栅栏关卡，接着是一座碉堡，再来是桥。这座桥仅供行人通行，要过桥，只能穿越一条像赏鸟步道般围以铁栅的走

廊，有些部分只容有一人的宽度，有些部分则有三入宽。偶尔，有人通过，都保持着低调的神态，稳定的步伐，避免引起哨塔的警觉，然后抵达西方，踏进弧光灯的光晕中。在日光下，赏鸟步道是灰色的；在夜晚，不知为何是黄色的，而且异常明亮。碉堡位于边界内约一两码处，屋顶正控制住关卡；但掌控一切的是塔楼：耸立在桥中央的铁黑长方柱体。连雪都避塔楼而远之。雪落在阻断桥梁交通的混凝土锯齿上；雪片在光晕里飞舞，在关卡旋绕，然后落在潮湿的鹅卵石上；但哨塔却独独幸免，仿佛雪花也不能凭自由意志欺近前来。在超出光晕笼罩的范围处，赏鸟步道缩窄成最后一道大门和一个牛栏。但那道大门，托比说，可以从碉堡内部电动控制，只要一有情况就可以立即关闭。

时间是十点三十分，但也可能是凌晨三点，因为沿着边界，西柏林已在黑暗中沉睡。在靠内陆的部分，这个孤岛城市可能还喧闹不休、酒色横流、纸醉金迷；“新力”的商招、重建的教堂与议事厅可能灯火辉煌，像游乐场；但边界地带从晚上七点就一片漆黑沉寂。靠近光晕处，矗立着一棵圣诞树，但只有上半部有灯光，从河对岸望去，也只有上半部看得见。这是一个绝无妥协的地方，吉勒姆想，这是一个没有第三条路的地方。无论他偶尔对西方民主抱持如何保留的态度，在此地，在这个边境，就像其他许多事一样，一切都已消逝无踪。

“乔治？”吉勒姆轻声说，疑问的眼光瞥向史迈利。

一个工人蹒跚地走进光晕里。他似乎挺起身子，就像所有人在走出赏鸟步道那一刻所做的一样，仿佛从背上卸下了负担。他带着一个小手提袋，和一个像铁路工人用的灯。他身形瘦小。但史迈利即使曾注意过这人，此时也已将注意力转回他棕色外套的衣领，沉湎于孤寂、遥远的思绪中。“如果他要来，就会准时到达。”史迈利曾这么说。那么，我们何必提早两个小时到这里？吉勒姆想问。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像两个陌生人，从小杯子里喝着甜咖啡，吸着这间差劲的土耳其厨房的油烟，谈着无聊的陈腔滥调？但他早已知道答案。因为我们有义务，如果史迈利有谈话的心情就会这么说。我们有义务关心，有义务等待，在这人努力逃离他所协助建立的制度时，我们有义务彻夜警戒。因为只要他企图奔向我们，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没有其他人站在他那一边。

他会来，吉勒姆想。他不会来。他可能会来。如果这不是祷告，什么才算是？

“还要来点咖啡吗，乔治？”

“不，谢谢，彼得。不，我不想，不。”

“他们好像有什么汤。除此之外就只有咖啡。”

“谢谢你。我想我已经喝够了。”史迈利说。他的语气非常平淡，仿佛乐于让别人听见似的。

“嗯，也许我还是要点一些东西，替他们分担租金。”吉勒姆说。

“租金？对不起。当然。天知道他们是靠什么过活的。”

吉勒姆点了两杯咖啡，并付了钱。他思虑周密，一走过去就付钱，以防他们匆忙离开。

看在乔治的分上，一定要来，他想；看在我的分上，一定要来。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来，这是我们梦想已久、却永远无法实现的丰收。

“你说宝宝什么时候出生，彼得？”

“三月。”

“噢，三月。你取好名字了吗？”

“我们还没认真想。”

对街，有一家卖锻铁、锦缎、假毛瑟枪、白镏之类回收再生的家具行，在门口灯光下，吉勒姆认出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巴尔干毛皮帽的身影，正假装细看商品。托比和他的团队负责这条街，山姆·科林斯掌控观测据点，各司其职。至于逃离现场的车辆，托比坚持要用出租车。现在，出租车就停在那里，总共三辆，毫不起眼，在车站拱门的暗处，雨刷上夹着纸条写道：“暂停服务”，司机站在小吃摊旁，吃着盛在纸盘里的甜酱热狗。

这个地方是地雷区，彼得，托比曾警告说。土耳其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一大堆恶棍。连该死的猫都会监听，一点也不夸张。

别窃窃私语，史迈利命令道，别喃喃自语，彼得。告诉科林斯。

来吧，吉勒姆热切地想。我们全在这里支持你。来吧。

吉勒姆的目光从托比背后，慢慢转到科林斯观测据点所在的那幢老房子的顶楼窗户。吉勒姆曾担任过柏林的任务，这样的观测工作他做过不下十次。望远镜、照相机、定向麦克风，所有无用的硬设备，只为了想让等待变得更轻松；无线电的噼啪声，咖啡和香烟的气味；双层床。他想像着，那个被挑选上的西德警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带到这里，而且要一直待到行动放弃或成功为止。这人对这座桥了如指掌，一眼就能从散兵游勇中辨识出正规军，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也能在噩运降临的一刹那掌握住：寂静地躲过监视，民警的狙击手悄悄定位。

但如果他们对他开枪呢？吉勒姆想。如果他们逮捕他呢？如果他们留下他——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况且他们以前也这样对待其他人——脸朝下，躺在距弧光灯光晕不到六英尺处的赏鸟步道上，流血致死？

来吧，他想，已经不像之前那般确定，希望他的祷告能划过东部的黑色天际线。尽管如此，还是来吧。

一丝纤细而异常明亮的光线掠过观测站那幢房子楼上面西的窗户，让吉勒姆站了起来，他转头看史迈利，但史迈利已冲向门口。托比·伊斯特哈斯在人行道等他们。

“这只是有可能而已，乔治。”他用着准备让大家失望的语气轻声

说，“只有极小的机会，但他可能是我们的人。”

他们一语未发地跟着他。寒意逼人。他们经过一家裁缝店，两个黑发女郎在窗下缝衣。他们经过贴满海报的墙面，有廉价的滑雪假期，还有咒骂法西斯主义、伊朗国王的标语。寒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在飞旋的雪花中，吉勒姆转过头来，瞥见一个用旧铁轨枕木搭成的儿童游戏场。他们在阴暗、死寂的建筑中穿梭，然后右转，穿过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在刺骨冰寒的夜黑中抵达河岸。一座老旧的木制防弹掩体，开有用来架设来复枪的枪洞，让他们对桥上的动静一览无遗。在他们左边，一个装饰着倒刺铁丝的木头十字架，耸立在充满敌意的河流旁，纪念着某个逃亡未能成功的人。

托比静悄悄地从外套里掏出一副双眼望远镜，交给史迈利。

“乔治，听着，祝你好运，好吗？”

托比的手在吉勒姆的手臂上握了一下，然后倏地离开，隐没入黑暗之中。

掩体因树叶腐化与湿气而充满臭味。史迈利蹲在来复枪洞前，软呢斜纹外套的衣摆拖在泥泞里。他观察着面前的场景，仿佛自己漫长的一生在眼前展开。河面宽阔，水流缓漫，因寒冷而升起一层雾气。弧光灯照亮河面，雪花在光束中飞舞。跨河而过的桥梁站在胖胖的石墩上，接近水面处，露出粗裸的柱脚。桥墩之间的空间呈拱形，只有正中央的空间四四方方，便于行船。但此时，惟一的船只是系泊在东边河岸的灰色巡逻艇，而这艘船惟一提供的交易，就是死亡。桥后面，宛若一片庞大阴影的，是高架铁路，但和河一样，被弃被遗忘，没有任何火车通过。远处河岸的码头如怪物般矗立，仿佛未开化时代的牢狱船；桥梁的黄色鸟道像要从码头凌空跃起，俨然一条暗夜中的奇幻光道。占地利之便，史迈利可以通过双眼望远镜看见全景：从东岸灯光照耀的白色军营，到高耸的黑色哨塔，再缓缓下降到西岸；从牛栏，到控制大门的堡垒，最后再到光晕。

吉勒姆站着，就在史迈利背后几英尺处，但在史迈利的感觉里，吉勒姆却可能远在巴黎。他看见一个孤单的黑色身影展开旅程；他看见那人抽了最后一口烟，烟头闪着火光；那人在鸟道上，把烟蒂丢过栏杆，在水面溅起水花。那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工人的半长外套，工人用的背包斜挎瘦小的胸前，走得不快也不慢，就像个习惯走长路的人。一个小个子的男人，相较于腿来说，身体似乎太长了；头上没戴帽子，只顶着雪花。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小个子男人走过桥来。

“是他吗？”吉勒姆低声问，“乔治，告诉我，是卡拉吗？”

别来，史迈利想。射他，史迈利想，对着卡拉的手下而非他自己的手下说。突然之间，他预见了可怕的事，这个小小的人影就要挣脱他背后的黑城堡了。射他，从哨塔开枪；射他，从堡垒开枪，从白色的军营开枪，从牢狱码头的黑人窝里开枪。在他面前关上大门，摧毁他，你们自己的叛徒，杀了他！在他奔驰的想像中，一个个场景浮现眼前：最后

一分钟，莫斯科中央发现卡拉的罪行，打电话通知边界“不计代价阻止他！”枪击，从不嫌多，多得足以击中目标一次、两次，然后等待。

“是他！”吉勒姆低声说。他已从史迈利毫无抵抗能力的手中取过望远镜。“是同一个人！你在圆场墙上挂的那张照片！乔治，你真是太神了！”

但史迈利在自己的想像中，只看到民警的探照灯集中在卡拉身上，他像车头灯下的野兔，在雪地上显得如此黝暗；他看见卡拉无助老人似的奔逃，想躲开子弹，不让自己像碎布娃娃般倒卧地上。和吉勒姆一样，史迈利以前也曾目睹这一切。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河面，望进一片黑暗之中，一阵邪恶的晕眩向他袭来，仿佛他奋力对抗的恶灵已欺身向前，无论他如何挣扎，恶灵都已掌控他，向他追索，骂他叛国贼；恶灵嘲笑他，但却也为他的背叛喝彩。卡拉背负的是史迈利怜悯的魔咒；而史迈利背负的则是卡拉狂热的魔咒。我用自己所嫌恶的武器摧毁了他，而且还是他的武器。我们穿越了彼此的边界，我们两个是无主之人，在这片无主之地。

“继续前进。”吉勒姆自言自语，“继续走，别停下来。”

接近哨塔的阴影时，卡拉放慢了脚步，在那一瞬间，史迈利真的以为他可能改变心意，向东德自首。然后，他看见一丝宛如猫舌的火光亮起，卡拉又点了一根烟。用的是火柴还是打火机呢？他很想知道。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

“老天，他可真冷静！”吉勒姆说。

小小的身影又开始移动，但脚步变慢，仿佛他越来越虚弱。他正燃起自己的勇气，走完最后的路程，史迈利想，又或者，他正努力浇熄自己的勇气。他想起瓦拉狄米尔和奥图·莱比锡，以及死去的基洛夫；他想起海顿和自己一生工作的毁灭；他想起安恩，因为卡拉的诡诈和海顿的计诱而让他永远蒙羞。他绝望地列举所有的罪行——拷问、杀人和无休无止的堕落阴谋——所有罪行，都在桥上踽踽独行之人虚弱的肩上，但又无法停驻。他不要这些，不要这样得来的战利品。锯齿状的天际线，宛如裂隙，再次向他招手。顷刻之后，史迈利就站在了雾气迷蒙的河边。

他们沿着拖船道走，吉勒姆领头，史迈利颇不情愿地跟随在后。弧光灯的光晕在他们前面，越靠近就越炽热。像两个普通行人，托比叮嘱说，就走到桥边等候，这很正常。从周围的黑暗中，史迈利听见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在紧张状态下迅速行动的快速但微弱的声音。“乔治，”有人低声说，“乔治。”在黄色的电话亭里，一个看不清的人影举起手，悄悄地敬了个礼，他听见一句“胜利”从潮湿冰冷的空气中潜行而来。雪花模糊了眼镜，他很难看得清楚。观测据点在他们的右边，窗里没有一丝光影。他看到门口停了一辆厢型车，知道那是柏林邮局车，托比的最爱。吉勒姆踌躇不前。史迈利听见一句“领大奖”之类的话。

他们走到光晕的边缘。一个橘色的寨垒阻断了桥上的视线，也隐蔽

了他们的诡计。从哨亭看不见他们。托比·伊斯特哈斯爬得比圣诞树还高，拿着双眼望远镜站在观测台上，冷静地扮演着冷战观光客的角色。一个丰满的女看守员站在他身边。一张陈旧的告示警告他们，风险自负。从他们背后倾圮的砖砌陆桥，史迈利辨识出一个久已遗忘的徽章纹饰。托比用手做了个小动作：竖起拇指，他是我们的人了。越过寨垒，史迈利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和铁栏杆的震动。他闻到美国烟的气味，冰冷寒风吹送，人未到，烟先闻。还有一道电动门，他想，他等待着大门猛然关上的铿锵声，但什么都没有。他突然想到，他不知如何称呼夙敌的真名，只有化名，一个女性化的名字。甚至连他的军阶也是一个谜团。史迈利仍然踌躇不前，像个拒绝上舞台的人。

吉勒姆挨近他身边，似乎努力催促他前进。他听见轻微的脚步声，是托比的监守员一个接一个地聚集在光晕边缘，在寨垒的安全庇护下，屏息等待目标的出现。突然之间，他就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神不知鬼不觉溜进拥挤厅堂的人。他瘦小的右手空空地垂在身侧，左手怯怯地横过胸前，拿着一根烟。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没戴帽子，背着背包。他向前走了一步，站在光晕里，史迈利看见他的脸，刻满岁月痕迹，饱经旅途风霜，雪花染白了一头短发。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衬衫，打着黑领带，看起来就像要去参加朋友葬礼的贫民。刺骨寒风让他缩紧脸颊，年岁益增几分。

他们面对面；他们可能隔了一码的距离，比在德里监狱时来得远。史迈利听见更多的脚步声，这次是托比笨重迟缓地从观测台的木梯上走下来。他听见轻轻的话语和笑声；他认为自己甚至听见了轻轻的拍手声，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是不是幻听；到处人影幢幢，但一站到光晕中，他就很难看得清。保罗·史柯戴诺悄悄向前，站在卡拉身边；尼克·狄·席尔斯基站在另一边。他听见吉勒姆叫某个人在他们下桥之前去把该死的车开过来，载他回去。他听见某个金属的东西掉落在鹅卵石上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安恩的打火机，但其他人似乎都没注意。他们又交换了眼神，也许在那一瞬间，两人都在彼此身上看见自己的一部分。他听见汽车轮胎的吱嘎声，车门打开的声音，发动机的运转声。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走近车子，卡拉与他们一起，尽管他们并没碰他；他似乎已习惯于囚犯的那种顺从态度；他已在严格的学校里学到了这一切。史迈利向后退，他们三个慢慢地在他身前走过，全都全神贯注、一本正经地注意着他。光晕里空无一人。他听见车门关上，车子开走的声音。他听见另两辆车跟在后面，也或许是一起离开。他没目送他们离去。他感觉到托比·伊斯特哈斯伸手抱住他的肩膀，也看见托比的眼中闪着泪光。

“乔治，”托比开口说，“你这一辈子，真是精彩！”

但是，史迈利的不为所动，让托比放开了手。史迈利迅速走出光晕。安恩的打火机唾手可得，就在非常接近光晕的地方，斜斜躺着，在鹅卵石上像黄铜般闪闪发亮。他想过要捡起来，但却似乎没有必要，其他人也似乎都没看见。有人握他的手，有人拍他的肩。托比迅速制止他们。

“保重，乔治。”托比说，“一切顺利，听到了吗？”

史迈利听见托比的团队一一离去，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彼得·吉勒姆。沿着堤防走回一小段路，几乎到了十字架矗立的地方，史迈利再看了桥一眼，仿佛想知道有没有任何改变，但显然没有，只有风势微微加强，雪花仍四处飞旋。

彼得·吉勒姆碰了碰他的手臂。

“来吧，老朋友，”他说，“该是睡觉的时间了。”

史迈利习惯性地摘下眼镜，心不在焉地用领带宽的一头擦拭，尽管他还得从斜纹软呢外套里拉出领带。

“乔治，你赢了。”他们慢慢走向车子时，吉勒姆说。

“是吗？”史迈利说，“是的，没错，我猜我是赢了。”